

[英] 伯内特·博洛滕

Burnett Bolloten

戴大洪 译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 西班牙 内战

革命与反革命

新星出版社  
XINGXING PUBLISHING

# THE SPANISH CIVIL WAR



THE  
SPANISH  
CIVIL  
WAR

西班牙内战【中】

革命与反革命

[英] 伯内特·博洛滕

Burnett Bolloten

戴大洪 译

新星出版社  
XINGXING PUBLISHING

THE  
SPANISH  
CIVIL  
WAR

西班牙内战【上】

革命与反革命

[英] 伯内特·博洛滕

Burnett Bolloten

戴大洪 译

新星出版社  
XINGXING PUBLISHING

THE  
SPANISH  
CIVIL  
WAR

西班牙内战【下】

革命与反革命

[英] 伯内特·博洛滕

Burnett Bolloten

戴大洪 译

新星出版社  
XINGXING PUBLISHING

# 目录

封面

上册

[二〇一五年英文版序](#)

[一九九一年英文版序](#)

前言

作者说明

译者说明

文前

[第一部分 内战、革命及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共和国的垮台](#)

[第一章 酝酿剧变](#)

[第二章 左派的分裂与僵持](#)

[第三章 军事叛乱与内战](#)

[第四章 革命与第三共和国的崛起](#)

[第五章 革命打击小资产阶级](#)

[第六章 农村的革命、自由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第二部 共产党的崛起](#)

[第七章 中产阶级的希望](#)

[第八章 人民阵线](#)

[第九章 外国干涉](#)

[第十章 将革命伪装起来](#)

[第十一章 拉尔戈·卡瓦列罗组成新政府](#)

[第十二章 共产党争夺控制权](#)

[第十三章 胡安·内格林博士和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第十四章 运往莫斯科的西班牙黄金](#)

[第十五章 苏联的影响、政治欺骗和阿萨尼亚总统的困境](#)

[第十六章 错综复杂的东西方外交斗争中的西班牙](#)

[第十七章 向英法伸出橄榄枝](#)

[第三部分 抑制革命](#)

[第十八章 无政府主义哲学与政府](#)

[第十九章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加入政府](#)

[第二十章 遏制革命委员会](#)

[第二十一章 治安力量](#)

[第二十二章 国有化对集体化](#)

[第二十三章 一个新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

[第二十四章 平衡各个阶层的力量](#)

[中册](#)

[第四部分 从革命的民兵武装到正规军](#)

[第二十五章 革命的民兵武装](#)

[第二十六章 纪律与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

[第二十七章 第五团](#)

[第二十八章 人民军](#)

[第二十九章 何塞·阿森西奥将军，拉尔戈·卡瓦列罗向共产党人挑战，政府撤离马德里](#)

[第三十章 保卫马德里、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和国际纵队，米亚哈、罗霍和克莱贝尔](#)

[第三十一章 苏联军官、记者和外交官](#)

[第三十二章 自由主义运动与正规军](#)

[第三十三章 钢铁纵队](#)

[第三十四章 拉尔戈·卡瓦列罗与莫斯科决裂](#)

[第三十五章 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压力加大](#)

[第三十六章 拉尔戈·卡瓦列罗进行反击](#)

[第五部分 共产党人获胜](#)

[第三十七章 西班牙共产党讨好社会党温和派](#)

[第三十八章 加泰罗尼亚：军事叛乱与社会革命](#)

[第三十九章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崛起、民兵委员会的解散](#)

[第四十章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托洛茨基分子](#)

[第四十一章 加泰罗尼亚走向公开交战](#)

[第四十二章 五月事变（一）](#)

[第四十三章 五月事变（二）](#)

[第四十四章 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

[第四十五章 胡安·内格林上台](#)

[第六部分 革命陷入低潮](#)

[第四十六章 内格林政府与自由主义运动的反应](#)

[第四十七章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取代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主导力量](#)

[第四十八章 共产党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第四十九章 与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关的重要情况](#)

[第五十章 破坏集体农庄和解散阿拉贡地方委员会](#)

[下册](#)

[第七部分 拉尔戈·卡瓦列罗和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失势](#)

[第五十一章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挑战西班牙共产党](#)

[第五十二章 共产党讨好全国劳工联合会](#)

[第五十三章 拉尔戈·卡瓦列罗退出政坛，劳动者总工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签订联合协议](#)

[第五十四章 将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赶出国防部](#)

[第八部分 共产党的影响达到巅峰](#)

[第五十五章 第二届内格林政府，共产党在军队中占据支配地位](#)

[第五十六章 共产党对安全部门的控制](#)

[第五十七章 加泰罗尼亚与八月危机](#)

[第九部分 怀疑、分歧、灾难激增，共产党的影响减弱](#)

[第五十八章 祸起萧墙](#)

[第五十九章 人民在为什么而战？](#)

[第六十章 内格林的十三点战争目标](#)

[第六十一章 英-法干预的希望破灭](#)

[第六十二章 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

[第十部分 抵抗政策终止](#)

[第六十三章 内格林返回中南部地区](#)

[第六十四章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西普里亚诺·梅拉与自由主义运动](#)

[第六十五章 寻找替罪羊](#)

[第六十六章 内格林逃之夭夭与第三共和国的末日](#)

[致谢](#)

[索引](#)

[参考资料](#)

本书由 “[ePUBw.COM](http://ePUBw.COM)” 整理，[ePUBw.COM](http://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电子书下载！！！！

# 封面



[英] 伯内特·博洛滕

Burnett Bolloten

戴大洪 译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 西班牙 内战

革命与反革命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本书由 “[ePUBw.COM](http://ePUBw.COM)” 整理，[ePUBw.COM](http://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 上册

## 二〇一五年英文版序

西班牙内战（1936—1939）的专家们应当熟悉伯内特·博洛滕这个名字，对这场史诗般的战争充满兴趣又受过教育的非专业人士可能也熟悉这个名字。在那些非常了解博洛滕的人看来，他是一个热心而且慷慨的人，轻松地显示出关于内战的渊博知识，即使表现得节制有度。因此，尽管从未打算成为一名学者或者希望正规机构资助自己的研究，他的历史专著仍然广为人知并且受到相关领域权威人士的高度重视，这些著作已被翻译成欧洲和亚洲的多种语言。当博洛滕于一九八七年去世时，他在身后留下了一笔令人肃然起敬的学术遗产，不仅包括他自己的著作，而且包括保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举世闻名的伯内特和格拉迪丝·博洛滕西班牙内战资料集。

### 伯内特·博洛滕与西班牙内战

伯内特·博洛滕（1909—1987）以其毕生精力所从事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研究始于一九三六年七月。那一年七月十八日傍晚，本打算在西班牙短时间旅游的博洛滕来到巴塞罗那，开始了十分令人期待的两周度假。第二天凌晨，听起来像是使劲拍打地毯的声音把他吵醒，实际上，这是从旅馆附近街头传来的枪炮声。他所下榻的西班牙



牙旅馆位于巴塞罗那的市中心，战斗正在那里的大街上进行。西班牙内战爆发了。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如旋风般席卷着城市的事态发展深深地吸引了博洛滕——他亲眼目睹了对教堂的洗劫以及对工商企业（包括他所住的旅馆）和公共场所的革命性接管——以致他认定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开启记者生涯的良机。在给合众通讯社伦敦办事处（他曾于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期间为合众通讯社工作过）拍发了加急电报之后，合众通讯社要求他作为该社的通讯记者之一留在西班牙采访报道西班牙内战。从这一刻起，博洛滕将从不同的方面采访内战，记录无政府主义者在靠近阿拉贡前线的地区所进行的集体化实验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报道马德里、阿利坎特、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战线的后方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直到他于一九三八年离开西班牙为止。

在此期间，博洛滕不仅得到了某些重大事件——例如一九三七年的五月危机——的第一手信息，而且直接认识了共和派方面的一些重要的内战参与者。他在所到之处遇见并且采访了性格各异的人物，例如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和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前者是社会党工会的资深领导人，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曾经担任共和派政府总理；后者是一名深受民众喜爱的无政府主义斗士，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马德里前线死难后获得了近乎传奇的地位。博洛滕还遇见了一些卷入西班牙内战的著名外国记者、艺术家和文学家。他遇见的这些名人当中有《芝加哥论坛报》的杰伊·艾伦，西班牙诗人莱昂·费利佩，英国诗人和作家W.H.奥登、斯蒂芬·斯彭德和拉尔夫·贝茨，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约翰·多斯·帕索斯以及墨西哥壁画家阿尔法罗·西凯罗斯。众所周知，内战还在好莱坞引起了轰动，因此，文艺明星作为名人游客去西班牙旅游并不少见，例如英俊小生、万人迷埃罗尔·弗林。博洛滕碰巧在巴伦西亚的共和派政府新闻审查办公室里遇见他，这使博洛滕发出了一条独家新闻。几天后，当传说弗林在马德里前线失踪时，博洛滕看到人们到处寻找的这位

澳大利亚演员正在一个露天水果摊买东西。

博洛滕到西班牙将近两年时，作为战地记者他的工作出现了疲态，这使他不得不考虑休息一下。一九三八年春天，他决定接受莱昂·费利佩的建议，与新婚不久的演员妻子格拉迪丝·艾薇·格林去墨西哥，这样一来他就能把自己在内战中的见闻感受整理记录下来。当年五月，博洛滕夫妇乘坐“玛丽女王”号客轮的三等舱动身前往墨西哥，他们随身携带了几个柳条箱，里面装着博洛滕在西班牙当记者期间所搜集的各种资料（报纸的剪报、小册子等等）。一九三九年四月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当成千上万各种政治色彩的共和派流亡者在墨西哥避难时，博洛滕得到了采访其中许多人的绝佳机会，这些人与他正在记录的重大事件直接有关。通过与这些事件参与者的交谈，他对内战有了某种更加精准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接受他的采访并且向他提供文件证据的许多内战人物是军队的领导人，例如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他是共和派空军司令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宣传家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的丈夫；还有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和何塞·米亚哈将军，整个内战期间，这两个人在共和派的军事行动和政治事务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鉴于出现了这些新情况，博洛滕决定扩大原计划的范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利用我有幸得到的这些个人证言和文件，写一部全面的内战史”。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博洛滕着手实施一项艰难的计划：扩充一九三八年离开西班牙时随身携带的本已庞大的原始资料库。他开始大量搜集与内战和革命有关的内容广泛的文献资料。为了得到内战期间出版的地方报纸和记述内战的印刷品，他在西班牙全国的省级报纸上刊登广告。与此同时，他走遍欧美各国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到处搜寻书籍、小册子和政府文件（战争在欧洲大陆爆发后，他从德国和意大利得到了刊期完整的几种报纸）。接着，在妻子的协助下，博洛滕用十年时间撰写了一部关于内战的历史专著，并将他为这部专著筹措资金而被迫出售的数百份报

纸、期刊和小册子誊抄打印成简易的副本，同时整理编辑了很可能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西班牙内战个人资料集。

博洛滕撰写的这部历史专著的初稿反映了一九三六年离开祖国之后左派政见和意识形态对他的影响。他在墨西哥的私人交往——特别是与臭名昭著的共产国际成员维托里奥·维达利（化名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的友好关系——反而有助于强化他对西班牙内战的马克思主义认识。他先前表明的关于左派政治斗争的看法得到维达利的真心赞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首先是因为这些看法非常接近共产党人的观点：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是分裂共和派阵营的力量。然而，当博洛滕的分析逐渐开始明显背离共产党的正统路线——例如他拒绝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描绘成一个“托派”组织——时，孔特雷拉斯建议他停止写作，“休息一下”。正是在其撰写历史专著的这一关口，博洛滕断定，他必须迁离墨西哥城，在墨西哥某个可以为他的工作提供较为自由的环境的地方重新安顿下来。尽管这次搬家并不意味着他正式断绝了与共产党人的私人关系并且不再赞同他们的思想，但是，离开墨西哥城标志着，他开始与他们的史学观点拉开距离。

随后的八年时间里，博洛滕夫妇迁居于墨西哥各地。他们先是落户瓜达拉哈拉，接着又去了诺加莱斯和索诺拉，最后居住在恩塞纳达。在这些新的居住地，博洛滕逐渐开始形成与共产党人背道而驰的内战观念。发生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是他不再承受必须与共产党人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的外部压力，而在墨西哥城，他受到的正是这种压力。他刚刚开始与之交往的生活在首都之外的共和派流亡群体对博洛滕此时的思想产生了另一种影响。例如，在瓜达拉哈拉，他开始采访无政府主义者、前马

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和前共产党人，这些人关于内战的个人证言与博洛滕本人对当时政治现实的印象产生了共鸣，他在西班牙对内战进行报道时，亲眼目睹了这种现实。此外，他们对于内战的看法得到了大量文献资料的证实，自从来到墨西哥后，他一直不停地搜集这种资料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研究中。为了将关于他现在认知的内战的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说法统一起来，博洛滕认为有必要为自己对共和派政治生活的研究构建一个更加复杂的阐述体系，这一体系不仅要考虑有时是相互抵触的光怪陆离的左派观点的复杂性，而且要建立在大量内容广泛的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的基础上。从这时起，他对内战的历史分析将围绕着两个最重要的主题进行。一个主题关系到一九三六年七月的军事叛乱所引发的那一场由无政府主义者推动的人民革命。作为记者，博洛滕去过共和派控制区的许多地方，由于所到之处亲眼目睹的革命性变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被下面这一事实所困扰：无论是在内战期间还是战后，共产党人竭力掩盖的正是那场革命的存在。他对那场革命的回忆与共产党人在宣传中对共和派事务的非革命阐述有明显的差异，在他看来，这种差异需要得到某种解释。因此，他将自己的研究置于人民革命的背景之下。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认识到，他的分析的主攻方向必须围绕着一个内容更加广泛的主题，它包括以共产党人为中心的左派政治斗争，这种斗争使共和派阵营分裂成为一些越来越敌对的派别。最重要的是，筛选成千上万份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进行无数次个人采访并与经历过内战和革命的人士数千次通信所花费的那几年时间使他认识到，试图对某一因深陷党派政治泥潭而高度情绪化的事件作出评价的阐述模型必须建立在事实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他后来解释说，他为阐述错综复杂的西班牙内战而进行的学术探索受到塞万提斯的格言指引：历史学家是记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非应当发生的事情的人。出于这种考虑，他始终努力坚持“审慎和客观的最高标准”，即使这意味着让一些以前的朋友和政界熟人——他们坚持以黑白分明的方式铭记西班牙的过去——感到失望。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在居住于墨西哥的将近十一年时间里，博洛滕搜集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内战资料档案库，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书籍和小册子、党派报纸和期刊、政府文件以及从各个政治派别的共和派流亡者那里获得的没有公布过的原始资料。资金困难迫使他在一九四〇年将所收藏的多种报纸和小册子中的一部分出售给了哈佛大学，其中包括刊期完整的（无政府主义报纸）《工人团结报》和（共和派报纸）《政治报》。不过，他仍然拥有大量资料，直到一九四六年，他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图书馆的负责人、自由主义历史学家H.H.费希尔一起将其个人资料集中的更大一部分资料整理出来存放在胡佛研究所。一九二四年来到斯坦福大学以后，费希尔帮助胡佛研究所发展成为国际著名的二十世纪欧洲革命与内战史料的收藏机构，据他说，这一次获得的重要资料成为胡佛图书馆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专项收藏的奠基石。从一九五三年起，它将被称为“伯内特和格拉迪丝·博洛滕西班牙内战资料集，1936—1939”。

与此同时，博洛滕继续撰写他那部关于内战与革命的书稿。直到一九四九年与格拉迪丝移居美国之后他才意识到，他远远没有完成的写作似乎正在变成一项遥遥无期的工程。在其人生的此时此刻，据博洛滕本人说，他已经写完了大约一半的内容，这些内容后来将成为其开创性的专著《精心的伪装》的精髓。尽管仍然决心在某一天完成自己的历史专著，但是博洛滕认识到，从事内战研究已经过于长久地占据了他和格拉迪丝的整个生活。因此，移居美国使他有可能会开始进行一些与其个人生活和职业有关的比较轻松的新的活动。例如，博洛滕夫妇在闲暇时会跳交际舞，这是他年过七旬以后仍然非常喜欢的一种消遣。他干过几年销售工作，一九五三年取得了房地产经纪人的执照，接着，他又成为西尔斯和罗巴克公司的一名非常成功的百科全书推销员。然而，持续的经济压力和不断出现的个人债务，包括第一次婚姻的破裂，迫使博洛滕停止了写作，结果，他无法按照原计划写作，而是像他自己所说

的那样，不得不“满足于写一本比较薄的书”。这部节略的书稿最终完成于一九五二年，当时他认为这是关于内战的两卷本著作的第一卷。他将用接下来的八年时间为他的书稿找到一个出版商。

## 一场争论的剖析

收到各种学术和商业出版机构回复的许多退稿信之后，博洛滕锲而不舍继续努力。西班牙著名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建议他与英国的小型出版社霍利斯-卡特出版社联系一下，认为他在那里的运气可能会好一些。一九六〇年前后，根据马达里亚加的建议，当时迫切希望看到自己的著作出版的博洛滕把书稿交给了这家出版社。在找到了一个愿意与其合作出版该书在美国出版商弗雷德里克·A·普雷格之后，霍利斯-卡特出版社同意接受这部书稿，它的书名于是变成了《精心的伪装：西班牙内战中的共产党阴谋》。尽管博洛滕反对使用出版社编辑给他的书添加的这个副标题（和具有挑衅性的封面）——他认为这是为了耸人听闻而对主题进行的炒作，但他仍然感到欣慰，因为多年来他为搜集各种文献资料、阅读不计其数的出版物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成文所作出的牺牲没有白费。

不过，他从这一渴望已久的成功中所获得的满足很快就因为一个与他这本书在国外的出版有关的意外事件而消失了。一九六一年三月《精心的伪装》出版发行之后不久，在没有告知博洛滕的情况下，他在伦敦的出版代理人法夸尔森开始与西班牙政治研究学会谈判，争取使其批准《精心的伪装》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出版。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博洛滕以政治原因为由坚决反对在西班牙出版他的书。此时政治研究学会已经认定，某个商业出版社将更适合翻译出版这本书的西班牙文版。当长枪党人出版商路易斯·德·卡拉尔特表现出对这个方案的兴趣时，博洛滕的代理人让政治研究学会把出版合同转给卡拉尔特在巴塞罗那的办公室。由于谈判在没有征求

他的意见的情况下突然进行，博洛滕一时不知所措，他试图通过拒绝签署出版代理人寄给他的合同阻止出版他的书。但是，他的努力无济于事。这一切开始进行之后仅仅过了三个月，博洛滕吃惊地收到法夸尔森的一封信，后者在信中告诉他，尽管没有作者签署的一纸合同，卡拉尔特已经出版了（匆匆翻译并严重删改的）西班牙文版的《精心的伪装》，书名叫《大骗局》（El gran engaño）。对博洛滕来说更糟糕的是，书中包括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所写的一篇序言。他是佛朗哥的宣传主管之一，当时担任国家控制的政治研究学会负责人。该书的出版将给博洛滕作为内战历史学家的名誉带来影响深远的后果。尤其是，它在西班牙国内，尤其在海外造成了以下错误印象：他的书不是客观学术研究的产物，他本人是个亲佛朗哥分子。事实上，博洛滕的许多流亡中的共和派熟人得知这本书在西班牙出版的消息后非常震惊（和失望），以致他们毫不犹豫地公开谴责他明目张胆地辜负了他们的信任。最令人痛心的指责也许来自与他长期保持书信往来的友人、著名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内战期间因作为首位女性部长加入共和派政府而声名远扬的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她在流亡者创办的无政府主义报纸上发表长篇文章，谴责博洛滕和西班牙文版的《精心的伪装》。由于他这本经过删改的研究专著得到了佛朗哥独裁政权的赞许，博洛滕不仅将会引起他长期与之交往的共和派流亡群体的愤慨，而且将在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引起人数众多、影响巨大的左派作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愤慨，这一群体强烈反对对西班牙内战进行任何不利于共产党人的阐述。他能否从卡拉尔特盗版事件对其写作生涯造成的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人们还需拭目以待。

完全抛开与其著作的西班牙文版有关的问题不谈，博洛滕还沮丧地得知，《精心的伪装》在英语读者中毁誉参半。尽管这本书在一些刊物上得到好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和《西班牙研究通报》上的评论，但是，它受到大多数主要报纸和学术期刊的冷遇。这在某种程度上纯属巧合：博洛滕这部专著正

在与某主流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另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重要著作、休·托马斯的《西班牙内战》（1961）争夺市场。除了对西班牙内战作了妙趣横生、通俗易懂的全景性描述之外，托马斯这本备受好评的书得益于其客观的写作风格。最重要的是，这位英国学者似乎没有让他的亲共和派倾向严重扭曲他对一九三六年以来左右两派围绕着内战所进行的诸多争论的分析。除了顽固地为佛朗哥辩护的那些人之外，人们普遍认为这本书是第一部可信而且全面的西班牙内战史。在自由主义人士——他们构成了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的基础——当中进一步加强了《西班牙内战》的畅销书地位的是它在西班牙成为禁书这一事实。另外，佛朗哥的国内反对派和共和派流亡者认为托马斯的这本书与博洛滕的著作不同，对于独裁统治长期以来所进行的有利于自己并且带有严重倾向性的内战宣传，它的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都是一种非常必要的纠正。

在《精心的伪装》首次出版时的历史背景下颇有影响力的舆论现实可以作为原因之一解释公众对其毁誉参半的反应。事实上，它出版于一个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不断加剧的时期，这不利于博洛滕为使自己的历史研究与冷战攻讦划清界限所做的努力。因为该书的主题与现时的党派政治具有无法摆脱的关系，大多数读者很难认为《精心的伪装》是对西班牙内战学术性的客观展示。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长期关注西班牙内战的口味挑剔的读者来说，博洛滕这本书被认为是一本基础读物。赞赏他的最大的读者群来自人数相对较少、政治上被边缘化的欧美左派团体。他们认为，博洛滕第一个对内战进行了深入分析，不仅展示了经常被忽略的内战的革命一面——托马斯的内战史对此几乎只字不提——而且无可置疑地证明了共产党人的阴谋对共和派事务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两本书出版之后，著名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弗农·理查兹在英国刊物《无政府》上发表文章断言，关于西班牙内战，读者从三百五十页的《精心的伪装》中了解到的事情要比从托马斯那部七百页左右的更全面



的“内战史”中了解到的多。对于博洛滕为西班牙内战研究做出的贡献，英国学者说的不多但却不乏赞赏者，例如牛津大学教师、后来写出关于现代西班牙的巨著的雷蒙德·卡尔和谨慎而不因循守旧的牛津大学钦定讲座现代史教授休·特雷弗-罗珀。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四日写给博洛滕的一封信中，特雷弗-罗珀主动给予以下赞誉：“我写信只是为了告诉您，我多么钦佩您所写的《精心的伪装》这本书。我认为它是已经出版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最富有启迪性的最佳书籍。……让我难以忍受的是，当休·托马斯那本非常拙劣的书被评论家们接受时，您的书却没有引起英国报刊的注意。”这么高的赞誉不仅增强了博洛滕写出一本有价值的著作的信心，而且在他无法从事历史专著的写作期间，促使他保持对于这个问题的热情。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博洛滕并不热衷于求得学术界的认可，但他从不讳言著名学者和作家对他的著作的赞美之词。与一些诋毁他的人所暗示的恰恰相反，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打动读者。更确切地说，他这样做主要是由于自己缺少一名专业历史学家所拥有的正规文凭，因此，著名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推荐使他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了一定的可信度。引述他们的赞美之词也是针对某些评论家为自己进行辩护的有效手段。这些评论家声称，作为一名以前的记者和独立作家，他的书让人想到业余之作而不是一名合格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英国工党政客罗伊·詹金斯在其刻薄的书评中对《精心的伪装》的冷嘲热讽是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

就此书[《精心的伪装》]而言最糟糕的是它的包装——书名、序言以及护封上的内容简介和作者生平。从这些说明来看，博洛滕先生似乎是一个具有非常离奇的背景以致不太可信的人。他真的可能像我们被告知的那样，为了写这本薄薄的三百页的书而用过去二十二年的时间作准备并且“以不断向美国的主要图书馆出售他的西班牙内战资料”为生吗？所有这些非常令人不可思议，而且，前言的开场白实在是再平庸不过了，作者在前言中不知天高地厚地宣称：“本书是多年持续深入研究的成

果。”

考虑到博洛滕个人经历中不同寻常的那些方面，考虑到多年来他专心致志地投身于西班牙内战的研究，詹金斯和另外一些不了解情况的评论家总是倾向于把他当作一个古怪甚至神秘的人物而不予重视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以下事实也不利于人们把他当作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他是一名独立学者，他的研究不依附于任何正规的学术机构或是著名的知识圈子。因此，尽管笼罩着其写作生涯的特殊环境并未妨碍包括西班牙研究领域的主要权威在内的一些人承认其历史专著的开创性特征，但是，在许多其他人看来，其背景中无法解释的那些方面及其含糊不清的研究动机足以引起对其研究成果学术价值的怀疑。对他来说不幸的是，从这时开始，他在撰写历史专著的过程中所选择的非正统方式将被批评他的人用来作为诽谤他个人、贬低其作品的借口。最恶劣的是，他们的无知——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如何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导致他们怀疑他的“真实”身份。最恶毒地诽谤他的人不仅诋毁他的个人诚信，而且指责他是一个暗中为美国政府（中央情报局）或者其他冷战机构工作的冷战宣传人员。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所带来的耻辱将给博洛滕作为一名西班牙内战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蒙上一道长长的阴影。

### 超越《精心的伪装》

由于《精心的伪装》西班牙文版事件的余波持续困扰着博洛滕，在其出版两年后，他试图通过在西班牙流亡者的刊物《通讯》（文献研究中心，巴黎）上发表一份否认声明消除因同意卡拉尔特的删改版出版而使公众产生的错误印象。博洛滕在其发表的声明中解释说，他已经通过自己的出版代理人乔治·格林菲尔德提出了抗议，抗议弗拉加·伊里瓦尔内为《大骗局》所写的序言和卡拉尔特未经授权对正文所做的删改。他说，这种删改“把我的著作降低到廉价政治宣传品的水平”。可是，尽管博

洛滕对自己的书被长枪党人出版商卡拉尔特盗版的经过所做的解释逐渐被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和另外一些以前与其为友的著名共和派人士所接受，他却仍然无法说服所有批评他的左翼人士。对于某些人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共产党人或者赞成共产党人关于内战的看法的人来说，从那以后他将被视为冷战思维的吹鼓手，在他们看来，反共等同于支持佛朗哥。后一种人对博洛滕作为内战学者的公众形象产生了某种非常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因为他们将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坚持不懈而且有时是恶意地竭力诋毁他的人格和作品，这使人们对他就共和派政治生活所做的阐述的史学价值产生了怀疑。事实上，由于他们坚决给他扣上了一顶冷战专家的帽子，因此，无论是否反对共产党，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承认博洛滕的著作对内战期间对共和派事务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左派权力斗争的动态的描述有什么重要意义。

这几年间，博洛滕与他的第二任妻子贝蒂（本姓比德斯）——他们是一九五五年结婚——定居于旧金山的湾区。他重操旧业又做了房地产经纪人，这是他在有生之年断断续续从事的职业。虽然没有继续撰写他的内战史的下一部分，但他仍然与内战中的熟人保持通信，继续搜集文献资料并且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他还渴望为他的书找到一个可靠的翻译和一个不问政治的西班牙文出版商，以便恢复他在共和派流亡群体中可能受到损害的名誉。他的寻找几乎导致了另一场出版灾难。通过墨西哥的一位律师朋友，博洛滕与胡斯出版社取得了联系，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一家声誉良好的出版社。胡斯出版社以其坚定的天主教保守主义而著称，可是，博洛滕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因此，他面临着自己的著作与一家支持佛朗哥的出版社再次搅在一起的危险。同一年（一九六一年）早些时候遇见斯坦福大学西-美和葡-巴研究所所长罗纳德·希尔顿教授并且与其成为朋友之后，他的运气发生了变化。希尔顿意识到与胡斯出版社合作出书是个错误，为了使博洛滕避免另一场公关危机，他立即开始进行干预。希尔顿使博洛滕确信，应当把胡斯出版社得到授权刚刚以新的书名

《西班牙革命：左派与权力斗争》（1962）出版的书籍全买回来，然后在斯坦福大学葡萄牙-巴西研究中心的支持赞助下重新出版。这一措施迅速得到落实，由于几乎没有在墨西哥发行，从而控制了可能造成的后果，使博洛滕没有再次受到出版丑闻的进一步伤害。从胡斯出版社买回大约三百册平装本之后，希尔顿让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把书的封面撕下来，代之以一个盖有研究所认可印章的封面。一九六四年，斯坦福大学西-美研究所出版了这个版本。后来，为了使以后将在西班牙发行的译本更准确地反映原文，又把经博洛滕认可的西班牙文译稿寄给了仍然拒绝放弃该书西班牙文版版权的卡拉尔特。

在以后的多年时间里，博洛滕加深了与希尔顿和早已保存了他的西班牙内战资料集的斯坦福大学的关系。一九六二年，应希尔顿之邀，他在西-美研究所给学生讲课，并且指导他们对西班牙现代史进行研究。由于博洛滕一直努力对任何可能影响其历史研究客观性的组织或学术机构保持独立，因此，一开始他对是否接受希尔顿的盛情邀请犹豫不决。不过，他克服了自己最初的顾虑，同意在不收取报酬的条件下担任教职。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作为斯坦福大学的兼职讲师和拉丁美洲与伊比利亚历史研究的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他承担了一项有益于提高理论水平的新职责。

在这一段时间里，博洛滕一直考虑有必要扩展第一本书的编年叙事和历史分析。然而，只要个人义务和工作职责处在优先的地位，就不可能做这件事情。除了初为人父——他唯一的儿子格雷戈里出生于一九六六年——之外，博洛滕在一九六九年之前全职从事房地产工作。但是，《精心的伪装》于一九六八年在收入休·特雷弗-罗珀所撰写的长篇序言后第二次印行激励博洛滕恢复了他的历史探寻。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他重新专注于西班牙内战的研究，修订校改原来的文稿，扩展编年叙事的范围。一九七七年，他的努力初见成效，《精心的伪装》的修订增补版《西班牙革命：左派与权力斗争》以法文出版。这个最新版本与较早那本书最重要的不同之处

在于，它全面论述了五月事件。五月事件是内战期间发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性事件，由于篇幅的限制，《精心的伪装》在最后一章没有对其进行彻底的分析。考虑到一九七五年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新近出现的政治变化，这个版本的出版似乎及时而恰当地提醒人们，由于像博洛滕这样的外国学者的奉献，西班牙人可以开始还原其充满争议的历史中一个令人迷惘的重要时期的本来面目了。然而，这部新著使博洛滕引起公众的注意主要不是因为那些关心历史的西班牙人，而是因为他与他的宿敌、美国独立学者赫伯特·索思沃思在有影响的文化周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版面上所进行的激烈论战。博洛滕与索思沃思的争论最初发生在几年前。在其一九六三年出版的《佛朗哥圣战的神话》中，索思沃思像宗教裁判所的判官一样，用将近十六页的篇幅对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的《精心的伪装》进行了审查。除了其他问题之外，索思沃思指责博洛滕出版了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曾经出版过的最亲共和派的书”。不仅质疑博洛滕的学术资格并引用前面提到的罗伊·詹金斯观点以加强这种印象，索思沃思还武断地宣称，这本书的基本前提——包括共产党人试图掩盖军事叛乱所引发的人民革命的观点——没有事实根据。尤其是，在索思沃思看来《精心的伪装》似乎具有的二元性引起他的怀疑并且让他感到困惑。按照他的说法，这本书旁征博引、正面论述共和派的前半部分驳斥了佛朗哥分子所编造的关于内战起因的某些神话，与其缺乏证据的有利于佛朗哥的最后结论根本上是矛盾的。索思沃思接着贬斥了博洛滕的研究方法，指责他完全围绕着有倾向性的原始资料构建了其反共叙事体系。

对于在索思沃思的恶毒攻击中所发现的肆意歪曲和颠倒黑白之处，博洛滕试图通过发表在西班牙流亡者的报纸《希望报》（图卢兹）上的一篇短文予以纠正。但是，正如大约十五年后索思沃思对《西班牙革命》充满敌意的评论所表明的那样，问题显然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解决。索思沃思不仅抓住这个机会像以前一样再次公开指

责博洛滕对共和派政治生活所做的分析，而且他还变本加厉地继续进行人身攻击，他断言，博洛滕的著作观念狭隘不可能摆脱冷战思维。更加具有挑衅性的是，他暗示，博洛滕的书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很可能是“某些美国政府机构[可以理解为中央情报局]所建立的秘密基金散布的”。后面这项含沙射影的指控让博洛滕感到特别屈辱，出于学术考虑，他显然没有特意利用美国政府秘密资助的出版物。博洛滕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有分寸的反击文章既没有使批评者也没有使回应者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在十月的一期《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索思沃思发表了一封严厉反驳博洛滕的信。这迫使博洛滕一个月后为自己的名誉而战。稳健的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这时加入了论战，他提醒人们注意，在索思沃思偏执地对博洛滕使用有倾向性的原始资料不依不饶的背后，是从前的斯大林主义那一套逻辑。康奎斯特根据自己在共产主义研究领域的经验发表意见，他提出了引人注目的观点：“任何以某种更广阔的视野关注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当涉及有争议的问题时，有些变节者提供的材料是虚假的（因为所有苏联的材料和亲苏的材料都是虚假的）；因此，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小心翼翼地择路而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这些回信有效地驳斥了索思沃思的恶意评论，它们却更容易加强而不是消除索思沃思含沙射影的评论给人们造成的那种印象：博洛滕应当被认为是一名冷战专家而不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这主要是因为他那些最坚定的辩护者的政治倾向。除了好斗的休·特雷弗-罗珀之外，由于一些反共的前共产党人——例如均为冷战时期资历得到普遍承认的苏联问题专家伯特伦·D·沃尔夫和罗伯特·康奎斯特——公开称赞他的著作，博洛滕越来越被人们视为他们的同类。在后佛朗哥时代西班牙国内的右翼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中，博洛滕的著作备受推崇，他在那里同样可以得到某些著名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例如里卡多·德拉·谢尔瓦，这是一位多产的历史学家，佛朗哥统治时期曾在西班牙信息旅游部担任局长。甚至博洛滕的那些左派支持者，例如反对偶像崇拜的坦率的自由主义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和托派历史学家兼西班牙内战专家

皮埃尔·布鲁埃，也以他们的反共（应当理解为反斯大林主义）观点而著称。结果，没过多久，当少数几个抵制反共倾向的评论家对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西班牙革命》的英文版——《西班牙革命：左派与内战期间的权力斗争》——发表评论时，博洛滕冷战专家的形象就被他们强化了。

随着《西班牙革命》的出版，博洛滕面临其终生从事的历史研究事业的转折点。在断断续续地把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西班牙内战的研究和写作之后，他还没有完成自己满意的内战史。我们已经知道，《精心的伪装》的叙事戛然而止并非博洛滕之所愿。这部专著的大部分篇幅都被用来描述分析城镇和乡村的人民革命以及共产党人在共和派控制区影响和权力的不断增强。后面这一过程的高潮作为一九三七年五月事变的结果而出现，它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价；另外，该书的末尾一章只是简略地概述了内战最后一年半的形势发展。由于《精心的伪装》显示的是多年来资料搜集和勤奋写作的成果的精华，博洛滕不得不将大量信息浓缩到一个相对狭小的阐述体系中。按照他的想法，未来的（几册或几卷）著作必须解析密度更大的同类信息，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以长篇注释的形式实现，同时还要涵盖新的领域，以反映与第一本书同等水平的实证研究和写作成果。完成《精心的伪装》的修订增补版用了他将近十年的时间，因此，他并不清楚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写完关于内战最后阶段的著作，这部著作将把重点放在人民革命的命运和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九年内战结束期间政治斗争的结局上。尽管年过七旬的博洛滕身体健康（他还在参加交际舞比赛），思维也像以前一样敏捷，但是，专心从事一项任务繁重的学术研究，他仍然面对着令人望而生畏的前景。偶然结识作为博士研究生当时正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本文作者使博洛滕有机会雇用一名研究助手——有时也是合作者——帮助他完成研究计划的最后部分。接受这种额外的帮助使他能够更深入地探讨问题，在以前的写作中，某些问题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充分论证。在这些问题中，最主要

的是与内战的外交背景有关的问题。博洛滕特别感兴趣的是说明以下情况的原因：英法两国政府根深蒂固的反共（进而发展成为反苏）立场导致它们共同决定，通过奉行不干涉政策，对德意参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还热衷于论证：西方民主国家极其坚定地奉行某种绥靖政策，以致斯大林和共产党人引诱它们加入一个由苏联主导的反法西斯联盟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博洛滕将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搜集与这个或者其他重要问题有关的各种各样的研究资料。除了利用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丰富的欧洲资料收藏之外，通过获取从设在西班牙（萨拉曼卡的国家历史档案馆的内战部门和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英国（大英图书馆和里士满的公共档案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学术、政治和政府机构以及美国的各个重要的研究图书馆里找到的档案材料和原始资料的缩微胶片和影印件，他充实了自己的研究基础。此外，通过马德里的一位文学代理人，博洛滕为他的个人收藏获得了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西班牙文和欧洲各种文字的最新出版物。

在个人层面上，博洛滕还用大量时间扩大自己的书信社交关系网。如今这个关系网不仅包括一些与西班牙内战密切相关的人，而且包括欧美的一些因为熟悉他的著作希望与他联系的人。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与后佛朗哥时代历史学家中的一些杰出代表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他们大都对他那几部用文献资料详细论证的历史专著给予高度的评价。尽管博洛滕对攻击他的那些人破坏其个人名誉的险恶用心已经不再耿耿于怀，但他仍然敏感地注意到，在西班牙和欧洲的一些历史学家中，将其著作边缘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虽然新近出版的《西班牙革命》的西班牙文版令人沮丧地销售情况被他看作这种倾向的迹象之一，不过，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为了质疑隐含于博洛滕对共和派政治生活阐述中的重要推断，大量讨论在西班牙和法国的报刊和电视上进行。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胡安·内格林身上，他是社会党温和派



领导人，内战后期担任共和派政府的总理。在赫伯特·索思沃思、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学者图尼翁·德拉拉和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皮埃尔·维拉尔等人的引导下，这个历史修正主义学派强调说，内格林受到某些历史学家的不公正对待，尤其是博洛滕那样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明确指出，内格林为共产党人介入并且控制共和派事务提供的帮助超过任何政界人士。按照经过修饰的形象，内格林被描绘成一位伟大的战时领导人。在其担任总理期间，面对不可避免的军事失败，与政府中那些所谓的不抵抗分子不同，他竭尽全力团结共和派的各种力量，以便与民族主义军队对抗。因此，他与共产党人的紧密配合被认为是必须建立的合作关系。与这种推理方式相辅相成的是以下看法：佛朗哥分子和冷战历史学家对共产党人本身进行了恶意诽谤，指责他们应对共和派的失败负主要责任。最重要的是，这种论断想当然地认为，内格林和共产党人对佛朗哥军队的抵抗组成了反法西斯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场战争在西班牙爆发，随后将激烈地进行到一九四五年。因此，他们要求重新确定（reubricar）内格林和共产党人的历史地位。

这一帮历史修正主义学者提出的论断并不是什么新花样。内格林和共产党人究竟是应当作为对企图劫持共和国的阴谋负责的反面角色被记录在案，还是应当作为为一项崇高的事业而斗争的英雄人物被人们怀念？自从一九三九年以来，这个问题引起了左派与右派的激烈争论。从索思沃思对博洛滕以法文出版的那本书所发表的评论来看，他粗略地描绘出后一种看法更清晰的轮廓。这表明，有一种历史研究的倾向在后佛朗哥时代形成了，那就是要“开始重新审视内格林”。到八十年代初期，这种倾向走势良好。博洛滕写了一篇文章对索思沃思等人提出的挑战作出回应，文章的标题是：《关于内格林博士的奇怪问题：莫斯科信任的人？》。在这篇文章里，关于内格林在担任共和国总理期间所起的作用，他系统地列举了引起争论的诸多要点。在举例说明内格林是共产党人的一个顺从的盟友——即使并不总是心甘情愿

——时，博洛滕进一步指出内格林领导能力上的缺陷，比以前的著作内容更多。根据博洛滕对来自反对和支持共产党的两方面的原始资料的解读，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内格林是一个具有实际能力和独立思想的政府首脑。相反，博洛滕指出，在内格林越来越依赖于共产党人的支持的治理下，共和派内部的政治裂痕比以前更为扩大和加深。博洛滕在文章的结尾推断，能否从关于内格林历史地位的相互矛盾并且充满感情色彩的混乱描述中发现所谓“内格林角色”的历史真相，人们仍需拭目以待。从其史学意义上来说，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提出的论断预示了过去三十年来使内战历史学家之间的史学争论沸沸扬扬的那些论点。

与此同时，博洛滕一直向着完成其历史专著剩余篇章的目标稳步前进。他在写完关于外国干涉的那一章之后，把注意力全部转向内战的最后阶段。从带有感情色彩的角度看，他发现这是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因为这些内容很可能是关于共和派历史的最黑暗的章节。面对民族主义军队不停的推进，从一九三八年到内战结束，共和派政府徒劳地试图避免战败。进行抵抗的内格林人民阵线政府为控制军事形势和共和派政治事务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只不过加剧了左派内部的自相残杀。这场大规模的斗争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初达到了白热化，当时，一场血腥的冲突爆发了，冲突以反对共产党的各个派别为一方，以内格林及其支持者和共产党人为另一方。到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内战结束时，共和派已经处在一种高度分裂的状态。从那时起，共和派的悲剧将控制内战失败者以及同情其事业的那些人的情感和理智。

博洛滕本人没能活着看到他的最后一部内战历史专著的出版。就在七十八岁的博洛滕于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去世之前几个星期，他刚刚完成这部重新修订并且增补了重要内容的历史专著的大部分写作。幸运的是，书稿已经送出并且已有出版社——西班牙的阿利安萨出版社，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在这本书的西班牙文版和英文版分别于一九八九和一九九一年出版之前，美国著名的西

班牙文化学者斯坦利·G·佩恩写了一篇新的序言并且编辑完善了最后一章。一九九一年，他毕生的辛劳取得圆满的成果，为了表彰其对公共历史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美国历史协会向博洛滕追授著名的赫伯特·费斯奖。

## 博洛滕与内战史学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从《精心的伪装》出版开始，博洛滕的内战专著总是与针锋相对的史学争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这种争论成为关于这一主题的作品特征。在西班牙国外，尤其是在佛朗哥独裁统治（1939—1975）结束之后那些年，围绕着博洛滕的著作发生的争论集中在下面这个问题上：他对共产党人在共和派控制区的作用所进行的犀利无情的批判性分析是不是建立在某种冷战解析模式的基础上。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鼓吹这种观点的批评者一端，人们可以发现赫伯特·索思沃思那样的作家，他们甚至指责博洛滕的著作不仅支持佛朗哥，而且对西班牙内战提出了一种冷战阐述。一九九六年，在一篇矛头对准博洛滕和他的所谓冷战意识形态同伙、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和反共宣传家胡安·戈尔金的文章里，索思沃思再次得到了报复博洛滕的机会。这篇文章发表在保罗·普雷斯頓 和安·麦肯齐编辑的一本名为《被围困的共和国：西班牙内战，1936—1939》（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6）的文集里。令人遗憾的是，在博洛滕不能再为自己辩护之后，索思沃思竟然被允许在一本学术文集里继续像以前那样指责他。鉴于这篇经过扩充的文章所具有的人身攻击性，文集的编者似乎认为他的文稿应当得到学术认可这一事实同样让人感到失望。由于这篇文章的发表将对作为历史学家的博洛滕的遗产造成广泛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概括一下它的要点。

索思沃思像法官一样进行审查的核心目的是要揭露戈尔金的冷战团伙，以便质疑他就共产主义在西班牙和国际舞台上的历史所说的一切。博洛滕被扯进讨论为的是公

开嘲笑他。索思沃思说他不仅相信戈尔金对共产党人的可疑见解，而且具有与戈尔金同样的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冷战思维。这里没有举出什么证据可以证明隐含在这种笼统推断中的任何指控。不过，索思沃思最明显的问题肯定与他似是而非的推理有关：他宁愿通过主观臆测和含沙射影提出问题，而不是把他的论点建立在可靠事实的基础上。以下事实清楚地表明，索思沃思以这种方式讨论问题应当问心有愧：他试图证明博洛滕的著作以右翼思想为基础，却没有注意后者用于分析共和派政治生活的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以及大量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相反，索思沃思将博洛滕的观点与戈尔金的观点混为一谈，坚持认为这位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向博洛滕提供了“其所有论断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样过于空洞和简单的是，索思沃思断言，除了戈尔金之外，罗纳德·希尔顿和“另一些与其关系密切的加州人”影响了博洛滕的思想。索思沃思显然是根据道听途说发表的这些言论，不知道他的消息来自何处，因为他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证实其说法的补充说明或参考资料。对博洛滕来说不幸的是，索思沃思并不仅仅满足于指控他与戈尔金这样一个所谓的卑鄙小人结成了意识形态伙伴关系。文章进一步暗示，博洛滕的反共立场对二战期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所有[相继产生的]正当理由形成了否定”。文章最后以强烈谴责的口气断言，博洛滕竭力证明共产党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行为不端“使他的书没有任何永恒的价值”。

尽管有理由断定严肃的学者不会受索思沃思这种极其主观、论据可疑的冷嘲热讽的影响，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多年来，索思沃思对博洛滕的著作的评论——包括他毫无根据地指责博洛滕是亲佛朗哥分子并且被自己的反共立场所蒙蔽——在西班牙和英国得到某些备受尊敬的内战学者的赞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索思沃思在英国和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所享有的被人顶礼膜拜的偶像地位。据其最狂热的崇拜者之一保罗·普雷斯顿说，索思沃思的影响在“新一代英国和西班牙学者”的著作中随

处可见。例如，在西班牙，赞同索思沃思对博洛滕著作的评论的著名人士包括一些像安赫尔·比尼亚斯和胡里奥·阿罗斯特吉那样的非常杰出的历史学家。更有损于博洛滕作为可以信赖的历史学家的名誉的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英国和西欧某些重要的西班牙文化学者对他的著作提出了赞同索思沃思观点的阐释。二十多年来，保罗·普雷斯頓、海伦·格雷厄姆及其门徒共同开展了一场解构博洛滕的反共“模式”的运动，他们在各种著作和文章里援引索思沃思少见多怪的攻击性言论，以此作为博洛滕的研究方法具有学术缺陷的附加证据。尽管他们的评论并不总是像索思沃思那样过分简单、流于谩骂，但是，这一帮公然党同伐异的历史学家仍然反映了他的观点：由于博洛滕坚持以冷战政治学的视角解读内战期间的共和派事务，其著作中历史分析的价值受到致命的损害。

这一帮学者认为博洛滕草率地处理了西班牙内战的国际因素，并且对此非常不满。尽管博洛滕著作的大部分内容确实是把重点放在了左派的内部斗争上，但是，说他的分析忽略了与内战有关的全局性问题并不客观。例如，在《西班牙内战》中，博洛滕特别关注不干涉政策对共和派事务产生的影响。在专门用来深入分析英法两国政府坚持奉行绥靖政策到何种程度的一章（第六十一章）里，作者清楚地说明，由于担心西班牙内战可能在欧洲引发一场必定将使苏联获益的全面战争，西方民主国家不愿意支持共和派，以免与站在民族主义者一边参战的德意两国发生冲突。他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论述驳斥了他那些批评者的观点，他们指责他没有把苏联的计划放在这些计划实施于其中的更广阔的外交背景之下进行分析。此外，他对法国、特别是英国的那些绥靖主义者的动机和行为的明确批评证明下述说法是不实之词：他的反共立场不仅使他看不见苏联外交议程的实际目标，而且使他同情佛朗哥并且支持轴心国。

我们可以在博洛滕希望《文汇》杂志发表的一封长信中找到进一步证明其以下看法

的证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反苏的英国和法国政府在纳粹政权崛起的过程中串通一气协调行动。在写信回应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的一篇题为《戳穿三十年代某些应景的神话》的历史修正主义文章时，博洛滕对作者企图一概免除英国当权者，尤其是奉行绥靖主义政策的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政府的责任提出异议。他特别不赞成斯基德尔斯基的这种说法：没有证据证明“英国一直试图使德国卷入一场对俄国的战争”：

这证实了我的怀疑，英国历史学家总的来说仍不愿意承认英国对纳粹军事力量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负有重大的责任。幸亏我的反苏资历得到充分的确认，足以排除我被称为亲苏分子的可能性，但是，历史真相比当代政治更重要。尽管实际上的确是带有秘密附加议定书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但是，证明英国协助怂恿纳粹政权、鼓励德国军国主义崛起并且纵容德国入侵东欧的证据具有压倒性的说服力，因此，对于任何负责任的历史学家来说，由于选择否认它而拿自己的信誉冒险有失谨慎。

尽管《文汇》杂志具有冷战思维的编辑梅尔文·J·拉斯基拒绝发表博洛滕的回信，但是，它的内容仍然反映了博洛滕身体力行地不懈追求塞万提斯式历史叙述的客观性所达到的高度。他在这封信中写道：“历史学家应当严谨、诚实、不偏不倚，不应当允许自己偏离真实的轨道。”毕生指引博洛滕写作的是这种信念而不是他本人的政治倾向。始终甘愿以高昂的代价坚守这些价值观，恰恰证明他具有健全的心智和诚实正直的职业操守。

近年来，博洛滕的著作没有逃出争议的罗网——从他的第一本书出版后，这张罗网就从天而降。在西班牙国内关于内战起因和政治性质的激烈史学争论中，经常提到他的名字。例如，皮奥·莫瓦之类有争议的右翼历史学家曾经试图利用博洛滕的著作

证明一九三六年的军事叛乱有正当的理由。博洛滕的众多左派批评者普遍不顾这种对其研究专著的明目张胆的意识形态曲解，他们坚持认为，西班牙右派之所以援引他的著作，因为它们实质上就是对西班牙内战的冷战阐述。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西班牙内战》的出版，并非所有学者全都认为有必要给作为西班牙内战研究领域权威人士的博洛滕的遗产贴上政治标签。无论是否同意他的历史分析，许多人认为他的著作是严肃的学术研究的产物，对于任何希望了解这一错综复杂而且充满争议的事件的人来说，严肃的学术研究不可或缺。最重要的是，不像其论敌往往会做的那样，他们没有试图根据博洛滕的政治见解评价他的历史贡献。我们可以在受到广泛尊敬的美国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杰克逊所发表的看法中找到这方面的显著例证。尽管他对内战的某些重要方面的看法——尤其是他对内格林在共和派阵营所起作用的阐述——实际上与博洛滕著作中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是，杰克逊始终认为博洛滕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历史学家，他那些最严厉的批评者把他看作“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是判断错误。另一位认为博洛滕的历史专著具有永恒价值的重要历史学家是已故法国学者弗朗索瓦·菲雷。在其研究共产主义为什么如此吸引二十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的富有启发性的专著中，菲雷称赞博洛滕向世人展示了一份可靠的共产党人在内战期间的活动记录：“为了了解共产党人如何深入渗透西班牙共和派政府以及这个政府为什么从一九三六年秋天开始越来越服从苏联代理人的命令，人们应当读一读伯内特·博洛滕的两本书。”

说他出版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专著不是为了参加战后时期的冷战辩论并非想要否认作者本人对这一时期发生在世界舞台上的各种事件所持的立场。另外，虽然以前博洛滕总是小心翼翼地自己的政治观点与成为其历史写作特征的那些东西之间划一条界线，但是至少有一次，他跨越了这条界线。一九八五年秋天，博洛滕在英国反对共产主义的刊物《瞭望》上发表了一篇观点鲜明的政论文章，题目是《霸权与

西班牙共产党》。他与一群学者一起决心揭露苏联人在“第二次”冷战异常激烈地进行过程中扩大其势力和影响的企图。凭借自己对西班牙内战期间共产党的战略战术的深入了解，博洛滕向人们指出，二十世纪后期的共产党人有可能操纵这一时期在中美洲和非洲兴起的革命运动，同时煽动这些地区的公众舆论反对（支持自由民主的）西方发达国家。无论博洛滕这样做的目的是否在此，他的文章不可避免地把他的观点与西方冷战战略家的思想联系起来，后者与《瞭望》杂志以及一些类似的反共学术活动有关系。鉴于他对内战期间共产党人在西班牙的活动的深入了解，同时考虑到一九四〇年离开墨西哥城以后他越来越强烈的反斯大林主义思想轨迹，我们就可以理解多年来他向保守主义的转变了。例如，在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博洛滕对大部分政治问题均采取某种保守的态度，因此，在整个这一段时间里，他认为苏联是东西方对立的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制造者。他对苏联人严重的不信任感一部分来自他对共产主义的亲身体验，一部分来自西班牙和欧洲的许多前共产党人的证言。这些人大部分不是右派，相反，他们认为他们脱离的那个运动已经背叛了他们曾经参与的左派事业的真正理想和价值观。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博洛滕倾向于把苏联人以及为其辩护的西方自由主义左派看作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专家，他们意欲打着共产主义理想的旗号掩盖历史真相并对苏联政权的极权主义行为视而不见。这是他努力揭露他们隐蔽的政治目的和颠覆性的宣传手段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博洛滕本人对共产党是什么人以及他们为了推进自己的事业可能干什么事的看法直接使他站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阵营一边。

然而，因此断定他对历史的判断只不过反映了他本人的政治观点——他的对手一贯都是这样做的——并不符合事实。断言博洛滕根据一个关于共产党阴谋的完全虚构的论题解读了他多年来查阅的大量文献资料同样流于简单化并且因此歪曲了事实。正如我们所知，作为一名曾经在共和派控制区采访报道的新闻记者，博洛滕的亲身



经历促使他撰写了他的西班牙内战史。弄清自己在西班牙所见所闻的复杂含义——后来他才意识到，西班牙内战的复杂性一直被共产党人的骗术所掩盖——的决心促使他更加深入地查找那个时期的档案文件。这需要多年时间对各个左翼派别的内战参加者进行不计其数的会见采访，还要广泛搜集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此外，他对共和派政治生活的详细解读与西班牙左派肤浅的描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佛朗哥派出版的带有类似偏见的内战史中通常也可以看到这种肤浅的描述。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他对内战的一般分析以及对共产党人所起作用的重点分析是其冷战思维的反映。无论如何，假如博洛滕想用他的著作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他有足够的机会这样做。例如，当博洛滕终于在一九六一年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西班牙内战史时，他处在表明其反共立场的理想地位，他可以宣称自己基于意识形态原因支持佛朗哥（反共的）独裁政权和所有强烈反对苏联的政权。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一部分原因是他内心同情共和派，另一部分原因是，考虑到其具有争议性的主题，他试图不惜任何代价写出一本建立在冷静的学术分析基础上的书。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博洛滕对历史的判断，他的几本西班牙内战史不应被任何想要了解这场悲剧性冲突的人所忽视，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感谢博洛滕，不仅因为《西班牙内战》这样的著作再现了大量难以找到的文献资料，而且因为他对共和派政治生活的深入分析为他们——甚至为所有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人——提供了破解那些长期以来使西班牙内战迷雾缭绕的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所需要的洞察力。

乔治·埃森魏因

一九九一年英文版序

西班牙革命是二十世纪的集体主义革命中最为独特的一场革命。它是唯一一场发生在西欧国家的全面的暴力革命，同时也是唯一一场由各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力量——它们经常相互竞争和敌视——所推动的真正意义上的多元革命，尽管最终共产党人逐渐掌握了控制权。西班牙革命还是唯一一场发生在某个大国的没有成功的重大革命，它被敌对的军事力量彻底挫败并扑灭。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西班牙革命从来没有受到对革命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们的关注，它本应受到这种关注。西班牙革命在二十世纪革命的研究领域相对而言不见经传的另一个原因是伯内特·博洛滕所指出的见解独到的“精心的伪装”，这是发生在多党派的人民阵线共和国政治框架——这一框架只是在内战爆发之后才被打破——内部的事实，由于革命在国外的支持者和宣传者将其描述成为某种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一事实逐步显示出来。终于，在意识到西班牙内战和外国军事干涉的重大国际意义之后，它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由于二十世纪初期独特的历史状况，西班牙在最大的范围内爆发了革命。三十年代，与过去的一百余年来一样，西班牙一方面在西欧大国中现代化水平最低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是经济落后的南欧（和东欧）国家中文明程度最高、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尽管马克思断言，在工业化的高峰期，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历史表明，在工业化的早期以及从早期到中期的过渡阶段，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更容易发生严重的冲突。工业发展初期微薄的工资收入和巨大的经济压力，加上被社会疏离的大批工人集中在新的城市环境中，形成了潜在的剧变条件，这些条件在工业化后期逐渐弱化。在西班牙，由于同时出现了现代社会的农民问题，社会反抗的可能性增大了——主要在这个国家的南半部，庞大的无地劳动者和赤贫者阶层人口激增，在十九世纪缓慢的现代化进程中，他们的经济状况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是恶化了，因此，在

二十世纪初期，他们的生活比旧政权统治的最后阶段其实或者相对来说更加贫困。

西班牙政治左转的趋势最初并没有受到现代民族主义的遏制。在另外一些国家里，民族主义是右翼势力动员的重要力量，但是，它在西班牙却鲜为人知，它仅仅存在于那些具有微弱的民族分离倾向的特殊地区，在那些地方，民族主义只是加深了社会和政治的裂痕。最初，西班牙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避免了巨大的国际压力对其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它不与外国结盟，也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它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情况，几乎具有某种实验室的特征，对于西班牙来说，当时以及后来人们在其他国家所发现的那种全方位的现代冲突和潜在的社会政治斗争不是几乎没有产生作用，就是因国外的战争、占领或者任何形式的来自外部的明显压力而扭曲变形。

不过，某种间接的外来影响仍然是最终导致西班牙政体分裂进而崩溃的一个因素。这种影响不是通过直接施压或干预，而是通过西班牙各种主要政治角色之间的相互恐惧产生作用，当国内的对立越来越严重时，国外政治极端主义最恶劣的榜样开始在西班牙受到模仿，接着，某种西班牙式的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可以迅速取得胜利。西班牙内战爆发前夕，这种恐惧显而易见，它为采取最可怕的手段避免成为最激进的外国极端主义的西班牙同类的牺牲品提供了正当的心理依据，或者说，左派和右派的好斗分子逐渐开始这样认为。结果，尽管没有与外国结盟或是发生军事冲突，西班牙仍然以这种方式在心理上与欧洲其余部分的政治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很容易受到那个时期最强大的政治压力的影响——实际上，由于严重的国内分裂，它对此类压力的敏感达到了某种夸张的程度，尽管这是由西班牙人自己造成的。

如果说，按照苏联的标准，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在西班牙多少有点姗姗来迟，那

么，与许多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情况不同，这场革命运动的发展最初并没有遭到强大的中央民族主义和右翼极端保守势力的反对。这反而导致革命者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忽视了潜在的社会底层保守势力比文明程度落后的俄罗斯更强大，同时忽视了三十年代西欧的国际均势与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年间东欧的情况大不相同。在挫败革命的过程中，终于被佛朗哥调动起来的两种因素最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它们是不太活跃的西班牙右翼底层力量和各种国际势力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西班牙内战——其间发生了革命——是三十年代欧洲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甚至也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它对世界之所以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由于西班牙的国内冲突，不如说是由于列强的干涉及其以干涉相威胁，同样也是由于这场斗争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其他国家非常紧张的政治局势。对于共和国的支持者来说，西班牙内战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为一场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而且，它实际上还变成了西方世界的一个独一无二的论坛，在这个论坛上，当时法西斯主义的得寸进尺开始受到质疑。共和派控制区内部形势的实际发展状况往往不被西班牙外界所了解。西班牙内战刚一结束，人们几乎立即就把注意力转向了欧洲全面战争的进程，结果，多年以来，西班牙的这场战争仅仅被人们当作欧洲战争的序幕或注脚。

由于随后西班牙国内长达一代人的文化专制以及国外对于西班牙国内的政治和历史明显缺乏关注这种综合因素，在接下来的二十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对西班牙内战进行认真的研究。只是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以后，随着一系列学术著作的发表，人们才开始以精确的历史视角仔细观察西班牙的这场斗争。

在这些新的专著中，唯一一部致力于研究共和派控制区革命派别内部斗争的著作是伯内特·博洛滕的《精心的伪装》，它是我们面前这本书的始祖，一九六一年由（伦

敦的) 霍利斯—卡特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学术突破，它第一次详细列举了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初的九个月与共和派各主要力量的政治斗争有关的文献资料。它把发生在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的那些事情从宣传和党争的领域提升至得到文献资料充分证明的历史记录的水平，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马克思统一工人党以及革命的社会党人在内战的最初几个月所进行的社会经济政治革命作了详细的描述，尤其是他们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和莱万特地区进行的革命。

博洛滕这部著作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利用文献资料一步一步地证明了共产党在政治军事力量上的成长壮大。该书揭示了共产党势力的扩张，首先在共和国的中部地区，然后逐渐向另外一些地区发展，共产党对军队、警察和政府机构的影响力稳步增强。如果这是共和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派别的话，那么，充分说明它的情况尤其重要。如果不将所有重大事态发展公之于世，显然无法达到了解共和国历史的目的，因此，博洛滕所做贡献的意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是这项艰巨使命的先行者。重现并且认识西班牙刚刚过去的历史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实际上，这是知识分子非上不可的一课，也可以说，这是在西班牙有效而持久地重新建立民主国家的先决条件。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一漫长但却必不可少的历程中，博洛滕的著作迈出了值得关注的一步。因此，重建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首任主席何塞·塔拉德里亚斯恰如其分地将其称为“已经出版的一万五千至两万种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然而，并不完全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精心的伪装》没有像它理应受到的那样受到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的欢迎。这本书实际完成于一九五二年，但是，由于开辟了一个与通常的看法大相径庭的全新视角，它被许多美国出版社拒绝了，其中包括五家大学出版社。正如雷蒙德·卡尔在为一九七九年版的《西班牙革命》撰写的序言中所说，“也许书名不太恰当，伪装本身就是隐瞒事实，而挖掘事实真相正是一名富

有献身精神的学者的工作，为了重现内战期间西班牙共和国混乱的政治局面，他千方百计地搜集各种可以利用的原始资料。”另外，霍利斯—卡特出版社坚持增加的副标题“西班牙内战中的共产党阴谋”也给人以错误的印象：这本书又是一件反共宣传品。

一九六一年出版后，这本书成为冷战狂热的牺牲品。尽管与作者的意图或该书的主旨相去甚远，但是，由于被保守派和反共人士盛赞为揭露了共产党的阴谋和专制，它不仅受到共产党人和前共产党人的大肆谴责，而且还受到另外一些左翼人士和共和派支持者的严厉痛斥，认为它企图以某种方式诋毁污蔑共和派的事业。博洛滕的著作实际上有力地驳斥了右翼分子关于共产党人阴谋在一九三六年推翻共和国的指控。不过，仍然有人说该书作者是中央情报局或某种政治势力的代理人或枪手，而且，这本书在英国出版三个月后，巴塞罗那出现了一个完全误导读者的盗版版本，该盗版由长枪党人出版商路易斯·德·卡拉尔特出版，附有一篇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撰写的序言。尽管博洛滕竭力反对这个他称之为“仓促草率并被删改”的译本出版，但是，他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该译本已经在西班牙面世。（一九六三年六月他在巴黎发表声明拒绝承认最初刊登在文献研究中心的刊物《通讯》上的这个译本。）由于一个经过准确翻译并且获得合法授权的西班牙文译本《西班牙革命：左派与权力斗争》的出版（墨西哥城，一九六二年），这种状况才得到纠正。两年后，斯坦福大学的西—美研究所出版了另外一个译本。

此外，伯内特·博洛滕不是一名受过训练的专业学者，也不是一位端着铁饭碗的大学教授。早年他当过合众社的通讯记者，后来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和个体商人独立谋生，最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加利福尼亚的房地产业从事一份稳定可靠的职业；尽管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间他曾作为讲师在斯坦福大学短期任教，但是，自谋生计的需要大大减少了他可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这不仅将博洛滕第一本书的

出版推迟到一九六一年，而且限制了他研究的范围，使其在七十年代从生意场上退休之前不可能取得更大的学术发展。

在此之后，他才有机会准备写作一部内容扩充了的专著，一九七九年，这部专著以英文和西班牙文出版，使用了一个更加贴切的书名：《西班牙革命》。他的第二本书保留了第一本书的所有优点，尤其是以大量原始资料为依据——实际上，这已使它成为其他历史学家的一本参考书或资料来源——及其严谨的客观性。《西班牙革命》对西班牙内战头十个月的政治斗争作了更加完整的论述，其中包括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巴塞罗那达到高潮的斗争以及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罢免，它不仅扩大了早期研究的范围，而且充实了大量新的材料。因此，在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整个研究领域里，它成为一部近乎完美的里程碑式的权威著作。

不过，在西班牙内战的后半程，政治活动依然存在，博洛滕收集了大量与此有关的文献资料，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将这些资料充分整理以供发表。八十年代，他专心致力于最终完成这项毕生的使命，开始写作我们面前的这本书。直到他漫长而非凡的人生的最后几个星期，博洛滕才将本书杀青。博洛滕最后留下的这第三本书是一部全新的著作，论及共产党的力量在一九三七年的僵持阶段以及进入一九三八年以后的发展壮大，尤其是在军队和警察中的发展壮大。像一九三八年两次内阁改组的情况一样，针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其他政治观点不同的左翼党派（主要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所发动的攻击得到了详尽的描述。本书对内战后期共和国领导人胡安·内格林独特而复杂的人物形象作了描绘，比已经出版的其他任何著作更加完整、更为精细。本书对共和派最后阶段的政治活动给予了认真的关注，包括失败主义的滋生发展以及对共产党人的专制越来越强烈的反感。这部权威著作最后的贡献是对内战即将结束时那几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最终引起争议的共产党人对军事指挥权的重新安排，内格林和共产党人在推行没有落实的拼死抵抗政策的尝试中所扮演的角

色，卡萨多试图推翻他们的密谋过程。

同时，本书的主要部分增加了大量因西班牙档案馆的改组整顿和全面开放而可以利用的新的文献资料。因此，本书不仅是一部更为厚重、更加完整的研究著作，而且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几乎属于权威性的颇有新意的描述，第一次从头至尾细致入微地对西班牙革命和共和派控制区的政治活动进行了全面而准确的考察。它竖起了一座将使未来的研究者永久受益的学术丰碑，同时也为作者的不懈努力竖起了一座纪念碑。几乎没有什么人曾经在如此重要而艰巨的事业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同样重要的是，博洛滕将其收集的大量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留给了未来的历史学家，收集这些资料花费了他一生中的许多时间。收藏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博洛滕资料集包括两千五百册印本（其中许多是珍本），一万两千份装订成册的内战时期的报纸，十大本剪贴簿，大约十二万五千帧缩微胶片，超过六十七箱手稿和两大箱各种各样的文件。这一珍贵的资料收藏使其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三个西班牙内战研究的资料来源之一。伯内特·博洛滕留下的的确是一笔不朽的遗产。

斯坦利·G·佩恩

## 前言

伯内特·博洛滕去世之前没来得及对这篇前言作最后的修改。不过，他留下书面和口述的说明，供整理完成其初稿时参照。与其基本上重复以前各种版本已经说过的话，我选择只列出与现在这本书有关的内容。另外，这篇前言是他的说明（由其夫人贝蒂和儿子格雷戈里记录）和早期草稿的忠实再现。

乔治·埃森魏因



一九七七年，我开始动笔撰写摆在面前的这本书，它包含了将近五十年的调查探索和分析研究。最重要的是，本书反映了我广泛使用大量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报纸刊物的情况。与那些尚未意识到报纸作为原始资料之重要性的历史学家不同，我坚信，如果不以查阅报刊的方式触摸内战参与者的生活，就不可能理解他们的激情、冲动以及真正的问题之所在。我发现，报纸比其他任何资料来源更清楚地反映了卷入这场可怕战争的众多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的看法和感受。多年来，我查阅了近五百种报纸和期刊（有些刊物报道内战多达百期）。为了再现当年那种乱世的气氛，我直接引用了两百多篇不同的报道。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明显扩大了研究的范围。我搜集了大量新的资料，包括报纸、刊物、书籍、小册子、缩微胶片和原始文件的影印件。这些资料大部分是从设在美国国内外的研究性图书馆以及公共和私人机构中找到的。

对于这些资料在提供素材和释疑解难方面给予我的无法估量的帮助，我想向本书《致谢》按字母顺序列出的那些个人、机构和出版社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但是，在此我必须专门提到为完成这部专著提供了特别帮助的一些人。

我为乔治·埃森魏因博士的友谊及其八年来的可贵帮助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他一次又一次地将其利用图书馆馆际出借制度从斯坦福大学格林图书馆和胡佛研究所图书馆与档案馆借到的成百上千种书籍和文章送到我家，为我节省了难以计数的工作时间。这种帮助使我得以广泛研读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的那些与三十年代欧洲外交史有关的出版物。因此，我才能够详尽阐述较早时候我在《精心的伪装》和《西班牙革命》中曾经阐述过的同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我非常重视我与乔治长期以来所进行的讨论，并且把他当作一位可以征询意见的朋友。除了别的意义之外，就一些错综复杂而且具有较大争议的问题而言，这些讨论有助于我充实想

法、巩固信念。另外，我还要为摘录他的文章及其专门为我撰写的大量注释向他表示感谢，读者将在多个章节读到他的这些注释。

我要感谢斯坦利·G·佩恩教授对本书的坚定支持及其不可或缺的贡献。除了为本书撰写序言之外，他还慷慨地腾出时间复审了原稿。[由于本书作者无法独力完成最后一章，佩恩教授费心帮助撰写了结尾的部分内容。]

特别感谢斯坦福大学的罗纳德·希尔顿教授，他是我交往二十七年的老朋友，如今是加利福尼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希尔顿教授不仅始终以其富有感染力的干劲和朝气鼓励我，而且允许我利用其无与伦比的西班牙语文化知识。多年来，希尔顿教授一直是我的研究的强有力的倡导者，我最为感谢的正是这一点。

为其过去二十五年坚持不懈的精神支持和帮助，我要感谢巴黎美国学院的戴维·温盖特·派克博士。

胡佛研究所的希丽娅·库克多年来慷慨地向我提供了帮助，她从图书馆和档案馆找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文献资料并将来自苏联的重要的原始资料精心翻译过来供我在研究中使用。

我要感谢两位西班牙人，他们真心实意地与我共同努力在西班牙出版本书和我以前的著作。近二十五年来，卢西亚诺·纳瓦斯一直为我提供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最新文献，佩德罗·F·格兰德则热心地支持《精心的伪装》和《西班牙革命》的出版发行。

一九三八至一九五二年间，格拉迪丝·艾薇·博洛滕以其奉献精神 and 辛勤工作帮助奠定了我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全部著作赖以问世的基础。

在为出版编辑书稿的过程中，葆丽娜·B·图克夫人（打字稿）、芭芭拉·沃克夫人（参

考文献)和默娜·B·罗切斯特夫人(索引)的认真工作对我助益良多。最重要的是,图克夫人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和打字员;在编辑过程的最后阶段,她那不同寻常的高标准及其审阅书稿时的深切关注和忠心支持对我具有很大的帮助。

我要向以下人士致以特别的谢意,他们欣然同意阅读极不便于阅读的大约两千页书稿并且给予有益的评论:保罗·阿夫里奇教授,刘易斯·贝特曼(编辑,北卡罗来纳),哈维尔·普拉德拉(编辑,马德里),斯蒂芬·施瓦茨,保罗·西伯里教授,琼·康奈利·厄尔曼教授和艾拉·沃尔夫。

贝蒂和格雷戈里·博洛滕事事处处尽一切力量支持我。他们以各种方式帮助我,并且为这部书稿无私地奉献了大量时间。本书得以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感谢他们的全身心投入。

尽管作者对上述个人和团体的贡献致以谢意,但是,就本书表述或暗含的最后结论而言,他仍然需要文责自负。

## 作者说明

曾经查询过的图书馆及其他机构

本书准备使用的所有资料均可以在下列某个或多个图书馆和机构所保存的书籍、信函、文件、访谈录、报纸、期刊缩微胶片及剪报中找到: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历史档案馆,马德里

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

国家历史档案馆,萨拉曼卡

国家图书馆，马德里

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巴塞罗那

国家图书馆，巴黎

布兰代斯大学，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

大英博物馆报纸图书馆，伦敦

当代历史研究中心，巴塞罗那

国际无政府主义研究中心，日内瓦

历史—社会文献中心，巴塞罗那

国际历史研究中心，地理和历史学院（毛林—宁研究室）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基金会，马德里

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马德里

哈佛学院图书馆，马萨诸塞州剑桥

马德里市期刊阅览室，马德里

国家期刊阅览室，马德里

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博洛滕资料集）

巴塞罗那市历史学会，巴塞罗那

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

国会图书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文化部，马德里（文献资料档案中心）

纽约公共图书馆，纽约

公共档案馆，英国里士满

军事历史部门，马德里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斯坦福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图书馆（索思沃思资料集）

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密歇根州安阿伯（拉瓦迭资料集）

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巴斯克研究计划

## 注释说明

通常，如果某位作者仅有一部著作或小册子列入参考资料，那么，这部著作在每一章节被首次提到后，注释中就只写作者的名字。如果参考资料包括同一位作者的多部著作，注释中将写出完整或简化的书名以保证准确说明。

在正文和注释中引用的所有报纸和期刊的出版地均在参考资料中写明。对于具有相同名称的报纸和期刊，为了准确辨别，其出版地也在注释中写明。

参考资料写明了所有被引用的文件资料的准确出处，无论是原始资料还是副本。

## 敌对双方的名称

最初我把佛朗哥将军的军队称为“叛军”或“反叛者”，后来我又将其称为“民族主义者”。军事叛乱的支持者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使用了后面这个名称。

另一方面，我在全书交替使用“反佛朗哥力量”、“左翼势力”和“共和派”等名称。尽管考虑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以后发生在战线两侧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诸如“民族主义者”和“共和派”之类名称的政治准确性也许应当受到质疑，但是，这些专用名词仍为大多数研究西班牙内战的历史学家所使用并且具有简单明了的优点。

## 地名

本书使用了下列地名的英式写法：

Andalusia ( Andalućía , 安达卢西亚 )

Estremadura ( Extremadura , 埃斯特雷马杜拉 )

Castile ( Castilla , 卡斯蒂利亚 )

Navarre ( Navarra , 纳瓦拉 )

Catalonia ( Cataluń , 加泰罗尼亚 )

Saragossa ( Zaragoza , 萨拉戈萨 )

Cordova ( Córdoba , 科尔多瓦 )

Seville ( Sevilla , 塞维利亚 )

为了与英式写法保持一致，西班牙语地名的重音符号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省略了。例如，Aragon : Aragón ( 阿拉贡 ) ; Cadiz : Cádiz ( 加的斯 ) ; Malaga : Málaga ( 马拉加 ) 。

### 正确的姓名

索引中西班牙人的姓名按照西班牙语写法以父姓顺序排列。例如，与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有关的内容将在其父姓拉尔戈而非母姓卡瓦列罗项下找到。不过，我时常称其为卡列瓦罗，在西班牙语原始资料的引文中往往也是如此，当时，朋友和对手经常这样称呼他。

### 加泰罗尼亚名称

加泰罗尼亚人的姓名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是相应的西班牙语写法，例如，Juan Camorera : Joan Comorera ( 胡安·科莫雷拉 ) ; Luis Companys : Lluís Companys ( 路易斯·孔帕尼斯 ) ; Federico Escofet : Frederic Escofet ( 费德里科·埃斯科菲特 ) ; José Tarradellas : Josep Tarradellas (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 。加泰罗尼亚名称的一个明显例外是正文中通篇使用的 Generalitat (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 ) 。

### 缩写及其他简称

AHN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 Madrid and Salamanca ( 国家历史档案馆 ) ，马德里和萨拉曼卡

AIT 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 Trabajadores ( 国际工人协会，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人国际 )

BL Bolshevik Leninists (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列昂·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西班牙支部 )

BOC Bloque Obrero y Campesino ( 工农集团，一九三五年与共产党左派联合组成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CADCI Centre Autonomista de Dependents del Comerç de la Industria ( 工商业雇员自治中心，加泰罗尼亚的办公室雇员和商店店员工会 )

CEDA Con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Derechas Autónomas ( 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右翼天主教党派联盟 )

CI Communist or Third International ( 共产国际或第三国际 )

CLUEA Consejo Levantino Unificado de la Exportación Agrícola ( 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巴伦西亚地区由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的农产品出口组织 )

CNT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 全国劳工联合会，意识形态受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引导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联盟 )

Comintern Communism International or Third International ( 共产国际或第三国际，各国共产党或共产国际“支部”联合起来的由莫斯科控制的世界性共产主义组织 )



ERC 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加泰罗尼亚中产阶级的左翼共和派政党 )

FAI 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无政府主义组织，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意识形态引导者 )

FE Falange Española ( 西班牙长枪党，法西斯政党 )

FIJL Federación Ibérica de Juventudes Libertarias ( 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无政府主义青年组织 )

FOUS Federación Obrera de Unidad Sindical ( 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工会组织 )

GEPCI Federación Catalana de Gremios y Entidades de Pequeños Comerciantes e Industriales ( 加泰罗尼亚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受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 )

GPU Gosudarstvennoe Politicheskoe Upravlenie (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苏联秘密警察，后更名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

GRU Glavnoye Razvedyvatelnoye Upravleniye ( 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 )

HI Hoover Institution ( 胡佛研究所 )

IISH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 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 )

JAP Juventudes de Acción Popular ( 青年人民行动，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

斯控制的天主教青年运动 )

JCI Juventud Comunista Ibérica ( 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青年组织 )

JSU Federación de 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 (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 由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合并而成 , 受共产党控制 )

ML Movimiento Libertario ( 自由主义运动 , 包括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在内的整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 )

NKVD Narodnyi Komissariat Vnutrennikh Del ( 内务人民委员部 , 苏联秘密警察 , 前身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

OGPU或GPU Ob' 'edinennoe Gosudarstvennoe Politicheskoe Upravlenie (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或国家政治保卫局 , 苏联秘密警察 , 统一的国家政治管理机构 , 隶属于人民委员会 , 后更名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

PCE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 ( 西班牙共产党 )

Politburo Political Buro or Political Bureau ( 政治局 , 共产党的核心执委会或控制机构 )

POUM 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 )

PSOE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 即西班牙社会党 )

PSUC 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 加泰罗尼亚的四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合并而成 , 受共产党控制 )

SHM Servicio Histórico Militar ( 军事历史部门 )

SIM Servicio de Investigación Militar ( 军事调查局 , 军事情报部门 , 受共产党控制 )

SIPM Servicio de Información y Policía Militar ( 佛朗哥的宪兵情报局 )

UGT 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 劳动者总工会 , 社会党的工会组织 )

UME Unión Militar Española ( 西班牙军人联盟 , 右翼军人组织 )

UMRA Unión Militar Republicanos Antifascista ( 共和国军人反法西斯联盟 , 左翼军人组织 )

USC Unió Socialista de Catalunya ( 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 , 加泰罗尼亚的社会主义政党 , 与三个较小的政党合并组成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

主要人物

这些人物以及其他内战参加者见索引。

Abad de Santillán , Diego (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 ) ,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主要理论家和积极分子

Adroher , Enrique ( “Gironella” ) ( 恩里克·阿德罗埃尔 , “希罗内利亚” )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负责宣传的书记

Aiguadé , Artemio ( 阿特米奥·艾瓜德 )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务治安专员，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亲共人士

Aiguadé , Jaime ( 海梅·艾瓜德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第二届内格林政府的部长，一九三八年八月辞职

Alcalá—Zamora , Niceto ( 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 ) ，自由派天主教徒，自由共和派右翼领导人，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一九三一年十月辞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成为共和国首任总统，一九三六年五月下台

Alvarez del Vayo , Julio (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 ，社会党左派，共产党的盟友，外交部长，总政治部主任

Andrade , Juan ( 胡安·安德拉德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的激进派成员，前托洛茨基分子

Ansó , Mariano ( 马里亚诺·安索 ) ，左翼共和派人士，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任司法部长，内格林的好友

Antón , Francisco ( 弗朗西斯科·安东 ) ，共产党马德里地方党组织书记，中部前线督察委员，被普列托撤职

Antonov—Ovseenko , Vladimir A. ( 弗拉基米尔·A·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 ) ，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消失

Araquistáin , Luis ( 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 ) ，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亲密助手，驻法国大使

Arredondo , Lieutenant Colonel Manuel ( 曼努埃尔·阿雷东多中校 ) , 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副官 , 因同情共产党被调离

Asensio , Colonel José ( 何塞·阿森西奥上校 , 后来晋升为将军 ) , 共和派军官 , 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者 , 国防部副部长 , 在共产党的压力下被迫辞职

Azañ , Manuel (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 ) , 左翼共和派人士 , 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五月任共和国总理 , 一九三六年六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任共和国总统 , 左翼共和派成员

Azcárate , Pablo de ( 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 ) , 西班牙驻伦敦大使 , 支持内格林

Baldwin , Stanley ( 斯坦利·鲍德温 ) , 内维尔·张伯伦之前的英国首相

Balius , Jaime ( 海梅·巴柳斯 ) , 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组织 “杜鲁蒂之友会” 的领导人

Baráibar , Carlos de ( 卡洛斯·德·巴赖瓦尔 ) , 社会党左派领导人 , 接替阿森西奥任国防部副部长

Barceló , Lieutenant Colonel Luis ( 路易斯·巴尔塞洛中校 ) , 共产党军官

Belayev ( 别拉耶夫 ) ,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

Berzin , General Ian K. ( “Grishin” ) ( 伊安·K·别尔津将军 , 别名 “格里申” ) , 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的主要苏联军事顾问 , 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消失

Besteiro , Julián ( 胡利安·贝斯泰罗 ) , 社会党右翼领导人 , 加入卡萨多上校反内格林的国防委员会

Bonnet , Georges ( 乔治·博内 ) , 法国外交部长

Burillo , Ricardo ( 里卡多·布里略 ) , 共产党员 , 马德里的警察部队指挥官 , 后为巴塞罗那警察部队指挥官

Calvet , José ( 何塞·卡尔韦特 ) ,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领导人 , 支持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Calvo Sotelo , José ( 何塞·卡尔沃·索特洛 ) , 君主主义西班牙复兴运动的议会领袖 , 内战前被暗杀

“El Campesino” ( “农夫” ) , 见González , Valentín

Cardona Rosell , Mariano ( 马里亚诺·卡多纳·罗塞利 ) , 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

“Carlos , Comandante” ( “指挥官卡洛斯” ) , 见Vidali

Carrillo , Santiago ( 圣地亚哥·卡里略 ) ,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书记 ,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加入西班牙共产党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担任西班牙共产党书记

Carrillo , Wenceslao ( 文塞斯劳·卡里略 ) , 社会党左派领导人 , 圣地亚哥·卡里略的父亲 , 担任安全总局局长直到一九三七年五月 , 加入卡萨多上校反内格林的国防委员会

Casado , Colonel Segismundo (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 ) , 共和派军官 , 国防部军事行动负责人 , 中路军司令 , 一九三九年三月组成反内格林的国防委员会

Casares Quiroga , Santiago ( 圣地亚哥·卡萨雷斯·基罗加 ) , 左翼共和派领导

人，一九三六年六月接替阿萨尼亚担任总理并且执掌国防部

Castro, Enrique (恩里克·卡斯特罗)，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五团首任指挥官，土地改革协会主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门负责人，后来（一九三八年九月）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离开苏联并且脱离西班牙共产党

Checa, Pedro (佩德罗·切卡)，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主要成员

Claudín, Fernando (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党员，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内战结束后与圣地亚哥·卡里略决裂

Codovila, Vittorio ( “Medina” ) (比托里奥·柯多维拉，化名“梅迪纳”)，共产国际代表

Comorera, Juan (胡安·科莫雷拉)，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前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领导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成员

Companys, Luis (路易斯·孔帕尼斯)，自由共和派人士，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Contreras, Carlos” ( “卡洛斯·孔特雷拉斯” )，见Vidali

Cordón, Colonel Antonio (安东尼奥·科登上校)，重要的共产党军官，国防部战术部门负责人，东路军参谋长，被内格林提拔为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

Daladier, Edouard (爱德华·达拉第)，法国国防部长，后任法国总理

Díaz, José (何塞·迪亚斯)，西班牙共产党书记

Díaz Tendero , Captain Eleuterio ( 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上尉 ) ，亲共产党的社会党左派，国防部情报监控部门负责人，被内格林任命为国防部人事部门负责人

Domínguez , Edmundo ( 埃德蒙多·多明格斯 ) ，社会党左派，劳动者总工会旗下的全国建筑工人联合会书记，改换门庭投靠共产党，中部前线监察委员

“Douglas” ( “Duglas” ) ，General ( “道格拉斯” 将军 ) ，见Smushkevich

Durán , Major Gustavo ( 古斯塔沃·杜兰少校 ) ，亲共人士，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分局负责人，被普列托撤职

Durruti , Buenaventura ( 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 ) ，无政府主义运动领导人

Escofet , Major Federico ( 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少校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一九三六年七月任加泰罗尼亚治安总署署长

Escribano , Antonio ( 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 )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阿利坎特省负责人，反对共产党，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执委会辞职

Estrada , Major Manuel ( 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少校 ) ，共产党军官，国防部总参谋长，被拉尔戈·卡瓦列罗撤职

Fernández Grandizo , Manuel ( 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 ) ，见 “Munis”

Fernández Ossorio y Tafall , Bibiano ( 比维亚诺·费尔南德斯·奥索里奥—塔法利 ) ，左翼共和派人士，《政治报》负责人，左翼共和派书记，共产党的盟友，被内格林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



Fischer , Louis ( 路易斯·费希尔 ) , 莫斯科和西班牙共产党有影响力的支持者

Franco , General Francisco (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 ) , 内战爆发时的加那利群岛驻军指挥官 , 在西属摩洛哥发动军事叛乱的领导人 , 一九三六年十月以后成为民族主义者的首领和政府首脑

Galán , Francisco ( 弗朗西斯科·加兰 ) , 西班牙共产党党员 , 被内格林晋升为上校

Galán , Juan ( 胡安·加兰 ) , 西班牙共产党党员 , 情报处副处长 , 军队督察

Galarza , Angel ( 安赫尔·加拉尔萨 ) , 社会党左派 , 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内政部长

Garcés Arroyo , Santiago ( 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 ) , 社会党人 , 内格林派 , 一九三八年被内格林提拔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

García Oliver , Juan ( 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 ) ,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 ,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任司法部长

García Pradas , José ( 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 ) , 《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马德里 ) 负责人 , 一九三九年三月支持卡萨多发动的反内格林政变

Gaykis , Leon ( 列昂·盖基斯 ) , 马塞尔·罗森堡之后的苏联驻西班牙大使 , 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消失

Gerö , Ernö ( “Pedro” ) ( 杰罗·埃尔诺 , 化名 “佩德罗” ) , 共产国际派到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代表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控制的匈牙利政府中担任部长

Gil Robles , JoséMaría ( 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 ) , 天主教的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领导人 , 逃到葡萄牙

Giral , José ( 何塞·希拉尔 ) , 自由共和派人士 , 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九月担任政府总理 , 左翼共和派成员

“Gironella” ( “希罗内利亚” ) , 见Adroher

Goded , General Manuel ( 曼努埃尔·戈代德将军 ) , 叛乱将领 , 在巴塞罗那被打败

Gómez , Mariano ( 马里亚诺·戈麦斯 ) , 高级法院主审法官

Gómez , Sócrates ( 苏格拉底·戈麦斯 ) , 反对圣地亚哥·卡里略 , 一九三八年试图重建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Gómez Sáez , Paulino ( 保利诺·戈麦斯·赛斯 ) , 社会党温和派 , 普列托的支持者 , 五月事变后中央政府派往加泰罗尼亚接管社会秩序的代表 , 一九三八年四月任内政部长

Gómez , Trifón ( 特里丰·戈麦斯 ) , 右翼社会党人 , 军需部门负责人 , 反对内格林

González , Valentín ( “El Campesino” ) ( 巴伦廷·冈萨雷斯 , 绰号 “农夫” ) , 共产党军事指挥官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苏联逃走

González Marín , Manuel ( 曼努埃尔·冈萨雷斯·马林 ) , 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 一九三九年三月加入反内格林的国防委员会

González Peñ , Ramón ( 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 ) , 社会党温和派 , 一九三七年担任新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主席 , 支持内格林反对普列托

Gorev , General Vladimir ( 弗拉基米尔·戈列夫将军 ) ，苏联军官，被称为“马德里的救星”，被斯大林处决

Gorkin , Julián ( 胡利安·戈尔金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负责国际事务的书记，《战斗报》负责人

“Grigorovich” , General ( “格里戈罗维奇” 将军 ) ，见Shtern

“Grishin” , General ( “格里申” 将军 ) ，见Berzin

Guarner , Colonel Vicente ( 比森特·瓜内尔上校 ) ，一九三六年七月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警察部门负责人，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Halifax , Viscount ( 哈利法克斯子爵 ) ，英国掌玺大臣，后任外交大臣并且是内维尔·张伯伦的“内阁决策委员会”成员

Henderson , Sir Nevile ( 内维尔·亨德森爵士 ) ，英国驻柏林大师，内维尔·张伯伦的支持者

Hernández , Jesús (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 )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任教育部长，一九三八年四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任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第一政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西班牙共产党开除出党

Hernández Zancajo , Carlos ( 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 ) ，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整个内战期间始终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

Hidalgo de Cisneros , General Ignacio ( 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西斯内罗斯将军 ) ，空军司令，社会党温和派，加入共产党

Hoare , Sir Samuel ( Viscount Templewood ) ( 塞繆尔·霍尔爵士 , 坦普尔伍德子爵 ) , 内维尔·张伯伦的 “内阁决策委员会” 成员

Ibárruri , Dolores ( “La Pasionaria” ) (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 , “热情之花” ) ,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Irujo , Manuel de (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 ) , 巴斯克民族主义领导人 , 内格林政府的司法部长 ,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辞职 , 然后担任不管部长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辞职

Isgleas , Francisco ( 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 ) , 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防务专员

Jurado , Lieutenant Colonel Enrique ( 恩里克·胡拉多中校 , 后来晋升为将军 ) , 共和派军官 , 内战结束时反对内格林

Kandelaki , David ( 达维德·坎杰拉基 ) , 斯大林派往柏林的贸易代表

“Kléber , General Emilio” ( Manfred Stern ) ( “埃米利奥·克莱贝尔将军” , 曼弗雷德·斯特恩 ) , 苏联将军 ,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任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指挥官 , 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消失

Koltzov , Mikhail ( 米哈伊尔·科利佐夫 ) , 《真理报》特派记者 , 斯大林的私人代表 , 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消失

Krivitsky , Walter ( 瓦尔特·克里维茨基 ) , 一九三七年叛逃西方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

Kulik , General G. ( “Kuper” or “Kupper” ) ( Г.库利克将军 , 化名 “库珀

尔” ) , 苏联军官 , 波萨斯将军的顾问

“Kuper” or “Kupper” , General ( “库珀尔” 将军 ) , 见Kulik

Kuznetsov , Nicolai G. ( 尼古拉·Г·库兹涅佐夫 ) , 苏联军官 , 海军武官和军事顾问 , 奉命在公海为运往苏联的西班牙黄金护航

Lamoneda , Ramón ( 拉蒙·拉莫内达 ) , 社会党温和派 ,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书记 , 后来成为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支持者

Largo Caballero , Francisco (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 ) , 社会党左派领导人 , 劳动者总工会书记 , 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Líster , Enrique ( 恩里克·利斯特 ) , 著名的共产党民兵武装领导人 , 第五团指挥官 , 被内格林晋升为上校

Lizarza Iribarren , Antonio de ( 安东尼奥·德·利萨尔萨·伊里瓦伦 ) , 卡洛斯派君主主义者民兵司令 , 一九三四年会见墨索里尼

Llopis , Rodolfo ( 鲁道夫·略皮斯 ) , 社会党左派 , 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副总理 , 始终忠于这位社会党领导人

López , Juan ( 胡安·洛佩斯 ) , 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 ,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任商业部长

Maisky , Ivan ( 伊万·迈斯基 ) , 苏联驻伦敦大使

“Malinó” ( “马利诺” ) , 见Malinovsky

Malinovsky , Rodion ( “Malinó” ) ( 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化名 “马利诺” ) ，苏联军官，免遭清洗，成为苏联元帅和国防部长

Mantecón , José Ignacio ( 何塞·伊格纳西奥·曼特孔 ) ，左翼共和派成员，亲共人士，一九三七年八月被任命为阿拉贡地区的首席行政长官

Martí Feced , Carlos ( 卡洛斯·马蒂·费塞德 ) ，自由共和派人士，五月事变期间加入加泰罗尼亚临时政府，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Martín Blázquez , José ( 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 ) ，任职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国防部的共和派军官，一九三七年逃往伦敦

Martínez Amutio , Justo ( 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 ) ，社会党左派，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巴伦西亚地方组织领导人，阿尔瓦塞特省省长

Martínez Barrio , Diego ( 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 ) ，温和的共和联盟领导人，共和国副总统，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至十九日的流产政府总理

Martínez Cabrera , General Toribio ( 托里维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 ) ，共和派军官，反对共产党，被共产党人解职，因马拉加失守受审，被判无罪

Marty , André ( 安德烈·马蒂 )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共产国际代表，国际纵队的组织者

Más , Valerio ( 巴莱里奥·马斯 ) ，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书记，五月事变期间加入加泰罗尼亚临时政府

Maura , Miguel ( 米格尔·毛拉 ) ，温和的保守共和派领导人，内战爆发前呼吁成立

## 多党派的民族团结政府

Maurín , Joaquín ( 华金·毛林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内战爆发时被民族主义者监禁

“Medina” ( “梅迪纳” ) ，见Codovila

Melchor , Federico ( 费德里科·梅尔乔 )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加入西班牙共产党

Méndez Aspe , Francisco ( 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 ) ，支持内格林的左翼共和派人士，一九三六年参与向苏联运送黄金，一九三八年四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任财政部长

Mera , Cipriano ( 西普里亚诺·梅拉 ) ，中部前线全国劳工联合会部队的无政府主义指挥官，支持卡萨多发动反内格林的政变

Meretskov , K.A. ( “Petrovich” ) ( K.A.梅列茨科夫，化名“彼得罗维奇” ) ，苏联军官，恩里克·利斯特和马丁内斯·卡夫雷拉的军事顾问，免遭清洗，成为苏联元帅，红军总参谋长

Miaja , General José ( 何塞·米亚哈将军 ) ，共和派军官，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至十九日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不幸的和解政府成员，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西班牙共产党党员，卡萨多反内格林的国防委员会首脑

Mije , Antonio ( 安东尼奥·米赫 )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国防部总政治部分支部门负责人

Minev , Syefan ( 斯特凡·米涅夫 ) , 见 “Stefanov”

Miravittles , Jaime ( 海梅·米拉维特列斯 ) , 中央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成员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Modesto , Colonel Juan ( 胡安·莫德斯托上校 ) , 共产党民兵武装领导人 , 后成为人民军军官 , 一九三九年三月被内格林晋升为将军

Mola , General Emilio ( 埃米利奥·莫拉将军 ) , 民族主义将领 , 半岛军事叛乱的组织者

Montseny , Federica ( 费德丽卡·蒙特塞尼 ) , 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 ,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任卫生部长

“Moreno” ( “莫雷诺” ) , 见 “Stefanov”

Morón , Gabriel ( 加夫列尔·莫隆 ) , 社会党温和派 , 取代安东尼奥·奥尔特加担任安全总局局长

“Munis , G.” ( Manuel Fernández Grandizo ) ( “G.穆尼斯” , 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 ) ,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 ( 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西班牙支部 ) 领导人

Negrín , Juan ( 胡安·内格林 ) , 社会党温和派 , 后来成为亲共人士 , 一九三六年九月担任财政部长 , 一九三七年五月担任总理 , 一九三八年四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Nelken , Margarita ( 玛加丽塔·内尔肯 ) , 社会党左派议员 , 加入西班牙共产党



Nin , Andrés ( 安德烈斯·宁 )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 , 一九三七年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杀害

Núñez Maza , Carlos ( 卡洛斯·努涅斯·马萨 ) , 西班牙共产党党员 , 民航总署技术干事 , 一九三八年四月被内格林提拔为负责空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

Orlov , Alexander (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 , 一九三六年九月开始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 西班牙 ) 特工负责人 , 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叛逃美国为止

Ortega , Lieutenant Colonel Antonio ( 安东尼奥·奥尔特加中校 ) , 西班牙共产党党员 , 内格林任命其取代文塞斯劳·卡里略担任安全总局局长 , 后因杀害安德烈斯·宁的丑闻被迫辞职

Ossorio y Gallardo , Angel ( 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 ) , 共和派法官

Ossorio y Tafall , Bibiano ( 比维亚诺·奥索里奥—塔法利 ) , 见Fernández

Ossorio y Tafall

“Pablo” , General ( “巴勃罗” 将军 ) , 见Pavlov

Pascua , Marcelino ( 马塞利诺·帕斯库亚 ) , 社会党温和派 , 内格林的支持者 , 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

“La Pasionaria” ( “热情之花” ) , 见Ibárruri

Pavlov , General D.G. ( “Pablo” ) ( Д.Г.帕夫洛夫将军 , 化名 “巴勃罗” ) , 苏联军官 , 指挥西班牙的苏联坦克部队 , 在斯大林的清洗中遇害

“Pedro” ( “佩德罗” ) , 见Gerö

Peiró , Juan ( 胡安·佩罗 ) , 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任工业部长

Pérez Salas , Colonel Jesús ( 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 ) , 共和派军官 , 普列托的国防部副部长

“Petrovich” ( “ 彼得罗维奇 ” ) , 见Meretskov

Pi Sunyer , Carlos ( 卡洛斯·皮·苏涅尔 ) , 巴塞罗那市长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Portela Valladares , Manuel ( 曼努埃尔·波特拉·巴利亚达雷斯 ) , 中间派领导人 , 一九三六年二月辞去总理职务

Pozas , General Sebastián ( 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 ) , 自由共和派军官 , 中部前线指挥官 , 五月事变期间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和东部驻军的指挥官 , 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

Pretel , Felipe ( 费利佩·普雷特尔 ) , 社会党左派 , 劳动者总工会司库 , 国防部总政治部秘书长 , 改换门庭投靠西班牙共产党

Prieto , Horacio M. ( 奥拉西奥·M·普列托 ) ,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前任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

Prieto , Indalecio (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 ) , 社会党温和派 , 一九三六年九月任海军和空军部长 , 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任国防部长 , 内格林迫使其去职

Ptukhin , E.S. ( E.C·普图欣 ) , 苏联空军军官 , 接替斯穆什克维奇

Queipo de Llano , Gonzalo ( 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 ) , 叛军将领 , 占领塞维利亚

Ravines , Eudocio ( 欧多西奥·拉维内斯 ) , 秘鲁共产党人 , 《红色阵线报》( 巴伦西亚 ) 编辑部成员

Regler , Gustav ( 古斯塔夫·雷格勒 ) , 德国共产党人 , 作家 , 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 , 战后脱离共产党

Río , José del ( 何塞·德尔·里奥 ) , 共和派领导人 , 加入卡萨多反内格林的国防委员会

Rodríguez , Benigno ( 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 ) , 西班牙共产党党员 , 内格林的政治秘书

Rodríguez Salas , Eusebio ( 欧塞维奥·罗德里格斯·萨拉斯 )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 , 加泰罗尼亚治安总署署长

Rodríguez Vega , José ( 何塞·罗德里格斯·维加 ) , 社会党左派 , 为内格林背弃拉尔戈·卡瓦列罗 , 一九三七年成为新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书记

Rojo , Major Vicente ( 比森特·罗霍少校 , 后为中校 , 接着晋升为将军 ) ,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马德里保卫战期间的参谋长 , 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任总参谋长 , 支持内格林

Rosal , Amaro del ( 阿马罗·德尔·罗萨尔 ) , 社会党左派 , 后来支持共产党 , 银行雇员工会主席 , 一九四八年正式加入西班牙共产党

Rosenberg , Marcel ( 马塞尔·罗森堡 ) ，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 ，被盖基斯接替 ，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消失

Salgado , Manuel ( 曼努埃尔·萨尔加多 ) ，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加入卡萨多反内格林的国防委员会

San Andrés , Miguel ( 米格尔·圣安德烈斯 ) ，左翼共和派人士 ，加入卡萨多反内格林的国防委员会

Sánchez Román , Felipe ( 费利佩·桑切斯·罗曼 ) ，保守的民族共和党领导人 ，加入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至十九日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的和解政府

Sanjurjo , General José ( 何塞·圣胡尔霍将军 ) ，流亡的君主主义军官 ，军事叛乱领导人 ，一九三六年七月返回西班牙途中死于飞机失事

Serra Pàmies , Miguel ( 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 ，战后脱离该党

Shtern , Gregoriy M. ( “Grigorovich” ) ( 格列戈里·M·施特恩 ，化名 “格里戈罗维奇” ) ，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别尔津之后担任苏联首席军事顾问 ，在斯大林的清洗中遇害

Silva , José ( 何塞·席尔瓦 ) ，共产党员 ，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

Simon , John ( 约翰·西蒙 ) ，内维尔·张伯伦的 “内阁决策委员会” 成员

Smushkevich , Yakov ( “Douglas” or “Duglas” ) ( 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 ，化名 “道格拉斯” ) ，西班牙的苏联空军指挥官 ，在斯大林的清洗中遇害

Stashevsky , Arthur ( 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 ) , 苏联贸易代表 , 内格林的朋友 , 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消失

“Stefanov , Boris” ( “Moreno” ) ( “鲍里斯·斯特凡诺夫” , “莫雷诺” ) , 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 , 共产国际代表 , 真实姓名斯特凡·米涅夫

Stern , Manfred ( 曼弗雷德·斯特恩 ) , 见 “Kléber”

Tarradellas , José (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 , 自由共和派人士 ,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首席专员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Togliatti , Palmiro ( “Ercole Ercoli” , “Alfredo” ) (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 化名 “埃尔科莱·埃尔科利” , “阿尔弗雷多” ) ,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 , 共产国际代表

Uribe , Vicente ( 比森特·乌里韦 ) , 农业部长 ,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Val , Eduardo ( 爱德华多·巴尔 ) , 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 加入卡萨多反内格林的国防委员会

Valdéz , Miguel ( 米格尔·巴尔德斯 )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 ,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专员

Vanni , Ettore ( 埃托雷·万尼 ) , 意大利共产党人 , 巴伦西亚《真理报》主编

Vansittart , Sir Robert ( 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 ) , 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 , 反对绥靖政策 , 被内维尔·张伯伦撤职

Vázquez , Mariano R. ( 马里亚诺·R. 巴斯克斯 ) , 一九三六年七月任全国劳工联合

会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书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九年任全国劳工联合会  
全国委员会书记

Vidali , Vittorio ( “Comandante Carlos” , “Carlos  
Contreras” , “Enea Sormenti” ) ( 维托里奥·维达利，人称“指挥官卡洛  
斯”，化名“卡洛斯·孔特雷拉斯”、“埃内亚·索尔门蒂” )，意大利共产党人，第  
五团第一政委，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关系密切

Vidarte , Juan—Simeón ( 胡安—西梅翁·比达特 )，社会党温和派，一九三七年  
五月任内政部副部长，内格林的支持者

Vidiella , Rafael ( 拉斐尔·比迭利亚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前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盟领导人

Voronov , N. ( H. 沃罗诺夫 )，苏联军官，指挥西班牙的苏联炮兵部队，免遭清  
洗，成为苏联炮兵学院院长

Wilson , Sir Horace ( 霍勒斯·威尔逊爵士 )，内维尔·张伯伦的亲密同事和首席外  
交政策顾问

Zabalza , Ricardo ( 里卡多·萨瓦尔萨 )，社会党左派，劳动者总工会旗下的全国  
农业工人联合会书记，反对共产党

Zugazagoitia , Julián ( 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 )，社会党温和派，主管《社会  
主义者》直到一九三七年五月，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任内政部长

## 译者说明

本书根据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he Spanish Civil War :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1991 ) 一书译出。

在本书中，除了指称在西班牙内战中与佛朗哥阵营对立的共和派阵营之外，“共和派” ( Republican ) 一词通常指的是左翼共和派 ( Izquierda Republicana , IR ) 以及共和派阵营中不属于社会党、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无政府主义和两大工会等党派组织的其他自由共和派人士和温和共和派人士。

对于作者重点记述的共和派阵营中的重要党派之一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 (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 PSOE ) ，本书多译为西班牙社会党。至于内战期间共和派阵营中的另外一些重要的党派组织，例如，全国劳工联合会 (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 CNT ) ，劳动者总工会 ( 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 UGT )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 ( 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 FAI ) ，西班牙共产党 ( Partido Comunista Español , PCE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 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 , PSUC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 , POUM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 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 , ERC )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 Federación de 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 , JSU ) 等等，考虑到中国读者对它们并不熟悉，所以在译文中均使用全称。

本书中的西班牙语人名根据《西班牙语姓名译名手册 ( 修订本 ) 》 ( 商务印书馆，1973 ) 和《西班牙语姓名译名手册》 ( 商务印书馆，2015 ) 译出，个别通译除外。

两年来，经常有人询问“西班牙内战史”的翻译情况。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本书

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西班牙内战史，书中主要记述的是西班牙内战期间发生在共和派阵营内部的事情。像共和派阵营与佛朗哥阵营之间的内战一样，本书作者为读者所揭示的这一场“西班牙内战”残酷血腥，你死我活，而其错综复杂的程度甚至可能超过前者，对于认识二战之前乃至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它也许更有启示作用。

## 文前

对于卷入西班牙这场争斗的知识分子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事实与谎言真假难辨地交织在一起，骗人者同样受到欺骗。

有人说，带着没有破灭的美妙幻想在西班牙战死的那些人是幸运的。

——朱利安·西蒙斯，《三十年代：一场循环往复的梦幻》

## 第一部分 内战、革命及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共和国的垮台

尽管反佛朗哥阵营所发动的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其最初阶段在某些方面比布尔什维克革命还要深刻——在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接踵而至，但是，由于某种史无前例的欺骗隐瞒政策，西班牙国外成百上千万感觉敏锐的人却对此事一无所知，不仅对这场革命的深度和广度不甚了了，就连它的存在也不知道。

——伯内特·博洛滕

### 第一章 酝酿剧变



引发内战的矛盾不是突然激化的。自从一九三一年四月推翻君主制宣告成立共和国以来，双方的敌意持续稳定地不断加深，接着，由于左派联盟人民阵线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举行的大选中获胜，形势愈发严峻起来。

在大选与内战之间的几个月里，共和国在城镇和乡村经历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工人骚乱，骚乱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以来统治西班牙的中—右政府所推行的政策的反应。在西班牙左派所谓黑暗的两年（el bienio negro）这一时期，不仅规定工资和雇佣条件的法律被废除、修改或已失效，而且共和国的许多其他工作也没有开展。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是一位温和的共和派人士，曾经担任司法部长，据他本人说，内战期间他与双方保持着同样的距离。马达里亚加写道，劳动法庭显示出某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像以前不利于雇主一样，现在它们的裁决不利于工人。“同时，土地改革协会失去了资金支持。从农村的角度看，就实际情况和农民餐桌上的面包而论，这些变化是灾难性的。许多地主一点教训也没有吸取，而且什么也不想放弃——这样的地主太多了，也许是出于对左派执政期间所受到的侮辱和伤害的报复，他们以极其野蛮残暴的方式对待雇工，以致社会环境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而且在道德观念方面变得越来越恶劣。农业工人的工资重新下降到不足以维持温饱的水平；工作失去了保障，同时，分得土地的希望彻底破灭。”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成立于一九三三年十月的法西斯政党西班牙长枪党领导人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在西班牙议会发言说，农村的生活“绝对让人无法忍受”。“昨天我在塞维利亚省。”他说道，“该省有个名叫巴多拉托萨的村庄，那里的女人凌晨三点出门去摘鹰嘴豆。工作九个小时——由于技术原因工作时间无法延长——之后，她们在正午时分收工。干这种活儿这些女人一天可以挣一个比塞塔。”

温和共和派报纸《太阳报》的报道特别具有启发性。“自从共和国建立以来，”该报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写道，“我们一直在两个极端之间极其危险地摇摆不定，尤其是农村。前两年[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农业实行了一种荒唐可笑的工作制，盛行一时的游手好闲和不受约束的风气最终毁掉了农业。农业工人挣着高额工资却能干活儿就不干活儿。……接下来的两年间[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我们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工资从每天十到十二个比塞塔锐减至四个、三个比塞塔，甚至减到两个比塞塔。财主开始报复劳工，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在为不久之后熊熊燃烧的社会怒火积聚燃料。与此同时，许多曾经按照政府命令被迫减租的地主想方设法驱逐佃户。……这些错误行为为人民阵线的胜利埋下了伏笔，这场胜利与其说是由于左派真正的实力，不如说是由于右派缺乏政治远见，尽管左派确实具有相当的实力。”

接着，在人民阵线获胜之后不断加剧的社会动乱的影响下，天主教的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这是一个松散的右翼政党联盟，简称CEDA，其核心党派为人民行动党——领导人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宣称：“为了表明不以任何形式迁就纵容，我们必须使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扮演某种社会角色。最初可能某些团体将会退出，但这不会让我担忧，甚至可能让我高兴。西班牙的保守阶层必须明白，如果他们不想放弃所拥有的大部分利益自愿做出牺牲的话，那么，他们就将永远消失。”

在另一个场合，他说：“有许许多多[雇主和地主]知道如何公平宽厚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也有许多人，一旦拥有了支配权，他们便以自杀式的利己手段降低工资、提高地租，试图蛮不讲理地驱逐佃户，而且忘记了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的惨痛教训。结果，在许多省份，左派从普通农民和农业工人那里获得的选票增加了。推行公平的社会政策之后，这些人的选票仍然将会属于我们。”

主要由于上述原因，一九三六年二月人民阵线获得大选胜利之后农村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以农业工人罢工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并且缩短工作时间；雇主经常以烧掉庄稼或者任其烂在地里作为回应。对于这场农村危机的描述，共和派的报刊上出现了两种说法，与其说它们相互矛盾，不如说它们相互补充。“每天，”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的《太阳报》写道，“我们收到的来信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收成低于往年的平均水平，但是，不关心收成好坏的工人就收割打场的工作提出了荒谬的条件。在一些村庄，这些条件非常苛刻，以致佃户、地主、小块土地拥有者和垦殖民[根据土地改革法在土地上定居的农民]……确信，他们不得不让庄稼烂掉或者将其付之一炬，因为如果他们答应工会提出的带有恐吓性的蛮横要求的话，他们就得以某种让购买者感到震惊的价格出售每一蒲式耳谷物。……耕种着西班牙土地的不只是有钱有势的大地主和养尊处优生活在外的土地所有者。对于数十万小块土地拥有者和垦殖民来说，公正解决当前的农业罢工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另一方面，左翼共和派的《自由报》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写道：“在农村……反动势力一方显然具有明确的目的，他们企图抵制共和国政权、把农民群众逼入绝境并将政府置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然的话，怎么能够解释这种情况：在一些省份，全省的雇主打算让收成烂在地里……，只能用来作饲料，而支付他们应付的工资然后把庄稼收回来却合算得多？同时，怎么能够解释类似于发生在阿尔门德拉莱霍的情况？在那里，雇主发誓一天工作也不提供，而且威胁要杀死任何提供工作的地主。”

农村危机还通过无地农民的反叛情绪表现出来，这些农民对土地改革法的实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认为政府官员在分配土地的问题上拖拖拉拉也使他们的耐心渐渐消失。“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土地仍然留在那些政坛大佬手里。”一位地方农民领

袖在五月三十日的《农业工人报》上说，“失望再次开始蔓延，我们走上了一条与一九三一年同样的路。人民阵线政府打算使农民的幻想破灭吗？农民愿意看到他们的希望再次化为泡影吗？不。他们想要得到土地，因此，如果不加快进度的话，那么，当农民意识到政府不给他们他们迫切需要的东西时，那些有责任使农民拥有土地的人不必感到震惊意外。”《农业工人报》是社会党左派所控制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喉舌。

四月十一日，规模不大但发展迅速的西班牙共产党书记何塞·迪亚斯要求政府加快实施土地分配。定居点的数量不足。大地主的土地应当没收，然后毫不拖延地分给农民。他接着指出，政府一直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这是民主革命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因此，我们应当竭尽全力达到这一目的。”

但是，在许多村庄，人们已经失去了耐心，在全部由自由共和派及温和共和派人士组成的政府满足他们的需要之前，农民不愿意再等待了。三月七日，《农业工人报》报道说：

马德里省塞尼辛托斯的农民集体占领了面积为一千三百一十七公顷的“葡萄藤橡树林”牧场并且开始耕种这个牧场。完成占领之后，他们给农业部写了下面这封信：

“我们的村子有一个适于耕种的辽阔牧场，过去那里实际上被耕种过，但是如今却被用来打猎放牧。我们多次向牧场的所有者提出租种土地的要求但没有结果，他与另外两三个地主几乎占有了曾为本地公共财产的所有土地。当我们的手和犁无所事事而我们的孩子却挨饿时，除了占领这块土地，我们没有别的活路。我们做的就是这些。通过我们的劳动，它将生长出以前并不生长的庄稼；我们的苦难将会结束，国家的财富也将增加。我们不认为这样做损害了谁的利益，我们向阁下请求的唯一一件事情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平静正常地从事劳动，请您将这种状况合法化并且肯

定我们的行为。”

三月十七日，《自由报》从托莱多省的马纳萨尔瓦斯报道：“当地两千名饥饿的农民刚刚占领了二十年前罗马诺内斯[伯爵]没有向国民付出任何代价便据为己有的‘栎树林’庄园。”

发表在某份共产党刊物上的一篇文章说：“马德里附近一个小村庄的农业工人以自行接管土地的方式做出了榜样。两周之后，萨拉曼卡省九十个村庄的农业工人如法炮制。几天后，这一榜样被托莱多省一些村庄的农民所效仿；接着，在三月二十五日黎明，卡塞雷斯省和巴达霍斯省的八万名农民占领了土地并开始耕种。[这些]农民的革命行动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极大恐慌。……[不过]政府没有动用武力，而是身不由己地从土地改革协会派出大批专家和官员，以使农民对土地的占领看上去是合法的。”

一名西班牙共产党人写道，农民领袖“估算，土地改革法计划每年安置五万农民，这意味着安置一百万农民要二十年，分给所有农民土地要一百多年。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农民才强行占领了土地”。

仅仅讨论有组织的占地和罢工并不足以弄清一九三六年春天和初夏严重影响着西班牙农村的极其紧张的社会形势，爱德华·E·马莱法基斯这样说，他是内战之前农村形势研究方面的权威。“如同一九三三年中—右势力的选举胜利使社会地位既定阶层有机会以各种各样的小动作——这些小动作大都置法律于不顾——向工人进行报复一样，人民阵线的胜利也使工人得到了不受惩罚地将其意志强加于人的许可。……威胁恐吓似乎已经成为所有不属于工会的工人的流行做法。最经常制造麻烦的可能是那些成群结队的工人，他们闯进农场强迫农场经理给活儿干。偷盗牲畜和庄稼以及砍伐树木当做柴火或木料的情况也普遍存在。”谈到巴达霍斯省，马莱法基斯写

道：“成千上万的农民在该省流浪，毫无希望地到处寻找工作；农场管理人员的作用不断受到反复出现的住宿工人[被迫雇用的多余工人]的影响，而小块土地拥有者则生活在无法摆脱的恐惧中，因为，当‘资产阶级’和‘法西斯分子’这些词的定义扩大到把拥有各种规模财产的人包括在内时，他们也将成为工人入侵的受害者。”马莱法基斯注意到，《太阳报》——这是“我们所拥有的关于那些混乱时期的一个客观的资料来源”——深切关注那些小块土地拥有者和佃户们的命运，它认为，与大地主相比，社会和经济危机对他们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伤害。

如果说农村的骚乱是使政府严重不安的一个原因的话，那么，城市里的劳动争端也是一样。从五月底到内战爆发，共和国受到几乎波及各行各业和所有省份的工人罢工的强烈震动。尽管实行了审查制度，报刊的版面上仍然充满了关于罢工的各种报道：罢工正在进行；旧的罢工结束了，新的罢工宣布开始，更多的罢工可能发生；有部分工人罢工，有总罢工，有静坐罢工，还有声援其他罢工的同情罢工。工人不仅为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和带薪假期而罢工，并且为实施二月二十九日颁布的法令而罢工，这项法令强制雇主恢复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以后由于政治原因被解雇的所有工人的工作并对他们进行赔偿。这一措施由人民阵线在其竞选纲领的第一部分作出承诺，而且引起雇主们的强烈不满。“我们的工资表上有一些重新雇用的雇员，我们没有合适的工作让他们做，”英资力拓公司 董事长奥克兰·格迪斯爵士一九三六年四月报告说，“而且，在刚刚过去的几天，我们遭遇了一场令人烦恼的罢工，罢工者指责我们非法解雇了实际上是因为参加一九三四年十月的革命运动而被关进监狱的那些工人，在他们坐牢期间，我们当然不给他们发工资，因此，他们要求我们给予赔偿。”

对城市中心困扰最为严重的罢工是马德里建筑工人的罢工，它使这座城市陷入瘫痪。尽管社会党的工会组织劳动者总工会（UGT）接受政府仲裁委员会提出的一项解

决方案，但是，更为激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合会（CNT）拒绝仲裁，反而企图将罢工转变成为与雇主和政府的革命性对抗。在尝试结束罢工——这一尝试不时被对立的工会组织成员之间的流血甚至致人死命的冲突所打断——未果后，政府逮捕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组织的一些领导人并且查封了它们的总部。给骚乱火上浇油的是长枪党党徒镇压罢工的行动和建筑承包商本身的拒不让步。用全国建筑承包商协会在内战爆发之后所发表的一项声明中的话说就是，他们的“反抗为形成有利于进行光复不朽之西班牙的圣战的局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为了实施这一壮举，我们在六月十日下令所有工场和工地停工。”七月三日，建筑承包商接受了政府的仲裁，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不顾劳动者总工会结束罢工的努力继续罢工。

促使骚乱蔓延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是，人们对一九三四年十月镇压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左派叛乱的情况记忆犹新。那场叛乱因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批准以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为首的三名天主教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成员加入由激进党领导人亚历杭德罗·勒鲁十月四日组成的内阁而引发。中—右势力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的大选中获胜后，激进党政府在议会里得到了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支持，不过后者没有加入内阁。由于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公开宣称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天主教的专制国家，最强大的反对派社会党人将其视为“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威胁，因此，他们决定，如果后者获准加入政府的话，他们就将进行斗争。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大选以后，因为不信任希尔·罗夫莱斯并且担心社会党人可能造反，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没有批准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加入勒鲁组建的政府，然而，由于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是最大的议会党团和政治组织，因此，它在政府中拥有代表的民主权利不可能永远被否决。尽管希尔·罗夫莱斯因共和国对教会的攻击而从未正式接受过共和国，但是，他宣称自己打算尊重获取政权的民主方

式并且还将法西斯主义斥为异端邪说。尽管如此，他那反复无常和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仍然让社会党人感到担忧。

“显然，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领导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法西斯政党，”理查德·鲁宾逊在他那部关于西班牙右派的极其客观、资料翔实的著作中写道，“但是，在社会党人看来，右派内部教义信仰的细微差别并不重要。希尔·罗夫莱斯对正宗法西斯主义的消极评价与他们毫不相干；现实的问题是：希尔·罗夫莱斯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实际上，他已经接受了共和国并且坚决主张以合法、民主的方式通过选举获取政权，寻求发展；但是，掌握了政权之后，他会怎么做呢？……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天主教社团原则为基础的国家。这个国家应当是在以宪法和民主的方式向自由—民主体制过渡的渐变过程中最终建立起来的。……然而，正如社会主义的实现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禁止天主教参政那样，只要天主教社团主义的实现仍将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末日，社会党人就无意区分法西斯主义与演变的天主教社团主义之间有什么不同。”

虽然希尔·罗夫莱斯拒绝考虑采取暴力手段并且否认自己与法西斯主义有关联，但是，他在一九三三年竞选活动最紧张时所发表的声明仍然使对手忧心忡忡：“我们必须创建一个新的国家。……我们是否为此付出血的代价有什么关系！我们需要一切权力。……民主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目的，而是开始征服一个新的国家的手段。当时机来临时，要么议会表示同意，要么我们让它消失。”

“尽管有朝一日将会废除自由议会制度历来都是[希尔·罗夫莱斯]所宣称的目标之一，”鲁宾逊写道，“但是，当他以如此赤裸裸的方式阐述这一目标时，仍然给人造成印象：这样做也许宜早不宜迟。……无论在其头脑中他自己的意图是否明确，在希尔·罗夫莱斯的社会党人对手看来，他的意图显而易见。……[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拉尔戈·卡瓦列罗告诉社会党人：‘……敌人已经宣战了，他们通过希尔·罗夫莱斯之口表明，如果议会不为他们的目的服务，他们就将反对它。好吧，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正在合法地争取社会进步。但是，如果你们不愿这样，我们将发动暴力革命。……如果合法手段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如果它妨碍我们前进的话，我们就将绕过资产阶级民主，继续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 ”

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当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同意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所提出的派代表加入政府的要求时，社会党人宣布进行总罢工。罢工在所有地方都失败了，只有阿斯图里亚斯矿区除外。在那里，罢工得到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支持，它很快发展成为一场夺取政权的斗争。斗争坚持了近两周之后，在摩尔人士兵和外籍军团的帮助下，当局将这场看上去好像无产阶级革命彩排和内战前奏的罢工镇压了下去。

这次镇压的手段残酷无情。某前任激进党议员是一名毫不妥协地反对左派的保守共和派人士，他写道：“被告在监狱里受到严刑拷打；囚犯不经审判便在监狱的院子里被处决，在那十六个月当中，对于警察实施的迫害和暴行，人们以眼不见为净。官方宣称，只有三个人被处决。多仁慈啊！但是，成千上万的人身陷囹圄，成百上千的人死于非命、受到拷打、成为残废。应当受到诅咒的残忍啊！不要紧，我们还有可悲的镇压利弊分析报告，那可是非常严谨的，报告显示，镇压的手段合法、干净而且正当，它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受到的危害。”另一位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写道：“将要成为[一九三六年]内战特征的各种形式的狂热和残忍都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革命期间及其之后出现过：被不时出现的红色恐怖毁掉的乌托邦革命；利用‘治安部队’进行的有计划的血腥镇压。”

由于这场镇压所引起的报复情绪，由于城镇乡村工人与雇主的相互敌意，最后一

点，由于左右两派势力之间无法妥协的对抗冲突，一九三六年二月人民阵线获得大选胜利后，人们在持续的骚乱中度过了春天和初夏，双方的挑衅和反击使骚乱愈演愈烈。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西班牙长枪党为暴力行为的升级火上浇油，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在长枪党歹徒为对三月六日几名党员被打死进行报复而企图行刺著名律师和温和社会党人议员路易斯·希门尼斯·德·阿苏亚之后，政府取缔长枪党并且逮捕了其领导人。不过，这一措施完全没有收到效果，因为长枪党继续存在甚至暗中有所发展，而且，据一位右翼历史学家说，它还“作为一种催化剂对于统一这个国家某些特定人群正在不断增强的反抗意志起到了促进作用”。

实际上，处于困境中的以自由主义的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为总理的政府所采取的平息事态的各项措施没有一项达到目的，因此，在损害公民自由的情况下，大选过后所宣布的警戒状态月复一月地延长了下去，这是一种没有戒严令那么严厉的安全警戒形式。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暴力和喧闹的场面层出不穷：群众集会和示威活动；纵火和破坏，包括焚烧教堂和教会学校；查封党派和工会总部；没收和试图没收财产；聚众闹事并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暗杀和反暗杀。“由于部长们担心暴力活动继续蔓延，政府审查人员试图禁止报道关于罢工和暗杀的消息，”弗兰克·E·曼努埃尔证实，“日报的副本必须火速送往官方的新闻部门接受审查：被删除的部分变成空白或者以断断续续的文字形式出现。几天后才送到马德里的巴黎《时报》经常比西班牙首都的报纸所刊登的消息更多。因为没有官方的统计资料，只有在找来一批地方报纸翻到标明‘社会冲突’的版面时，人们才能充分了解工人不满的广泛程度。”

“所有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一名共和派军官写道，“西班牙正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它根本不是一个幸福欢乐的国家。”

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军事叛乱在西属摩洛哥爆发，内战开始了。叛乱得到大部分警察的支持，得到君主主义者和长枪党的支持，得到金融界和商业界的支持，得到大多数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支持，得到大地主的支持，得到中小业主、佃户、佃农以及那些被农场工人所提出的过分要求激怒了的垦殖民的支持，它还得到城市中产阶级中较为成功的那一部分人的支持。不像通常想象的那样，由于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一般农民的财产关系千差万别的多样性，农村的人们不仅仅把内战看作拥有土地的贵族与没有土地的农民之间的冲突。正如爱德华·马莱法基斯所说：“西班牙问题的与众不同之处是，没有向一方或者另一方提供大力支持的农民内部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以致无法确定他们中的大多数究竟倾向于冲突的哪一方。……[其他国家的]内战……基本上可以被认为是农民反对其他社会群体的斗争。在西班牙，尽管此类斗争不是没有，然而，这场内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将成为农民对农民的自相残杀。”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场叛乱的倡导者没有等待心理热度达到顶点便已开始策划军事政变。据一位右翼历史学家证实，暴动的命令拟定于大选结束不久之后的一九三六年二月底，“在不难预见的时候，形势的发展将会使其势在必行”。同一位历史学家披露，自从一九三二年八月何塞·圣胡尔霍将军发动反对共和国的叛乱失败之后，政变的想法一直在君主主义者和军队领导人的头脑中萌动。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拥护阿方索的君主主义派别西班牙复兴运动领导人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宣称，一九三四年三月，他和一些右翼领导人曾经策划过一场以军队反叛为后盾的政变。他与另外几名君主主义者一起访问了意大利，如果西班牙爆发内战，他们希望得到意大利政府的支持。一位目击者描述了西班牙君主主义者与墨索里尼举行的会谈，阿方索派和卡洛斯派均参加了这次会谈；另外，卡洛斯派的民兵司令安东尼奥·德利萨尔萨·伊里瓦伦还提供了这次会谈所达成的一份政治和

军事协议的副本——协议的原件现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缴获的意大利文件一起存放于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我们根据这一描述可知，协议的副本或文字记录不应带回西班牙，但是，戈伊科切亚违反其对墨索里尼的承诺，将他自己的协议草稿带回了马德里。内战期间这些草稿在马德里被人发现，使政变共谋者中唯一没能逃离共和派控制区的利萨尔萨非常不安。据利萨尔萨说，罗马协议并没有产生实际结果，因为一九三六年七月的叛乱是由军官发动的，跟与墨索里尼进行的谈判无关，所以，西班牙最重要的内战历史学家之一里卡多·德拉·谢尔瓦认为，罗马协议的意义“被严重地夸大了”。不过，如同利萨尔萨所说，该协议帮助在罗马造成了“一种有利于叛乱的气氛，从而使意大利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比较从容地作出了支持[西班牙]军队的决定”。这可能是事实。

另外，据其传记作者描述，一九三二年那场叛乱未遂的领导人圣胡尔霍将军一直极力主张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大选之前发动一场政变。这个阴谋没有结果，但是，左派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加强了右派领导人将其计划变成行动的决心。

实际上，正当第一轮投票的结果仍在陆续公布时——与其一起发表的还有关于试图越狱、游行示威、焚烧教堂以及革命者其他欢庆活动的报道，西班牙复兴运动的喉舌《阿贝赛报》就在二月十八日断言，一九三一年开始的革命将会继续走它的暴力路线，直到遭遇有力的反抗为止，反抗将“排除妥协通融的惯例以彻底解决的方式”进行。

二月十七日凌晨四点，第一轮选举刚一结束，希尔·罗夫莱斯叫醒了临时政府总理、新近形成的中间派领导人曼努埃尔·波特拉·巴利亚达雷斯。“我用寥寥数语向他描述了形势：无政府状态已在一些省份蔓延；地方行政官员纷纷挂冠而去；闹事的暴徒正在抢掠官方文件。如果不以铁腕采取紧急措施的话，西班牙的未来就有陷入悲惨

境地的巨大危险。……我指出，‘必须给地方官员下达最为严厉的命令，在那些不得不进行新的选举和决胜选举的选区全力以赴采取行动’。”接着，波特拉给阿尔卡拉—萨莫拉打了电话。“我注意到，虽然总统批准在几小时之内宣布实行警备状态，但他当场拒绝了波特拉先生提出的立即宣布戒严令的建议。害怕发生军事政变？我不知道。事实是，没有采取任何可能制止诸多恶性事件发生的措施。……[我]悲哀地确信，最高层的权力人士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勇气制止威胁西班牙国家中心的危险发生。”

时任军队总参谋长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对左派接管政权的后果忧心忡忡，当天晚些时候，他极力劝说波特拉宣布戒严令而不要把权力交给人民阵线。“‘我老了，我老了，’”据半官方的民族主义内战史描述，总理是这样回答的。“‘你提出的任务超出了我的能力。……它需要一个能力更强的人。……军队为什么不干呢？’‘军队目前缺乏执行这一任务所必需的道义上的一致性，’佛朗哥回答道。‘之所以需要你的干预，那是因为你拥有高于波萨斯[国民卫队 监察长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的权力，而且你仍然可以动用大量国家资源，加上你所管辖的警察部门，此外还有我的合作，我保证，你不会失去我的合作。’波特拉显得焦虑不安。……‘暂时不要让我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他最后说。”

当时，君主主义者的领导人何塞·卡尔沃·索特洛强烈要求波特拉邀请佛朗哥将军“拯救西班牙”，但是没有效果。由于担心如果不把权力毫不拖延地交给人民阵线，左派的焦躁情绪可能失控，为了进一步逃避责任而且不愿陷入某种道德困境，波特拉于二月十九日辞职。以不想“刺激革命者”为由不敢宣布戒严令的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立即任命自由共和派的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为政府总理。阿萨尼亚仓促组成了一个由自由共和派与温和共和派人士参加的内阁，代表人民阵线管理这个国家。

这一刻并非突如其来。据共产党领导人何塞·迪亚斯说，人民阵线的地方组织已经推翻了许多城市的市政当局，“不是通过法律手段，而是通过革命手段，将其置于共产党、社会党和左翼共和派的控制之下”。

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右派的攻击，阿萨尼亚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控制关键的军队职位。佛朗哥将军被降职为偏僻的加那利群岛的驻军司令，他将在七月十七日成为摩洛哥叛乱的首领，后来又成为整个反叛运动的领导人；掌管至关重要的非洲军团的埃米利奥·莫拉将军被派到纳瓦拉省潘普洛纳的边远要塞，当地是卡洛斯派或王室正统派君主主义者及其狂热的民兵武装志愿军的活动中心，在那里，他被认为与世隔绝，但是实际上他可以从那里不受妨碍地指挥策划内地的叛乱行动，而且还能与对政府不满的纳瓦拉人合谋；同时，国防部监察长曼努埃尔·戈代德将军被调到巴利阿里群岛担任并不重要的要塞司令一职。

“在二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八日的大规模变动中，所有高级职务都给了或多或少被认为支持自由派共和政府的那些将军，” 斯坦利·G. 佩恩在他那部研究西班牙军队的鸿篇巨制中写道，“一九三六年春天，因为《[西班牙军事]年鉴》中列为将军的四百二十五名军人大部分处于不同阶段的退役状态，所以，在西班牙军队的现役军人花名册上，只剩下八十四位将军。在拥有指挥权的这八十四个人当中，大多数持有温和的政治观点，而且经过最近几年一遍又一遍的筛选，基本上已经没有君主主义者或极端保守的将军了。当年三月，国防部几乎所有重要地区的指挥权和职位不是掌握在众所周知的亲共和派将军手中，就是掌握在对宪法具有责任感的将军手中。”

右翼历史学家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写道，阿萨尼亚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深谋远虑，以致在西班牙按地理自然划分的八个大区中，只有一个大区的地方长官支持叛乱。此外，三位军队的监察长没有一位参与叛乱，非洲军团的高级职位也都由绝对可以

信赖的人担任。“现役中拥有指挥权的两位最危险的高级将领佛朗哥和戈代德受海岛职守所限，实际上失去了活动能力。”与佛朗哥和戈代德一样在军队中具有支配地位的华金·范胡尔将军、何塞·恩里克·巴雷拉将军和路易斯·奥尔加斯将军被剥夺了指挥权，后面两位还被监禁起来。这样就保证了对军队高级职位的控制，帕拉西奥·阿塔德继续写道，政府想当然地认为，它“通过最有效的方法从上层控制了军队，这种方法以武装力量等级制度的效力为基础”。政府还采取了其他确保控制军队的措施。“虽然从三月到起义当天根据行政命令所进行的军事指挥权的变动都要受到审查，但是仍然出现过指挥权发生异常变动的迹象，其意义非常明显。当然，这些变动并未中断谋反活动的整个进程，只是引起了混乱并使那些深知自己重要性的人感到不安。”

三月中旬，指挥权的变动在军界引起严重的混乱，以致阿萨尼亚的国防部长卡洛斯·马斯克莱特将军为了安抚左派舆论而发表了下面这份新闻公报：“据国防部了解，一些有关在职以及未被任命的军官的精神状态的谣言正在不断流传。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谣言虚假无据，毫无疑问，它们容易造成公众的不安，激起对军队的敌意，如果不予消除的话，还将破坏作为军队根基的纪律。本国防部长荣幸地宣布，所有在职以及未被任命的军官，从最高级别到最低的职位，保证遵守最严格的纪律，随时准备认真履行他们的义务并且——毋需赘言——服从合法政府的命令。”

但是，这份新闻公报并没有减轻左派的忧虑。社会党执委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声称，它的情报部门已经向它提供了“令人担忧的消息”，因此，轻视在营房、街头和政治中心散发的传单上的那些“带有威胁性的不祥内容”将是危险的。

尽管谋反者对政府采取的措施有所顾虑，但是，他们实施计划的劲头却丝毫未减。考虑到普遍流行的恐惧担忧，而且由于右派和中间党派至少得到了半数选票，似乎

可以相信，他们最终有望得到大部分民众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

土地拥有者担心中一右政府为停止共和国前两年进行的土地改革而使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以后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将被废除。实际上，人民阵线已经在其竞选纲领的第三部分承诺废除其中的两项，即，规定向卷入一九三二年八月圣胡尔霍叛乱的地主退还地产的法律和土地租赁法，后者导致八万名佃农在最初两个月被驱逐。

城镇和农村地区大大小小的雇工者担心，将会再次恢复那些确立劳动仲裁制度、确定工资制度和工作条件的法律，这些法律不是已经遭到废除和破坏，就是已被批准停止实施。实际上，人民阵线竞选纲领的第七部分宣称，将“在最纯粹的原则意义上”恢复劳动立法。

教会担心，宪法中被人漠视的反教权主义条款将会重新受到重视，因为人民阵线竞选纲领的第八部分宣称，“共和国必须将教育制度视为国家不可偏废的职能”。关于中一右势力获得一九三三年大选胜利之后的形势，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写道：“耶稣会教士继续执教：阿萨尼亚打算在新的学校用世俗教育取代宗教教育的计划被搁置，而且通过一项法律，作为共和国的一桩善举，同意拨款支付神职人员一九三四年三分之二的薪金，这在政治上也许是明智的，但是却有违反宪法之嫌。”由于四月二十八日只有社会党和共产党议员投票支持一项停止支付神职人员薪金的提案而使提案遭到否决，人民阵线赢得大选之后组成的阿萨尼亚政府最初在这个问题上小心行事。但是，五月十九日组成的由左翼共和派人士弗朗西斯科·J·巴尔内斯担任公共教育部长的新政府揭开了旧的伤疤。“阿萨尼亚政府曾于二月二十八日指示检查人员巡察宗教团体管理的学校。”理查德·鲁宾逊写道，“据说，这些检查人员经常自作主张关闭学校。然而，随着巴尔内斯的上任，关闭宗教团体管理的学校以及非法将私立学校收归国有实际上似乎成为官方的政策。西班牙争取自治



权利联盟成员组织[Cedista]的代言人要求，除非公立学校有地方安置宗教学校的学生，否则不要关闭它们。公共教育部长回答说，天主教徒现在必须为一九三三年以来他们没有大力发展公共教育体系的失职罪过受到惩罚。六月四日，由于公共教育部长的侮辱性言论像他的政策一样‘令人无法容忍地冒犯了这个国家天主教徒的良知’，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决定暂时退出议会。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成员组织继续抗议宗教迫害，政府则继续推行其世俗化政策。”

此外，因人民阵线获胜以后公众对军队表现出的敌意而焦虑不安的右翼甚至温和派军官担心，他们对共和国军事改革的不满如今又没有人正视了。共和国政府前两年[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的总理兼国防部长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开始实行军事改革，后来被中—右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所纠正。

最后，所有中—右势力都担心，即使阿萨尼亚组成的自由派政府想在人民阵线竞选纲领——他保证履行这个纲领，“连一个逗号、句号都不会改”——的框架范围之内行事，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也一心想要突破它，他们受到大选胜利的鼓舞，而且似乎忘记了失败者的可怕力量；中—右势力还担心，根据已经控制了这个国家的革命者的热情判断，事态的发展只能用武力来扭转，或者像一本赞成军事叛乱的历史书籍所说的那样，只能通过“一次外科手术”来扭转。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总理很快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对缓和左派的革命狂潮无能为力。的确，他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出任政府首脑时曾宣称，他希望“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治理国家“而且不搞危险的试验”；四月三日他还在议会谴责了正在使其政府感到难堪的暴力行为和掠夺财产的行为。但是，如同《太阳报》在三月二十八日所指出的那样，他的政府每天都承受着来自极左派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极左派不仅要求履行人民阵线竞选纲领的基本内容——他们达到了这一目的——而且经常催促

采取一些迟迟没有采取的措施。“这不符合总理谨慎克制的策略。”《太阳报》评论说，“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是，现在他能做什么呢？”

从阿萨尼亚在内战爆发三个月之前的四月十五日向议会发表的演说来看，显然，他已经觉察到将要发生大屠杀：“我非常清楚，暴力，由于它在西班牙人的性格中根深蒂固，所以不可能因为法律而绝迹，不过，我最深切地期待的是，可以宣告西班牙人愿意停止互相残杀的那一刻。大家不要把这些话当做无能的表示，或者认为这是一个被危险——危险包围着委托他去捍卫的那个政权——吓得畏缩不前的懦夫的胡言乱语。不！我们不是来这里指挥一场内战的，相反，我们是来避免内战。”

尽管显示出这样的信心，阿萨尼亚实际上已经精疲力尽，而且已经灰心丧气。“聪明老练的阿萨尼亚应该精明地治理一个国家而不是饱受政治动荡的折磨，他失去了经受磨难的力量。”著名的知识分子、阿萨尼亚的党内同志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说，“我曾看见他颓然倒在扶手椅里，精疲力尽，一动不动。‘阿尔沃诺斯，我再也受不了了！这是个什么国家呀！这是种什么局面啊！’”

事实证明阿萨尼亚应付不了这种局面，斯坦利·G·佩恩写道：“也许因为无法确定军队是否可以成为一种可靠的镇压手段，总理失去了遏制极端分子的决心。阿萨尼亚不愿或者不能利用秩序的力量维持秩序在军队和国民卫队、甚至在突击卫队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军官团中年轻的活跃分子更愿意支持少数不满的高级将领而不是与那些打算对礼坏乐崩的混乱局面一笑置之的资深共和派将领为伍。”

好斗的何塞·卡尔沃·索特洛是西班牙复兴运动和同时代表阿方索和卡洛斯两派君主主义者的民族阵线（Bloque Nacional）的议会领袖，在他的带领下，君主主义者尽其所能利用了正在到处蔓延的骚乱。“如果一个国家不知道如何保证秩序、安定和所有公民的权力的话，”卡尔沃·索特洛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在议会宣称，“那

么，这个国家的代表应当辞职。”他在随后的演说中发出警告：“我们看一看俄罗斯和匈牙利，我们阅读回顾一下它们最近的历史，我们因此而知道，那是一场悲剧，对于匈牙利，悲剧是短暂的，对于俄罗斯，悲剧仍在继续，我们希望西班牙不要发生那样的悲剧。于是我们对政府说，这个任务交给它了，我们还对政府说，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它肯定不会失去在座这些人的选票或支持。啊！但是，如果政府表现得软弱，如果它犹豫不决……我们必须站起来在这里大声说，我们准备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反抗，我们要说的是，资产阶级和各种各样的保守派人士此前在俄国遭受的那种被人灭绝的命运、那种毁灭性的悲剧决不会在西班牙重演。”

理查德·鲁宾逊在他那部关于这一时期的内容详实的历史著作中写道，右派开始相信，持续的混乱和普遍的罢工是某个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个计划打算造成作为革命先决条件的经济崩溃。“六月十一日，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卡拉斯卡尔断言，内政部长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各省]省长正在独立于内阁行事，市长独立于省长行事，民众则在为所欲为。政府第二天发表的一份[公开呼吁省长和市长制止武装起来的派别夺取行政权力的]声明表明，卡拉斯卡尔所说基本属实。”

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领导人希尔·罗夫莱斯有担心忧虑的特殊理由，因为他的大批对大选结果及其非暴力主张感到失望的追随者不是公然背弃了他，就是如他本人所证实的那样，“开始帮助主张武力解决问题的其他[右翼]政党，尤其是西班牙长枪党”。的确，他曾经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大选之前的竞选活动中威胁说，如果不能通过民主方式征服这个国家，他就要废除议会制，但是，在中—右党派赢得大选之后，为了实现他的天主教社团国家的理想，不顾君主主义者的指责及其名为青年人民行动（JAP）的青年运动要求采取暴力行动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为进化论而不是独裁手段进行辩护。军事叛乱的支持者里卡多·德拉·谢尔瓦明确地说：“当希尔·罗夫莱斯[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的《终极日报》上]用下面

这一段话描述[阿方索派君主主义报纸《阿贝赛报》的老板]卢卡·德·特纳的立场时，他完全是正确的：‘他不相信法律手段；他把我在共和政体之下为争取生存和治理的权利所作的努力视为对君主政体的破坏，而且他还笃信，诉诸武力将更有效地帮助实现他的理想。……由于这个原因，他总是鼓吹暴动，尽其所能配合暴动的准备工作，在他的报纸上给[反叛]运动以最大的支持。’这一段话同样普遍适用于君主主义者当中的激进分子。”

即使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担任国防部长之后，希尔·罗夫莱斯仍然拒绝借助军队和君主主义者的力量夺取权力，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不会原谅他的拒绝。一九三六年，面对越来越多追随者的背弃，尤其是青年运动追随者的背弃——据长枪党的一位领导人说，当年一月至七月，这些年轻人“几乎全部”加入了长枪党；面对巴伦西亚右翼运动——这是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准备采取暴力行动的决定，四月十五日，希尔·罗夫莱斯带着不祥的预感在议会发表演说：“不要欺骗自己，议员先生们！我向你们保证，代表了至少一半国民的公众舆论的主流不会听任死亡不可避免地降临。即使不能通过某一种方法保护自己，他们也会通过另一种方法保护自己。面对一方采取的暴力，另一方有权采取暴力，于是，政府将在一场内乱中扮演可怜的旁观者，这场内乱将从精神和物质上毁掉这个国家。一方面，那些想要继续通过革命方式夺取政权的人的暴力行为正在挑起内战，另一方面，一个不敢对其支持者表示不满的政府的冷漠正在培育、支持、怂恿内战，它的支持者正在迫使它为他们所提供的帮助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

据希尔·罗夫莱斯本人承认，尽管意识到“法西斯主义正在严重损害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情况下迅速蔓延”，他仍然坚持非暴力立场并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九日在议会宣称：“组成我们这个党派的那些人——我以他们的名义发言——既不可能对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兴趣，也不可能与之发生任何关系。你们必须明白，我

说这些不是为了博得你们的好感——我知道你们决不会对我有好感；我说这些是因为这符合我本人和我们党的某种深刻的信念。纯粹从国家的角度看，一个贴着外国标签而且与西班牙人民的性格和传统不协调的政治运动几乎不可能对我们具有吸引力；只要思考一下某些关于国家的极权主义学说的哲学含义，我们就不可能不注意到，它们充满了与我们的教义信念深刻对立的哲学和政治的泛神论……；只要我们考虑策略问题，作为信徒，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接受其唯一目的就是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那些手段。”

作为对希尔·罗夫莱斯非暴力立场的回应，长枪党的地下报纸《无所谓》六月六日写道，这是“卑鄙地企图以和平解决的诱惑麻痹人民。任何和平解决的办法已不复存在”。毫无疑问，长枪党的过分自信不仅归因于它对普通百姓不断增强的影响力，而且归因于里卡多·德拉·谢尔瓦所说的那种情况，“由于[长枪党]党员或支持者的数量在年轻指挥官和低级军官中日益增多”，长枪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谢尔瓦指出，这是“暴动的年轻化特征”的又一个证明。“最重要的是认识到，”里卡多还写道，“军队中暴动支持者的平均年龄远远低于效忠政府的人的年龄。”

“整个形势令人担忧，”希尔·罗夫莱斯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确信，必须竭尽全力避免右派走上暴力之路……，然而现实却是，为了遏制正在使我们流血的无政府状态除了独裁别无他途，这种信念逐渐在所有人心中扎下根来。再没有人真心相信还可能恢复正常的民主状态。”于是，在君主主义者领导人卡尔沃·索特洛被杀害后的七月十五日，希尔·罗夫莱斯对议会常务委员会说：“当我国公民的生命任凭一流的枪手摆布时，当政府无力制止这种事态时，不要幻想人民会相信法律或民主。放心吧，他们将会沿着暴力之路一步一步走下去，我们当中那些不会鼓吹或者利用暴力的人慢慢将被另外一些更加大胆、更为狂热的人所取代，他们将会利用这种强烈的

国民情绪。”结果，这是他在西班牙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说。

尽管希尔·罗夫莱斯在回忆录中坚称，他希望继续在法律体系的约束下行事；他从来不是军事政变的支持者；由于他反对暴力，暴动组织者并没有将他们的准备情况随时通知他；他为了避免内战竭尽了全力；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和他本人均没有“具体参与叛乱的准备，即使某些成员最初曾经予以配合”；负责半岛叛乱计划的莫拉将军提出建议，要求全体右派议员七月十七日齐聚布尔戈斯宣布政府和议会非法，他拒绝了莫拉的建议；而且，他的大部分追随者只是在暴动发生以后才支持暴动的，但是，他本人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他不仅仅是袖手旁观，而是间或积极参与了军事叛乱的阴谋，即使不是满怀热情。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几乎每天都有同志或者地方上的党代表前来向他讨教。“我给他们同样的建议：在不涉及党的情况下凭良心自主行事；与军队建立直接的联系；不要组建自己的民兵组织，但在叛乱发生时，必须等待具体的指示。”他还承认，一九三六年七月初，一些党员请求他把剩余的部分党的竞选资金交给莫拉将军，结果，他批准转给将军五十万比塞塔。“我面临严重的道德危机，”他承认，“因为当时斗争被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所以党收到的捐款只能用于选举的目的。我绝对相信，在新形势下，如果就捐款的用途与捐赠人进行协商的话，他们几乎都会要求，捐款现在只能遗憾地用于防止出现无政府状态。”

此外，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流亡于葡萄牙时所签署、多年之后才披露的一份文件中，希尔·罗夫莱斯声明，一九三六年大选以后使用武力恢复公共秩序是合法的。“无法想象除了军事手段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因此，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准备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我通过提出建议、通过道义支持、通过秘密指示予以配合、而且通过从党的竞选资金中拿出不菲的数额作为经济资助等一系列方式提供了

合作。”

不过，由于知道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正在分裂，他在给予这些支持时似乎显得三心二意；另外，如同一位支持叛乱的重要历史学家所说，他拒绝接受莫拉将军要求全体右派议员七月十七日齐聚布尔戈斯宣布政府和议会非法的建议也使他受到谋反者的“蔑视”。“我的拒绝显然使我在与叛军打交道时处境艰难。”希尔·罗夫莱斯证实，“直到最后一刻我仍然谨慎地尽量远离一切具有煽动暴力之嫌的事情。考虑到五年来我一直提倡以合法行动作为公共行为的唯一方式这一客观事实，企图通过任何与我轮廓清晰的人生轨迹相悖的行为保护我的政治生命并不合适。”

一九三六年二月，希尔·罗夫莱斯的政党在议会占有的席位比其他任何党派都要多，但是，由于他的暧昧立场，同时由于内战爆发以后军方更希望与“老政客”的政策断绝关系，仅仅过了五个月，他便逐渐被人遗忘。当然，从他的非暴力政策导致大批追随者转投长枪党并且导致中产阶级对暴力和法西斯主义解决方案更感兴趣那时起，他在政坛的失势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六月十二日，笔名“加谢尔”的《先驱报》社长阿古斯丁·卡尔韦特——他被认为是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政治上的同情者——指出了对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日益增长的支持以及二月大选以后整个政治形势所发生的惊人变化。他指责人民阵线自己造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他问道：

在最近的大选中有多少选票投给了法西斯分子？数字可笑得不值一提。人民阵线获胜之后，如果我们在西班牙拥有一个关心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并且能让大家——从它自己的支持者开始——服从其意志的有效政府的话，一小撮法西斯分子将不复存在，他们将被现实的力量化为齑粉。如今，恰恰相反，从西班牙归来的旅游者说：“那里的人个个都在变成法西斯分子。”什么东西改变了？什么事情发生了？难道是人们突然进行了深奥的政治学研究并在广泛阅读和大量对比之后得出了“法

西斯政权是所有政权中最好的政权”的结论，这可能吗？不，朋友，不是这样！……正在发生的只不过是，人们无法在那里生活，那里没有政府的管理。由于罢工和冲突，由于局势不稳和破坏，由于数不清的日常烦恼——更不用说犯罪和暗杀的企图——许多公民感到厌倦和愤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出于本能寻找某种救助和出路，接着，由于他们找不到，他们逐渐开始渴望出现一个在其统治之下至少可能找到救助和出路的政权。以极端方式镇压那些令人无法容忍的过火行为的会是哪一类政权呢？独裁政权，法西斯政权。因此，无意中，几乎没有意识到，人们“觉得”自己成了法西斯分子。他们不把独裁政权的弊害当回事，认为那是正常的。以后，当不得不忍受独裁政权的弊害时，他们将会认清它们，接着还将为它们而烦恼。但是在当下，对于这一类强势政府，除了那些用来摆脱眼前令人烦恼的、无法忍受的不法状态的绝对有效的手段之外，他们什么也看不见。

## 第二章 左派的分裂与僵持

如果从内战之前肆虐着这个国家的社会及政治对立的角度来看，这场冲突完全缘起于西班牙自身。外国干涉并非点燃内战火种必不可少的因素，尽管外国势力为了各自的目的利用了这场战争。在军事叛乱爆发之前的几个星期，在外国飞机或坦克第一次出现于西班牙之前的几个星期，对于即将在这个国家燃起的熊熊烈火来说，已经万事俱备了。马德里、巴塞罗那、巴伦西亚、马拉加和毕尔巴鄂等几个主要城市的暴动失败，使叛乱者打算一动手就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彻底落空。正是这些暴动的失败不可避免地促成了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在某些方面比早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更深刻。军事叛乱没能保护有产阶级不受左派的侵犯，反而“加速了我们大家所希望的革命的爆发，谁也没有料到会这么快”——令人生畏的旨在建立无政府主义或自由共产主义社会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FAI）的著名成员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如是说。



当然，她是在向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导向的强大的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合会发表讲话。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力图对全国劳工联合会施加具有指导意义的影响，结果，全国劳工联合会谴责人民阵线的竞选纲领是与“正在从西班牙的每一个毛孔散发出来的革命热情”格格不入的“极端保守的文件”。

但是，蒙特塞尼表达的绝不是人民阵线阵营中具有代表性的温和派观点的主流意见。一场革命肯定不是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总理——他在五月十日成为共和国总统——所希望的，也不是他的党内同志和私人朋友圣地亚哥·卡萨雷斯·基罗加所希望的。五月十三日，卡萨雷斯·基罗加接任阿萨尼亚的总理职务，同时执掌国防部。

一场革命同样不是领导着这个政治派别——它主要从文职人员、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和佃农以及小商人和小工厂主中吸收成员——的另外一些政治家所希望的；也不是共和国副总统兼议会议长、西班牙大东方 的大首领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所希望的，他的政党是从亚历杭德罗·勒鲁的激进党中分裂出来的共和联盟，形成了人民阵线阵营中最温和的派别，而且还与阿萨尼亚的党派共同声明反对人民阵线竞选纲领中有关工人阶级管控生产以及国有化和将土地无偿分给农民的内容。

一场革命当然也不是弱小的社会党右派领导人胡利安·贝斯泰罗或温和的中间派领导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所希望的。普列托控制着社会党执委会，与强大的工会组织劳动者总工会书记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所领导的人多势众的社会党左派不同，他在叛乱前的几个月奉行一种克制的政策并且谴责祸国殃民的罢工和骚乱。

“同样无私而可敬的两种观点在社会党内针锋相对，”内战之前主管《社会主义者》的温和派社会党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拉尔戈·卡瓦列罗领导的多数派认为与共和派的结盟已成往事，他们主张为了全面行使权力组成一个工人阶级联

合阵线.....；普列托代表的少数派考虑西班牙的现实情况，他们认为，由于保守派正在进行坚决的抵抗，任何与共和国及共和派的分裂都是非常危险的。.....拉尔戈·卡瓦列罗及其主要合作者[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和[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相信，一场军事政变必将被政府的反击和工人举行的总罢工所挫败。.....因为罢工、争吵和流血冲突意味着共和国政府的失败，所以，[当时的]社会状况丝毫没有引起他们的担忧，反而让他们暗中窃喜。”

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签署了人民阵线竞选纲领，但他认为，与自由共和派结盟只不过是赢得大选的权宜之计。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人民阵线竞选纲领发表的前几天，他十分明确地表明了自己未来的观点：

[我们的]责任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当我说到社会主义时.....我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是夺取政权。通过什么手段呢？通过我们可以利用的那些手段！.....[要让]人们充分了解，与左翼共和派合作，我们绝对没有把思想和行动上的任何东西抵押进去。我也不认为他们要求我们这样做，因为要求我们这样做就像要求我们背叛自己的理想一样。这是一次结盟，一次随机的合作，为此正在准备一份竞选纲领，它肯定不会与我们的愿望相符合，但是，此时此地我要对在场的各位以及所有能够听到看到的人们说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个联合起来的人，必须为捍卫竞选纲领而战。.....当你在这份竞选纲领中看不到纯粹基于我们的思想的内容时，不要失望，不要沮丧。不！这绝不是不再以坚定的信念和满腔热情为胜利奋斗的理由。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这样做。同志们，这样的话，在胜利以后，在摆脱了各种义务以后，我们可以对每一个人说，绝对是每一个人，我们将不受干扰地继续走我们自己的路，如果可能，直到实现我们的理想。

卡瓦列罗从前是个泥瓦匠，四十多年来他只是一位偶尔迸发革命积极性的改良主义

者，独裁政府时期他是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 国务委员会中的一名工人代表。作为共和派—社会党联合政府的劳工部长经历了幻想破灭的两年之后，一九三三年，被革命思想所激励的卡瓦列罗在六十四岁时摇身一变成为鼓吹社会主义的西班牙左派。

这一根本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所领导的自由共和派对实施一九三二年九月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的漠不关心造成的。的确，与实施一系列土地改革方案相比，自由共和派更关心他们的反教权主义。马莱法基斯写道，共和派长期受到反教权主义、反军国主义和反君主制度观点的熏陶。“让这些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感到非常振奋的是土地改革的反贵族意义而不是改革本身。阿萨尼亚完美地体现了这种态度。……共和国初期激情澎湃的那几个月，他在一些演说中富有说服力地呼吁进行土地改革，但是随后便陷入沉默。在他的三卷本演说集中，对于这个毕竟有可能是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除了两处例外，人们要想找到比一带而过更多的内容，那只能是劳而无功。”在后来通过改革法案的过程中，马莱法基斯断言：“左翼共和派之所以支持土地改革，部分是为了得到社会党人对他们主张进行的政治文化改革的支持，部分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必要措施，部分是出于他们所奉行的要求解放农民的自由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本能。这些原因没有一条足以使他们对土地改革付出巨大的代价，此外，土地改革显然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对财产权和个人经济机遇的尊重，这种尊重一直是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因此，土地改革法刚一通过，他们几乎立即开始在履行承诺方面推三阻四。”

杰拉尔德·布雷南在其经典著作《西班牙迷宫》中写道，共和派不愿认真对待土地改革使社会党人对共和国的幻想彻底破灭。“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感觉，对年轻人比对年长的人影响更大，对新入党的党员比对资深党员影响更大。……这种感觉在拉尔戈·卡瓦列罗身上找到了领袖。作为劳动者总工会的[书记]，他对在无政府工团主义

者面前节节败退的危险尤其敏感。而且他还有个人的不满。首先，他与阿萨尼亚不和。由于这个原因，在他担任劳工部长期间，他所拟订的许多法案受到阻挠，这让他感到特别愤慨。……因此，早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他就说，‘民众现在唯一的希望是立即发动社会革命。只有这样才能使西班牙免遭法西斯主义的统治’。”

在他周围聚集了大批社会党的工人党员以及社会党青年运动全国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大多数成员，这些人对与自由共和派合作的结果不满，同时对社会党——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PSOE）——内部的“改良主义”倾向不满，他们希望社会党发生激进或者“布尔什维克化”的转变并将所有改良分子或温和派开除出党。这些目标在秘密散发但是被人广泛阅读的小册子《十月，第二阶段》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这本小册子是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一九三五年起草的，当时他们正因参加一九三四年的暴动而坐牢。小册子宣称，拉尔戈·卡瓦列罗是“这场革命复兴的领袖和发起人”，因此，没过不久，他就被其追随者赞颂为“西班牙的列宁”。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因其纯朴、正直和廉洁受到党内外对手的尊敬，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被支持者的热情冲昏了头脑，并没有拒绝这个称号，只不过事态的发展不会承认他是“西班牙的列宁”。实际上，一九三四年的十月暴动失败后，一九三五年他在狱中接受采访时曾声称：“你在这个铁窗后面看见的是西班牙未来的主人！列宁断言西班牙将成为欧洲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列宁的预言将成为现实。我将是使它成为现实的第二个列宁。”

一九三六年三月，内战爆发四个月前，拉尔戈·卡瓦列罗掌控的有影响的马德里社会党人组织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为社会党制订了一份提交下届代表大会的新纲领，这份纲领宣称，它的“当务之急”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通过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作为工人阶级的民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消除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通过改造现有国家来完成的错误观念。”纲领的序言写

道，“除了从根本上把现有国家消灭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无产阶级专政或工人阶级的民主将被逐步转变成为一种超越阶级的绝对民主，强力压制型国家从此将会渐渐消失。社会党将会成为专政的工具，在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转变期间，当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使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国家必不可少时，它就要实行专政。”

显然，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在这份纲领中所使用的一些语言是从列宁和斯大林的权威著作中借来的，仅仅是在最近几年，逐渐衰老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才开始研究进而信奉他们的学说。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因革命信仰焕发了青春的卡瓦列罗到各省的省会巡回演讲，面对痴迷狂热的听众，他宣称，人民阵线的施政纲领不能解决西班牙的问题，因此，必须实行工人阶级专政。

卡瓦列罗的革命姿态加深了社会党内部已经无法弥合的裂痕。受人尊敬、语调柔和而且一度是位有影响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的胡利安·贝斯泰罗代表社会党的右派，他在一九三三年曾极力劝说他的社会党同志接受民主制度并警告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幻想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如今他已退居幕后。与此同时，主张革命的卡瓦列罗与主张演变的普列托为控制社会主义运动而进行的斗争也发展到了中期，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场个人之间的斗争。在普列托看来，卡瓦列罗不负责任：“他是一个总想显得聪明的傻瓜：他是一个呆板的官僚主义者，扮演一个走火入魔的狂热分子的角色。”普列托不认为社会党已经强大得足以进行一场成功的革命，所以应当继续巩固与共和派的联盟。普列托的改良主义让卡瓦列罗感到厌恶，他认为他这个对手更像一个“共和派”而不是一个社会党人。“在我看来，”卡瓦列罗在公开发表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写道，“无论在其思想上还是在其行动上……普列托根本不是一个社会党人。”“[他]忌妒，傲慢，目中无人；他认为他比别人都优越；他不能容忍任何稍微挡了他的道儿的人。”

虽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追随者在人数上远远超过普列托的追随者，但是，后者的力量来自他对社会党执委会及其机关报《社会主义者》的控制，除此之外，普列托的力量还来自他对党的某些地方组织的控制。另一方面，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力量来自劳动者总工会；来自社会党朝气蓬勃的青年运动；来自大多数党的地方组织，尤其是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而且来自他的舆论工具《光明报》。两派之间关于革命还是演变这个关键问题的争斗非常激烈，以致曾经有一次，当普列托与两位著名的阿斯图里亚斯矿工领袖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和贝拉米诺·托马斯被安排在埃西哈的一个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时，他们不得不在一阵枪林弹雨之下逃之夭夭。

这场暗斗使独立共和派人士兼历史学家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断言：“导致西班牙内战不可避免的是社会党的内战。……法西斯主义发展猖獗不足为奇。不要让人以为，是法西斯分子的暴力促使社会党人采取暴力……；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枪手开枪打的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他们的社会党同志。……这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人]公开宣称的，不仅如此，他宣布的政策是，要在西班牙迅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这样，他们把国家推上了通往暴力之路，这个一贯具有暴力倾向的国家变得比以往更加暴力。这正中法西斯分子的下怀，因为除了喜欢实施暴力并且精于此道之外，他们什么也不会。”

在内战爆发之前那几个月，拉尔戈·卡瓦列罗与西班牙共产党（PCE）——这是一股虽在成长但仍弱小的势力——的官方关系非常友好，以致这位社会党领导人不但鼓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合并，而且鼓动两党的工会联合会合并。此外，一九三六年三月，卡瓦列罗所控制的马德里的社会党组织决定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提议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共产党本身也积极主张这种合并。如同斯坦利·G·佩恩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党左派“关于加入共产国际并与共产党合作的想法非常天真而且不辨是非利弊，因此，当谈到与后者的合并时，他们以为这是共产党终于被社会党兼并

了”。

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一些公开场合亲自提出与共产党合并的建议，并且赞同共产党提出的以下建议：根据一项旨在“促进民主革命发展进而使其取得最后成果”的方案，组成一个代表两党的联络委员会。这种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极其敌视共产党人的立场截然相反的立场受到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的热情赞扬：“社会党的广大党员……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奉行的路线，这条路线几乎与革命路线完全一致，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完全一致。”

尽管共产党人与卡瓦列罗的官方关系发展顺利，但是，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为号召人们立即进行一场颠覆性的社会革命而进行的宣传鼓动仍然让他们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当时正在遵照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试图通过加强与自由共和派的联系进一步巩固人民阵线。实际上，在公开主张建立“作为未来权力机构”的工农联盟并且毫不讳言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党的最终目标的同时，何塞·迪亚斯曾经就拉尔戈·卡瓦列罗过激的革命姿态间接表示：“我们必须反对任何过于急躁的行为以及一切提前解散人民阵线的企图。人民阵线必须继续存在。我们与左翼共和派还要长期携手共进。”私下里，共产党人使用“左派幼稚病”和“左派衰老症”之类的言辞形容卡瓦列罗的倾向。但是，如果坚持与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不同的立场，他们无力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因为他的声望已经达到巅峰，而且他们认为他还具有把共产党人与追随他的民众联系起来的实用价值。另外，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概念已经控制了他的想象力，这有可能像曾经促进两党各自的工会组织和青年运动合二为一一样，促进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与西班牙共产党的合并。“对于统一革命运动和全面推动西班牙革命来说，”何塞·迪亚斯声称，“重要的问题是，拉尔戈·卡瓦列罗代表的路线应当在社会党内赢得胜利。”一九三六年四月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与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合并成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简称JSU）之后不久，该组织领导人

圣地亚哥·卡里略撰文提到他和两个青年组织的其他代表此前在莫斯科参与的几次谈话：“如同老布尔什维克马努伊尔斯基告诉我们的那样……，对于联合起来的组织和西班牙革命的整个进程来说，重要的事情是，拉尔戈·卡瓦列罗代表的倾向应当在社会党内取得胜利。如果不取得这一胜利，革命组织的联合甚至还有革命的未来——我继续引用马努伊尔斯基的话——都将受到损害。”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所领导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中间派以不加掩饰的敌意将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视为越来越大的威胁。它指责他们为两党合并进行的宣传是“联手欺骗”，并且认为两党青年运动的合并是“共产党对社会党青年组织的兼并”。实际上，由于完全不信任共产党人并且非常厌恶他们，社会党中间派甚至拒绝回应共产党所提出的在两党之间设立一个联络或协调委员会的建议。“共产党向社会党建议，根据一项旨在促进民主革命发展进而使其取得最后成果的方案组成一个联络委员会。”何塞·迪亚斯写道，“这个建议没有得到现在的改良主义中间派领导人的答复。另一方面，它受到社会党左派的欢迎。社会党的广大党员拒绝承认现在这个改良主义的执委会，他们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奉行的路线，这条路线几乎与革命路线完全一致，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完全一致。”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是中间派的头面人物和支配力量，他感到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的合作极其危险。普列托出身卑微，性格专横，一九三一年在第一届共和国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而且是北方工业区有影响的毕尔巴鄂《自由报》——他曾先后作为广告文字撰稿员和编辑在这家报社工作过——的所有者，他在自由共和派甚至保守共和派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他们比与社会党左派具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实际上，一九三六年春天，两派的分歧非常明显，以致他断言，这些分歧将会导致社会党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议会议员，作为一位雄辩但是时而走火入魔的演说家，他总是那么用力地捶打胸膛，以致一位议员说，“人



们不知道更应当钦佩哪一点：是他拳头的力量还是他胸部的抗击打能力”。 “他猛烈地捶打自己的胸膛，” 另一位目击者写道， “用尽全力大声呼喊，结果经常弄伤自己，鲜血直流。” 在官场及其党内擅长谋略的普列托经常作为共和派政权中最精明的政治家被人提起。他的谋略不仅帮助在五月十日把阿尔卡拉—萨莫拉赶下共和国总统的宝座并将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推上这个最高的职位，而且成功地把卡瓦列罗赶出了社会党执委会。他的能力既得到朋友的肯定，也得到对手的承认。

与卡瓦列罗截然不同，内战爆发之前普列托竭尽全力施加影响要求人们保持克制。他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演说中大声疾呼：“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容忍造成持续流血却没有明确革命目标的公共骚乱；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容忍以接连制造不安、恐慌和骚乱的方式滥用公共权力，消耗人力财力。一些天真的家伙也许会争辩说，这种不安、这种恐慌和这种骚乱只会危害统治阶级。这是错误的。……由于其对我国经济造成了破坏并且可能使之崩溃，工人阶级自己过不了多久也将身受其害。……我们应当做的是，理智地继续消灭特权，捣毁这些特权赖以存在的基础；然而，这不是通过孤立、分散的过激行为来完成，在采取了这些过激行为之后，作为人民行动的标志，留下了烧焦的塑像、着火的祭坛，或是被烟雾熏黑的教堂大门。我告诉你们，这不是革命……[如果]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理智的革命组织——不去约束这种滥用的力量，如果不去控制它，不去引导它进入有效的航道，那么，接着请听我宣布：这是在与法西斯主义沆瀣一气。” 在这种环境下，法西斯主义将会盛行，因为，他继续说道，胆战心惊的中产阶级在视野之内看不到拯救他们的办法，于是，他们将向法西斯主义求助。 “[请]不要说只有在民主政府执政时才有可能出现无谓的骚乱——这使民主制度受到怀疑——因为现实紧接着就会大声说，只有民主制度允许骚乱，只有独裁者的鞭子可以制止它们。……难道施暴和骚乱[应当]成为一种固定的方式，那不会是实现社会主义或者巩固民主共和国的手段吧，我相信这才是我

们所关心的。……这条道路不是通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它通向的是一种甚至与自由主义思想都格格不入的毫无希望的无政府状态；它通向的是可能毁掉这个国家的经济混乱。”

五月四日，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光明报》发表了一通指责的言论：“工人阶级需要民主共和国……不是因为它的固有长处，不是因为把它当作一种理想的国家形式，而是因为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专制制度所镇压的阶级斗争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从而实现其直接和短期的目标。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工人阶级为什么需要共和国和民主制度？如果只是为使民主制度和共和国生存下去因而认为阶级斗争应当停止，那是不尊重这种改变历史的力量。那是本末倒置。”

在一九三六年春天使这个国家剧烈动荡的骚乱过程中，有人开始活动让普列托出任总理——普列托与此不无关系。“围绕着他个人，一种氛围正在形成，”一位右翼历史学家记述道，“一种支持任命普列托担任要职从而使其可以全力制止正在发生的骚乱的氛围。[一九三一年共和国的奠基人之一、温和的保守共和派领导人]米格尔·毛拉一直试图形成这种氛围并且使其扩散开来。普列托不仅是人民阵线温和派的希望……而且是许多右翼温和派人士的希望。”据毛拉说，与其他所有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政治家相比，普列托让他产生了“更大的尊重和更深的敬意”。

然而，当阿萨尼亚总统提出让普列托担任总理时，他没敢接受这个职位，不仅因为卡瓦列罗所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表示反对，而且因为成员多为左派的社会党议员骨干会议以压倒多数投票决定不与共和派共同执政。“当组建[政府]的任务交给我时，我拒绝了，”普列托在内战结束以后写道，“因为社会党议员骨干会议的大多数人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联合政府，特别是由我领导的联合政府。”这样一来，普列托失去了组建一个以其所在政党议员支持作为生存基础的政府的希

望。“如果不顾议员骨干会议的决定我接受了阿萨尼亚先生交给我的权力，”几年之后普列托谈到，“人们当时会怎么说我？在某种程度上有正当的理由认为，我似乎是唯一一个应当对社会党的毁灭负责的人。另外，如果我在议会得不到大多数社会党议员的支持，那么，为了取得对议会的控制，我就不得不向右派议员寻求支持，结果，我将因此而使自己蒙羞。……当时，我被打上了叛徒的烙印。错……不在我；错在那些阻挠这一解决方案的人。”

在西班牙历史学家桑托斯·胡利亚看来，当普列托以为肯定将会由他组建新的政府而导演“阿萨尼亚行动”时，他错了。“结果，在手里没有确保组成一个可靠的人民阵线政府所必需的全部王牌的情况下，他在社会政治局面非常严峻的时刻冒着巨大而又毫无意义的风险把阿萨尼亚推上了共和国总统的位置。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游戏，因此，没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就不能参与，而普列托参与了，结果他失败了。这也许由果溯因地证明，他并不像他和他的同志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不负责任地把这一行动的失败归咎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可能陷入相互指责的恶性循环，因为拉尔戈的政策恰恰是要阻挠这一行动。想让行动成功的不是他，而是普列托。拉尔戈的政治责任并不在于他干扰了普列托的政策，而在于他没有用它取代别的政策，这不是一回事。”

无论情况是否如此，人们务必不要忘记这个事实，由于社会党左派的反对，普列托赌输了。

根据卡瓦列罗最信任的助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的说法，在社会党左派反对组成一个以普列托为首政府以及几天前他们对阿萨尼亚总理当选总统所给予的支持背后，存在着某种险恶的用心。“我倾向于认为……[战后]在于巴黎去世之前不久，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向我作出的以下陈述相当重要。”阿萨尼亚文集的编者胡安·马里

查尔作证说，“据阿拉基斯塔因说，社会党——他是社会党内最‘深刻的’思想家——的极端分子想要剥夺阿萨尼亚的所有行政职务，同时阻止普列托出任总理。这将使政府完全无力约束群众或稳住右派，从而催生一个纯粹的革命政府。据阿拉基斯塔因说，这个策略非常简单：把阿萨尼亚推选为共和国总统，然后，如同可以预料的那样，当他想让普列托成为他的继任者时，将遭到社会党的彻底否决。‘就这样，我们使他们两人英雄无用武之地，’接着，这位前社会党领导人对我说，‘你不认为我们做得过分了吗？’”

马里查尔的记述得到曾在内战期间担任内阁部长的马里亚诺·安索的证实。尽管政治观点不同，安索与阿拉基斯塔因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安索声称，几年后在与这位社会党领导人进行的一次私下交谈中，后者提到了“由他设想”并由拉尔戈·卡瓦列罗派实施的“操纵大局的计谋”，安索没有遗漏其中最微小的细节。“我与马里查尔的看法相同，”安索明确表示，“在阿拉基斯塔因的陈述中，对其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深远的后果，他有一点恐惧甚至悔恨。”尽管身处这场政治危机的中心，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他发表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供与阿拉基斯塔因所说的政治阴谋有关的线索。其实，只要记得他在内战爆发之前的革命态度，人们就难以想象他会宣称自己认为把阿萨尼亚推上总统职位是个“政治错误”。因为，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由于阿萨尼亚是左翼共和派的领导人而且还是人民阵线联盟的首脑，所以，左翼共和派是唯一一个将在某种程度上保证竞选纲领得到履行的派别。“如果推举阿萨尼亚担任共和国总统，”他说当时他想过，“西班牙的共和派就会变成一群没有牧羊人的羊；个个都将自行其是；共和国将会缺少一个支撑其成长发展的基础器官。我们的这种担忧后来不幸得到证实。”考虑到内战之前他们同样的革命主张，这未必是拉尔戈·卡瓦列罗或者他的贴身顾问阿拉基斯塔因当时的想法。一九三六年三月初，阿拉基斯塔因曾经写道：

不可能与那些在二月十六日选举投票中被打败的阶级和解。……只要拥有土地的贵族和教会的财产还没有被没收；只要银行和资本家的舆论工具还没有被控制；只要大型企业还没有收归国有……就不会有安定，也不会有繁荣。

右派想对西班牙革命反攻倒算，想要保住他们所有特权，而且希望中间派的阿萨尼亚会对他们有所帮助。阿萨尼亚总是喜欢限制革命行动，使其遵守资本主义社会的条条框框，他还幻想右派和左派都会帮助他完成这一子虚乌有的民族和解使命。

安定与和谐是异想天开，同样异想天开的是和解的政策。……只有两种选择：革命或反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因此，幻想采取中间立场的他处于因两面受敌而毁灭的危险境地。

在战后发表的一份公开声明中，阿拉基斯塔因承认：“导致共和国垮台的另一个因素很可能是我们党内的自相残杀。我认为，责任在于我们所有人。对于党内的腐败状态，我们大家都起了作用，有人以这样的方式，有人以那样的方式。这种状态让敌人看到了我们的虚弱，看到了叛乱的时机已经到来。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是处在这种可悲状态的话……结果将会有所不同。”阿拉基斯塔因认为，如果是一位社会党人领导着政府，他也许可以使军事叛乱的阴谋半途而废。“有人会说这一切已经覆水难收。唉！但是，未来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因此，认识历史绝不是毫无意义的。”

由于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意见分歧排除了一个由普列托领导的政府存在的任何可能性，在内战爆发之前两个月的五月十三日，阿萨尼亚总统任命他的私人朋友和党内同志圣地亚哥·卡萨雷斯·基罗加为新政府的首脑。像其前任一样，本届内阁完全由自由共和派与温和共和派人士组成。尽管普列托在战后宣称，如果作为总理他不得不向右派议员寻求支持的话，那将使他自己蒙羞，但是，有证据表明，实际

上，这种态度可能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妨碍。希尔·罗夫莱斯叙述说，四月和五月，代表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自由派的曼努埃尔·希门尼斯·费尔南德斯与带着普列托和阿萨尼亚的意图的米格尔·毛拉和胡利安·贝斯泰罗举行会谈，讨论组成民族团结政府的想法，普列托是“这些方案的核心人物”。五月十五日卡萨雷斯·基罗加组成他的内阁之后，天主教出版社社长、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喉舌《论坛报》的出版商何塞·拉腊斯前去拜访希尔·罗夫莱斯。他告诉希尔·罗夫莱斯，前一天他拜访了普列托，他们谈到了“为反对社会党的某些人所提出的革命方案，在一个由普列托领导的政府中把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包括进去的潜在可能性”。希尔·罗夫莱斯回答说，由于卡萨雷斯·基罗加刚刚组成了新政府，他认为普列托成功的机会很值得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冒险让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参加一个我们的大多数议员不打算支持的想象中的政府呢？……这样做只会让我成功地毁掉西班牙右派唯一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接着他向拉腊斯表示，一个由社会党温和派、共和派和中间派人士组成并且得到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议员支持的联合政府应当“更加合乎情理”，但是，一个由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直接参与的政府不切实际。“除了使我们在我们的选民当中彻底丧失信誉之外，考虑到[一九三四年]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加入政府引起了……十月革命这一事实，认为人民阵线的民众将会赞同我们参加组阁似乎也显得不合逻辑。”

不仅因为社会党被内部争斗弄得四分五裂，而且因为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那些决心通过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的右翼党派的背弃已经使它元气大伤——面临解体的威胁，这些私下协商没有产生什么可以避免即将到来的浩劫的结果。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这使不幸的总理兼国防部长卡萨雷斯·基罗加眼看着西班牙迅速走向内战而无计可施。

五月十九日，卡萨雷斯·基罗加向议会介绍了他的新内阁。与阿萨尼亚的策略一样，

他努力在右派与左派之间保持平衡。为了安抚左派，他宣布，他将加快落实人民阵线竞选纲领的节奏，他将保卫共和国免遭敌人的攻击，因此不会再对共和国的敌人宽大为怀。“我告诉你们，无论敌人出现在哪里，无论他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我们都要消灭他。”另一方面，为了让右派放心，他说他不会为底层民众所胁迫，同时谴责非法的政治性罢工、没收财产和暴力行为。“在这种状况下，政府不可能有尊严地开展工作的。我呼吁你们大家以真诚热情的合作帮助我。”

但是，在其执政的短短几周时间里，他几乎没有使社会动荡得到丝毫平息，而且他也像阿萨尼亚一样，对即将发生军事叛乱的所有警告置若罔闻。尽管努力试图呈现出强硬而且精力充沛的对外形象，事实证明，虚弱的卡萨雷斯既鲁莽又无用。他对右派的恐吓和抨击——难得地与对左派的恐吓和抨击同样猛烈——激怒了敌人但也不过是虚张声势。“当时的政治气候需要一个能力更强的人，”主管温和派报纸《社会主义者》的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间]他任内政部长时与他共过事的一些具有判断力的人告诉我，不要相信他那精力充沛的外表。他们断言，像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先生一样，他也只是嘴上的功夫，因此，一旦议会辩论结束，事情就没有下文了。”

到六月中旬，卡萨雷斯·基罗加政府迷失了方向，显然，他为保持不稳定的社会均势所做的种种努力都一个接一个失败了。政府的威信急剧下降，以致天主教自由派领导人米格尔·毛拉在《太阳报》上要求组成一个多党派联合的共和国独裁政府。“西班牙现在需要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联合独裁政府，”他在六月二十三日写道，“其基础范围从不主张革命的社会党工人阶级到保守的中产阶级，后者确信，为了真正的社会公平做出克制和牺牲的时刻已经到了。……独裁政府将由共和派人士来管理，由把西班牙和共和国的最高利益置于阶级或党派目标之上的……正直的共和派人士来管理。”

他在六月二十五日写道：

国家的混乱无序状态如今令人不能容忍。政府无力控制它。斗争的双方——而且不只是双方——陷入捕猎人类的野蛮游戏。非法罢工和雇主违反政府法令的行为以旺盛的繁殖力滋生蔓延。对于经济无法挽救的破坏以及政府财政的崩溃令人恐惧地迫在眉睫。就右派和左派的统治而言，他们合力——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把国家压迫到了窒息的程度，显示出他们攻击并且颠覆国家的意图。发生这一切的原因在于人民阵线是一个高明的竞选工具而不是政府的工具，不可能为政府所利用。除了是个杂交的产物之外，人民阵线还是一个危害国家秩序和公共财产的混合体。……

现在，我在潜意识中愿意相信，共和国只是工人阶级当中那些主张革命的极端分子的工具，他们受到自由民主制度的保护以及某些失去判断力的共和派议员的包庇，正在精心准备对政府发动攻击进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和中产阶级。……

他们把我们这些曾经在这个政权诞生时为了合作热忱地做出最大程度的个人牺牲的共和派称为法西斯分子，因此应当被消灭。……

如果共和国是这样的，那就可以宣告，它不可避免地即将毁于自称是其唯一捍卫者的那些人手，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毁于来自对立一方的反击。……

[不是]所有共和派——我将一切希望维护共和国政权的左派和右派人士包括在这个派别里——决心使他们的党派利益服从于共和政权的最高利益……就是他们任凭它在一场内战的血腥灾难中灭亡而见死不救。这场内战的后果既可能是一个法西斯政权，也可能是一个红色独裁政权。……

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政权不配继续存在下去。但是，一个顺从而愉快地向其所宣称的敌人投降的政权，除了应当灭亡之外，还应当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共和国知



道，在其民主制度的保护下.....如果一方或者另一方获胜，西班牙的共和政体将与自由和民主一起灭亡。共和国知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西班牙将会遭受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因为它的敌人没有哪个准备建立一种人道并且适于生存的政治社会制度。

六月二十七日，毛拉忧郁地写道：“我对我的论断将会说服目前在西班牙承担着政府重任的那些人不抱任何希望。”

### 第三章 军事叛乱与内战

如果说在来自左右两派的危险更加气势汹汹地日益逼近共和国之前，阿萨尼亚和卡萨雷斯·基罗加的消极被动让人感到他们似乎是苟且偷安甚或是无能为力的话，那么，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害怕激起左派更加起劲的煽动和更为猛烈的攻击，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低估了军队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发动一场成功叛乱的能力。这种心态是整个内阁的特点。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证明：“由于组成了一个个人色彩过于浓厚.....过于驯顺的政府，阿萨尼亚先生在选择顾问方面并不成功。关键的部长职位.....送给了好友。他的意愿和主张完全支配着他们。他在好友当中唤起的忠诚往往接近于盲目崇拜，而那些盲目崇拜者从来没有与其偶像不同的意见。由于这个原因，既然阿萨尼亚不相信将要发生一场叛乱，所以这个政府也不相信。”如同支持军事叛乱的帕拉西奥·阿塔德所指出的那样，阿萨尼亚和卡萨雷斯·基罗加确信他们对于高级指挥官的控制保证了军队“实际上的服从”，从而忽视了“部队里的许多年轻军官具有通过制伏他们的上司成功发动叛乱的能力”。此外，引用胡安·马里查尔的话说就是，军队谋反的报告“不像极左派的姿态和行为那样让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感到头疼”。这一点得到苏加萨戈伊蒂亚的证实。他说，因为他在自己主管的报纸上批评了军方的某些破坏行为，当时还是总理的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以这些批评弊大

于利为由亲自训斥了他。实际情况是，他补充说，当时阿萨尼亚心烦意乱，不是因为“正在通过加强纪律的训练精心掩饰其阴谋”的军方，而是因为那些“确保人民阵线赢得大选然后在发动数量惊人的罢工并且扰乱公共秩序”的选民。在担任共和国总统后与希尔·罗夫莱斯进行的一次私人交谈中，阿萨尼亚没有掩饰他对事态发展的担忧。“我不知道我们最终将走向何方。”他说，“你的朋友应当给我留出一点信任的余地。他们不应给我制造任何麻烦。我在另一方面的问题够多了。”

因为相对于天天向他们报告的谋反活动，阿萨尼亚和卡萨雷斯·基罗加更为担心社会动乱；同时，正如理查德·鲁宾逊所指出的那样，因为一支反对革命的武装力量的存在是左翼共和派在行动上对那些工人组织保持某种独立性的唯一希望，所以，他们没有采取针对军队的坚决行动。例如，他们没有理会共产党提出的要求：政府应当清除“军队中的法西斯主义和君主主义将领”，并且应当对“国家机器”进行“一次有力而彻底的清洗”，把军队、秘密警察、国民卫队、突击卫队以及法院中“一切掌握实权的具有极端保守、法西斯主义、君主主义倾向的军官和人员”清理出去。

“接到有人在一些部队中谋反的详细报告后，”斯坦利·G·佩恩写道，“政府的当务之急应当是把一部分军官调动到其他部队。尽管一九三六年春天出现过两三次西班牙军人联盟[UME，右翼军人组织]蠢蠢欲动的迹象，但是，甚至对于许多像莫拉和戈代德那样的将领，政府也不愿意这样做。……阿萨尼亚和卡萨雷斯似乎像右派一样相信，主要威胁将会来自阿萨尼亚自己的革命左派盟友。”

然而，偶尔的指挥权变动和极左派持续不断的反军队宣传正在右翼军官当中引起恐惧。六月二十三日，佛朗哥将军从偏远的加那利要塞给卡萨雷斯·基罗加写了一封警告信，陈述了军队中“严重的焦虑状态”。他对用一些“不够格”的人取代“具有

辉煌资历”的军官表示抗议，并且强调了这样做给军队的纪律带来的隐患。他声称，百分之九十的同僚具有这种看法。他指出，“那些断言军队不忠于共和国的人所说并非事实，”因此，他强烈要求对待军队要“公平、公正，三思而后行”。佛朗哥将军的支持者曼努埃尔·阿斯纳尔证实，将军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面对上帝、历史和自己的良心，他能够拥有可能拥有的一切正当理由”。

孤零零地身处远在大西洋上的指挥所，佛朗哥将军继续小心翼翼地行事，直到六月底或七月初他仍然没有最终决定参与叛乱，他的犹豫不决激怒了一些谋反者，他们威胁将在他不参与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佛朗哥令人捉摸不透的态度可能只是出于谨慎。”理查德·鲁宾逊推测，“另一方面，他在共和国时期的行为表明他非常重视合法性，因此，他需要在心中确定，在当时的情况下，暴动是否具有正当的理由。他在六月二十三日写给卡萨雷斯·基罗加的那封信既可以解释为试图使政策改变以避免发生一场叛乱，又可以解释为为使谋反者的任务更容易完成而作的努力。”他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推迟做出自己的承诺，因为谋反进行得并不顺利。在七月一日写给那些“爱国运动”参与者的一份秘密报告中，从外省的潘普洛纳要塞指挥着这场阴谋的埃米利奥·莫拉将军说明，对于这项事业的热情“尚未达到取得决定性胜利所必需的那种令人鼓舞的程度。……已经为在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之间挑起暴力冲突局面做出了努力，以便我们能够以发生暴力冲突为由开始行动；然而实际情况是，因为仍然有一些傻瓜认为可能与人民阵线控制下的民众代表达成协议，所以，尽管一些政治组织提供了帮助，直到目前这种局面仍未出现。”另外，暴动计划不仅因长枪党与军队中的谋反者意见不一受到妨碍，而且因对立的阿方索派与卡洛斯派君主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分歧受到干扰。

里卡多·德拉·谢尔瓦在《西班牙内战史》一书中对军事政治领导人的谋反活动以及他们达成共识的艰难作了最有价值而且最引人入胜的描述。在佛朗哥统治时期，作为

支持暴动的重要历史学家，谢尔瓦可以看到没有公开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这些资料存放在马德里官方军事历史部门的解放战争档案馆里，也可以看到重要的密谋者参与供他使用的另外一些未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在这部著作里，谢尔瓦有效地处理了许多最初出现在官方及半官方出版物中的关于谋反活动的不够准确或真假参半的内容，例如阿拉拉斯编撰的《西班牙圣战史》中的一些描述。谢尔瓦指出，《西班牙圣战史》故意使莫拉将军在暴动准备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模糊不清，“以提高其他军事人物的地位”。谢尔瓦断言，谋反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负责人是莫拉将军，他“自觉地设法把针对共和国和人民阵线的各种阴谋与反抗欲望整合起来，尽管结果并不理想”。因此，谢尔瓦含蓄地否认了西班牙陆军总参谋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解放战争史，1936—1939》所主张的佛朗哥将军全面负责并且领导了这场叛乱的说法。

当佛朗哥终于答应支持叛乱时，尽管右翼各派之间的争斗和意见分歧有愈演愈烈之势，可是很快出现了一个使对立各派联合起来的突发事件。

七月十三日，作为对谋杀共和国突击卫队中的左派何塞·卡斯蒂略中尉的报复，君主主义者的议会领袖、最重要的平民谋反者之一何塞·卡尔沃·索特洛被警察中的左翼分子所杀害。卡斯蒂略的同事伙同一些社会党人自行驾驶一辆公用卡车来到卡尔沃·索特洛的住处，宣称他们奉命前来逮捕他。“犯人不知道即将对他个人犯下的穷凶极恶的罪行，”一位社会党人历史学家写道，“因此从容地跟着这些共和派官员走了。……刚一离开市区，他们就杀害了卡尔沃·索特洛，然后将其抛尸埃斯特墓地。骚乱的底线被突破了。这一事件之后，政府和极端保守派再没什么可以失去。对于前者，权威几乎荡然无存；对于后者，只待决断。”

“当然，何塞·卡尔沃·索特洛这个大人物是支持谋反的最重要的君主主义者。”里卡

多·德拉·谢尔瓦写道，“由于希尔·罗夫莱斯在大选之后韬光养晦，他的作用有所增强；由于对共和国和人民阵线的大力抗争，他的地位有所提高。他认为，按照逻辑共和国必然堕落为人民阵线。……卡尔沃·索特洛是反抗的代言人，是暴动的先驱。……[他的]死向军队和平民发出了最后的暴动号召，[他的]死是内战爆发的危险信号。”

在后面的一段内容里，谢尔瓦写道：“显然，在七月十三日之前，谋反早就开始进行。它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此，即使没有这一可怕的事件，叛乱肯定也要发生。但是，对于消除谋反者的难题和疑虑，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十三日早晨，它在几小时之内传遍了整个西班牙。”

由于担心杀害卡尔沃·索特洛将被用来当作发动叛乱的借口，同时希望对谋反者加以制约，普列托发出警告：“如果反动势力梦想发动一场流血的军事政变……它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以为将会看到共和国政权毫无防备，它就是在欺骗自己。如果想要政变成功，它就必须冲破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用来阻挡它的人墙。将会进行……殊死搏斗，因为双方都知道，如果敌人胜利了，他不会饶恕他的对手。即使出现这样的结果，一场决定性的斗争也比目前这种持续流血的局面要好。”

卡萨雷斯·基罗加政府严厉谴责了杀害卡尔沃·索特洛的行为。它承诺，不仅要立即采取措施保证“对人类生命的基本尊重”，而且要对这一罪行迅速展开司法调查，还要“动用一切法律手段防止众多极端分子的破坏行为改变共和国的目标”。

但是，政府的谴责没有起到安抚右派的作用。如同苏加萨戈伊蒂亚所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一直在组织暴动的保守势力和军队受到严重的伤害。卡尔沃·索特洛是这场暴动的平民领袖。由于出色的准备和过人的才能，他使所有君主主义者特别关注暴动。作为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合作者，他在财政部的工作经历使他具有不

可低估的管理经验。……他不仅得到君主主义者的信任，而且得到半数以上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议员的信任。后者[对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忠诚因希尔·罗夫莱斯的策略而淡化，他们指责希尔·罗夫莱斯没有[在一九三五年]利用他所掌管的国防部推翻共和国政权……进而效仿葡萄牙建立一个独裁政权。”

七月十五日，内战爆发前两天，在议会常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代表君主主义者发言的巴列利亚诺斯伯爵费尔南多·苏亚雷斯·德·坦希尔指控：“政府自己的特工犯下了我国政治史上没有先例的这一罪行。鉴于天天有人在议会煽动对右派议员实施暴力和人身攻击而形成的政治气候，这完全可能发生。……我们一刻也不能再与这种行为的保护者和道德帮凶和平共处了。我们不想通过在一场闹剧中扮演某种角色来欺骗民众和国际舆论，这场闹剧伪造了一种文明正常状态的假象，然而实际上，自从二月十六日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彻头彻尾的无政府状态中。”

接着，在卡尔沃·索特洛的葬礼上，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以西班牙复兴运动的名义宣布：“面对着与你们胸前的十字架一样的这面旗帜，面对着听得到看得见我们的上帝，我们庄严宣誓，把我们的生命献给这项具有三重意义的使命：学习你的榜样，为你的死报仇，拯救西班牙。”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仍有妥协的一线希望。但它立即被扑灭了。由于普列托警告说将会发生一场谁也不会饶恕对手的殊死搏斗，双方现在开始摊牌。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民兵组织，如今，他们开始疯狂地动员武装力量；与此同时，军队和民间的谋反者正在对他们的暴动计划作最后的完善。

毫无疑问，人民阵线中的温和派被杀害君主主义者领导人的事件惊呆了，不过，最强烈地反对这种行为的是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总统，他十分清楚这一事件的可怕含

义。作为一个骨子里的温和派人士，他试图使西班牙坚持一条中间路线。他希望在共和国宪法的框架内进行实质性的改革，而不是来一场将使宪法湮没其中的狂风暴雨式的革命。由于这个原因，当七月十七日叛乱在西属摩洛哥的梅利利亚随着共和派指挥官曼努埃尔·罗梅拉莱斯将军被其部下成功推翻而爆发并且开始向伊比利亚半岛蔓延时，阿萨尼亚仍然希望找到某种能把共和国从左派与右派之间沉重的碾轧之下拯救出来的解决办法。七月十八日傍晚，在为防止国家陷入内战和革命所进行的最后努力中，他接受了卡萨雷斯·基罗加政府的辞职，然后委托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组成一个多少有些保守的新内阁，希望这能促使叛军军官坐下来谈判——人们应该记得，新总理的政党共和联盟是人民阵线阵营中最温和的派别。

马丁内斯·巴里奥通过电台宣布：“我出于两个最重要的理由接受了这个任务：使我的国家免遭恐怖内战的涂炭并且保护共和国的宪法和制度。”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因为，当一个接着一个兵营揭竿而起造反时，当左派组织动员他们的人马并且更坚决地要求用武力对抗叛乱时，共和国的危险增加了。两天来，卡萨雷斯·基罗加拒绝把工人武装起来以免政权落入他们之手。“[他的]国防部成了一座疯人院，”一位目击者对苏加萨戈伊蒂亚说，“最疯癫的病人是部长本人。他不吃不睡，着魔似的大喊大叫。他的样子让你害怕，即使他在某次发狂时突然倒毙，我也不会感到意外。……他不愿听到武装民众的任何建议，并以最严厉的语气说，所有擅自这样做的人都将枪毙。”

人们对卡萨雷斯·基罗加的命令置之不理，因为，在他尚未辞职时，五千支步枪已经根据炮兵兵营指挥官、拉尔戈·卡瓦列罗多年的政治伙伴罗德里戈·希尔中校的命令分发给了马德里的工人。这个经过充分证实的情况是社会党左派议员玛加丽塔·内尔肯告诉我的，社会党当时派她从劳动者总工会的总部人民之家去炮兵兵营。拉萨罗·索莫查·席尔瓦在其撰写的何塞·米亚哈将军传记中提供的说法不仅缺少证据，而且与几

小时后将军加入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的事实相矛盾。这一说法的大意是，当时的马德里军区司令米亚哈将军下令给工人发放武器。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做出了扣发武器的保证。实际上，据当时在米格尔·努涅斯·德·普拉多将军手下担任民航总署副署长的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说，当时任民航总署技术干事的卡洛斯·努涅斯·马萨请求米亚哈向人民之家提供武器时，将军拒绝这样做。

就在马丁内斯·巴里奥试图组成新政府时，革命的工人已经开始行使警察的职能，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罗德里戈·希尔中校给他们发放了武器。“一群群武装的工人在街头巡逻并且开始截停汽车，”马丁内斯·巴里奥回忆说，“一个士兵也看不到，更加令人意外的是，一个维护公共秩序的人也看不到。显然，国家的强制机关已经停止运行了。”此外，一名共产党人证实：“当午夜的钟声敲响时，从太阳门广场通往所有方向的道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无论是通向兵营、通向工人总部、通向工人生活区还是通向城市各个进出口的道路。武装的工人管理着汽车交通。汽车和有轨电车受到仔细的搜查。飞行巡逻队快速飞过城市的四郊，传送命令，检查岗哨。”

夹在军事叛乱与左派的反抗之间，马丁内斯·巴里奥面临着双重危险。为了避开危险，他首先必须拒绝向聚集在内政部外面吵闹的工人发放武器，这是他与即将成为其内阁成员的那些人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因反对共产党的参与而拒绝加入人民阵线的小型保守派政党民族共和党领导人费利佩·桑切斯·罗曼成为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的一员。内战结束之后不久我在墨西哥采访了他，他告诉我，新政府在组成之前应阿萨尼亚总统之邀来到总统府时，他被告知出现了“严重的事态发展——成群的工人聚集在内政部外面要求得到武器”。他说，当时已在总统府的马丁内斯·巴里奥坚决主张拒发武器。马丁内斯·巴里奥征求他的意见，桑切斯·罗曼回答说，发放武



器“在军事上不起作用，在政治上则蕴涵着难以预料的危险”。马丁内斯·巴里奥说，卡萨雷斯·基罗加政府在七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六点举行了一次会议，社会党温和派的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和社会党左派的拉尔戈·卡瓦列罗均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除了他之外，所有人都对卡瓦列罗认为应当发放武器的“坚决态度”报以沉默，他的回答是，应当呼吁人民“团结在合法的政府机构周围”。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后所写的一篇关于马丁内斯·巴里奥对这次政府危机的描述的文章里，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以下说法：当卡瓦列罗建议发放武器时，他是那些保持沉默的人之一。

为了防止灾难来临，马丁内斯·巴里奥必须做的不仅仅是拒绝发放武器，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劝说军队领导人不要采取极端的行动。据他本人说，为了这个目的，他通过电话与各个兵营商谈，试图争取那些态度尚不明朗的军队领导人的支持，同时说服已经造反的军队领导人放弃他们的行动。在所有这些通话中，最重要的是与负责伊比利亚半岛叛乱计划的潘普洛纳要塞司令莫拉将军的商谈。但是，马丁内斯·巴里奥谋求得到将军支持的努力没有效果。“如果你打算与我达成妥协，”将军答复说，“我们就将背叛自己的理想，同时还要出卖自己的同志。我们都应当被私刑处死。”他们的通话进行时，桑切斯·罗曼与马丁内斯·巴里奥在一起，据桑切斯·罗曼说，马丁内斯·巴里奥绝望地向莫拉恳求道：“此时此刻社会党人正在准备武装民众。这将意味着共和国和民主制度的终结。我们应当为西班牙着想。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内战。我愿意向你们、向军队提供你们想要得到的职位和条件。”实际上，这次通话几小时后，莫拉指挥部所在地潘普洛纳的《纳瓦拉思想报》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那一期报纸上报道说，马丁内斯·巴里奥愿意向莫拉提供国防部长的职位。“我们将对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马丁内斯·巴里奥向莫拉保证，“我们还将对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对此，莫拉将军毫无商量余地地回

答道：“你的建议现在已经不可能实现。潘普洛纳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志愿军[卡洛斯派君主主义者的右翼民兵]。从我所在的阳台上望去，随处可见他们的红色贝雷帽。大家准备投入战斗。如果告诉这些人我已与你达成协议，我将会第一个人头落地。在马德里，同样的事情也将发生在你身上。现在我们谁也控制不了我们的群众。”在其本人对这次决定性对话的记述中，马丁内斯·巴里奥声称，莫拉的回答如下：“我对投身我麾下的勇敢的纳瓦拉人民负有责任。如果我想改变行动的计划，他们就会杀了我。当然，我不怕死，我怕这种新的变化和我个人的信念不起作用。现在为时已晚，太晚了。”

尽管叛军做出这种反应，马丁内斯·巴里奥仍然继续组建后来被其称为调解政府的他的政府。如果这个政府具有明显的温和色彩，那么，与其说是因为它的五名共和联盟成员，不如说是因为包括党的领导人桑切斯·罗曼在内的三名民族共和党成员，众所周知，共和联盟持相对保守的观点，而民族共和党则拒绝加入人民阵线。

马丁内斯·巴里奥在对这次政府危机的记述中声称，他曾邀请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加入他的内阁，但是，由温和派控制的社会党执委会决定普列托不参加政府，尽管它愿意给予政府“坚定而忠实的支持”。当时主管执委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的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合乎逻辑地证明了这种态度。苏加萨戈伊蒂亚说，当另一份报纸的负责人就马丁内斯·巴里奥像卡萨雷斯·基罗加一样拒绝发放武器这一情况询问他的报纸对新政府的看法时，他答道：“我只报道与这场危机及其解决办法有关的消息。我不认为我们应当发表任何激烈的评论。我们将会帮倒忙。从现在起，只要内战还在继续，如果党没有做出其他决定，《社会主义者》将是一个全力以赴支持政府的舆论工具。”

但是，新政府从一开始就命蹇时乖，因为事态发展的控制权已经落入一定要让左派

与右派决一死战的那些人之手。

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叛军军官逐步推动着他们的计划。七月十七日控制西属摩洛哥后，通过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将军一次大胆的行动，他们在星期六下午两点占领了塞维利亚兵营。凯波·德·利亚诺将军的支持者兼传记作者安东尼奥·奥尔梅多·德尔加多和何塞·奎斯塔·莫内雷奥中将描写了他冷静地从共和派指挥官何塞·费尔南德斯·德拉·比利亚·阿夫里莱将军手里夺取塞维利亚兵营的过程。凯波·德·利亚诺是边防警察部队监察长，这是一支由海关、税务官员和警卫组成的部队。以视察海关检查站为借口，他可以出行数千英里从事谋反活动而不引起怀疑。因为他在一九三一年对共和国的出现表示了热烈欢迎而且与第一任共和国总统阿尔卡拉—萨莫拉是姻亲，所以谋反者并不信任他。但是，人民阵线将阿尔卡拉—萨莫拉赶下总统宝座令凯波大为不满，这帮助消除了对他的怀疑。然而，如同保守派历史学家里卡多·德拉·谢尔瓦所指出的那样，叛军将领对凯波的“决策能力”没多大信心，因此把他派往塞维利亚，“据最后分析”，叛军在那里肯定失败，结果，由于凯波将军表现出来的“必死的勇气”，一场失败“变成了内战中最令人意外的一场决定性胜利”。不过，尽管他取得了最初的成功，但是，直到一周之后，在来自西属摩洛哥的摩尔军团和外籍军团的帮助下，凯波·德·利亚诺才平定了塞尔维亚近郊的工人区。为了镇压罢工，他以极端措施相威胁。据他的传记作者说，他签发了一份公告宣布，参加罢工的所有工会的领导人将“被立即枪毙”，同时枪毙“随意挑选的同等数量的工会会员”。

凯波·德·利亚诺于七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两点夺取塞维利亚兵营之后不久，叛军在另外一些省会开始行动。当天下午四点在加的斯，五点在马拉加，六点在科尔多瓦，午夜十二点半在巴利亚多利德，七月十九日星期日凌晨两点在布尔戈斯，他们造反了。在其中的两个省会布尔戈斯和巴利亚多利德，国民卫队和突击卫队都参加了叛

乱，前者是君主建立的宪兵队，后者是共和国建立的警察部队。

在布尔戈斯，据七月二十日的《布尔戈斯日报》报道，“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从一开始就支持民族主义运动”。在巴利亚多利德，据该市出版的《卡斯蒂利亚北方报》七月十九日报道，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携手加入了民族主义运动”。不过，同样根据叛乱方面的消息来源，在塞维利亚、加的斯和马拉加，突击卫队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都支持人民阵线。另一方面，在科尔多瓦，只有少数突击卫队成员反对叛乱。

应当指出的是，一九三一年由共和国建立的突击卫队在城市维持秩序，而君主制遗留下来的国民卫队主要限于在农村执法。突击卫队建立之前，实际上没有用于维持城市市区秩序的警察部队。斯坦利·G·佩恩写道：

[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内政部长米格尔·毛拉是共和国产生的少数几位可靠负责、具有远见的领导人之一。他意识到，公共秩序问题对于新政权的未来十分重要。多年来，城市的暴力行为之所以断断续续地始终困扰着这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缺少一支有效的警察部队。当此类骚乱真正引起恐慌时，通常调来军队恢复城市的秩序，而国民卫队则在农村维持秩序。没有哪个机构为承担城市的警察职责适当地装备或训练。……由于缺乏用有效方法驱散人群的训练，维持秩序的士兵往往诉诸流血杀戮的手段，从而激起更大程度的暴力和不满。为了避免向军队或国民卫队求助，毛拉创建了一支全国性的共和国警察部队，配备的武器只有手枪和警棍；这些“突击卫队队员”将被用来镇压在大城市进行的示威活动。安全总局局长[安赫尔·加拉尔萨，他是共和国的第一任总检察长，还是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拉戈·卡瓦列罗战时政府中的社会党人内政部长]选择阿古斯丁·穆尼奥斯·格兰德斯中校担任突击卫队负责人，后者在摩洛哥军团[西班牙陆军中的现役摩尔人军团]服役期间作

为一名领导者和组织者享有盛誉。

据社会党温和派的苏加萨戈伊蒂亚说，尽管突击卫队由共和国创建，但是，它却包括了许多敌视新政权的人，他们是在穆尼奥斯·格兰德斯掌管这支队伍时加入的。显然，人民阵线赢得一九三六年的大选之后这些人并没有被清除，因为，据（佛朗哥政权）官方军事叛乱史《西班牙圣战史》说，这支队伍充满了共和国政权的敌人。“人民阵线出现之前一直担任这支队伍指挥官的穆尼奥斯·格兰德斯中校与突击卫队的许多军官保持着联系，”《西班牙圣战史》接着写道，“因此他知道，在突击卫队中，成百上千人非常愿意参加反政府的政变。”

就在七月十九日星期天凌晨五点前后马丁内斯·巴里奥向报界宣布他的新政府组成时，事态的发展比他的语速还要快。在萨拉戈萨，午夜过后不久，突击卫队开始在工会和左翼党派的总部抓人，军队在米格尔·卡瓦内利亚斯将军的指挥下刚刚宣布了军事管制。在韦斯卡，格雷戈里奥·德·贝尼托将军也起事了，他得到人数不多的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的支持。在巴塞罗那，叛军开始从兵营出发前去夺取战略要地，当天早些时候，曼努埃尔·戈代德将军将从巴利阿里群岛抵达那里接管指挥权。在南方，摩尔军团的一支部队正在靠近加的斯，在为反叛事业保卫这个重要港口的战斗中，它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此外，佛朗哥将军正从加那利群岛飞往西属摩洛哥，他将在上午七点到达目的地。据斯坦利·佩恩说，作为对他保证支持暴动的回报，军方答应把驻扎在摩洛哥的摩尔军团和外籍军团——“也就是说，西班牙陆军所有重要的作战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他，事实证明，得到这一指挥权是他向僭取民族主义一方最高权力所迈出的关键一步，两个月后，他被反叛者的权力集团任命为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国家元首。

值得注意的是，记录显示，七月十八至十九日由塞西尔·贝布上尉所驾驶的那一架将

佛朗哥将军从加那利群岛秘密送往西属摩洛哥的哈维兰快速飞龙小型客机，是马德里的君主主义报纸《阿贝赛报》驻伦敦记者路易斯·博林按照报纸出版商胡安·伊格纳西奥·卢卡·德·特纳侯爵的要求于七月九日在英国的克罗伊登包租的。

离开加那利群岛开始他的历史性航程之前，佛朗哥将军宣布实行军事管制并且发表以下公告：

西班牙的人民！对于所有那些感受到西班牙的神圣之爱的人……对于所有那些誓死保卫西班牙抗击它的敌人的人，这个国家要求帮助。西班牙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更危急。无政府状态在大多数城镇和乡村盛行。政府任命的官员主导着社会动乱，即使动乱实际上不是他们煽动的。当行政当局拒不采取强制性手段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时，对于被怯懦而卑鄙地杀害的公民来说，区别只是决定使用左轮手枪还是使用机关枪。各种各样的革命罢工使这个国家的生活陷入瘫痪。难道我们可以胆小怯懦、背信弃义地一枪不放毫不抵抗地听任西班牙落入祖国的敌人之手？不！叛国者也许可以这样做，而我们这些发誓保卫国家的人决不当这样做！……我们愿意为你们提供法律面前的公正与平等、西班牙人之间的和平与友爱、摆脱了放荡和残暴的自由与博爱！……西班牙万岁！

现在，这个一九三一年诞生的自由主义共和国经过自然的发展之后很快将被内战毁灭，这场持续数年的战争所产生的后果只能是一个或左或右的独裁政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阿萨尼亚总统——他担心卡萨雷斯·基罗加无法长时间拒绝发放武器，而发放武器将意味着民主政权的末日——才孤注一掷地任命马丁内斯·巴里奥组成一个新政府与叛军领导人进行谈判。

但是，尽管马丁内斯·巴里奥的内阁受到右派的抵制，它也同样受到左派的抵制，左派认为它纯粹是个投降政府。共产党官方的内战与革命史断言，作为共和派中间势

力的温和派“确信，通过摆脱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的束缚，它能够与叛军将领和保守势力达成妥协。马丁内斯·巴里奥及其支持者的姿态——表示愿意向叛军将领提供部长职位，同时拒绝武装人民以使他们能够保卫共和国——不可能在投降与抵抗之间产生一条中间道路，只能导致共和国在共和派领导人的带领下缴械投降”。它还质问，卡萨雷斯·基罗加和马丁内斯·巴里奥为什么不向人民发放武器？“这说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这些共和派的领导人宁愿与叛乱者达成协议也不愿把武器发给人民，因为他们害怕这将导致工人阶级在领导国家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得到加强。”

新内阁的名单公布后，工人阶级非常担忧与愤慨，毫无疑问，这与某些部长的名字有关。社会党左派的喉舌《光明报》曾经这样谈论新政府的成员费利佩·桑切斯·罗曼，尽管他是一个“真诚无欺的共和派”，但他也是“[共和国]新政权所发现的最保守的人物之一”；在谈到另一位政府成员安东尼奥·拉腊时，《光明报》写道，他是一个“下流的政治骗子”。至于马丁内斯·巴里奥，在内战爆发的几个月前，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人团结报》说他有一帮安达卢西亚地主好友，还说经常看见他在议会休息室里“与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友好交谈”。中产阶级左翼共和派的一些成员对政府怀有敌意，虽然其中有他们的四位代表。“在左翼共和派总部，”代表该党派右翼而且也是新的内阁部长的左翼共和派主席马塞利诺·多明戈写道，“我的许多同志听到政府的组成之后因羞愧难当愤怒地撕毁了他们的党证，尽管他们始终认为我的加入至少应当是一个关心的理由，而且也是对他们的一种保证。他们对责任以及为责任不得不做出的牺牲的理解与我不同。”左翼共和派领导人阿萨尼亚总统同样注意到：“一些左翼共和派成员甚至谈论共和国总统的‘叛卖行为’，那大多是一些莽撞而且缺乏理解力的人。”

当左派组织成员上街表示抗议时，街头的气氛一触即发。“大规模示威活动自发形成。”一位目击者写道，“他们雪崩似的涌向内政部和国防部。人们高喊‘叛徒，

懦夫’，即兴的演讲者向群众高谈阔论，‘他们把我们出卖了！我们必须首先动手枪毙他们。’”

面对民众愤怒的大爆发，加上他与叛乱领导人达成某种和平解决办法的希望化为泡影，马丁内斯·巴里奥决定辞职。“只有普列托进行最后的努力劝阻我，”巴里奥写道，“然而这是徒劳的，我的态度让他的希望落了空。不过短短几分钟，政治示威活动导致政府垮了台。当内阁成为被剥夺了权力的影子、只是可笑地保留着部长的头衔时，要求我与军事叛乱做斗争毫无意义。”

“现在，两个西班牙形成对峙，准备毫不留情地战斗到最后胜利或失败，”一位军事叛乱的支持者写道，“不可能有其他选择。”

#### 第四章 革命与第三共和国的崛起

在七月十九日那个狂热的日子，由于遭到左派和右派的抵制，马丁内斯·巴里奥内阁的成员名单甚至还没有在《马德里官方公报》上公布，它就已经被人抛弃了。所有与叛军将领妥协的打算都被迫放弃。一个决心与叛乱斗争的新政府组成，它必须答应工人组织发放武器的要求。“当我接管共和国政府时，”这个政府的总理何塞·希拉尔声称，“我不得不认为与军事叛乱斗争的唯一方法是把我们所控制的那一点点武器发给人民。”左翼共和派领导人萨尔瓦多·克马德斯证明：“由于缺乏镇压叛乱的手段，政府不得不向政治组织和工会——人民——做出让步，以使他们能够与叛乱势力做斗争。”然而，这只是一个被民众的浪潮所裹挟的孤独无助的名义上的政府，它保护不了一九三一年诞生的共和国政权，眼看着共和国政权在军事叛乱和社会革命的双重打击之下迅速瓦解而无能为力。据希拉尔总理说，在政府各部，立即成立了协助并且监督部长的人民阵线委员会，索性把掩饰真正权力之所在的一切幌子都去掉了。



这就是由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好友何塞·希拉尔组建的自由共和派政府。根据七月二十和二十二日《马德里官方公报》所公布的内容，它的内阁成员如下：

何塞·希拉尔	左翼共和派	总理
奥古斯托·巴尔西亚	左翼共和派	外交部长
塞巴斯蒂安·波萨斯将军	自由共和派	内政部长
路易斯·加斯特略将军	自由共和派	国防部长
普拉西多·阿尔瓦雷斯·布伊利亚	共和联盟	工商部长
恩里克·拉莫斯-拉莫斯	左翼共和派	财政部长
曼努埃尔·布拉斯科·加尔松	共和联盟	司法部长
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	共和联盟	通讯和商业海运部长
马里亚诺·鲁伊斯·富内斯	左翼共和派	农业部长
弗朗西斯科·巴尔内斯	左翼共和派	教育部长
安东尼奥·贝劳	左翼共和派	公共工程部长
胡安·留伊-巴列斯卡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劳工、卫生和物资部长

八月六日，阿萨尼亚派的胡安·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中校接替路易斯·加斯特略任国防部长。“令人钦佩的是，”一年之后阿萨尼亚总统对何塞·希拉尔说，“当没有人愿意服从命令时，当所有人——从最重要的到最卑微的——都准备溜之大吉时，你镇静而勇敢地接过了指挥权。”

当反叛的兵营加入暴动或者被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忠于政府的军队打败时，这个国家在一个又一个村镇、一个又一个城市分裂成碎片。由于叛乱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巴伦西亚、马拉加、毕尔巴鄂以及一些较小城镇的失败，叛军最初只夺取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地盘。七月二十日那一天，在大约八千八百五十名现役军队指挥官和军官

当中，有四千六百六十人身在反叛的兵营，其余的军官处于左派控制区，这不包括西属摩洛哥，实际上，那里的整个军官团全都支持叛乱。像先前其他军官所做的那样，左派控制区的许多军官最终逃到了叛军的地盘。尽管人民军中的共产党人指挥官恩里克·利斯特声称，内战期间在左派建立的人民军中服役的正规军军官有两千人，但是，人民军的总政治部主任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断言，“不到五百名军官仍然在为共和国效力”，“旧军队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可以利用的东西”。因为军官团即使不被左派憎恶，通常也得不到左派的信任，而且因为当军官的忠诚受到怀疑时，他们往往被人排挤、遭到监禁或者处决，所以，较低的数字也许更符合当时的特征。实际上，这得到了可以高度信赖的共和派军官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的证实。值得注意的是，与通常所认为的恰恰相反，现役将军中支持叛乱的人比继续留在政府一方的要少得多。军事叛乱的支持者兼历史学家里卡多·德拉·谢尔瓦写道，七月十七日，在西班牙的十八位师级将领中，只有四人参加了叛乱：卡瓦内利亚斯、凯波·德·利亚诺、佛朗哥和曼努埃尔·戈代德。据同样是军事叛乱支持者的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说，在现役的五十六位准将中，“十四人反叛，至少二十九人继续站在政府一边”。不过，独立共和派人士兼历史学家马达里亚加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在与政府站在一边的军官里，只有少数人是出于个人信仰而这样做的。大多数成为他们战友的人则是因为担任着不得不这样做的职务；这些人经常试图越过前线，有时他们也会得逞。”

君主时期创建并被共和国当作一支国家防御力量保留下来的警察部队国民卫队同样支离破碎。尽管在国民卫队总共三万四千三百二十名官兵中，大约两万零一百二十人在七月二十日那一天身处左派阵营，不过还是难以确定究竟有多少人仍在政府的实际控制之下，因为当时许多人脱掉制服加入了无产阶级的民兵队伍，另外还有数千人开小差投靠了叛军。实际情况是，据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消息说，一九三六年十

一月，在左派控制区总共有一万五千名国民卫队官兵，不过，这已是在将其重新组建成为共和国国家卫队继而招募了数千名新兵之后。

秘密警察也被解散，它的大部分特工支持叛乱。就连一九三一年被共和国当作新政权的支柱之一而创建的警察部队突击卫队——它有大约两万五千名官兵，由于大批人员倒戈投向叛军，以及在叛乱失败的地方被工会组织和左翼党派临时拼凑的治安委员会和民兵小分队夺走了警察的职能，同样土崩瓦解了。

“国家崩溃而且没有给共和国留下任何军队、任何警察，留给它的是因背弃和破坏而元气大伤的行政机构，”几周之后成为外交部长的社会党左派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从军队领导人和最高法院法官直到海关官员，我们不得不更换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管理共和国国家机器的大部分人员。仅仅在外交部，前外交使团百分之九十的人员挂冠而去。”用著名共产党领导人“热情之花”（多洛蕾丝·伊巴露丽）的话说：“整个国家机器遭到破坏，国家权力躺在了街头。”后来担任内政部长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国家权力在大街上零落成尘，权力的碎片被每一个反法西斯的公民掌握支配，他们以某种最符合自己心意的方式利用它。”的确，它的崩溃如此彻底，以致只剩下“国家的尘埃，国家的废墟”——一位共和派法官如是说。

作为国家权力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以前由边防警察部队实施的港口和边境控制被工人委员会或工会组织和左翼政党所领导的地方机构接管了。“政府完全无能为力，”社会党温和派人士胡安·内格林博士在后来出任内阁总理时回忆说，“没有任何边境或港口处在政府的掌握中。我国的边境和港口全部都由私人、当地、地区或者各省的机构控制着，政府当然感到无法行使它的权力。”“工人和海关官员严格控制着[里波尔的]边境地区，”一份共产党的报纸报道说，“他们只听从工人

组织的命令。” “在博港的海关检查站，”一位目击者写道，“没有让我们这些巴黎人感到不安的革命迹象。海关官员仍旧身穿过去的制服，他们无精打采地做着事，似乎有什么东西连他们的这点权力也剥夺了。护照审查室的门敞开着。这里说明了一切问题。室内的各个位置都有反法西斯民兵组织的人员守卫。他们身穿蓝色制服，披挂着子弹带。他们用手枪和步枪武装到牙齿。在一条长桌后面，坐着三个佩带手枪的工人。他们正在检查护照和证件。”

在海军，据内战期间担任海军第一政委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布鲁诺·阿隆索说，百分之七十的军官被他们的部下打死，同时由水兵委员会行使指挥权。阿隆索写道：“对水兵的长期压迫及其所遭受的传统不公和羞辱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积聚起仇恨，当叛乱发生并导致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被激情冲昏头脑时，这种仇恨得以宣泄。” “军官能否在暴力行为中幸免于难由水兵选出的委员会决定，”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而水兵委员会的决定完全是随心所欲做出的。”

在左派控制区，市政当局和其他地方管理机构的职能也被各种委员会篡夺了，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工会主导着这些委员会。“在我们控制的所有省份，”内战爆发几星期后一位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宣称，“这些革命机构使政府代表不复存在，因为他们除了服从委员会的决定之外别无选择。……资产阶级旧政权的地方管理部门只剩下了残骸，因为它们的生命力已经被工会的革命活力所取代。” “这些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政权的萌芽。” 发表在某社会党左派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写道，“它们代表一切革命力量。……在农村，它们夺取了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在城镇……他们参与管理所有事务。” “七月十九日以后，”加泰罗尼亚地区监狱总长拉斐尔·塔西斯—马卡写道，“在紧张而且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中，[加泰罗尼亚各省]市政当局立即变得气息奄奄、失去了活力。……各种委员会的橡皮图章代替了……市长的签字。” 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关于塔拉戈纳省的一份文件宣称，“所有地方都

建立了当地的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控制着社区的全部活动。” “战争和政治的中心在大街上。” 社会党人历史学家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写道，“权力掌握在人民、党派、委员会手里。”

法院被以其独有方式进行审判的革命法庭所取代。“每个人做出自己的判决，然后执行这些判决。”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成为司法部长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宣称，“有人习惯把这叫作‘私刑处死’ [paseo]，但我坚持认为，这是人民在正规司法机关完全瘫痪的情况下直接实施的正义。” 据社会党人阿图罗·巴雷亚说，在马德里，工会和政党的每个分支和派系都建立了“各自的警察、监狱、行刑队及专用刑场”。法官、地方法官和地方检察官被解除职务，一些人被监禁，另一些被处死，与此同时，许多地方的司法档案付之一炬。

为了约束革命的恐怖活动，何塞·希拉尔政府设立了“人民法庭”。这些法庭给人以判处死刑合乎宪法的假象，但对控制恐怖行动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实际上，据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说，一九三六年九月，由三名专业法官和十四名来自主要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的陪审员所组成的马德里人民法庭将其判处前激进党政府部长拉斐尔·萨拉萨尔·阿隆索死刑的裁定通知政府之后，内阁做出的将萨拉萨尔减刑为终身监禁的决定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由于不能证明萨拉萨尔·阿隆索参加了军事叛乱，当时身为内阁部长的普列托投了同意减刑的决定性一票，但是，人民法庭的主审法官马里亚诺·戈麦斯——以前是巴伦西亚的地方法官，后来成为最高法院院长——随后立即告诉普列托，他确信政府的决定将在人民法庭内部引起一场“可怕的哗变”，接着，这名犯人将会随随便便地被枪毙。“政府没有强制执行其决定的足够手段，” 戈麦斯接着说，“因此，它将无法挽救他的生命，而且……它将威信扫地。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我绝对相信，人民法庭将会拒绝继续履行它的职责，接着，在萨拉萨尔·阿隆索之后，所有政治犯将被子弹打成筛子，也许就在今天

晚上。”在得知一百多名犯人可能被枪毙之后，普列托改变了决定，投票支持处以死刑。

银行突然遭到搜查，它们的寄存保险箱被洗劫一空。宗教裁判所和监狱被人闯入，它们的档案被销毁，它们的囚犯被释放。“监狱的大门被打开，以便释放政治犯，”一位共和国的支持者写道，“普通刑事犯也自动跟着出了狱。”当然会出现怪异的情节。马达里亚加写道：“刑事法庭的法官突然在自己的公寓里发现了不久前被他判处三十年苦役的小偷和罪犯，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民兵，在抢走了这一家人的金银物品并用亚麻床单打包之后，他们当着法官妻女的面开枪将其打死。”

成百上千座教堂和修道院被放火焚烧或者改作世俗之用。“天主教的巢穴不复存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喉舌《工人团结报》宣称，“人民的火炬将它们化为灰烬。”“受压迫的人民放火焚烧了他们在前进道路上发现的蒙昧欺骗的活动场所。”发表在某无政府主义青年报刊上的一篇文章写道，“教堂、修道院、反动派聚会的地方，无论香烟缭绕还是阴森黑暗，统统都被付之一炬。”“为了这场事实上的革命，”一份无政府主义青年宣言宣称，“我们必须摧毁反动派的三大支柱：教会、军队和资本主义制度。教会已经受到痛斥，教堂已经被我们烧毁，没能逃走的教会乌鸦已被人民监视起来。”在塔拉戈纳省，《工人团结报》报道说：“所有村子里的教堂都被付之一炬。只有可以用于服务百姓的建筑保留了下来，但不包括那些焚烧之后非常危险的教堂。许多教堂被改成了公用仓库，还有一些改为反法西斯民兵使用的车库。”在数不尽的城镇和乡村，情况全都如此。然而，人称“红色”坎特伯雷教长的休利特·约翰逊主教大人一九三七年春天在巴伦西亚接受我的采访时却肯定地说，“没有一座教堂”遭到破坏或亵渎。这并不奇怪。如同戴维·科特所指出的那样：“这位看似圣徒的神父是他那个时代最坚定的同路人之一。”与他断言“没有一座教堂遭到亵渎或破坏”形成对照的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的“西

班牙主教联名信”声称，“遭到破坏或被劫掠一空”的教堂和小礼拜堂有两万座之多。

保罗·布兰沙德对焚烧教会建筑的现象作了如下解释：“[在最近一百年间]教会一次又一次被反教权主义的政治势力所羞辱，它的建筑一次又一次被反教会的暴民所焚烧，主要的宗教派别一次又一次被这个国家所取缔。这个号称世界上天主教最普及的国家所杀害的神父和修女、所烧毁的修道院和教会学校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要多。……由于被认为是国家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教会因此受到迫害。近两百年来在西班牙，主张民主政治的人无意识中都成了反教权主义者，而独裁政权的捍卫者往往倾向于亲天主教的立场。”

成千上万名神职人员和宗教团体成员以及有产阶级人士被杀害，另一些人则因害怕遭到逮捕或处决而逃往国外，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自由共和派与温和共和派人士。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与共和派法官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当谈到大批“著名甚至地位显赫的共和派人士”离开西班牙时，阿萨尼亚总统不满地说：“他们离开均未经过我的同意或者征求我的意见。而且有些人（我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了他）还欺骗了我。对于那些愿意留下的人——他们都在这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你知道[一九三六年]二月组成我的政府的那些部长还有几个仍然留在西班牙吗？两个：卡萨雷斯和希拉尔。如果说哪个人肯定有危险，这是说的卡萨雷斯。他就在马德里。在我任命的‘政府’使节中，只有迭斯—卡涅多一人离开任所来到巴伦西亚问候[我]并为政府继续效力。其他人都留在了法国。……我把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无名小卒提拔起来。我把他们大家从一九三三年的危难中解救出来并使他们成为议员、部长、大使、副部长，等等，等等。他们全都有责任为共和国服务至死方休，只要我还在职，他们就应该和我患难与共。这些人中有两三个终于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回来了。”

成千上万担心遭到监禁或草率处决的人躲进了马德里的大使馆和公使馆。关于此类避难者的人数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估计。诺曼·J·帕德尔福德说，估计超过了五千人。智利大使兼马德里外交使团团团长奥雷略·努涅斯·莫尔加达断言避难者超过一万五千人，而作为外交部长为使避难者离开使馆进行谈判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提供的数字是两万人。另一方面，在详细查阅了外交信函和其他资料来源之后，哈维尔·鲁维奥得出了七千五百人这个较低的数字，不过他仍然认为这“在国际关系史上前所未有”。挪威临时代办费利克斯·施莱尔说，最小的使馆之一挪威公使馆躲进了九百名避难者，与此同时，据墨西哥大使曼努埃尔·佩雷斯·特雷维尼奥将军说，墨西哥大使馆向八百多人提供了政治避难权。

由于这种扩展到外国使馆的避难所，成百上千人——如果不是成千上万人的话——的生命幸免于难，因为正如社会党左派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在革命开始的第五天写给妻子的私人信件所说：“对残敌的清理将是可怕的。它已经是可怕的了。没有一个法西斯分子可以继续活下去，尤其是那些最重要的法西斯分子。谁也不能阻止人民。”

在事态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重要成员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写道：“我们已经证实了一些我们只是从理论上知道的东西，即，革命具有盲目性和破坏性，革命行为夸张而残忍，不加控制和无法控制的力量在革命的过程中肆无忌惮地发挥着作用；一旦迈出去第一步并且突破了第一道障碍，人民就会像洪流一样从这个突破口奔涌而出，结果，这股洪流不可阻挡。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在失去理智的暴怒中，有多少人要遇难遭殃！人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些人，既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坏。……他们暴露了自己的丑恶和美德，尽管以前似乎无法想象：无赖的心中萌动着某种潜在的真诚，老实人的内心深处冒出某种野兽的欲望——想去杀人，希望流血。”



“我们不想否认七月十九日造成了激情和伤害的泛滥，”加泰罗尼亚地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公开宣称，“这是随着权力从特权阶级手中转移到人民手中而出现的一种自然现象。我们的胜利可能导致三四百名加泰罗尼亚居民死于暴力，他们被列为右派分子，因而人们把他们与政治或教会的反动势力联系起来。但是，这种流血是一场革命不可避免的后果。不管出现什么障碍，这场革命就像洪流一样奔涌，将其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荡涤干净，直到它渐渐失去动力为止。”

不过，一位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共和派人士兼天主教徒写道：

流血，两边都有许多无辜的人在流血。……然而，就共和派控制区而言，最根本的不同恰恰在于[军事]叛乱这一事实——这并不证明过激行为是合理的，但是至少解释了它们是为为什么发生的。且不论负有维持治安职责的警察部队是否参与，军队、几乎所有秘密警察以及司法机关丢下没有防卫能力的合法政府造了反。后者不得不把人民武装起来，监狱的大门被打开，以便释放政治犯，普通刑事犯也自动跟着出了狱。此外，随着社会底层的骚动，存在于每个城市、每个民族的那些坏人渐渐开始抛头露面，他们发现了适合自己的用武之地。在正常时期，警察会把他们置于控制之下，但是，正是这场叛乱使政府失去了强制力量，从而导致犯罪分子弄到了武器。在叛乱最初的那一段日子，这些无人管制的犯罪分子为所欲为难道令人意外吗？与此同时，极左派组织以某种粗暴而简单的方式实施正义，人们受到的审判是在仇恨的气氛中进行的。所有这一切并不证明人们在共和派控制区所犯下的那些罪行合理，但这有助于解释它们是为为什么发生的。

无法解释甚至更不合理的是军队、警察以及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绅士——他们应有尽有并以信仰天主教而自豪——所犯下的数量更多、手段更加残忍的罪行。

“革命在一个既不愿意也不可能支持它的共和国政府执政期间开始进行。”过了一

段时间阿萨尼亚总统写道，“过激行为逐渐开始在部长们惊讶的目光下出现。面对革命，政府可以选择支持或镇压。但是，与支持革命相比，政府更不可能进行镇压。它有没有镇压所需要的足够武力值得怀疑。我确信它没有。尽管如此，使用武力仍将引起另一场内战。”

失去国家的镇压机器，自由派的何塞·希拉尔政府成了有名无实的政权，它的权力因此而被分解为无数的碎片散落到上千个城镇和乡村的革命委员会手中，它们控制着邮政局和电报局、广播电台和电话交换机，组织了警察分局和法庭、公路和边防巡逻队以及运输和供应部门，并且建立了上前线打仗的民兵部队。总之，如同一些著名的反佛朗哥阵营拥护者用大量证据证明的那样，何塞·希拉尔内阁在西班牙的任何地方都无法行使真正的权力。

随着军事叛乱的爆发，经济像政治一样突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在那些叛乱失败的省份，两个工会组织——社会党人的劳动者总工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控制了大部分经济活动。

尽管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一九三六年七月，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搞垮了共和国政权，然而，内战期间采访报道左派阵营的《纽约时报》通讯记者赫伯特·L·马修斯——四十年来他是公认的西班牙问题权威，他的著作和文章对美国舆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其最后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中对革命导致的变化轻描淡写毫不在意。他首先引用了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杰克逊的说法，“在仍由人民阵线控制的许多地区，发生了十五世纪以来最深刻的社会革命”，接着，他评论道：“几乎每一个研究西班牙内战的历史学家都以多少有点不容置疑的措辞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要说的是，的确发生了一些事情，勉强称得上是一场革命，但是不应对它言过其实。从某种严格的意义上讲，革命根本没有发生，

因为共和国政府的运转情况与内战之前几乎一样。”

这段引语是一个例证，证明一些支持政府的新闻记者后来通过自己的著作使他们在内战期间就基本事实所传播的真假参半的欺骗性描述和歪曲性报道继续存在。

尽管如同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所看到的那样，由于外交方面的原因，共产国际遵照克里姆林宫的指示，试图对外界掩盖这场席卷了西班牙的范围广泛的社会革命，但是，即使根据共产党方面的资料来源，从来也不缺乏有关西班牙革命之广度和深度的证据。“参加叛乱与人民为敌的大资本家还是工厂的主人吗？”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问道，“不，他们已经不见了踪影，于是，工厂……落到工人手中，由工会掌控。”“今天，”共产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书记安东尼奥·塞赛宣称，“工人拥有了工厂，工人拥有了银行，工人拥有了土地，工人拥有了武器。”内战刚刚爆发不久，苏联首席记者、斯大林个人在西班牙的代理人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说，根据粗略的估计，约有一万八千家工商企业被工会和政府所接管，其中两千五百家设在马德里，还有三千家企业设在巴塞罗那。

地产被没收，一些被集体化，另外一些分给了农民，同时，在无数城镇和乡村，公证档案和财产登记簿被付之一炬，尽管官方公报一年多后仍不承认财产记录被销毁了。在反佛朗哥阵营控制的“各个省份”，共产党领导人何塞·迪亚斯断言，“大地主已经不复存在”。

附属于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农业工人工会组织成百上千次地对私人财产进行没收，然后，他们到土地改革协会把没收的财产登记在案。土地改革协会是农业部的代理机构，经常发布报告列出所没收的财产清单。这些报告的措辞似乎表明，登记在案的财产已被土地改革协会没收，随后交给农业工人工会处理，然而事实却是，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土地改革协会只是登记一下没收的财产。“我可以肯

定地说，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担任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的拉斐尔·莫赖塔·努涅斯写道，“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不是政府。农民不等政府决定就把庄园和可耕种土地直接据为己有了。”例如，据一位敏锐的观察家说，在雷阿尔城省，“绝大多数较大的庄园都被他们没收然后实行集体化，而在整个过程中，[土地改革协会的]任务只是投出一张表示合法的赞成票”。工会看到了将它们没收的财产向土地改革协会登记的好处，因为这往往会使它们的行为合法化，同时还使没收的庄园有资格得到这一政府代理机构的技术和经济援助。

铁路、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和船舶、电灯和电力公司、煤气厂和自来水厂、工程机械和汽车组装厂、矿山和水泥厂、纺织厂和造纸厂、电气设备和化工公司、制瓶厂和香水调制厂、食品加工厂和酿造厂以及大量其他企业被工人委员会没收或控制，实际上，对于企业主来说，两种形式具有差不多同样的意义。例如，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一个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共同建立的联合委员会控制了属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子公司西班牙国家电话公司的电话系统，结果，据对该委员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证实，除了保留一个收支账户之外，没有给资方留下其他任何职权；而且，不经联合委员会同意，资方无权撤资。另一个例子是巴塞罗那牵引、照明及电力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埃布罗河灌溉与电力公司的情况，它也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一个联合委员会控制了。据一份正式报告称，该委员会掌管了公司的设备、银行账户和其他财产，从而使资方无法“对公司的业务和财务状况进行有效的控制”。

电影院和剧院、报纸和印刷厂、百货商店和旅馆、高级餐馆和酒吧也被没收或控制，同样被没收或控制的还有各种商业和行业协会的总部以及成千上万套属于上流社会人士所有的住宅。

但是，如同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些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发生在城镇和农村的经济变化并非仅限于社会富裕阶层的财产。随着政府的垮台，所有障碍都不复存在，因此，对于革命群众来说，这是一个十分诱人的时刻，以致他们无法不按照自己内心的向往去改善整个经济生活。

“在最初那些乐观主义洋溢的日子里，”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几乎所有西班牙人的精神都被某种救世理想激励着。只不过，在民族主义阵营一方，那是他们正在拯救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共和派阵营一方，预言家宣告一种新的文明诞生。多么可怕的夸张啊，轻而易举地激起了西班牙人心中不切实际的幻想！”

## 第五章 革命打击小资产阶级

让成千上万名手工业者、小工厂主和零售商人感到震惊的是，他们的经营场所和设备被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所控制的工会组织没收了，经常还被社会党的劳动者总工会控制下的不那么激进的工会组织所没收。

例如，在马德里，工会不仅接管了鞋匠、木匠和小规模生产者的经营场所和设备，而且将所有美容院和理发店集体化，规定以前的店主只能领取与其雇员同样的报酬。像阿利坎特省的情况一样，在居民超过三十五万人的城市巴伦西亚，几乎所有工厂无论大小都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接管了；而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由于当地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革命头几个月里几乎处于不受任何约束的支配地位，许多城镇实行了非常彻底的集体化，以致集体化的对象不仅包括大型工厂，而且包括微不足道的手工作坊。集体化运动还侵犯了中产阶级的另一块领地。在人口接近一百二十万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主要城市巴塞罗那，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的工人将鸡蛋和鱼类的批发生意集体化，并且成立了一个屠宰场管理委员会，不许有任

何中间环节存在；他们还将主要的水果蔬菜市场集体化，取缔所有从事此类生意的中间商和代理人，但是允许他们作为挣工资的人加入这个集体化之后的实体。巴塞罗那的牛奶生意同样也被集体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不卫生为由关闭了四十多家牛奶消毒厂，剩下九家工厂对全部牛奶进行消毒，同时着手建立自己的零售市场取代所有牛奶经销商。许多零售商加入了这个集体，但是有些人拒绝这样做：“他们要求的工资比付给工人的高得多……他们声称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为他们制定的工资标准。”格拉诺列尔斯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个主要集镇，内战之前经纪人掮客熙来攘往。在那里，中间商全部被取缔或者被逐出流通渠道，没有选择的农民只能经由全国劳工联合会设在当地的代理委员会处置他们的产品。同样的模式出现在整个左派阵营控制区的无数个地方。在大型柑橘工业中心巴伦西亚地区，还开创了工会侵犯私有商业领域的另一个先例，全国劳工联合会成立了一个收购、包装、出口柑橘产品的组织，形成了一个包括二百七十个委员会在内的覆盖广大城镇和乡村的网络，把数百个中间商从这项重要的生意中排挤出去。总之，工会在几乎所有领域侵犯了中产阶级的利益。在无数城镇和乡村，零售商和批发商，旅馆、咖啡馆和酒吧业主，配制眼镜的技师和医生，理发师和面包师，鞋匠和木匠，女装裁缝和男装裁缝，制砖工人和建筑包工头都被无情地卷入了集体化运动，这里仅仅举出了其中的一些实例。

假如有些中产阶级成员在使自己适应新角色——在他们以前的生意或企业中充当工人而非雇主——的同时还默默地希望革命的狂热自生自灭、被没收的财产随后将会物归原主的话，他们很快就失望了；因为，在最初几个星期广泛而缺乏组织的没收之后，一些工会组织开始有计划地对所有行业进行重组，关闭了成百上千家小型工厂，将生产集中于设备优良的企业。“开明一点的小雇工者不难理解，”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主要舆论工具《工人团结报》宣称，“小型工厂的商品生产方式

效率低下。分散经营抑制生产。管理手工小作坊不同于管理采用先进技术的大工厂。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消除资本主义管理制度中的偶然因素和危险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必须采取某种能够保证造福于社会的方式来指导生产。”根据这种观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迅速与劳动者总工会的工人一道，关闭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七十家铸造厂，把它们的设备和人员集中到二十四家工厂里。“在这些工厂里，”一名社会主义工业的代言人宣称，“我们纠正了那些不关心技术问题的小雇主[的铸造厂]的缺点，它们的工厂是结核病的症结之所在。”在巴塞罗那，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木工工会通过关闭数百家小作坊并在几家大工厂里集中生产而对整个木工行业进行了重组，它们在所有木匠铺和木工厂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并且以工人的工资标准把以前的雇主当作技术管理人员使用。在同一个城市，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制革行业实行了同样激进的改革，将七十一家皮革厂减少到四十家；而在玻璃制造业，一百家工厂和货栈被削减为三十家。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巴塞罗那理发店和美容院的重组甚至更加极端；九百零五家店面被关闭，它们的人员和设备集中到了二百一十二家大型理发店和美容院，财产被没收的那些店主所得到的与他们以前的雇员一样的权利和义务。巴伦西亚的男女服装业、金属加工业、木器制造业和皮革制品业，托伦特的糖果业——那里的四十五家小型糖果厂被关闭，然后把生产集中在一个可以容纳数百名工人的新建厂房里，锡切斯的制鞋业，阿尔科伊的金属加工业和纺织业，昆卡的木材业，格拉诺列尔斯的制砖业，比克的制革业，巴塞罗那的面包烘烤业，马德里和卡尔卡亨特的木制家具业，都实施了某种类似的重组，或者称之为社会主义化。这里列举的只是几个实例。“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莱万特和卡斯蒂利亚的所有城镇和乡村，”一位广泛游历了这些地区的观察家写道，“迅速关闭了那些在恶劣的卫生条件下进行生产劳动的经济效益低下的小型工厂。把机器集中在几个车间，有时集中在一个车间。通过这种方式简化管理程序，进而使生产协作更加有效。”

难怪当时那些在这一系列革命事件中首当其冲的小规模生产者和经营者认为自己破产了；因为，即使是在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组织尊重小业主的财产权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清楚，这只不过是内战持续期间的暂时宽容。“一旦这场内战结束并且取得对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一位著名的巴伦西亚无政府主义者警告说，“我们必须禁止任何形式的小型私有资产，然后使之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将加强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使这项工作圆满完成。”的确，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组织声称，“工人的助人为乐和理智行为赢得了许多小商人和小工厂主的好感，他们一点也不反对将其企业社会主义化并且成为与其他人具有同样权利和义务的工人”，但是，只有在最特殊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分子才愿意接受革命性的变化，因此，他们显示出的友好态度并不足以反映其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工人阶级武装了起来，成为局面的实际掌控者，结果，除了顺应事态发展默默地接受失去财产的现实之外，小资产阶级别无选择。

不过，物质上的满足并非小资产阶级的唯一追求。如同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集体化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后来所说的那样：“加泰罗尼亚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总是希望通过小规模的生产经营获得某种程度上的经济独立。小商人、小工厂主或小业主往往比一个训练有素的工人活得更艰难……但是，他们宁愿过一种独立自主的普通生活，也不愿意在受制于人的条件下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店主经常在[工人]集会上发言，”全国劳工联合会商业雇员工会书记胡安·费雷尔回忆说，“他们创业的艰辛经历几乎使所有人潸然泪下——没想到如今眼看着店铺面临集体化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建议与会者让他担任管理方面的负责人，因为无论如何工人委员会都得任命一个人。”



但是，一般来说，工人对小商人和小工厂主几乎并不表示同情。据佩雷斯—巴罗说，三四十年的革命宣传使这些雇主在那些头脑简单的工人看来似乎不是“阶级敌人”而是他们“个人的敌人”，这导致了一系列对雇主的伤害。“我们并不同情他们，尽管直到一年以后革命运动进入衰退期时这一点才显示出来。”

不过，比较激进的工人并不都是凭借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达到他们的目的的。有时他们试图通过说服教育达到目的。巴塞罗那店员工会食品店员分会发出的一份呼吁书写道：“你们这些对社会问题一无所知的小店主即将经历一个发展阶段，它将彻底改变当今的社会结构，使之变得更加公平、更加高尚，经过这种改变，人剥削人的状况将成为历史。

“时至今日你们一直要把全部精力用于经营生意，为了卖掉四棵烂白菜、两公斤大米和三公升食油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个小时，这种低三下四的生存方式必须结束。……本食品店员工会要求你们去马西亚广场十二号夹层，在我们工会的帮助下参加日常学习，在那里，通过与我们的同志的频繁接触，你们就能成功地将自己从迄今为止控制着你们的社会和道德偏见中解放出来。”

但是，中产阶级多年以来对此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多少物质积蓄，他们苦苦挣扎着在与大型企业的竞争中苟延残喘，突然发现独立的希望毁于一旦。如果他们对这场革命有什么期待的话，那也是摆脱竞争并且得到更大份额的社会财富，而不是财产被人没收以及一份工人的工资。甚至还未受到集体化运动的大力冲击，某种深深的不安已在他们当中蔓延，因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企图用迷人的色彩描绘未来以减轻他们的忧虑，不过这是枉费心机。在革命进行的第二个月，《工人团结报》写道：

关于小资产阶级深感忧虑的消息我们已有耳闻。我们的印象是，革命最初那几天的

忧虑已经消散，不过，店主、商人、小工厂主、手工业者和小地主仍然感到心神不安。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没有信心。……

小资产阶级不会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失去任何东西。毫无疑问，他们的利益将成倍增长。例如，大多数店主和小工厂主每天操心的是支付账单、租金和纳税。……

在消灭私有财产和自由商品交易的同时，我们将许多长期在扣押财物、扫地出门的威胁之下生活的店主从噩梦中解救了出来。……

小资产阶级不必担忧。他们肯定更加接近无产阶级。他们可以确信，在废除了私有财产和私人经营之后，将会出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对于那些认为自己可能受到社会变革影响的人，这种生活方式决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小资产阶级应当丢掉他们的忧虑；因为一旦打败了法西斯主义，他们就能更加乐观地面向未来。

## 第六章 农村的革命、自由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如同集体化运动使手工业者、小工厂主和小商人心神不安一样，农村的集体化运动也让小地主、佃户和佃农忧心忡忡。革命最初的几个星期，在对革命之前无地农民打短工——他们出于本能而选择的一种劳作方式——的大庄园几乎毫无例外地实行农业集体化时，集体化运动波及到数以千计的中小农场主。即使是没有立即受到影响的那些人也明白，迅猛发展的集体化运动对他们具有致命的威胁，因为农村集体所有制不仅将使农业工人的劳动力市场不复存在并导致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失去竞争，而且对现有的小地主以及那些在占用土地之后认为这场革命已经完成其任务的佃户和佃农形成某种长期的威胁。

“由于战线的不断推移，”爱德华·E·马莱法基斯写道，“而且由于被没收的土地只是在土地改革协会[IRA]以追溯的方式使没收土地合法化之后才逐渐成为政府统计资料的内容，因此无法确切查明，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工会组织究竟没收了多少土地。……通过尽力综合平衡现有证据，我得出的结论是，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被没收，而且（因为集体化主要实行于可耕种土地）没收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说来令人感到残酷，没收土地行为的受害者主要是那些中小地主，由于大庄园所处的大部分地区在内战爆发之后几乎立即被民族主义分子所控制，因而它们并没有包括在土地改革协会的报道中。”

例如，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哈恩省，内战爆发前社会党人构成了那里的劳动力主体，中小地主则拥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土地，结果，集体化农业不仅以损害大庄园主的利益为手段，而且以损害中小地主的利益为手段，很快使自己成为具有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对革命的恐惧使大地主都逃走了。”加里多·冈萨雷斯在他那部研究哈恩省集体农庄运动的著作中写道，“另一方面，如果担心受到曾因工资和劳动条件等问题与其发生过冲突的短工的报复，中小地主则尽量在一段时间里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实际情况是，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权力掌握在武装民兵的手中。”加里多继续写道，社会党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共产党人认定，“伟大的时刻已经来临，大规模占有土地并且集体耕种这些土地代表了他们期待已久的革命。”

当私人农场主惊恐地看着农业集体化迅速蔓延开来时，加入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社会党人的劳动者总工会的农场工人则将其视为新时代的开始。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是西班牙的传统革命者和农业集体化的主要推动者，他们认为集体化是西班牙革命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是他们的首要目标之一，并以极大的魅力控制着他们的思想。他们不仅相信集体化将会通过引进农业科学和机械设备改善农民

的生活状况，不仅相信集体化将使农民免遭大自然的危害以及中间人和放高利贷者的不公平对待，而且相信集体化将提高农民的道德水准。“认识到集体化优越性的或是具有明确革命意识的农民，还有那些已经开始采用[集体化耕作方式]的农民，应当努力通过一切令人信服的手段敦促落后者。”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组织具有极大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土地与自由》写道，“我们不能允许个人占有小片土地.....因为私有土地总是产生精于算计和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心态，那是我们希望永远根除的东西。我们需要在物质和精神上重建西班牙。我们将要进行的既是一场经济革命，又是一场道德革命。”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另一份出版物写道，集体劳动消除仇恨、忌妒和利己主义，而且开创了“相互尊重和团结”的社会风气，“因为一起过着集体生活的人们像一个大家庭的成员那样彼此相待”。

集体化同时也是提高农民知识水平的一种手段。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主要理论家和活动家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认为：“个体农业的最大弊病是过量的劳动，这使所有身体健全的家庭成员——父亲、母亲、孩子——终日忙碌。.....没有固定的劳动时间，体力消耗没完没了。.....农民不应当使自己或者孩子作出如此过分的牺牲。至关重要的是，农民应该腾出时间和精力让自己和家人接受教育，因此，集体化之光可以照亮农村的生活。

“在集体农庄劳动比较轻松，这使集体农庄庄员有可能通过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充实自己的头脑，为他们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条件。”

社会党人的劳动者总工会持有类似的观点，但是，提倡集体农业并且反对分解大庄园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担心拥有小片土地的农民有朝一日可能成为革命未来发展的障碍，甚至成为某种威胁。劳动者总工会所属的实力强大的全国农业工人

联合会某地方分会书记说：“集体化是取得进步的唯一手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甚至不必考虑分配土地。各地的土质并不一样，有些收成……比另一些好。如果我们打算分配土地，就有可能重新陷入过去的困境，当幸运的农民丰衣足食时，一些辛勤劳动的农民却食不果腹，于是，我们将会再次看到主仆之分。”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执委会宣称：“我们绝不会允许分配土地、农具和牲畜，我们之所以对没收来的全部土地实行集体化，目的就是为了给农民家庭平均分配劳动任务，然后平均分享劳动果实。”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青年运动通过它的喉舌宣称：“我们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从一开始就认为，个体农业将直接导致出现巨富，导致对政要的控制，导致人剥削人，并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重新建立。

“全国劳工联合会不希望出现这一类情况，因而掀起了工业和农业的集体化运动。”

他们担心，如果鼓励个体农业，一个新的拥有土地的富裕阶层最终将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崛起。这种担忧无疑是那些集体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决心要把顽固的小自耕农——无论自愿还是强迫——纳入集体所有制的部分原因。当然，在一定的限度内，全国劳工联合会以及稍微温和一点的劳动者总工会官方执行的的确是一种尊重共和派小农场主财产的政策。“我认为，自愿加入的庄员是集体农庄最根本的基础。”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总书记里卡多·萨瓦尔萨说，“相对于由毫无积极性的农民——他们可能进行破坏直到把集体农庄搞垮为止——被迫组成的大型集体农庄来说，我更喜欢由一群勤奋可靠的劳动者所组成的充满热情的小型集体农庄。自愿实行的集体化过程也许显得更长，但是，管理有方的小型集体农庄作为榜样将会引起所有农民的关注。农民极其现实和功利，强制推行集体化则有

可能因其使集体农业丧失信誉而失败。”然而，因为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均不允许共和派小农场主拥有的土地超出其不雇短工所能耕种的限度，同时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必须按照当地委员会规定的条件将富余的粮食交给后者而不得自由进行处理，所以，如同本章稍后将要描述的那样，他们经常在各种形式的压力驱使下加入集体所有制。尤其是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处于优势的那些村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社会党人所领导的劳动者总工会会员中包括人数可观的小地主和佃农，他们几乎或者根本没有农业集体化的倾向，只是因为劳动者总工会能够保护他们不受地方官员、大地主、放高利贷者和经纪人的侵害才加入了这个组织。与劳动者总工会的情况不同，当内战爆发时，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雇农工会几乎完全是由受无政府主义哲学所激励的农业工人和贫困农民组成的。在这些革命积极分子看来，农业集体化是他们期待在革命之后立即建立的无政府主义或所谓自由共产主义新制度的基石。自由共产主义应该是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式的社会制度，“它将尝试在不设政府、不采取政治手段的情况下，按照众所周知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解决经济问题”，是一种以工会和自治社区为基础的没有等级的社会制度，工会和自治社区将联合组成一个全国性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大家共同拥有生产和分配的手段。

“自由共产主义是没有政府和私有财产的社会形态。”著名的无政府主义作家伊萨克·普恩特写道，“由于这个原因，不必发明任何东西或者创造任何新的组织形式。我们未来的经济生活将要围绕其运转的核心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社会：工会和自由社区——工会，工厂和集体农庄的工人自发地聚集于其中；而自由社区则是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集体形式，乡村的人们同样自发地聚集在里面，它为农村地区的所有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这两个按照民主和联邦原则行事的集体……作出的决定将是至高无上的，它们不被

任何更高的机构所控制。它们唯一的职责应当是，组成将集体拥有一切私有财产并将在每个地区掌控生产和消费的产业联盟。”

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大多数成员都把自由共产主义当做政治运动的最终目标，仍有少数“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对雇佣劳动的同时认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不应局限于某种特定的生产体制。“无政府主义社会必须由无数不同的体制所组成，从而使个人摆脱一切桎梏。”西班牙自由主义的一位重要人物写道，“对于各种各样的人性来说……它应当像一个实验场。”

尽管没有看到关于建立自由共产主义制度的硬性规定，但在所有地方这一过程几乎都是一样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实行新制度的每个地区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不仅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而且行使执法权。它首先采取的行动包括禁止私人贸易，把肥沃的土地集体化，贫瘠的土地往往也被集体化，同时集体化的还有农场的房屋、机械、牲畜和运输工具。除了极个别情况之外，理发师、面包师、木匠、鞋匠、医生、牙科医师、教师、铁匠和裁缝也被纳入集体所有制。库存的食物、服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被集中到由地方委员会所控制的公共仓库里，没有被烧毁的教堂改作仓库、食堂、餐馆、车间、学校、车库或营房使用。在许多居民点，国内流通的货币被废除，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金钱和权力是魔鬼的春药，它们把人变成了狼，变成了疯狂的敌人而不是兄弟。”“在[阿拉贡地区的小城]弗拉加这里，你可以把钞票扔到街上，没有人愿意接受钞票。”发表在某份自由主义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写道，“洛克菲勒，即使你带着全部银行存款来弗拉加，你也买不到一杯咖啡。在这里，金钱——你的上帝和仆人——已经被废除，人民因此而幸福。”在废除了货币的自由主义社区，工资以票证的形式支付，工资的级别由家庭的规模来决定。“大多数全国劳工联合会集体的特点是家庭工资。”一位外国观察家写道，“工资根据家庭成员的需要而不是每个工人完

成的工作来支付。”诸如面包、葡萄酒和橄榄油之类地产商品如若充足则自由分配，同时可以凭票证到公共仓库领取其他商品。多余的商品被用来与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其他城镇和乡村进行交换；货币只在与没有实行新制度的社区交易时使用。

尽管本书无法为读者提供一幅关于自由主义者控制区城镇和乡村生活的完整画面，不过，下面这段描述也许可以给人留下充分的印象：

在阿尔科拉村，据一名见证人说，货币不再流通。每个人都能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从哪儿得到？从委员会。当然，无论如何不可能通过单独一个分配中心供应五千人的生活所需。因此，像以前一样，那里有商店，人们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不过，这些只是分配中心。它们属于整个村庄，以前的店主不再赢利。付账使用的不是钞票而是票证。甚至理发师理发也收委员会发给的票证。只是部分实现了每个居民应当按其所需得到商品的原则，因为它是以假定每个人的需要都一样为前提的。

.....

每个家庭和每个独自生活的人领到一张卡片。每天要在工作的地方给这张卡片打孔；[因为]票证是根据这些卡片发放的，所以没有人可以逃避劳动。然而，这种制度的重大缺陷是，由于没有任何其他衡量价值的手段，为了评定已经完成的劳动价值，不得不再次求助于货币。每个人——工人、商人、医生——工作一天得到价值五比塞塔的票证。部分票证盖有“面包”的印戳，每张面包票可以购买一公斤面包；另一些票证代表一定数额的钱。不过，不能认为这些票证是钞票，因为它们只能交换生活资料，而且这有一定的限度。即使这些票证的数额较大，人们也不可能用它获得生产资料成为一个资本家，哪怕是以最低的标准，因为它们只能用来购买生活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归集体共有。

这个集体以委员会为代表。.....阿尔科拉村的所有货币都掌握在它的手中，大约有十



万比塞塔。除了购买无法通过交换获得的商品，委员会还用集体的产品交换集体缺乏的商品。不过，货币只是作为一种临时代用品被保留下来，在别的地方仍未效仿阿尔科拉村的时候，保留货币有充分的理由。

委员会是这个集体的家长。它拥有一切，管理一切，关注一切。每一项特殊的要求必须提交它审议，只有它最后说了算。

也许有人表示反对，认为委员会的成员有成为官僚甚至独裁者的危险。村民并非没有注意到这种可能性。他们认为，每隔一段不长的时间委员会成员应当更换，以使每个村民能在其中任职一定的时间。

所有这些为它增添了某种天真的成分。过于严厉地指责它并且认为其中具有更大的意义都将会是错误的，这只不过是部分农民为了建立自由共产主义所进行的一种尝试。最重要的是，人们不应忘记，农业工人，甚至还有居住在这种地方的小商人，生活水平至今仍然非常低。……革命以前吃块肉都是奢侈的，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的需求超出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

在与阿尔科拉村的一些农民进行的一次谈话中，这位敏锐的观察家继续提供了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可以被看作自由主义者控制下的每一个乡村委员会对村民生活所实行的精细控制的典型实例：

“例如，如果有人想进城怎么办？”

“这很简单。他去委员会把他的票证换成钱。”

“那么，他可以想换多少就换多少吗？”

“不是，当然不是。”

这些善良的人对我不能理解他们的意思相当吃惊。

“他什么时候能拿到钱，当时就能拿到吗？”

“每次他需要的时候。只是他得问委员会。”

“那么，委员会审查他的理由吗？”

“当然审查。”

我有点担心。在我看来，这种管理肯定将使人们在自由共产主义制度下几乎没有什么自由，于是，我试图弄清阿尔科拉村的委员会根据什么允许人们去旅行。……

“如果某人在村子外面有个女友，他能得到钱去看她吗？”

农民向我保证他能。

“每次他想去时都能吗？”

“天哪，只要他想，每天晚上他都能从阿尔科拉去看他的女友。”

“但是，如果有人想进城去看电影，他也可以得到钱吗？”

“是的。”

“每次他想去都可以吗？”

农民开始怀疑我的判断力。

“节假日当然可以，不过，干坏事可拿不到钱。”

关于自由主义者控制的卡斯特罗村，见证人弗朗茨·博克瑙写道：

无政府主义社会制度在卡斯特罗的显著特点是废除了货币。交易受到禁止；生产几乎没有变化。……委员会接管了庄园并进行管理。庄园甚至没有被合并，而是各自由其以前雇用的工人分别耕种。当然，货币工资已被禁止。要说取而代之的是实物支付也不对。不管什么形式的工资都没有；村民们直接从村子的仓库领取食品。

在这种制度下，村子提供的是少得可怜的基本口粮；我要冒昧地说，可能比以前的口粮还要少，哪怕是与安达卢西亚短工[农业工人]惯常生活的那种悲惨状况相比。所幸这个村子像许多其他同类村庄一样，不仅种植了油橄榄，而且种植了小麦；因此，至少人们有面包吃。此外，村子拥有与庄园一起没收的不少羊群，因此人们也有肉吃。他们还有一个香烟铺。这就是全部。我试图找点喝的东西，咖啡、葡萄酒或柠檬汁，但白费功夫。村里的酒吧已被当做邪恶的生意停业关门。我去商店看了看，那里的生意非常惨淡，以致估计快要倒闭。然而，村民们似乎因这种状况感到自豪。他们告诉我，不喝咖啡让他们高兴；他们似乎把禁止这种无用的事情当做一种道德进步。对于外面的商品他们需要的非常少，主要是服装，他们希望用他们富余的油橄榄直接交换。……他们对上层社会的敌意在经济方面远远不如道德方面。他们不想过他们没收了其财产的那些人的富裕生活，而是要杜绝后者那种奢侈享受，在他们看来，奢侈享受堕落之极。他们认为，即将诞生的新制度完全是禁欲主义的。

清教主义是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个特点。据研究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权威乔治·埃森魏因说，清教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的几个组成部分之一，从一八六八年该运动兴起直到西班牙内战时期都可以找到它的踪迹。因承认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在道德方面截然对立而产生的这一倾向特别提倡一种不受物质至上主义价值观念约束的

生活方式。因此，过度饮酒、抽烟以及其他被视为中产阶级特征的生活习惯几乎总是受到谴责”。例如，在自由主义者控制的马格达莱娜 - 德普尔皮斯村，人们把禁烟禁酒当做一场胜利来庆祝。在阿苏亚拉村，集体主义者查封了咖啡馆，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一个“轻浮的场所”。“无政府主义者不应当抽烟。”无政府主义刊物《白色评论》曾经写道，“无政府主义者绝不应做任何损害自己健康的事情，尤其是这种事情还要花钱时。”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应当光顾妓院：“经常出入妓院的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不比其他人优秀的话，他就不能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买春的男人使自己堕落到卖春女人那种地步。因此，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不能购买爱情。他应无愧于爱情。”

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相信自由性爱或“自由结合”，所以有时需要与其他村民妥协。内战期间曾经访问过马格达莱娜 - 德普尔皮斯村的著名法国无政府主义作家和活动家加斯东·勒瓦尔证明：

我询问了结婚的情况。我们的同志当然相信自由结合，但是，结婚是这个平静的村庄不会忽视的一件事情。另一方面，按照正式的礼仪结婚就将违背人们的原则。因此，有必要找到一种结婚方式，使人们不按正式的礼仪也能合法成婚。这种方式的程序是：

自从革命开始以来，已经有四对新人结了婚。他们由家人和朋友陪伴着，来到委员会的秘书面前。他们的姓名、年龄和结婚请求被记录在一个登记簿上。风俗受到尊重，婚礼保证举行。同时，为了尊重自由主义的原则，当新婚夫妇走下楼梯时，委员会秘书把写着所有这些内容的纸抽出来撕成碎片，然后，在他们从阳台下面经过时，把这些碎片像彩色纸屑一样洒向他们。所有人都表示满意。

我解释说，即使除了进行社会研究之外没有别的什么理由，也有必要保留关于这些

婚姻、出生和死亡的记忆，只有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可能不屑于这样做。他们理解我的想法，并且答应复原那个登记簿。

在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格劳斯村，据一位社会党人判断，生活水平比内战之前有所提高。“土地、磨坊、牲畜、商店、运输工具、手工作坊、制鞋业、家禽养殖业和自由职业全被纳入集体所有制。村庄是一个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经济集体。所有的人都有工作。所有的人都幸福地生活。苦难和奴役已被消灭。……一个大功率的汽笛管理着村子里的生活：劳动、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六十岁以上的人被免除了劳动的义务。……这是集体的基本原则之一。……当集体中的某个成员决定结婚时，他得到收入不变的一周假期，同时提供给他一幢配有家具的房子——房产也被集体化了……他将逐步偿还房款，没有利息。集体为他提供一切服务。从出生到死亡，他始终受到集体的保护。”

关于门布里利亚村，一份无政府主义者的记述写道：

七月二十二日，大地主的财产被没收，小片地产进行了清算，全部土地归公社所有。小地主理解这些措施，这些措施使他们摆脱了债务和支付工资的烦恼。

地方金库空空如也。在私人财产中发现了共计三万比塞塔，于是将其全部没收。食物、衣服、工具等所有东西在村民当中平均分配。货币被废除，劳动集体化，财产被公社接管，生活资料免费分配。然而，这不是富裕的社会主义化，而是贫穷的社会主义化。……

不再有任何零售业。自由共产主义盛行。杂货店由以前的店主经营，它的账目则被公社控制着。……

每人每周分到三升葡萄酒。租房、水电和看病是免费的。如有必要，公社以外的专

家会诊由委员会付钱。当一名妇女请求准许她去雷阿尔城找专科医生看胃病时，我就坐在离委员会秘书不远的地方。没有官僚主义的拖拖拉拉，她马上得到了此行的费用。

在自由主义者控制的辛卡河畔的阿尔瓦拉特村，委员会的效率低得多，发钱或者拒发的权力使它具有专制的地位。“一名妇女想去莱里达看专科医生，”在巴塞罗那指导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外国情报部门工作的著名外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阿古斯丁·索奇写道：

她早晨七点来到委员会的办公室。……委员会成员与劳动小组一起在地里干活儿，他们在劳动之余处理村子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组织的事务。

“要想得到外出的钱，你首先必须提供一份医生证明，”委员会主席解释说。

这一回答令那位老年妇女不满。她诉说风湿病之苦，试图劝诱委员会在没有医生证明的情况下发给她钱，但没有成功。

“有些人利用集体提供的新的可能。”委员会主席说，“许多人以前从不进城。……如今他们没钱也能外出旅行，他们小病大治夸大其词！”

主席的解释也许失之偏颇。医生可以对这个问题发表更为客观的意见。

多年以后弗雷泽与这些集体中的部分幸存者进行了交谈，在他那部口述史中，弗雷泽发表了下面这一段中肯的评论：“随着货币的废除，集体占据了有利的地位，因为任何想要外出的人都必须从委员会那里弄到‘共和国的’货币。这意味着需要证明出行具有正当的理由。……在马斯—德拉斯马萨斯，集体以送人去巴塞罗那看专科医生为自豪。……但是，据一位右翼人士说，对于一个没有工会会员证的人来说，如

果他要离开村子，即使只是短时间外出，他也必须得到一张通行证。……在阿略萨，身体有病被认为是一个正当的理由，于是，小学校长的岳父外出去做疝气手术，他利用这个机会一去不回。……集体与集体之间的情况明显不同，因此，像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接着，在后面的一段内容里，弗雷泽写道：“这场实验的乌托邦成分使得问题复杂化，主要是因为废除了货币。一些委员会的独断专行表明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局限性，这只能通过选出向村民大会负责的可以罢免的代表来克服。因此，作为一种形式的战时共产主义，集体化深受某些严重缺陷之害。”

在描述他所访问过的自由主义村庄生活的其他方面时，阿古斯丁·索奇谈到了卡拉塞特村：

过去这里有许多小自耕农……还有许多铁匠和木匠，他们都有自己的小作坊，他们在那里以某种原始的方式从事手工劳动。集体主义理想使他们看到了通往劳动共同体的道路。现在有一个大铁匠铺，十名铁匠在里面干活儿；他们拥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整洁明亮的生产车间。村子里的所有木匠都在一个大木工场里干活儿。……

强壮的[农业]工人被分成二十四组劳动小组，每个小组二十个人。按照预先制订的规则，他们共同耕种村里的土地。以前每个人为自己干活儿，现在他们为集体劳动。……

村子里有两个杂货店和一名医生。他们属于这个集体，不是因为他们被迫，而是因为他们自愿。问题出在面包师身上。他们既不想加入这个集体，也不想在新的条件下工作，因此他们离开了村子。新的面包师还没有招来。找到了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仍然由女人烤面包，但是村里需要招进新的面包师。

这曾经是个贫困的村庄，如今村民生活幸福。许多人过去经常挨饿，现在他们可以吃饱了。

一份关于特鲁埃尔省巴尔德罗夫雷斯地区的报告写道：“集体化仍然受到右派敌人和左派对手反对。如果向那些被没收了财产的长年游手好闲者询问他们对集体化的看法，一些人可能会回答，那是抢劫；另一些人则会说，那是一种专制。但是，对于上年纪的人、打短工的人、佃农以及总是被大地主和残酷无情的放高利贷者所控制的小地主来说，集体化的出现就像是一场拯救。”

关于卡兰达村，索奇写道：

曾经作为教堂的地方现在是个食品仓库。……新的肉类市场设在一幢附属建筑里，村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卫生讲究的市场。买肉不是用钱。女人们用票证换来肉，不付出任何东西，也不提供任何服务。它们属于集体而且食品供应充足。……

集体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友好相处。村里有两个咖啡馆，一个供个人主义者使用，另一个供集体主义者使用。他们每天晚上可以享受一下喝咖啡的奢侈。……

极好地体现了集体主义精神的是公共理发店，那里的服务是免费的。农民过去从不刮脸。如今几乎每张面孔都经过了精心修剪。每人一周可以修两次面。……

一星期供应五升葡萄酒。食物从来不缺乏。……

所有东西都集体化了，除了那些店主希望保持独立的小商店。附带卖药的杂货店属于集体，医生同样属于集体，他看病不收钱。像集体的其他成员一样，他由集体供养。

关于马埃利亚村，刊登在《土地与自由》上的一篇文章写道：“货币不复存在了。



.....在这个村子里，医生和教师都不收钱。他们完全无私地放弃了荒谬的特权。没有任何人收取报酬。”

在穆涅萨村，面包、肉类和食油免费分配，但是，与自由主义倾向最严重的村庄不同，部分货币还在流通。“每个男工一天得到一个比塞塔，”索奇说明，“女工和女孩得到七毛钱，十岁以下的儿童五毛钱。这些钱不应被看作是工资。它与基本生活必需品一起分配，以使人们可以购买需要补充的商品。”

反对宗教以及反教权主义的情绪深深植根于西班牙工人阶级运动中，在无政府主义者当中尤其深入人心。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现代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先驱社会主义民主联盟一直要求“废除迷信，用科学取代宗教信仰，用人类正义取代神圣正义”。此外，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西班牙自由主义者的绝大部分理论源于他——曾经宣称：“上帝的存在与幸福、尊严、智慧、道德是非感以及人类的自由水火不相容，因为，如果有个上帝存在，我们的智慧，无论多么伟大，我们的意志，无论多么坚强，与神的智慧和意志相比，都一钱不值。”他在《上帝与国家》中断言，人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摆脱他们的命运：两种是在想象中，一种是在现实里。“前两种是小酒馆和教堂，肉体的堕落和精神的堕落；第三种是社会革命。”自从巴枯宁和社会主义民主联盟时代以来，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对宗教的态度没有改变。“只要人还在上帝面前下跪并且恭顺地臣服于国家，”内战爆发之前不久发表在《土地与自由》上的一篇文章写道，“人类就不会进入一个公平的新世界。”接着，在革命初期，自由主义者在马德里的主要舆论工具《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发表社论宣称：“必须毫不留情地消灭天主教。我们不要求摧毁每一座教堂，但是我们要求任何教堂不应残留宗教的痕迹，不应允许狂迷的黑蜘蛛编织布满灰尘的黏性丝网，迄今为止我们的道德和物质价值观像苍蝇一样被这张大网束缚着。在西班牙，比其他任何国家更明显，在每一次倒行逆施中，在每一次反人

民的行动中，在每一次对自由的攻击中，天主教会总是充当主力军。”

“[在马萨莱昂村]天主教神秘主义已不复存在。”索奇肯定地说，“神职人员不见了，基督教会停止了活动。但是，农民不想毁掉建在山顶上的那座哥特式的雄伟建筑。他们将其改成咖啡馆和气象台。……他们扩大了教堂的窗户，并把曾为圣餐台的地方建成一个宽敞的阳台。放眼望去，阿拉贡群山南坡的景色尽收眼底。这是一个让人平静和思考的地方。星期天村民坐在这里，喝着咖啡享受夜晚的宁静。”

在反佛朗哥阵营所控制的几乎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些充满热情的积极分子，乡村集体化运动的初步进展，不论是以几乎无所不包的自由共产主义形式，还是以范围有限的集体化农业形式，都使他们精神振奋，他们以旺盛的精力继续推动集体化运动向前发展。对于其目标的正义和伟大，他们具有某种使徒般的信念，因此决心在他们能够做到的任何地方毫不拖延地立即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处在革命形势发展最快的时期，”一名狂热的自由主义者宣称，“所以我们必须砸碎一切束缚我们的枷锁。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我们何时才能砸碎它们？

“我们必须进行一场全面的革命。没收财产也必须是彻底的。现在不是高枕安卧而是开始重建的时候。当我们的同志从前线归来，看到我们无所事事他们会说什么呢？如果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不能开创他们的自由，国家将会卷土重来并且恢复政府的权力，逐渐毁掉以无数牺牲和英雄行为为代价而取得的革命成果。

“为了使西班牙无产阶级的鲜血不至于白流，后方应当积极行动。……我们必须进行我们的革命，我们自己特殊的革命，没收，没收，没收大地主的财产，同时没收阻挠我们实现目标的那些人的财产。”

在一次阿拉贡地区集体农庄代表大会上，一名代表宣称，将以最大的强度推行集体

化，以避免出现某些村庄只是部分实现集体化的情况。这一声明例证了集体化农业成千上万热情支持者的心情，他们并不担心集体化将使拥有土地的农民和佃农产生疏离感，因为对于后者来说，个人耕种至高无上。他们大权在握，对于工会领导人反复发出的警告——例如，工会领导人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雇农工会代表大会期间发出警告，“大规模推行集体化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将与农民对于土地的热爱和感情发生冲突，他们以非常巨大的代价才获得了土地”——毫不在意。

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出版物列举了许多拥有土地的农民和佃农自愿加入集体所有制的事例，但是毫无疑问，数量肯定多得多的农民坚决抵制集体所有制，或者只是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才接受它。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偶尔也会承认小地主和佃农对农业集体化的反感，虽然他们不时声称已经消除了这种反感。“我们最常面对的问题是大多数小地主的犹疑心态。”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协会总书记说，“拥有土地的农民习惯了他的的小片土地、他的小毛驴、他的肮脏棚屋、他的微薄收成，他对这点有限财产的感情超过了对儿子、妻子、母亲的感情，可他不得不放弃自古以来他所背负的这一重担并且说：‘把它们拿去吧，同志们。我这些微不足道的财产属于大家。我们都是平等的。对于我们来说，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试想一下，这意味着什么。然而，这正是我们成功地说服卡斯蒂利亚的农民去做的事。当农村的一个孩子死去时，人们再也听不见曾经非常普遍的那句凄惨的谚语：‘小天使上天堂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经常在他的骡子或驴死去时大发雷霆，而在失去子女时却相当平静。孩子的死往往解决了他的经济问题。”即使是在阿拉贡地区——那里负债累累的农民深受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思想影响，这一因素为集体农业提供了强大的自发推动力——自由主义者有时自己也承认他们在对土地实行集体化时所遇到的

困难。“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与莱塞拉村有关的一名自由主义者说，“更确切地说，这仍然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我们想让人们通过亲身体验认识到我们的想法的正确性和优越性。”

尽管阿拉贡地区的农业集体化涵盖了左派控制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而且该地区的四百五十个集体农庄中有许多基本上是自愿组成的，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应当归因于邻近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民兵的到来，否则情况不可能这样。因为，在巴塞罗那挫败了军事叛乱之后，民兵开往阿拉贡地区不仅是去与叛军或者民族主义者的军队作战，而且是去推广革命，绝大多数民兵都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成员。“我们正在打仗，同时还要发动革命。”身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武装阿拉贡前线指挥官的著名自由主义运动活动家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宣称，“后方那些革命措施不仅要在巴塞罗那实行；我们要把它们从那里一直推行到前线。我们攻占的每一个村庄都将开始沿着革命路线向前发展。”“我们民兵必须唤醒因政治专制而心灵麻木的那些人。”在一份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法莱特村民的文章写道，“我们必须引导他们走上真正的生活之路，为了做到这一点，只在村里转一圈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继续转变这些头脑简单的村民的思想。”关于布哈拉洛斯村，发表在一份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上的另一篇文章写道：“变化是彻底的。导致变化发生的主动权掌握在农民手中，这一点在几天之后杜鲁蒂所指挥的加泰罗尼亚志愿军第一纵队到达时得到了证实，部队经过村庄向萨拉戈萨挺进，给革命气氛带来一种新的激情。”

作为后果之一，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武装占领区的那些村庄里，有地农民和佃农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因为，尽管通常召开村民大会决定是否建立集体所有制，但是，表决总是采取鼓掌通过的方式，而且武装民

兵的存在绝不可能不使反对者感到畏惧。即使拥有土地的农民和佃农没有被强迫加入集体所有制，对于这些不顺从的农民来说，生活也会变得困难起来；不仅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许他们雇用短工，不许他们自行处理自己的粮食，而且经常不许他们享受集体农庄成员所享受的一切福利。实际上这意味着，在实行自由共产主义的村子里，不许他们去集体理发店理发，不许他们使用集体面包房的烤箱，不许他们使用集体农庄的运输工具和农业机械，或者不能得到公共仓库和集体商店供应的食品。此外，那些认为由于地主或其管家遭到处决或是逃走而不用交地租的佃农往往被迫向村委会交租。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形成某种强大的压力，几乎就像被步枪的枪托顶着一样，最终迫使许多村庄的小地主和佃农将他们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交给了集体农庄。如同索奇指出的那样：“小地主出于理想主义的原因交出财产的事例很少，尽管不是完全没有。在某些情况下，担心被强行没收是他们把土地交给集体农庄的原因。不过几乎总是出于经济原因。”

“受到孤立而且只能听天由命，小地主们前途无望。他们既没有运输工具也没有农业机械。另一方面，集体农庄拥有他们根本无力负担的农用设施。不是所有小地主全都立即意识到这一点。过了一段时间，经过亲身体验，在集体农庄所提供的有利条件使他们信服之后，许多人加入了集体农庄。”

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据法国无政府主义作家加斯东·勒瓦尔说，小地主得到更好的地块以交换其被集体化了的土地。谈到巴伦西亚省的卡尔卡亨特，勒瓦尔宣称：“大地主逃走之后，在不必诉诸武力的情况下……耕地整个进行了调整。向那些其土地位于集体耕地范围之内并且坚决要求保留私有土地的农民提供了比其原有土地更好的地块，同时他们还得到帮助，以使他们在不剥削别人的条件下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不过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实际情况是，在有机会自主作出决定之前，许多小地主和佃农被迫加入了集体农庄。尽管自由主义运动往往竭力淡化甚至根本否认推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强制因素，但是，有时也会坦率地承认强制因素确实存在。“在革命刚刚开始的那几个星期，”著名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伊希尼奥·诺哈·鲁伊斯写道，“集体化的坚定支持者按照他们的革命主张行动。他们既不尊重财产也不尊重人。在一些村庄，对于少数农民来说，只有将其强加于人，集体化才有可能被接受。这种情况每次革命必然出现。……集体化当然是好制度，并且已经在许多地方产生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但是，看到因为部分集体化推行者不够策略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引起人们对集体化的反感实在让人感到痛心。”

加泰罗尼亚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那里的农民大部分是小地主和被称为农夫的土地承租人，对于这个地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主要报纸《工人团结报》评论道：“出现了一些滥用手段的情况，我们认为这适得其反。我们知道，某些不负责任的行为让普通农民感到害怕，迄今为止人们已经注意到，在平时的劳动中，他们表现出某种冷漠。”几天之后论及同一个地区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胡安·佩罗问道：

有人相信……可以通过暴力行为在我国农民心中唤起对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兴趣或者要求吗？也许有人相信用这种方式进行恐吓能使革命精神在大小城镇传播流行？

这种行为正在产生的严重危害使我不得不把话说清楚。在占领了他们各自的城镇之后，许多来自加泰罗尼亚不同地区的革命者……试图占领农村，征服农民。他们打算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呢，通过告诉农民摆脱世代所受到的社会剥削的时刻已经来临？不是！他们打算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通过把革命的精神和道德标准带往农村灌输到农民的观念中？也不是，他们不做这些事情。他们进入农村时随身携带的是

革命的火把，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剥夺农民的一切自卫手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抢走了农民的汗衫。

如果今天你居然还去加泰罗尼亚的各个地区对农民大谈革命，农民将会告诉你，他们不相信你，农民将会告诉你，革命旗手已经从农村路过了。为了解放农民？为了帮助农民解放自己？不，他们路过农村为的是抢劫年复一年、世世代代遭受刚刚被革命打败的那些人抢劫的农民。

当然，强迫任何人加入集体所有制都与无政府主义精神背道而驰，无论通过什么手段。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埃里科·马拉泰斯塔的文章对西班牙自由主义运动具有某种重要的影响，他曾经说过：“人们可能更喜欢共产主义，也可能更喜欢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或者其他任何能够想象出来的社会制度，而且可以通过宣传和示范为其思想的胜利而奋斗，但是，必须当心人们断言自己喜欢的社会制度是有益于所有人的唯一一种绝对正确的社会制度，在任何时代均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除了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说服之外，应当采取其他手段去争取胜利。缺乏这种警惕性，灾难将会不可避免。”他还曾经写道：“革命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必须消灭政府和特权阶层的暴力；而自由社会只有通过自由发展才能形成。在这一自由发展的过程中，只要人类仍然渴望控制和特权，它就始终存在着危险，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必须进行监督。”但是，为了做到切实有效，即使这种监督也意味着武装力量的存在，那是权力和强制的组成部分。的确，在这些文章写成之后发生的第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革命——西班牙革命——中，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建立了保卫集体所有制的武装力量，而且利用它来推行集体所有制。某些无政府主义领导人不喜欢这些武装人员的事实只是突显了教条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在理论上，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所鼓吹的国家专政。对西班牙自由主义

运动影响深远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在批驳无产阶级专政时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相信这种专政将是临时性的短期行为，他们以此安慰自己。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唯一关心和争取的是，通过教育提高人民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地位，使其达到某种水平，以致一切政府很快就会变得没有必要。……

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是实现人民彻底解放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过渡手段；无政府或自由状态是目的，国家或者专政是手段。因此，为了解放劳苦大众，首先必须控制他们。……

他们断言，只有这种专政——肯定是他们自己的专政——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愿。不过，我们的回答是：除了使自己长期存在之外，专政不可能有其他目的，因此，它不可能在反对奴役的人民当中产生和发展。自由只能通过自由来创造，也就是说，通过人民的反抗和劳动群众自下而上自发地团结起来来创造。

一九二〇年，列宁在给无产阶级专政下定义并且为其辩护时写道：“专政的科学概念恰恰就是直接以武力为基础的无限权力，不受任何条件限制，不受任何法律法规约束。仅此而已。”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定义，伯特伦·D·沃尔夫曾经发表过以下评论：“这一阐述以其学究式的清晰达到完美，因为，即使是在一个并非革命者统治的独裁国家，建立极权主义政权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消除往往会使权力受到限制的一切约束：宗教的约束，道德的约束，传统的约束，机构的约束，成文或者不成文的宪政的约束，法律的约束，习俗的约束，个人良心的约束，公众舆论的约束——总之，将可能对权力设置障碍、对毁灭改造人的企图形成制约的一切东西全部清除。极权主义政权的整个历史已经证明了列宁作出的‘科学’定义的正确性。”

在西班牙革命期间，即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理论上反对



马克思主义者所鼓吹的国家专政，他们也在许多地区通过治安组织和革命法庭建立了某种形式的地方专政。虽然这还远远没有达到列宁所确定的关于极权主义专政的“科学概念”的那种标准，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不仅以赤裸裸的方式对神职人员和地主、放高利贷者和商人行使了他们的权力，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以赤裸裸的方式对小店主和自耕农行使了他们的权力。

尽管教条与实践之间存在着矛盾——每当与权力的现实碰撞时，这种矛盾总是让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感到头疼——但是，无论出现多少强制和暴力问题，一九三六年七月开始的这场革命仍然以其集体主义运动的普遍自发性和范围广泛性等特点及其道德与精神重建的承诺而不同于任何一场其他革命，对于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自发的运动。“与现代欧洲历史上所出现的其他社会运动不同，”乔治·埃森魏因写道，“这场集体化运动试图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改变导致数百万人民生活痛苦的贫困状态，不仅从物质方面，而且从精神方面。例如，集体农庄最显著的特点是强烈的社会一体化意识：它们制定了福利计划，第一次要求村庄为鳏寡孤独、老弱病残以及其他急需的人提供医疗和赡养。另外还有关于教育的坚定承诺，集体农庄最积极的行动之一是创办学校，特别是在偏僻的村庄，几百年来那里的人民没有享受过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无论我们认为集体化作为西班牙农业问题的解决办法在现代社会多么不切实际或天真幼稚，当时的实践肯定仍然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实验，用研究无政府主义史的主要权威之一乔治·伍德科克话说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声称他们找到了一种可以在自由和平的社会里生活的方法，当我们对此进行最终评价时”，他们的实验“不可忽视”。

在这一阶段必须指出，为了深刻认识内战期间盛行于左派阵营内部的血腥争斗的错

综复杂性，人们首先应当了解这场社会革命的深度和广度，并且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一九三一年的西班牙共和国不是因为佛朗哥将军取得内战的胜利而在一九三九年四月灭亡的，它灭亡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当时爆发的军事叛乱和社会革命使这个政权毁于一旦。

## 第二部 分共产党的崛起

### 第七章 中产阶级的希望

前面几章说明了大部分城乡中产阶级由于革命爆发而产生了近乎绝望的悲观情绪的原因。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在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的话语中找到了某种心理安慰，鉴于已经发生了“广泛的社会革命”，这位共和派法官说：“我们中产阶级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革命者承诺：一旦私有财产和私人贸易成为往事不复存在，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将会来临。但是，这种承诺无法给中产阶级带来慰藉，因为，绝大多数小工厂主、手工业者、零售商人、小地主和佃农不是将改善自己生活的希望寄托于废除私有财产，而是寄托在私有财产的积累上。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需要自由贸易，需要摆脱与如今被工会集体化的大企业的竞争，需要自由生产商品来赢利，需要随心所欲地自由耕种更多的土地，需要不受限制地自由雇用工人。最重要的是，为了维护这些自由，他们需要一个按照他们的想法而建立在他们自己的政党、自己的法庭、自己的军队基础上的政权；在这个政权里，他们的权力不受各种革命委员会的挑战，不被它们所削弱。但是现在，对于这样一个政权的所有希望都落空了，因此，中产阶级别无选择，只能退隐到幕后去。他们过于小心谨慎，以致不得不随波逐流，他们还使自己的衣着打扮与变化的环境相适应。一名保守的共和派人士注意到，“马德里表面看上去让人不相

信自己的眼睛：资产阶级行握拳礼。……男人穿着工装裤和麻绳编织的浅帮鞋，模仿[工人]民兵的装束；女人不戴帽子，衣服过时而破旧；比实际情况更明显的是，低三下四乞求继续活下去的人们全都装扮出一副绝对丑恶的模样”。一名共产党人观察者描写了巴塞罗那的情况：“林荫大道向上延伸，直到一英里外的加泰罗尼亚广场。你从另一端俯视过去，人头攒动，一眼望不到边。如今看不见人群中谁戴帽子、穿领圈、打领带；资产阶级服饰的标志消失了，从平行线大道，沿着医院街和花园别墅街，人们都是无产者的某种随意装束。”“由于街头看不见帽子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巴塞罗那的喉舌《工人团结报》宣称，“革命是属于我们的。”

杰拉尔德·布雷南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马拉加，“我与下电车的彼得·查默斯—米切尔爵士偶然相遇。他身穿一套洁白的毛呢西装，打着蝴蝶领结——除了那些外国领事之外，他是马拉加唯一一个敢于穿着这种象征资产阶级的服装的人”。

除了冒着失去自由、毁掉生活的危险公开反对革命之外，中产阶级无计可施，他们只能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希望形势最终可以改变。他们肯定不能向内战爆发之前代表更保守阶层的右翼党派寻求帮助，因为这些党派已经在革命的烈焰中毁灭。他们也不能转投自由共和派政党，例如左翼共和派、共和联盟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最强大的中产阶级政党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等，因为这些政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不是正在适应激进主义的新形势，就是具有天生怕事的性格特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一度出现的反对变革的意见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演变。”革命开始没几天，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写道，“精神世界与我们相去甚远的人们表现出不同寻常的适应能力，他们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各种事情的新法则。如今在加泰罗尼亚，没有人因为听说工业实行了社会主义化以及私有财产不复存在而大惊小怪”。

另一些共和派领导人认为一切都输掉了，他们不是已经离开了国内，就是正在逃往

各个口岸。甚至就在昨天还是中产阶级自由派宠儿的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也因悲观和恐惧而不知所措，一夜之间从万众欢呼的权力顶峰迅速坠落。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断言，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从最初那一刻就认为内战已经输掉了，早期出现的暴力行为也使他反感厌恶并心灰意冷。的确，许多自由共和派领导人在风平浪静的大海上是能干合格的领航员，然而，在内战之前猛烈冲击共和国的风暴中，他们就显得软弱无力，如今面对摧毁了国家强制机关的飓风，他们更是身不由己。“我们对其他组织的攻击所进行的微弱抵抗、我们面对胆大妄为的得寸进尺所显示的沉默和超然使许多人相信，我们已经不复存在。”左翼共和派领导人萨尔瓦多·克马德斯声称，“他们不可能理解激励着我们的高尚目标使我们压抑着自己的义愤。只要我们不得不用手中的武器建立起来的抵抗敌人发动的凶猛攻击的屏障没有崩溃，别人所缺乏的谨慎和责任感必定使我们的行为与众不同。”但是，当时只有所在党派显而易见的软弱无力给那些在革命洪流中举步维艰的中产阶级自由派和保守派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们马上开始寻找一个组织，可以作为遏制无政府工团主义和社会党工会所掀起的革命浪潮的防洪堤。

他们不必寻找太久。在之前过去的几周里，成功地把他们寻找眼前希望的目光集中在自己身上的组织是共产党。

内战爆发之前，共产党在西班牙政坛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它只有十七个议会席位，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官方估计它有四万名党员，很快，共产党将在反佛朗哥势力的阵营中对事态发展形成决定性的影响。共产党提倡保护城乡中产阶级的利益，在当时那种激情澎湃的革命气氛中，几乎没有共和派人士敢于提出这种主张，于是，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据它自己统计，共产党成了七万六千七百名农村土地拥有者和佃农以及一万五千四百八十五名城镇中产阶级的避难所。“共和国的中产阶级对共产党宣传的温和语气感到意外，共产党内流行的团结务实气氛给他们留下

深刻的印象，”一名社会党人写道，“他们成群结队地大批加入了它的行列。”

毋庸置疑，共产党在中产阶级当中的影响远远超出前面提到的统计数字，因为，成千上万实际上并非共产党追随者的城乡中产阶级人士将自己置于其庇护之下。与共产党所控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一样，从革命刚一爆发开始，共产党就积极维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后者正被卷入集体化运动的漩涡，或者正因私人贸易中断、缺乏经济来源以及工人民兵征用财产而陷入困境。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小商人和小工厂主形成了一个在许多方面与无产阶级具有共同之处的阶层。”马德里的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世界报》断言，“当然，在关于民主共和国的立场上是这样，而且他们像工人一样反对大资本家和强大的法西斯工业巨头。既然如此，尊重这些小商人和小工厂主财产权就是每个人的责任。

“因此，我们坚决主张我党的党员和民兵普遍要求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强迫人们尊重这些中产阶级公民，他们都是工人，所以不应对他们进行骚扰。不应以超出其微薄财力的征用和要求损害他们的正当利益。”

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的喉舌《劳动报》写道：

忽视我们本地的众多商品小生产者和小商人将是不可原谅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想为自己创造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条件，他们已经成功地做起了自己的生意。接着，由于法西斯分子的未遂政变，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完全生活在事变边缘的绝大多数小商品生产者和小商人如今比别人更惶惑，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正在受到危害，而且感到，与挣工资的工人相比，他们处于某种明显不利的境地。他们认为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命运。他们可能成为倾向于支持反动势力的群体，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比本地区正在实行的经济制度更坏的东西。……

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悲惨处境显而易见。他们不能经营自己的作坊和生意，因为他们没有储备金；他们几乎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尤其是那些小工厂主，因为他们必须向所雇用的寥寥可数的工人支付工资，这使他们无法顾及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

必须准许所有那些听从反法西斯民兵征召的人暂缓履行其义务，以使他们不必承担战时征用的全部负担。必须准许缓期支付，同时应当开设赊欠账户，以使他们的生意不致停业。

为了保护这一地区城镇中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人把一万八千名商人、手工业者和小工厂主组织起来，成立了加泰罗尼亚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简称 GEPCI），按照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喉舌《工人团结报》的说法，联合会的一些成员是“强烈敌视工人的顽固的雇主”，其中包括前裁剪同业协会会长古里。

为使读者不致认为共产党人对中产阶级的支持是一种利他主义而非实用主义的行为，不致认为共产党人更关心中产阶级的幸福而不是对加强自身相对于无政府工团主义和社会党对手的实力地位感兴趣，应当提醒读者记住列宁的话，只有“利用一切手段”才有可能克敌制胜，“甚至利用最小的机会争取得到大批盟友，即使这只是一些暂时的、犹豫不定的、反复无常的、不可靠的而且附带了条件的盟友。不明白这一点的人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常识”。

在农村，针对挣工资的农业工人大力推动的集体化，针对工会禁止农民拥有超出自己耕种能力的更多土地的政策，针对革命委员会征用收获的农作物、干涉私人贸易以及向佃户收租的做法，共产党人努力保护中小地主和佃户不受它们的伤害。

另一方面，自由共和派人士——他们主要关心的应该就是共产党正在主张保护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一直保持小心翼翼，甚至到了胆怯的程度。查阅自由共和派的报

纸可以发现与此有关的足够证据。事实上，直到一九三七年四月，它们才敢大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当时，革命的大浪正在退潮。“我们厌倦了保持沉默。”左翼共和派议员米格尔·圣安德烈斯声称，“我们不能容忍对小工厂主、小地主和知识分子的抢劫，不能容忍对所有那些年复一年为了积攒一点钱而劳动的人们的抢劫。……我们曾经眼看着我们的利益被践踏，我们曾经保持沉默。”

共产党人不是这样。从革命刚开始，他们就大声疾呼，不仅呼吁保护小工商业主，而且呼吁保护小地主，他们还千方百计地从农村出现的不满中获益。“军事叛乱初期，”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胡里奥·马特乌在谈到巴伦西亚省的情况时说，“当一系列无以计数、越来越多的委员会试图通过立即将所有小地主转变成为农业工人并且没收他们的土地及其收获的农作物的方式彻底改变整个农村的面貌时，出现了使农民成为反法西斯组织的敌人的现实危险。长期以来深受政治寡头和反动高利贷者压迫的本分的农业生产者再次受到粗暴的对待，这一次是由那些应该帮助他们发展进步的人对他们缺乏了解造成的。把信仰天主教的纯朴农民视为敌人的错误认识促使某些组织做出了诸如向佃户收取地租之类的不义之举，就像以前他们要向地主缴纳一样。……我们经历了真正危险的时刻，差点在后方引发了一场小地主与农业工人之间的内战。幸运的是，这场内战被制止了，但是仍然付出了代价：在为确保尊重小地主的财产权而进行的紧张的政治教育运动中，我们把肺都喊炸了。”

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讲话时，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起担任农业部长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比森特·乌里韦宣称：

粗暴对待农民的现行政策有两个危险。第一个危险是，它可能疏离站在我们反法西斯阵营这一边的那些人。另一个危险更严重：它将危及西班牙未来的粮食供应。……

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当前线的士兵为共同的事业献出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时，在远离前线的后方，有人根据人民拒绝接受的暴力思想使用属于人民的步枪横征暴敛。

但是，我告诉你们，农民；我告诉你们，农村的工人，尽管一些人正在伤害别人，尽管他们正在实施暴行，你们的职责是耕种土地，多打粮食，因为你们受到政府的保护，受到一些政党和组织的保护，因为你们身边还有共产党。……尽管有人使用了暴力，作为爱国者，作为共和国的支持者，作为反对法西斯分子的人，向政府呼吁、向共产党人呼吁是你们的责任，而且你们可以确信，为了使你们平静地耕种土地，我们将全副武装站在你们一边。

几天后在另一次集会上讲话时，他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巴伦西亚省的一些村庄建立自由共产主义制度的情况阐述说：“我们知道，一些委员会建立了某种类型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要服从委员会，受它的意志所支配。我们知道，委员会把收获的农作物充公，而且滥用其他手段，例如，没收小地主的农田，强行罚款，用票证购买商品，也就是说，一套完整的不讲规矩的行为。你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行为——仔细听好这一点——绝不可能得到政府的批准，就连默许也不可能。……我们声明，小地主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此，那些侵犯或者试图侵犯这些财产的人必将被认为是共和国政权的敌人。”

共产党保护小地主和佃农利益的运动应该给它带来了大批追随者，这再自然不过了。当然，在中小地主占优势的那些地区，他们的运动最为成功。例如，盛产柑橘和稻米的巴伦西亚省的农户家业兴旺，内战之前他们支持右翼团体，在那里，据官方统计，到一九三七年三月，五万农民加入了共产党在革命初期为保护他们而成立的农民联合会。一名社会党人抱怨说：“共产党在村子里专门网罗前自治党最顽固的残渣余孽，这些人不仅极端保守，而且道德败坏，通过保证允许他们继续拥有自



己的土地，共产党把这些小地主组织起来成立了新的农民联合会。”劳动者总工会的社会党人书记佩德罗·加西亚还声称，隶属于强大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巴伦西亚省农业工人抗议说，共产党正在该省促进一个与之竞争的农民组织的发展，“迟早有人将会为了政治目的而把这个组织当作一支在农村与劳动者总工会下属的农民协会对抗的突击力量来使用”。

除了向其成员提供肥料和种子并为他们向——同样由共产党所控制的——农业部贷款提供担保之外，新的农民联合会还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被用来抑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农业工人所发起的农村集体化运动并与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CLUEA）进行斗争，后者是两大工会（主要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为控制具有经济价值的柑橘的收购、包装和出口而设立的，这一控制权以前掌握在一群中间商的手里。农民联合会提供的保护及其对最终变化做出的保证可能诱使许多成员申请加入共产党，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巴伦西亚农村得到广泛的支持，”农民联合会总书记胡里奥·马特乌证实，“以致如果我们允许的话，成千上万的农民将会加入我们的党。这些农民当中的许多人相信上帝而且现在仍然相信，他们祈祷并在私下里捶胸忏悔，他们像热爱神圣的事物一样热爱我们的党。当我们告诉他们不应把农民联合会与党混为一谈，即使没有党证也可以通过为党的政治路线工作成为一名共产党人时，他们往往回答说，‘共产党是我们的党。’同志们，说这些话时农民流露出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由于共产党给城乡中产阶级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活力，在革命之后那几个月入党的大批新党员中有一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几乎不必赘言，这些新党员不是被共产党的原则所吸引，而是希望从旧的社会制度的废墟中抢救出来一些东西。同时，除了保护他们的各种财产权之外，共产党还把这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解释成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内战爆发没几天，人

称“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的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多洛蕾丝·伊巴露丽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宣布：

我国正在发生的革命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在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已经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一场与以前的蒙昧主义势力的斗争中，我们共产党人站在第一线。

在西班牙人民的伟大斗争中，你们这些将军，多次背叛祖国的人，不要再用脱离人民的思想凭空捏造共产主义的幽灵，人们反对的是那些希望把西班牙变成一个悲惨、落后的国家的人，在那样一个国家里，军队、神父和政治寡头将是生活和财产的绝对主人！我们共产党人正在捍卫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权，我们将与共和派、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并肩作战，不惜任何代价防止西班牙倒退。……

混乱的说法是个谎言；当共和国的叛徒散布消息说局势一片混乱时，那是在说谎！

在这一历史时刻，忠于自己的革命原则并且尊重人民的意愿的共产党站在表达了这种意愿的政府一边，站在共和国一边，站在民主一边。……

西班牙政府是二月十六日大选胜利产生的政府，我们支持它，我们保卫它，因为它是为民主和自由而战的西班牙人民的合法代表。……

反对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的人民斗争万岁！民主共和国万岁！

因此，从一开始，共产党就不仅作为财产保护人，而且作为共和国和正常的政府管理程序的捍卫者出现在烦恼不安的中产阶级面前。中产阶级并不完全相信它的诚意，但是，只要它为他们提供保护并且帮助恢复被革命委员会篡夺的政府权力，他们就准备支持它。当然，他们的支持充满了怀疑和担忧，因为共产党以前曾经奉行

一种完全不同的政策，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里看到的那样。

## 第八章 人民阵线

“我们的任务是把大多数无产阶级争取过来并且准备夺取政权。”热情之花在将近一九三三年年底时宣称，“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全力以赴组织工会和农会并且创建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对于我们非常有利。我们正沿着共产国际为我们指引的道路前进，这条道路将导致在西班牙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一个工人和农民的政权。”

这一政策与共产党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内战和革命爆发后所追求的貌似温和的目标形成了诡异的对比。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那一项正式批准采取人民阵线政策的决议。

产生这项新政策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上台后德—苏关系的恶化，约瑟夫·斯大林担心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军事力量最终将用来对付苏联。由于饱受强制实行集体化之苦并且正在竭尽全力巩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军事体系，苏联小心谨慎地不挑衅生事以免造成与纳粹政权的长期不合。

艾萨克·多伊彻写道：

希特勒血腥镇压国内的一切反对派及其实行的种族迫害对莫斯科与柏林之间日常外交事务的影响与它们对巴黎或伦敦与柏林之间日常外交事务的影响不大一样。斯大林肯定寄希望于俾斯麦传统在德国外交官中的影响力，这一传统要求德意志帝国应当避免与俄国冲突。在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的第一年，[斯大林]没有对德国发生的事情公开发表过任何言论，尽管他的沉默使迷惑的共产国际追随者难以忍受。

只是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才打破了这种沉默。即便是这样，他也尽量避免从那些在欧洲左派看来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性后果的事件得出结论，他还含糊其辞地加深了以下错误印象：作为“一种资本主义衰落的征兆”，法西斯主义将被证明是短命的。不过，他也认为纳粹的崛起是“复仇意识在欧洲取得的一场胜利”，而且他还注意到，德国政策的反苏倾向已经逐渐压倒了旧有的俾斯麦传统。尽管如此，他仍然煞费苦心明确表示，苏联希望在同样的条件下与第三帝国保持与魏玛共和国同样的关系。

的确，苏联政府的喉舌《消息报》在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不到几个星期就声明，“无论德国政府是什么形式或是由什么人组成”，苏联只是一个“对德国没有敌意”的国家。但是，苏联的友好表示受到冷遇，因此，一九三三年底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抱怨说，在过去的一年，德国统治集团试图改变与苏联的关系。

为了寻找预防德国扩张主义威胁的办法并使西欧各国政府受它的影响，苏联彻底改变了其敌视国际联盟的态度并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加入这个国际机构。“通过加入国际联盟，”共产国际出版的周刊《国际新闻通讯》宣称，“苏联可以更加实际有效地继续与一场针对苏联的反革命战争做斗争。”但是，尽管采取了这一行动，对德国意图的严重担忧继续存在。“对于苏联来说，战争的直接威胁加剧了。”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声称，“我们务必不要忘记，目前在欧洲，有一个公然宣称其历史使命是占领苏联领土的执政党。”

作为防止德国威胁其安全的进一步行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苏联与法国缔结了互助条约。法国愿意签订这项条约主要是想消除自一九二二年苏德两国签订拉帕洛条约恢复友好关系以来苏联与德国仍然保持的一切联系并使法国共产党不再反对国

防计划；实际上，两国总参谋部之间从未签订过任何军事协定以充实这项条约，因此，从一开始它就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甚至从政府层面来说也是如此。

即使是在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时期，法国外交部也有某种观点认为，可以根据德国外交部代理国务秘书就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与法国大使弗朗索瓦—蓬塞进行的会谈所做的一份备忘录判断法苏条约的意义。关于为在西方各国之间谈判协商一项取代洛迦诺公约的新条约而提议举行的洛迦诺公约五国（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德国）会议，这份备忘录写道：

弗朗索瓦-蓬塞先生特别想知道我们是否愿意参加会议并在不涉及第五点的情况下就议事日程的主要问题进行协商，还是打算强迫法国政府事先明确表示放弃第五点，即断绝与东方的关系。也就是说，德国政府有可能采取在搁置东方问题的情况下就一项西方国家之间的条约开启谈判的立场，还是必须首先要求法国在德国开始讨论西方国家的条约之前断绝其与东方的关系？如果德国遵循前一条路线的话，他认为他可以说，法苏关系将逐渐冷淡，特别是因为这种关系从没有被大部分法国人所接受；于是，我们将缓慢而稳步地达到我们的目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立即对法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放弃与苏联的盟约，法国政府只能拒绝这样做。在长时间交谈的过程中，弗朗索瓦-蓬塞先生极力使我相信正确的选择和错误的选择是什么，他在陈述的过程中郑重强调，法国与苏联之间不存在特殊的军事关系。

莫斯科充分意识到法苏条约最终将被束之高阁的可能性，因此，保证法国履行其义务成为法国共产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我们可以祝贺法苏条约的签订，”法共领导人瓦扬—库蒂里耶宣称，“但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法国资产阶级和军队中的法西斯骨干分子将会遵行它的条款，我们应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知道，无论是什么利害关系驱使某些法国政治势力与苏联修

好，法国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是仇恨苏联的。”

由于外交上的原因，法国的政策制定者不能公开暴露他们陷入的令人痛苦的两难窘境，但是，这种窘境还是被右派众议员皮埃尔·泰坦热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法国的生存确实岌岌可危。由于公开与苏联结盟的政策，我们可能立即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后果对我们来说是可怕的。如果德国被打败，我们的国家很快将被布尔什维主义所污染。如果德国获胜，它将把法国从地图上抹掉。”

法国和英国的强势集团都反对向东欧做出可能使西方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的不可变通的承诺，这些势力集团似乎乐于鼓励德国那些损害苏联的扩张目的。

在法国，保王党人、《周刊》编辑弗朗索瓦·勒格里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声称，保护西方文明的两个基本条件是避免战争以及通过“让它们互相残杀”消灭泛日耳曼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因此，他希望德国进攻俄国，假使这样的话，“它很可能感到满足；至少西欧将有一个进行调整的喘息机会”。

“在战前的那几年，”一九三七年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的萨姆纳·韦尔斯写道，“西方民主国家的大型金融和商业利益集团——包括美国的许多利益集团——确信，苏联与希特勒德国之间的战争只会有利于它们。它们断言，苏联肯定被打败，共产主义也将随着苏联的战败被消灭；另外，由于这场多年的战争，德国将被严重削弱，以后它将不可能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

一九三五年五月六日，美国驻柏林大使威廉·多德在日记中对富有影响力的英国政治家兼外交家洛西恩勋爵写给他的一封信作了如下批注：“他明确表示，他支持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联盟，以遏制德国对西方采取的行动并把德国的目标转向东方。”在发表于《每日邮报》上的一篇题为《为什么不是英法联盟？》的文章里，

英国报业巨头之一罗瑟米尔子爵写道：“英法两国的新盟约将会具有另外一种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它将把德国的领土野心转移到一个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的方向上——转向东欧。”

在战前的那几年，《每日邮报》的影响力和公众接受的程度不可低估。根据富兰克林·里德·甘农对英国新闻界与德国的分析，“[它]是英国最完善的报业集团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一九三七年，它的发行量为一百五十八万份；它是唯一一份主要读者为中上阶层人士的大众日报。”关于罗瑟米尔子爵本人，甘农写道：“[他]对共产主义这个问题近乎精神失常，因此经常强求沃德·普赖斯[《每日邮报》的首席驻外记者乔治·沃德·普赖斯]写一些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那样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沃德·普赖斯阐述道，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比国家社会主义更大的威胁，因此……如果没有希特勒，‘整个西欧可能很快就会大叫大嚷着要求出现一位这样的斗士’。”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什么古怪异常。就连前自由党首相戴维·劳合·乔治也在一年后对下院宣称：“用不了多长时间，可能一年，也可能两年，英国保守党人将把德国当作欧洲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如果]德国防不住共产党人……欧洲也将步其后尘。我们不要急着谴责德国。我们应当欢迎德国做我们的朋友。”

尽管《每日邮报》从没有被认为是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的保守党政府的喉舌，它仍然表达了庞大而富有影响力的保守意见主流群体的私下关切。据前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武官盖尔·冯·施韦彭布尔格将军男爵说，英国陆军部的约翰·迪尔少将爵士和英军总参谋部的一些与他想法一样的成员“确信，大英帝国与德国之间的下一场战争不仅对于大英帝国，而且对于整个欧洲都将会是一场悲剧。他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场战争只会助长苏联的阴谋”。在航空界，有一群坚定的亲德分子，据理查德·格里菲思说，其中最喧嚣、最激烈的鼓吹者是《飞机》杂志的编辑C.G.格

雷。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飞机》杂志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德国“站在抵御东方的野蛮落后、保卫西方文明的第一线”。

尽管内阁成员在战前的那几年没有当众表达过他们对于苏联的担忧，但是，几年之后，曾在鲍德温和张伯伦的内阁中担任过一些关键职务的塞缪尔·霍尔爵士（后来的坦普尔伍德子爵）公开说出了这些忧虑：“[我们]有不信任苏联的充分理由。二十多年来，历届英国政府饱受俄国人的阴谋诡计之苦。英国的党派政治经常受到苏联宣传的毒害。苏联秘密特工利用一切机会接连不断地制造麻烦。苏联资金进入英国煽动分子的囊中。……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这一段时间，煽动军队叛乱、工人罢工的尝试持续进行，苏联驻伦敦大使馆没有一刻不被当作间谍捣乱活动的中心。……如果说我们没有受到苏联这些长期以来有案可查的两面三刀和敌对行为的影响，[我们]应该不是人类。”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西方战前对德国采取的“绥靖”政策，如果不考虑对于苏联的这种担忧，就不可能理解包括西班牙内战在内的欧洲事态发展的过程。

毫无疑问，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着某种重大选择。一方面，它们可以在纳粹政权羽毛未丰时遏制并且消灭它，同时任凭苏联自由发展其国力进而在一段时间之后通过结成共产党联盟成为世界上的最大威胁。“我认为，如果纳粹政权被消灭，德国接着将会走向共产主义，”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担任英国空军大臣的伦敦德里侯爵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九日写给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还将发现法国、德国与苏联站在了一起，而且感到共产主义的威胁，它成为世界上最有力的政策。”

这不是他唯一的忧虑。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我们自己与德国》一书中，伦敦德里侯爵表示担心，除非英国立即与德国达成某种谅解，德国将“根据一项直接对抗的国际政策猛烈打击英国并且侵犯它的诸多殖民利益和商业利益。正是为了避免出现



这种不幸的后果，我竭尽全力使本国人民相信英德两国之间友好谅解的价值和重要性”。他还在后面的段落中写道，他“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与德国达成某种反对共产主义的共识”。

蒂埃里·莫尼耶同样一点也不含糊，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慕尼黑会议把捷克斯洛伐克作为牺牲品献给纳粹德国之后，他在一篇文章里表达了法国右翼党派的观点。“这些党派认为，”他写道，“如果爆发战争的话，不仅将造成巨大的灾难，不仅法国可能战败并遭到破坏，而且更有甚者，德国的战败将意味着形成了防止共产主义革命蔓延的主要屏障的那些独裁政权的垮台，这可能导致欧洲立即布尔什维化。也就是说，法国战败实际上只是法国的失败，而法国的胜利与其说是法国的胜利不如说是某些主义的胜利，人们非常正确地认识到，这些主义将直接导致法国及其文明自身的毁灭。令人遗憾的是，在法国，由于不能公开发表与此有关的任何看法，所以，具有这种看法的人士和党派通常也不承认它。实际上，在我看来，一九三八年九月之所以没有发生战争，这是一个理由充分的主要原因，即使不是一个理由最为充分的原因。”

另一方面，西方民主国家可能任由纳粹政权侵犯中欧和东南欧的那些位于苏联国界以西的非极权主义国家，希望它有朝一日将与日益强大的苏联政权发生冲突，尽管这也会给他们带来耻辱和巨大的风险。

对于任何把中欧和东南欧的小国作为牺牲品献给纳粹德国的政策，最坚定的保守党反对派人士的意见必须在此予以陈述。一九三七年十月，温斯顿·丘吉尔在写给伦敦德里侯爵的信中说：

我们大家都希望与德国友好相处。我们知道，最优秀的德国人为纳粹的暴行以及从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上倒退感到羞耻。我们当然不应奉行一种有损德国合法利益的

政策，但是，你肯定知道，当德国政府谈论与英国的友谊时，它的意思是，我们应当归还它以前的殖民地，而且我们还要同意，对我们来说，它在中欧和南欧拥有自由行事的权力。

这意味着，它将把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作为缔造一个庞大的国家阵营的预演。纵容这种侵略政策肯定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以中欧小国为代价使我们自己免遭祸害的政策将是非常错误的，而且极其不严肃。

在我们看来，为纳粹暴政向那些具有相当程度民主自由的国家蔓延推波助澜与英国和美国的舆论倾向完全背道而驰。依我之见，我们应当在国际联盟的监督下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区域联盟协定，使得德国满足于在它自己的疆界之内以合法的方式生存而不是企图侵略其弱小的邻国，消灭这些小国并把它们的领土和家园据为己有。

一九三五年春天，在与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迈斯基交谈时，丘吉尔批评了某些西方安全的维护者。根据迈斯基对这次谈话的描述，丘吉尔说：“这些人坚持认为，德国必须在某个地方打仗……因此，最好让它以东欧和东南欧的那些国家为代价建立一个自己的帝国……当然，这种想法非常愚蠢，然而不幸的是，在保守党的某些人士中，它们仍然很受欢迎。但是我坚信，胜利最终不属于西方安全的维护者，而是属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八年担任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的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和我这样的人，我们认为，和平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英国、法国和苏联必须成为防御同盟的骨干力量，这个同盟将把德国限制在某种不足为虑的安全状态。”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七日，范西塔特写信对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私人秘书威格拉姆勋爵说：“试图给予德国吞并中欧和东欧其他国家人民财产自由行事权的任何做法都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与构成本国政策基础的[国际]联盟的所有准则背道而

驰。几乎可以肯定，任何试图进行交易的英国政府将可耻并罪有应得地被赶下台。……英国政府如果考虑任何听任德国以牺牲俄国为代价满足其领土野心的建议的话，更不必说怂恿了，那么，绝对可以保证的是，这将使英国彻底分裂。”

但是，在战前那几年，有一些声音比温斯顿·丘吉尔和罗伯特·范西塔特的声音更强大，结果，范西塔特一九三八年被内维尔·张伯伦首相撤了职。劳埃德勋爵是一位保守党贵族，而且是一名重要的英国外交官，他阐释说，英国的对德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对苏联的担忧决定的。一九三九年九月，英国与德国开战后不久，在他所撰写并由内维尔·张伯伦首相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用推荐性序言打上官方认可印记的小册子《英国问题》中，劳埃德勋爵写道：“无论[希特勒的]手段多么可恶，无论他的外交政策多么具有欺骗性，无论他表现出他多么不能容忍欧洲其他国家人民享有的权利，但他仍然声称，他最终主张的是某种欧洲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可以想象，总有一天这将提供一种与其他国家达成谅解的基础，平等地决定不把它们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当作祭品摆上世界革命滴血的祭坛。”

为了防止西方民主国家可能以牺牲苏联为代价与第三帝国消除分歧达成和解，为了保证法苏互助条约不致半途而废，而且为了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签订类似的条约，在苏联看来至关重要，各国政府对德国在东欧的企图的敌视态度应当成为官方的行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九三五年八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决定采取人民阵线这一路线。于是，一个向社会党人和自由派政党示好的时期煞有介事地开始了，它结束了此前奉行的分裂政策，该政策谴责社会党人是“社会法西斯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其中包括法西斯国家的资产阶级”，后者有力地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但是，人们不应忘记，甚至还在一九三五以前，共产国际的某些支部已经开始谋求与其他政党合作，这符合苏联外交政策的新动向。这种尝试在法国取得了最好的效果。

苏联外交的政治目的不应掩盖这一事实：早在共产国际正式采取人民阵线路线的很长时间之前，西班牙的大部分左派政党就为开展一场团结运动找到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国内理由，即，左派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的大选中被中—右党派击败了。共产党人声称他们发起了西班牙的团结运动，但是，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所领导的自由共和派努力缔造了一个共和派与社会党的联盟，在下一次大选中，以这个联盟对抗中—右党派应当不会落下风。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其方案中决定，各国共产党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使农民和城镇小资产阶级加入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它坚持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阶层支持德国武装起来，以便削弱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并将德国的侵略矛头对准苏联”。毫无疑问，一九三五年上半年英国对德国重整军备给予的支持只是为这些指责提供了证据。

一九三五年二月六日，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在下院表示：“我们无法拒绝而且也不应当拒绝德国在军备问题上提出的权利平等的要求。”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英德海军协定签字，同意德国海军拥有相当于英国海军百分之三十五的舰船吨位。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一日，温斯顿·丘吉尔对这份协定提出批评，他指出：“我们容忍甚至鼓励德国在建立舰队的问题上撕毁和约。”“在苏联，”英国历史学家马克斯·贝洛夫写道，“[英德海军]协定被认为是英国虚弱的表现，同时也暴露了英国想使德国从整备空军转向海军建设的愿望，因为它觉得自己在海军方面更强大。这份协定也许还有助于将德国的注意力转向东方从而使英国从欧洲事务中解脱出来，以便挽救其在远东岌岌可危的地位。主张与德国合作的英国人将会发现一个新的活动领域。苏联人坚持认为，德国人不会遵守英德海军协定，只是把它当作撕毁各项条约的一个突破口接受下来。显然，德国对[苏联的门户]波罗的海的控制将无懈可击。[据迈斯基说，“英国政府希望确保德国在波罗的海对于苏联的优势

地位”，这是签订英德海军协定的首要目的。]似乎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希特勒先生主要考虑的也是波罗的海的局面。”此外，德国在一九三五年夏天违反凡尔赛和约重新开始征兵。这也被英国所容忍。

肯定是考虑到德国军事力量日益增长的威胁，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宣称，为和平而斗争给建立包括农民和城镇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带来了宝贵的良机，“应当把所有热心维护和平的人吸引到这个统一战线中来”。这一目标必须通过动员人民反对“垄断资本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掠夺性价格政策”以及反对“不断增加的税收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来实现。尽管这次大会重申，共产国际的目标仍然是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但是，团结中产阶级的政策迟早将会导致共产国际各个支部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淡化它们的革命目标，从而消除人们曾经对它们产生的怀疑。一九三五年，当时为共产国际宣传部门工作的阿瑟·科斯特勒写道：“所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标语口号一下子都被清理进了杂物室。它们被一种新的装饰所取代，名曰‘和平与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配着窗口的天竺葵。它的大门向所有善良的人们——社会党人，天主教徒，保守人士，民族主义者——敞开着。我们曾经鼓吹的革命和暴力的观念将被当做奇谈怪论受到嘲笑，就像反动的战争贩子到处诋毁的那样。我们不再自称‘布尔什维克’，甚至不再自称共产党人——现在党内很不赞成公开使用这个词。我们只是纯朴、正直、热爱和平的反法西斯人士和民主的捍卫者。”

这意味着共产国际放弃了夺取政权的目标吗？肯定不是。代表大会清楚地表明，人民阵线政府“可以成为一种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特殊形式”。“十五年前，”共产国际总书记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在他向大会所作的重要报告中宣称，“列宁要求我们集中精力‘找到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或者接近它的形式’。在一些国家，统一战线政府可能将被证明是最重要的过渡形式之一。”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国际这一新的政策在西班牙产生的结果是，共产党人“小心翼翼地行走在争取革命群众和温和共和派[中产阶级]双重支持的中间地带，有时无法自圆其说”。

## 第九章 外国干涉

从苏联外交政策的角度看，人民阵线这一策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一九三六年初的几个月，在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人不仅与它以前的对手社会党人，而且还与温和的中间党派联合起来参加了大选，大选在广泛的基础上进行，结果导致自由派政府上台执政。

当然，德国应当已经警觉地注意到一项旨在通过增强并扩大苏联与西欧的政治和军事联系来建立一条反德阵线的策略所取得的成效，但是，直到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爆发军事叛乱，才出现了以站在叛军一方直接进行干涉的方式反击这种对其计划的威胁的机会。与普遍持有的看法相反，武力对抗爆发之前，德国并没有向叛乱的组织者做出军事援助的承诺。根据一九五〇年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公布的德国外交部档案中与西班牙有关的文件，直到叛乱爆发几天后，希特勒才答应提供援助，当时佛朗哥将军派遣一名侨居西属摩洛哥的德国商人和当地的纳粹领导人前往德国请求给予飞机和其他支援。佛朗哥的请求很快就得到了同意，因为根据纳粹方面的原始资料，德国飞机在内战的头几个星期便加入了佛朗哥将军一方的行动，或者从西属摩洛哥运送摩洛哥军团和外籍军团到内地，或者执行轰炸任务。

一九四六年，在纽伦堡审判的法庭上，希特勒的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说：

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佛朗哥打电话向德国求助，请求给予支援，特别是空军的支援。人们不应忘记，佛朗哥和他的部队驻扎在非洲，由于海军掌握在共产党[左翼势

力]手中，他无法使部队渡过海峡。……决定性的因素是，首先，必须使他的部队过海到达西班牙。

元首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我极力劝他无论如何都要支援，第一，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那个地方继续蔓延；第二，利用这个机会测试一下年轻的德国空军各个方面的技术水平。

经元首许可，我派出了大部分运输机以及一些试验性的战斗机、轰炸机中队和高射炮兵；这样我就有机会弄清，在实战的条件下，装备是否符合任务要求。另外，为使个人可以积累一些经验，我注意形成一种连续的轮换，也就是说，不断把新人派出去，同时把另一些人召回来。

即使德国实际上的确利用西班牙这个战场为后来的战争训练了人员并且试验了新式武器，戈林在内战初期也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想法。正如安赫尔·比尼亚斯在他的重要著作《纳粹德国与七月十八日》中所指出的那样，希特勒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提供的第一批援助由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所驾驶的二十架容克—52型运输机组成。“确实派出了六架海因克尔—51式战斗机，但那只是为了护航……而且除了自卫之外禁止飞行员参加战斗。……一九三六年十月决定分批派遣作战飞机，十一月开始调动它们，也就是说，时间要晚得多。”

德国援助佛朗哥将军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尽管担心在还没有为一场大规模战争准备好的时候由于深深卷入西班牙内战造成复杂的国际局面，它仍然希望取得战略优势为即将在西欧进行的斗争做准备。内战刚开始希特勒本人就向一些纳粹党的领导人和外交官表示：“在形成法国与北非之间的陆地桥梁[的西班牙]，非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存在应当对我们有利。”他还在另外一个场合声称，“他唯一的目的是防止西班牙的外交政策在内战结束以后被巴黎、伦敦或莫斯科所左右。这样的话，在

因欧洲的重组而进行的最后交锋中，西班牙将不会成为德国的敌人，如有可能，还会成为德国的朋友。”

在一封日期表明为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的德国外交部信函中，德国大使对佛朗哥将军说：“毫无疑问，一场由于我国的干涉而获胜的战争[过后]，一个在我国的帮助下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了经济发展的西班牙，不仅将在未来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原材料产地，而且将成为我国长期可靠的朋友。”另一方面，希特勒肯定希望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失败和右翼势力的复兴削弱法国的人民阵线并使某些法国势力得到加强。这些势力反对妨碍德国向东方扩张的政策并且认为法苏互助条约很可能使法国卷入一场斗争，万一德国在斗争中失败，将会导致共产主义在欧洲取得统治地位。一篇文章提出了相当一部分法国人的典型看法：“莫斯科需要的是一场法国军队与德国军队之间的战争。在某个时候，以某种借口，苏联希望能够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法国军队布置在[德国]边境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削弱了德国可怕的军事力量，又使我国陷入一场对外战争，这场战争将敲响欢迎布尔什维克革命时刻到来的钟声。”

苏联并非没有看到德国干涉西班牙所产生的种种威胁。但是，由于唯恐引起西方国家温和党派——它们的身上寄托着苏联建立反德阵线的希望——的敌意，它不愿给对其公开资助世界革命的指责提供口实、添枝加叶。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它正式加入法国为防止冲突扩大而提出的国际不干涉公约，与加入该公约的其他国家一起保证，不向西班牙运送武器。“如果苏联不同意法国提出的中立政策，”一份共产党报纸评论道，“那将使[法国]政府陷入非常严重的困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法国和英国的法西斯分子，同时有利于德国和意大利政府对西班牙人民采取行动。……如果苏联政府对当前欧洲一触即发的形势采取进一步激化的措施，那将受到各国法西斯分子的欢迎，并将造成民主力量的分裂，从而直接为发动针对以苏联



为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所谓‘预防性战争’铺平道路。”

苏联对西方国家民主舆论的关心与叛乱发动者根据公布的共产国际“秘密”文件所提出的“共产国际一九三六年夏天密谋在西班牙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的指控有矛盾，因为，建立这样一个政权的尝试显然将会破坏克里姆林宫为与西方民主力量建立一个牢固同盟所做的努力。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更不必说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必要的力量这一事实，就可以对叛乱者的指控完全不予考虑。实际上，甚至右翼的天主教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领导人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都承认：“我决不相信当时有共产党暴动的可能性，更不必说共产国际直接参与。……面对希特勒分子的威胁，斯大林愿意与英国和法国建立友好关系。法苏条约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证明，与遏制德国帝国主义的政策相比，他把欧洲革命置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而且，没有什么能比向西班牙输入一个共产党政权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激起更大的敌意了。……真正的危险并不是隐藏在一场精心组织的共产党的暴动中，而是隐藏在到处盛行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中。我与阿萨尼亚先生最后一次谈话时……他没有向我掩饰人民阵线群众的不可阻挡之势使他产生的恐惧。”

构成指控“共产党人一九三六年夏天密谋在西班牙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的依据的那些“秘密”文件不仅最终被支持左派的赫伯特·R·索思沃思揭露出来是伪造的，西班牙最重要的内战历史学家之一、军事叛乱的支持者里卡多·德拉·谢尔瓦也认为是这样的，他说，它们是西班牙右翼作家托马斯·博拉斯起草的。“因此，”谢尔瓦断言，“这些文件肯定是伪造的……[但是]它们被西班牙和国外的宣传人员非常有效地利用了。”不过，他告诫人们，“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并非否认当时存在的共产主义威胁以及对共产主义的极度恐惧。此外，他根据西班牙共产党的原始文件而提出的证据显示，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它的革命目标，因此，他坚持认为，一九三六年上半年，西班牙共产党“有效地增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

尽管存在着这样的证据，尽管内战之前他们为了附和左翼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左派的激进倾向不时使用带有明显革命特征的语言，尽管他们公开主张建立工农联盟作为“未来的权力机构”，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党的终极目标，尽管他们曾经警告自由派政府，若不加快进行土地改革，农业工人将以武力把大地主的土地分掉，但是，共产党人仍然谨慎地坚持与温和派结盟。“人民阵线必须继续存在。”何塞·迪亚斯写道，“我们与左翼共和派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尽管他们要求清洗军队并且就在武装叛乱爆发之前还威胁说，除非政府履行人民阵线的竞选纲领，他们将为建立一个具有“一般革命特征”的政府而奋斗，但是，这种表达与其说是旨在立即激发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不如说是为了抚慰民众的革命情绪并且促使政府对右派采取行动。实际上，在内战爆发前马德里建筑工人罢工——这场罢工使政府陷入严重的困境，而且具有发展成为一场与雇主和政府的革命性对抗的危险——期间，共产党人曾竭尽全力劝说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停止罢工。

毫无疑问，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军事叛乱及其引起的广泛的社会革命在一个令人尴尬的时刻发生了。此外，正如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费尔南多·克劳丁多年以后所说：“西班牙革命——除了一九一九年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之外，这是共产国际存在期间发生在欧洲的唯一一场革命——的爆发使这个‘世界政党’的领导人措手不及。”他们陷入了令人再难受不过的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怎么可能在西班牙支持革命运动的同时继续在其他国家向温和派舆论求助呢？

如同我们很快就将看到的那样，为了化解这种困境，尽管正式加入了不干涉公约，斯大林仍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决定，在宣布中立的幌子下谨慎地进行军事干涉，同时继续推行温和的政策，在表面上制止革命性剧变的发生。

他的干涉决定与希特勒的相比姗姗来迟，实际上，比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也要晚，因

为，根据意大利法西斯党方面的原始资料，意大利的飞机和军舰在八月初就行动了。与希特勒的情况一样，直到战事即将爆发，墨索里尼没有给过佛朗哥将军或莫拉将军任何有案可查的援助承诺。确实，意大利政府曾于一九三四年与西班牙君主主义者领导人签订过一份协议，答应在西班牙爆发内战时提供军事援助。但是，正如密谋参与者之一利萨尔萨·伊里瓦伦所指出的那样，协议没有什么结果，因为，一九三六年七月的军事叛乱不是与墨索里尼谈判的军官发动的。不过，这份协议有助于在罗马形成“某种支持叛乱的气氛”，并且促使墨索里尼在稍稍犹豫之后于七月二十七日决定向叛军提供援助。另一方面，意大利外交部长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在没有首先与其上司磋商的情况下从一开始就表示同意援助叛军。

这一点在一九六七年得到马德里的君主主义报纸《阿贝赛报》驻伦敦记者路易斯·博林的证实，七月十八至十九日把佛朗哥将军从加那利群岛送往西属摩洛哥指挥叛乱的那架哈维兰快速飞龙小型客机就是博林包租的。在他的《西班牙：重要的年代》一书中，博林复制了一份由佛朗哥将军签署（并由里斯本的圣胡尔霍将军连署，在飞往西班牙指挥叛乱途中不幸遇难之前，圣胡尔霍将军被指定为叛乱领导人）的迄今为止没有公布过的文件，文件授权博林在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紧急洽谈购买飞机和军需物品。博林七月二十一日飞到罗马，在那里，他得到前西班牙国王阿方索的侍从武官比亚纳侯爵的帮助。尽管外交部长齐亚诺同情地接受了他们提出的援助请求，这一请求最初仍被墨索里尼拒绝了——意大利驻佛朗哥方面的大使罗伯托·坎塔卢波证明情况确实如此。几天后，墨索里尼终于同意提供援助，接着，十二架萨沃亚—81式轰炸机于七月三十日被派往西属摩洛哥，不过，只有九架安全到达目的地。

一九六八年，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对购买第一批意大利飞机的情况作了下面这种描述：“当暴动发生因而必须建立一座从摩洛哥向半岛运送军队的空中桥梁时，

意大利政府发出通知，购买飞机的协议应当与一九三四年[罗马]协议的某位签署者签订。戈伊科切亚[西班牙复兴运动领导人，参与签订了罗马协议]、赛恩斯·罗德里格斯和顺苏内吉先生带着莫拉[将军]的具体指示火速赶往意大利至关重要。几乎就在佛朗哥将军授权的路易斯·安东尼奥·博林谈判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成功地进行了购买战争物资的初步谈判。七月二十五日，他们在罗马会见齐亚诺伯爵，双方商定了运输机的装运事宜。到八月一日，已经有十四架意大利的萨沃亚—马尔凯蒂式军用飞机到达纳祖尔[西属摩洛哥梅利利亚附近的机场]，接着，在八月二日，到达同一机场的飞机数量是二十四架。一九三四年的那份协议以这种方式履行了。”一九四〇年出版的官方（亲佛朗哥）《西班牙圣战史》也声称，莫拉将军知道一九三四年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进行的谈判，因此，当博林的谈判遇到困难时，他要求戈伊科切亚赶往意大利首都协助已在那里的人。《西班牙圣战史》接着写道，直到此时，由于不太了解军事叛乱的意义所在，意大利政府对于提供援助仍然心存疑虑。“已于一九三四年就一场可能发生的反革命运动与齐亚诺达成协议的戈伊科切亚现身罗马消除了所有疑虑。”

尽管日期稍有出入，从四种原始资料中得到的上述证据反驳了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空军部长皮埃尔·科特的证词。科特证词的大意是，意大利运送飞机的决定是在发生军事叛乱的七月十七日那一天之前做出的。上述证据还证明，法国外交部长伊冯·德尔博斯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对美国驻巴黎临时代办所说的那些话也没有根据，德尔博斯说：“至少早在七月二十日，驾驶着飞机的意大利空军飞行员已经参战执行任务。”

下面这段内容摘自德国驻罗马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写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报告论述了德国和意大利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利益，这段内容说明了意大利干涉西班牙的动机。它还解释说，因为从一九三五年意大利入侵埃

塞俄比亚起，墨索里尼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出现了隔阂，因为，如果欧洲爆发普遍的战争，法国从北非调兵的路线将受到威胁，所以，意大利的卷入对德国有利：

由于两国都在试图阻止布尔什维主义在西班牙或加泰罗尼亚获胜，因此，德国和意大利在西班牙动乱中的利益一致。但是，虽然德国除此之外并不追求任何直接的外交利益，罗马却肯定要为将西班牙纳入其地中海政策的轨道而努力，至少也要为阻止西班牙与法国和/或英国之间的政治合作而努力。为此需要：佛朗哥的直接支持；巴利阿里群岛的一个立足点，除非建立一个与意大利友好的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不会自动撤离这个立足点；佛朗哥对意大利的政治承诺以及法西斯主义与西班牙新建政治体制的紧密联系。……

对于上述总体政策，在我看来，如果意大利继续深度介入西班牙事务，德国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意。就意大利与法国和英国的关系而言，西班牙内战所起的作用可能与阿比西尼亚战争的作用相似，明显造成了大国之间现实利益的对抗，从而避免意大利落入西方列强的圈套并为它们的阴谋所利用。为在西班牙拥有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而进行的斗争使意大利与法国之间天生的矛盾暴露出来；同时，作为西地中海的大国，意大利的地位与英国的地位发生了冲突。意大利将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与德国并肩对抗西方列强是明智的——尤其是考虑到西欧与中欧之间未来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某种普遍谅解的理想时。在我看来，由这种局面所产生的我们的指导原则是，我们应当让意大利在它的西班牙政策中扮演主角，但是，我们同时应当以非常积极的友好态度协助执行这项政策，以免出现可能损害德国的直接或者间接利益的结果，无论这种结果是以西班牙民族主义者失败的形式还是以英意两国在战事继续胶着的情况下直接达成谅解的形式出现。如果法西斯主义在承担创造某种政治社会实体——迄今为止它背面贴着纯军事和否定性的反赤化标签——的艰巨任务方面一马当先，我们肯定没有理由表示嫉妒。……如果在法国南边出现了某种因素——一

种妨碍法国从非洲调兵并在经济领域充分考虑我们的需要的因素，它摆脱了布尔什维主义并且破除了西方列强的霸权，另一方面却与意大利结为盟友，迫使英法两国停下来思考，我们必须认为这种因素值得期待。

由于意大利干涉带来的利益，德国鼓励意大利在内战的过程中向西班牙大规模投入军事力量。对于德国来说，比前面提到的那些利益更重要的是，意大利转移了它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注意力，吞并这两个国家是希特勒的东欧计划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并非巧合的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意大利——它曾于一九三四年挫败一场纳粹政变，保卫了奥地利的独立——默许的情况下，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到那时，意大利已经深深陷入了西班牙内战，以致没有德国的帮助就无法脱身。

另一方面，希特勒小心翼翼地将德国的干涉局限于数量有限的空军中队和炮兵、坦克部队，并不理睬向西班牙派遣大量地面部队的建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他派驻佛朗哥将军方面的大使威廉·福佩尔建议：“为了阻止布尔什维主义首先控制一半西班牙然后控制整个西班牙……需要一个强大的德国师团和一个强大的意大利师团，[它们]良好的训练和出色的指挥仍然可以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几个月后，即使派来更强大的部队，或许再也不可能取得这种胜利了。”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希特勒在西班牙的政策精明而且深谋远虑。一方面，他小心翼翼地防止西班牙内战在他还没有准备好时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另一方面，他希望延长这场战争以使西欧各国继续存在隔阂从而将意大利更牢固地与德国绑在一起。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概述了他的战争计划并由其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作了记录，正如他所透露的那样，从德国的观点来看，佛朗哥的彻底胜利并不是一种理想状况，德国宁愿“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从而“维持地中海的紧张局面”。简单地说，正如格哈德·L·魏因贝格恰如其分地说明的那样：“一场佛朗哥无法迅速取胜的战争拖延下去正好符合希特勒所阐释的德国利益的要求。可以通

过零零星星而非大规模地提供援助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

尽管某些历史学家否认希特勒故意拖延西班牙内战，安德烈·布里索在他那本关于希特勒的德国情报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书里非常清楚地描述了德国的政策：“卡利纳斯的头脑里对希特勒西班牙政策的定位没有疑问，这种定位是持续向佛朗哥提供适度的援助——足以使其感恩戴德（允许德国在伊比利亚半岛获得大量经济利益）并且阻止共和派获胜——但又不能多到使这位叛军首领迅速取胜。另一方面，希特勒希望‘维持地中海的紧张局面’为的是达到一个双重目的：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听任墨索里尼越来越深地陷入西班牙内战的同时，促使其不停地加大赌注从而削弱意大利在欧洲大陆的實力，直到迫使其乖乖就范，在不可能表示反对的情况下，首先接受德国吞并奥地利，然后接受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

尽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初仅仅稍做犹豫便答应了佛朗哥将军恳请援助的要求，斯大林在采取行动之前却非常谨慎地动摇不定。瓦尔特·克里维茨基是苏联派往西欧的一名以海牙为总部的高级特工，一九三七年底叛逃西方，他证明：

八月下旬，三名西班牙共和国高级军官终于受到苏联的接待。他们是来购买战争物资的，他们表示愿意用西班牙的黄金支付巨额货款。……[为了]掩盖这笔交易，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那个星期五，斯大林通过苏联贸易人民委员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向西班牙出口、转口或者运输各种类型的武器、军火、战争物资、飞机和军舰”。……共产国际的同路人及其唤起的民众私下里已经对斯大林没有立即援助西班牙共和国感到失望，现在又听说他要与莱昂·布鲁姆的不干涉政策同流合污。实际上，斯大林正在偷偷地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在一次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斯大林说]法国和英国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听任把守着地中海进出口的西班牙被罗马和柏林所控

制。一个友好的西班牙对巴黎和伦敦至关重要。不必公开进行干涉，而是巧妙地利用其作为军用物资提供者的地位，斯大林认为有可能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受他控制的政权。做到这些他就可以赢得法国和英国的尊重，争取由它们提出实际结成同盟的建议，然后，或者接受这个建议，或者——用它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达到其潜在的既定目标，与德国签订一项条约。

这是斯大林关于干涉西班牙的中心思想。不过，他也是因为需要向苏联那些可能对他大规模清洗并且枪毙布尔什维克老战友不满的外国朋友做出交代而采取行动。西方世界并没有意识到，当时斯大林对权力的控制多么微妙，愿意为他那些血腥行为进行辩护的外国共产党人和国际著名的理想主义者对他作为一个独裁者继续存在多么重要。一点也不过分地说，他们的支持对他来说生死攸关。因此，不去保卫西班牙共和国……可能使他失去他们的支持。

一九三八和一九三九年，克里维茨基发表了一系列揭露性文章，后来又于一九三九年出书揭露了一些事情。由于此后他被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支持者斥为江湖骗子，而且由于本书将多次引用他的文字，所以，引述下面这段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段话引自受到广泛尊敬的著名苏联问题学者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在一九四一年克里维茨基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神秘自杀之后所写的一篇文章：“[克里维茨基的]能力和智力确实出类拔萃。他断断续续地在[设在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的]共产国际谍报组织、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所谓四局）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内务人民委员部]担任要职。……在这期间，没有什么人他没见过，没有什么秘密他没听说过。……[在他叛逃之前的]最后三年，克里维茨基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对外部门工作，是令人生畏的西欧处的三位负责人之一。关于这个部门——它的任务和他的工作性质——外国几乎没有概念。他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组织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苏联整个政策的制定具有很大的影响。”



指责克里维茨基是江湖骗子的宣传运动成功地围绕着他制造了一种怀疑的气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在多年以后仍以谨慎的态度对待他所提供的证据。例如，休·托马斯认为，在他那部出版于一九六一年的西班牙内战史的第一版中有必要提醒读者，“克里维茨基所提供的证据除经证实之外应被认为带有偏见”，而且，“他那本书和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的那些文章……可能是由某个著名的美国苏联问题专家撰写的，后者通常被认为是联邦调查局……资助的”，尽管在四年后出版的修订版本中，他把这种说法修改成为“克里维茨基所提供的证据一般可以被接受，虽然他的细节有时不太准确”。

著名历史学家安赫尔·比尼亚斯是西班牙外交部的一名官员，这个僵化死板的人在写给加泰罗尼亚作家胡安·利亚尔奇的一封信中说：“我恳求您不要关心仍在疯传的那些说法，它们大概的意思是，内格林的行为、[他]运送黄金[去莫斯科]及其[处理]共和国财政的方式是由苏联贸易专员斯塔舍夫斯基的操控造成的。不过，仍有像博洛滕那样的绅士，他们拒绝抛弃投奔西方的苏联叛逃者所编造的传奇故事，这些叛逃者并不了解发生在西班牙的事情。”

尽管克里维茨基的书籍和文章里存在着某些伊丽莎白·波列茨基——她是被暗杀的苏联特工伊格纳斯·赖斯的妻子——所谓的“错误和夸大之处”，但是事实上，正如后来在他的书中显示的那样，克里维茨基是第一个揭露苏联首席军事顾问扬·K·别尔津将军、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特工头子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和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的苏联顾问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在西班牙所从事的活动的人，他还第一个揭露了国际纵队富有魅力的指挥官埃米利奥·克莱贝尔将军的真实姓名。不过，正如我们所知，更重要的仍然是，他还宣称，西班牙内战期间，在寻求与英国和法国结盟的同时，斯大林头脑里有一个替代方案——与德国签订一项条约。克里维茨基进一步宣称，早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斯大林就授权其派往柏林的贸易代表达维德·

坎杰拉基，“尽一切力量与希特勒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尽管谈判没有结果，克里维茨基的说法仍在几年之后得到验证，虽然他的说法与苏联一贯热情支持集体安全的表态相抵触。欧洲最重要的苏联问题学者之一伦纳德·夏皮罗在一九六〇年写道：“这些非常秘密的谈判首先被克里维茨基揭露出来。现在，[德国外长]诺伊拉特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写给[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的一封私人信件证明，确实举行过这些谈判。这封私信清楚地显示，坎杰拉基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名义对与德国达成一项协议进行了试探，但是遭到希特勒的断然拒绝。这份文件保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盟军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档案中。”

诺伊拉特在同一封信中解释了希特勒不愿开始谈判的原因：“说到与苏联政府开始会谈的可能性，我与元首的意见一致，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而且正好相反，这种会谈顶多会被俄国人用来达到他们一直谋求的与法国建立某种更紧密的军事同盟的目的，如有可能，还要达到与英国进一步恢复友好关系的目的。”

五十年代初期，对于某些历史学家来说，斯大林早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就开始为与德国达成某种政治谅解进行试探的说法不可接受。爱德华·哈里特·卡尔一九五一年写道：“许多苏联流亡者出版的书籍包含了一些对德苏秘密关系，尤其是三十年代的德苏关系耸人听闻的描写，但是，这些描写经常相互矛盾而且尚未得到可靠证据的证实。”因此，回忆深谙内情的克里维茨基早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所写的一篇文章将是十分有趣的，这篇文章当时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九三五年秋天……斯大林似乎觉得一个成功进行谈判的有利时机正在来临。斯大林的乐观态度可以用德国以优惠的条件新增了对苏联的贷款这一事实来解释。于是，人们立即在政治局听到了斯大林十分招摇的声音：“好啦，如果希特勒给了我们这

些贷款，我们怎么还能认为他要对我们发动战争？”决定向苏联提供贷款确有其事，但是，其他问题仍没有变化。不过，斯大林充满信心而且不会放弃。一九三六年秋天，斯大林好像再次认为希特勒将同意谈判。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仔细审查了预备好的所有资料。……为谈判进行准备的工作交给了苏联贸易代表坎杰拉基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个[柏林]常驻代表。……一九三七年春天，坎杰拉基与前面提到的那个国际事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一起前往莫斯科。当他们到达那里时，政治局的气氛为之一振；所有人都在谈论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它将使我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在欧洲，希特勒和斯大林将要玩弄一个大花招。现在还不能说最终谁将骗到谁。

但是，当时人们对这些幕后活动一无所知，而且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间，苏联还是集体安全和国际联盟的主要拥护者。我们不能断言斯大林的最终目的如克里维茨基所说是与希特勒签订一项条约，也不能断言他仅仅是把这一选择当作集体安全万一无效所采取的预备措施。我们知道，集体安全肯定无效，而且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造成其无效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的支持，因为，总的来说，绝大多数欧洲政治家内心担忧：集体安全可能导致与德国的战争，纳粹政权的垮台将使欧洲布尔什维化。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英法两国对西班牙内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另外几次左右了欧洲形势的重大事件所采取的政策根源正是这种担忧。

由于斯大林对在西班牙冒险的小心谨慎，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第一批苏联大炮、坦克和飞机才与飞行员和坦克驾驶员一起到达西班牙。尽管所有说法恰恰相反，但是，正如我在战后得以与之随意交谈的何塞·米亚哈将军、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和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等高级军官所证实的那样，它们不是在那之前到达的。例如，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说，第一批苏联轰炸机、坦克和大炮十月到达西班牙，第一批战斗机十一月二日到达西班牙。这一情况后来得到共产党

控制的第五团指挥官胡安·莫德斯托的证实。莫德斯托写道，第一批苏联坦克十月下旬到达，十一月，苏联飞机“结束了德国和意大利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西班牙首都的局面”。

苏联直到七十年代才公布了估计运往西班牙的苏联武器总数。一份一九七四年的苏联原始资料说：“苏联送给西班牙政府八百零六架军用飞机，主要是战斗机，三百六十二辆坦克，一百二十辆装甲车，一千五百五十五门大炮，大约五十万支步枪，三百四十支榴弹发射器，一万五千一百一十三挺机关枪，十一万多颗炸弹，大约三百四十万发子弹，五十万颗手榴弹，八亿六千二百万个弹壳，一千五百吨黑色火药，鱼雷艇，防空探照灯装置，汽车，无线电台，鱼雷和燃料。这些战争物资没有全部到达目的地，因为……苏联从其他国家租用的一些船只被意大利人击沉或者进入叛军控制的港口。”同样发表于一九七四年的另一份原始资料提供了内战期间苏联“设法运往”（“удалось направить”）西班牙的武器的以下分类（根据由苏联军事历史研究所提供的官方统计数字）：六百四十八架飞机，三百四十七辆坦克，六十辆装甲车，一千一百八十六门大炮，两万零四百八十六挺机关枪和四十九万七千八百一十三支步枪。

关于苏联对西班牙的其他军事援助，左派控制区的国防部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证实，在九月份的下半月，“国防部出现了一些苏联将军和军官，据说他们是‘军事专家’而且被称为‘友军顾问’”，接着，从那一天开始，轻型武器陆续到达。另一方面，马德里保卫战期间的参谋长、与苏联军事顾问工作关系密切的比森特·罗霍说：“具有作战能力的苏联专家在第一批武器运到之前于十月份到达。”

尽管俄国人没有向西班牙派遣苏军地面部队，但是，在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国际

纵队的第一批部队便参加了军事行动。国际纵队由共产国际倡议组建，据加里波第旅旅长卡洛·彭基耶纳蒂说，除了极少数例外，国际纵队的指挥官全部都是共产党员。另外，化名加略的意大利共产党员路易吉·隆哥——他是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多年后接替去世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成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说，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第一批五百名志愿人员到达他们的训练基地阿尔瓦塞特。据苏联方面估计，可能有来自五十三个国家的多达四万两千名反法西斯人士作为志愿者前往西班牙。志愿者当中有一些俄国流亡者，主要是居住在法国的俄国流放者，据苏联作家Л.К.什卡伦科夫说，他们“并不隐瞒在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斗这一事实，他们想为自己赢得原谅和返回祖国的权利”。

在提供武器及其手下一些最好的外国干部的过程中，斯大林小心翼翼地避免与意大利和德国发生严重的冲突。克里维茨基证实，斯大林“特别告诫他的政治委员，为了消除使苏联政府卷入战争的一切可能，苏联对西班牙的援助必须以非官方的名义秘密进行。由这些政治委员传达下去的他在那次向所有参加这一行动的高级军官发号施令的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远离炮火！’（подальшеот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огоогня）”不过，在地理上距离战场如此遥远的苏联具有严重的后勤问题，因此，它在向西班牙供应武器的过程中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任何飘扬着苏联或者共和国国旗的船只都有可能受到法西斯潜艇或飞机的攻击，从而被佛朗哥击沉或掳走。”前面援引过的一份苏联原始资料写道，“从西班牙内战爆发到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苏联船只受到八十六次攻击。‘共青团号’‘季米里亚泽夫号’和‘布拉戈耶夫号’被击沉，‘彼得罗夫斯基号’‘第二个五年计划号’‘联盟舵手号’和‘斯米多维奇号’被掳走并被带到叛军所控制的港口。无论飘扬着什么旗帜的船只，只要怀疑船上装载着苏联运往西班牙共和国的货物，法西斯分子就会攻击并且击沉它们。”

有证据表明，尽管斯大林起初希望共和派军队迅速获胜，但他最终作出判断，将这场战争拖延下去有利可图。据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头子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说，一九三七年夏天，一位从莫斯科返回西班牙的苏联将军告诉他，政治局对西班牙采取了一种策略。“在那之前，”奥尔洛夫写道，“政治局的政策是，用武器装备、飞行中队和坦克部队尽力帮助西班牙共和国政府迅速战胜佛朗哥。但是，政治局现在[已经]得出结论，如果交战双方都不能取得压倒优势，如果西班牙内战尽可能长期打下去从而使希特勒更长久地陷在那里，对于苏联更加有利。……政治局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计谋让[我]大为震惊，它想让西班牙人民长期流血以赢得时间。”

尽管难以想象苏共政治局的马基雅维利式计谋能让奥尔洛夫这样一个冷酷老练的特工大为震惊，但是，他对斯大林决定尽量使西班牙内战拖延下去的说法符合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策略。

## 第十章 将革命伪装起来

由于担心卷入一场与意大利和德国的战争，在英国和法国可能因意大利和德国在西班牙的强势地位威胁到它们的地中海利益而被迫放弃不干涉政策之前，苏联的援助仅限于支持反佛朗哥势力的抵抗行动。此外，苏联小心翼翼地不去影响革命左派，也不与他们发生关系。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会在世界各地那些共产国际正在谋求其支持的阶层当中重新引起恐惧和反感，而这正是苏联一直万分焦虑地竭力避免出现的情况。这将给法国的人民阵线致命一击，在那里，人民阵线内部的意见分歧已经越来越严重；而在其他国家，这将使与温和党派建立某种合作基础的一切努力白费功夫，特别是在英国，那里的共产党人为组成人民阵线而开展的活动受到来自工党的抵制。“法国的人民阵线已经击退了法西斯反动派并且坚持为了和平与苏联结盟的政策。”一名英国共产党员写道，“如果我们能够在英国做到同样的事，如果

我们能够战胜反对联合的邪恶势力，如果我们能够缔结一项与法苏条约相应的英苏条约，那么，我们就能建立一条可以遏制法西斯的战争攻势的战线。”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从西班牙内战刚一爆发，共产国际就试图把反对佛朗哥将军的斗争解释成为一场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以向外界最大程度地淡化甚至掩盖这场深刻的革命。

大约四十年后，一名反对西班牙共产党的左翼人士概括性地描述了共产国际及其西班牙支部在下面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困境：“共产国际和西班牙共产党只能通过歪曲事实解决使其进退两难的那些问题。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所发生的事情——消灭雇主和神父，没收企业和土地，工人管理，建立革命委员会，农民集体化，工人民兵和人民法庭——不是进行社会革命；这终究不是一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战争。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与封建蒙昧残余之间的战争，是一场合法政府反对军事叛乱的斗争，是一场西班牙国家与纳粹入侵者的斗争。”

具有三十年党龄的前共产党人费尔南多·克劳丁写道：“[对于斯大林来说]问题是，西班牙的无产阶级摆脱了远远落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些合理的限制。七月十九日之后的那几个星期，在共和派控制区，资本主义制度的秩序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生产资料和政治权力事实上落入工人组织之手。所有研究西班牙内战的历史学家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只有那些为了证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合理而罔顾历史真相的人除外。后面这种‘历史学家’始终宣称，西班牙革命的实质从未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因为如果不这么说，那就是承认斯大林分子在西班牙的政策是要掩盖这场革命。”

一位西班牙问题的权威学者写道，共产国际特别担心它的政策在民主国家中被广泛

宣传。“因此，各国共产党的前沿组织和支持共产党政策的观察家都强调新政策的资产阶级特征，例如美国的路易斯·费希尔。路易斯·费希尔在他的《西班牙内战》一书中宣称：‘……有些人把共产党在西班牙的民主主张看作一种诱导外国民主政府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支持共和派的战术策略。这样认为是错误的；这种策略使用起来很快就会被识破。民主口号意味着，共产党不想在西班牙建立一个与苏联一样的由一党支配的独裁政权。西班牙的条件不同。’”

尽管西方各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通过外国媒体驻西班牙的机构以及逃离西班牙的商人和难民充分了解了西班牙革命的激进性质，共产党人及其盟友仍然慷慨激昂地反复谈论这场革命的民主特征。

一九三六年八月，在一篇被世界各地的共产党报刊普遍转载的文章里，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安德烈·马蒂写道：“西班牙的工人阶级政党已经在一些场合明确表示了它们的奋斗目标，尤其是西班牙共产党。我们这个兄弟政党一再表明，目前在西班牙进行的斗争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而是法西斯主义与民主的斗争。在一个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里，封建的习俗和基础仍然根深蒂固，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捍卫、巩固并且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唯一可能完成的任务，共产党最近发出的所有呼吁反复强调证明的也是这一点。”

“七月十八日我们党在自己的日报《工人世界报》各个版面的显著位置上所刊登的唯一一句口号是：‘民主共和国万岁！’”

“所有这些尽人皆知。只有不诚实的人才会相信相反的说法。……对极少数财产——例如叛乱分子的办公室和报纸——的没收充公合法制裁了证据确凿的敌对分子和阴谋颠覆政权的人，采取没收措施不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而是作为保卫共和国



的手段。”

“作为对于某些报刊偏颇离奇报道的回应，”法国共产党八月三日发表声明，“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请求我们告诉公众，在与军事叛乱的斗争中，西班牙人民并不是在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他们只有一个目的：捍卫共和国的秩序并且尊重个人财产。”另外，法国共产党在同一天发表的一份宣言中声称：

“当我们宣布西班牙不存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时，我们是在代表共产党的同志、代表社会党人以及所有在西班牙为自由而战的人说话。

“那里只有一个简单的捍卫由宪法政府所领导的民主共和国的问题，面对军事叛乱，这个政府已经号召人民保卫共和国政权。”

“西班牙人民不是在为建立苏维埃或无产阶级专政而战。”几天之后英国共产党的书记哈里·波利特写道，“只有满口谎言的骗子或者蛊惑人心的自封‘左派’才会说他们正在这样做——而且两者都有助于法西斯叛乱分子达到目的。”甚至直到七个月后，发表在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刊物《劳动月刊》上的一篇文章还宣称：“说资产阶级经济已经‘消失’纯属一派胡言。”

“的确，人们有时感到意外。”敏锐的观察家弗朗茨·博克瑙写道，“[由共产党控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议员表示，西班牙根本没有发生革命，另外，我与之进行过长时间讨论的那些人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加泰罗尼亚的资深社会党人，而是外国共产党人。他们解释说，西班牙面临着特殊的形势：政府正在与自己的敌人作战。这就是一切。我暗示了这样一些事实：工人被武装了起来，行政权力被革命委员会掌握，成千上万的人不经审判就被处决，工厂和农庄不断被没收并且由其以前的雇员管理。如果这都不是革命，那么革命是什么呢？他们对我说我弄错了；这些都没

有政治意义；它们是没有政治含义的应急措施。”

八月七日，社会动乱蔓延的第三个星期，主管马德里的共产党报纸《工人世界报》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向外国新闻界发表如下声明：“[我可以如实地告诉你们，发动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既不是工人阶级的计划，也不是工人阶级的想法。过去几天我党已经通过我们的书记何塞·迪亚斯、我们的同志‘热情之花’和《工人世界报》多次重申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在不失共产党人的本色并且完整地保持党的革命性的同时，我们确信，为了建立我们能够实现最高理想的国家所必需的某些历史条件目前并不存在。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土地问题和一切具有民主革命特征的问题仍有待解决。因此，在完成[革命的]这一阶段之前，我们不可能，我们不应当，我们也不会谈论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像共和国的反叛者所宣称那样建立共产主义。”

在前面过去的几个星期，共产党人利用意大利和德国的干涉进一步淡化了西班牙内战的阶级特征。“起初，”西班牙共产党的一份宣言声称，“它可能仅仅被称为一场民主与法西斯主义、进步与反动、过去与未来的斗争。但是现在，它已经突破了这些界限，转变成为一场圣战、一场民族战争、一场人民保卫战，人民感到他们被背叛了，感到他们内心深处的感情受到伤害。”

## 第十一章 拉尔戈·卡瓦列罗组成新政府

毋庸置疑，只有在其他党派组织默许或者积极支持的情况下，共产党才能开始推行其掩饰或者歪曲西班牙革命的真正性质和波及范围的政策；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为了确保它的政策取得成效，共产党必须成为左派阵营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政党。只有通过削弱其他左翼运动，共产党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尤其是要削弱社会党左派的力量，后者控制着社会党的工会组织劳动者总工会和有影响力的社会党马德里分支马

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尽管内战之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合会开始在首都不断壮大，社会党人很可能仍然是革命爆发之后马德里和新旧卡斯蒂利亚地区 最强大的力量。

我们已经看到，在内战爆发之前的那几个月，社会党左派与共产党的官方关系极其热情友好，以致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天真地认为，他能够兼并共产党——后者已经支持他合并了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工会组织以及两党的青年组织。此外，他所控制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已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决定，在党的下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议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共产党本身坚决拥护这一合并。但是，尽管官方关系顺利发展，社会党左派领导人为立即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而开展的鼓动宣传却让共产党人不胜其烦，因此，他们在私下里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极端革命倾向形容为“左派幼稚病”。

由于共产党与社会党左派潜在的分歧，一九三六年七月革命的爆发使他们截然不同的态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一九三七年三月，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在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一份报告中声称：“当共产党提出必须保卫民主共和国时，社会党人——我们的大部分社会党同志——认为民主共和国已经失去政治意义，因此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将使工人阶级脱离民主力量，脱离小资产阶级和西班牙的大众阶层。当然，由于一些社会党同志不明白……现在不是谈论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谈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民主共和国的时候，我们所奉行的把一切民主力量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政策将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尽管没有记录显示社会党领导人在革命爆发时曾以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发表过强烈要求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公开声明，但是，在与共产党人私下进行的会谈中，他们可能提出过这个建议。毫无疑问，这个建议与拉尔戈·卡瓦列罗战前推行的

要求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政策完全一致，与内战爆发初期其最狂热的支持者所追求的目标完全一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领导人的主张从没有受到故意的挑战。确实也没有任何人站出来否认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共产国际成员和西班牙国际纵队的组织者安德烈·马蒂的说法，马蒂的大概意思是，由于共产党人的影响，社会党人放弃了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计划。“从军事叛乱的第一天起，”马蒂在一九三七年说，“当共产党宣称当务之急是保卫民主共和国时，许多社会党高级领导人则相反，他们主张应当立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将直接瓦解人民阵线从而导致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今天，由于我们的影响，许多社会党领导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看法并且接受了共产党的纲领。”

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上旬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尼奥·米赫断言：“就连过去那些经常不顾当前的形势大谈特谈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现在也都认识到了共产党保卫民主共和国这一路线的正确性。”

肯定是为了不让拉尔戈·卡瓦列罗受到屈从于共产党政策的指责，其支持者竭力避免公开谈论他的态度的突然转变。实际上，直到内战结束多年以后，当被别人问到时，这位社会党领导人的最亲密的朋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仍然认为何塞·迪亚斯和安德烈·马蒂的说法是一个“纯属胡说八道”的“共产党谎言”而不予置评。

到八月中旬，与其早期使用的——至少是对外界使用的——革命用语相比，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语言已经变得相当温和，例如，他在写给英国工会领导人本·蒂利特的一封信中声称，西班牙社会党人只是在为民主的胜利而斗争，并不打算建立社会主义。从没有人确切地透露过共产党领导人究竟向摇摆不定的拉尔戈·卡瓦列罗列举了一些什么理由，但是，如果他们的说法确有其事——这似乎非常有可能，那么，他们肯定认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将会引起西方列强的敌意，从而失去通过使

何塞·希拉尔内阁继续执政而获得的那些利益，因为，鉴于各个大国在发生反对合法政府叛乱的情况下所普遍采取的政策，希拉尔内阁可以合理地认为，它被允许在世界市场上自由购买武器。

共产党人竭力想让西方民主国家认为一个温和的非革命政府全面控制着西班牙的形势有其迫不得已的原因。例如，公共档案馆多年以后公布的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副手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所写的下面这份备忘录证明：“我要说的是，在相对正常的情况下——即，‘[西班牙]现政府’实际控制着国家并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性——即使没有两国间的协议，我们也应当最严格地遵守我们一贯奉行的常规政策，允许或者批准向公认的西班牙政府运送物资，同时对叛军实行禁运。但是，在西班牙目前的情况下，或者说在有可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不能盲目遵循常规。西班牙现政府是怎么回事？巴塞罗那那些掌权者在多大程度上承认马德里当局？后者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控制着马德里？……撇开国际方面的问题和我们想要避免‘一刀切’的愿望不说，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可能更清楚地看到，‘西班牙现政府’越来越不值得他们同情，甚至对于我国的工党人士来说也是如此。”

无论在私下进行的讨论中共产党人提出的“西班牙政府应当向西方列强显示某种温和的外表”这一有力论点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影响可能有多大，但是，从他的喉舌《光明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所发表的一篇社论来看，显然，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持有异议，因此，并不准备完全放弃革命行动。这篇社论肯定是由这份社会党左派日报的负责人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私人顾问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撰写的，它写道：“有些人一直在说，‘让我们首先打败法西斯主义，让我们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然后，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会有时间谈论并且发动革命。’表达这种意见的人显然没有慎重地考虑过我们正在经历的不可抗拒的辩证过程。战争和革命是同一

件事情。它们不仅并不相互排斥或妨碍，而且相互促进或补充。为了战争胜利需要革命，同样，为了发动革命需要战争。

“革命是在经济上对法西斯主义的毁灭性打击，因此，它是在军事上消灭法西斯主义的第一步。……人民不是在为七月十六日的西班牙而战，那个西班牙仍然是一个被世袭的等级制度统治的社会，人们是在为一个最终根除了等级制度的西班牙而战。辅助战争的最强大的手段是在经济上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后方的革命将更加有效地促进并保证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在内战爆发之后那几个星期造成共产党人与社会党左派不和的一个重要原因竟然是他们对何塞·希拉尔的自由共和派政府意见不一。共产党人尽其所能支持摇摇欲坠的希拉尔政府，为此甚至让人想起他们用过的溢美之辞。共产党的西班牙内战史断言：“希拉尔政府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知道接受并且承认正在西班牙出现的新的政治社会现实。”

在一部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比森特·乌里韦写道：“尽管希拉尔政府更像是一个影子内阁，党仍然竭尽全力支持它。……它随时可能自动垮台。它是共和国的合法化身，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它。”

正如拉尔戈·卡瓦列罗最信赖的顾问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当时巴达霍斯和梅里达刚刚陷落，它们的失陷使佛朗哥将军的南方部队与北方部队会师——写给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的一封密信所显示的那样，共产党对希拉尔政府的支持与阿拉基斯塔因对希拉尔政府的怀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乖巧地表示他为在“根本性的问题上不必经过事先讨论我的想法几乎总是与您一致”感到自豪之后，阿拉基斯塔因写道：“……我们现在承担的责任如此重大，尤其是作为我们报纸的负责人，我身上的责任特别重大，因此，由于不知道您是否具有同样的看

法，我不敢冒昧地就当前的政治形势应当发生的必要变化发表个人意见。”接着，他继续写道：

共和国政府名存实亡。它既没有权威和能力，也没有进行残酷的战争从而保证取得完全彻底的革命胜利的决心。比任何人都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您比我更清楚这一点。支持这个政府继续执政将使胜利受到威胁。……由于完全是因为政府的无能而发生的那些事情，例如前天晚上人们在模范监狱的所作所为[处决政治犯]，每过一天出现复杂的国际局面的可能性都在增加，我们失去外界同情的可能性也在增加。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这个政府应尽快消失。……

再组成一个共和派政府毫无意义。它将像目前这个政府一样愚笨无能、不起作用。一个以普列托为首的全部由他的朋友[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温和派人士]和共和派人士组成的政府也不可能使局面得到多大的改善。……从革命进程的角度看，[这]将使前方的战士更不信任共和国政府。这将加重民兵的担忧，同时可能妨碍他们为一项其政治社会目标对他们来说并不明确的事业而战。

如果我们拒绝接受普列托或者其他政治倾向与他相同或者接近的人——例如[胡利安·]贝斯泰罗——的话，那么，您就成为所剩下的唯一人选。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个由我们左派组成的清一色政府或是一个由各派组成的混合政府。前者将遭到共和派政党、温和派人士的坚决反对，尤其是阿萨尼亚的坚决反对，至少在战争持续期间会是这样。……另一方面，我相信，他不会反对一个以您为首政府……只要温和派与共和派接受这种解决方案。……如果他们不接受，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前考虑用暴力夺取政权的时候就到了。……

我知道，您也不愿与那些具有截然不同甚至互不相容的意识形态的人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但是，我认为，一个可能的联合政府不会在国内外引起恐慌，而且实际上

它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战时政府，不用说，同时也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府。一切取决于如何分配部长的数量和职位。……下面是我所说的这个设想中的政府：

社会党人（第一类——左派）

总理

国防部长

内政部长

海军部长或财政部长

国务[外交]部长或农业部长

社会党人（第二类——中间派）

财政部长或海军部长

农业部长或国务部长

工商部长

共产党人（最终，一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公共工程部长

劳工部长

共和派人士



交通部长（左翼共和派）

公共教育部长（共和联盟）

司法部长（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这样分配肯定能够改善局面。不过，重要的是控制那些对战争和革命起关键作用的部长职位并且掌握足够的部长数量以确保多数。……这样一来，严格地讲，真正的政府是第一类人，那就是您。……

我所勾画的这样一个联合政府将会产生预期的效果，不然的话，可以通过清除三心二意的人或反革命分子来改组政府使其具有更纯粹的左派倾向。一旦权力被您掌握，阿萨尼亚将不再是政府发生进一步的革命性转变的障碍。……

我不要求您对这封信作书面回复。您可以用只言片语把您对这一切的意见口头告诉我。

拉尔戈·卡瓦列罗对阿拉基斯塔因答复无案可查，但是，他肯定具有同样的看法。三天后的八月二十七日，他向《真理报》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认识科利佐夫的阿瑟·科斯特勒称其为“苏联最杰出与最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和“斯大林的密友”——抱怨说，希拉尔政府“完全不称职”。“那些部长无能、愚蠢而且懒惰。”他怒斥道，“没有人听[部长的]。他们根本不关心别人正在做什么。他们没有一点责任心或者形势严峻的概念。……此外，他们代表的是谁？所有民众的力量脱离了政府体系团结在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工会的周围。工人民兵不信任政府。群众向我们伸出了手；他们要求我们领导政府，但是我们保持低调，我们避免承担责任，我们仍然按兵不动！”

关于一触即发的危机，一名前议会议员提出了下面这种说法，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考虑到阿拉基斯塔因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密信，他的说法有可信的成分：在巴达霍斯陷落之后其追随者在马德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拉尔戈·卡瓦列罗决定以一个工人阶级政府取代“无能的”希拉尔政府并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是由于苏联大使的及时干预，这一计划才半途而废。大使成功地论述了战争应当继续“在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下”进行，从而避免“过早地建立工人阶级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将带来的危险”。尽管西班牙共产党否认这种说法，但其官方内战史实际上仍然证实了它：“另一方面，拉尔戈·卡瓦列罗确实加强了对希拉尔政府的攻击，他对希拉尔政府的指责更加尖锐，特别是在八月底，当时共和国的军事形势已经恶化。他的一些最亲密的战友，像阿拉基斯塔因和[卡洛斯·德·]巴赖瓦尔，或多或少地公开鼓动支持清除共和派部长，然后为建立‘工人阶级专政’把国家交给卡瓦列罗管理。”

没有共产党人和社会党温和派——他们在内阁中并没有正式职位，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支持，希拉尔政府肯定将孤立无援。就连几周以来一直努力在幕后支持政府的社会党温和派或中间派领导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都嘲笑它的无能。“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没有担任正式职务。不过，”八月二十六日采访了这位社会党领导人的科利佐夫写道，“为他提供了宽敞、豪华的办公室，还有一名海军部的秘书人员。……他坐在扶手椅子里，带着嘲讽表情的苍白的脸上堆满了横肉。他沉重的眼皮半睁半闭，但是，眼皮下面那双西班牙最警觉的眼睛凝视着你。他赢得了务实政治家稳固而持久的声誉，非常精明甚至狡猾。……我问他对形势的看法。十分钟后他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透彻而悲观。他嘲笑了政府的无能。”

另外，国际纵队政委和二战后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彼得罗·南尼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写道：“我曾经观察过普列托几天。与一般人相比，他是一部不停运转的庞大的机器。他同时思考一百件事情。他了解一切。他洞察一切。……穿着衬衫，汗流浹

背，气喘吁吁，因达莱西奥叫来一个又一个人，下达指示，签署文件，记下笔记，对着电话咆哮，责骂某个人，对另一个人微笑。他什么也不是；他不是部长；他只是休会议会的一名议员。然而他又什么都是；他是政府行动的策划者和协调人。”

任凭普列托在幕后疯狂活动，政府仍然虚弱无力，这位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尽管看不起拉尔戈·卡瓦列罗及其激进政策，但是，普列托承认，他是当时可以担任政府首脑的唯一一位政界人士。“他是一个总想显示聪明的傻瓜。”普列托对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说，“他是一个扮演狂热分子角色的死板官僚，一个搅局者，一个把自己想象成为领导有方的官员的好事者。他是一个可以毁掉一切事情和所有人的家伙。过去几年我们的政治分歧是社会党内斗争的焦点。但是无论如何，至少在目前，他是唯一的人选，或者说仍是更为合适的人选，他是唯一一个可能适合担任新的政府首脑的人。”普列托接着补充道，他准备加入拉尔戈·卡瓦列罗领导的政府，因为“对于西班牙或者我来说，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我对国家还有用处的话”。

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反对政府的任何变更，因此，摇摇欲坠的何塞·希拉尔政府又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但是，面对佛朗哥将军的军队向马德里闪电般的推进，同时厌倦了主持一个只是在理论上拥有国家权力并且失去大多数工人支持的政府，据《光明报》报道，在阿萨尼亚总统的建议下，何塞·希拉尔提出，将政府扩大到包括人民阵线的其他党派。尽管报道没有说拉尔戈·卡瓦列罗是出任一个新内阁的首脑还是仅仅参加一个由希拉尔领导的扩大了政府，不过，权威的科利佐夫澄清了这个疑点。他在九月三日的日记中特别提到，内阁最初的改组是有限度的。分属普列托和卡瓦列罗派的两三名社会党人加入政府。但是，那位“老人”突然要求由他担任国防部长，随后几乎立即要求担任总理。这遭到了除普列托之外的普遍反对。人们认为卡瓦列罗的“直率、孤僻、急躁”将使“正常的合作不可能进行”。当时身为拉

尔戈·卡瓦列罗信赖的顾问但是同情共产党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极力劝说这位社会党领导人，他应当担任国防部长而把总理职位留给希拉尔。接着，大家拜访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使它能出面调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样反对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政府首脑，但是后者坚持“非这样不可”。科利佐夫注意到，总体形势和时间的压力对卡瓦列罗有利，因为危机的传闻正在蔓延，而且在战时这种形势一天也不能继续拖延。“普列托宣称，尽管他与卡瓦列罗的关系众所周知，但他不会反对后者并且准备接受由其领导的政府中的任何职位。……对于大家来说，接受一个以这位老人为首的政府是一件令人非常苦恼的事情。……无论如何，拉尔戈·卡瓦列罗现在事实上是工人运动最德高望重而且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至于他的具有煽动性的左倾极端主义，德尔巴约让大家放心：在他担负着治理国家职责的非常时期，这种倾向将销声匿迹。”由于认为自己拥有坚实的基础，接着，科利佐夫继续写道，卡瓦列罗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又提出了一个要求：共产党加入他的内阁。“共产党对此表示反对。它更愿意全力支持人民阵线政府同时继续置身事外；此外，它不想制造不必要的国际麻烦，以免未来的政府被人称为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政府。老人声明，所有这些都是废话，他也会拒绝，也可以让一切见鬼去，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共产]党都将负有责任。”塞萨尔·法尔孔在内战爆发的头几个月担任马德里的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世界报》的编辑，共产党拒绝参加政府得到了他的证实：“共产党坚持与卡瓦列罗相反的立场。当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和国际形势均不适宜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参与时，为什么要改组政府呢？”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党温和派人士胡安·内格林博士（他将成为西班牙内战时期最具争议的人物）对组成一个以拉尔戈·卡瓦列罗为首政府——他在这个政府中得到了财政部长的职位——这个主意的最初反应与共产党人相似。“从国内和国际的角度看，”他对一位社会党的同志说，“我没有听说过更愚蠢的行为。我们决定输掉这

场战争吗？不要指望我的配合。”

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比森特·乌里韦写道：“有一次，拉尔戈·卡瓦列罗提出建议，我们应当接管国防部并把希拉尔赶走。当然，我们予以断然地拒绝并且解释了我们的理由。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于是我们中止了会谈。后来，卡瓦列罗派代表询问我们是否已与他断绝关系。我们告诉他，我们没有与他断交，但是，他不能指望我们强行赶走希拉尔，因为我们大家必须把彼此视为从事一项共同事业的盟友。”

不过，面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顽固态度和莫斯科下达的共产党应该加入政府的新指示——据前西共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接到莫斯科的指示时他们“一点也不惊讶”——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立场，结果，一个新的内阁组成了。

面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固执己见，克里姆林宫和共产党政治局别无选择只能让步。共产国际代表鲍里斯·斯特凡诺夫在写给莫斯科的一份长篇报告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面对卡瓦列罗和社会党少壮派准备以暴力推翻希拉尔政府的局面，”他写道，“共产党决定加入[新]政府以防止发生这种变化。”如今可以在马德里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历史档案馆里找到这份报告。

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未能在激烈的讨价还价过程中组成阿拉基斯塔因所建议的那种类型的政府，但是，公众表现出特别的热情欢迎九月四日组成的新政府。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是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对手，他回忆说：“形势正在恶化，情况非常严重。敌军到达[位于通往马德里的交通要道上的]塔拉韦拉—德拉雷纳。人们以难以形容的热情为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出现而欢呼。民兵列队从他面前走过，向他发出欢呼声并且宣誓宁死也不后退。内阁改组恢复了低落的士

气。”

内阁成员——他们所属的党派及其所担任的部长职务——如下：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	社会党（左派）	总理兼国防部长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社会党（左派）	外交部长
安赫尔·加拉尔萨	社会党（左派）	内政部长
安纳斯塔西奥·德·格拉西亚	社会党（温和派）	工商部长
胡安·内格林	社会党（温和派）	财政部长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	社会党（温和派）	海军和空军部长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	共产党	教育和艺术部长
比森特·乌里韦	共产党	农业部长
何塞·希拉尔	左翼共和派	不管部长
马里亚诺·鲁伊斯·富内斯	左翼共和派	司法部长
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	共和联盟	通讯部长
何塞·托马斯-彼埃拉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劳工和卫生部长

何塞·马利亚·阿吉雷是卡瓦列罗的政治军事秘书，曾经陪同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去总统府与阿萨尼亚磋商，他作证说，卡瓦列罗希望阿拉基斯塔因担任他的外交部长，但阿萨尼亚否决了这个建议。据说，卡瓦列罗告诉阿吉雷：“德尔巴约是一个苏联间谍。俄国人对阿萨尼亚施加了压力——就像他们正在对我做的一样，让他把外交部长的职位交给德尔巴约。如果我们拒绝的话，他们将不向我们提供武器。”接着，卡瓦列罗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阿拉基斯塔因。后者后来对阿吉雷说：“我劝告[卡瓦列罗]向阿萨尼亚和俄国人让步。因为德尔巴约不太聪明，我们应当控制他。我将前往巴黎[担任大使]。为了避免失败，我们必须做到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当月晚些时候，左翼共和派成员胡利奥·胡斯特被任命为公共工程部长，接着，巴斯克民族独立党成员曼努埃尔·德·伊鲁霍被任命为不管部长。

“资产阶级党派加入忠于共和国的政府是……一种象征。”当时苏联政策的代言人路易斯·费希尔写道，“它是为了向法西斯西班牙的资本家和外部世界表明，共和国并不打算在取得内战的胜利后建立苏维埃政权或共产主义制度。”

信奉天主教的中产阶级政党巴斯克民族独立党反对军事叛乱并且——以准许巴斯克地区自治为条件——同意加入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这一事实被共产党和同路人在国内外的宣传中充分利用。下面一段话摘自一九三七年六月十日刊登在民族主义报纸《阿拉贡信使报》上的一封信，据说这封信是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给另一名未说明身份的政府成员的，鉴于它的可信性，值得在此予以引述：“我多次想起四个月前你在我面前说过的话！你说，必须给外界造成[政府]具有资产阶级倾向这种印象——你也应该记得，我立即表示同意。在国外，没有什么事情像联合巴斯克民族独立党一样对我们这么有利。”

共产党对成为巴斯克自治政府总理的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的赞扬时常夸张得令其尴尬。“我必须承认，”他在一份致中央政府的报告中写道，“对我来说，报纸的赞誉和宣传有时过于夸大其词，尤其是共产党的报纸，它们的形容极尽热情褒奖之意，反而让我受宠若惊，羞愧得无地自容。这种老套的策略在巴斯克人民中没有市场，他们简单纯朴，从不口是心非。”

关于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组成，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注意到：“共产党与社会党以及形形色色的中产阶级政党还是第一次一起加入一个联合政府。共产党人与天主教徒成为同一个政府的组成部分同样也是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具有这些

特点的联合政府尚无先例。”正如斯坦利·G·佩恩所指出的那样，具有更重要的历史意义的是以下事实：这一前所未有的联合是“战时的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率先体现的几个主要特点之一，凭借着这些特点，它预演了在欧洲的二战废墟上冒出来的那些联合政权和‘人民民主政府’”。

## 第十二章 共产党争夺控制权

尽管共产党在新政府中只占据了两个部长职位，但是，为数不多的部长职位并没有真实反映共产党在这个国家拥有的实力：内阁组成时，它的追随者队伍已迅速壮大，远远超过了内战之前的四万人；几个月后，它成为反佛朗哥阵营中最强大的政治派别，根据一项官方统计，其党员将近二十五万。据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说，准确的统计数字是二十四万九千一百四十人，其中产业工人为八万七千六百六十人（百分之三十五点二），农业工人六万二千二百五十人（百分之二十五），农民——也就是小地主和佃农——七万六千七百人（百分之三十点七），城市中产阶级一万五千四百八十五人（百分之六点二）以及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七千零四十五人（百分之二点九）。

如果许多新的共产党的追随者——例如小地主、佃农、小店主、小工厂主、公务员、军官、警察、医生、教师、作家、艺术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战前曾经是自由共和派人士甚至是右派的同情者，只是由于希望从旧政权的废墟中挽救某种东西或者分享共产党越来越大的权力才受到共产党的吸引的话；此外，如果数量可观的共产党的追随者战前曾是社会党党员或劳动者总工会会员的话，那么，数量更多的共产党的追随者以前从没有把他们的信仰纳入过任何政治模式，如今，像改变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看法一样，由于共产党发展党员的热情、极其巧妙的宣传、在政治和军事两个领域表现出来的活力和组织能力以及因苏联武器和专家而获得的威望，他们



被共产党所吸引。

下面这些来自各种原始资料的证据说明了共产党人在发展新党员方面取得的成功：

“共和派中产阶级对共产党宣传的温和腔调感到意外并对普遍存在于该党党内的团结气氛和务实态度印象深刻，他们成群结队地大批加入了它的队伍。”社会党人历史学家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写道，“从没有翻阅过马克思主义宣传品的军官和官员变成了共产党员，一些人经过深思熟虑，一些人由于道德缺陷，还有一些人则为被该组织激起的热情所驱使。”

“如今，资产阶级将军和政治家以及许多赞成共产党保护小块土地拥有者的政策的农民已经加入了它的队伍。”路易斯·费希尔写道，“我想到了这些人的影响力以及他们所受到的影响。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新的政治身份反映了对旧的社会制度的绝望，同时他们还希望挽救残存的一些旧的制度。”

“每当波尔迪带我们去与各部年轻的官员交谈时，”社会党人阿图罗·巴雷亚写道，“我总是试图对他们进行评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大多来自上层中产阶级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现在纷纷宣称自己是共产党员，对于他们来说，在马德里加入共产党，不是因为它是一个革命工人的政党，而是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加入了最强大的团体，可以分享其既定的权力。他们已经跃过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他们讲求实效，冷酷无情。”

至于知识分子，另一名社会党人F.费兰迪斯·阿尔沃斯肯定地说：“西班牙传统的骄傲已经因为知识分子而变成了耻辱。他们几乎全都向共产党的意志卑躬屈膝。”在马德里围城初期，共产党控制的第五团以精心设计的方案疏散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为他们提供各种安慰和保护，这表明了共产党为争取西班牙知识界的支持所做的努

力。

前共产党人费尔南多·克劳丁是一名具有三十年党龄的党员，他写道：

共产国际和西班牙共产党从一开始就知道军事问题的决定性意义。在苏联专家和外国共产党精英的帮助下，西班牙共产党全力以赴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它的组织结构、运转方式以及训练有素的骨干分子使它特别适于做这件事。……必须立即创建半军事化的布尔什维克模式，按照这种模式，西班牙共产党可以迅速将自己变成共和国的军事组织、变成军队的核心力量。离开这种模式，自由主义实验、共和国政权、共和派政党和工会，一切都将死路一条。这个最基本的常识使群众超越其政治和党派倾向认识到，没有一支军队，没有统一指挥，没有纪律约束，没有战时经济，在前线和后方没有共产党所提出的那种“钢铁般的”团结，不使一切考虑服从于打败正在逼近的敌军这一当务之急，就没有生路。在内战爆发的头几个月，如果共产党及其庞大的外围组织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JSU）的成员数量像它的政治威信和影响力一样迅速增加了的话，那不是因为无产阶级认为西班牙共产党比卡瓦列罗分子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更革命”，而是因为它的目光更锐利并且具有更强的处理关键问题的能力。苏联通过援助共和国而获得的声望肯定对西班牙共产党的实力增长影响不小，不过，我们刚刚指出的才是其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劳动者总工会——更不必说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基层工会中，也就是说，在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当中，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和影响力相对来说增长较慢。西班牙共产党所获得的秩序和法律的捍卫者以及小业主的保护人的声誉吸引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入了党。而且尤为重要，共产党的军事才能以及某种被简化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革命被认为是掺杂着爱国精神的反法西斯主义——吸引大量没有受过传统的工会和工人组织训练的青年人成为共产党的追随者，或者通过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作为共产党实力增强的某种原因，与上面这些几乎同样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其他党派组织的相对虚弱甚至无能。从内战爆发开始，对民众失去了影响并且明显力不从心的共和派退居幕后，或者像一位西班牙共和国的朋友指出的那样，他们“在整个内战期间保持着一种麻木状态”，把阻止左派革命和保护中产阶级利益的棘手任务丢给了共产党人。这种变化的征兆是左翼共和派的喉舌《政治报》对共产党作了正面的宣传。“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态度变化……非常有趣。”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写道，“过去他们尽量不提共产党，并以仇恨和轻蔑的语气谈论它。现在，某些共和派的舆论工具用整版的文章赞美它。”

左翼共和派不仅友好地宣传共产党，声称它所表明政策与他们自己的正好相同，例如，本人身为左翼共和派成员的何塞·希拉尔就说，他的党派与共产党人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而且，用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话说就是，他们竟然多次为苏联的野心效力。

此外，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人数众多，但是，由于失去了中心目标，与具有稳固的组织、强大的凝聚力，尤其是严格的纪律的共产党人相比，他们已经不是对手。据前意大利共产党员、巴伦西亚的共产党报纸《真理报》的负责人埃托雷·万尼说，共产党的纪律“被狂热地接受，以致人们立即变成了工具，从而形成了我们的力量。面对战争的需要，家庭，个人，一切东西都不复存在。对我们来说只有党——党无时无刻不在”。

在西班牙共产党的行为准则中，不择手段和极权主义本质成为其政治成功的主要因素。杰拉尔德·布雷南写道：

[共产党人]不能理性地讨论问题。他们的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顽固的极权主义气息。他们的权力欲贪得无厌而且完全不择手段。对于他们来说，打赢内战意味着为

共产党赢得权力。……不过，更为重要的也许是，他们没有道德底线或政治操守。他们的机会主义涉及方方面面。只要出尔反尔保证获利，他们似乎没有什么不能改变的纲领，就像利用无产阶级对付中产阶级一样，他们打算利用中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肯定有助于随心所欲地歪曲历史；尽管如此，他们对于自己过去许多信条的背弃仍然让人想起十七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壮举，为了更有利于改变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这些传教士隐瞒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迹。这是一个值得强调的对比。因为他们忠于一个组织而不是一种思想，忠于一个外国教皇而不是一个民族群体，他们遵循的是罗耀拉所开创的道路。他们对西班牙的影响也非常相似。正如耶稣会士从莱内斯时期起就已背弃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伟大的苦行神秘运动并且拼命将一切都变成盲目的服从和奉献一样，共产党人表明，他们不喜欢伴随着革命而产生的极度的情感释放。他们不赞成一切冲动，无论是情感失控还是情感所造成的失控，因此，他们对各种形式的情感释放采取严格的实用主义态度。

由于失去了中心目标，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无法与组织稳固的共产党对抗，外国共产党的精英出谋划策指导并且加强了共产党的组织。“在为自由主义者辩护的同时，应当清楚地说明，”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塞萨尔·M·洛伦索写道，“社会党人、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党派成员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严重影响政治生活的不仅是教育的缺失，而且还有陈腐过时的教育，这种教育几乎不传授科学知识并且一直被教会所垄断（尽管有人努力推广教育，例如中产阶级的弗朗西斯科·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和无产阶级的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使受教育的人能力低下。”即使确如洛伦索所说，内战爆发初期全国劳工联合会在马德里占据了支配的地位，它这种并不稳固的支配地位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他证实，由于不打算夺取政权，全国劳工联合会没有它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或马拉加所拥有的那种无可争辩的控制权，因此，它不能大权独揽地指挥军事行动、领导警察和司法部门或者改变经济结构。“结果，马德里

陷入了难以形容的混乱状态。各种意识形态群体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每个国中之国都有自己的民兵、自己的法庭、自己的‘契卡’、自己的监狱、自己独占的建筑物、自己的食品和军火库；它们以自己的方式打仗并且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采取行动。.....[共和国]政府无法履行统一的职责。由于事实证明社会党人太缺乏活力以致无法承担这一责任，由于共和派因其信条、因其坚决反对独裁专制而不能或者不愿承担这一责任，其他党派理所当然将取而代之。这个党派就是共产党。

“从一开始斯大林分子就创建了一种军事组织。他们遵守纪律的军队等级森严，配备了完善的后勤供应，因此很快显示出对于其他民兵武装的优势。.....九月和十月，他们从共和派手中夺取了控制权并且吸引其他党派跟随其后，俨然首都最有力的保卫者。”

在后面的一段内容里，洛伦索坚持认为，只要百分之九十的民众赞同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所宣传的思想，西班牙就可能发生一场自由主义革命。但是，他承认，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怀有敌意的社会政治团体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追随者。

因此，为了建立自由共产主义，必须对许多人采取强制措施，阻止他们进行破坏，阻止他们造谣诽谤，阻止他们制造混乱：必须逮捕他们的首领，解散他们的组织，查禁他们的出版物。也就是说，建立自由共产主义将意味着建立某种自由共产主义专政；这将意味着否定.....所谓“共产主义与各种政权背道而驰，它反对一切压制行为，不设警察和军队”。这将意味着重建国家，把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一种管理其他人的统治阶层，这个阶层将会变得越来越专制并且享有越来越多的特权。（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和马拉泰斯塔已经明确指出了权力的危险并且解释了国家的起源。）

但是，如果这些理论上的考虑及其对于意识形态的忠诚没有使西班牙自由主义者退缩的话，他们实际上有可能掌握政权吗？这一点非常令人怀疑。……只有执行铁一般纪律的政党才有可能掌握政权，那是一个以军队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政党，它有一个革命的参谋部，有权力集中、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和决不妥协的思想路线，作战团队拥有不容置疑的指挥官。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内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每个人都按自己的判断行动，领导人不断受到批评和挑战，各地区联合会的自主权不可侵犯，同样，在各地区联合会的内部，地方协会和分会的自主权不可侵犯。为了做出一项大家普遍接受的决定……积极分子必须全力以赴，发表演说，私下接触，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四处活动。自由主义者对投票表决极为反感；他们追求的一致同意需要进行没完没了的辩论。在这些条件下，纵使其“领导人”希望，全国劳工联合会怎么可能掌握政权？

当革命爆发时，社会党很可能仍然是首都马德里和新旧卡斯蒂利亚地区最强大的势力——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声称情况并非如此。他们的力量很快就被共产党公开和暗中的背叛削弱了，他们自己的消极被动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负有责任。一位曾经深受共产党影响的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承认：“与许多社会党人的暮气沉沉相比，我很欣赏共产党人的朝气蓬勃。”另一名社会党左派人士写道：“我对社会党在困难的情况下承担责任行使职权的能力彻底失去了信心，我的同志托雷斯是社会党青年组织的资深成员，他最近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七年三月九日，社会党温和派的报纸《社会主义者》编发了一群社会党人写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他们将要加入共产党，因为他们自己的政党在各条战线没有显示出活力。

社会党人陷入了派系纷争。以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为首的温和派所控制的社会党执委会与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地方组织势不两立。“各省的组织 and 部门自行其是。”左派控制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中的卡瓦列罗派领导人之一文塞斯劳·卡里

略证实，“马德里的党组织只与一些向其请示的地方组织和支部保持着联系。”“内部纷争表明，”著名温和派人士加夫列尔·莫隆写道，“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命已经衰弱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在后方，像在前线一样，最大胆、最狂热和最不择手段的人把他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让他人感到他们的影响，并显示着自己的个性。”他在后面证实：“具有这些道德品质和多变性格的人没有谁留在社会党内。另一方面，共产党内充满了他们这种人。”

共产党人充分利用了社会党内部的分裂。前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是两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之一，他在内战结束多年以后论及社会党领导人之间的不和时写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千方百计地利用他们的自相残杀。今天我们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明天我们改变立场转而支持另一方。于是，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每天我们都在煽动一方反对另一方，最终导致他们互相残杀，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采取了相当成功的策略。”

在大有希望的情况下，共产党发起的吞并社会主义运动的行动开始了。当然，他们迅速取得的成功——尤其是在扩大其对左派的优势方面取得的成功——将不可避免地使拉尔戈·卡瓦列罗心烦意乱；因为，如他后来声称的那样，当内战之前主张与共产党联合时，他可能以为他有能力兼并他们，绝没有料到被兼并的是他自己的追随者。内战爆发没几天，当此前一直坚定支持他的拉斐尔·比迭利亚所领导的西班牙社会党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与共产党的加泰罗尼亚支部以及另外两个组织联合创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该党接受第三国际的纪律约束并将劳动者总工会的加泰罗尼亚分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时，他表示了强烈不满。但是，在左派控制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在社会党左派的大本营马德里，对拉尔戈·卡瓦列罗势力的威胁全方位地显示出来。由于社会党被内部纷争弄得四分五裂，大批得不到本党派指示的社会党左派工人在共产党的活力及其拉拢手段的影响下发生了动摇，他们的士气越来

越低落并且开始加入竞争对手的队伍。更糟糕的是，拉尔戈·卡瓦列罗在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中最信任的一些助手秘密或者公开地转身投靠了共产党人。这些人包括外交部长和社会党马德里地方组织副主席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建筑工人联合会书记埃德蒙多·多明格斯；劳动者总工会银行雇员工会主席和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成员阿马罗·德尔·罗萨尔；社会党工会组织司库费利佩·普雷特尔；以及两位著名的知识分子议员玛加丽塔·内尔肯和弗朗西斯科·蒙铁尔，他们都是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

一九三七年三月，蒙铁尔在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在这场革命斗争中，一个组织，多年来始终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且几乎是西班牙无产阶级独一无二的领头羊，因为自己的错误四分五裂趋于毁灭；另一个组织，最初由少数人所组成，但是，七月十八日以后，它却在无比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指引下成为反法西斯斗争的真正动力和西班牙人民实际上的带头力量，对此进行思考让我们这些几周之前还不是共产党员的人感到惊讶。”

有损拉尔戈·卡瓦列罗政治影响力的一个更重要的新情况是他对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失去了权威。在内战爆发的三个月前，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由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与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合并而成，双方代表在莫斯科与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一起商定了两个组织的合并方案。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一九三七年声称，在内战即将爆发之前，联盟成员已从合并时的（据他提供的统计数字）四万人增加到了十五万人，一九三七年四月继续增加到三十万人。

据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亲密战友兼顾问——或者像其对手形容的那样是“幕后操纵者”——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描述，这一合并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在他的姻兄弟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家里进行。“我在马德里住他楼上，因此看到社会党青年组织的



领导人常来他家与共产国际的代表会面，后者是个名叫[比托里奥·]柯多维拉的人，当时在西班牙引人注目，他使用梅迪纳这个化名，说西班牙语带有浓重的南美口音。……在那里，为他们安排了莫斯科的朝圣之旅；在那里，为把青年社会党人、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新一代拱手交给共产主义达成了协议。”尽管阿拉基斯塔因当时肯定赞成进行这些谈判，但在内战爆发后他从没有公开承认过他的默许。

人们应当记住的是，内战爆发之前，阿拉基斯塔因和拉尔戈·卡瓦列罗都与共产国际的代表长期保持着热情友好的关系。内战期间以及战后支持共产党的阿马罗·德尔·罗萨尔曾经是卡瓦列罗的支持者和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成员，据他说，一九三四年左派叛乱失败后，共产国际的代表经常去监狱探望卡瓦列罗。他写道：“与共产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热情友好的阶段并在各种场合表现出对苏联的支持。第三[共产]国际的代表与最有名的卡瓦列罗派人士保持着友好关系，例如阿拉基斯塔因、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等等。尽管卡瓦列罗在[他公开发表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忘了说，[一九三四年十月的叛乱失败后]他经常在狱中接待共产国际的代表，其中包括梅迪纳（比托里奥·柯多维拉），后者总是由阿拉基斯塔因或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陪同。一九三四年以前，他在劳动者总工会的办公室里接待他们。……他被释放之后，会见继续在同一个人地方进行。”

至于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四月的两党青年组织的合并，尽管后来所有的说法都截然相反，拉尔戈·卡瓦列罗鼓励推进了这次合并，即使以下情况确有其事：合并进行之前，双方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一致同意，在一个统一的全国代表大会以民主方式确定统一组织的原则、纲领和最终的组织形式并且选出一个领导机构之前，合并以共产党的青年组织成员加入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的形式进行。但是，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整合工人运动的政策推动下，两个青年组织的合并迅速进行，并没有召开统一的全国代表大会。拉尔戈·卡瓦列罗不反对合并，因为共产主义

青年联盟规模小得无法与他的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相比，据估计，与后者的五万名成员形成对照，前者只有三千名成员；而且因为他相信，他可以通过其支持者控制统一后的工人运动。结果，事与愿违，他被无情地欺骗了；因为，内战爆发没几个月，此前一直狂热崇拜他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被人称为宠儿（niñmimado）的社会党领导人，总是讨人喜欢地自称“小圣地亚哥”——与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的另外几名前领导人一起悄悄加入了共产党。包括卡里略在内，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西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卡里略被任命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流亡期间成为党的书记并在一九七五年佛朗哥将军去世之后以这一身份回到西班牙）并将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变成了共产政策的主要后盾之一。

当以卡里略为首的一批社会党青年组织领导人透露出他们背叛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消息时，后者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卡里略本人证实：“……听我们说了之后，他眼含热泪说道：‘从现在起，我再也无法相信西班牙革命了。’这是因为我们这些青年人是革命的真正力量。这支力量正在离他而去。他是真诚的，因为他相信，领导西班牙革命是他的任务。但他没有责备我们。他只是显示了他的悲伤。”不过，拉尔戈·卡瓦列罗后来对一位关系密切的合作者说：“他更像是我的一个孩子。我决不会忘记共产党人把他从我身边夺走了。”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他也发泄了自己的怨恨：“在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中，不乏圣地亚哥·卡里略那样的犹大，他们千方百计搞了一次假合并，成立了他们所谓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后来，当他们加入共产国际时，他们暴露出自己的叛徒嘴脸。”

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卡洛斯·德·巴赖瓦尔承认自己在内战初期曾经深受共产党人的影响，他在评论这次背叛时回忆说：“一群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JSU]的领导人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他们决定一起加入共产党。……我认为非常可怕的是，这样的事情竟能发生……我后来得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只有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除外，他们

采取每一步行动都通知他。他们一伙还得到了我们习惯称之为‘莫斯科眼线’的那个人的指点，他是共产国际的秘密代表[比托里奥·柯多维拉]。”

多年以后卡里略承认，甚至早在内战爆发之前，他就受到柯多维拉的影响。“那时我已认识他。”卡里略告诉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我必须说，柯都维亚（原文如此）与我合作得非常好。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在一定程度上感谢他。”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卡里略加入共产党。他从前的好友费尔南多·克劳丁是内战期间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而且是有关问题的权威人士。克劳丁写道：“正如当时他向我们解释的那样，[卡里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在保卫马德里的关键时刻，当敌军攻打首都脆弱的防线时，社会党显得无能为力。它的全国和地方领导人放弃首都逃往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则坚持继续留在那里，为人们树立了某种榜样。”他在后面又写道：“[作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领导人，他成为一个显要的人物，但是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一职务几乎可以忽略不提。……他很少参加[政治局会议]，只是一个负责执行党的政策的人。他不属于决定重大问题的核心集团，那个集团由共产国际代表……和西班牙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组成，前者是苏联（在外交、军事和情报方面）的高级代理人。”

为了充分了解未来的事态发展，有必要在此强调莫斯科的国外代理人——他们称之为共产国际“代表”或“讲师”——当时对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行使的权力。用前西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的话说，阿根廷人比托里奥·柯多维拉是“党的真正首脑”。此外，据曾在巴伦西亚的共产党喉舌《红色阵线报》任职并且认识柯多维拉的前秘鲁共产党人欧多西奥·拉维内斯说，内战之前柯多维拉“在政治上清理了”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层，用“顺从其旨意的人”取而代之。据同一位知情人

说，保加利亚人鲍里斯·斯特凡诺夫是“少数几个在大清洗中得以幸存的列宁的朋友之一”，而且还是斯大林的好友，他也在西班牙，使用莫雷诺这个化名，认识他的拉维内斯形容他是“革命、战争、共产党的各种骗局和花招的总导演。他的话被当作圣旨，仿佛斯大林亲自授意一般”。同样重要的事实是，意大利共产党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也在西班牙活动，特别是在柯多维拉于一九三七年夏天离开以后。与斯特凡诺夫一样，陶里亚蒂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他一九二五年逃出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二战之后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陶里亚蒂这时成为西班牙共产党实际上的领导人，指导战略部署并且多次为何塞·迪亚斯和热情之花撰写演说稿。陶里亚蒂使用化名埃尔科莱·埃尔科利和阿尔弗雷多，与斯特凡诺夫一起在西班牙一直待到内战结束。

陶里亚蒂是西班牙共产党实际上的领导人这一点得到了坚定支持克里姆林宫的恩里克·里斯特的证实：“他是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代表，全体政治局委员毫无怨言地服从他。”

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向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所作的证词中，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起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叛逃为止一直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派往西班牙的特工负责人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说：“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也与我一起……在西班牙，当时他是我的好友。他代表莫斯科领导西班牙共产党并且指挥共产党的民兵武装。……[现在担任]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的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能干的那个人——即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此外，在曾于一九三八年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五旅第一政委的美国共产党人约翰·盖茨看来，“陶里亚蒂是共产党在西班牙权力最大的人物。他负责制订西班牙共产党的总体政策。……法西斯分子叛乱之后西班牙共产党的巨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的意见和领导。……陶里亚蒂非常善于出谋划策，他也许是最能干的共产党人”。

圣地亚哥·卡里略同样对陶里亚蒂赞誉有加，一九七一年，这位流亡中的共产党书记写道：“对于我们这些年轻而且缺乏经验的人来说，[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顾问和名副其实的导师。”“他是一个非凡的人。”一九七四年，卡里略对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说，“我认为他是最有教养和才华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

国际纵队大本营所在的阿尔瓦塞特省的社会党人省长、与陶里亚蒂有私交的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提供了最耐人寻味的说明：“他在斯大林派来的所有[政治]代表中最有手段，内战结束前他是共产政策的实际负责人。我认为……他的智力和能力高于斯特凡诺夫。……共产国际在国际纵队内部的政治方向完全是由这个人引导的，他与斯特凡诺夫一同制定共产党的国内政策和军事政策。……他常常谦虚地请教问题，习惯于注重细节，总是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政治军事要人的性格特点并且诱使对话者说出他们的看法。但是，关于他，人们无法根据他的姿态或者面部表情判断……他在想什么或者他是什么感觉。”

“农夫”认为陶里亚蒂“冷漠，玩世不恭，从不紧张，毫无顾忌”。在战后于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会议上，恩里克·卡斯特罗在发言中作了形象的描述：“陶里亚蒂把眼镜擦拭干净，最后对着光线检查了一下，然后挨个审视我们。他盘着双腿，俨然一尊石像般端坐不动。……我想起了他的西班牙秘书说过的话：‘他是那么一种人，与我做爱就像下令枪毙我一样冷漠！’”

鉴于共产国际这个组织铁板一块的特点，这种情况不足为奇：凭借他们丰富的政治经验及其所掌握的由克里姆林宫直接授予的权力，柯多维拉、斯特凡诺夫以及后来的陶里亚蒂几乎毫不困难地主导了制定西班牙共产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政策的政治局会议。“西班牙没有列宁，”费尔南多·克劳丁写道，“但却有足够的共产国际顾问。何塞·迪亚斯和佩德罗·切卡这些真正的革命家和组织者以及多洛蕾丝·伊

巴露丽那种深受民众欢迎的演说家不具备反对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政策所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据共产党内的一名坚定的反对派人士说，他们的领导人“智力平庸，性格懦弱，惯于服从”。

无论如何，由于比托里奥·柯多维拉的权力和影响，由于他对圣地亚哥·卡里略以及另外几个加入共产党的社会党青年组织领导人的帮助，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迅速成为推行共产国际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背叛社会党后不久，共产党人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这个组织的控制。一九三七年一月，取代拟议中的将以民主方式确定统一组织的原则、纲领和最终的组织形式并且选出一个执行机构的统一的全国代表大会，圣地亚哥·卡里略在巴伦西亚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他为这次大会指定的代表不仅有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地方组织的代表，而且还有许多来自前线和工厂的年轻共产党员，这是一种策略，使他可以自始至终控制会议并保证选出一个安插了大量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的全国委员会和执行机构。“共产党人没有举行代表大会，”来自阿利坎特省的代表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写道，“而是玩弄‘骗局’召开了所谓巴伦西亚会议。他们竭力把它说成一次‘民主’的统一代表大会，但是事实完全相反。”

“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组织战时发生的种种变化，”几个月后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圣地亚哥·卡里略问道，“我们能够举行一次只有地方组织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吗？当我们的青年纷纷奔赴前线时，我们能够举行一次我们可能会在七月十八日之前我们的青年尚未拿起武器捍卫他们的自由时所举行的那种形式的代表大会吗？不，我们不能举行这样的代表大会。我们必须适应形势。形势使我们的代表大会，我们的全国会议，不仅应当由地方组织的代表参加，而且必须让那些在工厂里为努力提高战时生产做出巨大奉献的青年出席，必须让那些在陆地、在海上、在空中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青年出席；也就是说，让最优秀的那一部分青年，不是

地方组织里的而是前线的那一部分青年，拥有掌控联盟生活的合法权利。”

下面这一段从内战结束多年以后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摘录的内容耐人寻味：“我记得当时选举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的情况。……几位青年运动的老战士会晤了卡里略及其助手以及各省选出的代表。随后他们获悉，由于得到了同意领导所有安排的指示，每一位全国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均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

在这次政变中，卡里略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慷慨赞誉肯定有助于他达到目的。“此时此地我必须说，”他在向会议发表的演说中宣称，“拉尔戈·卡瓦列罗一如既往地享有西班牙青年人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超过了以往。我还必须补充的是，对于我们来说，像过去一样，卡瓦列罗同志是帮助我们联合起来的那个人。他是这样一个人：为了我们正在捍卫的共同事业，我们期待从他那里得到更多有益的建议，以使西班牙青年人的团结成为现实。”

下面这些事实肯定也帮助了卡里略：首先，社会党的青年代表当时几乎无人知道他已加入了共产党，以为他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其他领导人完全是在按照拉尔戈·卡瓦列罗及其社会党内的支持者的指示行事；此外，完全没有进行讨论。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回忆说：

[在会议上]没有讨论任何事情。讲话的人仅限于发表演说或作报告，但是接着不进行讨论。一个名叫卡拉斯科的人代表反坦克部队作了如何摧毁坦克的报告；一名水手讲了他自己的事，一名飞行员讲的也是自己的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事实是，没有讨论有关两个组织合并的问题。相反，发生的一切都被认为顺理成章。由于两个原因，我们这些忠于卡瓦列罗的人没在会议上提出任何异议，现在看来都是因为缺乏经验造成的，尽管当时无可非议。这两个原因是：1.参加会议的社会党青

年代表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不知道卡里略、莱恩、梅尔乔和奥罗拉·阿奈斯等人全都投靠了共产党。我们以为他们还是青年社会党人，因此，尽管我们感到似乎有些蹊跷，但是仍然相信他们是在按照卡瓦列罗和社会党的指示行事。如果我们知道这一伙懦夫已经背叛了我们，我可以向你保证，出现的情况将完全不同。但是我们丧失了警惕。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我不为承认它感到羞耻。2.会议的气氛和形式出乎我们的意料，当我们打算做出反应时，会议已经接近尾声。我们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的成员通常要对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及与会代表进行充分民主的讨论，因此确信巴伦西亚会议将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没有采用这种方式。当我们意识到什么事情发生了时已经太晚。会议结束了。

实际上，直到一段时间之后，当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之间的斗争进入白热化而且人们充分意识到共产党在巴伦西亚会议上所取得的胜利的全部意义时，第一道裂痕才真正出现。当包括苏格拉底·戈麦斯、顿迪多尔·洛佩斯和莱昂西奥·佩雷斯在内的一些著名的卡瓦列罗支持者公开抗议这次政变时，当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总书记何塞·格雷戈里·马丁内斯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总书记拉斐尔·费尔南德斯写给圣地亚哥·卡里略的公开信——他们在公开信中以没有与他们的地方组织进行协商为由，拒绝接受巴伦西亚会议选举他们担任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的职务——发表时，裂痕出现了。“像我抗议共产党对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控制那样表示抗议[的人]都遭到了污蔑和诽谤，有时甚至被杀害。”直到内战结束一直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内部领导着反对共产党的社会党反对派的苏格拉底·戈麦斯回忆说，“共产党从没有尝试过心平气和地冷静考虑一下政治上的不同意见；他们只是进行谩骂、污蔑和诽谤。”

如果结合所有这些事态发展，同时考虑到共产党人在玩弄阴谋诡计、挑动敌对派别相互斗争、大量安插秘密党员或同路人于关键岗位、对加入他们的队伍或者为他们



的利益效力的人软硬兼施等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能力，那么，内战初期他们作为实力派出现在反佛朗哥阵营中就不难让人理解了。

### 第十三章 胡安·内格林博士和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共产党在政府中所占据的两个部长职位既没有体现他们在西班牙的真正实力，也没有反映他们对内阁的真正影响。共产党在政府中的真实分量与其说取决于他们占据的两个部长职位，不如说取决于他们所具有的对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博士和外交部长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所具有的影响力，这两个人当时都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亲信。

尽管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身为社会党马德里地方组织的副主席而且表面上是个社会党左派，但是，他很快将被一些重要的社会党人视为实际上的共产党人。拉尔戈·卡瓦列罗断言：“他自称是个社会党人，但是却在无条件地为共产党效劳并且为他们的各种阴谋诡计推波助澜。”内战结束前不久，因为他的亲共活动，社会党的马德里地方组织决定将其停职并且建议社会党全国执委会将其开除出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内战之前作为一名苏联的支持者和共产国际政策的拥护者，他对促成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青年运动合并起了重要作用；内战期间，他支持共产党为使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而开展的运动。然而，时过境迁，在移居美国并且成为《民族》杂志的编辑部成员之后，他否认自己曾经支持两党合并。

作为内战初期拉尔戈·卡瓦列罗所信任的顾问，他不仅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听取德尔巴约的意见，而且指派其负责至关重要的引导武装力量政治方向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在这个部门，据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负责人佩德罗·切卡说，德尔巴约“全心全意地”为共产党效力。可是，尽管他出力不少，仍然有证据证明，他几乎或者完全没有赢得共产党核心集团的尊重。“他是个白痴，但是多少还有点用

处”，据一名前西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说，这是党的看法。不过有人说，他有另外一些特点。为苏联政权鼓吹将近二十年的路易斯·费希尔说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而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间塔斯社驻西班牙的代表奥瓦季·萨维奇则认为他是“政府里面最可爱的人”。

身为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不仅负责任命对外新闻司——该司审查以国外舆论为对象的通讯记者的新闻报道——的官员，而且负责任命外交部宣传部门的官员。“在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手下负责对美英两国宣传工作的三个月里，”利斯顿·奥克写道，“我得到指示，关于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的这一场经济制度革命，不得向外界泄露一个字。不许在巴伦西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以后西班牙政府的临时驻地]的外国记者随便报道发生的革命。”德尔巴约还任命化名安德烈·西蒙的捷克共产党员奥托·卡茨为外交部在巴黎的宣传机构西班牙通讯社的负责人，卡茨与他的助手阿瑟·科斯特勒都听命于共产国际主管西欧宣传的维利·明岑贝格。在伦敦，名为西班牙新闻社的外交宣传机构由英国共产党员杰弗里·宾负责。

不过，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对共产党人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内战初期帮助他们实施其渗透和控制战略，最终使他们的计划达到目的的主要工具是胡安·内格林博士，即使五十年已经过去，内格林仍然是西班牙内战时期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他是一个富商的儿子，马德里医学院的生理学教授，代表加那利群岛的议会议员，内战之前他是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为首的反对共产党的西班牙社会党中间派的追随者，如今是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财政部长，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出任总理，从一九三八年四月起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直到内战结束前夕的一九三九年三月，对于后来共产党成功地实施其政策，他比任何西班牙人负有更大的责任。至于他是否像拉尔戈·卡瓦列罗所指责的那样将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交给了共产党，只有通过认真周密地评估所有证据才能确定。

本书将在后面详细记述他为共产党人效力的情况以及他对共产党人成功实施他们的政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内战最后一年他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期间。但是，由于近几年来某些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试图通过对内格林所扮演角色的各种批评归因于“战后流亡圈子里的相互攻讦”来淡化或者全盘否定这些批评，而且他们还试图通过贬低或者无视揭露其背后真正力量的重要信息和关键证据来“重塑”内格林的历史地位，因此，在最初这个阶段，为了将内格林置于其崇拜者称之为“共和国化身”之前他所处的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下，考虑下面的相对信息非常重要。

例如，对内格林施加了特别但鲜为人知的影响的一个人是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是一名共产党员，著名的共产党民兵武装第五团的创建者之一，负责第五团的宣传工作，编辑该团的报纸《人民战士报》。据圣地亚哥·卡里略流亡时期的多年好友豪尔赫·森普鲁伦说，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根据党的指示”成为内格林的政治秘书，因此他“什么都知道”。“贝尼尼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他自学成才，知识丰富而扎实，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人的直觉，但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超我长期压抑着他内心深处的情感。”

前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断言，内格林直接受到共产党及其最亲密的两个合作者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和曼努埃尔·桑切斯·阿尔卡斯的控制，后者是“一名出色的建筑师，经历不凡，对党盲目服从，[一九三八年]担任外交部主管宣传的副部长”。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在内格林身边一直待到内战结束，他与陶里亚蒂一同起草了这位总理在西班牙本土发表的最后一篇演说。

内格林并不认为罗德里格斯的支持和友谊理所当然。用一九三八年四月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著名共产党员安东尼奥·科登——像内格林的所有支持者和辩护士一样，他

大肆宣扬内格林的政治独立性并且断言，正是内格林的“正确思想”使其赢得了共产党的支持——的话说，“内格林欣赏贝尼尼奥过人的长处，欣赏他的才干、他极强的工作能力、坚持不懈的热情以及始终——即使是在内战结束以后——对自己表现出来的热爱和尊重”。曾经主管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喉舌《工人团结报》的哈辛托·托里奥认为，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是内格林担任总理期间的“首席顾问”和“黑衣主教”。我个人则有保留地认为，这描述了两人关系的某种特征：内格林对罗德里格斯并不总是言听计从。“他的办公室紧挨着总理的办公室，”托里奥证实，“不与他商量总理从不做出决定。他被安排在那里以便内格林明白自己的前进方向。”

像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一样，内战将要结束时，内格林因其政治表现被社会党的马德里地方组织停职。尽管他是普列托派成员并在一九三六年九月经其推荐成为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财政部长，但是，早在内战爆发之前，内格林已经自行摆脱了将他与这位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联系起来的个人和政治束缚，最初是秘密地，后来是公开地。他从来不是共产党员，为了达到控制全局的目的，共产党为他提供了一个表面看上去合适的身份。

许多为共和国的事业不要受到伤害而焦虑的人似乎看不到内格林对共产党的贡献。例如，内战期间的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克劳德·鲍尔斯声称，内格林“尽可能远离共产主义”。由于一个人不必成为党员就能为党谋取利益，而且由于在党外甚至可以自觉不自觉地为实现党的目标做出更有成效的贡献，因此，鲍尔斯的天真及其对于共和派事业的同情无疑使他失去了判断力。曾经支持共产党的西班牙著名作家拉蒙·森德尔说：“鲍尔斯先生是我们的朋友——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们强有力的论点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他对莫斯科邪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投到我们身上的阴影视而不见。我们大多数西班牙人同样看不见这些阴影。”值得称赞的是，鲍尔斯后来对森德尔承认，他已经改变了对内格林的看法。

“内格林准备敞开大门让共产党控制政府和军队。”弗兰克·塞德威克写道，“……不可否认，他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一个不屈不挠的工作者，一名血战到底的斗士。他的勇气、自信、足智多谋及其充满活力的个性赢得了[《纽约时报》的]赫伯特·马修斯以及另外一些记者的长期赞誉，这些人参与共和派事业的亲身经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的文字失去了客观性。”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内战结束后的三十四年间，不顾所有可以用来证实内格林支持共产党的确凿证据，赫伯特·马修斯仍然否认内格林对共产党人的事业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在卷帙浩繁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献目录中，直到一九五六年内格林去世，他始终是其主要的辩护士。他在一九五七年写道：“那些在内战期间密切关注着他的人，例如我本人，还有那些多年以后仍然深深地敬佩并且爱戴他的人，都不会怀疑时间的裁决。他失败了，但他成为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子孙后代有理由为他感到自豪。”在其一九七三年出版的最后一部关于西班牙的著作中，马修斯写道：“有关内格林的不实之词歪曲篡改了许多历史事实，尤其是那些貌似最严谨的战后学者，他们几乎根本不了解内格林博士。他是共和派方面的关键人物。误解他的性格和动机将会错误地书写历史。即使像休·托马斯——他对内格林博士的描述相当公正而且富有同情心——那样敏锐精明的学者也不相信，对堂胡安的某些指责竟然完全是无中生有，例如，说他对共产党的要求言听计从。在《西班牙革命》一书中，佩恩教授错误地写道：‘看来毫无疑问的是，[内格林]为实现左派的奋斗目标全力以赴，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内格林博士利用共产党人并与合作只是出于实用的考虑，与‘左派思想’或任何意识形态没有关系。他没有政治色彩，对任何政党或政治运动本身也没有偏爱。”

尽管马修斯温和地批评了托马斯，但是，关于内格林所谓的独立性，两位作家均发表了误导公众的相似观点。“的确，几乎没有政治家成功地利用了共产党然后却不

被其吞噬。”一九六五年托马斯写道，“但是，三十年代在西班牙，未必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内格林的自信及其守口如瓶的本性也许使他认为，必要时他可以断绝与共产党的联系。……认为这样一个意志坚强、思想独立而且脾气很坏的知识分子可能一度屈从于他人实际上是荒谬可笑的。尽管与苏联经济顾问[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的关系良好，但是有一次（当时他任财政部长），他告诉另一名苏联人，不要试图对西班牙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否则的话，内格林接着说，‘门在那边’。”在一九七七年版的《西班牙内战》中，托马斯把这一段内容删掉了。这一桩轶事的提供者是共和国驻伦敦大使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他是内格林的激赏者，不过，据他以前的朋友和国际联盟同事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说，他后来“背离了寻求真理的严谨路线，堕落成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走狗”。

虽然托马斯删掉了这桩轶事，但他实际上仍然保留了下面的论断：“内格林与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没有什么密切关系，而且他非常讨厌热情之花。”为了支持自己关于内格林总体上对共产党人保持了独立的论点，他在两个版本的《西班牙内战》中均引用了前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政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的话，承认“时间将在必要的时候‘清算’内格林”。但是，埃尔南德斯的话实际上支持的是相反的论点：“为了除掉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们主要依靠内格林，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普列托。为了除掉普列托，我们利用内格林和另外一些著名的社会党人。如果内战持续下去，只要内格林妨碍了我们，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与魔鬼结盟除掉他。”事实上，如同我们将在本书的叙述过程中看到的那样，直到必须除掉内格林时，他也没有妨碍过共产党的政策。此外，与托马斯的论断相反，内格林不仅与某些重要的共产党人保持着密切关系，例如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桑切斯·阿尔卡斯以及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另一些人，而且与苏联贸易特使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保持着密切关系，后者是内格林非正式的经济顾问，据苏联派往西欧的高级情报特工瓦

尔特·克里维茨基说，斯大林交给斯塔舍夫斯基的任务是，“掌握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的政治和财政控制权”。

哈佛大学的胡安·马里查尔教授是另一位著名的内格林的辩护士，他写道：“不能把内格林看成一个自愿追随苏联政策的人。……我相信，我并非武断地断言……在最近一个半世纪的欧洲历史上，几乎没有人显示出这种智慧与性格、高尚品德与知识能力的珠联璧合。”形成对照的是，克里维茨基断言，斯塔舍夫斯基发现内格林是“其财政计划的一个心甘情愿的合作者”。尽管这种说法只有克里维茨基的一面之词，但是，四位见多识广的内格林的支持者证实了两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本人认识苏联派往西班牙的大部分要人的路易斯·费希尔——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将其称为内格林在国外的“主要宣传代理人”，另外，根据他从内格林那里得到的“大笔金钱”来判断，普列托还认为他“可能”是内格林宣传方面的“财务总监”——肯定地说，斯塔舍夫斯基“不仅安排西班牙购买苏联武器事宜，而且在许多经济问题上 是内格林的亲密顾问”。内格林的坚定支持者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承认，内格林交往最多的俄国人是斯塔舍夫斯基，他们建立了“真正的友谊”。马利亚诺·安索是内格林政府的一名部长，他注意到，内格林的“才能和不可抗拒的魅力”给苏联贸易特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被内格林任命为军事调查局（SIM）负责人的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说，内格林与斯塔舍夫斯基“相处得非常友好”，“他们天天一起进餐”；另一方面，研究共和国财政问题和西班牙黄金储备问题的权威安赫尔·比尼亚斯同样是内格林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内格林是整个共和国时期“最清醒、最非凡的政治家之一”，而且是“共和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不过，在确认斯塔舍夫斯基是一个“向西班牙共和派提供最初援助的关键人物”，并且在与购买苏联武器有关的重大财务活动中直接影响了内格林的同时，比尼亚斯对克里维茨基关于斯大林派遣这位苏联贸易特使前来扮演操控角色的说法表示怀疑。

克里维茨基还宣称，斯塔舍夫斯基提议将西班牙的巨额黄金储备——估计当时位居世界第三——运往苏联以换取供应马德里的武器弹药。“通过内格林，”克里维茨基说，“他与卡瓦列罗政府达成协议。”另一方面，从一九三六年起到一九三八年叛逃美国为止一直担任苏联在西班牙的特工负责人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肯定地说，“意识到[军事]形势正在恶化”的内格林向斯塔舍夫斯基提出将西班牙的黄金存放在苏联。“特使电告莫斯科，”奥尔洛夫补充说，“于是，斯大林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我们将会看到，奥尔洛夫受斯大林的委托具体安排黄金运送事宜。

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给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写了两封信，正式请求苏联政府同意把黄金运往莫斯科，这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排除了斯塔舍夫斯基干预的嫌疑。三十四年后，内格林的多年好友、战时担任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的马塞利诺·帕斯库亚公布了这两封信，当年是他亲自把它们带到苏联首都的。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所写的第一封信中，拉尔戈·卡瓦列罗表示，他以总理的身份决定请求苏联大使询问“贵国政府是否欣然同意存放大约五百吨黄金的建议，准确的重量待移交时确定”；在十月十七日所写的确认苏联接受了他的建议的第二封信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声明：“我们打算兑付一些国外存款的汇票……同时转让一些外汇以凑足贵国政府同意接受存放的黄金。”

尽管这些正式信件似乎使斯塔舍夫斯基的作用成为问题，但是，它们并没有排除下面这种可能性：这两封信是苏联贸易特使与西班牙财政部长初步讨论的结果，只不过随后把它们交给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批准签字而已。据帕斯库亚说，两封信都是内格林起草的。信中字斟句酌的词语——第一封请求、第二封确认苏联同意运送黄金的建议——很可能是根据斯塔舍夫斯基的建议用来掩盖斯大林对占有西班牙财富的特殊兴趣。



## 第十四章 运往莫斯科的西班牙黄金

由于马德里受到威胁，最先讨论将黄金储备从首都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保存这一问题的是希拉尔内阁，不过，直到九月四日拉尔戈·卡瓦列罗组成其以胡安·内格林博士为财政部长的政府为止，它也没有拿定主意。

九月十三日，根据阿萨尼亚总统批准的一项秘密法令（decreto reservado），内格林获得内阁的授权，将西班牙银行储存的黄金、白银和纸币转移到“在他看来最安全的地方”。法令第二条规定，该法令“在适当的时候”将提交议会，但是根本没有提交。几天之内，一万箱金币和金锭被运到卡塔赫纳的一个大山洞里。

选中卡塔赫纳并不让人感到意外。“那是一个兵力充足、戒备森严的大型海军基地，”安赫尔·比尼亚斯写道，“与战区具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在必要时可以把黄金储备从那里运往其他地方。……也许内阁还没有想好它们的最终目的地。”他认为，“实际上，黄金运到卡塔赫纳之后，立即加大了决定运往法国的可能性”。

显然，把黄金储备转移到卡塔赫纳不只是为了防止落入敌军之手，而且是为了尽快将其兑换成外汇购买迫切需要的战争物资。正如比尼亚斯引用保守共和派人士戈东·奥尔达斯的话所指出的那样，在有“足够的钱支付现金”之前，不干涉公约使购买武器变得困难重重，“因为任何以赊账方式购买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奥尔达斯是政府委托的几位在国外购买武器的代理人之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希拉尔和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都曾把一些黄金送到法兰西银行换成外汇，在总共大约七百一十吨的黄金储备中，这样送出的黄金合计有二百吨左右。拿到法国兑换外汇的黄金大部分是在转移到卡塔赫纳之后送出的。不过，据武器购买人和最大的资金接收者之一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说，由于部分运输没有规

律，由于在获得法兰西银行发放资金的许可方面的拖延，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结果导致有几次白白浪费了几周时间，没有做成一单生意。戈东·奥尔达斯说，这种拖延是一些重要交易失败的原因，另外，英国的银行也试图“尽量拖延把资金汇往某个似乎不合它们心意的账户”。

几乎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布尔戈斯的叛军或民族主义势力的愤怒反应，通过在西班牙和法国的特工和朋友，他们准确地得到了装运黄金的消息。利用正式公告、电台广播以及发往西方各国政府、法兰西银行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抗议函电并以法律诉讼相威胁，布尔戈斯方面竭尽所能阻挠出售黄金储备，指责西班牙银行同意用黄金储备为共和派的货币担保是“与马克思主义歹徒的恶意串通”，出售黄金储备是一种“掠夺”行为，是对银行基本守则的侵犯，因为银行法规定，黄金储备“组成了国家遗产的一部分，就像国家领土一样”。

黄金储备的首要目的应当是作为纸币流通的保证。尽管比尼亚斯没有详细考察消耗黄金储备的法律问题，但他认为，战时的财政状况使得人们必须“规避银行法的严格规定，因为银行法必定禁止为了诸如购买武器和战争物资之类的目的转让使用黄金储备”。另一方面，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对把大量黄金运往苏联一笔带过，他满不在乎地评论说，那是“严格按照银行法进行的”。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者就共和派将黄金运往法国而开展的舆论活动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引起了内格林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忧虑，使他们担心法国最终可能将会禁止使用黄金储备。这种忧虑很可能还促使他们——无论是否受到斯塔舍夫斯基的怂恿——决定将大量黄金储备运往苏联，在那里，这些黄金不仅可以用来购买苏联武器和补给，而且可以换成需要的外汇在其他国家购买武器和补给。在西欧和中欧进行这些交易的主要渠道是巴黎的北欧商业银行（欧洲银行），这家银行由（而且始终由）

苏联控制，其业务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暗箱操作，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无疑是一种有利因素，但是，由于从来没有公布过以共和国政府名义进行的交易的任何记录，这一因素如今使人们对银行账目可能造假的指控难下定论。

同样没有发现这一关键时期内格林掌管的西班牙财政部的外汇账目。内格林的门生和战时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断言：“只有胡安·内格林掌握着有关记录。”比尼亚斯特别强调了这种文件资料缺失的状况：“只要找不到共和国财政部和欧洲银行的有关资料……就不可能再现——即使是部分再现——共和国在国外进行的金融活动，也不可能确定通过出售运到莫斯科的西班牙黄金所获得的外汇流向了何处。我们必须无条件接受……这一令人痛苦的结论。”

同样不为人知的是通过伦敦的莫斯科人民银行以财政部的名义进行的交易。比尼亚斯写道：“没有探讨过[这家银行]参与共和国国际交易网络的问题，我们担心获得有关资料的难度甚至比欧洲银行的更大。这两家银行紧密合作，即使只是因为共和国包租的大多是英国船只，也可以肯定共和国的外汇资金大量流向了伦敦的这家苏联银行。”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拉尔戈·卡瓦列罗写信确认苏联同意存放黄金储备三天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收到了约瑟夫·斯大林发来的下面这封密码电报：

“会同罗森堡大使一起与西班牙政府首脑卡瓦列罗商定将西班牙的黄金储备运到苏联事宜。……这一行动必须极其秘密地进行。

“如果西班牙人要你出具这批货物的收据，拒绝他们。我再说一遍，拒绝签署任何东西并告诉他们，正式收据将在莫斯科由国家银行开具。”

斯大林的指示完全符合商业准则因而不会被误解。我认为，身为劳动者总工会银行雇员工会主席的亲共人士阿马罗·德尔·罗萨尔所发表的下述言论准确无误：“拒绝出具收据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由于这次运输的性质，不可能让保险公司为它保险，因为这将意味着把秘密泄露给敌人。另一方面，苏联银行不可能承担任何风险。运输的货物可能落入敌人之手，运输的船只可能因某一次战争行动被击沉。西班牙政府的保证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每艘船上都有一名西班牙银行的代表，他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看管货物，监督航程。……收据将在到达目的地并且列出货物清单之后开具，西班牙银行的代表可以参与清单的制作。制作清单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它持续了三个月之久。”

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为最初从马德里运到卡塔赫纳的一万箱金锭和金币中的七千八百箱（其余两千二百箱在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间运往法国和巴伦西亚）开具了正式的收据，收据上有西班牙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苏联财政人民委员Г.Ф.格林科和副外交人民委员Н.Н.克列斯京斯基的签名。收据显示，“在下列人员之一在场并且参与的情况下：阿图罗·坎德拉、阿维拉多·帕丁、何塞·冈萨雷克[原文如此]和何塞·贝拉斯科”，对七千八百箱黄金中的每一箱进行了开箱、点数和称重。收据提供的运到莫斯科的黄金重量为五亿一千零七万九千五百二十九点一三克或五百一十点零八吨，根据纯金含量四百六十五点二吨的估计，当时的价值为五亿一千八百万美元。

几乎将近二十年后，内格林与苏联的关系开始冷淡之后又过了很长时间，作为应内格林的要求开始进行的谈判的结果，该收据的一份副本和内格林所拥有的与存放在莫斯科的黄金有关的大量文件被他的儿子罗慕洛移交给了佛朗哥当局。谈判的要求是内格林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于法国去世之前不久通过其好友、前司法部长马里亚诺·安索提出的。内格林告诉安索，无论什么样的政府执政，这些文件都是西

班牙的国家财产。内格林去世后不久，他的儿子罗慕洛“希望完成其父的心愿”，将这些文件移交给西班牙驻巴黎总领事馆。

在一份由安索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起草和签署并由内格林的儿子连署以确认其忠实反映了父亲心情的补充文件中，安索表达了内格林“对西班牙而非苏联利益的深切关注”和他的忧虑：“没有支持其权利的文件，在必须清算因两国之间所进行的那一笔可能是最大和最重要的交易而产生的账目时”，西班牙将被置于“赤手空拳无以自卫”的境地。

在列举了一些“压在内格林心头”的其他问题——包括“许多重要的西班牙商船船队”被苏联滞留的问题——之后，安索断言，在西班牙与苏联之间进行任何财务结算时，内格林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西班牙人被赋予的无条件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

我们必须假定这些都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考虑关心的事情，他在晚年对苏联的幻想逐渐破灭，他和那个懵懵懂懂的理想主义生理学教授大不相同，和那个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与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商定将大量西班牙黄金储备运往苏联的政府新人也大不相同。“财政部长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反对共产主义，还不确定是否赞成俄国进行的‘伟大实验’。”多年以后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写道，“这种政治上的幼稚有助于解释他把黄金运往那个国家的冲动。此外，由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支持民族主义者而民主国家冷眼旁观，苏联是一个盟友，一个帮助西班牙共和派的大国。‘黄金储备现在在哪儿？’我问他。‘在卡塔赫纳，’内格林答道，‘在一个海军用来存放弹药的古老的山洞里。’斯大林的运气又来了，我激动地想到。货物已在卡塔赫纳这一情况大大简化了我的问题。苏联船只正在那个大型港口卸下武器和物资。这样的话，不仅是苏联船只，而且还有可靠

的苏联行动人员，都近在咫尺。”

无论我们如何想象奥尔洛夫谈到内格林——尤其是从马丁内斯·阿穆蒂奥对他的描述来看，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一个“出众的才华几乎全部用于实现自己的欲望和抱负”的人——时所使用的“政治上幼稚”这种说法，毫无疑问，鉴于西方列强的态度，如果不是运到苏联，就不可能有效地为了战争动用西班牙的黄金储备。奥尔洛夫告诉内格林，他将与最近到达西班牙的苏联坦克兵一起执行这项任务。“我希望强调的是，当时西班牙政府……并没有完全控制局面。”他对美国参议院负责调查国内安全法案实施情况的小组委员会说，“我坦率地告诉财政部长内格林，如果有人听到风声，如果无政府主义者截击我手下用卡车运送黄金的俄国人，他们会杀了我的人，然后，这将成为一个轰动全世界的政治丑闻，它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国内革命。因此……我问他，西班牙政府能否用某个虚构的名字给我弄到……英格兰银行或美洲银行代表的身份证明文件，因为到时候……我可以这样说，为了妥善保管正在把黄金运往美国。……内格林不反对这样做。他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我的英语说得大概还算不错，可以冒充外国人。就这样，他给我弄了一份某个布莱克斯通先生的证明文件，于是，我成为美洲银行的代表。”比美国参议院听证会早八年，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其所写的一本书中提到了这件事情，不过，他要么是不知道、要么就是不想泄露这位布莱克斯通先生的真实身份。“苏联方面参加行动的只有罗森堡大使选派的一名大使馆随员，”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我们只知道他将被称为布莱克斯通。当大使介绍他的时候，内格林开玩笑地给他起了这个名字。”

奥尔洛夫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他们已经对把黄金储备运到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大本营巴塞罗那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这不仅是为了妥善保管，也是为了购买战争物资。著名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提到了一九三六年八月与希拉尔总理的一次会晤：“我

们向他说明，只要他帮助我们获得我们需要的资金来源，我们就能独自打败敌人。我们深感遗憾的是，由于对加泰罗尼亚的无端敌意和对人民革命的恐惧……中央政府可能妨碍我们的工作，而胜利和拯救大家取决于我们的工作。……我们最后谈到西班牙银行的黄金有危险，欢迎立即将其转移[到巴塞罗那]。不久之后，希拉尔政府就垮台了。”

后来，桑蒂连制订了为至少夺取部分黄金袭击西班牙银行金库的计划。他说：“我们事先知道必须使用武力。我们在马德里大约有三千名可靠人员而且为用专列转移黄金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在政府可能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我们已经驶向加泰罗尼亚。……我们把我们的意图向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全国委员会作了汇报，并且通知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些较有名望的同志。计划让我们的朋友不寒而栗。他们反对这个计划的主要理由……是，它只会增加对加泰罗尼亚的敌意。”

另有证据表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确实打算袭击西班牙银行。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胡安—西梅翁·比达尔特声称，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告诉拉尔戈·卡瓦列罗，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正准备“袭击西班牙银行的金库夺取黄金，然后将其转移到巴塞罗那更安全的地方”，敦促后者采取“一切措施予以防范”。此外，阿萨尼亚总统也说，一九三六年九月桑蒂连告诉他，全国劳工联合会有四千人“准备来马德里抢夺黄金”。

尽管无政府主义者的计划不了了之，然而，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无政府主义者截击奥尔洛夫的人马，他对产生轰动世界的政治丑闻的担心将被证明言之有理。

被内格林授予布莱克斯通的名分之后，奥尔洛夫动身前往卡塔赫纳，为了把黄金装上苏联商船，他要求派来六十名西班牙水手。紧接着，他安排把黄金从山洞里运到码头上。“两周前一个苏联坦克旅已经上岸，”他写道，“此时驻扎在四十英里之

外[穆尔西亚以北]的阿切纳。它由在西班牙化名梅莱的C·克里沃舍因上校指挥。克里沃舍因给我派了二十辆军用卡车和二十名最好的坦克驾驶员。……提前一两个小时把六十名西班牙水手送到了山洞。……于是，十月二十二日，当夜色降临时，我驾车向存放弹药的山洞驶去，卡车车队跟在我的后面。”靠墙堆放着几千个完全一样的木箱子。“木板箱里装着金锭和金币——价值几亿美元！一个古老的国家多少个世纪积累的财富都在这里！”装车用了三个夜晚，从晚上七点直到黎明。奥尔洛夫向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作证说，在第二或者第三天，发生了一次猛烈的轰炸，有人说，如果一颗炸弹击中旁边那个存放着几千磅炸药的山洞的话，他们都将炸成碎片。“[内格林信任的财政部长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的健康状况是个严重问题。他的神经非常紧张。他对我们说，我们必须停止装车，不然我们[将被]炸死。我告诉他，我们不能停下来，因为德国人将会持续轰炸港口，船只[可能被]炸沉。我们必须继续装车。于是，他逃走了，只留下了一个助手，那是一个非常细心的西班牙人，为他们清点黄金[箱子]的数量。”

十月二十五日，七千八百箱黄金装上四艘苏联商船运往敖德萨，并于十一月六日至十日在莫斯科移交给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贵重金属局。一位同事向克里维茨基描述了苏联港口的反常情况：“码头四周全部清空并被特种部队包围起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军官从船坞穿过这一清空地带把一箱箱黄金扛到铁路旁边。他们搬运了几天这些沉重的黄金并把它们装上货运列车，然后在武装押解之下运往莫斯科。他试图向我估计他们在敖德萨卸下的黄金数量。我们正走过广阔的红场。他指着我们周围几英亩的空地说：‘如果把堆放在敖德萨铁路调车场的所有装着黄金的箱子一个挨一个地放在红场这里，它们将把这里全部堆满。’”

不过，事实比这种形象的描述给人的印象更深刻。正如收据所显示的那样，在七千八百箱黄金中，只有十三箱装的是金锭，另外七千七百八十七箱装的都是金币，成



百上千万金币——美国的美元，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的比索，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和瑞士的法郎，荷兰的盾，英国的沙弗林，德国的马克，意大利的里拉，葡萄牙的埃斯库多，俄国的卢布和西班牙的比塞塔——中有一些古币，还有一些极为罕见，金币本身的价值超过了它们的纯金含量。如果我们借用上面那种形象的描述，这些金币可以铺满整个红场。

这些稀有古币从来没有以其本身的价值在西班牙财政部的账本上登记过。可是却非常仔细地将假币、残币或者黄金含量低于法定标准的钱币列了出来。另一方面，苏联人也没有对这些本身价值大大超出其黄金含量的稀有古币做出说明。根本不可能把所有金币都熔化了，特别是重达三十一万八千六百零三点三克的葡萄牙古币，在苏联的正式收据中，专门列出了这一重量，这些金币的价值显然远远超过其所含估计约为二十八万六千七百四十三克纯金的价值。至于在其余的金币中还有多少稀有古币，那也许永远都是一个未知数。

大英博物馆钱币和金属部的罗杰·布兰德估计金币总数超过六千万枚，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只是为了发现是否存在有价值的钱币而把它们整理一遍，我非常怀疑值得不值得这么做。”他还认为：“当时的钱币市场比现在的市场小得多，即使其中的一小部分它都可能接受不了。”他说的这两个问题肯定不错，但他不知道的是，事实上，为了找出假币和残币，苏联人确实把这些钱币全部整理了一遍。因此，可以合乎逻辑地提出下面这个问题：难道苏联人不会在打算把有价值的钱币逐步拿到国际市场上卖掉的同时把它们全都放在一边吗？

赫伯特·马修斯声称，几个月后内格林失望地发现，苏联人不仅把金币熔铸成金条，而且还要为此收取高额费用。“由于按重量计算金币的价值高于金条，因此，他要求停止这种加工并对苏联要求收费表示抗议。”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他曾经提出过

抗议或者曾经将他所谓的关切告诉过任何内阁成员。同样没有证据证明的是，苏联人曾向西班牙财政部退赔过任何高额收费或是西班牙财政部收到过根据稀有古币本身的价值支付的款项。因为身为财政部长的内格林肯定知道黄金储备包括稀有古币，所以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在同意运往苏联之前，他为什么没有坚持要求就这些古币给予西班牙财政部适当的确认？在西班牙银行发现的文件——安赫尔·比尼亚斯的研究依据的就是这些文件——显示，西班牙财政部没有得到对稀有古币价值的确认，只是由于出售这些黄金的订单的生效，金币所含纯金的价值记在了它的账本上，无论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贵重金属局声称它熔化提炼了多少纯金。此外，这些文件中没有任何要求苏联人停止熔化提纯金币的记录。相反，内格林的支持者比尼亚斯证明，西班牙财政部一九三七年开出的涉及出售三百五十八点五吨黄金（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七十）的十五份订单经内格林批准全部生效。

苏联人从未披露那一批葡萄牙古币的最终去向，也没有披露经过他们细致检查的六千万枚金币中究竟有多少稀有古币。除了二十年后马修斯的说法之外，没有证据证明内格林曾经与苏联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另外，没有持客观立场的人见证过这些金币的熔化提纯，因此，怀疑苏联人甚至可能将他们发现的稀有古币据为己有然后代之以本国的黄金储备完成西班牙的订单并非毫无道理。在缺乏苏联档案的情况下，不能完全无视这种可能性。下面的情况增加了稀有古币命运的不确定性：可以肯定，即使是随船到达敖德萨并于点数、称重时在场的四名西班牙银行的代表也没有亲眼看到将金币熔化与提纯。总之，不许他们返回西班牙。“可能是内格林和门德斯·阿斯佩决定，”比尼亚斯写道，“为了避免有关黄金运往何处的消息泄露出去，他们应当留在莫斯科。”他描述了他们在苏联首都的困境：他们根本没有准备长期留下来，因此非常担心他们在西班牙的家人，也为其他个人问题忧心忡忡。最终，他们的家人到莫斯科与他们团聚，但是他们始终希望返回西班牙。在西班牙银行进

行广泛研究的过程中，比尼亚斯看到了跟随黄金到达莫斯科的四名银行雇员之一阿图罗·坎德拉写给银行副总裁胡利奥·卡拉维亚斯的“一封感人的信”，恳求后者“暗中让他们离开这里”。“一九三八年夏天，”比尼亚斯证实，“内格林和门德斯·阿斯佩决定采纳帕斯库亚的建议，允许他们离开苏联。……苏联政府坚决要求他们绝对保持沉默，但是允许他们离开。共和国政府建议银行把他们分派到设在斯德哥尔摩、美国、墨西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代理机构。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他们离开莫斯科。”

至于参与黄金行动的苏联高级官员，有证据表明，至少两人被枪毙，尽管无从了解他们的死是否直接或者间接地与运送西班牙黄金有关。据权威的《苏联名人录》记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苏联财政人民委员Г.Ф.格林科和副外交人民委员Н.Н.克列斯京斯基（两人均在正式收据上签了名）因所谓反苏“右倾托派集团”成员的罪名遭到处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格林科还被指控“试图削弱苏联的经济实力”。另外，有证据表明，与运送黄金直接有关的内格林的经济顾问斯塔舍夫斯基也在大清洗中销声匿迹。

尽管安赫尔·比尼亚斯得出结论，西班牙的黄金储备在离内战结束还有不到一年时就已几乎全部用光，我们仍然必须询问一个重要问题。通过向苏联国家银行出售黄金获得了大量的外汇，它们被转到苏联控制的巴黎北欧商业银行并被存入西班牙财政部在那里开设的账户，这些外汇也用光了吗？由于该银行的业务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暗箱操作而且财政部在该银行所开账户的记录从来没有公布过，另外，由于没有找到财政部自己的有关文件，因此，当比尼亚斯得出他的结论时，这个问题应当还没有找到答案。一九八〇年四月在纽约西班牙学会进行的一次交谈中，比尼亚斯用下面的话概括了这个问题：“我们对法国的苏联银行一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属于共和国的外汇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任何对西班牙与苏联之间的金融业务所进行的全面研究必须考虑苏联向内格林政府贷款的问题。迄今为止，只有比尼亚斯尝试进行了这种研究。他根据共和国的档案资料指出，内格林的策略是，确保从苏联得到长期贷款，以尽量保留剩余的黄金储备。这一策略并不成功。一九三七年秋天，内格林指示帕斯库亚申请一笔一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但这位大使十月二十九日回复说：“我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催促贷款。可是你不知道迅速落实有多么难。他们[苏联人]非常精明，办事拖沓，有时完全靠不住。”比尼亚斯接着写道，苏联人答应提供仅限于购买民用物资的两千万美元，同时坚决要求像迄今为止那样通过出售存放的黄金支付战争物资的订单，“因为，为了完成这些订单，苏联必须进口原材料，结果一定会消耗它的外汇储备。”比尼亚斯披露，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斯大林才批准了一笔七千万美元的贷款，但是附带了极其苛刻的条件：三千五百万美元须以同等价值的黄金担保并在两年之内偿还，而没有担保的其余贷款须在四年之内偿还。根据苏联的消息来源，由于黄金储备到一九三八年夏天已经用光，可能不得不为购买当年年底运往西班牙的武器另外提供贷款，但是，没有发现任何记录。比尼亚斯能够看到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料，他也只是简单地说：“不排除最后运送的苏联货物是以贷款取得的。”另外，他在发表于《欧洲研究评论》的一篇文章里证实：“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三日，[当时的西班牙驻巴黎大使]帕斯库亚[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领导人，后者同意了内格林提出的总计六千万美元的贷款要求。……帕斯库亚立即返回巴黎，随后，内格林本人亲自与苏联在西班牙的代表接触，商讨这笔贷款业务的细节。没有发现关于这次磋商结果的文件。”

没有提到消息来源的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内格林为自己要求的贷款担保，却不告诉任何人它存在何处。“没有说明，没有可以帮助澄清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丝毫信息。”内格林的朋友帕斯库亚说，“我真的不知道这笔交易的最后结果，因为内

格林存心对我采取了令人心寒的相同策略，什么情况都不说，偶尔还会闪烁其词。”

过了十九年，在内格林去世几个月后，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苏联《真理报》报道，不仅西班牙的黄金储备全部用光——它提到一封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由内格林和门德斯·阿斯佩签名的要求出售剩余黄金的信件作为证据——而且在苏联提供的八千五百万美元贷款中，西班牙政府仍欠五千万美元没有还。“内格林清楚地知道这件事，”这篇报道补充说，“因为他在所有与使用黄金和贷款有关的命令上都签了字。”

如果我们考虑到一九三八年底运到西班牙的武器，五千万美元这个数字似乎非常合情合理，但是，它完全忽略了苏联没有计算在内的下列情况：稀有古币的价值，西班牙财政部在巴黎苏联银行开设的账户上的不为人知的外汇存款数额，运到苏联的西班牙原材料和工业产品，由于运到法国的时间太晚以致无法在一九三九年保卫加泰罗尼亚的战斗中使用的武器可能最终运回了苏联，内战结束时向西班牙政府购买的商船可能没有付款，还有据说转移到苏联的机械设备。由于苏联控制的巴黎银行如本章前引安赫尔·比尼亚斯的证词所证实的那样从未公布过内战期间它与西班牙财政部业务往来的任何记录，由于内格林关于这一问题的个人记录五十年来“未被呈堂”，不仅使人们——像比尼亚斯所指出的那样——不可能对一九三六年十月运到莫斯科的大量黄金所换取的外汇进行准确的核算，而且使人们不可能对共和国政府与苏联之间的其他财政经济往来进行准确的核算，甚至到了今天，它们仍然被怀疑和猜测笼罩着。

对于《真理报》“黄金储备全部用光”的说法，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不以为然并且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一个大规模侵吞的问题。无论我对胡安·内

格林的看法如何，我断定他不会制造可怕的骗局，在去世之前安排……交给佛朗哥一份没有实际价值的文件[运到莫斯科的那些黄金的正式收据]。”他列举了用西班牙的资金为法国共产党谋利益的各种方式，其中包括对《今晚报》的补贴以及法国共产党秘密拥有的法国航海公司购买了十几艘轮船，然后，普列托继续写道：“即使所有这些费用都由运到苏联的黄金储备支付，它也不可能全部用光。我再说一遍：我们正在谈论一个大规模侵吞的问题。为了给自己辩护，苏联将会伪造它认为必要的任何证明文件。由于内格林进了坟墓，他无法否认造假专家模仿的签名的真实性。”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黄金运往苏联之前内阁进行磋商了吗？内格林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都说进行了磋商。可是，海军部长普列托却说没有进行磋商。他写道：“身为财政部长的内格林先生得到政府和共和国总统签署的一项法令[九月十三日的秘密法令]的批准，授权他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保护西班牙银行的黄金储备。作为当时政府的一员，我同意承担我对这项法令负有的责任，尽管我和其他部长都不知道这项法令的目的何在。我不知道当时的政府首脑拉尔戈·卡瓦列罗是否清楚这一点。装运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发现这件事情纯属偶然，当时正在按照内格林和门德斯·阿斯佩的指示装运黄金，到达卡塔赫纳之后有一些与我的部门有关的问题需要处理。”很难相信普列托在到达卡塔赫纳之前对运送黄金的计划一无所知，而且我们马上将会看到，奥尔洛夫的说法与他的说法有出入。

普列托还宣称，内格林在卡塔赫纳见到他时无法掩饰自己的“恼怒”。“他肯定认为我是去那里打探消息的。他没有对我说明他在场的原因。我知道他去那里的目的，因为海军基地司令告诉我，财政部长要求他派水手装运黄金……而他已经答应了。我对基地司令的应允表示认可，我对这件事情的参与也到此为止。”

奥尔洛夫提供的证据有利于证明普列托最初并不知道把黄金储备运往苏联的计划。在向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作证时，奥尔洛夫说，在把黄金装上苏联商船之前，他决定要求西班牙政府下达一道沿地中海航线部署军舰的命令。“我知道这种命令只能由普列托下达，……而他对黄金行动的整个计划一无所知。于是，我打电话给苏联大使。[我]请求他与卡瓦列罗总理交涉此事，安排海军部长普列托给西班牙军舰下令。……没过几天，财政部长内格林和……普列托来到卡塔赫纳，那道命令下达了。”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也说普列托安排了必要的海军保护，尽管这无意中与他所宣称的内格林“只是在得到内阁全体成员的同意后”才把黄金转移到苏联的说法自相矛盾。“由于必须确保海上运输的安全，”他写道，“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成为这一秘密行动的合作伙伴。他也满意地听取了情况介绍，然后直接亲自负责，安排一支海军舰队一路护送到突尼斯近海。”但普列托却说，不仅最初他不知道把黄金运往苏联的计划，而且没有人向他请求海军护航，他也没有建议提供海军护航。他举出卡塔赫纳驱逐舰队司令比森特·拉米雷斯·德·托戈雷斯所写的一封信作为证据，这位舰队司令宣称，没有任何西班牙军舰为苏联商船护过航。内格林的好友马里亚诺·安索暗示，这封信可能正是应普列托的要求而写的。无论如何，西班牙舰队司令的说法与苏联海军武官兼军事顾问尼古拉·Г·库兹涅佐夫的说法正好相反。库兹涅佐夫负责在公海保护黄金的安全，他明确地说，包括“自由”号巡洋舰在内的一支舰队把苏联商船一直护送到北非海域。

普列托还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下列说法斥为“谎言”：“内格林坚决要求充分告知阿萨尼亚总统”，而总统“对这个计划感到惊喜”。阿萨尼亚“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普列托反驳说。“拉尔戈·卡瓦列罗和内格林用对待内阁部长的同样方式对待国家元首，他们向大家隐瞒了一切，甚至在这成为既成事实之后。阿萨尼亚极为

愤怒。……他对我说，他打算立即辞职。尽管我很同情他，但我仍然努力让他冷静下来。‘你的辞职将意味着共和国的崩溃，’我对他说，‘因为，鉴于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依照宪法产生一位继任总统的事实，这可能被其他国家用来作为终止[外交]承认的借口。’”

从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中，可以得出大致可信的以下结论：（1）尽管内格林得到政府和阿萨尼亚总统签署的九月十三日法令的批准，授权他将黄金储备转移到最安全的地方去，但是，一个月后他决定把黄金运往苏联时并没有与内阁磋商，也没有征询普列托或阿萨尼亚的意见；（2）如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所说，普列托成为“这一秘密行动的合作伙伴”，但那只是在内格林和卡瓦列罗决定把黄金运往莫斯科之后；（3）对答应派水手把黄金装上苏联商船表示认可的普列托很可能被要求提供海军护航，他甚至有可能建议提供海军护航，因为，认为可以在他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况下接受如此重要的任务是异想天开。实际上，马塞利诺·帕斯库亚说，当时内格林与普列托之间的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是亲密”；内格林还告诉帕斯库亚，他经常向普列托咨询“各种问题，不仅因为他看重普列托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因为他们相互信任和忠诚”。

那么，普列托为什么否认他对运送黄金负有责任？答案是，他第一次否认发生在一九四〇年，那是战后他与内格林的不和最严重的时期。另外，人们也许会问，一向不信任莫斯科的普列托为什么要合作？因为他在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想法不可能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想法有多大不同，尽管与普列托一样不信任莫斯科，卡瓦列罗仍然认为，除了把黄金运往苏联之外，西方国家的态度让他没有别的选择。

拉尔戈·卡瓦列罗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与普列托和其他运送计划参与者的态度无疑是一模一样的。“由于叛军兵临马德里城下，”他在内战结束以后写道，“在



没有说明地点的情况下，[内格林]要求政府授权把黄金从西班牙银行转移到某个安全的地方。这是为了防止黄金不幸落入叛军之手而采取的正常行动；因为，如果失去了用来购买武器的黄金，共和国的毁灭将不可避免。……内格林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将黄金转移到卡塔赫纳[的海军基地]。后来，由于担心敌军登陆，他决定将黄金运往国外。运到哪里去呢？英国和法国是那个不干涉公约的主要推动者。……我们可以信任它们吗？不可以。那么，我们还能把它运到哪里去？除了正在用武器和食品帮助我们的苏联之外，没有别的地方了。……我们用这些黄金换取它不断供给我们的战争物资。……另外，我们还用黄金购买我们需要的其他东西。”

尽管把黄金运到莫斯科肯定在军事和财政方面对共和国有利，但是，它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弊端：这一重大的财产——当时价值五亿美元，按现在（一九八七年）的黄金价格计算大约七十六亿美元——转移将使西班牙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莫斯科的友好政策。在其一九七六年出版的关于西班牙黄金的第一本书中，研究这一问题公认的权威安赫尔·比尼亚斯承认，在把大量黄金储备运到莫斯科之后，“共和国失去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他还承认，把黄金转移到莫斯科有利于“增强苏联对某些共和国领导人的决策的影响”。可是，三年以后，比尼亚斯来了个惊人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声称，断言把黄金运到莫斯科将共和国置于某种依附境地是“具有严重的反共偏见的……人们所采用的一种愚蠢的论点”，这些人不明白，由于为了得到武器共和国必须依靠苏联，因此，把黄金运到莫斯科并没有在“实质上”增强它对苏联的依赖程度。

另一方面，在他们那部关于法国航海公司的独具特色的著作中，多米尼克·格里索尼和吉勒·埃尔佐格坚持认为，把黄金运到莫斯科使苏联不仅可以控制它对西班牙的武器供应，而且可以控制西班牙在苏联国外进行的任何采购，因为这些交易必须通过苏联控制的巴黎北欧商业银行付款。此外，他们断言，苏联对武器供应的垄断使它

得以控制共和国的政治“进程”。

由于把黄金运到莫斯科将西班牙政府置于在财政上依赖苏联的境地，使它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一旦武器禁运解除——这是其外交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它也不可能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易，人们也许要问，内格林和拉尔戈·卡瓦列罗为什么没有尝试把运走的黄金留下一些以便在需要时购买武器和外汇从而保留哪怕是一点点财政上的独立性。拉尔戈·卡瓦列罗说这是因为内格林担心敌军在卡塔赫纳登陆，事实使这种论点毫无说服力，正如比尼亚斯指出的那样，这个大型海军基地“兵力充足、戒备森严，与战区具有一定的距离”。民族主义者知道，试图攻占卡塔赫纳是徒劳的，因为他们没有海军，而且实际上他们也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这样的尝试。因此，人们不仅必须怀疑那些对把黄金运到莫斯科负有责任的人是否具有正常的判断力，而且必须怀疑他们对苏联的诱骗和控制是否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反抗。人们还应当怀疑他们在认可苏联人的结算时的判断力，没有尝试进行任何认真的核查或监督。即使进行过这种尝试，在内格林死后移交给佛朗哥政府的文件中，或是在比尼亚斯于西班牙银行发现的文件中，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录。

西班牙的黄金储备安全运到肯定使斯大林心满意足，因为他已经开始向西班牙运送武器，只有通过实际占有黄金才能让他对付款放心并且确保他拥有政治影响力。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声称，“当.....得知西班牙政府愿意将西班牙国家的全部积蓄托付给斯大林时”，他和罗森堡大使“大吃一惊”。据奥尔洛夫说，斯大林为庆祝黄金运到莫斯科举行了一个由政治局委员出席的盛大宴会，他在宴会上用一句俄国谚语表达了他的意思：“西班牙人再也看不见他们的黄金了，就像他们看不见自己的耳朵一样。”

一九三七年一月，黄金运到莫斯科两个月后，根据奥尔洛夫本人的描述，他收到了

斯大林的姻兄弟保罗·阿利卢耶夫寄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祝贺他获得“苏联的最高奖章列宁勋章”。尽管奥尔洛夫没有说明获奖的原因，但它只可能与运送黄金有关。

## 第十五章 苏联的影响、政治欺骗和阿萨尼亚总统的困境

除了通过得到黄金确保其在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之外，莫斯科还取得了一个同样重要的进展，它大大有利于加强苏联对西班牙政府事务的影响。那就是一九三六年九、十两个月军事顾问和政治代表的到位，在一些部门，即使不是在形式上，实际上他们也在行使着部长的权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内战初期的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写道，“苏联人在国防部的影响越来越大。[苏联军事顾问]研究总参谋部的作战计划，通过部长，他们拒绝了许多专业建议并且把他们的计划强加于人。”他在后面的一段内容中写道：“在空军和坦克部队中，这些‘友军顾问’也在同样行使着权力。”关于苏联在高层的影响，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写道：“苏联人指挥的空军在他们喜欢的时间和地点作战，与陆军和海军之间没有任何配合。海军和空军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逆来顺受，玩世不恭，到他的办公室拜访他的任何人都会受到他的嘲笑，他宣称，他不是部长而且什么都不是，因为空军根本不服从他的命令。真正的空军部长是苏联人道格拉斯将军[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他在后面继续写道：“在[苏联军官]背后的是数不清的政治代表，他们伪装成共产国际的代表并且实际控制着西班牙的政治生活。……他们指挥苏联军官和西班牙共产党以及[苏联大使]罗森堡本人，后者实际上只是一个幌子大使，真正的大使是那些以化名进入西班牙并且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秘密警察的直接指挥下活动的神秘人物。”

苏联的影响不能用苏联仅凭其在西班牙的军人数量就足以胁迫西班牙政府来解

释。“我确信，”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证实，“在我国境内的苏联人总数从来没有超过五百，其中包括飞行员、工业技术人员、军事顾问、海军人员、翻译和秘密特工。他们大部分是飞行员，像德国和意大利飞行员一样，短时间后即被替换。苏联不可能因其派到西班牙的军人数量而达到强行行使权力的目的。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由于其他大国的态度，它是我们唯一的战争物资供应者，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让西班牙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和共产党的同路人渗入其他政治派别，尤其是社会党。”

此外，由于在内外政策的重大问题上可以期望得到共和派和社会党温和派代表的支持，共产党人在政府中的地位加强了。代表左翼共和派的何塞·希拉尔在七月十九日组成的政府中出任总理并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中担任不管部长，我们应该记得，他在一九三七年三月的一次演说中宣称，他的党派与共产党人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我们必须考虑周边国家的态度。”表达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普列托的观点的《社会主义者》写道，“我们仍然希望某些民主国家对西班牙形势的看法有所改变，与某种不可抑制的促进革命的欲望可能导致的后果妥协将是令人遗憾的，也许会酿成一场悲剧。”此外，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执政的头几个月，尽管苏联施加压力严重地分化了其追随者，他仍然可以容忍与共产党的关系；因为，无论他私下里如何被激怒，他们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着一致性。实际上，从卡瓦列罗政府组成的那一天起，他就采纳了共产党的意见，要以它的温和给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或者内阁中的其他非共产党成员并不关心苏联政策的远大目标。他们只是希望，在表示尊重法律形式之后，担心出现一个依附于德意的西班牙的英法两国将最终解除武器禁运。在上任之后不久进行的一次私人谈话中，拉尔戈·卡瓦列罗表明，必须“放弃革命口号以赢得民主国家的友谊”。他在这个方面没有疏忽。“西班牙政府不是在为社会主义而战，”他向一个英国下院议员代表团声明，“它是在为民主

和宪法而战。” 他还在一份向外国新闻界发表的公报中说：“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目的不是在西班牙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尽管国外有些人这么说。政府的首要目标是保卫议会制共和国，因为它是根据西班牙人民自愿接受的宪法建立的。” 同样具有启发性的是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作为总理他向残缺不全的议会发表演说时所使用的克制语气：“我在接受这个职务时并没有放弃什么东西，我绝对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见解。我向你们和全体国民说明这一点。……但是，鉴于军事叛乱使我们面临的威胁，我认为我有义务暂时把我始终捍卫的思想观念所固有的现实希望放在一边，承担起我的职务必然赋予我的责任。”

说明其内阁重视外国舆论的是第一次内阁会议后发表的声明。为了与已经发生的深刻的革命性变化或任何社会改革方案完全划清界限，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声明：

1. 鉴于内阁的组成，本届政府认为自己直接代表正在前线为保卫民主共和国而战的所有政治力量，叛乱分子用武力反对的正是这个共和国。……
2. 本届政府的计划具有明确的基本目的，通过必要的联合行动协调各界人士的力量，迅速取得镇压叛乱的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有其他政治利益都被置于从属地位，意识形态分歧被束之高阁。……
4. 本届政府确认西班牙对所有国家的友好感情并明确表示最忠实地遵守国际联盟盟约，同时希望，仅仅作为回报，其他国家将像我国对待它们那样对待我国。……
6. 本届政府向陆海空三军致以最热情的问候，同时也向正在保卫共和国宪法的民兵致以最热情的问候。它的崇高目标配得上这些英勇的战士，他们改善社会的合法愿望将使他们成为这一目标的坚定捍卫者。

因为必须让外国舆论注意到合法的形式，议会于十月一日根据宪法的规定开会。共

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的负责人写道：

“人民的合法代表，二月十六日根据人民的自由意愿选举产生的议会议员，今天上午开会。政府根据共和国宪法在议会亮相。

“内战期间，当违背人民的意愿强加于合法共和国的战争正在前线进行时，本届政府得到了议会的正式批准。它由真正的人民代表所组成，迄今为止一直如此。国家元首信任它，今天，它以议会的信任……加强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一边是拥有合法机构的共和国。……另一边是军队的叛国者，法西斯恶棍，西班牙国内外各个阶层的冒险家。文明世界现已可以作出判断；它完全站在我们一边。帮助合法的西班牙政府是国际法规定的一项义务；帮助叛乱者是一种反文明、反人类的罪行。”

在议会于十二月举行了另一次会议之后，左翼共和派的喉舌以与共产党人相同的政治术语宣称：

合法性只有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昨天的共和国议会会议所显示的。它也是民主共和国政权的连续性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同时它还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国家不可动摇的决心，它决不允许其公共生活的合法性在这场血腥的内战所掀起的激情与欲望的风潮中荡然无存。

现在，……当世界注视着全体马德里人民和西班牙人民所进行的这一场不同寻常的斗争时，共和国保持着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法制生活。考虑到时势危急和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特殊情况，它的所有基础机制运转正常。没有什么被废弃。……

共和国议会昨天再次举行会议使某些似是而非的论点不攻自破，持有这些论点的人，尤其是西班牙国外的那些人，热衷于对一场捍卫合法权利的人民战争百般责难，在一些具有古老民主传统的国家甚至不必谈论这些权利，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天

经地义的。像其他国家许多年前所经历的一样，西班牙目前正在进行一场巩固共和政体和民主制度的斗争。

要求那些容忍德-意干涉西班牙所犯下的国际罪行的政府正确评价这场斗争的意义过分了吗？面对国内的敌人，在二月大选中获胜的西班牙人民将在几天之内打败野蛮的叛乱者。但是，面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机器，它无章可循，只能开诚布公地诉诸国际舆论。

今天，企图废除西班牙宪法的叛乱爆发四个多月以后，七月十七日之前世界各国与之保持着热情友好关系的同一个政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那个政府的合法接替者、同一个议会、同一个共和国总统以及同样的公共机构行使着同样权力，履行着同样的职责。这不意味着什么吗？要不然就是，面对以这些机构为目标的不可容忍的侵略行为，这个世界无动于衷？

内战结束以后，流亡中的共产党人、共和派人士和社会党人仍然希望对国际舆论施加有利于西班牙共和派事业的影响，他们竭尽全力掩盖一九三六年革命的深度。实际上，一些人甚至坚称，内战期间共和国宪法没有遭到破坏。例如，前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内格林的热情支持者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断言：“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到[内格林政府被左派组织联合推翻的]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在共和国合法政府控制的所有地区，宪法是法律，事实上存在而且有效，在叛军控制区，它只是法律。”毫无疑问，正是这种政治歪曲和欺骗使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变成了尖锐的批评家。内战之前马达里亚加是阿斯卡拉特的朋友及其在国际联盟的同事，对后者的“能力、正直和知识分子的纯洁性”赞赏有加。当阿斯卡拉特抛出上面的谬论时，我们可以再次引用马达里亚加的那句话，他“背离了寻求真理的严谨路线，堕落成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走狗”。

为了保证西方民主国家继续承认西班牙政府是合法政府，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留在他的职位上批准政府的法令、履行宪法规定的各种职能至关重要。能否说服他无限期地这样做下去非常令人怀疑，不仅因为他对革命以及随之出现的暴力行为的敌意众所周知，而且因为他相信注定要输掉这场战争。在战后所写的一封信中，他坦率承认了自己的悲观情绪：“大家知道，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起，我竭力对政策施加有利于折中解决的影响，因为打败敌人是一种幻想。”一九三七年夏天，著名的共和派知识分子、阿萨尼亚左翼共和派的保守派成员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记录了下面这段与总统的谈话：“‘战争注定要失败，彻底失败，’阿萨尼亚说，‘但是，如果战争奇迹般地获胜了，只要还有可能，我们共和派[即共和派各个政党的成员]将不得不登上第一艘船离开西班牙。’我对他的说法表示同意，然后接着说：‘如果您认为……战争注定要失败而且共和派难逃悲惨的命运，那您为什么不谋求和解？’‘因为我不能谋求和解。’他立即答道。我从他眼中不难看出，他的无能为力让他感到极度痛苦。”

正是因为坚信战争注定失败，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政府由于敌军进攻首都的威胁迁到巴伦西亚的三周前，阿萨尼亚决定转移到巴塞罗那。有人担心，他可能从那里越过边境进入法国，然后在法国辞去总统职务。“与总统一同商定的是，”拉尔戈·卡瓦列罗回忆说，“我们大家全部迁往巴伦西亚。……第一个离开的是阿萨尼亚先生，他没有像商定的那样待在巴伦西亚，而是去了巴塞罗那。这是为了更靠近边境。他没有与我们商量，也没有跟谁说一声。”

这一指责也许并不十分公平。阿萨尼亚的多年知己何塞菲娜·卡拉维亚斯写道：“有人说，当总统通知他们无论他们是否同意他打算当天下午离开马德里时，一些部长提出了强烈抗议。‘这肯定是违反宪法的。’一名部长告诉他，‘显然，打开监狱并向犯人发放枪支都要更符合[阿萨尼亚依赖的]宪法。此外，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



恰恰是你几天之后将会去做的事情。’ ” 卡拉维加斯否认了下述指控：如果不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警觉，阿萨尼亚已经从巴塞罗那逃走了。“毫无疑问，他多次想到辞职，而且有几次决定这样做，但他从来没有想过逃跑。……他认为，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是他的责任，尤其是因为他知道，在另一边，只是由于被指控为他的朋友或支持者，许多人进了监狱或者已经被处决。”

尽管阿萨尼亚确实没有辞去总统职务，但是，这是由于共和派对他施加了压力，特别是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他们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九三八年四月阿萨尼亚曾经通知普列托，由于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解决政府危机，他打算辞职。关于这件事，普列托在内战结束以后把他的回答记录如下：“你不能辞职……[因为]你的辞职将给一切带来消极影响，而且因为你是共和国的化身，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那些没有与佛朗哥结盟的国家的尊重。由于这种尊重，我们仍然能够存在，你一旦辞职，这种尊重将荡然无存。”人们应当记得，在阿萨尼亚听说黄金运往苏联的消息后，普列托曾用同样的论点劝他不要辞职。

弗兰克·塞德威克在他为这位总统所写的传记中记述道，一九三六年十月，当阿萨尼亚离开马德里时，新闻界报道说，他打算巡视东部和加泰罗尼亚前线。“许多文章说他不是去视察前线，还有人说他‘胆怯地’逃离了马德里，尽管当时共和派方面几乎没有人认为可以守住马德里。”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土崩瓦解，不出三个星期，残缺的政府便步了阿萨尼亚的后尘。原来的外交使团几乎无人留下；许多共和国的缔造者和知识分子，例如[格雷戈里奥·]马拉尼翁、[拉蒙·]佩雷斯·德·阿亚拉、[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和马达里亚加，不是已经离开西班牙，就是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离开马德里之后，阿萨尼亚去了巴塞罗那。他的敌人说，他选择巴塞罗那为的是能够靠近法国边境，以防共和派的军事溃败；他的朋友说，他在那里居留为的是以他的存在帮助控制加泰罗尼亚。

但是，几乎没有人对总统职位的权威或者总统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控制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制止革命的能力或愿望抱有幻想，尤其是阿萨尼亚本人。“从内战爆发开始，”《阿萨尼亚文集》的编辑者胡安·马里查尔证实，“他发现他可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其中之一是对革命暴力的象征性制约。”

像共和派人士和普列托一样，阿萨尼亚的悲观情绪及其随时可能辞去总统职务的危险让共产党人及其盟友大伤脑筋。“我们收到的关于阿萨尼亚先生态度的报告……让人放心不下。”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证实，“我们担心他天生的悲观情绪因与世隔绝而加剧，这可能导致他做出某种无法改变的决定。”

据阿萨尼亚的批评者说，真实的恐惧也像悲观情绪一样影响着他的战时行为。拉尔戈·卡瓦列罗回忆说，在马德里，每当他有公事去与阿萨尼亚商量时，总统总是问他政府打算何时离开。“一直等到没有退路的最后时刻吗？我提醒你，我可不想被人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拖着游街。”

“真正困扰他的是担心自己可能落入法西斯分子之手，”共产党人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写道。保守共和派领导人米格尔·毛拉曾在一九三一年的最初两届共和国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内战期间置身事外，他在证明阿萨尼亚具有“过人的智慧和威严的气质”的同时确认了这种担心。“[他]备受肉体恐惧的压倒性折磨。……这种恐惧比他更强大，以致他没有想到要掩饰它。”

另一方面，阿萨尼亚的私人朋友和姻兄弟西普里亚诺·里瓦斯一切里弗描绘了一个更为勇敢的人物，与前议会议员、阿萨尼亚的左翼共和派成员马利亚诺·安索描绘的一样。“渐渐地，”安索写道，“关于他胆小如鼠的骗人鬼话暗中滋生出来……还有一些自称是他朋友的人推波助澜。……[内战之前]我与他共同面对过无数威胁，但我从没有看见他失去自制或尊严。……在警卫室和圣器室，在贵族和银行界的高层会议

上，他们想要他的脑袋。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有消灭他的肉体才能恢复他们想要的局面。”

无论阿萨尼亚的内心是否坚强，辞职的想法肯定一直压在他的心头。正如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所指出的那样，阿萨尼亚是一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他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政府首脑，但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以后”，他“成为一个政治力量——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集团的囚徒，在这个集团中，共和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钱不值。在伴随军事叛乱出现的社会动荡中，他被迫目睹使共和国沾上鲜血的暴力行为。人们不必太了解他也能理解……他为无力制止暴力行为而忍受的痛苦。……有人在马德里模范监狱犯下罪行之后他曾说过一句名言：‘我不想担任一个杀手共和国的总统。’这句名言使他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在敌对阵营，没有人谴责类似的罪行。”

里瓦斯—切里弗注意到姻兄弟的极度痛苦，他证实，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设法劝阻了阿萨尼亚辞职。塞德威克写道，一九三六年夏天以及随后一段时间，在另外一些重要场合，一方面是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和真诚的温和派人士坚决要求阿萨尼亚将他本人和他的职务视为共和国必要的对外象征，另一方面则是那些按照莫斯科的旨意行事的人必须维持一种民主西班牙的假象。“于是，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阿萨尼亚成为双方必不可少的傀儡。这位敏感严谨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以笔作枪的勇士、纸上谈兵的专家、典型的宪政主义者，他决不想在一场实际战争中，尤其是一场其结果可能预示他在西班牙实现民主的抱负希望渺茫的内战中扮演任何角色。不过，他继续留在他的职位上。”

克里姆林宫对阿萨尼亚总统和许多共和派领导人的悲观情绪心知肚明。一九三六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斯大林给拉尔戈·卡瓦列罗写了一封信，在信上署名的还有人民委员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国防人民委员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这封信显示斯大林非常重视外交手段的作用，他在信中向卡瓦列罗提出以下建议：“西班牙革命走的是它自己的道路，在许多方面与俄国所走的道路不同。这是由不同的社会、历史和地理条件决定的，而且还要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在西班牙，议会道路可能被证明是一种比在俄国更有效地推动革命发展的手段。……千万不要排斥共和派领导人，而是相反，务必把他们吸引过来使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首先必须保证政府得到阿萨尼亚及其派别的支持，尽可能帮助他们克服他们的动摇犹豫。为了防止西班牙的敌人说它是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从而阻止他们以此为由公开干涉，这是非做不可的，外国公开干涉构成了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最大威胁。”

这封信还包括其他建议：（1）“在一个像西班牙这样的农业国家里，农民非常重要，必须重视他们。可以颁布关于农业问题和税务问题的法令，这些问题事关前线农民的利益。”（2）“有必要把城镇中小资产阶级吸引到政府一边来，无论如何也要通过保护他们的财产不被没收以及最大限度地保证他们的贸易自由为他们提供采取有利于政府的中立立场的机会；否则的话，这些群体就会投靠法西斯主义。”

“这份文件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前共产党人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写道，“证明了三位共产党领导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向另一位在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中享有国际政治声誉的社会主义者表达的对西班牙人民的爱。”我们已经知道，内战爆发之后不久，罗萨尔就背弃了拉尔戈·卡瓦列罗。

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的回信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写道：“你们正确地指出了俄国革命与我国革命发展过程中明显存在的不同之处。的确，正如你们自己指出的那样，两国的各种条件不同。……但是，作为对你们[关于议会道路]的说的答复，应

当指出的是，无论将来保留议会制度与否，我们当中没有热心的支持者，甚至共和派当中也没有。……我完全同意你们关于共和派政党的说法。我们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们参与政府的工作和战争行动。他们很大程度地参与了地方、省级和国家各级政府机构的工作。目前出现的情况是，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努力维护他们各自的政治特性。”

不过，那些情绪低落、无能为力的共和派领导人在为革命裹上一层温和的外衣方面起到了某种有效的作用。就连众所周知与世隔绝、悲观失望的阿萨尼亚总统也在沉默了六个月之后决定公开支持官方关于内战的说法。针对国外民主人士的观点，官方说法否认这场内战是一场阶级斗争，而是把它解释成为一场全体西班牙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反对外国入侵者及其西班牙卖国贼帮凶的斗争。阐明了官方说法的道理之后，阿萨尼亚宣称，共和国正在战斗，他没有提到践踏一九三一年宪法的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乱。他也只字不提在左派阵营内部进行的将会决定未来革命走向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斗争。“[我们]大家都在战斗，”他宣称，“工人和知识分子，教师和资产阶级——是的，正在战斗的也有资产阶级成员，工会和政党以及所有团结在共和国旗帜下的西班牙人，我们大家都在为西班牙的独立以及西班牙人民和国家的自由而战。”

## 第十六章 错综复杂的东西方外交斗争中的西班牙

斯大林肯定看到了继续承认西班牙政府为合法政权的巨大好处。他知道，只要英法两国承认它是合法政权，那就不仅可以将德意两国干涉的问题提交国际联盟审议，而且可以要求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准则，在发生反对合法政府的叛乱的情况下，允许合法政府在国际市场上自由购买武器。此外他还知道，如果英法两国打算放弃其中立政策的话，希特勒一九二五年在《我的奋斗》中所预言的德国在中欧和东欧

的野心——“[我们]把目光瞄准东方的国家[并且]主要考虑俄国以及附庸于它的那些邻国”——有可能暂时受到遏制从而推迟对苏联的可怕进攻。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与苏联驻伦敦大使伊万·迈斯基举行了一次会谈，会谈之后，艾登写信告诉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奇尔斯顿子爵，苏联政府确信，如果佛朗哥将军获胜的话，“德国和意大利受到的鼓励将使发动下一次侵略的日子更加逼近——这一次也许是侵犯中欧或东欧。那是苏联不惜一切代价希望避免出现的事态，这就是苏联希望西班牙政府赢得这场内战的主要原因”。

此外，这种认识肯定已经进入斯大林的战略考虑：由于德意两国的干涉，西班牙内战对法国的南部边境和英法两国在地中海的利益形成了某种潜在的威胁，因此，它可能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西欧战争，在交战双方打到各自的元气耗尽之前，他实际上可以袖手旁观，结果，苏联将因这场战争脱颖而出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已经阐明了他在一场全面战争肆虐欧洲时的战略。他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如果战争爆发的话，我们不应袖手旁观。我们必须参战，但是，我们应当最后一个参战。我们参战为的是对战局施加决定性影响，决定战争结果的影响。”一九四七年，这篇讲话首次对外公布。

据三十年代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古斯塔夫·希尔格说：“克里姆林宫一直坚信，资本主义列强之间总有一天会爆发战争。如果苏联能够置身于这样一场战争之外，它就可以期待坐收巨大的渔人之利，因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实力将因战争而削弱，力量的平衡将发生有利于苏俄的变化。……此外，在斯大林看来，与希特勒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意味着排除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危险。从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以来，这种危险像噩梦一般困扰着苏联政府和民众。……因此，他希望得到宝贵的时间加速推进苏联的军备计划。同时他将关注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在交

战各国元气大伤以后，他就可以利用苏联的力量影响世界政治的格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室主任阿诺德·J·汤因比在《一九三六年国际事务概览》一书中写道：“如果迟早将与德国发生另一场战争，它显然是为了苏联的利益，因为战争将由一场争端引发，在这场争端中，西方列强根本不考虑可能将苏联首先推进战争的问题。”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只是西班牙内战爆发十六年前——外国对这个新生苏维埃国家的干涉和共产国际暗中破坏资产阶级社会的不懈努力已经在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形成了一条鸿沟，几年后的外交承认并没有在这条鸿沟上架起桥梁。“自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来，”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W·惠勒—贝内特爵士写道，“布尔什维克对西方世界充满了畏惧和怀疑。列宁和斯大林都非常清楚，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和政策向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战争；这是一场永恒的战斗；尽管可能出现长时间休战，但是，在一方或者另一方被彻底打败之前，这是一场不可能结束的战斗。”

几乎毋庸赘言的是，在英法两国政府要人的圈子里，对苏联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因为他们没有纯粹将其视为当前的一种军事威胁，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新的、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的源头，一旦与德国发生战争，这种意识形态将会蔓延到整个欧洲，而且它只会受益于一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消耗战。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担任英国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怀疑，这些“极端分子”——这里用的是他的原话——“最想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厮杀两败俱伤，而他们则袖手旁观坐收渔利”。张伯伦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对德国驻伦敦大使馆代办特奥多尔·科尔特所作的下面这一段陈述意味深长，它无疑反映了首相的看法：“英国和德国实际上是运行最为有序、管理最为完善的两个国家，两国均建立在国家原则的基础上……那是人类关系唯一有效的原则。与此背道而

驰的布尔什维主义意味着无政府状态和野蛮。如果这两个优秀的白人种族在战争中相互灭绝的话，那将是愚蠢至极的。由此获益的只能是布尔什维主义。”

由一九三六年三月希特勒重新军事占领莱茵兰首先在西欧造成的战争恐慌因当年七月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加剧了。美国大使威廉·布利特认为：“在下一场战争中只有苏联肯定会得到好处，它将以一场‘全面革命’以及‘斯大林和同志们’的最终胜利而结束。”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当时以社会党领导人莱昂·布鲁姆为首的]法国政府确信，苏联政府理论上希望把西班牙内战进行到底，因为，尽管苏联政府首先将因马德里政府和巴塞罗那政府[即中央政府和加泰罗尼亚地区半自治政府]被支持佛朗哥叛军的意大利和德国军队推翻而遭受挫折，但是，这将使德国企图在西属摩洛哥确立某种新的地位，同时使意大利企图继续占有巴利阿里群岛，进而导致以德国和意大利为一方、以法国和英国为另一方的战争。苏联政府的这一预谋最终可能将使整个欧洲布尔什维克化。”

西班牙内战爆发七个月后，英国帝国国防委员会下设的参谋长委员会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一份秘密报告中表示了类似的怀疑。这份报告没有特别提到西班牙内战，它断言，“苏联政府根本不会反对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只要苏联不受牵连”，因为，“在某些条件下，它可以期望这样一场战争为在欧洲普遍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提供机会”，所以，没有理由认为它已放弃“世界革命的最后希望”。

对一场被认为只有苏联将从中受益的欧洲全面战争的恐惧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不断加剧，并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达到顶峰。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举行的一次英国内阁会议上，张伯伦的国防协调大臣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发言说，在进行一场可能消灭希特勒的战争的同时，“几乎可以肯定将毁掉大量别的东西。结果可能是欧洲



的状况发生了变化，除了莫斯科和布尔什维克之外，没人愿意看到这种结果”。在同一次会议上，印度事务大臣泽特兰勋爵谈到了“一场世界大战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它将导致现存世界秩序的崩溃和某种状况的出现，这种状况接近于控制着苏联命运的那些人的最终目标”。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七日，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写道：“苏联人[倡导集体安全]的目的是在欧洲制造混乱促成战争：他们不用亲自参与；他们希望结果将导致世界革命（而这非常有可能）。”

另外，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发给英国驻德国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的一封电报中，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要求大使“以你能采取的最认真的态度”警告德国外长冯·里宾特洛甫，如果由于任何轻举妄动引发了一场欧洲战火，“只有那些希望看到欧洲文明毁灭的人将从这场灾难中获益”。

这种不安并不仅限于政界。据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武官盖尔·冯·施韦彭布尔格将军男爵说，陆军部的约翰·迪尔爵士和英军总参谋部的一些与他具有同样想法的成员确信，大英帝国与德国之间的下一场战争不仅对于大英帝国，而且对于整个欧洲都将会是一场悲剧。“他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场战争只会有利于苏联的阴谋，因此，与他们的许多同胞相比，他们对这场战争表现出更多的忧虑。”

尽管这些忧虑与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捷克危机直接有关，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同样困扰着英国政府，并且成为不干涉政策以及英国决定不与德国在西班牙发生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在本书作者看来，它们也是英国政府在中欧和东欧采取亲德政策的根本原因，这种政策很快将以绥靖主义而著称。根据二战之后所公布的一系列与德国驻巴黎大使冯·韦尔切克伯爵的私人谈话记录，由温和的法国激进社会党人组成的爱德华·达拉第政府私下里显然怀有同样不祥的预感。一九三八年五月，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前五个月，外交部长乔治·博内对这位德国大使说，“任何

解决方案”都比战争要好，因为“一旦发生战争，整个欧洲将遭到毁灭，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将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司法部长保罗·雷诺同样直言不讳。他对韦尔切克说，战争对于欧洲将是一场万劫不复的灾难，“只有遥远的已被共产主义统治的俄国除外”，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古老文明世界的毁灭”。至于总理达拉第，他用启示录式的语言向德国大使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一场现代战争所造成的可怕的灾难性后果将为人类前所未见，那将意味着欧洲文明的彻底毁灭。一上战场，赤裸裸的破坏者——哥萨克和蒙古人——就会源源不断地大批涌现，给欧洲带来一种新的‘文明’。必须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即使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另外，在几个月后与德国代办布罗伊尔进行的一次谈话中，达拉第“特别强调了一场欧洲战争的可怕的灾难性后果”。他还说：“在欧洲大陆衰弱之后，苏联不会让发动世界革命的机会溜走。”

德国人不失时机地助长法国领导人的这种担忧。“在德国和法国耗尽了国力之后，”德国驻巴黎大使馆武官屈伦塔尔将军对法军总参谋长甘末林将军说，“等待时机的苏联就会介入，那将意味着世界革命。”即使只是因为与苏联签订的互助条约，出于明显的外交考虑，法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他们的担忧，不过，像蒂埃里·莫尼耶那样的右派作家，公开表示过这种担忧。我们已经看到，莫尼耶坚持认为，“德国的战败将意味着形成了防止共产主义革命蔓延的主要屏障的那些独裁政权的垮台，这可能导致欧洲立即布尔什维克化”。他接着说，令人遗憾的是，“在法国，由于不能公开发表与此有关的任何看法，所以，具有这种看法的人士和党派通常也不承认它”。

如果不考虑“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只会对苏联有利”这种担忧，对英国和法国的外交所作出的任何评价都会存在缺陷，然而，英国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状况正是如此愚蠢混乱，所以，只有极个别公认的权威触及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仅仅触及表

面。但是，必须把约翰·W·惠勒—贝内特爵士当作一个例外对待。他的经典著作《慕尼黑：悲剧的序幕》中包括下面这一段直言不讳的内容：“在英国保守党和法国保守派人士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苏联希望促成一场欧洲战争，它将对战争袖手旁观，而战争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或崩溃。莫斯科将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瓦砾废墟上建立某种无产阶级专政，即使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独裁政权有所不同，这种专政也不会更好，甚至可能更加糟糕。……[于是]产生了这样的希望，只要能把德国的扩张引向东方，它就不再威胁西方文明，苏联人的阴谋也可能使他们自食其果。在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中，德国的入侵行动迟早要把它的兵力耗尽在俄国的干草原上，多年无法卷土重来。”

支持温斯顿·丘吉尔的国民工党下院议员哈罗德·尼科尔森爵士是一位职业外交官和著名作家，我们从他的日记和书信中发现了一些极具启发性的内容，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困扰着当时许多政治家的恐惧和担忧，这种恐惧和担忧决定了英国的对德政策，后来又决定了英国对西班牙内战的政策。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德军进占莱茵兰，只要英法两国不怕打仗，它们就能采取联合行动成功地制止这一违反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的行为。在此前不久所写的日记中，尼科尔森道破了英法两国不愿干预的要害：“我们当然应该战而胜之并攻进柏林。但是，这有什么好处呢？这只会使德国和法国产生共产主义制度，这也是苏联人非常希望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关于亨利和霍诺尔·钱农夫妇（亨利是下院的一位保守党议员），尼科尔森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写道：“[他们认为]我们应当让德国这个勇敢的小国对东方的赤色国家随心所欲，还要让堕落的法国在它这样做时保持安静。否则的话，我们不仅将会看到西方出现赤色国家，而且还会在伦敦、凯尔维登[钱农家的乡间别墅在那里]和绍森德发现炸弹。”第二年，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尼科尔森在日记中记述说：“保守党的主张完全不变，愿意让德国进攻俄国并在近东横行霸道，只要它不

来打扰我们。”他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写道：“我们已经丧失了意志的力量，因为我们的意志力量四分五裂。管理阶层的人满脑子想的是他们的财富，这意味着对赤色国家的敌视。这种敌视在我们与希特勒之间达成了某种纯属虚幻但在目前行之有效的默契。”另外，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一日，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在战前和战时的保守党政府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的奥利弗·斯坦利对哈罗德爵士说：“‘你知道，无论胜败，这都是我们所代表的一切的末日。’他用‘我们’指的显然是资本主义国家。”

同样具有启发性的是下面这一篇奥利弗·哈维的日记。一九三六年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哈维担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私人秘书，然后继续担任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私人秘书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的外交日记中写道：“任何战争无论胜败都将带来巨大而且不可预知的社会变革，所以战争不是一种解决办法——请看一九一四年。因此，除非关系到英国头等重要的切身利益，应当不惜一切代价拖延时间从而避免打仗。……[保守]党内的富有阶层……认为，纳粹分子总的看来比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更保守：任何战争无论胜败都将毁灭悠闲的富有阶层，因此他们为了和平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希特勒不失时机地企图使英国政治家和上层社会名流相信，他是西方文明的守护人和潜在的反共斗士，而且他希望与英国和平友好相处。他在这方面得到了德国驻伦敦大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协助。“一段时间以来，里宾特洛甫忙于在伦敦营造某种对第三帝国的友好气氛。”有影响的半官方的《泰晤士报》编辑、绥靖主义的坚定支持者杰弗里·道森的传记作者约翰·伊夫林·伦奇写道，“他的宣传引起人们的认真思考。纳粹德国肯定是共产主义俄国与西方之间的一个楔子，这是杰弗里充分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二战爆发之后不久撰写的那本被当时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给予官方认可的小册

子《英国问题》中，著名政治家和保守党贵族劳埃德勋爵表示，尽管希特勒的“手段可恶”而且无视欧洲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但“他仍然声称，他最终主张的是某种欧洲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可以想象，总有一天这将提供一种与其他国家达成谅解的基础，平等地决定不把它们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当作祭品摆上世界革命滴血的祭坛”。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当有影响的政治家兼外交家洛西恩勋爵拜访希特勒时，这位纳粹领导人明确表示，“当共产主义成为一个问题时，他知道他在谈论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发现什么人比他谈得更好：他看到了共产主义给德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且与之斗争了多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将在一二十年之内灭绝的思想。……它是一种征服世界的思想，堪与创建了某个大型宗教的思想相提并论。……必须用另一种哲学与它斗争”。据认识勋爵的英国历史学家A.L.罗斯说，从那以后，洛西恩勋爵变成了“著名的与希特勒达成‘更充分的谅解’的鼓吹者，而且他比大多数鼓吹者的危害更大，因为他有魅力，因为他与英国政界上层人士关系友好过从甚密——他属于核心集团的一员，因为他有写作能力，其他鼓吹者都不具备这些东西。”

同样，一九三五年担任外交大臣的约翰·西蒙爵士在当年三月二十五日与这位纳粹领导人会谈之后记述道：“希特勒非常坦率地表示，他决不会同意与苏联签订一项‘互助’条约。他断言，共产主义是一场瘟疫：不像——他声称只想让德国人接受的——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种扩散性的传染病，它可能传遍整个欧洲和亚洲。他在德国已经消灭了共产主义，因此，德国是防止这种瘟疫向西扩散的屏障。所以他声称，我们应当心存感激。他不会与东方签订条约。我们访问柏林的实质性成果是，确认德国非常希望与英国达成充分的谅解。”

希特勒轻而易举地使许多来访者相信了他的真诚。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所指出的那样，有些人可能心存疑虑，但是他们仍然“相信，他们的担忧没有道理；希特勒是欧洲和平的虔诚信徒；如果他怀有敌意的话，那么，他敌视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英国”。不过，另一些人在到访之前已经改变了看法。例如，当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出任外交大臣之前不久应内维尔·张伯伦首相的要求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拜访希特勒时，根据德国方面的谈话记录，他表示，完全认可元首对重建德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如果英国公众舆论有时对德国的一些问题采取了批评的态度的话，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英国人民不十分了解德国的某些措施产生的动机和条件。“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他和英国政府的其他成员仍然充分意识到，元首不仅在德国国内取得了许多成就，而且通过在德国消灭共产主义，切断了共产主义入侵西欧的道路，因此，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德国看作西方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座堡垒。”

一年前，托马斯·琼斯以一种明显急迫的语气强调了英国与德国达成某种谅解的必要性。琼斯在政界上层人士中交际广泛，是斯坦利·鲍德温首相的好友、顾问和知己，首相的“惰性”让热衷于英德友好的人们担心。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从首相周末度假的契克斯寄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几天前刚刚飞去会见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琼斯写道：“我们必须在苏联与德国之间做出选择而且要快。……[希特勒]一直要求与我们结盟以形成一道防止共产主义蔓延的屏障。我们的首相将在明年的加冕典礼之后让位给内维尔·张伯伦，他在辞职之前并非不想作为最后的努力进行一下这种尝试。”

但是，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鲍德温始终没有进行这种尝试，他不想使自己陷入外交事务，结果，与德国达成某种谅解的尝试留给了他的更果断的继任者内维尔·张伯伦。不过，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和对苏联介入的担心足以促使鲍德温在七月二十六日

向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表示，“无论法国人或其他人怎么做，他决不考虑让英国人与苏联人并肩作战”。

这也是鲍德温内阁的海军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对西班牙内战的反应，他后来成为内维尔·张伯伦政府的“内阁决策委员会”成员。八月五日，鼓吹“严守中立”的霍尔写道：“我们决不应该在西班牙采取任何支持共产主义的行动，特别是在人们对葡萄牙的共产主义记忆犹新时，它可能蔓延到葡萄牙，尤其是在里斯本，这对大英帝国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同样重要的是主管英国内阁和帝国国防委员会内部机构达二十五年之久的莫里斯·汉基爵士的观点。“根据欧洲目前的状况来看，随着法国和西班牙受到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断言，“可以想象的是，不久的将来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也许对我们更有利，我们的队伍越大越好。”

根据查阅了第一海事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的私人文件的劳伦斯·R·普拉特的叙述，这位大臣及其部门人员与汉基具有同样的想法，而且还有证据证明，英国基地舰队司令、查特菲尔德的继任者罗杰·巴克豪斯海军上将曾于一九三六年提议，英国应与德国和意大利联合“镇压西班牙革命”。

至此，我们在本章以及前面的一些章节里已经列举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种说法言之有据：英法两国的权势人物将德国视为欧洲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并且不愿卷入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因为只有苏联可能从中受益。当伦敦《观察家报》的编辑、保守党观点有影响的传播者J.R.加文写下下面这段话时，他表达的显然不只是个人观点：“推翻德国政权从而使苏联的势力进一步加强并且成为未来无法遏制的力量绝不可能符合英国和大英帝国的利益，这也将使共产主义在欧洲和亚洲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法国右派以及温和的法国激进社会党成员持有

类似的观点，尽管后者没有公开表达过。因此，强调下述看法并不为过：英法两国不会不顾陷入一个可能被意大利和德国控制的西班牙的危险，改变它们的不干涉政策；共产党人及其盟友在形式和本质上改变西班牙革命特征的努力也不可能诱使英法两国政府在西班牙向德国政府提出挑战。

尽管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社会党人总理莱昂·布鲁姆据说是在英国的强大压力下采取中立立场的，但是，布鲁姆本人始终否认这些传言并且承担全部责任。不过，当内战爆发时，应西班牙总理何塞·希拉尔的吁请，他最初准备向西班牙政府提供战争物资，但是，在去伦敦参加了因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而召开的关于洛迦诺公约前途问题的会议后，他改变了主意。尽管西班牙问题不在议事日程上，但仍被间接提了出来。乔尔·科尔顿在他那部资料充分翔实的莱昂·布鲁姆传记中写道：“[英国]政府成员纷纷就援助西班牙共和派的政策表达了各自的意见，布鲁姆后来把这些意见形容为‘严重的忧虑’。‘要说那是反对或许有些言过其实。’多年以后他在回忆这次会谈时说，‘他们不过是在给予小心翼翼的忠告并且表示严重的忧虑而已。’在一次午餐交谈中，一些保守党人表示，他们希望法西斯分子与布尔什维克之间进行一场极端分子自相残杀的战斗；这是暗示，西班牙可以成为这样一场大决战的合适地方。布鲁姆、德尔博斯[伊冯·德尔博斯，法国外交部长]和莱热[亚历克西·圣—莱热·莱热，法国外交部秘书长]清楚地知道了英国保守党人的消极态度，他们不想在这场西班牙‘内部斗争’中支持任何一方；他们希望西班牙内战不要转化成为一场欧洲战争。不过，布鲁姆本人证实，他在伦敦逗留期间没有受到要他采取不干涉政策的直接压力。”

尽管如此，英国人仍然间接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不承认受到这种压力然后坚持自己承担全部责任是布鲁姆典型的行为方式。毫无疑问，由于英国官方的舆论环境，他离开伦敦时非常烦恼，因此，即使他还不准备放弃最初的打算，援助西班牙的决



心也有所动摇。不过，他在巴黎意外地遭到坚决的反对。”这其实是正常的，因为在那里，他是人们直接施压的对象，这些压力来自内阁中的某些激进社会党成员，来自共和国总统，来自联合起来的法国右翼势力，来自强大的激进社会党，后者代表了人民阵线联盟内部的大部分中产阶级。据莱昂·布鲁姆的法文传记作者让·拉库蒂尔说，中产阶级“胆战心惊地拒绝承担外交事务方面的任何风险”。

对法苏互助条约的敌视同样表明英法两国的权势人物反对任何可能使它们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的军事承诺。当部分重要的法国舆论毫不掩饰这种敌视而官方人士公开表示他们的反感时，权威的英国报纸竟别出心裁。英国政府的非正式喉舌《泰晤士报》写道：“英国舆论不准备接受……法国在整个国际政治领域的领导地位，也不准备承认它对所有义务负有责任，它正在以结成反德联盟的方式……不断积累这种义务。……此间并不认为法苏条约是一项积极有益的外交成就。”

“法国为了势力范围在东欧结盟——其目的仍然在于势力范围，即使没有侵略的意图只是为了自卫。”“观察者”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写道，“它正确或者错误地——我国有些人认为是错误地——相信，因与苏联和小协约国结盟而得到的好处超过了卷入某些实际上与它无关的争端所带来的风险。在这个问题上，法国的政策与我国的不同。”

“这些条约[法苏条约和捷苏条约]意味着战争而且不可能意味着别的事情。”J.L.加文在《观察家报》上写道，“如果我们支持它们，它们意味着英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而且不可能意味着别的事情。如果英国打算支持或者赞成使用那些致命的手段；如果我们打算全面或者部分参与其中；如果我们打算支持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潜在盟友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反对德国——那么，必将导致对和平局面的致命破坏而且再说什么也没有用。我们不可能左右逢源。如果我们准备在东方与德国冲突，最

终它必定在西方攻击我们。没有别的可能性。”

尽管从来没有任何官方声明像这些极具影响力的一流报纸一样如此直截了当地表达意见，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意见大致相当于政府的立场。根据二战之后公布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八日的会议记录，这一点显而易见。这次会议“详细研究了法国[因其在中欧和东欧承担的义务]可能将英国拖入战争的危险，因为，正如[张伯伦首相]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眼看着法国灭亡’。”

同样表示关切的还有英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它在一九三七年报告说：“如果法国因为与我们无关的抉择受到牵连，我们可能被卷入一场欧洲的全面战争，即使到时候对我们来说这场战争非常危险。”“尽管受到先决条件和各种因素的限制，”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米德尔马斯写道，“英国实际上从来没有否定过这一基本原则并且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奥地利沦陷之后不久由参谋长联席会议阐明了它。当法国‘陷入险境时……我们不能允许[它]被蹂躏，也不能允许把机场建在法国国土上。几百年来，英国人民为阻止低地国家[荷兰和比利时]被某个敌对的大国据为己有而战斗过’。”正如米德尔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张伯伦政府勉强承认，不能眼看着法国被德国打败是英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向东方扩张，但是，并没有出现西欧的力量平衡被打破这种最后的局面。因此，当张伯伦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上表示“最令人不安的情况是法国部长可以决定英国是否参战”时，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

于是，正如英国政府所察觉的那样，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不仅要防止因西班牙内战和法国介入的可能性所造成的持续威胁引起一场欧洲战争，而且要防止因法国在东欧承担的义务引起一场欧洲战争。有人认为，只有在法国摆脱它与东方的种种纠葛、英德两国达成某种政治谅解以保证在西欧维持现状并且允许德国作为反苏堡垒

在东方谋求霸权之后，西方的战争才能避免。

尽管英国的历史学家基本上都在回避“英国的目的是把纳粹的侵略引向东方从而使两个极权国家在那里两败俱伤力量耗尽”这一论题——考虑到对共产主义的担忧，这一论题至少符合逻辑——并且强调奉行绥靖政策的其他理由，尽管公开档案中的官方文件受到监管甚至导致某些文件消失不见，但是，证据仍然不容辩驳地表明，在政界上层以及上流社会人士中，存在着强大的舆论倾向，希望德国至少起到抗衡苏联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作用。证据已经充分证明，纳粹政权上台初期这些倾向就已存在，证据还使人们确信，直到一九四〇年春天德国入侵西欧打破力量平衡为止，这些倾向一直存在。

如果我们不得不喋喋不休地详细讨论绥靖政策背后的主要动力，那是因为英国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历史的研究状况令人非常不满意。如果不能无可辩驳地确定绥靖政策的主要动力，不仅无法理解战前的欧洲历史和英国政策——后者看上去并非一个接一个的荒唐失误，而且无法理解斯大林在西班牙内战和革命期间所坚持的“温和”路线。同样无法理解的是，斯大林的努力——他企图通过曲解西班牙革命的性质诱使西方民主国家放弃它们的不干涉政策，进而在西班牙与德国对抗——为什么绝不可能取得他所希望的那种效果。

不过，当大多数英国历史学家都在回避绥靖政策背后的主要动力这一问题或者将其一带而过并且企图以其他辩解来搪塞时，的确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例外。可以认为像阿诺德·J·汤因比——据（认识他的）托马斯·琼斯说，汤因比曾经“相信[希特勒]希望欧洲和平并与英国友好相处的诚意”——这样的权威在一九三七年作出那么明确的表述理所当然：“应当缔结一份西方条约并且应当默许希特勒先生在东方随心所欲地自由行动的建议将会被那些（不是因为害怕德国日益增强的实力，就是因为

不喜欢苏联，或者出于其他目的）认为英德友好非常必要的英国人所接受；那些坚决反对向德国提出的归还其战前殖民地的要求做出任何让步的英国人可能也会考虑这个建议。……几乎毫无疑问的是，相当一部分英国公众——包括议会下院中的一些支持政府的议员——将认为，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应当放弃东欧任其听天由命，只要能用这种方法把重新分配殖民地的问题暂时搁置就行。”

另外还有担任张伯伦政府陆军部长莱斯利·霍尔—贝利沙的顾问的军事战略家兼历史学家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的证词，他说，在“政府的圈子里我早就听到过这样一些精明的论点：允许德国向东方扩张，逃避我国所承担的国际联盟盟约义务，让其他国家首先承受侵略的冲击”。

约翰·W·惠勒—贝内特爵士甚至更加直截了当：“然而，这种宁愿看到德国控制中欧和东欧的态度不仅仅是英国外交基本倾向的附带产物。它的意义应当比这大得多，在整个形势中，它是关键因素之一。在‘迁就’希特勒以争取和平的一般愿望背后，暗中隐藏着一种期待，即使不是隐藏在张伯伦先生本人心里，至少也是隐藏在他的某些顾问心里：如果能够把德国的扩张引向东方，它迟早会与敌对的苏俄极权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在接着爆发的战争中，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将两败俱伤力量耗尽，而且由于持有这种观点的那些人认为，对于英国来说，布尔什维克俄国比纳粹德国更危险，因此，希特勒打败斯大林并在这个过程中极大削弱自己的前景不会不让人抱有期待。”

## 第十七章 向英法伸出橄榄枝

现在应当清楚的是，法国在中欧和东欧所承担的军事义务与英国外交政策的目标背道而驰。根据德国文件我们同样清楚的是，即使在法国政府官员当中，法苏条约也被一些人认为是与德国达成最终谅解的一个障碍。克里姆林宫充分意识到了这一

点。实际上，对英法两国可能以牺牲东欧为代价与德国达成某种协议的担忧在莫斯科根深蒂固。一九三七年二月，在与美国驻苏联大使约瑟夫·E·戴维斯的一次谈话中，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毫不掩饰这种忧虑。“他无法理解英国为什么看不到，希特勒一旦控制了欧洲，他也将吞并英伦三岛。”戴维斯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他为此似乎非常纠结，并且担心法英两国与德国之间可能就某些分歧达成了谅解。”

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对德国军国主义势力最终可能向东方而不是向西方扩张的担忧促使克里姆林宫在西班牙加倍努力以引诱英法两国放弃它们的中立政策。由于对英法两国不顾意大利和德国越来越大的干涉力度继续采取不干涉西班牙内战的中立政策、对法国政府没有以实际的军事协定补充法苏条约以及对英国工党抵制人民阵线感到失望，苏联的担忧加重了。

一九三七年一月底，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胡安·科莫雷拉向党中央委员会汇报了与共产国际高级代表杰罗·埃尔诺进行的讨论，杰罗在西班牙化名“佩德罗”，刚从莫斯科回来，他们认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是寻求欧洲民主国家的合作，尤其是英国的合作。”

“在民主阵营的大国中，决定性因素不是法国；”两天后科莫雷拉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说，“决定性因素是英国。全党同志务必认识到这一点，克制一下[他们]现在使用的口号。……英国这个国家不像法国。英国是保守党统治的国家。英国是一个变化缓慢的国家，它始终专注于帝国的利益。英国是一个富人的国家，它有一个不会轻易做出反应的极其保守的中产阶级。……有人说，英国无论如何决不会答应德国征服西班牙，因为这将意味着对其切身利益的某种威胁。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如果英国的大资本家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在西班牙问题上没有别的选择的话，那么，他

们随时可能与意大利和德国的资本家们达成协议。

“[因此]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仁慈地保持中立的国家争取过来，即使得不到它的直接援助。”

达到这一目的不仅要靠共产党人在革命爆发时所采取的强调革命温和倾向的策略，而且要靠另外一些具体手段，支持共产党的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一九三七年二月发给英法两国政府的一份照会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照会提出，将西属摩洛哥转让给这两个大国，作为回报，它们采取措施阻止意大利和德国进一步干涉西班牙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底，提出这个建议约两周前，在从莫斯科回来之后立即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进行的讨论中，“佩德罗”谈到了为了得到两个大国的支持而将西属摩洛哥以及同样被佛朗哥将军控制的加那利群岛交给英法两国的可行性。他提出的理由是，在俄国革命期间，苏俄也不得不付出了领土的代价。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教育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脱离共产党之后证实，“[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以及[苏联大使]罗森堡在西班牙都曾敦促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就西属摩洛哥提出一些让英法两国感兴趣的‘建议’以换取两个大国对共和国的援助”。另一方面，支持共产党的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声称，这份照会是在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授意下起草的。鉴于两人的亲苏立场以及他们与两位苏联外交官的频繁联系，这种说法与埃尔南德斯的说法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由于西属摩洛哥在佛朗哥将军的控制之下，而且最近不断有报道称，德国正在加强直布罗陀海峡对岸的海防，所以，莫斯科肯定清楚地看到，英法两国不可能同意如此进行利益分配，在不冒突发国际冲突风险的

情况下，它们也不可能接受这种分配的结果。实际上，埃尔南德斯断言，如果“有充分理由对强行改变摩洛哥现状的前景表示担忧”的英法两国“被这个诱人的建议吸引”的话，那么，“民主国家与德国和意大利的摩擦将会达到白热化，这将为实现苏联的计划创造有利条件，把两个集团推进一场远离俄国边界的战争”。

不过，值得怀疑的是，在提出摩洛哥建议时，共和国政府的大部分成员是否了解苏联西班牙政策的深谋远虑，就连他们是否知道摩洛哥建议也值得怀疑。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声称，从来没有人向内阁提出过与摩洛哥有关的任何建议；他表示，如果有人提出的话，他将“反对所有支持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措施”。他还声称，在担任内阁部长期间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建议。这是事实，因为，据阿斯卡拉特说，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告诉他，只有阿萨尼亚、拉尔戈·卡瓦列罗和他知道这一份秘密照会。“暂时没有通知其他内阁成员。”阿斯卡拉特补充说。在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一九三七年二月七日写给西班牙驻巴黎大使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的一封信中，这一点得到了证实，德尔巴约还在这封信中表示，由于普列托“日益增长的悲观情绪”及其“富有煽动性的高谈阔论”，“如果外交政策的一举一动都要经过多数批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尽管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份照会的副本仍然落到了佛朗哥将军政府的手中，并且被全文发表在敌方的报纸上。随后几天，照会的节选或摘要出现在英法两国的主要报纸上。“我国大使馆里有人与叛军有接触。”三月十八日德尔巴约写信告诉阿拉基斯塔因，“否则的话，无法解释他们怎么会知道照会的事，……[但是]我不介意这件事受到过分的宣传，因为它表明，我们的国际政策目的在于与西方民主国家紧密合作[并且]有助于促进集体安全与和平。”

还有，在四月九日致阿拉基斯塔因的另一封信中，德尔巴约写道：“我们必须不惜

一切代价把伦敦争取过来。……我们已经发现，除了大多数内阁成员对我们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这一事实之外，英国政府……的愚蠢和惰性令人恼火。但是，我们必须把它争取过来。如何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通过鼓动各个阶层的公众舆论（在这方面，拜会[访问共和派控制区的]英国教会代表团是一次无与伦比的成功）；另一方面，通过不断挑逗大英帝国天生的私欲和利己主义。”

由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签署的这份照会的部分内容如下：

—

1. 西班牙政府希望，就西欧而言，西班牙未来的外交政策采取与法国和联合王国积极合作的形式。
2. 为此，西班牙将愿意考虑，在符合自身利益的范围内，不仅在经济重建方面，而且在两个大国感兴趣的军事、海军和空军的关系方面进行合作。
3. 同样，西班牙将愿意与两个大国一起研究是否应当改变北非（西属摩洛哥）的现状，只要这种改变的发生对英法两国比对其他大国更有利。……

二

如果本着全面进行国际合作的精神所提出的这些建议的真正价值得到英法两国政府的正确评价，那么，鉴于和平事业——这等同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国家利益——要求有效地达到以下目的这一事实，两国政府将因此承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措施阻止意大利和德国进一步干涉西班牙事务的责任。

如果西班牙政府愿意做出的牺牲被证明不足以阻止意大利和德国继续向叛军提供人员和物资，如果共和国政府因此将不得不与两个大国援助的叛军将领继续作战，那



么，除非取得胜利，鉴于其基本目的——使西班牙人民免遭更多的苦难——没有达到这一事实，本照会第一部分所提出的建议将被视为无效条款。

“这份西班牙照会为共和国希望与英法两国达成谅解提供了最确凿的证据。”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尽管由于现实条件无法采取互助条约或者结盟的形式，但是，它的意图和目的是相同的。”他在后面的一节中写道：

两国政府均不愿接受共和国的建议，而通过国际“泄密”将西班牙照会的内容公布于众也表明，有一只活跃的幕后黑手正在千方百计地破坏有利于西班牙政府事业的各种努力。……

尽管二月照会是一份与内战期间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有关的官方声明，但是，并不能认为它代表了我们为劝说英法两国采取某种更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态度而进行的努力的限度。通过所有相关论据，通过通报意大利和德国针对两国政府采取的行动，通过提出消除意大利对马略卡岛的威胁的具体建议——通过我们所能采取的一切手段，我们全力争取使伦敦和巴黎的态度发生转变。

我们没有异想天开。我们并不要求军事援助。我们仅仅要求严格遵守“西班牙应当留给西班牙人”的不干涉政策——这是英法两国强加于我们的，就凭这个它也应当得到遵守；如果这两个民主国家觉得无法阻止德国和意大利继续干涉西班牙，他们就应当体面地承认其政策的失败并且重新全面确认自由贸易的权利。简言之，我们要求国际法得到应有的尊重。

英法两国对我们的警告、建议和要求置之不理的做法实在令人心碎。

尽管这些情况令人失望，苏联仍然继续支持反佛朗哥阵营的抵抗行动，它坚信，英法两国不可能允许一个附庸于意大利和德国的西班牙存在，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

它们迟早将会被迫干预，从而在德国来得及为东欧的战争做准备之前削弱或者消灭它的军事力量。

“[莫斯科]将千方百计地避免自己被孤立，”共产国际代表鲍里斯·斯特凡诺夫断言，“如果除了战争之外没有其他出路的话，那就努力迫使西方民主国家与希特勒打仗。”

“我们希望[民主国家]帮助我们并且相信它们将以这种方式保护它们自身的利益。”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宣称，“我们努力使它们认识到这一点进而争取它们的帮助。……我们非常清楚，法西斯侵略者在每个国家都能找到支持他们的资产阶级群体，例如英国的保守党人和法国的右派分子，但是，法西斯侵略正以飞快的速度进行，因此，必须使希望其国家自由独立的所有人相信，勇敢面对这种侵略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例如，在一个像法国这样的国家里。如今，除了向西班牙人民提供具体的帮助之外，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更有效地做到这一点。”

“莫斯科试图使法国和英国认识到它们应当为它们自己做的事情。”内战最后两年的政府总理胡安·内格林在内战结束之后说，“苏联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的希望是，巴黎和伦敦最终将会意识到意大利和德国在西班牙的胜利给它们所带来的危险，从而与苏联一起支持我们。”

不过，英法两国都不想冒爆发一场欧洲战争的风险，甚至不想因为在西班牙向德国挑战而削弱了纳粹政权。德国的干涉可能确实意味着未来对于英法两国的地中海利益以及对于法国南部边境的威胁，但是，这应当不影响通过在东方对德国姑息让步并且把它当作一支对抗苏联的力量以保证西欧和平的长期战略。

一九三七年五月，内维尔·张伯伦接替斯坦利·鲍德温担任英国首相大大加强了绥靖主

义支持者的力量。当然，鲍德温支持绥靖主义并且赞成与德国达成政治和解，但是，他不是个实干家。正如伯肯黑德伯爵所证实的那样，他喜欢“梦想和顺乎自然，希望问题以某种方式自行解决”。另一方面，据伯肯黑德说，张伯伦的“卓越天资并不是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所需要的”，他“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实干家”、“一个高层管理者和一个不妥协的熟练、严谨的辩论家”，带有些许“冷酷无情，让人想起他父亲约瑟夫·张伯伦的许多事情以及某种专制倾向，这种倾向使他对内阁实行铁腕控制”。伯肯黑德还说，张伯伦关于协商之公平基础的概念是，“应当告诉德国人，只要他们通过和平的手段，我们不会使用武力反对他们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达到目的”。

“通过和平的手段”这一先决条件是张伯伦政策的基本要素，因为，尽管张伯伦及其支持者已经容许德国通过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在东欧取得支配地位，他们甚至——如同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里所看到的那样——放弃了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英国向波兰做出的军事保证，但他们知道，如果希特勒打算使用武力达到目的，英国很可能因为议会中的反对派和新闻界的压力以及法国与中欧和东欧的纠葛卷入一场西欧的战争。由于这些原因，苏联边境以西的任何领土改变“只能通过谈判的方式和英国政策的逐步修正”来实现。

至于张伯伦在其绥靖战略中对于苏联命运的预见，公开的英国文件中没有证据证明他试图在两个极权国家之间挑起一场军事冲突。我们也不能指望任何详细阐述张伯伦策略的官方文件；因为，正如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在一份关于英国政策制定的一般性声明中注意到的那样，“决定经常是在没有记录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议会那间哥特风格的首相办公室里，在圣詹姆斯公园散步时，在伦敦西区的某个俱乐部或者某个乡间别墅里”——而且我们应当加上，在唐宁街十号霍勒斯·威尔逊爵士那间私密的办公室里。

尽管包括二战之前那些年的文件资料在内的英国档案已经根据一九六七年的公共档案法公布于众，但是，根本不可能发现任何可以具体证明关于东欧的宏观战略的内阁文件、备忘录或会议记录，因为这个具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只能由张伯伦信任的同事私下讨论。实际上，迄今为止所公布的内阁档案没有提供任何与讨论这个问题有关的蛛丝马迹。此外，即使英国政策的明确目的写成了文字，那也应当记住，大法官——负责所有政府文件的内阁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以安全为由把某些文件从“可供历史学家使用”变成“一百年或者实际上永远”限制使用的资料。如同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里所看到的那样，用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的话说就是，这种自由裁量权也许解释了张伯伦向德国提出的关于波兰的秘密建议为什么“并不令人意外地……从英国档案中消失了”，以及在编辑成册的英国外交政策文件中为什么“信件极少，会议记录甚至更少”。它还可能解释了内维尔·张伯伦发给阿道夫·希特勒的一些“秘密电报”为什么像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欧文所说的那样没有在编辑成册的官方文件中公布。

但是，即使可能永远无法找到张伯伦策略的文件证据，仍然不乏证据证明，他认为苏联是对英国利益的主要威胁，因而对苏联的目的持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据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米德尔马斯说，他在私人日记中“对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表现出某种“乐天主义，而对协商解决东欧安全则漠不关心”。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多年以后，曾任张伯伦议会私人秘书并且是其政策支持者的道格拉斯—霍姆勋爵（当时称为邓格拉斯勋爵）也许比任何英国历史学家都更清楚地揭示了绥靖主义的根源：“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像别的许多人一样，张伯伦把共产主义视为主要的长期威胁。他憎恶希特勒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但他觉得，欧洲普遍面临来自共产主义的更大威胁，尤其是英国。希特勒是一个坏人，但在短期之内人们应当——而且可能——与他打交道，然后可以控制他。”至于张

伯伦对苏联的不信任感，读者将会想起他怀疑这些“极端分子最想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厮杀两败俱伤，而他们则袖手旁观坐收渔利”。他的传记作者基思·费林指出，他怀疑“[苏联]动机的纯洁性”，“西班牙加深了这种怀疑”，苏联不会因为看到西方大国与德国卷入一场致命的战争而哭泣。张伯伦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写给一个妹妹的信中说，俄国人“狡猾地躲在幕后费尽心机想使我们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在另一封家信中，他写道：“我必须承认对苏联具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我怀疑它的动机，在我看来，它的动机与我们的自由思想几乎没有关系，它只关心别人听到它说什么没有。”

在评价从一九三三年阿道夫·希特勒政权上台到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时期的英国外交政策时，必须了解存在于政治精英当中的对苏联的怀疑和担忧，这种怀疑和担忧因西班牙的革命形势而加剧。如果我们像许多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回忆录和传记那样忽视甚至低估这种怀疑和担忧，那么，英国对德国的重新武装及其在中欧和东欧谋求霸权的默许就会变得难以理解，执行英国外交政策的政治家似乎也变成了完全不懂欧洲事务的天真幼稚、容易上当受骗的蠢货。的确，在英国历史学家A.L.罗斯看来，张伯伦是一个“自负的老笨蛋”，他“使用的全部都是相当愚蠢的商人的方法”。

几乎同样误导读者的是伯肯黑德伯爵的判断：“张伯伦对世界的认知浅薄粗略，他的政治职业素养也不足以使他在[一九三七年担任首相的]六十八岁时理解比较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这是他的不幸，同时也是国家的不幸。”著名国际史教授W.N.梅德利科特否认张伯伦具有这些特征，他写道：“张伯伦先生认真研究外交政策多年，在这些与重整军备、制裁和援助有关的领域，他对内阁的决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此外，这些特征也与温斯顿·丘吉尔——这绝不是一位友好的见证人——所描述的张伯伦的“坚韧的毅力”、“缜密的思维”和“非凡的智慧”不相符。最重要

的是，使人对张伯伦的能力产生误解的那些评价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张伯伦的两名关系最密切的支持者塞缪尔·霍尔爵士和约翰·西蒙爵士是具有丰富欧洲事务经验的前外交大臣。无法相信这三个人——他们与从一九三八年开始担任外交大臣的哈利法克斯勋爵一起组成了“内阁决策委员会”，该委员会把整个内阁排除在关于外交政策的“重大决定”之外——没有制订保护英国利益的战略并且不清楚他们容忍德国在东欧达到目的最终将导致什么后果。同样无法相信的是，英法两国所有支持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的政界人士都是天真幼稚的人，一点也不知道在德国成为东欧的统治力量并且与苏联确定了共同边界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人们从公开发表的声明中，从迄今为止所公布的曾经是机密或者绝密的官方文件中，从外交官、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的日记和自传中艰难地搜集各种各样的零星证据，在像本书作者在本章以及其他章节所做的那样把它们组合成为某种容易理解、符合逻辑的形式之后，所有证据均毫无疑问地证明，英法两国的强势集团希望利用德国作为一支抗衡苏联的力量，通过支持德国在东欧谋求霸权以抵御共产主义的威胁，从而使西方免受战争与革命的祸害。如此众多的英国历史学家忽视绥靖政策这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原因将在本书后面进行讨论。

于是，英法两国强势集团对于西班牙内战的态度不仅是由他们对革命性变化——尽管有人竭力将这些变化隐藏在“民主共和国”的外表后面，他们仍然对其了如指掌——的敌意所决定，而且是由全方位的国际政治所决定。因此，主要是在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党人敦促之下组成的相继几届西班牙政府所进行的任何掩饰以及游说的努力，甚至约束革命的努力，都不可能改变英法两国对西班牙内战的政策。关于这一点，如何强调也不过分。

然而，尽管偶尔也被种种质疑所困扰，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仍然坚决执行克里姆林

宫的命令，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犹豫不决，即使这些命令意味着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其他左翼党派的反感并将最终损害战争努力和斗争意志。“我们这些‘领导’西班牙共产党的人所充当的更像是苏联的臣民而不是西班牙人民的儿子。”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被开除出党几年后所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这看上去似乎荒谬绝伦不可思议，但是，我们接受的苏联训练把我们异化到这种程度，以致完全不像西班牙人了；我们民族的灵魂出离了我们，被一种具有沙文主义特征的狂热的国际主义所取代，它产生于克里姆林宫的城楼，最后消失在那里。”

不过，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未必知道克里姆林宫向反佛朗哥地区提供援助纯粹出于实用主义目的。通常被称为“农夫”的共产党民兵部队指挥官巴伦廷·冈萨雷斯内战期间风头十足，是个具有几分个人魅力的人物，他写道：“我真诚地相信克里姆林宫向我们提供武器并给我们派来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以及它所控制的国际纵队证明了它与我们的革命团结。……后来我才意识到，克里姆林宫并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利用人民为它自己的利益服务；它以无人能比的背叛和伪善把各国工人阶级当作其政治策略的筹码；它企图以世界革命的名义巩固其反革命的极权主义政权并为统治世界做准备。”

## 第三部分 抑制革命

### 第十八章 无政府主义哲学与政府

从内战刚一爆发起，共产党人就在努力争取获得英法两国的支持并且确保它们继续承认最初的希拉尔政府和后来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是合法政府，对于革命的进程来说，这种努力肯定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果想使这种努力对英法两国产生哪怕是极其微弱的作用，西班牙政府就得修复遭到破坏的国家机器，不是根据革命的方针新

建，而是按照灭亡的共和国的形象复原。此外，如果卡瓦列罗政府还是一个实质性的政府而不是徒有其名的话，它就必须夺回内战初期被革命委员会夺走的对所有国家权力部门的控制权。全体内阁成员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这样做完全不必顾虑对于外国舆论的影响。

但是，在极端革命派不加入政府的情况下，无法完成恢复国家权力的工作，或者说，至少完成起来非常困难。极端革命派指的是强大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它也经常被人们称为自由主义运动，其代表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及其意识形态向导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前者以无政府主义为指导思想，后者的任务是保护前者免受偏离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的影响，同时引导工会组织把自由共产主义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奋斗目标。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作为一个秘密组织成立于一九二七年，由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无政府主义小组组成，它最初的目的是帮助进行反对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军事独裁（1923—1930）的斗争，因为成立于一九一〇年并被普里莫取缔的全全国劳工联合会当时实际上已失去了功能。塞萨尔·M.洛伦索写道：

只是在一九二九年初，当全国劳工联合会部分重组时，[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才开始变得有名了。……它在平均十人左右的独立小组[小组成员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或者居住的所谓“爱好”小组，与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情况一样]的基础上非常松散地组织起来，有一个半岛委员会……作为联络机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真正凝聚力来自其成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妥协态度，他们是权力、等级、政治、国家、法律和妥协的凶猛敌人。这些“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用他们的激进主义、极端表达方式、无休止的批评指责以及不断预言明天就将爆发社会革命征服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予以强调的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实际上只是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个发展迅猛的派别；它不是一股诸如共产党——尽管其渗透的努力没有立即取得成效——之类的企图控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外来势力，而是一种



附带的结果，是全国劳工联合会自身发展的一种产物，由已在工会内部组织起来的激进分子所组成。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真正的活动中心是自由主义运动的摇篮和曾经汹涌澎湃的地方加泰罗尼亚。不久之前，它成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内部的“国中之国”。

“明显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重要成员费德里卡·蒙特塞尼在内战结束多年以后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由最忠诚和最有活力的无政府主义者所创建，正是因为这种活力和忠诚，它把工人阶级吸引了过来。……同时，人们不应忘记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如果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没有使自己被其他政治组织所控制，那正是因为……工会队伍中的那些[无政府主义]同志们的时刻警惕和不懈努力。就这样，在俄国革命之后的那个时期，它防止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大量涌入。”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试图凭借以下事实完成它的指导任务：其成员几乎毫无例外地属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并且担任着诸多重要的职务。属于某个政党的个人不应当在工会组织中担任任何正式职务，这是一个公认的原则。此外，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对全国劳工联合会下属的工会始终进行着严密的监督，在争论失败之后经常威胁要用武力反对偏离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当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并不总是公开承认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这种控制——或者至少是试图控制，实际上，有时它们对此坚决予以否认，但是，内战结束以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其他领导人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不过，确如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对全国劳工联合会施加了极大的影响——“密切注意那些不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异端邪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反过来也对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施加了有力的影响。不过，佩拉特斯关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

盟“实际上”受全国劳工联合会指挥的说法与其他人的说法大相径庭。

尽管内阁在从外国舆论的角度看允许自由主义者加入政府是否明智这一点上存在意见分歧，但是，此举的好处却是毋庸置疑的：这可以使他们为政府的措施分担责任。“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进入现在的内阁肯定将给国家管理部门带来新的活力和威信，”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光明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写道，“因为相当一部分政府目前没有考虑到的工人阶级将会受到它的措施和权力的约束。”但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愿意担任中央政府的部长并且参与国家的重建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尽管不久以前他们违反古老的原则加入了加泰罗尼亚地区自治政府。

坚决反对国家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国家是“人压迫人的权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奴役人民的最有力工具”——同样反对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所有政府，包括在俄国革命初期消灭了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苏联政府。内战爆发两周前，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土地与自由》写道：“苏联政府的整个官方辩证法抹杀不了与俄国的实验有关的一个明显的事实：国家的路线就是反革命路线。我们始终坚持认为事实如此，而且，对俄国最近十九年发展过程的研究为我们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相应地，随着苏维埃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革命在法令、官僚、镇压机器和税收的无情限制之下夭折了。革命是人民的事情，是大众的创造；反革命是国家的事情。它过去一直如此，今后也将永远如此，无论是在俄国、西班牙还是在中国。”

内战结束以后，一位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写道：“苏维埃国家的演变、无政府主义在其统治下的命运以及苏联的工会堕落成为一个纯粹的官僚附庸对于坚定广大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特别是其领导干部疏离政治、反对国家的观点起了重要作

用。”

无政府主义反对所有形式的政府的观点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巴枯宁与卡尔·马克思的论战中得到了强烈的表达。巴枯宁是伟大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他的著作对西班牙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用巴枯宁的话说，马克思提出的“人民政府”只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对大多数劳动群众的统治。“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这个少数将由工人所组成。是的，我想是由以前的工人所组成，只不过他们立即变成了统治者和人民的代表，他们不再是无产阶级，而且将要从他们占据的政治制高点上俯视所有工人群众。他们不再代表人民；他们代表的只是他们自己。……对此表示怀疑的人肯定完全不了解人性。”另外，对西班牙自由主义运动产生过明显影响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埃里科·马拉泰斯塔阐述道：“所有政府主要关心的是确保自己继续掌权，不论组成政府的是什么人。如果他们是恶人坏蛋，那么，他们继续掌权为的是使自己发财致富并且满足他们对于权力的欲望；如果他们是正人君子，那么，他们相信为了人民的利益继续掌权是他们的责任。……只要不是自相矛盾并且否定其所有信条，无政府主义者……绝不可能组成一个政府，即使他们足够强大；而且，万一他们这样做了，这个政府与其他政府将不会有任何区别；甚至可能更加糟糕。”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在革命发生六年前的一九三〇年撰文强调，“从中央集权向无政府主义过渡需要一种新人，一种具有道德优势的新型个人”，造就这种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使命。“只有成功地造就出有资格生活于其中的人，我们才能找到无政府主义的应许之地。同时，如果我们自己迟迟不能从精神上证明，主人和暴君并非必不可少而且我们知道如何像有资格享受自由的自由人那样生活，我们也不可能造就他们。”

推翻君主制和贝伦格尔的独裁统治后，一九三一年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并没有使自由

主义者改变他们的基本信条：“所有政府都是令人憎恶的，消灭它们是我们的任务。”“所有政府毫无例外同样邪恶，同样卑鄙。”“所有政府都是自由的毁灭者。”“在君主制和独裁政府的统治下，工人们忍饥挨饿，严重缺乏各种生活必需品；”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九三三年共和派与社会党人联合时写道，“如今，在共和国的统治下，他们的生活依然如此。昨天，他们最基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今天的情况完全相同。我们无政府主义者说这些并不担心任何工人反驳我们，而且我们说得更多。我们总是说，无论在哪一种政府的统治下，工人均遭受压迫并且不得不痛苦挣扎，以使他们的生存权利以及在长时间筋疲力尽地劳动之后享受生活的权利受到重视。”就像自由主义者把左派的政府和右派的政府混为一谈一样，他们也不区分政治家个人之间的优劣：“在我们看来，所有政客在各个方面都一样——蛊惑人心的竞选宣传，窃取人民的各种权利，对名声的欲望，机会主义态度、批评指责的能力以及一旦执政为自己辩护时的玩世不恭。”

与其他工人组织截然不同的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避免参加议会活动。他们不在中央或者地方政府中任职，不提名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而且，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那场导致右派上台的至关重要的大选中，它们指示自己的成员不要投票。“我们的革命不是在议会而是在街头进行的。”《土地与自由》在大选举行前一个月宣称。“我们对更换政府不感兴趣。”有影响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伊萨克·普恩特当时写道，“我们希望废除它们。……无论哪一方获胜，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他们都将是我们的敌人，都将是关押我们的狱吏和屠杀我们的刽子手；他们都会使用突击卫队的警棍，秘密警察的恐吓，国民卫队的步枪和监狱看守的目光。工人阶级今天只有：阴森的牢房，密探，饥饿，鞭痕和伤口。”在大选举行的前几天，《土地与自由》呼吁：

工人们！不要去投票！投票是对你们的人格的一种否定。别理那些要求你们投票给

他们的人。他们是你们的敌人。他们打算利用你们的信任上台执政。恳求你们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不要去为任何候选人投票。对于我们来说，他们都是一样的；所有政客都是我们的敌人，不管他们是共和派、保王派、共产党还是社会党。奥诺里奥·毛拉就像罗德里戈·索里亚诺和[埃兰·]巴里奥维罗一样无耻。拉尔戈·卡瓦列罗和普列托就像巴尔沃丁及其同伙一样玩世不恭和卑鄙。……我们既不需要一个国家也不需要一个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需要它们。我们关心的只是我们的工作条件，我们不需要议会保护我们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应当去投票。……不要关心左派还是右派在这场闹剧中取胜。他们都是顽固的右派。唯一的左派组织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它是真正的革命组织，而且正因为如此，它才对议会不感兴趣，那是一个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玩弄于股掌之上的肮脏的妓院。撕毁选票！捣毁票箱！砸烂那些监票人和候选人的脑袋！

不过，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大选中，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改变了它们的态度；因为，尽管反对人民阵线的竞选纲领——它们认为这是一份与“正在从西班牙的每一个毛孔散发出来的革命热情”格格不入的“极端保守的文件”，它们仍然决定不再坚决要求它们的成员不去投票。这不仅是因为左派联盟承诺，如果获胜就将大赦数以千计的政治犯，而且因为对于自由主义运动来说，就像对于支持人民阵线联盟的其他党派一样，再次采取一九三三年的不投票政策将意味着重大失败。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所发生的这种变化确保了人民阵线联盟的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信条发生了任何根本改变。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所有政府和所有政客根深蒂固的敌意使人们难以想象他们会加入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内阁，特别是因为，在内战爆发之前的多年时间里，他们与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及其手下的工会竞争对手劳动者总工会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敌对状态。

## 第十九章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加入政府

在内战爆发之前的多年时间里，社会党的劳动者总工会领导人拉尔戈·卡瓦列罗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关系同样被始终不变的敌意打上了印记。在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独裁统治或官方所谓的军事委员会时期（1923—1930），部分是为了保护并且壮大自己的工会组织，部分是希望得到其工会组织被独裁者取缔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地盘，卡瓦列罗作为工人代表任职于国务委员会。杰拉尔德·布雷南在他那部经典著作中写道，最初几年，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数量迅速增加。“凭借其无与伦比的工会以及组织大罢工的声望，它不仅在安达卢西亚草原遏制了所有竞争对手最近的发展势头，而且侵入了社会党人在中北部的势力范围。在那里，它夺取了劳动者总工会最早的据点之一马德里建筑工人工会的半壁江山，它还使许多铁路工人改换门庭并且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希洪港以及萨马和拉费尔格拉的那些大型铸造厂站稳了脚跟。

“对于掌控着整个劳动者总工会的卡瓦列罗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几乎无法摆脱地盘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夺走的恐惧。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感到了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绝对重要性。于是他发现，独裁统治为在这方面取得某种进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劳动者总工会也许可以完全吞并全国劳工联合会。这个意图并未实现。”

布雷南继续写道，利用独裁政府的仲裁机构作为依托，劳动者总工会在农村地区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尤其是在埃斯特雷马杜拉、格拉纳达、阿拉贡和新卡斯蒂利亚地区，但是，它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彻底失败而且没有在工业无产者中取得进展。“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更愿意加入保守的自由工会，他们知道，随着独裁政府的垮台，工会将发生分裂。”

劳动者总工会与军事委员会的合作引起了一场拉尔戈·卡瓦列罗所谓“几乎从未经历

过的侮辱诽谤运动”。社会党人竭尽全力与诽谤攻击进行斗争。发表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社会主义者》上的一份正式公告说，“[他们]参加政府的各个部门是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代表大会和决策机构决定的。这既不包含也不涉及政治合作或者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议。”另外，在一九二四年十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一致认为他的行为“完全正确”而且“问心无愧”，因为他“限定自己”只能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这份声明提到了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国务委员会中担任的职务。

尽管劳动者总工会没有明显地侵蚀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队伍，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军事委员会从它所得到的社会党工会组织的支持中受益匪浅。在保安总局局长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写给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继任者达马索·贝伦格尔将军的一份报告中，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出来；“社会党人过去六年的所作所为是对政府的公开支持。社会党工人之所以不顾劳工危机抵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那些诱人的呼吁和建议，社会党领导人之所以拒绝参加别人极力劝说他们参加的政治煽动和反抗活动，劳工立法和仲裁机构是主要原因，尤其是后者。”这份报告最后说，保安总局认为，社会党人积极干预社会政治问题“目前对于公共秩序并无危险”，反而成为维护秩序的一种“保证”。

当拉尔戈·卡瓦列罗真的以为劳动者总工会有可能吞并全国劳工联合会时，全国劳工联合会同样曾经真的打算完全控制整个工会运动。一九一九年举行的一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案，限西班牙工人在三个月内加入全国劳工联合会，逾期没有加入者将被斥为工贼。但是，这种吞并与之竞争的工会运动的尝试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几年后，当拉尔戈·卡瓦列罗任职于普里莫的国务委员会并且利用仲裁机构增强劳动

者总工会的实力时，他成为全国劳工联合会无情攻击的目标。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随着一九三一年共和国的建立而有所改善，因为，当时担任劳工部长的卡瓦列罗再次利用他的权力，通过损害竞争对手的方式扩大劳动者总工会的影响，而且还因他为国家干预劳动纠纷所做的辩护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发生了冲突。布雷南写道：

劳工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提出一系列法案规定了工人阶级在与资本家打交道时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提出的法案，该法案规定了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所有合同为了生效必须满足的一些条件。设立了一个特别法庭裁定涉嫌违规的行为。另外一项《混合陪审团法》设立了一些强制解决劳动纠纷的法庭。……还有一项法案要求每次罢工必须提前八天发出通知。这些法案除了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雇主直接进行谈判的原则背道而驰并且违背突然举行罢工的惯例之外，它们显然意味着国家在工业方面的权力大大增强。大批政府官员——主要是社会党人——出庭推动这些法律的实施，而且只要有可能，就会尽力利用它们在损害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情况下扩大劳动者总工会的影响。这当然是制定它们的那些人的目的。事实上，劳动者总工会迅速成为国家本身的一个机构并且利用刚刚得到的权力削弱它的竞争对手。假如一个纯粹的社会党政府上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可能对自己的命运抱任何幻想。

与劳动者总工会不同，全国劳工联合会抵制共和国的劳动法庭或者混合陪审团，不仅因为它们在劳资间的纠纷中强化了国家的权力，而且因为它们的目的是“为‘阶级调和’阉割西班牙无产阶级”——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位著名成员就是这样认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希望的不是阶级调和而是劳资双方无法缓和的持续斗争，它的方法是直接行动：激烈地罢工、破坏和抵制。直接行动不仅是工人改善生活水平的一种方法；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激励并且保持为起义之日做准备的反叛精神的鼓动手段。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其成员的国际工人协会



(AIT) 宣称：“直接行动以总罢工达到其最高境界，这应当是社会革命的一种前奏。”在军事叛乱之前那几年，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经常起义而著称，他们是西班牙标准的造反势力。无论这些总是局限于少数地区的起义是否因为缺乏其他地方的支持而失败，重要的是，它们唤醒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倾向。今天他们可能失败，但是明天他们将获胜。“假如昨天十个村庄揭竿而起，”伊萨克·普恩特写道，“明天肯定有一千个村庄举起义旗，即使我们必须坐满一百条‘布宜诺斯艾利斯’号那种[押解]船只的底舱。起义受挫并不总是意味着失败。未来并非永远属于胜利者。我们绝没有山穷水尽。”

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三年的左转并没有使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之间的尖锐分歧在任何方面有所缓和，因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继续对他怀有丝毫不减的敌意。他在内战爆发前几个月所提出的通过社会党以及全国劳工联合会劳动者总工会的联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也没有减轻这种敌意；因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他是一个“跃跃欲试的独裁者”，希望“社会党在工人阶级的起义胜利后取得绝对的支配权”，并且以联合为幌子，掩盖其在劳动者总工会占优势的地方吞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曾为联合进行过实质性的磋商，劳动者总工会的领导层还在发动武装起义前夕对开展罢工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这使得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敌意进一步加剧，后者正在一些地方把劳动者总工会的人马吸引到它那一边去。“工人群众不顾一切，”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写道，“因此他们准备追随最激进的领导人。”“在马德里，”《太阳报》报道说：“我们正在目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惊人壮举……宣布举行总罢工，不断组织局部罢工，还有其令人振奋的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这使政府陷入绝望。”

接着，内战和革命爆发了，这在两大工会组织之间制造了新的摩擦点。

然而，当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初组阁时，就像他的喉舌《光明报》不久之后指出的那样，不顾双方的这种不和，不顾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传统的反政府立场以及对他个人的不信任，他试图使他们相信，他们“将会感到自己有义务接受政府措施和权力的约束”。但是，尽管需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分担政府的责任以防他们对政府的法令说三道四，卡瓦列罗并未对他们势必公然违背自己的原则给予足够的回报，只向他们提供了一个部长职位。马德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喉舌《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在几周之后评论道，政府提出的条件“既不慷慨也不诱人”，而且“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国内的实力和影响毫不相称”。

的确，虽然在马德里省规模不如劳动者总工会，但是，在左派控制区的大部分省份，例如阿尔瓦塞特、瓜达拉哈拉、哈恩和托莱多（这里提到的只是两大工会的追随者人数大致相同的几个省），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实力丝毫不逊于劳动者总工会，而且，除了在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等地区实力比劳动者总工会更强大之外，在整个左派控制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人数很可能超过其社会党竞争对手。

不过，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接受了拉尔戈·卡瓦列罗提出的条件，但还须经过地方联合会批准。全国地方联合会会议于九月三日召开，然而，代表们拒绝了这个条件。两天后，当卡瓦列罗已经完成组阁时，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发表文章宣称：“许多人可能感到奇怪，全国劳工联合会这一支在前线和后方准备为人民的胜利而斗争的主要力量怎么……没有参加本届政府。毫无疑问，如果全国劳工联合会被政治观念所驱使，它在本届政府中的职位至少应当与劳动者总工会和社会党人一样多。”也就是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要求与社会党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派和普列托派——前者因控制着工会的执行机构而代表劳动者总工会，后者因控制着党的执行机构而代表社会党——同样数量的政府职位。“不过，”文章继续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再次确认它毫不动摇地坚持反权力主义的要求和信念：社会

的自由主义变革只有在消灭国家并由工人阶级掌控经济之后才能发生。”

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会议的代表拒绝了拉尔戈·卡瓦列罗提供的一个政府职位，一些代表甚至根本反对与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合作，但是，在“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之后，他们通过了一项折中方案，原则上同意加入政府并且为政府和国家的重建提供帮助。

根据这项方案，政府各部应当设立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劳动者总工会和人民阵线联盟的各两名代表以及一名政府代表组成的“辅助委员会”。这项方案将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免遭直接加入内阁的尴尬，但仍使它在政府的各个部门拥有发言权。据洛伦索说，它被卡瓦列罗拒绝几乎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些委员会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权力机构”，而政府部长将被贬为两大工会组织意志的“纯粹执行者”。

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为了参加政府，[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竟然企图强制推行某种以特设政府机构为基础的国家体制，这种体制事实上将使政府、共和国总统和议会名存实亡，也就是说，使共和政体不复存在。他们想让总理[即拉尔戈·卡瓦列罗]成为这个无政府工团主义国家的总统。他答复说，他接受权力为的是尽一切可能赢得战争从而拯救共和国，并不是为了背叛它。”他的态度无疑使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领导人确信，他们的希望落了空。

尽管自由主义运动不可能在不违反正统信条的情况下加入内阁，但是，它的一些领导人并不愿意让政府事务完全被竞争对手所控制。最坚决地主张加入政府的人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奥拉蒂奥·M·普列托，这位讲求实际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九月三日的方案“不切实际”并且感到“时间正在无情地流逝”，他要求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公开并且问心无愧地担任若干部长职务”。“鉴于我们在内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在多年以后评论说，全国劳工联合会“不应当拒绝[加入政

府]……，但是，对违反运动意识形态原则的担忧、对其思想和宗旨的尊重以及害怕承担这种责任抑制了主观能动性，结果，优柔寡断占了上风”。

由于这种优柔寡断，由于担心触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禁忌，但又觉得不能任由中央政府完全被竞争对手所控制，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的代表试图采取一种新的方法。他们在九月十五日举行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决定，政府应当被一个由五名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五名劳动者总工会的成员以及四名各共和派政党的成员组成的国防委员会所取代。当然，尽管这个名称对于自由主义运动来说不那么令人反感，但是，国防委员会实际上仍将是一个政府，只不过名义上不是而已。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肯定希望加入政府，一名自由主义者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但是，他们要求政府更名为国防委员会。这种名称的改变纯粹是为了使他们加入政府的强烈欲望与他们的反政府信条协调一致。多幼稚呀！一个纠正了自己的偏见并且始终只是藐视表象的运动试图以某个名称的改变掩饰其对基本原则的放弃。……这种行为幼稚得像一个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可悲女人，要求人们把她称为交际花而不是妓女。”

正如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奥拉蒂奥·M·普列托的儿子塞萨尔·M·洛伦索所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已经加入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而且非常希望加入巴斯克自治政府。那么，为什么要把地方政府与国家政府区别对待呢？……像部长一样，市政府的官员、法官或者警察也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在一个村庄行使权力像在一个国家行使权力一样违背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可以非常民主的进行治理，反之，一个地区也能以暴政来统治。”

后来批评西班牙自由主义者加入政府的外国无政府主义者最初赞成国防委员会的主意。赫尔穆特·吕迪格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其会员的国际工人协会驻西班牙代表和两

份在巴塞罗那出版的德文报纸《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国际工人协会信息》与《社会革命报》的负责人，他写道：“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所有持不同意见的[外国]同志全都赞成由一个国防委员会领导反法西斯运动的方案。……让我们坦率地说吧，这同样是一个行使权力的方案，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名称让其他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同志更容易接受一点。”

为了避免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因外国温和派人士可能的反应抵制拟议中的国防委员会，参加九月十五日举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的代表们提议，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继续担任共和国总统。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主要报纸《工人团结报》宣称：“我们在国外的地位不能由于我们提出的新体制而有所下降；因为我们必须牢记，应当保留具有小资产阶级政权特征的象征性人物，以免外国资本家产生恐慌。”

不过，全国劳工联合会谋求成立国防委员会的运动没有得到政府中任何党派的支持，另外，在九月二十八日举行的另一次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奥拉蒂奥·普列托抨击这个方案浪费时间，因为它难以被各个政党所接受，而且在他看来，“考虑到外国列强以及内战的国际因素”，它“显然完全不切实际”。他反复强调他赞成加入政府的理由“非常单纯”，强烈要求代表们抛弃诸多顾虑、诸多道德和政治偏见、诸多脱离实际的想法、诸多夸夸其谈，因为，“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每一天的流逝都使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处境更加恶化”。

尽管受到普列托的言论的震动，代表们仍然死抱着他们提出的方案不放。几周来，全国劳工联合会持续开展了一场支持成立国防委员会的运动，但是，它的努力徒劳无功。拉尔戈·卡瓦列罗毫不动摇地坚决反对。他的态度在下面的一段话里表现出

来，与共产党和共和派的完全相同。这一段话摘自其喉舌《光明报》所发表的一篇社论：“现在对国家机关进行一场激进的改革将会导致政府失去连续性，这对我们是毁灭性的。此外，我们正在日内瓦[国际联盟]进行一场斗争，如果斗争获胜的话，可能对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鉴于我们[将]获取赢得战争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这一事实，天平将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倾斜。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断然要求突破宪法的约束将会引起什么反应？我们担心，这只能使形势发生我们的敌人所希望的变化。”一个月后，《光明报》的另一篇社论写道：“与关注内战的纯军事需要同样重要的是，使政府机构具有一种不会在国外引起任何怀疑的形式，这甚至可能更重要。”一九三六年九月底成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的马里亚诺·卡多纳·罗塞利是该委员会与总理进行谈判的人员之一，他确认，这些社论反映了拉尔戈·卡瓦列罗本人的看法。

“喂，如果我们打算接受你们的建议，”据称拉尔戈·卡瓦列罗对一群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说，“我们实际上是在把自己置于与布尔戈斯军人集团[叛军政府]同等的地位。我们将失去我们手中的王牌：人民在多次大选中从法律上表示认可的合法存在的共和国政府。抛开你们神父般的顾虑，委派你们的代表加入政府，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将竭尽全力帮助集体农庄并且尽量对武器进行公平分配，以使共产党人——他们是你们的主要担忧——无法用苏联援助作为胁迫手段控制一切。”

面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坚决态度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抵制，奥拉蒂奥·普列托决定“消除”全国劳工联合会内部“最后残留的反对意见”，于是，他在十月十八日召开了一次地方联合会的全体会议。这一次，他的观点占了上风。全体会议授予他全权，“以他自己的方式”为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进行谈判。“我相信合作势在必行，”他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因此，我控制住自己的思想顾虑和良心不安。”

为了解释自由主义运动的新方针，《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写道：“我们正在考虑的是，政府的组成可能与国际形势有关，……由于这个原因，全国劳工联合会准备在不违反其反权力主义精神的情况下做出最大的让步：加入政府。这并不意味着它放弃了在未来充分实现其理想这一目标；这仅仅意味着……为了赢得内战从而拯救我国人民和这个世界，它准备与任何人在一个领导机构里合作，无论这个机构叫作委员会还是政府。”在与卡瓦列罗的谈判中，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要求得到五个部长职位，其中包括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但是，卡瓦列罗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最终，在十一月三日，他们接受了四个部长职位：司法部长，工业部长，商业部长和卫生部长。不过，没有一个要害部门；此外，工业部长和商业部长以前是由一个人担任的。

改组后的政府成员如下：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	社会党	总理兼国防部长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社会党	外交部长
安赫尔·加拉尔萨	社会党	内政部长
安纳斯塔西奥·德·格拉西亚	社会党	劳工部长
胡安·内格林	社会党	财政部长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	社会党	海军和空军部长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	共产党	教育和艺术部长
比森特·乌里韦	共产党	农业部长
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	全国劳工联合会	司法部长
胡安·洛佩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	商业部长
费德丽卡·蒙特塞尼	全国劳工联合会	卫生和公共救济部长
胡安·佩罗	全国劳工联合会	工业部长
卡洛斯·埃斯普拉	左翼共和派	宣传部长
何塞·希拉尔	左翼共和派	不管部长
胡利奥·胡斯特	左翼共和派	公共工程部长
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	共和联盟	通讯部长
海梅·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不管部长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	巴斯克民族独立党	不管部长 <sup>49</sup>

图注：

49. 新的任命和职位变化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对于跨越部长责任这道陌生的门槛，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几位代表并非没有思想准



备。实际上，据一位自由主义作家说，他们知道，他们在掌管自己的部门时不能影响革命。当然，拉尔戈·卡瓦列罗决定向全国劳工联合会提供四个而不是一个部长职位，既非出于同情，也不是慷慨大方。有证据表明，希望自己的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威是驱使他这样做的部分动机，当时，由于相信佛朗哥的军队随时可能占领首都，他正计划把政府转移到巴伦西亚。“离开首都的时候到了。”他后来写道，“敌人集中了大量兵力，随时可能在夜间发动突然袭击，攻进首都。”另外，不管是否有根据，他还担心，如果政府在接纳自由主义运动的代表之前离开首都，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可能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在马德里形势危急的情况下，”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如果不让无政府主义者分担政府的责任的话，他们很可能抓住政府向巴伦西亚转移所提供的机会尝试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地方政府。这只能在整个共和派控制区制造混乱和灾难。”

无论是否有必要，似乎没有就这种担心与阿萨尼亚总统进行过讨论。两周之前乘飞机离开马德里后，目前他与警卫一起被安置在巴塞罗那，那里靠近法国边境，交通便利。仍然享有总统权力——归根到底，这不是因为他是宪法所体现的法制的产物，而是因为他作为革命的宪法装饰所产生的微妙作用——的阿萨尼亚最初拒绝批准任命自由主义者担任政府部长的法令。拉尔戈·卡瓦列罗写道，总统没有认识到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变化将对未来产生的作用。“它已经从恐怖主义和直接行动转变成合作和分担权力的责任。……这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世界大事，不会不起任何作用。我对他说，如果他不签署这些法令我就辞职。他签署了它们，尽管持有异议。”

据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记述，对于被提名担任部长职务的四名无政府工团主义候选人，阿萨尼亚坚决反对任命其中的两位，他们是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和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均为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在其他情况下，通常的做法是服

从总统的意志或者给他时间改变想法。但是，在马德里当时所处的那个暗淡时期，任何犹豫不决都可能是灾难性的。未来的部长——特别是其中来自巴塞罗那的两位——已经开始怀疑上层并未想好他们加入政府这件事，他们正在谈论返回巴塞罗那并且断绝全国劳工联合会与政府的交往。我不得不两次离开总理的书房去安抚他们。共和国总统与总理之间进行的一次不乏某种戏剧性的电话交谈结束了让人为难的局面。尽管听不见阿萨尼亚先生的声音，我们在场的其他人几乎能够感觉到他的愤怒穿过电话线扑面而来。但是，没过一会儿，拉尔戈·卡瓦列罗就得到了授权，发布经总统正式批准的官方公报，宣布对四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的任命。”

过了大约六个月，在意身后的阿萨尼亚在回忆录中写道：“不仅不顾我的意见，而且不顾我最愤怒的抗议，他们强迫我接受了十一月进行的内阁改组，这次改组把全国劳工联合会和无政府主义者网罗进政府——共和派认为这不可避免而且有用。”

关于这一事件，当时的巴塞罗那市市长、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和阿萨尼亚的密友卡洛斯·皮·苏涅尔在回忆录中有所记述，他说，一天晚上总统打电话来说想跟他说话。“我立即赶了过去。我发现他心烦意乱，萎靡不振。就连他那过人的智力也显得迟钝，忽隐忽现。他对我说，他想逃走，离开西班牙，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发生了什么事情？拉尔戈·卡瓦列罗打电话告诉总统，他准备组成一个包括四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的政府。阿萨尼亚表示反对，可是，不顾他的反对，任命他们的法令已经以他的名义在官方公报上发表了。不过，他确实不愿意批准这些任命。……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最后，当我很晚离开时，他似乎已经决定对自己剩余的政坛生涯听之任之，命运把他与这种生涯绑在了一起。”

全国劳工联合会几位政府部长的名字在十一月五日的《马德里官方公报》上公布后，拉尔戈·卡瓦列罗立即提出将政府驻地迁移到巴伦西亚这个问题。担任海军和空

军部长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据其一名支持者说，他像拉尔戈·卡瓦列罗一样相信敌人将在三到六天之内占领马德里——证实：“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召集部长开会，提出政府应当撤离马德里……刻不容缓。几周之前我曾提出政府应当撤离的建议，不过是在公开宣布的情况下撤离。……我不希望在最后时刻突然转移，那会给人一种逃跑的印象。我认为，明智的做法是，让马德里人民在心理上有所准备，以使他们觉得这一措施情有可原，即使我们没有预先通知他们，他们也会祝我们一路平安而不会骂我们是逃兵。但是，总理对我的建议置之不理。

随后对卡瓦列罗的建议进行的讨论非常具有戏剧性。刚刚加入政府的四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认为，他们是一个骗局的受害者。他们相信，让他们担任部长只是为了使他们承担做出这个重大决定的责任，因此，他们不同意这个决定。”

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几位部长最初坚持……即使全部被敌军俘虏，任何部长也不应离开。他们说：‘如果政府保全了自己却牺牲了其余民众，那既不公平也失信于民。’……他们暗示，试图离开是徒劳的，因为人民将阻止他们。这被认为是一种含蓄的威胁。”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继续写道：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几位部长]提议，除了他们四位部长留在马德里之外，我们可以全部离开。我参加了讨论，强烈反对这个方案。“不是我们全部离开，就是一个也不离开。”我表示，“如果一些人被打上懦夫的印记而另一些人却被当作英雄称颂，那是不能接受的。或者我们全是懦夫，或者我们全是英雄。……”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几位部长要求允许他们私下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然后离开了会议

室。……耽搁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他们回到会议室表示，他们同意这个建议。拉尔戈·卡瓦列罗宣布，新的政府驻地将是巴伦西亚而不是预料中的共和国总统已经迁往的巴塞罗那。他要求大家保守秘密并且声明，任何人只要愿意就可以离开。我可以派两架客机在黎明起飞，它们能把愿意乘飞机离开的部长全部带走。当时没有人接受我的邀请。一些人认为等待的时间太长了。

[十一月六日]内阁会议刚一结束，拉尔戈·卡瓦列罗就乘车上路驶过了坐落在直通巴伦西亚的公路交叉口上的塔兰孔市。塔兰孔被罗萨尔纵队把守着，它由在军事叛乱爆发后从巴伦西亚的圣米格尔·德洛斯雷耶斯监狱释放出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犯人组成。当政府就撤离达成一致意见的消息传来时，罗萨尔上校决定不让任何人继续前往[巴伦西亚]。外交部长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受到粗暴的对待。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部长胡安·佩罗和胡安·洛佩斯被赶了回来。午夜时分他们出现在我家里，我带他们与我一起乘飞机离开。

同样半道而回的还有矮胖的马德里市长佩德罗·里科。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写道，里科回到马德里后并没有再去市政厅，而是立即躲进了墨西哥大使馆。“除了他以外，那里的避难者都是右派，待在大使馆让佩德罗·里科心神不安。他不能返回市政厅，在那里，他试图逃跑的行为已经受到人们的谴责。因为害怕报复，他不敢在家里睡觉，更不必说上街了。……再次面对塔兰孔民兵的可能让他心惊肉跳。我建议，他应当藏在汽车的行李箱里离开，就像一九三四年我和几个社会党人所做的那样，当时我们[逃]到了法国。……需要上帝帮助才能把他塞进行李箱，他肥胖臃肿，体积超过了行李箱的容量，他的笨拙也使把他塞进行李箱变得非常困难。这给那些佛朗哥的支持者提供了乐趣，他们在墨西哥大使馆的院子里目睹了这一场面。”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对政府偷偷逃离马德里的描述基本上得到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民兵

部队指挥官西普里亚诺·梅拉的充分证实。梅拉后来成为第十四师师长和第四军军长，当时他赶到塔兰孔抗议政府的逃跑行为。他在那里发现，部长、副部长和其他政府官员以及民兵组织的高层领导人都被罗萨尔纵队扣押起来。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奥拉蒂奥·M·普列托很快就赶到了，他与全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在前往巴伦西亚途中。他以全国委员会必须紧跟政府“以便充分了解事态发展从而确定相应的政策”为由为其离开马德里进行了辩解；梅拉反驳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不应当放弃马德里，尤其是在所有人都逃走时。“它在马德里的存在可能对人民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并且可能促使形势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政府的离开……是一种可耻的逃跑行为，因为就在不到八小时前它还告诉马德里人民，它将接受它的命运。”

但是，离开马德里的决定已经做出，因此，梅拉只好返回马德里，他没有与这位全国委员会书记握手，“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不配在我们这样一个革命组织中担任他所担任的重要职务”。梅拉宣称，他将组织一千人去保卫首都——“这些人要表明的是，当他们逃跑时，我们将捍卫他们抛弃的那些东西。”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政府部长离开马德里的决定立即在自由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反响。塞萨尔·M·洛伦索写道，当这些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前往马德里上任时，他们向他父亲奥拉蒂奥·M·普列托请示作为政府部长应当如何行事。普列托回答说，他们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知道怎样为全国劳工联合会谋利益。他对他们说，一名自由主义者，即使是全国委员会的书记，也不应当对其他自由主义者发号施令或者使他们受到任何特殊纪律的约束。全国劳工联合会不是共产党。他们应当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洛伦索接着写道，普列托给他们的行动自由很快就被用来对付他，因为在讨论政府转移到巴伦西亚的问题时，这些部长没有与全国委员会交换意见就同意了。“奥拉蒂奥·普列托不能……要求四名部长辞职……从而引发一场政府危机。政府

迁往巴伦西亚——这导致全国委员会的离开——激起了全国劳工联合会激进分子的愤怒。他们认为奥拉蒂奥·普列托应当负责，指责他怯懦并且说他是一个‘清债人’。”结果，十一月十八日，在全国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奥拉蒂奥·普列托作为全国委员会书记提交了其“不会收回的辞呈”，然后，他被强大的加泰罗尼亚地方联合会书记马里亚诺·R·巴斯克斯所取代。

但是，比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部长离开马德里和奥拉蒂奥·普列托辞职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运动领导人加入中央政府的决定对该运动所造成的剧烈震荡。这一决定不仅意味着对无政府主义基本信条的全面否定，彻底动摇了自由主义理论的整个结构，而且违反了民主原则，它是在没有征求该运动普通成员意见的情况下做出的。

从内阁改组的那一天起，为了打消正统无政府主义者的顾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主要报纸《工人团结报》试图通过尽量缩小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证明这一决定的正确性。

“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中央政府是我国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出于原则和信念，全国劳工联合会是反中央集权论者，是一切形式的政府的敌人。

“但是，形势……改变了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国家的性质。

“现在，作为管理国家机关的手段，政府已经不再是一支镇压工人阶级的力量，就像国家已经不再代表一个把社会划分成阶级的主体一样。如今，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已经介入，两者更不可能压迫人民。”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随着自由主义运动内部“合作派”与“拒绝派”之间的矛盾趋于恶化，一些支持与政府合作的人坚持认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内阁并不表示放弃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策略；而另一些支持者则坦率地承认这违反了教条但却认为

这是被现实所迫。“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哲学思想在理论上出类拔萃，令人惊叹，”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曼努埃尔·马斯卡雷尔写道，“但是，当面对像我们这样一场战争的悲惨现实时，它们是不切实际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行为应当由我们的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所驱使并且与之相符合，但是，当环境、当特定的形势要求改变策略时，无政府主义者不应当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框框里，在理论上坚持正常时期的行动方针，因为，丝毫不偏离无政府主义教条和宣言所确定的那些东西，顽固地墨守成规、遵循一条一成不变的路线是人们为了证明无所作为或四平八稳的正确性所能采取的最轻松的立场。”

关于反对与政府合作的一方，一位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写道：“我相信……许多反对合作的激进分子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他们虔诚地发出愤怒的呼喊，但是允许别人做出自己的选择。”

无论在自由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什么反应，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加入政府并非没有经过一番与良心和原则的内心搏斗。他们不是全都承认这种矛盾的心情，但是，担任卫生部长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成员费德丽卡·蒙特塞尼的坦白准确无误地表明了困扰着自由主义运动大部分成员的怀疑和担忧。据她自己生动地描述，她从母亲的乳房中吮吸的就是无政府主义乳汁。在其离开内阁以后举行的一次全国劳工联合会会议上，蒙特塞尼说：

作为资深无政府主义者的女儿，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后代，当我谈论整个无政府主义运动时，我可能说那是一种成就、一种经历、一种不断捍卫从我父母那里继承的思想的斗争生活，我认为，我加入政府、接受全国劳工联合会委派我担任的职务，其意义绝不只是任命一名部长那么简单。其他政党、其他组织、其他团体不可能意识到由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而造成的自由主义运动当时和现在的内部斗争及

其成员的内心挣扎。他们不可能意识到，但人民可能意识到，如果人民意识不到，那就应当告诉他们。他们应当被告知，对于曾经持续与国家进行斗争、曾经总是断言通过国家将一事无成、总是断言“政府”和“权力”这些词汇意味着对人类和民族自由的一切可能予以否定的我们来说，作为一个组织同时也作为个人加入政府意味着，不是一场根本意义上的历史冒险，就是在理论和策略方面对整个运动、整个过去的一次修正。

我们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只知道我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当我被全国劳工联合会指派为它在政府的代表时，我正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从七月十九日到十一月，我问心无愧地经历了整个这一段史诗般的时期。……

为了接受这个职务，我要独自克服多少郁闷、怀疑和痛苦啊！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可能就是他们的目的，这可能满足了他们的强烈欲望。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离开了我视为生活的那种工作，意味着与联系着父母理想的整个过去断绝了关系。这意味着一种巨大的努力，要流多少眼泪才能做出的一种努力。但是，我接受了这个职务。我战胜自我接受了它。我接受了它，我准备为了那些我认为与过去的我毫无关系的事情弄清自己眼前的责任，条件是，我将永远保持忠诚、正直和诚实，永远忠实于父母和我毕生的理想。我就这样加入了政府。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书记塞韦里诺·坎波斯参加了做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这一决定的那次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会议，他在内战结束之后寄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费德丽卡·蒙特塞尼起初坚决反对指定她为四名部长之一，但最终迫于压力同意了。他说，被指定的另几个人没有参加那次会议。蒙特塞尼在内战结束之后写信告诉我，被委派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的四个人是全国委员会书记奥拉蒂奥·普列托选定的。她指出，胡



安·佩罗和胡安·洛佩斯代表工会中的右派，她和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代表左派。她说：“[奥拉蒂奥·普列托]希望我能控制正统派的反对意见。”

在内战结束几年之后所写的一篇文章里，蒙特塞尼肯定地说，她个人对在政府中有所作为的可能性“从来不抱任何幻想”。“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她断言，“尽管当时的政府实际上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府，权力在街头，在斗争者和生产者手中，但是，[政府的]权力将被重新整合并加强，而且更加糟糕的是，这是在与我们串通一气的情况下由我们帮助进行的，因此，这将在道德上毁掉许多我们的同志。”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对其反政府信条的这么一次彻底背离可能只是由某些理由非常充分的动机决定的。关于它们，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些主要成员所提供的下面这些动机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

“我们是为环境所迫加入共和国政府的，”蒙特塞尼本人在成为内阁成员不久之后声称，“目的在于避免重蹈其他国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覆辙：由于缺乏预见性、果断性和敏捷的思维，它们被驱逐出了革命运动，眼看着其他党派控制了革命。”

后来她承认：“当时我们只看到因为我们而造成的现实情况：共产党人加入了政府而我们没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们所有的胜利成果都有付诸东流的危险。”

“我们打算把工人阶级的利益.....完全委托给那些政党吗？”担任商业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胡安·洛佩斯问道，“决不！”

在巴伦西亚出版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纸《社会熔炉报》的负责人曼努埃尔·比利亚尔写道：“出于防止工人和农民的胜利成果受到攻击、.....防止发生宗派斗争、防止军队变成某个政党的工具、防止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出现极权主义倾向并且

排除独裁的危险.....等特殊目的，全国劳工联合会被迫加入了政府。”

担任司法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加西亚·奥利韦尔提出了另外一个原因。他在离开内阁后声称，为了确保“外国资产阶级”提供军事援助，必须“给人造成不是革命委员会而是合法政府控制局面的印象”。

最后，据商业部长胡安·洛佩斯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想通过赋予在内战爆发初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革命委员会以合法地位来控制西班牙的政治生活。

但是，如果不包括与政府合作的主要倡导者奥拉蒂奥·普列托提出来的那些理由，自由主义运动的代表们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的根本原因所作出的多种解释将是不完整的。他的儿子塞萨尔·M·洛伦索写道：

奥拉蒂奥·普列托在多次发言、演讲、讨论和商议中说明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必须加入政府的各种理由。它们可以概括如下：“自由主义者在共和派控制区并不具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精神或者物质力量，更不必说赢得反法西斯战争了。即使最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他们战胜了法西斯分子以及其他反法西斯力量，革命也将受到经济封锁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压制。此外，由于其在政治上的盲目和军事上的无能，共和国政府正在把共和派引向灾难，同时它还全力打击工人积极性及其民兵组织和革命成果。因此，必须在某种先进的民主国家的框架内挽救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统一开展[军事]行动并且化解列强的压力。最后，自由主义者从内战爆发的第一天起由于参加各种地方或者地区的管理机构而事实上具有的意志以及人民大众想要看到建立一个真正的反法西斯联盟的愿望必须通过承担最大的责任来实现。”

## 第二十章 遏制革命委员会

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希望，自由主义运动加入内阁将使其能够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革命成果，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目光转向西方民主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则希望，通过提高政府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普通成员当中的威信，自由主义运动加入内阁将会促进被破坏的国家机器的重建，进而使他们能够在某种民主性质的上层建筑的掩护下，把内战爆发时被革命委员会篡夺的各个部门的国家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此外他们还希望，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将使正规的管理机构更快地取代这些委员会。除了篡夺国家权力之外，这些委员会还接管了市政当局以及其他地方管理机构的日常职能；而从革命的第一天起，正规的管理机构不是被强迫靠边站，就是不再行使职能。

对于曾经在一九三四年左派在阿斯图里亚斯暴动时呼吁用革命的权力机构取代共和国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种政策体现了某种根本的改变。它也与俄国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奉行的政策截然不同；因为后者在革命初期致力于用苏维埃取代旧的政府机构，而在西班牙革命中，共产党人则致力于用正规的管理机构取代革命委员会。“形形色色的专门委员会像瘟疫一样突然流行起来，它们执行人们完全意想不到的各种职能。”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在内战初期不满地写道，“我们声明，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关心如何保卫民主共和国，由于这个原因，所有机构都应当准确地反映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成员结构并促进实现该政府的目标，我们大家全都承诺支持并且捍卫这些目标。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它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具有我国和国际的特点，我们必须采取与其相适应的措施。”

共产党的意见是，这些委员会——它们大部分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中比较激进的成员控制着，而且在各自的地区它们的权力实际上不受任何约束——应当被正规的管理机构所取代，组成政府的所有党派应当在这些管理机构中拥有代表，它们的权力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的限制。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的意

见相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则恰恰相反，他们坚持认为，这些革命机构应当成为新社会的基石。“这些委员会是人民创建的反对法西斯叛乱的机构。”马德里的主要自由主义报纸《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宣称，“……如果不用这些委员会取代省市各级管理部门以及许多其他资产阶级民主机构，就不可能抵抗法西斯主义。它们是人民为了发动革命而创建的革命委员会。……我们这并不是说西班牙应当被数以百计分散在各地的委员会的工作弄得四分五裂。我们希望以这些从人民中间产生的机构为基础……重建西班牙社会，因此，我们应当达成一致，希望它们发挥作用。我们保护它们的主要目的为的是防止在七月十九日被非常可悲地摧毁的那些资产阶级机构和准则死灰复燃。”

但是在内阁中，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政府部长受到对手的步步紧逼，后者以安抚外国舆论进而增加政府从西方国家得到武器的可能性为由，不断施加压力要求终止委员会的权力。四名无政府工团主义内阁成员之一的费德里卡·蒙特塞尼写道：“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的论点始终一致：必须使西班牙共和国具有一种合法的外表，以消除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担忧。因此，国家恢复了它曾经丧失的地位，而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我们革命者帮助它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把我们拉进政府的原因。虽然我们并不愿意加入政府，我们还是加入了，因此，除了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被人束缚住手脚之外，我们别无选择。但我可以明确声明，尽管最终我们失败了，我们仍然寸土必争地捍卫了我们的利益，而且从来没有在不经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其中有一名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常任代表——事先授权的情况下支持过任何破坏革命成果的事情。”

一九三七年二月，担任工业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胡安·佩罗承认自己担心英法两国不会根本改变它们在向西班牙政府提供武器问题上的立场，但他认为，“在我们打仗而不是闹革命的情况下”，胜利取决于这两个大国。他接着写道，这并不意

味着放弃革命。“前进的路线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打仗，而在打仗的同时，我们应当通过小心谨慎地控制工厂仅限于为革命做准备，因为，这相当于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用切实有效的方式为在内战结束之后给资本主义社会以致命的一击锻炼自己。”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运动左派成员写道：“这是害怕那些‘民主’国家看到我们推进革命将使我们失去它们的‘帮助’，政客们还用这一论点成功地使那些为西班牙的自由发动革命的人踌躇不前。”

结果，得到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默认政府通过了法令，非但没有如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时所希望的那样给予各种委员会以合法地位，反而规定必须解散它们并以正规的省市行政当局取而代之，在这些行政当局中，追随人民阵线的所有党派和工会组织均有代表。另外还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撤除由地方委员会以及政党或者工会组织在公路沿线和村庄入口设立的一切检查站，并由内政部下属的警察部队接管它们的职能。所有这些措施都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数不清的城镇和乡村所取得的支配地位产生了威胁，并且实际上导致他们在某些情况下被排除在村委会之外，自然而然地使敌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主导地位的情绪更加极端。

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内战之前立场革命，而且实际上他所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在许多城镇和乡村的委员会中占据着某种支配地位，但是，如果只是因为对于外国舆论的担心，他在解散这些委员会的问题上与共产党人以及政府的其他成员达成共识是可以理解的。当他在上台之后不久宣称必须放弃革命口号以便赢得民主国家的友谊时，他想必已经意识到，他为确保英法两国的支持所做的努力不能仅限于对共和国宪法的口头拥护，因此，必须解散行使国家职能的革命权力机构。

一位左派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共产党人的压力……和生怕激怒英法两国的担忧使拉

尔戈·卡瓦列罗相信，必须尊重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因此]他最终接受了西班牙共产党的论点：首先让我们赢得战争，然后我们再进行革命。尽管坚守着自己的革命信念，但他认为现在不是夺取政权的适当时机，那应当推迟到战争结束以后。……不过，共产党人、社会党改革派和共和派人士希望走得更远。[他们想要]重新夺回当年七月小资产阶级失去的权力并将革命镇压下去。”

撇开外国舆论的问题不说，拉尔戈·卡瓦列罗及其内阁的大部分成员还有其他具有说服力的遏制革命委员会的动机，主要是因为许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所控制，它们影响政府的权威而且几乎全面干扰政府的工作。“目前，”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舆论工具《光明报》评论道，“这些机构只能对仅属于人民阵线政府独家所有的职能造成妨碍，全国的所有党派和工会组织均以充分负责的态度加入了这个政府。”而共产党的《工人世界报》写道：“关于内战之初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的城镇和乡村建立的诸多机构是否必要可能存在着一些疑问。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它们现在……严重妨碍了政府的工作。”在这一点上对委员会的指责不仅来自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就连担任工业部长的胡安·佩罗也公开承认它们妨碍政府履行职能。在前面提到的那些法令颁布的几周前，他在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次公众集会上说：“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可是地方委员会却把它们的指示塞了进去。当政府试图依法办事时，它们把所有事情搅得乱成了一锅粥。（听众开始低声议论。）不是政府多余，就是委员会多余。（听众高喊‘对！’）这些干预是什么意思？委员会是多余的？（更多人高喊‘对！’‘不对！’‘对！’）……委员会不是多余的，但它们必须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

由于自由主义运动内部在解散委员会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从法令的颁布到它们的落实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结果，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许多地区，甚至在不那么激进的劳动者总工会占优势的一些地区，革命委员会不顾政府的

反对继续存在。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据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说，新的市政当局迟迟无法建立的原因是人民阵线的各个党派试图得到与它们的实力不成比例的代表权。“自从要求组成新的市政当局的法令颁布以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卡斯蒂利亚自由报》在谈到利夫雷城省（原雷阿尔城省）的情况时写道，“尽管时间一点点过去，可是只有三四个地方建立了新的市政当局。并非代表某一个党派的人民阵线想要占据大多数职位。我们希望按比例代表制分配。”

共产党人告诫大家：“那些为像一张大网一样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委员会进行辩护的人们忘记了一个重要问题：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权力分散危害更大。我们知道支持委员会的同志们并不希望西班牙被这些数以百计的委员会的各自为政弄得四分五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共和国的]民主机构现在没有用处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令人费解的是，当我们因为国家的民主体制适合革命的现阶段并且是赢得战争的重要条件而必须捍卫它的时候，有人竟然想把这种体制和机构变成一种纯粹的装饰。”

但是，仅仅劝说并不能保证这些法令贯彻执行。只有通过重建共和国的治安力量，政府才能强制推行它的意愿，从而把被革命委员会篡夺的各个部门的国家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正如我们马上就将看到的那样，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内阁早已意识到这一点。

## 第二十一章 治安力量

本书前面讲述了共和国的治安力量在军事叛乱和社会革命的冲击下土崩瓦解的情况。因为大批人员投靠叛军，并且因为左派组织临时拼凑的治安委员会和民兵小分

队接管了警察的职能，国民卫队、突击卫队和秘密警察解体了。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说，这些治安力量“或优或劣，或胜任或无能，有一些绝对忠诚，另一些则被卑鄙的欲望和邪恶的本能所驱使，在后方履行着某种职能……，[而且]有时是城镇和乡村可以用来对付法西斯分子的唯一力量”。“主要由于民兵机智巧妙的工作，”左翼共和派的喉舌《政治报》写道，“在后方消灭了法西斯主义。”

仅凭少量供其调遣的共和国警察残余部队，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组成的何塞·希拉尔自由派政府面对工人组织的革命恐怖活动无能为力，工人纠察队和巡逻队进行搜索、逮捕并且草率地将人处决。据社会党人阿图罗·巴雷亚说，在马德里，工会和政党的每个分支和派系都建立了“各自的警察、监狱、行刑队及专用刑场”。

无论是希拉尔内阁还是任何其他政府，只有重建并且增强其控制下的治安力量才能成功地制止这种恐怖活动进而确立自己在西方社会心目中的威信。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尽管他们在最终由谁控制重新组建的警察部队的问题上各有主张。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希拉尔内阁采取了重建正规治安力量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它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清理并且重建国民卫队，今后它将被称为共和国国家卫队。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治下，为这支部队招募了数千名新兵；突击卫队的情况一样，据担任内政部长的社会党左派安赫尔·加拉尔萨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突击卫队增加到两万八千人。同样重要的是由隶属于财政部的海关和税务官员及警卫组成的边防警察部队（carabineros）的发展壮大，像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一样，它在军事叛乱和革命的打击下土崩瓦解。尽管希拉尔政府打算重建这支队伍然后将其当作一支针对革命左派维持公共秩序的力量来使用，但是，它的重建和扩大



并没有为此认真进行，直到一九三六年九月胡安·内格林博士——当时他被认为是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门生和支持者——掌管财政部以后，开始将它变成一支完全被社会党温和派控制的精锐部队。虽然战前边防警察部队在全国总共只有一万五千人左右，但是据报道，一九三七年四月，仅仅在左派控制区，也就是说，仅仅在西班牙大约一半的领土上，边防警察部队的总人数已经达到四万人。诚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前线的边防警察特种部队中服役，但是，大部分边防警察被留在了后方。众所周知，普列托和社会党温和派鼓励发展边防警察部队的目的在于加强其与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对抗的实力，不过，他们显然首先认为这是一支与极端革命派抗衡的力量。休·托马斯正确地记述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指责内格林“逐步把边防警察部队建设成一支财政部手下的私人军队”，但是，考虑到我们已经提到的事实——到一九三七年四月时，共和国政府控制的领土已经缩减到战前面积的一半而边防警察部队的总人数却从一万五千人左右增加到大约四万人——他的论点无法被人所接受：他说这是内格林“为了保证政府收到应收的税款”造成的。

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对边防警察部队发表的一次讲话中，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内格林的副部长赫罗尼莫·布赫达以带有威胁性的言论阐明了边防警察部队未来的作用：“你们是西班牙希望为自己创建的国家的卫士。那些认为可以允许没有社会秩序和道德的混乱局面出现的空想家们大错而特错，因为人民的军队以及光荣地成为其组成部分的你们这支边防警察部队知道如何防止这种局面出现。”

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掩饰他们的担忧：边防警察部队最终将用来对付他们。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的一条发自巴伦西亚的消息中，詹姆斯·米尼菲报道说：“一支可靠的警察部队正在悄悄而稳步地建立起来。巴伦西亚政府发现边防警察部队是达到这一目的的理想方式。……无政府主义者已经注意到这件事情，因此他们抱怨说，‘在尽人皆知几乎没有足够的人流从陆地或海上过境时’却加强了这支部队的

力量。他们意识到，它将被用来对付他们。”

一九三八年初，据一名共产党人透露，边防警察部队从一九三七年四月的四万人增加到了六万人，接着，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据无政府主义人士说，增加到了十万人，后者将这支部队称为“内格林的十万里子弟兵”。我们无法断言是否曾经达到过这个数字，但是，整个一九三八年，扩大这支部队规模的努力仍在继续，首先是把入伍的年龄从十八岁降低到十七岁，然后又把它从四十岁提高到四十五岁。内格林对边防警察部队有一种偏爱。他有个儿子参加了这支部队，他的用餐由这支部队伺候，他在巴伦西亚附近的小城纳克拉的住宅也由这支部队负责警卫。一九三八年四月成为国防部长后，他任命边防警察部队的一名上尉担任臭名昭著的军事调查局（SIM）局长，而在内战结束后，据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说，他“愚蠢地”委托边防警察部队的上校恩里克·普恩特用“比塔”号游艇秘密向墨西哥运送财宝，普恩特是一名社会党人，他背叛了内格林，将财宝交给了内格林当时的头号敌人普列托。

由于它所享有的特权，边防警察部队在人民军的官兵中不得人心，因为边防警察身穿绿色军装，人们称之为绿色瘟疫（la peste verde）。一些边防警察部队偶尔也会上前线，据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说，“由于他们享有特权，他们的存在往往成为发生不快的原因”。与人民军士兵每天挣十个比塞塔相比，他们每天挣十五个比塞塔，食物和武器也更好。边防警察部队拥有自己的工厂和车间，还有自己的运输工具，这些运输工具通常比军队的精良。后来，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当内格林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决裂时，他受到他所创建的这支部队的牵制。

在重建治安部队的同时，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采取措施将独立的工人纠察队和巡逻队纳入它的控制之下。它在上台之后不久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工人纠察队和巡逻

队合并组成治安民兵，经内政部批准与正规的警察部队合作维持国内的秩序。所有执行警察职能但不属于新建警察队伍的民兵都被视为“不安定因素”，如果这些人希望加入正规治安部队的话，他们将得到优先考虑。事实很快证明，这项法令只是为了把工人纠察队和巡逻队兼并成为国家的武装力量而采取的一项预备措施。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立即利用这个机会加入了正规的警察部队，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则犹豫不决并且无视政府的法令，在许多地方坚持保留自己的纠察队和巡逻队。由于决不能默许自己的民兵被国家兼并，一些立场比较坚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要求解散政府的警察部队，将其成员并入工人的民兵队伍。但是，这种要求毫无意义，因为，由于重新组建了治安部队，由于担任部长的那些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没有明确表示抗议，政府变得强硬起来，它开始解除违抗法令者的武装并且将他们逮捕，进而一个接一个地在内战爆发以来一直被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控制的那些地区重新掌握了公共秩序的管理权。各地的警察根据内政部长对其管辖下的地方当局下达的命令采取措施，收缴一切不属于财政部、内政部、司法部和国防部下属正式机构的人员所拥有的武器。

在重建政府治安部门的同时，司法领域也发生着重要变化。内战初期工人组织建立的革命法庭逐渐被一种形式合法的法庭取而代之，后者由三位法官以及人民阵线各个政党和工会的十四名成员所组成，每个党派有两名代表。尽管一九三六年八月底希拉尔政府颁布了建立新的法庭的法令，但是，直到十一月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卡瓦列罗政府几周后，这些法令才开始在各省执行。

在正规警察部队的重建工作逐步进行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充分利用其越来越大的权力以及他们洗脑、诽谤、渗透的技巧保证自己占据某种优势地位。阿尔瓦塞特省省长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证实，他们与苏联特工一起想方设法向各省的地方长官施加压力。此外，在公开和隐蔽的上层支持者的帮助下，他们利用社会党和共和派

领导人的不好意思或谦恭有礼在重建的警察机构里为自己谋得关键职位。例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迁往巴伦西亚之后成立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公共秩序委员圣地亚哥·卡里略及其继任者何塞·卡索拉——两人均转投共产党——成功地掌控了新建的首都治安警察部门；同为共产党员的路易斯·奥马尼亚·迪亚斯和洛雷托·阿佩利亚尼斯被社会党左派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安插在政府新设立的巴伦西亚警察总署署长和警署督察的位置上；共产党员胡斯蒂尼亚诺·加西亚和胡安·加兰分别被任命为内政部情报部门特别处的正副处长，而另外两名共产党员费尔南多·托里霍斯和某个名叫亚当的人则被安排在警察管理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托里霍斯被任命为安全总局政治委员，负责警察的任职、调动和督导；亚当则被任命为警察学校秘密警察训练中心主任，负责为新的秘密警察队伍培养骨干。

从其创建之日起，这支最终比任何穿军装的治安部队都重要的队伍纯粹成为苏联秘密警察的一支武装，由于西班牙在苏联外交政策中目前所占的重要位置，早在内战初期，苏联秘密警察就在左派阵营打下了根基。据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说，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四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苏联秘密警察对外部门负责人阿布拉姆·斯卢茨基出席了这次会议。“我在这次会议上听斯卢茨基说，”克里维茨基写道，“为了在共和派控制区建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组织，他手下一名经验丰富的军官被派到了西班牙。这名军官叫尼科利斯基，化名施维德、廖瓦和[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早在这些化名还没有在其他地方公布过的一九三九年，克里维茨基就把它们披露了出来，这一事实证明，他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内情，这种了解已经得到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和保罗·沃尔的确认，这两个人诚实可信而且熟悉克里维茨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遗产》是一九七三年奥尔洛夫在美国——一九三八年叛逃之后他定居美国——去世以后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所起草的一份文件。据这份文件透露，尼科利斯基是奥尔洛夫在苏共党

内的名字；一九六六年奥尔洛夫本人证实，施维德是斯大林就把西班牙黄金运往苏联的有关事宜与他联系时所用的“代号”；廖瓦这个名字得到了路易斯·费希尔的证实，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他在马德里与廖瓦见过面并在一九四一年把这一情况公之于世。

为了回答斯坦利·G·佩恩所提出的一份问卷，奥尔洛夫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声明，他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派，因此，克里维茨基所提供的九月十四日这个日期并不准确。这一出入并不重要；考虑到将其斥为江湖骗子的声势浩大的造势运动，重要的是他确实知道属于极端秘密的这一委派。作为对同一份问卷的答复，奥尔洛夫还声明，克里维茨基从来没有担任过苏联秘密警察的高级职务，他只在海牙的一个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联络点”工作过，那是“特工等级中最低的级别”。克里维茨基揭露了奥尔洛夫的特工组织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所扮演的专制角色——我们将看到这种情况，因为后者在他的著作、文章以及向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所作的证词中均对此事只字不提，所以，我们可以把奥尔洛夫的声明当作一次姗姗来迟的贬低克里维茨基的尝试不予考虑。级别如此之低的任何人大概都不可能像克里维茨基这样广泛而准确地了解内情。

委派奥尔洛夫前往西班牙之后没几个月，通过与西班牙共产党人和外国共产党人、各级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中的地下共产党员以及共产党所控制的西班牙秘密警察密切配合采取行动，苏联秘密警察成为反佛朗哥阵营内部的一个决定事态发展的关键因素。“事实上，”前共产党领导人费尔南多·克劳丁写道，“斯大林的秘密特工在共和国境内表现得仿佛是在蒙古共和国一样。”

关于拙著《精心的伪装》，在左派控制区采访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具有影响力的公共舆论营造者赫伯特·L·马修斯在他最后一部研究西班牙的著作《半个毁灭的

西班牙：对西班牙内战的重新评价》的第113页写道：“博洛滕断言，西班牙的秘密警察‘纯粹’成为苏联秘密警察特工的‘一支武装’，而且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迅速‘成为反佛朗哥阵营内部的一支影响事态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是一种不顾事实的夸大其词。政府的权力始终掌握在西班牙共和国领导人手中。”然而，他在第110页写道：“早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奥尔洛夫的指挥下，共产党人就已开始将数以百计他们的——不一定是共和国政府的——敌人投入监狱，折磨并且杀害了其中许多人。并不是像站在佛朗哥一方的前合众社记者伯内特·博洛滕[实际上我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起一直站在左派一方]所说的那样，内战期间始终有一个控制着整个共和派地区的‘独立的苏联警察系统’。当时有许多警务机构（休·托马斯认为有九个），包括一些合法机构。”实际情况当然就像我在本书以及较早之前在《精心的伪装》中已指出的那样，在内战初期，属于不同工会组织和政党派别的各种各样的纠察队、民兵小分队和巡逻队行使着警察的权力。如果像马修斯所承认的那样，实际上这样的机构有很多，包括“一些合法机构”——这意味着不少机构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此外，如果像他承认的那样，共产党人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挥下开始将“数以百计他们的敌人”投入监狱，“.....折磨并且杀害了其中许多人”，那么，他所谓“政府的权力始终掌握在西班牙共和国领导人手中”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从马修斯同一本书的第120页引述的下面这一段内容应当足以指出这种说法的漏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六日和十一月七日至八日夜间，当时马德里命悬一线，大约一千名囚犯从模范监狱被带走，然后在马德里及其周围的村庄遭到杀害。.....我相信，命令来自共产国际在马德里的代表，因为我知道，阴险的维托里奥·维达利[在西班牙化名卡洛斯·孔特雷拉斯，在美国化名埃内亚·索尔门蒂]那天晚上在某个监狱对囚犯进行简单的审讯，当他像通常那样认定他们是第五纵队成员时，就用他的左轮

手枪向他们的后脑勺开枪。”

因为维托里奥·维达利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特工组织的成员，所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对这些暗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在所有书面和口头的证词中，奥尔洛夫始终把他在西班牙的任务说成是担任与人无害的“共和国政府在情报、反情报和游击战方面的首席苏联顾问”，同时避免提到他在左派阵营内部事务中的秘密警察职能和专制角色，无论是对所谓右派还是对反斯大林主义者。另一方面，路易斯·费希尔认为奥尔洛夫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共和派控制区的特工负责人”，这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头衔，更加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对西班牙公民的生活所行驶的权力。克里维茨基肯定地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组织有它自己的专用监狱。[一九七四年，时任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书记的圣地亚哥·卡里略确认了这一事实。]它的特工实施暗杀和绑架。它有许多秘密的地牢并且进行突然袭击。当然，它独立于共和派政府行动。司法部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组织没有管辖权，它是一个国中之国。它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在它面前，就连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一些高官也要发抖。苏联似乎控制了西班牙共和派占领区，那里仿佛已经是苏联的一块属地。”

## 第二十二章 国有化对集体化

如果为了强制推行政府的意愿必须重建正规的警察部队并解散那些篡夺了以前属于国家的权力的革命委员会的话，那么，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还认为，通过将集体化企业，尤其是基础工业中的集体化企业纳入政府的控制之下从而削弱革命委员会在工厂里的权力同样必要。

当革命开始进行时，何塞·希拉尔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了初步措施。为了提高政府面对革命委员会的地位并使革命委员会的没收行为合法化，八月二日，希拉尔政府批准

了工商部长普拉西多·阿尔瓦雷斯·布伊利亚所提出的一项法令，要求国家接收那些被其拥有者或管理者放弃了的工商企业——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在内战初期逃往国外、隐藏起来或者被监禁和被处决的人所拥有或者管理的企业。法令规定，如果企业的拥有者和管理者在法令颁布四十八小时之内没有上班，国家将着手接收他们的企业，以保证企业继续运转。

尽管政府最初的干预非常有限，只是向官方指定的一些被工人委员会接管的马德里的工商企业分别派去人民阵线所有党派的代表各一名，不过，这项法令仍然是中央政府为了控制工业和商业而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措施。

其他法令紧随其后陆续颁布。

“通过八月十四日和二十日以及九月一日颁布的法令，”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和革命史写道，“希拉尔政府向各个电力公司连续派出政府顾问，并且成立了一个有权过问这些公司的技术和管理问题的电力委员会（Consejo General de Electricidad）。该委员会的执委会由人民阵线各党派代表组成：共和派的埃尔菲迪奥·阿隆索，社会党的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共产党的路易斯·卡博·希奥尔拉，劳动者总工会的曼努埃尔·洛伊斯，等等。

“西班牙经济中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不是那种被金融寡头利用或者操纵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一种通过人民阵线各党派的代表进行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对于工人阶级，这些代表确信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尽管具有局限性，希拉尔政府采取的却是西班牙的资产阶级政府在此之前从未采取过的革命性措施。因此，人们只能对它表示敬佩。”

共产党人知道，国家资本主义或国有化最终将使中央政府不仅能够根据战争的需要



组织安排反佛朗哥阵营的生产能力并且控制战争物资——它们经常被工会分发给当地居民以及自己的民兵组织——的产量和分配，而且能够通过切断其主要源泉之一削弱革命左派的力量。当然，他们不会公开承认国有化带来的政治利益，而只是根据军事和经济的理由为其辩护。集体化运动存在明显问题这一事实使共产党人在宣传活动中有机可乘。首先，集体化企业似乎毫不关心按照合理的军需生产专项计划准备配置技术工人、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满足于把资本家从工厂赶走然后自己成立委员会进行管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说，“没有尝试联系业务，没有以适当的方式搞经济合作。我们的工作没有计划，实际上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此外，只是因为可以产生高额利润，它们一直生产并非急需的民用商品，甚至生产奢侈品，结果造成原材料和人力的浪费。根据迈克尔·塞德曼主要根据工会的原始资料对巴塞罗那经济革命所进行的研究，尽管工会和工人委员会通过引进新的机器设备、改善工作条件并且尽量消除一些明显的漏洞而使生产更加标准化和现代化，但是，它们“经常受到工人自身的抵制，工人们不断要求增加工资，装病偷懒，破坏生产，拒绝接受工厂规章制度的管理和约束”。

激进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加泰罗尼亚地区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描述了最初的经济混乱：“在头几天的兴高采烈过后，工人们回到工作岗位，他们发现自己没有管理权。这导致产生了工厂、车间和货栈的工人委员会。在这种变化势必带来各种问题的情况下，工人委员会努力恢复生产。由于缺乏训练以及一些留下来的技术人员——许多技术人员跟资本家一起逃走了——的破坏捣乱，工人委员会和临时组成的其他机构不得不依靠工会的指导。……怀着比取得成功更高的期望，同样在经济问题上缺乏训练的工会领导人开始发号施令，以致工人委员会手忙脚乱，从而使生产陷入严重的无序状态。各个工会……经常发出相互矛盾的

不同指示加剧了这种混乱局面。”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且赋予集体化运动——某些非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将其称为“最重大的工人自我管理实验”——以合法地位，加泰罗尼亚地区自治政府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批准了一项关于“集体化与工人管理”的法令。该法案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倡议并由其在自治政府的代表、经济专员胡安·P·法夫雷加斯签署。法令第二条规定，所有雇用工人超过一百名的企业将自动实行集体化，而雇工少于一百名的企业可以在多数员工同意的情况下决定实行集体化。尽管法令的这一条款只不过是使已经存在的情况合法化，但是，用佩雷斯—巴罗的话说，这项法令“试图协调整合以前由各个工会或工人委员会进行解释的个体实践”。此外，在工人同意的情况下，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那位政府经济专员向每个集体化企业派出一名政府代表，这些企业被集中组成了一些大型的所谓工业总会。反过来，每个工业总会也在作为中央计划协调机构的加泰罗尼亚经济委员会中拥有自己的代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并非全都赞同这项法令。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接替法夫雷加斯担任经济专员的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随后写道：“我在担任经济专员之后不准备考虑或者实施这项法令；我打算让我们伟大的人民，根据他们自己的灵感，以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继续完成这项使命。”他还在别的地方说过，这项法令扼杀了“工人在某个不需要任何专家建议的领域里的首创精神”。因此，这项法令从未得到强有力的贯彻实施、违法行为大量存在以及关于成立一个为集体企业融资的工商信贷银行的重要条款没有落实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当一些集体工厂的工人向自治政府的左翼共和派财政专员何塞·塔拉德利亚斯请求资金帮助时，据后者自己证实，他试图“利用他们的困境获得集体化企业的控制权”。

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以外，财政部长、中央集权论者和国有化的坚决倡导者胡安·内格林也想利用经济的混乱局面。“当内战爆发时，”他对路易斯·费希尔说，“工人组

成委员会接管了工厂，他们往往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用销售所得给自己发工资。现在他们没钱了。他们经常为了弄到流动资金和原材料来找我。我们应当利用他们的困境得到工厂的控制权。”

尽管共产党人有支持国有化的充分理由，但是，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相反，对于在全国范围内管理生产并且使之合理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计划。因为根本反对国家控制或国有化，他们提倡由工会管理整个生产环节的集体化——或者如他们所说，社会主义化。“如果像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所要求的那样在西班牙实行国有化，”一份无政府主义报纸写道，“我们就将踏上通往独裁专制的道路，因为政府将会通过国有化来主宰一切，成为所有人和所有事情的绝对主人。”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化将通过把生产掌握在工会手中消除政府专制的危险。这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化概念：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它将消灭竞争和重复生产造成的浪费，使制订同时满足民用和军事需要的行业生产计划成为可能，并且通过用效益较好的集体企业的利润提高待遇较差企业工人生活水平的方式遏制工人当中自私行为的上升势头。据研究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权威人士达尼埃尔·介朗说：“看来……工人的自我管理可能导致一种自私的排他主义，每个企业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巴塞罗那]通过创建一种中心平衡基金改善这一情况。……结果，公共汽车公司的超额收入被用来补贴效益较差的有轨电车公司。”但是，实际上存在着许多不那么容易解决的不平衡状况。

内战初期，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其他地方的一些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工会的领导人已经有限地采用了集体化形式，在局限于一个地方的某个行业，例如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卡尔卡亨特的木制家具业，巴伦西亚的服装剪裁业、金属加工业和皮革制品业，锡切斯的制鞋业，阿尔科伊的金属加工业和纺织业，昆卡的伐木业，格拉诺列

尔斯的制砖业，巴塞罗那和比克的制革业以及阿利坎特省的制鞋业，这里只举了几个例子。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局部集体化当作自己的最终目标，而是认为这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各个生产分支整合成为由工会管理的社会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经济实体的过渡阶段。

但是，这项集体化的工作不可能像自由主义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开展。他们遭到了许多拥有某种特殊地位的企业的反对，这些企业既有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控制的，也有劳动者总工会的工人控制的，他们不愿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效益较差的集体化企业。另外，像共产党一样，社会党和社会党的劳动者总工会主张政府拥有并且控制基础工业，反对将小资产阶级的财产集体化。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认为，社会党人的计划完全依靠小资产阶级。

“关于经济问题，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之间始终存在着观点分歧，”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马里亚诺·卡多纳·罗塞利证实，“因为实际上，当全国劳工联合会主张更有效地实行集体化时，它得不到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地区和当地领导人的合作，他们极少关心甚至根本不关心这个重要问题。结果，在许多地方，劳动者总工会的普通成员听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指示。”这种观点分歧使得既不可能通过自由主义的集体化、也不可能通过国有化建立一个统一协调的工业体系，而且部分解释了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经济扩大会议上提出的那个精心设计的工会管理下的工业集体化方案为什么只能纸上谈兵。

将工业整合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实体的另一个障碍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所管理的许多企业实际上处于破产或者半破产状态，因此不得不请求政府干预以获得资金帮助。它们一般不向银行求助，因为银行都被劳动者总工会的银行雇员工会组织全国银行联合会控制着，那是支持共产党的联合会主席阿马罗·德尔·罗萨尔的势力范围。由于

蔑视金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从来没有打算在银行雇员中组织工会，结果被劳动者总工会完全控制，内战期间它们对此懊悔不已。

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经济状况的特点之一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接管了大部分工商企业，而竞争对手劳动者总工会则控制了银行和另外一些信贷机构，这些银行和信贷机构受到一个由劳动者总工会和自治政府的代表组成的银行委员会的全面监督。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的企业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不愿把它们的资金存入既有的金融机构并且用现金进行交易，所以，那些盈利的企业在它们的经营场所囤积了大量现金。这种囤积导致了严重的流通不足并且限制了本可以向效益较差的企业提供资金的基本信贷。希望改善这种状况的自治政府财政专员塔拉德利亚斯签署法令，规定所有超过一千比塞塔的款项必须用支票支付，但是，没人理睬这项措施。“大量现金由于意识形态原因不能流通，”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喉舌《战斗报》写道，“只要存在两个工会，只要几乎所有生产手段被一个工会控制而信贷手段被另一个工会控制，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拒绝利用金融机构，同时因为它的集体化方案需要资金，所以，一九三七年二月召开的一次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建议，创建工会自己的银行，但是，这个建议没有下文。

无论是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还是在共和派控制区的其他地方，这种状况都给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集体化企业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些企业急需资金，以致担任工业部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胡安·佩罗公开建议中央政府进行干预，仅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他的部门就收到了一万一千份要求资金帮助的申请。根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和革命史，担任工业部长和商业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用尽一切办法试图巩固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大部分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并且使之合法化，把国家的资金提供给那些处于破产状态的工团化[即集体化]企业”。

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得到政府的资助以挽救这些企业并且推进集体所有制的实施所做的努力没有成效。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证实，胡安·佩罗打算起草一项要求所有企业实行集体化的法令，但是，拉尔戈·卡瓦列罗制止了他，总理警告他说，在西班牙拥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将会收回对共和国政府的外交承认。于是，佩罗重新起草了法令，不过，内阁没有批准这项法令并且对它作了修改。据佩拉特斯说，内阁把它交给了一个部长委员会，委员会把它修改得只剩下一个框架。“但是，劫数仍然未到尽头。要使法令生效必须有钱，也就是说，贷款必须得到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的批准。他像高利贷者一样讨价还价，终于批准了一笔微不足道的贷款额度。……最终，工业银行介入了，它进一步削减了贷款额度。”佩拉特斯最后说，结果，在工业部长使这项“明显保守”的法令生效之前，一九三七年五月发生了本书后面将要讨论的政府危机，而新政府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直截了当地废除这项法令”。在这个政府中没有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

共产党人利用经济问题进一步为支持政府控制工业和金融业大造声势。共产党控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佩雷·阿迪亚卡声称：“经济权力必须掌握在一个实体手中。”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在谈到“为时过早的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实验”时说：“即使当初由于大资本家和大地主遗弃了他们的工厂和庄园而生产必须继续进行的事实，这些实验有正当的理由，后来的情况已不一样。……开始的时候，因为无论如何也要继续生产，工人没收被遗弃的工厂可以理解。……我再说一遍，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会谴责它。……[但是]今天，当一个代表了所有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力量和人民阵线政府存在时，这种行为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还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今天，为了供应前线 and 后方需要的一切，我们必须立即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生产加强合作。……当战局仍然不明朗时，当得到外国法西斯援助的国内敌人正在疯狂进攻我们的阵地并且危及国家的未来时，匆忙地进行这些为时过早

的‘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实验荒唐可笑而且等于帮助敌人。”

## 第二十三章 一个新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

共产党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由主义工业集体化计划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集体化实际上是对共产党的国有化计划的一种威胁；另外，为了产生效果，它必定侵犯中产阶级的财产，而克里姆林宫需要中产阶级的支持以取得外交政策的成功。为了对抗这种威胁，西班牙共产党坚持认为，试图以牺牲中产阶级为代价继续进行革命的原因是工人缺乏政治判断力。“军事叛乱爆发时，”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在谈到巴伦西亚的情况时说，“许多工人因为相信我们正在进行社会革命而陷入了没收财产和集体化的狂热。几乎所有工厂都实行了集体化。……这种狂热的‘集体化运动’不仅没收了那些支持叛乱的老板遗弃的工厂和车间，甚至还侵占了自由派和共和派雇主的微薄资产。……工人为什么犯这些错误？主要是因为对于当前的政治形势缺乏判断力，以致他们以为我们正在进行社会革命。”

听从共产党指挥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执委会成员费德里科·梅尔乔断言：“我们今天不是在进行社会革命；我们正在推进一场民主革命，在一场民主革命中，经济……不能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运行。如果我们正在推进一场民主革命并且宣称我们正在为保卫一个民主共和国而斗争，我们怎么能够尝试在经济领域采用一种极权的社会主义方式呢？……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同志前几天说：‘为了胜利，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我们应当补充的是，必须有一条建立在清晰、正确的经济路线基础上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这些经济异常、经济倾向和这些实验出现在我国并非偶然；它们源于一种意识形态体系，源于工人运动某个主要流派的意识形态变种，试图使我国的经济脱离这种经济发展需要经过的那些阶段。”

这些论点当然全面符合共产国际规定的路线并且符合斯大林外交政策的需要。帕尔

米罗·陶里亚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宣称，“西班牙人民面临的任务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而歪曲了四个月前爆发的这场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

在革命狂热盛行的情况下，坚持符合这些路线的主张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他们不仅必须与自由主义运动论战，而且必须与劳动者总工会、社会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中的激进分子论战。他们没有逃避这项任务。“在革命热情最高涨时，”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尼奥·米赫回忆说，“我们共产党人问心无愧地在马德里和西班牙的其他地方发表演说，当时我们明确主张保卫民主共和国。鉴于有些人甚至害怕提到民主共和国，我们共产党人不反对向不了解形势的激进分子说明，为了对抗法西斯主义，保卫民主共和国是政治上的明智之举。”

“我们正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我们并不以说明这一点为耻。”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举行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会议上，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发表讲话声称。他在讲话中概括阐述了这个统一青年组织的政策，自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青年运动合并以来，这还是第一次。“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外国侵略者，现在我们不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此时，在继续引用这次讲话之前，我们必须插入卡里略多年以后所作的一番陈述，这番陈述也许表明了他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对他们自己公开发表的言论的真实态度。在发表于一九七四年的一次访谈中，时任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书记的卡里略说：“我们当时说那是一场人民革命。这是显而易见的。大资本家、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哪里？他们全都消失了。因此，整个争论在我看来显得荒唐和教条。”）

但是，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全国会议上，卡里略表达了不同的思想，他继续说道：“有人说，在现阶段我们应当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还有一些人甚至说，



我们正在进行欺骗。他们说，当我们宣称我们正在保卫民主共和国时，我们是在设法隐瞒我们真正的政策。不过，同志们，我们正在为一个民主共和国而斗争，而且是在为一个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斗争。这不是一种欺骗西班牙民主舆论的策略，也不是欺骗外国民主舆论的策略。我们正在真心实意地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现在——甚至包括胜利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错误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那么，我们不仅将会看到法西斯侵略者站在我们的国土上，而且将会看到世界各国那些已经明确表示在欧洲当前的形势下不能容忍我国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与法西斯侵略者站在一边。”

本章前面引述过其看法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费德里科·梅尔乔断言，不能保护外国资本“将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错误，因为英国将立即对西班牙进行干涉，不是站在我们一边，而是站在佛朗哥一边，因为英国在我国有经济利益需要保护”。

尽管没有记录显示任何民主国家的政府曾经威胁要进行干涉，但毫无疑问，相当一部分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普通成员担心引起民主国家公开的敌意。然而，对在这次会议上初露端倪的政策的不满没过多久就显现出来；因为几周之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总书记拉斐尔·费尔南德斯指责它“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这不仅是一种个人意见。这是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中许多社会党人的意见，他们感到自己被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突然右转背叛了，他们的心情准确地反映在下面这封发自前线的抗议信中：

“我在不同的报纸上多次看到卡里略所发表的讲话……大意是说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正在为一个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战。我认为卡里略大错而特错了。作为一名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我正在为土地、工厂以及西班牙所有财富的集体化而战，正在为大家和人类的利益而战。

“卡里略和其他想把我们引上反革命邪路的人难道以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战士是绵羊吗？不，我们不是绵羊，我们是革命者！”

“我们在战场上牺牲的同志如果能够抬起头来，他们会怎么做？他们将如何看待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已经成为背叛那场他们为之献身的革命的帮凶呢？他们只可能做一件事，把痰唾在那些罪人的脸上。”

如果共产党人难以使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激进分子相信其政策的正确性，那么，要使自由主义运动相信更困难。然而，这一政策的成功有赖于这个强大运动的服从，即使不是心悦诚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据担任卫生部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费德丽卡·蒙特塞尼说，苏联外交代表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频繁举行会谈。“他们给我们的建议始终如一，”蒙特塞尼写道，“必须在西班牙建立一种‘民主集中制’（极权主义的委婉说法）；不能给国外造成正在进行一场深刻革命的印象；我们应当避免引起民主国家的怀疑。”她补充说，苏联人的态度彬彬有礼。“我没有听到他们使用任何威胁性的语言。……一九三七年一二月间我去日内瓦参加卫生代表大会时，[苏联大使]罗森堡极力劝我去苏联，他说：‘斯大林同志将非常高兴见到你。去吧，费德丽卡！你将受到公主般的接待。’[俄国人]从未提出过任何可能使我不得不与他们断绝关系的具体建议。他们对此非常敏感。但是，罗森堡多次建议我把女儿送到巴伦西亚，在市郊他所居住的别墅里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一起生活。听到这些建议时，我的血在血管中凝固了。”

即使这些担任政府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觉得为了影响民主国家不得不以牺牲革命为代价向苏联的政策作出让步，他们也没有始终不渝地附和共产党人高喊的“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据商业部长胡安·洛佩斯说，

即使在加入政府时同意采用这个口号，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给国外造成某种印象，决不是为了扼杀工人阶级所取得的正当的革命成果”。

与这些担任政府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相比，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主义运动甚至更不愿意接受共产党人的这个口号，这一点在它的报刊上明显地反映出来：

“前线的成千上万名无产阶级战士不是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战。”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情况通报》写道，“他们是为了闹革命而拿起武器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把革命的胜利推迟到我们赢得战争之后将极大地削弱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如果我们希望提高战士的士气并且为反法西斯的群众注入革命热情的话，我们必须坚定地推动革命前进，消灭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后残余，实行工农业集体化并且按照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创建新社会的领导机构。

“这应当被清楚地理解为，我们不是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我们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斗争。革命和战争不可分离。人们所说的与此相反的一切都是改良派的反革命行为。”

《全国劳工联合会报》愤怒地写道：“‘民主革命。’ ‘议会制共和国。’ ‘这不是进行社会革命的时候。’ 这是一些符合共和派政党的政治纲领而让工会组织引以为耻的口号。.....[如果]社会党和共产党及其青年运动恪守它们的原则的话，那就应当消灭‘整个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马克思）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未提到什么‘议会制民主共和国’的过渡阶段。.....因此，西班牙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马克思主义，针对这种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概括性地提出了他的革命理论。”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内战刚刚爆发时，共产党就把发生在西班牙的革命比做一个多世纪前已在法国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舆论工具对其政策的谴责造成了令人尴尬的消极影响，为了抵消这种影响，也是为了减少内耗，共产党人不得不修改了他们的用语。“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指责我们做了什么？”《工人世界报》在答复无政府工团主义报刊时问道。

按他们的说法，我们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为什么？因为我们保卫民主共和国。……[我们]希望确定一下我国现在这个共和国的性质。……第一，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掌握着一切权力；第二，耕者有其田：农业劳动者正在以前的大庄园里以集体或者个体的方式劳作，佃农现在拥有自己的土地；第三，所有工厂建立了工人管理委员会；第四，没收了参加军事叛乱的大地主、银行家、大资本家和政治寡头的财产，从而使他们失去了社会政治影响力；第五，推动民主革命发展的最大的支配力量、最重要的领导力量掌握在整个工人阶级手中；第六，以前镇压人民的那支军队已被消灭，我们有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因此，我们的共和国是一种特殊的类型；它是一个具有以前不曾有过的社会内涵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所以，不能把这个共和国……与[那些共和国]相提并论，在那里，民主是一个谎言、是一种以剥削阶级的绝对统治为基础的民主。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我们必须告诉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我们并没有因为保卫民主和共和国而放弃或者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正是列宁教导我们，革命者不应脱离实际。正是列宁教导我们，革命者应当始终牢记一个特定国家的具体情况，以便采取最适当的革命策略。

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举行的一次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何塞·迪亚斯发表讲话说：

我们正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为一个具有深刻社会内涵的新型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在西班牙进行这种斗争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像法国或者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民主共和国。不是。我们正在为之而战的民主共和国与众不同。我们正在为消灭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斗争；因为，不消灭它们，真正的政治民主不可能存在。……

现在我要问的是：[它们]被消灭到了什么程度？在我们控制的每一个省，大地主已经不复存在。作为一种统治力量的教会同样不复存在了。军国主义被消灭了，绝不可能卷土重来。大银行家和大资本家也没有了。现实情况就是这样。这些胜利成果决不会丧失的保证在于，权力实际上掌握在人民手里，掌握在真正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民手里，掌握在始终被等级制度所奴役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手里。这是旧社会一去不复返的最有效的保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因为我们拥有胜利成果不会丧失的某种保证，所以我们不应当不顾现实匆忙地进行“自由共产主义”和“集体化”实验，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乡村。西班牙政治进程的现阶段是民主革命时期，它的成功有赖于所有反法西斯力量的参与，而这些实验只能起到赶走它们、疏离它们的作用。

但是，共产党人说服其批评者的努力没有成效；因为自由主义运动的追随者，尤其是它的极端派系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FIJL），大多数人坚决反对共产党的口号，而且不同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阶层，他们越来越怀疑向外国舆论让步能否得到任何好处。从下面的引文中也许可以发现这一运动发展趋势的一些线索。一九三七年一月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正式表明支持民主共和国的事业后，在对该联盟的一次抨击中，自由主义青年运动的主要喉舌《自由青年报》宣称：

关于保卫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所能提出的最充分的理由是，为了不使我们与欧洲民主国家打交道时的处境更艰难，我们应当避而不谈革命。多么幼稚的理由啊！欧洲民主国家非常清楚我们是些什么人以及我们正在向何处去。就像那些法西斯国家知道一样，它们知道正在西班牙与法西斯分子作战的所有战士实际上都是革命者，因此不会认同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免革命……被它们扼杀。无论我们号称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还是号称革命，除非使欧洲民主国家满意，它们不会帮助我们。

用一个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来欺骗我们那些正在战场上英勇地进行殊死战斗的战士，欺骗我们那些正在后方辛勤劳动的工人农民兄弟，这是对西班牙革命的背叛。……

除了权力之外，国家的经济资源同样掌握在我们手里。一切属于我们。……面对国际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势力，我们正在捍卫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企图窃取属于我们的东西的叛徒应当像法西斯分子一样受到谴责并被毫不留情地枪毙。

“现在，当我们有可能改变西班牙社会时，任何对我们说这种改变不会得到国际资产阶级认可的人都是在开玩笑。”《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负责人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说，“从他渴望国际资产阶级允许发动一场革命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有权力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

“如果我们决不能发动革命以免与国际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如果我们必须隐瞒我们的所有目的，如果我们必须放弃我们的一切目标，那么，我们的同志是在为什么而斗争？我们大家是在为什么而斗争？我们为什么毫不留情地投身于这场斗争，投身于这场反对西班牙和外国法西斯主义的战争？”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喉舌《社会熔炉报》也写道：“[在]一场狂风暴雨、一场真正改

变了一切的社会革命猛烈冲击我国的时刻，共产党提出需要一个议会制共和国，一个被形势的发展远远抛在后面的共和国。这导致出现了一种有悖常理的情况：共产党人形成了西班牙共和派的极右翼，成为眼看着自己的世界沉沦的小资产阶级的最后希望。然而，似乎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共产党是一项政策和一场宣传运动的神经中枢，这项政策无视胜利果实的存在和七月十九日的新生，目的是使我们退回到资产阶级共和国初期。”

当然，认为共产党的目的是使革命退回到七月十九日以前并不准确。比较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它打算在民主制度的掩护下把人民革命转变成为建立一个极权主义一党制的警察国家的运动。毫无疑问，当斯大林对拉尔戈·卡瓦列罗说“议会道路”可能被证明是一种比在俄国更有效的推动革命发展的手段时，当他坚决支持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时，他想的就是这件事。另外还可以更准确地说，正如两位著名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在战后所断言的那样，这个“新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在欧洲的那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先驱——处于它们发展的初级阶段。

在为掌握控制权铺平道路的同时，为了打败佛朗哥将军，共产党人需要他们所能召唤的每一个人。前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坦率地透露了自己当时玩世不恭的想法，他反思道：“[这]应当被称为统一战线时期。打败佛朗哥之后，我们将给每个人贴上适当的标签：共和派，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社会党人，与共和派差不多一样是资产阶级的走狗；无政府主义者，对我们革命事业的一种威胁。这将使我们在消灭佛朗哥之后有充分的理由消灭他们。在那之前，我们把他们称为同志并且给他们一些赞美之词。当然，我们的人是历史上的新人类。我们将在‘神圣同盟’时期善待他们。然后，我们将尽快地消灭他们，免得他们长期遭受严重的痛苦。”

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指责共产党人想使革命退回到七月十九日以前，但是，只要不归还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财产，换句话说，只要不让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参与国家事务，就不可能退回到一九三一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那不符合党的长期目标和克里姆林宫在西班牙的意图。克里姆林宫的意图是，在某种民主政体的掩护下，控制西班牙的国内外政策以满足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西班牙共产党限制革命不是为了归还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财产，而是为了在中间阶层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支持者，然后根据自己的目的利用他们与反佛朗哥阵营中的革命势力抗衡，确保共产党的支配地位。正如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章里看到的那样，这是西班牙共产党在工商领域采取的政策，也是它在农业方面采取的政策。

## 第二十四章 平衡各个阶层的力量

在其控制的农业部的帮助下，共产党人可以对农村的形势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共产党人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所颁布的法令中，最著名的显然当属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颁布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无条件将那些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军事叛乱的人在农村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收归国有。“这项法令摧毁了大地主半封建势力的生存基础。”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评论道，“为了维护他们惨无人道的阶级特权，为了永远保持两个比塞塔的日工资标准和早出晚归的劳动时间，大地主发动了这场正在毁灭西班牙的血腥战争。”这项法令的有关条款规定，将那些由庄园主或其管家直接耕种或者租给大的佃户耕种的农庄以永久使用权的方式分给农民和农业工人组织，按照大多数受益人的意愿由他们分别或者集体耕种。租种农庄土地的小型农户获准永久使用他们租种的土地，在干旱地区不超过三十公顷，在灌溉区不超过五公顷，在水果种植区不超过三公顷。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断言，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颁布的法令“是军事叛乱爆发以来所采取的最严厉的革命措施。……它消灭了农村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私有财产”。



尽管这项法令的措辞用语给人以政府采取主动措施没收军事叛乱支持者的财产的印象，但是，这一措施实际上只不过是使农业工人和佃农已经实施的没收行为合法化。然而，共产党人经常说它起到了把土地分给农民的作用。社会党左派人士，强大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总书记里卡多·萨瓦尔萨写道：“我们在共产党的报纸上看到许多这样的内容：‘由于担任部长的共产党人采取措施颁布了十月七日那项法令，农民现在拥有了土地。’……这种说法肯定在不了解情况的人当中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宣传效果，但是，它们无法说服多少了解一些实情的人。……在共产党人担任政府部长之前，根据我们联合会的指示，农民组织实际上已经没收了所有属于叛乱分子的土地。”另外，一九三六至三七年间担任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的共产党人拉斐尔·莫赖塔·努涅斯在脱离共产党之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可以肯定地说，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不是政府。农民不等政府决定就把庄园和可耕种土地直接据为己有了。……因此，备受吹捧的十月七日日法令——某个政党实际上宣称这项法令完全由它独力促成——并没有把那些庄园分给农民或任何人，因为几个月前农民已经开始耕种它们。当然，由于这是一项得到政府批准的法令，它所产生的唯一效果是使没收财产合法化。”

多年以后共产党人仍然宣称，农民得到土地应当归功于他们主动采取的措施。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的两位著名党员写道：“西班牙的农业工人和农民不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得到的土地，而是——通过共产党人主动采取的措施——从工人阶级手中得到的土地。”

由于这项法令只适用于被指控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了军事叛乱的那些人的庄园从而在法律上并不允许没收属于共和派人士的财产，也不允许没收其他那些不支持佛朗哥将军叛乱的地主的财产，因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它不符合形势的要求。《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评论道：

农业部长颁布的只是一项将那些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了七月十九日法西斯叛乱的人在农村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收归国有的法令。当然，政府像往常一样落后于形势。农民没有等待用法令解决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们在政府之前采取了行动，一上来就没收了地主的财产，从底层发动了这场革命。因为真正了解土地问题，他们比政府更有效率。他们不加区分地没收财产，无论其所有者参与还是没有参与叛乱阴谋。.....将没收财产仅仅作为对那些直接参与或者帮助法西斯叛乱的人的一种惩罚并不解决西班牙革命的头号问题。

我们的政府应当充分地认识到，七月十九日摧毁了不公正的特权制度，一种新的生活正在西班牙全国出现。只要它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要它死抱着七月十九日之后已经过时的制度和方法不放，它将永远被人民的进步甩在后面。

对这项法令的限制的批评同样来自社会党左派所控制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举行的一次全国会议上，该联合会提出要求，应当修改这项法令，以便使其适用范围不仅包括那些参与军事叛乱的人，而且包括那些因下列情况而被视为工人阶级的敌人的人：违反劳动合同，因为工人的思想信念不公平地解雇他们，没有正当的理由向警察告发工人并且鼓励破坏罢工。

但是，共产党不可能同意这种修改。为了寻求反佛朗哥阵营中的有产阶级的支持，它不能让那些在内战之前就对工人运动怀有敌意的中小地主产生反感，于是，通过其控制的农业部和土地改革协会，它以十月七日日法令的限制为依据，实际上支持了中小地主所提出的归还他们土地的要求。“我可以告诉你们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村的情况，”自由主义青年运动伊比利亚自由青年联盟的一位领导人说，“因为我与卡斯蒂利亚的各个农业地区保持着日常联系。为了向资产阶级、法西斯分子和地主归还他们曾经拥有的财产.....农业部派代表去了这些地区。农业部长说这些人是小地

主。占有大量土地的小地主！农村的政治恶霸和阴谋反对工人的人是小地主？雇用二十或者二十五个工人而且拥有七八头耕牛的人是小地主？我要问的是，农业部长的政策目的何在，‘小地主’这个词的确切定义是什么。”

共产党甚至保护内战之前属于右翼党派的农场主，尤其是在巴伦西亚省，它在那里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这不可避免地引起大量农民的敌意。一名社会党人在谈到农民联合会时抱怨说：“共产党在村子里专门网罗前自治党派最顽固的残余人员，这些人不仅极端保守，而且道德败坏，通过保证允许他们继续拥有自己的土地，共产党把这些小地主组织起来成立了新的农民联合会。”

毫无疑问，共产党不顾中小地主的政治背景保护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与社会党左派之间迅速发展的激烈冲突，正如我们所知，后者控制着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共产党人要求集体化应完全自愿，从而意味着既要尊重共和派地主的财产权，也要尊重右派地主的财产权。尽管不赞成对共和派小地主的土地强制实行集体化，社会党左派仍然反对为了那些在内战之前与挣工资的农业工人公开冲突的小地主的利益影响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发展。社会党左派的报纸、劳动者总工会的喉舌《光明报》写道：“不应强迫支持共和国的小地主加入集体农庄，但是，应当向每一个自觉主动加入集体农庄的人提供慷慨的技术、经济和道义援助。当我们说‘支持共和国的小地主’时，我们有意将公然敌视工人阶级的小地主以及那些如今总是哭哭啼啼并且企图潜伏起来的卑鄙恶毒的政治恶霸排除在外，他们在农村地区形成了一支真正的第五纵队。对于这些人，我们必须解除他们的反抗能力。如果不顾勇敢的农民战士所曾遭受的监禁、折磨和苦难，想方设法以这些人员为基础建立一个富农组织，那将造成一场真正的灾难。”

前共产党领导人恩里克·卡斯特罗是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三六年九月

担任土地改革协会主任，他在《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一书中证实，他在土地改革协会的主要工作目标是“消灭农村的社会党人”，同时争取农民的支持。在这部反省自身的回忆录中，卡斯特罗将其内心的想法公诸于众，这些想法显然也是党的想法。“我们需要所有那些疯狂地希望拥有自己的土地的人。”他回忆说，“我们现在需要他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仍将需要他们——只要这能使我们夺取政权并且巩固我们的政权。以后，我们可以讨论它！以后，我们可以澄清问题！以后，我们可能会说谁是土地真正的主人！但是，在那之前，我们每天都得公开宣称，土地是他们的，党将把土地分给他们，我们将向他们提供资金、种子、农具和建议。只有当他们认为他们是‘他们的’财产的主人时，他们才会为保卫这些财产而斗争。”

为了争取处于中间阶层的右派和共和派农民的支持，共产党人不仅不得不遏制社会党左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集体化倾向，而且不得不约束它自己的青年运动的集体化倾向。“我们不仅发现某些组织鼓吹集体化，”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说，“而且最初我们还发现，由于不了解当前斗争的性质，我们自己的年轻人也在为集体化进行辩护。不过，巴达霍斯和其他省份的农民同志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告诉他们他们正在实行错误的政策以后，在他们开始遵循正确的政策以后，农村的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我们几乎没有必要提醒大家，世界上唯一一个进行了革命的国家苏联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九年之后才开始将土地集体化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一个民主共和国里去做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九年后苏联才去做的事情呢？我们宣布，只要我国的形势不允许采取其他政策，我们未来的长期政策就是保护小农经济，保护农村小地主的合法利益。”

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因之外，农业部长十月七日颁布的法令及其实际运用所体现的共产党的政策还因其他原因遭到批评。既吸收农业工人也吸收穷苦的佃农入会的全国

农业工人联合会总书记里卡多·萨瓦尔萨在接受采访问到阿尔瓦塞特省的情况时证实：“有许多地主的财产没有被没收，或者因为他们支持左派，或者因为他们假装支持左派。法律迫使他们的佃户继续向他们交租，结果，由于支持叛乱的地主的佃农被免除了地租，这造成了一种不公平的状况。”萨瓦尔萨批评这项法令还因为，它使把土地分给农村穷人的目标无法实现。萨瓦尔萨的批评所依据的事实是，从这项法令中受益的佃户和佃农依法有权保留他们在革命之前耕种的所有土地，只要不超过规定的限度，因此，他们不愿意把他们占有的一部分土地转让给挣工资的农业工人。“结果，”萨瓦尔萨证实，“许多地方靠工资糊口的农业工人仍然没有土地，或者不得不满足于耕种最贫瘠或是远离村庄的土地，因为其他土地几乎全部归小地主和佃农所有。在这种不公平的状况下，一些人租种不到土地，即使小块土地也租不到，因为他们是革命者，而以前充当政治恶霸狗腿子的那些人却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仍然享有某种特权。由于无法接受这种令人屈辱的不公平状况，以致冲突不可避免。”

不过，导致农村发生冲突的更重要的原因仍然是，共产党人用十月七日法令刺激了佃户和佃农的个人利益。在这项法令颁布之前，佃户和佃农不是被农业集体化运动所吸引，就是已经接受了有利于农业工人的土地重新分配方案。

“接着，颁布了十月七日那项法令，”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指出，“在不超过干旱地区三十公顷、灌溉区五公顷和水果种植区三公顷的条件下，它使佃户看到了继续拥有其以前耕种的所有土地之永久使用权的可能性。这相当于.....提供了一种保证，只要佃户没有公开支持军事叛乱，他就不可能失去他的土地。.....因此，这项法令的实际效果是，勾起了那些已经接受土地分配新格局的佃户和佃农重新获得他们以前耕种的土地的欲望。”

被来自共产党的支持所鼓励，许多在革命初期已经接受集体化的右派佃户和佃农要求归还他们以前耕种的土地。在反对集体农庄的声势高涨时，里卡多·萨瓦尔萨宣称：“我们现在最强烈的愿望是保卫革命取得的成果，尤其是保卫本联合会的各个分会组建起来的集体农庄，觊觎革命成果的敌对势力——即过去的反动分子以及那些因为充当政治恶霸的走狗而以租赁的方式占有土地的人——变得越来越强大，而我们的会员不是要求获得土地遭到拒绝，就是被人从所耕种的贫瘠土地上赶走。今天，在臭名昭著的十月七日法令的保护下，这些反动分子正在大肆攻击集体农庄，目的是要瓜分它们——瓜分它们的牲畜、油橄榄树、葡萄园以及所收获的农作物——从而终结农业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正在利用我们最优秀的同志不在之机，这些同志上了前线，如果当他们回来时，他们发现他们的奋斗和牺牲只不过是让世代仇敌作威作福，他们将会愤怒地哭泣，而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者现在用某个工人组织的会员卡做护身符。”

共产党人还竭力动员农业工人参加其针对集体农庄开展的宣传活动。一九三七年四月初，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他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接替奥拉蒂奥·普列托担任此职——指责共产党人前往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已经根据双方协议建立了集体农庄的地区“挑逗人们自私的欲念……通过向工人许诺个人好处煽动其瓜分他们正在集体耕种的土地”。共产党人并不仅限于这样做，因为巴斯克斯还指责他们在托莱多省杀害了许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另外，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协会总书记几个月后声称：“我们与共产党人进行了可怕的斗争，特别是与他们指挥的军队进行了斗争，他们杀害了我们最优秀的农民积极分子，野蛮地破坏了我们的集体农庄并且毁掉了我们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才获得的收成。”

对农业集体化的攻击这一时期主要发生在共产党的军队所控制的西班牙中部的新卡

斯蒂利亚地区，据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历史学家和积极分子胡安·戈麦斯·卡萨斯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在那里建立了大约三百个“示范”集体农庄。在马德里出版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日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负责人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声称，共产党民兵第十一师师长恩里克·利斯特对杀害大批卡斯蒂利亚农民负有责任，共产党人指控这些农民是“不法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加西亚·普拉达斯说，在托莱多的莫拉，被处死的农民多达六十人。利斯特从不否认他杀害了这些人。他在多年以后声称，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个地区建立了“一种名副其实的恐怖专政，这导致每天都有农民逃出村子……去投敌”。他说，他结束了这种状况。“必须在托莱多的莫拉设立一个法庭，采取非常坚决、严厉的措施。后来，有人指控我枪毙了某某、某某人。我回答说，的确，我的确枪毙过一些人，而且我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还这么做，因为，如同我在回答指控时所说，我打仗不是为了保护强盗，也不是为了压榨农民。我是为解放人民而战的。”

对集体化的攻击不可避免地将对农村经济和农民的士气产生某种不利的影响，因为，尽管集体化在一些地区遭到大多数农民的诅咒，但是，在另外一些地区，大批农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集体农庄。时任国际纵队第十五旅副政委的著名作家拉尔夫·贝茨是研究西班牙和西班牙革命的权威，他在与共产党断绝关系之后写信告诉我：“共产党对集体化的攻击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尽管存在强制推行集体化等大量问题，但是，也有许多正常的集体农庄，即，自愿组织的集体农庄。”例如，在托莱多省，甚至在内战之前那里就有集体农庄，据一份倾向于共产党的原始资料提供的数字，百分之八十三的农民决定支持集体耕种土地。

随着反对集体农庄的运动在夏收之前达到高潮——就连比较成功的集体农庄也在那一年的这个时候陷入了经济困境——失望和恐惧的气氛开始笼罩着农庄的劳动者。人们不再下地干活儿或者心不在焉地敷衍了事，因此，大量即将收获的农作物有烂

在地里的危险，而这些农作物对于战争努力至关重要。

于是，共产党人立即改变了他们的政策。

这种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初，农业部长当时颁布了一项法令，承诺向集体农庄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以使它们能够“令人满意地尽快开展适合农业生产劳动”。这并不意味着过去没有提供帮助。十月七日颁布的法令将帮助法令受益者的任务交给了农业部长领导下的土地改革协会。据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报道，从那以后，土地改革协会以贷款、农具、种子以及肥料的形式向集体农庄提供了五千万比塞塔。这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这些帮助仅仅提供给那些接受土地改革协会干预的集体农庄；因为，由于政府干预威胁其集体农庄的自主权而不让政府插手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指责土地改革协会拒绝向所有集体农庄提供来自农业部长的帮助。另一方面，据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国家农业信贷机构执委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马里亚诺·卡多纳·罗塞利说，即使不允许土地改革协会超越其权限向集体农庄提供贷款和帮助，这些集体农庄还可以向国家农业信贷机构申请资助，除了相关贷款交易所产生的风险之外，没有任何风险控制。但是，这个在农业部的支持和赞助之下工作的机构——其执委会中除了农业部的官员之外还有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代表——直到一九三七年夏末才开始正常运转。此外，据卡多纳·罗塞利说，尽管它向申请资助的集体农庄提供巨额贷款，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官方机构的怀疑态度而且担心贷款可能限制自己的独立性，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些集体农庄并没有利用这个机构。

前面提到农业部长于一九三七年六月颁布法令，承诺向集体农庄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这项法令的前言写道，政府有必要提供帮助，以避免出现“可能使那些在没收了参加叛乱的剥削者的土地之后自愿选择以集体农庄的方式进行耕种的农业工人寒



心的经济衰退”。法令的第一条说：“为了通过土地改革协会提供帮助，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以来建立的所有集体农庄在本农业年度均被认为是合法的，因此，土地改革协会所属部门不会受理要求归还被上述集体农庄所占用之土地的任何申诉……即使是在有人指控没收土地的合法性存在问题的情况下，或者是在确定被集体化之土地以前的拥有者或受益者的政治身份时出现差错的那些地区。”“这意味着，”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评论道，“保证集体农庄合法性的唯一重要的事情是行动，是建立它们的革命行动，因此，任何针对它们设计的法律或政策都不能影响它们。”它避而不谈集体农庄的合法地位实际上只是暂时得到了承认而已。它宣称：“[该法令]给予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以来建立的集体农庄一种不可动摇的合法地位。……由于这项法令，因广大农业工人自发的冲动而出现的集体农庄如今变成一种合法的农业劳动形式。”然而，几个月后，在一项共同行动计划中，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认为有必要提出使集体农庄合法化的要求。这并没有使情况改变，因为，直到内战临近结束时，马德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全国劳工联合会》仍在坚决要求使集体农庄合法化。实际上，继续掌管农业部直到内战结束的比森特·乌里韦，始终没有给予集体农庄永久性的合法地位。

尽管一九三七年六月颁布的这项法令为集体农庄的合法性所提供的保证仅限于该农业年度，但是，在那个重要的收获季节，它在农村营造了一种宽松的气氛，因此达到了它的目的。

然而，农作物刚刚收获完毕，人们立即又担忧起来。八月十一日，中央政府——它在五月进行了改组，全国劳工联合会没有加入这个政府——解散了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保卫阿拉贡地方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内战初期，目的是指导阿拉贡地区的反佛朗哥武装占领区的革命，这一武装主要由自由主义者组成。在共产党人于八月初通过短暂但紧锣密鼓的宣传为解散该委员会做好了准备之后，根据当时的国防部

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命令，在内阁充分知情并且同意的情况下，恩里克·利斯特所指挥的第十一师开进阿拉贡地区并且解散了保卫阿拉贡委员会。不引起怀疑，第十一师受命在中部前线的布鲁内特战役之后前往阿拉贡地区“休整”，而中央政府秘密批准的解散保卫阿拉贡委员会的法令直到该委员会被解散之后才公布。“由于遭到人民的怨恨，我们一枪不发便解决了保卫阿拉贡委员会。”利斯特写道，“结果，第二天，当解散它的法令在《共和国官方公报》上颁布时，这个委员会已不复存在。”当时政府中的社会党温和派的喉舌《前进报》对这项法令发表评论说：“昨天发生在阿拉贡地区的变化也许没有在国外引起特别的反应。没关系。它应当引起特别的反应，因为政府通过这次行动有力地证明了它的权威。”

在这项法令公布的同时，支持共产党的左翼共和派成员何塞·伊格纳西奥·曼特孔——他在内战结束之后加入共产党——被任命为阿拉贡地区首席行政长官。“从第一天起我们相互之间就充分理解，”利斯特写道，“我们与他全力合作，帮助他完成他那艰巨的任务。”在第十一师的武装力量支持下，曼特孔下令解散集体农庄并且逮捕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积极分子。据全国劳工联合会阿拉贡地方组织的一份报告说，从右派支持者那里没收的土地、农具和牲畜被归还原主或他们的家人；集体农庄新建的马厩和鸡舍被拆除，在一些村庄，甚至夺走了集体农庄播种用的种子，与此同时，六百多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被逮捕。

革命初期——当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阿拉贡地区拥有不容争辩的权力——加入集体农庄的佃农和小地主充分利用了这次镇压。他们瓜分了土地以及收获的庄稼和农具，甚至在突击卫队和共产党军队的帮助下，将根据其成员的意愿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洗劫一空。形势变得如此严峻，以致共产党人后来承认他们采取了一项危险的政策，尽管避而不谈个人的责任。

为了扭转形势，共产党再次改变了它的政策，于是，一些被解散了的集体农庄得到恢复。“承认集体农庄的权利并且决定归还不公平地从它们那里拿走的东西，”担任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的共产党员何塞·席尔瓦写道，“加上阿拉贡地区首席行政长官在这种方针指导下所进行的种种努力，情况恢复了正常。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再次焕发了生产热情，他们为给放荒的土地播种付出了必要的辛勤劳动。”

经过阿拉贡地区的破坏集体农庄活动之后，在其他地方，面对以前的地主要求归还被没收的土地的尝试，共产党不得不转而支持集体农庄。发生这种转变不仅是因为它原来的政策对农村经济和前后方的士气造成了伤害，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共产党需要反佛朗哥阵营中的中小佃户和地主的支持，它也不能允许他们变得过于强大，以免他们与城市里的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在自由共和派和社会党温和派的领导下争取操控国家事务。为了使国内外政策符合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共产党人必须居高临下。只有精心地使棋盘上的棋子相互制约，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共产党本身固有的力量——尽管它现在非常强大，而且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微妙平衡，由于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它们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居中斡旋的人。因此，如果最初共产党人认为通过与中间阶层的民众结盟消灭极左派的力量至关重要，那么，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随后的一个阶段，防止中间阶层的实力过分加强从而威胁共产党的优势地位同样至关重要。

但是，共产党人企图以一个阶层制约另一个阶层的努力长时间无法取得成效，除非他们可以控制前线和后方的武装力量，除非他们能够把独立的革命民兵武装并入由服从他们意愿的参谋军官和政治委员所指挥的正规军。从革命初期开始，他们就认识到这种必要性。

本书由 “[ePUBw.COM](http://ePUBw.COM)” 整理，[ePUBw.COM](http://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 中册

### 第四部分 从革命的民兵武装到正规军

#### 第二十五章 革命的民兵武装

读者还会记得，内战爆发时由何塞·希拉尔组成的自由共和派政府接过了一个军官团，军事叛乱和社会革命破坏了军官团的凝聚力。

为了反击军事叛乱，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解除了士兵效忠服从军官的所有誓言约束。但是，阿萨尼亚总统写道，这项法令在军方控制的城市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它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卡塔赫纳、巴伦西亚以及其他挫败了叛乱的城市驻军中得到执行：

士兵们离开军营，几乎全都回家了。大批人员加入了义勇军，在临时指挥官的率领下，以有限的武器装备去前线作战。能够留在军营里的极少数部队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军事叛乱破坏了所有部队的纪律。职业军官受到怀疑，主要由工人组成的部队更愿意听从所属工会或者政党的指挥而不是部队指挥官的指挥。内战初期马德里的驻军有十三个团，组成四至六支步兵部队和一个工兵营防守锯齿山脊任务艰巨。

为了把守进入首都的各条道路，共和国政府将民众武装起来。几千支步枪发放出去。但是，在马德里和其他地方，民众袭击了军营并且夺走了那里的武器，尤其是在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在巴塞罗那，民众占领了所有军事驻地。已经供不应求的

战争物资不翼而飞。他们烧毁了兵役记录；烧毁了马鞍。在巴伦西亚，骑兵团的战马被卖给吉普赛人，每匹售价五个或十个比塞塔。一场可怕的战争爆发时，不明真相的民众捣毁了最后残存的军事机器，而形势的发展将迫切需要这部机器。这些行为以及另外一些同样可悲的行为应当归咎于以下原因：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叛乱的凶猛和形势的严峻。许多人认为这是可喜的事态发展值得欢迎。

由于政府缺乏与军事叛乱作战的必要兵力，在前线打仗的重担落在工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肩上。它们组织了民兵武装，指定或选举立场坚定、受人尊敬的工人担任指挥官。人们通常把民兵队伍称为“纵队”，它们完全由建立它们的组织所控制，在政党或者工会代表警惕的目光注视下，职业军官加入了这些民兵队伍或“纵队”，国防部分配给军官的权力非常小，甚至什么权力也不给。

“由于必不可少，[工人组织]当时不得不利用我们。”一名共和国军官抱怨说，“工人组织严格按照自己的需要，仅以最低限度使用忠于共和国政府的军官，而且还会威胁他们，因为据说他们同情法西斯分子。”

七月底，为了制衡革命的民兵武装，也是为了组织更多的部队上前线打仗，何塞·希拉尔的自由共和派政府决定征召两年制士兵入伍。这项措施得到的响应微乎其微，不仅因为许多人已经加入了民兵武装，而且因为政府缺乏实行征兵的强制手段。

此外，政府还在八月初颁布了一项建立“志愿部队”的法令，两周之后，政府迈出了更重要的一步，它颁布了一系列旨在组建一支“志愿军”的法令。志愿军从随时可以参加战斗的预备役军人中选拔，配备由退役军官和非现役军士组成的干部队伍，他们的忠诚已经得到加入人民阵线的某个党派的证明。

但是，由于“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更愿意加入工会和政党自行组织的民兵武装”，这

些措施的效果同样微不足道，阿萨尼亚总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正如一位职业军官所说，志愿军始终是在纸上谈兵。“至于那些已经加入民兵组织的人员，他们更愿意留在自己的队伍中与朋友和战友们在一起，并不愿意加入新的[志愿军]队伍。”此外，当政府总理何塞·希拉尔和国防部长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均为温和的阿萨尼亚的坚定支持者时，组建一支由政府控制的军队的计划不仅让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感到担忧，而且让劳动者总工会的社会党左派感到担忧，劳动者总工会书记拉尔戈·卡瓦列罗为此多次与何塞·希拉尔进行气氛紧张的会谈。在上述法令颁布两天之后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光明报》断言，这些措施既不能以民兵武装没有足够的兵力打仗为理由，也不能拿他们缺乏作战能力当借口；民兵的数量以及希望加入民兵队伍的人数几乎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至于他们的作战能力，“不能比他们更善战了，以致我们怀疑任何别的武装力量是否可能强于他们”。另外，《光明报》还断言，“尽管他们对共和国赤胆忠心”，但是，“没有人用同样的政治热情和斗争热情激励”那些尚未自愿加入其他部队的预备役军人，“正是这种热情促使人们加入民兵队伍”，而加入内战爆发之后组建的正规部队享受优厚待遇的权利——上述法令之一的有关条款确认了这种权利——并不会激发民兵的战斗热情。在驳斥了支持组建志愿军的军事理由之后，社论继续写道：

“如果必须重新建立一支军队的话，那么，它应当以目前正在作战的士兵为基础，而不只是由那些迄今为止还没有在这场战争中打过仗的人组成。它必须是一支符合革命要求的军队……未来的国家将不得不调整自己以适应革命。用另一种类型的军队取代现在的战士将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他们的革命行动，打算这样做是以反革命的思路考虑问题。这是列宁说过的话（《国家与革命》）：‘每一次革命在破坏了国家机器之后都让我们看到统治阶级如何试图重建听命于“它”的专用武装，也让我们

看到被压迫阶级如何努力创建一种能够为被剥削者而不是剥削者服务的新的同类型组织。’ ”

与社会党左派不同，共产党人毫无疑问地接受这支拟议组建的军队，实际上，他们还帮助希拉尔内阁贯彻实施它的法令。尽管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支持这个政府是为了使其作为一个民主的幌子继续执政以便影响西方世界，特别是，尽管促使他们支持这些军事法令的动机是，需要建立一支比民兵更有战斗力的集中指挥的军队，不过，共产党人还有一个更加微妙的动机；他们不仅将这些法令视为向建立一支组织完善的常备军队——他们希望通过有计划的巧妙渗透最终确立对这支军队的控制权——迈出的一步，而且他们还知道，只要各个工会和政党拥有它们自己的军队，只要这些军队不被合并成为一支由其控制关键位置的正规军，共产党就绝不可能成为反佛朗哥阵营的主宰者。

在努力缓和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对创建志愿军的疑虑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将他们支持这样做的政治动机精心地隐藏在作战能力这一简单有力的理由下面，而且，到这时为止，他们小心翼翼地避而不提将民兵并入政府所控制的军队的要求——不久之后这一要求在他们所宣布的方案中成为一项重要的内容。

他们的主要舆论工具《工人世界报》写道：

我们相信，在必须尽快创建一支具备现代战争所需要的一切技战术能力的军队这一问题上，属于人民阵线的所有政党和组织与我们的意见一致。毫无疑问，我军的基础是我们英勇的民兵。但是，渲染夸大它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并不足以解决问题。为了提高武装起来的民众的作战能力，我们必须考虑采取那些可以立竿见影的措施。……

可能由于法令没有充分说明，有些同志认为会在创建新的志愿军的过程中发现某种贬低民兵作用的情况。毋庸置疑，民兵武装应当享有给予志愿军的一切优厚待遇，而且我们毫不怀疑政府将立即说明这一点，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谁也不会想去创建一支与我们光荣的民兵武装背道而驰的军队。实际上，这项法令的目的是要补充和加强人民的军队，使它具有更强大的战斗力，从而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但是，随后颁布的一项使民兵像志愿军成员一样拥有享受优厚待遇的权力的法令并没有消除政府的计划在社会党左派人士心中引起的疑虑。任命曾在七月十九日组成短命的调解内阁、其政党共和联盟代表人民阵线联盟右翼的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领导负责组建这支军队的委员会反而加深了他们对于政府意图的怀疑。正是这种怀疑，加上快速推进的佛朗哥将军的军队——八月十四日占领巴达霍斯之后，叛军在二十天之内推进了二百三十多英里——对马德里造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迫使筋疲力尽地领导着一个只有名义上的权力并且失去大多数工人支持的政府的何塞·希拉尔提出，扩大政府的组成范围，把人民阵线的其他党派包括进去。

我们已经看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由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总理和国防部长的新政府于九月四日组成。

鉴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对整个军事化概念的反感，根本无法确定他是否将会进行共产党人所设想的那种完全彻底的军事整编。他的反感不仅在上面引述的《光明报》社论中表现出来，而且在随后接受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的采访时表现出来。八月二十七日，卡瓦列罗入主国防部的前一周，斯大林的这位非正式代表采访了他。科利佐夫在日记中写道：

拉尔戈·卡瓦列罗一身工人打扮，佩带着一把左轮手枪。风吹日晒使他的皮肤呈棕褐色，对于一个年近七十岁的人来说，他显得身体健壮而且精力充沛。阿尔瓦雷斯·德



尔巴约安排了采访并担任翻译。……没有任何形式的开场白，拉尔戈·卡瓦列罗声色俱厉地谴责了政府。……工人阶级的民兵武装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国防部，因为国防部征召形迹可疑的人入伍，使用反动的前君主派将军，使用显然是叛乱分子的职业军官。……对于为什么迟迟没有把民兵改编成为正规军以及这应归咎于谁这个问题，他没有给予明确回答，然后继续抨击政府。他认为最近颁布的奠定了志愿军的基础的法令是危险的。……[他]在这项法令中看到了对工人阶级战士的轻视以及给予职业军人的特权：“军队的等级制度正在死灰复燃！”

我试图使他认识到预备役军人对于军队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一个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里，不经过军事训练，几乎无法参加战斗。他预言，正规军将从人民手中夺走他们以高昂的代价取得的武器。

接着，我们就军队与民兵各自的优势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拉尔戈·卡瓦列罗从《国家与革命》中引用了列宁关于武装起来的人民的论述。我提醒他，正是列宁亲自创建了工农的军队，使其具有绝对超过各种民兵小队、纵队和支队的重要性。通过认真挑选，把低级军官中的精英与先进的革命工人融为一体，可以从中打造一支强大的反法西斯的人民军队。当军队与民兵或游击队以同等的地位并存时，迟早将会出现矛盾，这种矛盾随后将会演变为冲突，最终，军队由于水平更高总是取胜。那么，为什么要延长发生这种矛盾冲突的时间呢？必须尽快将所有反法西斯的武装力量合并成为一个单一的军事组织。

他没有再次直接表示反对，但他指责共产党人想要“调理一切事情，在各地安插领导人，给所有东西起名字、贴标签、定指标”。他把这归因于共产党领导人的年轻幼稚，归因于共产党的自信，这种自信不是建立在自己的经验和成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俄国共产党人的经验和成功的基础上。他说，共产党人正在通过帮助[希拉

尔]政府产生危害，他们正在造成灾难，正在加剧民众的不满。工人阶级政党必须清除公务员和官僚，捣毁现行的整个行政体系，采用新的革命性的领导方式。……

凭借执着的信念的力量，满腔愤怒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滔滔不绝地说出了这一切。难以理解这种姗姗来迟的激进主义、最高纲领主义如何占据了这个人的心灵，几十年来，他在工人运动内部为最温和的改良主义立场进行辩护，他与包括反动的普里莫·德里维拉君主主义独裁政权在内的极右翼资产阶级政府达成妥协甚至结盟。不过，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许多人确信，实际上，这位“老人”内心深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九三四年]阿斯图里亚斯的斗争和随后那个时期的[经历]使他修改了自己的政治路线。……

我们又聊了一个半小时。卡瓦列罗多次提到忠于共和派的将领、阿萨尼亚的私人朋友、所有那些萨拉维亚们[提到了国防部长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的无能和不足。后来，当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我单独在一起时，我们……进了一个小酒吧。他对这次采访和谈话非常满意。他相信，现在这位“老人”完全同意有必要建立一支正规的人民军队。“他没有坦率地对你这么说；这是他的习惯，但你应当理解；他会站出来表示支持这支军队。老人对苏联友好并且赞赏俄国革命的经验。”

但是，只有时间可以告诉新任国防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及其苏联顾问携手创建他们心目中那种类型的军队要走的路程有多远。

他以新的身份所面临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无疑是民兵组织的弱点；因为，尽管《光明报》宣称民兵的作战能力无以复加，这些弱点肯定是佛朗哥将军的军队逆塔古斯河谷而上向西班牙首都快速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的确，它们不是由于缺乏斗志造成的，因为在街头或者小型战役中与局部的敌军作战时，民兵显示出巨大的勇气。相反，产生这些弱点的原因是，缺乏训练和纪律涣散；无论思想还是行动，各支民兵

部队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统一；以及存在于不同党派之间的对立状态。

阿萨尼亚总统回忆说：

除了由同属一个工会的工人组成的部队之外，共和派、社会党、共产党、全国劳工联合会、劳动者总工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部队以及另外一些组织均组成了规模不等的民兵武装。没有任何计划性，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各支部队在民兵选出的指挥官的率领下，兴高采烈地奔赴前线。没有人服从军队的纪律。……[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领导下的]国防部试图整顿这种混乱局面。它正式承认了民兵部队，尽量向它们提供武器，在它们愿意接受时对其进行专业指挥，同时根据最迫切的需要分配给它们战略战术任务。这些任务是否得到执行取决于民兵战士的心情、下级军官的兴致或是政党组织的指示。国防部每天制订的兵力情况报告……暴露了这支军队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以及各支部队在人数和素质方面的不同构成。……至少，前线各防区的指挥官是国防部委派的职业军官。还有一些职业军官担任低级指挥官。……他们全都处境艰难。他们的权威并不总是受到尊重。他们必须说服部下服从命令，而且不得不小心翼翼，以免引起任何对其忠诚度的怀疑。如果士兵仓皇后撤，如果他们不服从命令或者执行命令不力，指挥官不能处罚他们。

民兵不信任职业军官、没有战斗经验、重型武器不足以及总体缺乏有效的军事指挥使敌军拥有了某种优势，这种优势的作用远远超过民兵在人数上的优势。例如，在安达卢西亚前线，受国防部委派担任蒙托罗防区民兵纵队指挥官的职业军官梅嫩德斯少校十月一日打电话向马德里报告说，敌军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攻占了雷亚尔堡。他说，民兵的士气低落。那里有两支民兵部队：“一支不服从任何人的命令。他们能说的只是，他们应当枪毙他们的军官。另一支部队倒是服从命令，但是却以最微不足道的借口逃走了。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些边防警察，这些五十多岁

的男人能够防止发生一场真正的灾难。至于武器，情况也非常糟糕，因为民兵纵队没有一门大炮，也没有一挺机关枪。……我必须再次告诉你们，没有办法让民兵服从命令。”

“几乎不用说的是，这些民兵犯了他们所能犯的一切错误。”一位左翼观察家写道，“他们高呼着革命万岁发动夜间袭击；经常把大炮与步兵部队布置在一条线上。有时真会发生荒唐的事情。有一天一个民兵告诉我，午饭后，部队全体去邻近的一个农场吃葡萄；当他们回来时，阵地被敌军占领了。”关于加泰罗尼亚民兵部队在阿拉贡地区对被包围的韦斯卡城发动的进攻，支持佛朗哥将军的曼努埃尔·阿斯纳尔写道：“最初，加泰罗尼亚军队的进攻——这些进攻几乎全都是由无政府主义民兵武装实施的——完全缺乏组织协调并且背离战术原则，以致它们的行动更像乌合之众的随心所欲而不是真正的军事行动。结果，民族主义军队司令部赢得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它调集增援部队，发现自身的弱点，集中战争物资，为从灵活防御过渡到坚守城池做准备。另外，从炮火的密度、机关枪的部署、攻击的准备、部队恶劣的组织状况、低级指挥官的优柔寡断，从进攻的软弱无力可以看出，围城的军队缺乏战争最需要的心理素质 and 战术素养。”

同样是在阿拉贡前线，据内战初期指挥马西亚—孔帕尼斯纵队的忠于共和派的职业军官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说，不可能进行涉及不同部队的联合作战行动。

每当参谋部决定开展这种行动时，……它就不得不把[民兵]指挥官召集到指挥部里来，向他们讲解行动的基本目标以及每支部队在行动中所起的作用。随即，一场争论开始进行，民兵指挥官在争论中表示赞成或者反对，他们经常以否决的方式强行修改原来的计划。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大家总是能够就一项行动计划达成一致，不过，那是一项缩小了规模的行动，行动范围也小得多。即便如此，它也从来没有

得到执行，因为，当采取行动的时刻来临时，总会有人按兵不动，打乱各部队之间的协调配合——而协调配合是行动成功的关键所在。

这种情况应当归因于以下事实：即使是在每支部队的内部，命令也没有得到过严格执行，另外，由于前线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力量，所以，袖手旁观别人的失败使它们感到某种满足。组织了大量民兵武装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一心希望它的政治对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被打败。反过来，这些党派同样讨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人。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位著名成员写道：“宗派主义、观点分歧和传播政治信仰的热情不仅导致民兵部队彼此漠视对方的存在，忘记了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而且多次导致真正危险的情况出现在它们中间。”

“党派的自豪感似乎比共同保卫共和国的责任感更强。”经常与从马德里前线归来的民兵接触的社会党人作家阿图罗·巴雷亚证实，“无政府主义民兵向共产党人炫耀他们的胜利；共产党部队的胜利让其他人暗中感到失望。一支部队的失败变成了对其所属政治派别的嘲讽。这增强了各支部队的斗志，但也同时产生了互相怨恨的温床，它危害到整体的军事行动，使统一指挥无法实现。”

不过，共和派军官阿韦里少校对内战最初几个月普遍出现在大多数前线的情况作了最为引人注目的全面描述，当时他从巴塞罗那奉命前往阿拉贡地区，协助整顿前线的部队，他的描述被认为具有代表性：

快到萨里涅纳[民兵部队的指挥部]时，我遇见停在公路另一边的一辆卡车，接着，在一群士兵的要求下，我停了车。他们的卡车抛锚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它出了什么故障。……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我奇怪地问他们。

“去巴塞罗那，去那里过星期天。”

“可你们不是应当在前线吗？”

“当然，不过因为无事可做，我们要去巴塞罗那。”

“你们请假了吗？”

“没有，你难道看不出来我们是民兵？”

他们不理解我的问题，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在不打仗的时候离开前线天经地义。他们毫无纪律的概念，而且显然没有人就这个问题花费精力训导他们。在前线度过四十个小时的工作周之后，他们感到厌倦了，于是他们离开那里。

一到[萨里涅纳]我就去向[阿拉贡]前线指挥官[他是一位职业军官]报到，并且把我的任务告诉了他。我对他讲了我设想的计划，讲了我认为必须做的一些事情。他同情地看着我，然后答道：

“我们应当小心。我们应当注意。情况并不像通常那样，因此，你必须非常巧妙地与这帮家伙打交道。至少，马上我就要与[民兵]部队的头头开会，你将有机会亲自作出判断。开会之前，留下来和我一起吃午饭。……”吃饭时我们进行了详谈，他对我讲了他的悲惨处境；他没有权威，无法让任何人服从他的命令。民兵纵队的那些头头半神半人，既不接受命令，也不接受意见和建议。

“你会亲眼看到的！战争不能这样进行。我没有补给；战争物资由党派和工会来分配；武器不是送往最需要的地方，而是送到[组织]决定送往的地方。……”

一些民兵部队的头头到了。……他们大多数从来没有当过兵。一些头头由职业军官陪同，后者被人称为专家，但是不幸没有权力。他们扮演着某种辅助的角色，因此，他们的意见没有意义。同样没有意义的还有我们这些军官不得不忍受的屈辱，尽管实际上我们忠于自己的誓言并且承担着一切风险。没有人信任我们：随便是个什么人就认为他有权暗中监视我们或是对我们的建议置之不理。……

阿拉贡前线指挥官建议对韦斯卡发动一场决定性攻势。一切情况均表明，这座阿拉贡地区的历史古城几乎没有任何防御，因此，通过协同作战巧妙进攻，它将落入共和派之手。……与会者听他介绍了行动方案，对其进行了详细讨论，然而不幸的是，他们最后决定，在同意采取行动之前，要与各自的工会组织商量。在讨论将要结束时，出现了非常令人遗憾的情况，因为指挥官要求一些部队应当将其多余的物资交给需要它们的另一些部队的建议立即遭到了拒绝。也就是说，前线指挥官完全没有权力决定人员和武器的部署调配。

我之所以说明这些情况，尽管只是简要地说明，那是因为它们准确地反映了民兵武装的尴尬处境，由于可悲的无纪律状况和严重缺乏装备，为了对抗正规军，他们必须创造英雄主义的奇迹。……如果拥有出色的指挥官，拥有足够的战争物资和军事纪律，他们什么事情不能做到？在视察了前线不同的部队之后，我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没有防御工事。坚守阵地全凭勇气，只是因为没有人去想方设法鼓舞士气，所以，当敌军连续反攻时，民兵的勇气不复存在。战争物资的利用同样不合理。我曾经去过一个阵地，那里有几门十点五口径的大炮却没有炮弹。邻近的部队有炮弹，但是拒绝给他们，尽管后者自己并没有大炮。……

连成一体的战壕也是这种情况。考虑到毗邻的部队隶属于不同的政治组织，一些阵地建起了胸墙。当政治对手遭到敌军的打击时，存在着某种幸灾乐祸的情绪。……

在韦斯卡前线执行任务期间，我不得不在非常靠近敌军前沿阵地的地方过了一夜。我觉得累了，便躺下睡觉，可是，刚一盖上毛毯我就听到有人在大声唱歌。我爬起身来，看见一个哨兵正扯着嗓子高唱一首霍塔歌谣。

“听着，”我说，“你不知道哨兵应当保持安静吗？”

“谁他妈在乎？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不，老兄！现在应当也是一样。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他们可以从对面确定你的位置，然后让你吃一颗子弹？”

“禽！我们已经说好不向对方开枪了。而且，如果我不唱歌，那我就会睡着。”

听到这种理由，我缩回我的临时“床铺”——草地上的一条毛毯——准备在这个乡巴佬哨兵唱完他的歌谣之后睡觉。但是，他刚一停止唱歌我又听到他大声说话，好像是和远处的某个人进行辩论。我再次从我的栖身处起来，然后惊奇地——后来我不再感到惊奇——发现，我们的哨兵正在与法西斯军队前沿阵地那边的哨兵交谈，后者问他晚饭吃的什么东西。我们的哨兵夸张地给他列出了一份庞大固埃式的菜单——卢库留斯在他的餐桌上享用的盛宴。

“那是你们吃的东西！”对方的哨兵反唇相讥，“你们只有土豆吃，能吃上土豆你们就得谢天谢地了！”

“你是说你们吃的都是土豆吧，往后，你们的情况还会变得更加糟糕。我们这里有我们想要的一切。过来，你立马就能看到。”

对方的哨兵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邀请敌兵的某个家人——他以不太文明的语言[你的婊子老娘]形容了这个家人——到他这边来，然后他说道：“闭嘴吧，你这饥饿的老



鼠！”

“饥饿的老鼠！”我方哨兵惊叫道，“刚才是想让你知道，我们这里的食物多得吃不了，这儿有一根给你的香肠。”

接着，他干脆把一颗手榴弹从胸墙上方扔了过去。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几秒钟之内，整个前线全面开火。手榴弹、来复枪和机关枪将它们的美妙交响乐足足演奏了一刻钟。

随即陷入了一片寂静，不过是在愚蠢地消耗了几千个弹药筒之后。

除了前面提到的所有问题之外，民兵武装体系还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例如，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总参谋部。先后在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和拉尔戈·卡瓦列罗手下任职的国防部官员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写道：“当然，没有总参谋部，不过，接收所有电报和[电台]信息的情报局部分行使它的职能。……直到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国防部长……之后，才建立了总参谋部的大部分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领导下的国防部不得不依靠工会组织为它提供大量情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在劳动者总工会的马德里办事处建立了一个常设的情报部门，它一度曾是国防部最有效的消息来源。从该机构安插了代理人的每一个省份、每一个村庄，最不易察觉的叛军行动立即被人通过电话报告了总部。”

另外，没有中央军事机构，该机构可以通过全面审视前线的局势、制订统一的行动计划、决定现有兵力、弹药、武器和机动车辆的资源配置，在最有可能获胜的战线上取得最佳战果。在独立自主、各行其是的内战初期，也不可能指望出现这种统一指挥。“我们都记得自己是如何开始打仗的。”一名共和派的支持者写道，“一帮朋友集合起来，跳上他们自己的或是没收来的卡车和汽车，有人拿着来复枪，有人

拿着左轮手枪和弹药筒，开车上路寻找法西斯分子。当我们到达某个地方遇到了抵抗，我们便投入战斗，弹药打光以后，我们一般不是撤退到防御阵地……而是退回出发地。”

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国防部在运输领域难以行使任何职权，因此，它不得不依靠一个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代表所控制的道路运输全国委员会。不仅该委员会不大理会国防部的要求，就连它自己的命令通常也被那些拥有运输工具的民兵组织、革命委员会、工会分会和党派地方总部当做耳旁风，这些团体可以自行使用运输工具而不考虑全局的需要。

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每个党派和工会都有自己的军事指挥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指挥部只关心自己手下民兵的需要，而对同一个防区或者相邻防区其他部队的需要或军事计划，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根本不予考虑，尤其是对距离较远的阵地。此外，一支部队的补给经常被另一支部队偷走。曾经担任共产党民兵第五团指挥官的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战后承认，该团经常盗窃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运输工具以弥补自己的车辆不足。

在内战最初的几个月，佛朗哥将军军队的战斗力主要依赖于具有严明纪律、严格训练和专业骨干队伍的摩尔军团和外籍军团以及它所拥有的新式飞机，内战伊始，这些飞机就从意大利和德国到达西班牙。与此同时，共和派的民兵部队几乎毫无例外地没有可以信赖的参谋人员指挥它们投入战斗；它们通常对组织作战、连队配合一窍不通，不知道如何利用掩护和伪装，也不知道如何挖掘堑壕阵地；它们服从的不是中央军事当局的命令；它们几乎或者根本没有纪律；在十一月初敌军兵临马德里城下之前，也没有新式飞机保护它们。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具有人数上的优势，它们不仅在内战初期无法发动持续的进攻以致对许多城镇月复一月地围攻无果，而且

经常在敌军的攻击下溃不成军。“这场战争的一个现象是，”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加西亚·奥利韦尔指出，“当法西斯分子占据的城镇受到进攻时，他们可以长期坚守，而[当我军受到攻击时]我们根本无力抵抗。他们包围了一座小城，两三天后小城就被攻克了；而当我们包围一个城镇时，我们要在那里度过一生。”

## 第二十六章 纪律与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

在民兵武装存在的种种问题中——这些问题导致内战初期佛朗哥将军的军队在前线取得节节胜利，引起激烈争论或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莫过于缺乏纪律性。尽管这个问题困扰着所有民兵队伍，无论它们的意识形态如何，但是，只有在自由主义运动组织的民兵队伍中，解决这个问题遇到了哲学障碍，因为个人自由恰恰是无政府主义的精髓，没有什么事情像臣服于权力那样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完全背道而驰。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刊物《白色评论》在内战之前出版的一期中宣称：“纪律是对权力的顺从；无政府主义不承认权力。”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武装反映了平等、个人自由以及不受强制性纪律约束这些构成无政府主义信条的理想。没有军官等级制度，不用敬礼，不进行兵营式管理。发表在《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上的一篇文章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绝不可能成为身穿镶缀着饰带的制服、有节奏地摆臂抬腿、昂首挺胸正步走过马德里大街的循规蹈矩的民兵。”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宣称：“当一个同志进入全国劳工联合会兵营时，他必须明白，‘兵营’一词并不意味着屈从于包括敬礼、列队以及其他各种繁文缛节在内的可憎的军规，那些军规华而不实，是对所有革命理想的彻底否定。”如果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部队在内战初期没有纪律，那么，它们也没有军衔和肩章，食物、服装和住处均无差别，而且几乎没有职业军人——民

兵武装只接受了寥寥可数的职业军人担任顾问。无政府主义民兵武装的基本单位是小组，通常由十个人组成；每个小组选出一名代表，他的作用有点像最低一级的军士，但是没有相应的权力。这些民兵小组组成百人队，百人队选出自己的代表；若干个百人队组成一个纵队（columna），纵队上面设一个作战委员会。该委员会同样由选举产生，并且根据纵队的需要分成许多部门。选出小组和百人队的代表以及作战委员会的设立并不意味着任何人享有永久的特权，因为只要不能反映推选代表的那些人的意愿，代表立即就会被撤换。“人们得到的第一印象是，”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篇报道写道，“根本不存在等级制度。……没有人通过权力发号施令。”但是，必须有人执行任务，因此，采取了诸如此类避免出现摩擦的方式。例如，在无政府主义民兵的钢铁纵队，民兵通过抽签决定谁夜间站岗，谁凌晨放哨。

屈指可数的职业军人被任命为自由派民兵部队有名无实的指挥官，缺乏纪律和逐级指挥让他们感到非常震惊。有一次，率领部队攻打马略卡岛的阿尔韦托·巴约上尉就部队缺乏纪律观念向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所领导的巴塞罗那作战委员会表示不满，他说，引进一套与指挥责任相应的等级制度至关重要。他坚持认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铁腕治军势在必行，因此，他要求委员会准许他枪毙第一个不服从命令的人。

“那么，你打算枪毙谁？”加西亚·奥利韦尔问我。

“第一个不遵守纪律的人，”我回答道，“第一个在士兵当中破坏纪律而且不服从命令的人，把自己等同于平民、窃贼、罪犯的人。”

“你应当立即放弃这些想法。”他打断我的话说，“这是一些旧社会的思想。在我们的制度下，不能枪毙不幸的同志。可以对他教育纠正，但不能剥夺他的生命。……”

你应当尽快打消这些罪恶的念头，因为，如果你犯下这种罪行，你的人头将随后落地。”

“绝对有必要树立一个典型。如果指挥官没有强迫部下服从的权力，那么，谁也指挥不了他们，因为，当成千上万的人马溃不成军时，夸夸其谈的演说讲话不起作用。”……

“忘掉这些强制性的惩罚措施吧！如果一个同志犯了错误，应当怀着爱心纠正他，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绝不应剥夺他的生命。工人已经进入了一个革命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是贵族和主人而不是奴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待他们了，你们这些军官最好认识到这一点！”

然而，这种反权威主义思想体系具有非常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在战场上，因此，很快出现了遵守纪律的普遍要求。“我们曾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我们不相信修道院或者营房的清规戒律，”《工人团结报》宣称，“但是，在大批人员参与的战斗中，明确一致的看法和完美配合的行动必不可少。”

“最近几天，我们目睹了一些令人伤心的事情，这使我们产生了某种悲观情绪。我们的同志自由行动，在许多情况下无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指挥]委员会发出的集结信号。”

“革命将脱离我们的控制；如果我们不下决心赋予‘纪律’一词真正的含义，我们将因缺乏协作而遭到屠杀。”

遵守纪律意味着，对于受命负责具体任务的同志所做出的决定，不管是行政的还是军事的，我们应当贯彻执行，不能以自由的名义设置障碍，在许多情况下，自由蜕变成了为所欲为。”

内战期间在西班牙活动的法国著名无政府主义作家加斯东·勒瓦尔断言，试图按照无政府主义观念进行战争不合时宜，因为“战争和无政府主义是人类生活势如水火的两种状态：一种是破坏与杀戮，另一种是创造与和睦；一种意味着暴力的胜利，另一种意味着仁爱的胜利”。在后方，他说，许多同志最初根本不遵守纪律，后来却心甘情愿地约束自己，但是，“即使自我约束在某个具体的纵队产生了有效的集体纪律，也不能由此得出危险的一般性结论，因为这不是大多数民兵部队的普遍情况，所以，为了防止灾难发生，来自外部的强制性纪律至关重要”。

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是最受人尊敬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在无政府主义的原则问题上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九三六年七月，他组织了第一支民兵纵队从巴塞罗那开赴阿拉贡地区，希望攻占萨拉戈萨；当年十一月率领部队驰援受到威胁的首都之后不久，他战死在马德里前线。下面这一段关于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的轶事刊登在一份无政府工团主义流亡者的刊物上：当他还在阿拉贡地区时，一个青年民兵小组为了返回巴塞罗那惊慌地离开了前线。得知他们的意图之后，杜鲁蒂急忙赶去截住了他们。“他跳出汽车，挥舞着左轮手枪吓唬他们，然后让他们面壁而立。这时，一个当地的民兵来到现场要求他发给一双鞋，他反应敏捷地回答道，‘看看这些家伙们穿的鞋吧；如果它们合适的话，你可以拿走你喜欢的一双。没有必要让这些鞋在泥土里烂掉！’杜鲁蒂绝不打算枪毙这些年轻人，因为他总是说：‘这里没有人迫不得已。害怕留在前线的人可以返回后方去。’但他具有非比寻常的说服力，以致他们全都要求重返前线。在前线，他们以前所未有的英雄气概投入战斗。”

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对于纪律的普遍要求理由充分，但是，保证人们接受某种削弱无政府主义原则基础的思想并非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因此，有时需要的不是一点点灵活性。一位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在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的机关

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如果这场战争的时间正在被拖得越来越长的话，那么，这不仅是因为叛军得到了法西斯国家的物质援助，而且是因为我们的民兵缺乏协作、纪律和服从。一些同志将会提出不同意见，‘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不可能接受任何人的指挥。’我们应当回答他们，我们也不可能同意宣战，但是，我们大家已经同意向法西斯主义宣战，因为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如果我们接受战争，我们同样必须接受纪律和管理，因为如果没有它们，不可能赢得任何战争。”接着，他批评了某位代表在不久前召开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声明的大意是，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是而且应当继续是纪律的敌人。他说：“塔拉戈纳这位代表的出发点建立在一个原则性的错误上。我们无政府主义者鼓励人们不遵守纪律针对的是资产阶级的制度和政权，不是针对我们自己的运动，也不是针对我们自己的事业和利益。在事关我们反法西斯运动整体利益的问题上，缺乏纪律性是诚心让我们自己失败并灭亡。”

在一些风平浪静的前线，必须遵守纪律的观念迟迟无法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部队中深入人心。但是，在形势多变的中部前线——佛朗哥将军出色的军事部署在那里惊人地显示出它的优势——传统的无政府主义原则迅速失去了作用，以致到了十月初，由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武装所控制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已经可以实施包括下列条款的规章制度了：“所有民兵均应遵守营部以及百人队和小组代表所颁布的规章制度。

“不得擅自采取作战行动并应毫无异议地接受指派的岗位和职责，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后方。

“任何不遵守营部以及百人队和小组代表所颁布的规章制度的民兵，如过错轻微，将由所在小组给予处罚，如过错严重，将由营部给予处罚。”

“所有民兵必须懂得，尽管他自愿加入了民兵队伍，但是，作为一名革命战士，现在他是民兵队伍的组成部分，因此，他的责任是服从并且执行命令。”

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武装的著名指挥官里卡多·桑斯多年以后写道：“民兵们终于认识到，战争就是一所学校，每天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结果，在不把严酷的纪律强加于战士——他们都是可以不受指责地放弃阵地的志愿者——的情况下，事情发生了变化。”

尽管许多自由主义者认同纪律是“救赎理想获胜所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这一观念，但是，另一些人则认为，自由主义运动接受权力的概念对于无政府主义原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对于未来的革命进程是一种真正的威胁，因此，他们无法掩饰自己的忧虑。无政府主义青年运动的一个宣传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我们知道目前的情况迫使我们不得不暂时忘记我们最为珍视的某些原则……但这并非让我们忘记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信条是反对专制，因此，如果我们与已经裹挟了一些同志的专制主义浪潮同流合污的话，无政府主义思想将荡然无存。请让我们记住，当另外几场革命运动被所有革命运动都会滋生的专制主义弊病扭曲时，它们在如火如荼的阶段半途而废并导致灾难。……不，同志们，为了激励我们大家的那些理想，为了革命，无政府主义青年运动恳求你们不要重蹈这一覆辙。专制主义的病菌将会产生敌对情绪，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当中的敌对情绪是革命最可怕的敌人。”

## 第二十七章 第五团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来说，尤其是对于向其成员灌输领导和管理原则的共产党



来说，军纪问题并没有引起自我检讨。这不是说共产党的民兵队伍中不存在不守纪律的情况；相反，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情况不同，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共产党人没有良心上的不安需要克服，没有道德准则需要放弃。当共产党的机关报《工人世界报》声称每一个民兵都应当习惯他属于一支军队这一概念时，内战仅仅进行了几天。“纪律、等级和组织，”它要求，“每个人必须服从他的小组，每个小组必须服从其直接的上级，以此类推。我们的胜利将以这种方式得到保证。”共产党人认为军事纪律和组织是战争的主要问题。他们立即授予其民兵部队指挥官以强制执行纪律的充分权力，他们还通过他们的民兵第五团着手训练军事骨干，组成了配备专职参谋人员和专业部门的部队。

第五团是他们卓越的军事成就，显然也是内战中最著名的部队。它异乎寻常地迅速壮大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共产党在内战爆发之前已经建立了一个叫作反法西斯工农民兵（MAOC）的准军事组织，尽管人数不多，该组织仍然成为新组建的第五团的基石。据后来成为最受公众关注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的反法西斯工农民兵全国领导人胡安·莫德斯托说，反法西斯工农民兵是一个“群众自卫”组织，它是“那些以逐步把共和国变成一个法西斯政权为目的的反动派所挑起的斗争加剧”的结果。莫德斯托声称，反法西斯工农民兵的任务是保卫工人和他们的组织、他们的报刊、他们的地方工会、他们的集会和示威。他还说，马德里的军事暴动失败后，共产党立即命令他“将全体民兵集结在……古老的慈幼会修道院，在那里，夸特罗·卡米诺地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民兵已经自动建立起来”。就在这座修道院，第五团诞生了。

像莫德斯托一样在莫斯科接受军事训练的恩里克·利斯特一九三六年九月成为第五团团团长，他写道：“最常被人问到的问题是，这个团为什么叫第五团而不叫第一、第四或第六团。……七月十七日[西属摩洛哥爆发军事叛乱当天]……我们开始以反法西斯工农民兵为基础组成五个志愿者营。第五营是在夸特罗·卡米诺中心区招兵组建

的。……七月二十日，在参加了攻打蒙塔尼亚兵营的行动之后，第五营决定占用慈幼会修道院……并且改编为人民民兵第五团。”

在西班牙化名卡洛斯·孔特雷拉斯、人称“指挥官”卡洛斯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维托里奥·维达利是第五团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并且担任该团的第一政委。伦敦《工人日报》记者克劳德·科伯恩（化名弗兰克·皮特凯恩）把他描绘成一个“脖子短粗的壮汉，兼具近乎超人的充沛能量和不可泯灭的乐观精神”。第五团的首任团长恩里克·卡斯特罗说他是一个借助头部和手势的“逆反型的演说家”，风格有点像墨索里尼，而身为共产党员的职业军官安东尼奥·科登则说他是“革命动力的化身”。他肯定体现了所有这些特点，但是，在他的乐观和情趣背后，潜藏着共产主义运动最阴险毒辣的人物之一，我可以亲自证明这一点。与维达利非常熟悉的社会党左派人士、阿尔瓦塞特省省长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作了下面这一段简洁的描述：“作为活动家和鼓动者在莫斯科[受训]之后，[他被]共产国际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派往拉丁美洲……协助[化名梅迪纳的]柯多维拉。……[他]集间谍、煽动者和匪徒于一身，对于任何被他认为妨碍了莫斯科政策的人，心狠手辣，毫不留情。……一九三四年底，他与柯多维拉一起来到西班牙。他公开的任务是协助红色救援国际。……从[内战的]第一天起，他就投身于剧烈的社会动乱中。他熟悉街道，在不受约束的狂热民众中如鱼得水。……他组织并且训练了第一批巡逻队和行刑队，他建立了当地的兵营，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方法组织行动‘清理’那些他称之为法西斯分子的人。”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妓女、皮条客、普通罪犯——“卡洛斯了如指掌的马德里地下社会的所有地痞流氓”——都被他“为党的利益”加以利用。

一九三七年，维达利向《莫斯科每日新闻》副主编安娜·路易莎·斯特朗讲述了第五团的组建情况：

我们必须立即创建一支军队和参谋部，因为大部分武装力量参与了叛乱。我们最初只是一些聚集起来的同志，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许多人甚至不会使用步枪。……我们只有满怀热情、立场坚定的民众，他们利用任何可以找到的武器，追随任何挺身而出的领导人，奔向任何他们听说必须从敌军手中夺取的前沿阵地。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利用任何随便懂点什么的人，让他来做军官。有时看看面相就足够了，看到聪明坚定的目光之后就对那个人说：“你当队长，由你组织和指挥这些人。”

两天后，我们占用了慈幼会修道院——我们总共六百人，其中两百名共产党员。我们决定组成队伍，国防部门说：“你们将是第五营；我们已经收到了另外四个营的申请。”

“不，”我们说，“我们应当是第五团，因为我们至少将达到一千人。”

好啦，前面那四个营仍然是在纸上谈兵，而第五营不到十天已经有了六千人。当时[希拉尔]政府给我们写信都是说“第五营的同志们”，我们则以“我们第五团”的名义回信。在我们达到六千人之后，他们承认我们是一个团。……

我们决心创建一支特殊的部队，它应当树立一个纪律的榜样。我们称之为“铁军”。……我们为这个团制定了一些特殊的口号，以建立一支铁打的部队，“决不让受伤或者阵亡的战友落到敌人手中”是其中之一。另一句口号是，“如果我的战友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前进或者后退，我有权利打死他。”

马德里觉得这非常可笑。西班牙人都是个人主义者，因此他们说，谁也不会接受这种纪律。当我们的第一支几乎全部由共产党员和金属制造工人组成的铁军列队走过这座城市时，它引起了一阵轰动。在那以后，除了我们正规的民兵第五团正常的征

兵之外，我们通过挑选战士建立了二十八个这样的铁军。

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第五团民兵的誓言是他们的道德准则”：

我，一个人民的儿子和西班牙共和国的公民，作为人民军队的一个民兵自愿接受我的任务。

我向西班牙人民和共和国政府保证……用我的生命捍卫民主自由，捍卫进步与和平的事业，为民兵的称号争光。

我保证通过严格执行指挥官的命令维护并且协助维护纪律。

我保证尽一切努力戒绝不道德的行为并且阻止战友采取这种行为，以使自己始终正确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民主共和国的崇高理想上。

我保证随时响应政府的召唤帮助捍卫西班牙民主共和国。……如果我没有履行这一庄重的誓言，那就让我的战友羞辱我并且让我受到法律的无情惩罚。

第五团成功地征召了大量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共和派人士以及无党派的工人和农民，以致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它发展到了最高峰。它宣称，当时它有六万名士兵在不同的前线作战。尽管恩里克·利斯特在内战期间声称第五团由十三万人组成，但他在内战结束多年以后出版的书中列出了更切实的数字：六万九千六百人。另一方面，支持右派的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在他那部四卷本的人民军史著作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最全面的研究，他声称，第五团的征兵总数，包括由它征召并在阿尔瓦塞特、阿利坎特、阿尔梅里亚、瓜迪克斯和马德里的训练中心训练的部队，绝不超过三万人。他坚持认为：“为了达到共产党所宣称的六万人这个数字，必须包括第五团中的国际纵队，它们最初使用第五团指挥部的印章。”

据恩里克·卡斯特罗说，第五团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培训中心”。它在政治和精神以及经济和家庭等各个方面对自愿参军者的生活进行指导，从这个中心走出了许多具有统一方法和组织的部队。“它们是一套部件的组成部分，”国际纵队第十五旅副政委拉尔夫·贝茨写道，“时机一到就能重新组成一支军队。它们的军官等级分明，他们的命令以志愿者参军时所接受的纪律规范为后盾。同时，政治委员监控并且培养战士们的政治热情。”

第五团的宝贵财富之一是职业军人的合作，不仅是那些战前已经加入共产党的职业军人——例如第五团的指挥官之一路易斯·巴尔塞洛中校，他是民兵武装监察长，民兵部队无论需要从国防部得到武器还是资金，都得向他提出申请——的合作，而且还有其他职业军官的合作，尽管后者远未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共产党的温和的宣传、良好的纪律和出色的组织使他们产生了好感，同时还因为，似乎只有共产党有能力建立一支可以赢得这场战争的军队。

在普遍的战时气氛中，共产党的纪律性无疑是它的重要财富之一：

“共产党因为树立了遵守纪律的榜样而必然受到人们的信任。”一名并非共产党人的职业军官写道，“这样做不仅极大提高了它的威望，而且大量增加了它的人数。无数希望为国参军打仗的人加入了共产党。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当我偶然遇见某个即将奔赴前线的人时，我问他：

“‘可是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你过去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你是吗？你一直是一个共和派。’

“‘我加入共产党是因为他们纪律严明而且能够比其他人更出色地完成任务。’被问的人回答说。”

共产党的纪律性、职业军官的追随以及具有军事经验的外国共产党人——他们在帮助组建国际纵队之前均时间不等地加入过第五团——的合作肯定是一种优势。最重要的是，第五团在苏联武器的分配上比其他部队受到的优待。关于九月开始陆续运到的轻型武器，拉尔戈·卡瓦列罗任国防部长期间的国防部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写道：“我注意到，这些武器并没有平等地进行分配，而是对那些组成所谓第五团的部队给予某种明显的优待。”恩里克·利斯特在将第五团解散然后编入正规军的一九三七年一月吹嘘说，第五团有数千挺机关枪和数百门大炮。尽管根据利斯特本人三十年后所估计的少得不可同日而语的机关枪数量来判断，出于战时宣传的目的，这些数字肯定被夸大了，但是，实际情况仍然如拉尔夫·贝茨所说，第五团的部队得到了“精良的武器”。由于这种优待，由于向第五团的许多人提供的在苏联接受坦克手训练的机会，加上共产党的纪律和效率的吸引力，第五团可以从非共产党人兵源里大量招兵买马。

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的大批涌入似乎证实了共产党人的论点，即，第五团不是一支共产党的军队，而是一支属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阵线的武装力量。“我们组建第五团不是为了拥有一支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说，“共产党不需要自己的军队。党想要的是一支强大而且非常强大的军队，一支能够赢得战争进而能够巩固胜利的独一无二的军队，一支保护工农利益、保护所有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利益的人民军队。”

不过，正如共产党的《国际新闻通讯》所表明的那样：“从一开始，第五团就被共产党召至旗下并在政治上受其影响。”的确，它处在共产党严格而全面的控制之下，另外，在内战初期的六个月，它实际上是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很快，它将成为新的国家正规军人民军的基础——热情之花本人在战后承认，人民军被“计划用来在确定西班牙未来的政治结构时发挥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热情之花坦率承认的这一点增加了恩里克·卡斯特罗的证言的可信度。在脱离共产党之后，卡斯特罗公布了下面的一段话，这是从他担任第五团团团长时对该团的党内同志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摘录的。“同志们，”他说，“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一场战争，我相信，这将是一场极其漫长的战争。只有赢得这场战争，我们才能取得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在一个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至关重要的地区建立又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志们，你们大家都知道，需要有一支军队来进行战争。……我们准备成为这支军队的组织者。……这支军队将是我们的军队——注意听好——我们的军队。但是，只有我们知道这一点。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支军队将是一支人民阵线的军队。我们将指挥这支军队，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让其他人看着好像是人民阵线的战士。明白了吗？”

这篇讲话的直言不讳其实根本不足为奇，因为难以想象一名富有经验的共产党员竟会认识不到人民阵线联盟只是一种暂时的合作，其目的在于促进实现共产国际和党的目标，因此，“一支人民阵线的军队”将是影响现在与未来的革命进程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 第二十八章 人民军

尽管第五团作为武装力量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对共产党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共产党人不久后建议应当将各自独立的党派和工会民兵武装合并成为一支由政府控制的军队，却有充分的政治和军事理由。他们知道，在缺乏能够决定所有作战部队的部署和行动的统一指挥——既没有一支有组织的军队，也没有任何战略计划——的情况下，战争不可能走向胜利。他们还知道，只要各个党派和工会仍然拥有其领导人控制的民兵武装，只要这些民兵武装没有合并成为一支用纪律和权力的力量巩固加强的正规军队——一支他们打算控制其指挥权的军队，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反佛朗哥

阵营的支配力量，无法在民主制度的掩护下决定内政外交政策。

人们应当记得，在希拉尔内阁执政期间，共产党人没有要求将民兵武装合并成为一支由政府控制的军队，因为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怀疑希拉尔内阁的目的，然而，一旦拉尔戈·卡瓦列罗本人上台并掌管国防部，他们就可以旗帜鲜明地这样做了。两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和苏联军事顾问充分利用中部前线的一系列败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九月二十七日距首都仅五十一英里的托莱多的陷落——坚决地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实际上，正是他们的极力主张促使颁布了民兵军事化和创建一支军队的法令，这支军队叫人民军，建立在征兵的基础上，最高长官是国防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长期反对建立一支正规军的想法，因此，”路易斯·费希尔写道，“唯一的难题是他的苏联军事顾问需要劝说他放弃普遍存在但缺乏战斗力的党派军队这种形式。”费希尔与苏联在西班牙的大部分重要人士的私人关系使他的说法具有特殊的权威性。

恩里克·卡斯特罗——人们应当记得，他是第五团的首任团长——证明：“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乌里韦和埃尔南德斯、西共政治局、苏联军事和外交顾问步步紧逼拉尔戈·卡瓦列罗。‘我们必须建立人民军！’ ‘我们必须建立人民军！’ 在共产党支持这个口号的同时，第五团准备……把它的部队改编成为人民军[的旅]，在新的部队中保留它的指挥官和政委及其政治支配权。不过，对于这些在整个战争期间极其隐秘、极其微妙的活动，只有共产党人心知肚明。但也不是所有党员，只是党的骨干分子。”

然而，正如事态发展所显示的那样，从拉尔戈·卡瓦列罗批准这些军事法令到把它们完全落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共产党人在营房中、在战壕里、在公开发表的长篇大论中、在内阁里，坚持不懈地敦促实施这些法令。尽



管其他民兵武装抵制这些法令，卡斯特罗并不担忧。“他们将不得不加入正规军。”他对第五团的人说，“但是，当他们这样做时为时已晚。第一批部队将全部被我们所控制，无论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包括许多对党的利益极其重要的岗位。”

为了树立一个榜样，或者如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所说，为了显示“其真诚的目的”，共产党逐步解散了第五团，它下属的各个营与其他部队一起整编成为正规军初期的“混成旅”。第五团当时的团长、共产党员恩里克·利斯特（与他身边的一名苏联军官一起）被任命为第一旅旅长。据第五团第一政委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说，由于共产党人带头解散了自己的民兵武装，他们在首先组成的六个旅中得到了五个旅的控制权，这几个旅的大部分成员曾经在第五团接受过战火的洗礼。多年以后恩里克·卡斯特罗说，除了第一旅的恩里克·利斯特之外，第三旅旅长何塞·马利亚·加兰和第六旅旅长米格尔·加略（不要与国际纵队化名加略的路易吉·隆哥弄混了）也是共产党员；第二旅旅长何塞·马丁内斯·德·阿拉贡和第四旅旅长阿图罗·阿雷利亚诺都是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的社会党人。卡斯特罗说第五旅旅长费尔南多·萨维奥是一名社会党人，但没有说明共产党对他的影响有多大程度——假如对他有影响的话。利斯特列出了所有指挥官的名字，但是，除了只是说马丁内斯·德·阿拉贡是一个“共和派”之外，没有提到他们的政治身份。不过他指出，这些人都是职业军官，内战爆发之前，不是在军队服役，就是在边防警察部队服役。

在以这种方式将第一批人民军部队的控制权揽入自己手中的同时，共产党人并没有忽略人民军的最高指挥权。实际上，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掌管国防部的头几个星期，他们已经打下了可靠的基础。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部分是因为他们与国防部长的关系还过得去（所以，两名共产党的追随者安东尼奥·科登和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被安排在总参谋部的行动部门）——尽管后者牢骚满腹，但主要是因为他们

控制的一些人占据着国防部的关键位置，人们大概不会怀疑这些人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忠心，其中包括诸如曼努埃尔·阿雷东多中校、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上尉和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少校之类的职业军官。阿雷东多中校是卡瓦列罗的副官；迪亚斯·滕德罗上尉担任重要的情报监控部门负责人，在内战爆发之前那几个月，他是共和国军人反法西斯联盟（UMRA）的主要组织者，共产党人声称，该联盟是他们一九三四年建立的反法西斯军人联盟的发展壮大；埃斯特拉达少校是国防部总参谋长。拉尔戈·卡瓦列罗不知道，他们正在或者已经被拖进了共产党人的圈子。

同样通过公开和暗中占据领导职位，共产党人在极其重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设立这个部门为的是在社会政治方面控制军队，实行这种控制的手段是委派政治委员，正式名称叫代表委员。内战爆发以后，为了持续监督民兵的士气和职业军官的可靠性，各个党派和工会采取了在民兵部队中设置政治委员的习惯性做法。第四十二旅旅长埃斯特万·罗维拉中校证实：“许多民兵营的指挥官通敌，一有机会就开小差。这自然导致士兵对军官的不信任，使他们认为必须有自己的代表参与军事指挥以保证军官的忠诚。这些代表就是第一批政治委员。”一九三六年十月，相应于权力集中的总体趋势，一个规范这种做法的政府机构建立了。在仍然要求政治委员提防职业军官背叛的同时，还要求其在新组建的正规军的军官与士兵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并且维护军官的威信和权力。除了这些职责以及执行纪律和监督部下士气的任务之外，政治委员还有另外一些责任。“政治委员是作战部队的灵魂，是它的教育者，它的鼓动者，它的宣传者。”卡洛斯·孔特雷拉斯说，“他始终是，或者应当始终是，最优秀、最聪明、最能干的。他应当事必躬亲无所不通。他应当关心人民战士的胃口、心情和思想。从战士应征入伍接受训练那一刻起，直到他们奔赴前线从前线归来，他应当始终陪伴着他们；他应当关心他们吃得如何、睡得如何，关心他们训练得怎样、仗打得怎样。他必须注意满足他们的政治、经济、

文化和艺术需要。”当然，并非所有政治委员都像要求他们的那样行事。“有一些政治委员与广大战士并没有保持密切的关系，”孔特雷拉斯证实，“他们没有与战士们在战壕里并肩战斗，他们只想接近指挥官。”

由于政治委员可以对士兵施加影响，更不必说他的职务使他有可能影响军官的思想和情绪——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尼奥·米赫说，政治委员应当“在军官中进行政治鼓动，给他们注入令士兵振奋的同样的活力”，因此，可以想象，对于共产党来说，在总政治部拥有支配地位是设法控制正规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支配地位之所以得到保证，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米赫把持着分设的四个部门中最重要 的组织部门，不过，主要是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所任命的秘书长费利佩·普雷特尔和总政治部主任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他们享有卡瓦列罗的充分信任，暗中却为共产党谋利益。不久之后，由于刚刚投靠共产党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何塞·莱恩被任命为政治委员学校负责人，由于主管四个分支部门之一的工联党领导人安赫尔·佩斯塔尼亚因为生病而被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朋友加夫列尔·加西亚·马罗托所取代，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影响。加西亚·马罗托是具有明显共产主义倾向的社会党左派人士，尽管对共产党的某些手段颇有微词，最终仍加入了共产党。由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并不知道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费利佩·普雷特尔背叛了自己以及共产党因此对总政治部的渗透程度，共产党及其合作者得以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通过任命数量具有绝对优势的共产党人政治委员，毫无阻碍地损害其他党派组织的利益，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例如，加西亚·马罗托说，一九三七年初在中部前线，社会党的部队经常向他抱怨给他们指派了共产党人政治委员，他们认为这不能接受。他还说，担任南部前线政治督察委员的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巴列斯特罗斯曾抗议道，在派往南部前线的三十名政治委员中，安东尼奥·米赫挑选的全部都是共产党员。

由于共产党控制着总政治部，这种抱怨不可能通过政治委员传达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结果，最终只好通过一些独立的渠道来传达。

由于法律没有严格界定政治委员的明确职能和权力，因此，他具有广泛的独断专行的手段，政治委员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手段加强党对人民军的控制——政治委员被告知，他是“党在部队中的组织者，要大胆而有步骤地吸收最优秀的战士中的佼佼者，并且推荐他们担任负责的职务”。即使是在总政治部设立之前，共产党也没有对党在前线的活动掉以轻心。“为了让民兵了解党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必须建立宣传鼓动队。……共产党员应当承担吸收前线最优秀的战士入党的任务。”

多年以后，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中的共产党人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其脱离共产党后发表的一次演说中透露：

数十成百名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组织者”遍布前线和部队，我们的军官得到明确指示，要他们最大限度地将共产党员提拔到更高的级别上，以此降低提拔其他党派成员的比例。但是，我有责任说明，在执行这种草率的政策的同时，共产党员并没有停止与敌人战斗，他们在前线的不屈不挠和严明纪律也让人们看到，他们比最优秀的战士还优秀，这一事实促进了我们发展党员的工作。……一些共产党员军官和政治委员热情过度不讲策略，以致采取了极其恶劣的极端手段，对于不愿加入共产党或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军官和士兵，他们将前者解职，将后者派往前线。

通过这种手段，党的力量由于吸收了成千上万名新党员而在前线得到了“加强”，但是，党在后方破坏团结，扩大裂痕，使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部队之间的对立加剧。

这就是命令我们执行而我们也足够愚蠢地遵照执行的政策的实际后果。

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声称，共产党人竟然在前线杀害了拒绝加入共产党的社会党人。忠实的共和派职业军官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写道：“根据他们通常的策略以及他们得到的指令，共产党人政治委员通过对各自部队中与他们看法不同的士兵反复宣传，努力发展他们的党员，而共产党人政治委员构成了政治委员的大多数。他们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手段，从封官许愿到以莫须有的罪名相威胁。其他党派不可能以赞许的目光看待这种情况，因为它们注意到，它们的党员数量持续减少，为了避免受到迫害，它们的党员被迫更换了自己的党证。由于所有这一切，代表不同政治观点的政治委员之间的斗争随之而来，结果对军队造成了伤害。”反对共产党的国防部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证实：“根据总政治部主任的指示安排，[国防部]总政治部刚一成立就开始在军队的士兵中积极进行宣传活动。这些指示可以概括为，认真开展改变士兵政治信仰的工作，打击迫害任何不愿意入党的人（为此可以将秘密检举和诬告作为充分的证据）；肉体消灭被视为危险分子的那些人，为了完成这一项可怕的任务，可以用他们企图叛变投敌作为杀害他们的正当理由。”

共产党人政治委员的行为所造成的气氛肯定与拉尔戈·卡瓦列罗设立总政治部时希望营造的气氛截然相反。“在前线、营房以及部队驻扎的其他地方，”他签署的一份公告写道，“当属于不同工会组织的士兵或者民兵之间发生争执和纠纷时，代表委员应当镇定地妥善处理，通过这种兄弟般的行动将消除战士之间的所有意见分歧，并且消除个体或者团体自私的目的。”

除了共产党人政委和军官的工作以及社会党内的地下共产党员和亲共人士为加强共产党对人民军的影响而提供的帮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产生了有利于共产党的

更大后果：那就是第一批苏联军官的到达，接着是苏联武器的到达。

“一九三六年九月[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组成后不久，”这位总理多年的朋友兼政治伙伴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写道，“苏联大使向它介绍了一位苏联现役将军[弗拉基米尔·戈列夫]，大使说他是大使馆武官，还提到他的职业经历。接着，大批新的‘助手’突然不请自来，他们自动进入参谋部门和军队，在那里随意发号施令。”不过，认为主要的苏联军事顾问是不请自来或者至少是在国防部长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到西班牙是错误的。根据后面某一章所提到的苏联领导人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之间的通信判断，这位西班牙国防部长实际上通过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要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提供帮助。另一方面，苏联顾问不经国防部许可自主行事的情况似乎经常发生，他们无视国防部的意见独断专行。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证实：“他们的影响甚至达到了控制总参谋部所有作战计划的程度，经常彻底修改战术方案，用他们的方案取而代之。这些方案一般含有某种政治目的；在组织问题上，他们任命指挥官；在新闻方面，他们宣传某个政党的观点；在军事行动上，为了强行推行他们的政策，他们置不容置疑的战略战术考虑于不顾。”国防部长本人也证明：“西班牙政府和指挥作战的军官们，尤其是负责军事行动的国防部长和指挥部里的那些军官，根本不可能独立自主地采取行动，因为，由于担心危及苏联以出售战争物资的方式陆续给予的援助，他们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屈从于不负责任的外国干涉。有时，苏联大使和将军们以他们的命令没有像其所希望的那样准时执行为借口，随意向我发泄他们的不满。他们声称，如果认为他们的合作没有必要、不合时宜，我们应当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以便他们通知他们的政府安排他们离开。”另一方面，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期间担任总参谋长的比森特·罗霍——我们将在随后的一些章节里看到，整个内战期间罗霍始终得到共产党和苏联人的支持——坚称，这些指责是“无稽之谈，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他还说：“与制订行动计划

和执行这些计划有关的指示和命令始终都是由共和国总参谋部的参谋长官构思和起草的。”

人们从苏联人的说法中得到的无疑不是这种印象，化名“博尔特”的苏联将军H·沃罗诺夫谈到罗霍时说：“他喜欢[与我们]面谈，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并且用他的大笔记本把我们的建议和忠告记录下来。在他晋升为总参谋长后，我们继续实质性的合作，我始终打算竭尽全力帮助这位著名的共和派军官。”

据罗霍说，西班牙军官与苏联军事顾问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热情友好而且相互尊重的关系：“[如果]我能就与西班牙军官（不是我的军官）并肩作战的苏联军事指挥官说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他们是杰出的战友，他们帮助我多次克服巨大的困难，另外，每当遇到超越他们职责的问题时，他们都优雅地回避了。”

另一方面，曾经担任总参谋长托里维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的苏联军事顾问的K.A.梅列茨科夫在其一九六八年发表于莫斯科的回忆录中写道：“[苏联]顾问与共和国军事领导人的关系每天都要拿来讨论，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无法用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

尽管罗霍否认受到过苏联军官的干扰，他的同僚安赫尔·拉马斯·阿罗约却证实：“我不止一次听到罗霍亲口表示不满，我从他的不满中判断，俄国人认为他们的作战计划和命令比西班牙总参谋部的要高明，不经俄国人最后批准，[总参谋部]自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

如果可以根据我对塔斯社驻巴伦西亚代表米罗娃的个人认识，根据苏联大使——我们将在后面的某一章里论及他——以及最重要的苏联记者、对克里姆林宫具有影响力的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的表现得出一般性结论的话，那么，苏联文职人员的独断专

行丝毫不逊于苏联军人，更不必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了。将近一九三六年年末时，科利佐夫在马德里的总政治部里安营扎寨，专横地将审查外国记者新闻报道的工作置于总政治部的控制之下，据当时负责此事社会党人阿图罗·巴雷亚说，科利佐夫在那里“以旺盛的精力和傲慢的态度参与了几几乎所有讨论”。

赫伯特·马修斯是内战期间《纽约时报》驻西班牙的记者、三十多年来被广泛认为是研究西班牙问题的权威，我们已经多次提到他所写的关于西班牙的最后一本书《半个毁灭的西班牙》，在这本书中，马修斯故意忽略了前面引述的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证词，这一段证词曾经出现在我的《精心的伪装》一书中，因此，马修斯声称：“伯内特·博洛滕描写了‘苏联军官的威胁恐吓和专横行为’，甚至说文职人员也是如此，例如《真理报》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让人觉得他动辄就给斯大林打‘热线电话’。即使情况果真如此，那也是在私下里，决不会达到对拉尔戈·卡瓦列罗和胡安·内格林总理那样的人专横跋扈的地步。”马修斯还避而不谈《精心的伪装》所描述的以下事实：在某个令人难忘的时刻，被苏联大使的要求激怒的拉尔戈·卡瓦列罗将他赶出了自己的办公室。本书将在后面描述这一时刻。

## 第二十九章 何塞·阿森西奥将军，拉尔戈·卡瓦列罗向共产党人挑战，政府撤离马德里

毫无疑问，苏联军官的威胁恐吓和专横行为加快了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关系恶化的速度。由于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运动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中发展党员，并且由于共产党将卡瓦列罗在劳动者总工会和社会党内的许多追随者吸收入党，这种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了。尽管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一度似乎并无显而易见的问题，但是，当他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任命何塞·阿森西奥将军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时，一道明显的裂痕出现在光滑的表面上。



作为在内战初期镇守马德里的西北门户瓜达拉马山的民兵部队的指挥官，当时是一名上校的阿森西奥极大地鼓舞了这位社会党领导人的信心，因此，在九月成为总理兼国防部长之后，拉尔戈·卡瓦列罗将阿森西奥晋升为将军，并且安排他负责指挥受到威胁的中部前线的军队。正在努力争取阿森西奥支持他们的共产党人为阿森西奥的晋升和履新而欢呼，对“这位民主共和国英雄”的战功大加赞扬，称其指挥他们的铁军在瓜达拉马山“打了一场又一场胜仗”，还封他为第五团的名誉团长。一位著名共产党人后来承认，所有这些示好都是为了使阿森西奥脱离拉尔戈·卡瓦列罗。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阿森西奥对共产党人的示好并没有表现出迎合的意向，甚至还显示出对他们的极大反感，于是，他们要求解除他在中部前线的指挥权。

针对阿森西奥采取的策略是他们典型的惯用伎俩。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写道：

我在这里不妨指出共产党人在处理他们与人民军指挥官的关系时通常所采取的策略。他们把那些共产党员指挥官当作下属来对待，直接要求后者以最有利于达到党的目的的手段执行他们的命令，常常违背军人的职责。这些军官一般都会盲目服从，他们更在意党的命令而不是军队总司令部的命令。其他指挥官经常抵制共产党人的计划，不是拒绝接受共产党人提出的那些听起来更像命令的建议，就是拒绝参与那些会使他们良心不安的行动。[共产党人]假惺惺地对这些军官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不过，他们的关怀转瞬即逝，而且徒有其表。他们请军官吃饭，向军官倾诉钦佩之情，声称钦佩军官的勇敢和智慧。总而言之，他们试图激起这些军官内心的欲望，但是，当他们认为用这些方法无法迷惑军官时，他们开始对军官进行阴险的诽谤，迫使总司令部将其解职。许多指挥官仅仅因为恪守职责失去了生命或自由。

“在共产党的报刊上，”温和的社会党执委会机关报在内战临近结束时写道，“那些毫不犹豫地同意成为共产党员的指挥官立即具有了超过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军事

素养，而那些不需要党员身份因而拒绝了他们的指挥官则遭到含沙射影或直截了当的指责。”

共和派在军事上的惨败有利于共产党提出的解除阿森西奥中部前线指挥权的要求——这场惨败使佛朗哥将军的军队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兵临马德里城下。然而，尽管打了这些败仗，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同样普遍认为，阿森西奥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罕见的心理素质，但是，由于民兵组织系统的缺陷以及缺乏坦克、大炮和飞机，军事上的惨败不可避免。如同我们将在下面一章看到的那样，来自苏联的这些武器直到十月底时仍未运到，而将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共产党领导的国际纵队，只是在十一月份的第二周才投入战斗。

就在共产党人要求解除阿森西奥中部前线指挥权的时候，亲共产党的外交部长兼总政治部主任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对路易斯·费希尔起草的一封信表示了认可，这封信在十月十二日送到拉尔戈·卡瓦列罗手里，对阿森西奥的忠诚表示怀疑。尽管后来德尔巴约在内阁赞成解除阿森西奥的国防部副部长职务，但他坚持认为，这位将军“无疑是共和国军队中最聪明能干的军官之一”，有可能“成为最伟大的军事天才”。值得注意的是，在认可费希尔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那封信的前一天，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一张写给阿森西奥的便条上写了下面几行字：“我知道将在黎明开始非常重要的军事行动。得知你将亲临前线指挥行动让我平添了许多希望。由于最近的惨痛经验，我们只能相信你的才干。由于这个原因，我决定告诉你这些内心的话，在任何情况下，这只是我们之间的交流。”

虽然拉尔戈·卡瓦列罗一度拒绝解除阿森西奥的指挥权，但他最终屈服了。不过，在用一只手安抚共产党人的同时，他用另一只手淡化了共产党人的胜利，他把阿森西奥提升到国防部副部长的职位上，取代亲共产党的前政治伙伴罗德里戈·希尔中校。

他寻求独立路线的决心在随后几周接着进行的两次人事变动中具体表现出来。他恢复了在共产党人的坚决要求下被解职的塞希斯孟多·卡萨多的国防部军事行动负责人的职务。卡萨多将自己被解职归因于他曾警告总司令部，第五团在分配苏联武器时所受到的明显优待将在士兵当中引起猜疑和嫉妒，并将很快导致共产党取得实力地位。“据我观察，”他补充说，“该党以其特有的狡诈开始对我进行诽谤，并且努力使国防部长相信，我不是担任军事行动负责人这一职务的最合适人选，因为我有过激和悲观的缺点。”

除了通过恢复塞希斯孟多·卡萨多的职务向共产党人挑战之外，拉尔戈·卡瓦列罗还解除了最近加入共产党的国防部总参谋长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的职务，并且用阿森西奥的朋友托里维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接替他。在让人头晕目眩的事态发展过程中，这些人事变动几乎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它们使共产党人感到不安并使他们确信，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合作到头了。

尽管这些人事变动加强了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国防部内部的权力，但是，对于削弱共产党人在至关重要的中部前线的势力，它们最终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我们很快将会看到，拉尔戈·卡瓦列罗任命接替阿森西奥担任中路军司令的自由共和派人士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没过多久就对他们言听计从了，接着，在十一月十六日傍晚，由于敌军已经推进到首都市郊，内阁仓皇地放弃了这座危在旦夕的城市。

同一天晚上，米哈伊尔·科利佐夫造访了人去楼空的政府各部。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去了国防部，[总]政治部。.....那里几乎没有人。.....我来到总理办公室。房间锁着门。我来到外交部。那里空无一人。.....在外国新闻审查处，一名官员.....告诉我，两小时前政府认为马德里的形势没有希望.....因此已经撤离了。“为了防止出现恐慌”，拉尔戈·卡瓦列罗不许发表与政府撤离有关的任何消息。.....我来到内政

部。……屋里几乎空空荡荡。……我来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全体会议正在举行。……他们告诉我，就在当天，拉尔戈·卡瓦列罗突然决定撤离。他的决定得到内阁大多数成员的同意。……共产党人政府部长想要留下，但是他们被明确告知，这样做将使政府名誉扫地，因此，他们不得不像所有人一样离开了。……无论是各个组织最著名的领导人，还是国家的各个部门和机构，甚至没有得到政府撤离的通知。国防部长只是在最后一刻才告诉总参谋长，政府正在撤离。……内政部长加拉尔萨和他的助手、安全局长穆尼奥斯先于他人离开首都。……中路军司令波萨斯将军的参谋人员匆匆离开。……我再次来到国防部。……我从楼梯来到大厅。一个人影也没有！在楼梯间，……两个年老的勤杂工像蜡像一样坐在那里，他们身穿工作服，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等着部长摠铃召唤。无论是前任部长还是新换的部长，这件事情一成不变。一排排的办公室，所有门都敞开着！……我走进部长的办公室，……里面没有一点人气！再往前有一排办公室——总参谋部及其各个部门；参谋部及其各个部门；中部前线参谋部及其各个部门；后勤部及其各个部门；人事部及其各个部门。所有门都敞开着。天花板上灯光明亮。桌子上到处都是丢弃的地图、文件、新闻公报、铅笔和写满了字的拍纸簿。一个人影也没有！

几乎毫无疑问，政府仓皇诡秘的撤离严重损害了卡瓦列罗的名誉——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和几位共产党人部长都曾力劝这位总理提前组织安排并且公开宣布政府撤离，以免给人造成“一种逃跑的印象”——同时提高了共产党的声望。在第五团以及现有苏联武器和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在十一月八日到达的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帮助下，共产党在保卫被围困的马德里的战斗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由共产党控制的第十一旅是国际纵队投入战斗的第一个旅。

十一月七日上午，当政府机构的人员和档案还在撤往巴伦西亚的途中时，马德里的共产党报纸《工人世界报》声称：“[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工人赶来保卫这座城市，

他们将未来寄托在自己的勇气上。[本地的]工会以及所有反法西斯组织和工人组织挤满了准备战斗的人。”广泛流传的第五团的报纸《人民战士报》也声称：“几小时之内将决定马德里的命运。成千上万的民兵正在与前来镇压马德里人民的摩尔军团和外籍军团作战。这是英雄的时刻，这是决一死战的时刻。多少天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宣称，马德里将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坟墓，现在，将这些口号转化为现实的时候到了。……炮声正在我们的城头轰鸣。每个马德里人都应当挺身而出，不惜一切代价，准备夺取胜利。”

在马德里保卫战的头几天，为了激发工人的革命意识，《人民战士报》放弃了仅限于“反法西斯”的温和语言，让人产生了对于俄国革命的回忆。在刊登于报纸头版的一篇文章里，第五团第一政委卡洛斯·孔特雷拉斯写道：“马德里不可能陷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正在奔向战壕保卫他们的城市、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未来。……西班牙革命万岁！……今天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我们的俄国兄弟被百万敌军所包围，他们在四面受敌、忍饥挨饿、没有飞机和坦克的情况下赢得了战斗，因为他们怀有信念，相信未来。……我们同样怀有信念……因此我们必将获胜。”

毫无疑问，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布鲁埃和埃米尔·特米姆恰当地强调了必定激励了许多战士的潜在的革命信念：“对于大批西班牙民兵和‘国际纵队成员’来说，保卫首都是一项革命壮举，它的反法西斯主义象征意义只是暂时的。……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人反对革命]只是暂时的策略性让步，反法西斯斗争将在世界革命中结束。”

在十一月六日晚上动身前往巴伦西亚之前，国防部副部长阿森西奥将军将经过拉尔戈·卡瓦列罗批准的密封命令交给中路军司令波萨斯将军和不久前被任命为马德里军区司令的何塞·米亚哈将军，信封上写着：“绝密。早晨六点之前不得打开。”两位

将军决定，不等指定的时间到来就要看看接到的命令。他们认为，如果等待指定的时间，宝贵的十二个小时就浪费了。此外，他们打开信封以后发现，给他们的命令都下错了对象，各自收到的是给另一个人的任务。在米亚哈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少校看来，如果没有及时发现，这个错误也许会“增加战败的可能性”。

波萨斯接到的命令与其受到攻击的部队的战术行动以及建立一个新的指挥部有关，而米亚哈接到的命令是成立一个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马德里。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以他为首，由所有党派的成员组成，人数与各党派在政府中的代表成比例。如果拯救这座城市的一切努力失败，他应撤退到昆卡，“根据中路军司令[波萨斯将军]的指示在某地建立一条防线”。

“政府中没有人相信能够守住马德里，”《社会主义报》负责人、海军和空军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好友苏加萨戈伊蒂亚证实，“总理甚至比部长更不信，因为只有他最清楚军队混乱无序和不堪一击的状况。……撤离马德里的国防部长好不容易使普列托他们相信，敌军将在三到六天之内攻克马德里。”

前线实际上已不存在，比森特·罗霍写道：“在托莱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公路沿线牵制敌军的纵队被歼灭了。三千五百人组成的一支纵队，勉强找到三百人。”

米亚哈对阿森西奥将军和拉尔戈·卡瓦列罗交给他的任务表示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首都岌岌可危的那些日子，这似乎只能预示着某种灾难性的下场。据苏加萨戈伊蒂亚说，米亚哈立即意识到，他被选来当替罪羊。实际上，波萨斯将军说，当米亚哈得知自己的任务时，他气得差点哭起来，因为他认为，这是蓄意把他当作牺牲品献给佛朗哥将军。

在这种厄运似乎就要降临的背景下，由于马德里出人意料的顽强抵抗，这位将近暮

年、随和而平庸的将军——在命运攸关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六日，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平安退休更诱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西班牙和全世界的传奇人物。马德里的抵抗使拉尔戈·卡瓦列罗颜面扫地。米亚哈不会为自己的名声雀起向这位国防部长表示感谢，而且从那以后，他们之间变成了一种敌对关系。

### 第三十章 保卫马德里、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和国际纵队，米亚哈、罗霍和克莱贝尔

被政府撒手不管的何塞·米亚哈将军做了让人不难理解的事：他同意帮助共产党及其控制的第五团，因为这是中部战区组织最好、最守纪律的部队。据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说，第五团迅速通知米亚哈将军，“不仅它的部队、后备队和武器弹药，而且它的所有参谋人员以及它的指挥官和政治委员”均由他来部署调遣。

尽管马德里的保卫者总体上缺乏武器和组织，但是，与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对手相比，民兵有一个巨大的心理优势。坚守着市郊卡拉万切尔工人居住区的五一营的共产党人营长维克托·德·弗鲁图斯回忆说：

我们的民兵战士比此前四个月的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觉到，他们正在保卫他们自己的东西。显然，紧靠自己的家园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他们仿佛……是在自己的家门后面进行抵抗……他们知道，这是他们拯救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财产以及自己所爱的人的最后机会。……同时，一个可怕的障碍摆在敌人面前：他们必须逐门逐户地攻克马德里。每一道门都是街垒，每一扇窗户都是守城者投出自制手榴弹的胸墙。不错，是简单原始的手榴弹，但是威力足以杀伤敌军的一个巡逻兵。街道是进入马德里的必经之路。……不经过街道敌军就不可能占领首都。结果，前进，他们必须面对一支民兵大军，它的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使通过军事训练学到的所有

战术不值一提。屋顶上设有观察哨。……这使我们可以及时采取防御措施。……许多人认为，敌军没有向马德里的中心推进是因为他们没有决定这样做。我可以明确地说，由于前面提到的那些感情因素，在我们的民兵战士中出现的某种当时不为人们所知的心理奇迹才是敌军没有攻克马德里的原因。”

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民兵战士中，第五团第一政委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人物。亲身参加了田园之家战斗的共产党员阿尔瓦罗·梅嫩德斯称之为保卫马德里的“政治灵魂”。被人叫作“指挥官卡洛斯”的他疯狂地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跑来跑去，圆睁着因缺乏睡眠而浮肿的双眼鼓励战士们坚守阵地。“宁愿为捍卫我们的家园和‘荣誉’而战死，”他宣称，“也不要面壁而立被枪毙。”他保证，国际纵队正在赶来保卫受到威胁的首都。

英国作家文森特·布罗姆对这一历史事件作了如下描述：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打响的马德里之战在武器匮乏、组织混乱但人数众多的马德里人与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由大约两万个摩洛哥人和军团士兵组成的军队之间展开。马德里人得到一些苏联坦克和飞机的支援，而佛朗哥的军队则得到德国和意大利人员装备的补充。……

十一月七日破晓时分，天色灰暗，视野朦胧，马德里这座古城立即听到了以前没有听到过的大炮轰击的隆隆炮声……不过，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当炮弹爆炸、房屋倒塌、男女老幼被埋在瓦砾下面、大片薄雾般的烟尘像幽灵似的升起在城市上空时，几乎根本看不到任何惊慌失措的场面。城市里的宣传人员有效地开展了宣传工作。激情四射的演说，富有感染力的小册子，广播里让人跃跃欲试的鼓动以及一些充满振奋人心的意象的诗歌在马德里造成了一种气氛，在那里，英雄主义在那些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人们身上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各行各业的工人响应广播里的号



召报名参军奔赴前线，一些人手无寸铁，但是他们痴迷地等待接过死伤人员的武器。妇女和儿童从早到晚修筑街垒，一群妇女提出要求并开始组建一个女兵战斗营。……

接着，在雾蒙蒙的十一月八日上午，一支陌生的新军沿着大街整齐地列队开赴前线——在马德里人看来，他们是一些身穿灯芯绒制服、头戴钢盔、训练有素的士兵。

这是在苏联将军“埃米利奥·克莱贝尔”卓越指挥下的第十一国际旅，西班牙新闻界首先将其称为“国际纵队”。

据目击了这一场面的全国劳工联合会记者、后来（在一九三七年一月）担任无政府主义报纸《卡斯蒂利亚自由报》主编的爱德华多·德·古斯曼记述：

上午十点左右，埃德加·安德烈营和巴黎公社营的一千七百名德国、法国、波兰和意大利反法西斯战士列队经过太阳门和卡利亚奥广场，沿着大街开赴战场。……人们聚集起来热情地为他们鼓掌。士兵们用不同的语言高唱革命歌曲。……他们进入田园之家阵地，在那里，敌军已经占领了加拉维塔斯山和鹰山的高地。……与此同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民兵乘卡车穿过马德里。……革命赞歌歌声嘹亮，黑色和红色的围巾随风飘扬，他们经过圣比森特大道和重镇牧场，跨过曼萨纳雷斯河，进入田园之家阵地。他们中的一半人很快将会牺牲在那里。……“国际纵队”作战勇敢。西班牙人——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共和派人士、自由派人士同样坚定地与他们并肩作战。……战斗持续不停地打到八号和九号，而敌军的飞机则对工人居住区和阿圭列斯狂轰滥炸，威胁平民百姓的生命财产。但是，平民百姓没有屈服，他们将生命财产的安危置之度外，战士们同样没有后退一步。

休·托马斯对国际纵队在历史舞台上的亮相作了激动人心的描述，他写道：

到十一月八日傍晚，国际纵队部署就绪。埃德加营和巴黎公社营被派往田园之家。东布罗夫斯基营开往比利亚维德与利斯特和第五团会合。克莱贝尔负责指挥大学城和田园之家的所有共和派军队。他的效率立即让西班牙的指挥官们大吃一惊。……经常有人说，国际纵队挽救了马德里。然而，这个国际纵队第十一旅可能只有大约一千九百人。十一月十二日前后到达马德里前线的第十二旅大约一千五百五十人。国际纵队的部队规模太小，因此不可能单凭人数扭转乾坤。此外，在国际纵队到达前的十一月七日，民兵和工人遏制了巴雷拉[敌军指挥官何塞·恩里克·巴雷拉上校]的攻势。这一胜利是马德里人民的胜利。不过，国际纵队的勇敢和经验在后来的几场战斗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国际纵队的榜样激励着民兵继续抵抗，同时让马德里人感觉到，他们不是孤军作战，……[十一月九日]，被阻挡在田园之家的巴雷拉……向卡拉万切尔区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但是，巷战阻遏了摩洛哥士兵，他们没有取得进展。克莱贝尔将国际纵队的所有兵力集中在田园之家。在朦胧的夜色中，他们发动了进攻。“为了革命和自由——前进！”在圣栎和桉树之间，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一直打到十一月十日上午。到那时，只有田园之家的加拉维塔斯山仍被民族主义分子占据。但是，国际纵队三分之一的战士牺牲了。

在对这一史诗的描述中，罗伯特·科洛德尼比托马斯更突出地强调了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写道：“当克莱贝尔将军率领的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三个营——埃德加·安德烈营、巴黎公社营和东布罗夫斯基营——在苏联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进入田园之家的阵地阻击巴雷拉部队的猛攻时，马德里得救了。外国志愿人员的出现加强了民兵的抵抗并且为组织、训练、装备共和派军队赢得了必要的时间。”一位西班牙历史学家同样写道：“[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到来引人注目，看到这些经验丰富的军人时，民兵的心中充满了……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激情。在马德里保卫者的队伍中，乐观的情绪蔓延开来。现在有了苏联的战斗机和坦克，还有那些

准备保卫曼萨纳雷斯河与田园之家的德国人、波兰人、法国人和匈牙利人！谁说一切没有希望了？”

这些来自欧美各国的革命骨干主要是一些共产党人理想主义者，他们为什么去西班牙作战并死在那里？究竟是什么崇高的事业激励他们在马德里、哈拉马河、布鲁内特、埃布罗河等一系列内战最惨烈的战斗中流血牺牲？难道真像其中一些幸存者至今仍然坚称的那样，他们进行伟大的圣战只是为了捍卫一九三一年的民主共和国？按照国际纵队第十五旅政治委员桑多尔·沃罗斯的说法，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他去了西班牙，“在革命巨人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作战；作战甚至牺牲，是的，如有必要不惜牺牲，就像那些传奇式的共产主义领导人，他们不怕坐牢、折磨和毁灭，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解放被压迫的民众。……我是‘阶级斗争千锤百炼的钢刀，一个共产党人’。我是‘国际团结的具体体现，共产国际将这种团结缔造成为革命工人阶级的武装铁拳’”。《兄弟！》的作者威廉·赫里克也在国际纵队第十五旅作战，他在写给我的两封信中说：“我去西班牙时绝不相信资产阶级民主；在我看来，党的民主路线只是一种策略，一种手段，我，我们，最终希望的是使共产党掌权。可能除了一两个人之外，我认识的所有美国志愿人员都像我一样认为，人民阵线，民主的口号，不过只是帮助共产党夺取政权的策略而已。……亚伯拉罕·林肯营的那些老兵为此被欺骗了五十年。……不用说，我们国际纵队也是以反法西斯的名义行动的。……我们在[靠近西班牙边境的]佩皮尼昂时，我们的政治委员……告诉我们，在西班牙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我们应当回答说，我们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不要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

与此同时在马德里，拉尔戈·卡瓦列罗十一月六日撤离之前将任命其担任米亚哈的参谋长的比森特·罗霍少校组成了一个保卫马德里参谋部，据他介绍，该参谋部由“可以找到的”国防部总参谋部的人员组成，像国防部长一样，总参谋长托里维奥·马丁

内斯·卡夫雷拉将军与一些年纪较大的官员已经离开首都逃往巴伦西亚。据米亚哈的副官安东尼奥·洛佩斯·费尔南德斯上尉说，罗霍的参谋部由一些被国防部认为不值得带往巴伦西亚的人组成，不过，他们是“到当时为止在几乎无人注意的总参谋部的基层岗位上成长起来的最高级别的军官”。罗霍少校本人就是这些被忽视的军官之一，用一位权威人士的话说，他是“军队中得到广泛承认的最优秀的军事战略家”。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在其研究人民军的里程碑似的四卷本专著中写道，罗霍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认为是西班牙军队“最能干的军官之一”，而且受到“全体战友的喜爱和尊重”。萨拉斯·拉腊萨瓦尔还说，即使他在内战期间可能失去了许多战友的喜爱，但“他仍然得到所有人的尊重”。

具有影响、无处不在的米哈伊尔·科利佐夫比在西班牙的其他记者更为了解军事形势，十一月十日，马德里之战的第四天，他在日记中写到：“米亚哈很少过问军事行动的细节，甚至对它们毫不知情。他把这些问题交给他的参谋长以及各个纵队和防区的指挥官去处理。罗霍以他的谦虚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谦虚待人使其丰富的实用知识和非凡的工作能力藏而不露。他一直俯身在马德里的地图上，今天已是第四天。各支部队的指挥官和政治委员连续不断地来见他，他用一种低沉冷静的声音，就像在一间铁路调度室里一样，耐心地向他们说明、讲解、指示，并在文件上做出注解，经常还要画出草图。”

不过，新成立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主席是米亚哈将军，这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对于他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新闻界只字未提。十二月二十日，科利佐夫在日记中特别提到：“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一点关于比森特·罗霍的消息出现在任何一份马德里的报纸上，也没有出现在其他西班牙报纸上。记者们开始狂热地描写刻画指挥官和政治委员、军需官和卫生员。他们发表了大量在医院工作的人们载歌载舞的照片，但是关于实际上指挥着整个马德里保卫战的这个人，他们一个字也没有写。我

估计这不是因为敌视或反感，只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并不存在’。在这里，人们有时并不关心最明显的事情。很难不注意比森特·罗霍。毫不夸张地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看到他。……身为保卫马德里的总参谋长，[他]控制着由正规部队、民兵小组、炮兵连、独立街垒、工兵小队、飞行中队组成的错综复杂的防御网的所有脉络。不休息，不睡觉，在战线被分解成的无数个区域，他密切注视着敌军在每一个区域的每一个动作。”

直到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科利佐夫在日记中写道，新闻界的沉默打破了。“他们现在提到了他。在保卫马德里的领导者和英雄的名单上，他被列在第二位。我不禁庆幸自己因先于别人在报刊上提到罗霍而曾对此有所贡献。《社会主义者》的一篇社论说：‘我们感谢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的发现，感谢他让我们知道了一个人，在其简朴冷清的办公室里，这个人为拯救马德里贡献了他的全部力量。’”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科利佐夫“以其新闻记者的眼光发现，米亚哈将军的参谋比森特·罗霍是一名朴实无华但能力非凡的军官。……科利佐夫使罗霍引起了马德里的新闻记者的注意，于是，他的名字开始被人提起。科利佐夫对所有事情都非常留意”。

由于米亚哈将军所扮演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这一引人注目的角色以及他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所起的虽不显眼但却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关记录让人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在内战爆发之前那激烈动荡的几个月，当人们的政治忠诚迅速发生变化时，他们都秘密加入了右翼的西班牙军人联盟（UME）。佛朗哥政府出版的一部以文献资料为依据的著作阐明：

为了认清这两名在[武装起义]爆发时滞留于赤色政府控制区的军官的行为之背信弃义，只要记住他们两人都曾加入西班牙军人联盟（UME）就够了。该联盟的成立……以爱国主义为目的，希望在适当的时机建起一道能使西班牙免遭共产主义浪潮吞噬

的堤防。但是，当这一时机到来而马德里的民族主义起义失败时，米亚哈将军和罗霍立即效力于人民阵线而不是与他们的战友站在一边——他们看到了降临在军队中无数将军和下级军官头上的命运，许多人只是因为加入了西班牙军人联盟而被杀害。不过，由于他们的良心不安，由于他们认为通过销毁记录其该组织成员身份的存档证件就可以抹去他们以前行为的所有痕迹，米亚哈将军……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前往[管理政治档案的警察机关]要求把他和比森特·罗霍的证件……给他看看。证件刚一拿到手，他就把它们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在同一本书的附录十中公布的一份有共和国警察机关官员签字的档案影印副本证明了这件事。非常可靠的共和派军官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确认了这份档案的真实性。米亚哈和罗霍的西班牙军人联盟成员身份得到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证实，后者见过搜查马德里的西班牙军人联盟总部时所发现的正式成员名单。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米亚哈或罗霍曾以任何方式参与了军事叛乱的密谋，但是，内战之前他们在互相残杀的动荡中和即将发生军事政变的传言中预先加入了西班牙军人联盟这一事实，可以解释深受军队长官器重的罗霍内战初期为什么只是在受到一位朋友的警告之后才效力于政府的，这位朋友警告他，如果他不这样做就有可能被枪毙；也可以解释当时的马德里军区司令米亚哈为什么加入马丁内斯·巴里奥的“和解政府”任国防部长，因为政府认为这将满足叛军将领的要求。根据左派的激烈反应判断，这其实也是他们的估计。米亚哈在战前加入西班牙军人联盟的预防措施还可以解释他在马丁内斯·巴里奥的政府垮台后为什么拒绝担任何塞·希拉尔内阁的国防部长，因为，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他相信，叛军的胜利不可避免。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战后接受我的采访时声明，他拒绝加入希拉尔政府是因为，既没有一支军队也没有一支警察部队和它一起与叛军作战。

这只是米亚哈变幻无常的内战生涯的开始。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垮台后不久，他被派去指挥科尔多瓦前线，在那里，他率领各个民兵武装的大批民兵、前正规军士兵以及国民卫队和突击卫队队员，却没有夺取这座古老的摩尔人重镇，因而在民兵当中引起了对其忠诚的怀疑——这是一名职业军官在内战期间常有的遭遇。弗朗西斯科·莫雷诺·戈麦斯在《科尔多瓦的内战，1936—1939》中将米亚哈的失败归因于他“特有的行动乏力以及在关键时刻不敢冒险”。不过，另外应当指出的是，厄运从一开始就尾随着他，当时，在他指挥的守卫古老的圣母头像神庙——共和派军队在那里一直坚守到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是内战中最英勇的战绩之一——的部队中，数以百计的士兵和其他人员（总共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人，其中六百名作战人员）开小差，带上他们的家人逃难去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中旬，米亚哈被从科尔多瓦前线召回并被任命为巴伦西亚军区司令。然后他神秘地消失了，接着，国防部指示军事法庭一位名叫洛拉的法官调查他的案件，可是，没过几天他就重新出现了，他的案件也撤消了。最终，在十月二十二日，当敌军迅速向首都推进时，他被任命为马德里军区司令，这为下面的看法增添了依据：甚至还在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并且奉命“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首都之前，他已被选做替罪羊。

尽管米亚哈的过去乏善可陈，但是，命运的奇异转折和共产党精心导演的宣传活动使他成为马德里保卫战中被捧上天的人物，共产党需要一个门面作掩护，以使它能随意施展策略。正如曾任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的前德国共产党人古斯塔夫·雷格勒所指出的那样：“共和派的宣传机器需要一个英雄被人们当作偶像来崇拜。……作为一项政策，同时根据敏锐的感觉，在与外国记者交谈时，甚至在与西班牙人交谈时，我们认可这个受到热烈赞扬的形象。”

“由于赫赫战绩带来的巨大声望，”不太重要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佩德罗·马丁内斯·卡顿写道，“米亚哈将军在西班牙成为最受人爱戴的将军。”很快，米亚哈被新得到的声望所陶醉。“当我坐在车里时，”他告诉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女人们向我大声喊，‘米亚哈！’‘米亚哈！’然后她们对视尖叫，‘那是米亚哈！那是米亚哈！’……我向她们打招呼，她们也向我打招呼。她们非常高兴，我也非常高兴。”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也证实：“我千方百计地泼冷水给这种狂热降温，西班牙人民和新闻界让他头脑发热，尤其是围绕着他的那个小集团，使他实际上陷入了某种危险状态。他不止一次告诉我，民众的热情已经达到那么高的程度，以致女人甚至在大街上亲吻他。”

但是，内战结束以后，由于米亚哈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加入了反对共产党和内格林政府的国防委员会从而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流亡的共产党费尽心机试图打破它所蓄意制造的这个神话。“为了歪曲马德里保卫战的真实情况，”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尼奥·米赫写道，“曾经有人而且仍然有人热衷于把它说成叛徒米亚哈的功劳。这些人曾经宣传而且继续宣传明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同时宣传米亚哈不可能奉献的赫赫‘战果’。关于发生在马德里的事情，他知道的绝不比别人告诉他的更多，他根本没有感受过战事最紧张时那种非常可怕的困难局面。一个头脑迟钝、对人民一无所知的将军无法想象那些日子马德里的悲惨情景。”

经常与这位将军接触的共产党第五团团团长恩里克·利斯特战后的评论同样刻薄。“我们在内战初期利用米亚哈的做法百分之百是正确的。他的共和国现役将军军衔让许多人肃然起敬。公众大都不知道他根本没有能力指挥他所率领的部队。他完全不了解我们的战争的特点，也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军队，然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的角色确实有用，因为他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尽管他对军事几乎一窍不通，我们大家仍然设法造成一种气氛，使他享有他根本不配享有



的显赫声望。我们采取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因为这有利于我们的斗争。”

另外，据始终是共产党的忠实党员的安东尼奥·科登说，何塞·阿森西奥将军无法理解米亚哈怎么会逐渐成为“人民的所有力量、英雄行为和坚忍不拔及其政治领袖的全部智慧”的化身。我们知道，正是阿森西奥将军在十一月六日命令米亚哈成立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科登接着说：“人民把一个平庸的将军提高到他们的水平，并且把他作为自身美德和英雄事迹的化身向世界展示。米亚哈的神话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多年来，经认识他的苏联共产党人之手描绘的米亚哈的形象也好不了多少。内战期间担任《消息报》记者的著名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在回忆录中说这位将军是“一个虚弱的老人，战局带来的压力使他不堪重负”，还说他是一个傀儡。后来成为著名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苏联国防部长的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在西班牙被称为马利诺上校，他证实，米亚哈在马德里保卫战中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尽管如此，在内战期间，当共产党人需要一个驯顺听话、放纵自己的人物以便躲在他的身后为所欲为时，他们不仅在报刊上吹捧他，而且尽量迎合满足他的虚荣心。当时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是这些事情的见证人，根据他的回忆可以断定，在那些以公然献媚讨好的方式努力为党完成这项任务的人当中，包括著名共产党诗人拉斐尔·阿尔维蒂的妻子玛丽娅·特蕾莎·莱昂，她“经常与米亚哈将军出双入对，使他头晕目眩意乱情迷，从而保证其他人做必须做的事情时这位老兵不会碍事”。《纽约时报》驻马德里记者赫伯特·H·马修斯提到米亚哈时说：“从马德里被围困的第一天开始为米亚哈树立的忠诚可靠、坚定勇敢的共和国保卫者形象是个神话。他软弱、愚蠢、厚颜无耻。”

就米亚哈而言，他需要共产党人作为保护伞——“内战爆发时，另外一些根本不是[西班牙军人联盟成员的]人都被杀害了。”多年以后卡瓦列罗尖刻地评论说。很快，在共产党马德里地方党组织书记和中部前线督察委员弗朗西斯科·安东的敦促下，米亚哈加入了共产党，安东是他的主要鼓动者和领路人。“尽管米亚哈将军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可能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一样，”内战期间积极支持共产党的消息灵通人士路易斯·费希尔写道，“他却持有一张共产党的党证。共产党的宣传把他吹嘘成了一个神话。”社会党温和派人士胡安—西梅翁·比达特欣赏米亚哈的“温厚和友善”，他曾问过米亚哈是否真的是共产党员。他证实：“米亚哈以其特有的愉快神情笑了起来。他解开外衣的纽扣，掏出一个红色证件表明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

因为近来有人对米亚哈投靠共产党这件事情提出质疑，所以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人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在内战结束之后不久向我保证，米亚哈是一名共产党员。此外，米亚哈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在《人们，当心！》一书中说米亚哈是共产党员，罗霍后来成为总参谋长，在整个内战期间一直与共产党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在战后撰写的著作文章里也从没有批评指责过共产党；而拉尔戈·卡瓦列罗则在其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说，总参谋部的秘密情报部门告诉他，米亚哈是“两万八千六百九十五名持有党证的共产党员之一”。

实际上，米亚哈支持共产党的事业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在共产国际的喉舌《国际新闻通讯》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其驻马德里的记者休·斯莱特甚至公开说明米亚哈是一名共产党员。而共产党人教育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也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开宣称，米亚哈“对共产党的政策充满热情”。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总统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的日记中特别提到：“米亚哈屈服于诱

惑、‘改变信仰’皈依了共产主义。这种思想滑稽可笑。米亚哈从哪里了解的共产主义？四年前，在我担任国防部长时，他对我说，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派，但是，他不能向社会党人让步，而且应当枪毙他们！他接受共产党人的信仰很可能是为了获得某个政党的支持和庇护而预先采取的一种措施。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情更让拉尔戈不高兴了，他与共产党人势不两立，对他们以及他们的苏联祖师爷和煽动者怒不可遏。据拉尔戈说，米亚哈皈依‘共产主义’的结果是，马德里所有重要的军事职位都交给了共产党人，他们指挥的部队得到了他们要求的一切，而其他部队的供给则遭到克扣。”

对于共产党来说，与它控制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米亚哈将军同样重要的是党对委员会大部分关键职位的控制。据比森特·罗霍说，由于许多著名的政治人物逃往国外，该委员会主要由“自愿决定留下来准备积极参加城市保卫战的年轻人”组成。它的构成及其成员所属党派在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上公布如下，不过，如果其成员真正的政治身份与公布的身份不同的话，将在方括号里注明：

何塞·米亚哈将军	[共产党]	主席 <sup>59</sup>
费尔南多·弗拉德	社会党[共产党]	秘书长 <sup>60</sup>
安东尼奥·米赫	共产党	作战委员
圣地亚哥·卡里略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共产党]	公共秩序（警察）委员 <sup>61</sup>
阿莫尔·努尼奥	全国劳工联合会	战争工业委员
巴勃罗·亚格	劳动者总工会[共产党]	军需委员 <sup>62</sup>
何塞·卡雷尼奥	左翼共和派	交通运输委员
恩里克·希门尼斯	共和联盟	财政委员
弗朗西斯科·卡米内罗	工团主义者	市民疏散委员
马里亚诺·加西亚	无政府主义青年联盟	情报联络委员

#### 图注：

59. 尽管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成立时米亚哈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此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共产党。

60. 尽管弗拉德在这个表上被列为社会党人，但是，根据前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布列霍斯向我提供的情况，他其实是一名共产党员（布列霍斯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四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社会党人）阿图罗·巴雷亚《制造反叛》，第579页；（亲共产党的历史学家）科洛德尼，《为马德里而战》，第51页和第173页注释。不过，胡里奥·阿罗斯特吉和赫苏斯·A. 马丁内斯对巴雷亚的证言嗤之以鼻，他们否认弗拉德是共产党员（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141页和第251—252页注释135）。

61. 据费尔南多·克劳丁说，卡里略在他成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委员的一九三六年十

一月七日当天加入了共产党，见费尔南多·克劳丁《圣地亚哥·卡里略：一位总书记的大事记》，第48页。

62. 尽管亚格正式代表的是社会党的工会组织劳动者总工会，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却没有争议。实例见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68页和第251页注释133。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遵照拉尔戈·卡瓦列罗十一月二十五日发布的一道旨在加强政府权力的命令，委员会改组并且更名为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La Junta Delegada de Defensa de Madrid）。发布这道命令的官方公报写道：“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旨在执行共和国政府发布的命令，真正代表西班牙人民在今年二月举行的大选中所自由表达的意愿。”从此以后，委员会的成员叫作代表而不叫委员。经过几次变化，委员会的改组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完成，直到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散，委员会的组成如下：

何塞·米亚哈将军	[共产党]	主席
马克西莫·德·迪奥斯	社会党	秘书长 <sup>66</sup>
何塞·卡索拉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共产党]	公共秩序(警察)代表 <sup>67</sup>
弗朗西斯科·卡米内罗	工团主义者	前线服务代表
恩里克·希门尼斯	共和联盟	疏散代表
伊西多罗·迭格斯	共产党	民兵代表
曼努埃尔·冈萨雷斯·马林	全国劳工联合会	运输代表
洛伦索·伊尼戈	无政府主义青年联盟	战争工业代表
路易斯·涅托	劳动者总工会[共产党]	军需代表 <sup>68</sup>
何塞·卡雷尼奥	左翼共和派	新闻宣传代表

图注：

66. 尽管我没有马克西莫·德·迪奥斯是一名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支持者的证据，但是，阿罗斯特吉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改组后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的代表洛伦索·伊尼戈的一次谈话值得一提，在谈话中，后者告诉阿罗斯特吉，迪奥斯是一名共产党员（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第140页和第255页注释106）。

67.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人民西班牙》（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的刊物）所提供的卡索拉加入共产党的日期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一九三七年三月，卡索拉当选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四〇年六月七日《西班牙青年》）。

68. 路易斯·涅托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前军需委员巴勃罗·亚格的副手，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企图杀害亚格之后，他取代了亚格。像亚格一样，涅托无疑是一名共产党员，因为无法想象身为共产党员的亚格（见本章注释62）会安排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人做自己的副手，这个人至少也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共产党的支持者。值得注意的是，已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第140页暗示涅托是共产党员的阿罗斯特吉随后又在第251页注释133中声称：“[我]知道他是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成员，但是，我们不能肯定地说，他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

除了占据大部分关键职位之外，共产党人还对左翼共和派人士何塞·卡雷尼奥所主管的新闻宣传部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个部门，他们控制了官方的马德里广播电台，它的负责人是化名费利克斯·阿尔文的德国共产党人库尔特·哈格尔。

米亚哈将军扮演着双重角色：作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他填补了因政府撤离而留下的政治真空；同时，作为马德里军区司令，他负责部署并实施军事行动。尽管

令人信服的证据——我在一九八〇年出版的《西班牙革命》一书中列举了许多此类证据——表明他在政治上效忠于共产党，但是，西班牙历史学家胡利奥·阿罗斯特吉和赫苏斯·A·马丁内斯在其出版于一九八四年的著作《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却对这些证据视而不见。他们还无视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其未发表的回忆录中所提供的关于米亚哈这种共产党员人数的关键证言，虽然他们以批评的态度研究过这部回忆录。这种无视不利证据的做法使他们可以令人吃惊地宣称，所谓米亚哈的共产党员身份“纯属无稽之谈”。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人成为“他的主要政治顾问”，他“与他们很少存在意见分歧”。

两位作者否认米亚哈将军效忠于共产党显然是为了支持他们热衷的论点：西班牙共产党以及依附于它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并不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的支配性力量。我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情况是这样的。例如，曾经短期就职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共产党员恩里克·卡斯特罗写道：“共产党像一个无形的上帝一样控制着一切：城市和人民；米亚哈，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每一个人！”共产党人确实没有占据大部分位置，但是他们占据了大部分关键职位：主席，作战委员（后来的民兵代表），公共秩序委员和军需委员。另外，他们在委员会中占据的位置是其他任何意识形态团体的两倍，这明显违背了米亚哈将军接到的命令：委员会由所有党派的成员组成，人数与各党派在政府中的代表成比例。除此之外，就评估共产党人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的真正影响而言，同样重要的是有利于共产党的外部因素：他们的第五团的声望，国际纵队激动人心的到来以及令大多数左派团体无限感激的苏联顾问、飞机和坦克的存在。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中，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让人们接受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引起激烈争论的某些措施并非难事。

尽管《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对于西班牙内战史的编撰研究是一个宝贵的贡献，因为它第一次利用可以找到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全面论述了它在马德里保

卫战中的关键作用、米亚哈将军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之间的摩擦以及共产党人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之间火山爆发式的冲突，并且提供了迄今为止未被发现的大量资料，但是，随意否认米亚哈政治上效忠于共产党并且过分热衷于淡化共产党在委员会中的真正影响——甚至达到把共产党人自己对其重要作用的描述贬为“言过其实”的程度——损害了它的客观性。

在列举共产党人所占据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一些重要职位之前，有必要暂时离开这个话题，叙述一下著名亲共历史学家曼努埃尔·图尼翁·德拉拉（一位对立的左派作家说他是“一个进步的天主教‘历史学家’，一九三六年以来一直按照共产党人的规矩办事”）利用其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尽管这本书很重要，但是，在极其广阔的场景中，它的主题涉及的只是一个狭小的领域——所写的序言对我耗费四十年精力研究撰写的《西班牙革命》的全面攻击。“[如此]严谨地研究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这种具体事件对于打破‘博洛滕神话’是一种间接的贡献。这个神话是来自国外尤其是来自美国的、与西班牙内战史的编撰研究有关的诸多神话之一，制造这个神话的那本书所堆积的资料和证据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却将其整个研究服务于作者企图证明的某个先入为主的观点。非常奇怪的是，作者是在开始他的工作后经历了这一‘意识形态’先验化的过程。”

的确，一九三六年作为合众社的英国记者开始记录报道西班牙内战和革命时，我其实像许多支持共和派的记者一样，深受共产党战时宣传的影响，结果，我用了多年时间才挣脱了妨碍我思考的谬论和谎言的羁绊。显然，假如我没有向西班牙共产党及其国内外友人所制造的大量关于内战和革命的神话提出挑战，图尼翁·德拉拉不会对我表示不满。

下面这些主要以《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一书所提供的资料为依据的例子表明，在委



员会内部，由于共产党人的支配地位，由于其他党派在某种程度上的顺从或默许，他们在三个重要问题上随心所欲到了何种程度。

第一个例子是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排除在委员会之外。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里看到，该党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消灭的目标。就连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都承认，“坚决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排除在外的是共产党，而其他党派则没有“表示丝毫的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委员会中的代表冈萨雷斯·马林应当意识到这种排斥可能危及全国劳工联合会，可是，就连他也没有站出来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说话。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证实，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与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排除在委员会之外有牵连，他们引述了看上去好像是社会党执委会成员曼努埃尔·阿尔瓦尔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地方领导人恩里克·罗德里格斯作出的以下声明而没有提出质疑：“罗森堡大使不同意你们加入委员会。这当然不公平，但是，你们应当理解，苏联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在苏联的援助与支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之间，只可能作出一种选择。”十一月二十九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喉舌《战斗报》宣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加入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阻力不仅来自西班牙共产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而且来自“更高层——来自苏联大使馆，它与苏联驻巴塞罗那领事馆一起，正在煽动人们谩骂诽谤我们。……无论如何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以向我们提供援助为条件，想方设法……干预甚至操纵西班牙的政治事务。”

一月二十九日，根据共产党代表伊西多罗·迭格斯的建议，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在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批准没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报纸《红色战士》及其设在马德里的广播电台，用迭格斯的话说，这是因为它们“专门与政府和人民阵线作对”。随即，担任公共秩序代表的共产党人何塞·卡索拉宣布，由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非法”组织，他将没收它的所有房屋和汽车。再次没有反对意见，就连

富有激情、能言善辩、出席了会议的冈萨雷斯·马林也没有表示反对。尽管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排除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之外是委员会对共产党和苏联言听计从的一个重要例证，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却认为，这件事与西班牙共产党有关，也可能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有关，“但是，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无关”。

第二个关于共产党支配地位的例子是它在马拉加于一九三七年二月陷落后对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操控。当时，如同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里看到的那样，它对所有军事指挥岗位开展了一场强有力的清洗运动，尽管这场运动针对的是受到怀疑或不称职的军官，但其主要目的是清洗拉尔戈·卡瓦列罗任命的人，后者妨碍了它控制军队的努力。并非巧合的是，二月十三日，共产党代表迭格斯以委员会的名义给拉尔戈·卡瓦列罗写了一封信，敦促其强制征兵并且统一指挥权，信中的要求还包括，清除“动摇分子和可疑分子以及所有那些以其无能或消极为敌军行动效力的人”。这一要求针对的是共产党人深恶痛绝的国防部副部长何塞·阿森西奥将军，三天以后这得到证明，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在当天的报纸上谴责阿森西奥是那个“造成失败的人”，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尽管如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担任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军事行动部门负责人的恩里克·卡斯特罗多年以后所说，对军事指挥岗位的清洗运动是共产党“向取得支配地位又迈出的一步”，但是，委员会中似乎没人察觉这种危险，因此，由迭格斯、马克西莫·德·迪奥斯和冈萨雷斯·马林组成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批准了向卡瓦列罗本人递交的那封信，并且允许在报刊上发表。就这样，委员会参与了共产党针对总理的阴谋活动。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里看到，在内阁中的反对派同时施加的难以抗拒的压力下，卡瓦列罗被迫将阿森西奥解职。显然，在对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的攻击中，共产党操控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能力是个重要的因素。因此，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所谓“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猛烈攻击与委员会无关[al margen de]”并非事实。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关于共产党人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起主导作用的例子是公共秩序委员圣地亚哥·卡里略及其继任者何塞·卡索拉为将马德里的警察职能大权独揽而采取的直接行动。委员会刚一成立，卡里略立即安排他最信赖的五个助手担任他那个部门的高级职务，这五个人是阿尔弗雷多·卡韦略、费尔南多·克劳丁、费德里科·梅尔乔、路易斯·罗德里格斯·奎斯塔和塞贡多·塞拉诺·庞塞拉，他们或是刚刚加入共产党，或是马上就要加入共产党。据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说，治安部门“完全专业化”，各个党派和工会的独立警察小队不复存在，共产党成功地控制了新组建的治安部队，它采取强硬的手段使其追随者在治安部队中占据了“优势”。假如社会党和共和派委员反对的话，这种由一个政党将警察的职能大权独揽的局面就不会那么容易形成。但是，他们并未表示反对，他们没有这样做明显反映了当时存在于委员会内部的真正的权力关系以及共产党的主导作用。这是默认共产党的支配地位的一个典型事例。直到一九三七年四月，当卡索拉与冈萨雷斯·马林之间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终于因全国劳工联合会谴责共产党的屠杀行为和私设监狱而以一场激烈的正面交锋表现出来时，委员会中的社会党和共和派代表才第一次隐约显示出他们的忧虑，另外，据阿罗斯特吉和马丁内斯说，“特别是由于‘反无政府主义恐怖’不可避免的过分行为……一个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派的反共阵线似乎逐渐形成”。如果不是因为四月二十三日在马德里成立了一个新的城市委员会导致拉尔戈·卡瓦列罗解散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话，尽管不能断言这种新的力量重组将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是几乎不必怀疑，共产党人在这个机构中的支配能力足以使他们改组马德里的治安部门并将其集中控制在自己手里。

在共产党的部队拥有最好装备的军事领域，它不仅要确保马德里军区司令米亚哈将军在政治上的效忠，而且要保证得到他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少校的积极支持。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罗霍曾加入过共产党，但是，在组织马德里保卫战的过程中，他与马

德里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以及正式身份为苏联大使馆武官的苏联顾问弗拉基米尔·戈列夫将军长期密切的合作可能使他具有某种暧昧的经历并且使他得到苏联人的欣赏。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内战期间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对他的赞扬看出来，而且可以从另一些苏联参战者在内战结束多年以后对他的赞扬看出来。西班牙共产党一九六六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官方内战史中为他保留的段落也证明了这一点。“由于他对军事技战术的广泛了解，”该书写道，“比森特·罗霍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作为一个笃信宗教的人，他以堪称典范的忠诚献身于人民和共和国的事业。他以冷静和胆量，以其战略家和组织者的能力，很快赢得了普遍的尊重。”

一九三六年九月，罗霍作为公众人物出现在内战的舞台上，当时他向守卫被包围的托莱多城堡的何塞·莫斯卡多上校提出了投降的条件。那里是享有盛名的西班牙步兵学院，战前，作为一名军事史教授，他在学院颇受器重；叛乱爆发的头几天，大约一千八百名男女老幼逃到那里避难。根据塞西尔·伊比那部以大量口述和书面资料为基础的激动人心的围城记事，罗霍的态度含糊不清。在莫斯卡多拒绝了投降条件之后，有人问罗霍为什么不留下来与守军在一起。“罗霍显得忧心忡忡。‘如果我留下来的话，我在马德里的妻子和孩子今夜就将被杀害。’他说。直到后来人们始终没有注意到，罗霍回避了他是否愿意留下来这个问题。在眼睛被再次蒙上之前[被护送离开城堡之前]，罗霍把烟荷包里的东西倒在桌子上说：‘这是我能留给你们的最好的纪念。’当一条绷带蒙上他的双眼时，就像一个军人面对共和派的行刑队时也许会做的那样，他突然高呼：‘西班牙万岁！’尽管这是一句君主主义者的口号，其含义却可以作多种解释——罗霍少校暗指的是哪一个西班牙？在考虑为了摧毁城堡挖掘地道的问题时，罗霍再次像他离开这座建筑时那样含糊不清地低声说：‘为了上帝的爱，继续寻找地道的入口。’”

无论比森特·罗霍政治上实际同情哪一方，真相已经与他一起被埋葬在西班牙了。他

在内战结束多年以后获准返回西班牙，一九六六年六月在那里去世。作为共产党第五团的第一政委，卡洛斯·孔特雷拉斯与罗霍非常熟悉，就连他也承认，共产党对罗霍的忠诚从来没有绝对的把握。尽管热情赞扬了罗霍的军事才能，科利佐夫也对他的政治观点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怀疑。“说到比森特·罗霍，”科利佐夫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他过于含蓄，几乎不谈论政治事务，他对热点问题保持沉默，也许他对某些事情从来就不发表意见。我希望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目前的马德里保卫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成就。这比那些来自君主主义旧军队的革命新贵往往空洞无物的高谈阔论更有分量。罗霍教导士兵，他建立了从人民中选拔的军官骨干队伍。……应当写一些关于为自由而战的西班牙人民的新型军事艺术的新书。比森特·罗霍会写。还应当写一些关于他的书。”无论罗霍个人的政治信仰是什么，毋庸置疑的是，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对工作的全力投入，最重要的是，他愿意在不掌握军队控制权的情况下与西班牙共产党人合作，尤其是在战争后期，所有这些使其他考虑不是问题。很快，他从少校晋升为中校，接着是上校，最终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晋升为将军。一九三七年五月，他成为总参谋长，在这个岗位上，据一位言之有据的职业军官同事证实，他尽其所能加强了共产党在军队中支配地位。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一九三九年二月加泰罗尼亚地区沦陷、左派的军队越过边境逃到法国以后为止。确信已经战败的他拒绝跟随共产党控制的内格林政府返回中部地区。这是他在两年多稳定而密切的合作期间唯一一次与共产党的政策发生重大分歧。

为了评估罗霍在内战期间的政治立场，不能忽视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所提供的证据。一九三八年四月，加尔塞斯被内格林任命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当时他为共产党效力。一九七四年接受西班牙历史学家埃莱诺·萨尼亚的采访时，加尔塞斯说：“毫无疑问，罗霍按照共产党人的规矩办事。他对他们完全认同，已经达到希望入党的程度。内格林与他交换意见，不允许他这样做。一九三八年秋天内格林对

他说：‘在我们为得到援助正与英国人谈判的关键时刻，你不能成为共产党员。’ ”

导致某些历史学家忽视内战期间罗霍采取的亲共立场的一个因素可能是他的天主教信仰，不顾对自己的致命危险，他公开承认这一点。此外，内战之前就认识罗霍的职业军官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说，他不喜欢阿萨尼亚，“他的政治观点显然与左派相去甚远”。

曾任第五团团长的前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罗霍与众不同的情况：“罗霍绝不可能在政治上理解共产党。他之所以接受共产党，因为他认为，它不仅是一支政治力量，而且是一支军事力量；因为他知道，只要他正确行事，党将保护他不受任何人和事物的伤害。但他不是共产党员，永远也不可能是。他盲目地相信上帝，因此，他是一个怀着某种神圣感笃信宗教的人，以致不顾身为一名激进的天主教徒当时使他处于致命危险的现实，并不隐瞒自己的信仰。”

尽管罗霍确实没有加入过共产党，但是，同样可以确定的是，一个没有身份标签的人往往能够更好地为共产党效力。内战初期，当第五团团长卡斯特罗派一个民兵前去伺候罗霍时，他吩咐说：“我们需要他。他可能对党非常有用。” “可是……他是一个天主教徒。” 那个民兵表示反对。“也许原因就在于此。” 卡斯特罗回答道。

在一段关于比森特·罗霍的尖锐深刻的文字中，M. 特蕾莎·苏埃罗·罗卡写道：

一个问题出现在脑海里：与共产党人截然不同的罗霍为什么屈从于他们呢？有人说他是随遇而安。这个答案似乎过于草率。我们已经提到一种说法，断言他实际上是他为之而战的那一方的“囚犯”。……如果真的是共产党人建议任命他为马德里保卫

战的参谋长以及后来的总参谋长，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出于对国内尤其是国外舆论的考虑，他们一直热衷于维持一个民主政府的门面。莫非他们[出于同样的理由]也对使军队里有一个不问政治、信奉天主教并且稳居最高职位的军官感兴趣？……这一切有助于他们显示一种民主的外表，同时把所有权力抓在手中。可能罗霍受到了压力，更有可能是他的家人受到了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他屈服。正如我们所知，罗霍是西班牙军人联盟的成员。另一些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被枪毙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许感到不屈服不行，这使得共产党人有机会既利用他的军事才能又利用他的个人特征。

罗霍对保卫马德里的巨大贡献不仅被对米亚哈的宣传所遮蔽，而且因富有个人魅力的埃米利奥·克莱贝尔将军率领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戏剧性地登场而黯淡无光。

据苏联报纸《布科维纳苏维埃报》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克莱贝尔的真名是曼弗雷德·扎尔曼诺维奇·斯特恩，他的化名来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将军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显然，这在苏联官方保持沉默的近三十年中还是第一次，其间没有任何苏联方面的消息来源曾经透露过他的全名，只有苏联叛逃者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一九三九年准确地说出克莱贝尔姓斯特恩。如同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那样，现在已经弄清的是，他并不是某些历史学家误认为的那个化名格里戈罗维奇将军的格列戈里·M·施特恩（或斯特恩）将军，后者从一九三七年五月开始担任苏联在西班牙的首席军事顾问。

据熟悉克莱贝尔的第五团第一政委卡洛斯·孔特雷拉斯说，一九三六年九月这位将军从苏联来到西班牙，暂时与当时开赴阿尔瓦塞特的第五团一起行动，他在阿尔瓦塞特帮助组建了国际纵队最初的部队（第十一旅和第十二旅）并于十一月八日开进马德里。在马德里，他被派往最危急的前线阵地——大学城和田园之家。没过几天，

他的声望超过了米亚哈。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的德国共产党人古斯塔夫·雷格勒证实，克莱贝尔是“马德里真正的保卫者”并且创造了国际纵队不可战胜的传奇，他“上百次冒着生命危险[并且]具有西班牙英雄所必不可少的魅力”。“马德里人认为他相貌英俊，”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负责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他们毫无语言困难地记住了他的名字。他们在说出这个名字时通过自我暗示赋予他最高尚的美德和最强大的力量。他的名字使所有人都黯然失色。”在国际纵队第十二旅的台尔曼营担任营长的德国共产党作家路德维希·雷恩比克莱贝尔晚几天到达马德里，他发现，报纸“充满了关于第十一旅和克莱贝尔将军的报道，一周前还不为人知的克莱贝尔现在是西班牙最受欢迎的人。他击退了佛朗哥最精锐的部队摩尔军团和外籍军团”。外国新闻界也对克莱贝尔大加赞扬。“他是当时的风云人物，”赫伯特·马修斯回忆说，“我们都突出地宣传报道他——因为他实至名归。”

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写道：

通过采访和特写，作为激动人心的风云人物，克莱贝尔被介绍给世界，他注定要在西班牙和世界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的体型相貌给这一段传奇增添了色彩。他身材高大，浓眉大眼，浓密的灰发使他看上去不像四十一岁。介绍给世界的克莱贝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人，一个入了加拿大国籍的出生于奥地利的人，作为俄国的奥地利战俘，他参加白卫军与布尔什维克作战，最后才改信共产主义。……我认识克莱贝尔及其妻子儿女和兄弟许多年了。他实际上姓斯特恩，出生于布科维纳。……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名现役军官，被沙皇的军队俘虏，然后被送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战俘营。苏维埃革命之后，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和红军。……后来他上了伏龙芝军事学院，一九二四年从那里毕业。我们在总参谋部情报局短暂共事过一段时间。一九二七年克莱贝尔被派往共产国际的军事部门。……他曾为共产国际去中国执行过秘密任务。克莱贝尔从没有去过加拿大，也从没有参加过白卫军。这些虚构



的履历是用来掩盖他是一名红军军官这一事实的。这使其国际纵队指挥官的身份更容易被人所接受。实际上，尽管分配给了他这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他在苏联的国家机器中并没有实权。

据孔特雷拉斯说，克莱贝尔在马德里保卫战中声名鹊起立即引起了米亚哈和卡瓦列罗的妒忌。“他在人民当中的声望害了他。”孔特雷拉斯对我说。不过，他并没有透露，如同证据表明的那样，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对克莱贝尔的声望不满，因此，对他的死可能同样负有责任。另外，所有发现自己的历史地位将因克莱贝尔的突然走红而黯然失色的西班牙人全都对他表示不满，导致这种不满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妒忌，民族自尊心也是一个有力的因素。“西班牙共和派的民族自尊心因成功地保卫了马德里而高涨，”弗尔·约翰斯顿在他那部国际纵队史专著中写道，“因此，米亚哈和总参谋部不愿意看到公众的目光如此集中地关注一个外国人。似乎由于这个原因，应西班牙共产党的要求，至少是经西班牙共产党同意，[一九三七年]一月初国际纵队政治部突然将克莱贝尔从马德里调走。”另一方面，孔特雷拉斯说，苏联军事顾问戈列夫将军向米亚哈和罗霍建议把克莱贝尔调走。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因为，这个决定可能是戈列夫考虑到西班牙人的自尊心并在西班牙共产党和国际纵队政治部同意的情况下作出的。值得一提的是，据当时担任国际纵队军需官的路易斯·费希尔说，法国共产党的代表、有阿尔瓦塞特“屠夫”之称的国际纵队政治部主任安德烈·马蒂与克莱贝尔将军“势不两立”——阿尔瓦塞特是国际纵队的大本营。

现在我们知道，对克莱贝尔的攻击是比森特·罗霍发起的，然而不一定是受到了指使。根据他本人谨慎的说法判断，在克莱贝尔事件中，他似乎得到戈列夫的大力支持；另外，在一九三七年一月科利佐夫使他进入公众视野之前，他一直没有受到西班牙新闻界的关注。新闻界的忽视必定极大地伤害了这个为组织马德里保卫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并且解释了他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英勇的西班牙》一书中完全

无视克莱贝尔的存在的原因，尽管这本书列出了马德里前线各个防御阵地上的西班牙指挥官的姓名。当然，罗霍不可能忘记克莱贝尔。实际上，在克莱贝尔到达马德里仅仅十八天后的十一月二十六日写给米亚哈将军的一封信中，罗霍谴责了对克莱贝尔“言过其实”的宣传及其“人为的”声誉和“虚假的”指挥才能。他认为：“克莱贝尔的部队正在浴血奋战，但仅此而已，不是由他指挥的其他部队也在浴血奋战。”另外，他指责克莱贝尔关于军事形势的报告不真实、不服从命令而且怀有政治野心，他还警告米亚哈提防“可能使你丢掉职务的暗中操作，你的部下都能看到，你正在积极地履行职务”——三十一年过后，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的《这就是马德里保卫战》一书中，他第一次公布了这封信。

罗霍究竟是主动出击，还是事先知情，甚至是受到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的怂恿，这可能永远无法证实，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回忆录和历史著作几乎不提克莱贝尔对保卫马德里的重要贡献。实际上，就连最受公众关注的马德里前线共产党民兵指挥官恩里克·利斯特，还有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多洛蕾丝·伊巴露丽（热情之花），尽管他们在回忆录中用大量篇幅回忆了首都的保卫战，可是都对克莱贝尔避而不谈。甚至在事情过去三十一年之后，一九六七年出版的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只用几行文字含糊其辞地提到克莱贝尔，却不吝篇幅地赞扬罗霍。所有这些证据都支持了以下怀疑：与迄今为止人们所认为的相比，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更多地参与操作了克莱贝尔的调动。因此，难以赞成弗朗茨·博克瑙一九三七年提出的说法：克莱贝尔的失势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米亚哈和无政府主义者联手造成的，他们怀疑他正在策划一场由国际纵队支持的共产党政变。多年以后，一些历史学家在没有充分可靠证据的情况下重复了这一说法。正当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信中劝告后者尽量“防止西班牙的敌人认为它是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之际，以这支人数不多的部队离开前线发动一场反政府政变的主意与共产党

人为在西班牙控制政府所设计的更阴险的计划完全不符。就连博克瑙似乎也怀疑自己的说法的合理性，尽管他没有说明原因。

调离马德里之后，克莱贝尔暂时退隐于巴伦西亚，在拒绝了拉尔戈·卡瓦列罗向他提供的一个正在迅速崩溃的马拉加前线的次要职位之后，一九三七年夏天，在没有进行以前那种宣传的情况下，他出现在阿拉贡前线指挥第四十五师，没过多久，当时的总参谋长罗霍将他从那里调走。据卡洛斯·孔特雷拉斯说：“罗霍找到一些调动克莱贝尔的理由。他不想离开，非常烦恼和悲伤。”此后不久他被召回了苏联。尽管传说他被枪毙了，但是，直到二十八年后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在《布科维纳苏维埃报》上发表，他遭到清洗这一事实才得到了铁幕后面的消息来源的证实。“他的命运是个悲剧。”文章写道，“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他受到不公正的指控和判决。他死在一个[劳改]营里，后来[死后]被恢复了名誉。”

### 第三十一章 苏联军官、记者和外交官

无论是埃米利奥·克莱贝尔在马德里保卫战最困难的那些日子的短暂荣耀，还是比森特·罗霍少校在后方进行的非常宝贵的组织工作，都不应抹杀苏联军事顾问弗拉基米尔·戈列夫将军所起的作用，他指挥着中部前线的苏联炮兵、坦克和空军部队。路易斯·费希尔在西班牙可以随意接近苏联军官，据他说，戈列夫是马德里的真正英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他在战后写道，“我去国防部拜访掌控军事形势的戈列夫将军。……他组织了马德里保卫战。与其他人相比，他才是马德里的救星。”这也是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的看法。另一方面，在科利佐夫的日记中，凡是提到戈列夫的内容，无论明显还是隐晦，不是被作者去掉了，就是被苏联的书报检查人员删除了，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它在一九三八年发表时戈列夫将军已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销声匿迹，同时，科利佐夫日记则给予罗霍慷慨的赞扬。对比之下，斯大

林死亡十年后，《消息报》记者伊利亚·爱伦堡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对罗霍只是一笔带过，却以显著的位置记述了戈列夫的经历。他写道：“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戈列夫很少造访[国防]部的地下室；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他不到四十岁，但却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他聪明、含蓄，同时充满激情——我甚至可以说他富有诗意，因此赢得了大家的尊敬。要说人们信任他一点也不为过：他们认为他是福星。六个月后西班牙人学会了如何打仗，产生了才华出众的指挥官——莫德斯托、利斯特以及另外一些不那么出名的人。但是，在一九三六年秋天，可能除了参谋长罗霍之外，共和国军队的指挥官中几乎没有具有魄力和军事知识的人。在十一月的那几天，戈列夫发挥巨大的作用帮助西班牙人在马德里外围阻止了法西斯分子的进攻。”即使是坚决否认戈列夫“或其他任何外国人”负责指挥了马德里保卫战的罗霍也承认，戈列夫将军“大部分时间”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苏联作战物资陆续到达之后那一段为马德里而战的艰难时期”，通过“有效的配合”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

这样看来，现有的证据清楚地表明，在充分肯定克莱贝尔在战场上作出的重要贡献的情况下，组织马德里保卫战的功劳属于密切配合共同努力的罗霍和戈列夫两个人。

内战期间被人称为格里申将军的扬·K·别尔津将军是苏联在西班牙的首席军事顾问，因为苏联多年的沉默导致人们经常把戈列夫将军与他混为一谈，所以有必要指出的是，他们各自的身份如今已经得到明确的确认。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一年间苏联出版的一些书籍表明，戈列夫是苏联大使馆武官兼米亚哈将军的顾问，因此也是比森特·罗霍的顾问，而别尔津则是地位最高的苏联军事顾问。

据苏联问题专家戴维·达林说，别尔津是苏联总参谋部情报局即格鲁乌（ГРУ）的首

任局长，领导这个情报部门达十五年之久。他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并被派往西班牙领导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事实说明了西班牙内战当时在斯大林眼中的重要程度。据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惠特克·钱伯斯说，被朋友们称为老头（Старик）的别尔津是其“国际负责人”，在美国活动的苏联间谍网知道他的这个绰号。

在马德里保卫战中，戈列夫得到一批苏联高级军官的帮助：Г.И.库利克，戈列夫的直接上司，在西班牙被称为库珀尔将军，担任中路军司令波萨斯将军的顾问；Д.Г.帕夫洛夫，化名巴勃罗将军，指挥苏联坦克部队；Н.沃罗诺夫，化名博尔特，负责苏联炮兵部队；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人称道格拉斯将军，苏联空军部队指挥官并且担任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少校（后来晋升为将军）的顾问。一九三六年九月七日被海军和空军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任命为空军司令的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是一位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和普列托的私人朋友，他出身于阿拉瓦省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妻子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是著名的保守政府首相安东尼奥·毛拉的外孙女。在内战爆发初期，由于共产党人的纪律性和效率及其得到来自苏联的援助，像许多社会党人一样，伊达尔戈与妻子一起加入了共产党。

说起一九三七年二月重要的哈拉马河战役，共产党人指挥官恩里克·利斯特谈到了帕夫洛夫：“从二月六日到十三日，他实际组织了共和派的抵抗。巴勃罗将军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他聪明、勇敢并且可以迅速作出决定；他在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安东尼奥上尉是将军不可或缺的助手，担任他的翻译、副官和秘书以及我不知道的其他工作。我是在列宁学校认识的上尉，他在那里叫平托斯，战后他回到自己的祖国，用真实姓名克拉夫琴科夫获得了苏联英雄的最高奖励。”关于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Г.普罗科菲耶夫空军少将写道：“[他]是组织共和国空军大规模行动的灵魂。”

别尔津、戈列夫、帕夫洛夫、斯穆什克维奇和一九三七年五月接替斯穆什克维奇的E.C.普图欣，还有同一时间接替别尔津、在西班牙化名格里戈罗维奇将军的格列戈里·M.施特恩（或斯特恩）均在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间斯大林的清洗中被杀害。“在此期间，”苏共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发表的谴责斯大林的著名讲话中宣称，“在西班牙和远东获得了军事经验的指挥员骨干几乎全部被清洗。”据竟然免遭清洗的伊利亚·爱伦堡说，许多在西班牙作战的苏联指挥官“随后几年成为滥用权力的牺牲品”。路易斯·费希尔把处决他们归因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与红军之间“长期的激烈竞争”，红军不满自己“受到部队中不明人员的暗中监视，监视者搜集真假情报供内务人民委员部滥用。……这种状况早在西班牙内战之前就存在，内战只不过加剧了这种状况而已。在西班牙的苏联军官告诉我，他们始终受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随意摆布’和‘暗中监视’。他们向斯大林发泄自己的不满，结果却被处决了”。

在西班牙的苏联记者的命运好不了多少。《消息报》的爱伦堡，塔斯社的米罗娃和《真理报》的科利佐夫，这三个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著名记者都是犹太人，他们当中只有爱伦堡幸免于难。米罗娃在一九三七年返回莫斯科后被逮捕，此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至于科利佐夫，他既是杰出的记者和文人，又是斯大林在西班牙的私人代表，每天要从马德里通过电话与这位苏联独裁者讨论一两次西班牙的形势，据权威的《苏联名人录》记载，他在一九三八年被捕，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死于监禁中，死后名誉得到恢复。特别有意思的是，尽管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十三卷收入了科利佐夫的条目，然而，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亡之前准备出版的第二版第二十二卷中，他的条目被删掉了。他的文集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间出版，当时他仍然深受斯大林的宠爱，但是，直到这位独裁者死了四年之后的一九五七年，他的文集才得以再版。在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时期，科利佐夫

的弟弟Б.Е.叶菲莫夫在一九五九年莫斯科出版的《苏联作家》

(《Совет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第一卷的科利佐夫条目中说，他“死于暗藏的人民敌人的罪恶之手”。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六年间在列宁格勒出版的《苏维埃俄罗斯散文作家》(《Русские совет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прозаики》) 更加直言不讳：“在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期，当科利佐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成为暴政和专制的受害者时，他的文学和社会活动戛然而止。” 不过，受后赫鲁晓夫时代对斯大林比较温和的态度的影响，一九七三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第十二卷虽然恢复了科利佐夫的条目，但是没有提到他的死。

一九三八年返回苏联之后科利佐夫并没有立即被捕，因为他在当年五月探望了路易斯·费希尔。“他仍‘一切正常’。” 费希尔在一九四一年写道，“这也是他竟敢来看我的原因。同一年[一九三八年]他遭到清洗。他的文章和书籍不再发表和出版，他的朋友大部分都认为他被枪毙了。他可能是仅次于拉狄克的最有影响的苏联记者。顺便说一下，科利佐夫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中的‘卡尔科夫’。科利佐夫对西班牙充满了感情。但是，在与陌生人交谈时，他把自己隐藏在一团烟幕中，因而产生了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的同样冷漠的文字——编辑的废话和文章的糊弄。这使他显得华而不实，玩世不恭。” 英国作家克劳德·科伯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是伦敦的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的记者，化名弗兰克·皮特凯恩，他在退出英国共产党之后所写的自传里对科利佐夫作了下面这番描述：

我与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相处过很长一段时间，当时他是《真理报》的主笔，更重要的是，他在那一段时间还是斯大林本人的好友、喉舌和直接代理人。他是一个粗壮的小个子犹太人……有一颗硕大的脑袋和一张我曾见过的表情最为丰富的脸。他的脸上经常露出一一种极其快乐的表情——和一种强烈的期待，尽管环境令人沮丧，他仍然期待你和其他所有人尽力使事情更加有趣。他说话尖酸刻薄[他曾经是莫斯科的讽

刺周刊《鳄鱼》的编辑]，对其认为平庸无能甚或只是华而不实的人冷酷无情。不太了解他的人——尤其是那些非俄罗斯人——认为他的谈吐、他讲的辛辣尖刻的犹太笑话以及他对所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和事的冷嘲热讽玩世不恭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在我看来，把一个对生活怀有如此炽热感情的人说成“玩世不恭”绝不会是恰当的。实际情况可能是，因为其含有或可能含有的某种意思，人们生硬地使用了这个词，但这样使用并不正确，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当西班牙内战走向可怕的结局而支持共和派的欧洲各国人士真正变得玩世不恭、心灰意冷、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信心和热情时，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渴望与科利佐夫交谈。……他是一个能够看出失败的真正原因的人，他想象得到半数高喊的口号是空话，许多著名的英雄不是滥竽充数就是江湖骗子，但这不会让他烦恼，也不会减弱他的精力和热情。……科利佐夫曾经让我担任《真理报》驻伦敦记者。这个职务我只担任了很短一段时间，因为没过不久就传出了他消失的消息。作为他个人任命的人，我只能不声不响地离职。我不知道科利佐夫哪一天在莫斯科出了事或者据说出了事。他的垮台——以及据人们推测他被处决——发生在他位高权重的时候，因此，许多人听说之后无法相信。他们散布消息说，他被作为高级特工以另一个名字派往中国。他的许多朋友多年来始终对此深信不疑，一厢情愿地安抚自己悲伤的心情。他出事的消息使另一些朋友方寸大乱，他们变得心灰意冷，彻底变成玩世不恭的人。

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以最高顾问的身份在西班牙工作的苏联高级军官中，只有一九三七年被召回苏联的别尔津和戈列夫是内战期间遭到清洗的。其他人是后来遭到清洗的。

据《苏联名人录》记载，别尔津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当年死于监禁中。不过，《苏联军事百科全书》

(《Советская воен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和《苏联大百科全书》说他死于一九



三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尽管苏联方面的消息来源多年以后才证实他遭到了清洗，例如，伊利亚·爱伦堡在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的《共青团真理报》和一九七〇年苏联出版的《在西班牙作战的拉脱维亚人》曾经分别予以证实，但是，瓦尔特·克里维茨基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声称他消失了。鉴于现在已经知道，内务人民委员会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而且克里维茨基对苏联的秘密警察了如指掌，所以，他揭露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具有不容否认的可信度，尽管人们还记得，当年由于共产党人为把他打成江湖骗子而开展的造势宣传，他的揭露被斥为谎言。实际上，克里维茨基揭露的事情为扬·别尔津和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遭到清洗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合理的解释，后者是胡安·内格林的财政事务顾问，与别尔津一样，他们似乎都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所作所为。克里维茨基写道：

别尔津将军担任红军军事情报局的负责人达十五年之久。他是拉脱维亚人，十六岁时领导一支游击队与沙皇进行革命斗争。……别尔津加入了托洛茨基指挥的红军并且晋升到红军总司令部里的一个重要的职位。身材魁梧、已生华发、少言寡语、足智多谋的别尔津被斯大林挑选出来组织并指挥[西班牙的]共和派军队。

斯大林在西班牙的首席政治代表是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他是波兰血统。矮小粗壮的他看上去像个商人，名义上是苏联驻巴塞罗那的贸易代表。不过，斯塔舍夫斯基也曾在红军里供职。他辞去军队的职务接受了整顿苏联皮革工业的任务。他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斯大林立即派他去控制西班牙共和派的政治和财政。……

一九三七年三月，我看到别尔津将军写给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一份秘密报告。[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叶若夫也看到了这份报告。……别尔津报告说，我国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正以擅自干涉政府事务并且刺探政府情报的方式损害苏联在西班牙的威信。他最后要求，立即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特工

负责人亚历山大·J·奥尔洛夫从西班牙召回。“别尔津完全正确。”我看完这份报告之后斯卢茨基对我说。斯卢茨基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外部门的负责人，他接着说，我们的人在西班牙的行为好像他们是在一个殖民地，甚至对待西班牙领导人都像殖民者对待土著一样。当我问他将对奥尔洛夫采取什么措施时，斯卢茨基说，那要由叶若夫决定。

叶若夫是当时正在进行的大清洗的总指挥，他本人就是把西班牙当作苏联的一个省看待的。另外，别尔津在苏联各地的一些红军战友已经被捕，因此，别尔津本人的性命也不比别人更安全。由于他的许多战友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抓获，他提交的任何报告都将被视为对克里姆林宫的质疑。

四月，斯塔舍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汇报西班牙的形势。尽管他是一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一名僵化正统的共产党员，斯塔舍夫斯基也觉得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共和派控制区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像别尔津将军一样，他反对苏联人在西班牙领土上采用的专横的殖民主义方式。

斯塔舍夫斯基不喜欢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或“托洛茨基分子”，因此赞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待他们的方式，但是他认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应当尊重西班牙合法的政治党派。他小心翼翼地暗示，斯大林也许可以改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西班牙政策。“大老板”假装同意他的看法，斯塔舍夫斯基相当得意地离开了克里姆林宫。

几个月后，斯塔舍夫斯基和别尔津两人被召回莫斯科，接着便在斯大林的清洗中销声匿迹。克里维茨基说他们是一九三七年七月被召回的，他还说，当时人在巴黎的斯塔舍夫斯基的妻子告诉他，她丈夫和别尔津将军“曾路过巴黎，但只是在匆忙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停下来换车”。克里维茨基还说：“处决红军的重要指挥官对别尔津是一种不祥之兆。与斯塔舍夫斯基一样，自从大约二十年前苏维埃革命爆发以

来，他与被清洗的那些政委和将军关系密切。实际上，他在西班牙的功绩及其绝对服从的耿耿忠心一点用处也没有。”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克里维茨基明显地把别尔津和斯塔舍夫斯基的命运与他们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做法提出批评联系起来——至少部分联系起来；尽管一九三八年叛逃的奥尔洛夫到达美国之后肯定知道克里维茨基对他的指责；尽管人们还会记得，他在一九六八年回答斯坦利·佩恩提出的问题时特意诋毁了克里维茨基，但是，在《斯大林罪行秘史》一书中，他对克里维茨基的指责只字不提。

至于戈列夫将军，爱伦堡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回到莫斯科以后得知了他的“命运”，而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担任苏联大使馆海军武官和西班牙共和国舰队顾问、人称科利亚的尼古拉·Г·库兹涅佐夫在其一九六六年出版于莫斯科的书中说，戈列夫受到了“镇压”，但是没有说明时间。“人们感兴趣地注意到，”奥尔洛夫写道，“戈列夫是在刚刚获得列宁勋章两天之后被捕的，在克里姆林宫专门为表彰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杰出贡献而举行的一个仪式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加里宁向他颁发了这枚勋章。这个插曲表明，就连政治局委员也不知道谁被列入了死亡名单，处决的事情仅仅由两个人来决定：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叶若夫。”除了证实戈列夫和别尔津遭到逮捕并且未经审判被处决之外，奥尔洛夫还提供了部队指挥官科列夫和瓦卢亚的名字，他说，他们“帮助西班牙政府建立了共和国军队”，是一九三七年被从西班牙召回莫斯科之后处决的“许多苏联军官”中的两名。

除了一九三七年遭到清洗的别尔津和戈列夫，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在西班牙作战的其他苏联高级军官大部分在内战结束两年后的一九四一年——德国当年入侵了苏联——被害，只有少数人得以幸免：沃罗诺夫在国防部担任过一些高级职务，包括炮兵科学院院长；库利克直到一九五〇年还活着；库兹涅佐夫成为苏联海军的主

要指挥官并且担任过海军部第一副部长。据《苏联名人录》记载，施特恩和斯穆什克维奇当年十月死于监禁，普图欣则在六月被处决。同样为《苏联名人录》所记载，三个人均在死后恢复了名誉。

在一九七二年出版于莫斯科的一本书中，苏联著名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就西班牙内战期间的苏联飞机发表了下面的评论，对斯穆什克维奇被清洗的原因给予了某种解释。“尽管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我们的战斗机仍被证明没有德国战斗机速度快，尤其是在武器的口径和射程方面相形见绌。我们的SB型轰炸机没有战斗机护航不能飞行，而我们的战斗机不如德国战斗机，无法提供有效的掩护。无论共和国飞行员的英雄气概多么伟大，最终要看的还是作战物资的质量。出现的情况令人不快，甚至可以说令人感到莫名的意外，尤其是在它成为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飞行记录之后。然而情况的确是：我们肯定落在了我们的潜在敌人希特勒德国的后面。……斯大林对我们西班牙的挫折痛心疾首。于是，他把不满和愤怒发泄在那些不久前还被视为英雄并且正在享受他们当之无愧的荣誉的人身上。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斯穆什克维奇和雷恰戈夫，两人均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后来都蒙冤而死。”

尽管斯穆什克维奇最终确实是被斯大林枪毙的，但是并不能肯定发生在西班牙的事情是其部分缘由，因为他在一九三七年回到莫斯科之后被任命为空军副参谋长，并于一九四〇年被提拔到空军监察长的职位上。直到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当二战期间苏军在前线一败涂地时，他才被处决。

同样是在一九四一年，参加西班牙内战的苏联坦克部队指挥官帕夫洛夫将军遭到清洗，用爱伦堡的话说就是，加入了“被自己人毫无道理地消灭了”的那些人的行列。

至于以各种顾问和专家的身份参加了西班牙内战的低级军官，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死去了，但是，一些人多年后在苏联担任了高级职务，甚至获得显赫的地位。例如，П.巴托夫、И.叶廖缅科、М.亚库申、С.克里沃舍因、А.诺瓦克、Г.普罗科菲耶夫和А.罗季姆采夫成为各级将领，而Р.马利诺夫斯基和К.А.梅列茨科夫则被授予元帅军衔，马利诺夫斯基成为苏联国防部长，梅列茨科夫成为红军总参谋长。

梅列茨科夫一九三六年十月来到马德里，一九三七年六月返回莫斯科。他在第一混成旅短暂地担任过恩里克·利斯特的顾问；然后成为国防部总参谋长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的顾问，在那期间他被称为彼得罗维奇；最后短期担任米亚哈的顾问。

另一名免遭清洗的低级军官是游击战专家马姆苏罗夫·尤季—乌马尔，在西班牙叫作哈伊或克桑季，他后来成为将军。“在马德里的放荡贵族旅馆，海明威遇见我们的士兵。”伊利亚·爱伦堡回忆说，“他喜欢哈伊这个勇敢冒失的人，哈伊经常深入敌后（他是高加索山区的人，可以轻松地冒充西班牙人）。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所讲的许多游击战的事情都是哈伊告诉他的。（幸运的是，哈伊至少活了下来。我后来再次遇见他，真是感到非常高兴。）”

不是所有低级军官都这么幸运。作为德国军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德国共产党人古斯塔夫·雷格勒是著名作家和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他讲述了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应科利佐夫邀请所参加的一次聚会，苏联代表团的官员在那里聚集一堂：

首先迎接我的是工程师戈尔金。他为我们安装了探照灯，那是我们对付夜间空袭的唯一手段——高射炮还得去国外买。现在他被召回苏联，这是他的欢送会。他脸上一直挂着满意的微笑。他的工作受到称许，因此，在莫斯科他将得到奖励。……

第二天，科利佐夫访问了阿尔甘达。他在指挥所的阳台上找到我。他指着旁边的探照灯问：“这是什么？”

“戈尔金的遗产。”我答道。……

他尖声笑着说：“遗产？你这是一语成讖！”

“回去的路上他会出事？”我问道。

“不。”科利佐夫说。……“但是到达之后他会出事。……他将在到达敖德萨时被捕。”

一时我给惊呆了。然后我问：

“你怎么知道的？是政治原因吗？”

“是的，”科利佐夫说，接着他继续说道，仿佛是在谈论另一个世界，“你为什么这么吃惊？因为昨天的欢送会？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实际上，这是我们为他举办欢送会的原因。……把犯人带上断头台之前，法国人给他一杯朗姆酒。……这几天我们给他喝香槟。”

“我要进入阵地了。”我说，“我感到很不舒服。”

“一个欧洲人不太容易适应亚洲人的习惯。”科利佐夫说。

“我更喜欢美国人的习惯。”我说，“我要去迎接海明威[他刚来到西班牙，正在前线走访]。……在他身边人们可以更自由地呼吸，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的话。”

“我要和你一起去。”科利佐夫说，……“大概我也需要呼吸一下西方的民主空

气！”

（我认为，导致他死在斯大林的监狱里的是他的人性。）

有必要在这里补充说一下雷格勒向海明威描述的下面这件事，两人因此成为朋友：在埃尔·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附近的一次战斗中，朦胧中看到到处都是敌军的两名志愿军士兵惊慌失措，大声叫喊要其他人快跑。

我抓住他们把他们带到指挥所。……我决定送他们去一个疗养院，我向[国际纵队政委]马蒂报告了此事。他立即回复说他知道一个合适的地方，在埃纳雷斯堡附近。他们被带到了那里，结果，两天之前我听说，他们在那个城堡被一支苏联行刑队枪毙了。“混账！”海明威说着向地上吐了一口痰。这个动作使我成为他的朋友，后来，我不失时机地表明了这一点。我告诉他我比别人先看到的行动和危机的内幕。我让他知道我们的损失，只要可能让他提前得到消息，我断定他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他提供与共产党有关的机密材料，尽管他鄙视马蒂那一类共产党人，但他敬重共产党，因为它比其他党派更积极地投入战斗。后来他把我提供的材料用在了《丧钟为谁而鸣》里，结果，无数读者从一部虚构作品冷峻的文字中了解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听说的事情。他以猎人对偷猎者的憎恨描写了暗中监视症，这种苏联梅毒愚蠢地横行，无羞无耻，杀气腾腾。

尽管不知有多少各级苏联军官从西班牙返回之后遇害，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仍然像它的德国对手一样了解西班牙内战。实际上，红军总司令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西班牙经验的书涉及“几个从红军为行动做准备的实用角度来看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然而不应忽视的是，就在西班牙内战使得苏联可以在战场上试验新武器和新战术的同时，它也成为政治方面的新手段和新策略的试验场。反对苏联的西班牙政策的左派人士胡利安·戈尔金写道：“人们经常说，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总预演；人们不清楚的是，它还是‘人民民主政体’的第一个试验场，我们已经亲眼看到，经过改善的这种政体战后在十几个国家实行。用来把这些国家变成苏联卫星国的那些人员和手段在西班牙进行了考核和测试。由于这个原因，西班牙经验曾经而且将继续具有历史意义和普遍意义。”

正如苏联官方的《共产国际简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Крат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所指出的那样：“西班牙的事态发展表明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新的民主政体人民阵线是将反法西斯斗争与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终极目标[即共产党人掌握政权]联系起来的纽带。对于认识了解革命在即将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时所应采取的方式方法，西班牙经验的意义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充分理解和高度评价。”

尽管执行苏联的西班牙政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是在未经拉尔戈·卡瓦列罗同意的情况下到来的，但是，主要苏联军事顾问的到来却不能说没有得到卡瓦列罗的同意。实际上，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那封信——本书曾经引述过其中的一段内容——强调说，派遣军事顾问去西班牙是后者通过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反复要求”的结果。而且，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的回信中，拉尔戈·卡瓦列罗提到了“我们要求”的那些同志，承认他们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以真正的热情和非凡的勇气履行他们的职责”。

然而，尽管双方进行了这种貌似友好的书信往来，尽管斯大林向拉尔戈·卡瓦列罗保证，军事顾问已被“明确要求不得无视这样的事实，……作为在西班牙的外国人，苏联同志只有严格履行顾问的职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苏联军官必定行使的权力最终激怒了这位国防部长，并且解释了后来他谴责“不负责任的外国干涉”的原因。



由于米亚哈对苏联人事实上的依赖，他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之间很快出现了意见分歧，这可以从国防部长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发给将军的一份电报以及将军的回电中看出来。国防部长提醒米亚哈，他应当服从的只是政府发布的命令；米亚哈答复说，他注意到了拉尔戈·卡瓦列罗认为有必要提醒他记住纪律和服从的最基本原则这一事实，他说，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他从未忘记过这一原则，然后，他要求让某个值得拉尔戈·卡瓦列罗信任的人接替他。由于已经获得的声望，米亚哈料到国防部长肯定不会接受他的要求。结果不出他所料。

苏联军事顾问的行动实际上不受国防部和空军部的约束这一点得到了西班牙空军司令、共产党员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政治密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以及国防部长本人的证实。此外，国防部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证实：“我可以明确地说，空军和坦克部队整个内战期间均不在国防部的控制下，因此也不在总参谋部的控制下。国防部长及其参谋人员甚至不知道飞机坦克的数量和种类，只知道用于实际军事行动的那些飞机坦克的情况。同样，国防部长及其参谋人员也不了解战局的发展，甚至不知道暗中存在着许多由‘友好国家的顾问’以及得到他们完全信任的某些空军负责人秘密控制的[飞机场]。”

比苏联顾问人员自行其是更让拉尔戈·卡瓦列罗烦恼的也许是，共产党在军队的势力发展壮大，尤其是在中部地区。苏联军官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分配来自苏联的武器补给时对共产党人的明显优待，国际纵队的勇猛无畏，国际纵队和西班牙共产党的部队胜人一筹的高效率，所有这些都均有助于增强共产党的影响力，从而将数量可观的正规军军官吸引到它的周围。

尽管西班牙一些反对共产党的人低估了国际纵队作为西班牙军队的一个榜样所起作用的重要性，它仍然得到充分的承认。例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光明

报》写道：“因几百年来的压迫和愚昧而死气沉沉的我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这是社会等级制度表明它们完全没有组织能力的结果——必须做出与这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同志们一样的超乎常人的努力。智力在学习中得到提高。国际纵队的民兵们有机会在青少年时期培养自己的智力。另一方面，我国的民众却没有这种机会。但是，在我们胜利以后，我们将有这种机会，我们的孩子甚至将有更多的机会。我们正在为此而战；我们可以为此而死。”

“如今，”伦敦《工人日报》派到西班牙的记者写道，“忠于共和国的将军大部分都要求加入共产党，更不用说年轻的共和派军官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迹象，它表明了共产党作战行动的有效性。”另外，社会党人历史学家、支持胡安·内格林的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写道：“从不翻阅马克思主义宣传品的军官和官员成了共产党员，一些人因为私心，另一些人因为道德缺陷，还有一些人则为被该组织激起的热情所驱使。”

在加入共产党的高级军官中，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主席何塞·米亚哈将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样扮演重要角色的还有随和、衰老的中路军司令部波萨斯将军，他的苏联顾问是后来成为元帅的库利克将军，在西班牙化名库珀尔。在前西共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看来，库利克“粗俗但不讨人嫌”，“高大强壮得令人生畏，让人想到北极熊”。在恩里克·卡斯特罗看来，他“高大粗犷。……他的光头和那张冷酷的大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过，给人印象更深的是他的大喊大叫和他的手，他的两只大手摆动起来就像拉曼查风车的帆一样。他的参谋人员都害怕他”。相比之下，衰老的波萨斯冷漠而且虚弱。他不是咄咄逼人的库利克的对手，情愿让这位苏联将军当家做主，从不去为调整和平时期的生活节奏以适应无情战争的紧急状态费心劳神。“上午要到很晚才能把他叫醒。”库利克将军的副官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后来成为苏联元帅和国防部长，他的骨灰现在埋在克里姆林宫的

围墙下面——回忆说，“他用几个小时梳洗和早餐。饭后听取参谋长汇报。他的参谋长是一名上校，像他一样衰老。他们寒暄几句之后汇报就结束了。出于对事实的尊重，我必须说，他坚信自己绝对忠于共和派，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重要问题。不过，旧军队例行公事的传统严重束缚着他。”

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大选之后，波萨斯被任命为国民卫队监察长，由于他努力使这支部队效忠于共和国，从而招致军队中右翼将领的敌视。内战爆发之际，他成为希拉尔政府的内政部长，极力主张把人民武装起来。一九三六年十月担任中路军司令后，他悄悄加入了共产党，接着，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当他指挥东部地区的军队时，他又加入了共产党控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PSUC）。不过，尽管他是共产党员，但他只是一个具有宣传价值的名人，在党的核心圈子里丝毫没有影响力。

许多军官加入共产党或是受到前面列举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或是因为他们知道党员的身份可以保证他们的部队得到苏联作战物资的补给，而另一些军官却是因为共产党的温和宣传改变了信仰。真心支持共和派的职业军官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写道：

不可否认的是，共产党人是宣传艺术的大师，所以他们能够蒙骗大家。他们的宣传主要是声称他们的唯一目标是打败佛朗哥进而恢复共和国的法律。所有共产党领导人均明确表示忠于共和国政权和宪法，热情之花尤其高调，他们宣称，他们正在努力恢复宪法的尊严。他们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组建一支讲求效率、遵守纪律的军队，它将取代全国劳工联合会纪律涣散的民兵武装。他们适时地喊出这个口号，以致蒙骗了所有人。一些职业军人落入圈套，结果，由于共产党的宣传所引起的狂热，不少人轻率地加入了共产党。

至于除了赢得这场战争别无所求的我本人，我认为，共产党人冠冕堂皇的目标是赢

得战争的必要步骤。不幸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通过宣传只是为了获得军队的控制权，以便利用军队谋取私利。相对于他们的私利，与佛朗哥作战是次要的。这就是促使我反对他们的原因。

一些军官完全是因为个人动机而被共产党所吸引，尤其是战前无党派的那些军官。

“七月十八日之前无党派的那些忠于共和国的职业军队领导人几乎没有人不屈从于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势力，”担任共和国海军第一政委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布鲁诺·阿隆索写道，“有些人因为倾向性，另一些人因为意志薄弱，许多人则是因为担心没有政治背景将会导致出现一些针对他们的无法补救的蛮横行为。”

“让我提醒你一下，”共产党员安东尼奥·科登告诫国防部的一位军官同事说，“我们生活在陌生的时代，人毫无道理地遭到杀害。我郑重地建议你加入共产党。它需要你，你也需要它。”

尽管支持共和派的大部分记者和作家不了解共产党人控制人民军的目的，或者毋宁说他们担心为敌人的宣传提供材料，但是，约翰·多斯·帕索斯却直截了当地描述了他感觉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写道：“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以一种将在欧洲历史令人血脉贲张的片断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波澜壮阔的英雄气概保卫自己。此外，在后方，一场几乎像战争一样激烈的斗争已经在马克思主义的极权国家思想与无政府主义的个人自由思想之间进行。随着军队的日常需要成为比工人阶级反抗压迫的激烈斗争更重要的头等大事，共产党渐渐占据上风成为胜利的组织者。在这个高效无情的权力机器面前，具有个人自由和地方自治观念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步步退却。……现在无法回答的问题是，西班牙人民是否愿意为建立这支精锐的新军付出过高的代价，共产党……会不会只是变成一部更庞大的权力机器，这意味着它将是一部庞大的镇压机器。”

一九三七年初，多斯·帕索斯访问西班牙调查他的老朋友何塞·罗夫莱斯的失踪，结果发现后者被苏联人“在内战期间除掉了”。尽管内心深受困扰，他仍然顾虑重重地告诉了认识的所有人。多年后他表现了自己的进退两难，他写道：“如何把它说出来呢？你并不想帮助敌人。……同时你想说出真相。有些事情你感到可疑但是你还不能确定。我对自己说，只描述那些发生的事情。表面发生的事情真实地向你暗示，可能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私底下起着作用。……我所看见的、我现在知道的是，气息奄奄的自由共和国正在被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前哨阵地所取代。”

如果军队各个阶层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壮大最终使国防部长失去了耐心的话，那么，更让拉尔戈·卡瓦列罗这个神经质的人——即使对待自己的同事他也是性情固执，脾气暴躁，而且据他的副部长阿森西奥将军说，他希望亲自指挥掌控一切——不能容忍的是他的对手的胡搅蛮缠。他用强硬抵挡自己经常承受的压力，这种强硬导致他与苏联将军们以及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屡次发生激烈的冲突。

“与其说[罗森堡]是一名大使，”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密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认为，“他表现得更像苏联派到西班牙的总督。他天天来拉尔戈·卡瓦列罗这里巡视，有时由苏联高级文武官员陪同。巡视持续几个小时，在巡视的过程中，罗森堡总是对西班牙的政府首脑指手画脚，试图教给他怎样赢得这场战争。他的建议——实际上是命令——主要是针对军官的。应当解除这个那个将军和上校的职务，同时委派另一些人接替他们。他推荐这些人不是根据他们作为军官的能力，而是根据他们所属的政治派别及其对于共产党人的顺从程度。”

社会党左派议员希内斯·甘加写道：“[罗森堡的]兜里总是装着一叠写有以下或者类似内容的便条：‘应当将某师师长x撤职并且用z接替他’；‘某部雇员A没有履行职责。应当用B取代他’；‘必须把M抓起来，以叛国罪审判他’，如此等等，不一而

足。”

据阿拉基斯塔因说，罗森堡每天去拉尔戈·卡瓦列罗那里巡视时最有可能陪同他的苏联高级官员是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毫无疑问，奥尔洛夫严密监视着苏联高级外交官的态度言行，由于他的指挥部设在苏联大使馆里，这个任务很容易完成。因此，可以假定，如果罗森堡不竭尽全力推行苏联的政策或者胆敢像克里维茨基证明别尔津将军和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所做的那样批评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办事方法，那么，他的反常行为就会立即被报告给莫斯科。这也许解释了奥尔洛夫为什么在他的《斯大林罪行秘史》一书或者流亡美国三十五年间的任何书面口头证词中无论如何也避而不谈罗森堡、斯塔舍夫斯基以及一九三七年二月接替罗森堡的列昂·盖基斯被召回莫斯科的事情——他们全都神秘地消失了，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与这三个人有关的苏联方面的原始资料我只找到了爱伦堡的《战争前夕，1933—1941》。爱伦堡在这本书里说，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回到莫斯科以后得知了罗森堡的“命运”。至于斯塔舍夫斯基和盖基斯，阿萨尼亚总统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提到，内格林把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当天发来的电报读给他听，大使说，他不知道盖基斯的“情况”，也不知道“另一个与商业和财政问题有关的重要人物[显然指的是斯塔舍夫斯基]”的情况。阿萨尼亚八月六日写道：“仍然不知道……回国休假的盖基斯的下落。”十九年后，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告诉维托里奥·维达利，盖基斯“仍然活着并且已经‘恢复了名誉’”。除了这一段简短的内容，没有发现其他任何关于盖基斯的信息。

奥尔洛夫对这些即使不是天天接触也是经常打交道的高级官员的命运讳莫如深必然引起两点疑问。他为什么认为他们被莫斯科召回而且最终消失并不重要甚至不值一提呢？他可能对他们被召回负有直接责任因而对他们的消失负有间接责任吗？

无论罗森堡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办事方法态度如何，至少从表面上看，在良心许可的情况下，他一直竭尽全力推行苏联的政策。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位文雅而且显然敏感的外交官内心深处对斯大林及其派到西班牙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所实施的政策的想法，不过，尽管如此，他与拉尔戈·卡瓦列罗冲突的激烈程度只有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内阁部长的冲突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作为政府成员的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肯定被当作一个重要的见证人，据他说，两位共产党人部长与总理之间形成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紧张状态”。“非常暴力的场面出现在内阁会议上，此外，拉尔戈·卡瓦列罗还与苏联大使罗森堡先生激烈争吵。我不知道究竟是罗森堡先生的态度反映了共产党人部长的愤怒还是共产党人部长的愤怒反映了苏联大使的态度。我知道的是……苏联针对总理——或者更应当说是为反对总理——所采取的外交行动和来自共产党人部长的压力总是同时出现，而且目的相同。”

在与苏联人及其西班牙帮手的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面对自己的追随者被夺走，面对社会党内温和派固有的敌意，面对自由共和派无声的怨恨，拉尔戈·卡瓦列罗希望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支持他与顽强的对手抗衡。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谣言开始流传，说他打算组成一个“工会政府”，只包括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三月三日劳动者总工会的喉舌《光明报》所刊登的一则简短的报道为这种谣言添枝加叶，报道说，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卡瓦列罗是执委会书记）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正在“频繁举行会谈”，因此，“尽管政治领域的混乱无序愈演愈烈，工会方面正在为一项解决方案奠定基础，它将迅速而彻底地改变现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所刊登的乐观报道进一步为谣言火上浇油，两个曾为竞争对手的工会组织的领导人即将结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同盟，这将解决根本问题。虽然拉尔戈·卡瓦列罗可能有过把工会政府作为一种政治求生手段的转瞬即逝的想法，但是，这

个谣传中的计划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在三月初举行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它遭到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的激烈谴责。“[一个]工会政府……将意味着人民阵线的毁灭并且破坏了西班牙人民的团结。”迪亚斯警告说，“……[任何]企图破坏这种团结的人将被我们英勇的战士视为我们事业的敌人。”

尽管两个工会组织似乎并没有认真地讨论组成一个工会政府的想法，不过，拉尔戈·卡瓦列罗与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之间显然出现了暂时的修好。因此建立起来的新关系是使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倾向于对他以前的对手采取和解政策的一个有力的因素。尤其是，这阻止了他按照共产党的迫切要求对正规军彻底实行军事化。他从来没有特别喜欢过这支军队，他知道，自由主义运动对这支军队深恶痛绝。

### 第三十二章 自由主义运动与正规军

“我们不需要一支国家军队。”中部前线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的报纸《自由阵线报》大声疾呼，“我们要的是人民的民兵，它体现了群众的意愿，因而是唯一能够捍卫西班牙人民的自由和自由社会秩序的武装力量。我们像内战以前一样高呼：‘不要锁链。’军队是奴役的工具，专制的象征。让军队滚到一边去。”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胡安·洛佩斯在加入拉尔戈·卡瓦列罗内阁之前不久宣称：“我们不想建立一支服装统一、纪律严明的民兵部队。”

除非违反他们的反权力主义原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可能接受一支正规军。诚然，殊死斗争的紧急状态迫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民兵部队需要采取某种限制个人主义的措施，但这完全不同于接受一种彻头彻尾的军事化，这种军事化包括：严格服从政府对这些部队的管制，恢复等级和特权制度，由国防部任命军官，采用不同的薪饷标准，引进严厉的纪律处罚手段并且必须行军礼。“听到有人说出[军事化]这个词让我们忧虑和不安——为什么不承认这个事实？由于它使人想起对尊严和人



性的不断践踏，我们感到毛骨悚然。”巴伦西亚地区的无政府主义喉舌《我们》公开宣称，“直到昨天，军事化意味着——而且对于许多人来说它仍然意味着——在军营制度下以某种摧垮士兵的人性进而消灭其个人意志的方式管理他们。”

虽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具有符合其信念的反对军事化和正规军的道德动机，不过，他们这样做也有充分的政治理由。在内战爆发两个月前召开的一次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的大意是，常备军队——这指的是推翻旧政权以后建立的所有常备军队——将对革命构成最大的威胁，“因为在其影响下将产生一个独裁政府，所以必须给它以致命的打击”。由一个包括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运动领导人在内的委员会起草的这项决议宣称，捍卫革命成果最可靠的保证是武装起来的人民。他接着说：“成千上万的工人具有军营的经历并且了解现代军事技术。为了使民众在革命成果得到最终的巩固之前不被杀害或者沦为劳动的工具，每个居民区都应拥有自己的武器以及[另外一些]防卫条件。我们坚决主张必须牢牢掌握飞机、坦克、装甲车、机关枪和高射炮，因为外国入侵的真正危险来自空中。如果发生外国入侵，人民将为抗击敌人迅速自发地行动起来，只要一完成保卫家园的任务，他们就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

因此，当温和的何塞·希拉尔政府在内战初期试图建立志愿者部队并且随后打算建立一支由其控制的志愿军时，自由主义运动报以怀疑的态度不足为奇。全国劳工联合会在西班牙的主要报纸《工人团结报》论及前一项措施时说，就连军事叛乱爆发之前已被挫败的中产阶级也在想象建立政权的胜利之日。但是它断言，工人阶级不会满足于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不允许别人从他们手中把胜利夺走。中部地区重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的负责人加西亚·普拉达斯声称，人们不应当加入志愿军，因为这支军队将会导致建立一种企图在战胜法西斯主义之后秋后算账的新的等级制度。他接着说，人民已经表明，他们不需要为了赢得这场战争而

加入一支军队，所以不会让自己上当受骗。

因此，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当几周之后入主国防部的拉尔戈·卡瓦列罗颁布了一些旨在对民兵实行军事化进而建立一支正规军的法令时，自由主义运动的担忧加剧了，当共产党人对各种军事机构的渗透取得明显进展时，这种担忧变成了恐慌。

为了消除自由主义运动青年组织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因共产党人对军队的意图而产生的担忧，共产党控制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声称：“我知道……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有些同志希望联合自由主义青年组织以便赢得这场战争，不过，他们在内心深处认为，当战争结束军队从前线归来时，我们将利用这些军队镇压、消灭、杀害我们的自由主义青年兄弟。……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些同志，必须抛弃这些想法，因为它们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要求与自由主义青年组织联合的时候非常真诚。我们知道，我们的自由主义同志是争取胜利必不可少的一支力量，而且我们同样确信，胜利之后他们将与他们并肩携手建设一个强大、自由、民主的西班牙。这是我们的信念，因此，我们仅仅要求他们放弃他们的派别成见，不应把我们当作今天一时的朋友，到了明天便成敌人，而应把我们当作今天的朋友、明天的朋友，并且永远把我们当作朋友。”

总体上讲，即便只是因为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镇压，无论是无政府主义青年组织还是自由主义运动都不会对共产党人所造成的威胁的性质抱什么幻想。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已于一九三六年九月提出建议，在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共同控制的“战争民兵”，以期在一定程度上避开共产党人的威胁。但是，这两项决议都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因此，由于共产党的威胁仍然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无政府工

团主义领导人最终决定谋求内阁中的发言权，以此保证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些措施对军事机器产生影响。当然，这不仅意味着抛弃他们的反政府信条，而且意味着抛弃他们的反军事化原则。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起开始担任巴伦西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纸《社会熔炉报》负责人的曼努埃尔·比利亚尔认为，事实证明这些信条和原则危害了自由主义运动。在他看来，由于知道许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担任指挥职务极为反感，共产党人已经抢占了他们能够占据的所有指挥岗位。“我们只能死板地拘泥于教条吗？”他问道，“如果全国劳工联合会放开革命行动的制动杆，革命本身因我们的影响而受到的损害将减少。另外，由于革命是有目的的行动，而全国劳工联合会是革命最有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最符合革命利益的方针是，采取那些将使我们始终处于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措施。”

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几位部长在内阁议事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远远达不到他们的期望，尤其是在与军事有关的问题上；因为他们发现，正如担任工业部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胡安·佩罗所说，他们没有指挥战争的权力或职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建议成立一个处理军队事务的内阁决策委员会，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在该委员会中拥有发言权。这个建议得到了共产党人的支持，毫无疑问他们相信，新的机构将使他们可以更严密地监督控制卡瓦列罗的行动。十一月九日颁布的法令落实了这个建议，设立一个战时高级委员会，授权其“协调统一与战争和指挥战争有关的一切事宜”。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国防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海军和空军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共产党人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左翼共和派人士、公共工程部长胡里奥·胡斯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司法部长加西亚·奥利韦尔，以及亲共的外交部长兼总政治部主任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尽管法令规定了委员会的目的，但是，由于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之间的意见

分歧以及这位总理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之间的对立关系，这个新的机构从一开始就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这些分歧和对立使其根本无法达成一致，而且使其得不到恰当履行职能所必不可少的相关军事情报。由于国防部长决意不把他仍掌握的权力交给对手，战时高级委员会很少开会，因此，共产党人很快就有了公开表示不满的理由，而希望委员会有助于加强他们对军队事务的影响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则发现，在对手强大的实力面前，他们的声音几乎不起什么作用。

结果，自由主义运动没能通过加入政府增强自己在军事领域的话语权，甚至没能抑制共产党人在军队中的势力扩张，最终反而使其继续保持对自己民兵队伍的控制同时还要从国防部弄到武器装备的努力受到限制。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因为国防部决定，不再向那些不愿通过骨干队伍规范化而改编成为正规军的民兵部队提供武器。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举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上，阿尔科伊造纸工人的代表说：“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全国劳工联合会]在阿尔科伊组织了一支一千多人的民兵队伍，政府以没有军官为由不向这支队伍提供武器；另一方面，因为符合政府的条件，人数较少的社会党人却能组织一支队伍并且得到所需要的武器装备。”

为了绕过这些规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决定，他们的民兵以接受部队番号的方式假装默认改组整编。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队伍大都采用了这种权宜之计，包括中部前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用无政府主义报纸《卡斯蒂利亚自由报》负责人的话说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除了名称之外，一切保持不变”。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上，阿尔科伊的代表表示，与其失去武器装备，不如采用军衔和番号满足政府的要求。“但是，”他意味深长地接着说，“对于我们来说，百人队代表就是百人队代表。”这种策略没有帮助自由主义运动的部队弄到他们需要的武器，结果，他们不得不接受军事化的概念。

最终导致自由主义运动委曲求全接受军事化概念的不仅是对军用物资的需要：而且还有克服民兵组织自身缺陷的需要——毫无疑问，这是最重要的考虑。

从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下列内容充分显示了民兵组织最严重的缺陷之一，这篇文章是被派往马德里前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部队的一名正规军下士所写的：“我们发现这支部队里有一名职业军人上尉……他悄悄地就他认为应做的一切给[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领导人]里卡多·桑斯出谋划策。具有军事常识的桑斯总是接受他的意见；但是，每当必须作出决定时，他不得不召开一个民兵大会，把上尉的意见当作自己的提出来，巧妙地灌输给与会者，以使它看上去好像是讨论的结果。”

加泰罗尼亚民兵攻打巴利阿里群岛名义上的负责人阿尔韦托·巴约上尉记录了他与无政府主义民兵委员会成员进行的以下谈话，当时他命令他们进攻马略卡岛：

“‘先等一下，’主要负责人之一回答道，……‘我们只服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命令，因此，没有他们的同意我们不能执行你的命令。’

“‘但是，必须在不通知他们的情况下执行我的命令，’我有力地反驳道，‘因为他们在巴塞罗那，而登陆行动是军事秘密，我不能冒险发报或用电台联系，即使用密码电报也不行，明天早晨必须行动，不得迟疑，不得延误。’

“‘我们非常抱歉，’他们回答说，‘但是，如果明天行动，我们就不能参与。只有当我们的领导人下令时，我们才能让我们的战士去冒险。’……

“我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地劝说他们，我愤怒地命令他们，我哀求他们。……最后，他们答应他们自己讨论一下，是执行明天登陆的计划，还是等到他们接到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这种反军事化的民主程序的种种弊端很快就自动显露出

来。“那些负责人下令行动，民兵将开会进行讨论。”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说，“几个小时在讨论中浪费了，结果，当终于开始行动时，敌军已经严阵以待。这种事情让人发笑，它们同样让人哭泣。”

不过，他们还做了另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使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领导人，尤其是持续承受着敌军压力的中部前线民兵部队的指挥官，放弃了他们对军事化的传统看法。“正是[在马德里外围的阿拉瓦卡和波苏埃洛失守之后]我对纪律和军事化的所有观念崩溃了。”后来成为第十四师师长和第四军军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部队指挥官西普里亚诺·梅拉几个月后承认，“我的弟兄们在战斗中的流血牺牲使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我认识到，如果我们确实不想打败仗，那就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军队，必须为保卫工人阶级组建一支像敌军一样强大的军队，一支遵守纪律并且具有作战能力的军队。从那以后，我毫不犹豫地向我所有战士极力阐述服从新的军事原则的必要性。”

另外，梅拉在回忆录《一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战争、流亡和监狱生涯》中写道：“巷战或者简单的小规模战斗不再是问题，在这种战斗中，作战积极性可以弥补训练的不足。……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因此，我们需要军事化的部队，军官能够策划军事行动并且能够尽量用最少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抗击敌人。……我始终相信……在自由的人群中，没有比自我约束更强大的力量，对唯一理想的共同奉献压倒其他任何因素。我在战斗中注意到，信仰和伟大的思想可以产生高尚的姿态，也可以激励英勇的行为，……但是不足以使我们拥有战场上所需要的凝聚力。……我们已经用许多同志的生命为我们的权宜之计和异想天开付出了代价。为了减少流血牺牲，即使不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思想，那也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行为。……当人们毕生都在捍卫某种理想时，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事实：如果我们确实希望赢得这场战争的话，我们必须建立一支具有必要的纪律的军队。……我一想到身

穿军装便不寒而栗，但是看来别无选择。”

米亚哈将军那位亲共产党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证明这并非空口说白话。谈到佛朗哥将军的军队攻到马德里市郊的十一月六日至七日那个夜晚时，只用其姓名的首字母M称呼梅拉的罗霍回忆说，凌晨两点，一支“作战最勇敢伤亡最严重”的民兵部队的指挥官来到他的指挥部。

“‘我来请你授予我一个军衔，什么军衔都行。’梅拉说，‘任命我为中士吧。……我想像军官一样去指挥，以便使我的命令得到严格执行。我不想再当“负责人”M了。为了使今天的情况不再出现，我想成为M中士。’

“‘今天的情况对你来说是一个成功，对你的部队来说是一次胜利。’罗霍回答道。

“‘不错，但那是以战士的伤亡为代价。’……

“军事策略不可或缺的无情事实使这位像在战场上勇敢顽强地作战一样充满激情地坚守其工团主义政治信仰的战士豁然开朗。”

据罗霍说，十五天后，经过改编整训的梅拉的部队成为“我们的一支最精锐的攻击部队，它的指挥官像一八〇八年我国独立战争的那些游击战领导人一样，从一个新手锤炼成为早期民兵武装涌现出来的骨干人员中最杰出的指挥官之一”。

就像马德里前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部队在危急情况的刺激下稍微采取了一些纪律措施一样，在同样的激励作用下，他们开始用军队的组织形式取代民兵的组织形式并且大力推进骨干队伍的建设。马德里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的喉舌《自由阵线报》声称，应当抛弃所有偏见，全国劳工联合会应

当把大批同志送到军事培训学校去，他们将会逐渐发现，军人这个职业就像他们干了多年的那些行业一样体面和重要。它还说：“正在组建的人民军需要军事专家，这种需要是国家的特点，必须关注自身力量不断壮大的我们的队伍特别感到有这种需要。”马德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不仅受到政治考虑和马德里周围的残酷战斗的影响，而且受到国际纵队这个榜样的影响，后者效率更高的军队组织形式立即显示出其对民兵组织形式的优越性。渐渐地，无政府主义的《卡斯蒂利亚自由报》负责人证实，最初纯属名义上的改变深入进行。“人们已经注意到，而且事实已证明，在英雄气概和力量消耗相同的情况下作战，国际纵队的组织导致更高的效率。在我们的民兵部队中，干部队伍按照国防部的规定形成了。营长成为少校；百人队代表成为上尉，第一批下士和中士出现了。”

从许多自由主义运动重要人物所发表的言论明显看出，这种变化并非完全有名无实，他们告别了反权力主义的过去，成为军事化的积极推动者。例如，西普里亚诺·梅拉认为军队的纪律非常重要，以致决定“只与将领、军官、中士讨论问题”。“我们所做过的对军队危害最大的事情之一是，”他后来说，“曾经当过民兵的军官与士兵的关系过于亲密。”还有，被委以组建管理军官培训学校重任的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在担任司法部长之前被认为是一名正统的无政府主义者，如今他却要求一所军官培训学校的学员记住，应征入伍的士兵“不应是你们的同志，而应成为我们军事机器上的齿轮”。

为了防止共产党人控制军官培训学校并且防止他们阻挠毕业的军官同情支持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几位无政府主义者内阁部长谋求让加西亚·奥利韦尔担任组建管理军官培训学校的负责人。战时高级委员会委派这位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负责组建管理军官培训学校是因为委员会成员无法就其他人选达成一致，这应当归功于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其对手之间的敌意。一九三七年五月，当时不再是



委员会成员的加西亚·奥利韦尔在一次演说中证实，他得到国防部长真诚的合作，而后者对他非常信任是因为他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的党派谋利益。毫无疑问，卡瓦列罗支持这位无政府主义领导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不希望军官培训学校被共产党人所控制。不过，这一委任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因为，由于自由主义运动的成员普遍反对建立一支正规军，这些学校招收的自由主义运动成员少得可怜。“这使我郑重地把这个问题向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提出来，”加西亚·奥利韦尔说，“结果，在就此达成一致意见并且付诸实施之后，各地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保卫委员会都对培训学校招收学员特别关心。”谈到对于军衔存在的敌意，他证实：“当我们派遣一些中尉前去协助当时仍然反对军事化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武装领导人时，为了羞辱他们，那些领导人安排他们用镐头和铁锹挖战壕。”但他补充说：“在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后，当全国劳工联合会不再是政府成员时，当军事化向前推进时，正是以前羞辱过中尉军官的那些同志对获得共和国军队的高级军衔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作为组建管理军官培训学校的负责人，加西亚·奥利韦尔甚至赢得其意识形态对手的钦佩。“[安东尼奥·]科登和我与他联络，”国防部的职业军官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写道，“但是，留给我们做的只是执行他的指示而已。校区、教官、设备以及所需要的一切立即就能得到满足。奥利韦尔不知疲倦。他亲自安排并且监督每一件事情。他深入到最微小的细节，务必使它们得到妥善处理。他甚至关心学员的作息时间表和伙食安排。但他最关心的是，新的军官应当在最严格的纪律条件下接受培训。

“这个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让不相信即兴发挥的我感到惊讶。看到他全面的行动能力和自信，我意识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因此不得不感叹，在破坏性的活动中，这么多人才被浪费了。”

自由主义运动一些最著名的成员令人吃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在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刊上反映出来。军人风度受到称赞，运动敦促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部队的政治委员对犯错误的士兵进行“适当甚至最严厉的惩罚”。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二日，马德里南部的哈拉马河战斗激烈进行期间，《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的一篇社论声称，民兵应当服从指挥官的命令，违者格杀勿论。

但是，保证民兵普遍接受新的规矩并非易事，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一向教导他们要把所有军队全都视为专制主义的象征。他们认为自己从来不受发号施令的军官的意志约束，他们不仅把选举的原则引入部队，而且与小组代表和百人队代表平等相处。关于上面引述的加西亚·奥利韦尔要求军官培训学校的学员记住的那一段话——应征入伍的士兵“不应是你们的同志，而应成为我们军事机器上的齿轮”，一名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写道：“当我们的内心充满解放的概念时，当我们的内心充满自由观念和革命思想时，……我们无法理解我们那些担任政府部长的同志怎么能用这种话来表达他们自己的看法。”另外，著名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索拉诺·帕拉西奥在记述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民兵武装的军事化时坚称：“民兵最反感的是必须向他们一直将其视为战友的军官敬礼。”按不同的标准发放薪饷这个问题在民兵当中引起的担忧甚至反映在一份赞成军事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上：“经济差异产生了阶级，因此，在人民军中不应存在任何经济差异。在这支军队里，每一个人，从士兵到将军，他们都有同样的需要以及同样的满足这些需要的权利。不同的待遇将在发号施令者与服从执行者之间造成疏离，由此产生的不平等感对人民的利益具有副作用。当我们正在与所有特权斗争时，我们不能容忍军队中存在任何特权。”

“如果我说不需要克服阻力的话，那我就是虚伪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成员米格尔·冈萨雷斯·伊内斯塔写道，“自由主义阵营的每一个积极分

子都有顾虑要消除，有信仰要改变——为什么不承认这一点？有幻想要埋葬。这绝不仅仅是因为对某种在实践中被奉为神圣的传统观念的尊重，而且是因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旧军队部分或整体起死回生将会产生等级特权、畸形的青年，将使旧的制度复活，压制各种社会权利，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支军队最终可能成为革命的扼杀者，沦为某个政党的工具。”

正是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担心出现后一种情况，因为它们不像共产党那样打算渗透到整个军事体系中，所以，它们决心保持其部队诚挚平等的特点。因此，尽管它们决定把这些部队改编成为统一建制的旅，并且在仍由自己的指挥官指挥的情况下并入正规军，但是，它们不同意组成由国防部任命的军官所指挥的混成旅，反对借此用其他部队消解分化自由主义民兵武装。组建混成旅的计划主要出自苏联人之手，它的一个重要政治目的无疑是消除或至少削弱无政府主义者在军队中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前面引用过的国防部的职业军官马丁·布拉斯克斯就曾经对国防部副部长何塞·阿森西奥将军说：“一旦我们组建了我们的混成旅，[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将不复存在。”

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出于政治和技术上的考虑同意在混成旅的基础上对民兵实行军事化，但是，因为他对共产党的厌恶不断加剧而产生的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缓和关系的愿望阻止他认真尝试强制推行这一措施。结果，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部队虽然在军事行动方面服从总参谋部的指挥，但是仍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完全控制着，并且仍由属于该组织的士兵和军官组成。

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的一份报告中，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其会员组织的国际工人协会（AIT）驻西班牙代表赫尔穆特·吕迪格说：“目前，全国劳工联合会在中部地区有一支三万三千人的军队，全副武装，组织完善，所有人都持有全国劳工联合会的

会员证，由同为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员的军官指挥。此外，混编部队中还有许多我们的同志，不过，全国劳工联合会打算把他们全部集中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部队里来。”不久之后他又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认识到，它应当进行自己的军事化。这是组织一支强大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军队的有效手段。这支军队不仅要从事反法西斯战争，以后还将保卫革命。”

一些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向我充分证实了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部队这一时期的平等特点，其中包括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马里亚诺·卡多纳·罗塞利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日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负责人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后者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控制着中部前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武装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成员。加西亚·普拉达斯证明：

当对民兵实行军事化的法令颁布时，我们中部地区的部队只同意在保持一定独立性的条件下实行军事化，这个条件包括保留部队自己的指挥官。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及其继任者以及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不愿答应这个条件，但是它们不得不“容忍”它，因为我们宁可反抗也不会屈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必须允许普招的士兵加入我们的部队。从来没有强迫这些人成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但是我们始终拒绝承认政府拥有自行任命指挥官的绝对权力。通常出现的情况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向国防部提名其认为合适的人选同时提供必要的资料，然后，国防部根据它掌握的这些资料接受推荐并且颁发委任状。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方式适用可行，其中之一是允许指挥官获得高薪。我们中部地区的指挥官在领取他们的薪水之后将其中大部分交给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委员会随后将所收到的几百万比塞塔用来资助集体农庄。有些时候，当政府在巴伦西亚或巴塞罗那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默许的情况下打算把某些指挥官强行派给我们时，长期负责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爱德华多·巴尔、曼努埃尔·萨尔加多或我本人都不会同意这样做，结果，

幸亏采取了这种态度，我们才能始终把这些部队控制在手中，直到一九三九年三月我们可以用它们[在马德里]打垮共产党。

一九三七年二月，得到拉尔戈·卡瓦列罗完全信任的国防部总参谋长托里维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批准无政府主义民兵武装的马罗托纵队作战委员会建立一个全部由这个纵队的成员组成的旅，这一事实证明，拉尔戈·卡瓦列罗同意而不只是默许抛开形式严格的军事化，虽然他与苏联人曾经就此达成一致。明摆着的情况无疑是，这样做不是没有通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的苏联顾问K.A.梅列茨科夫——此人后来成为苏联元帅和红军总参谋长——就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日提交总政治部的一份报告中，南部前线政治督察委员、社会党左派议员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巴列斯特罗斯说，马罗托纵队作战委员会声称，它有马丁内斯·卡夫雷拉下达的由该纵队成员组成一个旅的书面命令，而且“格拉纳达防区的指挥官[欧蒂基亚诺·]阿雷利亚诺上校和萨拉萨尔中校均证明，他们见过所说的命令”。

正如我们将在下面一章看到的那样，无政府主义民兵武装的钢铁纵队同样获准由清一色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组成一个旅。值得注意的事实还有，钢铁纵队的非正式传声筒《我们》就军事化和混成旅的问题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利亚诺·巴斯克斯所进行的采访发表之后，国防部并未表示异议：

《我们》：我们的民兵纵队将不复存在了吗？

巴斯克斯：是的，它们将不复存在。它们必定将不复存在。[全国委员会已经决定]像其他所有民兵一样，我们的民兵纵队将改编成旅。……虽然可能发生一些变化，但是，目前这种改编并不表示发生了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因为以前指挥这些纵队的人现在仍将指挥这些旅。这意味着，我们那些喜欢这些行动负责人的同志可以放心，

他们不会由于随意任命指挥官而被迫接受他们不喜欢其意识形态因而也不喜欢与其打交道的人。此外，作为各个旅真正的负责人，政治委员——别让这个词吓着你——将由全国劳工联合会任命，他们始终对全国劳工联合会负责。……

《我们》：有人说这些旅将是混编的，也就是说它们将由马克思主义派的正规军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部队组成——这是我们的战士所担心的另一个问题。这是真的吗？

巴斯克斯：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它是与军队组建有关的计划之一。不过，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计划：在逻辑上是为我们组建的未来的部队必须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同志所组成，同时还要在这两个组织的控制下，尽管它们服从所有部队自愿接受的统一指挥部的命令。

虽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所接受的形式松散的军事化可以使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部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独立性，但是，它仍然遭到更极端的自由主义人士的坚决抵制，他们满怀激情地固守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信仰。除非将著名的钢铁纵队（Columna de Hierro）的传奇包括在其中，否则的话，我们无法描述在自由主义运动的原则与实践、普通成员与领导阶层之间所进行的这一场激动人心的斗争。

### 第三十三章 钢铁纵队

“有些同志认为军事化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我们认为它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虽然抵制根本不会打仗的下士、中士以及毕业于军事院校的军官，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组织，因此，我们不接受任何军事体制。”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召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上，钢铁纵队的一名代表这样说。

没有哪支部队比钢铁纵队更全面地代表了无政府主义精神，没有哪支部队比钢铁纵队更坚决地反对自由主义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自相矛盾，没有哪支部队比钢铁纵队对政府表现出更强烈的敌意，在内战最初的七个月，钢铁纵队驻守在特鲁埃尔前线的一个防区。“[我们]所做的一切肯定不是为了巩固这个政府，我们最终一定要消灭它，因此，帮助政府毫无意义。”上述那位代表宣称，“我们不接受任何与无政府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东西，思想必须变成现实，因为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在进行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民兵部队并没有使中小佃户以及地主、商人和店主产生更大的恐慌。钢铁纵队主要吸收巴伦西亚地区比较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加入，它的三千名成员中包括几百名圣米格尔·德洛斯雷耶斯监狱的囚犯。“必须释放[这些囚犯]，然后必须有人负责把他们带上前线。”钢铁纵队作战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写道，“始终认为社会应当为其弊端负责的我们将他们视为兄弟。他们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并且冒着生命危险与我们并肩为自由而战。监禁使他们被社会蔑视，我们则给他们自由和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需要他们帮助我们，同时我们希望为他们提供社会新生的可能性。”可是，这些以前的囚犯很快就给钢铁纵队带来了耻辱；因为，虽然其中一些人在被监管期间受到感化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但绝大多数人是顽固不化的罪犯，他们的心肠没有改变，参加钢铁纵队是因为他们可以用无政府主义者的标签做幌子设法脱身。

这些罪犯给钢铁纵队带来的丑恶名声导致纵队作战委员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委员会之间的严重不和。不过，造成不和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地区委员会支持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全国领导人所采取的政策，而钢铁纵队则以自由主义运动加入内阁有助于恢复政府的权威从而加大了政府法令的影响力为由批评这种政策。实际上，钢铁纵队得知四位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加入政府的消息后，它的官方喉舌《火线》立即对这些出任

部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它说，政府得以存续，“而且完全是以某个自称自由主义的组织的名义”。此类谴责——如果钢铁纵队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不被采纳，有时还伴以武力威胁——往往使地区委员会感到屈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钢铁纵队几乎或者根本得不到人员和物资援助的原因。

这种抵制对于钢铁纵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内战初期那几个月，它可以自己征兵并且在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后方村镇委员会的协助下，依靠没收财物补充军用。

“我们驻扎在巴伦西亚[期间]注意到，”纵队发表的一份宣言声称，“鉴于我们购买武器的谈判因为缺乏硬通货而失败，而许多船只却装载了大量黄金以及其他贵重金属，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没收了一些珠宝商的货船上的黄金、白银和白金。”“[一九三六年]十月前后，”一位历史学家叙述道，“钢铁纵队离开前线……开赴巴伦西亚，沿途造成一片恐慌。它的目的是‘清除后方所有危害革命利益的寄生虫’。在巴伦西亚，它扫荡了旅馆和饭店，使城市陷入恐惧中。在对珠宝店的搜查中，它没收了能找到的全部黄金和白银。”

据一份无政府工团主义日报报道，在卡斯特利翁市区，钢铁纵队完成了“匡正不公抚慰良心的任务。它点起清理垃圾的火堆，将指控、证供、诉讼和刑事审判卷宗付之一炬，这些东西实质上是针对穷人的，地位卑微的弱者必须为其草率的行为、为其过失和不幸——实际上那是别人的罪过——付出代价，他们被施以可憎的肉刑并被羞辱性地剥夺了各种权利，而进行诈骗、抢劫和暗杀的重罪犯却逍遥法外。……在销毁这些堆积如山的文件的噼啪作响的火焰中……一部属于中世纪的官僚机器化为灰烬”。

不过，随着政府权威的恢复，钢铁纵队对巴伦西亚地区城镇乡村的突袭很快就停止了。据一位共产党人历史学家说，“以在后方夜间‘作战’而著称”的钢铁纵队受



到训练有素的政府军的“全面打击”对在巴伦西亚恢复权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钢铁纵队的日报《火线》刊登的一篇报道表明，在反法西斯人民卫队（巴伦西亚的一支由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控制的警察部队）枪杀了一名放下武器的钢铁纵队成员后，一场冲突爆发了。报道声称，“这一罪行”在特鲁埃尔前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部队中“引起了一致愤慨”。“[我们]商定第二天去巴伦西亚参加死难同志的葬礼并且要求追究责任。”据报道说，送葬的队伍一直“平静而沉默地”行进着，但在经过共产党的总部后遭到机关枪的扫射，造成一百四十八名民兵伤亡。“[由于]我们比他们更有责任感，……我们压抑住自己的愤怒。……我们不想采取报复行动或继续交战。……不过大家应当知道，我们的做法并不意味着害怕或者遗忘。尽管我们现在已经返回前线消灭法西斯分子，但总有一天，当我们想起这些事情以及应当对此负责的那些人时，他们将得到应得的下场。”

由于革命热情的衰退以及内战爆发以来在自由主义运动内部遭到质疑，钢铁纵队对于志愿者的吸引力不再能够为它提供足够的新兵增援前线的战士。此外，各种革命委员会正在被正规的管理机构所取代，在这些机构中，革命的积极分子不再占有优势。更为严重的是，国防部不仅决定停止向一切拒绝按照规定的方式进行整编的民兵部队提供武器，而且以谨慎的措辞颁布法令要求所有战士的薪饷今后将由派驻各营的正规出纳人员发放——民兵以前是在没有监督而且不管薪饷结构的情况下将薪饷总额拨给每个纵队。由于法令没有提到向不采用军队编制的部队派遣出纳，显然，如果钢铁纵队打算继续坚持民兵的组织形式，停薪断饷的日子将为期不远。

拉尔戈·卡瓦列罗将这项经过讨论的法令提交政府并在政府批准后颁布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共和国官方公报》。尽管法令的措辞谨慎，但是它的目的明确。关于这一点，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在向阿森西奥将军建议采取这一措施时对后

者作了如下说明：“我建议现在颁布法令，使那些拒绝从民兵转变成军人的人领不到薪饷。如果我们向每个营派一名只给服从命令的士兵发饷的出纳，如果每个混成旅的出纳人员隶属于旅部的军需官，那么，这些混成旅，而且随后是整个军队，显然就能立即变得井然有序。同时，这将杜绝在‘钢铁纵队’出现的那种弊病，它还不到三千人，每月却收到六千人的薪饷。”关于这些弊病，根据社会党左派议员、南部前线政治督察委员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巴列斯特罗斯提供的情况，马拉加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部队在虚报薪饷方面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仅仅两周他们就比应得的薪饷多领了四十万比塞塔。但是，我们不应由此推定，虚报薪饷仅限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部队，因为夸大第五团规模的共产党人纵容同样的做法。

尽管钢铁纵队先前一直反对军事化，比普通成员更了解纵队困境的作战委员会现在已经认识到，继续采取不妥协的立场并不明智。他们知道，面对政府的压力和全国劳工联合会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阶层的敌意，部队无法坚持下去，如果不实行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所主张的有限的军事化，它将失去对其生存来说必不可少的物质支持。但是，能够使部队就范吗？不安的情绪和低落的士气正在蔓延，在倾向于反抗的士兵当中已经出现了怨言和威胁，如果引进军事化，哪怕是最松散的形式，他们也将离开前线。仅仅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这一天，就有九十七名士兵离开前线，而作战委员会则指责他们是逃兵。

在这一紧要关头，一九三七年一月底，当危险从四面八方向钢铁纵队袭来时，作战委员会向其成员发表了一份重要的报告：

[起初]，政府是一个无人在意的幽灵。工人阶级组织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是西班牙人民的唯一保证，……[但是]在几乎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我们自己敬

爱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本身成为一个没有活力与生气的幽灵，把它的影响和声望注入了政府。它现在只是政府的又一个附庸和革命火焰的又一个灭火器。

刚一变得强大起来，政府立即开始进行整顿，现在，它已经控制了一支军队，与其他政府的军队属于一类，与过去那种专用的镇压工具也没有区别。像以前一样，警察对那些试图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的工人采取行动。人民的民兵已不复存在，简单地说，社会革命已被扼杀。

如果我们得到政府的帮助而且得到我们组织——我们指的是那些负责任的委员会——的帮助，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作战物资和人员支援我们的同志。但是情况不是这样，因此，我们不得不让我们的战士月复一月在掩体后面穿着破旧的衣服打仗。这种自我牺牲不为人知，也不能要求任何人，而且天天都有许多问题发生。……我们承认纵队内部的问题解决起来有困难，因此，在严重的事态出现之前，在士气低落和身体疲劳蔓延之前，在以前所未有的牺牲为代价赢得并坚守的胜利成果遭到猛烈打击之前，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们重申，必须找到一种让所有人满意的方案。……如果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部队全部都被军事化，而我们作为唯一一支不接受军事化的部队站出来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决定，那么，我们不仅将会失去来自政府的帮助，而且将会失去来自我们自己组织的帮助。由于这些必要的帮助，我们这个纵队才能保持符合我们特点的革命原则完好无损，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因为失去了这些帮助，我们的作战方法失灵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同志绝大多数都会对应当为此负责的那些人表示愤怒，不过，我们希望指出的是，他们的抗议将被政府粗暴地扼杀。不再可能组成任何违抗政府意愿的组织，因为无论什么东西妨碍了它，它都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镇压。此外，这一段时间极其危险的情况迫使我们压住自己的怒火。我们必须再一次向基督学习。

我们知道军事化的弊端。它既不符合我们的性格，也不符合另外一些始终具有美好的自由观念的人的性格。但是我们也知道置身于国防部管辖范围之外的不便之处。实际上令人悲哀的是，必须承认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解散钢铁纵队或者使其军事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在报告的结尾，作战委员会表示希望把军事化问题提交当时正在进行的一次纵队集会予以讨论。但是，尽管讨论了这个问题，却没能作出任何决定。因此，《今天》大约在这个时候发表上一章所引述的那一次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的采访并非偶然。这位书记在采访中煞费苦心表示，将民兵部队按照全国委员会同意的方式改编为混成旅不会造成任何根本性的变化。然而，就连这种保证也没有缓和激烈反对军事化的那些人的强硬态度，他们构成了纵队成员的大多数。

可是，事情在三月初突然令人震惊地发展到高潮。

肯定是与内阁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同僚磋商之后，国防部长特意为加快钢铁纵队的军事化进度发布了一道命令，拉尔戈·卡瓦列罗在这道命令中宣布，特鲁埃尔前线的民兵部队从四月一日起将隶属于国防部，并且任命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的托雷斯—贝内迪托纵队指挥官何塞·贝内迪托为总参谋部编制部门的官员，以完成必须进行的整编。与此同时，据马丁·布拉斯克斯说，钢铁纵队被告知，将强制执行十二月三十日颁布的那一项要求由隶属于总军需官的各营出纳发放薪饷的法令。

无论作战委员会私下里对这些事态发展的看法是什么，它被迅速蔓延于钢铁纵队的愤怒淹没了。在一次全体会议上，民兵们拒绝接受部队整编和新的财务条例，接着，许多人决定离开前线以示抗议。

自称促成了这项法令的马丁·布拉斯克斯对此写道：“特鲁埃尔前线的无政府主义‘钢铁纵队’的一部分人反对强制执行我那项关于军队财务制度的法令。他们断言，政府正在变成一个反革命政府，它正在组织一支雇佣军，准备剥夺人民在军队和警察销声匿迹的一九三六年七月所取得的胜利成果。他们要求整个纵队的薪饷像以前一样按总额拨付，既不接受营的编制，也不接受新的财务安排。”

在返回后方途中，钢铁纵队的几个百人队在比拉内萨村卷入了一场突击卫队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武装冲突。“在小规模的暴力事件平息后，”社会党左派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在几天之后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警察莫名其妙地遭到袭击以致不得不进行增援。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负责人没有下令的情况下，某个组织的成员下令在巴伦西亚省的几个村庄进行了某种形式的总动员，试图切断通讯、阻止交通并且进入警察部队驻扎的村庄。”在一场双方均有一定伤亡的战斗之后，两百多名无政府主义者被抓获，据《我们》报道，其中有九十二名钢铁纵队成员。

由于担心这种对抗可能被国防部当做征召钢铁纵队成员加入正规军的借口，或是担心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的地方组织可能打算将他们并入自由主义运动的其他部队，钢铁纵队作战委员会发表了以下谨慎的通告：“钢铁纵队既没有被解散也不打算解散或者实行军事化；根据纵队全体成员同意的决定，它已要求换防以便休息并自行整编。现在这件事情正在进行。目前只有大概三个百人队还在等待换防。在换防完成之后，将召集全纵队开一次会，到那时，我们将以一贯的严肃性和责任感对纵队的立场和要走的道路作出决定。所以，在那之前，肯定不会征召同志们加入其他改编的部队，……因为，当他们属于一支正在休整的部队时，谁也不能强迫他们那样做。”

不过，此时的钢铁纵队实际上处于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共产党人肯定会为拉尔戈·卡瓦列罗制订立即征召其成员加入正规军的方案。“必须结束政党和工会保留民兵和独立部队的状况，”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宣言说，“同时建立一支军队。” 但是，拉尔戈·卡瓦列罗并没有采取将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视为危及其他自由主义民兵部队的先例的措施。于是，在召开决定钢铁纵队未来的大会之前那几天，作战委员会得到了片刻喘息的机会，它要在这次大会上为实行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同意的有限的军事化赢得民兵战士的支持。当事情处于这种状态时，无政府主义报纸《我们》发表的下面这篇由一名纵队成员所写的文章意义重大。

我是一名从圣米格尔·德洛斯雷耶斯监狱逃出来的囚犯。国王建立这座阴森的监狱为的是活埋那些决不向权力所制订的针对被压迫者的丑恶法律屈服的人，因为他们不是懦夫。像许多人一样，我被带到这里以消除犯罪行为；那就是，因为洗雪整个村庄曾经蒙受的耻辱；简单地说，因为杀死了一个政治恶霸。

我是年轻人而且依然年轻，因为我二十三岁就进了监狱，后来，多亏无政府主义的同志们打开了监狱的大门，我在三十四岁时获释了。十一年来，我受到非人的折磨，我只是一件东西，一个号码！

许多像我一样出生以来就忍受着所受到的恶劣待遇的囚犯与我一道获释了。其中一些曾经四处流浪的人自己走了；另一些人像我一样加入了我们解放者的队伍，解放者待我们像朋友，爱我们如兄弟。与解放者一起，我们一步步建立了钢铁纵队；与解放者一起，我们以越来越快的节奏袭击兵营，解除凶恶的[国民]卫队的武装；与解放者一起，我们毫不客气地把法西斯分子驱赶到他们现在把守的山顶。……

几乎没有人曾经关心过我们。我们离开监狱以后，大家身上仍然保留着资产阶级麻

木不仁的特性；所以，人们不是关心我们，不是帮助并且支持我们，而是把我们当做不法之徒来对待，指责我们无法管束，因为对于某些具有愚蠢念头的人来说，我们希望并且仍然希望自由就是不安于生活的节奏，这些人在某个部或某委员会占据着一席之地，荒唐而傲慢的认为自己是人类的主宰；另外还因为，没收了法西斯分子的财产之后，我们在所经过的村庄改变了生活的方式，消灭了横行乡里、掠夺虐待农民的政治恶霸，将其财产交给那些知道它们如何而来的人：工人。……资产阶级——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占据着许多位置——不停地编造一系列谎言对我们进行恶毒的诽谤，这让我们感到高兴，因为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反抗以及我们心中对于自由的渴望——这种渴望像高山上的雄鹰、丛林中的狮子一样无法抑制——伤害了他们，只有他们可能被这些东西所伤害。

有一些我们的兄弟，和我们一起在田间工厂吃苦受罪、和我们一样受到资产阶级无耻的剥削，可是，就连他们也与资产阶级的极度恐慌产生了共鸣，因为那些希望被人当做领袖的人告诉他们，在钢铁纵队战斗的人是残忍的歹徒。……

有几天晚上，在漆黑的夜色中，当全副武装、高度警觉的我试图穿透战场的朦胧看清隐秘的东西时，我会像做梦似的从掩体后面站起来，……怀着一种开火的热望抓紧步枪，不仅向隐蔽在不到一百码之外的敌人开火，而且向隐藏在我这一边、把我称为同志的另一些敌人开火。……我还会感到想笑，想哭；我想跑过田野撕破喉咙高喊，就像我用铁钳一般的手指撕破那个下流的政治恶霸的喉咙一样；我想把这个卑鄙的世界砸个粉碎，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一只充满关爱的手，为那些从战场上归来的劳累的战士和伤员，擦去脸上的汗水，止住伤口流出的血。……

在凄凉、阴沉的某一天，我们必须实行军事化的消息像一阵刺骨的寒风袭击了山顶。它像一把匕首捅入我的身体。……

我曾经在军营里生活过，我在那里学会了恨。我曾经坐过监狱，奇怪的是，在那里的悲伤和痛苦中，我学会了爱，学会了热烈地去爱。在军营里，我几乎丧失了人格，他们非常严厉地对待我，试图把愚蠢的纪律强加于我。在监狱里，经过艰苦的斗争，我重新找到了人格，因为每一次惩罚都使我更难对付。在那里，我懂得了要完全彻底地敌视所有等级制度；我还懂得了，在最深重的苦难中，要爱我那些不幸的兄弟。……

由于这种经历……当我在远处隐隐约约听到军事化的命令时，我感到全身瘫软无力，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革命使我产生的游击队员的大无畏精神将要消亡……我将再次掉进唯命是从的深渊，陷入军营和监狱纪律所导致的浑浑噩噩的非人状态。……

从没有人给过我们任何安慰，更糟糕的是，从没有人说过一句同情的话。所有人，法西斯分子和反法西斯分子，甚至我们自己运动的成员——我们感到非常可耻！——都讨厌我们。我们从未被人所理解……[因为]我们希望在战争期间过一种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生活，而其他人则要把不幸的自己和我們绑在政府的战车上。……

记录人类善行和罪恶的历史总有一天会说话，它会说，钢铁纵队是西班牙唯一一支具有革命应有的清醒看法的部队。它还会说，在所有部队中，我们的部队对军事化进行了最坚决的抵制，由于这种抵制，它完全改变自己命运的情况发生了。……

我们过去反对军事化是因为我们了解军官的情况。我们现在反对军事化是因为我们了解他们现在的情况。……我曾经见过……我亲切地跟他说话的一位军官气得或是厌恶得发抖，我也知道部队现在的情况，它们那些自称无产阶级的军官已经忘记了自己卑微的出身，不许民兵称他们为“你”（thou），违者将受到可怕的惩罚。

我们在战壕里经常活得很愉快，……[因为]我们当中没有谁高人一等，我们大家都是



朋友，都是同志，都是革命的游击队员。小组或者百人队代表不是强加于我们的；他是我们选出来的。他不把自己当成一名中尉或者上尉，而是当成一名同志。纵队作战委员会的代表也不是上校或者将军；他们是同志。我们总是一块吃饭，一同作战，一起欢笑和发誓。……

我不知道我们接着如何生活。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习惯下士、中士和中尉的凌辱。我不知道在最完整的意义上体验了做人的感觉后，我们能不能习惯做家畜，因为这是纪律的要求和军事化的含义。……

但是时间紧迫。我们落入了……一个圈套，我们必须摆脱它；我们必须尽力摆脱它。……主张军事化的人在我们周围比比皆是——我们自己的阵营中就有一些主张军事化的狂热分子。昨天我们是主流；今天他们是主流。除了由人民组成之外，人民军与人民没什么关系，它不属于人民而属于政府，指挥它的是政府，对它发号施令的也是政府。……

当我们被主张军事化的人包围时，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解散钢铁纵队，第二条路是对它实行军事化。……

[但是]这个纵队，这个从巴伦西亚到特鲁埃尔使资产阶级和法西斯分子闻风丧胆的钢铁纵队决不应当被解散；它必须继续坚持到底。……

如果我们准备解散这个纵队，如果我们准备解散之后应征入伍，那么，我们将不得不与某些人为伍，他们不是我们选择的人，而是驱使我们前进的人。……

无论我们被称为纵队还是营或师，从第一天起我们就为之贡献了壮丽篇章的革命——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我们不要缴械投降，不要放弃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形成的紧密团体。

三月二十一日，星期天，确定召开投票决定钢铁纵队未来的大会的日子，对于纵队所有成员来说，这是意义重大的一天。在过去的几周，各方面一直敦促作战委员会接受军事化作为解散之外的唯一选择；现在，由于激情耗尽而且纵队面临着解散，显然，军事化的支持者肯定可以如愿以偿。在大会上，作战委员会用来支持将纵队改编成旅的理由是，属于原有小组的民兵随后将被政府征召；即使他们决定解散，不久之后他们也将被召入政府组织的正规部队；国防部同意，在建议改编的这个旅中，四个营全部由钢铁纵队的成员组成，只有炮兵由职业军官指挥。这些理由非常充分，足以保证大会投票赞成改编。

几天后，作战委员会向纵队成员宣布，这支部队将改编成为正规军第八十三旅。事实上，一些纵队成员加入了另外几个无政府工团主义旅。指挥第八十二旅的墨西哥著名画家、墨西哥共产党员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证实：“因为我是墨西哥军官，所以派我指挥由前钢铁纵队和罗萨尔纵队的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部队，由于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信念，他们不切实际地反对所有军事纪律观念。另外一些墨西哥军官[其中有共产党员胡安·B·戈麦斯上校]也被派去指挥具有同样信念的部队，因为与敌视苏联正好相反，无政府主义者热爱墨西哥，这有利于我们的整编工作。”

### 第三十四章 拉尔戈·卡瓦列罗与莫斯科决裂

尽管钢铁纵队这一事件很重要，但它只是为几周以来一直在政府驻地巴伦西亚进行的明争暗斗带来了一点波动。

一九三七年二月初，随着战略港口马拉加的失陷，争斗变得更加险恶。在极度的混乱中，由西班牙和意大利部队组成的具有压倒优势的敌军迫使组织松散、装备不足、被意见分歧和相互猜疑弄得四分五裂的民兵部队仓皇溃逃，沿着海岸线从马拉加后退了八十多英里。我保存了两份与马拉加失陷有关的重要文件的副本。希望公

平分摊责任的人谁也不能忽视它们，因为它们与何塞·阿森西奥将军的《阿森西奥将军：忠于共和国》、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的《共和国人民军史》和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的《安达卢西亚战役》等书中所提供的宝贵资料共同构成了认真研究这一问题的基础。一份文件是负责南部前线马拉加防区的无党派职业军官何塞·比利亚尔瓦上校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二日向战时高级委员会成员所作的关于这次溃败的详细汇报；另一份是担任南部前线政治督察委员的社会党左派人士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巴列斯特罗斯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向总政治部提交的一份报告。这些文件提到，马拉加防区缺乏军纪和组织；后方混乱无序；职业军官和民兵指挥官不负责任；不同党派之间的斗争贻误军事行动；共产党努力发展党员；马拉加防区政治部主任卡耶塔诺·博利瓦尔过多地任命共产党人政治委员；肆意忽视防务工作；两名阵地指挥官罗梅罗和科内霍变节投敌；枪炮弹药供应不足；缺乏海军和空军的援助；最后还有，国防部没有对比利亚尔瓦上校及其他指挥官多次提出的增援和补给要求作出回应。在这场溃败中，最不幸的人物之一是比利亚尔瓦本人，他是在敌军突破埃斯特波纳以东的防线后一切开始变得不可收拾时被派到马拉加防区的。

“不用担心。他将一去不复返！”据说，国防部副部长阿森西奥将军在签署比利亚尔瓦的委任状时对国防部战术参谋部门负责人安东尼奥·科登这样说。的确，被国防部选作替罪羊的比利亚尔瓦后来遭到逮捕和监禁。不过，在关押了一年多以后，他被证明对这场失败没有责任并且恢复了名誉。

在安赫尔·戈略内特和何塞·莫拉莱斯合著的亲民族主义著作《马拉加：血与火》中可以看到一个电话话务员所作的一份速记记录，它记录的是二月八日零点刚过比利亚尔瓦与阿森西奥之间的一次激烈的通话。尽管这本在内战期间所写的书具有宣传的性质，但是，根据我在比利亚尔瓦从马拉加返回巴伦西亚之后立即对他进行的几次采访判断，摘自这份记录的下列内容看起来真实可信：

比利亚尔瓦：听着，佩佩，我已经收到国防部要求返回马拉加的命令，但是——

阿森西奥：你不应当离开马拉加。

比利亚尔瓦：法西斯分子已经进入马拉加，否认这个情况的人在说谎。……

阿森西奥：你不应当活着离开马拉加。你应当按照部长的命令坚守在那里。

比利亚尔瓦：你不知道马拉加正在发生什么。你是说，我应当返回马拉加？我觉得，你想让我向佛朗哥投降？

阿森西奥：你必须返回马拉加。你就不应当离开它。

比利亚尔瓦：显然，为了让凯波[民族主义将领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能够抓住我！这就是你希望的吧！

阿森西奥：你已经收到返回马拉加的命令，因此，你必须与部队一起回去。

比利亚尔瓦：与什么部队？我已经没有部队了，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我警告你，如果你不及时提供援助，不仅是马拉加，莫特里尔也将失守。但是，请注意，如果法西斯分子已在那里，我怎么可能返回马拉加？

阿森西奥：法西斯分子不在那里。……

比利亚尔瓦：你是说我应当向佛朗哥投降。在你的位置这样说很容易。你不应当活着离开纳瓦尔卡内罗[话务员注明，这个地名“有点像”纳瓦尔卡内罗]。无论如何，我会努力进入马拉加；我将返回那里，但是，请记住，这是你又一次卑鄙地欺骗了我。

阿森西奥：在军队中，没有卑鄙的欺骗，只有命令！

共产党人千方百计地利用马拉加的惨败推进他们的军事政策。日复一日，周复一周，他们一直在敦促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将其当政初期所认可的军事措施付诸实施，现在，马拉加的失陷为他们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说明。当然，他们大肆进行鼓吹不能说不是出于私利，因为他们认识到，严厉实施这些措施不仅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种手段，而且可以制造一部军事机器，只要党控制了这部机器，就将确保他们在国家事务中的支配地位。因此，他们不能忍受拉尔戈·卡瓦列罗对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的迁就，尤其不能忍受他在征兵问题上的拖延，特别是在自愿参军的人员减少而部队由于伤亡需要源源不断地补充新兵时。他们也不能忍受他在其他问题上懒散拖拉的表现及其战前养成的难以改变的生活习惯。“极其重要的军事文件堆积如山，无人看管，无人批阅。”科利佐夫在日记中写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卡瓦列罗晚上九点就得睡觉，而且谁也不敢叫醒这位老人。即使马德里在半夜失陷，政府首脑第二天上午才会知道。”曾经担任总参谋长托里维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的苏联顾问的基里尔·A·梅列茨科夫写道，人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使卡瓦列罗改变其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每当他去睡觉时，他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被切断，他的所有接见被取消。”

在这些苏联人的观察资料中，肯定有某些夸大的内容，因为，就连坚定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卡瓦列罗手下由国防部副部长掌管的战术参谋部门负责人安东尼奥·科登也承认，国防部长为国防部制定了一个“合理的工作时间表”。“他严格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工作，上午八点准时开始……直到晚上八点结束，有一个非常短暂的进餐时间。他在八点钟就寝，除非事情非常严重和紧急，谁也不许打扰他。”

无论卡瓦列罗的生活习惯如何，共产党人及其苏联盟友仍然可以忍受，就像他们尽

量忍受另外几位更加顺从他们意愿的西班牙人的习惯一样，例如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和胡安·内格林。但是，正如科登所说：“我很快发现，这位社会党领导人的坚定性格——它曾经受到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钦佩——建立在固执的基础上，由于过高估计了自己的素质和重要性，它往往变成一种负面特征。”的确，共产党人发现这种人难以对付。此外，正如科利佐夫在日记中所说，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作风生硬”。“他不时地大声吼叫；他不允许有反对意见。作为国防部长，他亲自解决军事问题。”

早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主要由于共产党的压力，政府决定征召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的适龄人员入伍，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部分由于拉尔戈·卡瓦列罗认为志愿者的士气高昂并且具有更强的作战能力，部分由于他知道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反对征召他们的成员加入政府的部队，而他需要他们的支持，因此，这个决定一直停留在纸面上。

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同意对政府宣布的那两年的适龄人员进行动员，不过，这附带了下列条件：所有持有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会员证的人应当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召入自己的民兵部队服役。在加泰罗尼亚，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地区委员会就此决定发表声明：“鉴于把我们的部队完全交给政府指挥非常幼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被动员的两年]适龄人员中所有属于我们工会组织的人应当立即去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兵营报到，在没有这种兵营的地方，立即向工会或者[当地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保卫委员会报到，它们将对报到者的组织关系、年龄、职业、社会阶层、住址以及所有必要的情况进行登记，然后把一份报告寄到尼古拉斯·萨尔梅龙广场十号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保卫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给登记入册的同志颁发民兵证，当然，这些同志今后将受地区委员会的调遣，委员会将把他们派往指定的部队或前线。”

一九三七年二月，马拉加失陷后不久，当共产党控制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指责政府不实行强制征兵时，拉尔戈·卡瓦列罗反驳说，政府既没有营房给征召的士兵驻扎，也没有资金和武器给他们发饷并训练他们。此外，几天前在回答共产党提出的实行征兵的要求时，他有些虚伪地宣称，根据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颁布的对二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的所有身体健康、有义务服役的人员实行征兵的法令，已经在“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实施了义务兵役制。他接着说：“政府和国防部要求各个党派和工会组织应当督促它们的成员接受这一法令规定的原则，以便在军事当局认为有必要征召服役年龄的人员入伍时，不会遇到任何障碍。本部长认为，希望共同保卫国土抗击外国入侵的人应当这样进行宣传而不是向政府提出已经采取过的法律措施的问题，例如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颁布的法令。”

但是实际上，这是为了掩盖没有实行强制征兵而进行的含糊其辞的诡辩，结果，几天之后，在共和派与社会党温和派内阁成员的支持下，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不仅迫使卡瓦列罗重申征召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的适龄人员入伍，而且把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的适龄人员包括在征召的范围内。不过，这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自由主义运动的问题。三月初，注意到政府动员令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敦促当地的工人向全国劳工联合会为给自由主义运动民兵部队招兵买马而设立的征兵站报到。三月十五日是被动员的适龄人员分别向各地的征召中心报到的日子，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和自由主义青年运动半岛委员会当天发表了一份共同宣言，禁止工人“加入正规军”，命令他们接受“指挥战争的机构”的安排，这当然指的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各地成立的保卫委员会。鉴于所有这一切，也就难怪几周之后共产党的喉舌

《红色阵线报》报道说，已经得到证实的是，在埃斯特雷马杜拉的一些村庄，有人力劝那些按照政府的动员令应当加入正规军的人不要这样做，然后开始把他们组成

具有“某种政治或者工会特征”的部队。

与此同时，西班牙共产党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利用马拉加的惨败：它要求清洗所有指挥岗位。虽然这个要求表面上针对的是受到怀疑或不称职的军官团成员，但它很快就被证明是专门针对拉尔戈·卡瓦列罗所任命的那些反对共产党渗入军队的人的。用本书经常引用的前共产党中央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的话说：“马拉加失陷与其说是一场军事失败，不如说是党为争夺‘控制权’而开展最困难的政治斗争——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斗争——的一个极好的借口。”

共产党人的第一个目标自然应当是何塞·阿森西奥将军，因为，作为国防部副部长，他在国防部占据着仅次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重要位置。人们还会记得，为了回应共产党人所提出的解除阿森西奥中部前线指挥权的要求，国防部长以对抗的姿态将其提拔到这个位置上。拉尔戈·卡瓦列罗多年以后写道，对阿森西奥将军的攻击“难以形容”。“我已经被迫解除了他的中路军司令的职务。……现在，[共产党人]决心将他赶出国防部。‘为什么？’我问他们。‘因为他是一个叛徒！’‘拿来证据给我看，证据！’……可是他们从未出示过任何证据。在每一次内阁会议上，那几个[共产党人]部长总是提出同一个问题：必须罢免国防部副部长；他在国防部是一个危险因素。我要他们拿出证据；他们表示可以提供，但却从来没有提供。莫须有啊！……在确信指责他是叛徒不起作用以后，他们指责他是一个酒鬼和玩弄女性的人。我回答说，我从来没见过他喝酒，另外，由于我确实知道他们吸收同性恋入党，所以我对他们因一位西班牙将军喜欢女人而谴责他感到意外。”

但是，共产党人没有因卡瓦列罗的固执而气馁。阿森西奥现在已经成为他们夺取军队控制权的计划的一个重要障碍，以致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亲自出马要求将其撤职。拉尔戈·卡瓦列罗满腔愤怒地将这位苏联外交官赶出了他的办公室，以此回答了



这个要求。

社会党左派议员希内斯·甘加生动地记述了得到总理的几位同僚证实并被拉尔戈·卡瓦列罗本人在其发表及未发表的回忆录中确认的这一标志性事件，他肯定地说，罗森堡威胁卡瓦列罗，如果将国防部副部长撤职的要求得不到重视，苏联将撤回它的援助。甘加写道：

苏联大使阁下的日常巡视最初给我们这些惯于出入国防部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们对此习以为常。他每天在总理兼国防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办公室里待几个小时。……罗森堡通常由一位翻译陪同，但可不是普通的翻译！那不是一名大使馆的秘书，而是共和国的外交部长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先生！……

一天上午，紧闭的屋门后面的巡视已经持续了两个小时，这时，突然听见“老人”卡瓦列罗在大声说话。几个秘书聚集在办公室的门外，出于尊重没有人敢推开它。卡瓦列罗的声音急剧加大。接着，门突然打开了，年老的西班牙总理站在他的办公桌前，伸出胳膊晃动着手指指向门口，我们听见他用一种激动得颤抖的声音说：“滚出去！滚出去！大使先生，你必须知道，虽然我们西班牙人非常贫穷因而急需外国援助，但是我们有强烈的自尊心，不会让一个外国大使把他的意愿强加在西班牙政府头上！至于你，德尔巴约，最好不要忘了你是一个西班牙人，而且是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因此，你不该伙同一个外国外交官向你的总理施加压力。”

在他本人关于这一暴风雨般的事件的说法中，拉尔戈·卡瓦列罗证实，他不愿忍受莫斯科的干涉，后者“对待西班牙像对待苏联的殖民地一样”。在“傲慢而放肆”的巡视过程中，苏联大使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声称，苏联反间谍机构已经发现阿森西奥将军叛变的证据，过了两个半小时，拉尔戈·卡瓦列罗站起来，拍着他的大理石桌面对大使说，不要再提这件事。“[我]非常恼火，因此[我]必须把他赶出办公

室。”

将苏联大使赶走之后，拉尔戈·卡瓦列罗与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单独留下。“我为他按共产党的要求办事训斥了他。”卡瓦列罗回忆说，“他能回答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都在说[阿森西奥是个叛徒]，即使不公平也应当解除他的职务。一个多么好的理由啊！但这么说的什么人？除了共产党再无他人！”

内战期间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成员、曾经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亲共人士阿马罗·德尔·罗萨尔非常简单而且片面地解释了西班牙总理对苏联大使的态度，他说，与罗森堡的第一次个人冲突发生时，“卡瓦列罗处于某种长期烦躁的状态”。他告诉我们，在以前的各种场合，所有事情显示正常，“符合两国良好的外交关系，尤其符合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与一位享有革命盛誉的老资格社会主义战士之间的关系”。他断言，大使一如既往，而卡瓦列罗发生了变化。“他毫无理由地讨厌大使；这是由某种新的精神状态、某种政治上的变化、更可能是某种政治伤害所导致的个人应激反应。……罗森堡是卡瓦列罗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可靠而且忠实的顾问，唯一一个帮助西班牙共和国的国家的代表。总理怎么可能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代表产生敌视、抵触的态度呢？只要卡瓦列罗忠于一九三六年的卡瓦列罗，一切都将顺利进行；但是，到他开始背离使他掌权的政治路线时，他将因自相矛盾而陷入困境。”

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在同一本书中说，“反对阿森西奥的活动是不正当的”，它“出于自私的职业野心”，阿森西奥是个“伟大的军人，实际上妨碍了另一些军人的前程”。其实，这种说法令人费解，因为这显然说的是共产党人安东尼奥·科登，正如科登本人公开宣称的那样，他一直与阿森西奥不和。尽管个人的心计和野心在倒阿森西奥活动中肯定起了某种作用，尽管科登的共产党同志在除掉阿森西奥的过程中

肯定利用了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军官——他在一年之后成为胡安·内格林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然而，毋庸赘言的是，反对这位将军的活动首先而且主要是为共产党的政治目的而不是为科登在国防部的个人野心服务的。人们应当记得，在反对阿森西奥的活动中，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共产党代表也竭尽全力向拉尔戈·卡瓦列罗施加压力。

阿森西奥事件表明拉尔戈·卡瓦列罗与苏联大使的关系恶化到了什么程度。就在将苏联大使赶出办公室几周前的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在回答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来的信中提出的“西班牙政府[对罗森堡]感到满意还是必须用另一名代表替换他”这个问题时，拉尔戈·卡瓦列罗还令人放心地说，“我们对他的表现和积极性感到满意。他工作一直过于努力，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也许因为这一友好答复，或者因为他们希望拉尔戈·卡瓦列罗对苏联大使大发雷霆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莫斯科和西班牙共产党对控制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并没有彻底绝望。实际上，他们仍然希望能够像其曾经促进两党青年运动合并那样，利用他的影响促进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合并。社会党左派领导人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说：“苏联人在整个内战过程中热衷于两党合并的计划。”他与卡瓦列罗的密切关系使他的话具有特殊的权威性，内战爆发之前，他个人像卡瓦列罗一样支持两党合并。“新的政党将叫做统一社会党，与加泰罗尼亚那个政党的名称一样，但实际上它将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由共产国际和苏联当局控制并指挥。党的名称将会蒙蔽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同时希望它不会使西方列强提高警惕。斯大林强烈希望拉尔戈·卡瓦列罗利用他的政府权力及其在社会党内的巨大影响力促使社会党被共产党兼并。”

达到这一目的，将向共产党的绝对支配地位和建立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迈出一大

步，谁能对此表示怀疑？

但是，尽管卡瓦列罗所控制的有影响的西班牙社会党马德里地方组织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阿拉基斯塔因属于该组织——战前拥护两党合并，但是，他的经历已使他对合并失去了最后一点热情。一九三七年五月被人设法赶下台后，卡瓦列罗说出了他对合并问题改变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我唯一要求的事情是，”他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说，“那些曾经希望进行这种合并的人应当坚持我们制定的共同计划，那就是，应当在一个革命纲领的基础上实现合并。我非常清楚地记得，由于得到莫斯科的同意，共产党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条件提出来，每当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总是说，我们应当与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断绝关系。”（这一段话与内战爆发以前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给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封建议两党合并的信有关。在人民阵线形成初期所写的这封信使用的是旨在迎合以拉尔戈·卡瓦列罗为首的人数占据优势的社会党左翼激进派而不是迎合以因达莱西奥·普雷托为首的社会党温和派的语言，它特别提出了下面这些条件：“完全独立于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政体彻底决裂”；“承认必须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并且以苏维埃的形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人]现在还像以前一样坚决主张我们应当与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断绝关系吗？”拉尔戈·卡瓦列罗接着说，“不，恰恰相反，他们现在的口号是，我们应当回到七月十八日以前。”

无论这个问题在卡瓦列罗和其他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决定改变他们对两党合并的态度时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毫无疑问，与其说他们不喜欢共产党现行政策的温和腔调，不如说他们痛恨它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破坏并且担心最终它将吸引那些无视这一问题的社会党人。一九三七年一月，一些社会党左派的重要人物进行了一次谈话，政府副总理鲁道夫·略皮斯对这次所作的以下描述表明了这一点。

谈话转向了所有真正的社会党人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即，共产党人的出尔反尔。有人当即描述了我们大家再熟悉不过的情况：共产党人在前线和后方开展运动；他们迫使各种组织驱逐社会党人；……他们露骨地劝人改变政治信仰，在劝诱的过程中无耻地使用应当受到严厉谴责的各种手段；他们一再对我们出尔反尔。他谈到了已经投靠共产党的那些社会党青年组织领导人的行为，还谈到共产党人对两名社会党议员内尔肯和蒙铁尔的“征服”。……与此同时，他补充说，我们的党没有显示出一点生气；[社会党温和派控制的]执委会始终保持沉默。……

另一些同志发了言。卡瓦列罗同样发了言。他只说了几句话，但是这些话清晰有力。“这里说的吸收是什么意思？”他问道。“决不会有人吸收我。党有不能抛弃的传统和潜力。……党不能灭亡。只要我活着，[社会]党就会存在！”

即使是在内战爆发之前，当拉尔戈·卡瓦列罗还在幻想可以通过两党合并兼并共产党时，他就对合并变得谨慎起来，因此，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摆在他面前的诱人条件，甚至让他成为统一社会党领袖的承诺，已经不能使他同意他们的过分要求。关于战前那一段时间，他写道：“[共产国际]想使共产党与社会党合并，然后将其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但它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共产党没有人具备完成这项艰巨任务所需要的影响和声望。……不幸的是，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在共产党的报刊上，我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党人，一个革命者，西班牙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忠实朋友，未来唯一的希望，西班牙的列宁！我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悬挂在电影院，陈列在商店的橱窗里，在西班牙和国外到处都是，甚至在苏联也随处可见。他们想唤醒我的虚荣心和野心，这是始终存在于人类心中的邪恶本能。但是，这些情感在我的内心深处长眠不醒。他们不了解我，否则的话，他们不会想出这么愚蠢的昏招。”在西班牙化名梅迪纳的共产国际代表比托里奥·柯多维拉曾经拜访拉尔戈·卡瓦列罗，催促他实施两党合并：“我将成为新政党的领袖

从而成为西班牙的主人，因为合并一旦完成，所有工人都将加入这个政党，它将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卡瓦列罗没有同意：“[我]已经获得太多的经验，不会让自己受这些迷人的条件诱惑。”一九三六年九月他成为总理之后，压力卷土重来。“[我]礼貌地予以了拒绝。”柯多维拉并没有灰心，他再次拜访了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客人告诉我，这是进行两党合并的最佳时机；所有工人都在要求合并成为统一的党；由于我担任了总理，这将会是一个成就；尽快实现合并是明智之举，因为这样就将赢得战争。总之，他暗示，我可以而且应当发动一场政变。我压住怒火回答道，所有工人要求合并不是事实，而且，即使他们要求合并，我也不会参与这一勾当。我要他不要再提这件事。如果有人想实现工人的联合，他只能加入劳动者总工会和社会党。……[我]不打算以他建议的背叛行为给我纯洁的政治历史和工会生涯染上污点。……脸像熟透的石榴一样通红的梅迪纳离开了。……我将我担任的所有职位——总理、国防部长——以及未来的平静生活置于了某种危险的境地。”尽管遭到卡瓦列罗的断然拒绝，劝说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的最终努力仍在进行。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带着一个紧急请求突然抵达巴伦西亚。“[他]以斯大林的名义问我会不会进行两党合并，我给他的回答是‘不会！’”

几天前刚刚把苏联大使赶出其办公室的卡瓦列罗所做出的这一桀骜不驯的明确表示终于使苏联人认识到，继续尝试使这位社会党领导人屈从于他们的意志是徒劳的，于是，它成为一个信号，标志着一场逐渐削弱其仍然掌握的权力的诋毁运动开始了。无形之中，“愚蠢”、“无能”、“老态龙钟”这些词汇口口相传，这预示着内战期间最激烈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最后成为内战初期左派领导人中最有影响、最受大众喜爱的那个人的政治生命的终结。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当时身为西共中央委员的恩里克·卡斯特罗注意到，这场历史性的斗争逐渐发展成为针对共产党以前的

盟友、“针对这个国家历史最悠久的工人阶级政党、针对其毫无争议的领袖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斗争，他承认，当脑子里想着下面这些事情时，他“带着满足的微笑摩拳擦掌”：

“我们应当赢得这场斗争。我们应当赢得与社会党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斗争。在群众的帮助下，在其他党派组织的帮助下！在社会党自己的帮助下！哈……哈。了不起！太了不起了！那些白痴指责我们对自己的盟友出尔反尔有什么关系？党正在做的不是它必须做的事情吗？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控制，可能进行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吗？傻瓜不应当感到惊讶！我们正在做的争取群众、完成一场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这些事不是什么新东西。这里有列宁和斯大林的教科书！想要了解其内容的人，想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战略和战术是什么的人，可以看看这些教科书。没有什么新东西，没有任何新东西！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你们——你们所有人——都这么蠢，以致没有设法弄清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但这不是我们的错。错在你们！……我们的盟友政治上的愚蠢无疑是我们最好的盟友之一。”

他接着说：“西班牙从来没有见证过一场隆重的政治葬礼。现在它将见证了。政治家拉尔戈·卡瓦列罗很久以前已经开始垂死挣扎。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像他没有意识到一生中的许多重要事情一样。……[但是]这使他的政治死亡更加可怕，它将在一种近乎完全孤立的政治气氛中残忍而出其不意地降临。”

现在，为了与无情的对手作斗争，拉尔戈·卡瓦列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完全相信其政治判断力的人给予指点和支持，然而没有这样的人。他多年来关系密切的合作伙伴和良师益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如今置身于巴伦西亚日常的云谲波诡之外远在大巴黎当大使，尽管他是一个出色的辩论家，但是作为政治战略家却能力可疑。

此外，曾经忠实地支持他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圣地亚哥·卡里略、玛加丽塔·内尔肯、费利佩·普雷特尔和阿马罗·德尔·罗萨尔等人已经改换门庭效忠于共产党。更糟糕的是，他身边可以信赖的政治追随者只有三个人，由于共产党人在外国顾问的帮助下练就了分裂敌对组织、消灭政治对手的列宁主义权术，三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他们的对手。首先是副总理鲁道夫·略皮斯，卡瓦列罗忠实的追随者和著名的教育家（曾任社会党控制的教师联合会主席），既没有必要的活力也缺乏政治敏感；第二个是一个名叫“阿尔法赫梅”（欧斯塔基奥·阿帕里西奥）的政治上的小人物；最后是一个年轻的新贵，傲慢而缺乏经验的前社会党议员信使何塞·马利亚·阿吉雷，他设法博取总理的欢心，因而得到不只是政治军事秘书职位和上尉军衔的慷慨奖励。

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在共产党人开展针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诋毁运动期间，阿吉雷深感力不从心并且对阿拉基斯塔因不在感到遗憾。在二月二十八日致驻法大使的一封信中，阿吉雷写道：“要是你能与我们在一起就好了！……我对我们的头儿很有信心。但是，他太孤独了！没有人或者说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帮助他有效地开展那些必须开展的工作。”

人们必然产生的疑问是，肯定知道自己的头儿处境危险的阿拉基斯塔因为什么从未表示愿意返回巴伦西亚帮助他。

针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诋毁运动正在聚集更大的力量。

“为什么开展[反对我的]这种运动？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离开政府几个月后，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一次公众集会上问他的听众。

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不想成为某些人在我国的代理人，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军事、政治和社会领域捍卫国家的主权。因此，在这些人认识到——当然，他们认识



到得太晚了——卡瓦列罗绝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代理人之后，他们改变了方针路线并且开始进行反对我的运动。但我可以证实，就在这一运动开展之前不久，有人向我提供了可以满足一个人的野心和虚荣心的一切：我可以成为统一社会党的领袖；我可以成为西班牙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我将得到与我打交道的那些人的支持；但是都有一个条件，我要执行他们的政策。于是，我回答道，我决不会这样做。

正如刚才我所说，他们了解我了解得太晚了。他们应当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拉尔戈·卡瓦列罗既没有叛徒的性情也没有叛徒的本质。我断然拒绝[执行他们的政策]，结果，有一次……我与某个国家的官方代表之间出现了非常激烈的场面，更加谨慎是他们的义务，但他们没有履行这种义务。于是，当着他们的一个代理人——尽管是一个担任着某部部长的代理人[指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面，我告诉他们，拉尔戈·卡瓦列罗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对于我国政治生活的干涉。

### 第三十五章 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压力加大

在苏联大使努力争取解除何塞·阿森西奥将军的国防部副部长职务的同时，共产党人从其他方面施加压力。我们应当记得，二月十三日，在共产党代表伊西多罗·迭格斯的倡议下，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要求清除军队中的“动摇分子和可疑分子”，随后《工人世界报》恶毒地斥责阿森西奥是“造成失败的人”，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在几天后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共产党人政府部长正式要求罢免阿森西奥。尽管本人相信阿森西奥将军“无疑是共和国军队中最聪明能干的军官之一”，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仍然坚决支持这一要求。他解释说，“作出决定的主要因素不是通常的个人信任，而是大部分部队对他所产生的怀疑，因此，我是最坚决地支持将其撤职的内阁部长之一。……卡瓦列罗认为这样做对他的副部长不公平，他与之进行的斗争具有某种重要意义。他对我与他采取不同的立场——这是第一次

——非常不满，结果让我深感遗憾，从那一天起，我不再是他最信任的部长。”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勇敢地保护阿森西奥将军，但是，由于遭到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到左翼共和派政府部长的跨越政治派别的广泛反对，他没有成功。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在战后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证实了这一情况。由于她以前的一些内阁同僚不愿向我提供有关他们各自态度的信息，她的诚恳尤其值得称道。左翼共和派政府部长在争论过程中的立场反映在他们的全国性喉舌《政治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于头版的一篇含沙射影诽谤阿森西奥的文章里。同一天，官方公报宣布了阿森西奥辞职的消息。

虽然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这次危机中暗中做了许多削弱拉尔戈·卡瓦列罗地位的事情，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内阁会议和他们的报刊上对阿森西奥将军所采取的敌视态度也很重要。作为一个严格执行纪律的人，阿森西奥将军在指挥中部前线期间对退却的民兵采取了严厉的措施，而且据一位权威人士说，他还下令处决了几名拒绝执行他的进攻命令的民兵指挥官，长期以来他得不到自由主义者的信任，内战初期，反对职业军官和任何形式的军事化是这些人的一个信条。因此，像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所做的一样，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很容易就卷入了反对阿森西奥将军的运动，同样，在不自觉的愿望驱使下，他们对共产党人反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前面提到的那封写给我的关于阿森西奥的信中，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坦率地承认，她后来认为，自由主义运动反对阿森西奥将军是错误的，不仅因为阿森西奥能力卓越，而且因为这帮助削弱了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打交道时的力量。

但是，拉尔戈·卡瓦列罗不会轻易抛弃一个他对其专业能力充满信心的合作者，因此，为了让将军以某种身份在国防部发挥作用，他直接下令要阿森西奥继续留在巴伦西亚。与此同时，受到围绕着阿森西奥展开的斗争的刺激，他对国防部中的共产党势力采取了有力的行动。卡瓦列罗把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战术参谋部门负责人的共

产党员安东尼奥·科登中校派往科尔多瓦前线；解除了自己的副官曼努埃尔·阿雷东多中校的职务，因为他同情共产党；然后把他与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上尉一起派往巴斯克前线，后者是重要的情报监控部门负责人，战前是左翼军官组织共和国军人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组织者。

关于这些人和另外一些人被清理出国防部，当时在战术参谋部门担任安东尼奥·科登的助手的马丁·布拉斯克斯写道：“无论是因为我的工作被认为更加重要，还是因为我被认为不太同情共产党，反正我没有像许多人那样被清理出国防部。……我的一些同事被派往毕尔巴鄂的北方军队，其中包括卡瓦列罗的副官阿雷东多和迪亚斯·滕德罗。我承认，我担心自己可能被人出于恶意派往那里。我对前线的形势非常悲观。我曾一再要求向毕尔巴鄂供应物资，但这些要求均遭到拒绝。‘我们不应当给北方的军队运送任何东西。’我被告知，‘让巴斯克人自己照顾自己吧！他们凭什么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考虑到这种目光短浅的政策，被派往北方的军队去显然意味着很可能以面对法西斯分子的行刑队而告终。”

共产党在这次清洗中的最大损失无疑是迪亚斯·滕德罗，他掌管的情报监控部门在每个人参军之前审查他们的政治背景。认识他的社会党左派议员玛加丽塔·内尔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改换门庭加入了共产党，据她说，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员的迪亚斯·滕德罗“为党做了一些了不起的事情”。他为共产党谋取利益的能力无疑因为他在一个特设的军官分类委员会中所起的主要作用而有所增强，据斯坦利·G·佩恩证实，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根据所有可以使用的军官政治上的可靠性将他们分类。M·特蕾莎·苏埃罗·罗卡写道：“对他特别有用的是汇集了战前所有军队指挥官的卡片索引以及他设法弄到的右翼军官组织西班牙军人联盟[UME]的部分档案。”就这样，他拥有了相当大的自主决定权，因此，他被拉尔戈·卡瓦列罗解除职务对西班牙共产党谋求支配地位的计划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何况，据阿森西奥说，在其他党派代表的支持

下，迪亚斯·滕德罗此前已被推荐接替他的高级职务。

除了解除迪亚斯·滕德罗等人所担任的关键职务之外，任命了六名均为可靠的社会党左派的监察人员详细检查部队的将领、低级军官、未授军衔的军官以及总政治部的高级官员和各级政治委员的工作。此举对共产党人控制军队的计划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因这种激烈反应的威慑而暂时变得小心谨慎的共产党人只是鼓足勇气对后一项措施提出了温和的批评，他们克制住自己没有报纸上谴责卡瓦列罗解除他们的人所担任的国防部的关键职务，以免给后者的愤怒火上浇油。由于迪亚斯·滕德罗的足智多谋，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既谴责了解除这些人职务的行为又使卡瓦列罗不能以任何身份把阿森西奥留在国防部。作为情报监控部门的负责人，迪亚斯·滕德罗与所有党派组织都有联系，因此，由于在国防部以外几乎没人知道他效忠于共产党，他可以利用钢铁纵队的喉舌《我们》的版面。政治考虑限制了那些不太偏激的自由主义报刊的言论，尽管它们攻击阿森西奥并且在战前敌视社会党领导人卡瓦列罗，但是，如今它们意识到他作为反共盟友的现实价值。然而，《我们》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反感并没有因为政治考虑而减弱。二月二十五日，由迪亚斯·滕德罗授意并且使用他所提供的材料，《我们》发表了一篇题为《军队的清洗在如何进行》的文章，文章包括一份“忠诚的共和国军官”的名单和另一份被任命接替他们的军官名单，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后面这份名单上的人“同情共和国”，他们“或者不向共和国效忠，或者只是保持中立”。第一份名单包括前面提到的被解除国防部职务的那几名共产党员和亲共军官：安东尼奥·科登、曼努埃尔·阿雷东多和迪亚斯·滕德罗；在第二份名单上，费尔南德斯上校的名字赫然在列，他接替迪亚斯·滕德罗负责情报监控部门，据《我们》说，他是阿森西奥的好朋友。然而，这份报纸断言，比所有这些事实更有趣的是，尽管已经给人造成阿森西奥将军被撤职的印象，但是实际

上，他被免去了所有责任并被当作国防部长和新任副部长的技术顾问安排在幕后。“而且，他的安排已经由一道简单的部长令确定了，可是，对于将军的委派和任命，无论他们是什么身份，都应当由政府提出并经政府首脑签署的法令来确定。”

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拉尔戈·卡瓦列罗曾经下达过这样一道部长令，当然，阿森西奥本人后来也否认了它的存在，但是，就像将军本人同时承认的那样，国防部长肯定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尽管如此，并没有做出那种正式宣布的任命，而且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一指控为的是阻止任何恢复阿森西奥在国防部的权力的尝试。

除了迪亚斯·滕德罗所授意的这篇文章之外，《我们》还对国防部长进行了下面的抨击：

“拉尔戈·卡瓦列罗……老了，太老了，不具备解决某些问题所必需的灵敏的脑力，而我们自己的生活以及全体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当所有报纸——除了由国防部长本人操纵的报纸之外——都在指责一个人时；当人们在战壕里、军营里、委员会里、大街上以及政府本身的部门里私下或者公开地说阿森西奥将军不是因为无能就是因为背叛……而屡战屡败时；当尽人皆知现在担任拉尔戈·卡瓦列罗顾问的这位将军在得知马拉加失陷的消息那天晚上像一个自贬人格在泥沼里打滚的人一样在一家夜总会喝得烂醉时，国防部长不应当给报纸写信并且采取可悲的姿态企图使人们对这些事情保持沉默。”（这涉及拉尔戈·卡瓦列罗所写的两封公开信，一封写给左翼共和派政府部长卡洛斯·埃斯普拉，另一封写给左翼共和派全国执行委员会，对左翼共和派的喉舌《政治报》在二月二十一日的第一版上用下面这句话含沙射影地攻击阿森西奥的继任者卡洛斯·德·巴赖瓦尔表示抗议：“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将某人撤职而胜利在望的话，那么，不要让我们因为任命某人而导

致失败。”在第一封信中，拉尔戈·卡瓦列罗质问埃斯普拉，《政治报》是不是准备开展“一场新的破坏运动，使我不得不失去一位能干的合作者”，同时强烈要求埃斯普拉利用其影响力阻止这件事情继续发展。他在写给左翼共和派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公开信中宣称，他不打算容忍一个人民阵线党派的官方喉舌开展一场可能给他信赖的合作者造成“不愉快的局面”的运动。《政治报》在回应时有些委曲求全地辩称，拉尔戈·卡瓦列罗表示不满的那部分内容是在不知道阿森西奥继任者的名字时排印的，而左翼共和派全国执行委员会同样显得局促不安，它声称，它在这部分内容中看不到任何攻击卡洛斯·德·巴赖瓦尔的意思。 )

“人民以充满敌意的目光发现，他们正在被愚弄。”《我们》继续对卡瓦列罗进行抨击，“阿森西奥的辞职是一个骗局，因为背着人民他受到吹捧，被提拔到部长身边的一个更受信赖的位置上。……国防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同志应当记住他老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正在变得老态龙钟，老态龙钟的人不应当管理国家，也不应当允许他们管理国家。”

被这种辱骂性的语言和关于安排阿森西奥的指控——为了避免受到无视公众舆论和内阁意愿的指责，这一指控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让将军在国防部帮助他的所有想法，即使是以非正式的方式——所激怒，拉尔戈·卡瓦列罗让社会党左派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暂时禁止《我们》出版发行。同一天，国防部长宣布，一名涉嫌授意发表几篇文章的正规军军官已经被捕，在他家里发现了大约两百份《我们》，没有提到迪亚斯·滕德罗的名字。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攻击使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全国领导人颇为尴尬。在几天后举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特别代表大会上，当全国委员会书记反对并且成功地否决了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提出的应当对禁止《我

们》出版发行表示抗议的提案时，这种尴尬显而易见。几个月后，关于其他自由主义报纸发表的攻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言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盟的国际工人协会驻巴塞罗那代表赫尔穆特·吕迪格写道：“我们都知道卡瓦列罗的过去，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各省报纸的编辑们并不是全都知道，几个月前，卡瓦列罗已经成为共产党势力的反对者，因此，要求他下台可能帮了共产党的忙。”

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七年五月下台几个月后，当西班牙共产党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地位时，阿森西奥被控没有及时向马拉加前线供应必要的武器弹药并被监禁起来等待审判。一九三八年五月，他被释放并恢复名誉，这部分是因为一些有影响的朋友的干预，其中包括共和国副总统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和当时的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后者个人相信阿森西奥是无辜的；部分是因为他能够提出有力的事实反驳主要控告他的人；部分是因为——由于当时共产党人不希望进一步扩大他们与社会党左派之间的隔阂——在不指控其上司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情况下对阿森西奥进行审判成为问题，作为国防部副部长，他直接服从卡瓦列罗的命令。

《我们》事件是共产党人使拉尔戈·卡瓦列罗受到的最大侮辱和伤害。几个月来，他注意到他们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武装力量的暗中渗透，这种渗透已经使他失去了大量追随者，包括许多亲密的战友。然而，肯定是因为担心失去苏联的援助，而且还担心让外界知道共产党在共和国的门面背后对政府事务的严重渗透，尤其担心让英法两国——他仍然希望可以诱使它们解除武器禁运——知道，他被禁止公开发表任何针对其不知疲倦的对手的言论。实际上，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即他的政府下台五个月后，他才敢公开指责共产党。他声称，他之所以等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他不希望人们说，他发表的言论对西班牙在日内瓦的地位造成了不利影响或者使前线的士兵士气低落。“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接着说，“我一生中所做的最大牺牲之一是过去这五个月我保持着沉默。但是，我并不遗憾，因为，尽管诽谤者凶狠地撕

咬我的肉体，我的良心使我确信，我是为西班牙的利益而沉默，为赢得战争的胜利而沉默。”显然，这些因素也解释了他执政期间的克制态度。

不过，被《我们》事件激怒的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二月二十六日，他从沉默中爆发了，以公开发表声明的方式进行回击。他在声明中所谴责的“法西斯分子的代理人”显然指的是共产党人。

他说，二月十四日，星期天，代表着反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的浩荡队伍在巴伦西亚的街头游行，证明他们对政府和共和国宪法的支持。（这里说的是马拉加失陷后在他的支持下由社会党左派所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巴伦西亚省书记处组织的一次示威游行。在一份邀请巴伦西亚省的所有工会、政党和文化组织参加的告示中，该书记处声称，它想通过示威游行让政府看到，它拥有劳动人民的支持。共产党人接受了邀请，而且由于马拉加失陷所造成的有利气氛，他们在一次当地各组织领导人的会议上成功地使一项建议得到采纳：在示威游行的当天向拉尔戈·卡瓦列罗递交一份包括十点要求的请愿书。除了其他要求之外，请愿书要求实行义务兵役制并且清理所有负有责任的军事岗位。根据示威游行前一天拉尔戈·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在他们的报纸上所发表的一篇社论中表明的以下观点来看，他们显然对这份请愿书不满：“我们不应当要求实行义务兵役制，而应当在被征召时去军营报到。……我们不应当要求什么，而是应当付出一切。”由于共产党人的参加并且用请愿书玩弄了一个大花招，社会党左派未能按计划利用这次示威游行巩固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权力。相反，共产党人却非常成功地利用它得到了许多好处。）

拉尔戈·卡瓦列罗继续说：

当[示威者]表达他们无条件支持政府的愿望时，当西班牙共和国及其合法政府的地位因这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世人的心目中得到加强时，法西斯分子的代理人竟



然变本加厉到如此程度，以致他们的目的和阴谋在传统的共和派和工人阶级组织中得到了某种响应甚至帮助。他们乔装打扮混入我们中间，骗取我们无产阶级和共和派的好心支持，在我们的队伍中制造混乱、煽动狂热、怂恿不守纪律的行为。……当局知道，持有共和派各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党员证以及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证的法西斯分子代理人正在共和派控制区里自由活动，他们的罪恶行径已经成功地迷惑了许多共和派军人甚至平民，这些人过去的清白历史和自我牺牲证明了他们的高尚信仰和忠诚。……一部分报纸和反法西斯的党派组织、这些组织中的一些负责人以及心地善良但缺乏思考的人民已经卷入了敌人的阴谋，配合了敌人的活动。敌人费尽心机地在我们中间组织了间谍活动，因此，我可以非常坦诚地断言，阴谋和激情像蛇一样盘绕在我们脚下。……

一个完整的组织楔在人民与政府之间，腐蚀了许多人的良心，激起最阴暗的欲望，这是一个有意无意地——我认为两种可能性都有——破坏我们事业的组织，结果，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在那些应当前进并且准备走在民主和工人队伍前列的人脚下，盘绕着背叛、不忠和阴谋的毒蛇。

我容忍这种事态不打算超过一个小时。

尽管共产党人在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发表的一次谴责性演说中公开将对他们的这种含沙射影的攻击称为“癞蛤蟆和蛇”的宣言，但是，三个月后，在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已经下台的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他们也如法炮制。当二月底拉尔戈·卡瓦列罗发表他的声明时，共产党人谨慎地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是卡瓦列罗攻击的对象，并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声明作出得体的反应。他们还与其他组织一起参加了总理召集的一次确保得到这些组织公开支持的会议。

不过，据埃尔南德斯在他脱离共产党多年以后所写的《我是斯大林的一个部长》一

书中说，三月初，一次“意义深远的”政治局会议在巴伦西亚举行，由斯特凡诺夫、柯多维拉、杰罗和陶里亚蒂组成的莫斯科代表团以及国际纵队的组织者马蒂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负责人奥尔洛夫和苏联代办盖基斯。埃尔南德斯提醒注意，后两个人是第一次出席西班牙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总之，”他讽刺地说，“外国人比西班牙人多。”他说，在会议上，推翻卡瓦列罗被陶里亚蒂作为首要的短期目标提出来。在身为政治局委员的热情之花的赞助下编撰的共产党官方内战史无视埃尔南德斯对这次会议的记述，而它遭到奥尔洛夫的激烈批评并且至少包含一处严重的错误。本书将呈现这一记述，因为它是我们拥有的唯一证据，证明在幕后围绕着推翻卡瓦列罗的建议存在着与莫斯科代表团的不同意见。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费尔南多·克劳丁证实，确实存在这样的不同意见。不过，无论是他还是他的亲密战友圣地亚哥·卡里略（政治局候补委员），都没有出席这次历史性的会议。

埃尔南德斯说，党的书记何塞·迪亚斯在会议开始时说明了他认为共产党人不应当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理由：他们将招致大多数社会党人的仇视，将被指责企图谋求政治军事上的支配地位，并将受到其他反法西斯力量的孤立。“我发现同志们被种种疑问所困扰，心中充满了犹豫和担忧，”埃尔南德斯评论道，“……不得不——第一次！——与莫斯科的代表进行一场政治斗争的想法让他们感到惊慌失措。”埃尔南德斯说，他表示支持何塞·迪亚斯，坚持认为卡瓦列罗对共产党人以诚相待，帮助他们在军队中取得支配地位而且没有阻止给他们分配最好的武器；多亏了他，他们才能组成人民阵线并将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合二为一；他对苏联顾问“言听计从”；在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的问题上，他是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他补充说，与卡瓦列罗决裂将是他们能够让佛朗哥将军取得的最大胜利。

“乌里韦、切卡、热情之花和米赫等人[另一名政治局委员佩德罗·马丁内斯·卡顿在

前线]呆若木鸡。在听到莫斯科的声音之前他们不敢发表意见。”接着，斯特凡诺夫发言了。他说，迪亚斯和埃尔南德斯正在捍卫一项有害的事业。谴责卡瓦列罗的不是莫斯科而是“历史”。马蒂对卡瓦列罗向国际纵队定量供应汽油而且没有给他的指挥部提供足够的汽车表示不满。“‘你的问题在于你有一部过于庞大的官僚机器。’迪亚斯反驳道。‘我不是官僚！’马蒂用拳头捶打着胸膛怒吼道，‘我是革命者，是的，先生，我是一个革命者！’‘我们都是革命者，’迪亚斯回答道。‘这还需要看看再说。’马蒂反唇相讥。‘你是一个不懂礼貌的人，’埃尔南德斯插话说，‘你的年龄和资历都不允许你对我们不尊重。’‘你就是一摊大粪。’马蒂反击道。迪亚斯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你是这次会议的一个客人。如果你不满意的话，门在那边！’”

会议随后乱成一片。“有些人一时说不出话来……另一些人则大发雷霆。不动声色的奥尔洛夫坐在椅子上抽着烟。冷漠得让人琢磨不透的陶里亚蒂以做作的平静注视着会场。柯多维拉……试图让马蒂安静下来。格雷[杰罗]若无其事地梳着头发。紧张得无法自控的热情之花大声尖叫‘同志们！同志们！’就像一张破唱片。”

盖基斯发言说：“‘卡瓦列罗正在摆脱苏联的影响。几天前他竟然把罗森堡赶出了他的办公室。’”接着轮到还没有发表意见的那些政治局委员。“‘这不会起什么作用。’”埃尔南德斯想，“‘他们将坐在阳光下面最暖和的地方。’……他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谴责拉尔戈·卡瓦列罗，并且表示他们同意苏联代表团的意见。‘我可以看到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代表团提出的办法，’迪亚斯讽刺地说，‘由于纪律我只能接受这种办法，请把我的不同意见记录在案。’”接着，被埃尔南德斯称为代表团“重炮”的陶里亚蒂发言。“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他的话不是为了辩解或说服。它们是命令，不必圆滑或委婉。……‘我建议，立即开展削弱拉尔戈·卡瓦列罗地位的运动。我们应当在巴伦西亚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埃尔南德斯

同志将是这次会议的演讲者。’ ” 埃尔南德斯说，最初他拒绝了，但是经过迪亚斯的提醒，他服从了党的纪律。会议结束时陶里亚蒂说：“ ‘至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继任者……我认为我们应当通过排除法来进行选择。普列托？德尔巴约？内格林？这三个人中内格林可能最合适。他不像普列托那样反对共产党，也不像德尔巴约那样愚蠢。’ ”

在埃尔南德斯对这次政治局会议的记述中有一个令人费解的错误不能忽视。他声称，奥尔洛夫出席了会议。这几乎根本不可能，不是因为奥尔洛夫否认自己出席了会议，而是因为埃尔南德斯对他的描述完全错了，埃尔南德斯说他是一个“身高将近两米、优雅而且有教养”的人。奥尔洛夫叛逃美国多年以后亲眼见过他的著名苏联问题专家伯特伦·D·沃尔夫写道：“这种通过精确的描述造成逼真效果的热情使虚构露出了马脚。两米应当是六英尺六又四分之三英寸。但是，我曾经数次采访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比那矮了一英尺多，比埃尔南德斯还矮，肩膀宽阔，有点肥胖。他看上去既不优雅也不高贵。”

在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西班牙革命》一书中，我试图通过我的一次个人经历对这一错误描述作出解释，这次经历使我相信，埃尔南德斯谈到的不是奥尔洛夫，而是某个名叫别拉耶夫的人。一九三七年春天，当我担任合众社驻巴伦西亚记者时，我遇见了奥尔洛夫和另一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特工，我在《西班牙革命》中认为后者是别拉耶夫。我不记得向我介绍他们时使用的名字，但是我在多年以后发现了奥尔洛夫的身份。一九七三年奥尔洛夫去世后，美国联邦印刷局出版了《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遗产》，其中包括他向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所作证词的文字记录，附有他的一张摄于一九三三年的照片。多亏这张照片并且因为我清楚地记得这个人，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奥尔洛夫绝不是一个“身高将近两米、优雅而且有教养”的人，他是一个矮个子壮汉，貌不惊人，在几乎任何人群当中可能都不会

引起别人的注意。我认为是别拉耶夫的那个人的体形外表与埃尔南德斯认为是奥尔洛夫的这个人的体形外表非常吻合，以致我相信别拉耶夫就是埃尔南德斯所描述的这个人。现在看来，这种假定是错误的，因为，在莫斯科见过别拉耶夫的恩里克·卡斯特罗对他的描述是，“笨重、强壮、中等身高”。

因此，我们也许不得不作出推论，埃尔南德斯根本不认识奥尔洛夫，至少，一直被当作奥尔洛夫——以其书中他本人与这个所谓奥尔洛夫的长篇对话为证，在对话中，他用这个名字称呼后者不下十几次——的那个高大优雅的叫这个名字的人，既不是奥尔洛夫也不是别拉耶夫，而是另外一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另一方面，我们也许不得不作出推论，他对奥尔洛夫的描述纯属捏造。

无论如何，根据埃尔南德斯所捏造的叙述判断，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奥尔洛夫没有出席研究推翻卡瓦列罗问题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会议。我们已经知道，奥尔洛夫本人否认自己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也否认共产国际的代表陶里亚蒂在场：“埃尔南德斯其实还犯了另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彻底毁掉了他的故事。按照他的叙述，这次会议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举行]。……可是，根据[意大利共产党作家]马尔切拉和毛里齐奥·费拉拉所写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传记，我们知道，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一九三七年六月[根据这部传记，实际上是七月]到达西班牙担任共产国际的代表，即，拉尔戈·卡瓦列罗已经从政府辞职后。因此，陶里亚蒂不可能出席埃尔南德斯所说的这次会议并且主张卡瓦列罗必须下台。由于陶里亚蒂不在场，这次虚构的会议连同埃尔南德斯所有异想天开的添枝加叶土崩瓦解。”

不过，奥尔洛夫的这一部分反驳并没有建立在十分牢固的基础上，因为，据西班牙共产党作家阿道弗·桑切斯·巴斯克斯说，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陶里亚蒂“实际上”整个内战期间都在西班牙，“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埃尔南德斯对早

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和十一月举行的两次重要会议作了详细的描述，陶里亚蒂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就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之前，他还参加了在马德里举行的另一次会议，那次会议研究的问题是大举进攻埃斯特雷马杜拉。此外，国际纵队大本营所在的阿尔瓦塞特省省长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证实，陶里亚蒂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起就在西班牙，他还记录了当年十二月与陶里亚蒂进行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陶里亚蒂试图在“清洗”国际纵队中的“间谍分子和不良分子”方面得到他的合作。更为重要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胡利安·戈尔金的证言，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其他人更全面：“关于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到达西班牙的日期及其亲自对共产党领导机构的直接干预，一场争论开始了，主要是在意大利进行，至今仍然没有结束。……他的授权传记作者马尔切拉和毛里齐奥·费拉拉……宣称，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他才来到西班牙。……根据我所保存的仅限于由与他合作的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和莫斯科的代理人所提供的大量证据，我可以证明以下几点：1) 作为共产国际拉丁地区负责人，陶里亚蒂早在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就已干预西班牙事务。……2) 陶里亚蒂属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布拉格任命的指挥西班牙行动的委员会。……3) [正是陶里亚蒂和共产国际法国代表]杜克洛（一九三六年九月）在马德里强行推出了西班牙共产党必须遵循的路线。4) 在西班牙或者在频繁前往巴黎和莫斯科期间，陶里亚蒂是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因此，他直接参与了所有重大的决定。”

戈尔金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在罗马的一次会议上谴责了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西班牙扮演的角色并让重要的《信使报》发表了赫苏斯·埃尔南德斯那本书的长篇摘录之后，他指使他的朋友费拉拉夫妇写了那部传记。”京特·诺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世界革命》一书中论述了陶里亚蒂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六日回答《新话题》杂志的问题时企图掩盖他在西班牙所起的作用，只要我们记住从诺劳的书中摘录的

下面这段话，陶里亚蒂的传记作者竭力否认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之前来到西班牙的目的就清楚了：“陶里亚蒂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在西班牙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有助于揭穿他最近散布的谎言：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九年间各国[共产]党组织——所作出的政治决定及其采取的实际措施——例如在西班牙——完全是它们独立自主的产物。”

关于陶里亚蒂到达西班牙的日期，有一点应当予以澄清。他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写给共产国际的一封信中说，他在西班牙已经“一个多月了”。这无疑指的是七月底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他被派到西班牙的时间，并不表明他此前多次出现在西班牙的说法站不住脚。总之，关于西班牙共产党的所谓独立性，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另外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斯特凡诺夫和柯多维拉都把这个党当作下级来对待，他们也出席了这次历史性的政治局会议，它决定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命运。

尽管埃尔南德斯没有提供这次会议的准确日期，但是他说它是在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的几天之前举行的。这次中央全会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至八日在巴伦西亚召开。埃尔南德斯似乎暗示，他发表演说的那次会议不是一次特别会议，而是三月七日在蒂里斯电影院举行的一次中央全会的公开会议——作为合众社的代表，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正是面对会议的听众，他声称，何塞·迪亚斯对他说：“鼓起你的勇气来。推翻卡瓦列罗的决定已经作出。如果你不执行的话，那就可能意味着你在政治上完蛋了。因此，无论如何不应出现这种情况。”

“无论是在政府内外，”埃尔南德斯写道，“我充当了反对拉尔戈·卡瓦列罗以及国防部副部长阿森西奥将军的急先锋，后者是他在军事方面信赖的人。我的名字引起憎恨。没有人看得出我个人的表演、隐忍和伪装。当然，人们根据我的行为判断

我。这不是我第一次为了服从莫斯科而压抑自己的感受，同样不是最后一次。……我的良心与公开的行为之间的冲突是一种无声、痛苦、秘密的斗争。党对我表示满意，我的追随者把我奉为雄辩有力的演说家，称赞我是党的领导阶层中的‘铁腕人物’。我的声望越增长，我觉得自己在我们奉命遵循……并且的确遵循了的政策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地陷得越深。实际上我充分意识到，我的所作所为把我的表里不一变成了一种精神折磨。”

虽然推翻卡瓦列罗现在成为莫斯科首要的短期目标，但是直到两个月后，才出现了一个把他赶下总理宝座的合适机会。在此期间，共产党人继续抓紧时间争取将所有妨碍他们取得支配地位的军官从军队上层清除出去。佛朗哥将军的意大利盟友三月八日对马德里前线的瓜达拉哈拉防区发动的一次进攻在这方面帮助他们。

在敌军推进的第五天，当时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胜利前进，在大多数内阁成员的支持下，两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埃尔南德斯和乌里韦要求不久前刚被拉尔戈·卡瓦列罗任命接替共产党人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的总参谋长托里维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辞职，并且要求立即召集战时高级委员会开会决定其继任者。

尽管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因为对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和另外一些军官不放心而在几天之前强烈要求战时高级委员会应定期开会讨论所有与战争有关的问题，例如“对军官的任命和控制以及清除军队中的所有敌对分子和不称职者”，卡瓦列罗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是，现在他已无法拒绝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开会的要求。委员会由卡瓦列罗主持召开会议，根据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比森特·乌里韦的支持下提出的建议，委员会投票决定，应由何塞·米亚哈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中校接替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尽管罗霍在米亚哈将军的支持下拒绝接受这一职务——将军在写给国防部的一封信中说，由于意大利军队的进攻，他没有罗霍不行，而且在作出决定



之前也应当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尽管一场激动人心的反击战很快就使意大利军队由向前推进变成仓皇逃命，但是，并没有让马丁内斯·卡夫雷拉继续任职。

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他发表的回忆录中声称，共产党人提议罗霍担任总参谋长以及后者在米亚哈将军的支持下拒绝接受这一职务是罢免马丁内斯·卡夫雷拉的一个花招。这就解释了罗霍本人的说法：他在拒绝这一职务之后受到国防部长的敌视。共产党人当时不承认他们与罢免马丁内斯·卡夫雷拉有关，但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倒台以后，埃尔南德斯公开声称共产党在罢免这位将军的过程中起了作用。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失去了国防部里可以帮助我的那些人？”拉尔戈·卡瓦列罗问道。他认为原因有三个：（1）他们拒绝像米亚哈那样对共产党人亦步亦趋并且加入共产党；（2）共产党人想用自己的支持者填补空缺“以便详细了解国防部正在发生的一切”；（3）共产党人想让他“感到厌烦进而放弃国防部长的职务”。

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另一场胜利紧随着罢免马丁内斯·卡夫雷拉接踵而至；因为，这位将军刚被解职，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及其在内阁中的盟友就使共产党人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和亲苏联的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成为政府派驻总参谋部的代表。

“经验已经向我们证明，”《工人世界报》三月十八日写道，“最高军事机构隶属于国防部长并不合理。政府在总参谋部的一切决策过程中直接发表意见要合理得多。这样一来，总参谋部的军官就能随时向政府本身提供帮助和建议。……另一方面，国防部长的艰巨任务需要两位部长直接帮助来完成。我们为这一重要共识的达成向政府致以真诚的祝贺。”

### 第三十六章 拉尔戈·卡瓦列罗进行反击

西班牙共产党在内阁和战时高级委员会中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苏联在西班牙的代理人一直在努力削弱卡瓦列罗的影响力，由于赢得接替阿森西奥将军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卡洛斯·德·巴赖瓦尔的无条件支持，这种影响力在进一步加强。巴赖瓦尔是与卡瓦列罗关系密切的社会党左派圈子中的一员，由于严重的疾病，他起初并不了解最近发生的那些使卡瓦列罗对社会党与共产党结盟失去热情的事情。据他本人讲述，他得到的信息全都来自亲共产党的人，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与他交谈仅限于了解其健康状况，尽量不让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打扰他。结果，巴赖瓦尔承认，他就任新职之后有意为两党合并发挥作用。“考虑到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都不能例外，我坦率地承认，”他写道，“有一段时间我和所有社会党左派深受共产党人的影响，因此我认为，重新开始工作的我应当有些出色的表现，通过持续不断的积极努力推动两党迅速合并，以便把我们自己从正在陷入的灾难中解救出来，同时显示共产党的办法的优越性。”他在另一篇文章里承认，“与许多社会党人的严重惰性相比”，共产党人的“能动性很适合”他。

尽管巴赖瓦尔在即将复出之时从他的社会党同志嘴里听到了一些指责：“就在前线，甚至在战地医院里，社会党人，仅仅因为他们是社会党人，正在受到可耻的对待，而共产党人则在各个方面受到欢迎，甚至将荣誉据为己有”；人们可以看到，社会党或无政府主义连队的战士“打着赤脚、衣衫褴褛，相比之下，同一个旅但是属于共产党的另一个连队的装备仿佛是要参加阅兵式”，但他倾向于认为这些指责夸大其词。

“我得到的印象令人非常震惊，”他写道，“以致我真的以为我听到的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被夸大了。此外，在与社会党人的各种谈话中，例如在与我们后来知道早已效忠于共产党的德尔巴约的谈话中，他们十分巧妙的回答听起来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热情，深受两党联合这一伟大理想的鼓舞并且热切希望通过一项影响深远

的政策消除那些指责中可能确实存在的现象，使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致力于赢得这场战争，结果，尽管我已不再处于脱离动荡的政治现实的天真状态，我仍然认为在我看来令人发指的邪恶不可能表现得那么优雅。由于这个原因，我愿意与那些不会行此不义——这种不义是某种精心策划的产物——的人一道，继续为这项全面联合的政策出力。”

然而，一旦坐在国防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巴赖瓦尔的看法就发生了改变。“在这个气象台里……我得到的印象是，我过的是一种最让人讨厌的生活，这粉碎了我在生病期间精心呵护的我最珍视的那种幻想。我渐渐发现自己轻信到了何种程度，以致面临受玫瑰色眼镜诱惑误入歧途的危险，这种玫瑰色眼镜像它们歪曲的世界一样丑恶。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我必须在短时间内改变部队的卫生管理和运输服务，并且为调整军需官队伍做准备。”巴赖瓦尔在另一篇文章里证实，由于军需官队伍控制在共产党人手中，“这个营私舞弊、招降纳叛的可怕武器被肆无忌惮地滥加使用，从为某个朋友弄一张特别证券的小型骗局，到根据部队或其指挥官的政治色彩决定给不给整个一支部队发放食品和服装的大型丑闻”。

“我听说，”拉尔戈·卡瓦列罗写道，“在一些前线，共产党的部队受到某种令人气愤的优待；给他们发放鞋、服装、烟草和食品。其他部队的待遇像前妻生的孩子一样——说得更准确一些，是没有在背后挨黑枪的时候。我还听说，在一些医院，就像过去神父和修女对待不信教的人那样，没人照顾不是共产党的伤病员。他们既得不到适当的治疗也得不到适当的食物；所有关照都给了共产党员和将要皈依共产党的人。”马德里的社会党左派议员卡洛斯·鲁维埃拉说：“令人悲哀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为了得到一双系带凉鞋，士兵必须是共产党员。在[军队的]医院里，与修女时代相同的事情继续发生，那时候，为了得到一碗炖菜或者炖鸡，或者无论什么吃的，你必须恭敬地披着教徒的肩布或者佩戴十字架。现在你需要佩戴锤

子镰刀的标志。”就连因反对共同的敌人而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社会党温和派也谴责共产党人在前线享有的特权地位。

“我无意冒犯那些占据着责任最重大的岗位的人，”巴赖瓦尔表示，“但是我必须说，除了不值一提的极少数例外，他们依赖的所有手段都掌握在斯大林分子手中。这些斯大林分子以最无耻的方式控制着军队的各个部门，利用军队的资金和职务特权谋取私利，他们只关心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只关心加强巩固共产党的权力，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只关心个人利益。在国防部副部长管辖的部门发生的事情同样发生在总参谋部的各个部门。通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阴谋诡计，而且置许多在责任最重大的技术岗位上任职的非党派专业人员的诚信于不顾，……共产党人控制了所有指挥岗位，然后在其保护下，开展了一场来势汹汹、厚颜无耻的拉人入党运动。”

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几周后，《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宣称：“共产党指示受其控制的军官利用军纪命令士兵改变信仰加入共产党，结果我们发现下述情况成千上万次地出现：军队指挥官使用权力和军规不是为了与法西斯主义作战，而是为了消灭革命组织并且削弱其他反法西斯团体的力量。”

从巴赖瓦尔担任国防部副部长那一刻起，大都会酒店的苏联人就开始讨好取悦他，该酒店是苏联人在巴伦西亚的指挥部。他还在国防部定期接受苏联人的拜访，在拜访的过程中，苏联人竭力诱使他背叛拉尔戈·卡瓦列罗。尽管巴赖瓦尔不愿详细讲述这些拜访，但他仍然透露：“我受到各种各样的恭维奉承，他们称赞我是唯一一位能够意识到迫切需要……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社会党人——当然，除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之外。总之，为了使我背叛拉尔戈·卡拉罗，他们一直在谨慎地与我培养感情。”但是，巴赖瓦尔拒绝抛弃这位社会党领导人，结果，从他使苏联大使认识到他不会扮演苏联人及其西班牙帮手希望他扮演的角色那一天起，他不再是他们诱骗

的对象。他的断然拒绝完全出乎人们的意外，因为不久前他还支持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的主意，尤其是这个主意当时在他的许多同志眼中已经开始失去魅力，这一情况使共产党人相信，他将在国防部为他们谋取利益。让他们大失所望的巴赖瓦尔成为卡瓦列罗政策的后盾，在随后几周，他协助国防部长对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地位进行了最严厉的打击。到三月底，这一打击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以致引起共产党政治局的公开谴责：“赢得战争所必需的所有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正在受到一系列行为的破坏，例如从指挥岗位上撤换那些已经多次证明其能力和才干的军官和政委——仅仅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的行为，尤其是在最近几周。”

使拉尔戈·卡瓦列罗怒火中烧的无疑是共产党人在国防部的所作所为以及正在引起他注意的共产党人政治委员的做法。这些做法从禁止前线的士兵阅读非共产党的报纸，到强迫士兵加入共产党。他最近还听说了国防部总政治部的宗派主义行为，我们应当记得，为了规范政治委员的委派，一九三六年十月设立了这个部门，但是，由于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费利佩·普雷特尔的背叛，它已经被共产党人所控制。国防部长选择这两个人负责总政治部是因为他们享有他的高度信任，他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发布命令规定，所有政治委员将由他根据总政治部主任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提名任命，而后者的提名将通过总政治部秘书长费利佩·普雷特尔提交。虽然这一命令并未授权总政治部主任在国防部长的正式任命下达之前批准候选人就任拟议中的职务，但是，由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费利佩·普雷特尔以及负责总政治部组织部门的共产党人米赫——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经常把自己的权力授予他——推荐的这些候选人被允许“临时”行使他们的职权，这种做法使共产党受益匪浅。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是最应当对此负责的那些人之一，”拉尔戈·卡瓦列罗写道，“……直到那时他还说他是我最可信赖的朋友。他自称是个社会党人，但是却在无条件地为共产党效劳并且为他们的各种阴谋诡计推波助澜。……我[把他]召来严厉

训斥了他的行为，因为他在我不知情也没有签字的情况下，任命了二百多个共产党人。听着我的训斥他的脸色变得苍白，然后没有一点表情地回答说，任命的都是连指导员，他任命这些人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力。我把手边的法规给他看，根本没有任何例外。”

内战结束后不久，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作出了下面的解释：“在西班牙设立[总政治部]以后，共产党.....对它的发展扩充比其他党派更感兴趣。在其他党派看来，它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因此最初把它当做舶来品和多余的东西冷眼旁观，满足于提出并非特别用心拟定的候选人名单。另一方面，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派出了他们最能干的人。这种差异在保卫马德里的关键时期加大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马德里前线的形势使得必须增加政治委员的人数。临时任命了几百人，这些人只能使已经存在的不平衡状况更加严重。”

三十多年以后，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承认，在对他的攻击中，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是那些说他“背叛”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内容。“不像对我的其他上司，我热爱弗朗西斯科先生。”他申辩说，“毫无疑问，我在内战爆发时是他最信任的社会党人之一。我已经是他的外交部长，但在准备设立总政治部时，他坚持让我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拉尔戈·卡瓦列罗让我充满无限的敬意。他是一个堪称典范的社会主义者，完全与他出身于其中的工人阶级打成一片。.....拉尔戈·卡瓦列罗有一副高贵的面孔和一双年轻人似的蓝色眼睛，很容易赢得群众的喜爱。内战初期，他在群众中比其他任何领导人更受欢迎和爱戴。我全心全意地忠于他。.....我任命[政治委员]不关心他们的政治身份。.....他们属于哪个政党或者持什么政治立场对我没有产生影响。结果最终政治委员中的共产党员比其他党派成员的人数更多。拉尔戈·卡瓦列罗身边的社会党人（以及一些多亏我才得到了职位的人）立即告诉他，我把总政治部拱手献给了共产党。”

感到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骗取了自己对他的信任并且意识到这位总政治部主任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拉尔戈·卡瓦列罗决定把情况通知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但是说来奇怪，尽管共和国总统批准解除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所担任的内阁职务，卡瓦列罗却让他继续留任。

“一九三七年的一天，”内战期间与阿萨尼亚保持着密切联系的社会党温和派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证实，“总理——拉尔戈·卡瓦列罗——从巴伦西亚给巴塞罗那打电话，请求紧急会见阿萨尼亚总统。会见在两地之间的贝尼卡洛进行。拉尔戈·卡瓦列罗抓紧时间开门见山：‘我请求这次会见是因为我必须告诉你，而且不能在电话里说，我的一个部长正在出卖我。’阿萨尼亚大吃一惊。拉尔戈·卡瓦列罗继续说：‘这个部长属于我自己的政党；他是一名社会党人，是外交部长。’接着，总理把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背叛行为告诉了共和国总统。……阿萨尼亚批准拉尔戈·卡瓦列罗罢免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但是，总理没有使用授予他的这一权力，就像几周之前一样，他没有利用我为他提供的机会不再充当共产党的傀儡。当时，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我对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说，他的行为更像一名苏联官员而不像一个担任政府部长的西班牙人。被我的话激怒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提出辞职，……但是，拉尔戈·卡瓦列罗拒不接受他的辞呈，而是让他继续留任。某些人徒有坚定的虚名，身上带着不少可笑的弱点。”

导致卡瓦列罗的行为自相矛盾的因素十有八九是，部分因为他不愿意中断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工作及其与国际联盟的外交联系，部分因为他担心苏联这个唯一的武器供应国可能对罢免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作出反应。不过，他的行为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地位并不稳固，把外交部长解职将会引发一场内阁危机。因为，万一政府进行改组，虽然卡瓦列罗及其追随者肯定可以依靠全国劳工联合会，尽管他们在原则和做法上有分歧，但是同样可以肯定，共产党人及其社会党

温和派与共和派盟友将在反对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的问题上团结一心，无论他们有什么分歧。于是，不愿冒险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逐出政府或者总政治部的拉尔戈·卡瓦列罗四月十四日签署了一项轰动一时的行政命令，限制这个有影响的机构的权力。他不仅亲自控制总政治部的方针政策，而且今后所有任免提拔全部直接由他决定，同时，任命和级别在五月十五日之前没有得到确认的政治委员可以认为自己已被逐出了政治委员的队伍。

这项行政命令引起共产党的激烈反对。“很明显，”《红色阵线报》写道，“政治委员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情和感谢。……企图限制甚至打算扼杀政治委员作用的都是一些什么人，这有可能做到吗？他们是仍然存在于我们中间的思想落伍者，是用旧学校的陈规陋习反对我们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的人。这些人是政治委员的敌人。……绝不能限制政治委员的工作并且给他们一个片面的定位，我们的军队需要的是，扩大他们的活动范围，赋予他们充分的手段，并且为使他们完成任务给他们以必要的激励。”这份报纸第二天问道：“谁会对这支英雄的队伍产生敌意？谁会对人民军队的缔造者表示反感？只有声称自己与人民为敌的人；只有那些与反法西斯军队势不两立的人；只有被某种最邪恶的犯罪狂热所驱使的盲目无情的人。我们的政治委员是我军的骄傲！我们必须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保护他们！”

热情之花声称：“有人企图通过将政治委员纳入官僚体系扼杀其主观能动性，这种体系往往会使政治委员出色的工作不起作用，从而将其变成没有不思进取的人，害怕采取任何可能引起指挥官不满的大胆行动。

“但是，我们肯定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政治委员无论如何不能失去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将他们置于无法发挥政治作用的从属地位不可能不对人民军的组织和纪律造成严重危害。



“这将使为创建人民军这支真正属于人民的军队所进行的一切建设性工作和改革的成果丧失殆尽。

“这将意味着我们的战士任凭军官所摆布，后者随时可以通过恢复旧时代的军营纪律从而改变我军的性质。

“政治委员，坚守住你们的岗位！”

“国防部长刚刚发布的关于总政治部的命令绝没有限制政治委员的作用。”卡瓦列罗的舆论工具《前进报》反驳道，“恰恰相反，它激发了他们的活力并以总政治部的目标规范他们的行为。总政治部的目标不是实行政治上的宗派主义……而是创造道德氛围并且树立责任感，这将使我们的军队在那个人——在这一历史时刻，他承担着引导西班牙命运的光荣而且艰巨的任务——至高无上的指挥下走向胜利。”

《红色阵线报》在反驳中声称：“国防部长可以随意给总政治部下达命令，但控制权必须掌握在总政治部自己手中。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设立它？为了使国防部增加一个部门吗？那样的话，总政治部将是多余的。”

《前进报》反驳道：

谁也没有……打算降低[总政治部的]威信，至少国防部长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已经提醒人们注意[国防部长命令的]目的，当然，是它希望达到的目的，那就是，总政治部不应被属于人民阵线政府的任何政党为了宣传加以利用。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都应老老实实地做事并以诚相待。我们以社会党的名义揭露，某些属于共产党的政治委员为了迫使士兵改变政治信仰滥用了他们的职权。……我们确信，一些作为社会党人、共和派人士和无政府主义者加入政治委员队伍的个人意识形态不够坚定、政治态度动摇多变，他们在违背自己内心信念的情况下，屈服于来自某些属于共产

党的更高级别的政治委员的压力，要求加入共产党。另外，由于在压力和胁迫达不到预期效果时，接踵而至的诽谤和威胁将愈演愈烈，[总理兼国防部长]决定……制止必将导致一场灾难、导致在属于不同政党和工会组织的士兵之间产生一条无法逾越的猜忌和宗派的鸿沟的事态发生。

四月二十二日，似乎并不在意自己对这场危机负有责任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把新闻界这场火星四溅的论战告诉了巴黎的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论战已经持续了三天而且没有停止的迹象。这确实令人感到遗憾。我在其他场合曾经设法制止共产党人，但在这种情况下非常困难，因为他们确信卡瓦列罗的命令为的是撤换共产党人政治委员——其中绝大多数表现得令人敬佩，他们不愿逆来顺受。昨天晚上我与忧心忡忡的[新任苏联大使]盖基斯进行了交谈。他预言政治形势将迅速恶化。……正如你能看到的那样，我们并没有继续沿着联合的道路前进，而是正在走向冲突。”

当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命令不仅得到社会党左派的无条件支持，而且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无条件支持，长期以来共产党人政治委员的活动已经让后者感到不安。马德里前线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武装的喉舌《自由阵线报》早在去年十二月就声称，该报的编辑们收到无数来信抱怨说，在许多由不同党派成员组成的部队中，一些没有军衔的军官和政治委员正热衷于使人改变政治信仰，并且利用胁迫手段达到这一目的。马德里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喉舌《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立即表示：“国防部长采取了我们大家赞赏的坚定正确的立场，他制止了共产党施展的那些花招。后者打算利用这些花招夺取整个人民军的政治控制权，其中包括任命大量政治委员，人数与共产党在前线的部队规模完全不成比例。我们大家全都赞成……总政治部的使命，但是，谁也不能允许这个为了保证军队的革命性质而设立的机构不仅把共产党在后方进行的同样疯狂的党派之争带到战火纷飞的前线，而且把它那令人无法容忍的谋求支配地位的计划带到前线。”

因存在于军事领域的其他尖锐斗争而引起的相互攻击，共产党与社会党左派之间围绕着总政治部在报纸上进行的这场激烈论战越来越充满火药味。这些斗争的焦点包括：后备部队的建立，共产党人认为后备部队组建得太慢；清除军队中的所谓叛徒；（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拉尔戈·卡瓦列罗发布的一项法令，把民兵部队指挥官可以晋升的最高军衔限制为少校，共产党人认为这干扰了他们用第五团训练出来的干部控制正规军的计划；拉尔戈·卡瓦列罗随后颁布的一项法令，不许任何人不经全国劳工联合会或劳动者总工会推荐进入军官培训学校，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企图对军队实行“非政治化”，从而使其被“两个工会所垄断”；最后还有，在拉尔戈·卡瓦列罗反对的情况下，战时高级委员会委派共产党人教育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和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前往马德里和巴斯克地区执行重要的军事任务。与最后这个问题有关的情况是，三月中旬，战时高级委员会任命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和左翼共和派公共工程部长胡利奥·胡斯特为政府在马德里的代表。他们的目的是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建立密切的联系并且了解中部前线的需要。当两人的任命提请政府批准时，因为担心一位共产党人部长出现在马德里可能增强共产党的影响力，拉尔戈·卡瓦列罗反对将两位部长的使命长期固定化的建议。由于意见不一，内阁既没有明确规定两位部长的职责，也没有决定他们在首都待多长时间，因此，当他们临时返回巴伦西亚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前进报》宣称，他们的任务结束了。四月一日，佛朗哥将军的部队及其德国和意大利盟友在北部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战时高级委员会委派委员会中的共产党代表乌里韦前去调查了解北部前线的情况时，围绕着这一问题又出现了不同意见。像对待埃尔南德斯的任命一样，国防部长反对这次委派，特别是因为乌里韦将与苏联将军戈列夫同行。

尽管这些问题本身都很重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只是两派之间根本分歧的征兆。

《前进报》写道：

一段时间以来，尽管共产党的报纸和煽动者对……社会党成员，尤其是那个最著名的社会党人的工作不停地进行阴险的影射和恶意的指责，我们一直保持着克制。……

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喜欢以恶毒的谩骂开展批评。它到处看到的都是问题、不足和缺乏远见。是让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销声匿迹的时候了，我们要问看到别人那么多瑕疵的煽动者，他们自己是否不犯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政府中共产党代表的行为有什么可以说一说？共产党人农业部长的行为肯定不是在各个方面完全符合国家的要求。就政府交给他的工作、一般情况下的要求而言，教育部长的行为也不是。在整个共和派控制区，农业生产和分配的问题仍然没有一个能够保证后方安宁的解决方案。成千上万的少年儿童没有受到教育部长的适当关怀。

后备部队？……军营里的成千上万西班牙青年被纳入了战争机器。可是，基本的后备部队建立在调整农业生产和分配的基础上。这是农业部长权限范围之内的事情。

后备部队？西班牙人民最重要的后备部队是少年儿童，年轻的一代。他们正在得到什么样的照顾？我们正在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关心？

应当提醒每一位政府部长注意的是，他的作用严格限制在与其部门有关的问题上。例如，对于教育和艺术部长或者农业部长来说，试图解决战争问题是愚蠢的。部长应当仅限于从事自己特定的工作，不应干预本部门以外的事情——除了在内阁会议上。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有足够的事情要去做。……我们不准备容忍任何以消极的批评和虚伪的主张继续扰乱后方的企图，这些批评和主张的目的在于有计划地诋毁那些正以完成伟大事业所需要的沉默朴实的英雄主义面对战争的严酷的人。

蠢话已经够多了！不要再喊无法兑现的口号，而要呼吁着眼于个人利益并且通过精

神保留来实现的热情、团结和友爱！……我们社会党人举起高于一切的西班牙革命的旗帜，由于我们的烈士和英雄的牺牲以及我们的西班牙口号和领导人，这场革命已经以一种西班牙的方式实现了。

《红色阵线报》针锋相对：

《前进报》的同志们真的以为政府部长仅仅是只关心各自工会“事务”的工会秘书吗？像社会党人、共和派和无政府主义者部长一样，共产党人部长在政府中代表他们自己的党派，同时，他们也像而且应当像其他部长一样关心战争造成的问题和形势。《前进报》或许认为只有国防部长正在打仗因而胜败问题仅仅影响他自己？战争和国家的管理由人民阵线来进行，由组成人民阵线的所有政党和组织来进行，因此，这些政党和组织在政府中的代表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关心影响整个国家以及全体西班牙人生活和未来的各种问题。《前进报》的专制观念是哪儿来的？

我们的部长在非常危急的时刻介入了北部前线和马德里的战事……他们的工作成果也赢得了信任。我们不说他们独自解决了问题；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问题的解决，而且，他们的努力、他们所完成的一切都得到我们党真心诚意的充分支持。……

《前进报》要求埃尔南德斯组织少儿后备军。的确，少年儿童必须为生活以及我们的胜利将造成的那种社会做准备，但是，为了赢得这样的胜利，我们首先必须为我们的军队配备必要的后备部队。……

《前进报》的同志们应当让我们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人民阵线的政策还是某种基于个人独裁的政策。

最后，考虑到几个月来所有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共和派人士——都在要求清洗军队的指挥官这一事实，这种清洗竟然从政治委员开始不让人

感到奇怪吗？我们应当想知道，有多少政治委员叛变投敌？有多少军官开小差而且仍在开小差？对于关心我军命运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

我们不太明白《前进报》的文章里反复强调“西班牙这西班牙那”是什么意思。这是在暗示什么呢？没有人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更具有西班牙色彩——深厚而强烈的西班牙色彩，而且正是我们党把现在这场战争定性为一场为维护国家独立和西班牙主权而进行的战争。

《前进报》宣称：

共产党说它始终支持人民阵线的政策，但却不失时机地利用一切机会推行它自己的政策并且进行大肆宣传，这不可避免地激怒了非共产党人士。因此，它只在某些事情上取得成功，与它天天吹嘘的情况大相径庭。换句话说，它引起了工人的怀疑并且挑起了工人之间的宗派斗争，使社会党、尤其是拉尔戈·卡瓦列罗长期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的有机联合难以实现。现在，四五个心胸狭窄、满腹怨恨的领导人把怒气全都撒向了卡瓦列罗，……这些领导人无法理解，当许多人在后方到处高喊只能制造混乱的荒唐口号时，一个人可以全凭着自我牺牲精神和决心兢兢业业地工作七个月之久。那些诋毁这位西班牙工人阶级领导人的家伙的智商跑到哪里去了？他们以为用一场暴风雨般的政治运动破坏他的威信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吗？他们没有认识到，拉尔戈·卡瓦列罗不是《红色阵线报》昨天晚上暗示的那样一个政治寡头，也不是一个独裁统治的仿效者，更不是一个潜在的独裁者。他是整个革命运动的化身。他是西班牙工人阶级的历史和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运动史的象征。他是我们工会四十年革命斗争中的模范行为的体现。

## 第五部分 共产党人获胜

## 第三十七章 西班牙共产党讨好社会党温和派

由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反对他们控制军队的计划并且拒绝通过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使他们获得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共产党人遇到了挫折。现在，他们决定公开与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温和派也就是所谓中间派结盟，以便利用社会党的内部斗争推翻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

内战爆发之前，控制着党的执委会的社会党中间派强烈敌视共产党人。它谴责他们的两党合并运动是“联合的骗局”，并且痛斥因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而完成的两党青年运动的合并是“社会党青年被共产党兼并”。的确，社会党执委会极不信任而且十分讨厌共产党人，以致拒绝对他们提出的在两党之间设立一个联络委员会的建议作出答复。“共产党向社会党建议根据一个旨在促进民主革命发展进而使其取得最后成果的方案组成一个联络委员会。”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一九三六年四月写道，“这个建议没有得到现在的改良主义中间派领导人的答复。另一方面，它受到社会党左派的欢迎。社会党的广大党员拒绝承认现在这个改良主义的执委会，他们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奉行的路线，这条路线几乎与革命路线完全一致，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完全一致。”

在公开赞扬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同时，共产党人严厉指责社会党中间派领导人因达莱西奥·普利托。普利托是一个专横的人，在温和派圈子里享有巨大的威望，他与自由甚至保守的共和派而不是社会党左派具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因此，当他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向巴黎的《不妥协者》宣称西班牙人的个性无法适应“莫斯科的方法”，所以他支持社会党与共和派政府合作时，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建议，鉴于普利托通过鼓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和国合作的陈词滥调”不仅与“夺取政权的暴力斗争”一刀两断，而且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则”划清了界线，他应当“自动退出社会党然后加入某个共和派组织”。尽管这样奚落了普列托，不过，一九三六年春天共产党人在内心深处更加赞成普列托的温和立场而不是拉尔戈·卡瓦列罗激进的革命立场，他们间接或者私下谴责了后者的立场，但是，他们知道，只要与拉尔戈·卡瓦列罗继续保持友好关系，他们就能从与强大的社会党左派的公开合作中获得许多好处。

尽管内战爆发之前西班牙共产党与西班牙社会党中间派不可能合作，但是现在似乎可以合作了，这不仅因为他们都对拉尔戈·卡瓦列罗怀有敌意所以决心将其赶下总理和国防部长的宝座，而且因为一些中间派领导人反对两党最终合并的态度有所缓和。此外，普列托派所控制的社会党的一些地方组织对两党合并的支持迅速升温，以致到一九三六年年底时，据社会党书记拉蒙·拉莫内达（在几个月后对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如果社会党不加以控制的话”，执委会面临着“合并在地、省和地区的各级组织进行”的可能性。但是，从基层开始的组织合并对社会党全国领导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所以，自一九二一年以来其政治信仰就在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摇摆不定、此时暗中支持共产党的拉莫内达小心谨慎地避免因鼓励地方组织赞成立即合并的积极性而引起更加谨慎的党的领导人的担忧。“在我们看来，”他接着说，“最明智的态度……是欢迎这种[支持合并的]意见并且通过与共产党进行磋商传递它。”这样一来，执委会就能“[对地方组织]行使权力从而阻止它们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为进行部分合并采取主动的行动”。

于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社会党执委会向共产党政治局建议，组成一个全国委员会协调两党的行动。据共产党官方内战史记载：“卡瓦列罗派领导人对执委会采取的新路线警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建议，社会党执委会应当邀请两名劳动者总工会[其执委会由拉尔戈·卡瓦列罗控制]的代表参加磋商。……尽管卡瓦列罗派领导人同意这个建议……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加快工人阶级联合的迫切愿



望。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的代表通过各种拖延手段和完全站不住脚的借口破坏两党的磋商。”

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拉尔戈·卡瓦列罗直截了当地答复斯大林，断然拒绝两党合并。但是，尽管他拒不合作，共产党人仍然由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对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堡和化名道格拉斯的斯穆什克维奇将军意料之外的友好态度而受到鼓励，后者是苏联在西班牙的空军部队指挥官，普列托以海军和空军部长的身份向他提供一切便利。“普列托最初对苏联人非常友好。”普列托曾经的好友、内战初期加入共产党的西班牙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证实，“他说，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鼓励他们帮助我们。他敦促苏联人给我们运送战争物资。他对苏联飞行员发表过两三次讲话，一次是在阿尔瓦塞特，感谢他们来到西班牙并且指明他们的国家是唯一一个帮助共和国的国家。他说话像一个共产党人。他对道格拉斯和罗森堡非常友好。”

普列托以同样罕见的与共产党人合作的态度向共产国际代表柯多维拉（“梅迪纳”）保证，他准备努力促成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合并，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进行的一次谈话中，他也向后来成为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的国际纵队政委彼得罗·南尼表达了这一意向。

尽管普列托的友好表示与他过去的行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从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不久就开始坚决抵制共产党人的行为来判断，他的内心肯定有所保留。普列托讲述的下面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他接替拉尔戈·卡瓦列罗入主国防部以后，值得我们记录在案：“一天晚上，在并非非常规的时刻，盖斯基[一九三七年三月中旬接替马塞尔·罗森堡担任苏联大使的列昂·盖基斯]给我带来了一些好消息：一批重要的战争物资——我认为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将要从苏联

港口装运启程。看我露出了满意的神情，大使显得非常高兴。两天后他又来见我，要求我支持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在我拒绝之后他几乎是以威胁的语气重申了他的要求。他固执地不肯罢休，向我暗示他是在执行莫斯科的命令，而且将视我的态度奖励或者惩罚我。他的威胁对我没有起什么作用。第三次来见我时，[盖基斯]只字不提我们先前进行的谈话，但是他通知我，曾经提到的那一批急需的战争物资将不再发运。这就是我所受到的惩罚。”

不过，在一九三七年春天，当共产党人需要普列托的时候，他更需要他们以达到推翻卡瓦列罗的目的。普列托没有原谅他这位对手一九三六年五月阻止他担任总理的行为。实际上，普列托与卡瓦列罗的关系甚至在那之前已经因为相互竞争和对抗而非常紧张，以致他们彼此几乎不说话。拉尔戈·卡瓦列罗证实：“在我被阿萨尼亚先生召见并与他和另外一些部长谈话时，有一次，普列托参加了。他与每一个人握手打招呼……但是只有我除外。我意识到我的存在让人讨厌，于是我就离开了。”据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将军说，尽管普列托与拉尔戈·卡瓦列罗加入了同一个内阁，但是，他们尽量避免互相接触，并且通过中间人商讨与他们各自的部门同时有关的事务。

像共产党人一样，普列托被敌视社会党左派的情绪所激励，同时受到这一希望的鼓舞：一九三六年七月席卷西班牙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的回落将使英法两国放弃它们的中立政策。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表达普列托观点的《社会主义者》写道：“我们必须考虑周边国家的态度。……我们仍然希望某些民主国家对西班牙形势的看法有所改变，与通过促进革命可能导致的后果妥协将是令人遗憾的，将会酿成一场悲剧，目前，革命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后果。”但是，普列托与指导西班牙共产党政策的共产国际在目的方面存在着某种严重分歧；因为，共产国际首先并且最为关心的是苏联的战略地位由于解除武器禁运而得到的改善，普列托则像阿萨尼亚

总统以及另外一些将这位社会党温和派政治家视为领袖的自由共和派人士一样，关心的只是西班牙的形势。在他看来，英法两国的援助将抵消苏联不断增加的影响，他将这种影响主要归咎于英法两国的中立政策。“对共产主义运动提心吊胆的西方民主国家没有想到，”他在内战结束以后断言，“由于它们不进行援助，这一运动在西班牙发展起来。这些国家拒绝给予我们帮助，以致当人们听说苏联正在向我们提供保卫国家的物资时，公众的同情慷慨地给予了苏联。”

不过，由于目前他还需要共产党人以便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同时由于他几乎没有认识到，像那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一样，他最终也将成为共产党人的牺牲品，因此，普列托顾不上担心共产党的发展及其诱使人们入党的手段了。共产党人不择手段地拉人入党一直使他对共产党与社会党执委会建立密切关系的尝试有抵触情绪，通过社会党主席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以及另外一些坚定的支持者，例如曼努埃尔·阿尔瓦尔、曼努埃尔·科尔德罗、安纳斯塔西奥·德·格拉西亚和弗朗西斯科·克鲁斯·萨利多，他对执委会仍然具有直接的影响力。共产党人也顾不上他们过去对普列托的不信任了，这种不信任一直妨碍他们向这位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以及他的社会党中间派示好。共产党人似乎一度认可普列托作为拉尔戈·卡瓦列罗继任者的候选人，正如共产国际代表鲍里斯·斯特凡诺夫在谈到他的这个身份时对秘鲁共产党人欧多西奥·拉维内斯所说：“就像你很清楚的那样，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朋友或者敌人；只有为我们办事或者不为我们办事的人。”

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底发表的一份反映共产党与社会党中间派的友好关系以及与拉尔戈·卡瓦列罗关系破裂的声明中，共产党政治局宣称：

“考虑到由于正确理解了人民阵线的政策，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的关系正在变得日益紧密这一事实以及对共产党的敌意实际上并非来自社会党本身，而是来自一些不

理解群众正常感情的孤立的个人，政治局认为，必须加强它与社会党的联系。因此，它邀请社会党执委会召开一次联合会议，旨在审视当前的形势，然后通过组成地方和全国性的协调委员会，在某种永久性的基础上建立比以往更加密切的关系。协调委员会将有利于磋商进而采取某些措施，以便实现两党统一行动并且尽快将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成为西班牙工人阶级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政党。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治局已经委派一个代表团立即与社会党的领导阶层建立联系。”

作为四月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的结果，一个全国协调委员会组成了，拉蒙·拉莫内达在委员会中代表社会党，何塞·迪亚斯代表共产党。它的第一个行动是向两党的各级组织发出指示，要求它们在各自的地区建立类似的联络委员会。在随后几个月，普列托派社会党人以几乎不亚于共产党人的热情从理论上大肆吹嘘两党合并的概念，但是，由于社会党执委会大多数成员的疑虑，它绝不可能成为现实。不过，它也并非一无所获。“在得知一些社会党人尚未为这种联合做好准备时，”一九六九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简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Крат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透露，“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得出结论，共产党人‘不应强行推动共产党与社会党合并。……’它们建议，应使那些已经打算加入共产党的社会党人相信，继续留在社会党内工作更有利于加强协调一致的行动，也更有利于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合并作准备。”

但是，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动荡不定的政治形势下，共产党人与社会党的普列托派立即建立密切的关系比组织合并具有更加迫切的重要性，而且注定要对即将到来的那一段决定性时期的事态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正如情况所显示的那样，在表

面上同意为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而努力的背后，隐藏着将拉尔戈·卡瓦列罗赶下总理和国防部长宝座的某种默契。

### 第三十八章 加泰罗尼亚：军事叛乱与社会革命

因为与社会党温和派就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达成协议——一些左翼共和派领导人也参与达成这个协议——而实力大增的共产党人只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以便使他们的矛盾发展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当一场武装冲突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首府、伊比利亚半岛最大的工业中心巴塞罗那爆发时，这个机会出现了。

自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至二十日军事叛乱在巴塞罗那失败以来，随着由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导的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合会及其意识形态指导者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它们显然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最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成为该地区实际上的控制者和革命的推动力量，巴塞罗那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声称挫败巴塞罗那军事叛乱的大部分功劳是他们的。作为这一戏剧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断言，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民兵部队“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两天令人难忘的战斗中挫败了军事叛乱，四百多人在战斗中丧生，其中包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积极分子弗朗西斯科·阿斯卡索，他在攻打阿塔兰萨纳斯兵营时战死。另一方面，军事叛乱时担任加泰罗尼亚治安总署署长（comisario general de orden público）、主张地区自治的温和共和派人士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少校则声称，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如果没有“治安部队的英勇奋战”，这些组织并不足以阻止巴塞罗那驻军占领这座城市。他所说的治安部队就是突击卫队和国民

卫队，后者由何塞·阿朗古伦将军和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上校指挥，两人均为忠诚的共和派人士。

无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挫败军事叛乱的过程中各自作出了什么贡献，它们的参战——尽管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拒绝向它们提供武器——对于负责指挥叛军的曼努埃尔·戈代德将军投降以后巴塞罗那和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政治局面立即发生的彻底改变具有决定性意义。

关于埃斯科费特拒绝向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提供武器这件事，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七月十九日约凌晨三点，巴塞罗那爆发军事叛乱一小时前，加西亚·奥利韦尔去治安总署要求得到武器。据阿瓦德·德·桑蒂连说，埃斯科费特少校答复道，他对自己的人马有信心，同时也不能将任何武器分发出去。几小时前，突击卫队奉命重新配备一些步枪，结果，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停泊于港口的船只上发现了这些步枪并将其夺走运到全国劳工联合会所属的运输工会。“要不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从中斡旋……一场屠杀可能在运输工会发生，他说服工会会员交出了一些明显有所磨损的武器。于是，在叛乱的兵营已经进入战备状态的紧要关头，一场冲突得以避免。”

加泰罗尼亚温和共和派人士、军事叛乱期间在埃斯科费特身边担任警察局长的比森特·瓜内尔描述了挫败军事叛乱后革命者的兴高采烈：

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拿着他们抢来的武器涌上街头，其中大部分人没有参加过战斗。……不可能恢复秩序。我们也无法使自己的队伍保持纪律，包括国民卫队。热情高涨的国民卫队队员被街头的气氛所感染，他们身穿衬衣开着卡车，车上插着许多旗帜，旗帜上写着各种组织的名称，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组织占大多数。像加泰罗尼亚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群众开始焚烧教堂和

修道院，焚烧著名右翼人士的住宅以及其他私人建筑。……我们下令警察分局以及突击卫队和治安部队收缴枪支，……但是，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不可能收回群众抢走的步枪、手枪和各种武器，由于担心再也找不到这些武器，迄今为止一直否认它们被抢走了。驻军部队的新老士兵被马德里政府颁布的一项奇怪的法令免除了[效忠服从其军官的誓言的]义务……他们加入了民众的队伍或者试图通过各种可以利用的交通方式返回故乡。我们无法解决的这种绝对混乱状态是军事叛乱所造成的许多灾难之一。警察部门和政府当局似乎逐渐恢复正常运转，但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治上的领导权，他们占有了大量战争物资并且表现出某些方面的组织才能。

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左翼共和派人士、巴塞罗那市市长卡洛斯·皮·苏涅尔写道：“在[战斗的]结局还没有确定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就不顾一切地忙着抢夺败军丢弃在街道上和兵营里的武器。这在随后那个可怕的时期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市长的责任……有赖于军队，[军队没有预见到]，军人被打败可能意味着他们为保证秩序领取的武器将成为制造恐怖和混乱的工具。”

挫败军事叛乱之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工人占领了邮政局和电话局并在巴塞罗那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其他城镇和乡村组成了治安巡逻队和民兵小分队，同时通过他们的工厂、运输工具和食品委员会对该地区的大部分经济生活确立了他们的支配地位。在巴塞罗那，飘扬在已经更名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的前雇主协会全国就业促进会总部上方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红黑旗帜见证了他们的权力和革命的胜利。

曾经就读于剑桥大学的英国诗人和共产党员约翰·康福德在西班牙的所见所闻鼓舞了他，后来他在战斗中死去。“在巴塞罗那，”康福德写道，“人们可以切身了解无

产阶级专政意味着什么。……实际控制权掌握在民兵委员会手里。……大街上到处都是武装的工人和民兵，他们还坐在过去属于资产阶级的咖啡馆里。雄伟的科隆酒店俯瞰着城市的主要广场，它被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所占据。再往前走，位于西班牙银行对面的一座大楼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总部。……武装的工人控制着街道，仿佛身在伦敦一样。……这才是真正的多数人专政，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在我们这个地方，”中产阶级党派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著名成员海梅·米拉维特列斯断言，“资本主义已不复存在。管理大型冶金厂和纺织厂以及公用事业公司的是工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还控制着法—西边境的大部分地区，这本来是中央政府所保留的诸多权力之一。一九三二年九月颁布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的第九条，授权马德里政府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负责维持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其本身已经成为革命的牺牲品，它既没有行使权力的意愿，也没有行使权力的力量。

就像一九三一年的共和国宪法由于革命已经成为一纸空文一样，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也已成为一纸空文。自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来，加泰罗尼亚就没有如此彻底地摆脱过马德里的控制；然而，这种自由并不能使鼓吹加泰罗尼亚自治的主力军中产阶级感到满意，因为，革命在摧毁马德里的强权的同时，也破坏了自由企业制度和私有财产安全赖以存在的政治结构。自治法令使加泰罗尼亚拥有了一个自治政府，它由议会和行政委员会所组成，以中下层中产阶级为主的加泰罗尼亚最强大的党派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在其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在革命的疾风暴雨中，这两个机构的实际作用几乎已经荡然无存。

七月二十日，刚刚挫败军事叛乱，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路易斯·孔帕尼斯就向包括加西亚·奥利韦尔在内的一群得意洋洋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发表了下面一番安抚性声明：“今天，你们是这座城市和加泰罗尼亚的



主人……因此，如果我提醒你们你们并不缺乏我党的忠诚党员——无论他们人数多少——的帮助也不缺乏国民卫队、突击卫队和青年卫队（Mozos de Escuadra，自治政府的特别警卫部队）的帮助的话，希望你们不要见怪。……你们取得了胜利，一切由你们来决定。如果你们不需要我或者不想让我担任加泰罗尼亚的主席，现在就请告诉我，我将立即成为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又一名士兵。另一方面，如果你们认为在这个位置上……我和我的党员……能够对这场斗争有所帮助，……你们可以信赖我和我的忠诚，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我相信，今天，可耻的过去已经结束，因此，我真诚地希望加泰罗尼亚将会走在社会发展最先进的国家的前列。”尽管孔帕尼斯主席这番声明的真实性曾经受到埃斯科费特少校——正如我们所知，当时他是加泰罗尼亚治安总署署长——的质疑，但是，在其所写的为孔帕尼斯歌功颂德的传记中，共和派法官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对这番声明毋庸置疑地予以确认；它还得到共产党作家曼努埃尔·贝纳维德斯和巴塞罗那市长、孔帕尼斯主席亲密的政治伙伴卡洛斯·皮·苏涅尔的确认。

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应孔帕尼斯主席的邀请前往自治政府宫。“步枪、机关枪、左轮手枪，这些武器把我们武装到了牙齿。”加西亚·奥利韦尔回忆说，“孔帕尼斯站着接待我们，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很快不再拘泥于礼节。我们坐了下来，步枪放在两腿之间。”“在会见的过程中，”同样在座的阿瓦德·德·桑蒂连说，“自治政府的一些成员脸色苍白，不停地发抖。”

这并不是孔帕尼斯第一次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打交道。在君主制时期，他曾作为他们的辩护律师赢得声誉。他与他们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因为他与他们在所有基本特征上有天壤之别，就像他放弃法律专业组织中下层中产阶级政党所表明的那样。作为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和农夫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他代表了该地区的小工厂主、手艺工匠、商人以及佃户和佃农。这使全国

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不喜欢他，无政府工团主义喉舌《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三年的一段评论概括了他们对他的看法：他“与其他政客是一路货色”。一九三四年孔帕尼斯当选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以后，这种关系并没有改善，结果，在社会动荡的关键时期，自治政府查封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总部并将它们的报纸停刊。“尽管《工人团结报》实际上是当地发行量居第二位的报纸，”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但在一九三四年，它长达几个月不能印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积极分子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继续出版。整个一九三四年，我们的地方组织、我们的俱乐部和我们的文化中心不能公开活动，自治政府唯一关心的事情是，搞垮全国劳工联合会，消灭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

但是现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控制了局面。

“在[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和加西亚·奥利韦尔与自治政府主席的交谈过程中，”巴塞罗那市长回忆说，“当孔帕尼斯表示，由于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他打算辞去自己的职务时，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场面出现了。……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他担心，如果他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关系破裂，他们将完全控制这座城市，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最可怕的混乱局面，造成并肩战斗的各派之间统一战线的崩溃，最终导致一场军队和长枪党的残酷镇压。只要不发生这种情况，局面就可能逐渐改善，政府就可能重新确立其当权的地位。”简单地说，正如警察局长比森特·瓜内尔所指出的那样：“除了维持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政府门面’并且一点一点地努力恢复政府的控制之外别无选择。”

用加西亚·奥利韦尔的话说，孔帕尼斯在其安抚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

义者联盟领导人的声明中表现出“灵活”和“务实”的姿态。“作为一个意识到国家的重大时刻已经来临的加泰罗尼亚人，作为一个并不害怕剧烈社会变革的进步开明人士……[他]使用环境要求的语言并以自尊和宽容的独特姿态从容应对非常困难的局面。”

毫无疑问，孔帕尼斯过去给予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法律援助现在有助于使他们对他产生好感。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后来的声明加强了他们有所恢复的对他的信任。他在十月的一次公开集会上宣称：“工人积极分子当然是那些最关心革命工作的人。我们这些肯定受到尊重和倾听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应当为工人阶级排忧解难。我们必须与他们同行或支持他们，但是，归根结底，发号施令的必须是他们。企图通过策略或力量防止工人阶级赢得未来将毫无意义。”

作为一名以煽情著称但是仍对弱者怀有些许真正同情心的随遇而安的政客，他很快适应了当时的气氛。“在共和派人士中，很少有人如此准确地理解了七月十九日以后出现的局面，”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同时，也很少有人如此明确而有力地对工人管理之下的新的社会制度表示支持。”显然，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达到胜利的高潮时，作为一名曾经反对它们的政客，孔帕尼斯过于精明。他知道，反抗将是危险的，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浪，在恢复自己的影响力之前，他的党派必须在沉没与独自忍受之间做出选择。但是，对其追随者的忠诚以及某种保护他人——甚至保护那些被怀疑同情弗朗哥将军的人——的人性冲动使他无法默默忍受革命引发的暴力行为。实际上，他的大部分公开声明均含有呼吁制止暴力行为并且谴责暴力行为的内容，而且，他的亲自干预还使许多生命受到威胁的人离开了这个国家。“一九三六年七月以后，当[路易斯·孔帕尼斯]被革命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位加泰罗尼亚科学家告诉安赫尔·奥索里奥，“当我们大家不得不向自治政府请求保护我们的朋友和机构时，我看到他竭尽全力挽救他所能挽救的一

切，尽管有时没有成功。我听说，多亏[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文化专员本图拉·]加索尔和[内务专员何塞·马利亚·]埃斯帕尼亚的干预，许多右翼政界人士，例如阿瓦达尔、本托萨—卡尔维尔、普伊格—卡达法尔奇、蒙特塞尼伯爵，以及大量教会上层人物还有无数神父和工厂主得以逃走保住了他们的性命，两位专员是应孔帕尼斯的要求并且完全按照他的指示采取的行动。”

孔帕尼斯还谨慎地谴责了以革命名义的过激行为和目无法纪，但他克制住自己没有评论革命所造成的变化。这也是内战初期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其他领导人及其舆论工具《人道报》的态度，因此，即使敢于对革命提出批评，他们也是旁敲侧击而不是直接表明不同意见。

“不到二十四小时，一度看似顽固不化的头脑发生了惊人的改变。”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写道，“在精神上与我们相去甚远的人们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适应能力，他们不加反抗地接受了事物的新秩序。”

“我们能够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实行某种绝对的专政表明自治政府已经过时，在它的地盘上建立了人民的真正权力。”西班牙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和积极分子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当别人对我们实行专政时我们不承认专政，我们也不想以别人为代价实行我们的专政。[我们决定]以孔帕尼斯主席为首的自治政府应当继续留在它的岗位上。”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有人说，选择实行我们的专政将更可取，这话说得太轻巧。不错，它可能对那些想当独裁者的人更可取，但是对劳动人民不可取。……且不论实际上我们将会走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主张的反面，对于西班牙来说，无政府主义专政就像法西斯或共产党的独裁一样邪恶。”几个月后将违背其反政府、反国家的原则成为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司法部长的加西亚·奥利韦尔也断言：“加泰罗尼亚在自由共产主义与

民主之间的选择正在决定西班牙的命运，前者相当于无政府主义专政，后者意味着各种力量的合作。……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决定支持合作和民主，放弃必将导致革命被无政府主义专政所扼杀的革命的极权主义。”

在挫败军事叛乱之后召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特别会议上，无政府主义者作出了放弃极权主义解决方案的决定。曾经被认为是个“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加西亚·奥利韦尔说，他建议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攻占那些重要的政府建筑”，但是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回答说，在占领萨拉戈萨之前不应发动政变，那里是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个据点和毗邻的阿拉贡地区的首府。他说，占领萨拉戈萨“用不了十天”。加西亚·奥利韦尔对此回答道，革命不应当“停留在街上等待占领这座或者那座城市”。不过，根据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正式报告，这次会议一致同意放弃“极权主义解决方案”，因为无政府主义专政将会导致七月十九至二十日合力战胜叛军的人全被消灭，因为它将由于外国的干涉被“镇压”。

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往往用反对专政的意见和外国入侵的威胁作为理由解释他们为什么决定不在巴塞罗那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但是，他们经常在农村地区借助于民兵小组和革命法庭建立某种形式的社区专政。不过，虽然他们在某些乡村不惜以武力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和自由共产主义，但是他们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有计划地将政府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内战爆发前一年，老资格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费德丽卡·蒙特塞尼的父亲费德里科·乌拉莱斯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写道：“[尽管]我们不谋求权力或独裁，但是我们并没有解决在社会革命发生与基于所有人经济平等、权利相同的自由政治制度建立之间需要运用什么力量的问题。”

身为温和共和派人士的治安总署署长埃斯科费特少校阐释了革命之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两难处境。他回忆说，七月二十日，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发现自己在巴塞罗

那“实际上控制了街道、武器和运输工具，也就是说实际掌握了权力时，它的领导人迷失了方向，尽管他们都是积极勇敢、经验丰富的战士。他们没有计划，没有明确的信条，没有关于他们应当做什么或者他们应当允许别人做什么的想法。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由共产主义观念不切实际，就其在革命时期应当遵循的路线而言，不能倡导这种观念”。

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其成员的国际工人协会（AIT）驻巴塞罗那代表赫尔穆特·吕迪格承认全国劳工联合会陷入了两难境地。他在回应国外无政府主义者的批评时写道：“那些声称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在一九三六年建立自己的专政的人，不知道他们在要求什么。……全国劳工联合会将需要一个政府方案，一个行使权力的方案；[它将需要]行使权力的训练、中央指导的经济计划和操纵国家机器的经验。……全国劳工联合会没有这些东西。那些认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建立自己的专政的人也没有这样一个方案，无论是关于他们本国的还是关于西班牙的。让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了！另外，假如全国劳工联合会在七月十九日以前就有这样一个方案，它就不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它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而且，假如它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革命，那将给予无政府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由于自己没有夺取政权的计划，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尽管他们是反国家主义者并且反对一切政府）决定允许自治政府继续运转。但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战争与革命不可能由一个对工人阶级队伍中人数最多、思想最激进的派别缺乏影响力的政府来指挥。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也不可能用他们自己的影响力使这个政府恢复权威而不违背其反国家、反政府的原则。于是，一个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成立了，在这个委员会里，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把持了关键的作战、治安和运输部门。据加西亚·奥利韦尔说，委员会是根据孔帕尼斯主席的建议成立的。这很有可能，因为没有人比孔帕尼斯更清楚地

意识到，如果打算赢得战争胜利的话，如果想从革命风暴中挽救一些共和制度的价值观念和部门机构并使革命的恐怖活动受到哪怕一点点控制的话，某种形式的中心管理机构是必要的——这个机构即使名义上不叫政府，本质上也是一个政府，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可以在不失面子的情况下参与其中，它可以在有名无实的政府重新掌握重要的实权之前进行战争。如果他对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的安抚声明只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的话，那么，这决不是向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屈服，正如共和派法官和孔帕尼斯主席的传记作者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旨在使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对孔帕尼斯主席作出让步的“无比明智”的一着。“我们不应想当然地认为他要欺骗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奥利奥索补充说，“实际上，没有什么比诚实更明智。主席想说的肯定是：‘现实地说，我只有名义上的权力。真正的权力在你们手里。……但是，你们不认为你们的努力需要一个指挥机构吗？如果没有指挥机构，你们就容易陷入混乱状态，劳而无功。那么，利用我的管理和领导能力吧。’”

尽管孔帕尼斯主席设想的可能是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作为自治政府的辅助机构发挥作用，但是，该委员会立即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实际上的行政当局。它的权力并不依靠遭到破坏的国家机器，而是依靠革命的民兵武装和治安巡逻队，依靠革命初期在该地区大量涌现的各种各样的委员会。身为民兵委员会成员的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委员会的工作包括在后方建立革命秩序，为前线组建民兵部队，组织安排经济、立法和司法活动。总之：“民兵委员会就是一切；它照管一切。”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成为唯一真正的权力，绝对的、革命的权力。”

孔帕尼斯主席委派精明而且极其能干的政治家何塞·塔拉德利亚斯作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在民兵委员会中的代表，据塔拉德利亚斯的传记作

者说，他的“双重目标”是“与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合作组织战争行动”以及“实现权力从无政府主义者向自治政府的全面转移”。即使对于像塔拉德利亚斯这样精明能干的人，结束权力的分裂状态也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但是，正如其传记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他能理解他们高尚的乌托邦目标”，他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友好关系成为“他开展政治活动的决定性因素”。

尽管塔拉德利亚斯确认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受到“孔帕尼斯主席高大形象的有力影响”，但是，他还说，自治政府“与其说是实质性的，不如说是象征性的”。这并不是说自治政府一点权力也没有，因为它可以依靠残余的正规警察部队即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也可以依靠一些政治派别组织的民兵，即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武装力量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这些部队。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财政委员会与劳动者总工会的银行雇员工会共同控制了该地区的银行系统——一部分由于主要代表该地区的蓝领工人，部分由于总是鼓吹废除货币，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忽视了这一权力资源，但是，财政委员会基本上是一枚为革命服务的橡皮图章，因为它的首要功能是满足民兵委员会的资金需要。当然，自治政府似乎也像一个最高权力机构那样颁布法令或行政命令，但是，在其官方刊物《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公报》上发布的大部分法令只不过是一些事先经过民兵委员会批准的措施，或者是对既成事实的法律确认。的确，随着孔帕尼斯逐渐恢复了自信，他抵制了委员会某些更极端的建议——例如废除革命者认为是个过时机构的加泰罗尼亚议会的建议——并以如果他们采取行动他就辞职相威胁。据曾经是共产党所控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的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说，孔帕尼斯对委员会的成员们说：“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可以不需要我，你们可以不需要自治政府，你们可以逮捕我，但是，全世界明天将知道，合法权力被篡夺了！”



孔帕尼斯喜欢夸张的举止。“他会大发脾气，”与他很熟的塞拉·帕米埃斯证实，“拽自己的头发，乱扔东西，脱掉外衣，扯掉领带，解开衬衫。这种行为很典型。”不过，在革命初期，孔帕尼斯表现得比较克制和谨慎，因此，作为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的橡皮图章，他的政府主要扮演被动的角色。正如委员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之一阿瓦德·德·桑蒂连所说，“所有事情必须由委员会决定或批准”。事实正是这样。证据如，将属于反对人民阵线的党派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专员暂时停职的法令；规定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并将工资提高百分之十五的法令；暂时停止针对民兵的驱逐诉讼的法令；没收教会财产和没收涉嫌参与叛乱者个人财产的法令；必须重新雇用由于政治原因被解雇的工人的行政命令以及劳工专员所发布的一系列关于由各行业工会制定新的工作条件的行政命令。“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行业刊物《照明与电力》报道说，“巴塞罗那自来水总公司和略夫雷加特河地下水特许经营公司的工人将两个公司收归公有并且接管了管理和技术控制权。……第二天，自治政府承认没收行为合法，随后，一名政府的审计员（interventor）加入了管理委员会。”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份关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没收城市横向地铁公司的报告写道：“自治政府任命了一名审计员，工人们原则上接受了他，但是，他的作用完全是被动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企业的革命委员会手里。”

显然，城市中下层中产阶级对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在分裂的权力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并不满意，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可以随意实行集体化的状况也不满意，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的佃户和佃农同样如此，他们代表了该地区农业人口的大多数。在占有土地之后，他们认为革命已经完成了任务。这不是激进的态度。在那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人占优势的村庄，或是在那些因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的进驻而使局面对他们有利的村庄，个人耕种遭到禁止，经常不惜牺牲地

里的收成。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主要报纸《工人团结报》承认：“一些问题出现了，我们认为结果适得其反。我们听说，某些不负责任的人把小地主们吓坏了，以致他们逐渐对日常劳作失去了兴趣。”它在另一天的报纸上写道：“小资产阶级陷入深深忧虑的消息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我们认为，最初的焦虑已经消失，但是，店主、商人、小工厂主、手工业者和小地主的不安仍将持续。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领导缺乏信心。”另外，关于巴塞罗纳边上的一个三万居民的小镇奥斯皮塔莱特，一位批评集体化运动狂热分子的左翼人士写道：“所有做小生意的地方都被接管，像食品店、肉类市场、粮店、小电子工厂等等。结果现在人们说，由于革命信誉扫地、民众越来越感到不满，奥斯皮塔莱特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法西斯分子较多的地方。”

眼看着自己的世界沉沦下去，也就难怪城市和农村的中产阶级为了抵抗汹涌澎湃的集体化运动而不顾一切地寻求帮助。

### 第三十九章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崛起、民兵委员会的解散

无论在城镇还是乡村，加泰罗尼亚的中产阶级都不可能转而支持迄今为止一直忠实保护他们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因为，就像加泰罗尼亚行动党和加泰罗尼亚国家党之类其他中产阶级党派一样，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大部分领导人已经胆小怯懦到了主动避让的程度。相反，控制着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人则与西班牙共产党的政策步调一致，勇敢地保护中下层中产阶级的利益，后者正被拖进集体化运动的漩涡，或者由于生意受到干扰、缺乏资金来源、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没收征用等等原因而面临灭顶之灾。“忽视我们本地的众多小商品生产者和小商人将是不可原谅的。”巴塞罗纳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机关报《劳动报》写道，“……他们认为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命运。他们可能成为倾向于支持反动势力的群体，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比本地区正在实行的经济

制度更坏的东西。……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悲惨处境显而易见。他们不能经营自己的作坊和生意，因为他们没有储备金；他们几乎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尤其是那些小工厂主，因为他们必须向所雇用的寥寥可数的工人支付工资，这使他们无法顾及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

于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一份宣言声称：“我们需要一种摆脱了天真幼稚的实验和异想天开的计划的经济，今天，在加泰罗尼亚流血的身体上，某些人正以疯子般的鲁莽不负责任地在一个充满了狂热的实验室里制订这种计划。我们需要一种摆脱了多如牛毛的委员会的影响和压力的经济，这些委员会到处涌现……[从而]使加泰罗尼亚大伤元气。”

保护农夫利益的正是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革命者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而不是中产阶级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它还大胆地将一万八千名商人、手工业者和小工厂主组织起来成立了加泰罗尼亚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Gremis i Entitats de Petits Comerciants i Industrials，简称GEPCI）。由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让许多成员为雇工者的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加入了它所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它受到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胡安·J·多梅内奇的指责。多梅内奇指责说，为了扩大规模，劳动者总工会的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不反对招收投机商、店主、商人入会，也不反对他们剥削工人。

在加泰罗尼亚的集体化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写道，起初，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小心翼翼地”开始活动，“然后变得大胆起来”。“至于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这个政党曾被认为最适合保护小资产阶级，由于当时的形势所迫，它将政治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它不可能心甘

情愿地看着自己的追随者被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夺走，于是，它组织了手工业者联合会[Unió de Menestrals]。手工业者联合会有时与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一起活动，有时与它相对抗。”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在内战爆发初期是一个规模很小的政党，它由成员总数约为两千五百人的四个微不足道的组织合并而成：强烈呼吁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情绪的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USC），这是其最大的组成部分；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党。根据战前担任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书记并在随后成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的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向我提供的信息以及其他来源提供的资料，我得出了以下分类数据：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人；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六百至七百人；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不到四百人；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党，大约八十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米格尔·巴尔德斯说，合并之初的党员人数在三千左右。另一方面，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路易斯·卡博·希奥尔拉提供的数字是五千人。

上面的数字与苏联历史学家Л.В.波纳马廖娃的数字有出入，她提供的一九三六年七月合并时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的成员为两千人，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一千五百人，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两千人，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党五百人，这使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最初的成员总数达到六千人。无论实际人数是多少，显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在内战初期只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组织。

据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书记塞拉·帕米埃斯说，内战之前四个组织合并的谈判一直没有达成最终协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共产党人坚持要求合并后的党组织必须通过西班牙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

联合会则要求加入工人党与社会党国际。塞拉·帕米埃斯证实，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主席胡安·科莫雷拉的态度也没有增加打破僵局的可能性，他最初反对与任何国际发生关系，尤其是与共产国际。据说科莫雷拉曾经告诫社会主义联盟执委会成员，务必防止共产党人控制新的党组织。但是，在革命的冲击下，这些意见分歧不复存在。四个组织的领导人明白，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控制局面的情况出现使他们几乎没有生存的希望，除非他们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胡安·科莫雷拉和拉斐尔·比迭利亚（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主席，曾经是卡瓦列罗的忠实支持者）放弃了他们反对依附共产国际的意见，随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于七月二十三日成立。

胡安·科莫雷拉成为新的党组织的总书记。在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开始的漫长的谈判过程中，他的立场似乎含糊不清而且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因为他在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机关报《社会正义》上的一篇访谈中说，他支持加入共产国际。他还在一九三六年六月签署了由代表四个组织的联合委员会起草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声明，新的党组织将承认“共产国际是唯一阐释世界无产阶级愿望的国际组织”。对这种含糊不清的立场的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是，在科莫雷拉公开支持共产国际的背后隐藏着他想成为联合政党首脑的野心，而且他也不愿断绝共产国际这条后路。实际上，加泰罗尼亚左派政治研究的权威维克托·阿尔瓦也许说得对，他认为，科莫雷拉支持加入共产国际“无疑是他为担任总书记一职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他]是温和的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中最温和的成员之一，……因此，他在意识形态方面没有理由希望新的党组织加入第三国际而不是加入第二国际”。他肯定不会忘记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人在人民阵线形成之前所使用的极端革命的语言。在一九三四年加泰罗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比森特·乌里韦声称，“在西班牙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帮助和

领导下”，加泰罗尼亚共产党“[必定]为共产主义、为苏维埃政权、为工农政府争取到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和农村地区进步群众的大多数，从而使加泰罗尼亚地区成为西班牙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坚不可摧的堡垒”。

有证据显示，除了曾经反对加入共产国际之外，科莫雷拉甚至反对四个组织合并。他的反对意见被华金·阿尔门德罗斯记录下来，后者是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巴塞罗那支部的书记，四个组织合并后成为党的执委会成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无论是米克尔·卡米纳尔那部旁征博引的三卷本科莫雷拉传记，还是何塞·路易斯·马丁—拉莫斯那部关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起源的著作，均未提到阿尔门德罗斯的这一重要证据。据阿尔门德罗斯说，“反对合并最坚决的”正是科莫雷拉。他肯定地说，科莫雷拉是一个“真正的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者”，认为自己的组织不应当与全国性的政党有牵连，因此，“他的天然盟友”是加泰罗尼亚的党派组织：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与其联合参加选举）、加泰罗尼亚行动党、加泰罗尼亚国家党和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但是，阿尔门德罗斯继续说，挫败军事叛乱之后，形势成为关键因素。“除了改变自己的观点之外，科莫雷拉无路可走”，因为他知道，面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毁灭性力量”，四个组织只能合并。

据苏联历史学家波纳马廖娃说，在内战的压力下，在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想让革命“沿着所谓‘自由共产主义’道路”进行的危险逼迫下，四个组织决定合并成为一个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政党”，并且“通过西班牙共产党”追随“共产国际”。

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立仅仅九个月后，它就有了五万名追随者。“在加泰罗尼亚，五万名积极分子是个奇迹。”科莫雷拉说，“加泰罗尼亚

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完全对立的势力曾经而且依然活跃，那就是，大多数农民，工人阶级中那一部分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另一部分也是传统上与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有联系并且慢慢变成小资产阶级的人。……在一个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环境中，面对那些尽其所能阻碍我们的强大对手，建立一个拥有五万名积极分子的政党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五万人这个数字似乎没有被严重夸大，据波纳马廖娃说，一九三七年七月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追随者增加到六万人，内战结束前增加到九万。成群结队入党的新党员来自各个方面：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的体力劳动者和白领工人、政府官员、警察、教师、商人、手工业者、小工厂主以及中小农场主、佃户和佃农，其中许多人以前支持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著名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积极分子塞韦里诺·坎波斯说：“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努力改变那些丝毫没有受过马克思主义启迪，尤其是没有受过革命思想鼓动的人的信仰。”不过，在成立一年后的一九三七年七月，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竭力淡化其中产阶级成分的重要性时，科莫雷拉宣称，它的成员百分之六十是产业工人，百分之二十是农业劳动者。“如果把这两个百分比加上那些官员、职员、教师以及其他所有挣工资的工人的话，”他补充道，“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党百分之九十七的党员是工薪阶层。”其余的是“一些从事自由职业的同志，小资产阶级党员的人数微不足道，无关紧要”。尽管没有提到农夫，但是我们应当认为，这些佃户和佃农被稍微宽泛地归入了农业劳动者的行列，据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负责农民运动的书记维克托·科洛梅尔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入了党。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从合并时起就通过西班牙共产党依附于共产国际。之后不久，加泰罗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成为党的领导核心。除了控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组织工作、舆论工具和工会活动之外，他们还负责党内监

视。所有档案都掌握在党的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华金·奥拉索手里，他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进行经常性的监视并且监听他们的电话。这项任务很容易完成，因为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和巴塞罗那地方委员会的成员大部分都与他们的家人一起住在内战爆发时党所占据的一幢名叫采石场的公寓大楼里。

真实姓名杰罗·埃尔诺的共产国际代表“佩德罗”——二战之后他在苏联控制的匈牙利政府中担任过多个高级职务——被安排在胡安·科莫雷拉的身边，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也定期派人带着指示去巴塞罗那。不到几个月，在成为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之后，曾经都是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的科莫雷拉和拉斐尔·比迭利亚加强了他们与共产党的关系。

佩德罗以非凡的能力、技巧和效率在幕后指挥着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他在一九一八年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积极支持者，一九三四年在共产国际担任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库恩·贝拉的私人秘书。另外，据说他在大清洗期间与苏联秘密警察关系密切，协助清除了当时生活在苏联的大部分“匈牙利共产党的老党员”。西班牙内战期间，他负责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日报《劳动报》，偶尔为报纸撰写社论。他还凭借三十年代初期担任共产国际驻加泰罗尼亚代表时对加泰罗尼亚形成的认识，设法消除了因某些党的领导人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以及他们不愿接受西班牙共产党的中心目标而在党的核心集团中所产生的意见分歧。佩德罗的主要成就之一是，他成功地使科莫雷拉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倾向服从于西班牙共产党的需要。阿尔门德罗斯写道，苏联代表佩德罗和一些西班牙共产党人的策略通过满足科莫雷拉的野心表现出来。“他们设法使他相信，他可能担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何塞·迪亚斯当时担任着这一职务，他的地位有所动摇。由于这一前景，科莫雷拉逐渐忘记了加泰罗尼亚的特殊性，随后也就忘记了这个新的加泰罗尼亚政党的特殊性。他完全听从西班牙共产党和苏联代表的指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变成了



瞎子和[政治局]恭顺的仆人。结果，在党的每周例会上，科莫雷拉表现得好像他受莫斯科发布的命令和口号指挥一般。”

在内战进行过程中，因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某些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权力集中倾向而造成的摩擦有几次险些爆发公开冲突，不过，佩德罗的老辣圆滑和个人威信成功地使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乖乖就范。内战结束之后，对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内部冲突，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提供了下面的说法：“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立之时起，来自四个组织的那些明智忠实的成员就与为首的胡安·科莫雷拉同志一起向西班牙共产党寻求支持和帮助。但是，也是从最初那一刻起，同样来自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一些人就开始对共产国际的路线不宣而战。……这些坏分子……从合并的第一天起就反对党的共产主义方向，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里始终坚持他们的立场。”

除了使不听话的人就范之外，佩德罗还控制了党的执委会会议并亲自检查最基层的党组织的工作，简单地说，就是始终严密地监督几乎所有细节。由于受到莫斯科的高度信任，他甚至监视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弗拉基米尔·A·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活动。

七月二十日挫败军事叛乱之后不到两周，在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之际，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与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一起采取了一项暗中破坏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支配地位的策略。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记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试图通过接受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邀请其加入政府的建议来“抵消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影响”。七月三十一日，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胡安·卡萨诺瓦斯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三位代表组成了一个新政府，但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反应强烈”，并且派了一位代表去找

孔帕尼斯主席要求“立即解散”这个政府。据塞拉·帕米埃斯说，这位代表以占领政府所在的自治政府宫相威胁，除非孔帕尼斯作出让步。“由于担心与无政府主义者公开发生冲突，”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继续写道，“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代表决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政府成员应当退出。……卡萨诺瓦斯甚至向当时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出示了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排除在外的新政府的候选人名单，希望可以使无政府主义者满意。只是在巴斯克斯认可了这份名单之后，卡萨诺瓦斯才敢公布。”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塞萨尔·M·洛伦索记录了一件事，说明自由主义者当时在加泰罗尼亚可以“制定规则”到何种程度：比迭利亚是加入政府的三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代表之一，他还是民兵委员会的成员，由于没有把他的打算告诉民兵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委员会“随便”就把他开除了。

但是，挫折并没有削弱孔帕尼斯主席将权力的杠杆掌握在自治政府手中的决心。几周之后，他召集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代表开会。“我承认，你们是控制局面的人。”他对他们说，“只要有必要，我准备与你们同舟共济。所有事情都在不断变化中，因此，我认识到，重新塑造社会的肯定是人民。如果你们希望，我就会退出，但是，我认为我可能对你们有用处。民主国家了解我，尤其是法国。由于这个原因，我相信，我们能够获得它们不会向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提供的战胜法西斯分子的武器。我们必须维持门面。因此，我建议，我们组成一个代表我的党派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治政府，在这个政府中，我将担任总理。在你们把我榨干之后，你们可以把我像废物一样扔到一边。我唯一的愿望是为革命出力。”

在孔帕尼斯为给被民兵委员会所取代的自治政府注入新的活力而努力的过程中，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帮助了他。中央政府不支持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向世界表明它的权

力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不起作用的革命机构。“我们一次又一次被告知，”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只要我们继续保留[民兵委员会].....就不会把武器运到加泰罗尼亚，我们也不会得到用来在国外购买武器或者为我们的工业购买原材料的外汇。”因此，他断言，如果他们不想输掉这场战争，除了解散民兵委员会并且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之外别无出路。“在现代劳工运动的历史上，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自己的信条或者政府的性质.....我们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次加入了一个政府。我们控制不了的环境使我们面临令人反感却无法回避的形势，导致我们采取了我們深恶痛绝但又不得不采取的办法。”

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对这一历史性的决定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她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宣称，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试图在某些建立了自由共产主义制度的地区——例如乌克兰——实现他们的理想，但是，因为不参与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发现自己偏离了运动的方向并且受到“血与火”的困扰。由于这个原因，她接着说，在加泰罗尼亚“我们参与一切事务并在各个领域站稳脚跟。.....就这样，我们甚至进行了一场政治革命。没有违背原则，只是认识到历史教给我们的东西。”

是谁作出了加入自治政府这一历史性的决定？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那些主要代言人没有澄清这个问题，尽管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一决定是在九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召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地区委员会全国会议期间作出的。

在何塞·塔拉德利亚斯——他被某个支持者称为“具有政治远见和非凡能力的人”——九月二十八日组成的新政府中，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只担任了十二个专员中的三个。我们应当记得，孔帕尼斯曾在七月委派塔拉德利亚斯（在四十一年后的一九七七年，塔拉德利亚斯成为佛朗哥将军死后的首任自治政府主席）作为政府的代

表加入民兵委员会，现在，根据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授予他的权力，他通过任命代表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塔拉德利亚斯为自治政府首席专员（总理），委托其行使自己的行政职能。自治政府的十二个席位在各党派组织中分配如下：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首席专员(总理)兼财政专员
阿特米奥·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内务治安专员
本图拉·加索尔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文化专员
胡安·P.法夫雷加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	经济专员
安东尼奥·加西亚·比尔兰	全国劳工联合会	卫生与公共救助专员
胡安·J.多梅内奇	全国劳工联合会	物资供应专员
胡安·科莫雷拉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公用事业专员
米格尔·巴尔德斯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劳工与公共工程专员
安德烈斯·宁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司法专员
费利佩·迪亚斯·桑迪诺中校	无党派（自由共和派）	防务专员
何塞·卡尔韦特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	农业专员
拉斐尔·克洛萨斯	加泰罗尼亚共和行动党	无任所专员

尽管民兵委员会的解散加强了自治政府的权力，但是，这并没有结束该地区的权力分裂状态；因为革命者将他们的治安巡逻队（Patrullas de Control或Patrols）和民兵武装继续分别置于全国劳工联合会所把持的治安委员会和防务秘书处的控制之下，他们还保留了一个巨大的覆盖加泰罗尼亚各个地方的防务、运输和食品委员会网络。另一方面，自治政府则可以通过内务治安专员阿特米奥·艾瓜德及其手下的治安总署署长即警察署长马蒂·罗雷特，依靠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还可以依靠温和党派的民兵武装。

在即将来临的几个个月时间里，结束权力的分裂状态成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加

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政府专员的首要目标。在这个方向上所迈出的第一步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颁布的一项法令，该法令要求解散随着军事叛乱而出现的那些革命委员会并由合法的市政委员会取而代之，各党派组织按其在政府中的代表比例获得市政委员会的职位。由于这些委员会大部分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所控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专员同意颁布这项法令肯定让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感到意外，尽管自由主义运动比较激进的成员进行了抵制，它仍然在加泰罗尼亚的城镇和乡村尽力夺回了一些失去的权力。

在随后几个月进行的结束治安和军事力量二元化的激烈斗争中，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政策之间将出现分歧。一方面，孔帕尼斯和塔拉德利亚斯希望通过巧妙地控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并且利用它们政治上的单纯和缺乏经验来结束权力的分裂状态，从而避免中央政府和西班牙共产党侵犯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另一方面，尽管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许多领导人具有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情绪，但它仍然不顾地区自治权受到侵犯的危险，希望得到中央政府和西班牙共产党的帮助，我们将在后面的几章里看到这一点。

## 第四十章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托洛茨基分子

加泰罗尼亚的政治舞台由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简称POUM）的存在而错综复杂。该党于一九三五年九月由安德烈斯·宁的共产党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与华金·毛林的工农集团（Bloque Obrero y Campesino）合并而成。据安德烈斯·宁说，一九三六年七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成员有六千人，到了当年十二月，党员增加到三万人。尽管按照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党员人数微不足道而且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之外几乎没有基层组织，不过，它在该地区仍然是一支不

容忽视的力量。

由于极力鼓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无情地批评人民阵线和斯大林的审判与清洗，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共产党人斥为“托派”。尽管包括安德烈斯·宁和胡安·安德拉德在内的党的一些领导人曾经是列昂·托洛茨基的信徒，而且还在内战爆发以后赞成加泰罗尼亚向托洛茨基提供政治避难权，但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并不是一个托派政党，它在许多文章和演说中也拼命地试图证明这一点。不过，与斯大林在莫斯科审判中所采用的将所有反对派混为一谈贴上一个单一标签的策略一样，共产党人指责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佛朗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托派代理人。

内战爆发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书记华金·毛林身陷叛军控制区并在试图回到共和派控制区时以化名被捕。一九三七年九月从哈卡监狱获释，几天后，他在真实身份被发现时再次被捕，直到一九四六年十月才被释放。“虽然毛林没有亲身参加内战，”研究西班牙内战的学者乔治·埃森魏因写道，“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主要理论奠基人和组织者，他的遗产给党的政策留下了不可否认的印记。尽管人们无法准确地判断他不在场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给内战期间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造成了严重的问题。这一点由以下事实所表明，当安德烈斯·宁接任党的领导职务时，他缺乏毛林所拥有的优势；因为，正如宁的好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后来写信对维克托·阿尔瓦[曾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的历史学家]所说：‘[对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来说]毛林在某种意义上是无人可比的“最伟大的”领导人（*dirigente máximo*）：他是纯粹完美的领导人，绝无仅有的领导人。’”毛林的优势还因这一事实得到增强：在合并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时，其追随者的人数至少是宁的追随者的二十三倍。在内战爆发之后举行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上，人们对毛林的强烈感情显而易见，据阿尔瓦说，宁被任命为政治书记而不是总书记——后者是“为毛林保留的职务和称呼”。

尽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共产党人斥为托派，然而事实却是，从该党成立之日起，托洛茨基与它就有严重的意见分歧，而且，内战爆发没几个月，号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少数正统托洛茨基追随者就成立了其第四国际的西班牙支部，这是一个成员寥寥无几的组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绝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即，绝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党。”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德语喉舌《我们的话》断言，“面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竭尽全力为自己辩护，而且不惜采用最卑鄙的手段。他们不仅将托洛茨基主义者开除出党，更有甚者，他们还以最具挑衅性的方式发表这些开除的消息。”

当时通过革命社会党国际协调局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联系的美国共产党（反对派）领导人伯特伦·D·沃尔夫写道：

简明的事实是：

1.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不是托派。它的成员和领导人绝大多数来自共产党。在一九二九年的极左浪潮中，由于拒绝工会分裂、拥护统一阵线政策、反对除了工人阶级之外都是“社会法西斯分子”的愚蠢理论、反对将脱离西班牙现实的策略机械照搬到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地方组织被整体开除出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杰出领导人是华金·毛林，托洛茨基一再激烈地攻击他是“中间路线派”、“机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将西班牙无产阶级引入歧途的主要领路人”、“孟什维克叛徒”以及一些精心选择的类似表述。……在情绪比较平和时，托洛茨基宣称“毛林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偏见、愚昧、外省哲学和低级政治的大杂烩”，他因此断定，“在西班牙建立革命政党的第一步肯定是谴责政治上庸俗的毛林主义。在

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手下留情。……”

2.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两位领导人安德烈斯·宁和胡安·安德拉德以前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大约五年前，在拒绝执行托洛茨基关于加入第二国际的指示之后，他们与他断绝了关系。……从那时起，托洛茨基有时说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左派’的跟屁虫”，有时把他们称为“叛徒宁和安德拉德”，……他还宣称，“在西班牙，人们肯定会看到，真正的革命者将无情地揭露毛林、宁、安德拉德及其一伙的背叛行径并为第四国际西班牙支部奠定基础。”

3. 托洛茨基分子不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成员。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一个开除一切托洛茨基分子的长期规定。[党的机关报]《战斗报》曾经刊登过一些与托洛茨基主义论辩的文章，这些文章不是以只有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那样的俄国人才会使用的“无情”、傲慢、辱骂的语气——只要在苏联党内出现不符合他们的宗派意志的声音，即使在他们所写的最好的政论文章里也是如此——而是以早就被托洛茨基分子和斯大林分子抛弃或者忘记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写成。

托洛茨基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安德烈斯·宁在自治政府中担任司法专员——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宣称：“建立在与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达成的某种共同纲领基础上的任何形式的联合政府都是对革命纲领的公然背叛。首要任务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政权并由一个工人政府，即委员会或苏维埃取而代之。”另外，巴塞罗那的外国托派志愿者M.卡萨诺瓦写道：“我们的国际组织驻巴塞罗那代表[让·鲁]一九三六年八月预见并阐释了……[因]解散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而结束权力的二元状态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西班牙革命带来的悲剧性后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不听我们的话。他们更喜欢与自治政府合作的‘实用主义’路线而不是第四国际的‘宗派主义’意见。”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回应时坚称，它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是向实现工人阶级掌权过渡的一步，它的口号始终是，而且还将继续是“一个名叫工农兵委员会的工人政府和一个立宪会议”。托洛茨基分子反驳说，这一口号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加入政府的行为自相矛盾，这个政府刚一组成就颁布法令解散了工人委员会并用代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地方议会取而代之。“内战期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一次也没有提出用委员会夺取政权。” G.穆尼斯（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写道，他曾经是宁的共产党左派的积极分子和宗派骨干，现在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小组的领导人。托洛茨基分子还谴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将其工会组织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Federación Obrera de Unidad Sindical，简称FOUS）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分会合并而不是与革命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合并，指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目的是避免与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发生摩擦。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表示，采取这一行动是希望给劳动者总工会注入一些“革命血液”，从而使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合并更加具有可行性。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安德烈斯·宁宣称，在他看来，如果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加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话，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派，而在劳动者总工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相比，这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支无足轻重的力量），它有望使自己的意见占据上风。这些希望很快就化成了泡影，因为，劳动者总工会的领导阶层以不召开会员大会并且解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所担任的重要职务的方式杜绝了任何自由发表意见的可能。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机关报《战斗报》说，这些撤职“通常是劳动者总工会中的小资产阶级会员要求的，内战之前，他们在商会和雇主协会时就与革命工人发生过冲突”。

共产党人无视托洛茨基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因为他们对苏联的批评同样苛刻。他们都谴责苏联政府当初支持不干涉公约，而且他们都认

为，苏联后来向西班牙运送武器是由于其自身利益的需要。《战斗报》断言：“对于错误的这一纠正不是出于什么促进西班牙革命事业的愿望——任何时候列宁都不会宣布中立——而是为了保护自己。……斯大林真正关心的不是西班牙或者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他只对保护苏联政府感兴趣。”

“有人厚颜无耻地宣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胡安·科莫雷拉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说，“苏联只对保护它自己的利益感兴趣，因此，它站在我们一边只是因为我们的失败将意味着它的失败。”这不是事实，他肯定地说，因为苏联强大得足以击退任何对其本国领土的入侵。“事实是，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工人国家的原则不是自私而是团结。……我们的苏联同志知道，我们的失败将把我们的德国同志、奥地利同志、匈牙利同志和葡萄牙同志的苦难延长多年，并且将使整个东欧、可能还有整个西欧工人的自由岌岌可危。……苏联实际上是强大的，但是，同志们，只靠苏联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苏联地处远方，与我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为了打败国际法西斯主义，当务之急是使欧洲民主国家站在我们一边。”

八月二十七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发表声明抗议斯大林处决格里戈里·E·季诺维也夫、列夫·B·加米涅夫以及另外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全国劳工联合会、社会党人和共和派人士并不理解发生在莫斯科的事情所蕴含的意义。”维克托·阿尔瓦写道，“他们几乎没有报道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理应将这些审判视为一种警告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似乎仅仅把它们视为一场家庭纠纷。”托洛茨基分子指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竭力轻描淡写或者隐瞒与斯大林的审判和暗杀有关的消息”。这不完全是事实，因为，尽管担心谴责莫斯科审判可能激怒共产党人的看法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部相当流行，但是，这种担心并不占上风。

一九三七年一月新的叛国审判在莫斯科开庭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共产党之间

激烈的舆论交锋火上浇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当即宣称被告都是无辜的。共产党的舆论工具《红色阵线报》回应说：“反革命集团的喉舌和指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煽动者《战斗报》终于暴露了自己。它撕下面具是因为在莫斯科对第二批托洛茨基恐怖分子、间谍和刺客以及盖世太保的帮凶进行了审判，像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一样，这些人由托洛茨基亲自指挥。”《战斗报》对此反击道：“斯大林非常清楚，除了一两个人之外，其他被告都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们也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我们不是。……莫斯科的被告还受到了另一些指控：指控他们是盖世太保的特务，指控他们为法西斯主义和外国间谍效力。我们也受到同样的指控。……幸亏西班牙不是苏联，不过，有人正试图把西班牙置于苏联人的监管控制之下。当然，我们将竭尽全力阻止他们这样做。而这就是斯大林和他那些国内外官僚不放过我们的原因。他们因为我们高举被他们抛弃和背叛的马克思列宁的旗帜而不放过我们。他们因为我们公布了其国内外政治生活的真实情况而不放过我们。他们因为我们在西班牙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战而不放过我们。他们企图把我们束缚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框架内。”

在随后的几个月，论战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恶毒。四月二十五日，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机关报《劳动报》宣称：“托洛茨基分子……知道，他们肯定在群众当中名誉扫地；他们知道，群众现在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最明显的敌人；他们知道，大家已经认识到，他们不仅是暗杀者——这已被基洛夫案件所证明[基洛夫是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苏联官方将其被暗杀归因于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而且还是蓄意破坏者和战争贩子。他们发现，工人抵制他们，向他们脸上吐口水，把他们斥为最令人憎恶的敌人。当然，他们不敢暴露自己的真面目，而是把自己伪装打扮起来。托洛茨基分子戈尔金[胡利安·戈尔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国际书记，执委会成员，《战斗报》负责人及其社论的主要作者]采用同样的方法。不过，他的辩解至少证明了一件

事：加泰罗尼亚的群众对托洛茨基主义像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因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急于否认他们的真实身份。”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一开始就严厉指责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支持“民主共和国”：《战斗报》写道，国际资产阶级充分意识到“西班牙的问题是革命或者反革命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的问题。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竭尽全力进行欺骗，在国内，他们欺骗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国外，他们欺骗的只不过是工人阶级”。

对于这种指责，共产党控制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反驳道：“有人说……当我们宣称我们正在保卫民主共和国时……我们是在进行欺骗。……这不是为了欺骗西班牙民主舆论而采取的策略，也不是为了欺骗外国民主舆论而采取的策略，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犯了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战的错误……那么，在我国的领土上，我们看到的就不仅仅是法西斯入侵者，而且还有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政府。……[那些]托洛茨基分子非常清楚，如果我们把号召进行社会革命作为当前目标的话，我们就将落入佛朗哥和莫拉设下的圈套，[他们]想把西班牙合法政府说成一个赤色政府，说成一个共产党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战斗报》断言，共产国际不希望西班牙发生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一场并不是在第三国际特许之下取得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胜利将意味着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心从莫斯科转移到了革命正在进行的地方。由于这个原因……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肯定要消灭那些不盲目地服从他们的纪律的党派组织。这适用于我们，也适用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他们认为在理论方面打败我们更加困难，因此打算首先消灭我们。至于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以后能够将其消灭。”

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一份向自治政府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专员出示的文件中，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建议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即司法专员安德烈斯·宁）逐出内阁，然后组成一个“拥有充分的权力”的新政府。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支持这些建议。十二月八日，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问题上没有公开表明立场的孔帕尼斯主席宣称，“一个拥有充分的权力并且能够将其权力强加于所有人的强大的政府”必不可少。全国劳工联合会对此回应说，“一个‘强大的政府’只能是个独裁政府。”此前一直非常谨慎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喉舌《人道报》大胆地反唇相讥道，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反应“莫名其妙”。“值此战争与革命的关头，我们看不出一个‘虚弱的政府’能够显示什么优势，因为战争与革命的进行和取胜完全建立在铁的纪律的基础上，建立在团结和行动的基础上，……只有一个毫不留情地将其权力强加于人的……强大的政府才可以奠定这些基础。强加于所有人，必须是所有人。”

由于消除对立双方的意见分歧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十二月十二日，塔拉德利亚斯总理正式宣布内阁处于危机状态。当天上午，曾为列昂·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并被某些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最激进的执委会成员胡安·安德拉德在其发表于《战斗报》的《每日政治笔记》中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处境：是决心支持现行的合作政策——这实际上是一种反革命同谋，还是支持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结盟。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问题是建立一个革命工人阵线，它……将阻止反革命前进并且提出无产阶级通过工农兵委员会掌握政权的问题。”同一天，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即将卸任的内阁成员胡安·科莫雷拉公开要求驱逐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指责它不忠于政府，因为其领导人曾经抨击政府的法令，同时指责它在苏联“站在我国人民一边并向我们提供大量援助”之际进行反苏宣传活动。另外，他要求撤销全国劳工联合会所把持的控制着革命民兵武装和巡逻队的防

务秘书处和治安委员会，以便赋予政府专员“充分的权力”并“在政府机构内部”建立“一种铁的纪律”。几天之后他又说：“有些委员会比政府本身管的还多。”另一方面，拥有自己的巡逻队和民兵武装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坚持认为，治安委员会和防务秘书处——它在两个机构中均有代表——是“体现革命性质的机构”，以防止政府“由于最近掌握了权力”而变成“一个针对无产阶级的警察政府”。它问道：“革命的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能够允许从它手中夺走这些[控制]手段吗？如果允许这样做，那就将在革命的道路上朝相反的方向迈出非常危险的一步。”

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最初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但是，由于没有意识到对于他们自身的威胁，或者由于他们因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其战前渗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企图、因为其经常指责集体化的热情已经引起城乡大部分中产阶级的不满而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什么好感，他们最终默许了十二月中旬将其逐出政府的决定。作为交换，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放弃了其撤销治安委员会和防务秘书处的要求，并且同意把防务专员的职位交给全国劳工联合会以换取由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占据的司法专员职位。从解决危机的这种方式来看，显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首先关心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不过，苏联总领事弗拉基米尔·A·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作用当时不是特别明显。据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和胡安·科莫雷拉的好友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说，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十二月份去找孔帕尼斯主席，“坚决要求不许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继续留在政府中”。多年后塞拉·帕米埃斯亲口告诉我：“他提出了种种理由。苏联武器，国外形势，[西班牙工业的]原材料以及食品的运送。”

不能肯定地说全国劳工联合会是否也从孔帕尼斯或者直接从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

那里受到过这一警告，然而重要的是，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关系密切的著名德国无政府主义者鲁道夫·罗克一九三八年写道，“苏联大使”[原文如此]曾经以拒绝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相威胁，除非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无论如何，全国劳工联合会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的声音在十二月十三日明显地开始减弱，当天的《工人团结报》只是简单地把政府危机说成是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竞争的结果。胡安·安德拉德对此反驳说，这不仅仅是两个组织之间的斗争。他警告说，危在旦夕的是“未来的整个革命进程”。

被逐出内阁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感到失望，但它决定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姿态。“没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不可能进行治理，更不必说与它作对了。”十二月十七日的《战斗报》刊出通栏大字标题。它声称，经历了这场危机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显然更加坚强了。“它已经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唯一真正的反对派。它的革命政治立场比过去更加坚定，由于它的革命立场，它将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

尽管表现出乐观的姿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仍然显得忧心忡忡。“现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已经达到直接的目的，谁会相信它将放弃自己的图谋？……由于把我们逐出了政府，它已经赢得初步的胜利。暂时它会感到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继续前进的程度。”

为了使全国劳工联合会觉得牺牲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道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同意正式退出内阁。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因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代表科莫雷拉、巴尔德斯和比迭利亚不过是以劳动者总工会代表的身份出现在新政府中而已，尽管众所周知他们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而且还在几周之内成为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组成的新政府的成员如下：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首席专员(总理)兼财政专员
安东尼奥·马利亚·斯韦尔特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文化专员
阿特米奥·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内务治安专员
何塞·卡尔韦特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	农业专员
胡安·科莫雷拉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物资供应专员
米格尔·巴尔德斯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劳工与公共工程专员
拉斐尔·比迭利亚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司法专员
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	防务专员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	全国劳工联合会	经济专员 <sup>54</sup>
胡安·何塞·多梅内奇	全国劳工联合会	公用事业专员
佩德罗·埃雷拉	全国劳工联合会	卫生与公共救助专员

### 图注：

54. 阿瓦德·德·桑蒂连加入政府的原因见本书第三十九章。

《工人团结报》为新政府出现工会代表占多数的特征而欢呼，认为这是其工团主义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以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为代表的政治党派的失败。“随着这次危机的化解，”它继续写道，“我们觉得谁也没有理由表示不满或者进行任何指责。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这两个对手——他们的冲突导致了我们的处境——均被排除在自治政府的行政委员会之外。两党在劳动者总工会里都有代表；……两党出自同一个思想体系，尽管见解和策略的细微差别使它们分裂。在我们看来，它们都没有大声抗议的权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如此简单地解释政府危机感到愤怒。胡安·安德拉德说：“我



们被逐出政府不是因为狡辩所称我们在劳动者总工会里有代表，而是因为我们保持着不妥协的革命立场。……无政府工团主义总是犯注重形式不注重实质的错误。……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选择了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它宁愿屈服于要求把我们逐出政府的反革命倾向……也不愿意坚持人民群众决不妥协的革命路线。”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隐瞒自己的看法，它认为，它是由于苏联的压力而被逐出政府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部队第一政委霍尔迪·阿克尔说：“我们不是顷刻间被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打败的，而是被隐藏在这些组织背后的某种力量打败的，在我们这些抗拒其意志的人面前，这种力量能够巧妙地让我们产生被人抛弃的恐惧心理，而且产生面对佛朗哥的叛军时没有武器弹药的恐惧心理。”《战斗报》还断言，有一个从国外输入的消灭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周密计划。它说，这一计划包括三个步骤：（1）营造政治和心理气氛；（2）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自治政府以使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3）采取措施实际将其消灭掉。“我们并不害怕战斗。”它威胁道，“我们不向任何人挑衅，但是，我们愿意不失尊严地回击一切挑衅。”

最终，党的领导人安德烈斯·宁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宣称：“有人希望通过某些野蛮的方法遏制革命并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推到一边。谁也不要抱有幻想。我们的党不可能被消灭，因为它是工人阶级的亲骨肉。……我们无产阶级不会让人束缚。它不想接受任何人的监护。它正毫不犹豫、不屈不挠地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向前发展，无论多么巨大的障碍都不可能阻止它。”

## 第四十一章 加泰罗尼亚走向公开交战

十二月危机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政府中的地位被削弱了。由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顺从地同意将其逐出政府并且没有意识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

会党的这一胜利对他们自身意味着一种明显的威胁，全国劳工联合会唯一可能的盟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感到忧虑。作为日益临近的危险的证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喉舌《战斗报》并不令人意外地转载了从越洋通讯社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发自莫斯科的一则消息中摘录出来的以下内容，这则消息刊登在墨西哥的《环球图片报》上：“苏联报纸表示，希望以与苏联同样的力度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收拾干净。”尽管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斥责这则报道纯属捏造——《消息报》或《真理报》确实没有刊登过这种消息，但是，它无疑使全国劳工联合会深切地感到自身的危险日益临近。

除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政府中的地位下降之外，十二月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最大的中产阶级共和派政党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的自信心和好斗性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的恢复惹得《战斗报》在一月二十八日轻蔑地宣称：“五个月来，共和派一直委曲顺从。他们举起握紧的拳头严肃地听取‘国际’的指示。有时他们表现得比真正的革命者还要革命。……[但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现在开始再次感觉强大起来。”

虽然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有意避免对驱逐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公开表示幸灾乐祸，但是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认为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是整个革命运动的重大挫折。这一点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举行的一次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公众集会上得到了证明。他们的演说极其好斗，充满了对未来的革命隐晦甚至公开的威胁，以致路易斯·孔帕尼斯主席觉得有必要插话发出警告，他仍然认为，只要将自由主义运动“驯化”并逐渐剥夺其武装力量，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政府中的合作必不可少。尽管指责“各种各样的委员会盘根错节混乱不堪”，强烈要求将所有行政管理权集中在自治政府手里并且警告说，“如果没有一个训练有素、充满活力而且负责任的政府的话，革命注定要失

败”，孔帕尼斯仍然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进行了下面这一番安抚：“一些共和派人士相信甚至梦想，今后将会建立一种与七月十九日以前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不过显示了他们的盲目和缺乏忠诚，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它既不正确也不合法。我曾经说过，我还要再说，工人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时候到了。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应当对监督政府的廉洁、效率和工作才智最感兴趣。”这番话似乎使自由主义领导人感到欣慰，他们坚信孔帕尼斯当初对于革命的承诺。《工人团结报》写道：“路易斯·孔帕尼斯现在与无产阶级组织意见一致……尤其是与全国劳工联合会意见一致，他显示出一种比他的某些同志更敏锐、更真诚、更忠实的政治目光。”

但是，无论孔帕尼斯主席或安抚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何塞·塔拉德利亚斯总理的治国之术多么精明，对待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方式多么巧妙，都不能安抚更加焦急的中下层中产阶级追随者，他们已经或者即将面临经济破产。他们渴望立即剥夺无政府主义者的权力，同时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有力的领导和大胆的政策中看到了从革命的灾难中挽救自己的部分财产的一线希望。怪不得他们继续成群结队地加入这个人数不断增加的竞争党派。另一方面，正如一位仰慕者对其想法的概括那样，塔拉德利亚斯确信，“当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因政治上的天真幼稚而自取灭亡时，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机会就将来临”，因此，至少在最初的时候，采取一种与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和平共处的政策比迫使他们站在不妥协的立场上要明智得多。

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坚决要求将所有行政管理权集中在自治政府手里并强制实施政府的法令，塔拉德利亚斯仍然经常保护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免遭共产党人的攻击。例如，有一次，当格拉诺列尔斯市出现了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时，他竭力阻止政府派部队增援。另一次，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指责无政

府主义者控制的战争工业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塔拉德利亚斯主持——时，他站在全国劳工联合会一边。还有一次，针对共产党人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治政府防务专员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及其副手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拖延执行政府法令的指责，他们进行了有力的辩护。由于经常保护自由主义者，塔拉德利亚斯受到他们的热情赞扬。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他很快发现自己与党内那些更加好斗的领导人产生了矛盾，例如内务治安专员阿特米奥·艾瓜德，后者喜欢大胆地冒险并且支持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不妥协政策。“[我]知道，”塔拉德利亚斯多年以后坚称，“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某些重要人物为了解决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共产党人串通一气，有人相信这个问题可以在一个下午得到解决而且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我从来都不这么认为。这不诚实，一点也不诚实。”

他的谨慎策略最初得到孔帕尼斯的支持，还得到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另一些领导人以及加泰罗尼亚的一个小型中产阶级政党共和行动党的支持。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讨厌这种策略，但是直到战后才公开批评了塔拉德利亚斯总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一份文件写道：“资产阶级领导人与无政府主义的反革命政策相勾结，暗中希望加快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的崩溃瓦解，然后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

由于许多人对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感到失望，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利用塔拉德利亚斯的谨慎策略不仅可以比较焦虑的那一部分城市中产阶级吸引到自己一边，而且可以将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的大量佃户和佃农以及工商业雇员自治中心（办公室职员和零售业营业员的工会组织，简称CADCI）的大量追随者吸引到自己一边，内战爆发之前这两个组织均属于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不可侵犯的势力范围。如今，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胡安·科莫雷拉的传记已经告诉我们，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主席、历届战时自治政府的农业专员何塞·卡尔韦

特不仅“与科莫雷拉密切合作”，而且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一名积极分子。因此，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各个部门的真正影响力比他们的正式官员数量所显示的要大得多。

在十二月改组政府的过程中达到目的之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立即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在革命初期夺取了食品批发业控制权的委员会。为了削弱全国劳工联合会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领域里的权力并且重建自由贸易，在新政府中担任物资供应专员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胡安·科莫雷拉颁布了解散这些委员会的法令。他在颁布法令之前不久声称，这些委员会取代经纪人“不利于社会”，它们对食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负有责任。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坚称这些委员会防止了富人从事损害工人利益的投机买卖，但是，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报纸上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委员会“在‘自由与革命’的名义下”也犯了“不少错误”，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延续了老板们的恶习并像他们一样做投机生意”。然而，双方争论的实质问题与其说是这些腐败行为，不如说是委员会掌握的经济权力。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书记安德烈斯·宁断言，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政策的目的在于“重新建立自由贸易并且破坏前[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物资供应专员多梅内奇同志针对投机商人所开展的整个革命工作”。

但是，只要革命者的武装力量完好无损，科莫雷拉的法令从颁布到实施就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为了逐渐削弱革命者的地位，十二月危机之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采取措施不断施加压力以结束该地区治安力量的二元状态。正如我们所知，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治安力量被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所控制的治安委员会手下的巡逻队，另一方面是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政府内务治安专员阿特米奥·艾瓜德控制下的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十二月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附带后果是前共产党员艾瓜德任命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欧塞比奥·罗德里格斯·萨拉斯为治安

总署署长即警察署长，取代了不太好斗而且惧怕无政府主义者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马蒂·罗雷特。继科莫雷拉之后，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很快成为自由主义者主要谴责的对象。作为一名前无政府主义者，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在内战之前早就放弃了自己的自由主义信仰，加入了毛林的工农集团，最终成为人数不多的加泰罗尼亚共产党党员，将其具有无政府主义积极分子特征的大胆鲁莽带到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十二月危机过后不久，在自治政府中代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建议，解散所有治安力量——巡逻队以及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并将它们合并组成一支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全国劳工联合会拒绝了这个建议。“巡逻队不仅应当继续保留，而且应当扩大规模。”《工人团结报》写道，“对它们的一切攻击实质上都是对我们的革命事业的攻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也宣称：“我们肯定不同意这个建议。同意它就等于把自己五花大绑交给资产阶级，就等于帮助建立用来镇压我们的军队。社会治安必须继续由工人阶级来控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治安部队必须建立在巡逻队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的秩序。”然而，由于得到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政府专员的支持，政府通过了一系列要求解散各种治安力量的法令，包括解散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然后将它们重新组建成一支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支部队中，指挥岗位将由被解散的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的军官所占据。

由于自由主义运动——它在政府中的代表不是同意了法令中的某些条款，就是在另一些条款的表决中被多数击败，但是他们仍然恪守政府团结的原则——没有谴责这些法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宣称：“如果其他党派组织没有看出事态发展的趋势因而没有做出形势需要的反应的话，那么，它们将承担历史的责任。……革命的前

途处在危急之中。那些天天向革命表示忠心的党派组织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们所奉行的那种无论对革命多么有害也要保持团结的政策只有利于改良主义。……关于这些法令我党只有一个任务：不停地公开谴责它们，坚持不懈地为废除它们而努力，从而保证工人阶级利用自己的治安力量强行维护革命秩序。”

《工人团结报》对这一指责给予了回应：“我们以明确的语言而不是旁敲侧击地公开表示，我们对关于社会治安的法令并不满意。我们在自治政府行政委员会的代表竭尽所能，试图通过消除那些革命的特征完善它。他们只达到了一部分目的。尽管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组织我们尊重这项法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用一项更加切实地反映了本地区真正的革命政治形势的新法令取代它的努力。……我们认为，建立一支与劳动人民的斗争和愿望格格不入的统一的治安部队是错误的。”

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围绕着这些法令展开的公开和私下的争论达到非常激烈的程度，以致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为了减轻普通会员的忧虑于三月十六日宣布，政府已经同意推迟讨论这些法令。这让塔拉德利亚斯措手不及。“在所谈论的这些无疑受到公众舆论广泛欢迎的法令被政府批准并由三月四日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日志》颁布之后，”他说，发生了“一些误会”。实际情况是，他解释说，政府同意推迟任命新的治安部队中的关键职务。事实的确如此。实际上，由于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主要局限于对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成员的任命不了了之，相关的法令也成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日志》的纸上谈兵，加泰罗尼亚地区治安力量的二元状态没有变化。

与此同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也在为采取其他措施煽风点火。党的中央委员会宣称：“我们曾经反复说过，没有正规的军队，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纪律和革命秩序，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虽然加泰罗尼亚已于一九三六年十月批准动员一九三

四至一九三五年的应征者入伍，这项措施并没有落实，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认为，“将我们的部队完全交给政府控制非常幼稚”，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只能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征召加入自由主义运动的部队。即使在当年十二月全国劳工联合会接管了防务委员会之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继续反对征兵并且努力保持由其革命领导人所控制的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完整性和纯洁性。因此，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迫切要求把民兵部队合并成为“效力于共和派政府”的正规军时，全国劳工联合会强烈要求把民兵武装组织成为一支“效力于革命”的军队，并且极力主张国防部以下的所有指挥岗位应当由“革命的工会组织牢牢控制”。总之，对立双方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这场争论中，拥有自己的民兵武装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立场鲜明：“就革命的前途而言，工人阶级所能得到的唯一保证是自己的军队。工人阶级的军队只能是……一支征召民兵组成的军队。……它必须绝对保持在革命组织的控制下。……总之，我党坚定不移地表示支持正规军，不过，我们支持的是一支活生生地体现了革命精神的正规军。”

为了加强建立一支由政府控制的正规军的鼓动宣传，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立了一个包括除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之外的所有党派组织在内的支持人民军委员会。二月二十七日，委员会提出一系列建议：立即将民兵部队改编成为正规军，征召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的应征者入伍，公布征兵中心的地址，解散一切没有政府官方身份的军事委员会，向人民军的所有部队委派“拥有足够权力”的政治委员。

二月二十八日，支持人民军委员会在巴塞罗那街头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和军事检阅。在全国劳工联合会看来，这场力量的显示是一次严重的挑战。由于委员会侵犯



了他的权力，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防务专员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威胁说要辞职。为了避免出现政府危机，在主张安抚的塔拉德利亚斯的敦促下，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强烈要求支持人民军委员会暂停一切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可能对“完全属于自治政府行政委员会的职能和权力”构成某种“侵犯”，尽管它们的“愿望良好”。各方达成一个妥协：支持人民军委员会被正式指定为防务委员会的附属机构，由伊斯格莱亚斯担任副主席，孔帕尼斯担任主席。不过，这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一次胜利。由于委员会被承认为一个官方机构，它可以加强党的鼓动宣传工作，甚至可以对防务委员施加更大的压力。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主要舆论工具《土地与自由》断言，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为建立正规军而开展的宣传活动背后，隐藏着“一种敌视无政府主义的政策”。这反映了自由主义运动的恐慌。

与此同时，伊斯格莱亚斯处在中央政府不断加大的压力下，后者早就反对加泰罗尼亚民兵在邻近的阿拉贡前线独立行动并且阻挠加泰罗尼亚地区因革命获得军事上的独立。但是，直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初，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才因为渴望得到武器和资金而同意接受中央政府在巴伦西亚颁布的军事法令，并且答应促使加泰罗尼亚的民兵武装服从国防部的指挥。结果，三月十八日，与塔拉德利亚斯一起代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参加了达成财政和军事协议的谈判的伊斯格莱亚斯被迫确定了征兵日期，不仅征召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的应征者入伍，而且征召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的应征者入伍。

三月二十三日，《战斗报》发表恩里克·阿德罗埃尔撰写的文章，阿德罗埃尔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负责宣传工作的书记，而且是该党在以伊斯格莱亚斯为首的、由全国劳工联合会所控制的防务委员会中的代表。阿德罗埃尔的文章谴责了巴伦西亚当局对加泰罗尼亚的军事政策：

为了迫使我们在军事上服从，巴伦西亚当局明确拒绝向加泰罗尼亚提供经济援助。巴伦西亚当局拒绝为阿拉贡前线提供武器弹药以防止我们无产阶级的军队取得胜利，同时避免激励西班牙工人的革命意志。……当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被迫恳求中央政府提供资金以向民兵支付拖欠了一两个月的十比塞塔薪水时，巴伦西亚当局收买了军官，正式提拔他们并且立即给他们发薪水。……从现在起，加泰罗尼亚军队的所有开支将由巴伦西亚当局负担，包括军事指挥部门、人民战争学校和军事行动的开支。加泰罗尼亚失去了军事上的独立性。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失去了它的军队。……自称民族主义者甚至分离主义者[这是提到主张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人士和主张独立的小型政党加泰罗尼亚国家党人时使用的称呼]的那些人如何面对加泰罗尼亚人民？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专员如何面对正在阿拉贡战场上战斗的他们的同志？他们如何为这么可耻地向中央政府投降进行辩护？……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人士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改良主义者的态度可以理解，符合逻辑。他们当然更愿意看到军队由巴伦西亚当局控制而不是掌握在革命的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手中，看到前一种情况他们要高兴一千倍。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那些政府专员的投降让人感到无法理解。不可思议的是，宁可被杀也不许别人抢走他们的左轮手枪的无政府主义的同志们竟然心平气和地同意把军队交出去，归根到底，军队是工人阶级真正的武器。我们已经把我们解放社会的军队交给了巴伦西亚当局，交给了民主共和国的支持者，交给了坚决要扼杀革命的人。

不是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像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这篇文章所说的那样“心平气和地”屈服于巴伦西亚当局的要求；因为，在三月初，像本书已经讨论过的钢铁纵队的情况一样，驻扎在阿拉贡前线赫尔萨的将近一千名民兵为了抗议政府的军事化法令离开前线，他们担心这些措施将把民兵武装变成政府严密控制下的国家机器。在巴塞罗那，他们成立了以去年十一月死在马德里前线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布埃纳

文图拉·杜鲁蒂的名字命名的“杜鲁蒂之友会”（Los Amigos de Durruti），旨在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层的“反革命”政策作斗争。该组织正式成立于一九三七年三月，由费利克斯·马丁内斯和海梅·巴柳斯（后者当时担任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巴塞罗那《晚报》的社长或主编）分别担任干事和副干事，据巴柳斯说，到五月初时，其成员增加到四五千。巴柳斯肯定地说，杜鲁蒂之友会的成员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尽管许多人的说法正好相反——例如，《曼彻斯特卫报》驻西班牙记者弗兰克·杰利内克声称，正如共产党人所说，这个组织被托洛茨基分子“渗透并控制”。不过，成员寥寥无几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小组领导人G.穆尼斯（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承认两个组织具有一种同志式的关系：“不仅我们与杜鲁蒂之友会的工人友好协作，他们也帮助我们出售分发我们的报纸。”

无法确定这么一大批民兵撤离前线对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是否产生了什么影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批应征者应当遵照军事法令出现在征兵中心之后仅一天，以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为首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专员退出自治政府，引发了一场政府危机。

现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所有关键问题上都陷入了僵持状态。自由主义运动曾经试图通过敷衍应付或假装接受政府的法令保持其武装力量的独立性；但是，虚与委蛇无法继续，政府的公开分裂不可避免。作为解决危机的一个条件，自由主义者要求，由于关于社会治安的法令“经历了如此根本的变化以致徒有其名”，因此，应当授权防务委员会“以其拥有的一切手段”制止“军事游行和示威以及任何不利于或者损害革命士气和战斗意志的行为”。另一方面，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宣称，它没有引起政府危机而且竭尽全力防止出现这种危机。“必须组成一个不会允许任何部门或团体经常阻碍[其]开展支持战争的工作的政府。必

须组成一个将会履行其职责并将贯彻执行那些已获一致通过却仍未付诸实施的法令的政府。”此外，它还坚决要求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签署一份保证书，对“不作修改地”执行前任政府通过的军事和社会治安法令并且落实新政府的所有措施做出承诺。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不打算签署可能在今后会被用来反对它的任何文件，因为在它看来，这“不仅与激励我们工会组织的思想原则背道而驰，而且与革命的本质和七月十九日以来劳动大众所取得的胜利成果水火不容”。

危机很快进入了第二周，仍然看不到解决的可能。四月三日，作为最后一着，孔帕尼斯主席拼凑了一个由六名专员组成的临时政府：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首席专员(总理)兼财政与教育专员
阿特米奥·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内务治安专员
胡安·科莫雷拉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公共工程、劳工与司法专员
何塞·卡尔韦特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	农业与物资供应专员
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	防务专员
胡安·何塞·多梅内奇	全国劳工联合会	经济、公共救助与卫生专员

没有人把这个新政府当成回事，认为它只是权宜之计，尤其是孔帕尼斯。危机出现时对全国劳工联合会显得越来越不耐烦的孔帕尼斯需要一个“能够政行令通的政府，而且还能将它的意志强加于那些阻碍其开展工作的人”。

现在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塔拉德利亚斯的谨慎策略逐渐失去了孔帕尼斯的支持，而塔拉德利亚斯则希望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因其思想上的自相矛盾和政治上的天真幼稚自取灭亡之前保持与它和平共处的政策。正如科莫雷拉的仰慕者和加泰罗尼亚政治戏剧的热心阐述者米克尔·卡米纳尔所注意到的那样，诸如孔帕尼斯和艾瓜德之类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重要人物“在立场上更接近于科莫雷拉而不是塔拉德利亚

斯”。当塔拉德利亚斯确认，由于认为政府团结的公开破裂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他准备向全国劳工联合会做出正式但非实质性的让步时，另一方的科莫雷拉则认为，有名无实的合作只不过削弱了政府的权力并且可能产生“甚至更加惊人的后果”。科莫雷拉还说，意见分歧集中在“要团结还是要权力”的问题上。显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答案是“要权力”。

四月七日，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推出了一个加泰罗尼亚“胜利计划”。计划的前言写道：“现在，整个问题以权力问题为转移，关键在于政府的权限。没有权力不可能有军队。没有权力不可能有战争工业。……没有权力不可能取得胜利。”它的要点是：（1）尽快建立一支作为共和国军队组成部分的正规的加泰罗尼亚人民军；（2）立即以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的应征者为基础组建五个师；（3）将基础的战争工业国有化并对运输业实行军事化；（4）尽快遵照前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通过的法令组建一支统一的治安部队；（5）将所有武器集中起来由政府控制。

整个计划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革命目标发生了冲突。“我们已经作出了太多的[让步]，”《工人团结报》警告说，“因此，我们相信，关闭水龙头的时候到了。”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安德烈斯·宁对这一立场表示欢迎：“七月十九日工人阶级掌握了权力。……它让机会溜走了。……无产阶级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岗位。……如果今天我们不因势利导和平地夺取政权的话，那么，明天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暴力斗争的方式消灭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我们以极其忧虑的心情注视着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犹豫不定。已经对反革命作出了太多的让步。……由于这个原因，我们高兴地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现在的立场表示欢迎。……全国劳工联合会宣称：‘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一步也不能后退了！’”

四月十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土地与自由》反映了更加激进的思想情绪，它号召：“同志们，镇压反革命！这是你们的任务。我们的责任是使之成为现实。”不顾这一任务，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继续在自治政府宫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进行谈判，寻求某种可以避免对立阵营之间发生公开冲突的妥协方案。但是，由于不时发生的冲突激增，外面的大街上看来已经充满了火药味，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内战的危险迫在眉睫。“没有人可以确定自己的人身是安全的，”米克尔·卡米纳尔在科莫雷拉的传记中写道，“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那些引人注目的保镖，他们总是与一些政治领导人形影不离。由于科莫雷拉的政治活动遭遇不测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他的公车始终跟随着一些武装到牙齿的人。”

四月十六日，孔帕尼斯主席为渡过危机组成了另一个临时政府。他在几周之后写道：

长期以来，[内务]治安专员艾瓜德一直要求[中央政府]增派兵力；自治政府的治安力量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只有两千名武装的突击卫队队员和另外六百名非武装的突击卫队人员以及少量共和国国家卫队队员。灵活变通的联合政策必须与加强政府权力的努力相结合，在涉及所谓不听指挥的组织[即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以及有人以强硬的手段违抗政府法令的特定情况下，必须采取行动。我始终坚决要求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公众舆论的压力，而且是因为马德里的内政部和其他权力机构的要求以及外国报刊对边境地区形势的评论，等等，等等。形势的错综复杂性使得增援成为必要，因为可以预料的是，即使在最大限度地灵活变通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冲突。自治政府一直在竭尽全力缓解形势，舆论也在施加压力。政府的权力正在得到不断加强，但是，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激怒，以致存在着政府失去公众的信任、效力于自治政府的治安部队丧

失斗志的危险。

尽管发生了微小的变化，孔帕尼斯四月十六日组成的新政府与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组成的政府具有相同的政治成分：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首席专员(总理)兼财政专员
安东尼奥·马利亚·斯韦尔特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文化专员
阿特米奥·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内务治安专员
何塞·卡尔韦特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	农业专员
何塞·米雷特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物资供应专员
拉斐尔·比迭利亚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劳工与公共工程专员
胡安·科莫雷拉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司法专员
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	防务专员
安德烈斯·卡普德维拉	全国劳工联合会	经济专员
胡安·多梅内奇	全国劳工联合会	公用事业专员
奥雷略·费尔南德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	卫生与公共救助专员

像四月三日组成的临时内阁一样，新政府流产了。它的成员无法就一个共同纲领达成一致，而且日益恶化的军队和警察的指挥控制问题仍然错综复杂令人焦头烂额。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把解决危机的过程形容为一场闹剧，“一场让大家更加难以忍受的闹剧，因为三个星期过去了——整整三个星期，之后情况依然如故”。它再次批评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在内战爆发时]并不知道对权力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他们更愿意认为这只是一个合作问题[而不是]坚决主张工人阶级全面夺取政权。……我们肯定，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群众将像我们一

样以冷淡的目光看待当前危机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它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比许多人认为的都要快，过不了多久革命的问题将被再次提出来。.....改良主义者不会放弃他们的目标。如果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说非常可怕，对我们大家也非常可怕。因为，危在旦夕的不是这个或者那个组织的前途，而是革命事业的前途。”

第二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巴塞罗那委员会宣称：“刚刚组成的这个政府是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中建立停战状态的一种尝试，无论停战多么短暂。小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将利用他们得到的这一次喘息机会获得并巩固新的职位。工人阶级负有通过建立一个工农政府.....为最终解决[政府危机]做好准备的历史责任。”

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同意掩盖这场危机，但是，自由主义运动的真实情绪反映在它的报纸上。四月十七日的《工人团结报》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以停止执行前任行政委员会所遵循的路线为条件接受了冲突的解决方案，它还相信，这一路线将被尊重并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合理政策所取代。”同一期《工人团结报》上的另一篇文章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已多次表现出最大限度的灵活和宽容。但要小心！不要让人们误解了它的意图或是认为，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将允许他们那些所谓的同志将自己践踏在脚下而不受惩罚！”

同一天，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的喉舌《道路》宣称：“[反革命势力]企图夺取国家机器。昨天，它要求建立一支庞大、统一的治安部队。.....今天，它提议建立一支没有革命成分的正规军。这些花招的卑鄙目的是什么？.....依靠这些肯定将会为其效力的军队，明天它就可以把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成果淹没在血泊之中。怎么才能挫败这一阴谋？.....通过缔造革命的军事组织。我们向[后方的青年]发出一个强烈的呼吁：建立革命青年骨干营！”



同一期《道路》上的另一篇文章威胁道：“击退反革命的时间到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自由主义青年联盟……已经声明……它们必须为消灭那些对反法西斯事业和革命事业不忠诚的人而战，更要为消灭那些根本不支持反法西斯事业和革命事业的人而战。……防止牺牲我们的同志进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方法是……建立一支确保取得战争和革命胜利的军队并将科莫雷拉、艾瓜德和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等人从加泰罗尼亚的社会生活中清除出去。”最后，同一天的《土地与自由》以通栏大字标题宣称：“对于某些政党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消灭法西斯主义。让它们惶恐不安的是无政府主义运动。耗费它们最大精力的是其诋毁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宣传运动。……如果它们想在西班牙重复它们在其他国家所做的事，它们将发现，我们已经严阵以待。”

与此同时，为了将阿拉贡前线的民兵纵队合并编入人民军，为了建立一支由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控制的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加强了它的宣传活动，但是没有什么成效。事实是，受与巴伦西亚当局达成的军事协议推动，的确发生了某些结构性变化：胡维尔特纵队、杜鲁蒂纵队和阿斯卡索纵队这三支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武装分别改编成为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六师和第二十八师；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巴里奥—特鲁埃瓦纵队改编成为第二十七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纵队改编成为第二十九师；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马西亚—孔帕尼斯纵队改编成为第三十师；但是，它们仍然被各自的党派组织所控制。至于那些关于社会治安的法令，实际上都被扔进了废纸篓。

在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过程中，四月二十四日，发生了一次对共产党人警察署长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的未遂暗杀。紧接着在第二天，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自治政府劳工与公共工程专员拉斐尔·比迭利亚的秘书罗尔丹·科尔塔达被暗杀。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惧笼罩着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暗杀为冲突添加了新的催化剂使其到了

一触即发的程度。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将暗杀归咎于“不法分子”——这个术语现在被普遍用来形容所有那些反对与政府合作并努力使自由主义运动坚持其无政府主义原则的桀骜不驯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自由主义青年联盟（FIJL）成员。“不再宽恕！”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喉舌《人道报》高呼，“社会秩序必须在一个人的统一指挥下尽快恢复，这个人必须迅速而无情地消灭频繁出现的犯罪行为。我们再也不能允许被人称为不法分子的团伙通过武力把它们自己的意志和法律强加给大多数公民。”“现在还有不法分子和奸细不是一种耻辱吗？”由激进的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组成的小型分离主义政党加泰罗尼亚国家党的喉舌《巴塞罗那日报》质问，“……另外，前些时候自治政府通过了关于社会治安的法令，它们为什么没有执行？当局要达到什么目的？”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还发表了一份共同宣言要求：“停止暗杀工人积极分子！停止针对反法西斯主义和无产阶级团结的挑拨离间！我们反对受雇于国内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奸细！人民要求正义并且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强行实现正义。”

为科尔塔达举行葬礼的四月二十七日当天，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这]不只是一场葬礼；这是一次公民投票。”党的喉舌《劳动报》写道，“成千上万名工人和反法西斯人士一队接着一队走过巴塞罗那的街道……悲痛使他们像兄弟一般团结起来，还有抗议。……葬礼的壮观场面表明，加泰罗尼亚人民决心惩罚凶手并且捣毁那些妄想阻挠我们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歹徒的巢穴。公民投票已经举行。投票的结果告诉我们，对于迄今为止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一天也不能容忍了；反法西斯的群众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内部的敌人，反对我们称为不法分子的那些人。”

全国劳工联合会抗议说，“利用一位反法西斯战友牺牲的痛苦事件在政治上大做文章令人厌恶”，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宣称，葬礼是“反革命示威”的一个借口。“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大批工人被工会调动了起来，……对一名工人积极分子死难的同情[使]他们陷入后方的斗争。……像不久前一样，这场示威最重要的政治目的是在极端保守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最落后的阶层中制造一种集体迫害的气氛，迫害的对象是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为采取更大的行动而营造的某种心理气氛正在形成。”

紧接着暗杀罗尔丹·科尔塔达发生的是杀害安东尼奥·马丁事件。马丁是边境城市普奇塞达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委员会主席，他在邻近的贝利韦尔村与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Guardia Nacional Republicana，前身为国民卫队）遭遇时被杀。此后不久，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从巴伦西亚派来的大批边防警察部队——由海关官员和税务人员及其警卫组成的部队——开始夺取迄今为止由革命委员会控制的法国—西班牙国境沿线的边防哨所。在两周前的四月十六日，内格林发布了一道命令，派遣一些重新组建的边防警察部队前往边境地区执行任务。这道命令提前警示了巴伦西亚当局打算夺回被革命者夺走的这一权力，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控制外贸和外汇以及武器的流动必不可少。

马丁被杀，边防警察部队夺取边防哨所，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准备收缴武器，以及共产党人警察署长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对奥斯皮塔莱特的无政府主义者总部发动袭击，这些消息使聚集在巴塞罗那上空的战云明显变得更加浓密而阴沉。

四月二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地方委员会调动武装人员小组占领了加泰罗尼亚首府的街道。所有人都手持来复枪，一些人腰间挂着手

榴弹。下午六点，政府召开会议，但是，在短暂的会议之后它宣布，由于不可能在“企图通过武力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并危及战争和革命”的武装人员的压力下继续工作。“因此，政府将中止会议并且希望所有未经其直接许可的人立即离开街道，以便使它有可能处理混乱的局面。同时它还警告说，加泰罗尼亚目前正在经历迅速的毁灭。不过，自治政府行政委员会已经为保证其法令的严格执行而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五一劳动节马上就到。劳动者总工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为举行一次联合示威游行而进行的谈判已被放弃。对立两派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使人们找不到任何宽泛的口号足以涵盖他们的分歧哪怕一天。“[透过]城市的表面，”目击者乔治·奥威尔写道，“在奢华和日益严重的贫困下面，在大街上因宣传海报和蜂拥的人群而呈现出来的欢庆表象下面，存在着某种明显和可怕的政治敌对气氛。无论持什么观点的人都预言：‘马上就要出事了。’危险的起因非常简单而且不难理解。那就是希望推动革命前进的派别与希望控制或制止革命的派别之间的对抗——归根结底，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对抗。”

在这种爆炸性的气氛中，新成立的极其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杜鲁蒂之友会显得异常活跃。四月份的最后一天，会员们在巴塞罗那大量张贴了他们的口号。“我们同意他们的纲领并且准备接受他们向我们提出的任何建议。”胡安·安德拉德——他被普遍认为是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写道，“这些口号中有两点也是我们的基本观点：一切权力归工人阶级以及工农兵民主政府是无产阶级政权的象征。”

五月一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宣称：

两天来，工人正在受到监控。[他们]……日夜关注着革命的前途。他们既不是不法分

子，也不是奸细。他们是七月十九日在大街上战斗的同一批工人。……

他们一直携带着武器保持警惕，因为他们忍无可忍。他们厌倦了多如牛毛的政治协议，他们厌倦了建立在脆弱的妥协基础上的纸糊的政府。……

我们不信任政府成员。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守望在大街上。……

我们再也不能容忍真正的不法分子了。我们需要统治，但我们需要绝对的统治。在前线和后方。由工人阶级来统治。……

但是，我们的行动一定不要退化成为一场孤立的运动，一定不要退化成为一场自杀式的“暴动”，那将危害工人阶级的胜利前进。不，不仅工人小组要采取行动，[而且]全体工人也要根据一个具体的方案以及对此时此刻各种需要和可能的清醒认识采取行动。

因此，[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组成一个革命工人阵线承担起赢得战争并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成果的责任。

因此，[必须]由工人、农民和士兵民主选举产生一个代表这些工作和战斗着的人们的政府，一个工农政府。

与此同时，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逐渐加强行动解除大街上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武装。五月二日，《工人团结报》警告说：“革命的保证是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企图解除人民的武装就是使自己站在街垒错误的一边。任何专员或警察署长，无论是谁都不能下令解除工人的武装。工人们正在与法西斯战斗，与后方那些尽人皆知其平庸无能的政客相比，他们具有更加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你们决不能允许任何人解除你们的武装！”

## 第四十二章 五月事变（一）

现在，巴塞罗那政治斗争的动力正不可阻挡地导致双方公开交战，导致西班牙革命的流血插曲和决定性的转折点，史称五月事变。

没有对哪个历史事件的报道或解释像对五月事变一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族主义者的报纸几乎一致将事变说成是无政府主义者对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一次反叛，尽管《布尔戈斯日报》还肯定地说，无政府主义者曾走上街头杀死苏联人。“西班牙人不是苏联人，”它补充说，“因此，虽然有时忘乎所以，赤色分子并没有忘记他们是西班牙人。”《纳瓦拉思想报》宣称，发生的是“一场真正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是“自由主义民主运动的最后一步”。至于外国新闻界，希特勒的《民族观察家》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人民》也像其他立场见解千差万别的外国著名报纸一样，把这说成一场无政府主义暴动。

但是，在共和派阵营的外国支持者当中，在共和派阵营内部，对五月事变的看法却截然不同。苏联《真理报》将这场冲突定义为“佛朗哥和意大利—德国干涉者所策划的“一场托洛茨基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暴动”，目的在于分散西班牙共和派对于前线的注意力”并“用‘无政府’幽灵吓唬英法资产阶级”。法国共产党的喉舌《人道报》把事变描绘成一场“希特勒分子的暴动”，在它看来，暴动的头目利用了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并且“确信可以得到不负责任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的帮助”；与此同时，美国共产党的喉舌《工人日报》报道说：“除了支持佛朗哥的法西斯分子、无政府主义‘不法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之外，君主主义者也参加了这场未遂暴动。”另一方面，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将事变定性为“在英法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主义的压力下，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的资产阶级政府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一次尝试”。

西班牙驻巴黎大使馆发表的一份声明使事变更加扑朔迷离，声明断言，这场“暴乱”并不像“某些企图造成世界舆论混乱的宣传机器所说”的那样只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当暴乱的头目认为已经控制了局势时”，传统的君主主义旗帜在巴塞罗那的一些阳台上飘扬。

在西班牙共和派内部，共产党的主要日报《红色阵线报》把这场骚乱描绘成一场由“托洛茨基反革命特务”策划的暴动。这种观点遭到革命左派的反对。根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说法，这场冲突是共产党人所激起的“大多数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的自动爆发”。这也是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说法，尽管它还指责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打算在墨索里尼同意的情况下使加泰罗尼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些描述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过了五十年后五月事变仍然被团团迷雾所笼罩，尽管许多人试图澄清其真相。不过，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到一九三七年五月时，巴塞罗那的政治气温已经达到了引爆点。

与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政府内务治安专员阿特米奥·艾瓜德共同商定并且遵照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事先做出的一项决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人警察署长欧塞比奥·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先发制人，他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五月三日，星期一，下午三点，他率领三卡车突击卫队士兵袭击了电话局。去年七月挫败军事叛乱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占据了坐落在加泰罗尼亚广场的这一幢地理位置优越的大楼，把它当做一个“关键的革命阵地”。迅速进入这幢十层的大楼之后，突击卫队士兵占领了底层，但是，他们在试图进入上面的楼层时受到了阻击。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发出援助的请求之后，警察的援军陆续赶到，他们“占领了相邻建筑的楼顶并在附近的大街小巷布置了非常显眼的兵力”。很快，一位目击者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自由主义青年联盟的武装人员乘坐卡车到达

了。“他们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革命成果。”

根据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颁布的关于实行集体化和工人管理的法令——该法令使工会没收或者管理其在革命初期所占领的大型工商企业合法化，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下属西班牙国家电话公司所拥有的电话局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共同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管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是这个机构中的支配力量，去年七月以来就在大楼的塔楼上飘扬着的他们的红黑旗帜证明了他们的主导地位。

虽然根据上述法令该委员会由一名政府代表所主持，但是，他的存在只是造成了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官方控制的假象。“那里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政府不得不结束这种局面。”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胡安·科莫雷拉声称，“电话局的内部管理全都是为一个组织而不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另外，无论是阿萨尼亚总统还是孔帕尼斯主席或者任何其他入，谁的通话都不可能不被某个行为不检点的接线员偷听。”这并非夸大其词。孔帕尼斯主席在他关于五月事变的笔记中亲笔证实：“自治政府各个部门的所有电话、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和共和国总统的所有电话均被窃听。”在全国劳工联合会看来，这种窃听尽管不是法律赋予的权力，但它却是革命赋予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由于能够行使否决权，能够如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所说截取窃听“有损名誉的电报和谈话”并且能够偶尔发现一些“阴谋削弱人民权利”的人，全国劳工联合会占有了实际权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打算成为这个地区的主宰者，它们就不可能允许这种情况长期存在。

因此，当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根据艾瓜德签发的命令袭击电话局时，他得到了除全国



劳工联合会成员之外的大部分政府专员的默许并非没有可能。不过，另一个例外是精明而且极其谨慎的塔拉德利亚斯总理。据阿萨尼亚总统——我们应当记得，他于一九三六年十月离开马德里去了巴塞罗那——说，塔拉德利亚斯在开战的第一天晚上告诉他，他只是在命令发出以后才知道了袭击行动，他认为这个决定“非常危险”，因为政府缺乏制服其可能遇到的抵抗的手段。“他发表了许多批评意见，”阿萨尼亚进一步证实，“批评艾瓜德没有准备好就开战了，批评孔帕尼斯张口闭口都是开战，他还为此警告过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所有问题最终都要通过谈判来解决。”

得知袭击的消息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专员要求将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和艾瓜德两人撤职，但没有奏效。“其他党派毫不妥协的态度，”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写道，“尤其是坚决反对这种惩罚措施的自治政府主席的机会主义态度在战事爆发之后引起了一场总罢工。”

曼努埃尔·克鲁埃利斯当时是加泰罗尼亚国家党——该党代表少数中产阶级分离主义者的思想倾向——的喉舌《巴塞罗那日报》的记者，他在追述五月事变时说：“如果孔帕尼斯像他按理应当做的那样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将内务治安专员和治安总署署长撤职的话，巴塞罗那就不会有五月那个可悲的一周。……孔帕尼斯主席在当时那种特定环境下的态度多少有点令人费解。……不是他不了解情况而且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使他拒绝将两人撤职，就是他完全知情并且默许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局面。……孔帕尼斯主席为什么不坚持提出辞职呢？难道他被已经开始出现在街头的反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歇斯底里迷了心窍？难道像在其他情况下那样，他想对党内的某些朋友表示忠诚？解释孔帕尼斯主席态度的真正原因并非易事，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他的态度对引发冲突、散布仇恨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巴塞罗那不得不因此而遭殃。”

当人们得知袭击电话局大楼的消息时，愤怒在那些主要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工人阶级街区蔓延开来。“成百上千的同志们占领了街道。”一名无政府主义目击者写道，“他们要去市中心彻底清除那些打算像七月十九日的法西斯分子一样再次进行挑衅的人。阻止他们很困难。这些同志……知道挑衅者企图干什么。……他们企图扼杀革命，破坏革命工人的胜利成果，然后只是重新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激怒无政府主义者使他们加入冲突，宣布他们是‘人民阵线’政府的敌人，破坏他们的组织，为资本主义民主列强进行干预打开绿灯，然后将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的西班牙工人阶级淹没在血泊之中。所谓‘工人的祖国’在这一场扼杀革命的行动中是刽子手的帮凶，为了在抵抗法西斯分子对其存在的威胁时得到资本主义民主列强提供的援助，它正在牺牲西班牙人民未来的自由。”

数百个街垒迅速筑起。“这些街垒看上去古怪而神奇。”乔治·奥威尔目睹了主要街道之一兰布拉大道上发生的事情，他写道，“当西班牙人明确决定动手干什么事情时，他们总是显示出那种富有激情的力量，男人、女人和很小的孩子排成长长的队伍撬起地上的鹅卵石，把它们装进从附近找来的手推车里运到前面，人们背着沉重的沙袋，摇摇晃晃地来来往往。”

夜幕降临之前，巴塞罗那是一座兵营。“成千上万的工人手持武器回到了街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宣称，“工厂、车间和仓库已停止工作。在城市的各个地方，自由的街垒重新筑起。七月精神再次征服了巴塞罗那。”不知那些对袭击电话局负有责任的人是否预料到了如此广泛的公众反应。

在围绕着巴塞罗那的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从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到城市商业公务区的边缘，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控制着局面。不过，在哥特区那一小块商业政治地盘内，对立双方势均力敌。例如，在位于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广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

占据着电话局，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则牢牢控制着它的总部哥伦布酒店，一九三六年七月它没收了这个酒店，从酒店的窗口用机关枪几乎可以对整个广场进行扫射。

在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萨里亚、奥斯塔弗兰克斯和桑斯以及巴塞罗那的沿海地区，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毫无战斗力。一些士兵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另一些士兵则待在他们的营房里，坐视危机自行发展。“顷刻间，几乎整个巴塞罗那都被我们的武装人员小组控制了。”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他们没有从他们的阵地向前推进，尽管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前进，打败那些进行抵抗的小股敌军。”他强调说，如果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想要夺取政权的话，它们将取得彻底的胜利，“但是，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因为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违背了我们的团结原则和民主原则”。

在离巴塞罗那港不远的加泰罗尼亚议会大厦——阿萨尼亚总统不久前把他的官邸设在那里——附近，枪声断断续续响个不停。晚上八点，阿萨尼亚总统指示当时人在巴伦西亚的总统府秘书长坎迪多·博利瓦尔去找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要求派兵增援他的总统卫队。卡瓦列罗已经就寝，于是，晚上八点半博利瓦尔把生气的总理从床上叫了起来。在催促卡瓦列罗刻不容缓地派遣援兵之后，博利瓦尔离开了，他几乎不会想到他的要求将被置若罔闻。没过多久，内政部长加拉尔萨通知卡瓦列罗，艾瓜德请求“紧急派遣镇压动乱必不可少的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

夜里十一点，塔拉德利亚斯首席专员代表孔帕尼斯主席前去看望阿萨尼亚总统，为混乱的事态向他表示歉意。从自治政府宫到议会大厦通常只需几分钟的路程走了一个半小时。“经过每一座兵营时他都必须从车上下来长时间协商，饱受羞辱。”阿萨尼亚在日记中写道，“他在开口[为混乱]道歉时实际上所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加

泰罗尼亚人他感到羞耻，我打断了他并且重复了我让博利瓦尔转告政府总理的话。‘不必道歉！镇压叛乱！就我而言，保证我的安全和行动自由就行了。’”然后，塔拉德利亚斯向总统告别。在战事余下的时间里，总统没有从加泰罗尼亚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消息。“自治政府没有人问到我，没有人打算让我做什么，也没有人关心我的立场。”阿萨尼亚总统愤愤不平地说，“这不只是一种可耻的失礼；这表现出一种无声的敌视。”政府总理拉尔戈·卡瓦列罗也不关心总统的境况。“他既没有给我打电话，也没有给我发电报。”

“[五月三日至四日的]整整一夜，叛乱分子控制着城市。”阿萨尼亚继续写道，“他们筑起了街垒，在没有任何人干涉的情况下占领了建筑物和重要的地方。……我并不担忧，但是他们使我陷入的处境让我心烦意乱。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冲突与我没有直接关系；我甚至还认为，如果事态继续恶化，可能有助于[在西班牙]实现和平。让我讨厌和烦恼的是叛乱将在国外引起的流言蜚语，另外那些叛乱者将会从中得到的好处以及它对战争的影响。”

同一天晚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自由主义青年联盟的地区委员会一起开会。执委会成员胡利安·戈尔金回忆说：“我们用下面这些精确的措辞阐述了问题：‘我们都没有要求巴塞罗那的群众采取这次行动。这是对斯大林分子的挑衅的一种自发的反应。这是革命的决定性时刻。为了消灭内部的敌人，我们都要走在革命运动的前列，否则的话，革命运动就将瓦解，敌人将把我们消灭。我们必须做出选择；革命或反革命。’[无政府主义者的几个地区委员会]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他们最大的要求是把那个向革命运动挑衅的[警察]署长撤职。要消灭的似乎不是他背后的各种势力！总是形式取代了实质！……我党站在革命运动一边，尽管我们知道它注定要失败。”

第二天，五月四日，星期二。上午，艾瓜德再次请求派遣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但是，遵照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指示办事的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只给了一个敷衍的答复。“我已经命令卡斯特利翁、穆尔西亚、阿利坎特和巴伦西亚的[警察]部队集结待命，”他答复说，“因此，在必要的情况下，那应该是发生在巴塞罗那的冲突加剧时，……你需要的部队将归你调遣。不过，总理和我一致认为，尽管应当做好一切准备，但是，在无须动用已在当地的所有部队而且不能证明兵力不足的情况下，驻扎在巴塞罗那以外的部队进行干预并不可取。”拉尔戈·卡瓦列罗希望以敷衍的方式使战事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平息。在与共产党人进行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时，他不愿因为向加泰罗尼亚派遣援兵而引起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敌意或者加强他的对手对该地区的控制。

与此同时，巴塞罗那的形势正在恶化。机关枪射击的嗒嗒声、手榴弹和炸药的爆炸声以及迫击炮的轰鸣响成一片。这种“可恶的噪声在成千上万幢石头建筑物之间回荡，回荡，像一场热带的暴风雨”。乔治·奥威尔写道：“砰—砰、嗒—嗒、轰隆—轰隆——有时逐渐变弱只听到零星的射击，有时突然枪炮声大作震耳欲聋，但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天亮之后仍然继续。”虽然有个别攻占敌人据点的尝试，但公开进行的都是规模较小的战斗。大多数作战人员仍然待在建筑物里或街垒后面，不停地向对面的敌人射击。

“我们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每个人的房子都被战火所殃及，”几天之后阿瓦德·德·桑蒂连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一希望的是，扑灭战火，结束血腥的屠杀。”然而，几个月后他又有了另一种想法：“也许……我们被一种忠诚和宽容的意识所支配，以致没有敏锐地察觉到针对我们策划的阴谋。”

下午两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通过广播电台呼吁停

火：“工人同志们！……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责任。我们没有攻击任何人。我们只是保护自己。……放下你们的武器！我们是兄弟！……如果我们自相残杀，我们就注定要失败。”

但是，打算给冲突火上浇油的大有人在。不仅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的人马发起了新的攻击行动，而且势单力薄的托派组织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持不同政见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杜鲁蒂之友会也异常活跃，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一些比较激进的成员加入了后者的队伍。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态度悲观。“我们觉得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并没有强大得足以带头组织群众进行抵抗。”党的执委会的一名成员承认。同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乔治·奥威尔参加了战斗，他证实：“当时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有直接接触的那些人告诉我，整个事件实际上让他们感到惊慌，但又觉得自己必须参与其中。”

“[由于]工人已经走上街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战斗结束后的五月十二日发表声明，“党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是是什么立场呢？与革命运动断绝关系，谴责它，还是与它联合起来？……我们选择了第三种立场，……尽管我们事先知道，革命运动不可能胜利。以任何其他方式行事都是不可饶恕的背叛。……当然有可能夺取政权，但是，作为工人运动内部的少数派，我们无力承担喊出这一口号的责任，尤其是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的态度在战斗者中引起混乱和动摇时，他们通过巴塞罗那的广播电台紧急要求工人阶级放弃斗争。号召工人夺取政权就意味着领导他们举行起义，这可能会给工人阶级带来严重的后果。由于这个原因，只能提出有限的口号：要求将挑衅的直接发起者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和艾瓜德撤职，废除关于社会治安的反动法令，成立保卫革命委员

会。”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机构并没有公开流露悲观情绪，因此，它表面上显得斗志旺盛，尽管它在五月三日晚上向自由主义运动的地区委员会建议采取积极的联合行动没有成功。第二天上午，《战斗报》敦促工人保持“一种长期动员的状态”并“继续加强已经发动的攻势，因为没有比进攻更好的防御手段。必须要求治安总署署长辞职并达到目的。……必须要求废除反动势力和改良主义分子所通过的社会治安法令并达到目的。为了实现这一切从而继续进行革命，即持续扩大革命的范围并使革命取得最终的结果，保持动员状态和攻势的工人阶级必须组成革命工人阵线并且立即着手建立保卫革命委员会”。

几天后，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宣称：“五月四日，佛朗哥的托派代理人……利用其喉舌《战斗报》呼吁他们的追随者……保持‘一种长期动员的状态’。……臭名昭著的塞维利亚刽子手凯波·德·利亚诺通过广播向加泰罗尼亚的叛乱分子说了下面这段话：‘我们支持并将帮助你们。坚持下去！’屠杀西班牙人民的刽子手与巴塞罗那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发出的呼吁看来是这些人民的敌人之间存在着思想和组织联系的最新证据。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公开充当着国际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

与此同时，在（政府所在地）巴伦西亚，五月四日星期二上午，担心共产党人可能利用这场冲突推翻其政府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召见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几位政府部长。他告诉他们，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自治政府内务治安专员艾瓜德已经请求内政部长派遣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增援。“政府不能这样做，”卡瓦列罗表示，“因为这意味着派兵帮助那个可能与挑起这场冲突有关的人。在答应派兵之前，他将根据宪法接管治安管理部门。”因此他建议，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

和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的代表应当立即前往巴塞罗那，努力争取结束敌对行动。随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为了避免中央政府接管治安管理部门”，派代表去巴塞罗那。全国委员会委派全国劳工联合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和担任司法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加西亚·奥利韦尔去巴塞罗那，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同时委派的是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和马里亚诺·穆尼奥斯·桑切斯，两人都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者。

上午十一点，中央政府开会。在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和左翼共和派政府部长的支持下，共产党人逼迫总理立即采取行动，不仅要求派兵增援加泰罗尼亚，而且要求政府接管该地区的社会治安和军事事务。屈服于制造内阁危机的威胁，卡瓦列罗勉强同意采取这些措施，但只是在到了傍晚局势仍未改善的情况下。

下午一点十分，孔帕尼斯主席——肯定是他指示艾瓜德请求从巴伦西亚派遣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增援——告诉拉尔戈·卡瓦列罗，局势已经“非常严重”，警察部队“不能胜任快速行动而且已经筋疲力尽”。卡瓦列罗答复说：“我认为我有责任通知你，……全体[部长]已经决定，如果到今天傍晚局势仍然没有改善，政府将根据[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接管该地区的社会治安。如果有什么异议的话，请你直接告诉我。”对于地区自治的主要监护人孔帕尼斯主席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他当然希望派遣援兵而不牺牲加泰罗尼亚的自治。于是，他回答道：“我认为，[中央政府]应在加强内务治安专员可动用的兵力方面予以配合。”不过，由于担心如果不交出治安管理权对方将拒绝派遣急需的援兵，因此他又以顺从的语气补充道：“鉴于[社会治安状况]可能继续恶化的危险，共和国政府可以采取它认为必须采取的措施。”

关于这次对话，普列托在下午三点用电传电报与阿萨尼亚进行的交谈中给出了一种



稍微不同的说法。他说，内阁决定让卡瓦列罗向自治政府主席建议，后者应当根据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要求中央政府接管该地区的社会治安。内阁认为这一程序比自治法令所规定的另一种选择“更可取”，即准许中央政府“在其认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或安全处于危险状态时自动参与维持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秩序”。卡瓦列罗在与孔帕尼斯交换意见之后向内阁报告说，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但他得到的印象是，自治政府承认它无力制止动乱”。不过，普列托非常乐观地告诉阿萨尼亚，他相信，在下午四点半内阁开会时，它将同意“在接到或者没有接到自治政府要求的情况下接管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治安”。

两种说法并不矛盾。无论如何，没有证据显示孔帕尼斯对中央政府接管社会治安表示了任何抵制。

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九日当着几名加泰罗尼亚流亡者的面签署的一份书面声明中，阿特米奥·艾瓜德的侄子海梅·安东·艾瓜德说，他的叔叔告诉他，孔帕尼斯主席既没有与他也并没有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商量就把社会治安管理权交给了巴伦西亚当局。他进一步宣称，据他叔叔说，孔帕尼斯请求增援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胡安·科莫雷拉驱使的，科莫雷拉“在那几天片刻不离孔帕尼斯左右为他出谋划策，同时利用主席的沮丧心情提出符合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利益的解决方案”。这份文件断言，建议孔帕尼斯“接受巴伦西亚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就是科莫雷拉。

情况也许是这样的，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孔帕尼斯同意将治安管理权交给巴伦西亚当局时，他得到了包括艾瓜德本人在内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他们的支持虽然勉强但心照不宣，因此，上面提到的这份文件是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在战后出现内部纠纷时企图将加泰罗尼亚失去自治权的责任完全推到孔帕尼斯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身上的一次明显尝试。

尽管孔帕尼斯已经许可，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仍然不愿意采取行动。他还在希望派往巴塞罗那的使者通过斡旋结束流血。但是，他的社会党内竞争对手、海军和空军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想要立即采取行动。作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个决不妥协的对手，据普列托本人说，他从革命一开始就认为，共和国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对于权力的控制。星期二中午十二点，他用电传电报通知阿萨尼亚，他已经命令两艘驱逐舰立即驶往巴塞罗那，舰队指挥官收到了“直接听从阁下调遣”的命令，另外，驻扎在莱里达的空军已经奉命“在巴塞罗那上空低空飞行以显示武力”。

说到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使者在巴塞罗那斡旋成功的可能性，普列托并不乐观。他在下午三点告诉阿萨尼亚，政府首脑倾向于在作出决定之前等待他们的谈判结果。“就我而言，我表示我对谈判结果几乎没有任何信心……因此，如果我们任凭时间流逝并且允许城市被叛乱分子所控制，那么，接管社会治安的任务将会变得更加艰巨。”

晚上九点半，普列托再次用电传电报与阿萨尼亚联系。他告诉总统，（将去转移总统的）“勒班陀”号和“桑切斯·巴尔凯特吉”号驱逐舰已于下午两点离开卡塔赫纳，五个中队的空军士兵将在开赴巴塞罗那途中于凌晨三点到达巴伦西亚。“士兵和水手斗志高昂。”他向阿萨尼亚保证。总统对此回复说：“在这里，在我的住处[加泰罗尼亚议会大厦]，我们仍然没有足够的防御手段。……告诉我，明天由谁负责指挥镇压巴塞罗那的叛乱？”“海军将按照‘勒班陀’号驱逐舰舰长的命令行动，”普列托回答道，“空军将由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中校指挥。……我已经把我的意见告诉你，这件事必须在几小时内予以解决。……显然，我的意见需要服从总理的意见。[空军]与地面部队之间的联系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于地面部队来说，要做的只是为空军指出具体的目标。由于没有防空部队妨碍低空飞行，飞

机将轻而易举地击中目标。至于军舰，它们的任务只是安全顺利地进入港口。”

从议会大厦顺利到达港口是阿萨尼亚主要担心的一件事，虽然正常情况下几分钟之内即可到达那里。自从战事爆发以来，如同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妻子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所说，阿萨尼亚“歇斯底里似地坚决要求”采取措施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但是，只有普列托倾听了他的要求。

“我已经说过，”阿萨尼亚在日记中写道，“总理并不打算直接或者间接与我联系。他也没有把我的情况告诉政府的部长们。星期二上午，普列托用电传电报与我进行了联系。他知道巴塞罗那的骚乱，但是，……由于没有亲眼看到，他不可能充分了解我的处境。他告诉我，他派了两艘驱逐舰开赴巴塞罗那港……供我调遣；二十架飞机将飞往雷乌斯和普拉特；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即将派出两支部队，一千名空军士兵正在飞往雷乌斯。他非常警觉并且准备镇压叛乱。”

星期二全天巴伦西亚政府一直在开会。傍晚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对手提醒他注意他在当天早些时候做出的承诺：如果到今天傍晚局势仍然没有改善，政府将接管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治安和军事事务。整个白天，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巴塞罗那不停地呼吁停火。下午三点，它们通过广播规劝人们：“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们，劳动者总工会的工人们！不要被阴谋诡计所欺骗。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我们只听从一个口号：大家回去为打败法西斯而工作！”尽管它们这样呼吁，国际工人协会驻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总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的代表阿古斯丁·索奇写道，仍然不能遏制战事。“各方的敌意有增无减。”

当内阁在巴伦西亚继续争论不休时，共产党的晚报《红色阵线报》宣称：“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发生的一切归咎于无法控制的有组织的歹徒，他们被委婉地称

为‘不法分子’。现在我们发现，他们完全被控制着；只不过被敌人控制着。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存在。……宽容已经足够了。忍耐是有限度的。当西班牙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危在旦夕时，当西班牙人民的自由以及广大群众的幸福和未来受到威胁时，我们不允许自己被人暗算。……不能再讨论这些问题了。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而且是形势需要的严厉行动。……所有那些企图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扰乱[治安]破坏[纪律]来达到这样或者那样目的的人，将会立即领教公共权力的无情力量，他们将受到政府的镇压和人民群众的惩罚。”

在内阁中，争论呈现出狂热偏激的特点。“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同志带头与支持接管社会治安和防务的共产党人和共和派对抗了四个多小时。”全国劳工联合会方面说，“这是一场激烈的争论，我们在表决以后失败了。”不过，会议决定，会议的决议要到最后关头才能生效，这是蒙特塞尼和卡瓦列罗迫使其对手接受的一个条件，他们相信，正在前往巴塞罗那途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代表可以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晚上九点半，普列托告诉阿萨尼亚，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部长“在投票时弃权，因为他们相信，在知道谈判结果之前将推迟接管社会治安”。

来自巴伦西亚的使者抵达巴塞罗那之后与加泰罗尼亚的领导人一起在自治政府宫呼吁停火。全国劳工联合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强烈要求他那些严阵以待的追随者不要忘记近在咫尺的阿拉贡前线，在那里，“法西斯分子随时可能发动进攻”。

从前的革命罢工、起义暴动和抢劫银行的组织者，如今的司法部长加西亚·奥利韦尔呼吁：“想想那种痛苦吧，想想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皮鞭统治下的那一部分西班牙领土上的反法西斯的工人兄弟听说……我们在[加泰罗尼亚]自相残杀时……所承受的精神痛苦吧。……你们都可以保持你们各自的立场……但是，即使你们受到那些对

找到这场冲突的解决方案不感兴趣的人的挑衅，你们也应当停火。.....[我]宣布，今天死去的突击卫队士兵是我的兄弟。我在他们面前下跪并亲吻他们。.....今天死去的[所有]人都是我的兄弟。”

无政府主义的消息来源证实，一些自由主义者被他们的领导人的停火呼吁激怒了。“当前往自治政府[宫]协商解决方案的我们的代表下令‘停火’时，一些同志义愤填膺，他们感到这是某种形式的背叛，让那些暗杀者[指的是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附近开枪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和突击卫队士兵]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无政府主义领导人中也存在着不同意见。五月事变期间在巴塞罗那活动的国际工人协会副书记赫尔穆特·吕迪格证实：

七月十九日无政府主义的斗士们决定支持合作之后，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究竟应当把权力的缰绳“完全”抓在自己手里还是应当继续合作这个问题又被多次提出来。七月十九日的决定尽管获得一致同意，但那却是出自本能。谁也没有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但是，在五月事变期间，尤其是在巴塞罗那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举行的那些争论激烈的会议上，当各方都能听到来复枪和机关枪震耳欲聋的枪声时，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出来的问题是：“我们应不应当夺取政权？”在那些流血的日子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们用这一句话概括了问题。但是，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所谓的“政权”指的是什么？

让我们首先确定他们指的肯定不是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决不会把国家政权也就是作为管理机构和镇压机器的政府当做实现他们所希望的社会变革的工具。他们也不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应当是建立一个新的法西斯-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超级大国。他们坚信，社会革命既不需要资产阶级政权也不需要新的

极权主义超级大国，因此，社会改革应当像捍卫革命一样由工人阶级的组织——无论是工会还是自发成立的新的机构，例如自下而上地反映了工人自己意愿的自主委员会等等——集中控制，应当建立新型的社会，从而抛弃一切自上而下行使“权力”的常规模式。

但是，由于代表加泰罗尼亚大部分产业工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在五月三日实际上与包括社会其他阶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泰罗尼亚农村的广大群众即农夫 [Rabassaires]，白领工人，技术人员等等）在内的所有组织处于公开敌对状态……“权力”的问题意味着，全国劳工联合会是不是应当立即把它们全部打败，将公共事务的管理权集中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建立自己必备的镇压机器以防止“失败者”在公共生活中卷土重来。回答是“不”，但是，那一段悲惨的日子作出的决定后来在西班牙和国际自由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一连串激烈的争论、诘难和斗争。

星期二晚上九点半左右，停火的呼吁从自治政府宫发出后不久，来自巴伦西亚的使者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成员在孔帕尼斯的主持下开会。“我们提出了由四方代表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全国劳工联合会、劳动者总工会和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 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 [政府] 的方案，曾为历届政府成员的人不得加入该委员会。”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报告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解除艾瓜德和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的职务，因为我们规定，新的内务治安专员应独立 [即个人] 承担管理社会治安的责任。”这个建议被接受了。但是，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建议应立即组成新政府“以使……公众舆论知道冲突已经得到解决”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坚决要求“首先必须停止巷战”。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努力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必须争取时间以避免 [中央] 政府接管社会治安，然而不可能达成共识。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和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虽然没有参加辩论，但他们支持共产党人的观点。最终，在 [五月五日星期三] 凌晨两点，会议作出一项决定后结

束。通过广播宣布的这项决定说……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应当全面停火以使局势恢复正常。……会议结束以后，我们通知[中央]政府，事情进展顺利。”

受到这一消息的鼓励，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天亮前宣布，政府已经通过了“迅速解决巴塞罗那问题的必要法令，但政府相信不必立即使它们生效，并且相信巴塞罗那将在今天恢复秩序”。徒劳的希望！“在当晚剩余的时间里，”孔帕尼斯主席在他的私人笔记中写道，“激烈的战斗继续在街头进行，因此，内务治安[委员会]、[孔帕尼斯的]主席办公室以及[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比迭利亚要求迅速派遣援兵。”

星期三凌晨，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再次努力劝说其追随者平静下来。“我们利用自己的所有影响谋求平衡，不停地派代表去正在发生冲突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努力总是不太受人欢迎。“一些同志打电话给[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委员会时，”阿瓦德·德·桑蒂连回忆说，“我听到他们在电话那头愤怒地叫喊，委员会让他们不要开枪，即使他们正在受到机关枪扫射。”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杜鲁蒂之友会努力保持高昂的斗志并发出一些战斗命令。“革命进攻万岁！决不妥协！”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街垒散发的一份传单宣称，“现在是决定性的时刻。下一次就太晚了。……只有无产阶级政权能够保证军事胜利。全面武装工人阶级。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联合行动万岁。”“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杜鲁蒂之友会印刷的传单则要求，“枪毙罪魁祸首。解除所有军队的武装。……决不放弃街头阵地。革命先于一切。我们向在街头与我们亲如兄弟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同志们致敬。社会革命万岁！打倒反革命！”

第二天，《战斗报》在头版刊登了杜鲁蒂之友会的这份传单并评论说，它“确实特

别重要”，“我们非常高兴地转载了它”。但是，除了这一谨慎的评论之外，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与杜鲁蒂之友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与杜鲁蒂之友会合作的只是那些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而不是党的执委会。“在战斗的第三天，”乔治·埃森魏因写道，“据当时人在巴塞罗那的美国托洛茨基分子雨果·奥勒说，杜鲁蒂之友会派一名代表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部，邀请执委会共同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但是没有达成协议。毋庸置疑，杜鲁蒂之友会与马克思主义党派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合作。然而，据和另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例如‘莫林’（汉斯·弗罗因德）——一起与这个无政府主义团体短期密切合作过的克拉拉和保罗·塔尔曼夫妇说，这种合作充其量不过是互相为对方散发一些政治传单。绝不能认为杜鲁蒂之友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关系是一种正式的联盟。”

虽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没有与其他组织一起通过广播呼吁停火，但它并未公开表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的和平努力与自己无关。的确，《战斗报》曾在五月四日敦促工人保持“一种长期动员的状态”并“继续加强已经发动的攻势”，但是，随后几天的报纸不再重申这一要求，因为，面对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满怀热情反复发出的停火呼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感到无能为力。

“四天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英语新闻快报《西班牙革命》写道，“工人们做好准备，枕戈待旦，只等全国劳工联合会发出发动进攻的命令。命令始终没有发出。……被工人视为革命群众组织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工人夺取政权这个问题面前退缩了。受到政府控制的它企图通过使敌对各方‘一团和气’而脚踩两只船。这就是五月三日至七日革命工人的战斗基本上是防御而不是进攻的原因。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态度并不是没有引起反对和抗议。杜鲁蒂之友会表达了全国劳工联合



会广大会员的共同愿望，但它没能成为榜样。”

美国托洛茨基分子费利克斯·莫罗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据他说，这种激进的语言只是为了“对外宣传的目的”。“通常，”他说，“《西班牙革命》面对的是看不懂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西班牙语报纸的英语读者，它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行为的描述并不真实；它是一副‘左的面孔’。”“[本应身先士卒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没有公开倡议全国劳工联合会共同率领群众采取行动，而是在幕后与其地区委员会商议，从而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无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提出什么建议，它们均遭到拒绝，你不同意？那我们对此就没有什么好说了。第二天上午……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向全国劳工联合会提出的建议，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怯懦行为，关于他们拒绝组织防御，等等，等等，《战斗报》只字不提。”

出于客观性的考虑，有必要在此引用为五月事变期间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所采取的政策进行辩护的“老者”的言论。为了反驳费利克斯·莫罗在他的《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对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指责，“老者”写道：

第四国际的革命浪漫主义者经常说，只要西班牙工人勇敢地开创一条决不妥协的革命路线，他们就不需要苏联的援助了；国际无产阶级将会自发地作出直接的反应，产生不可抗拒的效果，致使政府不敢禁止武器装备流入革命的西班牙。

费利克斯·莫罗在其分析一九三七年巴塞罗那五月事变的著作中提出了这个观点。……据我们这位作者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接受斯大林分子和资产阶级势力的挑战，从而使随后的斗争不仅在西班牙本国引发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而且成为一场世界革命的熊熊烈火的导火索，这场革命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欧洲的主要国

家。也就是说，承担着坚守反法西斯第一道防线这一巨大历史责任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们应当不畏风险，大胆地做出某种冠冕堂皇的历史姿态，鲁莽地投入可能导致反法西斯阵线瓦解的冒险行动，从而为法西斯分子长驱直入敞开大门——而这只是为了立即引发世界革命。……

让我们大家深感震惊的是，由于有人向我们保证欧洲革命在五月事变期间迫在眉睫一触即发，因此，阻止它按照费利克斯·莫罗以及另外一些革命战略家所设想的“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进行只不过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改良分子的堕落。

审视一下这些战略家为了描绘一场势不可挡的欧洲革命指日可待——由于五月事变所提供的历史机遇，这场革命即将爆发，但是，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令人失望地贻误了战机——的幻象所使用的夸夸其谈的逻辑推演步骤非常有趣。

莫罗先生想让我们相信，如果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工人们在五月事变期间坚持抵抗斯大林分子的进攻的话，一场势不可挡的社会革命将席卷整个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

“资产阶级-斯大林分子集团聚集一支无产阶级队伍的尝试只会加快工人政权向整个共和派控制区扩张的速度。”但是，读者会问，共产党人装备精良的警察和军队是干什么的，主要被斯大林分子控制的空军是干什么的，突击卫队、边防警察部队、国民卫队、社会党人控制的大批军队是干什么的，资产阶级的防区是干什么的，被社会党右派普列托控制的海军是干什么的？他们会不战而降吗？最初与革命工人发生冲突的那些部队——其中许多专门为对付革命工人进行过训练——会瓦解吗？另外，绝大多数成员被斯大林分子严格控制的国际纵队会怎么样？

在这场新的内战中，得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部队支持的工人很可能轻而易举地取得

胜利。但这充其量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一场发生在后方的内战显然将使前线的部队士气低落，同时，部队因参加这场新的内战而撤离前线也将为法西斯分子长驱直入敞开大门。……

对形势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不会说……法国和英国的人民群众准备为西班牙而打仗。也不会有人像费利克斯·莫罗那样轻易地同意加泰罗尼亚的革命力量废黜资产阶级政党并且驱逐社会党人和斯大林分子，“法国资产阶级将开放它与西班牙的边境，不是为了进行干涉，而是为了进行贸易以使新政权能够保证物资供应——否则的话，将立即面临国内的革命”。为了充分地正确评价这句话的含义，人们必须记住，法国近半数的无产阶级组织在斯大林分子的控制下，其余的则被社会党人所控制。……面对法西斯军队可能突破防线的极度危险，怎么可能进行一场反对西班牙社会党人和斯大林分子的内战，怎么可能向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法国工人开枪？为了要求[他们]本国资产阶级向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工人提供武器，法国工人甚至到了要下最后通牒的程度。当然，向资产阶级下最后通牒必定遭到（社会党和共产党）工会领导人的疯狂反对，两党工会领导人将会利用他们掌握的一切有效手段诽谤、中伤、歪曲西班牙的革命力量正在进行的这场斗争的性质。

在这场随着五月事变而发生的左派派系之间的争论中，不能把列昂·托洛茨基本人的看法排除在外。“如果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一九三七年五月夺取了政权，”他写道，“它将获得整个西班牙的支持。资产阶级—斯大林分子反动势力将再也不能利用存在两个政权的状况镇压加泰罗尼亚工人了。在佛朗哥占领的那些地区，不仅是工人，而且还有农民都将与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站在一边；他们将孤立法西斯军队并且开始在其内部进行不可抗拒的分化瓦解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政府是否还会冒险向西班牙燃烧的土地上派遣军队值得怀疑。军事干涉将会变得不大可能，至少变得非常危险。”

关于五月事变的争论再多也不会解决对立派别之间的分歧。战斗结束一周后，设在巴黎的第四国际书记处的一份决议宣称：“由于缺乏严肃认真的革命领导，工人被出卖了。”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执委会六月发表声明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导机构甚至没有独立的政策：它怯懦地追随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策并且盲目地重复其失败主义口号。”另外，一名外国托洛茨基分子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为了捍卫七月十九日的胜利成果，被他们的组织出卖、抛弃并被交到斯大林分子恶棍手里的巴塞罗那工人在一九三七年五月进行了最后一次英勇的尝试。……某个革命政党再次拥有了一个共同发动革命运动、促使并且领导它走向胜利的极好机会。然而，当无政府主义领导人从一开始就站在街垒的另一边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参加革命活动只是为了阻止它前进。就这样，它把胜利拱手奉送给斯大林分子刽子手。”

另一方面，在一场同时进行的宣传活动中，共产党人及其国内外支持者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行为的描述不尽相同。战斗刚一结束，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立即宣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托洛茨基分子”煽动了“加泰罗尼亚犯罪分子的暴动”。苏联《真理报》驻巴伦西亚记者的调子听起来相同，他说无政府主义工人“被托洛茨基—法西斯分子奸细欺骗了”；而为自由主义的伦敦《新闻记事报》撰稿的共产党人约翰·兰登—戴维斯则写道：“这不是一场无政府主义暴动。这是一场由‘托洛茨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通过其所控制的‘杜鲁蒂之友会’和自由主义青年联盟发动的未遂暴动。”宣传活动持续数月仍未减弱。一九三七年十月，为《工人日报》撰稿的美国共产党员罗伯特·迈纳把这场战斗描述成“由宁和戈尔金领导的法西斯暴动”；而法国共产党《人道报》的乔治·索里亚则在共产国际的喉舌《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文章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迫切希望尽量保持混乱状态，因为这是[它]从佛朗哥将军那里接到的命令。”他声称，马克思

主义统一工人党企图削弱人民抵抗的力量，以使加泰罗尼亚不能支援当时受到弗朗哥的德国和意大利盟友进攻的巴斯克地区。“它进一步希望可以在国外组织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广泛宣传。那几天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国外的反动报纸和法西斯报纸报道了加泰罗尼亚的‘一片混乱’和‘人民对苏维埃独裁的反抗’。与此同时，萨拉曼卡和萨拉戈萨的叛军广播电台日夜不停地用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一样的措辞发出命令：‘手握来复枪准备好，不惜任何代价决不放弃战斗，与兄弟们在前线并肩作战，把苏联独裁者赶出你们的国家。’”

共产党人对五月事变的解释被大肆宣传，以致天真的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克劳德·鲍尔斯——内战期间他住在法国与弗朗哥占领区交界的昂代——多年以后发表了以下看法：“五月初，共和派政府[对无政府主义者]大动干戈。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由托洛茨基派共产党人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引起了一场危机。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弗朗哥的间谍。在工厂，他们极力主张没收私人财产，而且进行罢工以降低战争中的生产速度。”

德国驻西班牙民族主义政权大使威廉·冯·福佩尔将军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写给阿道夫·希特勒的一份备忘录（内战结束几年之后才公布）被共产党人用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分子”与弗朗哥将军有关系的证据。据福佩尔说，弗朗哥告诉他，自己的一个间谍（他显然企图声称冲突是他挑起的）已经成功地“使三四个人上街开枪”。因为引起战斗的是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人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对电话局的袭击，所以，福佩尔的备忘录是一份没有什么价值的证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精心的伪装》一书的法文版中对它忽略不提。在写给《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一封信中，支持西班牙共产党和胡安·内格林内战期间所奉行路线的赫伯特·R·索思沃思质问道，为什么我避而不谈“这份电报的存在”。英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对

此回答道：“[索斯沃思]如此明显地露出了马脚，以致当他试图重复[斯大林分子散布的]一九三七年五月的巴塞罗那叛乱是佛朗哥分子所煽动的陈腐谎言时，几乎没有人会上当受骗——即使在当时，也只有那些同样认为托洛茨基是德国间谍的人才会相信这一指控；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诽谤中伤实际上是为反对托洛茨基而编造的那一套谎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 第四十三章 五月事变（二）

五月五日，星期三，继续进行的激烈战斗使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早早地来到自治政府宫。“射击在继续。”巴伦西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喉舌《社会熔炉报》写道，“巴塞罗那的街头在流血。我们的后方土崩瓦解的危险一小时一小时地增加着。”

“随着上午时间的推移，”《工人团结报》报道说，“战斗在城市的各个地区继续进行，而且在加泰罗尼亚广场[电话局位于该广场]、克拉丽丝大街、莱埃塔那大街[已更名为杜鲁蒂大街，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与治安总署在这条大街上令人不舒服地紧挨着]全面打响，在自治政府宫和四月十四日林荫大道附近，受伤的人越来越多。……在一些地方，……被认为是奸细的人成群结队，……他们开枪射击并逮捕平民，抢走平民的工会会员证。……这些奸细最恶劣的行为之一……[是从屋顶上狙击路人]以使恐慌在那些基本上平静的地区蔓延。”

来到自治政府宫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坚决主张应当抓紧时间组成新政府。他们意识到，卡瓦列罗与对手的抗衡坚持不了太长时间，因此，如果不能通过调停解决问题，他将被迫采取前一天他同意采取的措施。“上午十一点半会议休会时，我们的努力还没有效果。”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我们再次开会以后，在三小时的时间里，共产党人……坚持认为不应组成[新政府]。得知

中央政府已经决定接管社会治安和防务时，我们[还]在进行商议。……我们明显发现，所有人都以隐而不露的满意心情欢迎中央政府的决定。”

有必要在这里插入一段具有纠偏作用的议论。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指责“所有人都欢迎中央政府”接管加泰罗尼亚地区社会治安的“决定”，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与只是派遣增援部队——就像艾瓜德在战斗开始时所要求的那样——相比，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或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更喜欢这种直接导致加泰罗尼亚失去自治权的极端措施。当然，事实应该是，迫于中央政府的压力和对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恐惧，孔帕尼斯主席宁愿牺牲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也不愿冒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控制该地区的风险，但是，这并不表明他欢迎中央政府的决定。同为事实的还有，根据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胡安·科莫雷拉的好友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战后提供的可靠证言，科莫雷拉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据塞拉·帕米埃斯说，这些领导人“心慌意乱”，“不知所措”并且“认为大势已去”——说，他们应当坚持战斗，直到巴伦西亚的增援部队前来镇压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为止，但是并不确定这位强硬的政客实际上宁愿牺牲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相反，本质上拥护中央集权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并不考虑加泰罗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竭力敦促中央政府接管加泰罗尼亚的社会治安。

当组成一个新政府的谈判仍在自治政府宫进行时，普列托与阿萨尼亚用电传电报进行了下面的交谈：

普列托：十一点召开内阁会议听取加西亚·奥利韦尔[他已返回巴伦西亚]的汇报。无论他可能报告什么情况——我估计他会淡化局势的严重性——我都将捍卫关于社会治安的法令并坚决要求使其生效。……我不认为阁下应当留在那里。……政府迫切希

望您转移到巴伦西亚。

阿萨尼亚：我非常怀疑“勒班陀”号舰长[他受权指挥普列托派去转移总统的两艘驱逐舰]能够到达我这里，因为所有进入港口的通道都被封锁了。飞机仍然没有出现，局势也没有什么变化。枪声彻夜响个不停。已经证实叛乱分子在帕拉莱洛一个被共和国国家卫队占领的电影院前面部署了大炮。……昨天晚上，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人通过广播告诉他们前线的同志，做好准备在他们需要援助时向巴塞罗那进军。……我转移到巴伦西亚的主意不错，但是肯定无法实现。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可能走出我的住处的围栏。到处都有人用机关枪和来复枪射击，手榴弹也在不停地爆炸。自从星期一下午以来，我一直是这种处境。就此我必须告诉你，这个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这是一次无政府主义叛乱，尽管我不必向你指出它的严重后果和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使国家元首不能自由行动从而无法履行他的职责。第一个问题本身就很严重，因此要求尽快作出有力的决定。第二个问题增加了第一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可能产生无法预测的后果。从星期一下午开始，……我一直在等待我有理由期待的情况出现，即，政府集中充分的强制性力量控制局面并将共和国总统从他的困境中解放出来。……所有这些因素促使我通知你，我不能容忍政府在采取决定性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继续拖延。由于共和国总统无法凭借保护他的六十个装备低劣的士兵亲自镇压叛乱，他将不得不亲自解决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你具有的政治智慧和敏感足以意识到，无论是我个人的颜面还是我的职位的尊严，或是这种形势正在全世界引起的流言蜚语，都不能允许国家元首在目前的困境中再待一天。……等会儿我将争取与议会议长[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如果阿萨尼亚辞职他将继任总统]取得联系，由于他担任的重要职务，我认为我应当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向他作一个正式而且准确的描述。

普列托：[我]对失去的时间感到遗憾。我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责是不惜一切代价确



保国家元首的绝对行动自由。至于反叛的部队从前线回来加入叛乱分子的队伍，我保证，除非他们夜间行动，否则他们不可能得逞。……我不认为没有办法使共和国总统获得自由。这只是一个决心问题。我们拥有足够的手段。我劝阁下冷静几个小时。我马上要去参加内阁会议，我将让您知道发生的事情。

阿萨尼亚辞职的威胁对普列托并非没有产生作用，毫无疑问，他立即把它告诉了内阁。显然，它对拉尔戈·卡瓦列罗同样产生了作用，因为普列托回来以后说：“内阁会议开了不到六分钟。……总理说，因为兹事责任重大，不能继续拖延了。他建议，在《[共和国]官方公报》的特刊上颁布昨天通过的法令，然后，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和海军部长采取必要的措施恢复秩序。”

总统似乎对这种安抚性的保证并不满意，因此，他再次向普列托发出了辞职的威胁：“局势正在继续恶化。正如我[对你]说过的那样，‘勒班陀’号的舰长仍然到不了我的住处。……实际上，自从星期一下午以来，共和国总统失去了履行职责需要的自由。由于我已向海军部长[普列托]说明了原因，我只须提醒他请他们注意，以防事态迫使我做出无法改变的决定。政府只有立即采取不可抗拒的行动，才能避免这种情况。”

在内战期间阿萨尼亚所发出的几次辞职威胁中，主要由于普列托的努力而化解的只有这一次，尽管他鄙视总统的胆小怯懦，但仍看重其在宪法层面掩饰革命的作用。这不是普列托第一次见证阿萨尼亚的胆小怯懦。一九三六年十月，当时由于首都受到愈益严重的威胁，总统一直强烈要求政府撤离马德里，他问普列托：“难道政府想让法西斯分子在这儿抓住我？”被阿萨尼亚急于离开的慌乱以及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所激怒，普列托对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说：“那个胆怯的小白脸表现得像个歇斯底里的妓女。”作为共和国公认的最雄辩的演说家之一，普列托还有喜

欢在私下谈话里使用污言秽语的名声。

“普列托非常警觉，严重关切[巴塞罗那发生的事情]。”阿萨尼亚在日记中写道，“他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大了解形势。证据是，就在今天上午他还告诉我，在政府看来，我动身前往巴伦西亚是明智的做法。……‘问题不是我不愿意去巴伦西亚，’我说，‘而是我到不了大街上。’马丁内斯·巴里奥去电报室收看电视电报。他得到了某种印象，以致不等谈话结束便匆忙去见卡瓦列罗。很快他就回来说，政府正在做这做那，而我应当保持镇静。我作了相应的回答，然后不再继续讨论。”

根据普列托与阿萨尼亚晚上八点的电传电报提供的信息，此时拉尔戈·卡瓦列罗显然决定，他不能再承担拖延的后果了：“总理通知我，他会见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他们前来要求他既不要派遣援兵也不要动用军队。”卡瓦列罗明确拒绝接受这些要求并且告诉他的客人，他们应当让他们的同志明白，“认为他们能够战胜政府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将遭到镇压”。

时间已经到了中午，普列托发给阿萨尼亚的电传电报中提到的那次短暂的内阁会议一结束，政府立即向新闻界发表声明，颁布前一天通过的接管加泰罗尼亚社会治安和军事事务的法令，但是仍然没有使其立即生效。共和国国家卫队的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上校被任命为社会治安代表，同时任命我们知道已经投靠了共产党的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担任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军事指挥官，正式职务是第四军区司令，并且指挥在邻近的阿拉贡前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那里占据优势——作战的所谓东路军。这些任命剥夺了加泰罗尼亚防务委员会和内务治安委员会的权力，并与这些权力一道，剥夺了该地区宝贵的自治权。

尽管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指责巴伦西亚当局

没有立即响应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增援的要求并将它的拖延斥为逼迫加泰罗尼亚放弃自治权的“花招”，但是，当时没有任何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提出抗议。实际上，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公告的语气表明，孔帕尼斯主席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其他领导人如释重负地接受了巴伦西亚当局的决定，他们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担忧一时超过了他们对地区自治的忠诚。“共和国政府主动接管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治安。”公告声称，“由于拥有自治政府无法企及的资源优势，共和国政府能够对付目前出现的危急局面。没有时间对此予以置评。如果我们希望为反法西斯战争出力的话，我们可以奉献而且将会奉献的只有与共和国政府合作的忠诚和决心。共和国万岁！……我们强烈要求大家，放下手中的武器，结束街头的混乱。”

当然，像塔拉德利亚斯一样，孔帕尼斯更愿意逐步削弱无政府主义者的权力而不影响加泰罗尼亚自治，可是，一旦战斗爆发并且求援遭到拒绝，他只能毫无异议地同意巴伦西亚当局接管社会治安的决定。尽管他在关于五月事变的笔记中承认迅速着手平息边境地区的战事是中央政府的“任务”，但是仍然对其接管社会治安表示了温和的反对。孔帕尼斯担心自己将在历史面前承担放弃加泰罗尼亚自治权的责任，被随后几个月变成一种梦魇的这一担忧所困扰，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力量瓦解后，他多次试图收回社会治安管理权，但是一直没有成功。

在五月事变之前，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对孔帕尼斯的信任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他的所有言论和行动中，”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只有一种态度，一种与我们差不多完全相同的道德精神目的。几乎没有什么共和派人士如此正确地认识到七月十九日造成的形势，几乎没有人如此清晰有力地表示支持工人控制的新的社会制度。……五月事变突然使他以一种不同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从那时起，我

们开始对主席过去行为的诚意产生怀疑。他是否参与挑起了流血事件？……当我们采取一切手段努力结束兄弟相残的流血时，自从七月的日子以来，我们第一次失去了孔帕尼斯的支持。……假如孔帕尼斯在五月的挑衅以及随后对自治区的入侵中扮演了同谋或者傀儡的角色，他应当向在非常困难的时期支持他的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作出解释。”

根据全国劳工联合会星期二晚上提出的建议，一个临时政府终于在星期三组成了，它包括四名成员：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卡洛斯·马蒂·费塞德，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书记巴莱里奥·马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总书记安东尼奥·塞赛和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的华金·波乌。虽然中央政府接管社会治安自动解决了解除阿特米奥·艾瓜德内务治安专员职务的问题，但是，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继续负责治安总署，直到巴伦西亚当局任命的社会治安代表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到达为止。

新的呼吁立即通过广播从自治政府宫发出了。全国劳工联合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再次恳求工人离开街头。“我们告诉你们，这种局面必须结束。……我们又希望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背这个黑锅。……面对横陈街头的尸体，现在不是讨论谁对谁错的时候。最最重要的是，你们带上武器从街头消失。……我们不要等着别人这样做。我们自己必须这样做。然后我们可以讨论。当我们再次开会讨论我们的行为时，如果你们认定我们应当被枪毙，那么，你们可以向我们开枪，但是，现在你们必须响应我们的号召。”然而，巴斯克斯洪亮的声音说服不了被激怒的普通工人，战斗继续在巴塞罗那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些城镇和乡村激烈进行，例如塔拉戈纳、托尔托萨和新莫拉，在这些地方，作为对首都传来的消息的反应，潜在的敌意公开化。

与此同时，阿拉贡前线的民兵中间出现了恐慌，一些民兵准备立即开赴巴塞罗那。

传来的消息零零星星，而且有时相互矛盾。据一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消息提供者说，第二十九师的军官和政治委员分成了两派，一些人赞成带领部队去巴塞罗那，另一些人赞成向党请示。接着收到消息说，在位于通往巴塞罗那的交通要道上的莱里达，部队已经包围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地方总部。带着一个突击营的部分士兵，师长何塞·罗维拉前往（距莱里达二十六英里的）比内法尔。在那里，他发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第一百二十七混成旅旅长马克西莫·弗朗哥正要率领一百名士兵出发前往巴塞罗那。两人决定一起去莱里达与地方和军队的领导人谈判。谈判达成一个妥协方案：民兵返回前线，围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总部外面的部队撤退。在一段多少有些不同的描述中，胡利安·戈尔金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派使者从巴塞罗那带去了要求民兵返回前线的命令，民兵“以绝对的纪律性”服从了这些命令。在全国劳工联合会方面，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治政府防务副专员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竭尽全力”设法阻止“一大批乘坐汽车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去巴塞罗那。“我们通知[莫利纳]把军区司令的职务和我们的民兵的指挥权交给[刚刚被任命为第四军区司令的]波萨斯将军。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组织的领导人采取任何对抗巴伦西亚当局法令的决定性行动。”（自由主义运动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所作的这种多少有点含糊不清的表态目的显然是把决定向巴伦西亚当局交出控制权的责任推给其他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因为没有客观公正的证据表明，他本人当时反对他们这样做。）至于共产党人对部队离开前线的描述，热情之花说，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两个营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一个营在前往巴塞罗那途中受到担任阿拉贡前线空军部队指挥官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阿方索·雷耶斯的阻止，他威胁说要轰炸“逃兵”，除非他们返回前线。“这几个营的士兵返回了他们的部队，”伊巴露丽证实，“只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人到达巴塞罗那。”

在巴伦西亚，星期三下午早些时候，政府颁布接管加泰罗尼亚军事事务和社会治安的法令几小时后，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发表了下面这篇社论：

在加泰罗尼亚煽动骚乱的那些人不是我们的兄弟。……他们既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社会党人、共产党人或共和派人士，他们不是任何一类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是我们的凶恶敌人。他们是没有理想、没有良心、为侵略者卖命的人。……对于那些被法西斯分子所驱使的人，我们能有什么怜悯？他们企图在后方制造混乱局面，这种局面可能破坏我军的抵抗并帮助外国干涉者。对于杀害我们的工人和士兵、杀害那些以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保护人民的人的刽子手，我们能有什么怜悯？没有，什么怜悯也没有。……

不应当有片刻的犹豫。政府已经接管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治安。……那些挑起[冲突]的人应当承担造成的后果。但是，法令不可能只是一纸空文。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and 无情的力量立即采取行动。在彻底清理加泰罗尼亚的环境之前，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无论跳出来与人民作对的是谁，无论血腥残忍地与敌人勾结的是谁，都应当让他感受一下民意的力量。在加泰罗尼亚完全恢复秩序之前，在所有正直诚实的反法西斯人士为赢得战争并推动人民革命向前发展而重新开始工作和战斗之前，为了不再浪费一天时间，必须采取一切行动，是的，一切行动。

与此同时，在巴塞罗那，战斗继续进行。三起严重的事件促使政治气氛进一步恶化：刚刚代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劳动者总工会出任临时政府成员的安东尼奥·塞赛在前往自治政府宫时遭到枪击遇害。尽管出现各种各样的指控，谁应当对此负责却始终不得而知。“据说有人从[全国劳工联合会]公共娱乐业工会向他开枪，”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宣称，“[但]随后证明，夺去他性命的子弹不是从公共娱乐业工会的楼房里射出的。”共产党人指责说，他是被“为法西斯卖命的

托洛茨基分子挑衅者”暗杀的，而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代言人阿古斯丁·索奇则声称，子弹是“从塞赛自己党内的同志所占据的街垒射出的”。同一天，刚被任命为社会治安代表的埃斯科瓦尔上校在到达巴塞罗那履新时遭到枪击身负重伤。结果，巴伦西亚当局任命阿尔韦托·阿兰多中校为新的社会治安代表。接着，在星期三夜间至星期四凌晨的某个时候，著名的意大利知识分子、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卡米洛·贝尔内里与他的同胞和同事弗朗切斯科·巴尔别里被几个无名刺客谋杀了。

到这时为止，从巴伦西亚抵达巴塞罗那的唯一一支武装力量是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派遣的乘坐“勒班陀”号和“桑切斯·巴尔凯特吉”号驱逐舰前来转移总统的海军部队，但是，他们无法到达加泰罗尼亚议会大厦。根据阿萨尼亚的日记判断，总统因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漠不关心”和“傲慢无礼”而狂躁不安，大发雷霆，并且害怕“不公平地惨死在巴塞罗那”。尽管他在《贝尼卡洛的晚会》中声称，在四天的战事期间，他通过口授最后一部分文稿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但是几乎可以肯定，他生活在被杀死的恐惧中。他知道，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会忘记一九三三年一月卡萨斯·别哈斯村暴动期间对无政府主义农民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因此，尽管指控他作为国防部长曾经给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下达过不要伤员和俘虏，“向他们的腹部开枪”的命令缺乏证据，他仍然由于这一未经证实的指控受到憎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不会忘记，一九三二年他们在略夫雷加特河上游的矿区起义时，据阿萨尼亚本人向议会作证说，他命令指挥第四军区的将军，“从他的部队到达现场开始，十五分钟之内平息[暴乱]”。因此，阿萨尼亚有充分的理由感到焦虑。

五月六日星期四上午，当战斗暂时停止时，“勒班陀”号舰长带着五六名海军士兵出现在议会大厦。阿萨尼亚认为，任何离开的尝试都是蛮干。“普列托不停地催促我利用十分钟的平静去港口。”可是，他的建议似乎对总统不起作用。“普列托脸

上露出了一丝怀疑的微笑。”普列托的好友、后来担任内政部长的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他确信，稍微有点勇气就能成功地实现他的建议，撤退到海上是最佳选择。加泰罗尼亚议会大厦距离港口非常近，乘车四分钟就到了。但是，曼努埃尔先生宁可担惊受怕地度过四天，也不愿意下定决心四分钟。”最终，据阿萨尼亚说，与普列托再次交流之后，“时间更加紧迫了，交谈中他流露出我犹豫不前也许是害怕冒险的想法，我决定离开”。不过，就在他正要离开议会大厦时，阿萨尼亚说，战斗重新开始了，而且“比之前打得更激烈”，迫使他不得不到第二天才动身前往巴伦西亚。

与此同时，从星期三进行的激烈战斗来看，停火建议显然没有得到普通会员的一致同意。“战斗已经进行了三天，”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总部国外信息部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索奇写道，“仍然没有和平的迹象。……下午五点左右，全国劳工联合会地区委员会提出以下建议：‘停止敌对行动。所有党派原地不动。要求警察和与其并肩作战的平民同意休战！’”但是，没有人理睬这些建议。

杜鲁蒂之友会印刷了一份新的传单，其中包括下列要求：“成立革命委员会”、“枪毙那些攻击工人阶级的罪犯”、“解除武装[警察]部队的武装”。从五月事变之后发表在杜鲁蒂之友会的喉舌《人民之友》上的一篇文章看，传单似乎准确地表达了该团体的主要要求。这篇文章批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出版的一本题为《巴塞罗那事件》的小册子“不严肃”，同时指责它关于杜鲁蒂之友会的传单宣称一个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而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应邀加入其中的说法“缺乏资料证据”。不管怎样，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地区委员会将杜鲁蒂之友会斥为奸细，并且宣称它这份传单“令人完全无法容忍而且有悖于自由主义运动的政策。……大家必须响应地区委员会的号召。



现在，自治政府行政委员会已经组成，因为每个人在委员会中都有代表，所以大家必须服从它的决定。必须从街头将所有武器撤走”。

杜鲁蒂之友会立即通过在街垒传递散发一份宣言对这一指责作出回应：“我们早就知道，这些委员会只能妨碍无产阶级向前进。……我们杜鲁蒂之友会有充分的道德理由与那些以无能和怯懦背叛了工人和革命的人断绝关系。……他们的背叛行为极其严重。无产阶级两个最重要的保障——内务治安和防务的控制权——已被轻而易举地交给了敌人。……不是打算迅速勇敢地发动进攻，而是一点一点地把时间和弹药浪费掉。始终缺乏智慧，没有方向。……同志们！保持战斗的状态！不要软弱！社会革命万岁！”

“对困难重重的工人更加可怕的打击是，”前面引述过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托洛茨基分子费利克斯·莫罗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地区委员会向整个新闻界……谴责杜鲁蒂之友会是奸细。……面对这种恶毒的诽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报纸并没有为无政府主义左派进行辩护。”实际上，杜鲁蒂之友会散发的那份热情赞扬了“在街头与我们亲如兄弟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同志们”的传单肯定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感到局促不安，更何况，把事件的全部责任推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身上的谣言到处流传。“我隐隐约约地预感到，”乔治·奥威尔写道，“战斗结束以后全部责任将被栽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头上，它是最弱小的政党，所以是最合适的替罪羊。”

星期三晚上八点半左右，临时政府呼吁加泰罗尼亚全体工人和人民放下武器，“忘记积怨和仇恨”。它还发出了另一些呼吁。“不要听信挑衅者，不要听信想让战斗继续进行下去的托洛茨基分子。”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宣称，“让我们团结在自治政府的周围。”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米格尔·巴尔德斯敦促道：“巴塞罗

那的工人们，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我们一刻也不能再浪费我们的精力了。我们必须消灭托洛茨基犯罪分子，他们还在报纸上继续煽动加泰罗尼亚的反法西斯力量自相残杀。”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工人团结报》负责人哈辛托·托里奥也发出了呼吁。关于“集体疯狂的浪潮”——它正在毁灭革命前十个月的所有成果——以及“国际无产阶级的希望”，他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同志们，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同志们，突击卫队和国家卫队的同志们，这种行为令人难以置信；它是卑鄙的行为，我们大家因为它而感到耻辱。……在巴塞罗那，工人正在自相残杀。……正在使最理智的人变成疯子的这种疯狂状态必须结束。……只要想一想前线近在咫尺。只要想一想万一听说了这场大屠杀，前线可能士气低落。……警察部队的同志们，回到你们的营房吧！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回到你们的工会吧！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同志们，回到你们的中心吧！让和平回来吧！”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敦促工人回去工作的联合呼吁彻夜广播。“必须恢复正常状态。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反法西斯战争时，让目前这种工业停产状态继续下去等于与我们共同的敌人相勾结。”

作为这些呼吁的结果，战斗在五月六日星期四早晨停止了。因其领导人的态度而陷入迷茫，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热情开始低落，许多人放弃了街垒。但是，随着上午时间的推移，战斗再次爆发。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说：

运输工会安排人们回去工作。但是，由于线路遭到破坏，在有轨电车可以开出车站之前先派出了修理车。上午，修理车不得不返回，因为有人向它们射击。……地铁被迫停止运行，因为在一些进站口，共产党的警察和加泰罗尼亚国家党成员拦住了乘

客。.....在一些地方，大量全国总工会的会员证被撕毁。在另一些地方，我们的同志受到攻击。我们的地方工会被包围。.....下午，情况比之前更严重。同志们准备不顾后果自己动手解决问题。[但是]尽管多次受到挑衅.....我们不能盲目地进行最后的决战。[显然]我们已经帮助了敌人。他们希望我们走上街头；他们希望[中央]政府接管社会治安。.....我们非常了解那些同志的悲剧，他们受到挑衅，走投无路；他们眼看着自己的同志和朋友倒下。不过，最重要的是，必须防止七月十九日以来西班牙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全部奋斗突然化为乌有。

感到继续抵抗不起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指示其追随者离开街垒并且尽可能乐观地描述了形势。“考虑到反革命阴谋实际上已经被挫败，”五月六日星期四上午，党的执委会在《战斗报》上发表的一份声明宣称，“工人应当撤出战斗并在今天回去工作，没有失败，没有惩罚，继续为尽快打败法西斯积极地劳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命令它的武装民兵撤离街垒，撤出街头，恢复工作，但要保持警惕性。”《战斗报》同时宣称，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局部胜利。.....它粉碎了反革命的挑衅。它使那些对挑衅负有直接责任的人被撤职。它给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如果在加泰罗尼亚占据支配地位的工人阶级组织的领导人像工人一样善于对付困难的局面，它能达到更多的目的，非常多。根据他们的领导人反复发出的命令，群众已经开始撤出战斗，从而显示出服从纪律的伟大精神。不过，无产阶级应当保持警惕性。它应当加强警戒，荷枪实弹。它应当监视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的活动，准备挫败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在战斗结束之后的五月十三日，《战斗报》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的一项长篇决议，摘要如下：“由于在街头战斗的工人没有具体的目标和可以信赖的领导人，为了避免一场可能蜕变为‘暴动’的铤而走险并且防止无产阶级最先进的部分成员全体陷入灭顶之灾，.....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除了组织并且指挥一次战略退却之外别无选

择。‘五月的日子’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当前问题唯一先进的解决办法在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因此，必须通过联合一切准备为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而战的组织组成一个革命工人阵线协调工人群众的革命行动。只有通过前线的军事胜利和后方的革命胜利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委员会认为党在事变期间采取的对策十分正确，因此，中央委员会完全赞同执委会的路线，相信它维护了革命和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

五月六日星期四晚上，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已经到达巴塞罗那以南一百九十里处的托尔托萨郊外的消息传到了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前一天到达协助结束战事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卫生部长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和全国劳工联合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两人急忙赶到自治政府宫与巴伦西亚联系。他们不无理由地担心，开赴巴塞罗那途中的突击卫队可能在其所经过的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社区引起反抗。恳求巴斯克斯和蒙特塞尼为突击卫队顺利通过加泰罗尼亚打通道路并在援兵到达之前使充满火药味的巴塞罗那恢复和平的任务落在了此时回到巴伦西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司法部长加西亚·奥利韦尔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身上。通过电传电报为结束战事而进行的这次秘密磋商成为孔帕尼斯关于五月事变的笔记和文件的一部分，下面复录了其中的主要内容：

[加西亚·奥利韦尔]：这里是巴伦西亚，内政部长。卫生部长在吗？

[蒙特塞尼]：我在。……听着，加西亚，马里亚诺要跟你说话，然后我们应当与加拉尔萨谈一谈。……

[巴斯克斯]：今天上午形势看来似乎很快就会好转。……中午，由于警察准备进攻工会所在的建筑，形势开始恶化了。……实际上，阿兰多[新的社会治安代表，代替受

伤的埃斯科瓦尔]留用警察署长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对形势产生了某种决定性的影响。后者仍然指挥警察，因此肯定命令他们采取他们一直采取的立场。在许多地方，撕毁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员证是有计划地进行的。……担任埃罗莱斯[治安总署工作人员中的无政府主义负责人迪奥尼西奥·埃罗莱斯]警卫员的五名同志被人从家里带走之后遇害了。由于发生的这些事情以及一些类似的事情，同志们采取了保护自己的措施。当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到达托尔托萨的消息传来时，气氛变得更加紧张。现在不可能预见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警察及其上司不改变立场，那就无法避免在他们必须经过的村庄和迄今为止还没有出事的地方爆发冲突。

[加西亚·奥利韦尔]：我是加西亚·奥利韦尔。……内政部长已经下令立即将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撤职。他准备以尽可能公正的方式消除加泰罗尼亚的紧张局势。当务之急是，正在赶赴巴塞罗那的突击卫队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以接替被冲突弄得非常疲劳、紧张和冲动的警察。……你们必须理解这一点并且向委员会和同志们解释清楚。当务之急还有，你们要让同志们和部队经过的村庄明白，这些安定局势的中立部队——绝对中立——必须通过。政府知道，除非严守这种中立，否则的话，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冲突还将愈演愈烈，并将蔓延到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以及西班牙的其他地方，最终将导致政府在政治和军事上彻底失败。……内政部长[正在考虑]用其他方式而不通过道路调遣这些部队的可行办法，前往巴塞罗那的路途太远而且充满了各种[潜在的]障碍，以致途中可能遍布想让巴塞罗那的紧张局势延续下去从而造成政府垮台的挑衅者。由于现在政府已经接管了社会治安，我重申，明智的做法是，你们立即指示各个村庄的同志们不要在这些安定局势的部队所经过的道路上设置任何障碍。相反，他们应当为部队提供各种帮助并且对其表示欢迎，因为否则的话，存在着危险是……如果在途中受到攻击，他们将会被激怒，结果，我们只是成功地将加泰罗尼亚的问题变成了一场全国性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我们都将不可避免地迅速

毁灭。最重要的是，立即关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分离主义者[指的是加泰罗尼亚国家党]拥有众多支持者的塔拉戈纳省，目的是防止他们与[我们的]同志搅在一起，煽动后者武装抵抗治安部队。……

[巴斯克斯]：[虽然我们不知道]突击卫队接替巴塞罗那警察有不可否认的好处，但是我们应当承认，此间的问题并不需要警察介入。情况非常简单，只要他们接到返回营房的命令，几小时就能完全恢复正常状态。当务之急是，警察不要发动进攻，在三四个小时内不要采取任何行动。这期间足以恢复双方的信任，然后，街垒将被拆除，警察将撤离他们占领的建筑物和地方。……

[加拉尔萨]：我是内政部长。我在下午七点半得知，警察署长罗德里格斯·萨拉斯仍在指挥，我[对阿兰多]作出以下声明，我面前是根据录音记录的声明副本：“兹应立即任命一名治安部门的负责人担任警察署长，此人应为正规警察部队的成员，一个你更加信任的人；同时，工会和党派的代表应当停止干预社会治安。” [阿兰多]回复如下：“我完全同意并将立即执行您的命令。”……[关于]你们需要的[恢复信任的]时间，我不反对作如下安排：晚上十点，警察将接到一枪不发和不得进攻任何建筑物的命令。只有必要的警戒部队留在街上，但在三小时内不搜缴武器也不抓人。你们将负责监督你们的人在此期间从街上和[他们所在的]地方撤回家，而且也要一枪不发。我将发出这些命令，显然，你们清楚，如果双方不能忠实地执行这些命令，什么目的也不会达到。总理正在叫我。等我一会儿。……[这里]是加西亚·奥利韦尔。……

[蒙特塞尼]：加西亚，我们可以接受加拉尔萨所说的方案，条件是，休战定于明天上午六点至九点，以便使我们有时间组织一场巴塞罗那全市人民参加的群众和平示威游行，各个组织的代表举着他们连在一起的横幅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我们应当

向劳动者总工会提出这个建议，他们一定会接受。……

[加拉尔萨]：关于那三个小时……我不反对把它们定在上午六点至九点之间。至于举行和平示威，假如没有挑衅者的话，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不过，我担心这些挑衅分子可能利用普遍存在的紧张状态，示威可能开头不错结果糟糕。也许在星期天而不是明天[星期五]举行示威更好，两个工会组织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宣布它。我会命令警察夜间警戒务必小心谨慎。我保证，明天上午九点以后，一支由一个我绝对信任的人[这指的是埃米利奥·托雷斯·伊格莱西亚斯中校，他被任命为巴塞罗那警察部队指挥官]所指挥的温和宽容的新的部队将在那里。

[蒙特塞尼]：那好吧，加拉尔萨。……休战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救赎，但要记住，如果仍由同样的人负责社会治安的话，我不知道你的命令会被执行到什么程度。……

[加拉尔萨]：明天，其他官员将在那里。……但是你们绝对不要把这告诉别人，以免有人想重演埃斯科瓦尔事件。告诉你们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应当在午夜之后尽快回家，如果像我希望的那样没什么妨碍他们的话，其他人也都应当这样做，这样一来，明天就不必为此浪费三个小时了。这样试试非常容易。不过，这意味着我将承担重大的责任，因此，我不仅希望能够依仗你们的帮助，而且希望你们明白，这是我可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的最后尝试。不要对外宣布这些协议，只能以书面形式把它们告诉你们信任的人，并且签上你们的名字。你们觉得这样行吗？

[蒙特塞尼]：尽管我们因为夜间行动以及确定[我们的]人员的具体方位有困难而不能作出任何保证，但是，我们会在晚上尽量试一试。……马里亚诺让我告诉你，我们应当商定上午六点至九点，因为这将给我们工作的时间以使事情更容易进行。

根据他们与加拉尔萨达成的协议，巴斯克斯和蒙特塞尼兴奋地为安排休战彻夜工

作。“我们把达成的协议通知了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报告说，“并且指示同志们准备在早晨六点撤退。”同时，向位于通往巴塞罗那主要道路上的村镇发出了不设障碍允许突击卫队通过的指示。在星期二突然爆发战斗的托尔托萨，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地方组织接到了对突击卫队不作任何抵抗的指示。“我们的同志依照执行，”《工人团结报》写道，“从而显示了他们的纪律性以及

以及对组织的指示的尊重。”

在巴塞罗那，五月七日星期五天亮之前几个小时，有迹象表明，革命者的热情终于耗尽。继续与其领导人的意志抗争将徒劳无益的感觉压倒了他们，普遍存在幻灭感。许多人撤离街垒消失在黑暗中。黎明时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地方委员会联合发出呼吁：“同志们，大家回去工作吧！”

当天傍晚，来自巴伦西亚的突击卫队在一支由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派出的边防警察部队伴随下进入这座城市，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下午七点刚过，第一辆载有突击卫队和治安警察部队士兵的汽车驶进市区，”《工人团结报》报道说，“接着，一刻钟之后，大批部队到达，沿着对角线大道进入巴塞罗那。在开往内务治安委员会途中，他们经过了格拉西亚大道，加泰罗尼亚广场，环形大道，杜鲁蒂大街和哥伦布大道。当他们列队通过大街时，加泰罗尼亚人以极大的热情和表示支持的示威活动欢迎他们，士兵们举起拳头对此示意。”装备着最新式武器的增援部队从陆地和海上陆续抵达，几天之内，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援兵数量估计有一万两千人。

现在，在加泰罗尼亚这个西班牙自由主义运动的堡垒，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优势被打破了。几个月前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全盛时期似乎不可想象的情况如今已经成为现实，共产党人取得了革命爆发以来最重大的胜利。

#### 第四十四章 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



在加泰罗尼亚直接达到目的之后，共产党人立即使他们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斗争激烈起来。利用五月事变，他们要求政府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他们认为后者应当对流血负责，长期以来他们将其领导人斥为托洛茨基分子，是一伙为国际法西斯主义效劳的间谍和奸细。

此时应当问一下，共产党人本身是否相信自己的宣传，或者他们只是顺从地遵照莫斯科的指示行事。一九七四年，当时担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的圣地亚哥·卡里略接受了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的采访，在这次采访中，卡里略从某种意义上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九三五年]去苏联之前，我从来没有把托洛茨基分子当作我们可能的敌人。……尽管实际上我并不认为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分子是法西斯分子的代理人，但我接受了以前我不承认的事情。后来发生了有那么多供述、交代了那么多罪行的……莫斯科审判。我必须说，当时我相信那些供述都是真的。我不可能想到它们是逼供出来的。我始终认为革命者在面对警察时应坚贞不屈。我无法想象决定这些供述的意识形态因素：非常荒谬地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承认自己是党和革命的敌人——即使这不是真的——为党和革命做出贡献。因此，我相信那些人是反革命分子，敌人的间谍。”

五月的战斗刚一结束，西班牙共产党就动用一切宣传手段疯狂地开始进行鼓动，以迫使别人接受它的意志。

何塞·迪亚斯在五月九日的一次公众集会上宣称：

我们的首要敌人是法西斯分子。不过，法西斯分子有为其效力的代理人。当然，如果这些代理人说“我们是法西斯分子，我们想在你们中间活动以便给你们制造困难”，他们立即就会被我们消灭。因此，他们必须改头换面。……有些代理人自称托洛茨基分子，许多乔装打扮的法西斯分子使用这个名字，他们为了造成混乱而谈论

革命。因此我要问，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如果政府也知道这一点，那它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法西斯分子那样对待他们，无情地将他们消灭呢？

每个工人必须知道，苏联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审判。……亲自指挥这个犯罪集团制造苏联的火车出轨，在大型工厂搞破坏，千方百计刺探军事秘密以便泄露给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正是托洛茨基本人。另外，鉴于这一切在审判期间被揭露出来而且托洛茨基分子声称他们是在托洛茨基的指挥下与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合谋干的这些事情的事实，我必须质问的是：托洛茨基分子并不像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共和派那样是一个具有明确倾向的政治或者社会组织，而是一伙为国际法西斯主义效劳的间谍和奸细，难道这不是很清楚吗？必须清除这些托洛茨基分子奸细！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最近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不仅应当在西班牙取缔这个组织并且查封它的报纸，而且应当在所有文明国家把托洛茨基主义消灭干净，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想摆脱这个害虫的话。……

在西班牙国内，煽动加泰罗尼亚罪恶暴动的不正是托洛茨基分子吗？五月一日的《战斗报》充满了厚颜无耻地煽动叛乱的言论。……嘿，这份报纸仍在加泰罗尼亚继续出版。……为什么？因为政府无法像所有反法西斯人士要求的那样下定决心查封它。

在内战爆发十个月后，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政策使后方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前线需要的话，我将不得不断定，而且我确信，每一个反法西斯人士也将不得不断定，如果本届政府不强行维持后方的秩序，那么，另一个人民阵线政府就必须这样做。

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前进报》迅速回击，毫不含糊。它断言，共产国际西班牙

支部所鼓吹的强制措施显示出一种对于工人阶级团结的威胁。“这些措施将使那些正在劝说受无政府主义宣传影响的工人参与政府工作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产生最可怕的幻灭感。人民阵线政府采取强制行动——希尔·罗夫莱斯或勒鲁支持采取这种行动——将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它最终可能使那些坚决放弃过去那种不问政治的生活方式的人退回到他们的老路上去。如果不幸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将会输掉战争，革命也将遭到失败，因为，在工人阶级中有一半人反对我们的情况下，既不可能赢得战争，也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成功。”

为了制订“一条共同行动路线”，西班牙共产党——我们应当记得，最近它与社会党领导层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暗中与社会党执委会秘密协商。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证实：“两党一致认为政治形势严峻，因此，必须为一触即发的危机找到一种解决办法。”毫无疑问，共和派参与了这些秘密协商。在普列托的帮助下于五月七日乘飞机撤离巴塞罗那的阿萨尼亚总统说，同一天在巴伦西亚，前总理、左翼共和派领导人何塞·希拉尔代表共和派来看望他：“他告诉我，共和派与社会党和共产党人决定在下一次内阁会议上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作斗争。……希拉尔还说，共和派与社会党和共产党人组成了一个推进一项解决方案的集团。……尽管[他]没有作任何进一步的解释，我知道，三个党派之间的会谈进展顺利。他告诉我，在下次内阁会议上，共产党人将通过要求改变政策首先发难，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将从政府辞职。社会党人和共和派将会支持他们的要求。”

当天早些时候，拉尔戈·卡瓦列罗前来看望总统。尽管阿萨尼亚仍然因总理对他在巴塞罗那的困境“漠不关心”而愤怒，但他决定不提此事。“[卡瓦列罗]来到时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带着一个公事包。”阿萨尼亚叙述说，“他对巴塞罗那只字不提。……他开始谈话，仿佛我们天天见面，也仿佛我刚刚愉快地旅行归来。……我非常认真地考虑过第一次与他会见时我应当怎么做。我当然很想让他解释一下他的行

为。但经再三考虑之后，我忍住不去这样做而是[决定]，只要他不说这件事，我也什么都不说。我确信，如果我提出这个问题的话，事情将变得非常复杂，使得他作为总理脱不了干系。因此我决定……不以一个片面的结论导致他被解除职务，特别是因为这可能被认为是在宣泄私愤，尽管我的愤怒有正当的理由。我保持了沉默。”

于是，当五月七日和八日来看望他的共和派、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人表达他们联合反对政府的立场时，阿萨尼亚——正如雷蒙德·卡尔正确指出的那样，“自从一九三六年七月以来”，他的宪法地位让他“第一次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并得到一个报复的机会”——谨慎地没有公开站在争执双方的任何一边。“我听了他们所有人的意见，”他写道，“但是尽量不向他们透露我对政府行为的看法。另一方面，我当然不能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首先，我对他们说，我认为他们来看我具有通报情况的性质，但是，我绝不允许他们作出我同意他们向政府发动攻势的推断。”他提醒他们，一九三六年九月希拉尔内阁不顾他的劝告提出辞职为卡瓦列罗政府让路“被誉为政府的胜利”，“十一月份涉及全国劳工联合会和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共和派认为这不可避免，有利无害——的内阁改组不仅违背我的建议，而且是在我最愤怒地表示抗议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几个月后，”他接着说，“正是这些把拉尔戈抬举起来并且允许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加入政府]的人对他们忍无可忍了。”因此开始回过头来找他解决问题。他没有制造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神话”。如果现在认为政策必须有所改变，那是因为这些党派改变了看法，“不是因为共和国总统改变了看法，他的看法没有改变”。

几天后，五月十三日，所有任命和级别没有得到拉尔戈·卡瓦列罗确认的政治委员可以认为自己已被逐出政治委员队伍的最后期限到期的前两天，在一次狂风暴雨般的内阁会议上，两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和比森特·乌里韦要求立即改变总理在军事和社会治安方面的政策。他们还以没有妥协余地的言辞要求取缔马克

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希拉尔和普列托那里得知会议情况的阿萨尼亚证实，这次会议的特点是“罕见的激烈和野蛮。……拉尔戈·卡瓦列罗大呼共产党人是‘骗子和诽谤者’，六个小时就这样被耗掉了。社会党[温和派]通过内格林支持共产党人的意见，共和派也发了言”。

在与共产党人唇枪舌剑的过程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一个法西斯组织的看法，并且宣称他不会取缔这个政党。他还说，他加入政府不是为了服务于在政府中拥有代表的任何派别的政治利益，而某个具体的组织是否应当被取缔将由法院来决定。在其未发表的回忆录《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写道，他“竭尽全力”反对取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并且“宣称，只要由他领导政府，任何政党或者工会组织都不会被取缔；如果发生了犯罪行为，法院将会进行审理；他不打算在政治上帮任何人的忙”。由于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两名共产党人内阁部长起身离开了会议室。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写道：“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叛乱使我们有了……一个制造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危机的借口。”

“当内阁发生分裂时，”内战结束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证实，“拉尔戈·卡瓦列罗打算继续处理例行事务。我坐在他的旁边……说：‘喂，卡瓦列罗，事情有些严重了。由于政府中的一个政党退出了政府，内阁的联盟已经破裂。因此，我认为你的责任是，不要继续开会了，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共和国总统并与他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普列托的意见让拉尔戈·卡瓦列罗感到意外，他认为无论如何内阁可以继续讨论，”本身是一名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并在继任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的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普列托发表的完全符合宪法的意见[后来]受到谴责，被认为是

共产党人发起的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阴谋活动的一部分。”

直到内战结束几年后，与卡瓦列罗重归于好的普列托才公开否认了说他与共产党人秘密达成协议的指责。“迄今为止，”他声称，“我不屑于反驳我与共产党人进行交易以便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错误判断。除了自一九二一年我党不幸第一次分裂以来支配我对他们的行为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使我与他们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之外，由于我的道德倾向，我只能对一个同志和朋友以诚相待，作为总理，这个同志和朋友当时承担着那么微妙复杂的工作。”另一方面，使政府突然陷入危机的两名共产党人内阁部长之一的比森特·乌里韦在流亡期间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宣称：“普列托参与了罢免卡瓦列罗政府首脑职务的计划，尽管他本人没有公开透露。……[他]想报复拉尔戈·卡瓦列罗，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他不能原谅一九三六年五月卡瓦列罗使他想当政府首脑的抱负落了空。”此外，普列托以前的支持者、治安总署署长加夫列尔·莫隆也说，普列托同意共产党人“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不过，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党实际上的首脑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提供的。他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提交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说：“温和派与普列托一起在策划和解决危机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管怎样，普列托所发表的共产党人政府部长的退出已使内阁联盟破裂的看法是推动事态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卡瓦列罗决定中止内阁会议并向总统递交了辞呈。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据阿萨尼亚说，卡瓦列罗也许并不打算辞职，他“只是”希望总统“授权他撤换两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阿萨尼亚回忆说：“卡瓦列罗向我强调，由于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危机出现的不是时候，因此，应当让政府继续行使职能，以便实施非常重要的计划……停止实施这些计划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第一项计划是卡瓦列罗的国防部副部长卡洛斯·德·巴赖瓦尔设想出来的，他打算在西属摩洛哥煽动一场反佛朗哥将军的叛乱，阿萨尼亚认为这项计划是一种“轻率的冒

险”而拒绝考虑。第二项计划是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这项计划最初是由巴赖瓦尔的前任何塞·阿森西奥将军和前国防部总参谋长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制订的，我们应当记得，这两位将军都是迫于共产党人的压力去职的。“拉尔戈告诉我，”阿萨尼亚写道，“为了防止军官中的敌对分子坏事，他正在考虑去埃斯特雷马杜拉亲自指挥这一行动。我认为，其实他什么也不会指挥，实际上他只是签署总参谋部提交的命令。毫无疑问，他对这项计划信心十足，他肯定希望通过这一计划取得他的谋士所阐述的军事优势以及作为获胜的军事行动的指挥者在公众心目中所产生的政治优势和个人优势。”

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者声称，如果不是共产党人及其苏联顾问反对的话，这一行动可能成为内战的转折点。“它的目的是要切断叛军与南方的交通线，”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好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写道，“利用这条交通线，叛军得到意大利和摩洛哥军队的稳定增援。通过把敌军分割成为互不关联的两部分并使其失去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港口进入的外国军队和战争物资的支援，这一行动的成功可以彻底改变战争的进程。北部地区[即佛朗哥将军正在全力进攻的巴斯克各省]将得到解救；整个安达卢西亚地区将被收复。战争可能就打赢了。……无论如何佛朗哥不会赢得这么迅速、这么利落，至少会有充分的时间和有利的条件进行外交和平谈判。”

据民族主义军事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说，计划采取的这一行动由恩里克·胡拉多中校任总指挥，总共投入十万兵力，是迄今为止调动兵力最多的一次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他说，民族主义者可以投入战斗的兵力共有：六个营，三个摩洛哥士兵塔博尔营，十八个长枪党百人队，十个骑兵中队，五个炮兵连和七个机枪连。仅有的后备部队是一个意大利—西班牙蓝箭混成旅。鉴于兵力如此悬殊，他评论说，至少在开始阶段，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将会取得巨大的成功。不过，人们对共

和派能否赢得一场影响深远的胜利半信半疑，因为众所周知人民军缺乏进攻能力。“尽管如此，这肯定是尝试一下的好机会。民族主义者的空军部队……几乎全都在北方，距离选定进攻的地区几百公里。后备部队不是根本不存在，就是也在巴斯克各省。……因此，[共和派军队]最初的压倒性优势能够保持好几天——足以使[他们]到达巴达霍斯和西葡边境。无论[民族主义者]调动后备部队需要多长时间，政府军将确保拥有大炮、坦克和人员的绝对优势以及适度的制空权。”他最后说，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可能达到的明确目标：切断敌军大批地面部队与其安达卢西亚和非洲基地的联系，从而将凯波·德·利亚诺将军的部队置于一种“无以立足的境地”。至少可以保证使民族主义军队在北方的攻势陷于“瘫痪”。

定于五月初发动的攻势被米亚哈将军以各种借口一拖再拖。支持他的拖延战术的是西班牙共产党人及其苏联盟友，他们担心，一次可能成功的军事行动也许会推迟实现目前进展顺利的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计划。

米亚哈从一开始就反对发动计划采取的攻势，当接到从马德里派一些部队去埃斯特雷马杜拉防区的命令时，最初他拒绝执行。“在共产党人的怂恿下，他拒绝服从命令，”阿拉基斯塔因证实，“当时他们才是米亚哈的真正上司。……最终，面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强硬态度，他不得不放弃抵制，派出了要求调动的部队。”

然而，这不意味着共产党人不再反对发动这场攻势。国防部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证实：“[米亚哈]知道，接到命令后他必须立即着手将他指挥的部队调往指定的位置。但是，同一天下午，一位将军、一位‘友好的苏联顾问’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空军无法参加进攻[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的]梅里达的行动，因为其他战线需要它。在过去的几天我意识到，共产党人可能正在试图阻止这一行动，因此，听了这位‘友好顾问’的话之后，我确信，它不可能实施了。”



备受尊重的军事历史学家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写道：“为什么这一行动没有实施，人们列举了许多原因。奇怪的是，各种说法一般来讲与事实相符。实际上，计划对梅里达发动的攻势首先受到米亚哈将军的阻挠，然后受到苏联空军指挥部的阻挠。我查阅的文献资料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据拉尔戈·卡瓦列罗说，苏联人最初同意这个计划：“[他们]提出了率领参加这次行动的部队的各旅旅长名单，全部都是共产党员。但是，总参谋部和我已经任命了担任这些职务的人。……我下了命令，大意是要求实际上的空军司令[化名‘道格拉斯’的苏联将军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提供一份可以派出的飞机数量的备忘录。他回答说，我们能够指望他派出十架飞机。为一场投入四万兵力的攻势派十架飞机！我认为这是对没有任命共产党员担任指挥官的报复。总是看到共产党员被安排在可以得到一切荣誉的位置上，而其他的人却被安排在只能吃到敌人子弹的位置上，我们简直烦透了。”

接到莫斯科发来的反对“阿森西奥计划”的指示后，苏联军事顾问Γ·库利克将军在他的指挥部里召开会议。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在这次会议上，他个人坚决主张同意发动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因而受到共产国际代表陶里亚蒂的训斥。尽管他也证实，当苏联人于五月初通知拉尔戈·卡瓦列罗他们不会向其提供所需要的飞机时，卡瓦列罗“最终丧失”了发动攻势的决心，但是，从两周之后卡瓦列罗与阿萨尼亚进行的递交辞呈的那次会见来看，他显然仍旧希望实施这一计划。部分由于阿萨尼亚觉得给人留下急于接受拉尔戈·卡瓦列罗辞职的印象不够明智，部分由于总理认为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是一个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阿萨尼亚对总理说，自己将用晚上的时间考虑他辞职的事，明天（五月十四日）上午会把决定告诉他。

第二天，共和联盟领导人马丁内斯·巴里奥看望了总统。“[他]告诉我，”阿萨尼亚

叙述说，“他认为，如果卡瓦列罗被赶下台，由于工会可能采取的态度，这场危机很危险。……总之，他赞成缓和危机，因为它可能突然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除了某些工会和无政府主义者扰乱社会秩序的危险之外，我完全没有这些担忧。人们认为拉尔戈在劳动者总工会中的影响力比他实际具有的大得多。而且人们一般已经厌倦了滥用权力和昏庸无能。不管怎样，我决定不让拉尔戈及其支持者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印象：我个人认为他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或者说，他不可避免的垮台和被取代不是因为总统的愤怒就是因为总统对无产阶级的偏见。这一点令人感兴趣，因为卡瓦列罗曾在三四月份对我说，他预见，‘工人将像一九三三年那样再次被剥夺权力’。最重要的是，为了公众利益，作为众所周知遭到另一些人[共产党人]反对的结果，对于那些可能感到自己将被‘剥夺’权力的人，应当剥夺他们的权力，因为贴着同样的标签，另一些人也可以自称代表工人。”在“仔细权衡了利弊”并且断定“果实尚未熟透”之后，阿萨尼亚告诉卡瓦列罗，他认为，危机应当推迟几天再解决，因为总理“提出了事关国家利益的理由”，他不想妨碍他发动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如果[卡瓦列罗]愿意向共产党人解释一下推迟解决危机的理由，”阿萨尼亚接着说，“说服他们重新加入政府不会很难。万一埃斯特雷马杜拉取得成功……局面将会明显好转，他将掌握一个用以驳斥其批评者的决定性论点。他立即表示同意。”

拉尔戈·卡瓦列罗提供了一种稍微有点不同的说法：“[总统]建议，我应当收回辞呈，着手部署所计划的行动。如果这一行动的结果不错，政治局面将会改善。然后我们将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我不同意总统的建议，因为我确信，针对政府施展的阴谋诡计甚嚣尘上，任何拖延都不起作用。他固执己见，跟我谈到牺牲和其他事情，结果，我勉强同意收回辞呈。”

让阿萨尼亚感到意外的是，卡瓦列罗并没有设法使共产党人返回政府或者把推迟解

决危机的决定通知他们。“[拉尔戈·卡瓦列罗]肯定认为他的疏忽……非常高明。”阿萨尼亚写道，“但是，恰恰因为这一疏忽，他在社会党内的对手走上前台逼迫他采取行动，不许他用推迟解决作为逃避的手段。”阿萨尼亚没有说明他们怎么知道了他与卡瓦列罗达成的协议，不过，阿拉基斯塔因认为，“可能是通过阿萨尼亚本人，他习惯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保持经常的联系”。

“那天下午，当拉莫内达[社会党执委会书记]、内格林和德·格拉西亚[三位社会党温和派政府部长中的两位]出现在我的国防部长办公室里时，我们正准备动身[前往埃斯特雷马杜拉]。”卡瓦列罗回忆说，“普列托没有去；他躲在幕后。他们通知我，鉴于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已经辞职，由党的执委会提名的三名社会党人政府部长决定辞职。我回应说，他们与共产党人保持一致让人感到难以理解。……内格林回答道，这是执委会的决定，他们不得不表示尊重。”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召开的一次社会党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普列托派社会党人赫罗尼莫·布赫达证实，社会党执委会认为，在共产党人收回了他们的合作后，社会党人不可能继续留在政府。

“阴谋诡计昭然若揭。”阿拉基斯塔因写道，“为了推翻卡瓦列罗，[普列托]派核心的三名政府部长与共产党人串通一气。必须阻止卡瓦列罗发动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以免事实证明它成功了。普列托派的社会党议员胡安—西梅翁·比达特用下面这种坦白然而无耻的语言表达了这一观点：‘万一卡瓦列罗在这次攻势中取得成功，那就没有人能把他逐出政府了’”内战结束多年以后，比达特在回忆录中没有反驳这一指责，但他确实说了下面这段关于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的话：“我与普列托谈到阿森西奥计划。他对我说，整个事情子虚乌有，只是阿森西奥和卡瓦列罗所抱有的一种幻想。米亚哈明确表示，提供八到十个师将使马德里陷入严重危险的境地。

作为空军部长，普列托顶多只能提供八到十架飞机。这一行动.....不现实。”

正是因为社会党温和派政府部长的辞职，对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暗中与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串通一气的怀疑才变得不容置疑了。考虑到普列托对社会党执委会主席冈萨雷斯·培尼亚以及其他坚定支持者仍然具有的影响力，如果他愿意的话，就可以避免社会党温和派政府部长提出辞职。此外，人们不会忘记，在内战爆发之前，按照普列托的吩咐，拉莫内达曾经采用巧妙的策略将卡瓦列罗从社会党执委会中驱逐出去。

得知社会党温和派政府部长辞职之后，拉尔戈·卡瓦列罗拜访了阿萨尼亚总统：“我把拉莫内达、内格林和德·格拉西亚所说的话告诉了他，他的回答是，他不理解这些社会党人的态度。由于我坚决要求辞职，他决定开始磋商以征求意见。”阿萨尼亚继续掩饰自己的敌意：“我对他说了几句礼节性的话并且表达了个人问候.....可以说，在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之后，这些话不应出自我之口。”他所描述的这种“礼貌的友好态度”在即将进行的棘手谈判中起了作用，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只是偶尔怀疑总统对自己的真实态度。

在阿萨尼亚为了组成新的内阁于五月十五日进行的一系列磋商中，社会党执委会和共产党的协调一致表面上丝毫不亚于危机爆发时。“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猛烈抨击拉尔戈的无能，痛斥他的心腹小集团，”阿萨尼亚证实，“指责他与政府和战时高级委员会缺乏沟通，指责他不信任苏联人，等等，等等。共产党人对我说.....他们可以同意他保留总理职位.....但绝不同意他继续担任国防部长。.....显然，争论的要点是国防部长的任命及其与总理职位的分离。.....我召见了拉尔戈·卡瓦列罗，邀请他组成政府。他似乎非常乐意。”

五月十七日，卡瓦列罗向总统提交了他的内阁名单。“在他提交的名单中，”阿萨尼亚写道，“总理，也就是说他本人，不仅继续担任国防部长，而且占据了海军和

空军部长的职位！”考虑到危机是因不想让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国防部长而产生的，阿萨尼亚评论说，这种“独揽”国防职位的做法可以被理解为，他试图提出一种不可能被接受的解决方案并退出政府。“但是……拉尔戈决不希望退出政府。”这是向“兼并政府职能”迈进的一步，同时也是“利用这次危机将普列托从一个重要部门赶走的一种手段”。“‘你打算将普列托排除在外？’阿萨尼亚问卡瓦列罗，‘不顾他做出的贡献和享有的声望？’不，他不打算将普列托排除在外，他想任命普列托为农业、工业和商业部长！……不用再对名单作进一步的分析，显然，拉尔戈将无法组成一个内阁。”

甚至还在向阿萨尼亚总统提交他的组阁计划之前，拉尔戈·卡瓦列罗已经意识到，它将遭到共产党人和普列托派社会党人的坚决反对，因为，尽管没有公开反对他担任总理，但是，他们并不掩饰将他赶出国防部的决心。就共产党人而言，他们已经公开要求新政府的总理应当全力以赴处理总理办公室的事务。同等重要的另一个条件是，鉴于将在五月十五日生效的法令，即所有任命和级别到时没有得到确认的政治委员可以认为自己已被逐出了政治委员的队伍，在所有与政治委员的任命和政治方针有关的问题上，总政治部应当享有自主权。

至于社会党执委会，它要求，应当由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掌管新设立的国防部，这是将其在即将卸任的政府中所掌管的海军和空军部与原国防部合并而成的一个部门。这些要求肯定是根据共产党人与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事先达成的协议提出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比森特·乌里韦在内战结束以后写道：“根据共同协议，以纠正卡瓦列罗的错误、加强人民的团结、密切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之间的合作为条件，普列托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我在普列托成为国防部长之前曾经多次亲口向他提出这些问题，他总是对我说他乐意这样做，而且不会做损害社会党与共产党团结的事情。”

显然，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提出的要求相当于不仅拒绝让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国防部长，而且拒绝让他担任总理，因为普列托派社会党和共产党人非常了解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的心理特征；他们知道，他不会自愿放弃一点权力，而且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动摇的自负，因此，他将拒绝成为一个由多年竞争对手普列托控制其中最重要部门的内阁的傀儡。实际上，甚至还在他们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之前，社会党左派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已经宣布，它不会支持任何不是由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政府。

这一声明肯定是由卡瓦列罗亲自授意发表的，因为这与他本人在整个危机中的立场一致。“拉尔戈以不懈的精力多次表示，”阿萨尼亚回忆说，“除非由他本人担任国防部长，否则的话，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返回政府，因为他认为，他担任这一职务符合国家利益。”“你应当记得，”内战结束以后卡瓦列罗写信对一位社会党同志说，“共产党人要把我赶出国防部，同时把我留在总理位置上做一个傀儡。……我当时表示，作为一名社会党人和一个西班牙人，留在国防部是我的责任，否则的话，我不会接受总理职务；但是，我不是说这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可替代，也不是任何类似的原因，而是因为我具有与共产党及其一切帮凶斗争到底的坚定信念；只有在国防部我才能做到这一点。”他还在另一个场合写道：“真正愚蠢的是与共产党联手将我赶出国防部的另外那些党派。它们没有看到那个党排除异己的行为对战争本身的危害吗？……此外，它们如此盲目，竟然察觉不到共产党人掌管西班牙政策的强烈欲望吗？”

在他努力保留国防部长和总理职务的过程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得到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充分支持。在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报纸纷纷发表社论宣称工人阶级希望他留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保证，认为他是“最有能力领导政府，从而必定带领我们走向胜利的最高尚的人”，由他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为无产阶级正在与国际反动势力进

行的斗争的性质不被任何人或事情所歪曲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的同时，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断然宣布，它不会与任何不是由他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政府合作。然而，尽管得到这种支持，卡瓦列罗在制订其组成新政府的计划时甚至没有考虑征询一下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意见，实际上，相比于前任内阁中的四个职位，他只为他们提供了两个职位。这种待遇让全国劳工联合会感到非常屈辱，于是，作为回应，它宣称，尽管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它在政府中的代表人数，但它不能接受少于以前的政府职位，也不同意以任何借口给它的待遇与共产党相同——卡瓦列罗同样向后者提供了两个职位。它还断言，共产党挑起了这场危机，因此，它在政府中不会以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同样的忠诚度进行合作。

如果卡瓦列罗在制订组成新政府的计划时没有考虑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意见，那么，他更不会考虑共产党人的意见了。他非但对他们提出的总理应当全力以赴处理自己办公室事务的要求置之不理，并且反其道而行之，宣称自己不仅要指挥地面部队，而且要指挥海军和空军，还要控制武器生产。人们也许想知道，他是否真的希望共产党人及其盟友将会同意这个计划。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希望很快就落空了；因为，何塞·迪亚斯回应说，组阁计划显示出它无意考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愿望，这是全体西班牙人民的愿望，因此，共产党人不能按照它提出的条件加入政府，与此同时，拉蒙·拉莫内达以社会党执委会的名义宣布，他的党不能同意加入政府，因为组阁计划没有考虑社会党执委会的要求，而且因为共产党已经作出拒绝的答复。

同样与共产党人在反对卡瓦列罗组阁计划的问题上通力合作的是左翼共和派，他们随声附和了共产党人提出的新政府的总理应当全力以赴处理自己办公室的事务的要求。

为了面子，阿萨尼亚总统试图消除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甚至因为何塞·

迪亚斯不肯让步而劝告他。但是，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共产党毫不动摇，普列托派社会党人和左翼共和派站在共产党一边。结果，卡瓦列罗被迫放弃了组阁的打算。

## 第四十五章 胡安·内格林上台

由于拉尔戈·卡瓦列罗现在已被抛到一边，阿萨尼亚总统委托一个新人承担组阁的任务。这个人就是前任政府的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内格林是加那利群岛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一九二九年加入社会党，现在是代表社会党普列托派核心集团的国会议员，同时还是马德里医学院的一名生理学教授。“我决定委托内格林组成政府。”阿萨尼亚写道，“公众认为我会提名普列托。但是，由普列托领导那个合并了军事力量的部门更好，因为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担任总理，他突然改变风格——他的‘脾气’——可能不太容易。我觉得，利用内格林淡定的性情……更可取。”普列托认为阿萨尼亚不考虑他而是支持内格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阿萨尼亚向我解释说，因为我过于反共以致无法领导一个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所以他没有任命我为政府首脑。这种解释让我感到非常庆幸，没有担任[一个]我无法尽职尽责而且也不愿意担任的[职务]甚至让我更庆幸。”阿萨尼亚对内格林的偏爱得到了总统的好友和忠实追随者何塞·希拉尔的证实，总统在几天后告诉普列托，他决定任命内格林是因为内格林与共产党人打交道时更“灵活”。他补充说，缺乏灵活性可能在政府内部引起冲突。

就在阿萨尼亚委托内格林组成新内阁之前，社会党执委会告诉普列托，它决定请求阿萨尼亚把总理的职务交给他。据执委会成员胡安—西梅翁·比达特说，普列托回答道：“只是我与共产党人不好相处而且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关系也不友好。……[共产党人]已经在把内格林的名字当作卡瓦列罗的继任者到处散布。我认为，目前他得



到了比我更多的支持。他还具有一种更加冷静、更加随和的性格。我肯定不想在不能指望卡瓦列罗的慷慨支持——[一九三六年五月]当我可能担任总理从而可能避免这场灾难时，我就没有得到他的支持——的情况下接受总理职位。我向你推荐内格林的名字。”

尽管普列托推辞了总理职位，有人仍然认为他希望通过他的好友和追随者内格林控制政府，一九三六年九月，他推荐内格林担任了财政部长。但是，那些认为普列托将成为“实际上的政府首脑”的人“想错了”，阿萨尼亚写道，“不仅因为普列托非常明智不会超越自己的职权，而且因为内格林的性格适合当时那种形势”。无论如何，普列托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不可能知道内格林对西班牙共产党人言听计从到了什么程度，因为，就连普列托这个内战之前激烈反共的人都觉得，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保持友好关系合乎时宜。

普列托一九三一年与内格林首次相遇于议会，内格林在那里代表加那利群岛。在描述他所熟悉的内格林时，普列托回忆说：

我们变得非常友好，但是后来我们成为政治对手。造成我们敌对的分歧是因为，在成为政府首脑的同时，他开始对共产党人唯命是从，尽管他矢口否认这一点，但事实充分证明了他的奴颜婢膝。……

胡安·内格林是一个体力和智力超常的人，而且具有迷人的热诚和魅力。像他捣乱的能力一样，他有巨大的工作能力。他完全有可能像在办公桌前一连工作二十四小时那样，离开办公桌一个星期不见踪迹。……

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一九三七年他去那里出席会议，在那个人们肯定认为共和国政府是由暴徒组成的地方，他迷人的风度、他的教养和熟练的外语光彩照人。但

是，在通常的议会制度下，他绝不可能成为总理，甚至不可能担任部长，因为他缺乏演说的天赋。他朗读或者背诵为他写的讲稿的方法在我们的议会不合时宜，通常在那里，即兴演说至关重要。

他有四个人那么大的饭量和酒量，但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这种饕餮相，他在不同的地方分两三次进餐。许多夜晚，他在家吃第一顿饭，接着在饭馆里吃第二顿，然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某个夜总会里吃第三顿。因为在德国接受教育，他养成了一些让人想起尼禄时期罗马的习惯，例如，排空吃饱的肚子，漱一漱口，然后继续狼吞虎咽又吃又喝。

一九三六年底，财政部审计小额账目的官员详细询问主管人，因为花在阿司匹林上的钱令人难以置信。主管人的解释是，这与事实完全相符。新任部长经常需要阿司匹林，打开药瓶，放进嘴里，一下子把所有药片吞进去。

为人随和讲究吃喝，比严厉固执的卡瓦列罗顺从得多，而且可能因其温和派政治背景比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更容易被西方民主国家所接受，内格林早就被苏联贸易代表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选定为卡瓦列罗总理职位的接替者。“[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我在巴塞罗那与斯塔舍夫斯基交谈时，”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写道，“斯大林在西班牙的下一步行动已经开始安排进行。斯塔舍夫斯基没有对我隐瞒胡安·内格林将成为下一任马德里政府首脑的计划。当时，卡瓦列罗被普遍认为支持克里姆林宫，但是，斯塔舍夫斯基已经选择内格林作为他的接班人。”我们已经看到，克里维茨基所揭露的苏联在西班牙的活动后来均被证明准确无误。

由于克里维茨基在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揭露他所知道的内幕后被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斥为江湖骗子，而且由于他的信誉仍然继续受到诋毁，因此，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内格林与斯塔舍夫斯基的密切交往得到了四位著名的共产主义信徒的证实：

路易斯·费希尔，他说，在许多经济问题上斯塔舍夫斯基是内格林友好的顾问；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他断言，斯塔舍夫斯基与内格林建立了一种“真正的友谊”；马利亚诺·安索，将在内格林政府中担任部长的他注意到，内格林的“才干和不可抗拒的”魅力给一些“与他交往”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斯塔舍夫斯基；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内格林在一九三八年四月组成他的第二届政府后安排这位前普列托派社会党人负责军事调查局（SIM）。尽管含糊其辞地声称内格林“并不在乎”共产党，加尔塞斯仍然承认“他与苏联人相处得很好，特别是与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他每天与其共进午餐”。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在战后接受我的采访时说，一九三七年二月，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三个月前，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共产国际驻加泰罗尼亚代表“佩德罗”告诉他和另一些党的领导人，支持内格林作为拉尔戈的继任者。甚至像哈佛大学教授胡安·马里查尔那样激赏内格林——他声称，“在最近一百五十年的欧洲历史上，几乎没有人显示出这种才华与性格、完美道德与高度智力的结合”——的人也承认，内格林是“苏联和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候选人”。

克里维茨基声称，胡安·内格林具有官僚政客的一切素质。“虽然身为教授，他却是一个具有商人眼光的善于处理事务的人。他正好是符合斯大林需要的那种类型。……他将给外界造成西班牙共和国的事业‘合理’、‘正当’的印象；他不会用革命言论吓唬人。……当然，内格林博士认为拯救他的国家的唯一办法是与苏联密切合作。已经显而易见的是，积极的援助只能来自这一个源头。他准备与斯大林全面合作，为保证得到这一援助放弃所有其他考虑。”

尽管毫无疑问的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内格林刚一就任总理兼国防部长便心甘情愿地

放弃了自己的原则，但是，并不能够完全确定他是否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就已打算抛开所有道德和政治上的顾虑以确保得到苏联的援助。当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坚持认为不能确定“内格林在最初这个阶段是否知道他将接受共产党人的指导，即使知道也不能确定他是否默认了”的时候，他可能说得对。“通过更周密的研究仍然可能发现，”他补充说，“在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先生的过程中，只有苏联和西班牙的共产党人是知道整个剧情的演员，而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先生和内格林博士，除了一些提示的台词和他们正在除掉社会党内的对手这一残酷的事实之外，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显然，在内格林博士的头脑里，新内阁意味着向右、向权力、向秩序、向集中的一次转变。”

在莫斯科看来特别重要的是，内格林实际上与共产党没有正式关系。下面是一段未经证实的私人对话，据说发生在赫苏斯·埃尔南德斯代表共产党政治局拜访内格林向他表示共产党的支持时，这段对话表明，内格林本人肯定同样意识到，他与共产党人表面上的互无关联对于他的共产党后台至关重要，而且最终他将被迫在他对普列托的忠诚与苏联对他的要求之间做出选择：

“博士，”我说，谈话转入见面的目的，“政治局希望向共和国总统推荐你作为总理候选人。”

我观察着内格林。他对我们突然宣布的这个意图没有露出一丝意外或者激动的表情。毫无疑问，关于我要说的事情，他知道的比我更多。……

“你们知道，我几乎不出名，尤其不为公众所知。”

“不要让这困扰你。……名声是制造出来的！如果我们共产党人有什么组织出色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宣传鼓动部门。”我笑着说。

“但我不是共产党员。”

“这是一个有利因素。如果你是共产党员，我们不可能推荐你来当总理。我们希望一个共产党人的朋友当总理——不多不少，只是朋友。”我心照不宣地说。……

“共产党的许多政策在我看来恰当而且明智。”内格林说。

“如果你取代了卡瓦列罗，你在贵党内部不会得到多少支持。……”

“很少，几乎得不到什么支持。”

“但是，你可以依靠共产党人的力量。”我肯定地说。

“只有这样我才能管理。”内格林评论说。

“那你应当能管理。”

“我不希望你们把我的认可理解为我同意做你们的‘稻草人’。不要指望我那样做。此外，我不会对你们党、对我自己的党或者其他任何人有什么帮助。”内格林若有所思地说。

“我理解你的顾虑并有同感，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的支持将是坚定而且恭敬的，同样，它也将是谨慎的。但是无法防止一件事情发生——你将被贴上‘疑似共产党人’的标签。”我解释说。

“那是不可避免的。……你们打算支持谁当国防部长？”他问道。

“我们不会反对普列托。”

“普列托不是你们的朋友。”内格林说。

“的确，但是，与他的反共倾向可能造成的危害相比，他的个人声望更有价值。”

在表示对普列托的这种看法时，我想到了对于未来的国防部长我们决定遵循的策略。当政治局讨论是否同意普列托担任国防部长时，我们考虑了他在国内外温和派政界人士当中的巨大声望。在这方面，普列托对我们具有利用价值。我们也考虑了他性格中消极的一面。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对胜利没有信心。把进行战争所应负的最重要的责任委托给他不合常规。……各位政治局委员对支持他作为国防部长的候选人犹豫不决。[共产国际代表]陶里亚蒂给了我们以下指点：“通过支持普列托作为候选人，我们可以把他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只要他不同意为我们效力，我们就应在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利用他那臭名昭著而且自己承认的悲观主义把他除掉。……[我们]可以设法让他陷入声名狼藉的重重迷雾，以使身为著名社会党领导人的他变得毫无用处。于是，我们的敌人少了一个。”

“我个人非常尊重[普列托]；但你们与他会有问题。”内格林强调说。

“我们应当争取使他‘保持中立’。”我笑着回答道。

“怎么做到这一点？”

“副部长的职位像部长的职位一样重要，而且，由于它的专业因素，有时甚至更加重要。在普列托成为部长后，我们应当要求得到国防部和空军部的副部长职位。……总政治部实际上已经由我们掌握。还有我们与你的友谊。……”

“还有苏联人。”内格林笑着补充道。

“同意吗，博士？”

“同意。”

由于胡安·内格林升任总理，拉尔戈·卡瓦列罗被打败了，而共产党人则取得了迄今为止他们最辉煌的胜利。内战爆发时，卡瓦列罗比共和派阵营中的任何政治家都具有更实在的影响和声望，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短十个月时间里，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已经在政坛失势了，几乎变得无足轻重。他不仅对劳动者总工会和西班牙社会党的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失去了控制，不仅被剥夺了在强大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JSU）中的权力，而且对掌管他在马德里的喉舌《光明报》的那些共产党人失去了控制，同时，他的许多亲密战友以及无数占据着劳动者总工会和社会党地方支部领导岗位的支持者背叛或者抛弃了他。如今，在最后的痛苦挣扎中，他被从总理和国防部长的位置上赶下去，而且很快将被共产党人当作工人阶级的头号敌人猛烈攻击。“从我离开政府的那一刻起，”多年以后他在所发表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回忆道，“拉尔戈·卡瓦列罗不再是那同一个人。他被改变成另一个人。他不再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更不必说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了。他是工人阶级的头号敌人。他们叫我自大狂，野心家，顽固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愚蠢的称号。[我的]照片从所有地方消失了。他们以捣毁他们自己制造的偶像为乐。”另外，在其未发表的回忆录《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中，他写道：

长期以来在苏联，[卡瓦列罗]是一个风云人物。在所有城市中、剧院里、报纸上、国际标语口号中，他的名字与所有标志着工人阶级解放行动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共产党人]想要利用他因五十年来做出的牺牲而在西班牙工人阶级当中获得的影响来为莫斯科谋利益。他们以各种方式向他献媚：写文章，拍照片，提出政治建议，邀请访问苏联，等等。他是西班牙和无产阶级的救世主。他们以为他的品德像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一样，因此，他将屈服于他们的政策，按照他们的规则行事。但是，当他在政府中逐渐认识到共产党人的欺骗行为并且开始采取措施阻止他们控制军队、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和军需官的队伍时，当他告诉他们他不会背叛社会党或劳动者

总工会并将像一个真正的西班牙人和真正的社会党人那样实施国内外政策时，他就不再是[计划]合并的政党的领导人，也不再是他们以前宣称由他领导的那一切的领导人。

另一方面，依靠利用苏联武器得到的声誉，凭借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凝聚力和无情的力量，通过对几乎整个国家机器的巧妙渗透，同样在短短十个月的时间里，共产党人已经从一种相对无关紧要的地位上升到实际控制反佛朗哥派阵营命运的地位。

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党派的积极支持、默许纵容、毫无戒备的信任和反应迟钝，他们自己绝不可能得到这种权力。正如后来退出西班牙共产党的前共产党人“农夫”巴伦廷·冈萨雷斯在多年以后所质问的那样：

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外，尤其是在内战初期，有多少西班牙政客和军人没有张开双臂欢迎共产党的代理人并拒绝按照他们的规则行事？至少，我是一个信仰明确的共产党人，因此，我的态度具有某种逻辑性；但是，其他人的态度中有什么逻辑可言呢？如果不是认识糊涂并且串通一气——这几乎是普遍现象——的话，那么，在几个月时间里，一个像共产党这样力量薄弱的政党有可能渗透并且几乎控制整个政府机构吗？……

我不是企图为我的错误寻找借口，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应当承认自己的过失。如果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伤害了别人犯了罪，同时完全建立了自己的规则或者试图这样做，那是因为别人没有挺身而出，只有极其个别的例外。……当其他政党和工会组织软弱无能、优柔寡断并且按照规矩行事时，[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相应显得强大了。这是西班牙的教训，如今也是欧洲和世界的教训。只要它们接受了这个教训，它们就能拯救自己，但是，如果它们不接受教训，它们接着还要失败。



## 第六部分 革命陷入低潮

### 第四十六章 内格林政府与自由主义运动的反应

包括内格林一九三七年五月上台到内战结束的这个时期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西班牙共产党和内格林政府努力收紧权力的缰绳以及革命持续处于低潮为特征；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拉尔戈·卡瓦列罗从政坛消失、新任国防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试图结束共产党控制军队的局面以致他在一九三八年四月被逐出政府；第三个阶段以内阁重组、内格林集总理和国防部长于一身以及共产党人的权力达到巅峰为标志；第四个阶段的特征是派别斗争和幻灭感不断加剧、政府争取英—法支持的枉费心机以及不可阻挡的军事溃败；第五个阶段的标志是共产党的权力和影响力崩溃以及一九三九年三月内格林及其共产党盟友被一个左派和温和派联合政府推翻，这个政府试图与佛朗哥将军通过谈判达成一个不进行报复的停战协议，但白忙一场。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组成的内格林政府的成员如下：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首席专员(总理)兼财政与教育专员
阿特米奥·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内务治安专员
胡安·科莫雷拉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公共工程、劳工与司法专员
何塞·卡尔韦特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	农业与物资供应专员
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	防务专员
胡安·何塞·多梅内奇	全国劳工联合会	经济、公共救助与卫生专员

与由十八个人组成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相比，新政府只有九名成员，它排除了社会党左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相对加强了共产党的力量。“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不同，”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迈斯基回忆说，“新总理知道与共产党合作的极端必

要，而且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加入他的内阁并不感到特别忧伤。他大胆地将部长的数量从十八人减少到九人。这使政府更加精干和有效，而且最重要的是，共产党人在政府中的比例大幅度提高。”

政府在组成的当天宣称，它是所有党派的真正代表，它对争取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加入内阁的努力失败表示遗憾，它不会允许任何组织采取暴力行为，无论其意识形态是什么。

自由主义人士的反应充满了火药味。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报纸纷纷斥责政府是“反革命”。五月二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把西班牙共产党描绘成“反革命政党”，称其“与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以及社会党右派狼狈为奸”实现了以“巴塞罗那挑衅”和组成新政府为高潮的“政治阴谋”。它还指责共产党人是“一个国家和国际阴谋的代理人”，并且宣称，最重要的是，人民应当考虑对共产党的罪行“进行清算的那一天”。不过，他接着说，“无论出现了什么人，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革命将会继续进行。“工人群众在这里准备重申他们的革命意志和反对新的红色耶稣会士以巧妙的手法玩弄的花招的坚定决心。”

五月二十九日，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发表了一份关于刚刚结束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这次全体会议特别作出决议，不与政府“直接或者间接”合作；在军队中广泛进行反对“反革命政府”的宣传；与劳动者总工会达成协议，以便开展一场联合抵制运动。

但是，这些大胆的决议被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对手看作虚张声势；因为，仅仅两天之后，以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为首的全国委员会代表就登门拜访内格林，“讨论使合作成为可能的条件”。这种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原因显而易见。由社会党温和派和共产党人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委员会刚刚发表声明放弃了社会党左派控制的执委

会在内阁危机期间采取的立场。人们应当记得，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宣称，它只支持由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政府，这一立场得到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大力声援。由于担心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全国劳工联合会决定转变立场，谋求加入政府。在六月八日发表的一份“最低限度方案”中，全国委员会提出，在所有关于国防、经济和社会治安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共和派与自由主义者权力平等。它还建议在另外一些领域设立“咨询委员会”，由数量相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代表组成。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过分的要求”——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这样形容它们——根本不切实际，因此，不出人们意料，它们化为泡影。

曾被视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意识形态堡垒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也愿意背离它战前作出的不问政治的承诺，结果，内格林政府的组成所产生的直接作用反映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召开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全体会议所通过的一项决议上。在四天的会议期间，与会者一致认为，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应当创建一种“新的组织结构”，联盟的核心——小型的亲和性小组（grupos de afinidad）——将解散，被包括大量成员的地方、区域和地区组织（agrupaciones）所取代。这样一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将变成一个“扩展至西班牙的公众生活”，并且“从形成政权机关普遍基础的所有地方推动革命”的群众组织。正如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书记亚历杭德罗·希拉韦特所解释的那样：“关于新的组织结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发现自己在那样的条件下既可以确定革命的方向，也可以指导革命的进程。在革命爆发之前，当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秘密存在于法律与违法的边缘时，当它有时不得不在与资产阶级和国家的斗争中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时，建立在亲合体基础上的旧的组织结构非常有效。如今，面对为我们提供了光明前景的新

形势，对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来说，维持在当前现实中的边缘地位是荒谬的。”

希拉韦特没有提到，以其新的组织形式，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实质上将变成一个政党，因此，这项建议无论如何必须提请半岛代表大会批准。建议联盟进行改组遭到那些反对自由主义运动政治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例如，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著名成员费利佩·阿莱斯将这个不问政治的中坚力量称为“新的参政党”。在他看来，这决定性的一步相当于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一切：“通过把自己组成一个新的政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是在宣称，人民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正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在战壕里和街垒后面做了政府做不到的事情的那些人。……[他们]同样也是耕种这片土地的人，也是运输货物、改良土壤、在陆海空战斗中牺牲的人，可是现在，他们只是一群土包子。”

无法准确地估计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内部对改组的抵制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从亚历杭德罗·希拉韦特的言论判断，阻力很大，以致“意见分歧达到了以分裂相威胁的程度”。面对这个“严重的问题”，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以“寻找一个使对立的意见统一起来的解决方案”。委员会决定，“大量反对者”将被允许继续作为亲和性小组的成员，“但是，他们提出的关于组织性质的建议只能按照他们的小组所代表人数的相应比例加以考虑”。不过，这一妥协方案必须提请半岛代表大会批准，由于没有记录显示曾经召开过代表大会，因此，这一变通从未获得正式批准。

与此同时，五月三十一日，阿萨尼亚总统——一年后他在日记中悲哀地记载，内格林总是不与他商量便采取行动，所以告诉他的都是既成事实——做出了下面的乐观评论：“新政府普遍让人感到满意。人们松了一口气。他们期待活力，决断，管理的意志，恢复处理国事的正常方法，遏制无秩序的状态。由于相信政府很快就会结

束后方的混乱，公众的忧虑……有所缓解。这是最棘手的问题。新总理对他的计划、他的权力充满信心。他断言，战争将会长期继续进行下去（再打一年！），他正在为此做好准备。极少为人所知而且仍然年轻的内格林聪明、有教养，他认识到问题并了解它们。……人们也许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现在我对政府首脑说话时，不再觉得自己是在对死人说话。经过这样几个月后，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鲜的快乐。”

尽管内阁具有温和的表面特征，共产党人实际上也只占据着与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中数量相同的两个位置，不过，它的组成是骗人的。

首先，虽然普列托派社会党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但是，共产党人不仅保留了他们以前在警察部门占据的所有关键岗位，而且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奥尔特加中校被任命为安全总局局长，取代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者文塞斯劳·卡里略。在内格林的要求下，普列托派社会党人、社会党执委会成员胡安—西梅翁·比达特接任内政部副部长。在劝说其接受这一职务时，据比达特说，内格林讲了下面这段话：“喂，比达特，我让苏加[苏加萨戈伊蒂亚]担任内政部长，因为普列托要求我这样做。实际上，这就好像普列托同时担任两个部长。我对苏加不甚了了；他不是我的朋友。他是普列托的人。另一方面，共产党人要求我让奥尔特加中校担任安全总局局长，他无条件地支持他们。……我在这个部门还有谁？我不是向你提供一个职位，我是在请求你支持我。”苏加萨戈伊蒂亚在他的书中谈到奥尔特加“从温和的共和派人士迅速转变成为狂热的共产党人”，说他是自己“理论上的下属”；苏加萨戈伊蒂亚还声明，他没有任命奥尔特加担任安全总局局长。这一点得到了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曾任阿尔瓦塞特省省长和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书记的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的证实。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当苏加萨戈伊蒂亚接管内政部时，内格林已经“按照共产党人的吩咐”将奥尔特加中校安排在安全总局局

长的位置上，而且还任命了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的安全部门负责人。整个警察部队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剧烈动荡”，他补充说，“结果，它完全被共产党人控制了”。关于共产党人在警察部门处于支配地位的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内格林的朋友比达特提供的，他援引上司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的话说，内政部和安全总局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和亲信的老窝”。

当然，共产党人并没有公开承认他们对警察机构的渗透，但是，在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中，他们对警察机构的控制不言自明。内战史写道，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加强社会治安，把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

内阁表面的温和特征还在另一个方面让人受骗。虽然由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担任国防部长，亲共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仍然留在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正如普列托六月二十九日向阿萨尼亚抱怨的那样，这个部门“几乎全都是共产党人”，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充当的是稻草人”。另外，拉尔戈·卡瓦列罗颁布的遣散所有到五月十五日其任命和级别没有得到确认的政治委员的行政命令被搁置，使共产党人牢牢地控制了 this 至关重要的机构。人们还会记得，共产党加入新政府的条件之一是，在所有与政治委员的任命和政治方针有关的问题上，总政治部应当享有自主权。据比达特说，当记者问内格林，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私人朋友是否将加入他的政府，内格林回答道：“当然不，除了总政治部主任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之外。”比达特评论说：“大家知道……拉尔戈·卡瓦列罗当时最讨厌的就是他曾在内阁无情训斥过的这位前外交部长。但是，内格林把科学家的严肃与人间的幽默结合了起来。”

此外，被拉尔戈·卡瓦列罗免去国防部战术参谋部门负责人职务的共产党员安东尼奥·科登中校被再次委任这一职务；同为共产党员、被拉尔戈·卡瓦列罗从国防部总参谋部调走的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少校重新出现在国防部；被从高度敏感的情报监控部

门免职的亲共军官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上尉官复原职；米亚哈那位才华出众、政治态度暧昧却左右逢源的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少上校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毫无疑问，作为普列托担任国防部长的条件之一，所有这些安排都是根据他与共产党人之间事先达成的协议作出的。

与此同时，将缺乏战斗力和纪律性的民兵武装改编成为人民军部队的工作也在普列托的领导下加快进行，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的努力，它认为，新军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纪律性不仅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而且是控制政府的基本前提。六月二十三日，取缔最后一些民兵指挥部的法令颁布了。“这样一来，”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写道，“所有武装力量都在各个前线参谋部的控制之下，因此也在总参谋部的控制之下。由于内格林博士的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以及另外一些措施，各个前线的民兵部队均被整编成为正规军，于是，在整个共和派控制区，确立了纪律和统一指挥。”

最后，尽管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外交部被阿萨尼亚的好友、前总理何塞·希拉尔所取代，然而，他离开后在外交部及其所属机构——包括负责对外宣传的西班牙通讯社和对外新闻司——留下了一批共产党人工作人员。另外，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加入共产党的费德里科·梅尔乔被任命为宣传总监。

共产党人有充分的理由为事态发展欢欣鼓舞。实际上，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提交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说，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无疑冲昏了某些同志的头脑”。他写道，他们认为他们的成功完全应当归功于党，忘记了温和派与普列托一起“在策划和解决危机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接着说：“这种错误的判断使他们认为，党已处于可以提出控制权问题并为夺取政府和国家的控制权公开进行斗争的地位了。”

西班牙共产党此时应当摆脱一切束缚公开夺权的想法不符合斯大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给拉尔戈·卡瓦列罗出的主意：“为了防止西班牙的敌人说它是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应当尽可能争取得到阿萨尼亚及其中产阶级共和派的支持。这一政策没有改变，因此，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保证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遵循克里姆林宫的路线是陶里亚蒂的任务。“只要与我们的同志交谈并且听一听他们的讨论就能发现，”他在提交莫斯科的报告中继续写道，“时至今日（一九三七年八月）他们仍然没有完全弄清这个问题。我们的任务之一是向他们解释这个问题并帮助他们理解它。”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糊涂认识”非常严重，以致有些同志提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为消灭一切资本主义因素而斗争”并且“防止它们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他们还得出结论，“只有一个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政府”才能实现这一方针。“显然，”陶里亚蒂评论说，“这些具有如此糊涂认识的同志不可能懂得，在卡瓦列罗下台之后，他们的任务是向政府施加压力敦促其执行人民阵线的政策[即，共产党可以用来掩盖其控制目的的政策]，同时通过开展适当的政治工作分化瓦解无政府主义者和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的队伍来扩大政府的基础。”

我们将在后面的一些章节里看到，在共产国际神秘的政治王国中，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 第四十七章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取代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主导力量

在五月事变导致巴伦西亚当局接管了其社会治安和防务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内格林政府的组成巩固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所取得的政治胜利。五月五日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地区军事指挥官并且兼任在邻近的阿拉贡前线作战的东路军司令的自由共和派人士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内战爆发时他是国民卫队的长官，一九三六年



十月担任中路军司令时暗中加入了共产党——公开加入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在未来几个月时间里，他将给予共产党人充分的自由。波萨斯得到两名共产党员的协助：他的第一政委、前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比尔希略·利亚诺斯和刚刚被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任命为东路军参谋长的安东尼奥·科登。此外，战事进行期间为使突击卫队顺利通过加泰罗尼亚地区而被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任命为巴塞罗那警察部队指挥官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同情者埃米利奥·托雷斯中校六月八日被前马德里警察部队指挥官、共产党员里卡多·布里略中校所取代。

五月战事结束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政治势力的扩张通过它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越来越凶猛的攻击显示出来。六月一日，党的书记胡安·科莫雷拉发表了一次激烈程度超过以往的演说，他在演说中谴责了“通过凶恶的胁迫、暴力以及必要时暗杀等手段在城镇和乡村强制实行的集体化”，他还怒斥了“控制着工人群众的强大工会的专横意志，工人在巴塞罗那街头遭到随意追捕”，然后被“指控和处决”。他宣称，这些强大的工会攻击“下层中产阶级，破坏经济结构，破坏工业、商业和银行储备——正是后者构成了我们重建经济的基础”。最后他说，存在着“有计划有组织的走私贵重金属和商品以及囤积货币的活动”。

（当然，这些指责有一部分是事实。例如，为了购买武器和补给，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确实出口贵重金属，但是，必须完全公平地说，与运往苏联的大批黄金相比，出口的数量微不足道，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运往苏联的黄金构成了国家的财政储备。其实，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人对其更为不满的是它对主要港口和法国—西班牙边境的控制，这种控制使它可以通过自己的出口实体把值钱的农产品运往国外换取大量外汇。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这种控制是一个不容剥夺的革命成果，而中央政府则把它看成是对不可废除的国家权力的一种冲击。最

终，事实证明，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只能用武力来解决，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胡安·内格林把他的边防警察部队派往法国—西班牙边境，夺取了革命者手中的控制权。问题的核心是，无论其政治构成如何，只要希望自己作为一个政权有效地运转，没有任何政府能够承受失去这些重要的权力组成部分所产生的后果。因此，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作为革命左派的死对头，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进入财政部的那一刻起，内格林就发现自己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势不两立。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内格林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的社会党温和派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说，总理兼财政部长“并不希望无政府主义者加入政府”，因为他想“解散全国劳工联合会成立的所有出口组织”，从而“一劳永逸地杜绝”因把杏仁、柑橘和藏红花运往国外所造成的外汇损失。）

尽管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对手遵循其“造成消极后果”的路线，科莫雷拉继续说道：“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的路线，因此，今天力量对比的天平与内战初期不同了。……今天，凭借经验，广大群众已经可以通过日常事态发展的事实辨明，我们的路线正确而且真诚。今天，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天平已经开始倾斜，这种变化意义深远。”

另外，关于自由主义运动最敏感的问题之一，科莫雷拉谴责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公共事业和服务的控制。他强烈要求用一个新政府取代五月事变期间所组成的临时政府，新政府应当“把全部设施交给市政委员会，以使所有公共服务立即归城市管理，尤其是交通运输、煤气和自来水工程、公共娱乐、住房、屠宰场和集市”。他接着说：“例如，有人说，谈论公共交通是反革命，因为这意味着夺走工人拥有的东西。……我们想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吗？我们想形成一个新的贵族、新的资产阶级吗？成千上万名工人难道是为了让我们最终可以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电车有限公司取代巴塞罗那电车有限公司而战死在前线的吗？”

另一方面，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坚称，他们并不反对将公共服务归城市管理。“我们已经声明而且将在必要时反复重申，”《工人团结报》说，“将公共服务归城市管理与我们的原则一致。但是，必须保证市政委员会摆脱官僚主义的惯性并且清除旧时代政治生活中固有的道德败坏。”这等于变相说，只要他们没有控制市政委员会，就不会同意将公共服务归城市管理。尽管自身势力有所增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并不能够自行其是，因为，在巴塞罗那市政委员会讨论城市管理的问题时，由于担心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得到过多的权力，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站在了一边，它声称：“在它看来，除非得到工人阶级同志的有力合作和充分理解，否则的话，无法实行[城市管理]。”不过，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继续施加压力要求将公共服务归城市管理，就像它们为削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经济实力而要求将基础工业国有化时所做的那样。

此外，革命初期建立的革命执勤小分队治安巡逻队——试图将其解散然后并入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是三四月份在加泰罗尼亚引起争议从而造成政治僵局的主要问题之一——再次成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攻击的对象。六月四日，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自治政府内务专员卡洛斯·马蒂·费塞德发布行政命令解散治安巡逻队，他根据的是三月份通过的解散巡逻队、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并将它们合并成为一支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的法令，《工人团结报》曾痛斥这项法令“与劳动人民的斗争和愿望格格不入”。人们应当记得，马蒂·费塞德是五月四日在巴塞罗那战斗进行期间所组成的临时政府的四名成员之一。但是，作为自治政府社会治安力量的首脑，他实际行使权力的时间非常短暂，因为，在五月五日中央政府接管社会治安后，他成了巴伦西亚当局任命的社会治安代表的一名微不足道的助手。注意到社会治安代表曾经告诉他不再需要巡逻队执勤，因此，他发布的行政命令规定，根据三月份通

过的法令，巡逻队员个人可以申请加入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由于实际上根本没有组建统一的内务治安部队，而且对解散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只字不提，显然，援引三月份通过的法令只是为了给解散巡逻队提供法律支持。几天后，社会治安代表何塞·埃切瓦里亚·诺瓦宣布，他已经发布命令以保证巡逻队员“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交出他们拥有的全部装备和营房。尽管镇压巡逻队的抵抗所用的时间超过了四十八小时，但是，到六月底时，作为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它永久性地消失了。

值得注意的是，已被任命为巴塞罗那突击卫队指挥官并且将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成为内格林手下的安全总局局长的共产党员爱德华多·奎瓦斯·德拉·培尼亚上校把发布行政命令以及随后解散巡逻队自诩为他的功劳。他声称，加泰罗尼亚当局（显然是指那位胆怯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自治政府内务专员）最初坚决反对采取这一措施，因为它会带来危险：“一些[民兵]部队可能离开前线向巴塞罗那进军。他们没有说服我。我的决定不可动摇。……第二天，命令发布了，然后，我们在没有发生严重暴力事件的情况下占领了营房。巴塞罗那再一次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在此前的几周时间里，全国劳工联合会坚称巡逻队在五月战事中保持了中立，希望挫败任何解散巡逻队的企图。这种辩解不起作用，因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公开宣布，巡逻队死伤五十七人，其中死亡十七人。同样不起作用的是巡逻队本身做出的姿态，它们表示愿意为托雷斯中校和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效力，这种姿态虽然得到托雷斯的支持，但却遭到孔帕尼斯主席的拒绝。他的断然拒绝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现在中央政府接管了社会治安，他不再把政治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和解上，而是寄托在对它们的武装力量迅速瓦解的期待上，无政府主义武装力量的瓦解将导致巴伦西亚当局把社会治安的控制权归还给自治政府，挽回其作为公认的加泰罗尼亚自治的捍卫者的声誉。因此，

尽管孔帕尼斯表达了中央政府不应接管社会治安而应向自治政府派遣援兵的观点，但他仍然主张迅速在后方收缴武器并且夺取军火库，同时敦促巴伦西亚当局对边防哨所进行“清理并收缴武器”。人们应当记得，在五月事变之前，随着内格林派遣的边防警察部队的到达，收回法国—西班牙边境地区控制权的工作已开始进行，接着，在六月二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边防民兵”被正式解散。但是，结果让孔帕尼斯感到失望，因为，中央政府不仅利用边防警察部队夺取边防哨所的机会迅速恢复了对加泰罗尼亚边境地区外贸生意的控制，而且还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转移到了巴塞罗那，粉碎了他对社会治安控制权回归地方政府所抱的希望。

如果解散巡逻队、收缴后方的武器以及夺取边防哨所是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种沉重打击的话，那么，同样沉重的打击是，他们失去了在这一地区的无数城镇和乡村所拥有的权力。五月十五日，迄今为止一直抵制自治政府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所颁布的法令——该法令规定，由地方行政委员会取代革命委员会，各党派组织按照其在自治政府中的代表比例占有地方行政委员会中的职位——的各种革命委员会被加泰罗尼亚政府宣布为非法。实际上，早在五月中旬被宣布为非法之前，许多革命委员会就被最近开到的突击卫队和边防警察部队推翻了。而且，已经根据十月九日法令成立的一些城镇行政委员会将全国劳工联合会排除在外，另外，七月五日召开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塔拉戈纳省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将那些积极参与五月事变以及没有谴责事变的团体排除在各个市政委员会之外。

无政府工团主义革命力量的衰退加深了那些比较激进的团体对温和领导阶层的敌意。成立不久的激进团体杜鲁蒂之友会的喉舌《人民之友》在五月下半月出版的第一期上指责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地区委员会已经因为它

们的“无能和胆怯”“背叛了工人和革命”。地区委员会立即开除了这个激进团体并且发表了一份声明，将杜鲁蒂之友会的指责斥为“非常严重的恶意诽谤”，同时指示把所有“不公开表示反对该团体所采取的立场”的杜鲁蒂之友会成员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开除出去。作为无政府主义运动内部意见分歧日益加剧的征兆，自由主义青年运动巴塞罗那地方联合会、伊比利亚自由青年联盟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和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拒绝签署这份声明。

六月中旬，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不可避免地又进行了一次重大改组。五月事变期间组成的临时政府不起作用。在六月一日发表的谴责性演说中，胡安·科莫雷拉要求结束“这种过渡时期的政治局面”，组成一个能够“承担战争赋予的责任并且能够应对经济重建问题”的“稳定的政府”。六月十九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土地与自由》全文发表了一份“秘密政治报告”，它声称这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发给地方支部的，概述了它的改革计划。报告说，新政府将是一个“强大的人民阵线政府”。它的任务是“安抚情绪并使那些对反革命活动负责的人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将向全国劳工联合会提供政府职位，“不过是以一种让它感到不得不拒绝参与的方式”。尽管无法证明这份报告的真实性，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很快发现自己中了别人设下的圈套，以这份报告暗示的方式失去了它在政府中的职位。

在六月底开始的组建新内阁的谈判过程中，最初有关方面一致同意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各有三个政府职位，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一个，而孔帕尼斯主席将亲自担任政府总理。但是，在最后一刻，孔帕尼斯否决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反对意见，向著名人类学家、加泰罗尼亚共和行动党成员佩德罗·博什·希姆佩拉提供了一个政府职位，加泰罗尼亚共和行动党是一个小型中产阶级政党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盟友，从而相对加强了左翼共和派的力量。

全国劳工联合会谴责这一行为是个“圈套”，是一种“欺骗”，并且通知孔帕尼斯，它“绝不同意这一任命”。由于没有察觉到这可能确实是一个圈套，全国劳工联合会明确宣称，如果孔帕尼斯不撤销这一任命的話，它将不会加入政府。

显然，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没有意识到政治天平已经向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到了什么程度，因此可能抱有幻想，以为孔帕尼斯不会企图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执政。然而，孔帕尼斯必须像革命全盛时期那样考虑他们的意愿的日子现在已经过去了。他放弃自己所扮演的圆滑的安抚者的角色，采取坚定的立场把全国劳工联合会抛在一边不予理睬。“我是议会任命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他在广播演说中宣称，“并且得到所有工会和党派组织多次明确的认可。”但是，他说，有人正在试图否定他组成自己政府的权利。“加泰罗尼亚人民！够了！新的自治政府是一个人民阵线政府，这里是组成政府的成员。”接着，孔帕尼斯宣读了下列人名和职务：

路易斯·孔帕尼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主席
安东尼奥·马利亚·斯韦尔特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内务专员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总理兼财政专员
卡洛斯·皮·苏涅尔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文化专员
胡安·科莫雷拉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经济专员
拉斐尔·比迭利亚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劳工专员
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物资供应专员
何塞·卡尔韦特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	农业专员
佩德罗·博什·希姆佩拉	加泰罗尼亚共和行动党	司法专员 <sup>39</sup>

图注：

39. 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消息报》。关于此次政府危机的更多情况，见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消息报》；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人道报》、《工人团结报》和《劳动报》；另请参阅《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101—103页；何塞·佩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第二卷，第306—311页；卡洛斯·皮·苏涅尔（自治政府新内阁的成员），《共和国与内战：一个加泰罗尼亚政治家的回忆》，第445—447页。

不过，应当提到的是，反对任命博什·希姆佩拉不是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决定不加入内阁的唯一原因。据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前任政府专员巴莱里奥·马斯说，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其中两个因素值得记录在案：（1）支持与政府合作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与反对与政府合作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日益加剧，后者“逐渐发现他们的革命成果被别人从他们手中夺走了”；（2）“在一个宁愿破坏而不是巩固全国劳工联合会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的政府中……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担任政府专员时，”马斯战后告诉我，“成功地使四十个工业组织合法化，但是，由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农夫联合会向孔帕尼斯施加压力，其余工业组织并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尽管他们已经得到自治政府经济委员会的认可，在这个委员会中，所有党派组织均有代表。”

的确，反对与政府合作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对其领导人施加的压力以及孔帕尼斯对博什·希姆佩拉突如其来的任命很可能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谈判者提供了一个体面地拒绝加入政府的机会。无论如何，反对与政府合作的人毫不掩饰他们对这次政府危机的结果感到满意。



“这一次的花招被揭穿了。”《土地与自由》宣称，“在加泰罗尼亚拥有一百多万会员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不再是政府的成员了。这是因为无政府工团主义不能与职业政客有牵连，也不能在任何人面前卑躬屈膝。……[它]不愿让这种肮脏的政治玷污自己。”

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在全国范围内的喉舌《自由青年报》直接并且好斗得多，它在七月三日宣称：“到目前为止，反革命的指挥者已经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把全国劳工联合会赶出了中央政府和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他们毫不犹豫地用尽手段背叛革命，无论多么卑鄙、多么阴险。为了满足可耻的欲望，他们已经而且还在继续使战争处于危险的境地。……但是，西班牙人民已经看透了他们的把戏，因此，不会再让反革命势力进一步得逞。”

“革命的社会党人、忠诚的共和派人士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必须立即组成一个强大的联盟，这个联盟将打击西班牙革命人民的敌人进而永远消灭他们……。”

“革命处在危险之中。你们以巨大的付出并以牺牲生命为代价而赢得的革命成果正在被后方的敌人所出卖。不许他们从我们手中夺走这些革命成果。”

尽管这些革命的怒吼表达了大部分自由主义运动成员的感情，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仍然多次试图重新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们甚至还在争取，不过，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无论如何，他们的加入不会对事态发展产生什么重大影响，因为，自从五月事变以后，真正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中央政府手中，而且，由于共产党人夺取了加泰罗尼亚地区警察和军队的控制权，真正的权力最后转移到他们手中。

当时在加泰罗尼亚国家党——该党代表加泰罗尼亚中产阶级中的少数分离主义者

——的喉舌《巴塞罗那日报》当记者的曼努埃尔·克鲁埃利斯准确地记录了五月以来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力量对比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尽管孔帕尼斯及其政党在自治政府中的存在造成了表面的延续性，但是，政治主导权已经[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手中]转移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手中。……而且由于这种绝对的主导地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能够——有时是羞辱性地——迫使自治政府完全服从直到内战结束时一直由内格林博士所主持的中央政府的命令。”

在街头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五月事变刚一结束，目击了事件过程的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罗贝尔·卢宗就指出：“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巴塞罗那到处都是携带着武器的工人。后来，只能看到那些被委以特殊职责的人携带着武器，不过他们还是工人。如今（可能除了几个无产阶级专属社区之外），看不到一个携带武器的工人：只有突击卫队士兵，手持步枪的突击卫队士兵，像资产阶级执政的全盛时期一样，每个角落都有突击卫队士兵。”就连街头的服装也反映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优势衰落。“在城市的中心区域，”卢宗继续写道，“去年八月我提到的并且直到今年二月仍然被人们穿着的[那种]典型的工人阶级装束差不多已经完全被资产阶级、至少是小资产阶级服装所取代。一个更为明显的事实是，红黑相间的颜色几乎彻底消失了。五月以前，所有人都引人注目地展示着这种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色彩。……今天，正好相反，有胆量佩戴全国劳工联合会证章的人寥寥无几。在工会大楼外面已经看不到飘扬着的红黑旗帜。至于曾经非常流行的帽子和围巾，……现在根本看不到了。”

#### 第四十八章 共产党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五月事变之后那一段时间，在曾为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势力范围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发生的事情只有随意逮捕、

秘密关押、严刑拷打、绑架、暗杀以及破坏集体农庄。革命高潮时期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所进行的自发而且无目的的恐怖活动现在被共产党人统一指挥进行的更加复杂因而也更加可怕的恐怖活动所取代。“一股血腥恐怖的浪潮席卷了加泰罗尼亚社会，……”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一九三七年六月中旬宣称，“我们自由主义运动一直对此保持沉默……这不是因为我们胆小，而是因为我们的纪律性和责任感。……它以无与伦比的坚毅坦然忍受着对集体化、对无产阶级建设性工作的攻击。”

“从五月到现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六月底发表声明宣称，“针对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组织的挑衅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们的积极分子被迫害；他们遭到起诉和暗杀；我们的地方分会被查封，集体农庄受到破坏；有人实施暴力行为企图迫使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组织铤而走险，但是，不顾这一系列镇压和挑衅的猛烈冲击，我们仍然保持着冷静。我们不想破坏反法西斯联盟，它已经被某些人玩弄的卑鄙花招分裂了。”

这种克制激怒了更加激进的自由主义运动成员。七月一日，地下报纸《无政府报》的第一期显示出运动的领导阶层与广大普通成员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面对我们组织遭遇的严峻形势，面对针对我们开展的野蛮镇压，面对对我们的集体农庄和革命工作的攻击和破坏，……我们必须大声发出警告，敦促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那些积极分子同志[即领导人]……丢掉他们的幻想——他们乐观地以为我们的革命仍在继续向前发展，我们还是一支让人望而生畏、受到人们尊重的力量。农村的镇压令人震惊。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仇恨已经达到出人意料的程度。在大规模的流血中，派去维持秩序的突击卫队进攻村庄，捣毁一切，监禁暗杀我们的同志。”

在加泰罗尼亚以及共和派控制的其他地区开展的镇压行动持续进行了几个月。九月，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宣称，监狱里有成千上万人“被证明是革命者和反法西斯分子”；十一月，《工人团结报》提供的数字是一万五千人。这一时期究竟有多少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遭到暗杀将永远是一个需要推测的问题，因为从来没有公布过令人信服的数字。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把在前线和后方实施的暗杀都考虑进去的话，被杀害者人数众多。

尽管遭到镇压，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仍然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描绘了一个光明的前景。根据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为了反驳包括著名的俄国流亡者亚历山大·夏皮罗在内的一些外国无政府主义者对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尖锐批评，巴斯克斯宣称：“共产党发展壮大、反动派恣意妄为、我们的积极分子被关进共和国监狱等等情况可能表明我们的运动正在衰落，同时蒙蔽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观察家。但是实际上，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发展状况良好，会员不断增加，重新投入战斗，恢复了现实主义态度并且完全统一了观点。目前，我们关心的是赢得战争。一旦这个目的达到，我们将重新在社会领域发动攻势，然后，我们的朋友必须相信我们，革命将立即发生！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都吓不倒我们。我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可以取胜。我们将赢得胜利，我们将在西班牙实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极权统治[totalitarisme]。”

据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雅普·克洛斯特曼说，国际工人协会的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至十七日“秘密”举行的一次特别代表大会，“如果人们把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印发的明显带有倾向性的大会总结排除在外”，曾经对外透露的代表大会的全部信息只有部分发表的会议记录（法文）。

尽管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对形势作了乐观的估计，事情的真相却是，对于代表了半数工人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的直接镇压已经开始使它不再像内战初期那么春风得意。“[在]后方，”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武装领导人里卡多·桑斯写道，“事情进行得不像[革命]运动初期那么顺利。……工人不愿意再为帮助前线长时间工作。他们只想尽量少干点活而又得到尽可能高的工资。总的来说，这反映了一种不断恶化的局面。”

在全国劳工联合会遭到持续镇压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则面临着灭顶之灾。六月十六日，根据共产党人安全总局局长安东尼奥·奥尔特加中校的命令，突击卫队中校、巴塞罗那警察部队的共产党人指挥官里卡多·布里略采取行动占领了巴塞罗那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部以及另外一些该党办公活动的场所，逮捕了其大部分领导人，将他们投进巴伦西亚的监狱。同一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第二十九师师长、党的执委会成员何塞·罗维拉被波萨斯将军召到巴塞罗那，然后立即被共产党人警察逮捕。

遵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设在巴伦西亚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指挥部直接下达的命令，奥尔特加向其顶头上司内政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隐瞒了所有与即将采取的突击行动有关的消息。为了避免行动失败，作为附加的预防措施，他用一个虚假的警报将担任安全总局副局长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加夫列尔·莫隆派往雷阿尔城。由于不信任这位安全总局局长，苏加萨戈伊蒂亚任命莫隆以保证警察部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能知道。

在这个问题上，我应当说一下可以证明苏联秘密警察内务人民委员部直接插手了突击行动的个人经历。当时我是合众社驻巴伦西亚的记者，支持共产党采取的路线。六月十八日，逮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两天后，奥尔洛夫介绍我认识的一

个名叫“伊尔玛”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交给我了一份文件，她说这是提前拿到的安全总局局长即将发布的一份公报的副本。公报宣称（1）“一个威胁国家安全的巨大阴谋”已被发现，同时发现的大量文件“无可辩驳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敌人之间存在着可疑的关系，这些文件中有一张马德里的平面图，佛朗哥将军的一名间谍在平面图的背面用隐形墨水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与包括N——（这显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书记安德烈斯·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会谈；（2）这个“间谍组织”将现在和未来的军事行动计划出卖给了佛朗哥的总参谋部。已经逮捕了两百人。

虽然我没有轻信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但我确实觉得我得到的是一条重大的独家新闻，因此我应当立即给合众社打电话。不过存在着一个问题。这名特工强调说，我不能把安全总局局长当作正式的消息来源。我争辩说，这样一来合众社可能认为我个人在没有任何重要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了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进而怀疑我的信誉。“这么说你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一个为佛朗哥效劳的间谍组织？”她怀疑地反问道。我反复重申了我的不同意见，每说一次她的怀疑和焦虑就更加严重。由于担心得不到这一条独家新闻，我答应记住她的限制但暗自决定使用这个消息来源。可是，当我在一小时后把打出来的新闻稿交给对外新闻司的共产党人新闻检查官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时，她删掉了我开头的这句话：“安全总局局长发布以下公报”。显然，她受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预先警告。不过，她最终同意我可以使用含糊的表述：“有人宣称，……”

回顾这个情况有助于了解随后发生的事情，我得出了以下结论：（1）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急于通过某个通讯社在最大范围内广泛宣传这个所谓的阴谋又不把政府牵涉进去，政府对此并不知情所以难以预言它的反应；（2）这个公报并非如我被告知的那样是由安全总局局长发布的，而是由苏联驻巴伦西亚大使馆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办

事处炮制并且传播的，证明被告有罪的文件也是在那里伪造的；（3）对我说公报来自安全总局局长为的是得到我的信任，因为我毕竟不是共产党的资深同情者，尤其不是共产党员；（4）删除所有提到安全总局局长的内容是希望避免或至少推迟内政部长对他进行严厉的处罚，部长对即将采取的突击行动并不知情；（5）名义上归外交部——现由左翼共和派人士、阿萨尼亚总统的忠实朋友何塞·希拉尔担任部长——管辖的对外新闻司实际上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通过共产党人所控制，后者接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巴伦西亚指挥部的指示。希拉尔在任时是否知道这一情况值得怀疑，因为，正如我们所知，他只是接管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留下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各个附属机构，不过，当几个月后任命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担任对外新闻司司长时，他肯定知道她的政治倾向。

尽管马德里的共产党日报《工人世界报》六月十八日发表了逮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消息，但是，巴塞罗那的共产党报纸直到六月二十二日才提到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佛朗哥将军联系起来的所谓间谍组织。“几天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的喉舌《消息报》报道说，“警方在巴塞罗那发现了一个专门在各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的重要组织。……最基本的小心谨慎使我们不得不……对警方这一重大行动保持沉默，否则的话，我们可能使整个行动无功而返。不过现在……我们可以告诉读者一些与这个庞大的间谍组织有关的事实，其最干练的成员已经渗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警方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逮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所有领导人以及看来与这个间谍组织来往密切的大批外国男女。目前，被捕的人数估计达到三百人。在占领该党办公活动场所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因此，犯罪分子无论如何也无法否认他们的罪行。”

在随后的那一段时间里，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通过报纸和演讲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人的谴责，指控他们是间谍和叛国者，把他们比作苏联的“托洛茨基分子”和“阴谋破坏分子”。

六月二十五日，《红色阵线报》宣称：

从内战爆发开始.....在集会和报纸上，在官方的政府机构中，我们党不断要求对间谍、奸细和法西斯的代理人采取严厉的措施。即使我们不能根据已有的历史经验了解法西斯间谍活动的方式，也可以通过观察苏联对那些为希特勒效力的托洛茨基分子和阴谋破坏分子进行的审判对此具有充分的认识。.....然而，由于漠不关心并且缺乏间谍活动应当受到惩罚的意识[这说的是拉尔戈·卡瓦列罗]，任凭几个月的时间过去却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不过，在现政府的领导下，这种态度如今已经得到纠正，而且我们现在掌握了与我们的指控相符的证据。.....正如斯大林同志多年以前令人钦佩地指出的那样，托洛茨基分子不再是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一个派别，而是一帮刺客、破坏分子和间谍，他们受雇于盖世太保，在盖世太保的指挥下行动。[这个国家的]托洛茨基分子，所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人，与苏联的叛徒和卖国贼没什么区别，他们为佛朗哥效劳让人感到意外吗？.....现政府已经对间谍和叛徒采取了坚决的措施，而且我们确信，它将加强控制毫不放松。我们的事业的前途要求我们不能表现出任何软弱或顾虑。必须消灭所有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为敌人效力的人。

在相继逮捕并拘押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以及大批党员和外国支持者——其中一些人被杀害，或者被关押在秘密监狱里没有受到正式的指控——之后，镇压蔓延到其他城市，很快又蔓延到阿拉贡前线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部队，在那里，它的第二十九师被解散。这个师的一些人躲进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部队避难；另一些人遭到监禁或枪毙，其中包括最受人尊敬的师政治委员马西亚诺·梅纳；与此同



时，许多人被征召到政府控制的部队里。

全国劳工联合会毫不迟疑地做出了反应。在一篇题为《我们面对着第一份账单？》的言辞激烈的长篇文章中，曾任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商业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胡安·洛佩斯写道，尽管他既反对正统的共产党人也反对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但是，当他看到把那些毕生与资本主义制度做斗争的人描绘成希特勒的盟友时，仍然感到义愤填膺。“我们的革命不能堕落到这种程度，以致消灭各个反法西斯派别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惯例。……把自己的政治独立抵押出去，西班牙还不到为了获得帮助付出这么高代价的地步，只要帮助是以无私的方式进行的，我们接受并表示感谢，但当账单递过来时，我们不得不拒绝帮助。由于出现了某种令人难以容忍的新的迫害，西班牙革命的实质变得越来越不纯粹。……如果我们告诉共产党的同志们，等到西班牙人民发现他们代表着引进独裁专制的危险的那一天，就连西班牙的石头也会飞起来砸向他们，他们务必不要大惊小怪。”

在挫败加泰罗尼亚地区军事叛乱一周年纪念日，地下出版的《战斗报》发表了以下宣言：

在这一英雄事迹发生十二个月之后……工人阶级的死敌机会主义分子……纠集大批人马对无产阶级革命组织进行了突然袭击。这些卑鄙的流氓由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豢养并指挥。

为了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护，他们狡诈地采取惯用的伎俩，声称他们对付的是“不法分子”和“间谍”。但这根本不是事实。在巴塞罗那的各个监狱——其中一些是不透光线和空气的阴森地牢——成百上千的工人和农民在呻吟声中慢慢死去，他们中的一些人最近刚从前线回来，大部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

他们没有犯罪。在工人们看来，他们问心无愧，不该受到任何惩罚。只是根据为满足共产党及其附庸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需要而制订的政策，仅仅因为他们是不向.....持有共产党党证的反动寡头屈膝投降的党派组织的积极分子，这些工人和农民才被抓进监狱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曾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部队中作战并在镇压期间设法逃出巴塞罗那的乔治·奥威尔写信告诉一位朋友：“我们的所有朋友和熟人[几乎]都被抓进了监狱，而且很可能被无限期地关在里面，实际上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只是怀疑他们是‘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在我离开以后，最可怕的事情继续发生：大批抓人；把伤员拖出医院投入监狱；人们被成批塞进阴暗的地牢，那里连躺的地方都没有；囚犯遭到殴打并饿得半死，等等，等等。与此同时，除了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关系密切的独立工党[ILP]的报刊外，英国新闻界不可能得到这方面的任何消息。”

在六月十六日抓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行动中，作为头号目标首先被捕的是党的书记、私下里最让斯大林感到头疼的安德烈斯·宁。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享有盛名的安德烈斯·宁撰写并翻译过许多著作，红色工会国际（Профинтерн）创立初期，作为负责西班牙语国家以及意大利和法国的书记，他担任着重要的职务。他被带到马德里附近的一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监狱，在徒劳地试图逼迫其承认佛朗哥将军以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从事间谍活动——对于成功地进行一场莫斯科式的公开审判，宁的供述必不可少——的过程中，对他进行了残忍的折磨。此后，人们再也没有见过他。

当时被捕并被押往巴伦西亚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胡利安·戈尔金写道：“斯大林及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爪牙并不想简单地把宁和他的主要战友一杀了

事，……而是希望进行一场效仿莫斯科审判方式的公开审判，在共和国法律的外衣下，指控、定罪然后立即处决我们——在那些所谓人民民主国家里，后来也进行过这种审判。这一层法律的外衣是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逮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几天后]所颁布的一项法令，其适用范围广泛而且明确，足以监禁甚至消灭所有反对内格林政府的人。……这项法令没有得到议会的批准，此外，它所设立的间谍和叛国罪法庭由政府自己任命的三名文官和两名军官组成[并被授予秘密开庭的权力]。因此，它的专政特征——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它的行政特征——显而易见。这项法令规定了以下几类罪行：‘在西班牙国内外采取针对共和国的敌对行动；传播不利于军事行动的消息和看法并为之辩护，传播有损于共和国名誉与威信的消息和看法并为之辩护；举行旨在削弱公众士气的集会和示威；采取使军队士气低落或损害集体纪律的行为。’ 刑罚从最少在狱中服刑六年[零一天]到死刑不等。……不过，最严重的问题是，这项法令具有追溯效力。”

警察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采取的行动和上述法令——它允许进行秘密审讯并根据军法规定了“非常简单的程序”——令人生畏的适用范围使反对内格林政府的人警觉起来。六月二十八日，在一份致共和国总统、议会议长、政府总理、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以及各党派组织全国委员会的声明中，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抗议说，在“消灭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开启了危险进程”之后，紧随其后的将是消灭其他少数派政党；而司法部长所签署的“设立特别法庭秘密进行审判”的法令看来是对“西班牙共产党和苏联图谋的进一步退让”。“我们认为，西班牙的自由主义运动对此不可能表示赞同。”同一天，巴斯克斯公开宣称，他反对法令的政治倾向。他说，政府的所有反对派以及任何谈论政府或向政府示威的人都在法令的适用范围之内。“例如，这意味着此时此刻我有被控告的危险，明天我可能被逮捕，然后可能被秘密判处六个月零一天徒刑或死刑——以致你

们不会知道我[被控]犯了什么罪，也不会为之而羞愧。”另外，杜鲁蒂之友会的喉舌《人民之友》声称：“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所捏造的陷害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同志的间谍案耸人听闻。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奉命炮制这个兼具西班牙和苏联特色谎言的竟然是一位天主教徒政府部长[巴斯克民族独立党人司法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我们不应容忍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所玩弄的花招。我们务必记住，不久之后在同一个法庭上受审的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积极分子。”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有足够的理由警觉起来，尽管捣毁其各级组织的计划尚未提上议事日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被捕之后不久，西班牙共产党的宣传鼓动部门声称，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活动场所缴获的文件提供了“托洛茨基分子叛国的充分证据”。接着，它开始向全国劳工联合会提出挑战。“曾经大胆地公然为托洛茨基分子辩护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现在有什么话要说？曾经捍卫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并且为其辩护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现在有什么话要说？在关于托洛茨基分子叛国的压倒性证据被警察发现之后的今天，任何胆敢提出抗议并为他们辩护的人肯定将被视为他们的帮凶。……[那些]可能出于正直而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辩护的无政府主义同志们有责任公开明确地承认错误，并且像所有真正的反法西斯人士要求的那样，以同样的忠诚和热情要求毫不留情地惩罚叛徒。”

在欧美各国为营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而开展的一场坚持不懈的活动中，该党的外国朋友严厉谴责了西班牙政府的上述法令。像英国独立工党一样通过革命社会党国际协调局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联系的美国共产党（反对派）的喉舌

《工人时代》断言：“现在据以指控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这项法令是……给他们安上所谓‘罪名’之后颁布的。也就是说，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

人所依据的是一项具有追溯效力的法律，按照斯大林主义者谎称其严格遵守的那些自由民主的原则，这是一种恶劣的司法专制行为。”

一个由英国下院议员、独立工党主席詹姆斯·马克斯顿率领的国际代表团访问了西班牙，为了找到安德烈斯·宁并且向其他被捕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提供包括公开审判在内的法律保障，它代表各国加入革命社会党国际协调局的政党对西班牙政府施加压力。在八月代表团首次访问期间，国防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透露了西班牙政府的困境，当时他对代表团的法国成员马索·皮韦尔和达尼埃尔·介朗说，代表团代表的“只是那些几乎没有向西班牙提供什么帮助的国家”，而“苏联人却运来了武器，使西班牙共和国能够进行抵抗”。代表团成员从这种含蓄的批评中得到了“明确的印象，国防部长是在暗示，苏联要求以援助换取政治补偿”。

因为没有取得进展，由巴黎大学教授费利西安·沙莱和英国独立工党下院议员约翰·麦戈文组成的第二个代表团十一月访问了西班牙。“直到十一月底，[我们]没有谈到审判，”麦戈文报告说，“我们主要担忧的不仅是继续监禁，而且还有失踪的人，对[贝尼托·]帕冯先生公开发出的死亡威胁也让我们心神不安，他是受聘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囚犯进行辩护的西班牙著名律师[结果被迫逃往国外]。契卡[秘密警察]滥施暴行的证据越来越多。”

尽管司法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试图提供帮助，但他无权准许代表团前往关押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监狱探视。“面具被摘掉了。”麦戈文写道，“我们撩开帷幕，看到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部长愿意，但没有权力。契卡不愿意，它掌握着权力。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继续施压，我们自己会有危险。……作为与苏联援助的武器的交换，共产国际得到了这种专制的权力，它用这一权力监禁、折磨并且杀害不赞成共产国际路线的社会党人。……根据对共产党人策略的研究和经

验，我坚信，帮助他们在工人运动中赢得一席之地的是愚蠢的罪恶。就我而言，我无法原谅他们的行为，也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表示歉意。人类的尊严要求揭露他们的残暴手段。”

共产党人的手段与共产党所宣称的温和目标形成对照，因而在它谋求其帮助的民主国家造成了某种恶劣影响。在写给温和的西班牙社会党执委会的一封信中，著名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领导人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者恩里克·德·弗朗西斯科指出，自由派人士和工人阶级普遍认为，在政府中“共产党人占据了主导地位”，最近在社会治安领域发生的事件已经使“世界上具有良知的人们忧心忡忡”。与此同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巴伦西亚通讯》坚称，西班牙共产党“卑鄙的清除异己政策”应对外国民主阵营热情的衰退负责，民主国家或人民群众不可能因一个国家被共产党人“推动并控制”而受到鼓舞，在这个国家，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共产党人宣传的专政”。

一九三七年十月，在马德里的帕迪尼亚斯剧院，拉尔戈·卡瓦列罗发表了他在西班牙的（最后一次）著名演说。利用这个机会，他强调了共和国事业在国外所受到的损害。“你们都知道，”他说，“由于某种势力的行动，发生了一些至今仍未查清的不幸的人员失踪案。这种势力不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一个国中之国。同志们，事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以致国际组织[革命社会党国际协调局和第二国际]的代表专门到西班牙来调查事实真相，他们亲口告诉我：‘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无法唤起国外同志们们的热情，因为他们怀疑影响并且统治着这里的人是共产主义分子——他们明确地这么说——所以大家都在问，如果只是使共产党人控制了西班牙的命运，是不是应当帮助它。’”

在此期间，被带到马德里附近埃纳雷斯堡的一座秘密监狱的安德烈斯·宁在劫难逃。

为在西班牙进行公开审判榨取需要的供词未果之后，折磨他的人除了把他干掉别无选择。胡利安·戈尔金说，曾任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恩里克·卡斯特罗在脱离共产党之后向自己保证，“亲自处决安德烈斯·宁”的是他的前第五团战友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奥尔洛夫挑选其作为“处理安德烈斯·宁案件的直接合作者”。不过，因为安德烈斯·宁是国际知名人士，所以，对他的失踪必须有所解释。于是，据前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维达利伪造了一次从埃纳雷斯堡的秘密监狱“解救”安德烈斯·宁的纳粹偷袭，国际纵队的十名德国成员实施了这次假装的偷袭，他们将宁劫走，留下可以作为罪证的文件，以显示宁与纳粹秘密警察的关系。

每当有人提出“宁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时，共产党人就用宁被盖世太保解救的说法解释他的失踪。实际上，一九三九年我在墨西哥遇见维达利本人时，他试图使我相信的正是这种说法。米哈伊尔·科利佐夫提供的说法也是如此。“被告安德烈斯·宁……被一伙由西班牙人和德国盖世太保特工组成的法西斯武装分子劫走了，”他写道，“他们闯进地方中转监狱，在警卫不足的情况下，宁被暂时关押在那里。”

关于宁被解救的另一种说法稍有不同，它没有明确提到盖世太保牵连其中。当时最积极的亲苏观点传播者之一、法国共产党报纸《人道报》驻西班牙记者乔治·索里亚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发表在共产国际的喉舌《国际新闻通讯》上，大肆宣传这种说法，这些文章后来被编辑成一本题为《为佛朗哥效劳的托洛茨基主义》出版。不过，四十年后，在试图开脱西班牙共产党人对宁的死亡的责任时，他说，“‘安德烈斯·宁在什么地方？在萨拉曼卡还是在柏林？’在西班牙以这种相提并论的方式对宁的指控只不过”是“……苏联手段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运用，这种手段构成了后来所说的‘斯大林主义’的最肮脏的阴暗面”。大量证据清楚地表明，索里亚接着说，宁的失踪应归因于“不祥人物奥尔洛夫策划的阴谋”。“对西班牙内政”的这

—“明目张胆的干涉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西班牙共产党坚决否认与此事有任何关系。然而这并未缓解由此引起的导致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组织关系恶化的争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产生了两种意见：一方面，关于包括安德烈斯·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是‘盖世太保和佛朗哥的间谍’的罪名只是捏造的一种谎言，因为不可能举出任何证据来。另一方面，尽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既不是佛朗哥的间谍，也不是盖世太保的间谍，但是，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他们与人民阵线的不懈斗争确实帮了首领[佛朗哥将军]的忙。”

索里亚和另外一些作家竭力将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以及安德烈斯·宁失踪的责任转嫁给“斯大林主义”这一现象——这符合七十年代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非斯大林主义倾向——企图以此为西班牙共产党开脱，但是，他们的尝试经不起认真的调查研究，因为，从内战最初的几个月起，共产党的所有领导人和所有报刊，无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就以宗教般的虔诚开始进行这场圣战。这场起源于莫斯科的圣战的缘由无关紧要，因为，正如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后来所断言的那样：“[即使]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杀害安德烈斯·宁的行动可能是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部门实施的，那也要归因于西班牙共产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力以赴的积极配合，一切进行得协调默契。”

人们应当记得，就在采取突袭行动仅仅五周前，正是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在五月事变之后立即宣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一伙为国际法西斯主义效劳的间谍和奸细”，因此，应当把这些托洛茨基分子“歹徒”从所有文明国家清除出去。此外，人们还应记得，正是担任安全总局局长的共产党人安东尼奥·奥尔特加中校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指示下令采取了突袭行动，正是担任巴塞罗那警察部队指挥官的共产党人里卡多·布里略中校实施了这次突袭行动，而且，将安德



烈斯·宁带到埃纳雷斯堡的秘密监狱遭遇杀身之祸的那些警察也是共产党人。

杀害宁的确切方式始终没有得到证实。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在西班牙被害还是用船运到苏联生死不明。当时担任内政部副部长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在回忆录中说，他和内政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专门派了一名警探去马德里对宁的失踪进行调查。这名警探报告说，宁被带到埃纳雷斯堡一所“共产党契卡”使用的私人住宅，可以听到里面传出“尖叫和呻吟”，一天早晨，一辆大卡车装着一个板条箱开往阿利坎特，到了那里，它在一艘苏联轮船旁边停下，然后，这名警探认为，宁活着离开了西班牙。

四十年后，这种说法得到一个名叫哈维尔·希门尼斯的人的支持，但是并没有得到确证。在接受马德里的《变化16》周刊采访时，希门尼斯说他是当年被派往巴塞罗那突袭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马德里特警部队[Brigada Especial]成员。他不仅宣称曾在马德里目睹了为使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敌人的间谍活动有牵连而伪造宁签署的文件的过程，他还宣称曾在战后遇见过把他和其他特警部队成员送到巴塞罗那的汽车司机，司机承认后来把宁从埃纳雷斯堡送到巴伦西亚，“苏联轮船等在那里”。

无论宁的命运如何，共产党人及其盟友顽固坚持他被纳粹突击队解救的说法。他们坚称，盖世太保承受不了共和国警方就德国秘密警察在西班牙的活动审讯这名有用的间谍的后果。

一九三八年叛逃到美国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揭露并且谴责了斯大林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其他国家犯下的许多暴行，但是却对他们在西班牙所犯的暴行保持沉默。在他的著作、文章以及向美国参议院专门委员会所做的证词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或宁的失踪。然而，

在他叛逃多年以后进行的一次私人谈话中，当伯特伦·D·沃尔夫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参与了杀害宁的行动吗？”奥尔洛夫回答说他没有，他说他甚至不认识宁，他在西班牙的任务“仅限于反间谍行动和在叛军占领区开展游击战”——他对自己活动的描述是老生常谈——因此，他从未接受过“杀人的任务”。当然，他不可能让自己受到牵连。他也不可能亲自杀害宁；这项任务可以让别人来执行。

一九五三年，奥尔洛夫的文章《斯大林政权的可怕秘密》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后，他否认自己与宁的被害有任何关系。这一否认是《生活》杂志的编辑在答复客居加拿大的自由共和派人士海梅·米拉维特列斯的来信时代表奥尔洛夫做出的：“如果还要承担暗杀任务，他不可能从事他的‘外交’工作（指挥反情报活动和游击战）。奥尔洛夫说，那些任务由莫斯科派来的一个秘密清洗人员特别小组执行，其中的博洛丁可能是杀害安德烈斯·宁的特工。”然而，十五年后，在回答斯坦利·G·佩恩那份经常被引述的问卷时，奥尔洛夫却把责任全部推到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头上，没有任何关于克里姆林宫通过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特工组织——作为负责人他肯定要对特工组织的行动承担责任——插手其中的暗示。“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怀有私人恩怨，”因此，他说，“宁的失踪是一种政治报复行为。”

安德烈斯·宁的失踪给希望在西方社会的心目中为自己营造宪政声誉的内格林政府以道德上的沉重一击。总理的办公桌上高高地堆起了来自国外的抗议电报和信件。国际反响使内格林烦恼不安，他的政府在组成仅仅一个月后所蒙受的耻辱最初让他恼羞成怒。不过，根据内格林的支持者比达特的回忆录判断，他似乎更关心镇压的非法性而不是镇压本身。“我当时认为而且三十多年以后仍然认为，”比达特写道，“内格林与共产党人之间在策略方面可能存在着某种默契，以此交换他们答应给予的无条件的政治支持并且运送因为北方的失败和马拉加的陷落而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需要的武器装备，……内格林将允许他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除掉某个武装起来与政府作对的反对党。”从内格林在五月十三日内阁危机期间所采取的已经得到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证实的立场来看，显然，甚至还在成为总理之前，他就支持共产党人消灭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要求。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声称自己并不知道宁的下落，还说自己曾以若不通知内政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将会引发一场“惊人的政治丑闻”为由，反对采取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策划的针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突袭行动。他证实，听说宁失踪的消息时，内格林很恼火。

“你们的人把宁怎么样了？”内格林问他。“内格林带着明显的怒气告诉我，内政部长已经向他报告了苏联秘密警察在巴塞罗那所实施的一系列暴行，他们表现得好像是在自己的国家，逮捕西班牙公民时，就连作为一种礼貌通知一下西班牙当局都嫌费事。在没有法官授权的情况下，他们把所逮捕的西班牙公民从一个地方押解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关押在完全不受合法当局监控的私设监狱里。……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我能告诉他的是，像他一样，……我也想知道宁在哪里，而且我讨厌奥尔洛夫和他那一伙秘密警察。但我决定不对他说。我可以感觉到我党受到了暴风雨般的冲击，因此决心捍卫它，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捍卫党必定意味着为可能发生的罪行进行辩护。”

虽然无法证实埃尔南德斯是否像他所宣称的那样义愤填膺，但内格林最初的反应非常可信。同样不容置疑的还有苏加萨戈伊蒂亚和司法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所表示的愤慨，他们在政府保留的所有合法监狱里找不到宁。伊鲁霍证实，他指派一名法官专门处理这一案件，后者下令逮捕“大批涉嫌犯罪的警察”，其中一些“被发现躲进了苏联大使馆”，几天后，一支特警部队（brigada especial）企图逮捕这名

法官。当时，伊鲁霍在两次内阁会议上“直接”提出这一问题，并以辞职相威胁。

内政部长对这两次讨论宁失踪问题的内阁会议的描述是“近乎野蛮”。据埃尔南德斯说，内政部长想知道，他的权限是不是必须“根据某些苏联‘专家’的意见来决定”。“共产党人政府部长狂热地为他们的同志[安全总局局长奥尔特加]进行辩护。”苏加萨戈伊蒂亚说，“我声明，安全总局局长可以留任，但是如果那样的话，我将辞去我的职务。立场坚定的普列托痛斥了共产党人的辩论方式并表示支持我的态度，如果不撤换奥尔特加，他将与我一起辞职。”

“当我们声明我们不知道宁的下落时，”埃尔南德斯写道，“[内阁里]没有人认为我们是诚实的。我们辩解说，苏联‘专家’和‘顾问’的存在体现了一种‘无私的’援助。……我们再次强调了苏联提供的大量武器以及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从苏联那里得到的帮助对于我们的事业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由于气氛继续弥漫着火药味，……我做出了让步，同意以超越职权而且没有及时通知部长为由将替罪羊奥尔特加中校撤职，但是我还威胁说，要把所有显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罪的文件以及政府内外那些以‘简单的程序问题’为借口包庇该党间谍分子的人员名单公之于众。”埃尔南德斯承认，这一策略“蛊惑与欺骗”兼施。“内格林采取调解的态度，他建议停止辩论，等……我们掌握了共产党人部长所提到的全部证据而内政部长也可以告诉我们关于宁的下落的确切消息时再说。我们度过了第一场毁灭性的风暴！”

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加夫列尔·莫隆取代奥尔特加中校担任安全总局局长。读者还会记得，苏加萨戈伊蒂亚曾经任命莫隆为安全总局副局长，以保证警察部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能知道。但是，莫隆履新从一开始就在劫难逃，他只干了几个月，因为，据他那部披露内情但鲜为人知的回忆录记述，他严厉整顿警察部队的尝

试“因共产党人的抵制半途而废”。他断言，共产党决心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进行抵制，直至“把我‘赶出’ 警察部门”。由于“社会党人政府部长在对待[安德烈斯·宁失踪这一]丑闻时表现出来的怯懦畏缩、同流合污以及保守克制”，共产党的抵制成功了。人们始终认为属于普列托的西班牙社会党温和派的莫隆极其愤怒地猛烈抨击了政府中最有威信的政治家、国防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与其他任何人相比，他最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站出来彻底消除共产党人对安全部门的影响。……然而，这位著名的国会议员实际上对此毫无兴趣。”

莫隆对司法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也不客气：“伊鲁霍先生、内阁全体成员、公诉人和我都很清楚在哪里可以找到最应当为宁被劫持负责的人。”但是，莫隆说，伊鲁霍及其手下的那些法官认为，通过放任低级警官随意执法，他们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莫隆告诉苏加萨戈伊蒂亚，如果内政部长真的想把对宁的失踪直接负责的人绳之以法，他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因身陷令人烦恼的环境而深感悲伤和痛苦的司法部长决定，‘不能再做任何事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离开了安全总局。”

从内阁部长的怯懦畏缩来看，显然，他们不希望对安德烈斯·宁失踪案的调查过于认真。证据来自内政部副部长比达特。他说，莫隆“怒不可遏”地对内政部长说，“‘既然总理坚决要求知道真相，你可以告诉他，劫持安德烈斯·宁的行动是意大利人[比托里奥·]柯多维拉策划的，是“指挥官卡洛斯”[维托里奥·维达利]和陶里亚蒂策划的，是包括[总书记]佩佩·迪亚斯在内的共产党领导人策划的。刑讯他的命令是奥尔洛夫下达的。把这告诉内格林。如果他想让我逮捕他们，今天上午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全部投入监狱。’部长感到不知所措。由于逮捕这些人的政治含义，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毫无疑问，他必须立即告诉[内格林博士]，于是，谁应当对劫持或者杀害宁负责的问题再也没有被提起过。结果形势依然如故。”

从内政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以及其他内阁成员无意采取有力的行动这一情况来看，显然，尽管对宁的失踪最初感到义愤填膺，但是，由于担心招致唯一的武器供应者和监管西班牙黄金的苏联不满，他们并不想对这一事件的最终结果进行调查——不想揭露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以及密切地与其合作的人。据普列托后来说，当苏加萨戈伊蒂亚开始调查宁的失踪从而“即将发现丑恶的真相”时，内格林下令停止调查。如果这一情况属实的话，那么，同样属实的情况还有，总理始终表现得顺从而且无用，以致他的内阁丧失了功能。仅仅过了几个星期，八月十四日，为了压制新闻界对苏联的所有批评，内政部长发出了一个严厉警告。这一警告显示，政府决不会认真调查宁的失踪案并揭露其苏联制造者。

在声称有人好像“蓄意企图冒犯一个非常友好的国家，以此给政府制造麻烦”之后，内政部长警告说，一些报纸把苏联与那些“正在入侵我国领土”的国家相提并论。“这种绝对应当受到严厉斥责的放肆行为不可能得到审查部门的允许，因此必须立即停止。”如果不“严格”遵守这一命令，冒犯苏联的报纸将被无限期停刊，审查校样的书报检查人员将在“审理阴谋破坏罪的特别法庭”受审。

并非巧合的是，就在仅仅三天前，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向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舆论工具《巴伦西亚通讯》发出警告，要求其停止对苏联的进一步指责：“小心点，你们这些《巴伦西亚通讯》的反共分子！由于任凭自己被仇恨和恶意所驱使，你们正在用西班牙人民的利益赌博！在所有西班牙人的心目中，苏联，它的政府和它的人民，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再也不允许任何人把它们当作辱骂、诋毁的对象和恶毒攻击的目标。够了！人民将严厉斥责那些自以为可以攻击和伤害其最可爱的朋友和最坚定的保卫者——这位朋友和保卫者正以完全无私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帮助人民——的家伙。他们的目的是在两国人民之间造成猜疑和不信任。我们再也不会允许苏联的敌人和西班牙人民的敌人为所欲为。警觉起来的人民决心让他们住

口。”

但是，新闻审查对最有力最激烈地抨击苏联的印刷品无能为力。它们是秘密刊行的传单和报纸。八月十四日，地下出版的《战斗报》谴责了“苏联秘密警察的干涉”并且说：“一支与斯大林分子控制的西班牙警察关系密切的特种政治警察[部队]对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以致名义上的执政者几乎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主，而在他们背后，在把他们牵连进去的情况下，斯大林主义以罪恶的方式行动。”《战斗报》指称，在圣乌尔苏拉警察局，有一些苏联秘密警察人员与“当地的斯大林分子”共事，他们引进新的刑讯手段，“用痛苦和恐怖获取对黑暗的斯大林主义政治有用的声明和供述。……我们说的每一件事情在巴伦西亚众所周知。内政部长和整个政府也都知道。但是，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只能私下采取行动，……因为他们被斯大林分子当做人质，在政府里并不自由。为了破坏我们的革命，斯大林分子一直在用苏联的援助极其无耻地敲诈他们”。

考虑到据内政部长本人说，内政部和安全总局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和亲信的老窝”这一事实，一点也不奇怪的是，撤换奥尔特加中校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让步，它几乎没有削弱共产党人在安全部门的影响力，因此，奥尔特加的继任者加夫列尔·莫隆很快就被迫离开了安全总局。

尽管宁失踪的丑闻使西班牙共产党人处境尴尬，但是，这给他们带来的困扰微不足道。他们认为，克里姆林宫的主要目的——实际消灭最让其恼火的批评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已经达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的大部分领导人进了监狱，它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积极分子和外国支持者被监禁或者被枪毙，它的报纸被禁止出版，它办公活动的场所被占领，它的民兵武装被解散，因此，它再也不能有效地活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卡斯特利翁和巴伦西亚市议会的代表直

到一九三七年底才被除名，而新组成的执委会不仅继续与前线后方的党员联系，甚至还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拜访了内政部长。此外，在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帮助下，转入地下的党报《战斗报》及其青年组织的喉舌《工人青年报》（前《共产主义青年报》）秘密出版，但是，新的执委会成员在一九三八年四月遭到逮捕，此后直到内战结束，残余的党组织只是断断续续地有所活动。

内格林对宁失踪的愤怒逐渐消失。仅仅过了一个月，在与阿萨尼亚总统交谈时，他顽固地支持宁被盖世太保劫走的说法。“他不相信这是共产党人所为。”阿萨尼亚在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评论说，“共产党人当然对这种想法感到愤慨。内格林认为，为了防止宁招供，盖世太保……将他劫走。”“这不太离奇了吗？”不大相信的阿萨尼亚反问道。“不，先生。”内格林回答道。接着，为了使总统对“可怕的”盖世太保的效率印象深刻，他告诉后者，纳粹秘密警察企图对马德里的苏军参谋部投毒。

没有理由认为内格林比他的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两位部长肯定掌握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涉案的足够证据，只是迫于对苏联的尊重才没有公开揭露这个主谋——更加相信这种关于宁失踪案的牵强说法。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相信那些显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事间谍活动的文件的真实性，因为伊鲁霍在会见宁的妻子时告诉她：“只有‘另外几位部长’的亲信可能知道宁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这一起间谍案是捏造的。……我看到的那些文件是关于长枪党的，其中写有字母‘N’的那一份被证明是伪造的，因为有人从警察局的档案里拿走了这些文件然后添加上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关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审判不会秘密进行，至于我，为了使他们能够为自己辩护，我将向他们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但是，四个月后，伊鲁霍辞去司法部长职务。在十二月十一日对其工作人员发表的



告别演说中，他强调了保持“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他“完全不同意”法庭可以“根据政府的意见和要求实施法律”的观念。从他的兄弟和私人秘书安德烈斯·马利亚·德·伊鲁霍所撰写的回忆录来看，显然，他暗指的是共产党人企图影响审判过程。以曼努埃尔·德·伊鲁霍的个人回忆为主要依据的这本书赞许地引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民族报》所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内容，文章谈到伊鲁霍本人与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在政治上关系紧张，因为“他们决心改变司法制度”。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暗指的还有他与内格林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颁布的设立特别安保法庭的法令所产生的重大意见分歧。特别安保法庭将设立在“政府认为必要的地方”，像审理间谍和叛国罪的特别法庭一样，它被用来“镇压间谍、叛国和失败主义等明目张胆的罪行”，它采用军事法庭的“简易程序”，因此，不用说，它不必保证被告得到辩护的权利。在一九三八年所写的一份关于这些特别法庭的备忘录中，曼努埃尔·德·伊鲁霍证实，内格林委托最高法院成员马里亚诺·格兰多斯起草一份法令，设立一种效仿法西斯意大利的镇压工具秘密警察法庭的法庭。按照内格林的要求，司法部副部长、总理的朋友和支持者马里亚诺·安索把法令交给伊鲁霍，让他提交给内阁，但是，部长把它压了下来，没有提交内阁批准。于是，在作了一些使他能够越过司法部长的修改后，内格林以总理的身份亲自提出了这项法令。“像多次出现的情况一样，内阁会议开得艰难而混乱。”伊鲁霍的备忘录回忆说，“我用大量修正条款把特别安保法庭改变成为一个法庭。即便如此，我在辩论结束之后告诉内阁，如果通过的法令文本在《共和国官方公报》上颁布，我将在它发表时辞职。我无法对法令追求的目的视而不见……也无法对实施它所采用的政治手段视而不见。”尽管伊鲁霍告诉阿萨尼亚，如果他签署这项法令，自己将辞职，总统却无视这一警告，结果，司法部长被内格林的亲信马里亚诺·安索取而代之。

我们现在必须问一个相关的问题。镇压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

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以及罢免拉尔戈·卡瓦列罗对战争的进行有什么影响？具有三十年党龄的著名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共产党政策的主要分析家和批评者的费尔南多·克劳丁做出了回答：“[由于]执行莫斯科的指令罢免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总理职务并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进行镇压，西班牙共产党对工人群众内部分裂的加剧负有责任，同时极大地削弱了共和国的战斗力。”

## 第四十九章 与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关的重要情况

由于不断推迟，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才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进行审判。尽管审判在内战临近结束时进行，但是，为了主题的完整性，有必要暂时抛开严格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叙述的常规。

长时间推迟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原因可以归为以下几个：

1. 据通过革命社会党国际协调局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联系的美国共产党（反对派）的喉舌《工人时代》所发表的一篇报道，主要原因是适用何种法律的问题，普通法律还是军事法律。报道说：“这个问题关系到控辩双方使用的所有法律依据。”此外，辩方律师坚持认为，不能根据指控的罪行发生之后通过的法律审判他的委托人。“因为法律显然不能追溯既往，”报道接着说，“控方于是改变了策略，根据两项以前的法律进行了同样的指控。”

2. 第二个原因是革命社会党国际协调局在欧洲和美国开展的要求进行自由公开审判的运动，这场运动得到了第二国际和第四国际以及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支持。由于这场运动，在巴塞罗那进行一场莫斯科式的装模作样的审判的计划未能按照预想迅速落实。

3. 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共产党人的威胁恫吓，找到并且留住合格的被告辩护律师非

常困难。最初，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派曾在共和国早期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辩护的贝尼托·帕冯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辩护。可是，刚一得知自己将要担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律师，他就开始收到威胁要杀死他的匿名信，结果他最终被迫逃往国外。他在写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我确信留在西班牙可以向你们的同志提供什么保证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留下，即使违背我自己的利益。……近来，在西班牙反法西斯阵营中，一种理论被人们接受，它比我们在最专制的君主制时期所能想象的更加荒谬。这种理论是，为某个案件进行辩护的律师可能因此被指控为指控其委托人所犯罪行的同谋。……在这种一夜之间便可捏造谎言伪造罪证的环境中，在不可能针对他们想要安在我头上的所有罪名为自己辩护的情况下，你们能够告诉我，如何保证我的角色不会从辩护律师变成被告之一吗？”

由于帕冯的退出，又聘请了法国最著名的出庭律师亨利·托雷斯，但是，西班牙政府不允许他向被告提供法律帮助。“我们聘请了一位外国律师。”关押在巴塞罗那国家监狱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囚犯发出呼吁，“正如拉科西和季米特洛夫案件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做法甚至被匈牙利的霍尔蒂和德国的希特勒所接受。但是，共和国政府否定了我们的这种做法。我们的律师……迫于斯大林分子的暴力威胁不得不辞职逃到国外。另一些律师虽然非常同情我们，但是不敢接受为我们辩护的工作。在我们保证其家人安全的条件下，一位律师接受了！对斯大林主义恐怖的恐惧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身陷囹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苏联给予西班牙政府的援助付账。如果说我们还没有付出我们的生命的话，那得归功于国际劳工运动的团结。幸亏世界工人阶级头脑清醒。他们知道利害关系。”由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聘请的资历较浅的社会党人青年律师文森特·罗德里格斯·雷维利亚承担起辩护的全部责任。事实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伦敦的）共产党报纸《工人

日报》从巴塞罗那报道说，“为了允许辩方为案件作准备”，审判多次推迟进行。

随着开庭日期的临近，西班牙共产党人加强了其影响审判过程的努力。“他们在工厂车间、酒吧餐馆和官场政界征集到要求判处死刑的签名。”被告之一胡利安·戈尔金写道，“……他们还在前线征集签名。拒绝签名的军官和士兵受到威胁，将对他们进行最凶狠的报复。”在共产党人的造势活动中，一本广泛散发的题为《西班牙的间谍活动》的书帮助他们。据说该书由一个名叫马克斯·里格尔的人写成，审判开始之前不久在西班牙和法国出版，正如另一名被告霍尔迪·阿克爾所说，其目的是“使公众对我们的罪行以及惩戒的必要性有思想准备”。该书受到各种各样的赞美，包括由持不同政见的著名天主教知识分子何塞·贝尔加明所写的一篇序言。贝尔加明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描绘成一个间谍组织，是国际法西斯组织在西班牙的一个分支。

这本书由著名作家让·卡苏——当时他被认为是一名“死板的”共产主义者——译成法文并由德诺埃尔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作者完全不为人知而且从来没有确定过他的身份。共产党的《红色阵线报》提到他时只说他是一名“工人社会主义者”，在国际纵队作战。根据内部信息可以肯定，这本书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共产党的帮助下撰写的，何塞·贝尔加明也十分清楚他在扮演什么角色。“革命和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之一……是那些被称为‘精神高尚、没有偏见的基督徒’的天主教徒。”在阿利坎特出版的社会党左派刊物《斯巴达克斯》写道，“……而西班牙最著名的此类人物之一是何塞·贝尔加明。”

贝尔加明与西班牙共产党人的亲密关系——一九三九年移居墨西哥后，他身边净是西班牙共产党人——使人想起他是多年以后出现在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运动的先驱之一。我们可以根据西班牙共产党员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一九三九年七月写给埃莉

诺·罗斯福的一封信来判断他对共产党人的重要性。莫拉在信中赞扬了贝尔加明在墨西哥的文化活动，她对美国总统夫人说，这象征着“西班牙文化的真正传统”，它“本质上是民主的”，可以被人们保持下去。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一日，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审判在巴塞罗那的间谍和叛国罪法庭开庭，审判持续到十月二十二日，尽管直到十一月二日才宣布判决。审判在外国记者出席旁听的情况下公开进行，并没有像人们最初担忧的那样秘密审理——这是因声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国际运动而作出的让步。陶里亚蒂在向莫斯科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不满地说，社会党温和派内政部长保利诺·戈麦斯在审判期间“禁止新闻界进行任何针对托派叛国分子的宣传”。然而实际上，戈麦斯听任《红色阵线报》无视禁令而不予惩罚。除了其他违反禁令的行为之外，《红色阵线报》当时还在头版以大字标题宣称：“人民要求惩罚法西斯间谍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犯下叛国罪行”。“事实无疑可以证明，”曾经担任工业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胡安·佩罗写道，“在禁止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报纸对审判的过程及其依据发表评论的同时，共产党和亲共的报纸继续享有污蔑被告的绝对自由，尤其是在审判之后的那几天，法庭考虑判决时。”

但是，有人说，胡安·内格林更煞费苦心地企图影响审判的过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说，最高法院院长马里亚诺·戈麦斯告诉他，内格林在审判期间去见他，要求把一些被告判处死刑，并且断言，否则的话，“前线将会发生溃败”。这是“共产党人的表达方式”，阿拉基斯塔因说，“由于尊严，马里亚诺·戈麦斯拒绝屈服于这种压力。”戈尔金提供了一种更加复杂的说法，与上述说法稍有不同。戈尔金的说法据说得到了最高法院院长写给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一封信的证实。根据这种没有说明事情发生在审判之前还是期间的说法，内格林把马里亚诺·戈麦斯以及司法部长、公诉人和间谍与叛国罪法庭的主审法官一起召到他的办公室，还把一堆电报堆在自己

的办公桌上。“军队要求判处被告死刑。”他们对他说，“前线的情况非常微妙，部队的士气有点低落。我认为必须满足军队的要求。……如有必要我将率领军队攻击法庭。”当马里亚诺·戈麦斯和司法部长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表示反对时，内格林“改变了语气”，据说他声称：“先生们，国际形势使我不得不要求你们做出这种牺牲。只要你们宣判死刑，我保证不会予以执行。”曾经担任《工人团结报》负责人的哈辛托·托里奥也提到过这种说法。他说，内战结束以后，马里亚诺·戈麦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亲口对他讲述了这件事情。

我们不可能忽视由三个不同的消息来源提供的这一证言，但是平心而论，我们必须指出，那份关键的证据——马里亚诺·戈麦斯写给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信——迄今仍未发现。我找到的唯一一份有意义的文件是存放在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内战期间所缴获的共和派文件的内战分部的一封电报。电报是内格林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审判的最后一天——发给其助手何塞·加西亚·巴尔德卡萨斯的，要求后者“刻不容缓”地“亲自”通知最高法院院长、公诉人和司法部长，请他们当天来见他，他还要助手“立即”让他知道他们的“答复”，以便他们不能来时他可以设法去见他们。

无论这封加急电报可能包含着什么意义，无论内格林在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过程中可能扮演了什么角色，西班牙共产党企图妨碍司法公正都是毋庸置疑的。据霍尔迪·阿克爾说，主审法官之一曼努埃尔·埃尔南多·索拉纳在法官会议上建议，应当以向法庭施加压力的罪名起诉所有给法庭写信、发电报或递交请愿书要求判处被告死刑的人，同时应当宣判被告无罪。这是一九五〇年埃尔南多·索拉纳看望阿克爾时告诉他的。埃尔南多说，这个建议在他的同事中引起了“一片混乱”，他们“担忧地”回应说，如果这样做的话，“共产党人将杀害他们[被告]”。不能比这更有力地说明审判进行时的恐怖气氛了。

尽管法官们承受着压力，他们仍然拒绝考虑从事间谍活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第二十九师在五月事变期间擅离阿拉贡前线的指控。判决书确认，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以任何形式向敌人提供过关于前线或者后方的情报。“另一方面，”判决书继续说，“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都是确定无疑的反法西斯人士（具有明显的反法西斯意识），他们为反对军事叛乱的斗争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唯一目标是超越民主共和国进而建立他们自己信仰的政治制度。”这种不同寻常的陈述证明，法庭成员拒绝完全屈服于恐吓。

几个因素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摆脱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

1. 那些显然是伪造的文件，尤其是用隐形墨水写上姓名首字母“N”的那一份，它们使审判成为笑料。当时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审判是一场庸俗喜剧，它在伪造的文件以及从一些可怜的佛朗哥间谍身上榨取的供述的基础上上演。尽管这些间谍得到保证，只要他们声称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保持联系就能活命，后来他们还是都被枪毙了。……‘证据’如此空泛和虚假，以致不可能把任何一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送到行刑队面前。在把这些证据‘准备’成文件的过程中，W.罗塞斯[文塞斯劳·罗塞斯，当时埃尔南德斯手下的教育部副部长]扮演了某种非常活跃的角色。”

2. 阿拉基斯塔因、卡瓦列罗、伊鲁霍、蒙特塞尼和苏加萨戈伊蒂亚所提供的对他们有利的证词。

3. 被告进行的有效辩护。

4.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没能取得安德烈斯·宁的供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青年组织总书记、后来在流亡期间成为党的书记的维莱瓦尔多·索拉诺强调了这一点的重要

意义。“宁在严刑之下对行刑者的反抗打乱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西班牙同伙的计划。宁的‘供词’将会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及其身陷囹圄的领导人造成某种戏剧性的局面，因为它将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可以像在苏联那样行事，让全世界看到西班牙也有‘托派叛国分子承认了他们的罪行’。……但是，由于宁的英勇牺牲，一场‘莫斯科式的审判’无法在西班牙进行。”

尽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摆脱了从事间谍活动和擅离职守的指控，他们仍然因为参与五月事变而被判处刑期不同的徒刑。由于企图利用“叛乱活动”“实施其夺取政权的计划……进而建立他们主张的社会经济制度”，恩里克·阿德罗埃尔、胡安·安德拉德、佩德罗·博内特和胡利安·戈尔金被判处十五年徒刑，而第二十九师政委霍尔迪·阿克尔则被判处十一年徒刑。虽然他没有参与巴塞罗那的五月事变，但是，判决书写道，“为了策划并且利用任何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革命计划的运动，他采取了与他的执委会同伙一样的行为”。两名被告被判无罪，长期以来无法公开活动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及其青年组织（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被正式取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外国朋友试图推翻法庭的判决，但是，三个月后巴塞罗那陷落，这些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囚犯设法逃到了法国。

判决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在道德和政治上的一场胜利，因为它明确判定他们都是确定无疑的反法西斯人士，而且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向敌人提供过情报。戈尔金认为，判刑是一种折中的办法。他说，从司法部长下面这一段话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被释放，他们将在街头遭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暗杀。由于安德烈斯·宁失踪的丑闻，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教训。”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外国支持者当然为审判的结果欢欣鼓舞。“这一切让那些



斯大林主义诽谤专家的脸往哪儿搁？”《工人时代》问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一个‘托派法西斯’组织，‘与盖世太保携手行动’，一年半来这些话已经成为斯大林分子宣传的基点。‘罪名’蓄意捏造，‘证据’无中生有，并且通过成千上万个报纸专栏和成千上万本小册子无耻地在全世界散布。如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审判中洗清了这些‘罪名’，无中生有的‘证据’也被法庭否定了，被一个内格林政府的法庭否定了。斯大林分子现在将会怎么办？他们会收回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无耻诽谤吗？……会不会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的那样，不顾已经发生的一切，他们将继续他们的诽谤宣传？”

陶里亚蒂证明，共产国际难以接受审判结果。在提交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他认为判决“令人不能容忍”，因为“没有给予严厉的惩罚”。审判结果也让西班牙共产党深感失望，但是，它在不利的情况下采取了最为明智的做法，它没有公布判决书，在内战的最后几个月及其流亡的那些年，它也不再指责它的对手是“托洛茨基”的代理人 and 佛朗哥将军收买的“叛徒”。

## 第五十章 破坏集体农庄和解散阿拉贡地方委员会

为了追寻革命浪潮衰退的过程，我们现在必须回到一九三七年春天，当时，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农民协会以传教士般的热忱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发起的集体化运动正面临着越来越猛烈的攻击。

共产党人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颁布的法令使革命初期的没收财产行为合法化，但是不包括没收那些与军事叛乱无关的地主的财产的行为。受到这项法令的鼓励，许多被迫接受集体化的地主现在开始要求归还他们的土地。此外，让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左派均感头疼的是，共产党人利用这项法令鼓励那些在内战之前与挣工资的农业工人有矛盾却又不情愿地被集体农庄运动裹挟的佃

户和佃农收回他们以前耕种的土地。人们应当记得，这些农民中的许多人内战之前属于右翼政党，尤其是在巴伦西亚省，如今，那里有五十万人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组织的农民联合会。

当对集体农庄的攻击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底达到高潮时，忠实追随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社会党左派人士、劳动者总工会下属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总书记里卡多·萨瓦尔萨宣称：“我们现在最强烈的愿望是保卫革命取得的成果……觊觎革命成果的敌对势力——即过去的反动分子以及那些因为充当政治恶霸的走狗而以租赁的方式占有土地的人——变得越来越强大，而我们的会员不是要求获得土地遭到拒绝，就是被人从所耕种的贫瘠土地上赶走。今天，在臭名昭著的十月七日本法令的保护下，这些反动分子正在大肆攻击集体农庄，目的是要瓜分它们……从而终结农业革命。”

六月六日，控制着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社会党左派的喉舌《前进报》声称：“对于希望把这场斗争限制在反封建的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来说，共产党的政策最为有利。对于工人阶级政党和组织来说，情况不是这样。”它断言，共产党人想以过度侵犯忠于共和国政权的小农场主的合法利益为借口，破坏集体农庄的建设性成果。“保护现有土地拥有者的利益是一回事，……但是，这与通过消灭集体农庄产生一个农村小资产阶级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六月上旬，无政府主义报纸《思想报》声称，“恐怖和死亡”正在“我们最优秀的同志”当中蔓延，“特别是在集体农庄中蔓延”。几周之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协会总书记声称：“我们与共产党人进行了可怕的斗争，特别是与他们指挥的军队进行了斗争，他们杀害了我们最优秀的农民积极分子，野蛮地破坏了我们的集体农庄。”

一位安达卢西亚农民回忆说：“即使共产党人不用武力破坏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集体

农庄，……他们也会派遣大批铁杆支持者，以需要肉类供应军队为借口，抢走集体农庄的牲口。……[他们的]目的是，像在一种极权主义制度下一样，不容反对地控制一切。”

对集体农庄的攻击既破坏了农村的经济，又打击了农民的士气，因为，随着攻击活动在夏收之前达到顶峰，许多地方的农业工人放弃了他们的收成。于是，共产党人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六月初颁布了一项法令，承诺帮助集体农庄避免“可能使那些在没收了土地之后自愿选择以集体农庄的方式进行耕种的农业工人寒心的经济衰退”，并在本农业年度承认集体农庄的合法地位。西班牙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在评论这项法令时忽略了只是暂时给予集体农庄合法地位这一事实。它肯定地说：“[该法令]给予……集体农庄一种不可动摇的合法地位。……由于这项法令，因广大农业工人自发的冲动而出现的集体农庄如今变成一种合法的农业劳动形式。”不过，正如在前面某一章所提到的那样，继续掌管农业部直到内战结束的乌里韦部长始终没有给予集体农庄永久性的合法地位。

尽管一九三七年六月颁布的法令为集体农庄提供的保护仅限于该农业年度，但是，它在农村营造了一种宽松的气氛，因此达到了直接的目的。不过，农作物刚一收割完毕，不祥之感立即卷土重来。八月十一日，中央政府解散了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保卫阿拉贡地方委员会。该委员会一九三六年十月在卡斯佩成立，目的是指导阿拉贡地区的反佛朗哥武装占领区的革命，这一武装主要由自由主义者组成。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与革命史写道：“阿拉贡地区的真正主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加泰罗尼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武装的帮助下，他们在该地区实行一种无政府主义专制。……阿拉贡地区的无政府主义者强制推行集体化，该地区盛行的抢劫、犯罪和骚乱在工人当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和严重的不安。为了平息工人的骚动并在不使用‘可恶的’政府标签的情况下使他们的统治更冠冕堂皇，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

联盟领导人发明了阿拉贡地方委员会，同时建立了一套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官僚警察机构。”

这些指责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据保卫阿拉贡委员会主席华金·阿斯卡索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主要由自由主义者组成的民兵部队对食物和牲畜的无节制征用已经非常严重，大有把该地区“完全变成废墟”的危险。他说，这迫使委员会不得不禁止民兵部队负责人在未经其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征用物资。“我们希望所有人毫无例外地遵守这一规定，以避免出现获得自由的人民敌视其解放和解放者那种可悲尴尬的局面，避免出现人民竟然被其一直向往的革命弄得倾家荡产那种令人痛心的情况。”

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一份陈述成立地方委员会的正当理由的报告中，华金·阿斯卡索说，阿拉贡地区的三个省缺乏各种管理机构以及该地区部分被“并不是全都遵守必要和应有的纪律”的民兵占领造成了某种混乱的局面，这种局面预示着后方经济崩溃、前线战争失败的危险。由于这些原因，他接着说，有必要成立一个承担以前的管理部门所行使的全部职责的机构，“一个在组织和功能方面充分满足当前形势需要的机构”。

最初，阿拉贡地方委员会只是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代表组成，并且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行事。“一个全部由自由主义者组成的自治权力机构的成立不可能使一个由所有党派的代表组成的中央政府感到满意。”塞萨尔·M·洛伦索——他是奥拉蒂奥·M·普列托的儿子，我们应当记得，后者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之前一直担任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的主要鼓吹者之一——写道，“在共和派控制区的其他地方，没有哪里是由一个自行其是的地方机构控制的。……于是，阿拉贡地方委员会成为共和派、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选中的攻击目标，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其斥为乔装打扮的独裁机构，并且指

责它搞地方分裂主义。反对的声音非常普遍，就连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都表示了他们的不满。”洛伦索补充说，这些领导人认为，委员会的成立不仅给他们加入政府的努力增加了更多的困难，而且委员会本身也“不合法”，因为它是在未经全国总工会全国委员会同意的情况下成立的，也没有得到任何全体会议或例行代表大会的批准。他断言，阿拉贡地区的无政府主义者并非头脑迟钝认识不到他们的“独断专行”所造成的问题。他们知道，为了继续存在下去，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政府的授权。“著名的工联党领导人、全国总工会的伟大朋友贝尼托·帕冯全力以赴劝说他们……公开要求承认委员会的合法地位，甚至不惜牺牲自尊。他向他们解释说，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要求彻底改组委员会，因为，如果激进左派的优势受到大肆宣传的话，西方列强不会援助共和派。他使他们相信，必须保留某些资产阶级民主的表象。”

结果，保卫阿拉贡委员会同意让其他组织的代表加入，以换取中央政府的承认。不过，全国总工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仍然把下面这些关键职位保留在自己手中：主席、社会治安委员、宣传委员、农业委员、经济委员、运输委员和物资供应委员。虽然共产党人得到了两个位置，他们却无法接受一个在农村开展自由共产主义运动并对小业主和佃户的财产实行集体化政策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机构。不过，只是在全国总工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一九三七年五月在毗邻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失势而且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总理和国防部长职位分别被胡安·内格林和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所取代之后，摆脱了全国总工会的中央政府才有可能解散这个委员会。

内阁在敌视阿拉贡地方委员会方面意见一致，于是，七月十二日，一项解散委员会的法令送交阿萨尼亚总统签署。总统像通常一样胆小怕事。他担心这样做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因为全国总工会的力量在阿拉贡地区占据优势。不过，内格林

在八月六日向他保证已经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同时表示希望“在不发生严重暴力事件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在一个月前的七月四日，受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影响力急剧衰落的鼓舞，阿萨尼亚曾经问内格林何时解散阿拉贡地方委员会。“他已准备采取行动，”总统在日记中写道，“还要把他们投入监狱，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

内政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声称，委员会的“非法”行为“令人毛骨悚然”。不过，从解散委员会的法令来看，对其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它不受政府的权力管辖。“由于权力扩散的影响，”直到八月十一日才颁布的这项法令的开头写道，“阿拉贡地区……比其他任何地区遭受的损失都要大。……政府认为，只有解决阿拉贡地区的权力危机才能达到其集中控制权力的目的。”

由于阿拉贡地区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剩下的最后一个对抗中央政府的堡垒，而且他们控制的五个师中有三个——第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八师，它们分别是以前的胡韦特、杜鲁蒂和阿斯卡索纵队——驻扎在这个地区，因此，必须秘密行动并把法令颁布的日期推迟到实际解散了阿拉贡地方委员会之后。八月五日，普列托把第十一师——这是人民军战斗力最强、武器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之一——的共产党人师长恩里克·利斯特召到国防部来告诉他，政府决定派一支有能力执行政府决定的军队去阿拉贡地区。“普列托对我说，”利斯特证实，“我的任务没有书面命令，完成任务也不报道；它是我与政府之间的一个秘密；我必须毫不留情地清除我认为有必要清除的一切，而且不必因循官方或者法律程序。”由于利斯特是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普列托是在与共产党配合行动。

利斯特说，他制订了一个开展“心理攻势”的计划。他进行炮轰卡斯佩郊区的步兵演习并在大街上检阅坦克部队。这个计划产生了预期的效果。“由于遭到人民的怨

恨，”利斯特写道，“我们一枪不发便解决了保卫阿拉贡委员会。结果，第二天，八月十一日，当解散它的法令在《共和国官方公报》上颁布时，这个委员会已不复存在。”当时政府中的社会党温和派的喉舌《前进报》对这项法令发表评论说：“昨天发生在阿拉贡地区的变化也许没有在国外引起特别的反应。没关系。它应当引起特别的反应，因为政府通过这次行动有力地证明了它的权威。”

“阿拉贡人民以难以形容的热情为解散保卫阿拉贡委员会而欢呼，”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写道，“尤其是农民。”但是，第二十六师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指挥官里卡多·桑斯描绘的景象却并非如此欢天喜地。他声称，第十一师攻占了卡斯佩的办事机构并且逮捕了办公室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强行解散了保卫阿拉贡委员会。“它对所有村庄采取严厉措施，攻打集体农庄。它抢占了集体农庄的所有财物——牲口、食物、农具和房屋——并且残酷地镇压迫害集体农庄的成员。”

何塞·杜克是保卫阿拉贡委员会的两名共产党人成员之一，他在内战结束以后脱离了共产党，但是仍对委员会激进的农业政策持批评态度。他说，在他看来，利斯特的措施过于严厉且没有必要。委员会的另一名共产党人成员曼努埃尔·阿尔穆迪看法相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说：“利斯特在阿拉贡地区采取的措施非常严厉。他可以更加慎重地采取行动。结果，他的行为引起了强烈的敌意。”

九月，在巴塞罗那秘密出版的一期《人民之友》报道说，利斯特在卡斯佩宣布：“阿拉贡地区的集体农庄将从地球的表面消失。”报道接着说：“斯大林分子的法西斯心态已经牢牢控制了与我们形同手足的那个地区。这是令人痛苦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全国劳工联合会在阿拉贡地区的整个革命成果如何被苏联的代理人毁灭殆尽。”

利斯特声称，在他回到巴伦西亚以后，普列托“极尽其阴险伪善之能事”，开始大

声训斥他，以致等候室里三四十个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你在阿拉贡地区干了什么？你杀了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现在要你的人头。我必须把你的人头给他们，否则的话，另一场内战就将爆发。”利斯特否认枪毙过任何人（这与阿尔穆迪的说法相互矛盾，阿尔穆迪告诉我，“利斯特杀的人并不多”。），并且同意释放囚犯。“普列托仇恨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同样仇恨共产党人。他还是一个战争结局失败论者。他的计划如果成功将一箭双雕：他将在共产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之间挑起一场新的内战，在这场内战中，两个组织将互相残杀，另外，他将按照他的想法结束[对弗朗哥的]战争。”但是，对于削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力量，共产党人实际上并不需要普列托的激励。

共产党员安东尼奥·科登是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指挥的阿拉贡前线东路军的参谋长，据他说，普列托的表现符合其开展“一场反共攻势”的计划，“从那时起，这一计划日趋明朗”。正如事态发展将要证明的那样，这千真万确。同样千真万确的还有，据共产党阿拉贡地区党组织书记何塞·杜克在利斯特扫荡该地区一个月之后说，一些从当前形势中获益的共和派和社会党人告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应当对攻击他们的行动负责。共和派和社会党人企图把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人身上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不过，无政府主义者毫不费力便识破了其最危险的对手的诡计。“共产党员利斯特指挥的第十一师被派往[阿拉贡地区]执行镇压和惩罚行动。”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说，“……它的目的不仅是要消灭集体农庄，而且还要激起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同志们的暴力反抗或者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部队哗变，以便进行最大规模的镇压。我们各级认真负责的委员会镇静而自信的表现防止了一场灾难。”

有证据显示，驻扎在阿拉贡前线、由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的第二十七师的部分部队参加了攻击集体农庄的行动。既然如此，人们可能感到奇怪，无政府主义民



兵的三个师为什么在共产党的部队劫掠阿拉贡地区时按兵不动。我们应当还记得五月事变期间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防务副专员的那个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他曾“竭尽全力”设法阻止“一大批乘坐汽车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离开前线去巴塞罗那。莫利纳说，第二十八师的第一百二十七旅“斗志高昂要求对共产党人采取行动”。“我能让战士们相信的是，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我应当前往巴伦西亚通知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他还要去见内格林，如果“疯狂镇压”不停止的话，他将在回来之后发动进攻。他在到达巴伦西亚之后发现，全国委员会忙于“给会员证盖印章”，对这场“正在进行的将彻底终结全国劳工联合会影响力的重大行动”一无所知。接着，他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的陪同下前去拜访内格林，后者“把时间都浪费在谈论鸡毛蒜皮的琐事上”，直到总理看着表说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我站起身来走近内格林，有点局促不安地说：‘请原谅我，总理先生，我们还没有说明来访的目的。……如果不立即结束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局面，我们的部队将采取行动，……这很可能意味着战争结束、总理下台、共和国灭亡。’”内格林对莫利纳说，他“不知道”情况有这么严重，他将下令立即释放全国劳工联合会囚犯。“明天上午我将亲自去前线了解情况，”他说，“如果有不正当的行为发生，它们将会得到纠正。”得知会见内格林的情况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宣称情况令人满意，因此，它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出所料，内格林并没有像他许诺的那样去阿拉贡，”莫利纳注意到，“但是，逮捕停止了，地方委员会的成员和其他囚犯被释放，共产党人的恐怖行动减少了。不过，他们仍然达到了目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再一次不战自败——阿拉贡地方委员会被解散了。”

八月十二日，当镇压和破坏集体农庄的行动仍在进行时，全国劳工联合会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向阿萨尼亚总统投诉。几乎不能指望他以同情的态度倾听。听完全国劳工

联合会的诉苦后，如同他所说的那样，他“理智地”建议代表团，应当去向政府投诉！阿萨尼亚注意到，三名代表中的一名要求内阁中的代表权，而另一名代表则表示，他们不想担任内阁中的任何职位。阿萨尼亚在日记中记述道：“他们要求不受迫害，因为对全国劳工联合会所代表的东西要‘有所了解’和尊重。他们一再提到‘同志们’的失望和不满，[并且说]如果另一起类似五月事变的事件发生，他们和平平息事态的努力可能就没有用了。大家共同的目标是赢得战争，但是，如果这种迫害政策一定要造成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毁灭或屈服的话，……那么，最好大家同归于尽。”

尽管这些话给人以不祥之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在布哈拉洛斯举行的一次全国劳工联合会基层组织代表全体会议上仍然“决定不采取任何反击行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在内心深处因政治挫折、意识形态约束以及在与政府合作问题上的举棋不定而备受煎熬，希望通过重新加入内阁来挽救革命。塞萨尔·洛伦索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希望与内格林合作，因此不愿引起可能破坏他们的关系的严重冲突”。这显然反映了他父亲的想法。八月二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中部地区书记戴维·安东纳宣布，各地区委员会一致同意“向共和国政府提供它们所拥有的一切”——“它们的生产组织和生产工具”——因为这是支持政府的每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也是“行使参政的权利”。但是，政府认为离开全国劳工联合会它可以运转得非常好，因此，以其没有考虑当时的“时机”为由拒绝了全国劳工联合会作出的姿态。

与此同时，阿拉贡地区的镇压行动继续进行。在颁布解散阿拉贡地方委员会的法令的同一天，政府任命前委员会成员何塞·伊格纳西奥·曼特孔为阿拉贡地区首席行政长官。正式身份为左翼共和派成员的曼特孔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共产党的同路人。用恩

里克·利斯特的话说，他是“一个聪明、强悍、自信而且勇敢的人”。 “从第一天起我们相互之间就充分理解，” 利斯特接着写道，“我们与他全力合作，帮助他完成他那艰巨的任务。” 不过，据阿萨尼亚说，曼特孔并不总是像利斯特喜欢的那样言听计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阿萨尼亚在日记中作了下面这段批注：“利斯特[向曼特孔]建议，他应当把阿拉贡地方委员会的成员处决[带到郊外处死]。他拒绝了。‘这种花招过于明显。’ 他对我说，‘我枪毙了他们之后，[利斯特]将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以表明他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捍卫者。’ ”

尽管曼特孔确实在内战结束之后加入了共产党，但他并非言听计从的同路人的典范，这一点得到了何塞·杜克的证明。在八月十七日提交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杜克指责曼特孔“过于拘泥法律条文”而且“经常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他不满地说，首席行政长官对于“收缴后方的武器，与间谍、奸细[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之类问题一直没有给予“决定性的有力”关注。尽管出现了这种指责，在第十一师和突击卫队两个连的协助下，曼特孔继续无情地进行利斯特开始实施的消灭集体农庄行动。里卡多·桑斯回忆说：“这个被共产党狡猾地操纵着的卑鄙小人指挥了最终消灭集体农庄的行动。……他野蛮地迫害真正的反法西斯人士和革命者，说他们在革命初期的行为过于暴力，……他[还]解散了剩余的所有集体农庄。” 据全国劳工联合会阿拉贡地方组织的一份报告说，从右派支持者那里没收的土地、农具和牲畜被归还原主或他们的家人；集体农庄新建的马厩和鸡舍被拆除，在一些村庄，甚至夺走了集体农庄播种用的种子，与此同时，六百多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被逮捕。

革命初期——当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阿拉贡地区拥有不容争辩的权力——加入集体农庄的佃农和小地主充分利用了这次镇压。他们瓜分了土地以及收获的庄稼和农具，甚至在突击卫队和共产党军队的帮助下，将根据其

成员的意愿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洗劫一空。

形势变得如此严峻，以致共产党人后来承认他们采取了一项危险的政策，尽管避而不谈个人的责任。担任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的共产党员何塞·席尔瓦写道：

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最多样、最奇特的实验是在阿拉贡地区进行的，在那里，为了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肯定使用了最暴力的手段；在那里，一项明显错误的政策严重撕裂了农村的经济。在共和国政府解散了阿拉贡地方委员会之后，首席行政长官试图通过解散集体农庄消除农民群众心中深深的忧虑。这一措施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它在农村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首席行政长官颁布的法令保护下，对集体农庄不满的人——考虑到建立集体农庄所采用的手段，他们的不满有充分的理由——攻占了集体农庄，抢走并且瓜分了收获的农作物和农具，他们没有考虑那些并非通过暴力或者强迫手段建立的、繁荣兴旺的、成为一种组织典范的集体农庄，例如坎达斯诺斯的某个集体农庄。

的确，首席行政长官的目的是要纠正不公并使农村的劳动者相信，共和国在保护他们，但是，结果与所预期的正好相反。这一措施只是加剧了混乱状态，暴力手段仍在实施，只不过这一次是由另一方实施而已。因此，田间耕作几乎完全停止，四分之一的土地没有为播种进行翻整。

“共产党人和反动地主的死亡舞蹈导致了阿拉贡地区农业的崩溃。”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指责道，“没有进监狱的集体农庄成员不是受到迫害，就是逃往其他地区避难，或是寻求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部队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为下一季农作物翻整土地的时候到了。因胜利而欢欣鼓舞的小地主没有亲手耕种他们所占有的土地的能力。[另一方面]，被夺走了土地的农民——不妥协的集体农庄成员——拒绝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耕种土地，或者更糟糕的是，拒绝受雇于人挣饭

吃。”

十月九日，在西班牙共产党阿拉贡地区土地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何塞·席尔瓦强调指出，“整个农村几乎没有耕种土地的积极性”。“必须结束这种状况。我们必须振奋农民的精神，我们必须通过共产党的土地委员会这样做。”他接着说，因为解散集体农庄而造成的这种状况“严重而且危急”，因为“我们的敌人正在利用这种状况破坏生产”。仅仅就在几天前，共产党控制的土地改革阿拉贡地区办事处承认，“大部分村庄的农业生产陷于瘫痪，给我们的农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共产党的行动造成的局面确实令人非常担忧，因此，为了挽回局面，它不得不再次改变它的政策，恢复了一些被解散的集体农庄。“承认集体农庄的权利并且决定归还不公平地从它们那里拿走的东西，”何塞·席尔瓦说，“加上阿拉贡地区首席行政长官在这种方针指导下所进行的种种努力，情况恢复了正常。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再次焕发了生产热情，他们为给放荒的土地播种付出了必要的辛勤劳动。”

佩拉特斯认为，虽然没有关于共产党的镇压行动对他所谓“集体化的第二阶段”影响的完整资料，但是，出席一九三七年在阿拉贡地区召开的两次集体农庄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的对比仍然是耐人寻味的：在集体农庄遭到破坏之前的二月，五百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在集体农庄被解散、共产党继而转变政策之后，当时一些被解散的集体农庄已经恢复，两百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他判断：“集体化的第二阶段很可能更准确地反映了其拥护者的诚意。他们已经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是不畏一切灾难的集体主义者。不过，认为在第二阶段放弃了集体化的那些人全都反对集体化则是荒谬可笑的。恐惧、官方的压力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严重地影响了阿拉贡地区很大一部分农民的决定。”

不过，尽管经济形势在共产党人转变了他们的政策之后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因破

坏集体农庄并镇压其追随者而引起的敌意和怨恨绝没有完全烟消云散。由此产生的幻灭感也不会彻底被根除，这种幻灭感削弱了阿拉贡前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部队的斗志，它肯定是导致阿拉贡前线在几个月后土崩瓦解的一个重要因素。佩拉特斯写道：“集体农庄再次得到承认。抓进监狱的人被释放出来。集体化运动继续进行。为新的播种季节做好了准备。但是，这一次收获庄稼的是佛朗哥。一九三八年春天，整个阿拉贡地区以及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的部分地区将被法西斯军队所侵占。任何人都可能玩弄使一条战线及其后方士气低落的花招而不受惩罚。”

本书由 “[ePUBw.COM](http://ePUBw.COM)” 整理，[ePUBw.COM](http://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 下册

### 第七部分 拉尔戈·卡瓦列罗和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失势

#### 第五十一章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挑战西班牙共产党

在此应当强调的是，共产党人作出停止攻击集体农庄的决定不仅是因为攻击集体农庄损害了后方的经济和士气，而且因为他们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摩擦愈演愈烈，所以，如同我们将在下一章里看到的那样，他们需要与全国劳工联合会达成某种和解，以便为不可避免地与国防部长最后摊牌作准备。尽管普列托实际上与共产党人结成了反对宿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联盟，但他很快就表明，他不会成为他们的傀儡。

“接管国防部后没多久，……两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乌里韦和埃尔南德斯来见我。”普列托一年之后告诉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他们说，他们希望与我密切合作。”但是，当埃尔南德斯提出他打算“每天带着政治局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想法和意见”拜访普列托时，国防部长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如果埃尔南德斯有什么关于军事政策的看法要发表，他可以对内阁全体成员说。“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可以继续像与拉尔戈·卡瓦列罗斗争那样对待我，那么，”普列托告诉他，“你们就错了。……你们不可能控制我，我不会容忍你们与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内阁会议上进行的那种让人想起来就厌烦的争吵。”

同样使共产党人陷入窘境的是普列托对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的态度。尽管他在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之前曾向共产国际代表比托里奥·柯多维拉和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彼得罗·南尼保证，他准备努力促成两党合并，但是，他在成为国防部长以后明确表示，他不会向支持两党合并的苏联大使列昂·盖基斯所提出的咄咄逼人的要求屈服。的确，在社会党执委会七月份举行的一次每周例会上，他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了别的想法。执委会成员胡安—西梅翁·比达特记述了普列托的想法：普列托认为，共产党人正在赢得大量盟友。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民主国家的背叛”。由于苏联是唯一一个向西班牙运送武器的国家，共和派转而同情支持它，结果，通过占据各个部门的关键位置，共产党人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在他最密切和最忠实的朋友中，一些职业军官如今成为共产党员，例如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和许多别的职业军官。最后，普列托发表意见说：“在还来得及的情况下，在我们发现自己失去对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地位前，考虑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是否明智的时候到了。”

尽管普列托可能确实在某个时候发表过对民主国家的“背叛”不满的言论，不过值得怀疑的是，他是否认真考虑过两党合并的可能性。就在十二个月以前，他的喉舌

《社会主义者》还指责为两党合并进行的宣传是“联手欺骗”，并将两党青年运动的合并斥为“共产党对社会党青年组织的兼并”。无论如何，难以想象一个像普列托这样具有独立思想的人愿意接受共产党人提出的条件。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表的一封写给西班牙社会党执委会的信中，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将两党合并的基本准则阐述如下：（1）合并后的政党是“以统一的意志率领工人前进的坚如磐石的先锋队”；（2）无论是关于讨论的问题还是关于行动的方针，一项决定一经作出，对每个人都有约束力；（3）所有受党委托的人（政府部长、议会议员、地方官员、报纸记者等等）必须执行其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和指示；（4）所有破坏党的工作或者从事危害党的团结的活动的党员将被“开除出党并且受到公开的谴责”。

“我们肩负的责任重大。”共产党政治局提醒说，“西班牙无产阶级必须实现政治团结，通过两个工人阶级政党的立即合并，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政党。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这是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工人党员们强烈的愿望、坚定的决心和共同而且迫切的呼声。”

且不说共产党政治局提出的条件实际上没有考虑代表社会党左派的某些重要地方组织的态度，例如马德里、巴伦西亚、阿利坎特和哈恩的社会党组织，社会党中间派也不可能接受它。其实，在社会党执委会内部，反对立即合并的声音非常强烈，以致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向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发表讲话时，野心勃勃、精明狡诈、喜欢操纵他人的执委会书记拉蒙·拉莫内达没敢冒险对合并的前景作出某种不留余地的保证，尽管此时他已开始小心翼翼地支持共产党人：“我们支持西班牙无产阶级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党，……[但是]要有充分的保证，”他宣称，“一旦实现了统一之后，就要保证它不会因为没有任何预见到有关问题的方方面面而立即遭到破坏。”



进行这番陈述时，拉莫内达不仅反映了自己的担忧（以及他的个人野心——通过巧妙地玩弄手腕在合并后的政党中获得某个领导职位），而且反映了其他社会党中间派领导人的担忧，他们认为两党合并必将导致社会党被共产党兼并。虽然四月份成立的全国联络委员会——拉达莫内代表社会党加入该委员会——强烈要求两党“以全面的热情”为合并而努力，但是，据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党史说，社会党执委会“坚决反对建立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尽管它郑重声明支持合并”。如同我们所知，正是这种由普列托倡导并且得到包括其忠实支持者曼努埃尔·阿尔瓦尔、曼努埃尔·科尔德罗、弗朗西斯科·克鲁斯·萨利多和安纳斯塔西奥·德·格拉西亚等人在内的大多数执委会成员支持的反对意见导致共产国际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得出结论，共产党人“不应强行推动合并”，同时“应使那些已经打算加入共产党的社会党人相信，继续留在社会党内工作更有利于加强协调一致的行动，也更有利于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合并作准备”。

著名英国作家拉尔夫·贝茨是一位关于西班牙工人运动的重要权威，曾为共产国际工作并且担任过国际纵队第十五旅副政委，他在一九四〇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对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政党的努力评论道：这引起了“社会党内充满怒气和怨恨的反对，乃至明智的普通党员”。“你要记住，拉莫内达及其所宣称的一伙人不是‘一般的’社会党人。他们大部分是共产党人；他们或者是被争取过去然后奉命继续留在社会党内的社会党人——社会党因疏忽大意使M.内尔肯‘流失’而备受指责，或者是极少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宁愿相信建立在‘战争基础’上的必然性而不相信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终实现。”贝茨接着说，大多数社会党成员认为整个合并活动“只不过是共产党方面进行的一次兼并的尝试”。他们相信，他们将失去对劳动者总工会的控制并且在新的政党中沉沦，新的政党实际上将成为一个受共产国际控制的共产党，而社会党的传统将丧失殆尽。“就社会党方面而言，可以肯定的是，实际上

从未出现过大批党员呼吁与共产党合并的情况。总之，两党合并引起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敌意，让左翼共和派和共和派人士恐惧。因此，它是一个重大错误。幸运的是，共产党从来没有极力坚持。我认为，共产国际知道风险，因此，它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过分强迫西班牙共产党。我知道，共产国际在西班牙最能干的代表路易斯[柯多维拉的化名]不喜欢整个这件事。”

斯大林肯定认为共产党与社会党合并是建立一个一党制国家必不可少的步骤之一，如今对于他来说，实现两党合并显然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尽管两党合并遥遥无期，命运女神却继续向共产党人慈祥地微笑。现在，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社会党和共和派。在大量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学作品中，没有人比欧多西奥·拉维内斯更权威地描述了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这位秘鲁共产党领导人受柯多维拉的指派，主编西班牙最重要的共产党报纸《红色阵线报》。脱离共产党之后，凭借其在西班牙共产党人圈子里的亲身感受，他描述了西班牙共产党令人震惊的发展壮大以及伴随着成功而来的特权，为我们呈现了下面这么一番景象：

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政治失败增强了共产党的影响力并且使它头顶光环，即使不是政权的光环，至少也是政府的光环。共产党的追随者成倍地增加，他们来自各个阶层——来自共和国军队，来自政府雇员，来自进行非法交易的黑市，来自各种各样的寄生虫和投机者的世界。……

……直到昨天还因投身共产主义事业以及捍卫工人的权利而身陷囹圄遭受折磨的那些人，如今已经成为重要的共产党高官，他们可以在其拥有的郊外住宅安静地睡眠，不再受到汽笛的打扰；当饥饿使平民百姓陷入半死不活的状态时，他们享受着美味佳肴。他们是某种享有特权的帮会成员，内战为他们提供了一生中最优裕舒适时光。……

对于党的领导人来说.....内战是一个令人非常欣慰的时期。那是一种轻松惬意的生活，他们在身处逆境的时候肯定对此梦寐以求。宽敞舒适的住宅，摆满美酒的地窖，门口停着配有私人司机的轿车；或金发碧眼、或黑发棕眸，或秀发齐耳、或长发披肩，或浓妆艳抹、或略施粉黛，美女往来如云。对于像[中央委员曼努埃尔·]德利卡多那样的人来说，那是些花天酒地的日子。然而，对于西班牙人民来说，那并不是丰衣足食的时期——绝对不是。.....

共产党在共和国政府中的优势加强了它的权力及其对于军队的影响，以致共和国的军队最终可能变成一支真正的红军，听从来自党的命令。与此同时，它试图争取、制服或者消灭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最重要的骨干分子。至于加泰罗尼亚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宣称他们是托洛茨基分子，并且颁布了法令，要像苏联处置托洛茨基分子那样处置他们。

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最有力的抵抗。在左翼共和派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考虑到环境与范围，无论如何都）与发生在智利激进党身上的事情非常相似。甚至具有相似的人格特征。善良、聪明、单纯的人们真诚地合作，无私地奉献，却发现自己落入了圈套，可又没有勇气甩掉共产党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或者摆脱他们自愿接受的束缚。除了这些人之外，有一些人受欲望驱使胡作非为，他们想要金钱、高官和有利可图的职业。.....还有成千上万可怜的人，他们谦恭顺从地专心工作，不要求得到任何东西，条件只是平安地留在政府中某个微不足道的职位上，挣一份少得可怜的工资，被解雇的梦魇缠绕着他们。有许多斯特拉佩洛式的商人；商人们从事珠宝与粮食、微型画像与麻醉品、假护照与人血的非法交易。这些人充分认识到，帮助共产党当时是一种有效的投资，这种投资不仅获利，而且可以在某个时候使他们免于破产，甚至可能挽救他们的生命。通过如此肮脏的手段，中央委员会负责人和苏联领导人逐步奠定了他们所谋求的西班牙共产党的重要地位，确立了其不容争议的极

权主义权威。

社会党人已经放弃了对共产党的所有正面攻势。……当他们的力量减弱或者保持原状时，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社会党人指责共产党人“引诱人们改变政治信仰”是犯罪行为，一次比一次更无力。共产党人否认这种指责或者答应予以改正，但是，他们继续采用最凶恶、最无耻的强迫手段网罗新的追随者。什么方法都用上了：提供一份部里的工作，以解雇相威胁，晋升的希望，调任的承诺。有时，为了一个月得到六七百比塞塔——这些钱从国库出，全家人都会加入这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佩佩·迪亚斯的光荣的党。

显然，共产党的庞大组织在无耻、罪恶和玩世不恭中沉沦了。诚实地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可能看不到，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行为方式差别只在毫厘之间。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明显的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在竞争中获胜的政党时，这种暴虐的恐怖主义被人数不断增加的各阶层人士毫不反感地接受了。

正是在共产党这种迅猛发展的过程中，普列托对其采取了拉尔戈·卡瓦列罗在被共产党人玩弄花招赶下台之前不久开始采取的行动。被共产党在军队中劝诱人们改变政治信仰的尝试及其势力的日益壮大所激怒，普列托于六月二十八日发布了一道部长令，禁止在空军、陆军和海军中进行鼓动军官和士兵加入某个特定政党或工会组织的宣传。“上级建议或者只是暗示下级改变其党派或工会归属将被认为是一种胁迫行为，”命令表明，“因此将导致违规者的降级，并且不影响追究其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

根据共产党的指示，对外新闻司司长、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妻子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不许外国记者把关于普列托命令的消息发往国外。“我必须压下这个消息，因为它将造成不良的影响。”她在内战结束之后告诉我，“普

列托迫使我不得不辞职。”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路易斯·费希尔声称，他在一九三七年一月通过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帮助她得到了这个工作，如今，他又竭尽全力劝说普列托和内格林让她复职。“不太容易找到她的替代者，因此，共和派在国外的宣传将蒙受损失。”他向普列托恳求道。“[这]应当由内格林决定。让他按他的想法办吧。”普列托以异乎寻常的随和回答道。结果，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恢复了职务并在几个月后被当时的外交部长、左翼共和派人士何塞·希拉尔任命为对外新闻司司长。“普列托仇恨我，”她在内战结束之后不久说，“因为他认为我对伊格纳西奥加入共产党起了作用。”

当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报纸为普列托禁止在军队中鼓动官兵改变政治信仰的尝试大声叫好时，共产党在马德里的喉舌《工人世界报》抨击那些“不满现状的人”，不是去查找共产党赢得大多数战士支持的原因，而是“忙于进行各种猜测，从而认为这种支持不正常，谁知道是用怎样的施压胁迫造成的结果，甚至可能是欺骗”。

《工人世界报》接着说，这些不满现状的人对于人民的英雄儿女没有好感，他们认为那些积极加入共产党的人“是软弱的人、变节者，不能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我们必须记住成千上万最英勇的战士加入共产党的原因。我们不想详细讨论这些自由的军人任凭自己被胁迫的说法。那是幼稚可笑的。事实是，共产党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们现在并不是想说，其他党派和组织没有为斗争竭尽全力，但是实际上，从战斗开始的第一天起，共产党已经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出现在前沿阵地和最危险的地方。”最后，这份报纸问道，共产党的发展危害了谁？“肯定不是社会党人，因为我们很快就要把我们两党合二为一，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这是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共同愿望，是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无政府主义组织也没有受到危害，因为我党的发展壮大意味着人民阵线的巩固加强。”

西班牙共产党并不害怕这些“不满现状的人”反对其谋求支配地位，引自陶里亚蒂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提交莫斯科的报告中的以下内容证明了这一点：“党明确认识到一件事：它必须进行一场坚持不懈的斗争以扩大并加强它在军队、警察和各个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加强党的地位……是取得胜利最重要的保证之一。……我们决不能失去我们在各个领域已经占据的任何位置，我们必须继续占据新的位置。”这个建议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要求西班牙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并且消灭民主政治的一切因素。

以人民阵线为幌子，共产党人毫不停顿地继续从事劝诱人们改换门庭加入共产党的活动，这使普列托禁止在军队中鼓动人们改变政治信仰的命令成了《全国劳工联合会报》所谓的“一纸空文”，这份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实际上希望情况不会变成这样。命令发布两个月后，普列托的喉舌《社会主义者》指责前线在分发某些报纸时表现出来的偏心以及给予那些报纸读者的偏爱。《全国劳工联合会报》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它以大字标题写道：“只有执法队才能消除……军队中劝诱人们改变政治信仰的行为。”它认为，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再“用破坏性的卑鄙手段和最吸引人的权利干扰我们的士兵之间融洽而且愉快的关系”。

然而，无论是普列托发布的命令，还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报》提出的未必治本的解决办法，都没有吓住共产党人。“我们的所有同志务必记住，”热情之花向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称，“任何命令和限制都不能阻止他们为了人民阵线的利益开展旨在提高广大士兵政治觉悟水平的政治教育工作。我不认为随便什么人就可以把这一命令解释成为一种用来限制士兵政治权利的措施，这不利于人民军。显然，这是我们大家希望避免出现的情况。”

为了继续反对军队的政治化，普列托于十月五日发布了以下行政命令：

1. 禁止军队首长和军官参加具有政治性质的公众集会。

2. 同样，禁止他们向新闻界发表声明或者发表广播演说。因在未经国防部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发表对军队首长或军官的采访而违反这一命令的报纸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3. 未经国防部专门许可，不得举行阅兵式或军队游行。

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巴伦西亚通讯》为事态发展的这一转折欢欣鼓舞，赞扬新的国防部长试图“将某些政治势力对军队造成的破坏消除在萌芽状态”，同时敦促他“以不可动摇的力量采取行动”。

不需要鼓励普列托，因为，除了两项禁止在军队中鼓动改变政治信仰和进行政治宣传的国防部行政命令之外，普列托还试图纠正共产党人政治委员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这一状况。我们应当记得，拉尔戈·卡瓦列罗在被逐出政府前夕曾经试图纠正这种状况，但是他没有成功。当时他发布了命令，要将那些由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临时委派但其任命和级别在五月十五日之前没有得到确认的政治委员全部解职。尽管这一措施在卡瓦列罗离开国防部后被束之高阁，但是，在能够确定其政治身份之前，普列托拒绝批准对数百名政治委员的任命。他不批准这些任命遭到共产党的强烈谴责。热情之花十一月十三日向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报告时宣称，国防部长拒绝批准“任命数百名自内战爆发以来具有模范斗争经历的政治委员”的行为“令人难以理解”，这导致“那些在前线牺牲的政治委员境遇悲惨，使他们的家人处在极度的痛苦中，因为他们的任命没有得到批准”。必须纠正这种状况，她接着说，所有政治委员都要明白，无论他们的任命是否得到正式批准，他们应当作为政治委员继续工作，“因为，军队最强大的战斗力取决于此”。

在战时高级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普列托提出了政治委员这个棘手的问题。拉尔戈·卡瓦列罗下台后，对战时高级委员会进行了改组，现在它由胡安·内格林、何塞·希拉

尔、比森特·乌里韦和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组成。普列托在内战结束后写给内格林的一封信中回忆说，他在会上详细说明了与政治委员的政治身份有关的统计数字。他说，这些数字显示，与那些共产党根据其相对兵力委任为政治委员的党派成员人数相比，正式登记为共产党员的政治委员的比例“不知要高多少倍”。他告诉内格林，除了正式的共产党员之外，有许多政治委员是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还有一些政治委员直接用“劳动者总工会”掩盖他们的政治身份。“作为我在大家面前所作上述分析的结果，我建议，通过在各个政党和工会组织中间公平地分配职位，重新建立政治平衡。……比森特·乌里韦强烈反对这个合理建议，于是，你支持他的否定意见。”

普列托没有因这一反对而退缩，他在十月二十一日发布了一项限制政治委员级别的命令，至少就士兵来说，担任连、营和旅的政治委员受到这一限制的影响。在实施这一限制所影响的人当中，最著名的共产党人是利斯特的第十一师政委、二十四岁的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和热情之花二十七岁的情人、马德里前线督察委员弗朗西斯科·安东，普列托用社会党人费尔南多·皮纽埃拉取代了后者。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普列托的命令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属于共产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政治委员：“许多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政治委员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岗位，尽管他们年纪轻轻，却担任着大部队的政治委员，部队的编制不小于旅，而且，从军事叛乱爆发之初起，他们就自觉自愿地投入了战斗。”

为使弗朗西斯科·安东免遭降职——从马德里前线（那里驻扎着几个军）的督察委员降为战事不激烈、公众不关注的特鲁埃尔前线的旅政治委员——的羞辱，同为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的埃尔南德斯和乌里韦专门作了努力，但是，普列托拒绝让步，因此，安东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这个职位。“事实是，某个政治委员不得不接受较低的职务并且加入作战部队而不能在对两三个军指手画脚，”普列托后来评论



说，“由此引起的喧嚣实在是幼稚可笑。”“安东离开共和国最大一支军队的政委职位加入了一个旅，”卡洛斯·孔特雷拉斯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刊登的一篇赞扬安东的文章中写道，“这样做时他面带开朗真诚的微笑，他的微笑在最悲惨的时刻激励着我们。”然而，以政治局为靠山的安东并没有向他的旅指挥部报到，最终，“因为直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仍未前往第五军第四十七师第四十九混成旅就任”，普列托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将他从政治委员团队中除名。被除名之前，在未经普列托许可的情况下，他以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将军的平民随员身份出现。罗霍曾对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恩里克·卡斯特罗说：“普列托认为我是你们的工具。”这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与此同时，国防部长的举措让总政治部主任、亲共产党的社会党人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感到不安，他问接替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尼奥·米赫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门负责人的恩里克·卡斯特罗，是否认为共产党可能对普列托作出某些让步。“胡里奥先生，”卡斯特罗回答道，“你的问题让我感到意外。当党认识到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的存在恰恰取决于它在政治上对军队的控制时，你相信它会允许别人夺走它的控制权吗？不，胡里奥先生！党将与普列托进行斗争，就像它与卡瓦列罗斗争一样。”“我认为，为了安抚普列托和社会党，我们应当作出某些让步。”德尔巴约反驳道，“毕竟，我是一名社会党员。”卡斯特罗最后的回答是：“不！”

当天晚上，这个问题被提交给共产党政治局的一次特别会议。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参加了这次会议，据卡斯特罗说，他受到党的总书记何塞·迪亚斯的粗暴对待：

“卡斯特罗接替一位政治局委员[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门负责人]对你来说不意味着什么吗，德尔巴约同志？”

“迪亚斯同志，我认为……”

“德尔巴约同志，……如果你问卡斯特罗同志他怎么看你说‘我认为’的那些话，他会尽职尽责地说：‘你的认为没有意义。……重要的是党的认为、党的要求、党的考虑。……是这样吗，卡斯特罗同志？’”

“的确如此，迪亚斯同志。”

“但……”

“不，德尔巴约同志，……不！如果卡斯特罗对党产生过瞬间怀疑或者与党有瞬间分歧，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代表党出现在总政治部。不要忘记这一点，德尔巴约同志！当你对卡斯特罗同志说话时，忘掉卡斯特罗同志吧。你是在对党说话。普列托反对共产党。不要忘记这一点，德尔巴约同志，不要忘记这一点！”

离开共产党总部后，德尔巴约对卡斯特罗说：“与党的领导人的每一次见面都是一次极好的学习。”

之后不久，十一月十八日，普列托解除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任命温和派社会党人克雷森西亚诺·毕尔巴鄂接替他。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除了将大量军衔较低的政治委员从政治委员团队中除名——这些人的名字列满了《共和国官方公报》和《国防部官方日志》——之外，普列托还撤销了一些有名的共产党或亲共产党政治委员和军官的职务，其中包括著名的第五团的缔造者、现任利斯特第十一师第一政委的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普列托亲自任命的运输委员会主任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人们同样熟悉的前国防部副部长的战术参谋、现在波萨斯将军手下担任东路军参谋长的安东尼奥·科登；以及总政治部分支部门负责人路易斯·多波尔托。科登承认，普列托将他撤职是因为他参加了一次纪念俄国革命二十周年的政治集会。我们应当记得，普列托掌管国防部以后，他重新任用了迪

亚斯·滕德罗和科登，这两个人都是被拉尔戈·卡瓦列罗撤职的。

除了担任情报监控部门负责人之外，迪亚斯·滕德罗还是新近成立的指挥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向国防部长推荐晋升和任命的军官，在委员会中，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拥有最后发言权。在评价内战期间罗霍为西班牙共产党提供的帮助方面，没有比忠诚和正直毋庸置疑的共和派军官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的回忆录更有价值的资料了，还没有哪一部同样扎实可靠的著作被人这么忽视或者故意置之不理。在对指挥委员会的记述中，被普列托任命接替迪亚斯·滕德罗的佩雷斯·萨拉斯证实，罗霍是共产党人“最能干的帮手”，按照他们的希望部署军队。他说，对于信任罗霍的国防部长，这是一种不忠诚的行为。他还说，迪亚斯·滕德罗“盲目地听从共产党的建议和指示”。委员会中“绝对忠于部长”的人只有来自工兵部队的国防部副部长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博拉尼奥斯，但是，“由于总是处于少数，又不认识其所属兵种之外的任何职业军官，因此，他始终起不了什么作用，当委员会讨论任命问题时，他经常受到蒙骗”。

显然，凭借罗霍的默契配合和迪亚斯·滕德罗的内部消息，在更全面地掌握他们支持或希望阻止其任命升迁的职业军官的情况方面，共产党人比费尔南德斯·博拉尼奥斯具有优势。

因为知道迪亚斯·滕德罗与共产党人眉来眼去，普列托并未不加考虑地批准提交给他的所有任命升迁报告。他在内战结束以后证实，他没有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信念，他相信，共产党只对军队中取得支配地位感兴趣，因为，“如果我们胜利的话”，这将使它拥有“绝对的权力”。他遏制共产党人野心的尝试不仅逐渐激怒了共产党，而且开始让比森特·罗霍感到恼火。在罗霍所写的书里，他总是把自己表现成为一个远离党派斗争的职业军官。关于罗霍在这场致命斗争中的真正立场，证据

来自直到一九六六年在布拉格去世仍对共产党忠心耿耿的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罗霍多次告诉伊达尔戈，“他忍受不了普列托”，所以他想从总参谋部辞职，“因为”，由于普列托的悲观主义及其对共产党员军官的敌意，“他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同样让共产党人及其盟友感到恼火的是普列托对那些已经升任军官的共产党民兵指挥官的敌意，例如恩里克·利斯特、胡安·莫德斯托、“农夫”巴伦廷·冈萨雷斯和曼努埃尔·塔圭尼亚。热情之花断言：“普列托不相信从人民当中脱颖而出的指挥官的军事才能。他也不信任职业军官，虽然他支持并且保护他们。另一方面，他不放弃任何反对民兵指挥官的机会，尤其是在他们是共产党员时。除了其根深蒂固的反共立场之外，他的态度实质上体现了某些他不承认却又让他彻夜难眠的东西：他知道，人民军……是一支将对形成西班牙未来的政治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强大的革命力量。”

肯定是由于这个原因，普列托准备竭尽全力阻止共产党控制武装力量。他的副官阿尔韦托·巴约上尉甚至在一九四四年出版于墨西哥的一本书中声称，为了对抗苏联的影响，国防部长当时表示愿意把西班牙的三个战略要地割让给英国以换取后者的军事援助。据我所知，该书出版时居住在墨西哥并大量写作的普列托从未否认过这种说法。据说，这个建议是一九三八年二月向两名英国空军军官R.V.戈达德上校和H.M.皮尔逊少校提出的。两名英国军官在即将返回伦敦时前去拜访国防部长，据当时正与普列托一起参加一个会议的巴约上尉说，普列托通过其担任翻译的秘书希塞拉讲了下面这番话：

政府确信，如果英国不支持我们，我们将输掉这场战争。这些绅士返回他们的国家后……我希望他们代表我国政府提出一个秘密建议，我将急切地等待对此建议的一个

答复。

我的建议如下：如果英国愿意将天平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倾斜——它随时可以这样做而且应当这样做——从而使我们获胜并使我们不再受制于目前唯一——一个用战争物资帮助我们的国家苏联的话，西班牙将由我做中间人，把固若金汤的卡塔赫纳海军基地、装备精良的马翁海军基地和景色壮观的维哥港湾——那里宽阔得足以成为整个英国舰队的避风港——转让给英国。

拥有这三个海军基地，英国将会发现它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力量大大增强，而西班牙则将受惠于英国的保护，永远摆脱受苏联影响的一切可能。

尽管我在一九四八年曾与（当时已是空军上校并在利马担任英国驻秘鲁大使馆空军武官的）皮尔逊通信联系，但我仍然无法确认巴约所讲述的这件事情。“我恐怕我的回答将会让您有点失望，”他在信中写道，“但是您应当理解，即使现在我也无权透露任何一次机密谈话的内容，就算我还记得它。戈达德和我访问西班牙的主要目的是空军情报。不过，让谈话偏向或者转移到国际政治斗争上面是我们的各级主人常有的习惯。外交部是唯一可以证实或者否认有关情况的权威部门：巴约提到的普列托建议实际上是否通过戈达德向英国政府提出过，还有，英国政府是否作出了什么答复。”

无论巴约的说法准确与否，如同人们不会相信共产党人攻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主要原因是其所谓昏庸无能和老态龙钟一样，谁也不会真的相信，促使共产党人决定将普列托逐出国防部并由胡安·内格林取而代之的是普列托的“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而不是他阻止他们掌握军队控制权的魄力。对于内格林的辩护士和歌颂者来说，对于那些极力渲染内格林的所谓政治独立性并将其在内战期间的行为理想化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来说，具有启发性的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内格林取代普列托接管国

防部以后，共产党人为取得军队的控制权而开展的反对拉尔戈·卡瓦列罗和普列托的激烈斗争戛然而止。在证明内格林对西班牙共产党唯命是从这方面，单是这一事实本身，就比本书收集到的所有资料证据都有分量。

被共产党人逐出国防部——本书将在后面某一章里讨论这件事情——之前，普列托在另一个与共产党人控制军队有关的重大问题上显示出他的难以对付。这指的是他为防止新成立的军事调查局（SIM）不可挽回地落入西班牙共产党及其苏联盟友之手所作的努力。他对西班牙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说时承认，尽管他在“某些苏联专家”的建议下同意成立军事调查局，但他最初反对这个主意，因为“如此敏感的一个部门可能会像最近发生在安全总局的情况那样，被不受政府控制的人所掌握”。

在我曾经引用的《对斯坦利·G·佩恩教授问卷的答复》中，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说：“看来[令人奇怪的是]，当我坚决要求让我组建一个军事调查局时，[普列托]拒绝了我的要求。……我曾经直接对他说，他的[拒绝]不仅对西班牙军队不公平，而且对正在西班牙战斗牺牲的苏联士兵——飞行员、坦克手、炮兵——不公平。……我问他：‘你为什么回避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差点让我跌倒在地。‘我担心情报机构被你们掌握，’他带着捉弄人的微笑说，‘总有一天你们将会逮捕我和其他政府成员，扶持我们西班牙的共产党人上台执政。’……[我]说他可以派他自己的人担任军事调查局负责人，我只提供传授技术的顾问。这似乎让他感到满意。”

结果，普列托在八月九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上发布了成立军事调查局的命令，它的正式职责是“打击间谍活动，防止破坏行为，根据国防部的指示在军队内部执行调查防范任务”。普列托说，他亲自起草了这项命令，“因为我不想毕恭毕敬地

照搬交给我的方案”。命令第二条规定，军事调查局所有负责人、督导人员和特工的任用是国防部长独自拥有的特权。不过，普列托并没有把他的任用限制在非共产党人的范围内。因为他告诉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他根据“那些方案策划人”的推荐任命古斯塔沃·杜兰——我们很快将会看到，西班牙共产党始终声称杜兰是共产党员——为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地区负责人。杜兰是一位富有才华的作曲家和语言学家，他曾经是著名的共产党民兵第五团的一名指挥官，随后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苏联将军埃米利奥·克莱贝尔的译员兼参谋长。后来，在内格林手下，他将被提拔为第二十军军长。“他们没有向我隐瞒被推荐者是共产党员。”普列托告诉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但我仍然任命了他。”

奥尔洛夫证实，他告诉杜兰，国防部长不喜欢共产党人，因此，他不应当任用太多共产党人做他的部下。“‘采用与内阁成员相同的比例。内阁里只有两位共产党人部长。’我说。大约过了一天，普列托打电话对我说，他想任命他的一位社会党人私人朋友做杜兰的副手。他希望我不要反对。当然，我不反对。‘能派多少就派多少社会党人和你的朋友，’我对他说，‘每个人都有工作要做。’”

当然，奥尔洛夫是否力劝杜兰不要任用太多共产党人值得怀疑，因为，据普列托说，杜兰任用了数百名共产党人做他的特工，而社会党人才四五名。这是“不能容忍的”，普列托说，于是，他将杜兰撤了职，重新委派他担任第四十七师师长。杜兰立即去找奥尔洛夫。“我刚刚被撤职了。”他告诉后者。“我几乎无法相信这件事。”奥尔洛夫后来确认。不到十五分钟，这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已经来到普列托的办公室。“‘你为什么这样做？’我问普列托。他眨眨眼睛。他流利的口齿结巴起来。‘杜兰任用了太多共产党人，实际上，他只任用共产党人。’‘这不是事实。’我反驳道，‘这是附有党派身份的新人员名单。其中社会党人是共产党人的四倍。’但是普列托固执己见。……我坚决要求普列托收回命令，

恢复杜兰的职务。”然后，普列托看着手表说，他会在第二天继续讨论。“‘没有什么要讨论了。’我说，‘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不恢复杜兰的职务，我永远不会再来见你。’我坐进我的汽车里，这是我最后一次与普列托谈话。这发生在星期四，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普列托对这件事情的说法与奥尔洛夫大致相同。他告诉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他对奥尔洛夫说，他将杜兰撤职是因为他没有“任用人员的权力”。奥尔洛夫对此回答道：“杜兰可以任用临时人员。”

“临时人员、固定人员都不能任用！”普列托反驳道，“这是在西班牙，而且，临时人员变成了固定人员。”普列托肯定记得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国防部长时临时任命的数百名共产党人政治委员。

“无论如何，我要求立即恢复杜兰少校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地区负责人的职务。”

“我非常遗憾，但我不能同意。”

“如果你不同意杜兰复职，我将断绝与你的关系。”

“很抱歉，但是，杜兰少校将继续指挥他的部队而不是返回军事调查局。你的行为毫无道理，我也不会向你屈服。”

后来，古斯塔沃·杜兰在美国居住两年之后而不是现行规定通常要求的七年之后成为美国公民，并在四十年代初期受雇于美国国务院担任敏感的职务。由于就其内战期间可疑的共产党员身份所发生的争论在美国激烈进行多年仍无结果，因此，将某些情况记录在案有重要的意义。如今，一九七七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已经明确确认他在战时是共产党员，另外，据我个人了解，内战期间以及



战后我在墨西哥遇见和采访过的那些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对他都非常尊重。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坚决要求应当让杜兰继续担任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地区负责人这一事实表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西班牙共产党无条件地信任他。可是，在内战结束以后，当他移居美国先是接受（美国众议院）帕内尔·托马斯非美活动委员会、后又接受参议院政府运行委员会的约瑟夫·麦卡锡的调查时，他否认自己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或是一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加入美国国籍后不久，他被国务院的斯普鲁伊尔·布雷登雇用，一九四六年迫于压力从国务院辞职。后来他成为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计划的一名官员。

在美国文职人员委员会忠诚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以下述方式解释了他与共产党人的关系：“我必须附加这一段说明，即使冒着被误解的风险，在西班牙内战的第一年，我看到的共产党人的行为只是我指挥的部队里那一个个共产党员在前线的表现，从勇敢和纪律的角度看，他们的表现符合公认的军人标准。因此（在内战期间自然而然），我对他们的态度——像几乎所有共和派军事领导人当时的态度一样——是友好的。当我逐渐了解到下面的一些情况以后，我的态度变得越来越不友善：共产党人手段残忍而且表里不一，他们企图完全控制他们参与的所有事情，实际上他们首先效忠的不是他们声称为之效力的政府而是他们的党，最后还有，这个党所接到的指示不是基于理想主义，而是基于非常具体的利益，这些利益完全不符合西班牙人民的利益。”

尽管奥尔洛夫声称他在与普列托就杜兰复职一事争吵之后召回了他的顾问，因此他们“与军事调查局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但这并不是事实。正如时任安全总局局长的加夫列尔·莫隆所证实：“像所有其他事情一样，军事调查局被我们的苏联好朋友暗中控制着，他们终于侵入部长的势力范围，接管了不可分割的任命调动人员的职能和权力。”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估计当时普列托的反抗已对共产党人造成了威胁，据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奥尔洛夫决定暗杀国防部长。埃尔南德斯声称，他从自己的警卫班长梅纳那里听说了这个阴谋，梅纳则是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西班牙特工安东尼奥·苏维奥伦那里得到的消息，结果，他通知柯多维拉和盖基斯及时挽救了普列托的生命。“听着，”他对苏联大使说，“在发生了宁被劫持并且‘失踪’的惊人丑闻之后，如果奥尔洛夫犯下他正针对普列托策划的罪行，我将亲自谴责这一罪行。”尽管历史学家必须认真地筛选埃尔南德斯提供的证据，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奥尔洛夫不会想到暗杀这种非常符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口味的主意。

不管怎样，现在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显然，像其前任拉尔戈·卡瓦列罗一样，普列托绝不会成为他们的棋子，因此，撤换他是当务之急。

## 第五十二章 共产党讨好全国劳工联合会

正如前面一章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决定恢复一些被解散的集体农庄不仅是因为农村的经济和农民的士气受到了破坏性的影响以及拉尔戈·卡瓦列罗临时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结盟所带来的威胁，而且还因为他们与国防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摩擦愈演愈烈。实际上，普列托遏制共产党人控制军队的趋势的决心现在迫使西班牙共产党设法将其逐出国防部，同时寻求与全国劳工联合会达成某种暂时的和解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为，尽管西班牙共产党以经济崩溃相威胁保护了城乡那些中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它不能让他们变得过于强大，以免他们依靠现在因革命陷入低潮而深受鼓舞的社会党温和派与共和派的帮助，企图将政府控制在自己手里。为了指导国内外政策，西班牙共产党必须占据支配地位，通过控制警察和军队，并且通过充分利用不同派别和阶层相互之间的对立关系及其固有的自身利益巧妙地平衡各种力量，可能做到这一点。

前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写道：

在我们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可以依靠其他党派组织所缺乏的一些东西：纪律，盲目服从的概念，绝对听从上级指挥。……在面对这个冷酷无情的庞然大物时，其他党派组织怎么办？一个支离破碎、内部分裂的社会党，根据三种不同的指示运转，具有三个相互斗争的代表性人物：普列托、卡瓦列罗和贝斯泰罗，不久之后还要给他们增加一个：内格林。我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设法利用了他们的自相残杀。某个时期我们支持一方反对一方。另一个时期我们转变立场支持完全相反的那一方。于是，今天，明天，我们天天煽动一方反对另一方，以使他们互相残杀，这是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玩弄的花招，而且无往不胜。就这样，我们主要依靠内格林打败了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一定程度上也依靠了普列托。为了除掉普列托，我们利用了内格林和另外一些著名的社会党人。倘若内战持续下去，如果内格林妨碍了我们，我们为了消灭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与魔鬼结盟。……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总体情况好不了多少。……尽管他们的队伍比社会党人更稳固、更严整，我们仍然设法打开了缺口。我们通过争取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大多数与政府合作加深了它们的不和，作为一种演变的结果，这种不和正在全国劳工联合会中出现，在此之后，无政府主义运动经历了一个内部争论的过程。……共和派的各个派别也没有……显示出某种同心协力的姿态。因内战初期群众对[军事]叛乱的反应所具有暴力和混乱特征而受到惊吓，他们愿意接受我们推行的恢复秩序和纪律的政策，从而被我们争取过来。他们对我们的价值在于他们的名声而不是他们的能力。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尊重并且保护他们，但也不妨对他们的真诚加以利用，当我们与人民阵线的其他力量之间出现麻烦时，就把他们当作特洛伊木马来使用。

毫无疑问，内战期间在西班牙取得的经验为克里姆林宫在二战之后完成对东欧的绝对统治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例如，在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马蒂亚斯接受前共产国际

驻加泰罗尼亚代表杰罗·埃尔诺的建议和指导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主要依靠的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演练到极致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正是在匈牙利，这种方法第一次被称为“萨拉米香肠战术”。伊尼奥塔斯·保罗战前是匈牙利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作家，战争年代在伦敦为英国广播公司工作，拉科西—杰罗专政时期（1949—1956）在监狱里度过，他描述了这一经典过程。在某个“迷人的真诚”时刻，他写道，拉科西“炫耀说，他把联合组成[匈牙利政府]的非共产党合作者‘切成了一片片萨拉米香肠’。他这种‘萨拉米香肠战术’确实十分有效，可能除了肆无忌惮和一把切‘香肠’的小刀之外，不再需要别的什么来确保他的成功”。在西方，几乎没有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认识到，早在俄国革命前列宁就已实践并且鼓吹的分化其他党派组织以便从它们的衰败中渔利的方法在苏联之外首次成功的应用是在西班牙内战这个政治实验室里完成的。

在共产党人争夺权力的过程中，与萨拉米香肠战术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利用中小地主、小店主、小手工业者和小工厂主的恐惧的能力。内战爆发时这些人转向西班牙共产党寻求保护以免遭受集体化浪潮的冲击，内战之前他们在政治上分别倾向于共和派和右翼政党。尽管共和派在西班牙共产党加强其权力基础的过程中为它的目的出了力，但是，它并不把他们视为长期的盟友。就共和派而言，他们也不可能相信共产党会永远保护他们的财产所有权。此外，共产党并不认为可以指望中产阶级共和派支持一场长期的斗争，因为他们缺乏工人阶级那样的革命动机，所以它怀疑，即使赢得了内战的胜利，也要在政治和经济上消灭他们。内战刚一爆发就被共产党人的甜言蜜语所笼络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成员埃德蒙多·多明格斯证实了这种互不信任。在内战结束不久由玛加丽塔·内尔肯按照党的观点进行修改之后出版的《战胜内格林的人们》一书中，多明格斯写道：“在内战初期被群众的浪潮推动向前而非出于自愿的共和派人士缺乏继续进行一场遥遥无期的长期斗争的坚定决心。……我们

的斗争的性质及其包含的政治因素使他们怀疑，即使战争最终获胜，他们也将被取代。这削弱了他们非常有限的反抗精神。

为了保持优势，共产党人不仅必须使对立派别之间势均力敌地相互争斗，而且必须使它们相继中立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消失。随着在权力的阶梯上一步步登高，他们在身后留下了一个个新的对手。“当我们与卡瓦列罗决裂时，” 埃尔南德斯写道，“我们与社会党多数派决裂了。……当我们挑起卡瓦列罗危机时……我们使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百多万会员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攻击普列托冒犯了共和派人士，他们认为在西班牙，这位社会党领导人是比任何其他人士更有代表性的共和派政策的决策人。……如果在此期间我们的地位没有出现总体的崩溃，那是因为仇恨共产党人的各种势力没有组成统一战线。”

面对普列托在掌控国防部之后达到顶峰的敌意，为了保持他们在权力的天平上的优势地位，并且为迫在眉睫的与这位社会党领导人的最后摊牌作准备，共产党人需要与全国劳工联合会暂时停战。政策的这种变化现在具有双重必要，因为，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拉尔戈·卡瓦列罗正试图通过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结盟重新上台。

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提交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陶里亚蒂批评西班牙共产党没有及时对改变策略的必要性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写道，卡瓦列罗下台后，党没有认识到“使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接近我们以防止[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卡瓦列罗的支持者再次和好”的重要性。陶里亚蒂没有说明共产党在破坏集体农庄和镇压自由主义运动期间怎么才能改善它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关系。他还对党的另一些错误行为进行了批评。他说：“在从巴塞罗那前往巴伦西亚途中，我向同行的同志们提出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他们的看法非常简单：‘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失去了所有影响力。……我们希望他们组织另一场暴乱，然后我们将一劳永逸地消灭他们。’不幸的

是，这种看法在党内非常普遍，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当人们具有这种看法时，接近无政府主义群众并使他们脱离其领导人的政策不可能落实。党员们……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它的领导人、它的内部问题、它的各个派别、它的危机等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我还没有发现一个同志可以对我说出国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的名字。”

值得注意的是，陶里亚蒂把西班牙共产党不设法改善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关系归咎于最近刚刚接替他成为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比托里奥·柯多维拉。在九月十五日写给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和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的一封信中，陶里亚蒂指责柯多维拉在“与无政府主义者建立友好关系从而孤立卡瓦列罗”的问题上没有采取“连贯的政策”，因此强烈要求他们不要让柯多维拉返回西班牙。“我不想作出草率的判断，但是，”他说，“我认为我已得出结论，他的出现对党有害。”

肯定是因为陶里亚蒂的建议，共产党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态度开始变得温和起来。热情之花十月一日在议会发言时以一种抚慰性的语气宣称，“我们不应忽视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我国的重要性”，因此，“必须考虑使其队伍中真心实意的革命工人分享政府职责的可能性”。在另一个场合，何塞·迪亚斯声称，“那些认为或者想说因为我们正在打仗所以不能谈论革命的人大错而特错了”。

几天后，在马德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从普通民兵战士提拔起来的中部前线共产党军事指挥官“农夫”拥抱了与他地位相似的无政府主义民兵指挥官西普里亚诺·梅拉。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评论说：“这种拥抱应当扩展到我们国家的全体工人。”“农夫”在这一貌似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发表的演说中宣称。“团结不能只是又一个口号或者一个谈论的话题。它必须通过行动、通过政策的根本转变来实现。这样的话，在那些并肩战斗、一起工作的人当中将会产生必要的信任。”然

而，梅拉的演说明显让人感觉到，与一次象征性的拥抱相比，更需要使自由主义运动相信共产党人的诚意。他在演说中谴责了“可以破坏或者削弱在战壕中用鲜血缔造的团结的诱人改变政治信仰的行为和宗派活动”。

几个月来，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报纸一直把西班牙共产党斥为“反革命”。《工人团结报》说，西班牙共产党并不是为“使我们的革命具有特色的伊比利亚理想”所激励，它给“它的所有行为”全都打上了“苏联的印记”。“粗略翻阅过共产党报纸的人得到的印象肯定是，”《自由阵线报》写道，“除了佩戴锤子镰刀图案的积极分子之外，其他人在西班牙都是废物和人渣。只有这些积极分子聪明、忠诚、英勇，能够克服种种困难为人民指出通往胜利的道路。……共产党必须从根本上认识到，它走在一条可能以无法挽回的彻底失败为尽头的错误道路上，在这条道路上首先沉沦的将是共产党自己。”甚至在共产党的安抚政策开始显露最初的迹象后，《自由阵线报》仍然警告说：“当事实让人看到对工人阶级发动战争的罪恶意图时，我们不可能认为关于团结的言论是真诚的。”

这种充满敌意的反应并没有使西班牙共产党望而却步，它试图消除人们的怀疑。

《工人世界报》抚慰性地宣称，党希望在领导战争和革命方面得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合作不是因为“某种权宜之计或机会主义政策，而是因为坚定地相信这将加强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从而促使胜利早日到来。“我们感到庆幸的是，改善各种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关系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种和解的完美体现也许是‘农夫’同志与梅拉同志……兄弟般的热情拥抱。我们的热烈希望和全体工人的愿望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与人民阵线其他党派组织的关系在短时间内完全正常化。”

这是一种过于乐观的期望。不仅因为共产党在自由主义运动中失去了信誉，而且因

为策略性地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建立友好关系存在着另外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是卡瓦列罗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他在离开政府后不久重新担任了执委会的总书记，决心与共产党人继续斗争。“[我处在]我熟悉的环境中，”他写道，“与我这个阶层的人经常联系。……他们不会策划阴谋诡计，玩弄政治花招。……我现在关心的是，西班牙的命运将会怎样。那些肆无忌惮、鲜廉寡耻、一心只想着权力的人，打算对西班牙做什么？……可怜的西班牙！你的命运被野心、不忠、背叛所控制，因此，我想到了你的精神和物质废墟。这是我在寂寞时的独白。”

为了保持自己与宿敌对抗的政治资本，拉尔戈·卡瓦列罗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签订了一份临时盟约。除了其他内容之外，两个工会同意停止相互间的暴力行为，赋予工人加入其认为合适的组织的绝对自由。尽管没有提到两个工会意见分歧的重大问题，例如国有化，两个对立工会之间的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仍然加强了社会党左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与他们的共产党敌人对抗的地位。共产党人则认为，这份协议缔结的是“一个针对各个政党和政府的进攻联盟”。陶里亚蒂在八月三十日提交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西班牙共产党反对这份协议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卡瓦列罗“现在是以工会团结的倡议者的面目出现的”。他还说，党并没有认识到，如果它在使两个工会重归于好的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话，那么，“这份针对我们的盟约可能被用来反对它的策划者”。

无论如何，这份盟约使共产党人难以实现当前的目标：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达成暂时停战以便为迫在眉睫的与普列托的最后摊牌作准备。同样严重的问题是拉尔戈·卡瓦列罗对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的控制，这妨碍了党实现它的最终目标：将这个社会党的工会组织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必须把他从他的堡垒中驱逐出去。

第五十三章 拉尔戈·卡瓦列罗退出政坛，劳动者总工会与全国劳工联合



## 会签订联合协议

为了将拉尔戈·卡瓦列罗从他在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的堡垒中驱逐出去，西班牙共产党直接利用社会党工会组织中左派与中间派的意见分歧并且发挥了它自己长期积累起来的影响，因为它不仅渗透到了普通会员当中，而且还将一些有影响的全国委员会成员纳入了党的轨道，其中包括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埃德蒙多·多明格斯、费利佩·普雷特尔 和何塞·罗德里格斯·维加。这对卡瓦列罗来说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明文规定全国委员会拥有任命新的执委会的权力。

劳动者总工会内部的蛮不讲理和意见分歧在五月变得特别引人注目，当时，执委会宣布它反对任何不是由卡瓦列罗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政府，而全国委员会并不赞成执委会所采取的立场。六月，当全国委员会成员兼银行雇员工会主席阿马罗·德尔·罗萨尔——他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著名追随者中最早转投西班牙共产党的人士之一——在批评了执委会的政策之后从执委会辞职时，紧张状态加剧了。七月，拉尔戈·卡瓦列罗拒绝接受参加某个纪念内战爆发一周年的会议邀请后，气氛变得更加紧张。“如果共产党不准备出席，劳动者总工会肯定会派代表参加。”他答复说，“但是，因为[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刚刚在七月十日宣称，‘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是一伙团结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是一伙一事无成而且满腹怨恨的人，他们不代表任何人，他们把他们的怨恨和个人情绪置于人民的神圣利益之上’，所以，我们不可能与共产党参加同一个会议。”

共产党政治局宣称，这一答复最充分地证明了《红色阵线报》的说法：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的大部分成员并不代表群众的意愿。“不过，考虑到内战爆发一年后的国际形势，”它说，“各个党派组织之间应当保持前所未有的最严格的协调一致，[这]将加强建立在尽快赢得战争进而开展人民革命这一共同目标基础上的团结。”

“人民革命”这一表述——多年以后西班牙共产党将其称为“民族革命战争”——是给国内听众的一点小恩小惠，最近被共产党用来安抚那些批评者，他们不接受为一个“新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战的口号。“人民革命”的性质并不比“新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具有更明确的定义，因此，它并未消除人们的疑虑：一旦共产党人扩大并巩固了他们的权力，七月革命的势头将持续减弱，未来社会的格局将由西班牙共产党来决定，无论它喊什么口号。

从一些仍然忠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西班牙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著名成员所发表的演说来看，社会党左派显然不相信西班牙共产党关于革命性质的口号。在九月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曾在卡瓦列罗政府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卡洛斯·德·巴赖瓦尔谴责了那些企图抑制人民群众“革命干劲”的人。“我们正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战的说法使战士和后方人员的热情减退。”在同一次集会上，前内政部副部长和劳动者总工会所属全国办公室雇员联合会书记卡洛斯·鲁维埃拉宣称：“今天，许多西班牙人在问自己，七月十八日的幻想在哪里。为什么街头不像当时那样充满活力？原因是，曾经出现了一次倒退。我们决不能忘记革命的规律，因为，在不革命的情况下，自由不可能取得胜利。……想使革命激情消失者大有人在，他们想给七月十八日塞进私货。西班牙工人阶级必须对这种形势作出反应。关于人民革命有许多说法，但是，在不进行社会革命的情况下，人民革命是一场什么革命呢？”

顺便提一下，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控制的对外新闻司认为它提出的“人民革命”的口号对于温和的外国舆论来说过于激进。例如，七月七日，我在发给合众社的电讯中引用了共产党政治局致社会党的一封信中的有关内容，这封信敦促两党实现合并，政治局认为，两党合并“是军事胜利的一种保证，同时也是巩固人民革命成果并且取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共产党员新闻检查官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删去了用着重体标出的词句。

在共产党政治局看来，向卡瓦列罗发动进攻的时候到了。几乎可以肯定，七月三十日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签订的临时盟约增加了进攻的迫切性。共产党人及其盟友共同发难，要求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召开一次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没有宣布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不过显然是要选出一个新的执委会。八月中旬——当时对集体农庄的攻击登峰造极，共产党人要到几周之后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作出安抚的姿态——《红色阵线报》不满地说，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通过允许工厂、车间和公用事业“在没有政府介入的情况下”继续控制在各种委员会和工会的手中而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结成了联盟。它认为，这是生产处于无组织状态的根本原因之一。“拒不遵循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委员会制定的路线，控制着执委会的那个团体的主要领导人越来越屈从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团主义政策，遭到执委会的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同志反对的这种倒行逆施解释了全国委员会关于没收财物、基础工业的国有化和工人管理的一系列决定为什么得不到贯彻执行。”《红色阵线报》继续说，劳动者总工会在与全国委员会对立方面甚至走得更远。在没有就与全国劳工联合会恢复关系这一问题与全国委员会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它一意孤行，缔结了一个“加强工团主义化倾向并与人民阵线政府对抗”的全国性联盟。“如果执委会继续在不受我们伟大的工会组织控制的情况下自行其是，这种政策将会导致什么后果？它可能导致劳动者总工会成为某个小团体的工具，这个小团体只由自己的个人野心所支配。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全国委员会必须立即开会。”

在随后的几周时间里，全国委员会根据劳动者总工会的章程多次要求执委会召开一次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但是，预见到危险的拉尔戈·卡瓦列罗不是对这些要求视而不见，就是寻找借口拒绝它们。“在答复我们的某一次要求时，”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写道，“执委会说，要求应当由所有联合会共同署名。这不符合规定。全国委员会成员不必按照这个程序。”

在一次挽救自己地位的孤注一掷的行动中，拉尔戈·卡瓦列罗以其没有缴纳会费这种简单的技术性理由将在全国委员会中拥有代表的四十二个联合会中的十个开除出劳动者总工会。“然而，可怕的是，没有什么努力可以阻止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疯狂地走向分裂。”《红色阵线报》报道说，“它以没有缴纳会费为借口——这是执委会捏造的借口，因为它拒绝接受补缴的会费——开除了十个全国联合会。”不过，《红色阵线报》断言，开除这些联合会不是一个是否遵守规定的问题，而是“为了在全国委员会获得绝对多数所玩弄的一种花招”。

九月二十九日，全国委员会使事情发展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它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卡瓦列罗尖刻地对此回应说：“我们有责任提醒你们，未经执委会预先召集，全国委员会不能开会。如果你们所说的会议召开，它将被认为是反叛行为。”全国委员会没有退缩，它发布通告，全体会议将在十月一日召开。通告称，根据章程第三十三条，“‘当多数代表认为必要时’——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全国委员会将召开会议。执委会对此回应说，它认为全国委员会召集开会的方式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挑衅行为”，同时威胁要暂时剥夺那些“在召开会议的要求上签名并且可能参加会议”的联合会的权利。第二天，报纸公布了一份名单，列出了二十九个联合会，它们被卡瓦列罗控制的执委会开除或者暂时剥夺了权利。

这种企图以玩弄策略压制全国委员会的疯狂尝试注定失败，因为拉尔戈的对手根本不在乎开除和暂时剥夺权利。的确，正如拉尔戈后来所说，他可能仍然享有大多数普通会员的支持，但是，反对他的全国委员会成员掌握着大多数表决权。十月一日，在劳动者总工会总部的楼梯上仓促召开的临时会议上，全国委员会成员选出了一个新的执委会。著名的一九三四年阿斯图里亚斯暴动领导人、普列托派社会党人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当选执委会主席，下面这些均为共产党的支持者的社会党人得

到了剩余的关键位置，使西班牙共产党有效地控制了新的执委会：埃德蒙多·多明格斯，副主席；何塞·罗德里格斯·维加，总书记；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副书记；费利佩·普雷特尔，司库。

这次突然袭击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内战之前他们将其弱小的统一总工会（CGTU）与劳动者总工会合并，直到内战爆发时，他们在这个工会组织内部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力。正如后来转投内格林的普列托派社会党人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在回忆录中坦率承认的那样：“他们没有基础和威望”，因此，他们在内战期间通过利用某些人来施加他们的影响力，“这些人除了党证之外与社会党人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留在我们党内比加入共产党对共产党人更有用”。

至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在导致其宿敌政治毁灭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还有他对与之为控制军队斗得不可开交的共产党人所取得的这场胜利的感觉如何，在他的各种著述和公开发表的声明中，没有发现任何痕迹。在大多数情况下，普列托玩弄政治花招时总是喜欢匿影藏形，但是，在阿萨尼亚的日记中有证据表明，内阁全体成员一致希望彻底打垮那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而普列托在内阁中仍然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于社会党温和派（甚至对于共和派）来说，与除掉宿敌并且剥夺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劳动者总工会的最后一点权力相比，这可能增强共产党的力量似乎显得并不重要。八月二十三日，突然袭击五周前，据阿萨尼亚记述，内格林告诉他，内阁一致同意将议会的开会日期推迟到十月：“内格林给我讲了许多理由。大部分理由不足为信，所有理由都神秘兮兮。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政府应当等到拉尔戈·卡瓦列罗不再担任劳动者总工会的书记为止，这好像得到了一致同意。内格林向我保证，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委员会将在下次会议上取代执委会。”内格林还告诉阿萨尼亚，由于卡瓦列罗打算在议会中反对政府，他和他的部长们认为，在卡瓦列罗被撤换之前应当将议会开会的日期推迟，“以使他在被解除了职务之后不能说，

我在代表一百万工人发言”。为了掩饰自己对于卡瓦列罗的敌意，阿萨尼亚敷衍地表示，推迟议会会期可能对政府不利，因为它不能公开透露推迟的理由，但是，他仍然同意内格林把议会开会的日期推迟到十月一日。

八月二十八日，据阿萨尼亚的日记记载，总统再次接待了内格林，内格林告诉他，卡瓦列罗已经与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以及另外一些议员一起拜访了议会议长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反对推迟议会会期：“他们想指责政府在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的表现；在政治领域，因为共产党人和苏联人的支配地位，而且因为他们认为全国劳工联合会正在遭受的迫害。”“内格林向我保证，”阿萨尼亚附带说明，“[苏联人和共产党人]现在被牢牢控制着，对他们的控制从未放松。”阿萨尼亚在日记中没有记录他对这一明显的谎言作何反应。

确定十月一日为议会开会的日期正是时候，因为那天正逢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委员会选举新的执委会，拉尔戈·卡瓦列罗当时全神贯注于劳动者总工会的内部危机，以致没有参加议会会议。因此，共产党的势力加大对议会渗透的力度没有引起丝毫争议。像往常一样，共产国际的喉舌喋喋不休地声称政府遵守宪法的规定。“十月一日，”《国际新闻通讯》报道说，“……西班牙议会恢复工作。……内格林政府……表明它是最忠实地捍卫宪法的一届政府。……面对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盟友企图用来吓唬民主国家人民的‘布尔什维主义’、‘赤色西班牙’等不公正的指责，人民阵线的各个党派，尤其是共产党，日复一日坚持不懈地一再重申，‘我们正在为一个新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战’。因此，议会……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我们的斗争的性质：民主反对法西斯的斗争。”

但是，在对斗争的这种过于简单的定义背后，共和派阵营中仍然反对共产党谋求霸权地位的那一部分人正在为生存进行持续的斗争。

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遭遇了明显的失败，但他拒绝承认新的执委会。结果，两个执委会在一种毫不掩饰的敌对状态下并存。“我们有理由怀疑，”两周后，卡瓦列罗在马德里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断言，“有人打算像在加泰罗尼亚那样对付劳动者总工会。你们都知道加泰罗尼亚有一个统一社会党，那不是统一社会党，而是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从一开始它就加入了第三国际，指挥[它]的那些人都是共产党员。……问题的实质是，由于加泰罗尼亚的劳动者总工会被共产党人所利用，由于因为我们的党实际上也被共产党人所利用，唯一能够反抗的组织是劳动者总工会。因此，他们想要占有它。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希望它保持自由。”

为了给这位社会党领导人施加压力，根据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回忆录《我的回忆》记载，政府决定“截取没收所有寄往劳动者总工会的信件，包括寄给我个人的信件”。他指称，共和国通讯部长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同意了这一卑鄙的阴谋”。“似乎这样做还不够，政府命令银行不许工会提取任何存款，以使我们无法支付日常费用。”

卡瓦列罗的对手从其他方向同时开火。他断言，内格林、普列托和苏加萨戈伊蒂亚应当对免去他的两个议会职务——社会党少数派议员团主席和议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负责。“他们不会允许任何反对派存在，[所以]要有计划地剥夺我的所有职务。他们没有试图把我从马德里的社会党组织[他领导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中赶走，因为他们自己将被开除。”的确，整个内战期间，马德里的社会党组织对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的忠诚保持不变，五月政府大改组后，他每星期天都在好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何塞·迪亚斯·阿洛尔和帕斯库亚尔·托马斯的陪同下从巴伦西亚去马德里参加会议。卡瓦列罗说，普列托派控制的西班牙社会党执委会企图“使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服从它的鲁莽政策”但没有成功，因为“马德里不向专制屈服”。

不过，在巴伦西亚，普列托派社会党人比较幸运。在那里，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控制着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社会党内的第二大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自从拉尔戈·卡瓦列罗被逐出政府，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成为反对社会党温和派和西班牙共产党的中心。七月九日和十日，巴伦西亚省委员会在联盟总书记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并且通过一系列决议。其中最好斗的两项决议如下：

1. “在认真调查了因[西班牙共产党所控制的]巴伦西亚农民联合会的成立而在农村造成的问题之后，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同意，在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外围成立的任何组织都应被认为具有分裂倾向，……因此决定将所有加入农民联合会的党员开除出党——成立农民联合会的唯一目的是分裂农村的劳动者，它由恢复了西班牙政治最卑鄙、最残暴特征的那些人指挥。”

2. “我们认为埃尔南德斯和热情之花攻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演说破坏团结，因为它们造谣中伤。因此我们一致同意立即解散巴伦西亚省的所谓社会党与共产党联络委员会，直到对方收回这些攻击性的言论为止。”

七月十六日，社会党执委会的喉舌《社会主义者》谴责了解散联络委员会的决定，该委员会是为促进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而在四月成立的，《社会主义者》还问道，“难道我们必须忍受眼看着不负责任的弊病在我们党内滋生的耻辱吗？”答案很快就有了。七月二十五日，社会党执委会在温和派内政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同意的情况下决定采取行动。新近任命的温和派社会党人省长曼努埃尔·莫利纳·科内赫罗根据内政部长的命令行事，取缔了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并且正如拉尔戈·卡瓦列罗所指出的那样，任命了另一个“符合”政府和省长“口味”的委员会。被取缔的委员会的总书记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证实：“中午，



在一队[内格林的财政部管辖下的]边防警察的跟随下，一名警官带着社会党执委会的一封信和内政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签发的命令出现在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总部以及[联盟的日报，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前进报》的编辑部和印刷车间.....命令我们交出办公室、文件和钱。.....当我们试图反抗这种粗暴的行径时，那名警官告诉我们.....他得到命令，如果我们不服从命令，他就把我们抓进省立监狱。”

几天后，社会党执委会公开宣布了取缔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的理由。它说，两年来，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选取了一种“不服管束的态度”，但是因其“蛊惑人心的宣言使它看上去似乎是个热心革命的组织”，所以没有采取纪律措施。《红色阵线报》评论说，社会党执委会“及时有力地”采取了行动，同时谴责了“无产阶级和社会党团结的敌人”。它宣称，“这一伙人.....挑拨工人互不信任，经常煽风点火尽其所能分裂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工人群众，进而阻止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没收《前进报》使拉尔戈·卡瓦列罗及其支持者在西班牙全国只剩下一份日报——质量很差的劳动者总工会地方喉舌《巴伦西亚通讯》——为他的立场进行辩护。内战刚一爆发，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将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时，他失去了这个地方工会组织的喉舌《消息报》。过了还不到一年，他在马德里的喉舌《光明报》又被别人夺走了。现在必须剥夺他的最后一个日常传播媒介。在九月十五日写给莫斯科的一封信中，陶里亚蒂报告说，《巴伦西亚通讯》正在对西班牙共产党进行“卑鄙的诽谤”，党的书记处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同志们天天发誓，”他写道，“他们要把卡瓦列罗派赶出工会地方组织的领导层和报纸的编辑部。”他说，他们的计划是与劳动者总工会地方领导人中的温和派达成协议，然后“对报纸进行某种不完全合法的突然袭击，将卡瓦列罗派的编辑

赶走，成立一个新的编辑部。他们向我保证，凭借当局的帮助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解决问题。就我而言，我一直鼓励并且督促他们按这种方法办”。但是，他不满地说，原来，党的书记处“根本没有从当局那里得到过提供帮助的任何承诺”，因此，劳动者总工会地方组织的温和派不准备发动突然袭击。“这样一来，整整一个月浪费在与温和派会谈、与当局会谈等琐事上，结果，在此期间，应当在群众中开展的最基本的工作——动员工人在工厂和工会举行反对报纸及其编辑部的集会——完全被忽略了。”

面对劳动者总工会地方组织中那些温和派的胆小怕事，新组成的全国执委会决定干预，十一月初，他们在内格林手下的一小队由恩里克·普恩特——此人后来成为总理信任的同伙——指挥的边防警察的协助下，占领了《巴伦西亚通讯》的办公室。在被夺走最后这个日常表达媒介之前，拉尔戈·卡瓦列罗大胆尝试与广大群众进行了一次近距离接触。十月十七日，在马德里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他的对手，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政治家的风范，也没有提出解决方案或者发出什么号召。尽管如此，听众的反应非常强烈而且呈现一边倒的势头，这表明，这位年迈的社会党领导人仍然拥有大批追随者。当他登上讲台时，一个人大声喊道：“帕科，不要担心，你的所有老朋友全都与你一起在这里。”据社会党左派议员希内斯·甘加说，这种支持的表达使卡瓦列罗相信，“人民继续信任他”。这次集会是在宽敞的帕迪尼亚斯影院举行的，虽然那里面积很大，但事实证明，它容纳不下集会的群众，结果，只好在另两家剧院装上扩音器。“群众的热情难以形容。”卡瓦列罗记述说。

尽管卡瓦列罗计划在另外几个城市举行群众集会，但当局不允许他再次公开发表演讲。他被苏加萨戈伊蒂亚置于严密的监视下，当他由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鲁道夫·略皮斯、文塞斯劳·卡里略、帕斯库亚尔·托马斯和希内斯·甘加——这些人都是社会

党议员和他的好友——等人陪同动身前往阿利坎特参加一系列群众集会的第一场集会时，突击卫队士兵的枪口阻止了他。“专制、暴虐、不公胜利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痛苦地评论道。

几天后，十月二十九日，阿萨尼亚与内格林讨论了这个问题。内格林告诉总统，已经要求拉尔戈·卡瓦列罗不要外出以免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当他坚持外出时，”阿萨尼亚记述道，“内政部长和总理决定阻止他。……内格林向我保证，拉尔戈几乎得不到公众的一点支持。他不会允许卡瓦列罗或者他的助手和顾问从事任何破坏活动，即使把他们抓进监狱并且送上[审理间谍和叛国罪的]特别法庭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正在巴伦西亚散布‘失败主义’。……我强调说，他的组织应当严守审慎与宽容的原则，不要是事情弄到撕破脸的地步。”

十月二十六日，拉尔戈·卡瓦列罗给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把他和其他社会党议员前往阿利坎特途中所蒙受的羞辱告诉了议会议长，说这是对所有忠于共和国的议员的“蓄意冒犯”。问题被提交（刚刚将拉尔戈·卡瓦列罗免职的）议会常务委员会，但是，政府的行为得到除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以外的所有十六名常务委员会成员的认可。社会党书记拉蒙·拉莫内达赞扬苏加萨戈伊蒂亚处理情况手段“巧妙”，热情之花则认为，政府在制止“某些可能引起混乱的公众集会”方面履行了它的职责。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担任内政部副部长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比达特声称，听说卡瓦列罗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后，他问在其他方面胆小怕事的内政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这是不是事实，内政部长的回答让他“感到痛苦和震惊”：“这算什么！我准备把拉尔戈·卡瓦列罗和他的朋友关进监狱。……我的命令不公开进行讨论。”尽管发出这样的威胁，卡瓦列罗的对手却承担不了采取这种极端行为的后果，不过，他被

有效地剥夺了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直至内战结束，他再也不能通过报纸或者站在讲台上吸引公众舆论的注意了。“内格林政府的专制政权不允许在报纸和集会上发表任何不同意共产党行为的意见。”他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中写道，“也不能公开谴责劳动者总工会和社会党执委会与共产党所有丑恶行径的同流合污。”

甚至还在最终剥夺拉尔戈·卡瓦列罗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之前，共产党人与社会党温和派联合起来企图夺走他的所有传播媒介并将他逐出各种社会生活的行为已经激怒了社会党左派。与公开进行的论战相比，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与社会党执委会十月中旬你来我往的三封信件更鲜明地表现了使之分裂成为两派的相互间的厌恶感。三封信的篇幅很长，下面是从其中摘录出来的部分内容：

[致社会党执委会的第一封信写道]在共和国这一危急时刻，如果始终站在西班牙工人阶级前列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没有通过明确指出使我们陷入当前境地的那些人的错误和责任而把正在发生的事实真相告诉人们，那它就是逃避它的传统和历史责任。

某个政党正在极其危险地暗中损害一些人的士气，这个政党的首要任务是以成为战时和战后独一无二的政治力量的暗藏祸心拼命扩大其政治势力，而它损害其士气的那些人……正在努力把这个国家从各种形式的国内外暴政中解放出来并将把人民——尤其是最广大的无产阶级——拥有当家做主的绝对自由的社会政治制度赋予它。……

直到三个月前，西班牙的反法西斯力量确实团结。所有党派和工会组织始终在政府中通力合作，共同承担战争的责任。如今，这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局面遭到了破坏。……谁应当对此负责呢？首先是共产党，它密谋策划把不同意它所引进的口号的个人和组织赶出政府，接着，只要被它视为在军队和各个政府部门进行宗派活动的

障碍，它就推翻那些过去被它奉若神明的偶像人物。它用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自己辩护：政党——而且特别是共产党——是享有特权的政治存在，几乎具有神的血统，它的任务是制定政策，而工会的任务只是行动，同时盲目服从新的精英。……[西班牙共产党]已经宣称，它要与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中反对其极权主义政策的那些人死战到底。

这个制造分裂的政党是反法西斯力量团结的凶恶敌人……但它却自称是西班牙工人阶级政治统一的倡导者。……它通过将其捆住手脚交给共产国际的方式兼并[社会党]青年运动和加泰罗尼亚社会党的先例对两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合并没有什么促进作用。共产党在前线和后方所实施的无数镇压迫害行为也不是有利于合并的因素。……

我们同时必须指出这种政策在国际上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有人认为，作为五月事变的结果而把工会组织和社会党左派排除在政府之外将会促使欧美民主国家同情共和国的事业。截然相反的事情已经发生。国际形势现在比以往更加不利，这是以下原因造成的：

一方面，那些民主国家的保守阶层认为，在政府更迭和政策变化的过程中，西班牙反法西斯阵线被削弱，叛军因而有了更大的获胜机会。……另一方面，那些民主国家包括广大国际工人阶级在内的大部分自由派认为，共产党在现政府中处于支配地位。这种看法由于某些与社会治安有关的事件——这些事件刺激了世界人民的良心——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报纸所进行的肆无忌惮地迫害宣传而强化。这一切促使我们所拥有的大部分国际支持者疏远了我们。这首先是因为共产党，它应当对这场危机负主要责任。……

然而，让共产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全部负责并不公平。它是主犯，但它不是唯一的罪犯。另一个政党驯顺地支持共产党大张旗鼓地开展制造分裂的诽谤宣传，甚至针

对的是自己的党员。我们不会点它的名字。我们不想因为与我们具有同一血统的那些人的卑鄙行径使自己难堪。不过，绝大多数社会党党员明白我们指的是谁，因为他们知道一些难以理解的串通行为，这些行为的始作俑者迟早有一天将不得不对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和历史本身作出解释。我们听说过多种形式的背叛，但是，为了另一个政党的利益对自己的政党进行清洗却闻所未闻。这等于听命于那个政党并且默不作声地忍受它的侮辱，要不然就是真的乐意。只有极少数反革命、反民主的人[这指的是社会党执委会]能够毫无顾忌地这样做，极少数为了权力而只关心权力的人。

社会党执委会在回信中写道：

如果[你们的来信]没有熟悉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的落款，我们会以为那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最近散发的文件的副本；论点何其相似乃尔。你们的语言可能更加阴险更加好斗，这说明了无政府主义报纸大肆进行宣传的原因。……

因此，你们的来信与一场坚持反对现政府……反苏、反对我们自己政党的运动目标一致。事实上，内格林政府拥有[西班牙社会党]全国委员会非常明确的支持，劳动者总工会应当足以使一个社会党的地方委员会不去攻击政府。……

据无政府主义者和你们自己说，……我们面临一种新的暴政，一种反西班牙的专制，你们认为共产国际应当对此负主要责任。萨拉曼卡和罗马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你们说政府专制，而西班牙共和派要求的是：一个治理国家的政府，不是一个必须天天请求不服管制者许可的政府。在战争期间，当一名社会党人不仅应当坚持原则做一名权力主义者，而且应当像你们一年多前呼吁无产阶级专政那样，热情地主张在不走极端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把权力集中起来时，身为社会党人——正统的社会党人！——的你们却鼓吹一种反权力主义或自由主义的观点。……

反西班牙的专制！的确，西班牙决不能对自己的命运失去信心，但它需要苏联的帮助，只要不丧失它的独立。正是在这个据你们说想把我国变成殖民地——托洛茨基分子和佛朗哥也这么说——的国家的帮助下，我们把自己从沦为殖民地的厄运中解救出来。……你们，你们这些昨天的布尔什维克攻击共产党，指责它扩张势力、为其成员弄到职位无所不用其极。现在不是讨论这种政策合法不合法的时候。那是[两党]联络委员会会议的议题。……

你们称其超越国家与法律而且专制的共产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榜样，一个头脑冷静的榜样，一个富有责任心的榜样。此刻，在攻击共产党的同时，你们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更加紧密，不过，另一方面，你们消除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分歧的能力没有限度。……

在你们看来，政府已经疏远了民主国家的支持者。……民主国家为什么受到了刺激？因为，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它们却像你们自己一样恐惧地认为：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世界游荡。现在，看到你们及时散发的文件时，它们将比以往更加相信这一点。……

当你们指责本执委会与共产党串通一气时，你们违反了社会党的原则和纪律，并且双双背叛了它们。所幸令人放心的是，这是劳动者总工会和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共同参与的串通一气，我们认为它们的看法比一个地方委员会的看法更值得考虑。这是一种提出了以平等的地位合并——例如，就像法国社会党与行动和统一委员会那样——的问题的串通一气。你们提到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例子。我们没有与它们断绝关系。你们没有为它们成为现实存在作出过一点贡献。我们与此无关，但是反对拆散它们。

在似乎是最后一次书信往来的第三封信中，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写道：

读了你们的回信以后，……我们首先产生的念头是，就当没有收到它吧，因为我们相信，起草它的不仅有社会党人，而且还有共产党人；因为，在我们看来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竟然可以如此慷慨地为一个不是我们自己的政党作近乎低三下四的辩解和奉承。……但是，信中提到的事实和原则都是一些谎言的堆积，……以致它们只不过是既不正确也不明智的一面之词。……

你们有时说我们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有时又说我们是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在这方面你们也模仿共产党人，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你们的导师。你们像他们一样认为，通过用诬蔑不实之词对某些人进行辱骂就可以消灭他们。这是最幼稚的策略，因为，就连小孩都会觉得它可笑。如果你们企图用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那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狂热的沙文主义——定义我们，笑声在广州都能听到。但是，如果你们想说我们相信一种西班牙的社会主义，相信一种可以不顾外国干涉……完全按照我国人民的意愿并以他们喜欢的形式在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那么，这种西班牙社会主义，即使它不是普遍通用，这种非世界性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战士为什么要流血呢？为什么在革命初期同样受到外国入侵的苏联没有放弃在其领土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等待世界革命的爆发呢？

你们不认为可能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吗？这是托洛茨基的基本信条。因此，你们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们不是。实际上，你们既不相信在一个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相信在全世界同时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你们已经失去了社会主义信仰，因为你们已经不相信无产阶级是一个注定要发动并且加强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

很简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党人，也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人，属于一个因其富有



成果的悠久历史以及政治上的成熟而肩负着指导西班牙革命战争的任务的政党，尽管许多人背离了党的方向，他们自称社会党人，但只是一些名义上的社会党人。

在同一封信中，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谴责执委会在警察和“无耻小人与叛徒”的帮助下“卑鄙地抢走了”社会党左派的日报，而共产党仅仅在马德里就有五六份官方或者非官方的日报。

与报纸被夺走同样使社会党左派恼怒的是共产党报纸的为所欲为，它们可以不受限制地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拉尔戈·卡瓦列罗和他那些助手是劳动者总工会的敌人，”《红色阵线报》宣称，“所有工人都与他们断绝了关系。他们是工会团结的敌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敌人，人民阵线的敌人。”

与此同时，在法国工会领导人莱昂·儒奥对争议作出仲裁的一九三八年一月之前，围绕着两个对立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而展开的斗争达到了沸点。偏袒共产党人的儒奥裁定，新的执委会应当扩充，把四名卡瓦列罗派人士包括进去。但是，因为关键位置仍然由全国委员会任命的那些人占据着，而且因为执委会由十五名成员组成，所以，卡瓦列罗的四名代表并没有对共产党人控制这个工会组织造成威胁。儒奥强烈要求卡瓦列罗加入新的执委会以“加强团结”，卡瓦列罗拒绝了。他的决定受到对手的欢迎。“事实上，”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写道，“考虑到卡瓦列罗的性格及其‘顾问’灌输给他的大量政治毒素，对他来说，完全不可能与以冈萨雷斯·培尼亚为主席的新的执委会合作。后者也是社会党的主席，卡瓦列罗与社会党的领导层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刚刚巩固了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胜利，新的执委会立即委派埃德蒙多·多明格斯和阿马罗·德尔·罗萨尔（两人均为亲共人士）以及西班牙教育工作者联合会（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los Trabajadores de la Enseñanza）书记塞萨尔·

加西亚·隆巴迪亚（一九三九年一月被共产党开除）开始为制订“一个联合行动总体方案”与全国劳工联合会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十月开始向全国劳工联合会示好的共产党人继续高唱他们的塞王之歌。热情之花一月五日声称：“我们不允许革命在前进的过程中倒退。”

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为莫斯科所写的一份备忘录中，陶里亚蒂强调了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结盟的重要性，他还报告说，共产党向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示好的做法已受到鼓励。“最重要的是防止出现全国劳工联合会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因此，他说，“我们必须设法保证全国劳工联合会中的积极力量支持我们与投降分子和叛徒[例如普列托，阿萨尼亚和拉尔戈·卡瓦列罗]斗争。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巴斯克斯）赞成与我们结盟。”

的确，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和另外一些温和派成员决定采取一种与对手和解的政策，他们相信共产党人已占据上风，相信先前与拉尔戈·卡瓦列罗结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相信孤立对于自由主义运动具有毁灭性。不过，陶里亚蒂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向莫斯科报告说，西班牙共产党和劳动者总工会“朝与无政府主义群众和组织建立友好关系的方向”进展得“太慢”。他指出，它们没有认识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转变使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它们也没有认识到，正是这种联合将使最终战胜无政府主义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他警告说，如果“我们不采取联合的政策，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实力将增强，……因为它的骨干力量比劳动者总工会的更能干，而且它还具有从脱离政府控制的一部分工人的角度看问题的优势”。他接着说，党已经与马里亚诺·巴斯克斯进行了接触，但到目前为止仍未达成协议。他最后说，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任务是使社会党人相信两个工会之间必须进行最紧密的合作，因此，“我们现在正全力以赴争取完成这一任务”。

这份报告发往莫斯科后不久，两个工会的领导人之间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奥拉蒂奥·M·普列托和费德丽卡·蒙特塞尼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参加了会谈），但是，直到三月十八日，在敌军对阿拉贡前线发动的压倒性攻势和迅速恶化的军事形势的压力下，双方才最终消除了各自提出的草案的分歧。

尽管协议确认工人对工厂的管理是工人取得的最有价值的革命成果之一并且要求使集体农庄合法化，但它是对无政府主义信条的一次全面否定，因为，它不仅在这两个问题上承认政府的最终权力和权威，而且在诸如工业国有化和正规军之类重大问题上承认政府的最终权力和权威。尽管如此，协议仍然被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热情地接受了，甚至被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些团体接受了，例如中部地区委员会，可是归根到底，无论是工人对工厂的管理还是集体农庄，都没有获得合法的地位。因此，回想起来，协议似乎只是为共产党人及其盟友的以下目的服务的：加强他们对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优势地位并且确保在即将到来的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摊牌的决定性时刻得到后者的支持。将普列托赶出国防部是西班牙共产党的下一个目标。另外，协议还受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些普通成员的欢迎，他们厌倦了激烈的派系斗争和连续发生的军事失败，但是，他们的热情大部分都被自由主义运动内部表示异议的声音淹没了。“我们知道，”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在为庆祝达成协议而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宣称，“许多[同志]在得知劳动者总工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就双方联合——这是我们为赢得战争胜利并且重建被破坏的经济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的总体方案达成协议的消息后非常生气。但是，我们对这些表示不满的人并不在意。……我与劳动者总工会书记罗德里格斯·维加同志的拥抱成为西班牙工人阶级团结的象征。”

坚决反对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所奉行的无政府主义的奥拉蒂奥·M·普列托——我们应当记得，他是促成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加入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重要因素

——在内战结束以后明显满意地声称，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达成的协议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前所未有的胜利”，因为它代表了作为一种非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无政府主义的“彻底失败”。“联合政府被正式承认，”他补充说，“为了现实牺牲了教条，因为现实不承认微妙的理论。”

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热情地接受了协议，它却加深了自由主义运动内部主张合作者与理想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后者认为接受政府管理是对无政府主义信条的否定，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次胜利。“共产党竭力引诱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著名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成员、内战期间大部分时间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激烈论战的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以便控制并且利用这枚橡皮图章为它的霸权政策服务。全国委员会的同志们对这种引诱越顺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发现自己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分歧就越大。”

不过，这种分歧暂时被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所缓和，因为两个敌对工会之间的斗争终于可以结束了。“在与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在未来繁重而光荣的任务中，”《红色阵线报》评论说，“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达成的协议……是动员人民并且巩固其坚如磐石的团结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明白这一点，[因此]面对团结的敌人在可耻的绝望中可能玩弄的一切花招，他们准备捍卫无产阶级的团结并且加强人民阵线。”

## 第五十四章 将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赶出国防部

由于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全国领导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同时由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在政治上陷入穷途末路，共产党人倍受鼓舞，现在他们感到自己强大得足以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放手一搏。

在他们针对国防部长采取的行动中，军事形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共和派占领了特鲁埃尔，这是他们自内战爆发以来第一次在重大攻势中取得胜利。但是，仅仅两个月之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经过一场在冰天雪地里进行的艰苦战斗，他们被迫撤出这座城市，短暂地弥漫于共和派阵营并且提高了国防部长地位的欢乐气氛突然消失殆尽。接着，三月九日，凭借空军四比一的绝对优势，佛朗哥将军在阿拉贡地区发动了迄今为止内战期间所见过的最强大的攻势。“三月份是灾难性的一个月。”内政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记述说，“我们的防线崩溃了。敌军的摩托化部队毫不费力地向前推进。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我们失去了阵地、制高点和村庄。……东路军政委……发给普列托一份报告，报告认为形势已经没有希望：由于食品和弹药的补给难以为继，由于来自空中的威胁，部队的士气一落千丈。”（第四十四师）第一百四十四混成旅第一政委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三月十八日向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报告说，人们“冷漠”、“麻木”，“大多数职业军官恐惧惊慌”而且“极其缺乏优秀的中层骨干”。在许多部队，他补充说，情况类似于早期那些既没有军官也没有编制的民兵武装。

部分与西班牙部队混编的国际纵队如今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第十五旅的美国政治委员桑多尔·沃罗斯写道：“恐怖行动在国际纵队中继续进行。为了阻击法西斯军队的进攻，我们需要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运输车辆，需要训练有素的军官、军士和士兵。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想的不同；尽管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物资，但是，他们主要依靠恐怖行动。军官和士兵被无情地下令处决了。波兰人、斯拉夫人、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死亡人数特别多，尤其是从莫斯科来到西班牙的那些人。经常草率地枪毙人，大部分情况下由军事调查局秘密执行。”沃罗斯关于大规模逮捕和枪毙国际纵队成员的说法得到了前国际纵队加里波第旅旅长卡洛·彭基耶纳蒂的

证实。彭基耶纳蒂说，当时“‘契卡’一直在满负荷运转”。

这些恐怖行动只是长期以来发生在阿尔瓦塞特的恐怖行动的某种延伸。据曾经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的前德国共产党人古斯塔夫·雷格勒说，国际纵队的组织者、以“阿尔瓦塞特屠夫”著称的安德烈·马蒂在那里设立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的指挥部。“结果，”雷格勒告诉我，“法国旅——它的政委是马蒂教导出来的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共产党人——将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送到基地，他们在那里被监禁，有些人被枪毙了。向我的旅提出的同样暗示[原文如此]遭到断然拒绝，就连共产党人卢卡契·保罗将军都拒绝了——一九三七年这位将军死在我的身边。阿尔瓦塞特的统治是实施恐怖行动的统治；那里甚至出现了一个惩罚团，耶夫·拉斯特[一名荷兰共产党人]短时间在团里干过；我从他那里得知的详细情况证明，阿尔瓦塞特被用来当作一个刑场，到最后，除了共产党人之外，那里的工作人员没有其他党派的人。”

在那些坚定地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社会党左派的部队里，派系斗争和打击革命对它们的士气的影响比其他部队更大，它们缺乏斗志不能只归咎于军事原因。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四月一日的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认为，阿拉贡前线的崩溃同样应当归咎于“暗中激烈进行的党派斗争”。它断言，有些党派团体的唯一目标是“谋求自己的霸权地位”。“在这种环境下，不难理解人民战士为什么实际上丧失了勇气和斗志。……极其可悲的是，我们的战士感到他们被一群叛徒指挥着，被一群人民事业的敌人指挥着，他们不得不带着这种感觉迎战一支最强大的敌军。”

四月十五日，发动攻势不到六个星期，敌军到达地中海海岸，将共和派控制区一分为二。“至今仍然没有人解释，”阿萨尼亚总统在内战结束之后不久写道，“三月

十八日[敌军]占领莱里达后，它为什么不攻占[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以后的政府所在地]巴塞罗那。两个城市之间根本没有军队。”对民族主义者没有利用其军事优势的一种解释我们已经提到过：希特勒决心拖延西班牙内战并且鼓励墨索里尼在西班牙投入大批军事力量以便将意大利与德国更紧密地绑在一起。这将转移墨索里尼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注意力，把这两个国家并入德意志帝国对于实现纳粹德国在东欧的目标至关重要。绝非巧合的是，三月十三日，发动阿拉贡攻势——德国的飞机、坦克和大炮在这场攻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四天后，希特勒在墨索里尼没有提出任何抗议的情况下占领了奥地利，而在一九三四年，墨索里尼曾为保卫奥地利而抵抗德国进攻做好了准备。但是，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签订了墨索里尼支持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要求的慕尼黑协定之后，元首才决定尽快结束西班牙内战，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东欧。

与此同时，在共和派控制区，甚至还在民族主义军队发动进攻的三月九日之前，有人已经决定了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命运。“必须为他挖掘一个深深的墓坑，”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写道，“把他为反对共产党控制军队所玩弄的全部花招埋葬其中。把他赶出国防部后，共产党人不直接掌握的所有军事指挥手段将被集中在内格林博士手里，他是莫斯科信任的人。”

“但是，怎样才能赶走普列托？”第四十四师师长“农夫”在逃出苏联之后所写的一本书中问道。“他的威望很高，尤其是在特鲁埃尔的军事行动成功以后。”这位前共产党人说，“克里姆林宫的代理人”决定，牺牲这座城市以使普列托名誉扫地。他还宣称，当他的师被包围在特鲁埃尔时，作为使普列托名誉扫地的阴谋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军事指挥官恩里克·利斯特和胡安·莫德斯托故意抛弃了他，不过，他与他的大部分士兵一起设法逃了出来。而利斯特则声称，“农夫”是在特鲁埃尔还没有被包围时逃出来的，他“胆怯地”抛弃了自己的部队。因为两人对立的政治立

场，所以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的说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农夫”一九五〇年十月写信告诉普列托，为了罢免国防部长，他被当作替罪羊。收到“农夫”这封信以后，普列托说，当时有一些军队负责人告诉他，共产党人决定放弃特鲁埃尔以除掉他。“但是，”他断言，“尽管许多迹象表明他们的说法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我并不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我不能相信它。不可能！如今，‘农夫’在他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的来信中似乎证实了这种说法。那么多我曾经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结果证明是事实！”

尽管共产党人是否曾以极端的方式下令放弃特鲁埃尔以便除掉普列托仍有争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座城市的失陷使他们开始了驱逐他的行动。正如他们曾经发动的诋毁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运动——在民间暗中散布卡瓦列罗“愚蠢”、“无能”、“虚荣”、“老迈”之类的流言蜚语——那样，他们也是采用他们所能采用的一切手段败坏普列托的名誉。“整个前线 and 后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谣言。”埃尔南德斯说，“‘普列托是个投降派’，‘普列托不想让苏联飞行员参加我们的战斗’，‘普列托说在没有法国援助的情况下继续把仗打下去是愚蠢的’，‘普列托为了逃往英国要求英国政府派一艘驱逐舰’，‘普列托以加强我们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力量为借口，打算把共和派控制的整个中南部地区让给佛朗哥’，等等，等等。”

“我们必须利用特鲁埃尔的失陷除掉普列托，”埃尔南德斯声称，共产国际代表佩德罗在西班牙共产党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说，“刚刚火速去了一趟莫斯科回来的斯特凡诺夫带回了明确的指示并且发表以下讲话支持[佩德罗]：‘“家里”[莫斯科]的同志建议，用新的后备力量补充军队可能延长抵抗的时间。这就能把斗争继续进行下去，以便引发一场可能改变战争全貌的世界性冲突。抵抗！抵抗！抵抗！这是“家里”的指示。……你们认为在普列托掌管国防部的情况下有可能这样做



吗？’ ” 提出这个问题纯粹是为了产生语言效果，因为，正如陶里亚蒂所说，普列托的悲观情绪是全力抵抗政策的主要障碍。他说的当然不错，因为普列托的悲观主义众所周知。空军司令和普列托曾经的好友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在内战结束以后告诉我，他不得不经常警告国防部长，不要当着下属的面发表悲观言论。他说，“普列托认为，一个负责任的悲观主义者比一个不负责任的乐观主义者更有价值。他说话像个悲观主义者，但做事像个乐观主义者。这是他的矛盾性格之一。”

普列托的悲观情绪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一九三七年五月，内格林政府组成几天之后，他拒绝发表广播演说。“向西班牙人民发表演说，”他告诉内阁，“任何人都能比我做得更好，因为，无论我怎样努力试图隐瞒我的想法，对于我的听众来说，它们总是显而易见。”还有一次，他的悲观情绪让他考虑向德国宣战。五月三十一日，为了报复对参与国际巡逻计划的德国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的轰炸，德国海军炮击了共和国的阿尔梅里亚港。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普列托建议对德国舰队实施大规模的空中打击，“即使可能引发一场战争进而点燃一场欧洲战火也在所不惜”。“我的内阁同僚和政府首脑认为我的主意是蛮干，”他证实，“因此拒绝了”这个建议。这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建议，他看不到赢得战争的可能性。”他说，西班牙的半个国家正在与另外半个国家作战，后者不仅得到意大利、德国和葡萄牙的帮助，而且得到其余欧洲国家冷漠态度——如果不是敌视态度的话——的帮助。“通过向德国宣战，”他接着说，“我试图找到一种利用国际冲突的解决办法，因为，面对意大利和德国公然侵占西班牙领土的危险，西方国家有可能决定进行干预。”

人们可能会认为，考虑到克里姆林宫希望英法两国卷入西班牙内战，普列托的建议将会受到莫斯科的欢迎。情况并非如此。据埃尔南德斯说，内阁会议因等待应邀前

来主持后半程会议的阿萨尼亚总统暂时休会，休会期间，共产党的机器“在五分之一分钟之内全部运转起来寻找‘对策’。柯多维拉前往苏联大使馆。陶里亚蒂来到巴伦西亚附近一个名叫埃尔贝达特的小村庄，在那里有一个隐藏在美丽柑橘林中的‘农庄’，苏联代表团设立了一个功率非常强大的电台，它通过这个电台与法国和莫斯科直接联系。……莫斯科的指示明确：‘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阻止普列托向德国挑衅’”。声称自己像普列托一样认为战争是“一场毫无希望的痛苦”的埃尔南德斯说，他“非常失望”，他的良心在服从莫斯科与忠于西班牙的矛盾情感中挣扎，不过，服从莫斯科的意识占了上风。

有必要顺便说一下，对“德意志”号袖珍战列舰实施轰炸的是一名苏联飞行员（Г.К.利文斯基）。这是共和派的苏联空军顾问Г.普罗科菲耶夫少将透露的。“我有机会与他一起飞行过几次。”少将在二十八年之后写道，“[利文斯基]是一名出色的轰炸机驾驶员，没过多久，直接命中德国战列舰‘德意志’号证明了他的技能。”显然，人们不能根据这一陈述毫无疑问地断定利文斯基是奉克里姆林宫的具体命令对当时在伊维萨岛沿海抛锚的“德意志”号进行了轰炸，然而，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问题出现了，有意使英法两国卷入西班牙内战的莫斯科为什么要反对普列托的建议？答案也许是，看到英法两国对德国炮击阿尔梅里亚作出了谨慎和不安的反应，克里姆林宫可能断定，如果采纳普列托的建议，将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肯定将会导致德国对佛朗哥的援助大幅度增加，而英法两国的不干涉政策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同时，这样做还会被指责为蓄意在西欧点燃战火。谈到专门设立的不干涉委员会在德国炮击阿尔梅里亚当天召开的一次会议，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迈斯基写道：“委员会应当提出抗议，……[但是]所谓‘民主’国家的外交官怕得要死，以致整个‘不干涉’闹剧立即像一座纸板搭成的房子一样坍塌了。”实际上，决定英法两国外交官行为的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怀疑。五月三十一日，英国大使要求德

国外交部长“不要帮助赤色分子把西班牙内战扩大成为一场世界战争”；六月三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对美国大使说：“苏联政府似乎想让英国为它火中取栗，于是，一旦德国与英法两国打起来，苏联不会受到怀疑，使它可以比较从容地隔岸观火。”这暴露了英国政府的真实想法。法国政府同样满腹狐疑。据德国驻巴黎大使说，听说社会党政府总理莱昂·布鲁姆告诉苏联代办，“此类事件的重演将会遭到法国政府最严厉的反反对，这将造成一种非常严峻的局面”。

尽管莫斯科反对普列托轰炸德国舰队的建议，它与他的关系并没有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也没有受到他本人公开承认的其悲观情绪的影响，只要他不是那么桀骜不驯，它可以容忍他的悲观。更让人感到极为不安的是他削弱共产党在军队中的优势地位的决心。在认为他的悲观性格“众所周知而且有时接近失败主义”的同时，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也承认，他对国防部的管理“具有毋庸置疑的积极作用”，但是，“使正规军非政治化的倾向构成了他工作中最消极的一个方面”。

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提醒读者回忆埃尔南德斯的以下陈述，这一段陈述有关共产党对担任国防部长之前的普列托的看法，曾经在前面的某一章里引述过：

“当政治局讨论是否同意普列托担任国防部长时，我们考虑了他在国内外温和派政界人士当中的巨大声望。在这方面，普列托对我们具有利用价值。我们也考虑了他性格中消极的一面。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对胜利没有信心。把进行战争所应负的最重要的责任委托给他不合常规。……各位政治局委员对支持他作为国防部长的候选人犹豫不决。陶里亚蒂给了我们以下指点：‘通过支持普列托作为候选人，我们可以把他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只要他不同意为我们效力，我们就应在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利用他那臭名昭著而且自己承认的悲观主义把他除掉。……[我们]可以设法让他陷入声名狼藉的重重迷雾，以使身为著名社会党领导人的他变得毫无用处。于

是，我们的敌人少了一个。’ ”

因此，特鲁埃尔的失陷为向国防部长发动一场全力进攻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像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和右翼社会党人胡利安·贝斯泰罗一样，普列托越来越期待通过调停结束内战。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间曾经多次进行过试探，但是，得到德国和意大利的全面支持因而确信将会获得最后胜利的佛朗哥将军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别的什么都不考虑。

二月二十七日，特鲁埃尔失陷五天后，热情之花首先向普列托开火。欧塞维奥·西莫拉一九三六年在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编辑部里做撰稿人，后来在教育部担任埃尔南德斯的政治秘书，他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对于热情之花——她认为普列托禁止政治委员劝诱人们改变政治信仰的措施是一种针对共产党人的恶毒政策——来说，特鲁埃尔军事行动的失败是一个可以轻松地使国防部长名誉扫地的机会。”没有对普列托指名道姓，也没有提到人们所知赞成调停的其他社会党或共和派人士的名字，热情之花宣称：

散布失败主义言论并且声称我们的军队没有战斗力的都是一些什么人？……他们是无能之辈和胆小鬼，他们为上帝点燃一根蜡烛，接着为魔鬼点燃另一根，他们一只脚站在这里，另一只脚站在叛军那边。……

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我们的战士不是为了保护地主和银行家的特权上前线的；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我们的女人把她们的儿子贡献出来不是为了回到旧的奴隶社会。……那些企图毁掉我们的人民在英勇牺牲的十九个月中所赢得的革命成果的人没有资格谈论民主。……

[当]总政治部实行……将那些因英勇行为受到嘉奖……并且享有士兵信任的政治委员

撤职的政策时，……只是被赢得战争从而打败法西斯的愿望所激励的我们必须说，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政策继续下去。

在随后几天时间里，共产党人对普列托的攻击毫不放松地持续进行，当佛朗哥将军的军队闪电般地向地中海沿岸推进，谁也不知道共和派军队将溃退到哪里为止时，这种攻击加大了力度。

三月十六日，在一种大难临头的气氛中，法国大使埃尔里克·拉博纳拜访了内格林，他告诉后者，他的政府愿意充当西班牙内战的调停人。同一天，大使向巴黎报告说，内格林政府中赞成调停的那些成员主要依据的论点是，意大利和德国的干涉势不可挡，以致外界无论提供什么帮助，共和派也没有获胜的希望。因此，他们认为，最好是在还来得及及时放弃抵抗，“因为，对于捍卫理想甚至生存来说，调停为共和派提供了可能出现的最好机会”。另一方面，拉博纳报告说，内格林总理的答复是，西班牙人民以前表现出来的顽强抵抗精神将为国际形势朝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争取时间。内格林说，调停注定要失败，因为，即使佛朗哥同意，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会强行否决，所以，唯一的结果只能是动摇军队的信心，削弱后方的士气。“这时，”拉博纳叙述道，“总理情绪激昂、目光炯炯地大声说：‘抵抗没有犹豫的余地！我可以控制局面。无论反对抵抗的人可能担任多高的职务，他们都将受到镇压。’”

内格林召集了一次内阁会议，“有传言，”前巴塞罗那市市长、现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文化专员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卡洛斯·皮·苏涅尔回忆说，“和平问题将被提出，一些部长将要求，应当开始进行谈判，尤其是普列托。由于这些传言，而且仿佛执行一道口令似的，军队的电报纷纷发到总理办公室，要求发生动摇的部长辞职。”

据内政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说，内格林把拉博纳的建议和他要继续战斗到底的决定告诉了内阁。没有人提议为和平进行谈判，内格林的意见占了上风。“只有伊鲁霍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巴斯克民族独立党人部长]……提出，应当研究军事形势，以便在确信失败不可避免时，我们可以减少因延长一场无望的战争而造成的痛苦。至于 [外交部长和阿萨尼亚总统在内阁的代言人] 希拉尔，……他提出，不应彻底拒绝法国的建议，因为一旦出现了这种需要，它可能会受到欢迎。”普列托会后告诉苏加萨戈伊蒂亚，希拉尔的忠告缘于法国大使对他进行的一次拜访，大使“表示愿意为共和国总统及内阁的撤离向他提供一艘军舰，作为回报，建议我们让我们的飞机飞往法国的机场，让我们的舰队驶往 [突尼斯的] 比塞大港”。

“为什么对内格林所暗示的我们可以等待法国战争物资的到来抱有幻想？”普列托严厉地评论说，“从法国大使的建议可以明显看出，他的政府认为我们死路一条。”

短暂休会之后，下午六点，内阁由阿萨尼亚主持在佩德拉尔维斯宫重新开会。不出所料，总统提出了和平谈判的问题。他指责政府拒绝了法国的建议，然后问这些政府部长，他们是否考虑过，“不把通往谈判的大门关上更加慎重，因为，一旦政府首脑的乐观判断不能实现，我们将会需要它”。阿萨尼亚知道普列托像自己一样悲观，因此要求他报告军事形势。国防部长回答说，军队“士气低落”并且“开始丢掉武器弹药全线溃退”。他的话只是充实了阿萨尼亚的论点：战争已经失败了。

与此同时，随着投降的谣言开始流传，共产党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的支持下组织了一场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以突击卫队为先导，经过巴塞罗那的主要街道向佩德拉尔维斯宫前进。热情之花回忆说：“共产党把巴塞罗那的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要求政府继续抵抗。”苏加萨戈伊蒂亚注意到，示威

的“施压目的”显而易见。第二天，《红色阵线报》宣称，“代表我国全体工人和成千上万英勇战士”的巴塞罗那工人阶级“……群情激昂地表明了他们的意愿：进行斗争直到最后胜利，把胆小鬼、动摇分子和叛徒从我们当中驱逐出去”。这份报纸报道说，餐饮业工人联合会成员关闭了所有酒吧、咖啡馆和餐厅。“其他团体的同志们走进影院和剧院，劝说里面的观众出去参加示威游行。”正如普列托后来所说，这次“示威是通过清空剧院和电影院组织起来的，因此，无论观众愿意与否，他们都要参加游行，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上的乘客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

当示威者在一片混乱中冲进佩德拉尔维斯宫的花园时，开会的部长们听到了“打倒叛变的部长！”“打倒国防部长！”的叫喊声。苏加萨戈伊蒂亚证实，普列托对他说，他确信，“为了向共和国总统施加压力”并“将其意志强加于人以防阿萨尼亚表现软弱”，内格林建议共产党人举行了这次示威游行。

陶里亚蒂告诉莫斯科，共和派的各个政党不满地说，这场示威是背着它们组织的，而且事实上是直接针对它们的。“邀请共和派各政党参加示威实际上将意味着毁掉一切。”他补充说，几天前，共和派的各个政党为成立它们自己的协调委员会召开会议，“从而首先在人民阵线之外采取了行动”，这提出了政治格局发生变化这一问题。“所有这一切肯定得到了共和国总统的授意，是为发表反对内格林、支持投降的宣言作准备。三月十六日的示威游行把共和派带回了现实，使这些人认识到，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投降，离开他们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实际上，自从三月十六日以来，人民阵线重新开始运转，几乎完全恢复正常，共和派的官方立场已经改善。”

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陶里亚蒂不满地告诉莫斯科，它对示威的支持转瞬即逝。他报告说，它派代表参加了向内格林提出示威者的要求的委员会，但是，第二天的

《工人团结报》对示威活动只字不提。“这部分可以用通讯不畅来解释（与党联系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几乎整夜都在党的总部躲避轰炸，因此无法向报纸的编辑传递消息），部分可以用无政府主义者常见的口是心非及其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来解释。”

内政部副部长、总理的支持者胡安—西梅翁·比达特证实，内格林事先知道示威活动。比达特说，社会党执委会接到内格林打来的一个电话，电话告知，一场支持政府的示威活动正在组织，他已经亲自予以批准。“没过多久，来了一个共产党的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比总理更加直言不讳：‘有一个涉及范围很广的推翻内格林的阴谋，它将安排一个同意无条件投降的和事佬担任政府首脑。……他们不能允许内格林被暗箭所伤，因此，由于他们相信人民是站在政府一边的，他们决定采取主动组织示威活动支持他。……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示威应当与内阁会议同时进行。’”社会党资深人士、普列托的支持者曼努埃尔·科尔德罗对此反驳道：“让我们把事情说清楚。实际上，示威的目的是向共和国总统施加压力。”“不是！”共产党人回答说，“示威的目的是要防止五十万共和派爱国者被割断喉咙。”他们的论点不可抗拒。社会党执委会指派比达特代表社会党参加示威活动。“我们一直对共产党人不满，”科尔德罗满腹牢骚，“但是，我们只能跟着琴师的曲调跳舞。”

在佩德拉尔维斯宫，比达特与内格林进行了下面这番交谈：“你看到一场组织得这么好的‘自发性’示威活动高兴吗？”比达特开玩笑地问道。“请相信我，”内格林答道，“为了避免出现无条件投降的危险，我们必须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高兴我来了。”比达特回答说；接着他问：“你认为阿萨尼亚可能[投降]吗？”内格林回答道：“与他在七月十八日时一样。”

像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一样，阿萨尼亚对通过妥协解决问题抱有的希望被一场群



众示威粉碎了。尽管如此，当全面胜利看起来就在眼前时，佛朗哥将军不会考虑和平谈判的可能性。此外，据比达特说，社会党执委会与内格林完全保持一致，所以“不可能实现体面结束内战的和解，原因很简单，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佛朗哥不接受其他结果，也就是说，他要消灭共和派军队”。

内战结束之后不久，阿萨尼亚在一封信中写道，从一九三六年九月开始，他一直竭尽全力争取达成某种和解，因为，打败敌人的想法是一种“天方夜谭”。他肯定地说，没有哪位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重要的大使不知道他的立场。“当极端分子在佩德拉尔维斯宫外边举行反对共和国叛徒的示威时，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那是把总统斥为失败主义者的日子，那是指责总统打算策划一场秘密交易（un pastel）的日子。今天，他们当中没有人在意，如果交易成功了会怎么样。”

尽管巴塞罗那工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号召下参加了这次示威活动，但是，在当地的自由主义运动中，人们对血战到底是否明智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亲眼见证了这种令人痛苦的两难困境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写道，面对特鲁埃尔的得而复失以及叛军随后对阿拉贡、莱万特以及加泰罗尼亚等地区的侵犯，“一些民兵开始自问，牺牲是否换来了什么，牺牲究竟为了什么”。他说，两种倾向引人注目：“[以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为首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倾向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的倾向，……为了逃避怀疑的折磨，前者在内格林全力抵抗的麻醉剂中寻找需要的乐观因素，后者则试图通过有计划地不断抵制反革命诱惑挽救自己的名誉，甚至……认为一九三八年年中将实现停战。”

从全国劳工联合会前任书记奥拉蒂奥·M·普列托的一次演说可以明显看出，在代表半数工人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中开始蔓延的幻灭感和困惑感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他在

该组织三月召开的一次全国会议上宣称，战争已经失败了，因此，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利用其影响力从社会党人和共和派的失败主义论调中得到好处，“不再有意无意地按照苏联人——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进行一场毁灭西班牙的战争，让自由主义运动为一项貌似我们自己的事业而流血——的规则行事”，争取实现体面的和平，“这样的话，我们将拯救大量生命，使我们的人免遭深重的苦难，进而可以在比我们继续进行虚张声势的抵抗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重建我们的运动”。最后，与会代表决定，“全力支持国防部长，通过对军事力量来一次整顿，终结共产党人的支配地位”。这个决定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虽然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承认自己得到了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支持，但他没有提到“整顿军事力量”。的确，几乎难以想象普列托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结成同盟反对共产党，即使是在陷入绝境的最后关头。

与此同时，不久前与共产党控制的新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签订了联合协议并与共产党人一起举行反普列托示威游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让西班牙共产党感到不安。“巴斯克斯采取了一种暧昧的立场。”陶里亚蒂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他要求内阁组成保持不变，除非把工会代表扩充进去。也就是说，他维护普列托，反对内格林和共产党人。”这种意外的转变让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某些领导人大吃一惊，其中包括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负责人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这位出席了在巴塞罗那召开的那次全国会议的代表记述说，示威游行之后不久，巴斯克斯转变了立场，他提出，全国委员会应当告诉普列托，“我们将乐意看到他继续留在国防部”。这种摇摆不定和前后不一是巴斯克斯在整个内战期间的行为特征，与西班牙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方针形成对比，后者确切地知道它想达到什么目的。

尽管巴斯克斯给予国防部长以短暂的支持，普列托的政治生涯此时已经日薄西山。

在同时发表于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和胡安·内格林的喉舌《先驱报》的一篇文章里，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对国防部长进行了猛烈攻击。虽然他使用了“胡安·本图拉”的笔名，作者的真实身份显而易见。在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普列托表示：“如果这是正常时期，……我会立即提出辞职，因为，按照我的内阁团结的概念，……我认为教育部长对我的攻击不能接受。但是，当前的形势不允许我辞职。责任把我与我的职务捆绑在一起。出于自愿放弃责任，即使理由非常充分，那也相当于临阵逃脱，而我不会临阵逃脱。因此，我将继续担任国防部长，但我知道，从现在起，我是在没有权力、不受尊重的情况下担任这一职务的。”

然而，普列托无须作为国防部长继续忍受各种羞辱，因为，据陶里亚蒂说，内格林此时已经得出了与西班牙共产党同样的结论：“为了避免一场惨败，必须解除普列托的军事领导职务。”尽管总理承认是他自己作出的决定，普列托则坚持认为，他被迫屈从于共产党的要求。“撤换你担任的国防部长的决定完全是我个人独自作出的。”内格林在写给普列托这位以前的良师益友的一封信中说，“三月二十九至三十日夜间，经过艰难痛苦的内心斗争，我作出了这个决定。这是因为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内阁会议，……当时，由于你杰出的辩才、你的人格、你习惯性的戏剧化表现，而且由于你的职务所具有的权威，你以最灰暗的绝望语气对事态发展所作的描述使我们的内阁同僚彻底灰心丧气了。”显然，内阁中不再有普列托的位置，因为，像共产党人一样对这场内战最终将会融入一场欧洲战火抱有希望的内格林再也不能容忍一个认为战争已经失败的人担任他的国防部长。在几年后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内格林声称：“已经有人不断提到，我将普列托[撤职]的决定是外界施加压力的结果，具体地说，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这不是事实，绝对不是事实。说这些话的人并不了解我。我以我国战争死难者的名义向你们发誓，这些话

没有一句是真的。”

在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陶里亚蒂说，内格林召开了一次社会党领导人会议并在会议上宣布，他不能再让普列托继续留在国防部了，因为后者是“一个应当被枪毙的失败主义者”。他还说，他希望[阿萨尼亚的心腹好友]希拉尔主动辞职，像普列托一样，希拉尔正在告诉所有人，战争已经失败了，“因而不可能得到来自国外的任何援助”。陶里亚蒂补充说，社会党领导人“授予内格林重新组阁的自主权”。这时，普列托对社会党执委会的影响力下降到了谷底。从这时起，许多众所周知的“普列托派”社会党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内格林派”，尽管有时他们的忠心值得怀疑。在告诉普列托它决定支持内格林时，社会党执委会表达了适当的歉意。“实际上，”社会党主席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说，“你继续留在国防部几乎是一种羞辱，但是，鉴于目前的政治形势，除了接受这种牺牲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当新政府的组成仍在进行讨论的时候，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也在讨论共产国际的一个建议：共产党应当撤出它在政府中的两名部长。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证实，共产国际认为，这样一来，“由于击破了西班牙国内外反动势力在诽谤人民阵线政府的宣传运动中所使用的给其贴上共产党标签的论点，共和国的地位将得到加强”。另一方面，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坚持认为，“从政府中撤出它的部长将不被人民所理解，也不会加强共和国的地位，尤其是在特鲁埃尔失陷之后投降主义论调甚嚣尘上之际”。它断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共产党人部长的存在更有必要。据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何塞·杜克说，政治局的主要异议之一是，离开共产党的支持，内格林和德尔巴约（他将重新担任外交部长）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内阁。

陶里亚蒂告诉政治局，共产党退出政府的策略目的在于“使英法两国的公众舆论相信，共产党对夺取政权不感兴趣，即使在夺取政权相对容易的西班牙，我们对此也

不感兴趣。……这样一来，我们将使英法两国与苏联的关系得到加强。如果希特勒决定发动战争，他将不得不与苏联和民主国家同时作战。” 埃尔南德斯说，他反对这种策略。“人民阵线的所有党派都对我党和内格林怀有仇恨和敌意。” 他在脱离共产党之后写道，“内格林只有完全依靠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才能控制政府。从政府撤出我们的部长将意味着抵抗政策的消亡。” 埃尔南德斯的反对得到了陶里亚蒂的证实：“埃尔南德斯以一种绝望的腔调反对说：‘这将意味着失去一切。’” 尽管如此，仍然达成了某种妥协：埃尔南德斯一个人退出，留下比森特·乌里韦作为代表西班牙共产党的唯一一名政府部长。埃尔南德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时他仍是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说，共产党代表人数的减少再次证明了“国内外某些人的奸诈，他们利用目前存在的对可怕的共产主义威胁的恐惧，企图在西班牙的反法西斯力量当中引起猜疑、制造分裂，从而使世界舆论产生共产党在国家机器中来势汹汹的印象。我退出政府显然证明事实正好相反”。

## 第八部分 共产党的影响达到巅峰

### 第五十五章 第二届内格林政府，共产党在军队中占据支配地位

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组成的第二届内格林政府成员如下：

胡安·内格林	社会党	总理兼国防部长
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社会党	外交部长
保利诺·戈麦斯	社会党	内政部长
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	劳动者总工会	司法部长
比森特·乌里韦	共产党	农业部长
塞贡多·布兰科	全国劳工联合会	教育和卫生部长
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	左翼共和派	财政和经济部长
安东尼奥·贝劳	左翼共和派	公共工程部长
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	共和联盟	通讯和交通部长
海梅·艾瓜德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劳工部长
何塞·希拉尔	左翼共和派	不管部长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	巴斯克民族独立党	不管部长 <sup>1</sup>

## 图注：

1. 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共和国官方公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后，伊鲁霍作为不管部长重新加入政府。

通过任命唯一一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塞贡多·布兰科接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的教育部长职务，全国劳工联合会派代表加入内阁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社会熔炉报》称布兰科是一位“忠诚的革命者”，但是，自由主义运动中反对他的人后来说他恰恰是“另一个内格林式的人物”。劳动者总工会也加入了政府，由亲共产党的社会党执委会主席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代表。

陶里亚蒂欢迎全国劳工联合会重返政府。他向莫斯科报告说，这创造了“与无政府

主义者的一种新型关系”，从而减小了“发生无政府主义暴动的危险”。曾为革命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大声疾呼的《工人团结报》如今已经成为以马利亚诺·巴斯克斯为首的那些更政客化、更世故的成员的喉舌，它断言，扩大了代表范围的新政府将“有助于提高我们部队的士气”，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加入“开辟了新的行动方向，这将唤起每个人的信心、促使大家保持镇定并激发某种牺牲精神”。

为了装饰门面，当局极力劝说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继续留在内阁里，因为他的存在将使国内外舆论打消疑虑。热情之花在内战结束之后说，共产党想方设法让普列托留在政府中，但他拒绝了所有建议。内格林同样试图让普列托继续留在内阁里，但是，正如他对他的社会党同志比达特所说，普列托愿意接受的唯一职务是财政部长，这样他就能为移居国外调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金和财力。“我不可能同意这个要求。”内格林说，“只要战争继续进行，财政部.....就不能独立于总理自行其是。.....我知道普列托对于[社会]党有多么重要，因此，我竭尽全力让他留在我身边。”

至于为了使英法两国舆论相信共产党人对夺取政权不感兴趣而离开内阁的埃尔南德斯，他被任命为掌握着百分之八十地面部队的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第一政委。“为了促使重新组成一个全国团结政府，我党作出了一切牺牲。”热情之花几周之后宣称，“.....这驳斥了某些人到处散布的我国将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愚蠢谎言，他们把共产党人描绘成政府和国家的主宰者，以此播下猜疑与不和的种子。我们加入政府完全是由形势造成的，这表示了我们对于民主共和国的支持。.....共产党决不去争夺政府职位，也不认为那些职位非常重要；它永远不会那样做。”

尽管西班牙共产党只有一个政府部长的职位，但它现在所掌握的控制手段比以往都多。不仅共产党最出色的地下党员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重返外交部——他还

保证共产党人继续控制对外宣传和对外新闻司，把主管宣传的副部长这个关键职务给了共产党员曼努埃尔·桑切斯·阿尔卡斯——明显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最重要的是，胡安·内格林总理夺取了国防部。内战结束以后，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厌恶地说内格林是“莫斯科信任的人”，而“农夫”则将其斥为“共产党人野心勃勃与唯命是从的工具”。这些说法受到西班牙国内外赞赏内格林的那些人的强烈质疑，他们对内格林的大肆赞美与社会党内的一些内格林批评者的严厉谴责形成鲜明的对比。拉尔戈·卡瓦列罗断言，内格林已经将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出卖给了共产党，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则给内格林政府贴上了“西班牙甚至在奥地利家族和波旁王朝的黑暗统治时期都不曾经历过的最专制暴虐、最不讲道德的政府”的标签；而哈佛大学的胡安·马里查尔教授后来声称：“在最近一百五十年的欧洲历史上，几乎没有人显示出这种才华与性格、完美道德与高度智力的结合。”西班牙历史学家安赫尔·比尼亚斯则认为，内格林是“整个共和国时期目光最敏锐、气质最非凡的政治家”，是“共和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这些赞颂后来被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马莱法基斯所超越，他断言，“自从十七世纪的奥利瓦雷斯 以来”，内格林“在西班牙无人能比”，与温斯顿·丘吉尔那样的战时领导人能力相当。

在内格林的外国赞赏者中，最为著名的是赫伯特·马修斯，三十多年来，他是《纽约时报》关于西班牙问题的权威，他撰写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深深地影响了公众舆论。他在一九五七年宣称，内格林已经“对西班牙的历史产生了影响，它的后代有理由为之感到骄傲”；他还在一九七三年写道：“出于与‘左派’或者任何意识形态完全无关的政治原因，内格林博士利用共产党人并与他们进行合作。他没有什么政治色彩，对任何党派本身也没有偏爱。”由于共和派政治史已经因内格林的信徒试图将其抬高到民族英雄和调解者的地位而被严重歪曲，所以，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马修斯对这位总理的描绘可以与他一九六四年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描绘相



媲美：“华盛顿和古巴流亡者极力使人们相信这样的鬼话：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古巴共产党的囚徒或莫斯科的傀儡。从性格上看，他不可能接受命令甚至建议。……现在，五年已经过去了，对于美国官员和美国公众来说，确实应当认识到……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非凡的人物之一。”

根据五十多年来收集整理的口头与书面证据，我对内格林的评价是，在内战的最后一年，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对于扩大并且巩固共产党在至关重要的权力中心——军队和安全部门——的影响力，他比其他政治家起了更大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所有问题上对共产党都百依百顺，但是，在决定西班牙未来政治格局的武装力量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任凭自己被共产党牵着鼻子走——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实际上，共产党对内格林的控制并没有扩展到所有领域，因为，西班牙共产党看重的是他作为一名温和派人士掩盖其霸权目的的特殊价值，它承受不了因强行落实所有计划与他关系破裂而产生的后果。

关于西班牙共产党对内格林的控制，一九三八年在总政治部担任分支部门负责人恩里克·卡斯特罗是一位重要的见证人。他那部资料丰富、反省深刻的回忆录《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因其对一些没有党派倾向的人士——在他们天真、无知、默许或者纯粹善意的基础上，共产党得以建立起自己的强大力量——的论述而成为关于内战的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我先前已经有所引述。因此，他对这位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记述值得回忆。尽管承认内格林在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初期“似乎对体现旧思路的[社会党与共和派]前辈过于关照”，卡斯特罗仍然断言，总理受到共产党的控制，“直接被党和他的两位最亲密的合作者所控制：一位是第五团的喉舌《人民战士报》负责人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另一位是[曼努埃尔·]桑切斯·阿尔卡斯，后者是一名出色的建筑师，经历不凡，对党盲目服从，担任外交部主管宣传的副部长”。据不久之后将被内格林提拔成为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并且直到一九

六九年去世都是一名忠实共产党员的安东尼奥·科登说，桑切斯·阿尔卡斯“在工作上得到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的热情支持，后者负责政工部门与总理办公室的联系”。此外，正如前面某一章所提到的那样，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根据党的指示”成为内格林的政治秘书，用科登的话说，总理“欣赏贝尼尼奥过人的长处，欣赏他的才干及其突出的工作能力和坚持不懈的热情，欣赏他始终表现出来的对自己的热爱和尊重，即使是在内战结束后”。

正是由于总理受到身边的共产党人亲信如此周密的引领，以致曾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写给莫斯科的一份备忘录中对内格林的可靠性表示怀疑——称其是一个“无所顾忌的人”——的共产国际代表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的一份报告中明确确认，第二届内格林政府“无疑是与共产党领导人合作最为密切的一届政府，对于共产党的建议，它比其他任何一届政府接受并且执行得更加充分与迅速”。

尽管这样表扬了内格林政府，陶里亚蒂对于总理的工作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在同一份报告中，陶里亚蒂批评了内格林的“杂乱无章”，甚至批评了他的道德行为——“一个并非没有腐化（女人）迹象的波西米亚人”，而且还把他的工作方式比作“一个散漫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式。共产国际驻西班牙首席代表对内格林的这种描述与那些非常了解他的非共产党人士在谈论他的饮食和工作习惯时所做的描述相吻合。关于内格林的工作习惯，在他手下担任国防部秘书长的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说，官方文件总是在没有批阅的情况下积压起来，总理外出期间，随行的私人秘书都会带着“七个装满文件的手提箱。……他们来来去去，上楼下楼，他抽不出时间也不会想到打开这些箱子。他毫无规律的时间观念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至于普列托与另一些人曾经有声有色地描述过的内格林那卡冈都亚式的饮食习惯，社会党左派领导人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苏联特工早在内战初期就知道内格林喜

欢“举办宴会”——经常变成“疯狂的派对”。“他们对他进行了评估，”据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然后开始在他身上‘下功夫’，以便利用他达到他们的目的。”无论如何，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在个人纵情享受中挥霍了精力，从而逐渐削弱了他的工作能力。

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的报告中，陶里亚蒂批评内格林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容忍“一系列盗窃者、投机者和破坏者存在”，尤其是在外贸领域，并且批评他否认共产党人在经济领域具有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地位。可以相信，这种否认或许得到了斯大林的直接支持，斯大林可能更愿意通过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之类商务代表与内格林打交道，而不愿让他的秘密交易受到西班牙共产党的审查。陶里亚蒂还批评内格林在对待社会党领导人——他说这些人“被不断增长的对共产党的敌意”所驱使——的问题上软弱无力。他指出，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一直努力劝告内格林把社会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克服困难，同时劝他与劳动者总工会更加紧密地合作，……但是，内格林是个天生的知识分子，对于参加党的生活并不积极，他坚决不同意这样做。”结果，他以“不断向那些人……作出让步”的方式解决问题，尽管“他知道，他们是他的敌人，他们为错误的政策辩护”。

这些不满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或准确性？很难有把握地说清楚，因为，从陶里亚蒂写给莫斯科的那些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从来不让自己出现在最有可能暴露自己的明处，甚至不惜牺牲另外两名共产国际代表柯多维拉和鲍里斯·斯特凡诺夫以及西班牙共产党本身。无论如何，陶里亚蒂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所写的这份长篇报告呈现出一幅内格林的画像，它揭示了一个被矛盾的情感、被与共产党——“唯一一个真心实意支持[他]的政党”，而且他也承认，“他欠共产党的人情”——和平共处的愿望、被害怕完全疏远了社会党执委会的担忧所左右的人。

像半个世纪以来大多数共产党的忠实党员和同情者一样，安东尼奥·科登否认共产党以任何方式控制了内格林，他强调说，总理实际上生怕被人称为“亲共分子”，于是，这种担忧“约束了他的行为”。这肯定是事实。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写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陶里亚蒂提到有人攻击内格林是共产党的代理人。“社会党、共和派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给内格林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他写道，“它们指责他是共产党的代理人，所有任命能干的人担任负有重大责任的职务的提议都遭到反对。所有渴望为赢得战争而工作的能干的人都被称为共产党。……结果：许多基本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二十四小时可以办妥的事情要用一个星期来完成。党强调要有更快的速度，但是，必须考虑这种情况，不能强行解决问题。”毫无疑问，内格林害怕被人贴上亲共分子的标签从而与社会党领导人关系破裂，这种担忧解释了为什么在科登和另外一些“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的人看来，内格林“在构思并且阐述正确的口号时往往显得坚定有力，而在落实这些口号时，经常显得软弱动摇”。

当然，共产党人可能更喜欢一个合乎他们心意的人，一个把生命和灵魂交给党的人，但是，他们的政策需要一个温和派社会党人——至少是在名义上。他们已经把内格林从一个相对来说的无名之辈抬举成一个国内国际的知名人士，而且不顾他的种种“弱点”，毫不犹豫地支持并且吹捧他，只要他对实现他们控制军队和安全部门的主要目标有促进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没有哪个社会党著名人士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并且足以取代他。正如第六军的共产党人指挥官伊格纳西奥·加列戈所说：“社会党内没有其他能够领导政府的人选——而这个人必须来自社会党。内格林作为一种选择，我们决不拒绝任何别的候选人，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们决不拒绝条件更好的候选人。我不想提供姓名，但是，有谁呢？长期以来，相信胜利并为取得胜利而战的人只有一个内格林。这就是我们支持他的原因。

此外，他忠心耿耿，行为磊落。”

直到一九四五年，内战结束六年后，据坚定不移地支持内格林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说，苏联人“仍然非常尊重他”。“几个月前，”他补充说，“我与聪明机智而且和蔼可亲的苏联驻墨西哥大使奥曼斯基交谈。……他明确表示，在墨西哥，没有人认为谁可以代替内格林[成为取代佛朗哥将军的政府首脑]。在旧金山与[前共产国际领导人]马努伊尔斯基共进晚餐时，我得到了同样的印象。……莫斯科十分注意倾听他对西班牙事务的意见。马努伊尔斯基用非常赞赏的言辞表达了对内格林的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驻伦敦大使伊万·迈斯基与当时移居英国的内格林关系密切。“他在英国愉快地生活，住在离伦敦不远的博文顿的乡间住宅里，有自己的花园、菜地和附属设施，”苏联大使回忆说，“甚至还有一名英国男仆，那是住宅的主人留下的。”内格林建议大使和夫人周末去他那里做客。“事实上，我们的确在下一个周末试着去了，在那里过得非常惬意。此后，博文顿成了我们周末固定的休憩地。”内格林于德军入侵法国期间的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从法国来到英国，与他同行的西班牙人中包括他的前财政部长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和他的共产党人政治秘书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他被允许“停留不超过三周并且受到下述附加条件的限制：在此期间不得从事政治活动”。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塞缪尔·霍尔爵士和外交部严重关切与佛朗哥将军的关系，他们担心内格林可能留在英国不走并且从事敌视西班牙民族主义政权的政治活动。迈斯基竭尽全力延长内格林的逗留期。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五日，迈斯基在英国外交部与副国务大臣R.A.巴特勒会谈时说：“我相信，内格林博士不是非去美洲不可——他认为这将是可悲的。”在记录这次会谈的备忘录中，有一条手写的附注，签名是“B”，大概是巴特勒所写的。注释写道，由于苏联政府没有提供任何帮助，“迈斯基先生的干预相当无礼”。另一条由外交

部常务副大臣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的私人秘书S.威廉斯手写的附注则说：“遗憾的是，无法说服内格林先生去苏联，他应当在那里受欢迎。”尽管如此，迈斯基的干预肯定产生了很大作用，因为，由于某些得到苏联大使通知的左派领导人的抗议，在七月二十日富兰克林·D.罗斯福——他肯定担心在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中疏远保守的天主教徒选民——拒绝了内格林的美国签证申请之后，他被允许留在英国。

尽管内格林在内战期间对莫斯科和西班牙共产党具有利用价值并与苏联大使关系友好，但是，认为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莫斯科效力毫无顾虑而且没有采取措施保持某种程度的政治独立是错误的。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认为，没有苏联的武器援助将输掉战争，他还相信，巴黎和伦敦最终将为保护它们自己的利益被迫进行干涉。然而，必须提出的问题是，为了得到苏联的援助，他愿意屈从于共产党的压力到什么程度？认为他对他所扮演的角色没有良心上的顾虑或不安也是错误的，因为他曾经故意造成两个最重要的西班牙社会党人的毁灭并使自己的政党实际上变得虚弱不堪，他还顽固地致力于全面破坏各种形式的民主制度所依赖的那些东西。只要多少知道一点众多曾经为克里姆林宫效劳者的命运，他就不得不考虑他的朋友比达特向他指出的那种可能性：某一天，他或许也将成为“献给斯大林这个摩洛哥神的祭品”。“你以为在这种可怕的束缚下我不像别人那样心情沉重？”内格林回答说，“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当我向我们的法国朋友求助时，我听到的只是空口承诺和漂亮话。……无论可能多么痛苦，

我们唯一的办法是接受苏联的援助，要不然就得无条件投降。[社会]党不能指望我无条件投降。……我不会为了使佛朗哥可以享受枪毙他们的乐趣而抛弃数十万正在为共和国英勇作战的孤立无援的西班牙人。”

加泰罗尼亚小城格拉诺列尔斯遭到轰炸后内格林的感情爆发让人觉得他可能真的以

为历史选择他来扮演“西班牙的救世主”这个英雄角色。“整个城市鲜血四溅，尸骸遍地。”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目睹这一景象的总理没有向我掩饰他的情绪。他谈到那些流落街头为了生存而偷窃的孤儿。他望着院子，陷入沉默。他的两眼湿润，泪光闪闪。”接着，据苏加萨戈伊蒂亚说，内格林自言自语道：

可怕，太可怕了！

这样履行职责给我带来莫大的痛苦。我不得不向别人掩饰这种痛苦，因为，我必须成为他们的推动力，他们的鼓动者和鞭策者。可是，我能依靠什么人？我只能让你看到我的脆弱。这一切多么可怕呀，尤其是当我确信每一个人都很卑鄙时，绝对是每一个人，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共和派人士、长枪党人、佛朗哥分子，他们都是一样的。如果这只是一个与他们自己的争斗有关的问题，我会自动回避闪开，因为不值得为他们的争斗牺牲哪怕一条生命。然而，这是关系到西班牙的一个问题！关系到西班牙！我非常担心，由于我们的愚蠢，它最终将在一次决定性的国际交易中被欧洲列强所瓜分，因为就连我们都把自己当成巴斯克人、加泰罗尼亚人、加利西亚人、巴伦西亚人。这种担心给了我力量。如果我不认为我必须反抗灭绝西班牙的企图的话，我早就不再要求人们作出牺牲，还会非常愉快地提出辞职。这些天来随处可见的格拉诺列尔斯那些孩子的景象从精神上打垮了我。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继续战斗！

内格林可能确实认为，在忍受“可怕的束缚”的过程中，他寻求的是让他通行的唯一一条光荣之路，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和普列托也接受过苏联的援助并作出了让步。与其前辈不同的是，为了获得这种援助，他为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壮大竭尽全力，以致其最终加冕登基。难道是内格林过于天真，以致没有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当拉尔戈·卡瓦列罗和普列托为使军队非政治化而斗争时，他们肯定意识到了。

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陶里亚蒂称赞内格林“按照党的要求”改变了普列托的军事政策。陶里亚蒂所提到的重要变化包括“最大限度地加强了”党在军队中的地位，并且“重新评价了”政治部的作用。内战结束后不久，普列托直截了当地指责内格林奉行的是一种“确保一党军事优势的愚蠢政策”。不只是陶里亚蒂对内格林在改变普列托的政策方面所起作用的赞赏支持了这一指责，内格林掌管国防部后立即作出的一些具有明显政治性质的任命也支持了普列托的指责，这些任命完全不考虑监督“他对军队和政府各部作出的所有任命”的社会党领导人的要求。例如，他提拔因从事政治活动被普列托调任东路军参谋长的安东尼奥·科登担任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这是他手下的国防部里最重要的职位；他提升空军参谋长卡洛斯·努涅斯·马萨担任负责空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并且任命佩德罗·普拉多斯为海军参谋长——这三个人都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的确，为了安抚社会党，他提拔阿方索·哈蒂瓦担任负责海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同时保留了布鲁诺·阿隆索的海军第一政委职务——这两个人肯定是社会党人。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尽管党向内格林提出了[关于海军的]建议并且得到他的同意……但是，直到[一九三九年]一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此，[即使到了那时候]海军司令部的改组也不彻底。海军政治部仍然在一个社会党人（布鲁诺·阿隆索）的控制下，他是抵抗政策的死敌，是应当对内战期间海军的消极负主要责任的人之一。”当陶里亚蒂告诉莫斯科内格林的让步使其“作出许多错误的决定并且在共产党人明智的建议与我们对手的要求之间和稀泥”时，内格林容忍社会党人占据海军的关键职位是他耿耿于怀的主要例证。

不过，除了海军之外，国防部的局面尽在西班牙共产党的掌握中。负责空军事务的副部长卡洛斯·努涅斯·马萨和负责陆军事务的副部长安东尼奥·科登是两个最可信赖的共产党员。谈到科登时，作为对社会党领导人的安抚而被指派担任纯属装饰门面的



国防部秘书长一职的苏加萨戈伊蒂亚说：“他在其同伙的圈子以外极其不受人们欢迎。对于这位副部长，来看我的军官中很少有人不表现出彻底的失望，人们指责他不厌其烦地坚持劝人改变政治信仰。……不满其共产主义狂热的看法没有对内格林产生影响，他认为共产党人是他最好的盟友。在衡量与他们结盟的利弊时，他发现利大于弊。”内格林对科登非常信任，以致这位国防部副部长自己证实，“除了需要部长签发的行政命令或是那些我认为应当征询他的意见的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问题之外”，内格林把“与军队有关的问题尽可能”交给他做决定。

此外，被普列托调离重要的情报监控部门的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重新被任命为国防部人事部门的负责人，而情报监控部门隶属于这个部门。担任情报监控部门负责人的是共产党员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他曾在一九三七年春天被拉尔戈·卡瓦列罗解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我们应当记得，迪亚斯·滕德罗曾经是指挥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向国防部长推荐晋升和任命的军官，委员会中权力最大的是亲共产党的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作为人事部门负责人，利用手头所掌握的与军队里每个军官的政治背景及现时政治信仰有关的情报，迪亚斯·滕德罗重新开始指挥委员会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如今，在内格林同意的情况下，罗霍、科登、埃斯特拉达和迪亚斯·滕德罗可以安排任何有利于共产党的任命和晋升。科登的国防部副部长和指挥委员会前任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在他那部被许多人忽视的回忆录中证实，“整顿军队所必需的全部职位都被共产党人占据了”。

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国防部副部长的巨大权力，共产党人很快就重新得到他们在普列托手下失去的职位，从而加强了他们在军队中的优势。他们惯用的一种让非共产党人感到特别恼火的策略是，保证使科登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后立即雇用的共产党员及

其盟友得到迅速的提升。这种策略与军官培训学校入学考试的通知有关。考试日期在《国防部官方日志》上公布，前线的所有战士享有优先权。“但是，在通知发布之前，”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写道，“共产党的部队已经得到党的通知，因此，它们的报考者可以提前准备。通常，《国防部官方日志》不会按时送到前线。结果，非共产党员战士总是很晚才提出申请。玩弄这种花招是安东尼奥·科登的工作”。

佩特拉斯还引述了一个实例来说明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在军队中可以多么神速地飞黄腾达。一九三八年五月间，由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何塞·德尔·巴里奥指挥的第二十七师——前卡洛斯·马克思师——提拔了一千二百八十名官兵（下士、军士、少尉、上尉和各级政治委员）。“刚刚受到提拔的这些人被派到别的师、旅、营填补空缺的职位。……就这样，共产党人在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共和派和其他非共产党人的部队中占据了新的职位。”

据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军事部门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的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透露，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以后提拔的七千名部队官兵中，有五千五百名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由于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同样不令人意外的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指挥人民军五十二个师中的八个师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到了一九三八年九月，它只控制全部七十一个师中的九个师。因此，当一九三八年春天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宣称共产党人占据了军队中百分之七十的指挥岗位时，他似乎具有充分的理由。“他们通过贿赂、诱骗、提拔、特别关照以及各种胁迫手段使人转投共产党，甚至在战壕里也这样做，”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这造成一种不满和分裂的气氛，以致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和军事机器的效率。”

至于组成人民军的编制更大的那些部队，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所提供的数据显示，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冬天，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的十七个军（包括托拉尔兵团）中有八个军的军长是共产党员，在其余的部队中，负责把握部队政治方向的军政委有五个是共产党员。也就是说，在这十七个军当中，有十三个直接处于西班牙共产党的军事指挥或政治控制之下。此外，在西班牙东部埃布罗河流域驻扎的部队中，有四个军由共产党员指挥，他们是何塞·德尔·巴里奥、恩里克·利斯特、曼努埃尔·塔圭尼亚和埃特尔维诺·维加。

与共产党在军事指挥权方面的压倒性优势一样使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担忧的是，它企图通过把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调动到其他部队破坏无政府主义作战部队的纯粹性。“[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被故意从他们一直所在的军和师里调走。”佩拉特斯证实，“无政府主义大部队的完整性妨碍共产党实现其控制军队的目标。”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军事秘书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所写的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指控，“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西班牙共产党有计划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迫害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战士，包括使用“在[军事]行动中暗杀”的手段。这份报告还指控，共产党在军事法庭“无条件地支持下”进行诽谤和告发，另外，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按照其收到的共产党的指示向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部队委派指挥官。

尤其让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所有反对共产党的人）感到愤怒的是他们在战地医院受到的对待。由于内格林接管国防部后任命共产党员胡安·普拉内列斯医生担任医疗部门负责人，如今，战地医院大部分被西班牙共产党控制了。内战爆发时普拉内列斯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私人医生，一九三六年担任共产党民兵第五团的医疗队长官后声名鹊起，接着，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成为卫生部的副部长。一九三八年，他被任命为由四个军组成的中部军区医疗部门负责人，据一名担任政治委员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阿尔弗雷多·尼斯塔尔说，他把“下属的大批文职人员”派往这四个

军，“以致造成人员过剩，即使这些人并不全是共产党员，至少也有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

我们已经看到，在内战的头一年，社会党左派各种各样的不满之一是医院给予共产党员的优待。有必要重复一下他们的不满。“[在]一些医院，”拉尔戈·卡瓦列罗证实，“就像神父和修女曾经对非教友病人所做过的那样，没有人照料非共产党人伤病员。他们既得不到适当的治疗也得不到适当的食物；所有关照都给了共产党员和将要投靠共产党的人。”代表马德里的社会党左派议会议员卡洛斯·鲁维埃拉也说：“[在军队的]医院里，与修女时代同样的事情继续发生，那时候，为了吃一顿炖肉和炖鸡，或者为了吃上无论什么现成的食物，你必须披上表示虔诚的圣布或者戴上十字架。现在，你需要戴上锤子镰刀的标志。”

根据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没有公布的一份由五个独立的报告组成的文件判断，情况自前一年以来更加恶化。“最恶劣的事情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八日的一份报告强调指出，“大量伤病员因为医护人员的玩忽职守、医术拙劣和缺乏职业道德而死亡。我们看到一些可耻的事情。……这让人担心是蓄意预谋的破坏。”在列举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死亡后，报告继续写道：“具有同情心和高度道德责任感的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反复出现。我们的战士非常宝贵，因此，不能继续让他们任凭那些可以不受任何惩罚地杀人害命的家伙摆布。”

在为五份报告所写的简短导言中，文件怒斥了西班牙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的犯罪记录罄竹难书。……谁能设想暗害伤员，用病号、伤员和残废做政治交易？即使是最无耻的小人能够设想吗：根据党的指示，医院里的主任、医生、护士一千人等更关心伤员的党证而不是他们的伤病？唉，最残忍、最卑鄙的事情正在这个领域发生。在卫生医疗部门，共产党人实行这种政策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

尽管因为新闻审查和一九三七年社会党左派的报纸全部被没收而受到压制，流行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左派当中的这种怨恨仍然在这些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为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的需要而散发的传单中表达出来。在七月十三日散发的一份传单中，半岛委员会书记处严厉指责西班牙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所作所为：“借助于苏联人的讹诈，一个由政治新贵组成的、被布尔什维克政府的使节精心操纵的政党掌握了战争指挥权、军官任命权和军队整编权。选拔军官的依据是愿意接受共产党的党证。只有这些驯顺的人能够左右逢源，获得提拔，受到照顾从而占据远远超出其能力的指挥岗位。……与此同时，许多应当提拔的人才不是因为受到不负责任的刑事指控而被监禁或者被剥夺了指挥权，就是待在无法发挥其才能的岗位上。”

社会党温和派人士也有同样的担忧。一九三八年三月，内格林将普列托解职前不久，在内格林的住处举行的一次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的聚会上，人们痛斥共产党的行为无法接受。“内格林试图淡化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苏加萨戈伊蒂亚同志情真意切地大声说：‘胡安先生，让我们摘掉面具吧。我们的同志正在前线被杀害，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党证。’”一年后，普列托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社会党全国委员会。

因此，当内格林在四月份成为国防部长时，他完全知道社会党人强烈的怨恨和敌意并且不得不出让让步。但是，在这些肯定得到西班牙共产党默许的让步中，有些纯粹徒有虚名。作为旨在安抚社会党人和共和派的一整套骗局和幌子的一部分，内格林任命名义上是左翼共和派成员的比维亚诺·费尔南德斯·奥索里奥—塔法利担任重要的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曾经担任这一职务，直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被普列托派社会党人安东尼奥·克雷森西亚诺·毕尔巴鄂所取代。内战爆发时奥索里奥—塔法利是议会议员并且担任内政部副部长，后来主管马德里的左翼共

和派喉舌《政治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选为左翼共和派秘书长，如今，出于利益的考虑，他成为共产党人的盟友。因此，他得到这个新的任命应当归功于共产党人而不是内格林。当党询问时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门负责人的恩里克·卡斯特罗是否可以推荐一个能“像‘胡利奥先生’那样一丝不苟地”为共产党人办事的人以及他是否认识奥索里奥时，他回答道：

“我认为他是个骗子和好色之徒。不，他不会成为我们的障碍。这只是一个满足其恶习和嗜好的问题。”

“接着要与[弗朗西斯科·]安东一起去见他。他应当接受这个任命，不过必须让他明白，他被任命应当归功于共产党。”

于是，他们去见奥索里奥-塔法利先生，当时他是左翼共和派的秘书长。他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找到他。他热情接待他们，摆出一副大人物的架势。当他们观察他的时候，其他人在暗自发笑。……

“你们认为我能发挥作用吗？”

“你可以依靠我们的帮助。”

几天后，比维亚诺·奥索里奥-塔法利来到总政治部。……他从来不是一个障碍。他知道是谁使他得到了他的职务。只需时不时地提醒他，因为，在那些日子，在几乎与共和派无关的形势下，从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开始，共和派不过是共和制的一种装饰而已。

除了假装公正地任命了奥索里奥—塔法利之外，内格林还试图通过在军事部门为社会党执委会成员设立一些徒有虚名的高级职位安抚社会党领导人。他任命苏加萨戈

伊蒂亚为“协调监督”三位副部长工作的国防部秘书长，并且任命同为执委会领导成员的弗朗西斯科·克鲁斯·萨利多做他的副手。科登最初怀疑苏加萨戈伊蒂亚将会成为“普列托的眼线”，但是，内格林“用一些安慰鼓励的话”向他保证，这“实际上是一个几乎不可能采取任何有效行动的名誉职务”。当然，这是事实，因为两个最重要的副部长职位分别由科登和努涅斯·马萨占据着，他们只服从西班牙共产党的命令。

内格林还委派社会党执委会另一位著名成员、普列托的好友之一曼努埃尔·阿尔瓦尔担任协调总政治部各分支部门工作的“特别代表”，这是一个实际上没有任何真正权力的虚职。在内战结束之后写给普列托的一封为自己进行辩护的信中，内格林着重举出这三项任命作为他公正选拔非共产党人的例证并且声称，国防部秘书长这一职务对行政管理和政治功能的影响“非常明显，因此对共产党十分不利”。

普列托在回信中列举了被内格林委派担任陆军、空军和警察部门高级职务的著名共产党人的姓名。“事实最有说服力。”他反驳道，“因此，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曼努埃尔·阿尔瓦尔和弗朗西斯科·克鲁斯·萨利多这几个你企图用来作为你的挡箭牌的名字抹杀不了那些事实，因为这些同志没有任何可以与共产党的支配地位进行最低限度对抗的实权。”

对于苏加萨戈伊蒂亚来说，他那纯属象征性的角色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我去跟苏加萨戈伊蒂亚打招呼，”科登写道，“他亲切友好地接待了我，并且表示愿意为我的工作提供帮助，尽管他可能完全不知道他能为此做什么。”克鲁斯·萨利多没有这么恭顺谦卑。科登特别提到：“秘书长的管家是克鲁斯·萨利多，他的一言一行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反共的特征。”科登不愿忍受这种干扰，于是去向内格林告状。“我详细说明了情况。内格林同意我的看法，同时他还告诉我，为了避免出现

复杂的政治问题，要对苏加萨戈伊蒂亚进行安抚，因为秘书长已经表示他要递交辞呈。”苏加萨戈伊蒂亚告诉科登，“由于不了解各位副部长如何工作并且认为自己的职位纯属虚设”，他正考虑提出辞职。科登听后要求他不要给总理制造“新的难题”。“我不知道我的拜访是否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问题解决了，他继续像煞有介事似的履行其职责，直到[一九三九年二月]加泰罗尼亚地区失守为止。”

尽管苏加萨戈伊蒂亚留在他那有名无实的职位上，但他并未掩饰自己无能为力的感觉。“你们一点也不知道我有多么厌烦。”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写给社会党执委会的信中说，“当我想要知道关于战争的情况时，我不得不买一份报纸或是去问某个朋友。”他还在内战结束以后写道：“无论是我作为秘书长的存在，还是这个职务本身，都毫无意义。”

那么，苏加萨戈伊蒂亚为什么要忍受这种自我菲薄呢？佩雷斯·萨拉斯上校写道：“难以理解苏加萨戈伊蒂亚为什么忍受这样一种让人丢脸的状况。这不是一个虚荣心的问题，……因为，对于某个直到最近仍然担任政府部长的人来说，这个职位倒不如说是一种降级。他的理由肯定是不给内格林制造麻烦。”接着，在深入探讨了问题的核心之后，萨拉斯评论说：“因军事和政治大权在手而飘飘然的内格林认为，诸神选中他来拯救西班牙。……面对这种危险，社会党和共和派忧心忡忡。……大家认为，如果内格林被共和国总统或者议会的不信任投票罢免的话，一场政变将随之发生，总理将在政变中依靠军队，军队中的共产党人军官几乎全部支持他。只有这种看法才能解释那些党派和[议会]议员的谦卑顺从，尽管他们私下承认共和制是虚幻的假象。”

## 第五十六章 共产党对安全部门的控制

一九三八年春夏时节，胡安·内格林及其共产党支持者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如果确如



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断言的那样，共和派和社会党的沉寂是因为担心罢免内格林将会引发一场得到共产党控制的军队支持的政变；如果确如普列托告诉社会党执委会的那样，阿萨尼亚“不再拥有改变共和国政策的自主权，因为军事指挥权全部被共产党人所垄断，他们还要继续抵抗”；那么，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共和派和社会党的担心由于对军事调查局（SIM）的恐惧而加剧了。

尽管军事调查局的正式职责是“打击间谍活动，防止破坏行为，在军队内部执行调查防范任务”，但是，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操纵引导下，它很快渗入左派阵营的整个机体。“由‘苏联同志’建立的军事调查局的警察令人生畏，权力无边。”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写道，“政客和官员、士兵和将军在他们面前胆战心惊。对某人是可疑分子或敌视政权的指控可能像闪电一般突然降临。没有律师愿意承担为这种人辩护的风险，他可能在地牢里被杀害，也可能在水沟里被子弹打得浑身是洞。”

对于军事调查局不受法律约束的活动，积极参加了内战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在认真进行研究之后作了描述。他证实，军事调查局是一个警察网络系统，不仅在大大小小所有部队中活动，而且严密监视它自己的成员的行动。“军事调查局对政府部门无孔不入。在前线，被安插在军队各个级别的军事调查局特工拥有与政治委员和指挥官一样的权力，甚至比他们的权力还大。……在后方，军事调查局的特工让秘密警察自己感到害怕。在每一个看得见的特工背后，都有一个看不见的特工监视着他。”他在另一本书里还写道，军事调查局在其他党派组织内部刺探情报的活动非常“完美”，以致它们的协议和计划很快就被送到共产党的政治局。

我们已经知道，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最初拒绝了奥尔洛夫提出的让其组建一个军事情

报机构的“坚决要求”，但是，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只提供传授技术的顾问”为条件，普列托最终同意了这个要求。我们还知道，尽管普列托使所有负责人、督导人员和特工的任用成为他独自拥有的特权，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地区负责人古斯塔沃·杜兰仍然在没有向他请示的情况下任用了数百名共产党人特工。奥尔洛夫后来宣称，在普列托将这位违反规定的负责人撤职并且拒绝让其复职后，他召回了他的顾问，因此他们“与军事调查局再也没有任何关系”。这不是事实，因为，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时任安全总局局长的加夫列尔·莫隆证实，“像所有其他事情[包括他自己的部门]一样，军事调查局被我们的苏联好朋友暗中控制着”。此外，一九三八年四月普列托下台后被内格林任命为军事调查局副局长的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承认，苏联顾问出没于这个部门，特别是奥尔洛夫和别拉耶夫。

普列托无法控制军事调查局不仅因为招收了大批先前在革命初期临时拼凑起来的各种情报机构和警察队伍工作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而且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可靠人士来领导这个部门。他首先任命了社会党人安赫尔·迪亚斯·巴萨，事实证明他这位朋友并不称职；接着任命了普鲁登西奥·萨亚圭斯，这位共和派人士只干了两个月；最后是社会党人曼努埃尔·乌里瓦里中校，这位前国民卫队成员以背叛普列托而收场，他逃到了古巴——据说携带着现金和珠宝。普列托一九三八年告诉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乌里瓦里是一名“资深社会党人”，最初忠实地为他效力，并且拒绝了奥尔洛夫的“助手”提出的在不通知国防部长的情况下“经常与他直接”磋商的要求。不过，普列托断言，乌里瓦里“因身为军事调查局局长——在这个岗位上他经常连续工作四五天而不睡觉——责任重大，精神状态越来越不稳定，他的行为发生了变化，逐渐向那些要求他与他们一起背着我做事的人妥协屈服”。

有些作家推测，乌里瓦里也许被希望除掉他的共产党人摆布或诱骗了。根据全国劳

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的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这可能与乌里瓦里在军事调查局的朋友们的说法不符：“在发现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多次进行总数高达两千二百万比塞塔的诈骗活动之后”，他由于“个人安全”的原因逃离西班牙。此外，他好像打算把共产党人从军事调查局清除出去。无论如何，他的离开为提拔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铺平了道路，加尔塞斯此前一直是社会党人和普列托的支持者。乌里瓦里逃走之后，（二十二岁的）军事调查局副局长加尔塞斯成为该组织的临时负责人（jefe accidental）。由于再也没有任命正式的负责人，加尔塞斯的“临时”负责就变成了永久性的，他领导军事调查局直到内战结束。加尔塞斯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写给西班牙历史学家埃莱诺·萨尼亚的一封信中说，内格林任命他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为的是随时了解“普列托的人”在军事调查局中的活动并且“改善它的工作”，尽管他对加泰罗尼亚著名作家和研究西班牙情报活动的权威D.帕斯托尔·佩蒂特说，他不愿接受这个职务，因为他“厌恶”与警察工作有关的一切事情。“我竭尽全力拒绝担任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并且向内格林博士的官方和私人‘助理’说明了我的态度，但是不起什么作用。”他说，亲自与总理面谈的结果只能是，他被迫担任这一职务。

任命他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非常有利，因为，据我曾多次引述其有价值的证言的何塞·穆尼奥斯·洛佩斯说，名义上是社会党人的加尔塞斯早已暗中开始为西班牙共产党效力。以后多年，在继续坚定不移地忠于内格林的同时，他表现出对苏联人和西班牙共产党人的敌意，就像一九七四年他在墨西哥接受埃莱诺·萨尼亚的采访时所显示的那样。然而，毋须赘言的是，没有苏联人和西班牙共产党人的支持，他不可能在内战期间担任这一关键职务。由于采访的关系萨尼亚与加尔塞斯多次接触，因此，我尊重他的判断。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加尔塞斯]首先是一个内格林派，只有在内格林实行某项有利于共产党人的政策时，他才是一

个暗藏的共产党人。我[在一九七四年]认识他并且与他打交道时，这种暗藏的共产主义倾向已荡然无存。他在这一点上态度明确。”

作为一名边防警察部队（内格林偏爱的警察部队）的上尉和一名总理的追随者，加尔塞斯在接受萨尼亚的采访时声称，内战期间内格林“并不在意西班牙共产党”，谈到共产党人时语气通常是轻蔑的。“另一方面，[内格林]与苏联在西班牙的政治领导人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正式身份为苏联贸易特使，与内格林把大量黄金运往苏联直接有关]关系融洽，他们天天一起进餐。”加尔塞斯还说，他们一起进餐时他多次在场。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我们只能断定，早在被任命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之前，他就与内格林关系密切，因为，斯塔舍夫斯基于一九三七年年中被召回苏联并销声匿迹，距加尔塞斯担任军事调查局副局长和临时局长（一九三八年四月）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萨尼亚在写给我的信中表达了以下看法：内格林的密友、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九月担任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的药理学家拉斐尔·门德斯博士——他使加尔塞斯成为边防警察部队上尉并且担任他的副官——是使加尔塞斯得到提拔并使其成为“内格林的心腹之一”的“牵线人”。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中，有一份令人感兴趣的文件，这份注明日期为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文件声称，为了控制军事调查局，（一九三八年四月被内格林任命为内政部副部长的）门德斯负责使加尔塞斯升任高级职务并且设法使他长期留在那里。

加尔塞斯接替乌里瓦里之后，军事调查局通过压制对内格林政府的所有批评显出其特征。正如我经常引述的佩雷斯·萨拉斯上校所证实：“严重背离其使命的军事调查局拥有一个秘密特工网络，负责暗中监视所有敢于谈论总理的问题和战争发展趋势的人。这些人被当作反政府分子抓了起来。严厉批评——它们往往具有建设性，有时甚至是必要的——绝对禁止，公民自由——尽管在战时需要受到某种限制——彻

底废除。”也就是说，公民享有的自由发表意见、举行公众集会以及不受随意逮捕、调查和没收财产的权利被剥夺了。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些权利还会恢复。

一九三七年政府从巴伦西亚转移到巴塞罗那后，共产党成为当地最强大的团体组织，在那里，军事调查局尤其让人感到害怕，第二届内格林政府组成后，它的权力达到顶峰。当时，帕斯托尔·佩蒂特断言，军事调查局“完全被西班牙共产党控制了”。另一方面，在马德里，党的领导机构转移到巴塞罗那之后，共产党的影响逐渐减弱，据一九三八年五月共产党的一份秘密报告说，社会党在各个秘密警察部门的力量与共产党的力量相当。这份报告还说，在所有这些部门里，除了军事调查局之外，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的关系热情友好。当共产党的影响在内战的最后几个月进一步减弱时，我们将会看到，由于民众的士气普遍低落，最初与共产党合作的军事调查局中部地区负责人、社会党人安赫尔·佩德雷罗开始疏远共产党，并且在一九三九年三月支持卡萨多上校发动反对内格林和共产党人的政变。

内战结束后不久，内格林向伦敦《每日电讯报》的亨利·巴克利否认秘密监狱和刑讯室或者所谓契卡的存在，但在过了十年之后，他向同一位记者承认自己“错了”。这并不是说他亲自批准设立了它们，然而毫无疑问的是，通过加尔塞斯或门德斯，他知道它们的存在，而且，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他对它们视而不见。何塞·佩拉特斯证实：“军事调查局的地牢有时隐藏在被整齐的花园和围栏环绕的高楼大厦里。西班牙人把各种形式的秘密监狱称为‘契卡’。军事调查局成立初期，契卡阴森黑暗，设在旧房子和修道院里。刑讯逼供采取典型的野蛮方式：用橡胶管抽打然后兜头浇上冰冷的水，假枪毙以及其他种种痛苦血腥的折磨。‘苏联顾问’将这些古老的手段现代化。新式牢房更狭小，墙壁涂上鲜艳的颜色，地面铺着边缘锋利的瓷砖。……把不服管束者关在‘冷藏室’或‘噪音间’里，不然就绑在‘电椅’上。……囚犯被一连几个小时泡在冰水里，直到他准备交代[折磨他的人]想让他交代的问

题。”

西班牙共产党和圣地亚哥·加尔塞斯均未公开承认过军事调查局秘密监狱和刑讯室的存在，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尽管民族主义者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占领巴塞罗那之后曾经拍下了其中一些的照片。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和十日写给帕斯托尔·佩蒂特的两封信中，加尔塞斯声称，他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另外，他在前面提到的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写给埃莱诺·萨尼亚的那封信中证实，作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他下令解散了亚历山大·奥尔洛夫领导的臭名昭著的审讯委员会（comisión de interrogatorios）。他还引人注目地声称，他在掌控军事调查局之后将奥尔洛夫赶出了西班牙，而且还就此事打印了一份正式的备忘录向内格林解释说，这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是一个“政治说教狂”，作为技术顾问对他已经“毫无用处”。他说，他根据自己就有关军事调查局组织工作的所有事情向奥尔洛夫提出的几十个问题确定了这一点。

加尔塞斯将奥尔洛夫赶出西班牙似乎不像真有其事，因为，这么一个惊人的事件不可能一直不引起注意，而且它将造成严重的影响。只要这件事一发生，它很快就会广为人知。无论如何，在战后与普列托的争论中，内格林可以利用这件事，因为，他在这场争论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论据证明自己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并且保持了独立性。此外，在一九七四年给萨尼亚写信之前流亡墨西哥的三十五年的时间里，加尔塞斯本人肯定会向人吹嘘这件事，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只要知道这件事，内格林的所有支持者和辩护士一定都会利用它，因为，对于任何一点可以证明内格林在政治上没有与人结盟的东西，他们求之不得。但是，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卷帙浩繁的书籍中，没有一点它的痕迹，甚至没有任何暗示。一九八六年萨尼亚向我透露所谓驱逐奥尔洛夫事件——当时我与他第一次通信——之前，我没有听到过加尔塞斯这一引人注目的说法。因此，我不得不得出的结论是，所谓驱逐奥尔洛夫事件是加尔塞

斯想象力的产物。

不过，平心而论，有必要指出，加尔塞斯至少有一次试图玩弄花招蒙骗苏联人。据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中一份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的备忘录说，他在顾问委员会为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提供了一个位置，条件是，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作为共和派的一员加入委员会，以免引起苏联人的“怀疑”——“这可能是内政部副部长门德斯的指示，他把一切都归功于门德斯”。显然，备忘录接着说，“莫斯科干涉的力度”很大，以致加尔塞斯“不得不依靠这种策略规避它”，因此，“如果他作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的位置更加稳固，他会强行实施自己的规则”。他实际上不能独立自主地行动表明，他“受外国势力的支配”。不过，应当附带提到的是，尽管加尔塞斯玩弄了花招，但他并不打算授予全国劳工联合会任何实权，只是准备利用它而已，因为，八月六日的另一份备忘录不满地说，“他坚持利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充当通常那种告密者或刽子手的想法”。备忘录说，这绝不可能被答应。“我们的同志必须合法地正式加入军事调查局，享有该局其他特工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我们再次强调，必须要求顽固的加尔塞斯辞职并且收到他的辞呈。”

尽管加尔塞斯蒙骗苏联人的花招表明，他可能对处在苏联人的监督之下感到愤怒，因此宁愿在与全国劳工联合会打交道时选择一点独立性，但这并不足以证实他将奥尔洛夫赶出西班牙的说法。实际上，这恰恰证实了相反的结论，他在对待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关系方面小心翼翼，即使不是完全胆战心惊。

据奥尔洛夫——离开巴塞罗那一个月后，他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叛逃到了美国——本人说，他与他的手下将巴塞罗那的一幢大楼一直占用到七月十二日。尽管他离开了，刑讯室和特别法庭仍然继续全速运转。幸运的是，历史学家并不是只能依

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揭露军事调查局犯罪事实的民族主义者所提供的证据，因为，在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看来，这些证据过于偏颇，所以在内战历史的研究中不应占有一席之地。即使在七月十二日奥尔洛夫离开后，军事调查局仍然伙同内格林建议设立的特别安保法庭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这一点得到一些身居高位的温和共和派人士的证实，他们对军事调查局犯罪行为的谴责不可能轻易被人忽略。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以充分的证据证实了军事调查局犯下的罪行，他是温和的巴斯克民族独立党在政府中的代表，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一日提出辞职。在前一天举行的一次火药味十足的内阁会议上，他描述了军事调查局特工刑讯逼供的种种方式。同时他谴责下面这种常规做法“惨无人道”：将“成千上万的公民”与他们的家人分开，“使女人与丈夫分离，孩子与父母分离”，任凭时间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过去，被捕者是死是活、他们被关在哪座监狱、他们受到什么指控，统统不告诉他们的家人。“使用这种残酷的法西斯手段，”他断言，“我们将会输掉战争。”他还说，他已经提醒加尔塞斯注意他的指控，后者向他保证，不会允许继续使用这些“非法残忍的手段”。这时，内格林离开会议室去与加尔塞斯交谈，几分钟后回来告诉内阁，他已下达严厉的命令，“各种形式的刑讯逼供必须停止”，违抗命令者将被追究责任。这些保证想必没有让伊鲁霍感到一点慰藉，因为，他在八月辞职以后所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对于个人安全来说”，内格林控制的军事调查局成为“一个非常专横危险的工具”，因此，他曾多次以辞职相威胁，每次都得到“承诺和保证”。

如果需要更多关于军事调查局罪行的证据，还有卡洛斯·皮·苏涅尔的证言。他是温和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在成为自治政府的文化专员之前一直担任巴塞罗那市市长。皮·苏涅尔写道：“最初受权调查间谍案件的[军事调查局]扩大其活动范围



变成一个政治工具，很快就因手段残忍得到一个险恶的名声。”与此同时，特别法庭“采用简易程序日夜”审案并“以判决严厉而著称”。由于这些原因，他证实，加泰罗尼亚当局多次向共和国政府提出抗议，对法治状况的恶化、军事调查局的滥用职权以及死刑判决数量的增加表达了深切的担忧。他还说，这是一九三八年八月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样重要的还有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司法专员、著名人类学家和巴塞罗那大学校长佩德罗·博什·希姆佩拉提供的证据。他断言，特别法庭成为军事调查局非法行为的“掩护手段”。“我们[一九三八年提出]的抗议没有效果，我们就我们所知道的非法逮捕提出的质询无人理睬。特别法庭由一名职业法官、一名国防部的军人代表（通常是军事调查局成员）和一名‘社会治安部门的代表’——也就是一名警察——组成。……总是根据被告的供词或者某位特工的证词定罪，军事调查局不一定是合法取得的这些供词，其特工的证词往往值得怀疑。因此，我没有办法只好非正式地与我们那些担任[政府]部长的朋友伊鲁霍、希拉尔、艾瓜德谈这些事，但他们基本上无能为力。……[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司法专员抗议的对象是军事调查局的非法手段、特别法庭的非法程序和非法进行的逮捕，因为我们[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管辖下]的菲格拉斯监狱受到影响，我们的人员失踪了，后来发现他们死在伊瓜拉达和塞尔韦拉那样的地方。”另外，博什·希姆佩拉在写给休·托马斯的一封信中说：“内战的最后一年，我们用了大量时间与军事法庭和军事调查局作斗争。”这一陈述无疑证明，尽管内格林向八月十日的内阁会议作出保证，军事调查局仍然继续滥用职权，以致引起加泰罗尼亚当局的严重不安。

现在应当清楚了，在内格林的副官圣地亚哥·加尔塞斯指挥下的军事调查局是左派阵营中最令人恐惧的安全力量，它的阴影笼罩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据当时身为共产党员并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被任命为安全总局局长的爱德华多·奎瓦斯·德

拉·培尼亚上校那部鲜为人知的回忆录说，“军事调查局还渗入了正规警察活动的领域，严重损害了后者的名声”。

尽管此时担任内政部部长的是坚定支持普列托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保利诺·戈麦斯·赛斯，但是，共产党人把持着警察管理部门的所有关键职位，自从内战爆发以来，他们对这些职位孜孜以求。此外，奎瓦斯上校指出，部长的工作“受到担任他的副部长的控制，担任副部长的是内格林的得力助手[即前面提到的那位曾在一九三七年担任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的拉斐尔·门德斯博士]”，因此，内格林的势力对于部长处理公务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尽管身为共产党员，曾经担任统一的加泰罗尼亚治安部队负责人并且帮助摧毁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该地区的力量的奎瓦斯上校并不是一个脱离实际的共产主义者。内战初期，他很早就受西班牙共产党的吸引而入党，他的经历与其他加入共产党的共和派军官相似。在马德里前线作战时，他成为共产党民兵第五团的一名名誉指挥官，然后应邀参加了一次会议：

最进步的理念激励着那些发言者：他们拒绝将犯罪当作革命的手段。抢劫将受到无情的检举。……他们的军事方针非常明确：立即建立一支正规的军队，创办军官培训学校，加强防御工事的建设，组织后备部队，实行统一指挥。几天后，我入了党。

……

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公开号召尊重所有忠于共和国的军官的政党。[希拉尔]政府应当采纳这个倡议，但是，由于缺乏权威和胆小怕事使其不受公众欢迎，它任凭军官听天由命。它也如此对待国家的其他公务人员，这是内战初期只有少数骨干分子的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并且不时成为推动力量的原因。……

它争取支持者的政策卓有成效。它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声称共产党不是为推行其意识形态而战，而是为捍卫宪法的合法性而战。

“但是，”他问自己，“他们的话是真心的吗？只有时间能够回答。”奎瓦斯说，就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成为安全总局局长的那一天，当加泰罗尼亚共产党的一名代表召集他参加一次党的会议讨论他未来的职责时，他与共产党决裂了。“我的回答非常明确：我忠于职守，不会屈服于外界压力。那一天，我们断绝了关系。几天后，我接待了来访的一些苏联人，他们愿意进行合作。我很有礼貌地把他们送走，之后，他们再也没有来过我的办公室。”

尽管相信奎瓦斯在共产党的权力达到顶峰而且就在他成为安全总局局长之际敢于公然反抗共产党可能不错，甚至让人感到宽慰，但是，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共产党为什么没有把他开除出党并且罢免他的职务？会不会是他被共产党的无耻干涉激怒之后从没有公开表达过愤怒而只是暗中决定自行其是？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内战结束两个月后，陶里亚蒂在写给共产国际的那份常被引述的报告中提出了支持这种推测的脆弱证据。关于奎瓦斯，他写道：“不顾党的指示，不顾党的压力和建议，他允许党的敌人掌握了中部地区的警察力量。”但是，这一指责只涉及某一地区的警察管理部门，由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民族主义军队到达地中海海岸将共和派控制区一分为二之后所形成的地理和政治上的分离状态，奎瓦斯实际上无法对它进行控制。此外，对于奎瓦斯所谓他与西班牙共产党决裂这一值得注意的事件，陶里亚蒂甚至没有任何暗示。而西班牙共产党前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还特别将安全部门列为“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所控制的关键的权力核心部门之一。因此，我们可以不无道理地得出结论：奎瓦斯的说法只不过是在推卸责任，而陶里亚蒂则以指责这位上校——像对其他加入共产党的军官一样，他轻蔑地将奎瓦斯称为共济会会员——的方式将其添加到他的替罪羊名单里，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里看

到，他用这份名单解释了一九三九年三月反对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政变成功的原因。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陶里亚蒂把政变的成功部分归因于这些共济会会员的背叛时，他还体现了共产主义运动不信任其无力控制的秘密会社的传统。早些时候，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一份报告中，陶里亚蒂写道：“党内有许多共济会成员，而且我还意识到，他们首先是共济会会员，其次才是共产党员。身为共济会会员的那些共产党员警官在参加党的会议之前先召开共济会会员的‘小会’。有人告诉我军队也有这种情况。有证据显示，某个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曾经隐瞒而且仍在隐瞒他是共济会会员的事实。”此外，在稍后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撰写的一份报告中，他说：“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内有许多共济会会员，尤其是在党的领导人中。至少有三个人是执委会成员，两个人是书记处成员。巴塞罗那的党组织书记很可能是共济会会员。尽管西班牙的共济会会员所起的作用与其他国家的共济会会员不同，但是我认为，这种状况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无论陶里亚蒂影射共产党内存在着一些听从某个高官指挥的共济会会员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事实上，一九三八年四月，在政府所在地巴塞罗那，共产党人在秘密警察和制服警察中的地位根深蒂固，以致社会党人内政部长保利诺·戈麦斯·赛斯几乎形同虚设。不过，他采取措施成功地控制了国内新闻的审查权，据陶里亚蒂说，这个领域“长期以来被党的敌人[即社会党人]控制着”。陶里亚蒂说，共产党人向内格林投诉，内格林“承认我们的抗议是正当的，并且同意党提出的整顿方案”。方案将新闻审查权直接置于总理办公室的控制下，但是，“由于担心与社会党决裂”，内格林“没有实施这一方案”。

不过，内格林并没有对保利诺·戈麦斯放任自流。有一次，在新闻审查人员允许社会

党执委会的喉舌《社会主义者》发表一篇批评内格林政府和他个人的报纸《先驱报》的文章后，内格林命令保利诺·戈麦斯逮捕他们。“于是，立即听不到反对《先驱报》的声音了。”普列托在内战结束以后写给内格林的一封信中说，“社会党不能说它想说的话；只允许胡安·内格林的意见自由发表。”他说，在《社会主义者》与《先驱报》之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反差，前者是政府首脑所属政党的喉舌，而后者拥有“充足的纸张，昂贵的插图副刊用从国外进口的高级纸张印刷，这种纸张是用为平民百姓购买食品的外汇买来的”。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胡安·内格林博士的权力和威信直接建立在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的军队和警察的基础上，同时间接依靠对手的屈从或压抑。如今，他的对手不仅包括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人这些革命左派，而且包括普列托派社会党人和左翼共和派，更不用说还有可怜的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确，陶里亚蒂的愤怒表明，在与社会党执委会打交道时，内格林有时表现出克制和慎重，但是，关于他在等待时机直到能够与共产党断绝关系的论点是错误的。这是大约三十年后拉斐尔·门德斯博士发表的论点。据门德斯本人说，他是内格林“多年来最好、最忠实的朋友”。“总理的既定想法之一是，”他声称，“一旦战争结束，立即解散共产党的军队。他支持这些军队甚至允许它们发展，因为苏联是我们唯一的补给来源。”他还声称，一九三八年夏末慕尼黑危机之后不久，内格林告诉英国大使和英国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的情报部门负责人，如果英法两国向共和派政府出售其赢得战争所需要的战争物资，他不仅将把两名共产党人部长从政府中除名，而且还将取缔西班牙共产党并用非共产党人取代军队中担任指挥官的共产党人军官。

不能根据表面意思相信内格林的这些表示，也不能认为除了策略方面的考虑之外它们有什么别的意义，因为，在控制军队和安全部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内格林促

进了共产党的事业发展，按照陶里亚蒂的说法，这是“唯一一个真心实意支持[他]的政党”。那么，内格林能够召集什么力量摧毁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呢？社会党人、共和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指责内格林是陶里亚蒂所说的“共产党的代理人”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至少就内格林一直积极推动其转变成为一支强大的社会治安力量的边防警察部队来说，当他在普列托被逐出内阁的几天前任命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马塞利诺·费尔南德斯取代普列托的好友维克托·萨拉萨尔担任这支部队的负责人时，他暴露了对共产党人的偏爱。

这项任命是公然违抗社会党执委会的行为，因为，当他在一九三六年九月成为财政部长时，人们认为他将把边防警察部队变成一支完全由社会党温和派控制的精锐部队。实际上，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重申了已有的禁止部队人员从事政治活动的规定，而且，据说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告诉刚被任命为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的拉斐尔·门德斯，务必“防止共产党的势力渗透到”这支部队中。当然，关于这个说法我们只有门德斯的一面之词，但它可能确有其事，因为当时内格林还没有完全切断与他的朋友和导师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血肉联系。门德斯的另一个说法与我们知道的情况——内格林在内战的最后一年支持共产党——完全相反：他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普列托被罢免后成为内政部副部长时，内格林告诫他“要在警察机关、情报部门和突击卫队中抵制共产党的影响”。此外，据我经常引述其可靠证言的军事调查局官员何塞·穆尼奥斯·洛佩斯说，门德斯不仅是普列托的亲信，而且还是共产党人的朋友。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九三七年九月，门德斯被任命为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仅仅三个月后，当时正与西班牙共产党争夺军队控制权的普列托让内格林把他调走，然后用自己亲密的政治伙伴维克托·萨拉萨尔接替他。

当然，当边防警察部队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和五月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控制下夺取法国—西班牙边境地区时，当几个月后边防警察部队在巴

伦西亚没收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的办公场所和印刷车间时，共产党人支持内格林动用这支部队。但是，企图控制国家所有军事力量的他们不可能允许这么一支强大的部队长期独立。因此，当内格林决定罢免普列托并与西班牙共产党联合时，控制边防警察部队的机会出现了。事实证明这并不容易，因为边防警察部队有它自己的政治委员，名叫财政部代表（delegados de hacienda），这些像指挥官一样的代表主要由社会党人所担任，而根据共产党马德里地方组织治安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判断，共产党对这支部队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负责莱万特方面军政治军事委员会的共产党人埃米利奥·佩雷斯向我说明了内格林的两难处境。他说，内格林成为“他建立的这支部队的受害者。……后来[在与普列托决裂之后]，当他想有所改变时，由于边防警察部队的指挥官与社会党之间保持着联系，严重的政治问题出现了。”这解释了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鼓励党员加入边防警察部队的原因，也说明了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对我讲的下面这番话的含义：“许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加入了边防警察部队。内格林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他。”

因此，对于共产党人控制国家所有军事力量的终极目标来说，内格林任命共产党人马塞利诺·费尔南德斯取代社会党人维克托·萨拉萨尔担任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是一个相当重大的贡献。

## 第五十七章 加泰罗尼亚与八月危机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内格林政府从巴伦西亚转移到巴塞罗那，这加剧了地方当局与中央政府的不和，尤其是在社会治安领域。

自从一九三七年五月爆发公众骚乱以来，对中央政府控制警察部门的不满不断郁积。尽管孔帕尼斯主席承受着舆论的敌意同意巴伦西亚方面接管社会治安并向加泰

罗尼亚地区派遣数千名突击卫队士兵，但他仍然相信加泰罗尼亚很快将会恢复它所失去的自治权。七月二十九日，在一九三七年六月组成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中担任财政专员的何塞·塔拉德利亚斯向阿萨尼亚总统抱怨说，中央政府派遣了“一支占领军，以牺牲地区的利益为代价驻扎下来”。他的不满表达了孔帕尼斯和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的烦恼，不过，他没有得到总统的鼓励。几周后，司法专员佩德罗·博什·希姆佩拉以同样的话语向阿萨尼亚总统表示不满。对自己在五月事变期间的痛苦经历耿耿于怀的共和国总统在日记中写道：“博什无视这一事实：如果加泰罗尼亚地区驻扎着一支‘占领军’（他们喜欢这样称呼它）——合法政府派来的一支最终把加泰罗尼亚……从暴徒的魔爪下拯救出来的军队——的话，那么，几个月来，在占领军巡逻、‘管制’、私设法庭等等情况下，该地区的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应当感到愤怒、耻辱并备受折磨。”

中央政府转移到巴塞罗那不仅加剧了加泰罗尼亚当局与中央政府的不和，它还激起了加泰罗尼亚国家党的分离主义者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温和的自治论者强烈的地方主义情绪。尤其让人备受刺激的是部长和官员及其家人和朋友显眼招摇的存在，他们希望并且要求受到优待。“我告诉[内格林]，”共产党军事指挥官恩斯特·利斯特写道，“包括某些部长在内的相当一部分政府高级官员滥用职权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所有人都知道，这些官员带来了情妇和家人，为他们征用豪华住宅。政府的行政机构同样要求，并不考虑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难处。这当然让加泰罗尼亚人感到愤怒。”前共产党人安全总局局长爱德华多·奎瓦斯·德拉·培尼亚也证实：“人们用最不正当的手段抢占住房而不受惩罚。”

孔帕尼斯主席的愤怒既有个人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本人是个热情的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霍尔迪·阿克尔与这位心烦意乱的主席多次谋面。一九三四年巴塞罗那反勒鲁—希尔·罗夫莱斯右翼政府的政变失败后，尽



管政治观点不同，他们在监狱里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阿克尔说：“孔帕尼斯向我抱怨随着政府来到加泰罗尼亚的那些中央官僚机构的不法行为；新闻审查以不公平的方式进行；武装袭击属于自治政府和巴塞罗那市政委员会的公共建筑；干扰[加泰罗尼亚的]警察和司法机构。……[他]告诉我，每天晚上他必须清空自己主席办公室办公桌的抽屉，因为那些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人警卫人员或其他雇员搜查他的每一件东西并把他们感兴趣的東西拿走。”他还告诉阿克尔，他不得不更换派给他的警卫人员，“因为他们不是来保护他的，而是来暗中监视他的”。

加泰罗尼亚地区领导人对中央当局的抱怨持续不断。佩德罗·博什·希姆佩拉说，中央政府“在司法问题上完全不尊重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无视[根据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属于地方的权力”。他说，典型的事例包括在巴塞罗那设立了一个国家监狱；任命法官；建立特别法庭，加泰罗尼亚当局经常对这些法庭的程序和判决提出抗议；占用自治政府管辖下的监狱。加泰罗尼亚经济学家何塞·马利亚·布里卡利指出，中央政府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开始控制了对外贸易，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开始控制了食品供应和固定税收。也就是说，加泰罗尼亚不仅被剥夺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赋予它的权力，而且被剥夺了作为革命结果它收归自己的特权。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前司法部长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列举了另外一些不满：“征用结婚戒指、情人耳环、祖母胸针之类的家族所有物；把库存的纺织品运往苏联；根据斯塔舍夫斯基的指示抢走我们制造中心的机器和设备。……还有上千件其他事情加深了敌意和怨恨。”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为供自由主义运动内部传阅而写的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中说，共产党“积极帮助[苏联]以最荒谬的价格获得我们的库存商品，同时帮助苏联间谍窃取我们的工业秘密”。

前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经济专员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评论说：“谁也不知道西班牙银行黄金储备的情况，不知道它们是否还在或者已经消耗殆尽。不过，可以明确说

出一件事情：苏联已经得到加泰罗尼亚库存的价值亿万比塞塔的纺织品和其他商品，而且有人怀疑，只需支付保证金，苏联就得到了这些商品。由于内战爆发，共和国政府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秘密方式执行它的财政政策，即使在帝王专制统治时期也没有见过这种方式。”

几乎毫无疑问的是，所有这些不满，加上中央政府机构以及随着政府转移到巴塞罗那的大批西班牙共产党官僚令人讨厌的存在，刺激了加泰罗尼亚人强烈的地方主义情绪。这同样激怒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那些具有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倾向的领导人，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被迫服从共产国际领导人和西班牙共产党不满，也对西班牙共产党企图占据完全属于加泰罗尼亚人的职位不满。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举行的一次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创始人之一拉斐尔·比迭利亚严厉告诫了本党那些桀骜不驯的党员。他宣称，为了赢得战争，只能有一个政治和经济领导核心。对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来说，为了保证与共和国的其他部分团结一致，“我们必须纠正自己的缺点，同时与我们党内存在的某些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残余和影响作斗争。如果考虑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年轻幼稚以及它是[四个加泰罗尼亚党派组织]合并而成这一事实，存在这些思想残余和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警告说，必须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作斗争。“[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必须动员起来，让党的所有积极分子和骨干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正确路线，因为，如果连自己都不理解这一真理，党就无法使人民群众理解它，而且，如果不能确保加泰罗尼亚与共和国的其他部分紧密团结，党随时可能卷入加泰罗尼亚与西班牙其他部分之间的冲突。”去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这一警告的意思是，所有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应当忘记他们与加泰罗尼亚的亲密关系，服从西班牙共产党所控制的国家政权的统治。

如果加泰罗尼亚人被一支“占领军”的存在和大批政府及共产党官员的“入侵”激

怒是事实的话，那么，中央集权主义者被地方主义情绪的高涨激怒也是事实。本人是个中央集权主义者的内格林忧心忡忡地看待加泰罗尼亚人的不满，任何地方主义——他更喜欢称之为分离主义——的表现都让他焦躁不安。一九三八年七月，当他的朋友、内政部副部长拉斐尔·门德斯请他就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活动中注意到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复苏迹象”作指示时，他咆哮道：“我与佛朗哥继续作战不是为了看到愚蠢狭隘的分离主义复活。我是因为西班牙并且为了西班牙而战，因为它的伟大并且为了它的伟大而战。不这样认为的那些人错了。只有一个民族：西班牙！不能允许这种活动暗中持续进行下去，必须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只要我继续引导政府的政策，这就是一项民族政策。”

无论内格林是否愿意承认，加泰罗尼亚社会各阶层最愤恨的是本书前一章已讨论过的军事调查局及其特别法庭和共产党控制的警察机构无处不在的恐怖活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写给共和国总理的一封篇幅很长的信件中，路易斯·孔帕尼斯附上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务治安专员和司法专员提交的报告，报告谴责了某些“损害后方士气和信心”的事件。有必要将其中一部分重要内容陈述如下：

关于司法专员的那份文件，它应当清楚地表明，揭发涉嫌滥用职权行为的那名官员第二天被人发现死亡了，据说他是自杀的，可他实际上是被三颗子弹打死的。法院调查了这件事情，但是，我必须抗议共和国政府的某些警察部队所采用的简单方式，这些装备着机关枪的警察闯进[自治政府管辖下的]菲格拉斯监狱，并且一直待在那里。这一暴行是藐视自治政府的行为，它是在未经事前协商、通告或合法申诉的情况下实施的。

至于内务治安专员的报告所概述的事态，除了许多反复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之外，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另外一些事件可能大量增加了。我不得不以悲伤的心情强调事

态在某些方面的严重性，公众逐渐意识到，它已经发展到动荡的程度，在我们的人民当中引起了恐慌。

几周前，在锡切斯的市郊发现了十九具尸体。他们都被捆绑着，尸体上携带的文件显示，他们是来自“马德里重镇”的囚犯。以前在伊瓜拉达发现过其他被捕者的尸体，后来发生过一些与囚犯和其他失踪者有关的孤立的案件。只是在昨天我才被告知，塞尔韦拉警察局负责人给一帮有前科的人员配备了武器，由他们搜查、逮捕并且处决所谓嫌疑犯。几周前在巴塞罗那市区和另外一些地方采取了这种给某些人配备武器的做法。

法院和那些由中央政府直接授权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行使审判职责的所谓特别法庭……采用由共和国政府法令确定的简易程序完成它们的任务。结果，这一周强制执行的死刑判决几乎达到了一百例。这种简易程序和无情的审判……增加了可能的痛苦以及对如此大规模滥用权力的反感。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文化专员卡洛斯·皮·苏涅尔把自治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不断恶化归咎于“军事调查局的滥用职权”、“死刑判决的数量增加”和“不法分子的犯罪行为”。不过他还强调说，政府中央集权的欲望成为双方分歧的焦点。“不可否认的是，”他断言，“共和国政府实行的是一种处心积虑、一意孤行的逐步中央集权的政策，这令人怀念政府过去对加泰罗尼亚的政策。”实际上，正是这种中央集权的趋势，加上对削减或者取消加泰罗尼亚地方权力的其他种种不满，促使中央政府中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人士海梅·艾瓜德提出辞职。正如英国研究西班牙历史的重要权威雷蒙德·卡尔所说：“由于自治政府的职权已经降低到‘民间组织’的水平，[这位]加泰罗尼亚人部长从中央政府辞职以抗议不断削减自治政府的权力。在一个像其所有前任一样讨厌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者的由共产党主导的中央

集权政府统治下，西班牙多元化的梦想最终化为泡影。”

促使艾瓜德和巴斯克民族独立党人政府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一起提出辞职的直接原因是三项法令在八月十一日的内阁会议上获得批准：由中央政府对战争工业（这基本上是一个在自治政府参与的情况下由全国劳工联合会管理的加泰罗尼亚人的势力范围）、港口和法院实行军事化。“尽管是因为战争的持续以及为了战争的胜利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记述道，“……但是，这些法令削减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权力，从而加深了许多加泰罗尼亚人的疑虑。”在同一次内阁会议上，据何塞·希拉尔说，经过“非常激烈的争论”，批准了六十四个人的死刑判决。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财政专员何塞·塔拉德利亚斯打电话给阿萨尼亚，请求他不要在这些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但是，据财政专员的传记作者说，阿萨尼亚“没当回事”。事实上，阿萨尼亚爱莫能助，因为，当塔拉德利亚斯八月十二日告诉他这个情况时，五十八个人已于前一天被处决了，总统在日记中作了以下批注：“令人发指！我怒不可遏。谈论怜悯和宽恕[这指的是大言不惭地向全国发表题为《怜悯、宽恕与和平》的讲话]之后只过了八天，他们没有告诉我任何情况或者征求我的意见就处死了五十八个人。我只是看了报纸才知道。自从[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以后，我没有见过总理，他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内格林对于总统的这种漠视肯定使阿萨尼亚痛苦地想起五月事变期间前总理拉尔戈·卡瓦列罗对他显示的“冰川式的冷淡”。这也是从内格林执政初期就感到的一种强烈失望，当时，新总理以其自信和才智迷住了总统，因而使他产生了——就像他愿意相信的那样——不再“对一具尸体说话”的感觉。

由于找不到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和巴斯克民族独立党成员——两个自治地区的传统代表——接替艾瓜德和伊鲁霍以维持“民族团结政府”的假象，内格林召集加泰

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开了个会，与会者包括党的书记胡安·科莫雷拉、米格尔·巴尔德斯和拉斐尔·比迭利亚。据保存于西班牙共产党档案馆的比迭利亚的回忆录记载，（希望避免出现一场全面内阁危机的）内格林说：“我认为，一个加泰罗尼亚人和一个巴斯克人可以由另一个加泰罗尼亚人和另一个巴斯克人来接替。我请你们给我一个代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部长，因为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不是代表加泰罗尼亚的唯一党派。你们的党也能代表它。”

接着进行的对话被比迭利亚记录下来：

巴尔德斯：我们一致认为应当由科莫雷拉作为我们的代表担任部长。

内格林（显出某种不满的神态而且根本不考虑这个建议）：噢，不！科莫雷拉和比迭利亚都不行。他们作为共产党人太有名了。就是因为我想对那些认为共产党的代表过多的人作出让步，我把前政府中的两名共产党人调走了一名。因此，如果现在我用加泰罗尼亚的名额在政府中安排另一名共产党人，他们就会说我在欺骗他们。给我一个不出名的共产党人。

科莫雷拉：莫伊克斯。

内格林：莫伊克斯是谁？

科莫雷拉：你问他是谁实际上就表明他不是著名的共产党人。他是一个工会人士。

内格林：同意。

至于曼努埃尔·德·伊鲁霍空出的位置，则由鲜为人知的巴斯克民族行动党成员托马斯·毕尔巴鄂填补，他被认为是内格林的人，他的政党从未调动过值得重视的追随者或

选民队伍。八月十七日，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以下公报：“共和国政府特别感兴趣地重申，它尊重自治地区权利和特点的立场不可动摇，它还为看到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代表继续留在政府里从而保持了其作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的特征感到骄傲。”

但是，政府危机的草草解决并不能掩盖公众认为与地方自治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党派的缺席。就连通常倾向于对这种问题含糊其辞的西班牙共产党在多年以后也承认，“把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拉进政府并未抵消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退出造成的影响”，而托马斯·毕尔巴鄂的组织与巴斯克民族独立党那种势力的代表性有“很大的差距”。

内格林得以避免最后摊牌的一个原因是代表左翼共和派和共和联盟的四名支持伊鲁霍和艾瓜德的部长无所作为。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皮·苏涅尔指责他们没有辞职，表现出“某种事不关己的消极态度”，使得内格林“可以随意组成他选择的联盟”。另一个原因是热情之花指出的，她声称，使内格林能够应对这一局面的正是西班牙共产党的“坚定态度”，共产党建议他不要使其扩展成为一场全面的政府危机——这将意味着把解决危机的权力交给总统阿萨尼亚——“而只是更换两名辞职的部长”。

西班牙共产党提出的一种说法认为，艾瓜德和伊鲁霍的辞职是一个推翻内格林的阴谋的组成部分。众所周知，极其受人尊重的右翼社会党人胡利安·贝斯泰罗赞成通过谈判结束内战，有人说他与阿萨尼亚以及另外一些社会党和共和派领导人、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几个无政府主义派别共同参与了这一阴谋。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说法，尽管这位长期以来被西班牙共产党污蔑为“投降主义者”的著名社会党领导人在八月危机期间突然从马德里前来看望阿萨尼亚引起了查无实据的猜

测。两人之间会见的情况不为人知，就连阿萨尼亚的私人秘书坎迪多·博利瓦尔也没有参加这次谈话。他们肯定讨论了结束内战的方法，因为自从内战爆发以来，这个问题就占据着他们的头脑，但是，据博利瓦尔说，两人对此均“守口如瓶”。没有证据表明真的存在一个推翻内格林的阴谋。四名共和派政府部长的消极状态和阿萨尼亚本人的逆来顺受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事实上难以想象，如今已经败下阵来因而不冉继续活在妄想得到宪法权力的虚幻世界中的阿萨尼亚还会具有反对内格林的坚韧毅力。“我只代表那个花盆。”他在接待一个来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团时承认。

尽管如此，内格林和共产党人都不打算冒险对内阁进行重大改组。八月十三日，当危机尚未解决时，内格林手下负责陆军事务的共产党人国防部副部长安东尼奥·科登通知所有军队负责人，军事调查局发现了一个以煽动士兵杀害军官的方式颠覆共和国军队的阴谋。“通过绝对可靠的渠道，”他在发给所有师长的电报中声称，“军事调查局掌握了叛乱分子[向共和国军队]发布的以下命令：‘八月十四至十五日夜问，在每一块阵地、每一个指挥所、每一个战线后面的村庄、每一个军需仓库、每一个机场，也就是说，在所有地方，你们应当立即利用你们以十对一的不可抗拒的优势，无论采取什么手段，消灭你们的指挥官及其所信任的士兵。天亮时，在你们控制的地方升起白旗，我们将会注意观察，以使我们能够把你们从赤色分子罪恶的压迫之下永远解放出来。爱国者们！赤色地区的西班牙兄弟们！等到十五日清晨，我们可以拥抱在一起！’”

当所有师部都在阅读这封通告叛军所发布的赤裸裸的命令的电报时，由共产党员、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何塞·德尔·巴里奥指挥的第十八军的坦克部队接到了立即向巴塞罗那进军的命令。到达巴塞罗那之后，他们在头顶飞机的轰鸣声中列队通过一条条大街。同一天，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宣称：“面



对一切阴谋诡计，工人、战士、全体人民坚定地站在民族团结政府及其总理内格林一边。”

正是在这种军事威胁以及军队指挥官支持内格林的电报潮水般地涌向阿萨尼亚的背景下，八月十六日晚上，总理要求总统签署两项任命新的政府部长的法令。尽管阿萨尼亚避而不谈这次令人感到羞辱的会面的细节，不过，他的朋友皮·苏涅尔记录下来：“在会见过程中，内格林告诉[总统]，由于这场危机仅仅是一次局部的危机，因此，只需更换两名部长，这是总理解决危机权限范围之内的事，不用与总统进行协商。当然，阿萨尼亚可以拒绝这种解决方案，但是，考虑到军队的态度，他应当知道这样做的后果。阿萨尼亚再次屈服于压力，签署了任命两名部长的法令。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件令人痛苦的事情时，阿萨尼亚只用了简单的四个字，他说，这是一次‘难以忘记’的会见[Entrevista para no olvidada]！”

在内战结束以后写给内格林的一封信中，普列托提到“军队在巴塞罗那大街上的可耻阅兵”和“一窝蜂拍发的无耻电报扼杀了国家元首的意志”。他还说，这些电报电文内容的一致性和拍发时间的同步性清楚地表明，“有一只手在操纵”。至于所谓颠覆共和国军队的阴谋，那是一个“骗局”。他说，文件提到军事调查局发现叛军鼓动共和派士兵杀死军官并升起白旗。“这是在距离前线一百公里的巴塞罗那采取戒备措施的理由吗？我毫不犹豫地对我出示这份文件的人表示了我的看法：它有卑鄙的政治目的。归根到底，实行戒备为什么必须包括大张旗鼓地在巴塞罗那的大街上举行吓人的阅兵式，动用装甲车辆和装备并由飞机编队形成空中威慑？”

第二天，报纸发表了新政府的人员组成：

胡安·内格林	社会党[亲共人士]	总理兼国防部长
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社会党[秘密共产党员]	外交部长
保利诺·戈麦斯	社会党[普列托派]	内政部长
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	社会党[内格林派]	司法部长
比森特·乌里韦	共产党	农业部长
塞贡多·布兰科	全国劳工联合会[内格林的人]	教育和卫生部长
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	左翼共和派[内格林的人]	财政和经济部长
安东尼奥·贝劳	左翼共和派[内格林的人] <sup>51</sup>	公共工程部长
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	共和联盟	通讯和交通部长
何塞·莫伊克斯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共产党人]	劳工部长
何塞·希拉尔	左翼共和派[阿萨尼亚的人]	不管部长
托马斯·毕尔巴鄂	巴斯克民族行动党[内格林的人]	不管部长

## 图注：

51. 据我所知，安东尼奥·贝劳完全听命于内格林。值得把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证言记录下来。“安东尼奥·贝劳先生[是]左翼共和派最明智、最有代表性的领导人之一。”（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让我去战斗》，第191页）

与以往历届内阁相比，本届内阁中内格林及其共产党支持者的力量更加强大，它将是最后一届战时政府。

## 第九部分 怀疑、分歧、灾难激增，共产党的影响减弱

### 第五十八章 祸起萧墙

尽管这场政治闹剧仍然在巴塞罗那上演，自由主义运动的作用却微不足道。由于对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看法不一而导致分裂，它失去了影响事态发展的团结和力量。

一九三八年早些时候，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因塞贡多·布兰科接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担任教育部长而重新加入政府时，以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书记为首的全国委员会流露出很大的希望。它在四月八日向地方工会发出的一份通报中断言，通过与内格林政府合作，全国劳工联合会可以恢复一九三七年五月失去的政治地位并且结束对自由主义运动的镇压。它要求所有积极分子遵守纪律接受政府的决定，这些决定可能显得“束缚手脚或独断专行”，但是，鉴于严峻的军事形势，它们都是必要的。虽然全国劳工联合会只有一个部长职位，它声称，这是为了“安抚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防止法国关闭其边境不许战争物资通过。

全国委员会越来越包容的倾向与自由主义运动中更加激进的精神氛围发生了冲突。结果，全国委员会决定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主要喉舌《工人团结报》负责人哈辛托·托里奥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在没有经过任何程序的情况下于五月七日突然解除了他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以来就担任的这个职务。托里奥进行了激烈的反击，他痛斥“所谓上级委员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冷漠”对待逮捕无政府工团主义积极分子和破坏全国劳工联合会最好的集体农庄的局面。他说，《工人团结报》受到“无法忍受的”审查，并且在什么也没有做的情况下被这些委员会以“阻止政府采取不公正措施”为借口停刊没收。因此，为了让自由主义运动了解真实情况，他在四月三十日决定把经过删改的文章校样发给各个工会组织，以使它们能亲眼看到，“报纸的问题是它无法控制的外力的结果”。他说，这是他被“突然解除”报纸负责人职务的原因。

罢免托里奥之后，《工人团结报》采取了一种无条件与政府合作的政策，但它表现

得绝不像马里亚诺·巴斯克斯的导师、全国劳工联合会前任书记奥拉蒂奥·M·普列托那样一反传统。奥拉蒂奥·普列托宣称，不问政治的倾向寿终正寝，自由共产主义只是一个未来的目标。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负责人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认为奥拉蒂奥·普列托是一个“道德非凡、天资聪颖的人”，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最有头脑的人之一”，但是，他“对我们的运动是危险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奥拉蒂奥·普列托推动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了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在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发起的用一个国防委员会取代中央政府的运动，强烈要求代表们“抛弃诸多顾虑、诸多道德和政治偏见、诸多夸夸其谈”。如今，他认为曾经是自由主义运动神圣的意识形态领路人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只是一个“幻影，一个口号，一种革命幼稚病的特殊形式”，并且指责它言行不一。他说，它为“无产阶级武装”和“控制经济”辩护，成员当中既有军官也有监狱看守，基层国家机关中有它的代表，但在承认这一切的同时，它认为它“因没有加入政府得以保持自身的纯洁”。他还批评一九三七年七月召开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建立“一个新的机构”的决议只是“一个含糊不清的东西”，并且指责半岛委员会因“智力低下和精神虚弱”而否认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政治性”。他坚持认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应当成立一个自由社会主义政党以便加入所有国家机关。

八月危机期间，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试图通过劝说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让塞贡多·布兰科退出政府来维持它那受到严重削弱的权威，但没有奏效。信仰坚定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他们坚持在政府中保留一个不起作用的部长，没有人与他商量或者告诉他利益攸关的事情。……[那些]自以为是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不顾他们受到的所有羞辱坚持自己的主张。”

尽管根据塞贡多·布兰科针对自由主义运动的批评所做出的多少有些自辩性的反应判

断，他似乎作了某种保全面子的尝试，反对将战争工业、港口和法院军事化的法令，但是，他没有成功，因为，正如阿萨尼亚在日记中简单明了地指出的那样，“内格林制服了他”。这是可以预料的，因为布兰科不是一个具有坚定的无政府主义信念的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说他只是“又一个内格林的人”。此外，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在三月份与共产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签订联合协议时，它已经主动承认了政府的最高权力和权威。因此，它不可能轻易转变立场，所以，它在公共场合对这些法令保持沉默。正如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胡安·戈麦斯·卡萨斯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沉默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签订的协议“为政府鲸吞一切和中央集权的各种心血来潮开了绿灯”。在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方面，半岛委员会谴责政府的三项法令“侵犯了人民取得的民主成果”，这些成果是“防止公然走向一党专政的最低保障”。

加泰罗尼亚地区陷落两个月前，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日至三十日于巴塞罗那召开的自由主义运动全国大会上，两派之间的根本分歧激烈爆发。经历过布尔什维克革命并且见证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毁灭的美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她阅读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预先准备的材料，材料“表明，它反对内格林政府逐步蚕食自由主义运动成果，并且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怯懦立场持批评态度”。然而，戈德曼不想根据一面之词作出判断，她用很长时间倾听了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书记的解释。“我意识到，”她当时写道，“他与半岛委员会的同志们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我对争论双方同志们的个人诚信不可能有须臾的怀疑。我发现他们全都具有优秀的品质、发自内心的真诚和投身斗争的激情。当然，他们的性格差异肯定对这场争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巴斯克斯同志粗暴的方式和吼叫的声音容易激起对立情绪。最初，在我了解了他的粗鲁外表背后的真诚和优良品质之前，我自己对它们也很反感。……[伊比利亚无

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同志们]准备了一批令人叹服的文件材料，有力地证明了某些针对自由主义运动成员的暴行。……我必须承认，我们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同志的批评和要求有充分的理由。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自己像一只守护着它的小鸡的母鸡一样。我为他们担忧。”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奥拉蒂奥·普列托和马里亚诺·巴斯克斯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佩德罗·埃雷拉使大会充满了火药味。根据何塞·佩拉特斯在他那两部关于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著作中使用过的没有公开发表的辩论记录，普列托“毫不掩饰地”采取了一种“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立场，他“傲慢地贬低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并且“断言真正有效的行动”只可能来自“权力机构”。最后，他宣称，自由主义运动所犯的误差是“幼稚”以及“缺乏具体计划”造成的。

巴斯克斯同样吹毛求疵：“为了在未来掌握控制权，我们必须抛弃我们的经典和哲学包袱。我们现在[在军队中]几乎没有掌握任何职权的原因是我们的同志拒绝接受[民兵武装的]军事化。……如果听从政府的指导，集体农庄的情况应当更好。它们已经得到了八百万比塞塔的贷款，贷款会比我们的同志决定利用的多得多。”接着，巴斯克斯为内格林政府“勇敢地对付共产党”及其军事上的成功进行辩护，他声称，没有人能够取代内格林。佩拉特斯讽刺地说：“以巴斯克斯为首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像蚂蟥一样吸附在内格林一伙身上。”“[在]那时，”戈麦斯·卡萨斯写道，“[巴斯克斯]已经远远偏离了他担任建筑业工会书记时所曾采取的立场。政治合作对他产生了某种毁灭性的影响。”

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在大会上对无政府主义者所推崇的信条的抨击激怒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代表佩德罗·埃雷拉，他立即进行了反击：“我们必须挫败那些贬低我们的原则的人。那些没有思想的人不应成为我们运动的领导者。……仍以身为

无政府主义者而自豪的人们肯定不会贬低这些人所谓的‘哲学包袱’和‘过时经典’。如果某人贬低我们的信条的话，……他就应当离开我们。……内格林的政策不值得我们信任。我们不止一次表示了对它的担忧，但是，没有人倾听我们的意见。……我们一刻也不应当忘记我们真正的革命目标。”对于有人提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加入政府机构以便消灭它”的建议，另一名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代表回应说：“这等于说，为了消灭卖淫嫖娼，我们应当把妻子和恋人送进妓院。”

尽管他们坚持认为与政府合作是一项丧失原则的政策，但是，这种异议对大会的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最终，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重申，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承担“间接政治合作”的义务。

不应使读者误以为巴斯克斯及其全国委员会的支持者有意与内格林和共产党人生死与共。就连陶里亚蒂都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莫斯科的信中说：“不幸的是，我党无法从内部直接影响无政府主义工会组织。……巴斯克斯的团体决不希望把它与我们联系起来，以免被人指责为共产党工作。”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成员费德丽卡·蒙特塞尼认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内格林政府的支持正在导致一场“灾难”，她为巴斯克斯的立场寻找理由时说：“马利亚诺认为我们应当继续抵抗，因为他觉得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这将造成一种有利于我们的形势。即使他在这个问题上与内格林和共产党人看法一致，那也不表示他向他们屈服了。……直到今天我仍在自问，究竟谁是正确的：是我们，还是他。如果世界大战不是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而是在年初爆发，马利亚诺的地位将会得到彻底的挽救。然而事实却是，西班牙人民当时再也无力抵抗，因此，任何旨在挽救人民的生命和利益——至少是最低限度的人民利益——的解决方案看上去都像是一次集体救赎。多么不可思议呀！在那些日子，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阿萨尼亚和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他们的看法竟然一致。”

自从内战爆发以来，自由主义运动为了生存必须参与权力的争夺，可是，这样做又必须否定神圣的无政府主义原则，陷入这种难以化解的困境后，运动内部逐步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分歧。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的自由主义运动大会上发生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上层领导人之间的那场争论，并不能使这种矛盾和分歧表现得更加引人注目。但是，在内战进行了二十八个月之后的今天，在代表半数工人阶级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持续衰落的今天，对于运动的普通成员来说，教条之争已经明显变成了空谈。“饥寒交迫的人民在心理上越来越厌倦战争。”佩拉特斯写道，“为了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必须通过将内格林解职导致根本的政治变化。”阿瓦德·德·桑蒂连写给我的下面几行文字表明了对于总理的敌意：“[如果]战争由内格林及其政府的同伙来结束，我们肯定将被打着共和国旗号而不是打着法西斯旗号的人所消灭。”

当然，不可能解除内格林的总理和国防部长职务，这不仅因为自由主义运动内部意见分歧，而且因为社会党人虚弱无力——社会党及其工会组织不可挽回地分裂成为敌对的派别；因为中产阶级的共和派政党苟且偷安，软弱不堪。内战进行了两年多以后，最大的中产阶级党派左翼共和派的喉舌《政治报》承认：“中产阶级……已经靠边站了，他们在战争中被淘汰出局并走向毁灭。他们只能怪自己，因为他们没有设法建立一个足以保护他们生存的组织。”的确，共和派中产阶级名义上的领导人阿萨尼亚拥有解除内格林职务的宪法权力，但是，据佩拉特斯说，当一个拜访他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代表团极力劝说他“除掉这个独裁者时，……他立即吓得魂飞魄散”。

不管怎样，谁可以取代内格林？哪一个重要的共和派人士或社会党人享有莫斯科和西班牙共产党人的信任而且愿意接受这个并不令人羡慕的任务，像斯大林希望的那样把战争进行到底？左翼共和派领导人、阿萨尼亚的好友何塞·希拉尔像总统本人和



社会党领导人胡利安·贝斯泰罗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一样，只想通过谈判结束内战。至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当一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请求他与“政治上诚实可靠”的人们一起“增强”政府的权威“……以免输掉战争”时，他答复说，他们是在请求他去参加一个“葬礼”，所以他不能去。他告诉他们，战争已经失败了，他们像他一样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也帮不了什么忙，“事情毕竟已经发生，与内格林和家伙一起分担灾难责任的时候就要到了”。

值得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情况作进一步考察，不仅因为它可以使人了解内战最初十个月共和派阵营中最显赫的政治人物的个人悲剧，而且有助于说明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严重分裂的程度。一九三七年五月被赶下台继而报纸被没收、所有职务被剥夺之后，他拒绝与对手合作并且拒绝参加西班牙社会党或劳动者总工会的任何正式活动。他说：“新出炉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设宴招待各国代表，给我送来了一份请柬，我没有理睬。难道他们认为请我赴宴吃饭我就会忘记他们对我做的那些事情吗？面对美味佳肴，觥筹交错（cuchipandas）之间我将会是什么心情？我要求的是尊严，他们要的是得意和傲慢。”另一次，执委会的几名成员邀请他在西班牙社会党成立纪念集会上发表讲话以“显示党的团结”。“我对邀请表示意外[并且]告诉他们我不能讲话，因为，在谈论党的历史时，我将不得不谴责政府现在的丑恶行径，并将不可避免地把政府总理斥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不和的制造者和共产党的支持者。此外，在我可能发表讲话之前，他们必须收回所有针对我的蠢话和谎言，以使我们看上去不像鲜廉寡耻或者丧失尊严的人。”第二天，卡瓦列罗给组委会寄去下面这封信，确认他不参加集会并且进一步说明了原因：

有些人可能已经忘记……我是一八九三年三月入的党，也就是说，四十五年零五个月前。我加入劳动者总工会时间更早，是在一八九〇年，四十八年之前。我没有把这当做特别的功德说起过，但这表明我从不是一个消极的人；从我加入的第一天起，

我就把整个生命献给了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事业。两个组织都把我安排在责任最重大的岗位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的行为从来没有受到过指责。尽管如此，尤其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由社会党执委会引发的那一场政治危机以后，在共产党的大力协助下，该执委会所控制的社会党的主要报纸最近开展了一场针对我的诽谤宣传。在西班牙劳工运动的历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如果特定报纸的文章或者官方在集会和会议上发表的正式声明或演说可信的话，我就是个破坏纪律的人，一个麻烦制造者，一个不合格的社会党人，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一个企图分裂社会党和工人阶级的阴谋家——简直就是一个叛徒。

几个月来，我一直默默地忍受着这些侮辱和诽谤，接着，当我终于决定公开出来说话时，我被允许举行了第一次公众集会，因为有人预料它将以失败而告终；但是，由于结果恰恰相反，某个得到执委会支持的社会党人政府部长禁止我继续发表讲话。我甚至受到限制不许离开我的住所，以防我与社会党人接触。此外，在警察和突击卫队的协助下，反对这样滥用职权的社会党报纸和组织被强行接管。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我被随意解除了劳动者总工会书记的职务，我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被一致选为劳动者总工会书记的。我还被解除了社会党少数派议员团主席和议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对我采取的是一些只能对不合格的社会党人采取的措施。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社会党人吗？这么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情竟然是在我不能参加的情况下策划的。另一方面，如果我是一个应当受到党的领导阶层信任的优秀社会党人的话，那就对外公开声明这一点并且预先纠正针对我的诽谤宣传。……

你们可以发现，问题比乍看起来更严重。……由于这些原因，而且由于我可以列举的许多其他原因，我必须真诚地对你们说，我不能参加你们计划举行的集会。此外，

我确信，我的缺席决不会对战争的进程有任何影响。

共和派人士、社会党人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政治上的无能为力使他们更加灰心丧气，同时加深了他们对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敌意。他们的反抗在受到严重删改的报纸上似乎始终不太明显，不过，这却是党派和工会地方组织无法回避的谈论话题。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中，陶里亚蒂提到“[一九三八年年中]大部分共和派、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越来越强烈的敌意”，同时强调了“共产党是唯一一个真心实意支持内格林的政党”这一事实。就连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那样小心谨慎的内战编年史作家也不打算掩盖这种敌意的普遍程度。他写道，批评内格林的人声称，他与共产党人有一个秘密协议，因此，他为他们效力，“全然不顾公共利益。……据[他的]反对者说，他的行为完全像一个独裁者，他在每一次危机中想方设法吓唬阿萨尼亚，扼杀其意愿，让其重申对他的信任。议会仍然存在，只是简单地按照宪法程序召集开会，但它无法鼓起勇气否决内格林的权力。……内格林的政治对手说，他的力量根本不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他持续掌权应当归因于他的独裁手段。他严重依赖共产党人控制的军队”。苏加萨戈伊蒂亚还在后面接着说：“共和派被激怒了；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同样被激怒了，社会党中有一个决非无足轻重的派别愿意支持任何旨在击败内格林的行动。他们憎恶他的政策，指责那是共产党的政策。”

如果这是一九三八年年中巴塞罗那的气氛的话，那么，马德里的气氛怎么样？据何塞·希拉尔说：“马德里的风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致到了必须制止人们断绝与共产党人的所有关系并且不许他们宣称自己是共和国的敌人的程度。这种印象普遍存在，从中部地区过来的部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

现在，相互之间的分歧非常明显，以致就连内格林在国外的主要宣传人员都无法掩

盖。路易斯·费希尔一九三八年八月写道：“有些社会党人指责共产党人想要控制所有职位和宣传工作。共产党人则指责社会党人做的太少抱怨太多。事实是，共产党人积蓄力量的做法以及他们的纪律性可能具有令人讨厌的副作用。作为一个中间党派，社会党人被夹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与共产党人之间。对两边都不喜欢的那些人不是闷闷不乐，就是希望有一座与他们以前谩骂的无政府主义者沟通的桥梁。”

鉴于共和派阵营内部不和这种状况，有什么迹象显示了内格林作为一名政治家颇为自负的才能吗？因为与共产党站在一边，他无法缓和人们的悲观情绪，在自己的党内也得不到信任。“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说，”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写信告诉他的女儿，“无论我们失败还是赢得内战，独立的社会党人都将被迫移居国外，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将被佛朗哥杀害，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将被共产党人杀害。”受人尊敬的社会党右翼领导人胡利安·贝斯泰罗留在马德里置身于党内斗争之外，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宣称：“如果我们赢得内战，西班牙将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整个民主世界将敌视我们，我们只能依靠苏联。……如果我们被打败，未来将是可怕的。”

甚至早在五月份，内格林的“民族团结政府”组成仅仅几周后，热情之花就承认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争论”，她表示，“我们两党真诚地努力结束争论”至关重要。尽管热情之花作出这种规劝，两党的关系仍然持续恶化。她在自传中记述说，它们一天比一天更难以相处。“社会党领导人，包括那些倾向于与我们达成谅解的人[例如党的书记拉蒙·拉莫内达]，完全拒绝参加两党协调委员会会议。与社会党领导人的联系减少到与拉莫内达的几次会谈，……他以种种借口反对任何联合行动。”

拉蒙·拉莫内达是一个无人能比的机会主义者，自从一九二一年以来，其政治效忠对

象就在西班牙社会党与西班牙共产党之间变来变去。他的冷淡态度表明，共产党人的影响力在一九三八年秋天明显衰落，这不仅是由路易斯·费希尔委婉地称之为他们“积蓄力量的做法以及他们的纪律性”造成的，而且是由战争的灾难性进程造成的。

他们前景黯淡的另一个迹象是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JSU）越来越激烈的内部斗争。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由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青年运动在内战爆发之前合并而成，两年来，它是共产党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正如前面某一章所提到的那样，双方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一致同意，在一个统一的全国代表大会以民主方式确定统一组织的原则、纲领和最终的组织形式并且选出一个领导机构之前，合并以共产党的青年组织成员加入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的形式进行。但是，根本没有举行代表大会。作为替代，合并后的青年组织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和另外一些青年社会党人加入了共产党——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他不仅指定了代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地方组织参加会议的人员，而且指定许多来自前线和工厂的年轻共产党员参加会议。这是他要的一个花招，使他可以确保大量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在全国委员会和执委会的选举中当选。“共产党人没有举行代表大会，”来自阿利坎特省的代表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写道，“而是玩弄‘骗局’召开了所谓巴伦西亚会议。他们竭力把它说成一次‘民主’的统一代表大会，但是事实完全相反。”埃斯克里瓦诺还在内战结束以后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由于两个原因，我们这些忠于卡瓦列罗的人没有在会议上提出任何异议，现在看来都是因为缺乏经验造成的，尽管当时无可非议。这两个原因是：1.参加会议的社会党青年代表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不知道卡里略、莱恩、梅尔乔和奥罗拉·阿奈斯等人全都投靠了共产党。我们以为他们还是青年社会党人。……如果我们知道这一伙懦夫已经背叛了我们，我可以向你保证，出现的情况将完全不同。2.会议的气氛和形式出乎

我们的意料，当我们打算作出反应时，会议已经接近尾声。”

尽管如此，两名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坚定支持者、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巴伦西亚省委书记何塞·格雷戈里·马丁内斯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阿斯图里亚斯地区书记拉斐尔·费尔南德斯仍然拒绝接受为他们在全国委员会中安排的职务；接着，没过多久，阿利坎特省的代表埃斯克里瓦诺在痛斥其他成员屈服于共产党人之后从执委会辞职。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初西班牙共产党的影响和权力急剧增强期间，表示异议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趋于沉寂。“战争为掩盖最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最严重的政治灾难提供了有效的烟幕弹。”埃斯克里瓦诺写道，“如果有人试图发表反对大规模政治迫害的意见，他将被以破坏战争努力为由剥夺权利。对于进行大规模迫害来说，战争是一个多么便利的机会啊！……为了理解许多真正的青年社会党人为什么没有在这个统一组织诞生的那一刻就毁掉它，强调这一事实非常重要。”不过，在穆尔西亚，据陶里亚蒂说，分歧已经相当严重，以致出现了两个对立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班子：“一个由卡瓦列罗派组成，以青年之家为总部，另一个由共产党人组成，在党的机关里办公。”

随着对西班牙共产党的敌意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愈演愈烈，越来越多持不同意见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成员试图恢复社会党青年运动以前的政治组织，尤其是在阿利坎特、哈恩、穆尔西亚和巴伦西亚几个省。对于组织分裂的危险，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的喉舌《现在》几乎不作任何报道，可是，它对“团结的敌人”越来越频繁的抨击以及“没有人能够分裂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因为]六十万联盟成员将阻止它”的警告却暴露了持不同意见的联盟成员所造成的威胁。对他们的活动感到担忧的卡里略企图“通过许以军队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官职的方式收买引人注目的反对派首领”，但是他没有成功。一九三八年十月，尽管共产党人从前线召来一些党员显示了他们的军事实力，社会党人仍然在哈恩省选出了一个

新的省委。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的一封打印了三十七页的致美国社会党领导人诺曼·托马斯的信中，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描述了西班牙共产党的称霸野心，他写道：“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JSU）中，或者像某些幽默作家称呼的那样，在‘苏化青年团’[一出关于苏联的戏剧的名称]中，对共产党人发展党员有强烈的反应，在一些省份，青年社会党人已经将骗人的‘统一’二字从他们的组织名称中去掉，恢复了以前的独立性。”

不过，对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层的最大威胁却在社会党左派的堡垒马德里出现了。将近一九三八年年底时，一个“青年社会党人委员会”成立了，由马德里省省长何塞·戈麦斯·奥索里奥的儿子苏格拉底·戈麦斯任委员会主席，安东尼奥·埃斯克里瓦诺任书记。为了躲避危险，圣地亚哥·卡里略把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转移到了马德里，他试图重新控制社会主义青年运动但没有成功。这也许可以解释他在加泰罗尼亚地区陷落之后为什么没有返回中部地区。十一月，青年社会党人委员会在马德里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几乎每个省都派代表参加了。埃斯克里瓦诺证实，一些代表要求立即断绝与共产党人的关系，重新建立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但是，因为当时敌军正在进攻加泰罗尼亚地区，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与此同时，看到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即将发生内部分裂的拉蒙·拉莫内达在一九三八年秋天成立了一个隶属于执委会的青年书记处（Secretariado Juvenil），还任命了一些省份的青年书记，希望在反对派获胜的情况下能够获得重新恢复的社会党青年运动的控制权，不过，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陷落及其本人逃往法国使他在在这方面所抱有的无论什么期望都即刻化为泡影。

由于这些证据令人信服地表明人们对西班牙共产党的敌意愈演愈烈，因此，没有必要再向那些前著名共产党人——他们的著作列在共产党的忠实信徒及其辩护士的参考书目上——的说法寻求证实。但是，完全无视他们的说法就等于向那些把所有不

符合党的路线的著作排除在内战史书之外的人让步。《西班牙共产党与苏联的斯大林反对派》就是这样一本不符合党的路线的书，它的作者是二战之后从苏联逃出来的著名共产党民兵指挥官巴伦廷·冈萨雷斯（绰号“农夫”）。尽管像无数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一样存在着许多不确和曲解，它仍然包含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价值的资料，我们应当予以记述。

（我对这本书的引用曾经受到著名作家和西班牙内战评论家赫伯特·R·索思沃思的批评。著名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回应索思沃思的批评时说：“索思沃思先生对于证据非常挑剔。他拒绝考虑前共产党人所说的一切，也拒绝考虑其他任何与被认为参与了‘冷战’的西方组织‘有关’的人所说的一切。冷战在这里照例指的是发表令苏联领导人不快的意见或是讲述令苏联领导人不快的事实。所有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关注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当涉及有争议的问题时，……某些背叛者提供的材料是虚假的；任何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非常谨慎地从事。另一方面，不能因为这个或者那个见证人本人的立场否认其证词的真实性，甚至不能因为他们自身存在的缺陷否认其证词的真实性。我们也不排斥那些总是把自己美化到超出我们可以接受的程度的人——否则的话几乎要把整个人类排除在外。即使不是如此明显地偏袒一方，索思沃思先生的标准也可以使他以坚持绝对准确性为借口把所有他不愿意考虑的人排除在外。”）

关于一九三八年四月组成的第二届内格林政府，“农夫”写道：“从那时起，前线和后方的士气持续低落，我们的败仗一个接着一个。……人民群众对于共产党人的仇恨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以致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一位党的领导人不得不宣称：‘我们不能后退。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权力，否则的话，我们将像猎物一样在大街上被人追杀。’”



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共产党人不得不越来越依靠他们的军队和警察。在前线，诱骗、胁迫和暴力手段日甚一日。“成千上万我们的同志承认，”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十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与被对面的敌人打死相比，他们[在前线]更害怕被自己这边的对手杀害。”在世界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大本营斯德哥尔摩发布的一份报告也宣称：“不能仅仅因为反法西斯军官和士兵属于工人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就杀害他们……否则的话，群众要问，内格林政权与佛朗哥手下的法西斯政权有什么区别。采取这种手段不可能不使士气低落道德败坏，不可能不损害人们的斗志。”

生活在被暗杀于前线的恐惧中的不仅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且包括所有不服从共产党的意志的人。由于一个持不同意见的青年社会党人小组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散发了一份拒绝接受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路线的报告，前线枪毙的青年社会党人“不计其数”，另外还有“许多”社会党人被监禁、被降职或者失去了担任政治委员的可能性。苏加萨戈伊蒂亚告诉内格林：“我们的同志正在前线被杀害，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党证。”前线的青年共和派人士也逃脱不了这种恐惧。据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说，为其“受迫害的成员”寻求保护的共和派青年运动领导人前往他的指挥部，要求允许他们加入他当时正在组建的第二十四军。“他们在一次来访时交给我一份发给共产党某个旅的……旅长或政委的‘机密’文件的副本，文件说，必须清除那些反对共产党权威的人，如有必要，甚至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在威胁和恐惧笼罩着前线的同时，对军事调查局和秘密警察的畏惧使大家噤若寒蝉，几乎听不到一点批评。从这时起，在共产党的宣传和苏联物资的支持下，内格林成为抵抗的象征。受运输条件和斯大林不要在内战中陷得太深的决定限制的苏联援助以下列信念为前提：英法两国最终将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被迫干涉，而西班牙内

战最终将成为一场西欧和中欧的全面战争的一部分。“如果战争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的话，[莫斯科]将通过各种方法努力避免被孤立，争取迫使西方民主国家与希特勒开战。”共产国际顾问鲍里斯·斯特凡诺夫告诉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

一九三八年五月，与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保持一致，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国际的喉舌《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的一项决议中宣称：

西班牙共和派每天都在赢得同情和声誉。我们的斗争正在调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民主国家和自由力量。我们的抵抗正在激励大不列颠、合众国、法兰西等国自由民众的决心，为反对正在把[世界]推向战争的法西斯的野蛮暴行共同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共产党再次证明了它对具有民主特征的西班牙革命的立场，它还谴责一切危险、激进的冒险试验，这些试验只能……妨碍巩固和加强民主的成果。我们正在为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战，它建立在人民的意愿和人民军队的基础上，它保证所有反法西斯的党派组织自由开展政治活动。

## 第五十九章 人民在为什么而战？

与其迎合西方民主国家的政策一致，内格林政府努力争取外国资本的支持。

四月二十七日，它颁布法令解散了加泰罗尼亚电力联合会，该联合会根据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倡议成立，目的是要控制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开办的外国水电公司。根据这项法令的规定，所有公司将恢复企业法人（personalidad propia）的地位，以便将其归还以前的所有者。同时，解散革命初期成立的工人委员会，并向每个企业派遣一名政府审计员（interventor）。“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组织强烈抗议对[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一九三六年十月批准的]集体化法令的这一肆意侵犯。”无政府工

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写道，“加泰罗尼亚的一些政治团体也提出抗议，它们认为这是中央政府对加泰罗尼亚自治权的干涉。”

这项法令“表明，”《纽约邮报》驻巴塞罗那通讯记者写道，“政府开始采取严厉措施安抚外国大资本家，从而把对英法两国外交政策具有巨大影响力的重要财团争取过来。”但是，由于相信佛朗哥将军将会赢得最终胜利，有关企业对这种姿态视而不见。基地设在多伦多、以加拿大人而著称的国际大型企业巴塞罗那牵引、照明和动力公司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拥有埃布罗河灌溉和动力、巴塞罗那电力公司、埃勒克特拉·罗伊森斯、塞格雷水电、曼雷萨电力和城市照明等企业，内战刚一爆发，它就将总部迁往民族主义者控制区的萨拉戈萨。巴塞罗那的公司经理弗雷泽·劳顿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写信告诉伦敦的一位公司管理人员H.马尔科姆·哈伯德：“这里的情况看上去正在日益恶化；目前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在公司业务和私人生活方面遇到各种可以想象的困难。”如今，佛朗哥将军的胜利近在眼前，四月二十七日颁布的法令不大可能诱使他返回巴塞罗那。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土地与自由》没有明确提到这项法令，它警告说，只有承认工人阶级是“最重要的因素”才能激励“争取胜利的士气”；“企图以任何借口夺走[工人阶级]最想要的东西……废除[他们]首要捍卫的东西”就是“彻头彻尾的疯狂。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在西班牙的历史上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开辟了……通往解放的道路。……通过创造试验各种社会主义化的新形式，它利用生产资料开创了一个历史新纪元。当我们谈论争取胜利的士气时，我们想到的是工人群众。夺走他们的革命成果——这些成果增强了他们的斗争意志，使他们加倍努力，为捍卫自由战无不胜——严重打击了他们的士气，这样做难道不是太荒谬了吗？”

在尝试对外国资本进行安抚的同时，政府的审计人员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废除一些西班牙企业的集体化并且使其国有化。这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埃斯塔尼斯劳·鲁伊斯·庞塞蒂手下的经济部门在加泰罗尼亚工业化地区的有限范围内所倡导的一种政策。此外，另一些企业被物归原主。《工人团结报》指责“鼓动这一趋势的人”缺乏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那种“慎重态度和责任心”，他们企图“恢复某些特权，甚至建立一些新的特权”，并不担心这将影响成千上万工人和战士的士气。尽管只有部分企业物归原主，但是，因为许多所有者已被枪决或是在内战爆发时逃往民族主义者控制区，所以，共产党控制的对外报道审查人员允许外国新闻记者对少量物归原主的情况作大肆渲染。

“如果共和派确实像其敌人称呼它的那样曾经是‘赤色分子’的话，那么，”《纽约邮报》的记者写道，“将工厂和矿山物归原主的壮举无疑表明，这个标签如今不再适用了。实际上，许多工业资产从来没有被集体化，它们一直以私有私营的方式运转。还有数以百计曾在内战初期被工人苏维埃接管的其他企业已物归原主。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我，剩余的企业最终也要‘废除集体所有制’。这位官员声称，内格林政府已经变得比阿拉贡攻势之前的那个政府更加保守，更加倾向于资本主义，因此，他断言，内阁未来发生的变化甚至可能使它进一步右转。这位官员没有接着说下去的是，政府废除集体化具有某种政治动机。由此表明，对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利益来说，共和派政府不是一个‘赤色’政府。”

这篇文章显然是官方的消息提供者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授意发表的，因为，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卡多纳·罗塞利的话说，实际归还的资产数量“微不足道”，但是，收回工人革命成果的威胁加上中央政府并未颁布任何使革命成果制度化的法律足以在自由主义运动的普通成员当中引起疑虑和不安。自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胡安·内格林以财政部长的身份签署法令要求集体化的工业企业向国家缴税却

不给予它们合法地位以后，这种威胁就凸显出来。

尤其是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一日颁布的对战争工业实行军事化的法令所造成的威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军事化的可恶程度丝毫不亚于国有化。尽管所涉及的工厂被工人委员会实行了集体化，工人委员会对工厂的占有后来也因自治政府一九三六年十月颁布集体化法令而合法化，但是，这种方式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央政府的承认。“[军事化法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佩拉特斯写道，“根据政治标准委派专业技术人员，同时建立一个由监督和顾问组成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其中有许多苏联人，他们听命于一个政党，它的指示不容质疑。这种情况必定产生可怕的后果：工人的士气逐渐低落，因为他们失去了控制权，真正的专家被专门诱使他人改变政治信仰的人取而代之。所有这一切均对生产造成了某种不利的影响。”他在同一本书的后面写道，这项法令是由一个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参与其中的政府颁布的。“即使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高层领导人表示了他们赞成的意见，普通会员也不会同意，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工人当中存在着坚决反对交出战争工业的意见。”

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召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大会的一份简要的会议记录上，可以发现这种反对意见的痕迹。在这次会议上，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代表担忧地表示，由共产党控制的负责武器装备的国防部副部长接管战争工业将导致全国劳工联合会被劳动者总工会所兼并，因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所掌握的工厂和车间的管理权将被“解除”。这位代表说：“这一切都得到了全国委员会的默认！我们必须发出警告，这是通往地狱和灾难之路。”

要把一些企业物归原主的消息同样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工人群众心神不安。《土地与自由》发表的一篇冠以大字标题《人民在为什么而战？》的文章宣称：“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西班牙人民不愿意重归一九三六年七月

灭亡的那个政权的统治。尽管有人为了安抚国际上的反动派和被剥夺了特权的 social 阶层，为了损害我们的斗志和夺取胜利必不可少的牺牲精神，说的是完全相反的话，做的是刹住前进车轮的事。”

显然，革命未来前途的捉摸不定让工人群众忧心忡忡。“我们曾经抵制为了得到外国援助牺牲我国人民最重要和最宝贵的革命成果——必须作出这种假设——的倾向，认为那是一种极其有害的错误做法，或者更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策略。”《工人团结报》写道。它在另一期报纸上写道，这种牺牲将“直接瓦解后方的斗志，随后使前线的士气一落千丈。这就等于告诉战士们，他们应当抛弃最重要的战斗理由”。

对于那些把西班牙内战基本上描绘成为一场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冲突的历史学家（以及像亚伯拉罕·林肯旅的老兵那样的当代政治活动家），无论他们完全理解还是故意歪曲共和派阵营内部斗争的真正性质和苏联干涉的实际目的以及摧毁了一九三一年建立的共和国的那一场地震式革命的影响范围，此时提出“人民在为什么而战”这个问题正合时宜。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这场革命就深度和广度而言并不是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件大事，而只是一个可悲的现象，用这一流派的典型代表安赫尔·比尼亚斯的话说，它“严重损害了共和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对共和国及其外交政策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九七九年比尼亚斯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斯大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政策对于“控制革命”、“全力以赴”进行战争、“改善共和国在英法两国政府眼中的形象以使它们即便不直接干涉也将对共和国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非常重要。最终，他接着说，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可以肯定，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那一封著名的信证明了这一点。……与学术界当前流行的说法相反，我不认为这意味着苏联干涉共和国的内部事务，也不认为它引起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反

感。至少，这没有得到文献资料的证明。不过，回到革命的话题上，它的爆发确实无法避免，这决定了共和国的命运。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满怀热情投入了战争，只要有革命，就会有热情。当革命受到控制时，许多防线的热情衰退了。综合考虑所有因素之后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归根到底不可能依靠一场革命赢得战争。”

由于比尼亚斯的陈述含糊其词，因此，通过引述费尔南多·克劳丁的分析著作《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的部分内容澄清一些问题至关重要。直到一九六四年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分道扬镳为止，克劳丁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是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他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中写道：

如果战争只是一项技术工作和军事任务，那就很难挑剔指责西班牙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三位一体对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所起的作用。……西班牙共产党关于“我们若不赢得战争就不可能进行革命”的论点本身意义明确，但另一个总是伴随着前一个论点的关于“我们赢得战争之时已经取得了革命胜利”的论点本身则含糊不清，因为……共和派阵营的每一个政党和工会组织都有自己的“革命”概念。

……

共和国的整个未来将严重受制于内战期间占上风的社会形态和政权类型。由西班牙共产党建立的军队、共产国际和苏联援助基本上服务于两个政治目标：军事抵抗叛乱分子，同时保证资产阶级共和派可以接受而且相信“西方民主国家”也可以接受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占据优势。但是，在实现第二个目标的过程中，西班牙共产党建立的军队、共产国际以及苏联与革命现实和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发生了冲突，后者将这种现实视为他们最伟大的成就。这一冲突必然削弱共和国的军事力量。两个政治目标……不是相辅相成而是相互抵触。第二个目标损害了第一个目标的积极作用。……

一九三七年头几个月，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人认识到，他们顺应莫斯科的路线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态度并不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这导致了革命最初的“无产阶级内涵”持续萎缩，同时使西班牙共产党、社会党改良派和资产阶级共和派在政治军事格局中的力量不断加强。……

像西班牙革命这样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不是果断地向其最终目标前进，就是同样果断地后退并以反革命而告终。早在法西斯军队攻占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之前，反革命力量已经在共和派控制区悄悄地建立起来了。内战拖延的时间越长，随着接踵而来的地方失守和人员牺牲，军事力量的对比将变得对敌人越来越有利（因为他们从德国和意大利得到的援助比共和国从苏联得到的援助多得多），失败主义和绝望的情绪也将在城乡各个阶层的小资产阶级当中更加普遍地到处蔓延，并且影响无产阶级群体。阿萨尼亚和普列托的投降主义政策具有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共产党人所主张的抵抗到底则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西班牙共产党不顾一切地试图控制不断恶化的形势，但是，无论宣传还是它为加强军队或武器生产而采取的各种措施，都无法填补人民失去革命热情而留下的真空——在内战初期，这种热情是人民群众斗志高涨的决定因素。

接着，克劳丁提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它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内战结束之前不久西班牙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士气低落的征兆。在描述了无产阶级最激进的一部分成员感到被拒绝、被背叛以及共产党内部“在乐观的外表掩盖下的怀疑和犹豫”之后，他继续写道：“[党内]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反对与资产阶级共和派和社会党改良派领导人结盟的政策，而且有人表示，对党来说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是把战争的指挥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倾向都与一种拥有广泛党员基础的认识有关：寄托于‘西方民主国家’援助的希望已被证明完全是幻想。”



无论这种背离主流的倾向——它反映了党内不断增长的怀疑情绪——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其影响力绝不足以使党的政策发生变化，陶里亚蒂也迅速纠正了这种倾向。他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反对我不得不经常采取的立场的人倾向于认为，只要把所有权力掌握在党的手中，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因此应当抓紧时间这样做。对于发动一场完全由工人阶级参加的运动的想法，佩佩[党的总书记何塞·迪亚斯]也曾拿不定主意。不过，这种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

尽管存在这样的证据，多年之后热情之花在接受采访时却坚决否认党内曾经出现过任何背离主流的倾向。她说：“我们在内战期间从来没有提出过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只提保卫共和国和民主政府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党内没有任何犹疑。”不过，当马德里的《工人世界报》——巴塞罗那的共产党政治局对它的监管不太严格——大胆地发表意见时，背离主流的倾向短暂地公开表现出来：“我们不能像另一份报纸那样说：‘唯一可能对西班牙有利的战争结果既不是法西斯主义获胜，也不是共产主义获胜，因为法国不希望那样。’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反对我们，西班牙人民将取得胜利。”政治局的回应是明确的。肯定是由陶里亚蒂亲自授意——即使实际上不是他写的——发表的何塞·迪亚斯的署名文章写道：

“唯一可能对西班牙有利的战争结果既不是法西斯主义获胜，也不是共产主义获胜”的说法绝对正确。为了消除任何怀疑，我们必须再次重申，西班牙人民正在为国家独立……和保卫民主共和国而战。……我们的党从来没有考虑过在战后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如果说工人群众、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追随我们而且信任我们的话，那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国家独立、自由和共和国宪法最坚定的捍卫者。……提出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问题必将使人民发生分裂，因为共产主义政权不可能被所有西班牙人所接受，这绝不可能，所以，我们的党决不会做任何分裂人民的事情。……你们

断言“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反对我们，西班牙人民将取得胜利”……但是，这也不符合政治形势或是我党以及共产国际的政策。我向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作报告时说：“所有民主国家有理由联合起来共同采取行动……理由就是防止发生威胁我们大家的战争。”当我说到“所有民主国家”时，我不仅想到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国家，而且想到了法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等等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我们希望这些国家帮助我们；我们认为它们可以通过帮助我们保护它们自己的利益。……你们在你们的文章里采取的立场完全不同，所以它是错误的。你们犯的错误是，你们忘记了我们的斗争所具有的国际特征。

根据这一明确的回应，显然，受共产国际指挥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打算像它从内战爆发以来所做的那样，以相同的温和外表示人。

## 第六十章 内格林的十三点战争目标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为了影响西方民主国家和佛朗哥阵营的温和派，政府采取了行动，它向西班牙和外国记者发表以下声明：

为了使同胞了解并告知世界，享有西班牙共和派所有政党和工会组织信任的民族团结政府……郑重宣布下面这些战争目标：

1. 确保一个彻底摆脱了一切外国干涉——无论干涉的性质和起因是什么——的西班牙的绝对独立和领土完整……
2. 从侵犯我国领土的外国军队和一九三六年七月以后以技术合作为借口来到西班牙的那些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干涉并且企图控制西班牙的法律和经济生活的人员的占领下解放我国的领土。[为了防止误解，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明确解释说，这一段内容针对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和技术人员以及那些“被委派担任入侵者

在叛军占领区建立的各种外国工业企业负责人”的人。]

3. 一个由建立在纯粹民主原则基础上的强大国家所代表的人民共和国，它通过一个由享有普选权的公民选举产生的具有充分权威的政府行事.....

4. 共和国的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应当由全体国民在内战结束以后立即举行的公民投票中自由表达的意愿来决定。应当充分保证公民投票的举行并且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保证参加投票的公民不受任何可能的报复。

5. 在不损害西班牙统一的情况下尊重地方自治权.....

6. 西班牙政府将保证充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证信仰自由，保证自由表达宗教信仰及自由举行宗教活动。[据以A.利萨拉为笔名的安德烈斯·马利亚·德·伊鲁霍说，这一条是他哥哥曼努埃尔·德·伊鲁霍促成的，他哥哥是一名身体力行的天主教徒，当时代表巴斯克民族独立党担任不管部长。]

7. 在国家最高利益允许的范围内，国家应当保证合法取得财产并且保护生产者。在不限个人能动性性的情况下，它应防止任何可能导致剥削平民并且侵犯公众权利、危害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管理控制的财富积累。为此，国家应当鼓励小型企业的发展，保证家庭财产不受侵犯，促进一切有益于改善各阶层生产者精神、经济和族群状况的措施。

没有支持叛乱的外国人的财产和合法利益应受到尊重，因此，将对赔偿内战期间无意造成的损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8. 土地改革应当消灭那些旧的半封建的贵族庄园，它们缺乏任何人类、民族和爱国的情感，总是成为农村取得重大发展的主要障碍。一个建立在广泛、坚实的农民民

主基础上的新西班牙，农民应当是他们耕种的土地的主人。

9. 国家应当通过推进符合西班牙生活和经济特定需要的社会立法保证工人的权利。

10. 民族文化、身体和精神状况的改善将是国家关注的首要问题。

11. 西班牙军队……应当摆脱任何政党或倾向的控制。……

12. 西班牙政府重申其拒绝将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的宪法准则。……

13. 对所有希望共同承担重建和强大西班牙的艰巨任务的西班牙人实行大赦。……

内格林的喉舌《先驱报》确认，这一方案将在“战争结束当天”实施。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说，总理对十三点战争目标的兴趣“近乎狂热。他认为它们非常重要，在佛朗哥控制区和国外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但是，如果关于“纯粹民主”和军队“摆脱任何政党或倾向的控制”——这是多党制所依赖的两个基本条件——的承诺具有一点实际意义的话，那么，正如前面几章所显示的那样，在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行为中几乎看不到任何迹象，更不必说西班牙共产党实行的那些政策了。甚至在这一方案正式宣布之后，西班牙共产党仍然继续拼命谋求对军队的控制并且重新开始进行鼓吹建立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宣传造势活动。它在五月十三日宣称，统一的政党将有利于“所有倾向，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因此，谁也不能“无视”它，“只能最大限度地给予支持”。它敦促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应当“以极其紧迫和认真的态度为统一党证”而努力。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之类类似的合并来看，如果这一合并实现的话，它将是向建立一个一党制国家所迈出的一大步，因而将使上述方案对“纯粹民主”和军队“摆脱任何政党或倾向的控制”这两个基本问题所作的承诺变成空谈。对于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西班牙政府在国内外对这一方案进行了最广泛的宣传。在接着召开的国际联盟会议上，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特别强调了“自由表达宗教信仰及自由举行宗教活动”的承诺——自从革命爆发以来，这种自由受到压制。随后几个月，一些改革开始进行。六月二十五日，内格林恢复了陆海空军的宗教活动，命令三军首长为此要求的官兵提供宗教帮助。十月十七日，巴塞罗那自内战爆发以来第一次目睹了宗教葬礼的壮观场面，葬礼是为悼念一名巴斯克上尉举行的，送葬的队伍“举着十字架”沿对角线大道行进，“神父精心着装”，参加者“唱着圣歌”。内格林的新闻秘书弗朗西斯科·阿吉雷在为《每日图片报》撰写的社论中说：“昨天下午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天主教葬礼让安排国际战士撤离的军事人员看到了一个感人的场面。当他们离开这里时，葬礼所显示的尊重将使他们可以带走对于西班牙的某种印象，与他们迄今为止所得到的印象——即一个狂热偏执的可悲典型——相比，这种印象完全不同。……巴斯克英雄比森特·德·埃吉亚·萨加杜伊的葬礼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政治事件。……正在共和国一边战斗的天主教徒知道，与以往不同，他们表达宗教信仰的权利现在……不仅受到政府的保护，而是受到全体公民的尊重。如果缺乏这方面的证据，昨天证明了这一点，新闻电影也将向世界展示它。”最后，内格林于十二月八日颁布法令，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设立一个“高级宗教委员会”，将与宗教活动有关的所有事宜交给这个委员会处理。内格林的喉舌《先驱报》发表社评强调指出这项法令所提供的“宗教自由的保证”及其对于外国的影响，世界各国将会“看到共和国的自由精神”。在社评的旁边刊登了巴斯克民族独立党人胡里奥·豪雷吉和社会党人曼努埃尔·科尔德罗之类温和派政治家的赞美之词。内格林任命他的朋友和生理学家同行、巴塞罗那大学的贝利多·戈尔费里奇博士为委员会负责人。无法肯定地说内格林是否打算重新开放巴塞罗那的教堂，因为仅仅几周之后这座城市就被佛朗哥将军占领了。

十三点战争目标同时成为内格林政府的标志性装饰。“十三点方案……成为共和国的基本原则。”内格林在国外的主要宣传代理人路易斯·费希尔写道，“内格林频繁地在演说中提到它们。它们被正式通报外国政府，国外的亲共和派宣传机构经常把它们当作话题。”

在针对外国舆论发表的一次广播演说和赫伯特·R·索思沃思——五十年来他一直是内格林的坚定支持者——主编的每周一期的宣传小报《西班牙新闻》的报道中，西班牙总理宣称：“我们希望保证西班牙的独立和西班牙人民的自由。……我们需要西班牙人民通过一次公民投票在宽容、自由和个人保障的范围内勾勒西班牙国家的法律面貌。我们向大家保证，一旦战争结束，将实行一次全面大赦。我们需要一个民主产生的强大稳固的政府。……我们的方案由一个知道如何恢复秩序、创建军队……团结人民、保卫领土的政府作保证，它是多少代以来第一个将其权力与人民的愿望联系起来执政的政府。”

外国同路人也帮助在国外宣传十三点方案，例如德国著名剧作家和诗人恩斯特·托勒。在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的马德里广播电台对美国播送的一个广播节目中，他强调个人财产受到保护。“你可以拥有一个店铺，一家百货公司。你可以拥有一间纺织厂或珠宝店。没有人会干涉你的生意。”共产党控制的国际纵队讲英语的部队所主办的刊物《自由志愿军》举行了一次论十三点宣言可贵之处的征文比赛。“这是一个深深感动了全世界富有人情味的正派人的庄严声明。”得奖的文章写道，“它将有效地使西班牙国内外许多摇摆不定的人确信，共和国的事业被有能力的人所掌控，因此一定会成功。……所有相信人类正义和自由的开明人士必须支持这一方案，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受到外国侵略者攻击时他们对共和国承担的责任。”十三点方案还得到包括左翼共和派及共和联盟的某些著名领导人在内的非共产党人士和外国知名学者乐观的好评。

鉴于对这一方案的大肆宣传，它的来源值得一提。据路易斯·费希尔——在这个问题上，他提供的证据至关重要——说，方案的灵感来自英国电影制片人艾弗·蒙塔古。费希尔谨慎地避而不提蒙塔古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和伦敦《工人日报》的编辑。“在巴塞罗那逗留期间，”他在美国版《人与政治》中写道，“我天天都去外交部，每次我都看到艾弗·蒙塔古坐在德尔巴约的接待室里等待国防部批准他去前线拍摄影片。……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知道，在我看来，共和派政府应当明确提出它的战争目标，类似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方案。’ ‘好主意，’ 我说道，‘为什么从没有人想到过？’ 我把这个主意告诉了德尔巴约。……他去找内格林商量。内格林说：‘好啊，把它写出来。’ 德尔巴约草拟了十点方案给内格林看。内格林说，‘我们必须提出十三点方案以表明我们不迷信’，然后，他亲自增加了三点内容。” 内格林轻浮的态度基本说明整个方案的实质。

值得注意的是，在路易斯·费希尔这本书的英国版中，所有关于艾弗·蒙塔古——从一九二九年起他就是著名的英国共产党党员——的内容都被删掉了，而且正如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所指出的那样，它还对十三点方案那一段情节作了“修改”以适合“英国人的口味”。 “一段时间以来，” 经过删改的英国版写着，“共和派领导人一直在考虑宣布社会和平目标的可行性。他们希望这些目标将会影响佛朗哥阵营的士气并且增加国外对西班牙共和派的同情。德尔巴约和内格林拟订了主要的战争目标，最后，它们在一次正式的内阁会议上被通过。”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这是一次为政府和国家增光的内阁会议，会议本身直接证明那些企图把共和派西班牙描绘成一个外国势力、蛊惑民心的政客和革命者所控制的国家的人是在造谣。” 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也在多年以后宣称：“十三点方案证明了国外那些宣传活动的欺骗性，它们说我们打仗是为了在西班牙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者某种无政府主义制度，而且无视民主的原则。”

尽管西班牙共产党没有直接参与十三点战争目标的炮制，不过，它在方案公布两周之后正式发表了以下公告：“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研究了十三点方案并且一致表示同意。这份文件符合正在为保卫共和国民主制度和国家独立而战的西班牙人民斗争的性质，从而奠定了我国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团结起来的基础。……我们号召我们的所有同志、所有战士和全体反法西斯人士继续为民主的西班牙工作和战斗，在这个民主的西班牙，人民享有长期以来拒绝赋予他们的充分的权利，在这个民主的西班牙，他们将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自由、和平、正义和社会进步。”

在四月三十日内格林宣布其方案的内阁会议上，只有一个人发出了犹疑的声音。根据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第二天发给地方委员会的通报，唯一一位全国劳工联合会内阁部长塞贡多·布兰科建议先把方案交给各个党派组织认可，但是，内格林以下述理由予以拒绝：（1）它必须在当天发表同时递交英国大使馆；（2）它的目的是向国外表明，“尤其是向法国和英国”表明，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没有采取偏激的政策，也没有任何赤化的危险”；（3）如果把它交给各个党派组织，“谁也不会表示同意，因为它无法满足它们各自不同的政治诉求”。最后，内格林指出，宣布方案“不必照本宣科，因为它不是将要全面落实的一件事情，而是必须及时向国外发表的一个声明”。

五月三日，在发给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地方委员会的一份通报中，半岛委员会表露了它的预感。通报说，十三点方案的目的肯定是想促使外国改变其对西班牙反法西斯阵营的政策，但它也是“第一次公开承认开始”对革命进行清算。由一个全国劳工联合会派代表参与的政府宣布方案这一事实提出了一个与责任有关的“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看来已经“同意放弃迄今为止我们所捍卫的一切革命成果”。然后，半岛委员会以一种比较缓和的语气接着说：“作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作为更强大的势力强加于人的东西，我们接受所宣布的方案，我们不



能公开反对这一方案，以免使自己陷入给西班牙反法西斯阵营带来真正灾难的境地。……但是，我们决不同意参与正在利用国际形势胁迫工人阶级放弃革命成果的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集团的阴谋。如果我们革命的工会组织不去分担这一方案的责任，那就更好。但是，它已经为避免更大的灾难采取了行动，这与它派代表参与政府的目的一致。与这些承诺无关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应当而且可以继续作为实现无政府主义追求和志向的工具。”

在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行为采取宽容态度以免加剧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的同时，半岛委员会试图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离经叛道保持距离从而避免承担历史责任，不过，这种巧妙的做法并没有得到更激进的自由主义运动成员的支持，因为，半岛委员会在三天以后分发了另一份与十三点方案完全划清界限的通报：“从建立一个议会制政权的第三点到保证大赦佛朗哥的支持者的第十三点，整个文件不仅与我们的想法严重冲突，……而且不符合[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所造成的现实状况。……我们在文件中没有看到用什么办法保障工人和农民取得的成果：工人阶级管理生产的权利和集体耕种土地的权利。另一方面，国家保证私人财产、私有企业不受侵犯，保证自由举行宗教活动，发展小型企业，赔偿外国资本，等等，等等。在现在这个时候，难以想象制订一个更加反革命的方案。”

五月十九日，由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和前书记奥拉蒂奥·M·普列托这两位著名的温和派人士控制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试图缓和自由主义运动中蔓延滋生的焦虑。它在一份概括了地方委员会对十三点方案的反应的通报中说：“[工会]积极分子……凭着直觉看到了危险，但某些同志有时候会夸大其词……因为宣布的方案包含了许多有利因素。”接着，像下面的举例所显示的那样，它以积极的态度解释了方案的每一点：

1. 确保西班牙的绝对独立和领土完整。自从七月十九日以来我们反复重申了这一点。如果有人感到担忧，那应当是共产党人，因为文件提到了一个“摆脱了一切外国干涉”的西班牙，“无论干涉的性质和起因是什么”。……

6. 西班牙政府将保证自由表达宗教信仰及自由举行宗教活动。还能说些什么呢？既然我们知道宗教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北美和英国，那么，表明我们对它的尊重至关重要。

7. 国家应当保证合法取得财产并且应当鼓励小型企业的发展。我们更愿意看到一个支持社会主义化、集体化等等运动的声明，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忘记这些问题是我们国外问题的“症结”所在？难道我们可以突然不顾这一事实：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美国，或是任何民主国家，它们能够友好地看待或者帮助一个建立在集体化、社会主义化甚至工人实行的国有化基础上的政权取得胜利吗？……

11. 西班牙军队应当摆脱任何政党或倾向的控制。这只是重复了我们面对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和兼并意图（*absorcionismos*）始终表达的观点。

“我们逐条剖析了这份文件。”通报继续说，“……它并不像乍一看那样反革命。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不是根本问题。重要的是，为了影响外国舆论，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宣布它。……在法国，在北美，在英国，它是那些希望帮助我们的人所掌握的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这才是关键。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尽管对十三点方案进行了大肆宣传，但是，它没有给民主国家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不过，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最有权势的成员奥拉蒂奥·M·普列托——就决定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策以及全国委员会支持十三点方案而言，他与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共同负有主要责任——在内战结束以后自以为是地宣称：“外交官和国外的资

产阶级一点也不注意我国历届政府的虚假宣传，我国政府为其愚蠢的天真所害，试图掩盖像阳光一样明显的事情：一方面，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进行着零星的社会主义尝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暗中等待胜利的时刻，以便把西班牙布尔什维化。”

尽管如此，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佛朗哥将军全力进攻加泰罗尼亚地区为止，一部分重要的西班牙左派仍然希望英法两国可能改变它们的政策，德国与西方民主国家潜在的对抗将突然爆发，变成一场拯救西班牙共和派的全面的欧洲战争。由于明显的外交原因，不可能公开承认这种希望。热情之花宣称，即使在一九三八年春天东部前线崩溃之后，当一切看来都将化为一场灾难时，“我国仍然有人对国际形势抱太多的幻想，天天盼望发生某种突然改变欧洲前途从而结束对我国的入侵的特别事件。我们没有这些天真的幻想并且提醒大家警惕它们。[如果]一场欧洲战争爆发，由于迫切希望征服西班牙从而获得地中海的控制权，正在入侵我国领土的法西斯分子将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最野蛮的杀伤性武器屠杀我国人民。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以为一场欧洲战争对我们有利，可以更快地结束内战”。

尽管热情之花如此振振有词，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私下谈话时并不讳言他把希望寄托于一场欧洲战争，他的想法反映了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的期待。据阿萨尼亚的姻兄弟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弗说，德尔巴约向何塞·希拉尔“保证”，欧洲战争即将来临，它将“对我们的命运产生某种决定性的有利影响”；而苏联记者和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回忆说，一九三八年夏天外交部长向他保证，“以德国为一方、以法国及其盟友为另一方的战争不可避免”。

这当然也是约瑟夫·斯大林的希望和胡安·内格林的个人信念。后者是抵抗政策的象征，据西班牙共和国总理的朋友和始终不渝的仰慕者赫伯特·马修斯说，内格林“认

识到，只要他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更大的冲突将会发生从而拯救西班牙共和派”。

## 第六十一章 英-法干预的希望破灭

虽然英法两国克制着没有在西班牙与意大利和德国进行对抗，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看不到自己的战略利益受到威胁；这是因为它们担心，在西欧打一场全面战争，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只能使苏联获益。这一点已经在前面的一些章节里面强调过，但它重要得足以进一步加以证明。

在一份政策总结报告中，起草报告的格拉德温·杰布写道，集体安全的问题是，它可能“引发无论战败与战胜均造成灾难的战争”。杰布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以来担任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的亚历山大·卡多根的私人秘书，这份报告依据的文件部分来自英国政府中心部门负责人威廉·斯特朗，他们三个都是内维尔·张伯伦首相的支持者。

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召开的一次法国国防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国防部长爱德华·达拉第说：“如果看不到干涉西班牙将引起一场全面战争，那就一定是个瞎子。”至于他所想象的全面战争，读者应当记得，他在三个月后用启示录式的语言向冯·韦尔切克伯爵作了陈述：“一场现代战争所造成的可怕的灾难性后果将为人类前所未见，那将意味着欧洲文明的彻底毁灭。一上战场，赤裸裸的破坏者——哥萨克和蒙古人——就会源源不断地大批涌现，给欧洲带来一种新的‘文明’。”

因此，西班牙内战期间英法两国的不干涉政策不仅是由它们对社会革命以及共产党人随后的优势地位——它们通过其外交官和秘密特工充分了解这些情况——的敌视决定的，而且是由它们的恐惧心理决定的，它们担心一场全面战争将使共产主义在整个欧洲登堂入室。所以，在掩饰或者引导无效的情况下，相继几届西班牙政府在

约束或者压制革命方面的无所作为可能影响了英法两国的政策。为了证明这种看法并非牵强附会，有必要再来探讨我们在前面的一些章节里谈论过的外交博弈，以便读者了解斯大林在西班牙导演的“民主”骗局为什么注定要失败。

我们已经看到，内维尔·张伯伦从一九三七年五月接替斯坦利·鲍德温担任英国首相之时起即以更大的力量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新首相认为苏联对英国的利益和西方世界构成主要的长期威胁。由于这个原因，与德国达成政治和解是张伯伦外交政策的基石，所以，认为英国终究将会冒着在西欧引起一场战争的风险援助西班牙共和派不切实际。

我们在前面某一章已经看到，一九三八年春天一些共产党员开始怀疑英法两国最终将被卷入这场冲突的假设，但是，如果想要保持斗志，尤其是保持前线的斗志，那就必须消除共产党人不能接受的这种怀疑。一九四〇年，曾在内战期间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五旅副政委、当时已与共产党人断绝关系的英国作家拉尔夫·贝茨说：“我从不认为西班牙政府将会得到英法两国的真正帮助。”他说，他受到在马德里处理这个问题的英国共产党代表的“严厉指责”，国际纵队的刊物《自由志愿军》——他是这份刊物的编辑——甚至拐弯抹角地“指责”他“可能使年轻战士们的头脑里产生这种想法”。“如果我们为了集体安全遏制革命的话，那我们就失算了。我认为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始终没有放松[把英法两国]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的努力。如果不大幅度减少这种努力，我们怎么可能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那里得到更多的支持？”

哈利法克斯勋爵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与阿道夫·希特勒举行的一次会谈明确显示出张伯伦及其支持者打算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到什么程度。时任掌玺大臣的哈利法克斯后来作为外交大臣与塞缪尔·霍尔爵士和约翰·西蒙爵士一起成为张伯伦的“内阁决

策委员会”成员。根据德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哈利法克斯承认，希特勒“不仅已经为德国做出巨大的贡献”，而且可以“通过不许共产主义进入他的国家阻止其向西方继续发展”。哈利法克斯说，英国方面“不一定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维持现状”。他接着谈到“欧洲秩序可能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化也许注定将会发生。在这当中突出的问题是但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关切地认为，任何变化都应通过和平演进的过程实现，因此应当避免采用可能引起影响深远的动乱[即西欧战争]的方式”。由于奥地利是通往捷克斯洛伐克的门户，但泽是进入波兰的要冲，这些话必定促使希特勒认为，他对东欧的领土野心几乎不会遭到反对。

“如果说哈利法克斯这些话具有什么实际意义，那就是，”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写道，“它们引诱希特勒鼓励但泽、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日耳曼民族主义分子制造动乱；同时还向希特勒保证，这种动乱不会遭到来自外界的反对。”希特勒也得到了法国政府的类似保证。“[我]吃惊地注意到，”访问巴黎归来的德国驻奥地利大使弗朗茨·冯·巴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告诉希特勒，“像[外交部长]博内一样，法国总理[卡米耶·肖当]认为可以对重新确定法国中欧政策的方向进行完全不设障碍的讨论。……[他]也不反对通过演进的方式明显扩大德国对奥地利的影响。”此外，冯·巴本在十二月四日写给德国外交部负责政治部门的国务秘书冯·魏茨泽克的信中说：“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对于德国……在重建一个民族国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影响，博内和肖当都没有表示任何反对。”

为了推行其绥靖政策，张伯伦撤除了外交部中最有力地倡导反德主张的常务副大臣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的职务，将其安排在新设立的“首席外交顾问”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据伯肯黑德伯爵说，“他发现自己被关进了一只镀金鸟笼”，“对外交事务不再能施加任何实际的影响”。张伯伦在写给妹妹的信中批评斯坦利·鲍德温

几个月来“白白浪费时间而没有”把范西塔特赶出外交部，他写道：“说来有趣，我用三天就办成了这件事。……我担心他出于本能根本反对我的政策。……我猜测，罗马和柏林将欢欣鼓舞。”

由于绕开了外交部，更有力的推行绥靖政策的道路如今已经畅通无阻。据与张伯伦密切合作的其首席外交政策顾问霍勒斯·威尔逊爵士说，对于首相与那位独裁者达成谅解的政策，外交部代表着一种障碍。“对于威胁着欧洲的这场危机来说，”坦普尔伍德子爵（塞缪尔·霍尔爵士）在他发表的关于那个时期的回忆录中写道，“[张伯伦]似乎觉得外交部这部老式机器运转得不够迅速。”更能表达霍尔爵士对外交部的真实态度的是他在斯坦利·鲍德温辞去首相职务之前不久的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七日写给内维尔·张伯伦的那一封直言不讳的信。在建议张伯伦不应仿效“鲍德温敷衍了事、逍遥自在的无为态度”之后，他继续写道：“在你控制局面之前，不要让国际政治事务中发生任何无法挽回或损害严重的事。我说这话是因为我相信外交部对德国（以及意大利和日本）有严重的偏见，因此它们不自觉地几乎永远不可能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我个人认为，一旦你成为首相，很可能改变欧洲的气氛。”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可以绕过正常的外交部渠道直接给首相写信并登门拜访的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告诉希特勒，英国政策旨在“为与德国建立一种真心诚意的友好关系奠定基础”。亨德森补充说，哈利法克斯勋爵已经确认，可以认为欧洲“极有可能”发生变化，只要这些变化是“高度理性”而非“随意使用武力”的结果。威廉·N·梅德利科特在他为《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八卷所写的序言中断言，这一政策肯定不是亨德森通过对绥靖政策的某种“修正主义”解读“自己制定出来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米德尔马斯和伊恩·科尔文所指出的那样，亨德森是张伯伦的追随者及其政策的主要鼓吹者之一。梅德利科特通过引述亨德森本人的说法而作出的推断更引人注目，这位前驻柏林大使

在他的回忆录《失败的使命》中写道：“张伯伦先生和我之前注意到的鲍德温先生都同意，我应当把希特勒和纳粹党当做目前的德国政府尽最大努力与之合作。……张伯伦先生向我概述了他关于对德总体政策的看法，我认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始终遵循他为我制定的总路线，由于这一路线非常符合我个人的职业观念，因此，我可以在德国更从容、更忠实地为我的国家提供最好的服务。”

关于这一点，值得引述一下亨德森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提交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他在这份备忘录中写道：“[东欧的地位]从来没有明确确定，它也不是英国的重大利益之所在，另外，德国人肯定比斯拉夫人更开化，因此，如果处理得当的话，他们最终对英国利益的潜在威胁也更小——人们甚至可以断言，假如德国的准备工作足以使大英帝国相信这不是同时针对它的，那么，实际上并没有充分的理由竭力阻止德国完成它的统一，或是阻止它为与斯拉夫人打仗做准备。”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前两天，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在访问伦敦期间向希特勒报告说，哈利法克斯勋爵告诉他，“张伯伦和他——哈利法克斯勋爵——决定与德国达成某种谅解”，“在英国人看来”，为了推行这种政策，“张伯伦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同时冒着巨大的风险”。里宾特洛甫回答说：“德国希望强大而且必须强大。……为了对付苏联的进攻，德国必须武装起来。……元首开始不要求西方大国提供帮助，除非某一天世界革命的压路机驶向德国。”哈利法克斯勋爵这时插话说：“英国非常清楚德国的实力，因此，它无论如何都不会反对德国。”接着，里宾特洛甫继续说：“德国希望得到生活在靠近德国东部边境——即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一千万日耳曼人的民族自决权。……关于这一点……当哈利法克斯勋爵在贝希特斯加登对此表示理解时，当他声明东欧的现状不可能无条件地永远保持下去时，元首感到非常满意。”第二天，里宾特洛甫报告说，张伯伦“极其郑重地要求”德国外长告诉元首，“他最真诚地希望与



德国达成某种谅解”。

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在伦敦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实际上，这被认为不可避免，因此，张伯伦继续镇定自信地推行他对德国的绥靖政策。不过，希特勒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其下一个领土目标至关重要，免得英国因对法国的条约义务卷入一场欧洲战争。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日益加剧的五月二十二日，哈利法克斯勋爵指示内维尔·亨德森把出现这种危险的可能性告诉里宾特洛甫：“如果非得采取暴力手段不可的话，我或他均无法预测随之可能产生的后果，因此，如果由于在那里采取鲁莽的行动引发了一场欧洲大火，我请他不要期待本国将会袖手旁观。只有那些希望看到欧洲文明毁灭的人才会从这样一场灾难中得到好处。”九月初，相互理解出现了。德国驻伦敦大使馆代办特奥多尔·科尔特向迪克森大使报告了与张伯伦和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会谈的情况：“会谈在一种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威尔逊]明显受到感动（就一个英国人在任何情况下可能流露出的此类情绪而言），最后他握着我的手说：‘如果我们两国——英国和德国——就解决捷克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话，我们只须清除法国或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决定所造成的阻力。’”九月底，作为英国逼迫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地区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慕尼黑协定。

到这时，斯大林肯定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从一九三四年苏联加入国际联盟以来他怀着摆脱德国威胁的希望积极推行的集体安全政策可能已经失败了，英法两国将会冒着战争的风险干涉西班牙的微弱希望正在破灭。因此，为了使德国军队把攻击的目标转向西方，他重新开始对通过谈判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产生了兴趣。我们已经看到，他的贸易代表达维德·坎杰拉基在内战初期就开始为达成一项协议与德国谈判，但是，这些试探性的努力遭到希特勒的断然拒绝。实际上，直到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胡安·内格林被推翻以后，斯大林才最终放弃了使英法两国因西班牙内战而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的全部希望，恢复执行与希特勒签订一项条约的计

划。

这一时期重要的是预测西班牙的事态发展，甚至调查欧洲列强之间除了结束西班牙内战之外还会玩弄什么外交阴谋，以便充分了解将要参与的危险游戏以及英国的政策制定者本身在战争期间真正担忧的事情。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在向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斯大林痛斥英法两国鼓励德国与苏联进行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它们将作为有生力量出现……为两败俱伤的交战双方强行规定停战条件”——如果西班牙内战发展成为一场西欧的战争，这正是斯大林为苏联预留的仲裁人角色。同时，他还对与德国和解的愿望第一次作出了公开的暗示。“一九三九年三月，斯大林元帅发表了一次讲话，”第三帝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审判期间作证说，“他在这次讲话中对他与德国建立更加友好的关系的愿望作了某种暗示。我把这个讲话交给阿道夫·希特勒，并且问他我们是否应当设法查明这个暗示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真实的意图。希特勒起初不愿这样做，但是后来逐渐接受了这个想法。关于商务协定的谈判开始进行，经元首同意，我在谈判期间对莫斯科进行了试探，以确定在国家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建立某种沟通渠道的可能性以及两国的利益是否至少可以协调。”

正如在德国外交部档案中发现的文件所显示的那样，从斯大林发表讲话开始，双方在讨论政治和解问题时均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无疑源于下述事实：德国和苏联均担心对方利用为政治和解提出的具体建议加强其与英法两国谈判的地位。实际上，这些文件表明，直到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为止，事情的进展没有超出暧昧试探的范围，此时距离（八月）签订导致德国进攻波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苏联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协定不到三个月。就在五月三十日当天，德国外

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打电报给德国驻莫斯科大使：“与此前制定的策略相反，我们现在已经决定与苏联进行明确的谈判。”

尽管斯大林直到一九三九年年中还没有开始与希特勒进行正式谈判，但在西班牙内战期间，除了通过坎杰拉基作出的姿态之外，他还想方设法让希特勒知道，把他当作合作伙伴而不是敌人对德国有利。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说法证实了这一点。“苏联情报机构的第四种方法是所谓传递错误信息。……传递错误信息不只是为了说谎而说谎；同时还想把它当作一种微妙的手段，诱使某个外国政府去做克里姆林宫希望它做的事情。……西班牙内战期间……传递错误信息部门奉命向德国军事情报机关传递信息：在西班牙作战的苏联飞机不是最新设计的，苏联的武器库里停放着数千架新式飞机，都是飞行速度更快、飞行高度更高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战斗机。这并不是事实。（尽管数量不足）苏联向西班牙提供的是它所拥有的最新、最好的飞机。这一误导他人的情报严重影响了德国最高统帅部。……显然，斯大林想给希特勒造成深刻的印象：苏联比他认为的强大得多，武器装备也更优良，因此，对于德国来说，把苏联当作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比较明智。”

八月在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四个月前，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声称，斯大林对西方的外交政策以对“孱弱的”民主国家的极度蔑视为基础，因此，他的国际政策是由一系列花招组成的，这些花招的唯一目的是使他与希特勒打交道时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情况不一定是这样，因为斯大林不可能把他的外交政策完全建立在与希特勒达成一项有问题的协议的基础上。由于这个原因，他小心翼翼地保留着集体安全的选择权，希望西方列强最终与希特勒在西班牙或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对抗，从而使苏联边境摆脱德国入侵的威胁。正是因为斯大林拥有两种选择权，所以，就像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那样，即使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之后，他仍然期待英法两国改变它们的中立政策，命令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在西方潜在的对抗最终转化为战火

的希望越来越小的情况下继续战斗。

认为只有斯大林、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把赢得内战的希望寄托于最终爆发一场欧洲战争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些领导人也怀着这种希望。有一段时间某些著名的社会党人同样抱有这种希望。谈及一九三七年夏天和秋天佛朗哥将军占领巴斯克各省和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者、在其政府中担任安全总局局长的文塞斯劳·卡里略写道：“不过，共产党和内格林政府告诉我们，胜利的希望并没有破灭，它取决于可能爆发的世界大战。它们坚持认为，英法两国不可能允许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取得彻底的胜利，因为这将使它们在地中海的地位岌岌可危。由于我准备说出全部真相，我不想隐瞒这一事实：当初我也有这种看法。……但是，我没有打算从战争中获得好处；除了我的祖国之外，我也没有为别的什么人的利益效力。”

另一方面，像希望通过谈判结束内战的社会党右翼领导人胡利安·贝斯泰罗一样，阿萨尼亚总统对期盼导致一场欧洲战争表示不满。他曾在答复支持内格林的社会党执委会成员胡安—西梅翁·比达特时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认为，一场世界大战将会拯救共和国的正义事业。这场大战将会成为一场浩劫，它的规模无法想象，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试图通过牺牲成百上千万人的性命得到拯救是错误的。……我发现，你们都受内格林的论调影响。……试想一下，就像上一次大战结束时共产主义输入了东欧一样，当这一次大战结束时，共产主义将输入西欧。大多数共和派人士——我猜想，还有大多数社会党人——对这种结果深恶痛绝。”

如果说一场全面战争终将爆发的希望落了空，那么，这不是因为英法两国决定政策的那些人对意大利和德国的势力在地中海的扩张不太在意；这是因为两国外交政策所考虑的范围超越西班牙问题涵盖整个欧洲。如果英法两国不愿在西班牙与德国对

抗；如果它们还要牺牲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如果内维尔·张伯伦最终将像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秘密建议与德国达成某种将使英国摆脱其对波兰所作保证的政治解决方案，那么，这是因为它们知道，阻挠德国实现它在这一阶段的目标，即使不会导致战争，也将削弱纳粹政权从而增强苏联对欧洲大陆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影响英法两国政策的那些人希望在西方避免战争，直到德国在东方削弱了自己的实力为止。在德国入侵苏联折损自己的利齿之前与之对抗将使苏联成为欧洲大陆的仲裁者，与不得不承担作战主力的重任相比，苏联将因此拥有更加巨大的影响力。

当然，归根到底，英法两国能够容忍德国完全控制的欧洲地区不可能大于他们容忍苏联控制的欧洲地区。它们不希望任何人拥有支配地位。德国领导人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如果德国在占领波兰之后首先入侵比利时、法国和荷兰而不是进攻苏联的话，那是由于德国人认为征服西欧并且控制其海岸线是与苏联交战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因为，尽管英法两国鼓励德国对东欧的野心，但是，德国并不能确定，一旦它在苏联领土上陷入一场消耗战，这些大国不会尝试恢复有利于它们的平衡。毫无疑问，在英法两国那些反对采取让德国在东欧自由行事的政策的人心中，德国将在袭击苏联之前进攻西方的看法根深蒂固。

尽管德国的进攻方向看来似乎明确无误，但是，有证据表明，英法两国领导人并没有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掉以轻心：绥靖政策可能事与愿违，德国可能向西进军而不是向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日，慕尼黑协定签署一个月之后，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写给英国驻巴黎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的一封信中概述了他的想法：“我们今后必须考虑德国在中欧的优势。……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和法国必须通过保持将使对它们发动的任何进攻成为冒险的强大的武装力量维护它们在西欧的优势地位。……允许德国在中欧扩张是一回事，在我看来这是正常和自然的事，但是，我们必须能

够抵制德国在西欧的扩张，否则的话，我们的整个地位将被削弱。”

英国驻柏林大使馆代办G.奥格尔维—福布斯爵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的一份公文急件中告诉哈利法克斯，德国可能在向东进军之前进攻西欧。他说，有一派人认为，“在确信他在东方行动时其西翼不会受到攻击之前，希特勒先生不会冒险进军苏联，因此，他的首要任务是在英国完成重整军备之前消灭法国和英国”。哈利法克斯的副国务大臣助理威廉·斯特朗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八日提交的一份报告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在这份报告中提到了“我们曾经收到过的一些希特勒打算在今年春天进攻西方的报告。……在目前的情况下，德国不可能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而物质条件将使它更容易在西方而不是东方采取行动”。

显然，法国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法国驻莫斯科大使罗贝尔·库隆德尔在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几天后的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写给法国外长乔治·博内的一封信中说，纳粹领导人发现他们有两条路可走：“或者马不停蹄地继续征服东欧和东南欧”，或者“在英法两国依靠美国帮助在军备方面赶上德国之前进攻这两个国家。……目前，第二种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必须重视放任德国采取这种行动的危险”。

尽管如此，一般认为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的下一个行动将针对波兰。但是，不顾在议会中的反对派和群情激愤的英国公众舆论的压力下仓促作出的维护波兰独立的条约保证，张伯伦竭尽全力逃避他所承担的义务。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和理查德·戈特就英国对波兰的条约义务、随后为摆脱这些义务所做的努力以及八个月的“虚假”战争等问题对文件资料进行的精心研究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甚至在虚假战争期间，张伯伦仍然希望英国与德国达成一项将使西欧避免战争的协议。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他的主要合作者和顾问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向

赫尔曼·戈林派往伦敦的使者赫尔穆特·沃尔塔特提出的秘密建议以及几天之后威尔逊与德国驻伦敦大使赫伯特·冯·迪克森举行的会谈同样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这些被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内米尔爵士称为“见不得人的谈判”——张伯伦首相在没有告知外交部的情况下“愚蠢地参与”其中——是绥靖主义政策的巅峰之举。冯·迪克森在战争爆发以后所写的一份长篇备忘录中记述了威尔逊所提出的那些建议，苏军在位于格罗迪茨堡的冯·迪克森庄园里发现了这份备忘录，他还在担任大使期间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所起草的一份篇幅较短的“绝密”报告中记述了威尔逊的建议。这些建议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不仅因为迪克森后来在一九五一年出版于伦敦的一部著作中证实了它们的所有重要细节，而且因为沃尔塔特在亲自写给戈林的报告中提到了它们。另外，从来没有任何英国历史学家对威尔逊的建议（很自然，他向外交部隐瞒了这些建议）提出质疑。尽管许多历史学家（例如威廉·N·梅德利科特、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和西蒙·纽曼）在他们对张伯伦的外交政策所作的修正主义评价中故意忽略了威尔逊的这些建议，但是，它们已经被另外一些历史学家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尤其是伊恩·科尔文、刘易斯·内米尔爵士和A.J.P.泰勒。不过，这些建议并没有被赋予它们应有的重要意义。

尽管与西班牙内战没有直接关系，迪克森的两份备忘录比其他任何文件更清楚地显示了绥靖政策的主要动机——使德国的侵略转向东方——并且说明张伯伦为与德国达成某种政治和解以便维持西欧的和平究竟准备走多远。所以，它们与西班牙内战具有特别重大的关系，因为它们证明斯大林意欲通过使英法两国卷入西班牙内战而在西欧燃起一场战火的企图不会得逞，它们是斯大林试图通过歪曲革命的真正性质影响西方国家政府的努力必定失败的最明显的证据。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应当在本书论述的范围内。

迪克森在篇幅较长的那一份备忘录中证实：

[一九三九年]七月，当[戈林的使者赫尔穆特·]沃尔塔特先生在伦敦进行捕鲸谈判时，威尔逊[霍勒斯·威尔逊爵士]邀请他举行了一次会谈，并在就预先准备的说明事项交换意见之后提出了一项全面调整英德关系的计划纲要。……

在政治领域希望签订一项原则上放弃侵略的互不侵犯条约。这项条约的潜在目的是使英国以它们已经通过这项条约获得德国放弃侵略手段的保证为由，逐步摆脱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

威尔逊建议的重要性被这一事实所证明：威尔逊对沃尔塔特的邀请得到了张伯伦的亲自批准，他的办公室离威尔逊的不远。但是，为了不影响其使命的非官方性质，沃尔塔特拒绝了这个建议。……

为了避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于八月三日[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前一个月]去威尔逊家里拜访了他，我们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会谈。……威尔逊以一种比他对沃尔塔特所采取的更为明确的方式再次确认，缔结一项英德条约实际上将使英国的担保政策失效。与德国达成协议将使英国可以以互不侵犯条约保证德国不会进攻波兰为由摆脱它在波兰问题上的尴尬处境；这样就解除了英国对波兰承担的义务。然后，可以说，波兰将单独面对德国。

在我的坚持下，霍勒斯·威尔逊爵士还谈到了面对[因希特勒一九三九年三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而引起的]英国公众舆论的群情激愤如何进行谈判的问题。……他非常坦率地承认，由于采取这一措施，张伯伦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使自己面临下台的可能。不过，通过巧妙而严格的保密，可以避免触礁。……

就新的英德战争爆发而言，最可悲的事情是，德国要求得到与英国平等的世界大国



地位，英国原则上也准备承认这一地位。但是，德国需要立即、全面和明确地满足它的要求，而英国——尽管它准备放弃它在东方承担的义务及其包围德国的政策，同时允许德国在东欧和东南欧取得支配地位并与德国讨论真正的世界合作伙伴关系——只想通过谈判以及逐步改变英国政策的方式实现这一点。这种改变要用几个月而不是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才能完成。

A. J. P. 泰勒是少数几位敢于大胆议论霍勒斯·威尔逊爵士秘密建议的英国历史学家之一，他写道：“威尔逊在唐宁街十号的信笺上写了一份备忘录，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它从英国档案中消失了。这份备忘录建议缔结一项英德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条约。……这项条约‘将使英国得以摆脱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难以想象，这些建议是在张伯伦不知情或是未经张伯伦批准的情况下提出的。”

尽管威尔逊的建议没有得到柏林的回应并且如冯·迪克森所说被“直接扔进了废纸篓”——肯定是因为急欲在入冬之前解决波兰问题的希特勒更愿意与斯大林而不是与英国签订一项条约，前者可以立即提供领土收益，后者则需要在群情激愤的英国舆论的压力下进行时间无法确定的长期谈判——但这却是英国政府最终的努力，是其为了使德国的行动目标远离西欧所作的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搏。

说来奇怪，A. J. P. 泰勒不确定英法两国政府是否期望纳粹德国消除“布尔什维克的威胁”。“这是当时和后来苏联人的怀疑。官方档案中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证据，甚至在其他地方也没有。英法两国的政治家被德国问题弄得过于心烦意乱，以致没有考虑德国成为统治东欧的大国后将会发生的事情。当然，如果德国非要侵略不可的话，他们更希望它侵略东方而不是西方。但是，他们的目的是避免战争而不是准备打仗；因此，他们真诚地相信，至少张伯伦相信，只要希特勒的要求得到满足，他将适可而止寻求和解。”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在战前那几年英国与苏联进行

的危险的外交博弈中，英国政府所奉行的各项政策——从一九三五年开始鼓励德国重整军备的政策，一九三八年逼迫捷克斯洛伐克屈从德国要求的政策和一九三九年七月不惜以牺牲波兰为代价企图与德国进行秘密缔约谈判的政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成了一个又一个愚蠢的举措。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背后没有任何战略思考，他根本没有考虑过德国一旦成为东欧的霸主并且与苏联建立了一条共同边界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英国军事专家利德尔·哈特在其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谈到德国入侵波兰后的战略形势时承认：“由于德国与苏联现在面对着一条共同的边界，因此，[英法两国]最希望的是，这两个互不信任的盟友之间将发生摩擦，从而使希特勒扩张的力量向东发展而不是向西。”尽管利德尔·哈特没有证明这种希望与两国的战前政策之间存在着任何必然的联系，但是，考虑到本章以及前面某些章节所提出的大量证据，难以理解英法两国领导人为什么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很久就“被德国问题弄得过于心烦意乱，以致[像A.J.P.泰勒指出的那样]没有考虑德国成为统治东欧的大国”以及德国与苏联之间建立了一条共同边界“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

当然，并无证据表明，在战前那几年推行绥靖政策时，除了担心西欧将会爆发一场对苏联有利的战争之外，英国领导人没有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其他考虑的影响。据伯肯黑德伯爵说，这些考虑包括英军参谋长在一九三八年夏末提交帝国国防委员会的报告中所得出的结论：英国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因此，在缺乏强大盟国的情况下，它不可能在三条战线——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上作战。“[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担心远东的局势，”伯肯黑德伯爵证实，“如果英国在西方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他们担心日本可能在远东采取行动；因此，他们始终心神不定地关注着美国的中立并且意识到令人不快的实际情况：万一出现了什么麻烦，不能期望得到美国方面的帮助。英国政府还担心自治领 各国对参战的态度。南非已经决定保持中

立，它应当会这样做；澳大利亚工党反对参战，而麦肯齐·金[总理]能否使加拿大人民参战则存在着重大疑问。”此外，英国历史学家查尔斯·L·莫厄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自治领各国采取的政策是一种不承担义务的政策，“因此，它们肯定不受英国所承担的义务的约束。……[它们]当然反对参战，并且为绥靖政策使它们远离战争的威胁而感到高兴”。尽管所有这些考虑被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家用来为绥靖政策进行辩解，但是，在对苏联根深蒂固的恐惧这个最重要的考虑面前，它们都显得苍白无力。

本章以及另外一些章节的内容已充分证明，绥靖政策的根源在于这种对苏联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在于相信纳粹德国是一道防止共产主义传播的屏障，在于相信西欧爆发一场战争只能有利于苏联扩大它的势力和影响。但是，这些绥靖政策的基本要素却被英国主流史学界低估或者几乎完全忽略了。

由于英国历史学家对本国过去的外交政策持谅解态度而造成的这一失误有两个原因。第一，不因本国政府针对某个外国政权采取马基雅维利式的谋略而追究其责任是为公众所接受的传统。因此，无论爱国或者现实的张伯伦及其支持者试图怎样使西欧免遭战争或者革命的蹂躏，不应指责他们密谋使一个极权主义政权与另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相互争斗。“当然，”英国新修正主义历史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写道，“英国有一些……主张谈判的团体，希特勒肯定一直希望谈判——‘德国与大英帝国以牺牲苏联为代价进行交易’。但是，这种犬儒主义（或现实主义）与英国传统社会无关。”第二，由于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尽管斯大林本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主流历史学家不想因为承认英国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负有责任而使苏联有机可乘。

在揭露绥靖政策主要根源问题上的这一失误不仅对于世界历史这一重要时期的研究

是不幸的，而且对于那些试图真正了解西班牙内战与革命、弄明白斯大林在西班牙制造的民主假象为什么注定不起作用的人也是不幸的。

## 第六十二章 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

对于诱使英法两国站在共和派一边参加西班牙内战，内格林或共产国际现在显然已经无计可施。受到大肆宣传、标志着内格林的外交努力最高水平的十三点方案没有给民主国家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对归还某些国内外资产的大肆吹嘘也没有造成多大影响。

不顾这些挫折，不顾捷克斯洛伐克成为牺牲品，不顾埃布罗河战役的惨败（这场战役从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以强渡埃布罗河开始，至十一月十六日以攻占的所有地盘得而复失告终，伤亡大约六七万人），不顾一九三九年二月加泰罗尼亚地区全部失陷，斯大林命令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继续执行抵抗政策。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三日，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宣称：

有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或者几乎不可能指望得到外国的援助，曾经任凭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入侵加泰罗尼亚的民主国家不会在我们失去这么一个重要地区的此时此刻帮助我们，这种认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国际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幻莫测。另外，法西斯入侵者在加泰罗尼亚的胜利使他们愈发胆大妄为，刺激他们更清楚地暴露他们的征服、掠夺和战争计划，结果，这反过来使那些迄今为止不愿面对现实的人认清了形势，从而增加了直接和间接帮助西班牙人民的可能性。站在西班牙共和国一边的苏联这个强大的国家，它是自由、正义和世界和平的坚定捍卫者。工人阶级以及真诚的民主国家迄今已向西班牙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并将继续这样做。部分因为在斗争中缺乏协调和果断，部分因为他们尚未完全认识到公正解决西班牙问

题对于它们的重要性，他们没有能够使他们的政府的政策变得完全对我们有利。但是，只要我们加强抵抗，仍然可以做到迄今尚未做到的事情。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说，抵抗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此，就像前几次当许多人认为已经彻底失败时一样，我们断言，……我们的抵抗可以改变局面。它可能导致国内外出现新的因素，这些因素将有助于加强我们的优势，进而开启胜利的前景。

在这种貌似乐观的情绪背后，政治局肯定知道困扰着党的上层人士的担忧。恩里克·卡斯特罗在《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一书中重温了他早在埃布罗河战役惨败和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之前就有的想法：

他知道，已经没有赢得战争的可能性。

他知道，为了制止希特勒在欧洲的计划，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希望延长共和派的抵抗。

他知道，许多人将会因为延长抵抗而死，城镇和村庄将遭到破坏。

这有什么关系？

一场革命总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在他看来害怕这些是荒谬的。西班牙有什么价值？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只要西班牙可以让苏联得到喘息，只要西班牙可以推迟对苏联的入侵，它的价值有什么关系？……

对于卡斯特罗来说，只有一个祖国，那就是社会主义祖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要苏联存在。

关于埃布罗河战役后后方人们的普遍心态，他写道：“后方是这场悲剧的晴雨表。内格林和共产党徒劳地试图使人们相信，埃布罗河战役是一场伟大的军事胜利，它解救了巴伦西亚。人们根本不相信。他们没有公开表示这一点，因为公开表示仍很危险。……人们不再关心战争。他们关心胜利者。恐惧开始渗入几百万人的身心，他们的脸上露出巨大的悲伤，强忍着眼泪不流出来，因为这不仅是幻想的破灭，而且是可怕的受难的开始。”

在幻想无情破灭的过程中，与军事失败和平民百姓生活的艰辛起了同样重要作用的是，人们确信，无论结果如何，自由事业失败了。我们已经看到，令人恐惧的军事调查局逮捕了那些“敢于谈论总理的问题和战争发展趋势”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大多数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此时意识到，即使赢得胜利，共和国也没有前途。“无论我们失败还是赢得内战，”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告诉他的女儿，“独立的社会党人都将被迫移居国外，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将被佛朗哥杀害，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将被共产党人杀害。”而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则流露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不祥之感，他写道，如果内战以内格林的胜利而结束，“我们肯定将被打着共和国旗号而不是打着法西斯旗号的人所消灭”。至于代表着一大部分中产阶级的温和派社会党人和自由共和派人士，正如我们所知，胡利安·贝斯泰罗表达了他们共同但不敢说出的想法，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举行的一次社会党执委会会议上断言：“如果我们赢得内战，西班牙将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如果我们被打败，未来将是可怕的。”

对胜利的恐惧主要源于人们确信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将决定西班牙未来的政策，这一点应当毋庸置疑。“我不知道，如果我们赢得内战的话，共产党人强制实行他们的制度的可能性有多大，”佩雷斯·萨拉斯上校写道，“但我知道，他们将会加强并巩固他们的权力，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机会决不会再次出现。如果不是这样的

话，他们为什么对控制军队那么感兴趣？如果他们宁愿冒输掉内战的风险也不愿失去对军队的控制，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不能以他们比较善战因而使我们大家有更大的机会赢得内战为借口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解。除了他们的兵力更强之外，这不是事实，而那是因为他们的武器装备比较精良并且占据了更多的指挥岗位，但是，共产党的这种优势削弱了其他西班牙人的斗志，后者的人数多得多。”

由于担心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困扰反对派，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在保证军队“摆脱任何政党或倾向的控制”五个月后，内格林被迫向议会提出了这个问题。面对普遍惶恐不安的议会，他在回应批评时没有表示愿意道歉或者给人以纠正的希望。他说，暗示军队受到某个政党的控制、谈论偏爱或袒护是对政府首脑、国防部长和军队的一种“侮辱”。“我们必须制止这些拙劣的含沙射影。”他接着恐吓道，“在议会中公开谈论它们是一种危害国家[*lesa patria*]的犯罪。何况，议员先生们，它们是捏造的。我不怀疑存在着失误。这是人的失误。但是说领导偏袒、任人唯亲是荒谬的，彻头彻尾的荒谬。这些说法造成了可怕的危害，即使它们是真的也不会造成这么可怕的危害。明天，当我们的敌人可以把那些应当更有责任感的人在这里所说的一些事情大规模复述传播时，他们该有多高兴啊！”

不过，还有一个在议会内外都不能随意谈论的更重要的问题：劳动人民的士气低落，而胜利的希望取决于他们作出的牺牲。被共产国际派往西班牙从事组织工作多年、曾任国际纵队第十五旅副政委的英国小说家拉尔夫·贝茨承认，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所推行的政策是使无产阶级士气低落的决定性因素。一九四〇年与共产党人决裂之前不久，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如今，在他们为革命作出了所有牺牲之后，在他们对共产党作出了所有让步之后，在他们憎恨的压制其军队——他们这样称呼自己的民兵——的小资产阶级解散了他们的工厂管理委员会之后，在这一切仍然无法赢得英法两国的认可之后，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分析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之

后，想象一下[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痛苦吧。……我担心，由于发生的许多事情，共产党及其前途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例如，我曾经与许多西班牙社会党人交谈过。他们都对共产党怀有某种永恒的仇恨。这是一种灾难性后果。……我相信，你不了解各种政治倾向的西班牙工人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

阿拉基斯塔因在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敌意已经存留于后世。他在这封民族主义军队进攻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最后几天所写的信中说：“这个结果是可怕的，但它不难预见到，我们曾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愿意倾听我们的意见的每一个人。……[共产党人]应当独自对这一场可怕的灾难负责。即使他们以及那些像德尔巴约与内格林一样奴颜婢膝地为他们效力的社会党人有一百条性命，也无法抵偿他们的累累罪恶和蠢行。”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内战结束以后的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内格林向议会常务委员会（Diputación Permanente de las Cortes）描绘了某种想象的情况，他说，“如果我们收到的那些姗姗来迟的战争物资能够早一点运到的话”，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提前四个月收到那些战争物资，”他说，“或许埃布罗河攻势将意味着内战的结束。只要我们提前两个月收到它们，加泰罗尼亚也不会就这样失守。即使在博尔哈斯布兰卡斯失守之后——当时加泰罗尼亚的守军还有三万七千支步枪——如果我们收到我们需要的物资，几乎可以肯定，巴塞罗那不会失守。……即使在巴塞罗那失守之后，我们也可以守住加泰罗尼亚，然后我们将赢得内战，因为我一点也不怀疑，只要我们能够继续抵抗六、八或者十个月，形势将发生根本的变化。”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佛朗哥将军向加泰罗尼亚地区发动进攻，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他占领了西班牙最大的工业中心、曾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



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坚固堡垒以及地方自治脉动中心的巴塞罗那，这使加泰罗尼亚工人的士气跌到了低谷，失败主义情绪达到高潮。对于加泰罗尼亚中产阶级——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共产党人通过抵制造成破坏的工会革命博得他们的好感和信任而崛起——来说：抵抗政策和空泛地保证“尊重地方自治权”的十三点方案毫无意义。巴塞罗那市长、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皮·苏涅尔对阿萨尼亚总统说，“由于内格林对加泰罗尼亚的敌视政策，加泰罗尼亚人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而战了。”本人主张加泰罗尼亚自治的《巴塞罗那日报》主编曼努埃尔·克鲁埃利斯回忆了日益盛行的失败主义情绪：“我们非常明白忠于内格林政策的人说些什么，但是，他们的话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他们告诉我们要进行抵抗，可是，‘我们在哪里进行抵抗，用什么来进行抵抗？’我们这样问自己，‘而且，我们为什么抵抗呢？’他们提出的坚持抵抗[*resistència numantina*]的理由和目的在我们看来不够充分和明确。在其整个政治—军事政策中，内格林排除了一切加泰罗尼亚因素；根据持续不停地兼并集权的意图，他已经强行剥夺了加泰罗尼亚的决定性地位。”

加泰罗尼亚最后的危机即将到来。坚定支持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描述了一九三九年一月的巴塞罗那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马德里之间的“巨大反差”：“气氛多么不同啊！那时多么热情……现在多么沮丧！敌军进入巴塞罗那之前四十八小时，它已经是一座死城。……完全是因为这种气氛使平民和士兵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它]失守了。”

当罗霍不顾使工人阶级——他们构成了反佛朗哥阵营的主力军——士气低落并使加泰罗尼亚中产阶级幻想破灭的责任主要应当归咎于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时，对于突然降临加泰罗尼亚的灾难，共产党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它在纪念加泰罗尼亚失陷两周年之际宣称：“自治政府没有组织[地区的]防御，而是动员它的力量阻止进入加泰罗尼亚境内，在西班牙国内外与共和国政府一意周旋，破坏共和国政府的威

信。由于对人民的力量失去了信心，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更愿意背着共和国政府通过与帝国主义国家谈判来寻求救助，正是这些所谓民主国家的政府……帮助佛朗哥赢得了内战。”

没有证据表明自治政府与外国政府进行了秘密谈判，虽然加泰罗尼亚确实有一些分离主义者，只要存在一点可能，他们乐于通过谈判实现某种独立的和平。但是，佛朗哥几乎已经赢得内战，而且世界对此一目了然。尽管如此，共产国际仍然继续努力以求得到民主国家的军事援助。一九三九年一月，在民族主义军队进军巴塞罗那途中无情地扫荡他们面前的一切的时候，像其前身《国际新闻通讯》一样用几种语言出版的共产国际的喉舌《世界新闻与观察》发表了一份由十六个共产党组织签名的紧急呼吁：

战争威胁着法国、欧洲和世界。我们发出警告。为了帮助我们自己援助西班牙吧！

为了有力地援助西班牙共和派，我们向全世界人民，向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人们，向真心诚意的民主人士发出这一紧急呼吁。

两年半以来，在其遭到大批嗜血的意大利和德国士兵入侵的国土上，西班牙人民的儿女英勇地抵抗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铁流般的进攻。……

意大利对法国的战争已经开始。进攻巴塞罗那是这场战争第一阶段的顶点。……

为了制止战争，为了挽救和平，为了保护文明和人类文化的成果，西班牙共和派必须得到援助。

西班牙共和派将会获胜。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们必须立即……重新得到国际法的授权，向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保卫者、向加泰罗尼亚的共和派军队运送武器、

弹药、飞机和大炮。

这是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权利，它是一个根据全民投票所表达的人民意愿而产生的合法政府。……

人民掌握本国外交政策的时候到了。同情的话语和团结一心的空洞表示是不够的。

现在是人民采取有效行动的时候了。

但是，在西班牙国内外，谁也没有办法扭转佛朗哥军队强大的攻势，甚至没有办法抵挡。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工人们在忠于共和国的突击卫队支援下英勇镇压叛军的日子早已过去。共产党、社会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人们在国际纵队和苏联武器的支援下为解救受到威胁的首都而英勇保卫马德里的日子早已过去。正如佩雷斯·萨拉斯上校尖锐指出的那样：“那时候，后方的血腥斗争和前线的暗杀还没有开始，共产党人也没有在军队中占据不公平的优势。……[这]极大地削弱了其他党派成员的斗志，他们发现自己被一小撮人所支配，仅仅因为这一小撮人控制着武器。”

受到孤立和谴责的共产党人设想了一种孤独的英雄姿态。第十五军的共产党人军长曼努埃尔·塔圭尼亚讲述了军政委弗朗西斯科·安东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凌晨四点——佛朗哥的先头部队进入巴塞罗那市郊之前几小时——来见他的情况。“他们告诉我，共产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准备竭尽全力保卫加泰罗尼亚首府，动员群众从而赢得稳定巩固前线的时间。他们希望再现马德里的奇迹。不过，条件完全不同了。共产党领导人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肯定知道这种命令毫无意义，但是，为了继续作为坚持抵抗到底的组织，必须发布这种命令。……认为加泰罗尼亚首府的民众将会挺身而出保卫城

市完全不切实际。最后几天，无论怎么呼吁，在上百万居民中几乎无法集合上千人修筑工事。巴塞罗那悲伤地接受了失败，根本看不到人们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我们已经不是在一九三六年了。”

尽管如此，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仍然在一九六七年发表讲话描绘了一幅充满想象力的画面：“与西班牙人一道，成千上万苏联志愿人员在巴塞罗那的街垒和马德里的空中一直战斗到最后。”但是，实际上，除了极少数人之外，苏联公民全部撤离了西班牙。何塞·费尔南德斯·桑切斯在充分根据苏联原始资料撰写的一份短小精悍的论文中说明，“所有作为飞行员和坦克手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的苏联公民”于一九三八年十月至十一月离开了西班牙，因此，在一九三九年，只有包括职业军官、翻译以及辅助人员在内的三十名苏联专家仍然留在西班牙。“当巴塞罗那看起来马上就要被佛朗哥的军队占领时，”他说，“所有苏联顾问在城里集合并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清晨离开。”

毫无疑问，对于把内战持续更长时间的可能性，斯大林现在已经不抱幻想，尤其是考虑到意大利和德国以大量武器慷慨援助的民族主义军队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且不说撤出大部分国际纵队的志愿人员，仅仅召回除少数顾问及其助手之外的所有苏联人这一点就表明他对西班牙内战失去了兴趣，因而打算降低自己介入的程度。不过，对于他那脚踩两只船的策略来说，在半推半就地对待与希特勒交易的可能性的同时，继续执行抵抗政策意义重大。

在此期间，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民族主义军队对加泰罗尼亚地区发动进攻六周前，内格林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冗长的信，催促其迅速交付他需要的武器。在写给“我著名的同志和伟大的朋友”的信中，内格林强调说，“没有您关心我们的斗争，我们早就无力抵抗”，“我国的自由和民主也已不可挽回地失去前途和命

运”。尽管这封八页书信的前半部分是对欧洲政客——对于他们，诡计多端、深谙大国外交手腕的斯大林比内格林要了解得多——的乏味评论，但是，它的其余内容具有足够的历史价值，应当在此予以复述（着重体是我加的）：

在我们的国内政策中，团结已经实现了，如果考虑到我们经历过的混乱时期，尽管团结不尽完美，但它是令人满意的。尽管存在着不得不与同床异梦的各种党派——它们极易受到叛乱分子以及公开或者暗中与我们为敌的國家的影响——联合执政这种状况固有的难题，我们实现了这一团结。有时可能被认为是软弱的行为实际上只不过是承认，我们还没有完成某项计划所必需的实力。一名政治家的职责不是为了过早地实现某个目标而牺牲权力，尤其是当他没有一个同心同德的强大政党[大概是影射前面提到的“同床异梦的各种党派”]做后盾时。我相信，我成功地运用了这一原则。

由于外国影响和敌人的宣传，由于那些失去了活力或者从未植根于人民之中的党派的不满，一场坚决反对共产党的运动仍在激烈地进行。我不应对您隐瞒这一事实，我还要毫不犹豫地告诉您，共产党人是我最好、最忠实的合作者，在争取胜利的斗争中最愿意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但是，实际上，为了给人造成政府受外国势力操纵的印象，最微不足道的理由也被用来恶化气氛。……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全力回击，因为这将导致一场新的冲突。尽管如此，我并不担心国内形势，我确信，它将继续不断好转。……

[至于军队，]……最近几个月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加强了后备部队，组成了骨干队伍，技术有了进步。一切都在好转，尤其是军队的战斗力。不过，[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将军即将向您作的口头汇报将会使贵国政府意识到，迅速执行我们的订单（副本附后）可能对战争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为了造成彻底的影响，

必须大批而不是零星地发货。……一旦需要得到满足，我们就可能在明年春天过去之前打败叛军。……

我不应在没有向您保证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几年之内重建复兴西班牙时停笔。现在不是向您讲述我对复兴我国的计划的时候，但是，请相信我，考虑到西班牙的资源，对于一个统一的国家和一个有力地控制着国家的政府来说，完成这个任务并不困难。

最终，我们将比以前更加强大。许多传统的障碍将被清除。依靠能力和威望经过战争考验的人，凭借一支强大的军队和我国造船工业的潜力，我们可以建立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船队和海军舰队，并且向其他国家提供[船舶]。如果知道某个特定时期在西欧这个偏远的一隅有一支有能力在人类共同的进步事业中与苏联合作的强大海军，对于许多西班牙人来说这将永远是一种荣耀，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我们的苏联朋友以无私的方式给予我们的鼓励、合作和帮助。于是，我们就可以公开说明苏联人民高尚慷慨的奉献，他们的儿女作出的牺牲以及领导他们国家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我与您握手以象征团结，同时表达钦佩和感激之情。

从着重标出的内容中，我得出了四点结论。

第一，内格林急于使斯大林对他的政治智慧、他对西班牙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以及他的领导能力产生深刻的印象。

第二，多党制让他烦恼透顶，因此，假如事情顺利的话，他愿意用一个“同心同德的强大政党”取而代之。也就是说，他愿意超越斯大林和西班牙共产党长期以来所

主张的那种社会党与共产党的简单的合并，他本人曾在一九三七年六月表示拥护这一主张，当时他声称自己始终支持两党合并，因为它们的纲领“毫无二致”。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内格林作出这种表示只是为了讨好西班牙共产党，不过，在陶里亚蒂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证据显示，内格林将其政府的“虚弱”归咎于多党制（regimen de partidos），因此，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向西班牙共产党提议，建立一个“全国阵线，在这个阵线中，所有政党将不复存在”。这样一来，陶里亚蒂评论道，内格林认为就有可能“在不必时刻考虑某些政治团体的要求和威胁的情况下执政了”。陶里亚蒂继续写道，共产党劝告内格林放弃这个主意，因为“它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比森特·乌里韦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证实，内格林打算把所有党派合并成为一个全国阵线。“他坚持认为，通过这样一种合并或者变动，由于我们的实力和政治经验，[共产党人]将成功地强行实施我们的方针。组成内格林这个唯一的党派之后，政府的措施就不会遭到拒绝了，因为它一旦组成，共和派控制区的所有其他党派将被取缔。”

在最近半个世纪流传的那些神话中，必须打破的是内格林的合作者和追随者何塞·马利亚·加西亚·巴尔德卡萨斯博士所制造的一个神话。据加泰罗尼亚作家胡安·利亚尔奇说，加西亚·巴尔德卡萨斯告诉他，埃布罗河战役即将结束时（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苏联表示愿意向内格林提供“无限制的军事援助”，只要他同意在西班牙强行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内格林明确予以拒绝。……苏联向内格林提出的这个建议至今[一九八五年]不为公众所知，……[一九三九年二月]当军队试图越过法国边境时，他在菲格拉斯向一些最亲密的合作者和朋友透露了这个建议。”在五十年制造神话的过程中，内格林的其他辩护士谁也没有说起过这个故事，它与斯大林为使民主国家卷入内战而奉行的“温和”政策背道而驰。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圣地亚

哥·加尔塞斯的说法表面上看来可信得多，他声称，内格林通过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带给斯大林一封信，“向其询问为了引起欧洲民主国家的同情解散共产党的可能性”。但是，唯一支持这个说法的是内格林的另一名信徒和圣地亚哥·加尔塞斯的提携者拉斐尔·门德斯三年前所写的一篇文章，正如我们在前面某一章看到的那样，门德斯说，内格林告诉英国大使和英国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的情报部门负责人，如果英法两国向共和派政府出售其赢得战争所需要的武器，他不仅将把两名共产党人部长从政府中除名，而且还将取缔西班牙共产党并用非共产党人取代军队中担任指挥官的共产党人军官。不过，如前所述，不能根据表面意思相信内格林的这些表示，充其量是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除此之外不能认为它们有什么别的意义。

我的第三点结论是，如果取得内战的胜利，内格林将依靠那些“能力和威望经过战争考验的人”，这主要是一些共产党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最好、最忠实的合作者”——他们给了他对西班牙共产党的信心。

第四，内格林提出了两个在内战获胜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富有吸引力的条件，希望以此促使斯大林加快运送武器的速度：（a）提供商业船队和海军舰队；（b）在西欧有一支“有能力在人类共同的进步事业中与苏联合作的强大海军”。

总之，这封信具有特殊的意义，信中透露了内格林在内战结束以后愿意与苏联合作到什么程度，由于他对西班牙共产党的依赖，这种深度合作可能使西班牙变成苏联在西欧的第一个卫星国，成为二战之后在东欧建立的那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先驱。

热情之花本人在回顾往事时提供了一些情况，可以使人深入了解西班牙共产党打算在共和派赢得内战之后建立什么性质的政权。“内战期间，”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武装起来的人民的支持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被转变成为当代民主革命史上的第一个人民共和国。”她说，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中，工人阶级创建



了“最民主的无产阶级政权形式”苏维埃，而在这一场西班牙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西班牙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些国家，它成为一种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政权形式”。

尽管内格林的信上注明的日期是十一月十一日，但是，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我们已经知道，他将向斯大林口头汇报军事形势——直到叛军开始进攻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前几天才动身前往莫斯科。他在回忆录中既没有解释这一耽搁的原因，也没有谈论以前订购的武器。他说，在之前的某一天上午，内格林打电话要他尽快去一趟他的住处。赶到之后总理告诉他，“避免或者推迟加泰罗尼亚失陷的唯一办法是请求苏联向西班牙大批运送战争物资”，接着，总理命令他当天动身去莫斯科，带上一份所需要的武器清单，清单包括二百五十架飞机，二百五十辆坦克，四千挺机关枪和六百五十门大炮。“内格林对我说，”他写道，“这对我们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因此，必须派一个他完全信任的人去谈判。”由于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没有提到任何以前的订单，因此，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将带到莫斯科的是一份全新的所需武器的清单。

应当详细叙述一下他所描写的与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会见的情况：他坐在斯大林与翻译之间，（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国防人民委员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坐在他们对面。“当我们开始审阅所需武器清单时，”他说，“我感到有点局促不安，因为在我看来他们似乎是天外来客，显得不是那么真实。我惊喜地看到斯大林表示同意。”在起身离开谈判桌前，伏罗希洛夫问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如何支付将近一亿零三百万美元的货款，因为西班牙政府在苏联的余款已经不足十万美元。“‘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补足这一差额的办法。’伏罗希洛夫说，‘明天你将与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同志会谈，最后把这件事情定下来。’”伊达尔戈声称，双方同意向西班牙政府提供一笔“仅仅由我签字”保证的

贷款补足购买武器的款项。他评论说：“当我们想到某些国家在向一些政府提供几百美元贷款之前强加给后者的无耻条件，并且把那些条件与苏联政府不要任何担保和抵押就给我们一亿美元的迅速自然进行对比，……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在谈到苏联对我国的慷慨无私时充满感激之情。”

在判断伊达尔戈这一陈述时，人们不应忘记一九三八年三月内格林及其驻莫斯科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为了获得一笔七千万美元的贷款所遇到的困难。当时，苏联人坚持一半贷款用黄金担保并在两年之内偿还，而没有担保的其余贷款要在四年之内偿还。斯大林不可能仅凭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签字就会同意以不那么苛刻的条件提供贷款，尤其是在失败看来已经不可避免时。

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还声称，苏联人立即着手准备运送武器，它们被装上七艘苏联货轮驶往法国港口。但是他说，法国政府设置了“各种障碍”，一直拖延到最后时刻才允许这批武器过境法国。“当[武器]陆续到达加泰罗尼亚时，时间已经太晚了。我们再也没有可以集结飞机的机场或需要守卫的领土了。”

人们也许想当然地认为，在民族主义军队攻势正盛时运到加泰罗尼亚的武器就是据称十二月下旬或者一月从摩尔曼斯克装船运出的那些武器，不过，根据可以找到的证据，作出这种判断是草率的。曾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喉舌《战斗报》政论撰稿人的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对这一批战争物资——如果它实际上存在过——能否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之前运到西班牙提出质疑。他指出，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调集战争物资运到摩尔曼斯克，然后装上七艘货轮，这些货轮必须在北冰洋上沿着漫长的挪威海岸航行，然后进入大西洋和北海，驶过英吉利海峡，最后在波尔多卸下货物，用火车经法国运往西班牙——“据记载，这总共用了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另一方面，内格林的坚定支持者安赫尔·比尼亚斯反驳说，“站在反共的立场

上”，伊格莱西亚斯认为必须对这一批物资实际上是否曾经存在提出质疑。

在围绕着这一批据称是由于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莫斯科之行而运送的武器所进行的争论中，有一个事实值得特别予以注意。一九七四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苏联官方二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提供了关于内战期间运往西班牙的武器的精确数字（第二卷，第54页），它甚至没有提到某些人声称的这一次运送；然而，在这本书出版时，苏联没有理由隐瞒它对西班牙共和派的援助。该书作者在正文和附表中声称，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苏联“安排运送”（удалосьнаправить）五十二船货物去西班牙，与此相比，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一日运送了十三船货物，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只运送了三船货物（见下表）。

由苏联军事历史学会提供的这些数字使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和安赫尔·比尼亚斯的说法均不足为信：前者声称七艘装载着二百五十架飞机，二百五十辆坦克，四千挺机关枪和六百五十门大炮的货轮（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或一九三九年一月）从摩尔曼斯克启程，后者则毫无根据地断言，“大量”新的战争物资在一九三八年底从苏联运往西班牙。比亚尼斯的另一个说法也没有任何可信性：（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英法等国签订）慕尼黑协定后，苏联重新开始提供“大规模”援助。“将近一九三八年年底时，”他声称，“这一批物资陆续运到，因此人们只能相信，只有斯大林真的[像某些人坚称的那样]抛弃了共和国，才会不再安排运送这些货物。”此外，鉴于内格林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写给斯大林的那封信以及接着又在二十六日写信催促莫洛托夫必须“立即给我们发运我们已经订购的货物”，显然，伊达尔戈去莫斯科的任务并不是像他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要求得到新的战争物资，而是像比亚尼斯本人承认的那样，“落实以前提出的要求”。

## 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苏联运往西班牙的武器

武器	1936.10.1— 1937.8.1	1937.12.14— 1938.8.11	1938.12.25— 1939.1.28	总计
飞机	496	152	—	648
坦克	322	25	—	347
装甲车	60	—	—	60
大炮	714	469	3	1 186
机关枪	12 804	4 910	2 772	20 486
步枪	377 793	125 020	35 000	537 813 <sup>①</sup>

①原书误为497 813。

至于所谓一亿零三百万美元贷款，1在苏联的原始资料中没有丝毫证据表明曾经同意提供这么一大笔贷款。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能够拿出的唯一证据是骗人的，因为它的依据是内战期间内格林政府驻莫斯科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一九七〇年四月所写的一篇文章。帕斯库亚在文章中谈到他曾于一九三八年夏天提出过一笔六千万美元的贷款要求，也就是说，是在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前往莫斯科六个月前。另外，苏联《真理报》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声称，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苏联提供的八千五百万美元贷款中，西班牙政府还欠五千万贷款没有还，但它没有提到任何其他贷款。同样重要的是，据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内格林指示担任农业部长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比森特·乌里韦给苏联政府写一封信，询问“苏联是否愿意继续向西班牙共和国运送武器并且提供它要求的贷款，为了继续进行抵抗，这都是绝对必需的”。无论数额多少目的何在，苏联没有提供这笔贷款，因为，根据同一种共产党的官方资料，虽然苏联作出保证，“只

要共和国坚持抵抗，苏联将一如既往地继续提供必要的援助”，内格林政府却在几天之后被推翻了。

尽管关于民族主义军队进攻加泰罗尼亚期间运到该地区或法国的武器数量和种类的各种说法相互矛盾，不过没有争议的是，对于阻止佛朗哥将军的压倒性攻势及其一月二十六日对巴塞罗那的占领来说，它们运到的太晚了。这场战役失败惨重，以致造成整个国家行政机构的土崩瓦解。直到共产党的力量彻底崩溃为止，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一直是左派阵营中最有权势的共产党人。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陶里亚蒂显然试图使政府总理成为加泰罗尼亚惨败的替罪羊，他对这场灾难发表了以下看法：

[巴塞罗那]失守后，国家机器在前所未有的混乱和恐慌中彻底崩溃。在巴塞罗那失陷的八天前，内格林命令政府的所有部门撤退到赫罗纳-菲格拉斯一带，同时建议政治领导人全部离开。但是，他和各部部长们均未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撤退并保持政府机构的运转。由于这个原因，战斗陷入一片混乱。官员用卡车带走了他们的女人、孩子和朋友，带走了他们的床和床垫，甚至带走了他们的桌子和桌子上的墨水池。到处都是悲惨怪异的景象，这使整个城市士气低落。十几天来，通往边境的道路拥堵不堪。赫罗纳-菲格拉斯一带毫无准备，结果，这么多人最后只好露宿于田野以及菲格拉斯城堡内外道路的两侧，而城堡则成为政府的临时落脚点，因而也成了可怕的混乱最集中的地方。

没有什么部门还在运转，电话电报不通，铁路公路停运，总[政治]部不再办公。曾经作为政府处理这种局面的最后手段而训练的边防警察部队和突击卫队瓦解了。边防警察对混乱的发生负有责任。突击卫队参与了一些抵抗行动，但在陷入混乱之后不复存在。征兵中心和仍然存在的少量后备部队也无影无踪。只有总参谋部与前线

保持着联系并具有一定的运转能力，但是非常困难而且缺乏设备。由于后方完全陷入混乱，受到一阵阵混乱反复冲击的军队不再具有战斗力。但是，它不顾一切仍然在格拉诺列尔斯前线（第十一师）和赫罗纳外围进行抵抗，部队相对有序地后撤并且按部就班地执行破坏公路、桥梁、弹药库等设施的计划，从而使平民百姓和全部武器有可能向法国转移。

内格林完全不知所措。他没有主动采取任何具体措施组织撤退。不过，他确实放手让共产党自由行动了。他不得不天天与内阁中气焰嚣张的投降分子争论，内阁几乎总是在开会。投降分子当时包括除乌里韦之外的所有部长，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担任劳工部长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莫伊克斯同志除了在一月三十日的内阁会议上哭泣之外找不到更有用的事情做，会议期间，在宣读了罗霍写来的一封对我们的朋友背信弃义的信之后，内格林要求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使他在政府应当向中部地区转移时可以自行作出决定。别的部长，共和国总统，几乎所有其他党派的领导人，非共产党人军队首长，他们全都要求内格林结束内战，承认不可能继续进行抵抗，并且请求英法两国从佛朗哥方面争取“体面的”停战条件。没有人知道这可能是一些什么条件，也没有人试图具体列出一些条件：一般认为可能允许我们从中部地区撤出几千名身处险境的领导人，但不会更多。……显然，尽管内格林仍然坚持以前奉行的抵抗政策，但是已经失去了继续进行斗争的信心。……

内格林态度的矛盾之处在于，尽管他以不切实际的方式反复重申抵抗[政策]，但他后来没有为组织抵抗做任何事情。他的主要责任是，在[距法国边境八十公里的]菲格拉斯的最后几天，他没有下达必要的命令，至少把陆续运给我们的武器转送到巴伦西亚和马德里。

这些对内格林的最后指责并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因为，除了一些可以被敌军的行

动迅速摧毁的渔村之外，菲格拉斯被陆地和海洋与中部地区隔开；不仅如此，其防御部署实际上也完全被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着。所以不难得出结论，如同陶里亚蒂在报告中对内格林的其他指责——其中一部分后来成为共产党官方说法的原始依据——一样，这些指责在一定程度上是想推卸他自己对最后的失败应负的责任。同样不难得出结论，像陶里亚蒂一样，热情之花也打算使政府总理成为失败的替罪羊，多年以后她明显重复了陶里亚蒂对内格林的某些指责，说他“尽管好像仍然坚持以前奉行的抵抗政策，但已失去了继续进行斗争的信心”，还说他没有设法“将尽可能多的战争物资运往中南部地区”。

尽管陶里亚蒂和热情之花都指责内格林已经对抵抗的前途失去了信心，但是，某个身份不明的“萨同志”——根据陶里亚蒂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此人来判断，这是一名苏联军事顾问——在巴塞罗那失守两天之后告诉他：“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失陷无法挽回，他认为，一旦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不可能在中部地区继续抵抗，所以，彻底失败不可避免。”陶里亚蒂特别提到，这是“包括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职业军官”的看法。因此，谁也没有采取措施将武器运往中部地区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二月一日，在菲格拉斯城堡，一九三六年选出的西班牙议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在原本四百七十三名议员中，只有六十二人出席了最后这次议会会议。有些议员与军事叛乱者站在一边；有些议员逃离了西班牙；另一些得到了外交官的职位；一些人不能出席或拒绝出席，例如拉尔戈·卡瓦列罗和阿拉基斯塔因；而在内战爆发时发现自己站错了队的一部分议员早已被囚禁或处决。

最后这次议会会议超出了宪法通常的表面意义。它象征了一九三一年春天人们满怀欢乐和希望宣告成立的第二共和国的悲剧命运。出席会议的议员几乎没有人再次踏

上西班牙国土。大多数人将在佛朗哥将军统治时期的三十六年流亡生涯中客死他乡，尤其是温和派社会党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像路易斯·孔帕尼斯和胡安·佩罗等著名人士一样，他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于一九四〇年被盖世太保移交给佛朗哥，然后他被处决了，与成千上万个无名人士一起，成为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残酷镇压的受害者。

部长和议员们聚集在城堡的一个寒冷的地下室里。大多数部长穿着大衣，挤坐在一条不长的板凳上。为会议悬挂了共和国国旗，石头地面铺上了廉价的地毯。议会议长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站在一张蒙着红色锦缎的临时讲台后面，晚上十点半，会议开始。“议员先生们，”议长说，“根据宪法召集的这次共和国议会会议是在困难的条件下举行的。我们正在遭到外国入侵者及其国内同伙和爪牙的玷污和践踏的加泰罗尼亚的一块土地上开会。……我对你们的希望只是，无论如何也要按捺住你们内心的激情。……在西班牙的社会生活中……这次会议可能将是历史性的。”

“内格林是第一个发言者，也是唯一重要的发言者。”总理的一位目击了会议情况的朋友写道，“我们这些知道他身体疲惫、精神沮丧状况的人对他能否坚持发言表示怀疑。有几次他必须停下来振作自己，他不时地好像完全陷入了茫然，以致无法连贯表达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他的草稿念完之后，当时他才说了一半，于是不得不即兴发言。”

根据官方的会议记录，内格林声称，议会是在“一种严酷战争气氛”中召开会议，尽管“现在士气稳定，恐惧感也消除了”。但是，他说，事实上，几天来，“一阵恐慌几乎使我们的后防窒息，污染了我们的军队并且给整个政府机构造成破坏。不过，让我们平心静气地说，秩序和权力均未受到什么威胁。……尽管敌人不断挑衅，并没有发生叛乱、哗变或是反抗政府权力之类的事情”。他谈到了他的



政府在获得外国武器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有时无法克服的”困难，与此同时，在德意两国工业生产力的支持下，敌军“得到了它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甚至超出它的需要”，然后，他继续说：

和平决不仅仅是在战场上赢得的。它可以通过在敌军士兵中造成某种心理影响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在国外传播我们捍卫的观点来实现。西班牙政府的愿望从一开始就是想让世界看到这里为什么起纷争，并且让站在另一边的我们的同胞、朋友和敌人都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议员先生们，不要抱有任何幻想。我们西班牙人不是因为某个思想问题、某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打内战。不，我们是为我们国家的独立而战，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取胜，我们就将成为奴隶。……[我们]正在捍卫西班牙和另外一些国家的利益。……西班牙政府的使命是，不仅要让这些中立友好的国家看到它们的利益之所在，还要让它们意识到，任凭自己被我们的敌人玩弄的花招所迷惑大错而且特错了。……为了挽救欧洲和平，它们允许奥地利被吞并。为了挽救欧洲和平，它们允许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我不相信它们对此视而不见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如同幻想通过扼杀西班牙就能满足某些人的胃口一样，由于它们竭尽全力姑息纵容，这些人的胃口越来越大。

接着，根据他的十三点战争目标，总理只提出三个和平条件：（1）保证摆脱一切外国影响的国家独立；（2）保证西班牙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命运；（3）保证战争一旦结束停止一切迫害和报复。他说，这是结束战争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一想到意大利和德国的胜利对于我国意味着什么，我就感到毛骨悚然。”它们的统治将使西班牙面临丧失国家地位的威胁，而恢复这种地位则需要用几代人的时间。“[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一息。我们将在加泰罗尼亚战斗，……即使我们失去这里，我们还有中南部地区。那里有成千上万我们的战士，他们准备为那些值得为之献身的根本目标继续战斗。”

各个主要党派的代表接着在会议上发了言。马丁内斯·巴里奥提出了一项支持内格林的和平条件的简单议案，会议以口头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这项议案。凌晨零点四十五分，本次议会会议结束。

虽然没有人表示反对和平建议，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种姿态没有希望，因为，甚至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共和派军队胜利渡过埃布罗河之后，尽管当时战斗的最终结果仍未确定，佛朗哥已经断然拒绝接受除彻底胜利之外的任何解决方案。他说，认为“罪犯与受害者”可以和平共处只是幻想。“民族主义西班牙所向披靡，因此，”他声称，“它不会允许任何人或任何事把它的胜利夺走或者降低胜利的成色。”

显然，内格林现在没有资格向一个正在取得全面辉煌胜利的敌人提出和平条件。就连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他曾不止一次告诉总理，“只要对他保持信任，他将继续站在总理一边并且与其共命运”——都失去了信心。“相信外国还会提供援助难道不是一种幻想？认为军事胜利仍有可能难道不是一种错觉？”他在内战结束后问道，“也许在不少关注我们的斗争的人看来，这些问题可能具有失败主义倾向，但是我知道，所有经历过那种不幸的人也提出了这些问题。……当时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也许是他们的政治责任要求他们这样做；然而，我承担的军事责任要求我提出这些问题并给予回答。……已经非常清楚的是，除苏联之外的所有国家……背弃了我们，它们都在焦急地等待战争结束。”

一直在寻找替罪羊的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了罗霍的失败主义情绪：“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巴塞罗那失陷后，罗霍立即向内格林提出应当结束战争了，建议后者给所有部队指挥官下达书面命令，要他们升起白旗让敌军通过。可是，关于这一情况，内格林既没有告诉共产党也没有告诉萨同志。在一月二十九日的内阁会议上，罗霍

将军声称不可能进行抵抗了，后来他也这样说过。尽管他留在自己的职位上继续发号施令，但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挽救局面，他认为局面已经毫无希望。”

二月二日，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在菲格拉斯发表由政治局重要成员安东尼奥·米赫起草的臭名昭著的宣言，谴责了它的所有敌人：加泰罗尼亚自治论者，逃兵，失败主义者，第五纵队和托洛茨基分子。在西班牙共产党的词典中，“敌人”这个词现在几乎包括全体西班牙民众。宣言声称巴塞罗那的失陷造成了内战爆发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对于英法那些民主国家的人民来说”，这意味着“一场真正的灾难”，然后，它继续写道：

我们必须公开谴责这一事实，某些人的犯罪行为 and 背叛行径促成了目前这种局面，由于敌人的胜利，他们对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以及继续斗争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这些人绝大多数就是导致抵抗不力的那些人，他们玩弄阴谋诡计并迟疑拖延，他们反对统一行动，他们散布不和谐的言论，他们破坏其他人的努力和政府的工作。……

面对这种局面，为了在前线和后方建立纪律，共产党调动它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全部力量以避免错误，克服弱点和不足，并且愤怒地谴责这些破坏团结的活动和公然背叛的行径。它请求政府和所有人民的组织尽快采取强有力的惩戒措施。应当像处理前线的叛徒和逃兵一样处理所有曾经擅离职守或正在擅离职守的文职官员和军队指挥官。……

政治局特别谴责拉尔戈·卡瓦列罗逃离国土的可耻行为。他身边聚集着一小撮团结的敌人，西班牙人民及其组织的敌人。他曾不遗余力地蓄意破坏政府的工作，破坏我国人民的团结和抵抗，如今，他以逃跑达到其罪恶生涯的巅峰。政治局还希望反法西斯组织和人民愤怒谴责那些分离主义者或自治论者的行为，他们在以错误的政策

给调动加泰罗尼亚一切力量的重要工作制造困难之后.....只想着逃到国外去。人民将会看到这些懦夫和叛徒受到应有的惩罚。.....

面对这种极其严峻的形势，共产党重申它对西班牙人民胜利的信心并且声明，只要还有一块加泰罗尼亚领土，我们就将通过整编军队以及恢复前线和后方的士气和纪律来成功地保卫它。

共产党坚决抵制那些逃兵、失败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第五纵队不战而放弃加泰罗尼亚领土的犯罪行为。.....

我们党的神圣目标是捍卫民主共和国和西班牙的独立，它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它把全体党员和一切力量交给政府来支配，并且要求党的积极分子为解决当前重要的政治军事问题迅速提供最大的帮助，毫无异议地服从行政当局和军事当局的命令。.....

共产党声明，对于当前那些阻挠完成这一任务并且阴谋破坏团结的人，它将毫不留情地与之斗争。.....

最后，以全体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名义，政治局向正在受到野蛮残忍的入侵者的粗暴对待的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慰问。我们将继续战斗，直到取得解放巴塞罗那以及所有被侵犯的领土的胜利。

大家必须在前线或后方工作和战斗：所有共产党人，所有工人，所有反法西斯人士！

决不怜悯逃兵、懦夫和团结的敌人！

二月十日，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战斗结束了。比森特·罗霍将军，共和国总统，政府总理及其部长，议会议员，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成员，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成员，各

党派组织的领导人以及包括加泰罗尼亚地区被打败的军队在内的四十万难民越过边境逃到法国。“像许多别的人一样，”《泰晤士报》记者劳伦斯·费恩斯沃思写道，“我不想再看到这种景象。……逃难的西班牙人成群结队地翻过边境的山脉，人流如雪崩一般满山遍野——每个人都是一场个人悲剧的化身。”

“加泰罗尼亚的形势大好。”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长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在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高兴地写道，“佛朗哥以一场计划十分周密的大扫荡改善了局面。许多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被抓进监狱。我把情况告诉领袖，他命令将他们全部枪毙，他还补充说，‘死无对证’。”

## 第十部分 抵抗政策终止

### 第六十三章 内格林返回中南部地区

二月十日，在加泰罗尼亚这场大戏的最后一幕即将结束时，内格林在他的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的陪同下从图卢兹飞往阿利坎特。其他内阁部长随同他前往，只有何塞·希拉尔和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除外，前者与阿萨尼亚总统一起留在法国，后者留下为的是处理财政事宜。

到达阿利坎特之后，内格林宣布马德里将成为正式政府所在地。他还宣布，“在群众的情绪鼓舞下”，他的政府将为“国家独立、民族自决和全体西班牙人大团结的原则”战斗到底。至关重要的是，他声称，确保斗争“不会在外国统治或恶毒仇恨与野蛮报复的情况下停止”。

并非所有内阁成员都为他前往中南部地区的决定喝彩，大多数内阁成员最初拒绝离开图卢兹。只是在他警告了那些不服从的人之后，他们才跟随他前往。不过，据陶

里亚蒂说，他们“在马德里接着做在菲格拉斯做的事情：召开内阁会议以证明不可能继续进行抵抗，因此需要谈判投降”。

中南部地区的军队将领中同样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我在阿利坎特机场一降落，立即与军方权威人士进行了联系：米亚哈将军，马塔利亚纳将军，各部队首长和海军司令。”几周之后内格林告诉议会常务委员会，“我可以从电话交谈的大致情况中觉察到，政府首脑的到来使许多人不知所措，甚至让许多人不高兴，好像这扰乱了他们商定的某些事情。我尤其注意到与我通话的那些人态度冷淡而生硬。”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表示，军队领导人的士气让他心情沮丧。他还记述，在巴伦西亚米亚哈将军的指挥部里进行的一次交谈中，他和内格林注意到，他们对继续抵抗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我们鼓舞士气的话没有在他们心中引起共鸣，他们心如死灰，对一切都已麻木不仁，只盼望早日结束战争行动。”

这一切不应让人感到意外。一月三十日，在对内格林了解军事形势的要求复电时，米亚哈将军就报告说，军队“武器匮乏”，无法使用的物资的比例“实在令人痛心”，而且，经过两年半的内战之后，民众已经“厌倦了战争”。

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人们普遍认为中部地区的军队无法抵挡敌军发动的任何攻势。这是因为敌军拥有压倒性的兵力优势，同时因为我军缺乏武器、飞机和运输工具，而且我军部署薄弱。”所有职业军官都认为，“不可能进行抵抗了”，包括那些共产党人职业军官。至于均为职业军官和共产党员的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安东尼奥·科登、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和负责空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卡洛斯·努涅斯·马萨，他们“公开”表示他们不认为可以继续进行抵抗。“我相信，”陶里亚蒂接着说，“在从民兵队伍提拔起来的指挥官中，认为我们不能继续抵抗的意见也相当普遍。同样的看法也普遍存在于无政府主义者、共

和派和社会党人的骨干中，存在于警察部门和政府机构中。因此，问题不再是如何组织抵抗，而是如何‘体面而且不失尊严地’结束战争。”他说，有一点大家都同意：共产党人是和平的“唯一障碍”。“在群众中，厌战情绪以及战争所带来的苦难使他们表现出强烈而普遍的和平愿望。整个国家都在等待形势出现结束战争的新发展。人们不再期望胜利。”（在评价内格林及其支持者关于有可能进行有效抵抗的说法时，读者应当记住我在这份曾经是‘绝密文件’的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用着重体标出的那些内容。）

陶里亚蒂谴责米亚哈将军——他最近刚被任命为陆海空三军总指挥和中南部地区的政府代表——因任命里卡多·布里略中校为该地区的警察部队指挥官而使形势“进一步恶化”。布里略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九三七年六月突然袭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时，他是巴塞罗那警察部队的指挥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被任命为埃斯特雷马杜拉驻军的指挥官。一九三八年九月，他被解除指挥官职务并被共产党开除出党。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陶里亚蒂把这位“前共产党人”描述成为“一名为其对党的刻骨仇恨所驱使的共济会会员”。陶里亚蒂声称，在他的指挥下，以前曾经是“党所信赖的警察部队之一”的突击卫队恢复了“他们的旧传统和反动性”。至于“社会党骨干和投降分子所控制”的边防警察部队，可以“毫不费力地调动起来”与共产党作斗争。“因此造成了一种真正的权力机构针锋相对地与我们斗争的局面，这场斗争不再是暗中秘密进行的，而是公开持续地进行。”

早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之前，西班牙共产党在中南部地区的影响力已经开始衰退了。热情之花后来承认：“党的领导核心为了靠近政府而转移到加泰罗尼亚对我们来说弊大于利，因为党在中南部地区的所有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均受到了严重削弱，尤其是在马德里。我们的对手为了加强他们的地位而利用了这一失误。”实际

上，正如我们所知，据何塞·希拉尔说，曾为西班牙共产党堡垒的马德里的气氛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致到了这种程度：“必须制止人们断绝与共产党人的所有关系，并且不许他们宣称自己是共和国的敌人。”

正是在这种政治影响力衰退乃至丧失的背景下，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到达中南部地区参加这场西班牙大戏最后一幕的演出。党的主心骨和实际上的领导人陶里亚蒂与他们一起到达，用党的官方内战史的话说，他返回西班牙以便“继续用他的经验帮助西班牙的同志们”。另一名共产国际的代表鲍里斯·斯特凡诺夫以及三名政治局成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热情之花和佩德罗·马丁内斯·卡顿已在那里，而党的书记何塞·迪亚斯则因重病去了苏联。尽管西班牙共产党声称它要继续奉行抵抗政策，但是，担任巴伦西亚的共产党喉舌《真理报》负责人的意大利共产党员埃托雷·万尼——他与驻在巴伦西亚的共产党领导人和苏联代表团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证实：“实际上，大家在内心深处都感到，一场已经使交战双方的西班牙人伤亡无数的战争毫无意义。后来我才意识到，被认为是共产党人官方立场的‘继续抵抗’只不过是接受苏联人提出的‘抵抗到底’这一口号的彻头彻尾的表面文章。”

内格林实际上是否像他的亲苏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经常显示的那样乐观——后者认为一场全面战争一触即发，因此应当在战争爆发之前继续抵抗——值得怀疑；因为不仅陶里亚蒂指责总理“对继续抵抗的前景没有信心”，而且他的国防部副部长安东尼奥·科登也声称，他“不是作为决心牢牢控制局面以便指挥抵抗行动的政府首脑，而是作为一个希望减轻良心不安并且接受必要牺牲——尽管他认为牺牲已经没有意义——的绅士”返回西班牙的。

无论内格林心里可能想什么，几乎毋庸置疑的是，他被矛盾的心情折磨着。我们可以从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他写给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一封为自己辩解的信中发



现一些暗示了他的内心煎熬的内容：“我试图振作精神，恢复工作，为有效的抵抗[和]继续战斗集中一切必要的力量，因为，即使我们不能获胜，这也是挽救那些可以挽救的东西的唯一途径，至少，这可以挽救我们的名誉。”我们有理由假定，促使内格林迅速返回西班牙的是下面这些因素中的部分因素：（1）他对共产党人的忠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欠他们的“人情”；（2）他打算以不逃避责任的方式挽救自己的尊严；（3）他希望他的迅速返回能提高士气，同时为那些越过边境逃到法国并且认为已经不可能继续抵抗的军队领导人树立一个榜样；（4）他希望抵抗能够促使佛朗哥将军作出某种宽容的保证，即使得不到这种保证，抵抗也将为他的追随者争取逃往国外的时间，因为这些追随者大部分都有生命危险；（5）他希望，只要继续坚持抵抗，西班牙内战最终可能成为一场欧洲全面战争的一部分——这种希望越来越渺茫；（6）他认为，如果事实证明不可能继续进行抵抗，他就可以把投降的责任和失败的耻辱嫁祸于他的对手。

内格林知道，除了那些效忠于西班牙共产党的军官之外，几乎没有军队领导人支持继续抵抗的政策，这加剧了他的痛苦。胡安·莫德斯托写道，内格林说的不错，应其要求从法国回国的指挥官和政治委员全部都是共产党员。“不过，有必要强调的是，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因为我党的控制欲望，而是因为其他党派的许多人都当了逃兵。”实际上，据科登说，大部分军队高级指挥官和政府高级官员——副部长，局长，总监，总参谋部人员和部队首长——“以各种各样的借口不愿返回西班牙”。在那些没有返回西班牙的高级官员中，引人注目的有：工兵总监帕特里西奥·德·阿斯卡拉特上校；一月底“因临阵逃脱”与另外一些党员被西班牙共产党开除出党的安全总局局长爱德华多·奎瓦斯·德拉·培尼亚上校；国防部人事部门负责人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上校；炮兵总监何塞·路易斯·富恩特斯上校；胡安·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将军；（接替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担任东路军和埃布罗河战役总指挥的）恩里克·

胡拉多将军和曾任东路军司令、最近担任菲格拉斯军事长官的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不过，比所有这些临阵逃脱者都重要的人物是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将军，在与内格林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的两年中，他们之间和谐的关系从没有受到不同政见的损害。

除了支持阿萨尼亚的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之外，这些军官在政治风向有利于共产党时都曾支持共产党，或是与波萨斯将军和奎瓦斯上校一样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尽管如此，他们现在都对继续抵抗失去了信心。巴塞罗那失陷之后，罗霍告诉阿萨尼亚：“所有资源均严重匮乏，部队没有一点士气。”而且他还补充说：“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了。”内战结束后不久，在他所写的第一本书中，罗霍解释了他决定不去中南部地区的原因：“显然，有人迫使大家接受了我们应当坚持抵抗政策的观点，因为这可能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他们还希望我们继续作出一年的牺牲！但是，已经没有一点基础了！让我们不顾所作出的那些牺牲！抵抗！只要得到希望的培育和理想的支持，这是一种崇高的英雄主义模式！但是，在高举理想大旗的决心崩溃以后……[抵抗]不再是一种军事姿态。它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怎么可能抵抗？我们必须抵抗的理由是什么？”

接着，罗霍提出了一个被内格林及其支持者故意无视的严厉指控：“如果战争真的在中部地区继续激烈地进行着，那么，为什么要把集中存放在法国的食品、原料和武器装备清理掉呢？这种做法过于显眼而引起注意，以致无法不让人感到不安。一方面，通过出售库存物资在经济上为战争善后；另一方面，在不提供必要条件——甚至不提供食品——的情况下不断发出抵抗的命令。”

内格林在内战结束后声称，中南部地区拥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可以组织部署“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防御，但他回避了罗霍对于继续抵抗的总体怀疑。相反，他

赞扬了罗霍的“坚定责任感”、“绝对正直”及其“无可指责的骑士风度”和“摆脱了偏见的爱国主义精神”。共产党人也没有公开指责罗霍拒不返回西班牙。实际上，他们的官方内战史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显然，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都不想与这个人纠缠，是他们把他提拔为高级军事将领并且给他戴上桂冠和最高勋章，而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军事形势。公开谴责罗霍的失败主义情绪和临阵逃脱将为他们的对手提供弹药并将打破半个世纪以来他们精心炮制的神话：完全是因为“叛徒和投降分子”才导致了内战的失败。

除了他所承认的不利于共和国的军事力量对比、清理法国库存的战争物资以及选择留在法国的那些高级军官的临阵逃脱等情况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使罗霍作出了不回西班牙的决定。“许多下级指挥官的行为丝毫无法让我信任。即使抵抗的口号切实可行而且有效，他们所做的一切……也与他们应当做的背道而驰。然而，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确信，这个冠冕堂皇的口号既不可行，也不合理。”

正如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所证实的那样，最后六架飞往西班牙的飞机上“几乎空无一人”，考虑到选择留在法国的那些军队和政府的高中级官员的精神状态，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至于那些返回西班牙的共产党人，伊达尔戈承认，他们并不是去那里“赢得荣誉，因为我们知道形势几乎毫无希望。我们因为党的纪律而去那里”。不过，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返回西班牙。第十五兵团的共产党人指挥官曼努埃尔·塔圭尼亚证实：“他们包括西班牙共产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领导人，如[弗朗西斯科·]安东、[安东尼奥·]米赫、[路易斯·卡博·]希奥尔拉和圣地亚哥·卡里略。”恩里克·利斯特支持了这一指控。“在二月十三至十四日夜间我乘坐的从图卢兹飞往中南部地区的飞机上……有十三名乘客，”他说，“尽管机舱实际上可以容纳三十三人。……关键在于，前面提到的那些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执委会成员……认为，战争已经失败了。”尽管利斯特是在试图从当时党的

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手中夺取党的控制权时提出这一指控的，但是，卡里略本人对他没有返回西班牙的解释自相矛盾，迷雾重重，以致不足为信。

在留在法国的共和派领导人中，没有人比如今暂时栖身西班牙驻巴黎大使馆的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更公开地承认失败。早在越过边境逃到法国之前他就告诉内格林，他不会返回西班牙。“绝对不会。”他说，“如果我去中部地区，我就是支持并且赞成我不赞成的抵抗政策。我将留在[加泰罗尼亚]直到政府同意我离开，但是，一旦我越过了边境，除了谋求和平之外，你们不能指望我做任何事情。我不会考虑返回西班牙。”

由于担心阿萨尼亚辞去总统职务从而导致英法两国立即承认佛朗哥政权为西班牙的主权政府，内格林于二月十二日派德尔巴约飞往巴黎告诉总统，政府认为他返回西班牙“责无旁贷”。但德尔巴约白跑一趟。“我唯一的职责是谋求和平。”阿萨尼亚告诉他，“我拒绝……拖延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我们必须为得到人道的待遇努力争取最有利的保证，然后尽快结束一切。”接着，内格林给阿萨尼亚发了两封电报，据议会议长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说，第二封电报“比第一封更加无礼，伤害感情”。内格林指责总统“放弃了他的宪法责任并‘以西班牙人民的名义’要求他立即返回共和派控制区”。但是，总统拒不回国的决心已定，尤其不会“回到马德里与内格林和乌里韦及其帮凶热情之花和佩佩[何塞]·迪亚斯为伍”。

尽管阿萨尼亚告诉德尔巴约唯一的出路是谋求和平并为得到人道的待遇努力争取最有利的保证，但是，在他自己的文字中有迹象表明，他认为达成一项不进行报复的解决方案是痴心妄想。自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当时他为了避免内战任命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担任一个“和解政府”的首脑——以来，他一直希望通过和解实现和平。但是如今，在二月十三日佛朗哥将军颁布了令人恐惧的政治责任法之后，达

成不进行报复的解决方案的一切可能性荡然无存。民族主义政府的官方公报用二十四页篇幅刊登了这项法令，从它的序言可以明显看出法令的适用范围和严厉程度，序言写道，这项法令针对所有那些“以行动或者严重失职煽动或者造成赤色颠覆”的人以及“阻止民族主义运动取得历史性的圣战胜利”的人。根据法令的规定，所有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政党、工会组织和附属团体将被取缔，年龄超过十四岁、曾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期间参与“破坏社会秩序”或“以消极或者明确的行为”抵制或者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的人将受到法令的惩罚。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注意到，至少一半西班牙人在应当惩罚的范围内。

这项法令并不令人意外地引起了恐慌。内格林刚刚于前一天在马德里发表了一项声明，号召继续进行抵抗，号召“重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使马德里名垂青史的精神”，号召“大家超越党派利益精诚合作”。只有这样，他宣称，政府才能保证西班牙的独立并且防止国家被“鲜血、仇恨和迫害的浪潮所淹没”。

不过，以为民众的力量将会为了重新团结在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周围而再次作出牺牲只是幻想。当共产党领导人从法国回到马德里时，他们发现，左翼各派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与社会党左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一样，政治侵害和压制使左翼人士感到愤怒，对革命运动的攻击使他们心灰意冷，与此同时，没有获胜希望的战争迟迟不能结束也使他们筋疲力尽，他们憎恨内格林政府——社会党人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将其称为西班牙历史上“最玩世不恭、最专制的”政府——也憎恨它的抵抗政策。

“抵抗？为什么？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社会党温和派人士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巴塞罗那的失守和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陷落……已使人们的希望破灭，甚至使大

部分自欺欺人的共产党人希望破灭。前线的部队令人担忧地发现，纪律松弛和开小差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没有投敌的士兵留在战壕里并设法回家。……内格林认清新的现实了吗？有人试图告诉他溃疡蔓延的致命性吗？总理身边的那些人与总理一样被抵抗政策所束缚，他们都是共产党人。”

“只有因为骄傲自大而目空一切的人才会无视这一事实，”担任军需部门负责人的贝斯泰罗派社会党人、劳动者总工会全国铁路工人联合会主席特里丰·戈麦斯写道，“当他们回到中南部地区时，所有人都敌视他们——所有人，也就是说，除了继续操纵内格林的那一伙共产党人之外。……不能否认的是，……攻占加泰罗尼亚地区是敌军轻松取得的一场胜利。有鉴于此，内格林政府所鼓吹的抵抗政策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事实上，……内格林政府有名无实。没有任何部门在行使职能；名义上的各部部长根本不想证明自己名副其实；他们一心想着如何确保自己能够离开西班牙。”

正如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恰如其分地指出的那样：政府是“一个沉默、瘫痪的幽灵，它既不管事也不发话，没有办事机构和固定的驻地”。

内格林迫使其返回西班牙的内阁成员又是什么看法呢？担任司法部长的普列托派社会党人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告诉曾任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安全总局局长的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文塞斯劳·卡里略：“为所有在佛朗哥占领时冒着风险继续留在共和派控制区的同志弄到护照，然后让他们全部离开！……不管内格林说什么，人们在这里什么事情都不做。请记住，他被共产党牢牢地控制着，以致他只告诉乌里韦和德尔巴约自己正在干什么。我们另外这些部长无足轻重。”

在马德里的反对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他们针对共产党、内格林及其政府以及社会党执

委会“开展了一场激烈的诽谤活动”。“他们企图控制[内格林派和共产党人所控制的]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领导权。……除了马德里之外，这些社会党人在阿利坎特、穆尔西亚和哈恩等省份对政府享有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

促使政治空气恶化的一个因素是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几天前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在菲格拉斯发表的那一份谴责拉尔戈·卡瓦列罗“逃离国土的可耻行为”的宣言，上一章里提到过它。在向莫斯科报告时，陶里亚蒂称这份宣言强烈谴责了“懦夫和投降分子的阴谋和背叛”。他说，主要抨击了卡瓦列罗在巴塞罗那失陷两天之后逃往法国的行为。“这样做完全正确……但是，政治局决定非法大量散发[《工人世界报》。不顾军事部门的审查，马德里这份共产党的报纸多次印发宣言并将其张贴在墙头]。结果导致社会党在一系列省份[与共产党]断绝关系，马德里率先发难，马德里的人民阵线决定公开谴责共产党，将其斥为团结的敌人。在其他省份，共产党被驱逐出人民阵线。……事实上，这份宣言被我们的敌人当作共产党人不希望和平的证据向群众宣传。”

菲格拉斯宣言事件发生时，陶里亚蒂的共产国际同事鲍里斯·斯特凡诺夫在马德里，他在提交共产国际的一份“绝密”（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报告中证实了反对派的敌对反应，这份报告的影印件可以在马德里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档案馆里找到。“起草这份宣言的同志们并不了解中南部地区当时的政治环境。”斯特凡诺夫写道，“它成为组成最广泛的反共联盟的一个借口。……我个人担心这种情况将会发生，因此建议推迟发表，哪怕只推迟二十四小时。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但是，在进一步考虑之后，他们决定大量印发。”由于人民阵线各个派别的反应，斯特凡诺夫继续写道，政治局明显地发现，“我们党被孤立了，[而且]是唯一一个要求广泛采取坚决抵抗政策的政党”。他说，由于军事机构、警察部门、工会组织和新闻界已经开始采取鲜明的反共立场，党的孤立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迅速作

出反应，尽快设法打破它们的反共联盟。”

这份宣言最初使内格林不胜烦恼，不过，他的烦恼逐渐消失，因为，在二月二十六日发表了“由内格林亲自修改了”最后草稿的第二份宣言之后，据陶里亚蒂说，内格林“开始工作，而且做的比党要求的还要多”。陶里亚蒂还向莫斯科报告说，党犯了另外一些错误。在谈到二月初（他十六日到达之前）共产党在马德里召开的会议时，他说，会议的“整个基调不对头”，因为它没有考虑“新的斗争条件和群众的情绪[即他们的和平愿望]”。接着他说，热情之花的讲话“明确地激烈谴责了投降分子的阴谋”，这不会为人民所理解，并且“使我们更加孤立于马德里的所有其他政治力量”。多年以后，西班牙共产党流亡时期的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发表看法（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种看法多半也适用于陶里亚蒂对鲍里斯·斯特凡诺夫的批评）说，陶里亚蒂对党的批评“可能受到某种恐惧心理的影响，这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害怕自己被苏联领导人当做西班牙失败的替罪羊”。

与陶里亚蒂相反，参与确定党的会议基调的斯特凡诺夫在提交共产国际的秘密报告中为党的路线进行了辩护。“的确，”他承认，“在马德里会议上几乎没有人谈论和平。……也许应当更多地谈论并且发表各种意见。不过，我仍然认为马德里会议的路线和多洛蕾丝的讲话完全正确。……由于局面混乱、阴谋诡计、士气低落、失败主义、密谋行动、……饥饿和普遍的筋疲力尽，……马德里会议当时是共产党最重大的政治活动。……马德里的党员清楚地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他们知道，考验他们的时候到了。……他们焕发出满腔热情，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继续战斗下去。……马德里会议是为克服党的孤立状态所采取的最重要措施。因此，把党的孤立归咎于这次会议是完全错误的。……多洛蕾丝发表讲话的那次会议比以往吸引了更多的人。如果我们在阿尔瓦塞特、阿利坎特和其他城市组织召开由多洛蕾丝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发表讲话的会议，如果我们在马德里组织召开更多的会议，那么，群众将站在共产党一边，



决不会出现卡萨多与卡瓦列罗派、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派的联盟。”

在写给莫斯科的那一份批评西班牙共产党的报告中，陶里亚蒂为马德里会议的基调指责了他的共产国际同事斯特凡诺夫，他还指责斯特凡诺夫“完全被动并且在政治上盲从”。实际上，据斯特凡诺夫提交莫斯科的报告透露，当着共产国际领导人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的面，陶里亚蒂说：“党和我所犯的最大的政治错误是，没有在马德里会议上就和平这一主要问题作出决定。”另一方面，陶里亚蒂把党的路线在会后的变化归功于自己，他说自己在二月十六日回到马德里后开始改变党的路线。“[政治局领导成员]切卡同志第一个认识到进行调整的必要性……并且立即接受了这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调整[这反映在二月二十三日政治局发表的宣言中]公开提出和平问题，这表明，我们像全体人民一样希望和平，……内格林可能已经在菲格拉斯阐明了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但是，为了确保[佛朗哥将军]接受它们，必须进行抵抗。”新的宣言坚持认为可能得到民主国家直接或者间接的帮助——这可以在上一章所引述的内容中看到——并且紧急呼吁“团结和反法西斯的兄弟情谊”，它宣称，西班牙共产党决不会放弃“与所有党派、所有领导人、所有工会组织和所有政治、军事团体”团结并且紧密合作的政策。

但是，对于缓和对立派别之间的敌意，这份宣言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因此，由于担心在马德里走投无路，分别于二月十日和十六日从法国回来的内格林和共产党领导人决定在二十七日离开首都。曼努埃尔·塔圭尼亚证实：“马德里像一个陷阱，我们全都想趁它的门还半开着时逃出去。……我们的敌人和以前的盟友对于我们非常仇视，使我们不得不警惕。”同样害怕被困在首都的内格林转移到了埃尔达，这是位于阿利坎特省沿海地区的一个小镇，离马德里三百八十二公里，邻近的莫诺瓦尔有一个机场。他忠实的同志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和曼努埃尔·桑切斯·阿尔卡斯陪同他前往，前者是他的政治秘书，后者是主管宣传的外交部副部长，这两个人均能力出

众，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陪同他前往的还有他的副官胡利安·索莱·孔德少校，这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们把指挥部设在一座名叫波夫莱特的旧宫殿里，它的位置代码是“尤斯特”。这座宫殿与另外一些建筑物一起在当月早些时候被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征用，保护这些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人所占用的建筑物的任务交给了第十四军的一支由一百名共产党游击队员组成的精干卫队，第十四军是共产党员多明戈·温格里亚少校指挥的一支共产党部队。温格里亚的苏联顾问斯坦尼斯拉夫·A·沃普沙索夫上校写道：“内格林在埃尔达镇安顿下来，对所有事情都撒手不管。他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做任何事。他的消沉状态正中失败主义者和叛徒的下怀。”尽管为内格林提供精干的游击队员保护的显然是共产党，但是，按照党使内格林成为替罪羊的策略，恩里克·利斯特也对总理转移到埃尔达这么“一个远离任何中心城市的地方”提出批评。“这为那些阴谋家肆意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利斯特说，“同时也自愿地将自己尽可能地与人民和军队隔离开来。”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担任农业部长的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比森特·乌里韦同样对内格林横加指责。他写道，在部长们回到西班牙到他们离开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内格林只召集了两三次政府会议，而且“几乎没有讨论什么事情”。回到马德里后不久，他“消失了好几天”，没有让共产党知道他在哪里。“以前，我们知道他的所有重要举措，特别是那些政治举措，他也会征求我们的意见。这一次他完全保密，对谁都不说他在干什么和打算干什么。”后来，内格林告诉共产党，他已经会见了“其中有许多共济会会员”的军队领导人，后者显示出某种“强烈的反共心态”。不过，乌里韦证实：“内格林保持着消极的态度，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他在另一段内容里写道：“在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内格林与最后这一时期的内格林之间有一道鸿沟。以前，他显示出决心和信心。他寻求我们的帮助，征求我们的意见。如今，虽然没有与我们断绝关系，他不再寻求我们的支持。他听我们的建议像

有些人听下雨的声音一样，在共和派控制区逗留期间，他没有采取任何表明他希望把战争进行下去的措施。为了继续进行斗争……为了团结一切党派和力量，他只得到一个政党的坚定支持：我们的党。在我看来，他不依靠共产党，因为他认为战争已经失败了。他不关心继续斗争，而是努力使自己处于某种地位，以便他能凭借这种地位以最有利的方式结束他的总理生涯。”

在二月二十七日内格林及其共产党人随从撤往埃尔达的同时，共产党的政治局成员在陶里亚蒂的率领下离开马德里前往埃尔帕尔马，埃尔帕尔马位于穆尔西亚正南通往首都的主要道路上，离埃尔达约八十公里。“我们待在穆尔西亚附近，以便能够依靠某个重要的党组织：”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另一方面，热情之花提供了一种值得怀疑的解释。她写道，同志们同意转移到位于埃尔达与马德里之间的这个地方，“以便迅速得知政府的决定从而在首都采取行动，因为电话和电报通讯变得越来越困难”。难以看出，在距离首都三百八十二公里的埃尔帕尔马，政治局怎么能够有效地行动。除了陶里亚蒂提供的那个理由之外，这次转移的一个貌似可信的理由是，埃尔帕尔马靠近卡塔赫纳的海军基地（相距四十三公里），他们担心那里的舰队开小差，从而失去撤离中南部地区的主要手段。

尽管内格林转移到埃尔达时精神沮丧，但他打算显示一下力量。科登声称，总理告诉他，他想让“国家和军队感到政府仍在行使其职责”，不过，人们的普遍印象是，政府已经有名无实。无论如何，内格林与他的内阁成员关系并不融洽。据二月十六日见过他的恩里克·利斯特说：“他对一些部长破口大骂，说他们是什么也不做的懦夫，只会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窝里斗。”内格林说，只有乌里韦、莫伊克斯和德尔巴约“继续保持着他们的尊严”。从目击者的这些描述中浮现出来的是一个名存实亡的政府的形象，或者说，至少是一个瘫痪的政府的形象，这一点得到新近被内格林任命为中部前线督察委员的亲共人士埃德蒙多·多明格斯的证实。尽管多明格斯

声称政府返回中南部地区受到热烈欢迎，但他承认，谁也不能确定它在什么地方。“在回到中南部地区的二十三天时间里，”斯特凡诺夫向莫斯科报告说，“政府没有做任何事情以使军队和人民感觉到，还存在着一个管理国家的政府。”西班牙共产党的忠诚党员比森特·乌里韦对这种政治乏力局面作了全面的描述，他说，部长们“一点事情也不做”，“甚至懒得把他们各自的部门安顿就绪”。另一方面，他补充说，“他们在夜总会和类似场所里相当活跃”。不过，即使是在这些政府部长来到中南部地区之初，人们就对他们不屑一顾。“当我们大家一起去拜访米亚哈总指挥时，他穿着睡衣接待了我们。……这向我们暗示，在他看来，没有政府也许更好。穿着睡衣接待客人表明了藐视和轻慢，但是，当一名军人穿着睡衣接待他的上司时，那就到了蔑视的程度。”

现在有必要更详细地描述一下从二月十日内格林回到西班牙那一刻起他所面对的最为令人不安的问题。两天后，他会见了中路军司令塞希斯孟多·卡萨多——早在内格林回来之前，卡萨多就在密谋尽快结束战争。尽管卡萨多对最后两个月战事的记述有时混乱或不准确，但他关于他与内格林会谈情况的说法却无人反驳。总理要求他向自己汇报总体形势，卡萨多着重报告了以下几点：

1. 失去加泰罗尼亚地区使战争物资的生产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原材料的短缺造成了令人担忧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为继续斗争生产最低限度的必要物资。”

2. 坦克、反坦克炮、大炮和自动武器几乎没有什么补充，飞机只剩下三个娜塔莎中队、两个卡秋莎中队和二十五架战斗机。他说，对于共和派飞行员来说，与飞机数量及性能占优的民族主义空军作战将是自杀。山区以及昆卡和瓜达拉哈拉草原上的部队忍受着冬天的严寒，战士没有棉衣，而且因为不可能给他们发皮靴还穿着凉

鞋。

3. 整个内战期间，食品供应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现在则是“特别严重而且没有希望缓解”。没有运输工具把莱万特地区的食品运出来，缺乏汽车零配件，尤其是轮胎。

4. 曾经显示出极大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的马德里民众，现在公开表示“厌倦了战争希望和平”。

5. 与这种阴沉的景象形成对照的是，敌军“正以征服者的高昂士气”在马德里南面集中兵力以便发动最后的攻势，最少投入二十五个师，同时投入大量坦克、大炮和飞机。“在这种情况下，马德里的陷落不可避免，还将造成大批人员死亡，这将成为无谓的牺牲。”

内格林回答道：“我赞成你认为情况特别严重的看法，然而……形势要求我们继续战斗。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因为自从一九三七年五月以来，我多次试图利用我与某些著名民族主义分子的友谊与敌人进行谈判，但是，我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于是我向英国政府建议，它应该充当调停人，……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努力也没有奏效。”

毫无疑问，内格林指的是他向英国代办拉尔夫·史蒂文森和法国大使朱尔·亨利所提出的和平建议，即，愿意以议会在菲格拉斯会议上同意的三点要求为条件结束战争。尽管不能指望马上得到回应，但是，内格林肯定已经料到，他提出的条件将会遭到胜利在望的对手断然拒绝。我们不妨记述一下这些和平建议的命运。二月十六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私人秘书奥利弗·哈维在日记中写道，内格林的建议已于二月十四日用电报发往布尔戈斯，而哈利法克斯的意见是，“尽管他不想就外交承认佛朗哥政权讨价还价”，但是，他愿意让佛朗哥做一些使英国的立场更“从

容”的事情。发往布尔戈斯的另一份电报表示，“如果佛朗哥能以‘某种方式重申正在考虑的政策’，即，他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允许进行随意或者普遍的报复，将给”英王陛下政府“提供极大的便利”。“今天，”哈维写道，“我们通过[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进一步得知，只要保证不进行报复并且允许领导人逃走就愿意投降。”这一信息肯定是阿斯卡拉特主动作出的试探，因为哈维在日记中记述，[英国外交部]决定“再起草一份电报把这个意思告诉布尔戈斯，但在电报发出之前，我们要求阿斯卡拉特征得国内[即内格林]的同意”。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说，他和阿斯卡拉特多次给内格林发电报以征得总理的同意，但是没有收到回复。他断言：“问题的症结肯定出在马德里。正如内格林后来所推测，那里的破坏分子拦截了电报，他们在卡萨多上校的指挥下准备发动军事叛乱。”不过，阿斯卡拉特说，二月二十五日收到了同意的复电，但为时已晚。他证实：“英国外交部二十一日通知我，如果第二天——二十二日——得不到答复的话，它将重新自行其是。”二十二日，奥利弗·哈维在日记里写道：“阿斯卡拉特仍没有答复，因此他刚刚被告知，我们不能无限期地等待下去，如果不能立即得到答复的话，我们必须先行承认[佛朗哥将军]。我们已经打电报向巴黎建议，我们应当尽早承认，确切地说，不能迟于二月二十四日，因为，根据佛朗哥发表的一份声明，他不会接受外国的统治，而且，报复心理与他的政府格格不入，尽管他必须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

阿斯卡拉特提供了佛朗哥将军这一份在报复问题上含糊其辞的声明——英国根据这份声明承认了佛朗哥政府。声明的要点是：（1）“民族主义西班牙已经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因此，失败者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别无出路。”（2）“首领[佛朗哥]的爱国主义、骑士风度和宽宏大量……是所有没有犯罪的西班牙人的可靠保证。”（3）“通过延长这种罪恶的顽抗，赤色分子领导人完全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而使更多的生命牺牲，更多的鲜血流淌。由于报复心理与民族主义政府和首领格格不入，[赤色分子领导人]意欲通过延长这种愚蠢的抵抗达到的目的只能加重他们的罪责。”阿斯卡拉特写道，难以相信张伯伦、哈利法克斯或者英国外交部的任何官员会认为佛朗哥的声明有丝毫意义。

西班牙著名作家路易斯·罗梅罗指出，从来没有人对内格林迟迟不给阿斯卡拉特答复的原因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通过写信和采访，他花费大量精力试图对此追根寻源。他写道：“后来与内格林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先生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含糊其辞、不太可信的回答：直到最后时刻他才收到那份电报，当时它已不切实际（cuando había perdido su virtualidad）。”（罗梅罗在一条脚注中说，阿斯卡拉特告诉他：“内格林不愿向他解释沉默的原因，所以对任何直接具体的问题避而不答并报以微笑，意思是，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罗梅罗问道，“内格林拒绝成为正式出面负责终结战争的那个人？……他希望把战争延长一段时间？他被由别人承担失败责任的希望所驱使？”

当然，二月十二日与卡萨多进行谈话时，内格林还没有收到阿斯卡拉特的电报，但是，他肯定确信，佛朗哥将会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我们除了抵抗别无选择。”他对卡萨多说。为了进行抵抗，他说，法国有一些从加泰罗尼亚地区撤出来的武器，还有最近从其他国家得到的数量可观的大炮、自动武器和飞机。他补充说，所有这些武器可能被允许运进西班牙，“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法国对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卡萨多的著作的英文版中，他说，内格林声称，有一万挺机关枪，六百架飞机和五百门大炮“在法国待命”。这些数字没有出现在将近三十年后出版的同一部著作的西班牙文版中。）至于被扣押在法国的士兵，内格林说，他正在为遣返他们进行谈判，只是谈判还没有结果。最后，他向卡萨多保证，为了解决食品和运输问题，“他会尽快采取必要措施”。

卡萨多回答说，后两个问题无法解决。“至于你所说的在法国的数量可观的武器，我不认为[法国人]会允许它们离开本国，即使他们允许离开，虽然这不大可能，卸货也将非常困难。[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承认，“在法国的加泰罗尼亚军人和武器均无法向中南部地区转移”]我认为我们应当把问题说清楚。……我们知道，英法两国向民族主义阵营派驻非正式代表已有一段时间了，它们站在佛朗哥一边，迫不及待地要承认他。因此，我们不应欺骗自己，必须认为这两个国家是我们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物质方面不可能进行抵抗，如果所有和平努力都落了空，我建议你召开一次由陆军和空军的全体首长以及海军司令参加的会议，以便他们每个人都发表意见说明我们应当怎么做。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解除或者减轻这一悲惨时刻压在你身上的历史责任。”

内格林默许了卡萨多的建议，于是，二月十六日，一次会议在阿尔瓦塞特以南两公里的洛斯利亚诺斯小飞机场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下列陆、海、空军首长：陆海空军总指挥何塞·米亚哈中将；由中路军以及莱万特、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方面军组成的中南部地区集团军司令曼努埃尔·马塔利亚纳将军；中路军司令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莱万特方面军司令莱奥波尔多·梅嫩德斯将军；埃斯特雷马杜拉方面军司令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将军；安达卢西亚方面军司令多明戈·莫里奥内斯上校；中南部地区空军司令安东尼奥·卡马乔上校；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卡洛斯·贝尔纳尔将军；共和国海军司令费尔南德斯·布伊萨海军上将。

根据卡萨多对会议情况的记述，关于在法国的战争物资，关于食品和运输问题及其为通过谈判结束内战所做的失败的努力，内格林把几天前对他说的话重复了一遍。他最后总结道，由于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已荡然无存，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继续战斗。与会者中只有“明显心神不安”的米亚哈将军表示，他赞成“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抵抗”。这肯定让卡萨多、马塔利亚纳和梅嫩德斯等人大吃一惊。据



卡萨多说，二月二日他们与米亚哈在巴伦西亚会晤，当时米亚哈同意与他们一起推翻内格林。米亚哈对内格林在这个时候将其晋升为中将感恩戴德并非完全不可能，也可能他只是不愿当着内格林的面公开发难而已。无论如何，几天之后他将再次改变立场，站在卡萨多一边。其他军方领导人同意马塔利亚纳将军的意见，将军表示，由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失陷，人民和军队认为败局已定，因此希望立即结束战争。担任中南部地区空军司令的共产党人卡马乔上校说，他只有五个飞机破旧的飞行中队和一些战斗机，“以这样的物质条件迎战装备精良的民族主义空军是愚蠢的”。他说，和平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海军司令费尔南德斯·布伊萨海军上将作了最令人担忧的陈述。“这位长官报告说，”卡萨多记录道，“如果不能立即实现和平的话，海军决定放弃西班牙领海。”因为一个水兵委员会通知他，他们“认为内战已经失败了，所以，他们不愿继续忍受天天进行的密集轰炸，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防空手段”。在布伊萨看来，“内战无可挽救地失败了，因此，尽快通过谈判实现和平是明智的”。

几周之后在巴黎，内格林向议会常务委员会简要报告了军队领导人的失败主义情绪和敌对态度。他说：“这些先生肆无忌惮地迫切要求作为政府首脑的我应当立即结束战争。”内格林尤其不信任总是跟着他活动的卡萨多。“我怀疑，为我设下了一个陷阱，当然，我与政府全体成员一起设法逃出了卡萨多的魔掌。”

在内格林即将离开马德里时，出现了两个使抵抗政策无法自圆其说的新情况。二月二十七日，英法两国承认佛朗哥政府是西班牙的合法政府，接着，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一直焦虑地等待着这件事情发生的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辞去总统职务，终于摆脱了其作为宪法幌子的傀儡角色——最初他为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的人革命做幌子；后来他为内格林和共产党早期的独裁统治做幌子，这种统治在一九三八年春夏时节日益显得咄咄逼人。阿萨尼亚的辞呈尽量避免涉及他在内战期间所

扮演的使其蒙羞的角色，辞呈表示，佛朗哥将军得到承认使他失去了“必须向各国政府传达信息——不仅传达作为一名西班牙人我的良心告诉我的东西，而且传达我国绝大多数人民深切希望的事情——的国际合法代表的资格”，国家的政治机器也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保留一个我在离开西班牙那一天并没有放弃的职务，即使只是名义上的，因为我希望看到抓紧时间实现和平”。

内格林认为，议会议长、温和的共和联盟领导人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应当按照宪法“自动”接替阿萨尼亚，但是，对此具有不同看法的巴里奥采取了拖延的策略。三月三日，他在巴黎的一个餐馆里召开议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这场危机的法律和政治影响。常务委员会决定，只有内格林准备以“尽可能轻微的损害和牺牲”结束战争，它才可能与他合作。于是，马丁内斯·巴里奥通知总理，除非这一条件得到满足，他将面临不得不拒绝担任总统的痛苦选择。尽管内格林坚称他向内阁会议上宣读了议长的电报，内阁对电报内容也表示同意，但是，马丁内斯·巴里奥说，他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他还说，就在他准备动身返回西班牙——尽管他“严重怀疑此行会有什么意义和效果”——时，反内格林的政变发生了。他因此而幸运地摆脱了未来的责任。

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佛朗哥将军得到承认和阿萨尼亚总统辞职“使领导与人民的士气更加低落”。此外，这种情况给那些认为继续抵抗是徒劳的人增加了动力，这些人正在密谋推翻胡安·内格林政府。

## 第六十四章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西普里亚诺·梅拉与自由主义运动

处在结束内战运动中心的人物是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各种对手被吸引到他的周围。尽管共产党人和苏联军事顾问不喜欢卡萨多，但是，在内战期间，他的专业能力及其对于共和国的忠诚从来没有受到过非议。内战爆发

时，卡萨多是一名坚定的共和派人士，担任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总统卫队的指挥官，由于内战初期的冲突，他对西班牙共产党持敌视态度。实际上，因为他对苏联武器分配不公的批评，在共产党的坚决要求下，他被国防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解除了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的职务。不过，卡瓦列罗以挑战的姿态很快便将他官复原职，接着，一九三六年年底，卡瓦列罗委派他在一名苏联将军和两名苏联上校的协助下组建人民军的混成旅。一九三七年五月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执掌国防部以后，卡萨多先后被派去指挥第十八军、第二十一军和安达卢西亚地区的部队。

尽管卡萨多从未被共产党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但是，在内格林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并将共产党人安东尼奥·科登任命为实际控制地面部队的国防部副部长之后的一九三八年春夏时节，他与共产党保持着还算不错的关系。实际上，他在一九三八年五月被任命为威名远扬的中路军司令。中路军由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和第四军组成，前三个军分别由职业军官路易斯·巴尔塞洛、埃米利奥·布埃诺和安东尼奥·奥尔特加指挥，这三个人都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第四军则由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民兵武装指挥官西普里亚诺·梅拉指挥。当军事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说卡萨多在一九三八年春夏时节“考虑的不是投降而是胜利”时，他无疑是正确的。马德里的共产党喉舌《工人世界报》为任命卡萨多而喝彩，赞扬他“忠于共和国和人民”，称他为“反法西斯主义者和自由战士”，并且说他“早在军事叛乱之前就反对那些统治着我们国家的反动派”。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随着共和派内部残酷斗争的持续加剧，卡萨多与西班牙共产党的关系不断恶化，结果，他对共产党的敌意成为使他与反对共产党的派别结盟的黏合剂。“在内战期间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当时身为共产党员的第十五军军长曼努埃尔·塔圭尼亚后来写道，“许多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派人士基于对共产党人的敌意支持卡萨多。”于是，两个重要因素结合起来使卡萨多在内战达

到高潮的那几个星期成为决定历史命运的人：他担任的中路军司令这一关键职务以及他对西班牙共产党的敌意。正如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前安全总局局长加夫列尔·莫隆所说，发动反叛的任务不一定是别的什么人所能完成的，因为没有看到既愿意又能够承担这一责任的人。虚构的马德里英雄何塞·米亚哈将军——他现在晋升为中将并且是中南部地区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官——肯定不是这个人，因为他不具备与共产党在马德里地区仍然完好无损的政治军事组织对抗的心理素质。出席二月十六日 洛斯利亚诺斯会议的另外那几位对政府不满的部队指挥官也不可能承担这一责任。

甚至还在内格林返回西班牙之前，卡萨多已经决定亲自掌控事态发展。他写道：“我们不能继续犹豫不定袖手旁观。”他与部队的指挥官和各个党派——“当然除了共产党之外”——的领导人进行磋商。“他们一致同意应当尽快结束战争，但是他们不愿意出头，希望由别人来完成这个任务。”二月二日，他会见了米亚哈、马塔利亚纳和梅嫩德斯几位将军，告诉他们他决定推翻内格林，同时告诉他们他还打算尽快与民族主义政府建立联系。“没有讨论，”他接着写道，“三位将军表示同意这一决定并且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卡萨多还记述了第二天他与右翼社会党人胡利安·贝斯泰罗会见的情况。贝斯泰罗是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此时是西班牙最德高望重的社会党领导人。作为重建马德里委员会主席——一个纯属象征性的职务——他在整个内战期间一直留在首都，几乎完全置身于党派斗争的漩涡之外。他是一位典型的和平人士，曾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作为阿萨尼亚总统的使者出席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的加冕典礼，向英国人传达了总统关于通过谈判结束内战的愿望。尽管在战前以及内战的前两年与卡瓦列罗派和普列托派社会党人不和，然而，随着战事的缓慢变化以及对于和平的强烈呼声逐渐形成压倒之势，他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当卡萨多请求他予以合作时，他回答

道，他将“无条件”支持卡萨多，但“只是为了实现和平”。

卡萨多最重要的盟友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马德里的地方组织以及西普里亚诺·梅拉指挥的第四军，政变的成功有赖于它们。“尽管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增强并且大有吞噬自由主义运动之势，”著名的西班牙历史学家和文学人士路易斯·罗梅罗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活力，它们的队伍没有受到开小差的困扰，而开小差已使社会党和资产阶级共和派深受其害，这些党派被内格林富于个人色彩的政策所诱惑，它们不是壮大了西班牙共产党的队伍，就是被纳入共产党的轨道。……在卡萨多与自由主义运动之间……惺惺相惜之情油然而生，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上校与共产党人的对立。”

在卡萨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关系中，特别重要的是他与西普里亚诺·梅拉的和谐默契。正如我们在前面某一章所看到的那样，梅拉早已放弃了其反对纪律和军事化的传统看法。

路易斯·罗梅罗说：“西普里亚诺·梅拉[是]从民兵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最著名的指挥官，是西班牙人民——真正而不幸的西班牙人民——的历史中不时涌现出来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之一。由于梅拉的自由主义信仰，没有什么知名作家为他撰写过令人满意的传记，他可能也不希望有。他也没有像另一些人那样受到天花乱坠的宣传。他生于一八九六年，尽管年龄并不大，寥寥几幅发表过的照片上显示的却是一张饱经沧桑的面孔，由于劳动艰苦，生活贫困，历尽苦难，他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不过，激励着他的理想使他容光焕发。”

另外，在同一本书前面的段落中，罗梅罗写道：

内战之前，西普里亚诺·梅拉……曾经担任建筑工人工会的书记。由于大家公认其为

人正直，他逐渐在民兵队伍中脱颖而出，一直晋成为指挥镇守瓜达拉哈拉和昆卡前线的第四军的中校军官。作为一个专业泥瓦匠，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他成功地把显示出忠诚的职业军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他潜心研究军事技术，因为他知道，与敌军作战最重要的是拥有一支作战的军队。像我国过去那些深受民众拥护的杰出领导人一样，他是一个具有军事天赋的勇敢好斗而又清心寡欲的理想主义者。第四军主要由自由主义运动成员所组成，但是，梅拉坚决要求自己 and 部下严守纪律。……尽管卡萨多与梅拉的家庭出身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在军事观点、对战局发展的看法以及严于律己的行为方面非常一致。……他们彼此尊重，因此，在这两个分别来自职业军队和民兵武装的军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基于相互信任的友谊。

最重要的是，他们怀疑抵抗政策的合理性。我们已经看到，卡萨多在二月十二日与内格林会见时并未掩饰自己的悲观。内格林对法国将会允许存放在法国的战争物资和扣押在法国的士兵重返西班牙所抱有的模糊希望也没有对他产生影响。在二月底与内格林进行的一次类似的没有结果的会见中，西普里亚诺·梅拉同样表达了悲观的看法。有必要把与梅拉有关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

梅拉：你非常清楚，内格林先生，留在法国的士兵不会回来，法国当局控制的武器也不会重新运回西班牙。此外，你还清楚，没有哪国政府愿意帮助我们，我们也不可能收到来自任何国家的武器。……由于失去了加泰罗尼亚地区，我们的悲惨处境变得更加糟糕了，因为我们再也不能指望它的工业，也不能依靠埃布罗河流域的部队和东路军的支援了，它们已被彻底消灭。我们中路军仍然完好无损并严阵以待，但是，我们没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而且已经几个月伙食供应不足了。……由于老百姓的失败主义情绪和共和国政府——如果它实际上还存在的话——的瘫痪，部队的士气持续低落。你必须意识到，我比正常情况下更悲观。

内格林：……我已经尽一切可能准备与敌人进行谈判，包括请求英国政府充当调停人，但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因此，除了全力进行抵抗之外没有别的政策可行。为了执行这一政策，我们还有数以千计的大炮、机关枪和迫击炮，五百多架飞机以及大量各种弹药。

梅拉：可是，内格林先生，这么多战争物资在哪里？

内格林：在法国。

梅拉：噢，当然，在法国。但我们是在西班牙。你真的相信你能把它们运到马德里？

内格林：我认为是这样的。

梅拉：你说你“认为是这样的”，这意味着你也不是很有把握。

中部地区的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运动成员具有与梅拉同样的担忧。在二月底于马德里举行的一次全国劳工联合会特别全体会议上，这种担忧显而易见。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的负责人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出席了会议，并且尽管语焉不详，他还完全公开地向我们说明了会议的情况以及全国劳工联合会马德里地区领导人随后的活动。他描述了普遍存在的担忧情绪：“我们认为形势非常糟糕，以致看来抵抗与和解都不可能。”大家一致同意，必须防止“出现马拉加、桑坦德、阿斯图里亚斯和加泰罗尼亚那样的情况：绝望和恐慌所导致的疯狂使我们后方因担心军事惨败而发生混乱”。

为了避免彻底崩溃，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由军队、警察和宣传部门组成的具有“特别权力”的地方防务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书记爱德华多·巴尔和曼努埃尔·冈萨雷斯·

马林、曼努埃尔·萨尔加多、曼努埃尔·阿米尔、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均为马德里地方组织中著名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积极分子。“两三天后我与巴尔和阿米尔交谈。”加西亚·普拉达斯说，“我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失去时机……我们正在冒险，内格林和共产党人蠢蠢欲动，可能准备镇压我们……一场军事政变即将发生，因此，除非我们先发制人，否则我们将为人所制。”

毫无疑问，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最担心的事情是西班牙共产党抢先发动政变，因为，读者应当记得，共产党人控制着组成卡萨多的中路军的四个军中的三个军。据加西亚·普拉达斯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防务委员会向卡萨多提出这个问题以便决定“起义的方法，起义正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加迫切和不可避免”。委员会还与其他党派组织的领导人接触。“我们与何塞·德尔·里奥以及共和联盟的其他领导人——他们为他们的头头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先生[留在法国]的行为感到羞耻——进行协商，我们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我们还与左翼共和派在马德里的代表进行了同样的协商，他们不能原谅阿萨尼亚的辞职及其发表的哀怨、虚伪的声明。两个党派的成员讲述了关于内格林的可怕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推翻他。”委员会还会见了社会党最大的地方组织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领导人伊拉里奥·德拉·克鲁斯和戈麦斯·埃希多。“他们认为我们正在走向一场灾难，没有什么人和物将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他们表示他们毫无保留地赞成我们的计划，并且小心翼翼地鼓动我们举行一场他们没有办法举行的起义。……他们在我们自由主义运动身上看到了唯一一支能够成功举行一场起义的力量。……巴尔和萨尔加多每天与卡萨多通话两三次，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他，在通话的过程中，他们制订出起义计划的所有细节。塞希斯孟多[·卡萨多]——我们叫他塞希斯——负责联络我们认为有必要联络的军方领导人。由于他的专业才能，他的共和国资历，他的敏锐和聪颖，他对所有反对人民和破坏反法西斯阵营团结的阴谋诡计的抵制，他在军方领导人中享有崇高的



威望。”

与此同时，卡萨多上校一直在与佛朗哥将军派到马德里的情报人员进行结束内战的秘密谈判，已经取得初步的进展。深受人们尊重的军事历史学家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记述了谈判的过程，他在马德里的军事历史部门查阅了民族主义方面的有关文件。下面对一直进行到一九三九年三月第一周的谈判过程的简要描述，完全建立在上校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根据身为民族主义情报机构宪兵情报局（SIPM）特工的马德里大学教授胡里奥·帕拉西奥斯的一份报告，一九三九年一月底，同为大学教授的宪兵情报局特工安东尼奥·德·卢纳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试探卡萨多上校的想法”。很快，在一次试图把卡萨多争取过来的过程中，这名特工告诉他，“佛朗哥将军愿意向放下武器以及没有犯过普通罪行的军人提供安全保证”。

二月一日，帕拉西奥斯收到了卡萨多对这一姿态的简要答复：“知悉，同意，越快越好。”

二月十一日，布尔戈斯的宪兵情报局全国负责人何塞·温格里亚上校收到特工的报告称，“卡萨多与贝斯泰罗一致要求尊重正派职业军人（*militares decentes*）的生命”。

二月十六日，一份报告送到布尔戈斯，报告引述卡萨多的话说：“我希望组成一个贝斯泰罗内阁，在这个内阁中，我应当担任国防部长。……即使不是这样，那也没有关系。我不会顾忌任何人。我建议把民族主义军队进入马德里的时间最多推迟十五天。”在特别提到卡萨多要求“怜悯”他的部下之后，报告接着说：“不可能防止一些重要的赤色分子逃走，尽管[卡萨多]向我们保证，许多赤色分子将会留在马德

里，他将陆续逮捕他们。”

尽管如此，对卡萨多的诚意仍有怀疑，因为帕拉西奥斯告诉布尔戈斯，他很“精明”；帕拉西奥斯还说，当“马德里全都知道共产党的政变迫在眉睫”时，“他继续执行他的迂回拖延策略”。

正是在此时，布尔戈斯断定，“确实需要一个绝对可信、能够承担责任的军官参加谈判了”。这个人是驻马德里的炮兵第四营营长何塞·森塔尼奥·德拉·帕斯上校，所谓“绿星”间谍网的负责人。

二月二十日，森塔尼奥在曼努埃尔·吉蒂安的陪同下会见了卡萨多，吉蒂安是宪兵情报局在马德里的另一名重要特工。在会见的过程中，根据宪兵情报局提交布尔戈斯的报告（我继续援引马丁内斯·班德的叙述），“卡萨多‘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胜利者，没等他们说话就‘急于证明他是苏联领导人的政策及其残忍、偏激的民众追随者的死敌’。他说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热诚的共和派，是阿萨尼亚[最近他把留在法国的阿萨尼亚斥为“懦夫”]、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死对头，尤其是共产党人的死对头，他对共产党破口大骂。”由于“共产党人的威胁”，森塔尼奥和吉蒂安要求卡萨多不要推迟政变的时间。“[佛朗哥的]军队不能允许任何耽搁。”他们对他说了。卡萨多对此回答道，急于求成将会导致“可怕的流血”。至于政治领导人，卡萨多说，最好允许他们离开西班牙：“越多越好。这样一来就将减少流血和仇恨。”据同一份报告说，卡萨多表示：“他不希望负责追捕他们；何况，他打算出国。”这时，森塔尼奥和吉蒂安向卡萨多出示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概要说明了佛朗哥将军准备向投降的军官开出的优待条件。报告称，“认真阅读了文件之后，卡萨多表示特别满意：‘好极了，好极了！’”他大声说。“他似乎受到感动，‘明确表示同意并显出了热情’。”这种热情“肯定不是真心流露”，马丁内

斯·班德评论说。接着，两名宪兵情报局特工坚持要求卡萨多确定一个共和派军队投降的明确日期。卡萨多回答说，可以“在大约五天之内”采取行动。森塔尼奥在报告中对卡萨多的态度评论道：“他对民族主义事业不感兴趣。因此，他一直考虑内战结束之后去流亡，但他愿意为这项事业效力，因为他知道，这是唯一可以遵循的道路，原因在于它光荣、合理、人道而且具有西班牙特色。”

二月二十二日，曼努埃尔·吉蒂安第二次会见卡萨多。“他再次催促卡萨多确定发动政变的明确日期。卡萨多回答说，他将在月底‘动手解决问题’。他请求民族主义军队推迟即将完全准备就绪的攻势，因为他不能对将会发生在马德里的血腥暴行负责，而且因为，如果进攻开始了，‘他将不得不作为一名共和派军官采取行动，履行职责坚持到底’。最后，他要求，为了‘不让人们多流一滴血’，给他时间和信任。关于这次会见的报告像前一份报告一样乐观。‘我们的印象是，’报告写道，‘卡萨多完全有把握成功实现他的计划。’”

但是，佛朗哥将军对谈判的缓慢进展不满意。二月二十五日，他告诉部下，“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民族主义军队有足够的办法“武力”攻占马德里，“只要愿意立即就能”。卡萨多显然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为了得到佛朗哥将军的宽恕，他必须确定发动政变和最后投降的明确日期。

二月二十七日，佛朗哥的总司令部收到马德里的宪兵情报局特工发来的以下信息：“明天，星期二，将成立一个善后委员会。我们请求批准贝斯泰罗和鲁伊斯·福内利斯上校[卡萨多参谋部的一名军官]与[宪兵情报局]特工一同飞往民族主义者控制区，以使投降立即生效。”布尔戈斯的答复很明确：“我们必须强调的是，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民族主义西班牙不接受任何解决办法。……可以让一两名职业军官来这里，但只是为了前来了解投降所要采取的方式。……不欢迎贝斯泰罗或者其他文

职官员出现。”

三月二日，马德里的宪兵情报局特工给佛朗哥发去以下信息：“卡萨多已经收到来自总司令部的答复和指示。政客当中似乎存在着某种担忧，卡萨多的军政委员会至少暂时还没有出现。……政客希望通过这个委员会实现他们所谓体面的投降，这将允许那些想要离开的人自由流亡。”三月四日，布尔戈斯收到另外一条信息：“一切取决于允许共和派领导人逃走，以便使卡萨多看上去不是叛徒。”

卡萨多此时受到来自本方的巨大压力，人们要求他通过谈判达成一项体面的解决方案，这将保证那些身处险境因而想要逃往国外的人的生命安全。但是，达成这种解决方案的希望实际上很渺茫，因为佛朗哥已经通过臭名昭著的政治责任法清楚地表明，除了无条件投降他不考虑任何其他解决方案，而且他在谈判的过程中反复重申了他决不让步的立场。

不过，卡萨多可能认为，除掉内格林和共产党人将会缓和佛朗哥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从而使他给予那些想要逃往国外的人这样做的权利，同时还会作出其他让步。安东尼奥·科登声称，二月份他去拜访卡萨多时，上校故作“神秘地”告诉他，“佛朗哥不仅将在报复问题上作出让步，而且只许西班牙军队进入马德里，并将承认共和派军队首长和军官的军衔”——但对他为结束内战进行的谈判没有透露任何口风。科登还声称，卡萨多对他说，“某些绝对可以信赖的英国人”多次当面告诉他，足以撤走两万人的船只已准备就绪，而卡萨多概要说明的和平条件也“将强迫佛朗哥接受”。

没有文件证明英国作出过任何保证，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至少，从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阿尔珀特在英国公共档案部门查阅的大量文献资料来看，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迹象。当然，这不排除某些文件可能不在公众可以查阅的范围之内的情况。

尽管如此，英国试图将“强迫”佛朗哥接受某些条件的说法仍然有悖于与佛朗哥将军保持良好关系这一英国政策的总体倾向。的确，某个名叫德尼斯·考恩的人多次拜访过卡萨多，而亲共产党的埃德蒙多·多明格斯则指责这是企图与中路军首长进行交出马德里的谈判。我们肯定都知道，考恩是英国政府委派的负责交换俘虏谈判的切特伍德委员会的联络官员。阿尔珀特说：“卡萨多非常关心被关押的民族主义支持者，因此，他在下个月进行的和平谈判过程中警告民族主义方面，如果他被迫进行绝望的抵抗，这些囚犯可能被杀。在马德里动荡的气氛下，考恩的访问受到注意，但是，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他在劝说卡萨多投降方面起了什么作用。”阿尔珀特后来（一九八七年）告诉我，“他的看法”不像几年前初次研究这个问题时那么明确，现在他认为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实际上，当阿尔珀特作出以下推测时，他可能是正确的：“考恩在去西班牙进行一般性会谈之前也许被告知，如果遇到机会的话，他应尽量劝告卡萨多与佛朗哥达成协议。”如果情况真的如此，科登关于卡萨多告诉他英国给过其某些保证的说法或许就确有其事。也可能，卡萨多对科登说这些话是希望把后者争取过来支持他反对内格林，就像他似乎打算用关于英国保证的同样说法影响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一样。西斯内罗斯一九四〇年接受我的采访时声称，卡萨多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底告诉他，马德里的“英国代表”已经“保证”，佛朗哥将会同意“有利的和平条件”。根据我所作的采访记录，卡萨多还在三月二日对西斯内罗斯说：“我可以向你保证，佛朗哥决不会与内格林谈判，但我绝对可以肯定，如果几位受人尊敬的军方领导人直接与他谈判的话，我们应当能够得到下面这些条件：1. 无论是摩尔军团、志愿兵团[意大利和德国部队]还是外籍军团，都不会进入马德里；2. 任何希望离开西班牙的人都可以离开，佛朗哥将会为此提供便利；3. 佛朗哥不会对留在西班牙的人进行报复；4. 职业军官的军衔将得到佛朗哥军队的承认。”

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回忆录中说，当他向卡萨多询问是谁作出的这些保证时，“他非常严肃地回答道，英国已经谈妥了这些保证的最后细节，而且他亲自参加了与英国代表的各种会谈。佛朗哥向英国代表明确保证履行这些承诺，只是附带一个条件：我们推翻共和国政府，因此，我们这些职业军官将负责控制局面并直接与他打交道”。

无论这些所谓承诺事实上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问题出现了：内格林和共产党领导人知道卡萨多所造成的威胁吗？他们肯定知道。这不仅是因为科登和西斯内罗斯声称他们把卡萨多引诱他们参与其密谋的企图告诉了内格林，不仅是因为立即向党的领导报告情况是共产党员必须承担的责任，而且主要是因为马德里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卡萨多政变（三月五日至六日）之前“几个星期已经得到有人正在策划阴谋的情报”，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述。正如曼努埃尔·塔圭尼亚所证实的那样，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刚从法国一回来，他们就收到了卡萨多心怀不满的情报：“[马德里]党组织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卡萨多上校可能领导一场政变。……由于我是从加泰罗尼亚来到马德里以及留在马德里的[共产党人——其他人去了埃尔帕尔马——当中]级别最高的军官，共产党的[马德里]地方组织书记多明戈·希龙一直向我报告有关卡萨多上校正在策划的所有阴谋的最新情况。”

那么，内格林在干什么？他也知道卡萨多的密谋吗？无疑他是知道的，不仅因为他的共产党人随从显然向他报告了情况，而且因为他在逃出西班牙之后不久亲口对巴黎的议会常务委员会所讲的话（我在前面曾经引述过他那次讲话的部分内容）。“[回到马德里后]我很快就从一系列迹象中发现了正在策划的阴谋。”他指出，“首先，卡萨多迫切希望我住在他在环城大道为我准备的一所房子里，因为[他说]那里非常安全。第二，他企图为我配备一个他亲自挑选的特别卫队。第三，卡萨多先生一直跟着我活动，不仅在他指挥的中部前线[的部队]，而且在我视察的所有

部队。我怀疑，为我设下了一个陷阱，当然，我与政府全体成员一起设法逃出了卡萨多的魔掌。”

## 第六十五章 寻找替罪羊

根据西班牙共产党和内格林本人有力的证词，现在已经最终确定，他们完全知道卡萨多上校造成的威胁。那么，他们为挫败他的阴谋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会不会，在二月二十七日佛朗哥将军得到外交承认和阿萨尼亚总统辞职之后，为了避免个人承担投降的恶名，他们决定任凭卡萨多的计划水到渠成？

从二月中旬到三月六日，内格林和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短暂地回到了中南部地区，在分析这一段时间他们行为的过程中，重要的是记住这一点，无论他们私下里有什么担忧，在本书前面某一章引述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二月二十三日所通过的宣言中，没有显示出任何失败主义的迹象。这份据陶里亚蒂说“由内格林亲自修改了最后草稿”的宣言对国际形势作出了乐观的估计：国际形势前所未有地动荡不安，而这种动荡增加了民主国家直接或间接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可能性。因此，抵抗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它将使西班牙国内外出现开启胜利前景的新的因素。

还要记住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二月二十五日，佛朗哥将军得到外交承认和阿萨尼亚总统辞职两天前，《共和国官方公报》颁布了一项由内格林签署的法令，把卡萨多上校——阴谋活动的神经中枢——晋升为将军。据内格林的国防部副部长安东尼奥·科登说，在这一令人惊讶的晋升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说，内格林告诉他“必须谨慎行事”，因此，他“正在考虑任命卡萨多为陆军参谋长”，然后用担任第二军军长的共产党员埃米利奥·布埃诺中校取代他。据内格林的政治秘书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说，这一招的目的是解除卡萨多对中路军的“直接指挥权”。

共和党的官方内战史声称，用布埃诺取代卡萨多的主意出自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二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建议内格林将卡萨多撤职并因其“可疑的行为”起诉他，然后“暂时”用布埃诺中校或第一军军长路易斯·巴尔塞洛中校取代他。像布埃诺一样，巴尔塞洛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另一方面，陶里亚蒂说，最初共产党建议任命著名共产党人胡安·莫德斯托担任中路军司令，但是，这个主意遭到内格林的反对。比共产党更为谨慎的内格林也许担心，任命莫德斯托可能刺激卡萨多，因为他是从普通民兵提拔起来的最著名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而且是在莫斯科训练出来的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而布埃诺中校则是一名职业军官，像许多别的职业军官一样，他悄悄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总之，我们将会看到，并没有认真地试图撤换卡萨多，他继续掌握着中路军的指挥权，直到内战结束为止。

正如本书前面某一章所提到的那样，陶里亚蒂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共产国际的长篇报告提供了一些基本材料，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内战结束之后共产党对内格林所持的态度。在这份报告中，陶里亚蒂指责总理把卡萨多晋升为将军“而没有根据大量揭发他的犯罪证据撤换他”。他还提出了以下指责：“我认为，在这几个月，[内格林]表现得像个竭力想把自己从他所认为的绝境中拯救出来的人，但他并不想公开背叛我们的党或他的过去。即使他让那些叛徒阴谋得逞，那也是因为叛徒们发动的军事政变似乎为他提供了摆脱个人责任的机会。另外，他的混乱生活和心理恐惧也造成了危害。”

无论人们可以多么严厉地评价内格林的私生活或政治表现，但却根本不能指责他懦弱或害怕。就连卡萨多都证明了他的个人勇气，卡萨多说，他“在前线当着我的面经受了各种情况的考验”。此外，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内战结束以后陶里亚蒂和西班牙共产党指责内格林的目的在于使总理成为替罪羊。例如，官方的《西班牙共产党史》指责内格林在内战的最后阶段“拒绝听取共产党



的建议，他对继续斗争已经不感兴趣，而且任凭投降分子肆意活动”。这部一九六〇年出版于法国的党史是以热情之花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在莫斯科撰写的，委员会成员包括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安东尼奥·科登和（热情之花的秘书）伊蕾妮·法尔孔。

尽管出现了这些指责——当西班牙共产党试图在党内外美化内格林的政治家品质时，一九七七年出版的共产党官方内战史的最后一卷对这些指责只字未提——仍然有大量来自共产党方面原始资料的证据显示，除了把卡萨多晋升为将军以及据说反对任命莫德斯托担任中路军司令之外，内格林对共产党的大部分要求都言听计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陶里亚蒂本人在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承认，内格林在二月底“做的比党要求的还要多”。此外，科登证实，同样是在二月底，总理兼国防部长告诉他，他应当尽可能将军事部门集中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便形成政府指挥军队的氛围”。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当科登在三月三日告诉内格林中南部地区集团军（Grupo de Ejércitos de la Zona Centro—Sur）司令部采取了“奇怪而可疑”的措施时，总理答道：“我对这一切受够了。科登，看来最好是让你以我的名义行动。”

关于内格林的退缩和主动谦让及其愿意向西班牙共产党交出他剩余的任何权力，最重要的证据也许是三月三日《国防部官方日志》所宣布的那些措施——它们似乎立即成为历史问题。据陶里亚蒂说，这些措施是内格林本人二月十六日回到中南部地区三四天后向他提出来的。陶里亚蒂没有解释为什么迟迟没有宣布这些措施，但可能是因为内格林担心这会促使卡萨多立即发动政变。无论如何，陶里亚蒂和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坚决要求贯彻执行这些措施。官方的《西班牙共产党史》证实：“党意识到投降分子正在策划阴谋诡计，因此坚决要求总理对他们采取有力的行动。终于，内格林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下令采取旨在加强中南部地区军队的措施，为其创造贯彻执行抵抗政策的合适条件。”

当然，内格林“下令”采取的措施正是十天前共产党提出的那些建议。尽管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宣布了这些措施，但是，直到三十多年以后的七十年代初期，当一份那一天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在马德里市期刊阅览室被发现时，它们才真正得到了证实。在此期间，与这些措施有关的准确信息的缺失引起了可怕的混乱和猜测，而且产生了传奇性的说法：通过《国防部官方日志》宣布的那些措施，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发动了一场旨在完全控制军队和国家的全面的军事政变。撇开事实上政变通常不会在政府的官方刊物上大张旗鼓地宣示不说，对实际宣布的措施所进行的仔细审读基本上也没有为这种在三十多年的西班牙内战史研究中已经变得根深蒂固的传奇说法提供证据。七十年代初期发现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后，军事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断言：“没有发生军事政变。”实际发布的那些措施充分支持了这一结论。

发布的措施中包括下面这些新的任命：

任命陆海空军总指挥何塞·米亚哈将军担任三军监察长。尽管这项新的任命有效地削弱了他的指挥权，但它是否能对卡萨多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值得怀疑。由于米亚哈二月十六日在洛斯利亚诺斯会议上的暧昧表现，卡萨多并不信任他。

任命中南部地区集团军——其司令部设在巴伦西亚，由（塞希斯孟多·卡萨多的）中路军、（莱奥波尔多·梅嫩德斯指挥的）莱万特方面军、（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指挥的）埃斯特雷马杜拉方面军和（多明戈·莫里奥内斯指挥的）安达卢西亚方面军组成——司令曼努埃尔·马塔利亚纳将军“暂时”担任目前空缺的总参谋长一职，接替拒绝返回西班牙的比森特·罗霍。这项任命和三月三日《国防部官方日志》同时宣布的集团军本身的解散均未实质性地改变共产党人在马德里地区拥有军事指挥权的局面，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在这个卡萨多密谋的中心地区，组成卡萨多中路军的四

个军中有三个军的军长由共产党人担任。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没有发布撤换卡萨多的命令。

上述集团军的两名参谋人员费利克斯·穆埃德拉上校和安东尼奥·加里霍中校被安排到没有实际作用的岗位上，他们被怀疑对政府不满并且涉嫌为佛朗哥将军从事间谍活动。加里霍被安排到米亚哈手下，而穆埃德拉则被任命为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下属的组织部门的临时负责人，处在科登警惕的目光监视下。卡萨多不可能认为这些调动是企图阻挠他的计划。

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还宣布，下列共产党人军官得到晋升：

授予胡安·莫德斯托上校将军军衔。

晋升路易斯·巴尔塞洛中校、埃米利奥·布埃诺中校、弗朗西斯科·加兰中校和恩里克·利斯特中校为上校。利斯特晋升的时间是一月二十八日，没有更早地宣布这一晋升是因为《国防部官方日志》在巴塞罗那陷落前夕的一月二十四日暂时停刊。但是，莫德斯托和利斯特这两名最重要的共产党人指挥官都没有得到新的任命，而巴尔塞洛和布埃诺则继续指挥各自的部队——尽管共产党建议用他们当中的某个人取代卡萨多担任中路军司令。我们马上就将看到，只有弗朗西斯科·加兰得到了任命。

到目前为止，难以想象与军事政变有什么相关。至于得到任命的人，只有六名共产党人军官值得一提：

除了现有的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一职之外，（已在二月底被内格林晋升为将军的）安东尼奥·科登被任命为国防部秘书长，这是以前由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担任的一个虚职，他拒绝返回西班牙；同时任命埃内斯托·纳瓦罗·马克斯担任科登的战术秘书。这两项任命只不过重申了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对国防部的控制。国防部现

在实际上成了一个影子机构，仅存于内格林设在埃尔达的波夫莱特宫（位置代码“尤斯特”）里的临时指挥部，被第十四军的共产党人游击队员保护着。

与此不同，另外四名共产党人军官得到的任命具有实际意义，但是与密谋中心马德里的政变无关：

弗朗西斯科·加兰上校被任命为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

埃特尔维诺·维加中校被派去指挥阿利坎特的部队，那是距离埃尔达三十七公里的一个重要港口。

莱奥卡多·门迪奥拉中校被任命为穆尔西亚驻军司令，那是位于马德里通往卡塔赫纳的主要道路上的战略要地。

伊诺森西奥·库尔托少校被任命为阿尔瓦塞特驻军司令，它位于马德里通往阿利坎特和穆尔西亚的主要道路上。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返回西班牙后，正是在阿尔瓦塞特设立了他的司令部。

当科登把后三项任命交给内格林签署时，总理说：“三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对吧？”“是的，先生。”科登答道，“我推荐他们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而是因为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人具备同样或类似的指挥才能。”

显然，最后四项任命并不是为了除掉卡萨多。它们的首要目的是，在大规模撤退势在必行的情况下，保护最重要的通往海岸的逃跑路线。由于佛朗哥将军准备发动最后的攻势，这种情况越来越有可能出现。并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些任命让共产党的对手惶恐不安。在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卡洛斯·贝尔纳尔将军收到了弗朗西斯科·加兰将要接替他的命令，恐惧普遍存在，因为，正如担任海军第一政委的社会党

人布鲁诺·阿隆索所说，人们害怕共产党人“将会杀害他们的敌人”并且阻止那些面临生命危险的人逃往国外。

无论这些恐惧是否合理，共产党人肯定也有类似的担忧，在仇恨和报复的大气候下，他们同样害怕，如果不保护好主要逃跑路线的话，他们自己可能被别人杀害，其政治、工会和军事干部的撤离也有可能受到阻挠。路易斯·罗梅罗戏剧性地表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一场战争的最后阶段……可能发生流血事件，以往的争吵斗争，政治对立，甚至还有个人恩怨，都可以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这种方式之一是，剥夺个人和团体撤离的手段，把他们留给大兵压境、报复心切的死敌摆布。”

使这一重要阶段的历史研究陷入混乱状态的一个因素是，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的卡萨多那本历史著作的西班牙文版及其同一年发表的连载文章中，包含了任命五名共产党人军官的内容，他声称，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宣布了这些任命，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同一部著作的英文版中，并不包含这些内容。卡萨多所说的五项任命如下：科登将军，陆海空三军总指挥；莫德斯托将军，中路军司令；利斯特上校，莱万特方面军司令；巴伦廷·冈萨雷斯中校（“农夫”），埃斯特雷马杜拉方面军司令；曼努埃尔·塔圭尼亚中校，安达卢西亚方面军司令。

但是，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其实并没有宣布这些任命。当然，直到七十年代初期为止，人们不知道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七十年代初期，这一期失踪不见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在马德里市期刊阅览室里被发现。不过，这一宝贵的发现并没有终止所有猜测，因为，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有人猜测这五项任命应当在三月四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上公布了；但是，由于找不到那一期《国防部官方日志》，无法核实卡萨多的说法。因此，当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在一九八五年初发表他对内战最后那些日子的最终描述时，他断定，所有可以找

到的三月四日这一期“神秘的”《国防部官方日志》都被藏匿或销毁了。直到同年九月份，多亏我的研究助手卡门·德拉·卡尔·马塔——当时她在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为我工作——的不懈努力以及马德里西班牙文化部文献信息档案中心的何塞·曼努埃尔·马塔和玛加丽塔·巴斯克斯·德·帕尔加的可贵帮助，一份三月四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在其出版四十六年后被找到了。我非常感谢他们大家。

与所预期的正相反，人们长期寻找的这一期《国防部官方日志》并不包含上述五项至关重要的任命。它也不包含任何与共产党人军官有关的意义重大的任命或晋升。此外，关于卡萨多声称的这些任命，所涉及的那些军官——科登、莫德斯托、利斯特、冈萨雷斯和塔圭尼亚——撰写的书籍没有提供丝毫线索。正如一位前共产党人在一九八五年向我指出的那样，推断这五名军官被党要求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并不合理，因为冈萨雷斯和塔圭尼亚都是在脱离西班牙共产党之后才写出了他们的书。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卡萨多已经知道这些任命——在《国防部官方日志》于马德里出版前，它们被从上面删掉了——因为他肯定会揭露这个重要的事实而不是声称它们发表在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上。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五项任命不足为信，卡萨多所依据的或者是一次错误的记忆，或者是一些未经证实的传说，要不然就是他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捏造了事实，他声称，内格林和共产党人打算控制中南部地区的军队。

陶里亚蒂在其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没有提到三月四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关于三月三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他断言：“只要这些迟迟才被内格林接受的措施全部生效，卡萨多就不可能发动军事政变。”他还指责内格林在一期他称之为“特刊”的《国防部官方日志》上同时公布了所有措施。他说：“它几乎包括提拔和任命共产党人的全部命令，从授予莫德斯托和科登将军军衔，到晋升利斯特为上校，等等，等等。[我们的]敌人可以用这一期《国防部官方日志》作为共产党人准备在

内格林同意的情况下夺取所有权力的证据。密探也不可能干得更好。”

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热情之花也因所谓对于共产党人建议采取的措施迟迟不予落实而指责了内格林。她写道：“由于阴谋已开始实施，[这些]在另一种情况下可以有效地改善局面的[措施]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同时]在阴谋策划者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他们感到他们的计划将要失败。不过，他们可以依靠一个他们没有想到的盟友，即内格林本人，他莫名其妙地把他曾经任用的同志留在身边。遵照内格林的命令，从法国回来的几乎所有政治军事骨干人员开始集中在埃尔达，等待始终没有作出的安排。”

这些指责至少有一点明显不实，因为，出现在三月三日《国防部官方日志》上的那些被委以指挥职务的共产党人军官（加兰、维加、门迪奥拉和库尔托）都得到了安排。另一方面，利斯特和莫德斯托在回忆录中所说也确有其事，他们声称，在他们去埃尔达面见内格林要求得到指挥权之后，内格林迟迟不采取任何行动。但是，他们断言内格林应独自承担这种犹豫不决的责任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读者应当记得，总理实际上不得不把他的军权交给了共产党最信任的职业军官安东尼奥·科登。此外还应指出的是，在利斯特和莫德斯托撰写回忆录的六十年代，两人在共产党内地位显赫，而当时党的政策是把某些错误和失职归罪于内格林，在党看来，正是这些错误和失职导致了内战的失败。

只要我们注意到以下事实，热情之花对内格林的指责——把西班牙共产党的军事骨干集中在埃尔达按兵不动“等待始终没有作出的安排”——就更荒唐：内格林在埃尔达时身边只有忠诚的共产党员，例如他的政治秘书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主管宣传的外交部副部长桑切斯·阿尔卡斯，他的副官、莫德斯托以前的助手胡利安·索莱·孔德少校，当然还有安东尼奥·科登。情况既然如此，以下看法就不是没有道理的：如

果陶里亚蒂和共产党政治局真的希望把莫德斯托和利斯特安排到指挥岗位上，那么，在埃尔达谁也不会予以阻挠。至于从法国回来的共产党的政治骨干，把他们的按兵不动归因于内格林似乎不大合乎情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热情之花本人证实，当内格林向埃尔达转移时，她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动身前往穆尔西亚南边的埃尔帕尔马，在那里，他们服从的显然不是内格林的命令而是陶里亚蒂的命令。仅就这一点而言，把他们的无所作为完全归罪于内格林不但不合情理，而且毫无意义。热情之花对内格林的这一指责并没有出现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共产党官方内战史的最后一卷中。

尽管热情之花和陶里亚蒂企图把未能挫败政变阴谋的主要责任强加于内格林，但是，陶里亚蒂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显然表明，西班牙共产党面临严重的纪律问题，无论它有什么打算，这个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实际运转能力。在断言“只要这些迟迟才被内格林接受的措施全部生效，卡萨多就不可能发动军事政变”之后，陶里亚蒂继续说道：“但是，当时出现了第一个令人不安的可怕现象：党所依赖的骨干出了问题。布埃诺中校拒绝接受中路军的指挥权。我们因此失去的将是采取预防措施的关键因素。被任命为穆尔西亚驻军司令的门迪奥拉拒绝了，被任命为阿尔瓦塞特驻军司令的库尔托拒绝了。被任命为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的帕科[弗朗西斯科]·加兰晚了两天才到那里，而且违反党关于除非率领他所指挥的步兵旅不得进城的命令，……一个警卫员也没带就坐汽车进了城。这导致其他人逮捕了他。”没有抵挡住保留共济会会员的强烈要求是党的纪律涣散的部分原因，陶里亚蒂补充说，就布埃诺、门迪奥拉和库尔托而言，他们的问题只能解释为“直接或间接与军队准备发动政变有关，共济会可能参与其中”。

不过，在陶里亚蒂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下面这一部分内容更充分地表现了党面临的这场危机的严重性：



面对政府的无能和缺陷，我们党能够主动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军队发动政变吗？当我们看到形势一天天恶化时，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我甚至请求给予指示，但是由于技术原因，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陶里亚蒂所说的肯定是他通过驻巴伦西亚的苏联代表团的电台向莫斯科请求指示的尝试。关于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据斯特凡诺夫写给共产国际的秘密报告称，陶里亚蒂二月十六日回到西班牙两天后，在马德里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斯特凡诺夫应“尽快”前往莫斯科就一些“迫切、棘手的策略问题”请求指示。据斯特凡诺夫说，“陶里亚蒂口头阐述了”这些问题“并且由我记录下来”，其中包括那个关键的问题：如果政府不顾西班牙共产党的反对与军队和工会一致决定投降的话，党应当采取什么立场。“它应当设法独自继续战斗吗？”鉴于陶里亚蒂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写给莫斯科的长篇报告中甚至不提这件事，斯特凡诺夫的莫斯科之行显然没有成为事实，因此，我们也许只能断定，是否继续进行斗争这一重大问题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陶里亚蒂手中。不过应当提到的是，担任巴伦西亚的共产党喉舌《真理报》负责人并与陶里亚蒂关系密切的意大利共产党员埃托雷·万尼在回忆录中说，三月上旬，“路易莎”——陶里亚蒂的妻子丽塔·蒙塔尼亚纳——带着莫斯科的指示来到巴伦西亚。由于万尼没有提供她离开莫斯科的日期，因此无法判断她动身前往西班牙时反对内格林的政变是否已经发生。此外，由于陶里亚蒂在写给莫斯科的长篇报告中对这些指示只字未提，所以无法证实它们，因而也不能确定莫斯科在政变发生时的明确态度。]

[陶里亚蒂的报告继续写道]我们认为，尤其是我个人认为，由于以下原因我们不能使用武力：我们的地位已与我们在[加泰罗尼亚]菲格拉斯时有所不同，当时大家的眼睛都盯着边境，这使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动员起来反对我们的国家机器，政府和军队都是这样，我们的敌对行动

和反抗只能被野蛮的武力所镇压。对于这种武力行动，我们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盟友；所有人都反对我们。我们不得不以党的名义夺取政权。这在政治上意味着，党必须承担武力破坏人民阵线的责任。党的整个领导阶层一致反对这个主意。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促使我建议党不要[使用武力]。由于我了解党以及当时它的部队的情况，我相信我们将迅速被打败，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因为不知所措的群众不会追随我们，他们只想要和平。就连共产党员指挥的部队也不会以必要的力量和决心支持我们。其中一些很有可能调转枪口反对我们。甚至更有可能的是，一部分党员将发生动摇。

根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在组成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的十七个军中，八个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七军、第十四军、第十九军、第二十军和第二十一军——的军长是共产党员，而另外五个军——第八军、第九军、第十七军、第二十二军和第二十三军——负责把握部队政治方向的军政委也是共产党员。此外，包括五个师的后备部队托拉尔兵团由共产党员伊拉蒙·托拉尔指挥。只有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就连共产党员指挥的部队也不会以必要的力量和决心支持我们”这一陈述的重大含义。

但是，尽管陶里亚蒂坦白地承认甚至不能依靠共产党员指挥的部队采取针对卡萨多的“预防措施”，群众也“不会追随我们，他们只想要和平”，他仍然在把目标再次对准内格林时声称：“另一方面，我们大家相信，只要[他].....提供机会让我们担任一系列决定性的职务，就有可能防止政变或以突然一击将其镇压下去。因为这将保卫政府和人民阵线的斗争形式表现出来，它会得到群众以及军队的支持。”人们无法找到这种说法与陶里亚蒂坦白承认的另一些情况的共通之处：由于“所有人都反对我们”，党不可能使用武力挫败阴谋，同时，党会“迅速被打败，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因为“不知所措的群众不会追随我们，他们只想要和平”。

西班牙共产党及其支持者在内战结束之后声称，如果不是内格林的犹豫漠然和卡萨多的背叛，共和派能够一直抵抗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从而可以阻止佛朗哥将军取得内战的胜利。考虑到陶里亚蒂如此明确地承认了共产党势力和影响的衰落以及相关的所有其他证据，这种说法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热情之花在回忆录中干脆把卡萨多发动政变的责任强加于内格林，同时对共产党的无所作为和无能为力避而不谈。“他在内心深处希望摆脱自己承担政府责任，”热情之花写道，“并且寻找一个替罪羊。……他得到投降分子活动情报时的消极冷漠使我们相信，他让事态发展顺其自然。”这很可能是事实，然而，关键问题不是热情之花的指责是否具有事实依据，而是她对内格林一直在寻找替罪羊的指控是否并不同样适用于共产党。实际上，值得注意的是，斯特凡诺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责怪共产党领导人没有表现出对于内格林的更大的独立性。“尽管他们并不认为内格林显示出任何绝不动摇的姿态，”他写道，“但是，他们对他抱有期待，把一切希望全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我]得出结论，”埃托雷·万尼写道，“尽管出现了种种迹象，至少，某些党的领导人根本不想作任何努力改变事态发展的进程。”即使是在密谋活动的中心马德里，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在动身向穆尔西亚以南的埃尔帕尔马撤退前，也没有进行任何阻挠卡萨多的尝试。三月五日奉命前往埃尔达之前一直留在马德里的塔圭尼亚说，共产党非常明显地按兵不动，因此“完全证实了我的怀疑，由于不想对任何可能导致风雨飘摇的人民阵线瓦解的行动负责，它始终不想采取主动，[而是]打算坐观事态的发展”。

热情之花断言，内格林正在寻找替罪羊并且为长期的煎熬即将结束感到宽慰，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陶里亚蒂和西班牙共产党正在想方设法使内格林和卡萨多成为替罪羊也是事实。这并不是说二月中旬陶里亚蒂和政治局成员返回西班牙时不打

算继续执行抵抗政策，尽管加泰罗尼亚地区已经失陷，他们仍然希望英法两国最终迎战意大利和德国，从而使西班牙内战成为一场西欧全面战争的组成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不顾普遍存在的士气低落及和平愿望，政治局在二月二十三日发表了乐观的宣言，宣言预言，只要反佛朗哥的力量继续抵抗，就会得到民主国家的援助。此外，政治局二月二十四日向内格林建议解除卡萨多所担任中路军司令的职务，这大概是为了振奋马德里这一关键战场抵抗力量的士气。

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政治局在卡萨多起事的前几天从马德里永久撤退到埃尔帕尔马，并且促使内格林同时转移到埃尔达？答案很简单。二月二十七日，英法两国承认佛朗哥政府是西班牙的合法政府，使从这两个国家得到援助的希望彻底破灭。接着，在同一天，阿萨尼亚辞去总统职务。“除了其他事情之外，”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这两件事情进一步打击了领导人和人民的士气。在一些人认为失去‘合法’政府的地位将使援助的可能[‘据信’的可能]不复存在的同时，其他人则放弃了对国际形势将会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所抱有的一线希望。”人们也许进一步要问，为什么像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已经转移到埃尔帕尔马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政变即将发生时为了就近利用莫诺瓦尔的飞机场而奉命集中于埃尔达？答案同样很简单。第一，陶里亚蒂写给莫斯科的报告证明，党的军事和政治机构显示出了崩溃的迹象。第二，三月四日，佛朗哥的第五纵队在卡塔赫纳的海军基地发动了暴乱，因此，第二天上午布伊萨海军上将（他在洛斯利亚诺斯会议上警告内格林，如果不能立即实现和平的话，海军将放弃西班牙领海）命令舰队出海驶往北非，使整条海岸线处于不设防状态，成千上万人没有办法逃走了。

无视这些以及另外一些不利于共和派的事态发展，抵抗能够坚持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神话一直流传了半个世纪。“如果再坚持六个月，”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等到西班牙内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我们最终可

能赢得[内战]。”后来他说，这并不是痴心妄想。需要的只是“提高公众士气，整顿军队并将某些当权的不可靠分子和失败主义者撤职”。在重要的历史学家中，希望这个神话永远流传下去的是休·托马斯。他在那部颇受欢迎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中断言：“如果共和国保持完整，内格林和卡萨多继续留在一个阵营，哪怕再坚持短短两个星期，他们的国际处境可能就会发生变化。三月十五日，希特勒进军布拉格。就连张伯伦都在三月十八日提出了抗议。到三月底时，英法两国对波兰的保证已经改变了国际形势。一个团结的共和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改善局面。”除了别的因素之外，这种引人注目的说法完全无视英法两国对佛朗哥将军的外交承认和阿萨尼亚总统辞职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无视本书前面某一章所阐述的事实：英国对波兰的保证是一种虚假的表态，内维尔·张伯伦和霍勒斯·威尔逊爵士竭尽全力逃避他们所承担的义务。

到二月底时，就连共产党的阵营内部都对继续抵抗失去了信心。陶里亚蒂知道这一点，斯大林当然也知道这一点，自从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后，他的外交关注的重点不再是西班牙内战，而是与希特勒签订使德国侵略的方向转离东欧的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那么，既然内战已经失败，继续抵抗也于事无补，为什么不对政变的密谋放任不管？为什么不把令人讨厌的谈判任务留给卡萨多上校，看他能与一个冷酷无情、急欲报复的胜利者达成什么协议？这样的话，共产党人就可以免除投降的耻辱和历史责任。

于是，三月五日，在卡萨多尚未宣布政变时，已经离开马德里转移到埃尔帕尔马的共产党领导人奉命前往埃尔达，在那里，他们集中在一幢已被安东尼奥·科登和另外一些共产党人占用的大型建筑里，位置代码是“达卡尔”。在恩里克·利斯特看来，政治局成员显然认为内战已经失败了。“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把自己封闭在埃尔达，”七十年代初期，当时仍是共产党员但与党的领导层不和的利斯特证

实，“他们还命令我们的一些从法国回来的军队领导人去那里隐居，远离前线，远离工人群众聚居的大型工业中心城市，尤其要远离曾经是我们的堡垒的马德里，当时那里已经成为反对共和国的阴谋中心。”

利斯特还在一九六六年按照当时党的方针声称，《国防部官方日志》宣布的措施是一种挑衅，内格林应当对此负责。“看了《国防部官方日志》以后，”他写道，“我按捺不住对这种愚蠢行为的愤怒，因为，对于那些阴谋策划者来说，这好像一支短标枪，立即被他们用来作为证据，指责我们共产党人从法国回来是要夺取军队的指挥权并让战争按照我们的方式进行。内格林意识不到这种后果吗？我不这样认为。”

另一方面，担任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第一政委的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脱离西班牙共产党之后说，“内格林在政治局的坚决要求之下所采取的那些措施”是莫斯科授意的，它们是“一种狡猾的煽动反抗和暴乱的政治挑逗，是点燃暴乱火药桶的那一颗火星”。然而实际情况是，尽管这些措施可能为共产党人打算夺取政权的普遍怀疑增加了内容和色彩，因而使政变的密谋具有更大的紧迫感和推动力，但是，毋须共产党人的任何刺激，卡萨多的政变将会发生。实际上，无论是在三月五日至六日政变当晚卡萨多的政变委员会通过电台播出的官方公报中，还是在政变策划者发表的各种演说中，均未提到这些措施或者暗示内格林和共产党人打算政变。此外，正如我们所知，自从二月初卡萨多在内格林和政治局返回西班牙之前开始与民族主义者的特工谈判以来，政变一直在密谋策划中，二月二十七日事态发生重大变化之后，政变的契机出现了。此时，以西普里亚诺·梅拉的第四军为后盾的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已与卡萨多结成同盟。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知道了，西班牙共产党在二月底已经放弃了继续抵抗的所有希

望。内格林的情况也是这样。关于内格林和共产党领导人最后几天在埃尔达的戏剧性活动，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提供了一些证言。尽管读者可能记得，事实证明他的证言有的时候不足为信，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段特定的证言在某些重要方面与陶里亚蒂写给莫斯科的报告的说法一致，也与内战结束之后不久我在墨西哥从一些重要的共产党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一致，而这些共产党人直到最后仍然站在内格林一边。尽管埃尔南德斯的证言也许不是全都可靠，但是，在某些历史学家——他们对前共产党人提供的证据不屑一顾，对另外一些证据则不加鉴别地予以接受——的圈子里，下面的证言颇受重视，仅仅因为这一点，它就不应被断然拒绝。

谈到三月五日凌晨，埃尔南德斯讲述了他去埃尔达会见内格林的情况：

凌晨三点，内格林出现了。……他看上去像个流浪汉，没有刮脸，帽子拉下来遮住了耳朵。……他似乎非常疲劳。……

“埃尔南德斯，我的朋友。”他用柔和的声音说，“当我离开法国返回中南部地区时，我相信，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我将把我的皮囊丢在这里，但是，这种可能现在已经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九。……我们在这里无事可做。我不想在反对佛朗哥的阵营中领导一场新的内战。”

“可是，你的决定将使一切陷入最可怕的混乱。”我说。

“不会比现在更混乱！暴乱已经发生了。现在是卡塔赫纳和舰队。明天将是马德里或巴伦西亚。我们能够做什么？镇压他们？我不认为值得去找这种麻烦。内战肯定已经失败。如果别人想用谈判实现和平，我不会去妨碍他们。”

“那么，《国防部官方日志》所宣布的一系列任命是什么目的？”我问他，觉得迷惑又好奇。

“那是因为你的同志们的要求。我尽量让他们感到满意，要知道，一切都将毫无意义，甚至还会造成危害。”

我看得出来，内格林，总理兼国防部长，那个在最困难的时期最忠实有力地体现了我国人民伟大斗争精神的抵抗者，已经死了。

当天晚些时候，陶里亚蒂和热情之花到达埃尔达，他们立即与埃尔南德斯进行谈话，后者提出了一些问题。“陶里亚蒂摘下眼镜，”埃尔南德斯叙述道，“像通常一样，当他准备倾听时，就不停地擦拭眼镜。”

“我想问你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一名政治局委员，我是否有权知道作出了什么决定？在马德里，我得到的第三手消息是，你们已经决定在等待事态发生变化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没有人告诉我这些措施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必须等待暴乱发生而不是抢先制止它。”

“第二个问题是，”我继续说，“作为一个党的领导机关的常设地，埃尔达有什么比马德里或巴伦西亚有利的条件？”

“第三个问题是，昨天的《国防部官方日志》所宣布的任免事项的政治理由是什么？”

陶里亚蒂继续擦拭他的眼镜。他不时地像鱼缸里的金鱼一样用他的近视眼盯着我。

.....尽管我已经说完了，陶里亚蒂和热情之花都不打算回答我。终于，热情之花开火了。

“埃尔南德斯同志非常清楚为什么没有请他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大家一致认为，为了避免军队的猜疑和其他党派的指责，他在担任[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第一政委期



间，不宜参加政治局会议。”

“这是事实，不过，同样是事实的还有一致同意的补充意见，你们将让我知道政治局决定的一切事情，并且事先与我商量所有重要的问题。”我争辩说。

热情之花假装没有听见我的话，她继续说道：

“为了始终在政府附近以便能以必要的速度应对任何紧急情况，政治局决定转移到埃尔达。最后，《国防部官方日志》宣布的是我们建议内格林作出的任命，这些任命符合我们明确的政策：清理军队中的叛徒和动摇分子，在投降分子和政变策划者、失败主义者和阴谋集团周围设置障碍，用可靠的人取代他们，后者已经在上百场战斗中证明自己誓死忠于人民的事业。现在清楚了吗？”她挑衅似的结束了谈话。

“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我答道，“如果不安全的因素使党的领导机关选择离开马德里，那么，它不应转移到埃尔达而应转移到巴伦西亚，那座城市是共和派控制区的战略中心，拥有发达的通讯网络，将会保证对紧急情况作出迅速的反应。另外，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预测政变主要发生在马德里，那就应当把我们最有威望的一两支部队与一名政治局委员一起派到那里去。在我看来更加显而易见的是，向内格林建议这些任命铸成了无法弥补的大错，除非你们预见到了可怕的后果。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蓄意挑起一场暴乱，我们不可能做得更好。你们能够告诉我，为什么莫德斯托、利斯特、维加、门迪奥拉以及另外一些人一直没有履新赴任？我可以知道他们正在埃尔达干什么吗？或者说，他们的任务是在这里等待事态发生变化吗？”

热情之花张牙舞爪地厉声呵斥，像一头发情的母狮。

“我不允许埃尔南德斯同志把我们称为煽动者。……”

陶里亚蒂觉得必须干预了。

“我相信，埃尔南德斯同志不希望把我们称为煽动者。”……他的声音冷漠，镇静，仿佛是在讨论核裂变。接着，他态度阴险地继续说：“这种军事安排与预防措施的结合不幸稍微晚了点。……我们试图通过一次努力纠正内格林摇摆不定的政策对清除阴谋叛乱活动中心造成的危害。事情做得太过火了。但是，我们还能采取别的什么措施吗？……任凭事态自然发展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我同意，我们的同志应当立即履新赴任，我们应当考虑转移到巴伦西亚并把政府设在那里。尽管内格林萎靡不振，我们应当鼓励他。一切都要小心谨慎，即使是一只老鼠，也不让它乱动。如果他们打算暴乱，他们将在半小时之内遭到镇压。”

我们可以根据这一段对话推测，埃尔南德斯并不知道被召集到埃尔达的共产党领导人很快就将按照陶里亚蒂的指示离开这个国家了。其实我们可想而知，没有任何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知道确切的行动计划，只有全权负责使西班牙共产党退出内战的陶里亚蒂对这出大戏的下一步行动有明确的计划。

## 第六十六章 内格林逃之夭夭与第三共和国的末日

当共产党领导人聚集在埃尔达时，卡萨多上校与他的政变同谋正在完成他们推翻政府的计划。“[三月五日星期天]傍晚七点，”卡萨多叙述道，“我在前国防部大楼里安营扎寨。……如果共产党发动暴乱，这幢非常陈旧的建筑可以很好地用于防御。”晚上八点，参与密谋的大部分人员来到大楼，对名为国防委员会的政变委员会的各项职务进行了分配。密谋者中最著名的人物、德高望重的社会党人胡利安·贝斯泰罗表示，由于军队是唯一合法的权力机构，卡萨多上校应当担任主席和国防部

长。不过，卡萨多只同意暂时领导委员会，直到米亚哈将军从巴伦西亚到达为止。刚刚被任命为陆海空三军监察长的米亚哈经过最初的犹豫之后，现在已经明确表态参加政变。

委员会的职务最后分配如下：

何塞·米亚哈将军	前共产党党员	主席
胡利安·贝斯泰罗	社会党人	外交部长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	共和派人士	国防部长
文塞斯劳·卡里略	社会党人	内政部长
米格尔·圣安德烈斯	左翼共和派人士	司法和宣传部长
爱德华多·巴尔	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通讯和公共工程部长
曼努埃尔·冈萨雷斯·马林	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财政和经济部长
何塞·德尔·里奥	共和联盟成员	教育和卫生部长 <sup>3</sup>
J.桑切斯·雷克纳	工联党人	秘书 <sup>4</sup>
安东尼奥·佩雷斯	劳动者总工会成员	劳工部长 <sup>5</sup>

图注：

3. 只有此前的姓名和职务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马德里的报纸上（实例见《政治报》）。

4. 桑切斯·雷克纳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三月七日马德里各报发表的名单里，但却见于《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四卷，第293页以及玛蒂尔德·巴斯克斯和哈维尔·巴莱罗的《马德里的内战》，第836页。

5. 安东尼奥·佩雷斯三月八日加入了委员会（巴斯克斯和巴莱罗，《马德里的内战》，第836页）。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援引劳动者总工会总书记何塞·罗德里格斯·维加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所写的一封信说，马德里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成员同意帮助政变委员会，“以防止反法西斯阵营内部发生冲突，尤其是考虑到政府已经不复存在这一事实”（《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293页）。担任劳动者总工会副主席的地下共产党员埃德蒙多·多明格斯写道：“[劳动者总工会的一次会议]委派安东尼奥·佩雷斯代表我们加入委员会。维加和我都不愿意接受这种职位。懊恼愤怒的佩雷斯不得不违心地担任了一个部长职务。委员会会议表现出对共产党人最强烈的仇恨，[但是]我们没有让他们把工会排除在外。”（《战胜内格林的人》，第212页）

夜里十一点半，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贝尔纳韦·洛佩斯的指挥下，西普里亚诺·梅拉——他帮助卡萨诺策划了政变——的第四军所部第七十旅接管了国防部、内政部和通讯交通部的警卫，同时接管了电话交换中心、西班牙银行和安全总局。午夜过后不久（三月六日），左翼共和派人士米格尔·圣安德烈斯以委员会的名义通过广播发表宣言：“西班牙的工人们！西班牙反法西斯的人民！……作为革命者，作为无产阶级，作为西班牙人，作为反法西斯战士，我们再也不能被动地接受内格林政府的鼠目寸光、迷失方向以及毫无意义的无所作为。……我们无法忍受的是，当人民斗争、作战、死亡时，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却准备去国外生活。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为了防止有人在最紧要的关头开小差，我们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内格林博士政府的权力已经失去了法律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西班牙人民忠实和真正的保护者、作为准备以自己的生命作保证因而视死如归的人，为了使所有人不得逃避同样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我们……确认我们的权力。”

接着，胡利安·贝斯泰罗发表讲话。他说，由于阿萨尼亚总统的辞职，共和国已经群龙无首。“根据宪法，除非在最长八天的时间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安排总统选举，否则的话，议会议长[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不得接任总统。在目前这种不可能达到宪法要求的情况下，没有总统授权和议会支持的内格林政府已经失去了合法性——试图给人以议会仍在活动的假象也是徒劳的。”另一方面，他接着说，“共和国军队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力。……内格林政府只能通过隐瞒事实、时隐时现及其阴险的目的争取时间。……它的拖延政策不可能有什么别的目的，只是为了鼓动人们病态地相信，国际事务的错综复杂将会造成一场普遍的浩劫，而在这场灾难中，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大众将与我们一起灭亡。”

下一个讲话的是卡萨多上校，他向战场两边的西班牙人呼吁：“同胞们……人民勇于……在独立自由的情况下通过和解的方式寻求和平之路。……我们想要一个摆脱外国控制的国家。……身处遭到入侵地区的西班牙人，你们必须在外国人与同胞之间做出选择。……在得到没有犯罪活动的和平保证之前，西班牙人民不会放下武器。……你们必须做出选择。如果你们给予我们和平，你们将会看到我们慷慨的西班牙心胸开阔无比。如果你们继续与我们打仗，你们将会看到我们英勇的战斗精神冷酷无情、不屈不挠，像锻造我们的刺刀所用的淬火钢一样坚硬。不是为西班牙带来和平，就是一直战斗到死！……西班牙的同胞们，共和国万岁！西班牙万岁！”

最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第四军军长西普里亚诺·梅拉讲话。他猛烈抨击胡安·内格林“背信弃义的犯罪行为”，声称这位被罢免的总理为“战士和工人所不齿”。他还说，内格林的政策“只有一个目的，当人民留下来面对敌人束手待毙时，他带着国家的财富逃走。……现在正与你们说话的这个军官——他因为想起自己身为体力劳动者的艰辛生活而心情激动——认为，只能用纪律对待国家的仆人，因此，必须反对掠夺或者背叛它的人。……由于这个原因，我加入了组成国防委员会的……这些历

史清白、心地善良的人的行列。从现在起，同胞百姓们，西班牙有了一个政府和一项使命：实现某种建立在公正原则和兄弟情谊基础上的体面的和平。……但是，如果因为无谓的误解和平的努力失败了——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令人遗憾的，那么，我还要冷静地告诉你们，作为军人，我们准备在我们的岗位上为捍卫西班牙的独立战斗到底。工人们和战士们！……独立、自由、不可征服的西班牙万岁！我们已经为捍卫人民的生命和尊严做好了准备，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国防委员会万岁！”

虽然讲话的大意如此，但是，没有一个讲话者可以确定能够实现体面的和平。当然，他们可能受到希望的鼓舞：只要赶走内格林和共产党领导人，委员会就能通过谈判向佛朗哥将军争取合理的和平条件，尽管后者迄今为止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

广播讲话刚一播出，卡萨多就接到内格林打来的电话。关于这次通话，卡萨多提供了三个几乎完全相同的版本。下面这个版本出现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的《人民报》上。

内格林：将军，马德里发生什么事情？[在一九三九年出现于伦敦的三个版本的第一个版本中，卡萨多说，他告诉内格林：“我只是一名上校。我不接受你授予我的将军军衔，因为它像你的政府一样不合法。”]

卡萨多：我起义了。

内格林：对谁？对我？

卡萨多：是的，对你！

内格林：我已经听到政变宣言，在我看来你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

卡萨多：我自己感到心情平静，因为我尽了作为军人和公民的职责。委员会中各个政党和工会的代表同样感到心情平静，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为西班牙做出了贡献。

内格林：我希望你深思，因为我们仍然可以达成和解。

卡萨多：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因为我认为，一切已经得到解决。

内格林：至少，你应当派出一个代表，以便我可以移交政府的权力，或是我应当为此派个代表去马德里。

卡萨多：不必操心这件事。你不可能移交你没有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已经夺取了你和你的政府放弃的权力。

内格林：那么，你不同意这个要求？

卡萨多：不同意！

下午一点左右，卡萨多接二连三接到了从埃尔达打来的四个电话，它们分别来自：通讯部长（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内政部长（保利诺·戈麦斯）、负责陆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安东尼奥·科登）和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每个来电者均试图以总理的名义说服他，他应当接受移交权力。“我告诉所有来电者，我已经拒绝了内格林博士，这是不可改变的。我还请他们不要坚持，因为那是徒劳的。（他们想把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那个政府的权力——移交给我。）”

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断然否认内格林愿意交出他的权力，并且声称卡萨多是“异想天开”，但是，他当时不在埃尔达，也没有透露其消息来源。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对此保持沉默，热情之花在她的回忆录《唯一的道路》中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不过，两个坚定支持内格林的人（其中一个西班牙共产党党员）为卡萨多的说法提供了依据。一个是圣地亚哥·加尔塞斯，他声称，内格林往马德里打电话时他与总理在一起，总理向卡萨多建议，应当派著名的贝斯泰罗派社会党人特里丰·戈麦斯完成权力的合法移交；另一个是莱万特方面军司令莱奥波尔多·梅嫩德斯将军的军事行动负责人弗朗西斯科·休塔特上校。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写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休塔特说，科登根据政府的指示命令梅嫩德斯打电话给卡萨多，要求后者“采取措施使其行为合法化”，同时“接受政府的权力，以保证共和派的合法性”。但是，卡萨多“拒绝接受任何无权可交的人所移交的权力，因为政府的组成不符合宪法”。内格林千方百计“合法”移交权力的企图是一个狡猾的花招，因为，如果这个花招得逞的话，就将使他免遭被驱赶下台以及为了活命狼狈、仓皇逃离西班牙的羞辱。但是，卡萨多无意帮内格林这个忙。

卡萨多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到埃尔达内格林和他的部长那里时，正逢内阁短暂休会。一九七七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党官方内战史的第四卷声称，部长们重新集中以后，乌里韦询问应当对政变采取什么措施。“内格林叫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命令他让轰炸机在拂晓时分做好准备。”内格林未必下达了这种命令，因为，三十八年前陶里亚蒂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写给莫斯科的那份报告中说，内格林并没有在内阁会议期间提出“镇压”的问题，相反，他“表示反对公开对抗的主意”。实际上，当我在一九四〇年采访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时，他说，没有什么所谓的命令，但据他回忆，政变发生以后内格林对他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尽量争取时间。切莫与卡萨多发生冲突。”

没有理由相信陶里亚蒂和共产党政治局会在这一关头反对内格林设法为他们逃离西班牙争取时间，因为，正如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那样，这显然是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向内格林提出的建议之一。如果内格林确实认为继续斗争是徒劳的并



且对自己的磨难即将结束感到宽慰，那么，埃尔达的那些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上也有同样的感觉。恩里克·利斯特声称，在一九三九年春夏时节于莫斯科举行的几次会议上，他谴责了政治局成员的失败主义倾向。“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把自己封闭在埃尔达。……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我说，我无法忘记三月六日早晨给我留下的痛苦印象。当时，我在卡萨多发动叛乱几小时后……从卡塔赫纳赶到埃尔达，我发现，多洛蕾丝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不是在研究如何回击卡萨多委员会的那些叛徒，而是准备乘飞机离开。”

陶里亚蒂在内战最后阶段所扮演的狡猾角色使下面的对话具有了可信性。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这是内战结束之后不久他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谈话的内容。无法证实这一段对话，但是，因为它与政变之前事态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已在本书前一章得到文件资料的充分证明——相吻合，所以在此予以引用。

马努伊尔斯基：对你们来说内战不可挽回地失败了。尽管种种迹象表明即使出现奇迹也无法避免共和国面临的失败命运，具有正常判断力的党仍然继续高喊抵抗的口号。希望欧洲燃起战火是一种幻想，因为，在彻底解决西班牙问题之前，不可能爆发欧洲战争。

埃尔南德斯：当时你们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马努伊尔斯基：如果没有向你们说明这一点，那是我们代表团的失误。

埃尔南德斯：你们告诉我们的正好相反。

马努伊尔斯基：无论如何，这没有改变基本情况。一旦确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挽救党的声誉使其不致受到怀疑至关重要，内战期间，人民阵线的所有党派都因玩弄

阴谋诡计而名誉扫地。如果我们的西班牙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分担同样的责任，那将是不公平的，因为，在内战期间以热情和鲜血做出最大贡献的正是我们的党。[陶里亚蒂]采取了一种在我看来非常巧妙的策略。一方面，他继续高喊抵抗的口号，以此显示共产党人不会在与佛朗哥的斗争中放下武器；另一方面，他把广阔的战场留给那些叛乱分子，后者在发动叛乱时表示，他们准备结束他们认为毫无意义的抵抗并且谋求与佛朗哥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当时这是彻头彻尾的疯狂。埃尔科利听任事态像预期的那样发展。卡萨多分子落入了圈套.....[结果]党不必为最后的灾难承担责任。.....如今，由于西班牙民众正在遭受佛朗哥残忍的血腥镇压，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有必要按照共产党人的建议抵抗到底将会更好。.....因此，他们将迁怒于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迁怒于卡萨多委员会成员。[陶里亚蒂的]策略挽救了西班牙共产党的政治前途和声誉。

由于退隐于埃尔达，内格林和共产党领导人无法采取有效的行动挫败政变，即使他们想这样做。毕竟，他们出现在埃尔达不是为了逃离西班牙吗？“各省军队的指挥权都被叛乱分子接管了。”几周之后当内格林流亡国外时，他告诉议会常务委员会，“政府无法与任何人取得联系。我们的信使遭到逮捕，我们知道，叛乱分子正在接管公路的控制权，因此，政府将被关在一个笼子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写道，政府决定尽快离开西班牙。两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乌里韦和莫伊克斯）说，他们“由党来支配，所以将听从党的指示”。在安东尼奥·科登和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陪同下，他们前往共产党在埃尔达的总部“达卡尔”。在那里，共产党领导人正在全力以赴为自己逃往国外做准备。斯特凡诺夫证实，除了立即离开西班牙之外他们无路可走。“如果同志们不在三月六日离开的话，多洛蕾丝、莫德斯托、利斯特和乌里韦很可能在两三天内遭到处决。.....他们被处决将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并且将在党员队伍中引起混乱。

.....他们必须离开，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在那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笼子里无法采取任何有用或切实可行的行动。任凭党的领导人和相当一批杰出的共产党人军官留在埃尔达束手就擒是错误的，他们在那里的居民当中没有一个忠实的支持者，因此，他们在那里几乎没有办法与党组织和军队保持联系。在那种条件下，允许党的领导人原地不动非常愚蠢，而且也是极大的犯罪。”

三月六日早晨，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当大部分内阁部长前往莫诺瓦尔机场等待载运他们离开西班牙的飞机到达时，内格林和德尔巴约去达卡尔与共产党领导人告别。曼努埃尔·桑切斯·阿尔卡斯（共产党员，主管宣传的外交部副部长）、比维尼亚诺·费尔南德斯·奥索里奥—塔法利（亲共产党的总政治部主任）和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内格林的追随者，曾经权力很大的军事调查局负责人）以及另外一些“高级官员”陪同他们前往。在那幢建筑物里，他们找到了热情之花、何塞·安东尼奥·乌里韦（巴伦西亚的共产党议员）、安赫林·阿尔瓦雷斯（共产党人军官）和另外几名共产党人军队指挥官，还找到了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共产党员，内格林形影不离的政治秘书）、伊蕾妮·法尔孔（热情之花的秘书）和另外几名共产党的“合作者”。佩德罗·切卡和曼努埃尔·德利卡多（两人均为政治局委员）以及陶里亚蒂上午八点左右从穆尔西亚到达。德尔巴约说，达卡尔到处是人，他们把建筑物的阳台变成了“最公开的民主集会场所”。

德尔巴约说，卡萨多迅速采取措施防止内格林发表广播演说，以免全国人民从演说中得知“即将进行谈判”以及总理为实现“体面的和平”所做的努力。德尔巴约还声称，卡萨多从总理本人的言谈中听说他打算发表广播演说，而演说的播出将使卡萨多失去发动叛乱的一切理由。“因此，他决定扼杀政府的声音。”尽管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内格林打算发表广播演说以便向人民说明英法两国承认佛朗哥和阿萨尼亚辞职所造成的局面，并且解释“为了获得体面的和平”应当继续进行抵抗的

理由，但是，它根本没有提到“即将进行谈判”。在陶里亚蒂和斯特凡诺夫写给共产国际的长篇报告中，也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内格林即将为和平进行谈判。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身为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政府内阁成员的比森特·乌里韦在他那部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到曾经打算进行谈判，他还批评内格林由于无力应对局势而“失去斗志”并决定离开西班牙。他声称，三月五日至六日晚上他用大量时间试图劝阻内格林和德尔巴约离开，但“不起作用，因为他们去意已定”。这也许是事实，然而，不管怎样，多年来共产党的官方态度是把卡萨多政变成功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内格林及其内阁部长的消极被动，归咎于他们在埃尔达的与世隔绝，并且归咎于他们逃离西班牙的决定，仿佛共产党领导人没有直接参与逃离西班牙的准备工作似的——他们提供了一支由一百名游击队员组成的卫队保护政府和党的领导，还提供了三架飞机“供党的领导人使用”。

关于内格林在即将离开西班牙之际去达卡尔对共产党总部的造访，陶里亚蒂评论道：“内格林似乎不想背弃共产党人，他说他欠他们的人情。”另一方面，陶里亚蒂觉得不欠内格林的人情。作为总理兼国防部长，尽管内格林为加强共产党的实力和地位做出了比其他党外人士更大的贡献，尽管内格林因为把自己的政治命运与共产党人联系起来而牺牲了他的朋友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声誉，陶里亚蒂对他并不宽容。内格林和共产党领导人逃离西班牙几天后的三月十日，陶里亚蒂在写给政治局的一封信中确定了对这个曾为促进党的事业做了那么多工作的人的政策。“我认为，”他写道，“[内格林的逃跑]是一个可悲的错误，这个错误如此令人费解，以致我开始怀疑内格林与卡萨多串通一气。你们与他在国外的联系，你们关于他的声明，等等，务必非常谨慎。”

就连狂热的共产党人恩里克·利斯特都接受不了陶里亚蒂这种忘恩负义的指控。他写

道：“陶里亚蒂的看法不可思议。他是共产国际派到西班牙的代表，而整个政治局毫无怨言地服从共产国际。”他说，三月六日上午十点左右，正是陶里亚蒂安排多洛蕾丝·伊巴露丽、赫苏斯·蒙松（共产党议员）、斯特凡诺夫和法国共产党议员让·卡泰拉斯等人乘飞机前往非洲（奥兰）。“也就是说，这些人比内格林提前大约五小时离开了西班牙，后者在下午两点半离开。”热情之花在她的回忆录《唯一的道路》中承认，她比整个政府提前离开几小时，尽管十几年后出版的由她主持编撰的共产党官方内战史的第四卷对这一重要细节语焉不详。“陶里亚蒂随后组织[埃尔达]其余的政治局委员……以及从法国回来的那一批共产党人军官离开。”利斯特继续写道，“陶里亚蒂执行的是什么指示？卡萨多暴动难道只对内格林放弃战斗的计划有利，它会不会对其他人结束内战的计划同样有利？”

陶里亚蒂关于内格林与卡萨多勾结的指责并没有得到西班牙共产党的支持。一九七一年，当时的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在承认内格林得知卡萨多政变的消息后“有某种如释重负之感”的同时，认为陶里亚蒂的指责“太严厉”。就连经常对陶里亚蒂指责内格林的言论鹦鹉学舌的热情之花也在一九七七年为这位总理恢复了名誉。“在真实可信的西班牙史编撰完成之后，”她断言，“内格林的个性将因他所做的、他想做的、他能做的而呈现出其应有的一切活力。”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为内格林恢复名誉的这种做法出现在佛朗哥将军一九七五年去世后，当时，西班牙共产党和内格林的支持者似乎认为，为内战挖掘出一位民族英雄的时候到了。

尽管陶里亚蒂对内格林横加指责，但是，根据他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写给莫斯科的那份报告，显然，当他在三月六日早晨到达达卡尔时，没有人打算与国防委员会对抗，更没有人愿意继续执行抵抗政策：“情况完全混乱不堪。大家陷入一种绝望的状态。我们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失去了联系。”与党的领导人简单磋商之后，他要他们向内格林提出两项建议。两项建议均得到总理的认可。第一项是发一封电报

给卡萨多，建议他委派一个或几个人以“友好和爱国的”方式解决分歧，而“权力的移交应当以正规合法的方式进行”。陶里亚蒂解释说，提出这项建议“以使内格林留下，同时为了争取几小时时间”。“内格林一句话也没有说，”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叙述道，“他把这些建议草草地写在几张纸上。然后，总理的秘书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负责将其整理成文并拍发出去。可是，电台和电传打字机已被拆除。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莱万特方面军司令]梅嫩德斯将军设在埃尔达的指挥部的电话把建议转发给卡萨多。”这封电报的下落不明，因为卡萨多在记述整个事件时并没有提到它。另一方面，乌里韦说，马德里“根本拒绝[与内格林]打交道”。第二项建议的目的是要保证主要逃跑路线的安全，它同样没有结果，因为没过多久即得到了“要命的消息”，埃尔达东南仅三十七公里之隔的阿利坎特已经被卡萨多的支持者占领。陶里亚蒂评论说，阿利坎特的失守破坏了“我们计划的整个行动”。

不过，就在向内格林提出这两项建议时，陶里亚蒂已经想到下一步行动。“我们决定让多洛蕾丝离开西班牙，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无法保证她的生命安全。莫雷诺[斯特凡诺夫]与她一起离开。我不认为他的存在有什么作用，因为他不具备应对这种局面所需要的任何素质。整个晚上他不能给领导班子提供一点建议。”

整整一天，不利于共产党的消息不断传来。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政府得到消息，卡萨多已经下令逮捕内格林、热情之花、德尔巴约、乌里韦、莫德斯托、利斯特和所有政治局委员。更可怕的消息是，支持卡萨多的突击卫队开始攻占埃尔达郊区。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叙述说，直到下午两点半，他和内格林都在等待卡萨多对内格林提出的“正规合法地”移交权力的建议的反应，机场几次警告他们，如果再推迟飞机起飞的话，他们将落到卡萨多手中。他们到达莫诺瓦尔机场时，已经过了下午

三点。“这令我担忧，因为我宁愿付出任何代价也要避免在即将平安离开时遭受屈辱的命运。……[内阁]同僚理所当然地以他们的愤怒迎接我们，尽管有所克制，他们像我们一样没有吃饭，此外，他们还在炫目的阳光下等待了六个小时。”

据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在与德尔巴约一起即将离开之际，内格林告诉埃尔达的共产党人：“我们一刻也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因为我们将被逮捕。我认为，我们全都应当离开。”两人与在场的人激动地握手之后离开了。“从那时起，埃尔达的包围圈开始收紧。……埃尔达的驻军司令——一名共产党员——被逮捕，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取代了他。”陶里亚蒂说，下午五点左右传来消息，共产党员、空军参谋长路易斯·阿隆索·维加中将与卡萨多合作。“于是，我们失去了从马德里过来的公路上支持我们的重镇阿尔瓦塞特。”

逃离西班牙之前，内格林遇见了第十四军军长多明戈·温格里亚上校——我们应当记得，他的精干的游击队员被安排在埃尔达保护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人——的苏联顾问斯坦尼斯拉夫·A·沃普沙索夫上校。沃普沙索夫与接替格列戈里·M·施特恩担任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化名“希洛夫”的米哈伊尔·斯捷潘诺菲奇·舒米洛夫准将在一起。“在等着轮到我们撤退时，”沃普沙索夫写道，“[我们]在小镇埃尔达附近的一幢农舍里遇见了共和国前总理内格林，于是请他调拨两架道格拉斯运输机供我们使用。内格林尴尬地回答说，他不再拥有任何权力，他能做的只是对我们的帮助表示感谢。他能为我们做的真多呀！不过，前总理给阿尔瓦塞特附近的空军基地司令[曼努埃尔·]卡斯孔上校写了一封介绍信，但是我们没有用上这封友好的介绍信，因为那个空军基地一架飞机也没有。我们正在交谈时，内格林的副官报告说，叛军已经占领了阿尔瓦塞特，因此，必须抓紧时间赶到莫诺瓦尔机场，一架飞机正在那里等着这位前总理。内格林迅速与我们握了握手，然后几乎是跑着上了他的汽车。”尽管内格林没有帮上忙，沃普沙索夫、舒米洛夫以及其他苏联顾问和译员仍然乘坐苏联驻巴黎

使团提供的一架法国飞机离开阿尔瓦塞特飞往北非的奥兰。

与此同时，（三月六日）晚上十点左右，在陶里亚蒂的主持下，共产党政治局在埃尔达莫诺瓦尔机场的一幢建筑里举行了在西班牙的最后一次会议，另外一些党的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由于佛朗哥即将获胜”，会议决定，少数人留下来秘密组织那些最有可能陷入危险境地的人撤离，并由“一些人们不太熟悉的同志”成立一个新的领导机构。

“大家的士气相当低落。”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说，“我问莫德斯托和利斯特，他们是否认为有可能恢复对于军事形势的控制。[陶里亚蒂这好像是在为自己打掩护，以防有朝一日这两位共产党军事领导人指责他没有打算继续战斗。]他们两个回答说……没有政府的支持，党什么事情也做不了。我仍然坚持认为在场的一些同志不应离开。……接着，政治局单独再次开会，决定切卡、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书记克劳丁和我留下来。”

当时安排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人逃离的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回忆了最后那几个小时的戏剧性场面。“午夜时分，卡萨多派遣的第一批部队乘坐卡车陆续到达，他们开始不管死活抓捕我们。……同志们决定再次开会作最后的决定。……当时已是[三月七日]凌晨三点，天在四点半就要亮了。如果到时候飞机还没有离开，那就一切都完了，因为它们将被枪林弹雨所摧毁。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我知道情况紧急并且被人们的镇定所激怒，我认为他们过于镇定从而造成了危险。另一方面，我对同志们深感钦佩，已经知道危险的他们仍然在以最负责的精神尽其作为共产党人的职责。……离天亮只有一个半小时了。……大家毫无争议地一致同意以下决定：一部分同志前往图卢兹，其他同志则尽力突破包围圈向不同的方向疏散。”

在游击队员的保护下，飞机起飞了，而陶里亚蒂、切卡和克劳丁则设法穿过突击卫



队逐渐收紧的包围圈进入卡萨多控制的地区。此后长达三十八年，西班牙共产党不能在西班牙合法活动。

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写道，由于电话电报通讯系统出了故障，马德里的共产党人“不知道政治局在埃尔达作出的决定及其采取的措施，也不知道内格林和他的政府的反应。尽管如此，他们没有犹豫不决；他们决定以他们能够采取的方法保卫自己，保卫政府和共和国”。相反，陶里亚蒂明确声称政治局对马德里的共产党人作出了指示：“[马德里的共产党人]一刻也没有犹豫就开始为推翻政变委员会而行动。这是他们接到的政治局的指示。”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马德里的共产党人接到过政治局的明确指示，如果预料中的卡萨多叛乱付诸实施，他们应当如何应对。尽管如此，他们决定调动他们在马德里的一些军队与政变委员会战斗到底。在采取对抗行动的第三天，《工人世界报》否认政府已经逃走：“共和国政府现在坚守着它的岗位，就像它在加泰罗尼亚的关键时期所做的一样。否认这一点的那些家伙告诉人们的不是事实。”战斗持续了几天，只是在卡萨多召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两个师对共产党实施了羞辱性的打击之后，战斗才停止。“推翻政变委员会的计划因为一次神速的行动落了空。”陶里亚蒂在本书经常援引的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写给共产国际的那份报告中说，“这意味着我们被打败了。”

根据躲藏在阿尔瓦塞特期间得到的消息，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陶里亚蒂给共产党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马德里的同志们]相信，政府正在国家的其他地方进行抵抗。我还不知道所有详情，不过情况好像是，在决定尽一切可能保护自己之后，我们的同志缺乏战斗的决心。当然，他们的责任感使他们没有从前线召集援兵。[正如很快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他们也不确定前线部队的可靠性。]这给了政变委员会时间，它从其他前线阵地把无政府主义者的几个师调进马德里打败了我们。我们的大部分指挥官表现很好，但是士兵不参加战斗，因为他们不清楚与另一

些共和派士兵作战的原因。相反，惯于望风而逃的梅拉的部下具有与我们作战的决心和斗志。”

在同一封信中，陶里亚蒂表示，马德里的共产党人的进退两难，他对部队的可靠性也失去了信心：“我们认为，党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可能是，以任凭自己被砍头、被孤立、被宣布为非法的方式向敌人投降。另一方面，由于下面的一些原因，我们拒绝考虑发动一场政变推翻国防委员会并且夺取政权的主意。只要从前线调动几个军，也就是说，只要让前线对敌军敞开，我们就可以成功。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们决不会这样做。此外，我们并不确定这些部队将支持我们。其中一部分不会响应，因为他们不清楚冲突的原因。总之，我们将会失去同样不清楚斗争目的的群众的支持。这意味着我们只有采取恐怖的手段才能控制后方：集体处决其他党派的领导人等等在当前的形势下不太明智的手段。发动这样一场政变，我们几乎不会有任何盟友，而且可以想象，在最血腥的混乱中结束内战的责任也将落在我们身上。”

陶里亚蒂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透露了共产党人在马德里的军事力量被削弱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几乎完全不能指望那些共产党员军官：“对抗卡萨多的军事行动所必须依靠的共产党员职业军官没有响应。……[埃米利奥·]布埃诺（第二军）拒绝控制马德里前线。[路易斯·]巴尔塞洛（第一军）也一样。两人拒绝向党提供必要的部队以便在几小时之内粉碎卡萨多的叛乱。……[安东尼奥·]奥尔特加（第三军）不仅不提供必要的部队，而且允许从埃斯特雷马杜拉调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两个师……通过他的防区。正是这两个师在马德里打败了我们的同志。此外，奥尔特加用错误的情报误导党，并且始终与卡萨多保持着联系。这三个人（布埃诺、巴尔塞洛和奥尔特加）全部都是共济会会员。”

因为陶里亚蒂企图诋毁驻守在马德里的三位最重要的共产党员职业军官，所以应当

记述的是，巴尔塞洛对党的忠诚从未动摇，并且为此献出了生命，三月十三日，他被国防委员会逮捕，随后遭到处决。布埃诺上校被逮捕并在佛朗哥的监狱里关押多年，而设法逃到阿利坎特的奥尔特加上校后来被佛朗哥的军队逮捕并被处以铁环绞刑。

推翻内格林只是国防委员会的初步目标，它的主要目的是把政府控制在温和派和职业军官手中，他们主张与佛朗哥谈判，争取在对共和派比较宽容的条件下实现和平。与一九三一年以来的历届共和国政府一样，这代表了一种不同力量 and 不同观点的融合。其中一些人愿意为了争取更有利的条件继续作战，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必须立即实现和平，即使按照佛朗哥的条件。

三月十二日，随着马德里地区共产党部队的最后抵抗被国防委员会的军队镇压下去，委员会成员商议起草了一份声明，阐述他们希望作为和平条件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

1. 直接与佛朗哥政府进行谈判。
2. “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
3. 保证不进行报复并且不在合法组成的民事法庭之外提出指控。
4. 在二十五天的期限内，共和派控制区所有愿意离开的居民自由离开西班牙。
5. 除非犯有普通刑事罪，保证正规军军官的生命安全、自由和军职，保证其他军事人员和共和国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自由。
6. 保证共和派投降后不让外国军队（即意大利军队和摩洛哥军团）进入共和派控制区。

这份文件建立在国防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根本错误的基础上，它以为在协商投降条件的谈判中军官和非激进分子可以得到佛朗哥的容忍。

在内战的结果没有完全确定的那一段时间，佛朗哥一直拒绝作出丝毫让步或是与共和派当局谈判，即使在梵蒂冈亲自建议时。如今，当残余的共和派军队即将土崩瓦解时，他根本不打算改变自己的态度。他非常清楚，共和派已经失去了斗志，对于抵御他马上就要发动的重大攻势，人民军既没有做好军事准备，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正如本书前一章所提到的那样，一月份以来，卡萨多亲自与佛朗哥在马德里地区的军事情报网（宪兵情报局）进行了接触。这个情报网由隶属于佛朗哥本人大本营的何塞·温格里亚上校指挥，它的马德里指挥所和电台设在离首都不远的托莱多小镇埃斯特万·安布兰。为了鼓励反共暴动，佛朗哥在二月六日签署了一份名为“总司令的让步”的文件并且立即传递给卡萨多，这份文件提出了投降的最低条件，这些条件是：

一、民族主义西班牙.....对于那些只是受骗参加了内战而没有犯罪的人是宽宏大量的。

二、自愿放下武器并且不像其同伙那样犯有死罪或者其他罪行的指挥官和军官将被保证生命安全，在最后时刻为西班牙的事业做出更重要贡献的指挥官和军官、在战争中所起作用较小或者没有恶意的指挥官和军官将会受到更仁慈的对待。

三、为避免无谓的牺牲而放下武器并且没有犯下屠杀或者其他严重罪行的人，在享有充分的人身安全的同时还将获得安全通行权，以使他们能够离开我国国境。

四、将为在国外重建其生活的西班牙人提供保护和帮助。

五、只是在赤色军队中服役或者仅仅曾经是反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团体的一名成员，将不会成为需要承担罪责的问题。

六、对于赤色分子统治期间所犯的罪行，只有法院拥有审判权。为了那些有罪者的家人的利益，将从轻给予刑事处罚。

紧随着这些含糊暧昧、让人无法放心的条件，佛朗哥于二月九日颁布了适用于所有西班牙公民的新的政治责任法，该法规定了对那些被判犯有不同于刑事罪行的政治罪行的人所实施的各种罚款、监禁及没收财物的处罚，追溯期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联系起来看，这些措施只能进一步引起国防委员会成员的忧虑，使他们强烈要求澄清佛朗哥所作出的“让步”，以便更明确地保证不被起诉以及移居国外的权利，尤其是对于职业军官。三月十二日，宪兵情报局向布尔戈斯的佛朗哥大本营报告说，卡萨多和共和派中部军区司令马塔利亚纳将军希望立即飞往北部就投降条件进行谈判，随后发来国防委员会当天起草的一份文件。佛朗哥简单生硬地回复说，他“要求尽快无条件投降”。

三月十四日，卡萨多对共和派控制区发表广播讲话，他向听众保证，国防委员会的目标是实现体面的和平，接着，他在一个国内外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民族主义军队发动新的攻势的话，共和派军队将进行抵抗，直到获得合适的条件为止。这一公开声明激怒了佛朗哥。当第二天上午卡萨多再次向宪兵情报局特工表示他和马塔利亚纳迫切希望飞往布尔戈斯谈判时，佛朗哥明确回复说，“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没有其他解决方案”，因此，他们不能指望“玩弄手腕牺牲民族主义西班牙的利益”。他补充说，“以他们的声明所反映的态度，他们不应派人来”，而“应承担他们发表那些声明所造成的后果”。

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佛朗哥的大本营收到情报，随着小规模处决的恢复，马德

里越来越不平静，尸体出现在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卡萨多表示，正在采取严厉的措施以维持秩序，三月十七日解散了共和国军事情报局（SIM）并且去掉了共和国军徽上的红星。而贝斯泰罗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全都在向友好政府探询协助撤离事宜。

三月十五日通讯系统几乎彻底崩溃后，卡萨多再次向宪兵情报局的特工表示，他希望两天后飞往布尔戈斯，贝斯泰罗则在三月十八日的广播讲话中宣读了一份国防委员会致民族主义政府的公开声明，敦促尽快“进行谈判以保证实现体面的和平”。当天夜里布尔戈斯方面回复说，卡萨多和马塔利亚纳前来谈判没有意义，“至于确定投降的细节，来一个具有充分权力的职业军官就够了”。

卡萨多仍然希望获得时间和某些保证，三月二十日，他起草了一封致佛朗哥大本营的电报，电报的开头承认“民族主义政府已经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但是接着警告说，如果国防委员会不能通过谈判实现以有权撤离为条件的和平有序的投降，共和派控制区可能爆发新的混乱，从而导致对民族主义支持者的报复。第二天，他向国防委员会建议，派遣两名共和派中级参谋人员安东尼奥·加里霍上校和莱奥波尔多·奥尔特加少校前往布尔戈斯与佛朗哥的代表会谈。关于“需要讨论的问题”，他起草了一份新的声明，声明要求扩大一点“让步”的范围，其中包括由民族主义政府提供“撤离的工具”。声明还要求，不许外国军队在马德里列队出现，而投降则是一次小心谨慎的军事行动，应当分阶段逐日在一系列地区进行，以保证有序和安全。在卡萨多要求根据二月六日的“让步”同意这两名使者前往之后，佛朗哥很快于二十三日上午同意接待他们。不过，在此期间，民族主义方面的代表坚持要求澄清国防委员会进一步讨论“让步”的意义何在。为了防止谈判失败，共和派新政府三月二十二日答复说，“委员会同意向宽宏大量的首领[佛朗哥]无条件投降并且敦促有关部门[宪兵情报局]抓紧时间”，从而基本上放弃了幻想，知道不可能与佛朗哥进

行真正的谈判。不过，即使在这时，他的要求的确切性质已昭然若揭。

在国防委员会的代表不顾一切地寻找外国船只协助即将进行的撤离政治难民行动的同时，两名参谋人员加里霍和奥尔特加于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点到达布尔戈斯郊外的首领机场，与宪兵情报局的何塞·温格里亚上校和佛朗哥大本营的代表路易斯·贡萨洛上校会谈。加里霍和贡萨洛随后为各自的上司准备的报告对这次会谈过程和细节的描述略有不同。两份报告同样写道，加里霍极力要求详细说明佛朗哥的“让步”，特别是第五点提到的“罪责”是否由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有效的刑法典来确定。他还问，这种责任是否需要确定由个人还是集体来承担。他反复强调，国防委员会无意保护那些犯有普通罪行的人。共和派代表顽强坚守的一点是，必须为那些想要移居国外的人发放有效的护照，加里霍乐观地估计这一人数不会超过四五千人，但其他与会者对此表示怀疑。贡萨洛报告说，共和派代表在这些问题上受到了一定的鼓舞，接着，他提出了佛朗哥“关于敌军投降和占领敌人领土的准则”，准则要求共和派空军的所有飞机三月二十五日解除武装飞往民族主义方面的机场投降，在那两天之后下达共和派全军投降的具体命令。尽管卡萨多发送给佛朗哥的建议被接受，但共和派打算用二十五天时间逐个地区分阶段投降的计划却遭到否决，虽然国防委员会的代表强调说，立即投降可能引发左派强硬分子的暴动，更多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将在暴动中遇害。

同一天深夜十一点，国防委员会在马德里开会，二十四日下午六点，国防委员会再次开会。加里霍详细报告了贡萨洛和温格里亚对“让步”的口头说明，但这些说明仍然具有不确定性，由于委员会代表提出的签署一份书面协议的要求遭到拒绝，它们更是没有正式的约束力。空军立即投降面临相当大的阻力，卡萨多声称，由于技术原因空军不可能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投降；许多人还对佛朗哥拒绝给予任何书面保证表示不满。危机感越来越严重，因为委员会争取外国大力协助撤离的努力失败

了，法国驻马德里领事避免代表他的政府作出任何协助撤离或接受难民的承诺，英国人也没有提供更多的帮助。卡萨多以一种孤注一掷的姿态给佛朗哥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民族主义方面的代表立即将它传送给佛朗哥。这封信要求佛朗哥考虑委员会的立场，要求得到更多的时间和撤离的保证，但是，它只是使佛朗哥的大本营在二十四日夜里将近十点钟时发出一封无线电报予以拒绝。

三月二十五日凌晨，国防委员会又召开了一次疯狂的会议。经过激烈的争吵之后，卡萨多准备向佛朗哥再提出另外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同意以佛朗哥的“让步”为条件投降，但还要求至少有一份书面文件，与关于撤离的承诺一起作为那些“让步”的保证。尽管仍然希望推迟一点投降的时间，委员会打算三天以后交出空军。二十五日下午，加里霍和奥尔特加带着委员会的最后建议去首领机场进行第二次会谈。

据加里霍说，民族主义方面联络官的反应比两天以前更热情。共和派代表提出了国防委员会的最新建议，但是，当被问到共和派空军是否准备立即投降时，他们不得不支吾应对。加里霍坚称，签署某种对法律责任提供担保的投降协议只是为了安抚国防委员会在共和派控制区的反对者。民族主义方面的代表关注会谈的重点，在进一步讨论之后，他们同意共和派军官起草一份详细的备忘录，对先前确定的“让步”作出具体的说明。当共和派代表起草备忘录的时候，民族主义军官再次与他们的上司交换了意见，然后气势汹汹地告诉加里霍和奥尔特加，会谈已经没有意义，他们必须趁还来得及及时飞回马德里。

两名共和派军官立即返回马德里，显然，谈判的最后希望破灭了，佛朗哥的最后进攻随时将会开始。为阻止佛朗哥发动进攻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二十六日凌晨两点四十分，一封无线急电发往布尔戈斯，电报声称，共和派空军将于当天晚些时候投



降。这为时已晚。

自从二月中旬以来，佛朗哥一直在部署最后的“胜利攻势”，由于双方实力悬殊，进攻的结果毫无悬念。单是飞机，民族主义军队这时就比共和派多大约五百架到一千架。计划沿剩余的战线攻击所有主要的阵地，但重点进攻马德里南部，实现全面突破，封锁这座前首都城市，然后向东，封锁巴伦西亚。

二十六日拂晓，进攻开始。两个多月以来，共和派最后的计划是以分阶段撤退（repliegue escalonado）这一概念为基础的，按照计划，武器不足、士气低落的人民军残部试图以有序的方式一步步依次从四个防区后撤，最后集中在东南部的卡塔赫纳海军基地，那里是大规模撤离的最后避难所。实际上，由于经常出现整支部队集体投降的情况，所以只有零零星星的个别抵抗。在许多情况下，似乎是民族主义方面对所谓“首领的让步”的广泛宣传导致负责指挥继续抵抗的共和派军官缴枪投降，宣传向敌军军官保证，他们越早停止抵抗，他们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越小。到三月二十七日，马德里前线的成千上万名士兵放下武器向东南方走去，融入平民百姓的人流中，有些人则搭乘马德里的地铁穿越整个城市消失在相反的方向。二十七日晚些时候，除了固执的贝斯泰罗拒绝离开马德里之外，国防委员会转移到巴伦西亚，马德里于二十八日下午一点正式投降。大约同一时间，共和派几个主力军的军长发布了停火和准备投降的命令。在较大的城市，长枪党党徒和第五纵队的其他成员大胆地公开露面，开始接管市政部门。

马德里向东和东南方的道路挤满了试图离开这个国家的难民，因此，国防委员会于三月二十八日在巴伦西亚成立了一个官方的“疏散委员会”。到这时为止，除了得到一些英国船只的承诺之外，它在争取外国协助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可以用来从共和派控制区的港口带走难民的船只寥寥可数，不过，少

数官员和另一些显要却乘坐飞机——有时是强行占用的——逃往法属阿尔及利亚避难。到二十九日傍晚，卡萨多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已经逃走，前者乘坐的是一艘英国巡洋舰。与此同时，一则谣言到处流传，作为撤离的港口，只有阿利坎特仍然开放，因此，到三月三十日早晨，大约一万两千名难民聚集在码头附近，等待永远不会到来的船只。

到三月二十九日，抵抗实际上已经停止，民族主义军队迅速向前共和派控制区长驱直入。得到准许的成千上万名共和派士兵脱下军装返回家乡。第一支到达阿利坎特——这里而不是卡塔赫纳更像共和派的避难所——的部队是甘巴拉将军指挥的讲西班牙语的意大利军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国防委员会曾经试图阻止外国军队介入投降的过程，甘巴拉却比佛朗哥更宽容，他承认阿利坎特码头周围是一个临时“中立区”，只要接运难民的船只很快到达，就允许他们自由离开。这个消息刚一传到布尔戈斯，佛朗哥立即撤销了甘巴拉的命令。他命令甘巴拉尽快占领整个地区，同时催促其他民族主义部队迅速赶往阿利坎特以保证他的命令充分执行。到三月三十一日，整个共和派控制区几乎已被民族主义军队全部占领。

四月一日，佛朗哥将军发表了最后的新闻公报：“今天，已将赤色军队俘虏缴械的民族主义军队达到了最终的军事目的。内战结束了。”对于共和派来说，国外流亡和国内镇压的年代即将到来。国防委员会对追溯既往的政治责任法的作用感到害怕有其非常充分的理由。战斗结束八个月后，此时共和派的普通士兵大部分早已被释放，西班牙的监狱突然关进了二十七万名囚犯，主要是被非法拘押的政治犯。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军事法庭将判处大约五万人死刑，其中一半左右实际执行。共和国和革命都失败了，佛朗哥时代开始了。

## 致谢

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

玛莎·阿克尔斯伯格

弗朗西斯科·阿吉莱尔

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

维克托·阿尔瓦

马科斯·阿尔孔

杰伊·艾伦

何塞·阿尔穆迪

迈克尔·阿尔珀特

乔恩·阿姆斯登

欧斯塔基奥·阿巴里西奥·博（阿尔法赫梅）

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历史档案馆，马德里

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

国家历史档案馆，萨拉曼卡

霍尔迪·阿克爾

何塞·阿森西奥将军

艾马，S.A.

玛乔丽·贝利

海梅·巴柳斯

阿图罗·巴雷亚

伊尔莎·巴雷亚

刘易斯·贝特曼（见前言）

拉尔夫·贝茨

尼古拉斯·贝尔纳尔

琳达·伯纳德

国家图书馆，马德里

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巴黎

罗杰·布兰德

贝蒂·博洛滕（见前言）

格拉迪丝·博洛滕（见前言）

格雷格·博洛滕（见前言）

乔治·博哈特公司

安娜·博尔金纳

杰拉尔德·布雷南

大英博物馆（报纸图书馆）

埃伦·H. 布劳

罗纳德·布拉托夫

何塞·布列霍斯

卡门·德拉·卡尔·马塔

剑桥大学出版社

塞韦里诺·坎波斯

阿尼塞托·卡瓦哈尔上尉

F. P. 卡瓦哈尔

马里亚诺·卡多纳·罗塞尔

雷蒙德·卡尔

文塞斯劳·卡里略

拉尔夫·H. 卡拉瑟斯

何塞·卡鲁亚纳-戈麦斯·德·巴雷达

马里亚诺·卡萨苏斯·拉卡斯塔

恩里克·卡斯特罗

何塞菲娜·塞迪利亚

国际无政府主义研究中心，日内瓦

佩德罗·切卡

里卡多·德拉·谢尔瓦-德奥塞斯

玛丽娅·西富恩特斯

何塞·克拉韦里亚·普雷纳费塔

蒙特塞拉特·孔多米内斯·佩雷尼亚

罗伯特·康奎斯特

拉里·科特

詹姆斯·克拉夫茨

路易斯·G. 库韦罗

柯蒂斯·布朗

埃琳娜·丹尼尔森

戴维和查尔斯（·霍尔丁斯）有限公司（理查德·A.H. 罗宾逊的代理人）

米奇·德克特

莫什·德克特

伯纳德·德纳姆

玛丽娅·特蕾莎·迪亚斯·德洛斯里奥斯

米洛拉德·M. 德拉奇科维奇

斯隆和皮尔斯·迪尤尔

特亚·杜伊克尔

何塞·杜克

绿洲出版社

德诺埃尔出版社

青年出版社

先锋出版社

洛萨达出版社

南美洲出版社

玛丽安娜·恩克尔

西尔维娅·英格兰

约翰·埃里克森

罗布·厄恩斯特

路易斯·埃斯科瓦尔·德拉·塞尔纳

安东尼奥·埃斯科里瓦诺

乔治·埃森魏因（见前言）

齐妮娅·J. 尤丁

费伯和费伯出版社

费夫斯通讯社

拉蒙·费尔南德斯-波萨·希尔

F. 费兰迪斯·阿尔沃斯

米格尔·费雷尔

格里特·E. 菲尔斯特拉

H. H. 费希尔

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内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基金会，马德里

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马德里

赫苏斯·德·加林德斯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罗托

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

J.加西亚·普拉达斯

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

安东尼奥·加里格斯·迪亚斯-卡尼亚瓦特

安东尼·希拉韦特

弗朗西斯科·希拉尔

何塞·希拉尔

奈达·格利克

维克托·格兰茨有限公司

胡安·B.戈麦斯上校

F.冈萨雷斯

埃弗拉因·冈萨雷斯·卢纳

安东尼奥·冈萨雷斯·金塔纳

胡利安·戈尔金

查尔斯·L·格雷斯

豪尔赫·加西亚

格拉纳达出版社

佩德罗·F·格兰德（见前言）

霍华德·格林

蕾切尔和罗伯特·格林

伊莎贝尔·瓜迪奥拉

哈考特和布雷斯出版公司

哈珀和罗出版社

哈佛学院图书馆，马萨诸塞州剑桥

A.M.希思出版公司

威廉·海涅曼有限公司

马德里市期刊阅览室

国家期刊阅览室，马德里

路易斯·埃尔南德斯

塞韦里亚诺·埃尔南德斯

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将军

罗纳德·希尔顿（见前言）

唐纳德·C·霍姆斯

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

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全体工作人员）

今日出版社

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

拉蒙·伊格莱西亚斯

阿格尼丝·英格利斯

巴塞罗那市历史学会

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

安德烈·马利亚·德·伊鲁霍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

加布里埃尔·杰克逊

戴维·贾菲

米格尔·希门尼斯

弗尔·B·约翰斯顿

鲁道夫·德容

查尔斯·F·凯泽

基彭霍伊尔和维奇出版社

雅普·克鲁斯特曼

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

希丽娅·库克（见前言）

罗斯玛丽·库尔普伊斯

凯蒂娅·兰多

皮拉尔·莱昂·特略

加斯东·勒瓦尔

莉娜·利弗

拉蒙·利亚尔特

绝对自由主义

普伦图书馆

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弗朗西斯卡·利纳雷斯·德·比达特

鲁道夫·略皮斯

埃尔马尔克斯·胡安·伊格纳西奥·卢卡·德·特纳

恩里克·卢门

罗伯特·M·麦克布赖德出版公司

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

菲利普·T·麦克莱恩

麦克米兰出版社，伦敦和贝辛斯托克

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

爱德华·E·马莱法基斯

赫伯特·马歇尔

J·马丁·布拉斯克斯

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

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

佩德罗·马丁内斯·卡顿

萨尔瓦多·马丁内斯·达西

奥雷利奥·马丁·纳赫拉

巴莱里奥·马斯

何塞·曼努埃尔·马塔

阿尔瓦罗·梅嫩德斯

莱昂诺拉·梅嫩德斯·贝尔特兰

何塞·米亚哈将军

哈里·米尔顿

文化部，马德里

弗兰克·明茨

费德丽卡·蒙特塞尼

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

费利克斯·莫罗

威廉·莫罗公司

欧塞维奥·穆哈尔-莱昂

G.穆尼斯 (曼努埃尔·格兰迪索·穆尼斯)

何塞·穆尼奥斯·洛佩斯

华金·纳达尔·法雷拉斯

卢西亚诺·J.纳瓦斯 (见前言)

玛加丽塔·内尔肯

纽约公共图书馆

杰克·诺佩尔 (美国参议院安全调查专门委员会主席)

保罗·诺思·赖斯 (纽约公共图书馆)

W.W.诺顿出版公司

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

爱德华多·奥罗斯科-G. (“画家”)

索尼娅·布劳内尔·奥威尔

卡洛斯·奥特罗

玛丽娅·奥特罗-博伊斯沃特

牛津大学出版社

兰多尔福·帕恰尔迪

H.S.帕森斯

D.帕斯托尔·佩蒂特

孔查·帕蒂尼奥

阿莱恩·B.保罗

斯坦利·G.佩恩（见前言）

何塞·佩拉特斯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

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

阿图罗·佩鲁乔

A.D.彼得斯公司

阿格尼丝·F.彼得森

梅洛迪·菲利普斯

D.温盖特·派克（见前言）

普伦图书馆

路易斯·庞塞·德·莱昂

波鲁瓦·埃马诺斯-西亚



尤金·B·鲍尔

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

哈维尔·普拉德拉（见前言）

雅各布·普林斯

帕特南出版公司

阿方索·金塔纳-佩纳

比森特·拉莫斯

A·拉莫斯·奥利韦拉

《读者文摘》

古斯塔夫·雷格勒

路德维希·雷恩

雷纳尔和希契科克出版社

沃纳·赖斯

弗农·理查兹

里卡多·德尔·里奥

米格尔·罗夫莱多

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

赫尔穆特·吕迪格

安德烈斯·萨沃里特

玛丽娅·德尔·卡门·萨拉斯·拉腊萨瓦尔

埃莱诺·萨尼亚

费利佩·桑切斯·罗曼

圣马丁出版社

威廉·T. 塞尔-史密斯

京特·施米加勒

斯蒂芬·施瓦茨（见前言）

曼努埃尔·施瓦茨曼

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

保罗·西伯里（见前言）

马丁·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

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

军事历史部门，马德里

马克·沙伦

阿德里安·舒伯特

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

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

维尔瓦尔多·索拉诺

海伦·索拉努姆

阿古斯丁·索奇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路易丝·苏亚雷斯

莱奥波尔多·苏亚雷斯·德尔·雷亚尔

阿尔玛·塔皮亚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克拉拉·塔尔曼

阿恩·索恩

卡罗尔·汤奇

葆丽娜·B·图克（见前言）

多伦多公共图书馆

玛蒂尔达·德拉·托雷

赖纳·托斯托夫

休·特雷弗-罗珀，格兰顿的戴克勋爵

费利佩·乌瓦奇

琼·康奈利·厄尔曼（见前言）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图书馆

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安阿伯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全体编辑和行政人员）

克里斯蒂娜·乌松

皮拉尔·巴雷拉

玛加丽塔·巴斯克斯·德·帕尔加

曼努埃尔·比达尔

维托里奥·维达利（卡洛斯·孔特雷拉斯）

维京出版社

何塞·比利亚尔瓦

安东尼奥塞·比利亚努埃瓦

安赫尔·比尼亚斯

佩德罗·博尔特斯·博乌

芭芭拉·沃克（见前言）

乔治·韦勒

伯特伦·D·沃尔夫

艾拉·沃尔夫（见前言）

耶鲁大学出版社

维克托·萨拉戈萨

## 索引

（以下标注的是原书页码，查阅时请参照本书边码）

Abad de Santillán, Diego（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加泰罗尼亚地区领导人：on revolutionary violence（论

革命暴力) , 52—53 ; on collectivization ( 论集体化 ) , 63—64 , 223 , 224 ; plans to seize gold reserves ( 计划夺取黄金储备 ) , 149—150 ; on Anarchist ideals ( 论无政府主义的理想 ) , 194 ; on withholding arms from Anarchists ( 论不给无政府主义者发放武器 ) , 387 , 第四十一章注释44 ; on CNT—Companys confrontation (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孔帕尼斯的表面关系 ) , 389 , 390 , 451 ; on relation between CNT—FAI and Generalitat (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之间的关系 ) , 389 , 391 , 402 ; on Central Antifascist Militia Committee ( 论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 ) , 393—394 ; CNT councilor of economy ( 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经济专员 ) , 412 ; on May events in Barcelona ( 论巴塞罗那五月事变 ) , 431 , 432—433 , 434 , 441 , 452 ; says Communists profit from CNT—UGT pact ( 指出共产党人从全国劳工联合会—劳动者总工会协议中获利 ) , 569 ; on PCE influence in military ( 论西班牙共产党对军队的影响 ) , 594 ; on loss of Caralonian products ( 论加泰罗尼亚失去自治权 ) , 612—613 ; on ministry of Segundo Blanco ( 论塞贡多·布兰科的部长职位 ) , 624 ; on opposition to Negrín ( 论对内格林的反抗 ) , 627 ; on Anarchosyndicalist fears ( 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担忧 ) , 665

ABC ( 《阿贝赛报》 ) , 君主主义报纸 : 11 ; charters Franco' s flight to Spanish Morocco ( 包租把佛朗哥送往西属摩洛哥的飞机 ) , 43

Aberri, Major ( 阿韦里少校 ) , 共和派军官 : on militia' s disarray ( 关于民兵武装的混乱状况 ) , 256—258

AC ( 加泰罗尼亚行动党 ) , 加泰罗尼亚中产阶级政党 : timidity of ( 胆小怯

懦) , 396

Acció Catalana (加泰罗尼亚行动党)。见AC

Acción popular (人民行动党)。见AP

Adám (亚当) : appointed to police administration (被安排在警察管理部门任职) , 219

Adelante (《前进报》) , 社会党的报纸 : 244 , 373—374 , 375—378 , 463 , 522—523 , 526 ; seized by Negrín' s government (被内格林政府没收) , 561

Adroher, Enrique (恩里克·阿德罗埃尔) , 笔名希罗内利亚,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负责宣传的书记 : on loss of Catalan independence (论加泰罗尼亚失去独立性) , 419—420 ; sentenced to prison (被判刑) , 520

Agencia Espa (任命奥托·卡茨负责) , 139 ; Communists in (机构中的共产党人) , 488

Agrarian crisis (农村危机) : pre—Civil War (内战前的农村危机) , 4—5 , 6—7 , 10 , 第一章注释10

Agrarian Reform Law (土地改革法) : and colonos Settlement (与垦殖民的定居) 4 ; peasants' impatience with (农民对土地改革法的实施失去耐心) , 5 ; far left angered by liberals' indifference (极左派因自由派对土地改革法的漠不关心而愤怒) , 23

Agricultural decree of October 1936 (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颁布的农业法

令) : on land confiscation ( 关于没收的土地 ) , 236—237 ; offers land to single tenants ( 向个体佃户提供土地 ) , 240—241 ; and demands for land restitution ( 与要求归还土地 ) , 522

Agricultural decree of June 1937 ( 一九三七年六月颁布的农业法令 ) : promises aid to collectives ( 承诺帮助集体农庄 ) , 242—243 ; temporarily legalizes collectives ( 暂时使集体农庄合法化 ) , 243

Agriculture ( 农业 ) 。见Agrarian crisis ; Agrarian Reform Law ; Agricultural decree ; Institute of Agrarian Reform

Agrupación Socialista Madrile ( 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 ) , 马德里的社会党组织 : drafts new revolutionary program ( 制订新的革命纲领 ) , 24—25 , 114 ; remains loyal to Caballero ( 保持对卡瓦列罗的忠诚 ) , 560 ; corresponds with PSOE ( 与社会党执委会以书信论战 ) , 563—567

Aguirre, Francisco ( 弗朗西斯科·阿吉雷 ) , 内格林的新闻秘书 : on Catholic funeral in Barcelona ( 论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天主教葬礼 ) , 644

Aguirre, JoséAntonio ( 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 ) , 巴斯克地区自治政府总理 : Communists praise ( 共产党人赞扬阿吉雷 ) , 123

Aguirre, JoséMaría ( 何塞·马利亚·阿吉雷 ) , 卡瓦列罗的政治军事秘书 : on plan to name Araquistáin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 关于提名阿拉基斯塔因担任外交部长的计划 ) , 122 ; supports Caballero ( 支持卡瓦列罗 ) , 353—354



Ahora ( 《现在》 ) ,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的喉舌 : 631

Aiguadé, Artemio ( 阿特米奥·艾瓜德 )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 named Catalan 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lor (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务治安专员 ) , 402—403 , 412 ; clashes with Tarradellas ( 与塔拉德利亚斯意见不一致 ) , 415—416 ; appoints Rodríguez Salas police commissioner ( 任命罗德里格斯·萨拉斯为警察署长 ) , 417 ; raids telefónica ( 袭击电话局 ) , 430—431 , 第四十二章注释15和注释25 ; asks Galarza and Caballero for reinforcements ( 请求加拉尔萨和卡瓦列罗增援 ) , 433—434

Aiguadé, Jaime Antón ( 海梅·安东·艾瓜德 )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 不管部长 : named Caballero minister ( 被任命为卡瓦列罗政府的部长 ) , 203 ; on Companys' s surrender of public order ( 论孔帕尼斯交出治安管理权 ) , 437 ; named Negrín labor and social welfare minister ( 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的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长 ) , 483 ; named labor minister , Negrín' s second government ( 被任命为第二届内格林政府的劳工部长 ) , 585 ; resigns from government ( 从政府辞职 ) , 615

AIT ( 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l Trabajo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 s Association] ) ( 国际工人协会 ) : on general strikes ( 论总罢工 ) , 198 ; holds "secret" congress ( Dec.1937 ) (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秘密" 举行代表大会 ) , 499.另见CNT ; FAI

Aláiz, Felipe ( 费利佩·阿莱斯 ) ,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 : on FAI' s reorganization as political party ( 论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改组成政党 ) , 485

Alba, Victor (维克托·阿尔瓦),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 左派历史学家: on Comorera (论科莫雷拉), 398; on Maurín (论毛林), 405—406; on POUM' s understanding of Moscow trials (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莫斯科审判的理解), 408

Albacete (阿尔瓦塞特), 国际纵队的训练基地: arrival of first brigades in (Oct.1936) (一九三六年十月第一批国际纵队成员到达), 108; site of brigade terror (对国际纵队实施恐怖行动的地方), 571; lost to Negrín (内格林失去阿尔瓦塞特), 734

Albalate de Cinca (辛卡河畔的阿尔瓦拉特村): Anarchist system in (在阿尔瓦拉特村实行的无政府主义制度), 70

Albar, Manuel (曼努埃尔·阿尔瓦尔), 社会党执委会成员, 普列托的支持者: on POUM exclusion from Madrid Junta (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排除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之外), 298; courted by Communists (共产党人向其示好), 384; opposes Socialist—Communist merger (反对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 537; Negrín appoints to war commissariat (被内格林安排到总政治部), 597—598

Alberti, Rafael (拉斐尔·阿尔维蒂), 共产党诗人: 294

Albin, Félix (费利克斯·阿尔文)。见Hager, Kurt

Alborz, F.Ferrándiz (F.费兰迪斯·阿尔沃斯), 社会党人: on intellectuals in PCE (论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 125

Alcalá—Zamora, President Niceto ( 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 ) : and left—wing rebellion in Asturias ( 与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左派叛乱 ) , 8 ; and CEDA ( 与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 ) , 8 , 9 ; rejects Portela' s proposal of martial law ( 拒绝波特拉提出的宣布戒严令的建议 ) , 11—12 , 第一章注释49 ; appoints Aza·德·利亚诺 ) , 41

Alcora ( 阿尔科拉村 ) : libertarian communism in ( 在阿尔科拉村实行的自由共产主义制度 ) , 66—68

Alcoy ( 阿尔科伊 ) : industries centralized in ( 工业被集中起来 ) , 59 ; unarmed CNT militia in ( 不向阿尔科伊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提供武器 ) , 325

Alfaro Siqueiros, David ( 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 ) , 墨西哥画家 , 第八十二旅旅长 : role in Spain ( 在西班牙的任务 ) , 342 , 第三十三章注释31 ; commits murder ( 谋杀 ) , 第四十八章注释25

Alfredo ( 阿尔弗雷多 ) 。见Togliatti, Palmiro

Alianza de la Democracia Socialista ( 社会主义民主联盟 ) , 巴枯宁主义者组织 : on abolition of religions ( 废除宗教信仰 ) , 72

Almendros, Joaquín ( 华金·阿尔门德罗斯 ) , 西班牙社会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书记 : on Comorera' s opposition to PSUC ( 关于科莫雷拉反对组成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 , 398—399 ; on role Pedro ( Een·埃尔诺的作用 ) , 400

Almudí, Manuel ( 曼努埃尔·阿尔穆迪 ) , 共产党员 , 保卫阿拉贡委员会成员 : on Lister' s measures in Aragon ( 论利斯特在阿拉贡地区采取的措施 ) , 526

Alojamientos ( 住宿工人 ) , 被迫雇用的工人 : 7

Alonso, Bruno ( 布鲁诺·阿隆索 ) , 社会党温和派人士 , 海军第一政委 : on murder of naval officers ( 论海军军官遇害 ) , 49 ; on officers in PCE ( 论加入西班牙共产党的军官 ) , 318 ; on Caballero memoirs ( 关于卡瓦列罗的回忆录 ) , 第四十五章注释19 ; Negrín appoints chief political commissar ( 被内格林任命为海军第一政委 ) , 592—593 ; on navy' s fear of Communists ( 论海军对共产党人的恐惧 ) , 715

Alonso, Elfidio ( 埃尔菲迪奥·阿隆索 ) , 共和派人士 : member of Consejo General de Electricidad ( 电力委员会成员 ) , 223

Alonso Vega, Lieutenant Colonel Luis ( 路易斯·阿隆索·维加中校 ) , 共产党员 : allies with Casado ( 与卡萨多合作 ) , 734

Alpert, Michael ( 迈克尔·阿尔珀特 ) , 英国历史学家 : on British role in Casado negotiations ( 论英国在卡萨多谈判中的作用 ) , 709

Alphonsine Monarchists ( 阿方索派君主主义者 ) 。见Renovación

EspaAlvarez, Angelín ( 安赫林·阿尔瓦雷斯 ) , 共产党人军官 : prepares to leave Spain ( 准备离开西班牙 ) , 732

Alvarez, Santiago ( 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 ) , 共产党人 : commissar of Eleventh Division ( 第十一师政治委员 ) , 542 ; on low morale of eastern army ( 论东路军低落的士气 ) , 570

Alvarez Buylla, Plácido ( 普拉西多·阿尔瓦雷斯·布伊利亚 ) , 共和联盟领导

人：becomes industry and commerce minister (20 July)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成为工商部长)，47；flight from Spain (逃离西班牙)，第四章注释58；proposes sequestering “abandoned” enterprises (提议接受“被放弃的”企业)，222

Alvarez Coque, Colonel (阿尔瓦雷斯·科克上校)，共和派军官：replaces Martínez Cabrera (取代马丁内斯·卡夫雷拉)，第三十五章注释70

Alvarez del Vayo, Julio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社会党左派，亲共人士，外交部长：on Republic's failures (论共和国的失败)，22, 48；relations with Largo Caballero (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关系)，22, 120, 367, 371—372；on regular officers in Popular Army (论人民军中的正规军军官)，47；becomes foreign minister (成为外交部长)，48, 122, 203；on Spanish refugees (关于西班牙难民)，52；on government arms purchases (论政府购买武器)，第十一章注释7；and Communists (与共产党人)，130, 131, 138, 348—349；and merger resulting in JSU (与导致组成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合并)，130—131；expelled from Socialist party (被社会党开除出党)，138；in war commissariat (在国防部总政治部)，138, 275, 371, 374, 487；appoints Katz to propaganda post (任命卡茨主管宣传)，139；censorship powers of (掌握新闻审查权)，139；on Negrín and Stashevsky (论内格林与斯塔舍夫斯基)，143, 476；on gold shipments (论运送黄金)，146, 149, 155—156；fears Aza's resignation (担心阿萨尼亚辞职)，164；seeks French and British aid (寻求法国和英国的援助)，181—183，第十七章注释7；on CNT entry into Caballero government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卡瓦列罗政府)，204；

refused passage through Tarancón ( 通过塔兰孔市受阻 ) , 206 ; and Koltzov' s meeting with Caballero ( 与科利佐夫对卡瓦列罗的采访 ) , 252—253 ; on UGT as war bureau ( 论劳动者总工会作为国防部的情报部门 ) , 259 ; and Asensio' s ouster ( 与罢免阿森西奥 ) , 281—282 , 355 ; on Koltzov' s discovery of Rojo ( 论科利佐夫发现罗霍 ) , 291 ; member of Higher War Council ( 战时高级委员会成员 ) , 324 ; proposes Rojo succeed Martínez Cabrera ( 提议罗霍接替马丁内斯·卡夫雷拉 ) , 366 ; featured in News of Spain ( 被《西班牙新闻》突出报道 ) ,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 leaves Communists in foreign ministry ( 在外交部留下一批共产党人 ) , 488 , 501 ; asks about PCE concessions to Prieto ( 询问共产党是否可能对普列托让步 ) , 543 ; dismissed by Prieto as Commissar General ( 被普列托解除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 , 543 ; and Togliatti ( 与陶里亚蒂 ) , 第五十一章注释42 ; named foreign minister , second Negrín government ( 被任命为第二届内格林政府的外交部长 ) , 585 , 586 ; on Russians' admiration for Negrín ( 论苏联人钦佩内格林 ) , 590 ; named to cabinet of 17 Aug. ( 被任命为八月十七日内阁成员 ) , 618 ; and Thirteen—Point program ( 与十三点方案 ) , 644 , 646 ; hopes for European conflict ( 寄希望于欧洲战争 ) , 649 , 第六十二章注释45 ; returns to Alicante ( 返回阿利坎特 ) , 685 ; on morale of military leaders ( 论军队领导人的士气 ) , 685 ; on interception of cables by military ( 论电报遭到军方拦截 ) , 697 ; on hope of continued resistance ( 论继续抵抗的希望 ) , 721 ; flees Elda with Negrín ( 与内格林一起逃离埃尔达 ) , 731 , 734 ; on timing of Casado' s rebellion ( 论卡萨多叛乱的时机选择 ) , 732

El Amigo del Pueblo (《人民之友》), 杜鲁蒂之友会的报纸: 第四十一章注释  
49, 454, 494, 504, 526

Los Amigo de Durruti (杜鲁蒂之友会)。见Friends of Durruti

Amil, Manuel (曼努埃尔·阿米尔), 全国劳工联合会积极分子: with Regional  
Committee of Defense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防务委员会), 705

Anarchists (无政府主义者): support Asturias strike (支持阿斯图里亚斯  
矿区罢工), 9; FAI guidance of CNT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引导全国劳  
工联合会), 21; UGT fears losing ground to (劳动者总工会对在无政府主义  
者面前节节败退感到担忧), 23—24; union control of local  
committees (无政府主义工会控制地方委员会), 49; on destruction of  
institutions (捣毁教堂), 51; belief in a Variety of economic  
systems (相信各种经济体制), 65; opposition to state dictatorship (反  
对国家专政), 77; former Republican parties seek support against (前  
共和派各政党寻求支持遏制无政府主义), 82—83; and Communists during  
construction workers' strike (建筑工人罢工期间与共产党人), 100;  
unequal match for PCE (不是西班牙共产党的对手), 126—127; as danger  
to gold shipment (对运送黄金有威胁), 149; entry into Caballero  
government (加入卡瓦列罗政府), 191, 207—208, 324; on replacing  
workers' committees (关于取消工人委员会), 215; maintain own police  
forces (保持自己的治安力量), 218; plan union control of  
production (打算由工会控制生产), 225; suspicion of Communists (怀疑共  
产党人), 231; on land confiscation decree (论关于没收土地的法令),

237 ; impact on militia (对民兵的影响) , 261—265 ; against regular army (抵制正规军) , 322 , 329 , 418 , 420 ; confrontation with Companys (面对孔帕尼斯) , 389 ; and POUM (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410—411 ; reaction to telefónica raid (对袭击电话局的反应) , 431—432 ; power broken in Catalonia (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优势被打破) , 461 ; rising causes Catalan cabinet crisis (提供了制造内阁危机的借口) , 465 ; solicit position in Negrín' s cabinet (谋求内格林政府中的职位) , 484 ; and Aragon Defense Council (与保卫阿拉贡委员会) , 523—524 , 527 ; animosity toward Negrín and PCE (敌视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 , 629. 另见 CNT ; FAI ; Libertarian communism

Anarchosyndicalism (无政府工团主义) 。 见Anarchists ; CNT ; FAI ; FIJL ; Libertarian communism

Anarquía (《无政府报》) , (加泰罗尼亚的) 地下无政府主义报纸 : 498—499

Andrade, Juan (胡安·安德拉德)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 历史学家 : as Trotsky disciple (作为托洛茨基的信徒) , 405 , 406—407 ; on POUM in Generalitat (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加入自治政府) , 第四十章注释15 , 411 , 413 ; urges CNT—POUM alliance (极力主张全国劳工联合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结盟) , 410 ; on POUM and Friends of Durruti (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杜鲁蒂之友会) , 427—428 ; sentenced to prison (被判刑) , 520

Anglo—German Naval Agreement (英德海军协定) : signed 18 June 1935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英德海军协定签字) , 95 ; Churchill criticizes (丘吉尔批评英德海军协定) , 95



Ansó, Mariano ( 马里亚诺·安索 ) , 左翼共和派人士 ,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担任司法部长 : on Araquistáin' s plans to weaken Azaand document transfer to Franco ( 1956 ) ( 与一九五六年向佛朗哥移交内格林的文件 ) , 148 ; on Aza14—15 ; liberal Republicans concern with ( 自由共和派关心反教权主义 ) , 23 ; in working—class movement ( 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反教权主义 ) , 72

Antón, Francisco ( 弗朗西斯科·安东 ) , 共产党马德里地方党组织书记 , 中部前线督察委员 : urges Miaja to join with Communists ( 力劝米亚哈加入共产党 ) , 294 ; dismissed by Prieto ( 被普列托降职 ) , 542 ; replaced by Fernando Pi·皮纽埃拉取代 ) , 542 ; Vidali ( Contreras ) on ( 维达利[孔特雷拉斯]论安东 ) , 542 ; and Rojo ( 与罗霍 ) , 543 ; and plan to defend Barcelona ( 与保卫巴塞罗那的计划 ) , 669 ;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 , 689

Antona, David ( 戴维·安东纳 ) , 全国劳工联合会中部地区书记 : on government rejection of CNT overtures ( 关于政府拒绝全国劳工联合会作出的姿态 ) , 528

Antonov—Ovseenko, Vladimir A. ( 弗拉基米尔·A. 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 ) , 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 : and Pedro ( Ern·埃尔诺 ] ) , 401 , 第三十九章注释33 ; on POUM exclusion from Generalitat ( 关于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 ) , 411

AP ( 人民行动党 ) , 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核心党派 : 4

Aparicio, Eustaquio ( Alfageme ) ( 欧斯塔基奥·阿帕里西奥[阿尔法赫梅] ) :

supports Caballero ( 支持卡瓦列罗 ) , 353

Apellániz, Loreto ( 洛雷托·阿佩利亚尼斯 ) : appointed Valencia police inspector ( 被任命为巴伦西亚警署督察 ) , 219

Appeasement ( 绥靖 ) : reasons for British policy ( 英国采取绥靖政策的原因 ) , 178—179 ; France and Britain cannot threaten policy of ( 英法两国不可能采取冒险的政策 ) , 184

Aragon ( 阿拉贡地区 ) : success of collectivization in ( 集体化的成果 ) , 74 ; dissolution of collectives in ( 解散集体农庄 ) , 244 ; as last CNT—dominated region ( 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的最后一个地区 ) , 525 ; Franco launches offensive in ( 佛朗哥阿拉贡地区发动攻势 ) , 570 ; collapse of ( 阿拉贡前线崩溃 ) , 571. 另见 Defense Council of Aragon

Aranguren, General José ( 何塞·阿朗古伦将军 ) , 共和派人士 , 巴塞罗那国民卫队指挥官 : 386

Araquistáin, Luis ( 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 ) : 社会党左派领导人 , 驻法国大使 : on labor courts' wage policies ( 论劳动法庭的工资政策 ) , 第一章注释4 ; and Caballero ( 与卡瓦列罗 ) , 22 ; views on Republic' s failure ( 认为共和国政府失败了 ) , 22 , 117—118 ; on Caballero ( 论卡瓦列罗 ) , 第二章注释19 , 319 ; on left Socialists' plan to frustrate Aza' s centrist stand ( Mar. 1936 ) ( 一九三六年三月论阿萨尼亚的中间立场 ) , 30 ; on Socialist revolution ( 论社会主义革命 ) , 第二章注释65 , 116 ; on disarray of Socialists ( 论社会党人的混乱状态 ) , 31 ; on revolutionary

terror (论革命恐怖) , 52 ; on Communist claims of influence on Caballero (论共产党的宣传对卡瓦列罗的影响) , 115 ; proposes coalition (建议组成联合政府) , 117—118 ; Caballero plans to appoint as foreign minister (卡瓦列罗打算任命其担任外交部长) , 122 ; on merger resulting in JSU (论导致组成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合并) , 130—131 , 第十二章注释35 ; relation with Communists (与共产党人的关系) , 131 ; on Fischer (论费希尔) , 第十三章注释46 ; on French foreign exchange problem (论法国外汇问题) , 146 ; on Soviet influence (论苏联的影响) , 159 , 277 , 315 ; receives Vayo letters on foreign policy (收到德尔巴约关于外交政策的信件) , 182 ; on Communist plan to fuse with Socialists (论共产党计划与社会党人合并) , 350 ; absence during Caballero ouster (卡瓦列罗被推翻期间不在西班牙) , 353 ; hears from Vayo of commissariat crisis (从德尔巴约那里得知总政治部危机) , 374 ; on Estremadura offensive (论埃斯特雷马杜拉进攻计划) , 467 ; on Negrín (论内格林) ,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 and Claridad (与《光明报》) , 第四十五章注释18 ; on Socialists' role in Caballero ouster (论社会党人在推翻卡瓦列罗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 470 ; on Negrín' s demand for POUM death penalty (关于内格林要求判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死刑) , 518 ; protests postponement of Cortes opening (反对推迟议会会期) , 559 ; accompanies Caballero to meetings of Madrid Socialists (陪同卡瓦列罗参加马德里社会党组织的会议) , 560 ; with Caballero when stopped at gunpoint (与卡瓦列罗一起被突击卫队士兵的枪口阻止) , 562 ; on dangers faced by independent Socialists (论独立的社会党人面对的危险) , 630 ; on JSU reaction to Communists (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对共产党人的反应) ,

632 ; on future of Republic ( 论共和国的前途 ) , 665 ; blames Communists ( 谴责共产党人 ) , 666 ; and last Cortes meeting ( 与最后一次议会会议 ) , 677

Ardiaca, Pere ( 佩雷·阿迪亚卡 )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 : supports government control of economy ( 支持政府控制经济 ) , 227

Arellano, Arturo ( 阿图罗·阿雷利亚诺 ) , 军队指挥官 , 亲共社会党人 : Enrique Castro on ( 恩里克·卡斯特罗论阿雷利亚诺 ) , 273

Arellano, Colonel Eutiquiano ( 欧蒂基亚诺·阿雷利亚诺上校 ) , 格拉纳达防区指挥官 : and CNT Maroto Brigade (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马罗托旅 ) , 331

Arms embargo ( 武器禁运 ) 。见 France ; Germany ; Great Britain ; Italy ; Non—Intervention Agreement ; USSR

Army ( 军队 ) : and Aza' s indifference to grievances ( 与阿萨尼亚对不满的漠视 ) , 15 ; regular officers distrusted by the left ( 左派不信任正规军军官 ) , 47。另见 Fifth Regiment ; Militia ; Popular Army ; Volunteer army

Aróstegui, Julio ( 胡里奥·阿罗斯特吉 ) , 左派历史学家 : on Bolloten' s views ( 对博洛滕的看法 ) , 第十三章注释7 ; ignores Miaja' s Communist ties ( 无视米亚哈与共产党的关系 ) , 296—297

Arquer, Jordi ( 霍尔迪·阿克尔 )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部队政委 : on Soviet manipulation of POUM ( 论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控制 ) ,

413 ; on PCE influence on POUM trial ( 关于西班牙共产党对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影响 ) , 517 , 519 ; sentenced to prison ( 被判刑 ) , 520 ; on central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in Catalonia ( 论中央政府对加泰罗尼亚的干扰 ) , 612

Arrando, Lieutenant Colonel ( 阿兰多中校 ) , 共和国军官 : named Catalan delegate of public order (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地区社会治安代表 ) , 453 , 458 ; told to name new police commissioner ( 内政部长令其任命新的警察署长 ) , 459

Arrarás, Joaquín ( 华金·阿拉拉斯 ) , 研究军事叛乱的历史学家 : on generals' meeting ( Mar.1936 ) ( 关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举行的将军会议 ) , 第一章注释37

Arredondo, Lieutenant Colonel Manuel ( 曼努埃尔·阿雷东多中校 ) , 卡瓦列罗的副官 : pro—Communist sympathies of ( 同情支持共产党 ) , 274 ; posted to Basque front ( 被派往巴斯克前线 ) , 356

Arrigoni, Enrico ( 恩里科·阿里戈尼 ) , 笔名布兰德 , 《无产阶级文化报》记者 : on assassination of Berneri and Barbieri ( 论暗杀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 ) ,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Ascaso, Francisco ( 弗朗西斯科·阿斯卡索 ) ,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积极分子 : killed in Barcelona military insurrection ( 军事叛乱爆发时在巴塞罗那战死 ) , 386

Ascaso, Joaquín ( 华金·阿斯卡索 ) ,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

盟领导人，保卫阿拉贡委员会主席：on militia requisitions（关于民兵补给的征用），524；on creation of Aragon Defense Council（论成立保卫阿拉贡委员会），524

Asensio, General José（何塞·阿森西奥将军），共和派军官，卡瓦列罗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named general and commander of central front（晋升为将军并被任命为中部前线指挥官），280；named to undersecretaryship（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280，282；Communists' treatment of（共产党人对待阿森西奥的做法），280—281；Fischer questions loyalty of（费希尔怀疑阿森西奥的忠诚），281；removed from central front（被解除中部前线的指挥权），282；delivers sealed orders to Pozas and Miaja（交给波萨斯和米亚哈密封的命令），284，285；on Miaja's incomprehension（不理解关于米亚哈的神话），293；denounced by Mundo Obrero（受到《工人世界报》的谴责），299；assigns Villalba to Malaga（派比利亚尔瓦去马拉加），344—345；Communists plan to oust（共产党人打算罢免他），347—348，355；Rosal on campaign against（罗萨尔论反对阿森西奥的运动），349；CNT distrust of（全国劳工联合会不信任阿森西奥），355—356；Nosotros campaign against（《我们》的反阿森西奥的宣传），357—358；succeeded by Baráibar（被卡洛斯·德·巴赖瓦尔接替），358；indictment and release of（受到指控及被释放），359；and plans for Extremadura（与埃斯特雷马杜拉进攻计划），466

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l Trabajo（国际工人协会）。见AIT

Assassinations（杀害）。见Terror；revolutionary

Assault Guard ( 突击卫队 ) : form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 建立与成分 ) , 42—43 ; role in July uprising ( 在七月叛乱中的作用 ) , 42—43 ; collapse of ( 土崩瓦解 ) , 48 , 216 ; growth under Caballero ( 在卡瓦列罗政府治下发展壮大 ) , 216 ; attempts to disarm Barcelona Anarchists ( 试图解除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的武装 ) , 427 ; enters Barcelona to take over public order ( 进入巴塞罗那接管社会治安 ) , 460

Asturias ( 阿斯图里亚斯地区 ) : left—wing 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 Oct.1934 ) ( 一九三四年十月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左派的叛乱与镇压 ) , 8—9

Austria ( 奥地利 ) : Hitler prolongs Mediterranean war in order to annex ( 希特勒为了吞并奥地利而拖延地中海地区的战事 ) , 103—104 ;

Hitler' s occupation of ( 希特勒占领奥地利 ) , 103—104 , 571—572

Avila Camacho, Manuel ( 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 ) , 墨西哥总统 : administers Spanish refugee funds ( 管理西班牙流亡者的资金 ) , 第十三章  
注释23

Aza·阿萨尼亚 ) , 左翼共和派政府总理 , 后来担任共和国总统 : and Popular Front ( 与人民阵线 ) , 10 , 12 , 15 , 99 ; appointed prime minister by Alcalá—Zamora ( 被阿尔卡拉—萨莫拉任命为政府总理 ) , 12 ; and military ( 与军方 ) , 12—13 , 15 , 34—35 , 250 , 254 ; caution regarding church ( 在教会问题上小心行事 ) , 14 ; becomes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 10 May 1936 ) (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日成为共和国总统 ) , 21 , 27 ; extreme left plots to weaken ( 极左派密谋削弱阿萨尼亚的作用 ) , 23 , 29—30 , 34 ; and Caballero ( 与卡瓦列罗 ) , 23 , 122 , 295 , 371—372 , 464—

465 , 466 , 469—469 , 472 ; offers premiership to Prieto ( 让普列托担任总理 ) , 28—29 , 474 ; names Casares Quiroga premier ( 任命卡萨雷斯·基罗加为总理 ) , 31 ; on assassination of Calvo Sotelo ( 关于杀害卡尔沃·索特洛 ) , 38 ; seeks moderate solutions ( 寻求温和的解决方案 ) , 38 ; fears arms distribution ( 对发放武器感到担忧 ) , 44 ; accused of “treason” by Republican ( 共和派指责其 “叛卖” ) , 45 ; appoints Giral premier ( 任命希拉尔为总理 ) , 46 ; on Republican leaders’ flight to France ( 论共和派领导人逃到法国 ) , 51—52 , 第十五章注释24 ; and excesses of the Revolution ( 论革命的过激行为 ) , 53 , 164 ; on messianic goals ( 论救世理想 ) , 56 ; loss of confidence of ( 失去信心 ) , 82 ; hopes for left coalition ( 寄希望于左派联盟 ) , 95 ; suggests cabinet reorganization to Giral ( 建议希拉尔改组内阁 ) , 120 ; threatens to resign ( 威胁要辞职 ) , 156 , 449 ; needs to remain in office ( 必须留在总统职位上 ) , 163 ; in Barcelona ( 在巴塞罗那 ) , 163 , 204 , 464 ; supports official version of Civil War ( 支持官方对内战的说法 ) , 166—167 ; and Spanish Morocco offer ( 与西属摩洛哥建议 ) , 181—182 ; reluctant to appoint CNT ministers ( 不愿任命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为政府部长 ) , 204—205 ; on Miaja’ s Communist ties ( 论米亚哈与共产党的关系 ) , 295 ; unaware of Gaykis’ s fate ( 不知道盖基斯的下落 ) , 319 ; and May events ( 与五月事变 ) , 431 , 433 , 437—438 , 448—450 , 453—454 ; begins to form new cabinet ( 开始组织新内阁 ) , 470—471 ; attempts to reconcile Caballero with Communists ( 试图使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和解 ) , 473 ; and Negrín ( 与内格林 ) , 474—475 , 486 ; on “Gestapo” version of Nin’ s disappearance ( 关于 “盖世太保” 与安德烈斯·宁的失踪有关的说法 ) , 513 ;



signs decree creating Tribunales Especiales ( 签署设立特别法庭的法令 ) , 514 ; dissolves Aragon Defense Council ( 解散保卫阿拉贡委员会 ) , 525 ; unsympathetic to rural collectives ( 不同情集体农庄 ) , 528 ; on Negrín' s postponement of Cortes opening ( 论内格林推迟议会会期 ) , 558 —559 ; favors negotiated settlement ( 赞成谈判结束内战 ) , 576 , 577 , 579 , 第五十四章注释54 ; on central police authority in Catalonia ( 论中央政府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治安权 ) , 611 ; claims ignorance of Catalan executions ( 声称不知道加泰罗尼亚的处决 ) , 615 ; signs decrees replacing Aiguadé and Irujo ( 签署接替艾瓜德和伊鲁霍的法令 ) , 618 ; intimidated by Negrín ( 受到内格林的恐吓 ) , 627 ; views prospect of world war ( 对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看法 ) , 656 ; flight of ( 逃走 ) , 681 ; remains in France ( 留在法国 ) , 685 ; defeatism of ( 承认失败 ) , 690 ; resigns presidency ( 辞去总统职务 ) , 700 , 721

Azcárate, Pablo de ( 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 ) , 西班牙驻伦敦大使 : on Negrín' s independence ( 论内格林的独立性 ) , 142 ; maintains that Republican Constitution was upheld ( 坚称共和国宪法得到维护 ) , 162 ; claims authorship of Spanish Morocco offer ( 说明西属摩洛哥建议的来源 ) , 181 ; role in peace negotiations ( 在和平谈判中的角色 ) , 697—698

Azcárate, Patricio de ( 帕特里西奥·德·阿斯卡拉特 ) , 工兵总监 :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 , 688

Aznar, Manuel ( 曼努埃尔·阿斯纳尔 ) , 右翼历史学家 : on Franco' s justification for military insurrection ( 论佛朗哥关于军事暴动的正当理

由) , 35 ; on militia' s weakness ( 论民兵的弱点 ) , 255

Backhouse, Admiral Roger ( 罗杰·巴克豪斯海军上将 ) , 英国海军军官 : supports establishment of Anglo—German ties ( 提议建立英德合作关系 ) , 175

Bakunin, Mikhail ( 1814—1876 ) ( 米哈伊尔·巴枯宁 , 1814—1876 ) ,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 antireligious views shaped Spanish libertarianism ( 反对宗教的观点影响了西班牙的自由主义 ) , 72 ; on dangers of state dictatorship ( 论国家专政的危险 ) , 77 ; influence on Spanish working class ( 对西班牙工人阶级的影响 ) , 193

Balabanoff, Angelica ( 安杰丽卡·巴拉巴诺夫 ) , 列宁的秘书 , 共产国际书记 : on alleged suicide of Krivitsky ( 论克里维茨基的所谓自杀 ) , 第九章注释 43

Baldwin, Stanley ( 斯坦利·鲍德温 ) , 英国保守党政府首相 : 91 ; delays in establishment of Anglo—German ties ( 在建立英德合作关系方面犹豫不决 ) , 175

Balius, Jaime ( 海梅·巴柳斯 ) , (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 ) 无政府主义报纸《晚报》的负责人 : vice—secretary Friends of Durruti ( 杜鲁蒂之友会副干事 ) , 420—421 , 第四十一章注释49 ; claims Friends of Durruti has no Trotskyist members ( 声称杜鲁蒂之友会没有托洛茨基分子 ) , 420—421 ; biography of ( 生平简历 ) , 第四十一章注释49

Baltic ( 波罗的海 ) : Britain' s desire to assure German supremacy

in ( 英国希望确保德国在波罗的海的优势地位 ) , 95—96

Bank of France ( 法兰西银行 ) : receives gold shipments for exchange ( 接受换取外汇的黄金 ) , 145—146

Banque Commerciale pour l' Europe du Nord ( 北欧商业银行 ) 。见 Eurobank

Baráibar, Carlos de ( 卡洛斯·德·巴赖瓦尔 ) , 社会党左派领导人 , 国防部副部长 : with Araquistáin , proposes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 与阿拉基斯塔因一起建议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 , 119 ; and Communists ( 与共产党人 ) , 132 , 368—370 , 556 ; succeeds Asensio ( 接替阿森西奥 ) , 358 , 368 ; supports Caballero ( 支持卡瓦列罗 ) , 370 ; plans to foment rebellion in Spanish Morocco ( 计划在西属摩洛哥煽动叛乱 ) , 466 , 第四十四章注释25 ; and Claridad ( 与《光明报》 ) , 第四十五章注释18

Barbieri, Francesco ( 弗朗切斯科·巴尔别里 ) , 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 , 贝尔内里的同事 : killing of ( 被杀害 ) , 453 ,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Barceló, Lieutenant Colonel Luis ( 路易斯·巴尔塞洛中校 ) , 共产党员 : participation in Fifth Regiment ( 加入第五团 ) , 269 ; allegiance of ( 其效忠对象 ) , 第二十七章注释19 ; commander First Army Corps ( 担任第一军军长 ) , 702 ; promoted to colonel by Negrín ( 被内格林晋升为上校 ) , 714 ; fate of ( 命运 ) , 737

Barcelona ( 巴塞罗那 ) 。见Catalonia

Barcelona Traction , Light , and Power Company ( 巴塞罗那牵引、照明和动力公司 ) : transfers to Nationalist territory ( 迁往民族主义者控制区 ) , 635

Barcia, Augusto ( 奥古斯托·巴尔西亚 ) , 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 becomes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 20 July 1936 ) (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成为外交部长 ) , 46 ; flight from Spain ( 逃离西班牙 ) , 第四章注释58

Barea, Arturo ( 阿图罗·巴雷亚 ) , 社会党人作家 : on revolutionary justice in Madrid ( 关于马德里的革命法庭 ) , 50 , 216 ; on bourgeois adherence to PCE ( 论西班牙共产党的资产阶级追随者 ) , 125 ; on revolutionary terror ( 关于革命恐怖 ) , 216 ; on dissension in militia ( 论民兵武装之间的不和 ) , 256 ; censors reports of foreign journalists ( 审查外国记者的报道 ) , 278 ; on Koltzov' s influence in Madrid war commissariat ( 论科利佐夫在马德里对总政治部的影响 ) , 278

Barnés, Francisco J. ( 弗朗西斯科·J.巴尔内斯 ) , 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 closes Catholic schools under Aza' s government ( 在阿萨尼亚政府治下关闭天主教学校 ) , 14 ; becomes minister of education ( 20 July ) (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成为教育部长 ) , 47

Barrio, José del ( 何塞·德尔·巴里奥 )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第二十七师师长 : promotion of his Communist officers ( 提拔他手下的共产党人军官 ) , 594 ; leads government show of force in Barcelona ( 率领部队在巴塞罗那展示政府的武力 ) , 617

Basque Nationalist party ( 巴斯克民族独立党 ) : moderation of population due to ( 民众由于其影响比较温和 ) , 第四章注释32 ; in Caballero government ( 加入卡瓦列罗政府 ) , 123。另见Aguirre, JoséAntonio

La Batalla ( 《战斗报》 )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喉舌 : 226 , 298 , 407—413 , 414 , 419—421 , 435 , 442 , 456—457 , 502—503 , 512—513

Bates, Ralph ( 拉尔夫·贝茨 ) , 英国作家 , 国际纵队第十五旅副政委 : on “good collectives” ( 论 “正常的集体农庄” ) , 242 ; biography of ( 生平简历 ) , 第二十四章注释29 ; on Fifth Regiment units ( 论第五团的部队 ) , 269 , 270 ; on proposed Socialist—Communist fusion ( 论计划中的社会党—共产党合并 ) , 537 ; on Codovila ( 论柯多维拉 ) , 537 ; doubts that Britain and France will intervene ( 怀疑英法两国将进行干涉 ) , 651 ; on decline of popular morale ( 论民众士气低落 ) , 666

Batov, P ( П.巴托夫 ) , 苏联军官 : 312

Bayo, Captain Alberto ( 阿尔韦托·巴约上尉 ) , 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部队的军官 , 普列托的副官 : discusses discipline with García Oliver ( 与加西亚·奥利韦尔讨论纪律 ) , 262 ; on CNT and Majorca invasion ( 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与进攻马略卡岛 ) , 325—326 ; later biography of ( 后来的经历 ) , 第三十二章注释21 ; alleges Prieto offers Spanish locations to Britain ( 声称普列托愿意把西班牙的战略要地转让给英国 ) , 545—546

Bebb, Captain Cecil ( 塞西尔·贝布上尉 ) , 把佛朗哥从加那利群岛送往西属摩洛哥

哥的飞机驾驶员：43

Bédarida, Fran·贝达里达)，历史学家：portrait of Chamberlain (描述张伯伦)，第十七章注释45

Belayev (别拉耶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identity mistaken by Bollothen (博洛滕弄错了他的身份)，363，第三十五章注释50；allegedly behind POUM trials (据说幕后操纵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审判)，第四十八章注释19

Beloff, Max (马克斯·贝洛夫)，英国历史学家：on Russian reaction to Anglo—German Naval Pact (论苏联对英—德海军协定的反应)，95—96

Benavides, Manuel (曼努埃尔·贝纳维德斯)，共产党员作家：on Companys and CNT (关于孔帕尼斯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关系)，389

Benedito, José (何塞·贝内迪托)，无政府主义民兵指挥官：Caballero appoints to general staff (卡瓦列罗任命其为总参谋部官员)，337

Benito, General Gregorio de (格雷戈里奥·德·贝尼托将军)，叛军将领：leads uprising in Huesca (在韦斯卡领导暴动)，43

Berenguer, General Dámaso (达马索·贝伦格尔将军)，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继任者：told of usefulness of Socialist participation in dictatorship (向其报告社会党人参加独裁政府的好处)，197

Bergamín, José (何塞·贝尔加明)，天主教作家，亲共人士：featured in News of Spain (被《西班牙新闻》突出报道)，第四十五章注释13；writes preface

to "Max Rieger's" book (为“马克斯·里格尔”的书作序),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P517—518; ties with PCE (与西班牙共产党的关系), 517—518

Bernal, General Carlos (卡洛斯·贝尔纳尔将军), 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 at Los Llanos meeting (出席洛斯利亚诺斯会议), 699; replaced by Francisco Galán (被弗朗西斯科·加兰取代), 715

Bernerì, Camillo (卡米洛·贝尔内里), 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 killing of (被暗杀), 453,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Berzin, General Ian K. (扬·K·别尔津将军), 别名格里申将军, 化名斯塔里克, 苏联军官: Krivitsky reveals presence in Spain of (克里维茨基揭露其在西班牙活动), 106; is not Vladimir Gorev (与弗拉基米尔·戈列夫不是同一个人), 307; perishes in Stalin purge (被斯大林清洗), 308, 310—311; allegedly criticized NKVD (据说批评过内务人民委员部), 319

Besteiro, Julián (胡利安·贝斯泰罗), 社会党右翼领导人: Pagainst revolution (反对革命), 22; Gil Robles on (希尔·罗夫莱斯论贝斯泰罗), 第二章注释22; sees eclipse of right-wing Socialism (意识到社会党右派失势), 25; with Aza, 627; and alleged plot to oust Negrín (与所谓推翻内格林的阴谋), 617; on possible outcomes of war (论内战可能出现的后果), 630, 656; on future of Spain (论西班牙的前途), 656; background of (个人背景), 703; and Casado (与卡萨多), 703, 726; named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Casado junta (被任命为卡萨多委员会的外交部长), 726; makes radio broadcast during coup (政变期间发表广播讲话), 727; refuses to abandon Madrid (拒绝离开马德里), 742

Bielov ( 别洛夫 ) 。 见Belayev

Bienio negro ( 1933—1935 ) ( 黑暗的两年 , 1933—1935 ) : 3

Bilbao, Crescenciano ( 克雷森西亚诺·毕尔巴鄂 ) , 社会党温和派人士 : holds subcommissariat in war ministry ( 掌管国防部总政治部的分支部门 ) , 第二十八章注释30 ; replaces Vayo as Commissar General ( 接替德尔巴约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 , 543—544

Bilbao, Tomás ( 托马斯·毕尔巴鄂 ) , 巴斯克民族行动党成员 , 不管部长 : replaces Irujo in 17 Aug. cabinet ( 在八月十七日内阁中接替伊鲁霍 ) , 616 , 619

Bilbao ( 毕尔巴鄂 ) : collapse of military revolt in ( 军事叛乱在毕尔巴鄂失败 ) , 47 ; Arredondo and Díaz Tendero posted to ( 阿雷东多和迪亚斯·滕德罗被派往毕尔巴鄂前线 ) , 356 ; supplies withheld near ( 几乎不向毕尔巴鄂供应物资 ) , 356

Bing, Geoffrey ( 杰弗里·宾 ) , 英国共产党员 : runs Spanish News Agency in London ( 负责伦敦的西班牙新闻社 ) , 139

Birkenhead, Earl of ( 伯肯黑德伯爵 ) : on Baldwin and Chamberlain ( 论鲍德温和张伯伦 ) , 184—185 , 186 ; on Vansittart' s reassignment ( 论范西塔特的新职位 ) , 652 ; on British unpreparedness ( 论英国没有做好准备 ) , 661

Blackstone ( 布莱克斯通 ) 。 见Otlov, Alexander



Blanco, Segundo (塞贡多·布兰科), 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内格林政府的教育部长: named education and health minister (被任命为教育和卫生部长), 585, 618, 623; influenced by Negrín (受内格林影响), 624; wants party approval of Thirteen—Point program (想让各个政党认可十三点方案), 646

Bland, Roger (罗杰·布兰德), 大英博物馆馆员: doubts gold coins were sorted for value (怀疑是否值得按价值对金币进行整理分类), 151

Blanshard, Paul (保罗·布兰沙德), 美国历史学家: on victimiza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论焚毁天主教堂), 51

Blasco Garzón, Manuel (曼努埃尔·布拉斯科·加尔松), 共和联盟领导人: becomes justice minister (20 July 1936)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成为司法部长), 47; flight from Spain (逃离西班牙), 第四章注释58

Blasco Ibáñez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 小说家: portrays ascetic revolutionary in La Bodega (在小说《酿酒厂》中描绘了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者), 第六章注释28

Bloque Nacional (民族阵线)。见National Front

Bloque Obrero y Campesino (工农集团)。见BOC

Blum, Léon (莱昂·布鲁姆), 法国社会党人总理: Franco—Soviet Pact signed under (执政期间签订了法苏条约), 89; approves of Stalin's noninterventionism (赞成斯大林的不干涉政策), 104; responsible for

French neutrality (对法国的中立负责) , 176 , 第十六章注释41 , 第十六章注释46 , 575

BOC (Bloque Obrero y Campesino) (工农集团) : precursor of POUM led by Maurín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前身, 由毛林领导) , 405

Bolín, Luis (路易斯·博林) , 君主主义报纸《阿贝赛报》驻伦敦记者: charters plane to fly Franco to Spanish Morocco (包租把佛朗哥送往西属摩洛哥的飞机) , 43 ; on Franco' s authorization to seek aid in England , Germany , and Italy (关于佛朗哥寻求英国、德国和意大利援助的授权) , 101 ; requests military aid in Rome (去罗马请求军事援助) , 101—102

Bolívar, Cándido (坎迪多·博利瓦尔) , 阿萨尼亚的秘书: asks Caballero for Barcelona reinforcements (要求卡瓦列罗增援巴塞罗那) , 433

Bolívar, Cayetano (卡耶塔诺·博利瓦尔) , 共产党员, 马拉加防区政治部主任: appoints Communist political commissars (任命共产党人政治委员) , 343

Bolloten, Burnett (伯内特·博洛滕) , 记者和历史学家: Vi' s claims (比尼亚斯论博洛滕相信克里维茨基的说法) , 105—106 ; on Orlov' s identity (论奥尔洛夫的身份) , 363 ; and NKVD' s stories of POUM espionage (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编造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 , 500—501

Bolodin (博洛丁) , 苏联特工: alleged role in Nin' s death (据说执行了杀害宁的任务) , 509

Bolshevik Leninists (Trotskyists)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 托洛茨基分

子) : organize Spanish Fourth International ( 组成第四国际西班牙支部 ) , 406 ; numbers of in Spain ( 西班牙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数量 ) , 第四十章注释11 ; expelled from POUM ( 被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开除出党 ) , 406 , 第四十章注释12 ; manifesto on proletariat dictatorship ( 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宣言 ) , 第四十一章注释82 ; reject CNT call for cease—fire ( 拒绝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停火呼吁 ) , 434 , 441 ; on POUM' s weakness ( 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软弱 ) , 444—445。另见Trotsky, Leon ; Trotskyists

Bonet, Pedro ( 佩德罗·博内特 )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 : sentenced to prison ( 被判刑 ) , 520

Bonnet, Georges ( 乔治·博内 ) , 法国外交部长 : urges peace to Welczeck ( 极力向韦尔切克主张和平 ) , 171 ; and France' s assurances to Hitler ( 与法国对希特勒的保证 ) , 652 ; and Coulondre on Germany ( 库隆德尔对德国的看法与博内 ) , 658

Borkenau, Franz ( 弗朗茨·博克瑙 ) , 奥地利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 on libertarianism in Castro ( 论卡斯特罗村的自由主义运动 ) , 68 ; predicts social revolution ( 预言社会革命 ) , 112 ; theorizes Kléber' s downfall ( 提出克莱贝尔失势的说法 ) , 305

Borrás, Tomás ( 托马斯·博拉斯 ) , 右翼作家 : alleged author of “evidence” of Communist plot in Spain ( 据说伪造了共产党在西班牙的阴谋的“证据” ) , 100

Bosch Gimpera, Pedro ( 佩德罗·博什·希姆佩拉 ) , 人类学家 , 加泰罗尼亚共和行动党成员 , 司法专员 : offered justice ministry by Companys ( 孔帕尼斯让其担任司法专员 ) , 494—495 ; on sbuses by SIM ( 论军事调查局滥用职权 ) , 606 ; on central police authority in Catalonia ( 论中央政府在加泰罗尼亚的治安权 ) , 611 , 612

Bowers, Claude ( 克劳德·鲍尔斯 ) , 美国驻西班牙大使 : claims Negrín had no Communist ties ( 声称内格林与共产党没有关系 ) , 140—141 ; views May events from Communist angle ( 按共产党的观点看五月事变 ) , 445—446

Brand ( 布兰德 ) 。见 Arrigoni, Enrico

Br' s fears of European war ( 听达拉第诉说对欧洲战争的担忧 ) , 172 ;

Brenan, Gerald ( 杰拉尔德·布雷南 ) , 英国历史学家 : on liberal Republicans' indifference to land reform ( 论自由共和派不关心土地改革 ) , 23—24 ; on PCE' s success ( 论西班牙共产党的成功 ) , 127 ; on growth of CNT—UGT under Primo De Rivera (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统治时期的发展 ) , 196 ; on 1931 laws regarding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hips ( 论一九三一年关于劳资关系的一系列法案 ) , 197—198

Brezhnev, Leonis (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 , 苏联领导人 : on last defense of Spain ( 论西班牙最后的抵抗 ) , 669

Bricall, José María ( 何塞·马利亚·布里卡利 ) , 加泰罗尼亚经济学家 : on loss of Catalan autonomy ( 论加泰罗尼亚地区失去自治权 ) , 612

Brissaud, André ( 安德烈·布里索 ) , 历史学家 : on Canaris , Hitler' s intelligence chief ( 论希特勒的情报局长卡纳里斯 ) , 104

Brome, Vincent ( 文森特·布罗姆 ) , 英国作家 : describes Madrid defense ( 描述马德里保卫战 ) , 287

Brook—Shepherd, Gordon ( 戈登·布鲁克—谢泼德 ) , 英国作家 : on posts held by Krivitsky ( 论克里维茨基担任的职务 ) , 第九章注释44

Broué, Pierre ( 皮埃尔·布鲁埃 ) , 法国历史学家 : on revolutionary faith of Madrid defenders ( 论马德里保卫者的革命信念 ) , 284

Buckley, Henry ( 亨利·巴克利 ) , 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 : and Negrín on SIM ( 与内格林关于军事调查局的说法 ) , 603

Bueno, Emilio ( 埃米利奥·布埃诺 ) , 共产党员 : commander Second Army Corps ( 第二军军长 ) , 702 ; promoted to colonel by Negrín ( 被内格林晋升为上校 ) , 714 ; Togliatti on ( 陶里亚蒂论布埃诺 ) , 717—718 ; imprisonment of ( 被监禁 ) , 737

Bugeda, Jerónimo ( 赫罗尼莫·布赫达 ) , 社会党温和派人士 : on carabineros ( 论边防警察部队 ) , 217 ; on Socialists' reasons for quitting Caballero cabinet ( 关于社会党温和派退出卡瓦列罗内阁的原因 ) , 470

Buiza, Admiral Fernández ( 费尔南德斯·布伊萨海军上将 ) , 共和国海军司令 : at Los Llanos meeting ( 出席洛斯利亚诺斯会议 ) , 699 ; against continued

resistance ( 反对继续进行抵抗 ) , 700 ; orders Cartagena fleet to North Africa ( 命令卡塔赫纳的舰队驶往北非 ) , 721

Bujaraloz ( 布哈拉洛斯 ) : influence of Catalan militia on collectivization in ( 加泰罗尼亚的民兵武装对布哈拉洛斯集体化的影响 ) , 75

Bullitt, William ( 威廉·布利特 ) , 美国驻法国大使 : on supposed Russian aims in West ( 想象中的苏联在西方的目的 ) , 170

Burgos ( 布尔戈斯 ) : beginning of uprising in ( 叛军起事 ) , 42 ; seat of Nationalist junta ( 民族主义政府所在地 ) , 146

Burillo, Lieutenant Colonel Ricardo ( 里卡多·布里略中校 ) , 共产党员 , 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警察部队指挥官 : replaces Torres Iglesias in Barcelona ( 在巴塞罗那取代托雷斯·伊格莱西亚斯 ) , 490 ; seizes POUM headquarters ( 占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部 ) , 499—500 , 508 ; Miaja appoints head of police ( 被米亚哈任命为警察部队指挥官 ) , 686 ; removed from Communist party ( 被共产党开除出党 ) , 第六十三章注释13

Butlletí Oficial de la 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公报》 ) ,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官方刊物 : 394

Caballero ( 卡瓦列罗 ) 。见 Largo Caballero, Francisco

Cabanellas, Guillermo ( 吉列尔莫·卡瓦内利亚斯 ) , 米格尔·卡瓦内利亚斯的儿子 : on Franco' s prewar position ( 论佛朗哥内战之前的立场 ) , 第三章注释

Cabanellas, General Miguel ( 米格尔·卡瓦内利亚斯将军 ) : declares martial law in Saragossa ( 在萨拉戈萨宣布军事管制 ) , 43 ; one of four active service generals to join uprising ( 参加叛乱的四位现役将军之一 ) , 48

Cabello, Alfredo ( 阿尔弗雷多·卡韦略 ) ,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 : Carrillo appoints to Madrid security ( 被卡里略安排在马德里的治安部门 ) , 299

Cabo Giorla, Luis ( 路易斯·卡博·希奥尔拉 ) , 共产党人 : member of Consejo General de Electricidad ( 电力委员会成员 ) , 223 ; on composition of PSUC ( 关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组成 ) , 397 ;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 , 689

CADCI ( Centre Autonomista de Dependents del Comer ) ( 工商业雇员自治中心 ) , 办公室职员和零售业营业员的工会组织 : many members join PSUC ( 许多成员加入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 , 416

Cádiz ( 加的斯 ) : beginning of uprising in ( 叛军起事 ) , 42 ; arrival of rebel—backed Moorish troops in ( 支持叛乱的摩尔军团到达加的斯 ) , 43

Cadogan Sir Alexander ( 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 ) , 英国副外交大臣 : on British suspicion of existing Spanish government ( 关于英国对西班牙现政府的怀疑 ) , 116 , 第十六章注释45 ; on Soviet plan for world revolution ( 论苏联的世界革命计划 ) , 171 ; supports Chamberlain ( 支持张伯伦 ) , 650 ; on German invasion of Austria ( 论德国入侵奥地利 ) , 第六十

Calaceite ( 卡拉塞特村 ) : Anarchist—run economic system in ( 无政府主义者在卡拉塞特村实行的经济制度 ) , 71

Calanda ( 卡兰达村 ) : collectivization in ( 卡兰达村的集体化 ) , 71—72

Calvet, Agustín ( 阿古斯丁·卡尔韦特 ) , 《先驱报》社长 : charges Popular Front created fascist threat ( 指责人民阵线自己造成了法西斯主义威胁 ) , 19—20

Calvet, José ( 何塞·卡尔韦特 ) ,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领导人 : named Catalan agriculture councillor (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农业专员 ) , 403 , 412 , 495 ; PSUC member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 ) , 416 ; named supplies councillor ( 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物资供应专员 ) , 422

Calvo Sotelo, José ( 何塞·卡尔沃·索特洛 ) , 君主主义西班牙复兴运动的议会领袖 : urges Portela to ask for Franco' s aid ( 强烈要求波特拉争取佛朗哥的帮助 ) , 12 ; leads monarchists' criticism of Aza , 36—37 , 38 ; Zugazagoitia on ( 苏加萨戈伊蒂亚论卡尔沃·索特洛 ) , 37

Camacho, Colonel Antonio ( 安东尼奥·卡马乔上校 ) , 中南部地区空军司令 : at Los Llanos meeting ( 出席洛斯利亚诺斯会议 ) , 699 ; against continued resistance ( 反对继续进行抵抗 ) , 700

Caminal, Miquel ( 米克尔·卡米纳尔 ) , 科莫雷拉的传记作者 : ignores Comorera' s opposition to PSUC ( 没有提到科莫雷拉反对组成加泰罗尼亚统一



社会党) , 398 ; on Tarradellas vs. Comorera ( 论塔拉德利亚斯与科莫雷拉的较量 ) , 422 ; on threat of civil unrest ( 论内乱的威胁 ) , 423

Caminero, Francisco ( 弗朗西斯科·卡米内罗 ) , 工团主义者 : named civil evacuation councillor , Madrid Defense Council ( 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市民疏散委员 ) , 295 ; named front services delegate , Madrid Delegate Defense Council ( 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前线服务代表 ) , 296

El Campesino ( 农夫 ) 。见González, Valentín

Campos, Severino ( 塞韦里诺·坎波斯 ) ,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书记 : on montseny' a entry into cabinet ( 关于蒙特塞尼加入内阁 ) , 209 ; on middle—class composition of PSUC ( 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中产阶级成分 ) , 399

Canaris, Admiral ( 卡纳里斯海军上将 ) , 希特勒的德国情报局长 : on Hitler' s plan to foil Franco ( 论希特勒打算使佛朗哥受挫 ) , 104

Cantalupo, Roberto ( 罗伯托·坎塔卢波 ) , 意大利驻佛朗哥方面的大使 : confirms that Mussolini initially refused military aid ( 证实墨索里尼最初拒绝提供军事援助 ) , 101

Capdevila, Andrés ( 安德烈斯·卡普德维拉 ) , 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 ,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经济专员 : 424

Carabias, Josefina ( 何塞菲娜·卡拉维加斯 ) , 阿萨尼亚的知己 : on Aza' s

departure for Barcelona (论阿萨尼亚前往巴塞罗那) , 163

Carabineers (边防警察部队)。见Carabineros

Carabineros (边防警察部队) : relinquish control of ports and frontiers (交出港口和边境的控制权) , 48—49 ; reorganization under Negrín (在内格林手下重新组建) , 217—218 ; seiza frontier posts (夺取边防哨所) , 427 ; take over Barcelona public order (接管巴塞罗那的社会治安) , 460 ; Marcelino Fernández appointed to head (马塞利诺·费尔南德斯被任命为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 , 609 ; Communist fears of (共产党对边防警察部队的担忧) , 610 ; Rafael Méndez and (拉斐尔·门德斯与边防警察部队) , 610

Carcaganta (Valencia) (巴伦西亚省的卡尔卡亨特) : cabinetmakers centralized in (木制家具业被集中起来) , 59 ; land trades for small owners in (为小地主调整了土地) , 75—76

Cardona Rosell, Mariano (马里亚诺·卡多纳·罗塞利) , 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 : on Caballero' s insistence on legal government (论卡瓦列罗强调政府的合法性) , 202 ; on economic divergence between CNT and UGT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之间的经济观点分歧) , 226 ; on credits extended to collective farms (关于向集体农庄提供贷款) , 242 ; on homogeneous CNT army units (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军队所具有的平等的特点) , 330 ; on restitutions of private property (论归还私人财产) , 636

Carlists (Carlist monarchists) (卡洛斯派君主主义者) : meeting with

Mussolini ( Rome agreement ) ( 与墨索里尼会谈[罗马协议] ) , 11 ; centered in Navarre ( 聚集在纳瓦拉省 ) , 12 ; work with General Mola ( 与莫拉将军合作 ) , 第一章注释51 ; differences with Alphonsine monarchists ( 与阿方索派君主主义者的政治分歧 ) , 36。另见Lizarza Iribarren, Antonio de ; Requetés

Carlton, David ( 戴维·卡尔顿 ) , 英国历史学家 : denies Britain dissuaded France from aiding Spain ( 否认英国劝阻法国援助西班牙 ) , 第十六章注释46

Carr, Edward Hallett ( 爱德华·哈利特·卡尔 ) , 英国历史学家 : on contradictions in German—Soviet relations ( 论关于德苏关系的矛盾说法 ) , 106

Carr, Raymond ( 雷蒙德·卡尔 ) , 英国历史学家 : on Aza' s stand in Caballero ouster ( 论阿萨尼亚参与推翻卡瓦列罗 ) , 464 ; on Jaime Aiguadé' s resignation ( 论海梅·艾瓜德辞职 ) , 615

Carrascal, Geminiano ( 赫米尼亚诺·卡拉斯卡尔 ) , 历史学家 : alleges Aza·卡雷尼奥 ) , 杜鲁蒂之友会成员 : 第四十一章注释49

Carre·卡雷尼奥 ) , 左翼共和派人士 : named communications and transport councillor , Madrid Defense Council ( 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交通运输委员 ) , 295 ; named propaganda and press delegate , Madrid Delegate Defense Council ( 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新闻宣传代表 ) , 296

Carrillo, Santiago ( 圣地亚哥·卡里略 ) ,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 , 共产党书记 : on Manuilski' s support of Caballero ( 论马努伊尔斯基支持卡瓦列

罗) , 26—27 ; and JSU ( 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 , 130 , 131—132 , 134—135 , 630—631 ; Codovila' s influence on ( 柯多维拉对卡里略的影响 ) , 132 ; praises Togliatti ( 赞扬陶里亚蒂 ) , 133—134 ; praises Caballero ( 盛赞卡瓦列罗 ) , 135 ; associate of Jorge Semprún ( 好友豪尔赫·森普鲁伦 ) , 140 ; takes control of Madrid security ( 掌控马德里的治安部门 ) , 219 , 299 ; confirms existence of NKVD prisons ( 证实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专用监狱的存在 ) , 221 ; on Socialist revolution ( 论社会主义革命 ) , 229—230 , 239 ; named public order councillor , Madrid Defense Council ( 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公共秩序委员 ) , 295 ; calls for union of libertarian and socialist youth ( 呼吁自由主义运动青年组织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联合起来 ) , 323—324 ; defends “democratic Republic” against POUM ( 针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指责为 “民主共和国” 辩护 ) , 409—410 ; believes in truth of Moscow confessions ( 相信莫斯科审判中被告供述的真实性 ) , 462 ; tries to check Socialist strength ( 试图控制社会党的力量 ) , 632 ; and plan to defend Barcelona ( 与保卫巴塞罗那的计划 ) , 669 ;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 , 689。另见JSU

Carrillo, Wenceslao ( 文塞斯劳·卡里略 ) , 社会党左派领导人 : on independence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s ( 论各省政府自行其是 ) , 129 ; ortega replaces as director general of security ( 奥尔特加取代卡里略任安全总局局长 ) , 486 ; with Caballero when stopped at gunpoint ( 与卡瓦列罗一起被突击卫队士兵的枪口阻止 ) , 562 ; on Negrín' s expectation of world war ( 论内格林希望爆发世界大战 ) , 656 ; named interior minister ,

Casado junta ( 被任命为卡萨多委员会的内政部长 ) , 726

Cartagena ( 卡塔赫纳 ) : receives gold shipment ( 黄金运到卡塔赫纳 ) , 145 , 147 ; militarily well defended ( 戒备森严 ) , 158 ; fleet departs for North Africa ( 卡塔赫纳的舰队驶往北非 ) , 721 , 第六十五章注释47

Casa del Pueblo ( 人民之家 ) , 社会党的劳动者总工会总部 : Nu·马萨请求向人民之家提供武器 ) , 39

Casado, Segismundo ( 塞希斯孟多·卡萨多 ) , 共和派军官 , 国防部军事行动负责人 : on Soviet advisers ( 论苏联顾问 ) , 108 , 159 , 277 ; on arms distribution to Fifth Regiment ( 论对第五团的武器分配 ) , 270 , 282 ; on Communist activity in army units ( 论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活动 ) , 276 , 280—281 ; dismissed and reinstated as operations chief ( 作为国防部军事行动负责人的解职和复职 ) , 282 ; on Miaja ( 论米亚哈 ) , 293 ; on air force and tank corps under Soviets ( 论空军和坦克部队受苏联人控制 ) , 315—316 ; on halting aircraft arrival to Extremadura ( 论空军不到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参加行动 ) , 468 ; Angel Pedrero supports ( 安赫尔·佩德雷罗支持卡萨多 ) , 603 ; relation with Negrín ( 与内格林的关系 ) , 696—697 , 698—700 , 711—712 , 728—729 ; at Los Llanos meeting ( 出席洛斯利亚诺斯会议 ) , 699 ; background of ( 个人背景 ) , 702 ; appointed commander Army of the Center ( 被任命为中路军司令 ) , 702 , 714 ; hostile to PCE ( 敌视西班牙共产党 ) , 703 ; and Besteiro ( 与贝斯泰罗 ) , 703—704 ; and Cipriano Mera ( 与西普里亚诺·梅拉 ) , 703—704 ; and libertarians ( 与自由主义运动 ) , 703—704 ; negotiates with SIPM ( 与宪兵情报局谈判 ) , 707—709 ;

urged to proceed with coup ( 催促卡萨多发动政变 ) , 707—710 ; junta rebels ( 5—6 Mar.1939 ) ( 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至六日的政变委员会 ) , 722 , 726 ; named defense minister , Casado junta ( 被任命为卡萨多政变委员会的国防部长 ) , 726 ; names seats in rebel junta ( 任命政变委员会成员 ) , 726 ; makes radio broadcast during coup ( 政变期间发表广播讲话 ) , 727 ; goals of Defense Council ( 国防委员会的目标 ) , 737—738 ; attempts to negotiate with Franco ( 争取与佛朗哥谈判 ) , 739—740 ; Defense Council moves to Valencia ( 国防委员会转移到巴伦西亚 ) , 742, ; flees Spain ( 逃离西班牙 ) , 742

Casanova, M. ( M.卡萨诺瓦 ) , 托派志愿者 : on dissolution of Central Antifascist Militia Committee ( 论解散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 ) , 407

Casanova Ruiz, Julián ( 胡利安·卡萨诺瓦·鲁伊斯 ) , 历史学家 : objections to his description of Iron Column ( 对其关于钢铁纵队的描述提出异议 ) , 第三十三章注释2

Casnovas, Juan ( 胡安·卡萨诺瓦斯 )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 forms new government , excluding PSUC ( 组成包括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在内的新政府 ) , 401

Casares Quiroga, Santiago ( 圣地亚哥·卡萨雷斯·基罗加 ) , 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 becomes premier and war minister ( 13 May 1936 ) (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三日担任总理和国防部长 ) , 21 , 31 ; confronts pressures from right and left ( 面对来自右派和左派的压力 ) , 32 , 34 ; disregards Hidalgo de Cisneros' s warnings ( 无视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警告 ) , 第三章注释2 ;

Franco warns not to rotate military officers ( 佛朗哥警告其不要进行军官轮换 ) , 35 ; on assassination of Calvo Sotelo ( 谴责杀害卡尔沃·索特洛的行为 ) , 37 ; government resigns ( 18 July ) ( 七月十八日卡萨雷斯·基罗加辞职 ) , 38 ; refuses to arm workers ( 拒绝武装工人 ) , 38—39 , 44—45 ; one of two Aza ( 让·卡苏 ) , 法国作家 : translates "Max Rieger' s" book into French ( 将 "马克斯·里格尔" 的书译成法文 ) , 517

Castelló, General Luis ( 路易斯·加斯特略将军 ) , 共和国自由派军官 : becomes minister of war ( 20 July ) ( 七月二十日成为国防部长 ) , 46

Castilla Libre ( 《卡斯蒂利亚自由报》 ) ,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 : 215 , 287—288 , 325 , 327—328

Castillo, Lieutenant José ( 何塞·卡斯蒂略中尉 ) , 突击卫队中的左翼分子 : murder allegedly provoked assassination of Calvo Sotelo ( 据说谋杀卡斯蒂略导致卡尔沃·索特洛被杀害 ) , 36

Castro, Enrique ( 恩里克·卡斯特罗 ) , 前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军事行动负责人 : on Codovila ( 论柯多维拉 ) , 133 ; on Togliatti ( 论陶里亚蒂 ) , 134 ; on Communist role in Republican affairs ( 论共产党在共和国事务中所起的作用 ) , 140 , 239 , 269 , 270—271 , 272—273 , 296 , 299 , 347 , 352—353 ; on profiting from Spanish left ( 论利用西班牙左派 ) , 234 ; on Vidali ( 论维达利 ) , 267 ; posts held by ( 担任过的职务 ) , 第二十七章注释7 ; on Martínez de Aragon , Arturo Arellano , JoséMaría Galán , Miguel Gallo and Fernando Sabio ( 论马丁内斯·德·阿拉贡、阿图罗·阿雷利亚诺、何塞·马利亚·加兰、米格尔·加略和费尔南多·萨维

奥) , 273 ; on Miaja and M.T.León ( 论米亚哈与玛丽娅·特蕾莎·莱昂 ) , 294 ;  
on Rojo' s religious beliefs ( 论罗霍的宗教信仰 ) , 302 ; on Kulik ( 论库  
利克 ) , 316—317 ; on Nin' s execution ( 关于处决安德烈斯·宁 ) , 506 ; on  
PCE' s battle with Prieto ( 论西班牙共产党与普列托的斗争 ) , 543 ; on  
PCE' s control over Negrín ( 论西班牙共产党对内格林的控制 ) , 587—588 ;  
on Fernández Ossorio y Talla ( 论费尔南德斯·奥索里奥—塔法利 ) , 597 ;  
continuing faith in USSR ( 继续信任苏联 ) , 664—665

Castro ( 卡斯特罗村 ) : libertarianism in ( 在卡斯特罗村开展的自由主义运  
动 ) , 68

Catalonia ( 加泰罗尼亚地区 ) : military rising and arrival of Goded ( 军  
事叛乱与戈代德到达 ) , 43 ; collapse of military revolt in ( July 1936 )  
( 一九三六年七月军事叛乱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失败 ) , 47 ; Abad de Santillán  
on violence in ( 阿瓦德·德·桑蒂连论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暴力行为 ) , 52—53 ;  
Revolution in ( 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革命 ) , 57 , 58—59 , 76 , 224—225 ;  
Socialist leaders leave Madrid for ( 社会党领导人从马德里逃往加泰罗尼亚  
地区 ) , 132 ; British dissuade French from aid to ( 英国劝阻法国援助巴  
塞罗那 ) , 第十六章注释61 ; seat of Republican government ( 1938 ) ( 一九  
三八年的共和派政府所在地 ) , 第十六章注释61 ; as seat of libertarian  
movement ( 自由主义运动汹涌澎湃的地方 ) , 192 , May events 1937 ( 一九三七  
年的五月事变 ) , 386 , 429—461 ; status of Catalan autonomy ( 加泰罗尼亚  
的自治地位 ) , 388 ; Nationalists fail to take ( 民族主义军队没有攻占巴塞  
罗那 ) , 571 ; becomes seat of government ( Nov.1937 ) (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成为政府所在地 ) , 571 , 第五十四章注释9 ; SIM operations in ( 军事调查局在



巴塞罗那的活动) , 603 ; Catalan reaction to government transfer to ( 加泰罗尼亚人对迁来的反应 ) , 612 ; fall of ( Feb.1939 ) ( 一九三九年二月失陷 ) , 663—664 , 667 , 675—676 ; Franco' s offensive against ( 佛朗哥进攻加泰罗尼亚地区 ) , 667。另见assault Guard ; CNT ; Comorera, Juan ; Companys, Luis ; ERC ; FAI ; Junta de Seguridad ; May events ; National Republican Guard ; Nin, Andrés ; Patrols ; POUM ; PSUC

Catholics ( 天主教徒 ) : support of military revolt ( 军事叛变的支持 ) , 10 ; chided by Barnés for not developing State schools ( 巴尔内斯因公立学校不发达指责天主教徒 ) , 14

Cattelas, Jean ( 让·卡泰拉斯 ) , 法国共产党议员 : flees Spain ( 逃离西班牙 ) , 733

Caute, David ( 戴维·科特 ) , 英国历史学家 : on leftist politics of Hewlett Johnson ( 论休利特·约翰逊主教的左翼政治主张 ) , 51

Cazorla, José ( 何塞·卡索拉 ) ,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 ( 共产党员 ) : takes over Madrid security ( 接管马德里的治安部门 ) , 219 ; named public order delegate , Madrid Delegate Defense Council ( 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公共秩序代表 ) , 296 ; seizes POUM property ( 没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财产 ) , 298 ; monopolizes Madrid police ( 完全控制马德里的警察 ) , 299 ; clashes with González Marín ( Apr. 1937 ) ( 一九三七年四月与冈萨雷斯·马林发生冲突 ) , 299

CEDA ( Confederación Espa ( 希尔·罗夫莱斯领导 ) , 4 ; joins Radical party

cabinet (加入激进党内阁), 8, 9; asks transfer of Catholic pupils to State schools (要求把教会学校的学生转入公立学校), 14; withdraws from Cortes (退出议会), 14—15; defections from (脱离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 第一章注释76, 32; weakness in the face of fascism (面对法西斯主义时软弱), 17; supports military conspiracy (支持军方的密谋), 第一章注释80, 18—19; Larráz plans to include in a Prieto government (拉腊斯关于组成一个包括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在内的普列托政府的计划), 31; relies on Calvo Sotelo (信赖卡尔沃·索特洛), 37。另见Gil Robles, JoséMaría

Censorship (新闻审查): under control of Madrid war commissariat (在马德里的总政治部控制下), 278; Barea censors reports of foreign journalists (巴雷亚审查外国记者的报道), 278。另见Mora, Constanca de la

Centa·森塔尼奥·德拉·帕斯上校), 第四炮兵营营长: participates in Casado negotiations (参加与卡萨多的谈判), 707

Center—right government (1933—1935)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的中—右政府): dismantles work of the Republic (消解共和国的成果), 3; effects on workers (对工人的影响), 6; and CEDA (与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 8; role of Radical party in (激进党在其中的作用), 8; fears repeal of anti—agrarian reform measures (担心废除其采取的反土地改革措施), 14; compels left to seek unity (迫使左派寻求合作), 95

Central Antifascist Militia Committee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反法西

斯民兵中心委员会) : 393—395 , 401—402 , 407

Challaye, Professor Félicien ( 费利西安·沙莱教授 ) , 巴黎大学教授 :  
visits Spain in defense of POUM ( 为保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访问西班牙 ) , 505

Chamberlain, Arthur Neville ( 阿瑟·内维尔·张伯伦 ) , 英国保守党政府首相 :  
conservative stand of ( 保守的立场 ) , 91 ; dismisses Vansittart ( 将范西塔特撤职 ) , 94 ; on Soviet goals ( 论苏联的目的 ) , 169 ; negotiates with Germany ( 与德国谈判 ) , 175 , 184—185 , 第十七章注释30 ; fears military responsibility to France ( 担心对法国承担军事责任 ) , 178 ; succeeds Baldwin ( May 1937 ) ( 一九三七年五月接替鲍德温 ) , 184 ;  
officially “excludes” some British State papers ( 官方 “隐匿” 某些英国政府文件 ) , 185 ; abandons Czechoslovakia and Poland ( 抛弃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 ) , 第十六章注释61 , 185 , 186 ; sees Soviets as major threat ( 视苏联为主要威胁 ) , 185—186 , 651 , 657 ; studies on ( 对张伯伦的研究 ) , 第十七章注释42、注释43和注释45 ; noninterventionism supported ( 坚持不干涉政策 ) , 650 , 653—654 ; does not defend Poland ( 不保护波兰 ) , 658—659

Chatfield, Lord ( 查特菲尔德勋爵 ) , 英国第一海事大臣 : backs Anglo—German ties ( 支持英德合作 ) , 175

Chautemps, Camille ( 卡米耶·肖当 ) , 法国总理 : and France’ s assurances to Hitler ( 与法国对希特勒的保证 ) , 652

Checa, Pedro ( 佩德罗·切卡 ) ,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 weakness before

Comintern advisers ( 不如共产国际顾问之处 ) , 134 ; on Vayo' s service to Communists ( 论德尔巴约为共产党人效力 ) , 138 ; at politburo meeting on Caballero ouster ( 出席研究推翻卡瓦列罗的政治局会议 ) , 362 ; prepares to leave Spain ( 准备离开西班牙 ) , 732

Chilston, Viscount ( 奇尔斯顿子爵 ) , 英国驻莫斯科大使 : receives Eden letter on Soviet hopes for Franco' s defeat ( 收到艾登论苏联希望打败佛朗哥的信 ) , 168

Chomsky, Noam ( 诺姆·乔姆斯基 ) , 美国语言学家和社会思想家 : on liberal historians' neglect of social revolution ( 论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忽视社会革命 ) , 第六章注释81

Church ( 教堂 ) : destruction and secularization of ( 捣毁和改作世俗之用 ) , 51 ; Spanish bishops' statistics on destruction ( 西班牙主教统计的遭到破坏的教堂数量 ) , 51

Churchill, Winston ( 温斯顿·丘吉尔 ) , 英国政治家 : on danger in Britain' s allowing spread of nazism ( 1937 ) ( 一九三七年论英国允许纳粹主义蔓延的危险 ) , 93—94 ; proposes peace with Germany ( Feb.1920 ) ( 一九二〇年二月建议与德国建立和平 ) , 第八章注释27 ; on France' s lost opportunity to stop Hitler ( 论法国失去遏制希特勒的机会 ) , 第十六章注释21 ; on Chamberlain ( 论张伯伦 ) , 186

Ciano, Count Galeazzo ( 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 ) , 意大利外交部长 : approves aid to Spanish rebels ( 同意援助西班牙叛军 ) , 101—102 ; agrees to ship

transport planes ( 25 July ) ( 七月二十五日同意装运运输机 ) , 102 ; as party in 1934 agreement with Spain ( 一九三四年作为当事人与西班牙达成协议 ) , 102 ; on fall of Catalonia ( 论攻占加泰罗尼亚地区 ) , 681

Cierva, Ricardo de la ( 里卡多·德拉·谢尔瓦 ) , 保守派历史学家 : on meaning of 1934 "Rome agreement" ( 论一九三四年 "罗马协议" 的意义 ) , 11 ; on monarchists' call for insurrection ( 论君主主义者呼吁暴动 ) , 17 ; on younger army officers in Falange ( 论长枪党内的青年军官 ) , 18 ; on conspiracies prior to military uprising ( 论军事叛乱前的密谋 ) , 36 ; on General Mola ( 论莫拉将军 ) , 36 ; on assassination of Calvo Sotelo ( 卡尔沃·索特洛被害 ) , 37 ; on Queipo de Llano' s coup ( 论凯波·德·利亚诺的叛乱行动 ) , 41—42 ; on loyalty of active service generals ( 论现役将军对共和国的忠诚 ) , 47—48 ; on right—wing authorship of "evidence" of Communist plot ( 论右派提出的有关共产党阴谋的 "证据" 的来源 ) , 100

Cimorra, Eusebio ( 欧塞维奥·西莫拉 ) , 《工人世界报》的撰稿人 , 埃尔南德斯的政治秘书 : on Prieto' s ouster by Communists ( 论共产党人罢免普列托 ) , 576

Ciutat, Colonel Francisco ( 弗朗西斯科·休塔特上校 ) , 梅嫩德斯的军事行动负责人 : and proposed transfer of power to Casado ( 与向卡萨多移交权力的建议 ) , 729

Civil Guard ( 国民卫队 ) : role in July uprisings ( 在七月叛乱中的作用 ) , 42 ; collapse and reorganization ( 瓦解与重建 ) , 48 , 216—217

Clara, Sebastián (塞瓦斯蒂安·克拉拉) : on collectivization of barber shops (论理发店的集体化) , 第五章注释23

Claridad (《光明报》) , 劳动者总工会的喉舌 : 25 , 28 , 45 , 116 , 120 , 192 , 199 , 202 , 214 , 239 , 250—251 , 254 , 316 , 320 ; Caballero loses control of (卡瓦列罗对其失去控制) , 478—479 , 561 ; becomes Communist mouthpiece (成为共产党人的喉舌) , 第四十五章注释18 ; history of (报纸的历史) , 第四十五章注释18

Claudín, Fernando (费尔南多·克劳丁) , 前共产党领导人, 作家 : on Comintern (论共产国际) , 100 , 134 ; on reality of social revolution in Spain (论西班牙社会革命的现实) , 111 ; on Caballero seen by working class (论工人阶级眼中的卡瓦列罗) , 第十一章注释26 ; on strength of PCE (论西班牙共产党的实力) , 125—126 ; on Carrillo' s ties to PCE (论卡里略与西班牙共产党的关系) , 132 ; on Soviet secret police in Spain (论西班牙的苏联秘密警察) , 220 ; Carrillo appoints to Madrid security (被卡里略安排在马德里的治安部门) , 299 ; says PCE' s actions weaken Republic (认为西班牙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削弱了共和国) , 515 ; on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 (论革命与内战) , 638—640

Clergy and religious orders (神职人员和宗教团体成员) : murder or flight of members of (被害或逃走) , 51 , 第四章注释56

Closas, Rafael (拉斐尔·克洛萨斯) , 加泰罗尼亚共和行动党领导人 : named Catalan councilor without portfolio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无任所专员) , 403

CLUEA ( Consejo Levantino Unificado de la Exportación Agrícola , 巴伦西亚的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 ) : opposed by Communist Peasant Federation ( 遭到共产党的农民协会抵制 ) , 86 ; set up by CNT ( 由全国劳工联合会成立 ) , 86 , 第七章注释26

CNT (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 全国劳工联合会 ) , 无政府主义工会组织 : and Madrid construction strike ( 与马德里建筑工人的罢工 ) , 7—8 ; and Popular Front ( 与人民阵线 ) , 21 , 195 ; controls economy ( 控制经济 ) , 54 ; collectivization program of ( 集体化方案 ) , 57—61 , 224—227 , 242—243 , 392 , 491—492 ; unions expropriate small businesses ( 工会没收小业主的生产资料 ) , 57 ; closes down Catalonian foundries and woodworking ( 关闭加泰罗尼亚的铸造厂和木工厂 ) , 58 ; farm workers' enthusiasm for collectivization ( 农场工人的集体化热情 ) , 63 ; against individual farming ( 反对个体耕种 ) , 64 ; works toward libertarian communism ( 努力推行自由共产主义 ) , 65 ; works on ideological conversion of villagers ( 努力转变村民的思想 ) , 75 ; creates own armed forces ( 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 , 77 ; establishes parochial dictatorships ( 建立地方专政 ) , 78 ; controls CLUEA in Valencia ( 控制巴伦西亚的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 ) , 第七章注释26 ; disorganization of ( 陷入混乱 ) , 127—128 ; history of (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历史 ) , 第十八章注释3 ; Caballero asks to join government ( 卡瓦列罗邀请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 ) , 191 , 199 ; Montseny on ( 蒙特塞尼论全国劳工联合会 ) , 192 ; early growth under Primo de Rivera ( 最初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统治时期发展壮大 ) , 196—198 ; clashes with UGT ( 与劳动者总工会发生冲

突) , 197—199 ; rejects Republican labor courts ( 抵制共和国的劳动法庭 ) , 198 ; growing strength in left zone ( 在左派控制区实力增长 ) , 199 ; plans national council of defense ( 打算建立国防委员会 ) , 201 ; accepts four ministers ( 接受四个部长职位 ) , 203 , 211 ; reaction to move to Valencia ( 对政府向巴伦西亚转移的反应 ) , 205—206 ; against Regular Army ( 抵制正规军 ) , 250 , 320 , 322—323 , 329 , 332 ; denounces Communist killings and prisons ( 谴责共产党进行屠杀并私设监狱 ) , 299 ; lacks war powers in ministry ( 在军事上没有指挥战争的权力 ) , 324—325 ; resentment of International Brigades ( 对国际纵队不满 ) , 第三十二章注释 27 ; militia adopts military stance ( 民兵采取军事化措施 ) , 325 , 327—329 , 332 ; recruits CNT officers ( 招收全国劳工联合会军官 ) , 328 ; military units remain under control of ( 民兵部队仍然在其控制下 ) , 330 ; friction between Iron Column and ( 钢铁纵队与全国劳工联合会之间的不和 ) , 334 ; members drafted into militia units ( 成员被召入民兵部队 ) , 346—347 ; hostile toward Asensio ( 敌视阿森西奥 ) , 355—356 ; reacts to Nosotros attack on Caballero ( 对《我们》攻击卡瓦列罗的反应 ) , 359 ; supports Caballero' s curbs on war commissariat ( 支持卡瓦列罗约束总政治部 ) , 375 ; and defeat of military rebellion ( 与挫败军事叛乱 ) , 386—387 , 第三十八章注释 4 ; accommodation with Generalitat ( 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达成和解 ) , 391—393 ; and Central Antifascist Militia Committee ( 与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 ) , 393 ; opposed by Catalan PSUC ( 遭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反对 ) , 396—397 ; joins Generalitat ( 加入自治政府 ) , 402 ; approves dissolution of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 同意解散革命委员会 ) , 403 ; size of ( 规模 ) ,



第四十章注释21 ; Comorera demands end of its security forces ( 科莫雷拉要求其治安力量停止活动 ) , 411 ; weakening position in Generalitat ( 在自治政府中的地位削弱 ) , 414 ; Companys needs collaboration of ( 孔帕尼斯需要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合作 ) , 414—415 ; Tarradellas defends ( 塔拉德利亚斯保护全国劳工联合会 ) , 415 ; on abuses of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 关于革命委员会的弊端和恶习 ) , 416 ; rejects militarization proposals ( 拒绝军事化建议 ) , 417 , 419 , 420 ; opposes PSUC' s "Victory Plan" ( 反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 "胜利计划" ) , 422 ; show of force during government crisis ( 在政府危机期间显示力量 ) , 425 ; armed committee members occupy streets ( 地方委员会武装人员占领街道 ) , 427 ; and May events ( 与五月事变 ) , 429—433 , 434 , 438—441 , 453 , 454—455 , 第四十三章注释44 , 456 , 460 , 494 ; tries to prevent central takeover of Barcelona police ( 试图避免中央政府接管巴塞罗那警务 ) , 436 ; Barcelona delegation proposes provisional council ( 巴塞罗那代表团建议成立临时委员会 ) , 441 ; backs Caballero in fight for power ( 在权力斗争中支持卡瓦列罗 ) , 472 ; offered two seats by Caballero ( 卡瓦列罗提供两个政府职位 ) , 472—473 ; attacks PCE as counterrevolutionary ( 抨击西班牙共产党是反革命政党 ) , 484 ; wants representation in Negrín' s cabinet ( 希望派代表加入内格林政府 ) , 484 ; exports precious metals ( 出口贵金属 ) , 490—491 ; loses control of ports and borders ( 失去对港口和边境的控制 ) , 490—491 , 493 ; attempts to preserve patrols ( 试图保留巡逻队 ) , 493 ; withdraws from Companys' s cabinet ( 退出孔帕尼斯政府 ) , 493—495 , 528 ; loses power in towns and villages ( 失去在城镇和乡村拥有的权力 ) , 494 ; on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terror ( 论共产党的革命恐怖 ) ,

498—499 ; alarmed at POUM repression ( 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遭到镇压而警觉 ) , 504 ; objects to Aragon Defense Council ( 反对阿拉贡地方委员会 ) , 525 ; tells Aza568 ; enters Negrín' s second government ( 加入第二届内格林政府 ) , 585 , 623 ; on poor hospital treatment of non—Communists ( 论非共产党人在战地医院受到的恶劣对待 ) , 595—596 ; clashes with FAI ( 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不和 ) , 625—627 ; protests dissolution of foreign utilities ( 反对解散外国公用事业公司 ) , 635 ; reacts to Negrín' s Thirteen—Point program ( 对内格林的十三点战争目标作出反应 ) , 647—648 ; fears PCE coup ( 担心共产党发动政变 ) , 705 ; aligns with Casado ( 与卡萨多结成同盟 ) , 722。另见Anarchists ; FAI ; FIJL ; Libertarian communism

CNT ( 《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 , 马德里的自由主义报纸 : 73 , 199 , 202 , 213 , 231 , 237 , 243 , 261 , 370 , 374—375 , 540—541

Cockburn, Claud ( 克劳德·科伯恩 ) , 化名詹姆斯·佩蒂弗和弗兰克·皮特凯恩 , 英国作家 , 《工人日报》记者 : on Vidali ( 论维达利 ) , 267 ; on Koltzov ( 论科利佐夫 ) , 309

Codovila, Vittorio ( 比托里奥·柯多维拉 ) , 化名梅迪纳 , 阿根廷人 , 共产国际代表 : relations with Caballero ( 与卡瓦列罗的关系 ) , 131 ; and merger resulting in JSU ( 与导致组成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合并 ) , 131 , 132 ; power over Spanish Communists ( 对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影响力 ) , 133 ; Vidali as assistant to ( 维达利协助柯多维拉 ) , 267 ; on Socialist—Communist fusion ( 关于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 ) , 352 , 383 , 535 , 537 ; and

Caballero ouster (与推翻卡瓦列罗) , 361 , 362 ; accused of Nin' s death (被控杀害安德烈斯·宁) , 511 ; and alleged plot to assassinate Prieto (与所谓暗杀普列托的阴谋) , 549 ; criticized by Togliatti regarding Anarchists (因无政府主义者问题受到陶里亚蒂的指责) , 553

Collectivization , rural (农村的集体化运动) : applied to all holdings (适用于所有财产) , 62 ; statistics on (统计资料) , 第六章注释 1 ; collectivist zeal (集体化运动支持者的热情) , 65 , 73 , 238—239 ; small farmers' anticollectivism (小地主反对集体化) , 73—74 ; in Aragon (阿拉贡地区的集体化运动) , 74—75 ; positive aspects of (值得肯定的方面) , 78 ; supported by Communists (共产党人支持集体化) , 244—245 ; efforts to dismantle (破坏集体化的后果) , 522—523 , 529—530 ; legalized for one year (合法化了一年) , 523

Collectivization , urban (城市的集体化运动) : government plan to take over collectivized enterprises (政府打算接管集体化的企业) , 222 ; approval of Catalanian decree on collectivization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批准关于集体化的法令) , 224 ; Communists' aversion to (共产党人反对集体化) , 228 ; decollectivization of enterprises (废除企业的集体化) , 636

Colodny, Robert (罗伯特·科洛德尼) , 历史学家 : on Eleventh International Brigade (论国际纵队第十一旅) , 288—289

Colomer, Victor (维克托·科洛梅尔)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负责农民运动的书记 : on rabassaires' ties with PSUC (关于农夫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关系) , 399

Colonos ( 垦殖民 ) : settled under the Agrarian Reform Law ( 根据土地改革法定居 ) , 4 ; support of July 1936 military revolt ( 一九三六年七月支持军事叛乱 ) , 10

Colton, Joel ( 乔尔·科尔顿 ) , 美国历史学家 : on Blum' s noninterventionist policy ( 论布鲁姆的不干涉政策 ) , 176

Colvin, Ian ( 伊恩·科尔文 ) , 英国历史学家 : on assumption that Germany would police Europe ( 论有人设想德国将成为欧洲的警察 ) , 第八章注释28 ; on Henderson and Chamberlain ( 论亨德森与张伯伦 ) , 653 ; and Wilson' s secret proposals ( 与威尔逊的秘密建议 ) , 658

El Combatiente Rojo ( 《红色战士》 ) , 马德里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报纸 : seizure approved by Madrid junta ( 经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批准被没收 ) , 298

Comintern ( 共产国际 ) : masks Spain' s social revolution ( 掩盖西班牙的社会革命 ) , 54 , 110 ; Seventh World Congress ( 1935 ) adopts Popular Front ( 一九三五年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批准采取人民阵线政策 ) , 88 , 95 , 99 ; aims to unite peasantry and small bourgeoisie ( 旨在联合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 , 95 ; calls peace fundamental goal ( 表明和平是首要目标 ) , 96 ; calls Popular Front a transition to proletarian rule ( 表明人民阵线是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形式 ) , 96 ; Nicolaevsky on Krivitsky' s role in ( 尼古拉耶夫斯基论克里维茨基在共产国际的职责 ) , 105 ; initiates International Brigades ( 组建国际纵队 ) , 108 , 289 ; agrees with politburo on prolonging war in Spain ( 同意苏共政治局把西班牙内战拖延下去的策略 ) , 109 ; seeks support of world democratic parties ( 寻求各国

民主党派的支持) , 110 ; need for propagandizing in the West ( 在西方的宣传需要 ) , 111 ; PSUC accepts discipline of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接受共产国际的纪律约束 ) , 130 ; power over Spanish Communists ( 对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影响力 ) , 133。另见Codovila, Vittorio ; Ger见General Commissariat of War

Committee for the Popular Army ( 支持人民军委员会 ) : absorbed into Catalan defense Council ( 被纳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防务委员会 ) , 419 ; established by PSUC ( 由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建立 ) , 419 ; proposes transformation of militia ( 建议将民兵改编成正规军 ) , 419

Committee of war ( 作战委员会 ) : hear complaints on militia discipline ( 听到对民兵部队缺乏纪律性的抱怨 ) , 262 , 264—265

Committee , revolutionary ( 革命委员会 ) 。见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Commune de Paris Battalion ( 国际纵队巴黎公社营 ) : Gúzman describes entry into Madrid ( 古斯曼描述其开进马德里的场面 ) , 287—288 ; Colodny on ( 科洛德尼论巴黎公社营 ) , 289

Communism International ( 共产国际 ) 。见Comintern

Communist party ( 共产党 ) 。见PCE

Communists , Catalonia ( 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人 ) 。见PSUC

Comorera, Juan ( 胡安·科莫雷拉 ) , 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主席 , 后任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书记 ,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物资供应专员 , 司法专员 : on need

for Western aid (论需要西方援助) , 180—181 ; political allegiance of (其政治效忠对象) , 397—398 ; on creation of PSUC (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产生) , 398—399 , 416 ; joins Communist central committee (进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 400 ; later biography of (后来的经历) , 第三十九章注释31 ; named Catalan public services councillor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公用事业专员) , 403 ; defends Soviet intervention (为苏联的干涉辩护) , 408 ; demands ouster of POUM (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 , 411 ; on curbing CNT' s powers (论限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权力) , 411 , 430 , 448 , 490—491 ; named public works , labor , and justice councillor (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的公共工程、劳工与司法专员) , 421 ; influence on Companys in takeover of public order (在中央政府接管加泰罗尼亚社会治安的问题上对孔帕尼斯的影响) , 437 ; calls for government stability (要求组成稳定的政府) , 494 ; named councillor of the economy ( June 1937 ) (一九三七年六月被任命为自治政府经济专员) 495 ; and replacement of Aiguadé and Irujo (与接替艾瓜德和伊鲁霍) , 615—616

Compa—UGT (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控制) , 55 , 430 ; raided by Rodríguez Salas and Aiguadé (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和艾瓜德下令袭击) , 430—432

Companys, Luis (路易斯·孔帕尼斯)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 : allegedly informs Caballero of FAI plans to seize gold (据说向卡瓦列罗报告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夺取黄金的计划) , 150 ; political biography of (孔帕尼斯的政治传记) , 389 ; relation with CNT—FAI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关系) , 389—391 ,

401—402 , 414—415 , 495 ; humanitarian gestures of ( 人道主义姿态 ) , 390—391 ; fate of ( 命运 ) , 第三十八章注释28 , 678 ; and Central Antifascist Militia Committee ( 与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 ) , 393—394 ; defends Generalitat ( 保护自治政府 ) , 401 , 403—404 ; names Tarradellas first councillor ( 任命塔拉德利亚斯为自治政府首席专员 ) , 402 ; says Antonov—Ovseenko asks ouster of POUM ( 声称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 ) , 411 ; named president of the Committee for the Popular Army ( 担任支持人民军委员会主席 ) , 419 ; set up interim cabinet during crisis ( 政府危机期间拼凑临时内阁 ) , 421 ; impatience with Tarradellas' s policies ( 不再支持塔拉德利亚斯的政策 ) , 422 ; on danger of Catalanian civil war ( 论加泰罗尼亚发生内战的危险 ) , 423 ; sets up new cabinet ( 16 Apr.1937 ) (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六日组成新内阁 ) , 423—424 ; requests police reinforcements ( 要求增援治安力量 ) , 436 ; surrenders police control ( 交出治安管理权 ) , 436—437 ; Comorera' s influence on ( 科莫雷拉的影响 ) , 437 ; gives up Catalan autonomy ( 放弃加泰罗尼亚自治权 ) , 447 , 451 ; attempts to regain autonomy ( 试图恢复自治权 ) , 451 , 493—495 , 611 ; rejects patrols' offer to Torres Iglesias ( 拒绝巡逻队表示愿意为托雷斯·伊格莱西亚斯效力的姿态 ) , 493 ; forms new cabinet ( June 1937 ) ( 一九三七年六月组织新内阁 ) , 494—495 ; on central government abuses in Catalonia ( 论中央政府在加泰罗尼亚滥用职权 ) , 611—612 , 614。另见Catalonia ; Comorera, Juan ; ERC

Confederación Espa见CEDA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 全国劳工联合会 )。见CNT

Conquest, Robert ( 罗伯特·康奎斯特 ) , 英国诗人和历史学家 : on Southworth ( 论索斯沃思 ) , 446 , 632—633

Consejo General de Electricidad ( Board of Electricity ) ( 电力委员会 ) : formed to consolidate utilities ( 为加强对公用事业的控制而成立 ) , 222—223

Consejo Levantino Unificado de la Exportación Agrícola ( 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 ) 。见CLUEA

Construction strike ( 建筑工人罢工 ) 。见CNT ; Falange Espa·孔特雷拉斯 ) , 见Vidali, Vittorio

Cooper, Duff ( Viscount Norwich ) ( 达夫·库珀 , 诺里奇子爵 ) : on Chamberlain ( 论张伯伦 ) , 第十七章注释43 ; resigns from Chamberlain cabinet over Munich agreement ( 因慕尼黑协定从张伯伦内阁辞职 ) , 第十七章注释43

Cordero, Manuel ( 曼努埃尔·科尔德罗 ) , 社会党人 , 普列托的支持者 : courted by Communists ( 共产党人向其示好 ) , 384 ; opposes Socialist—Communist merger ( 反对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 ) , 537 ; on Communist resistance demonstration ( 论共产党要求政府继续抵抗的示威游行 ) , 579 ; backs Negrín on religion ( 支持内格林对宗教的措施 ) , 644

Cordón, Antonio ( 安东尼奥·科登 ) , 共产党人军官 , 国防部副部长 , 东路军参谋长 : on Negrín' s praise of Benigno ( 论内格林对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的赞赏 ) , 140 ; on Vidali ( 论维达利 ) , 267 ; appointed to war ministry ( 被



安排到国防部) , 274 , 第二十八章注释16 ; on myth of Miaja ( 论米亚哈神话 ) , 293 ; on motives for Communist affiliation ( 论加入共产党的动机 ) , 318 ; on Villalba' s appointment to Malaga ( 关于把比利亚尔瓦派往马拉加 ) , 344 ; on Caballero ( 论卡瓦列罗 ) , 345—346 ; and Asensio ( 与阿森西奥 ) , 349 ; assigned to Cordova front ( 被派往科尔多瓦前线 ) , 356 ; reappointed to war secretariat ( 重新被安排到国防部的战术参谋部门 ) , 487 ; Prieto appoints as eastern army chief ( 普列托任命其为东路军参谋长 ) , 490 ; on Prieto' s anticommunism ( 论普列托的反共倾向 ) , 527 ; ousted by Prieto ( 被普列托撤职 ) , 544 ; on Negrín ( 论内格林 ) , 588 , 589—590 , 687 , 695 , 711 ; Negrín appoints to undersecretaryship ( 被内格林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 , 592—594 , 597—598 ; alleges plot to assassinate army officers ( 声称有人阴谋杀害军官 ) , 617 ; against further resistance ( 反对继续进行抵抗 ) , 686 ; on officials' refusal to return to Spain ( 论军官拒绝返回西班牙 ) , 688 ; on Casado' s hope for concessions ( 关于卡萨多希望佛朗哥作出让步 ) , 709 ; named secretary general ,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 被任命为国防部秘书长 ) , 714 ; with Negrín in Elda ( 与内格林一起在埃尔达 ) , 717 ; asks Casado to accept transfer of power ( 请求卡萨多接受移交权力 ) , 729

Cordova ( 科尔多瓦 ) : uprising in ( 科尔多瓦的叛乱 ) , 42 ; Miaja' s failure to capture ( 米亚哈没有夺取科尔多瓦 ) , 292

Corey, Louis ( 刘易斯·科里 ) , 《民族》的撰稿人 : on Vayo' s influence on Nation publisher ( 论德尔巴约对《民族》出版人的影响 ) , 第十三章注释5

Cornford, John ( 约翰·康福德 ) , 英国诗人 : on proletariat dictatorship in Barcelona ( 论巴塞罗那的无产阶级专政 ) , 388 ; fate of ( 命运 ) , 第三十八章注释12

La Correspondencia de Valencia ( 《巴伦西亚通讯》 ) , 卡瓦列罗的喉舌 : 506 , 512 , 541 ; Caballero loses control of ( 卡瓦列罗对其失去控制 ) , 561—562

Cortada, Roldán ( 罗尔丹·科尔塔达 ) , 劳动者总工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 , 比迭利亚的秘书 : murder of ( 被暗杀 ) , 425

Cortes ( 西班牙议会 ) : last meeting of ( 最后一次会议 ) , 677—679

Cot, Pierre ( 皮埃尔·科特 ) , 法国空军部长 : on unfounded claims of Italian aid ( 没有根据的关于意大利援助说法 ) , 102

Coulondre, Robert ( 罗贝尔·库隆德尔 ) , 法国驻莫斯科大使 : on German plans to attack West ( 论德国打算进攻西方 ) , 658

Cowan, Denys ( 德尼斯·考恩 ) , 英国联络官员 : and prisoner exchange ( 与交换俘虏 ) , 709

Cruells, Manuel ( 曼努埃尔·克鲁埃利斯 ) , 前《巴塞罗那日报》记者 : on Companys' s refusal to dismiss Aiguadéand Rodríguez Salas ( 论孔帕尼斯拒绝将艾瓜德和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撤职 ) , 431 ; on PSUC control in Catalonia ( 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了加泰罗尼亚地区 ) , 496 ; on mood of defeatism ( 论失败主义情绪 ) , 667

Cruz, Hilario de la (伊拉里奥·德拉·克鲁斯), 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领导人: meets with CNT Defense Committee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防务委员会会谈), 706

Cruz Salido,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克鲁斯·萨利多), 西班牙社会党人, 普列托的支持者: courted by Communists (共产党人向其示好), 384; opposes Socialist—Communist merger (反对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 537; appointed Zugazagoitia' s aide (被任命为苏加萨戈伊蒂亚的副手), 597—598

Cuenca (昆卡): lumber industry centralized in (木材业被集中起来), 59

Cuesta Monereo, José (何塞·奎斯塔·莫内雷奥), 凯波·德·利亚诺的支持者: 41

Cuevas de la Pe·奎瓦斯·德拉·培尼亚), 共产党员, 内格林政府的安全总局局长: claims credit for dissolving patrols (声称解散巡逻队是他的功劳), 492—493; on Méndez and Gómez Sáez (论门德斯和戈麦斯·赛斯), 606—607; and PCE (与西班牙共产党), 607; on seizure of housing in Catalonia (关于在加泰罗尼亚抢占住房), 612;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688

Curto, Major Inocencio (伊诺森西奥·库尔托少校): named military commander of Albacete (被任命为阿尔瓦塞特驻军司令), 715; Togliatti on (陶里亚蒂论库尔托), 718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and Hitler' s prolongation of Mediterranean war (与希特勒拖延地中海地区战事的企图), 104; crisis in

delineates Western fear of USSR ( 反映西方对苏联的恐惧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 ) , 170

Daily Mail ( 《每日邮报》 ) , 英国报纸 : prewar influence of ( 战前的影响力 ) , 91

Daily Worker ( London ) ( 伦敦《工人日报》 ) : 316 , 517 , 645

Daily Worker ( 《工人日报》 ) , 美国共产党的报纸 , P429 , 445

Daladier, Edouard ( 爱德华·达拉第 ) , 法国激进社会党人 , 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 : fears war with Germany would promote Russia ( 担心与德国的战争将有利于苏联 ) , 171—172 ; on noninterventionism ( 论不干涉主义 ) , 650

Dallin, David ( 戴维·达林 ) , 美国苏联问题专家 : on identity of Ian K. Berzin ( 论扬·K. 别尔津的身份 ) , 307

Davies, Joseph E. ( 约瑟夫·E. 戴维斯 ) ,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 : hears Litvinov' s warning on Germany ( 听取李维诺夫就德国发出的警告 ) , 180

Dawson, Geoffrey ( 杰弗里·道森 ) , 伦敦《泰晤士报》编辑 : proponent of appeasement ( 绥靖主义的支持者 ) , 173

El Debate ( 《论坛报》 ) , 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喉舌 : 31

Defense Council of Aragon , Anarchist—dominated ( 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保卫阿拉贡委员会 ) : recognized , then dissolved ( Aug. 1937 ) ( 得到承认 , 后于一九三七年八月被解散 ) , 243—244 , 523—528 ; escapes government

authority ( 不受政府的权力管辖 ) , 525

Defense Council of Madrid (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 ) : Miaja told to set up and lead ( 米亚哈受命成立并领导保卫马德里委员会 ) , 284 ; Rojo on composition of ( 罗霍论委员会的组成 ) , 295 ; roster of ( 成员名单 ) , 295 ; recast as Junta Delegada de Defensa de Madrid ( 改组更名为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 ) , 296 ; Communist influence in ( 共产党人在委员会中的势力 ) , 296—300 ; dissolved by Caballero ( Apr.1937 ) ( 一九三七年四月被卡瓦列罗解散 ) , 299—300 , 第三十章注释98 ; and campaign against Asensio ( 与反对阿森西奥的活动 ) , 349 ; demands army purge of “suspect elements” ( 要求军队清除 “可疑分子” ) , 355 ; Just and Hernández represent government in ( 胡斯特和埃尔南德斯在委员会中代表政府 ) , 375

Del Pablo ( 德尔·巴勃罗 ) 。见Povlov, General D.G.

Delbos, Yvon ( 伊冯·德尔博斯 ) , 法国外交部长 : and claims of Italian aid agreement ( 与意大利同意援助的说法 ) , 102 ; and British arguments for nonintervention ( 与英国坚持不干涉政策 ) , 176

Delicado, Manuel ( 曼努埃尔·德利卡多 ) ,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 prepares to leave Spain ( 准备离开西班牙 ) , 732

Derecha Regional Valenciana ( 巴伦西亚地区右翼运动 ) , 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分支 : youth movement supports rising ( 青年运动支持暴动 ) , 第一章注释80 ; countering Gil Robles , decides to prepare for violence ( 背弃希尔·罗夫莱斯 , 决定为采取暴力行动做准备 ) , 17

Deutscher, Isaac (艾萨克·多伊彻), 历史学家: on Stalin' s rapport with Thire Reich (论斯大林与第三帝国修好), 88—89

El Día Gráfico (《每日图片报》), 巴塞罗那的报纸: 644

Diari de Barcelona (《巴塞罗那日报》), 分离主义的加泰罗尼亚国家党的喉舌: 426, 496

Diario de Burgos (《布尔戈斯日报》), 布尔戈斯的报纸: 42, 429

Diario Oficial del Ministerio de Defensa Nacional (《国防部官方日志》): 544, 547, 713—717, 722

Díaz, José (何塞·迪亚斯),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and land distribution demands (与分配土地的要求), 5; on overturning of city councils by Popular Front (论人民阵线推翻各地的市政当局), 12; and Caballero (与卡瓦列罗), 26, 362—363, 365, 473; on Socialists' refusal liaison committee (论社会党人拒绝设立联络委员会), 27; on workers' ownership of plants (论工人占有工厂), 54; on alliance with moderate sectors (论与温和派结盟), 100; Hernández on (埃尔南德斯论迪亚斯), 112; defends democratic Republic (保卫民主共和国), 114—115, 232—233; on Spanish Communist party statistics (关于西班牙共产党的统计数字), 124; speeches written by Togliatti (陶里亚蒂为其写演讲稿), 133; weakness before comintern advisers (不如共产国际顾问之处), 134; seeks French and British intervention (试图使英法两国进行干预), 184; against continuing collectivization (反对继续实行集体

化) , 227 ; on popular nature of Fifth Regiment ( 论第五团的大众性 ) , 270 ; censures CNT trade—union project ( 谴责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政府方案 ) , 320 ; on proposed Socialist—Communist fusion ( 论建议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 ) , 381 ; represents PCE on 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 代表西班牙共产党参加全国协调委员会 ) , 385 ; accuses POUM ( 指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 445 , 508 ; attacks Spanish Trotskyists ( 攻击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分子 ) , 462—463 ; admonished by Aza473 ; Morón accuses of Nin' s death ( 莫隆指控其杀害宁 ) , 511 ; on Castro' s party allegiance ( 论卡斯特罗对党的忠诚 ) , 543 ; on Communist rapprochement with CNT ( 论共产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恢复友好关系 ) , 553 ; defends bourgeois democratic republic ( 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辩护 ) , 640—641 ; health of ( 健康状况 ) , 687。另见PCE

Díaz Alor, José ( 何塞·迪亚斯·阿洛尔 ) , 社会党左派 : accompanies Caballero to meetings of Madrid Socialists ( 陪同卡瓦列罗参加马德里社会党组织的会议 ) , 560

Díaz Baza, Angel ( 安赫尔·迪亚斯·巴萨 ) , 普列托派社会党人 : briefly heads SIM ( 短期领导军事调查局 ) , 601

Díaz de Ceballos, JoséMaría ( 何塞·马利亚·迪亚斯·德·塞瓦略斯 ) , 加泰罗尼亚治安总署署长 : appointed by Galarza ( 被加拉尔萨任命为治安总署署长 ) , 第四十三章注释57

Díaz Sandino, Lieutenant Colonel Felipe ( 费利佩·迪亚斯·桑迪诺中校 ) , 自由共和派人士 : named Catalan defense councillor (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

政府防务专员) , 403

Díaz Tendero, Captain Eleuterio (埃莱乌特里奥·迪亚斯·滕德罗上尉) , 国防部情报监控部门负责人, 亲共产党的社会党左派: and organization of UMRA (与组织共和国军人反法西斯联盟) , 274 ; head of vital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负责重要的情报监控部门) , 第二十八章注释17 ; posted to the Basque front (被派往巴斯克前线) , 356 ; usefulness to Communist party (对共产党的用处) , 356—357 ; Payne on (佩恩论迪亚斯·滕德罗) , 357 ; Suero Roca on (苏埃罗·罗卡论迪亚斯·滕德罗) , 357 ; uses *Nosotros* to denounce Caballero (利用《我们》谴责卡瓦列罗) , 357—359 ; allegedly arrested by Caballero (据说被卡瓦列罗逮捕) , 359 ; reappointed to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department (重新负责情报监控部门) , 487 ; ousted by Prieto (被普列托撤职) , 544 ; appointed to head of personnel , defense ministry (被任命为国防部人事部门负责人) , 593 ;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 688

Díéguez, Isidoro (伊西多罗·迭格斯) , 共产党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的代表: named militia delegate , Madrid Delegate Defense Council (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民兵代表) , 296 ; proposes seizure of POUM newspaper and radio station (建议没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报纸和广播电台) , 298 ; urges Caballero to enforce draft and remove "suspect elements" (敦促卡瓦列罗强制征兵并且撤换“可疑分子”) , 298—299 ; initiates Asensio' s ouster (提议罢免阿森西奥) , 355

Díez—Ca·迭斯—卡涅多) , 随笔作家: Aza—General Sir John (约翰·迪尔少将



爵士) , 英国陆军部官员 : predicts tragic outcome of Anglo—German war ( 预言英德战争的悲剧性后果 ) , 91—92 , 171

Dimitrov, Georgi ( 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 ) , 共产国际总书记 :  
on “transition” to proletarian rule ( 论向无产阶级专政 “过渡” ) , 96

Díos, Máximo de ( 马克西莫·德·迪奥斯 ) , 社会党人 , 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秘书长 : 296

Dirksen, Herbert von ( 赫伯特·冯·迪克森 ) , 德国驻伦敦大使 : and British aid to German interests ( 与英国帮助德国谋求利益 ) , 654 , 658 ; on nonaggression pact ( 论互不侵犯条约 ) , 659—660

Dodd, William ( 威廉·多德 ) , 美国驻柏林大使 : on Lord Lothian’ s hope that Germany will attack eastward ( 论洛西恩勋爵希望德国进攻东方 ) , 91

Dombrowski Battalion ( 国际纵队东布罗夫斯基营 ) : Hugh Thomas on movements of ( 休·托马斯论东布罗夫斯基营的行动 ) , 288 ; Colodny on ( 科洛德尼论东布罗夫斯基营 ) , 289

Doménech, Juan J. ( 胡安·J.多梅内奇 ) , 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 ,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物资供应专员和公用事业专员 : criticizes UGT for admitting bourgeoisie ( 指责劳动者总工会接纳资产阶级 ) , 397 ; named Catalan supplies councillor (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物资供应专员 ) , 403 ; named Catalan public services councillor (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公用事业专员 ) , 412 ; named interim economy and health councillor ( 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经济与卫生专员 ) , 422

Domingo, Marcelino ( 马塞利诺·多明戈 ) , 左翼共和派主席 : on distrust of Martínez Barrio' s government ( 论人们不信任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 ) , 45 ; flight from Spain ( 逃离西班牙 ) , 第四章注释58

Domínguez, Edmundo ( 埃德蒙多·多明格斯 ) , 社会党左派的 ( 劳动者总工会 ) 全国建筑工人联合会书记 : joins Communists ( 加入共产党 ) , 130 , 555 ; on weakening of Republican spirit ( 论共和派的精神虚弱 ) , 552 ; elected vice—president national UGT executive ( 当选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副主席 ) , 558 ; appointed to negotiate with CNT ( 受委派与全国劳工联合会谈判 ) , 567 ; on government' s move to Elda ( 论政府转移到埃尔达 ) , 696

Doporto, Luis ( 路易斯·多波尔托 ) , 总政治部分支部门负责人 : ousted by Prieto ( 被普列托撤职 ) , 544

Dos Passos, John ( 约翰·多斯·帕索斯 ) , 美国作家 : on struggle between Marxism and Anarchism ( 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斗争 ) , 318 ; and search for José Robles ( 与寻找何塞·罗夫莱斯 ) , 318

Douglas, General ( 道格拉斯将军 ) 。见 Smushkevich, Yakov

Douglas—Home, Lord ( Lord Dunglass ) ( 道格拉斯—霍姆勋爵 , 邓格拉斯勋爵 ) , 张伯伦的议会秘书 : on Chamberlain' s distrust of Soviets ( 论张伯伦不信任苏联 ) , 186

Draft ( 征兵 ) : Caballero does not enforce ( 卡瓦列罗不实行强制征兵 ) , 346—347 ; CNT sets up own ( 全国劳工联合会自行征兵 ) , 347

Draft , Catalonia ( 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征兵 ) : Anarchists drafted into militia units ( 无政府主义者被召入民兵部队 ) , 346

Duclos ( 杜克洛 ) , 共产国际法国代表 : collaborates with Togliatti ( 与陶里亚蒂合作 ) , 365

Duque, José ( 何塞·杜克 ) ,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 保卫阿拉贡委员会成员 : on Lister' s tactics ( 论利斯特的策略 ) , 526 ; on blame on Communists for Aragon ( 关于共产党人应对阿拉贡地区的情况负责 ) , 527 ; on Mantecón' s vacillations ( 论曼特孔的犹豫不决 ) , 529 ; on need for Communist backing in government ( 论政府中需要共产党的支持 ) , 582

Durán, Major Gustavo ( 古斯塔沃·杜兰少校 ) , 亲共人士 , 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分局负责人 : named to Madrid SIM by Prieto ( 被普列托任命为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分局负责人 ) , 547 ; and Emilio Kléber ( 与埃米利奥·克莱贝尔 ) , 547 ; dismissed by Prieto ( 被普列托撤职 ) , 547—548 ; Communist ties of ( 与共产党的关系 ) , 548—549 ; appoints Communist agents ( 任用共产党人特工 ) , 601

Durruti, Buenaventura ( 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 ) , 无政府主义领导人 : on relation between Revolution and war ( 论革命与战争的关系 ) , 74 ; as example of Anarchist self—discipline (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自我约束的实例 ) , 263 ; circumstances of death ( 死亡的详情 ) , 第二十六章注释15 , 420 ; and Mamsurov ( 与马姆苏罗夫 ) , 第三十一章注释61 ; persuades CNT fighters to give up confiscated arms ( 说服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民兵战士交出从政府抢来的武器 ) , 387 ; present at CNT confrontation with

Companys ( 参加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孔帕尼斯的会见 ) , 390 ; presses for delay of CNT coup ( 竭力要求全国劳工联合会推迟政变 ) , 392

Ebro ( 埃布罗河 ) : battle of ( 埃布罗河战役 ) , 663

Eby, Cecil ( 塞西尔·伊比 ) , 美国历史学家 : on Rojo' s behavior at siege of Alcázar ( 论罗霍在围攻托莱多城堡时的表现 ) , 300

Echevarría Nova, José ( 何塞·埃切瓦里亚·诺瓦 ) , 加泰罗尼亚地区社会治安代表 : appointed by Galarza ( 被加拉尔萨任命为社会治安代表 ) , 第四十三章注释57 ; dissolves patrullas de control ( 解散治安巡逻队 ) , 492

Eden, Anthony ( Earl of Avon ) ( 安东尼·艾登 , 埃冯伯爵 ) , 英国外交大臣 : on Soviet hopes for Franco' s defeat ( 论苏联希望佛朗哥失败 ) , 168 ; on Baldwin' s refusal to support French action against Germany ( 论鲍德温拒不支持法国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 ) , 第十六章注释21 ; on French noninterventionism ( 论法国的不干涉主义 ) , 第十六章注释45 ; on appeasement policy ( 论绥靖政策 ) , 第六十一章注释8

Edgar André Battalion ( 国际纵队埃德加·安德烈营 ) : march on Madrid describes by Gúzman ( 古斯曼描述其开进马德里的场面 ) , 288 ; Colodny on ( 科洛德尼论埃德加·安德烈营 ) , 289

Efimov, B.E. ( Б.Е.叶菲莫夫 ) , 科利佐夫的兄弟 : on death of Koltzov ( 论科利佐夫之死 ) , 308

Egido, Gómez ( 戈麦斯·埃希多 ) , 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领导人 : meets with

CNT Defense Committee (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防务委员会会谈 ) , 706

Eguía Sagarduy, Vicente de ( 比森特·德·埃吉亚·萨加杜伊 ) , 巴斯克上尉 : has Catholic funeral ( 享受天主教葬礼 ) , 644

Ehrenburg, Ilya ( 伊利亚·爱伦堡 ) , 苏联记者和作家 : on Miaja ( 论米亚哈 ) , 293 ; praises Gorev ( 赞扬戈列夫 ) , 306 ; survives purges ( 免遭清洗 ) , 308 ; confirms date of Berzin' s death ( 证实别尔津的死亡日期 ) , 310 ; on Mamsurov and Hemingway ( 论马姆苏罗夫和海明威 ) , 313 ; on Rosenberg' s fate ( 关于罗森堡的命运 ) , 319 ; on Vayo' s views of war in Europe ( 关于德尔巴约对欧洲战争的看法 ) , 649

El Campesino ( “ 农夫 ” ) 。 见González, Valentín

Eleventh International Brigade ( 国际纵队第十一旅 ) : and Madrid defense ( 与马德里保卫战 ) , 283 , 287—289 ; statistics on ( 人数 ) , 288 ; motives of members ( 成员加入的动机 ) , 289。 另见International Brigades ; Kléber, Emilio

Enterprises , manufacturing , mining , and banking ( 制造、采矿和金融企业 ) : union control of ( 工会控制制造、采矿和金融企业 ) , 第四章注释88

ERC ( 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 , 或Esquerra )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 ) : no longer support middle classes ( 不再支持中产阶级 ) , 82 , 396 ; dominates Generalitat ( 在自治政府中处于支配地位 ) , 388 ; accommodates to Revolution ( 适应革命 ) , 391 ; resents GEPCI ( 对加泰罗尼亚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不满 ) , 397 ; sets up Unióde

Menestrals (组织手工业者联合会) , 397 ; joins with PSUC against FAI (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一起对付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 , 401 , 403 ; growing power of (力量增强) , 414 ; satisfaction with POUM ouster (对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政府感到满意) , 414 ; urges creation of Committee for the Popular Army (推动建立支持人民军委员会) , 419 ; does not protest loss of Catalan autonomy (没有对加泰罗尼亚失去自治权提出抗议) , 450 ; backs CNT control of utilities (支持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公用事业) , 492 ; ousts persons active in May events from city councils (将积极参与五月事变的团体排除在各个市政委员会之外) , 494

Ercoli, Ercole (埃尔科莱·埃尔科利)。见Togliatti, Palmiro

Eremenko, I. (И.叶廖缅科) , 苏联军官 : 312

Eroles, Dionisio (迪奥尼西奥·埃罗莱斯) , 警察部队的无政府主义指挥官 : murder of his bodyguards (他的警卫人员被杀害) , 458

Escobar, Colonel Antonio (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上校) , 共和派人士, 巴塞罗那国民卫队指挥官 : 386 ; named delegate of public order (被任命为社会治安代表) , 450 , 451 ; wounding of (受伤) , 453 ; at Los Llanos meeting (出席洛斯利亚诺斯会议) , 699 ; named head Army of Extremadura (受命指挥埃斯特雷马杜拉方面军) , 714

Escofet, Major Federico (费德里科·埃斯科费特少校)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加泰罗尼亚治安总署署长 : refuses arms to CNT during insurrection (军事叛乱爆发期间拒绝向全国劳工联合会提供武器) , 386—

387 ; on police role in defeating military ( 论警察对挫败军事叛乱所起的作用 ) , 386—387 ; denies Companys' s conciliation of CNT ( 否认孔帕尼斯安抚全国劳工联合会 ) , 389 ; on Anarchists' lack of planning ( 论无政府主义者缺乏计划 ) , 392

Escribano, Antonio ( 安东尼奥·埃斯科里瓦诺 ) ,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阿利坎特省负责人 : on 1937 Valencia conference ( 论一九三七年召开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巴伦西亚大会 ) , 135—136 , 631 ; on JSU committee "election" ( 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的 "选举" ) , 135 ; on ignorance of leaders' Communist ties ( 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不知道其领导人与共产党的关系 ) , 135—136 ; resigns from JSU executive committee ( 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执委会辞职 ) , 631 ; named secretary "Commission of Young Socialists" ( 担任 "青年社会党人委员会" 书记 ) , 632

Esenwein, George ( 乔治·埃森魏因 ) , 美国历史学家 : on puritanical tendencies in Spanish Anarchism ( 论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清教主义倾向 ) , 68—69 ; on gender inequalities in collectives ( 论集体农庄的男女平等 ) , 第六章注释42 ; on enriching aspects of the collective movement ( 论集体化运动改善生活的一面 ) , 78 ; on Southworth and Negrín ( 论索思沃思与内格林 ) , 第十三章注释19 ,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 第六十章注释17 ; on founding of CNT (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创建 ) , 第十八章注释3 ; on POUM ( 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 第四十章注释3和注释15 , 第四十一章注释2和注释49 , 442 ; on Maurín' s importance ( 论毛林的重要性 ) , 405—406 ; on assassinations of Berneri and Barbieri ( 论暗杀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 ) ,

第四十三章注释32；on CNT and Friends of Durruti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与杜鲁蒂之友会)，第四十三章注释44

Espa·马利亚·埃斯帕尼亚)，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务专员：aids right-wing escapees (帮助右翼人士逃走)，391

Esplá, Carlos (卡洛斯·埃斯普拉)，左翼共和派人士，宣传部长：named Caballero minister (被任命为卡瓦列罗政府的部长)，203；receives letter from Caballero defending Baráibar (收到卡瓦列罗为巴赖瓦尔辩护的信)，358

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 (或Esquerra)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见ERC

Estat Català (加泰罗尼亚国家党)，加泰罗尼亚中产阶级政党：timidity of (胆小怯懦)，396；and murders of Berneri and Barbieri (与暗杀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第四十三章注释32

Estrada, Major Manuel (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少校)，共产党人军官，总参谋长：Communist sympathies of (支持共产党)，274；Caballero replaces with Martínez Cabrera (卡瓦列罗用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取代他)，282，366；appointed to defense ministry (被安排在国防部)，487；head of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担任情报监控部门负责人)，593

Estremadura offensive (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planned by Asensio and Martínez Cabrera (由阿森西奥和马丁内斯·卡夫雷拉策划)，466；Communists oppose (共产党人反对)，467；Araquistáin on (阿拉基斯塔因论埃斯特雷马杜



拉攻势) , 467 , 470

Eurobank ( 欧洲银行 ) , 苏联控制的北欧商业银行 : and gold transactions in Europe ( 与在欧洲的黄金交易 ) , 146 ; Provided no published accounts of transactions ( 不公布交易记录 ) , 153 ; and Spanish purchase outside Soviet Union ( 与西班牙在苏联国外的采购 ) , 157

Fábregas, Juan P. ( 胡安·P.法夫雷加斯 ) 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经济专员 : signs CNT decree on industrial collectivization ( 签署全国劳工联合会提出的工业集体化议案 ) , 224 ; named Catalan councilor of economy (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经济专员 ) , 403

FAI ( 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 (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 ) , 附属  
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 : guides CNT in libertarian  
communism (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由共产主义运动向导 ) , 21 , 191—192 ; youth  
movements against individual farming ( 其青年运动反对个体耕种 ) , 64 ;  
and armed protection of collectives ( 与武装保护集体所有制 ) , 77 ;  
establishes parochial dictatorships ( 建立地方专政 ) , 78 ; Caballero  
government tries to include ( 卡瓦列罗政府试图使其加入政府 ) , 191 ;  
votes for Popolar Front ( 为人民阵线投票 ) , 195 ; military attitude  
of ( 对军队的态度 ) , 263—264 , 322—323 ; objects to PSUC in Catalan  
government ( 反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加入自治政府 ) , 401 ; approves  
dissolution of Catalan committees ( 同意解散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革命委员  
会 ) , 403 ; proposes restructuring ( 打算重建 ) , 485 ; supports  
negotiated settlement ( 赞成谈判结束内战 ) , 580 ; criticized by Horacio

Prieto (遭到奥拉蒂奥·普列托批评) , 624 ; clashes with CNT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发生冲突) , 625—626 ; responds to Negrín' s Thirteen—Point program (对内格林的十三点战争方案作出回应) , 647。另见Anarchists ; CNT ; Libertarian communism

Falange Espa由普里莫·德里维拉领导) , 3 ; and Madrid construction strike (与马德里建筑工人的罢工) , 7 ; attempts to assassinate Jiménez de Asua (企图暗杀希门尼斯·德·阿苏亚) , 9 ; supports military revolt (支持军事叛乱) , 10 ; influences CEDA members (影响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成员) , 17 , 第一章注释76和注释80 ; and pro—violence stand of younger army officers (与年轻军官的暴动倾向) , 17—18 ; and delay of insurrection (与暴动的延误) , 36。另见Primo de Rivera, JoséAntonio

Falcón, César (塞萨尔·法尔孔) , 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世界报》的编辑 : on PCE' s reasons for not entering government (论西班牙共产党不参加政府的原因) , 121

Falcón, Irene (伊蕾妮·法尔孔) , 热情之花的秘书 : prepares to leave Spain (准备离开西班牙) , 732

Fanjul, General Joaquin (华金·范胡尔将军) : relieved of command (被剥夺了指挥权) , 13

Farlate (法莱特村) : collectivist conversion in (集体化的推行者转变村民的思想) , 74—75

Faupel, General Wilhelm von (威廉·冯·福佩尔将军) , 希特勒的驻弗朗哥政权

大使：advises Hitler on military aid to Spain ( 建议希特勒军事援助西班牙 ) ， 103 ; memo used by Communists ( 被共产党人利用的备忘录 ) ， 446

Federació Catalana del Partit Socialista Obrer Espanyol (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 ) : at origin of PSUC ( 发起成立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 ， 397

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 ) 。见FAI

Federación de 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 (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 : led by Santiago Carrillo ( 圣地亚哥·卡里略领导 ) ， 26。另见JSU

Federación Ibérica de Juventudes Libertarias ( 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 ) 。见FIJL

Federación Nacional de Banca ( 全国银行联合会 ) ，劳动者总工会的银行雇员工会组织：prevents borrowing by CNT—controlled firms ( 妨碍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的企业贷款 ) ， 226 ; and Claridad ( 与《光明报》 ) ，第四十五章注释 18

Federación Nacional de Juventudes Socialistas ( 全国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 : supports Caballero in radicalization of party ( 支持卡瓦列罗使社会党转向激进 ) ， 24

Federación Nacional de los Trabajadores de la Tierra ( in UGT ) ( 劳动者总工会所属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 ) 。见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nd Workers

Federación Obrera de Unidad Sindical ( 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 ) 。见FOUS

Federación Socialista Valenciana ( 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 ) :

controlled by Caballero socialists ( 由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控制 ) , 560

Federation of Anarchist Groups of Barcelona ( 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 ) : refuses to sign expulsion of Friends of Durruti ( 拒绝签署开除杜鲁蒂之友会的声明 ) , 494

Feiling, Keith ( 基思·费林 ) , 英国传记作家 : on Chamberlain' s distrust of Soviets ( 论张伯伦不信任苏联 ) , 186

Fernández, Lieutenant Colonel ( 费尔南德斯中校 ) , 卡瓦列罗政府的国防部官员 : succeeds Díaz Tintero in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department ( 接替迪亚斯·滕德罗主管情报监控部门 ) , 357

Fernández, Amador ( 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 ) , 社会党人 : member of Consejo General de Electricidad ( 电力委员会成员 ) , 223

Fernández, Aurelio ( 奥雷略·费尔南德斯 ) , 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 ,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卫生与公共救助专员 : 424

Fernández, Marcelino ( 马塞利诺·费尔南德斯 )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 : Negrín appoints as head of carabineros ( 被内格林任命为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 ) , 609 , 610

Fernández, Rafael ( 拉斐尔·费尔南德斯 ) ,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总书记 : refuses ISU committee seat ( 拒绝接受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

国委员会的职务) , 136 , 631 ; decries rightward swing of JSU ( 强烈反对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突然右转 ) , 230

Fernández Ballesteros, Alberto ( 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巴列斯特罗斯 ) , 社会党左派 : protests appointment of Communist commissars ( 抗议委派共产党人政治委员 ) , 275 ; on CNT Maroto Brigade (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马罗托旅 ) , 331 ; hears of payroll inflation ( 听说民兵部队虚报薪饷 ) , 335—336 ; on disorder at Malaga ( 论马拉加的混乱局面 ) , 344

Fernández Bola·费尔南德斯·博拉尼奥斯 ) , 国防部副部长 : loyalty to Prieto ( 忠于普列托 ) , 544

Fernández de la Villa Abrile, General José ( 何塞·费尔南德斯·德拉·比利亚·阿夫里莱将军 ) , 塞维利亚兵营的共和派指挥官 : 41

Fernández Grandizo, Manuel ( 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 ) , 化名G·穆尼斯,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 : assails POUM' s tactics ( 猛烈抨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策略 ) , 407 ; claims ties with Friends of Durruti ( 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与杜鲁蒂之友会的关系 ) , 420—421

Fernández Ossorio y Taffall, Bibiano ( 比维亚诺·费尔南德斯·奥索里奥—塔法利 ) , 曾任《政治报》负责人, 共产党的盟友 : Negrín appoints as general commissar of war ( 被内格林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 ) , 596—597 ; bids farewell to Communist leaders ( 向共产党领导人告别 ) , 731

Fernández Sánchez, José ( 何塞·费尔南德斯·桑切斯 ) , 历史学家 : on Soviets' departure from Spain ( 论苏联人撤离西班牙 ) , 669

Fernsworth, Lawrence (劳伦斯·费恩斯沃思), 伦敦《泰晤士报》记者: on Spaniards' flight to France (论西班牙人逃到法国), 681

Ferrara, Marcella and Maurizio (马尔切拉和毛里齐奥·费拉拉), 意大利共产党作家: on Togliatti (论陶里亚蒂), 364—365

Ferrer, Juan (胡安·费雷尔), 全国劳工联合会商业雇员工会书记: on treatment of small business owners (论如何对待小业主), 59

Fifth Regiment (第五团): evacuation of intellectuals during Madrid siege (在马德里围城期间疏散知识分子), 125; Benigno Rodríguez founder of (创建人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 140; trains military units (训练军队), 266; MAOC as source of (第五团的基础反法西斯工农民兵), 266—267; moral code of (道德准则), 268—269; composition of (组成), 269—270; conversion into Regular Army (改编为正规军), 270—271, 273; distribution of arms to (对第五团的武器分配), 282; and Madrid defense (与马德里保卫战), 283, 286

FIJL (Federación Ibérica de Juventudes Libertarias) (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 hostility to Communist rhetoric (敌视共产党的冠冕堂皇), 233; objects to land restitution (反对归还土地), 238; fears Communists' role in militarization (对共产党人在民兵军事化中扮演的角色表示担忧), 323; refuses to sign expulsion of Friends of Durruti (拒绝签署开除杜鲁蒂之友会的声明), 494

Fischer, Louis (路易斯·费希尔), 亲苏美国作家: on bourgeois aspects of

Comintern policy (论共产国际对资产阶级的政策) , 111 , 123 , 125 ; on Alvarez del Vayo (论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 139 ; on valuables transferred through France (关于经法国转移贵重物品) , 第十三章注释23 ; said to be Negrín' s propaganda agent (被称为内格林的宣传代理人) , 142 ; on Negrín and Stashevsky (论内格林与斯塔舍夫斯基) , 142 , 476 ; biography of (生平简历) , 第十三章注释46 ; receives funds for volunteer transport (收到招募派遣志愿者的资金) , 第十三章注释46 ; on Orlov' s code names (关于奥尔洛夫的化名) , 220 ; on establishment of Popular Army (论人民军的建立) , 272 ; drafts letter to Caballero on Asensio' s loyalty (起草给卡瓦列罗的信质疑阿森西奥的忠诚) , 281 ; on Miaja' s Communist ties (论米亚哈与共产党的关系) , 294 ; on relations between Marty and Kléber (论马蒂与克莱贝尔的关系) , 304 ; on Gorev' s role in Madrid defense (论戈列夫在马德里保卫战中的作用) , 306 ; on Stalin' s purge of officers (论斯大林对军官的清洗) , 308 ; on purge of Koltzov (论清洗科利佐夫) , 308—309 ; writes for News of Spain (为《西班牙新闻》写文章) ,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 arranges reinstatement of de la Mora at Press Bureau (安排德拉·莫拉在对外新闻司复职) , 539 ; on dissension on the left (论左派阵营的分歧) , 629—630 ; on Negrín' s Thirteen Points (论内格林的十三点方案) , 644—645

Flight (逃走) : of clergy , property owners , and Republicans (神职人员、有产阶级和共和派人士逃往国外) , 51—52 ; of Communists (共产党人逃走) , 725 ; of Negrín (内格林逃走) , 731 ; of Casado (卡萨多逃走) , 742

FNTT (Federación Nacional de los Trabajadores de la Tierra , 全国农

业工人联合会) : newspaper , El Obrero de la Tierra ( 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报纸《农业工人报》 ) , 5 ; on advantages of rural collectivization ( 论农业集体化的优点 ) , 64 ; small farmers join for protection ( 小地主为得到保护而入会 ) , 65 ; supports UGT' s agricultural workers in Valencia ( 支持巴伦西亚的农业工人 ) , 86 ; on inadequacy of land confiscation decree ( 论将土地收归国有的法令的问题 ) , 238 , 240

Foreign Press Bureau ( 对外新闻司 ) : Communist functionaries remain in ( 保留共产党人工作人员 ) , 488 ; and accusations of POUM espionage ( 与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 ) , 500—501 ; controlled by NKVD ( 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控制 ) , 501。另见Censorship

Fourth Administration ( 第四局 ) , 苏联军事情报机构 : Nicolaevsky on Krivitsky and ( 尼古拉耶夫斯基论克里维茨基与第四局 ) , 105

Fourth International ( 第四国际 ) 。见Bolshevik Leninists ; Trotsky, Leon

FOUS ( Federación Obrera de Unidad Sindical ) ( 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 )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工会组织 : censured by Trotskyists for merger with UGT ( 托洛茨基分子谴责其并入劳动者总工会 ) , 407

Frade, Fernando ( 费尔南多·弗拉德 ) , 加入共产党的社会党人 ,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秘书长 : 295

Fraga ( 弗拉加 ) : success of libertarianism in ( 自由主义运动在弗拉加的



成果) , 66

Fragua Social (《社会熔炉报》) , 在巴伦西亚出版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纸 :  
210 , 234 , 447 , 585

France (法国) : signs Franco—Soviet pact (签订法苏条约) , 89 ; on  
commitments to Eastern bloc (关于对东方集团的义务) , 90 ; policy based  
on fear of Bolshevization (政策基于对欧洲布尔什维化的担忧) , 107 ;  
continuing noninterventionism of (继续采取不干涉政策) , 110 , 176 ,  
187 , 483 , 575 , 650 ; European ties of oppose British policy (在欧洲承  
担的义务与英国外交政策背道而驰) , 180 ; hopes to profit from German—  
Soviet struggle (希望从德国与苏联的争斗中获益) , 187 ; recognizes  
Franco' s administration (承认佛朗哥政权) , 700 , 720

France—Navigation (法国航海公司) , 共产党拥有的轮船公司 : Prieto  
alleges embezzlement for benefit of (普列托声称其挪用西班牙黄金获  
利) , 155 ; ships Soviet—supplied arms to Republic (运送苏联提供的武  
器共和派) , 第十四章注释69

Francisco, Enrique de (恩里克·德·弗朗西斯科) , 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书  
记 : writes introduction to Caballero memoirs (为卡瓦列罗的回忆录作  
序) , 第四十五章注释19 ; says Communist methods harm Republican  
cause (认为共产党人的手段损害了共和国的事业) , 506

Franco, General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 , 叛军领导人 , 后来成  
为民族主义西班牙的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国家元首 : named generalissimo and

head of state ( 被任命为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国家元首 ) , 第一章注释44 , 43 ;  
urges Portela to declare martial law ( 极力劝说波特拉宣布戒严令 ) ,  
12 ; sent to Canary Islands ( 被派往加那利群岛 ) , 12—13 ; warns Casares  
Quiroga on substituting military officers ( 警告卡萨雷斯·基罗加不要撤换  
军官 ) , 35 ; vacillates on eve of military insurrection ( 在军事叛乱前  
夕犹豫不决 ) , 35—36 ; assumes command of Moroccan forces ( 得到摩洛哥  
军队的指挥权 ) , 43 ; proclaims martial law ( 宣布实行军事管制 ) , 43—  
44 ; one of four active service generals to join uprising ( 参加叛乱的四  
位现役将军之一 ) , 47—48 ; sends aides to Hitler requesting military  
support ( 派助手请求希特勒提供军事援助 ) , 97 ; German aid to ( 德国援助佛  
朗哥 ) , 98 ; authorizes Bolín to seek aid abroad ( 授权博林寻求外国援  
助 ) , 101 ; no record of promise of Italian aid before war ( 没有意大利  
在内战爆发之前承诺援助的记录 ) , 101 ; Germany prevents total victory  
by ( 德国避免使佛朗哥取得彻底胜利 ) , 103—104 ; struggle against  
described as defense of Republic ( 反对佛朗哥的斗争被描述成为保卫共和国  
的斗争 ) , 110—111 ; advances on Madrid ( 向马德里推进 ) , 120 , 252 ;  
confiscates Republican valuables ( 没收共和派的财物 ) , 第十三章注释23 ;  
and Spanish Morocco ( 与西属摩洛哥 ) , 181 , 466 ; reasons for early  
strength ( 内战初期实力占优的原因 ) , 259 , 第二十五章注释34 ; on Miaja and  
Rojo ( 关于米亚哈和罗霍 ) , 291 ; attempt to negotiate settlement  
with ( 试图与佛朗哥谈判结束内战 ) , 483 ; Soria says POUM advances cause  
of ( 索里亚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帮了佛朗哥的忙 ) , 507 ; invades  
Aragon ( Spring 1938 ) ( 一九三八年春天侵占阿拉贡地区 ) , 531 ; launches  
Aragon offensive ( 在阿拉贡地区发动攻势 ) , 570 ; demand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 要求无条件投降 ) , 576 , 579 , 679 , 738 ; occupies Basque provinces and Asturias ( 占领巴斯克各省和阿斯图里亚斯地区 ) , 656 ; offensive against Catalonia ( 向加泰罗尼亚地区发动进攻 ) , 667 , 675 ; Count Ciano on ( 齐亚诺伯爵论佛朗哥 ) , 681 ; issues Law of Political responsibilities ( 颁布政治责任法 ) , 690—691 , 738—739 ; impatient with Casado negotiations ( 对与卡萨多的谈判没有耐心 ) , 708—709 ; recognized by Britain and France ( 得到英法两国的承认 ) , 720 ; uprising at Cartagena ( 在卡塔赫纳发动暴乱 ) , 721 ; signs Concessions of the Generalissimo ( 签署 “总司令的让步” ) , 738 ; Launches final offensive ( 发动最后的攻势 ) , 741—742

Franco, Máximo ( 马克西莫·佛朗哥 ) ,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第一百二十七旅旅长 : negotiates compromise in Lérida ( 在莱里达谈判达成妥协方案 ) , 452

Franco—Soviet Pact of Mutual Assistance , signed on 2 May 1935 (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签订的法苏互助条约 ) : lacks military agreement ( 缺少军事协定充实 ) , 89—90 ; supported by USSR with Popular Front line ( 得到苏联人民阵线路线的支持 ) , 94—95 ; Hitler tries to strengthen French parties opposing ( 希特勒试图反对法苏条约的法国党派的力量 ) , 98 ; as proof Stalin wished to contain Germany ( 证明斯大林希望遏制德国 ) , 99 ; as reason for coverup of French fears of USSR ( 作为掩饰法国对苏联的担忧的理由 ) , 172 ; limited acceptance of ( 不太受欢迎 ) , 第十六章注释50 , 180。另见France

Fran—Poncet, André ( 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 ) , 法国驻德国大使 : on

cooling of Russo—French ties ( 论逐渐冷淡的法苏关系 ) , 90

Fraser, Ronald ( 罗纳德·弗雷泽 ) , 历史学家 : on Puritanism of collectives ( 论集体农庄的清教主义 ) , 第六章注释28 ; on abolition of money in collective villages ( 论集体农庄废除货币 ) , 70—71

Freemasons ( 共济会会员 ) : Togliatti accuses ( 陶里亚蒂指控共济会会员 ) , 718

Frente Libertario ( 《自由阵线报》 ) , 中部前线的无政府主义报纸 : 322 , 327 , 374 , 553

Frente Rojo ( 《红色阵线报》 ) , 共产党在巴伦西亚的喉舌 : 133 , 236 , 242—243 , 347 , 373—374 , 376—377 , 408—409 , 430 , 439 , 452—453 , 501—502 , 512 , 518 , 538 , 553 , 556—557 , 561 , 567 , 569 , 578 , 580 , 617 ; believes collectives have permanent legal status ( 认为集体农庄拥有了永久性的合法地位 ) , 523

Freund, Hans ( 汉斯·弗罗因德 ) , 化名莫林 , 托洛茨基分子 : works briefly with POUM ( 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短期合作 ) , 442

Frienfs of Durruti ( Los Amigos de Durruti ) ( 杜鲁蒂之友会 ) : founded to combat “counterrevolution” ( 为与“反革命”斗争而创立 ) , 420—421 , 427 ; Esenwein on ( 埃森魏因论杜鲁蒂之友会 ) , 第四十一章注释49 ; and POUM ( 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 427 ; rejects CNT call for cease—fire ( 拒绝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停火呼吁 ) , 434—435 , 441—442 ; makes new revolutionary demands ( 提出新的革命要求 ) , 454—455 ; expelled from

CNT—FAI ( 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开除 ) , 第四十三章注释44 , 494

Frutos, Víctor de ( 维克托·德·弗鲁图斯 ) , 共产党的五一营营长 : on morale of Madrid defense militia ( 论保卫马德里的民兵的士气 ) , 286—287

Fuentes, JoséLuis ( 何塞·路易斯·富恩特斯 ) , 炮兵总监 :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 , 688

Gaceta de la República ( 《共和国官方公报》 ) : 335 , 544 , 711

Gaceta de Madrid ( 《马德里官方公报》 ) : 46

Galán, Francisco ( 弗朗西斯科·加兰 ) , 共产党员 : promoted to colonel by Negrín ( 被内格林晋升为上校 ) , 714 ; named commander Cartagena naval base ( 被任命为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 ) , 714—715 ; Togliatti on ( 陶里亚蒂论加兰 ) , 718

Galán, JoséMaría ( 何塞·马利亚·加兰 ) , 共产党员军官 : Enrique Castro on ( 恩里克·卡斯特罗论加兰 ) , 273

Galán, Juan ( 胡安·加兰 ) , 共产党员 : named intelligence subchief ( 被任命为内政部情报处副处长 ) , 219

Galarza, Angel ( 安赫尔·加拉尔萨 ) , 社会党左派 , 内政部长 : names Mu·格兰德斯为突击卫队负责人 ) , 42 ; appointed interior minister ( 被任命为内政部长 ) , 122 , 203 ; on function of militia units ( 论民兵小分队的作用 ) , 216 ; on growth of Assault Guard ( 关于突击卫队的发展壮大 ) , 216—217 ;

makes Valencia police appointments ( 任命巴伦西亚警察负责人 ) , 219 ;  
leaves for Valencia ( 撤往巴伦西亚 ) , 283 ; on clashes between Iron  
Column and police ( 论钢铁纵队与警察的冲突 ) , 338 ; suspends  
publication of *Nosotros* ( 禁止《我们》出版发行 ) , 359 ; and Aiguadé' s  
request for reinforcements ( 艾瓜德请求增援与加拉尔萨 ) , 433—434 ; and  
takeover of public order ( 与接管加泰罗尼亚社会治安 ) , 457—460 , 第四十  
三章注释57 ; on three—hour truce ( 关于三小时停战 ) , 459—460 ;  
appoints Torres Iglesias as Barcelona police chief ( 任命托雷斯·伊格莱  
西亚斯为巴塞罗那警察部队指挥官 ) , 490

Gallego, Ignacio ( 伊格纳西奥·加列戈 ) 第六军的共产党人指挥官 : on  
Negrín' s usefulness to PCE ( 论内格林对西班牙共产党的用处 ) , 590

Gallo ( 加略 ) 。见 Longo, Luigi

Gallo, Miguel ( 米格尔·加略 ) , 共产党员军官 : Enrique Castro on ( 恩里克·  
卡斯特罗论加略 ) , 273

Gambara, General ( 甘巴拉将军 ) , 民族主义军队的意大利将军 : prevented by  
Franco from creating refuge at Alicante ( 佛朗哥不许其在阿利坎特设立难  
民区 ) , 743

Gamelin, General Maurice Gustave ( 古斯塔夫·莫里斯·甘末林将军 ) , 法军总  
参谋长 : and Kùhlenthal' s prediction of Soviet takeover ( 屈伦塔尔关于  
苏联介入的预言与甘末林 ) , 172

Ganga, Ginés ( 希内斯·甘加 ) , 社会党左派议员 : on Rosenberg ( 论罗森堡 ) ,

319 ; on Caballero and Rosenberg ( 论卡瓦列罗与罗森堡 ) , 348 ; on Caballero ( 论卡瓦列罗 ) , 562 ; with Caballero when stopped at gunpoint ( 与卡瓦列罗一起被突击卫队士兵的枪口阻止 ) , 562

Gannon, Franklin Reid ( 富兰克林·里德·甘农 ) , 历史学家 : on influence of Daily Mail ( 论《每日邮报》的影响力 ) , 91 ; on Rothermere' s views on Germany ( 论罗瑟米尔对德国的看法 ) , 91

Garcés Arroyo, Santiago ( 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 ) , 军事调查局官员 : on Negrín and Stashevsky ( 论内格林与斯塔舍夫斯基 ) , 143 , 476 ; appointed head of SIM ( Apr.1938 ) ( 一九三八年四月被任命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 ) 301 , 601—602 ; on Rojo' a political allegiance ( 论罗霍的政治效忠对象 ) , 301 ; and Soviet presence in SIM ( 与苏联在军事调查局中的存在 ) , 601 , 603—604 ; background of ( 个人背景 ) , 第五十六章注释21 ; and alleged letter from Negrín to Stalin ( 与所谓内格林写给斯大林的信 ) , 672 ; returns to Alicante ( 返回阿利坎特 ) , 685 ; commandeers palace as Negrín headquarters ( 征用作为内格林指挥部的宫殿 ) , 694 ; on attempt to transfer power to Casado ( 论试图向卡萨多移交权力 ) , 729 ; bids farewell to Communist leaders ( 向共产党领导人告别 ) , 731

García, Justiniano ( 胡斯蒂尼亚诺·加西亚 ) , 共产党员 : named intelligence chief ( 被任命为内政部情报处处长 ) , 219

García, Mariano ( 马利亚诺·加西亚 ) , 无政府主义青年联盟成员 ,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情报联络委员 : 294

García, Pedro ( 佩德罗·加西亚 ) , 劳动者总工会的社会党人书记 : on Communists' establishing rival peasant groups ( 论共产党建立农民组织 ) , 86

García Birlan, Antonio ( 安东尼奥·加西亚·比尔兰 ) , 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 : named Catalan health and public assistance councillor (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卫生与公共救助专员 ) , 403

García Lombardía, César ( 塞萨尔·加西亚·隆巴迪亚 ) , 教师联合会书记 : appointed by UGT to negotiate with CNT ( 受劳动者总工会委派与全国劳工联合会谈判 ) , 567

García Maroto, Gabriel (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罗托 ) , 社会党左派 , 后来成为共产党员 : replaces Pesta 275

García Oliver, Juan ( 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 ) ,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 , 司法部长 : on people' s justice ( 论人民的正义 ) , 50 ; named Caballero minister ( 被任命为卡瓦列罗政府部长 ) , 203 , 209 ; on why CNT entered Caballero government (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卡瓦列罗政府的原因 ) , 210 ; on militia' s weakness ( 论民兵的弱点 ) , 260 , 262 ; heads Barcelona Committee of war ( 领导巴塞罗那作战委员会 ) , 262 ; member Higher War Council ( 战时高级委员会成员 ) , 324 ; named head officers' training school ( 被任命为军官培训学校负责人 ) , 328—329 ; on CNT role in defeating military (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对挫败军事叛乱所起的作用 ) , 386 ; refused arms by Escofet ( 埃斯科费特拒绝向其提供武器 ) , 386—387 ; on Anarchists' accommodation with Generalitat ( 论无政府主义者



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解) , 389—390 , 392 ; proposes coup ( 建议发动政变 ) , 392 ; designated to go to Barcelona ( 被派往巴塞罗那 ) , 436 ; appeals for cease—fire ( 呼吁停火 ) , 439 ; on Berneri assassination theory ( 论对暗杀贝尔内里的看法 ) ,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 asks CNT ministers to prepare for takeover of public order ( 请求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部长为中央政府接管加泰罗尼亚社会治安做准备 ) , 457—459 ; on central government abuses in Catalonia ( 论中央政府在加泰罗尼亚滥用职权 ) , 612

García Pradas, José ( 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 ) , 《全国劳工联合会报》负责人 : on social revolution ( 论社会革命 ) , 233 ; on Líster' s alleged role in assassinations ( 指控利斯特对杀害农民负有责任 ) , 241 ; on dangers of volunteer army ( 论志愿军的危险性 ) , 323 ; on CNT army units (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军队 ) , 331 ; on Vázquez' s shift in position ( 论巴斯克斯立场的转变 ) , 580 ; on Horacio Prieto' s critical stand ( 论奥拉蒂奥·普列托的危险立场 ) , 624 ; 705 , 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特别全体会议 ; on special CNT plenum ( 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特别全体会议 ) , 705 ; with Regional Committee of Defense (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防务委员会 ) , 705 ; plans rebellion against Negrín ( 策划反内格林的起义 ) , 706

García Val, Alejandro ( 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 ) , 运输委员会主任 , 第五团的共产党人指挥官 : on vehicle theft by regiment ( 关于第五团盗取运输工具 ) , 259 ; appointed to war ministry ( 被安排到国防部 ) , 274 ; ousted by Prieto ( 被普列托撤职 ) , 544

García Valdecasas, Dr. José María ( 何塞·马利亚·加西亚·巴尔德卡萨斯博士 ) ,

内格林的助手：delivers message to POUM trial officials ( 向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官员传递信息 ) ， 519 ; and alleged Soviet offer to Negrín ( 与所谓苏联给内格林的建议 ) ， 671—672

Garijo, Lieutenant Colonel Antonio ( 安东尼奥·加里霍中校 ) ， 中路军军官：suspected of spying ( 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 ， 714 ; meets with Franco' s representatives ( 与佛朗哥的代表会谈 ) ， 740—741

Garrido González, Luis ( 路易斯·加里多·冈萨雷斯 ) ， 历史学家：on rural collectivization in Jaén ( 论哈恩省的农村集体化运动 ) ， 63

Garvin, J.L. ( J.L.加文 ) ， 英国保守报纸《观察家报》编辑：proposes maintaining Anglo—German ties ( 建议保持英德合作关系 ) ， 175—176 ， 第十六章注释53 ; on British objection to treaties with Soviets ( 论英国反对与苏联签订条约 ) ， 177

Gassol, Ventura ( 本图拉·加索尔 ) ，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文化专员：aids right—wing escapees ( 帮助右翼人士逃走 ) ， 391 ; named Catalan councilor of culture (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文化专员 ) ， 402

Gates, John ( 约翰·盖茨 ) ， 前共产党人，国际纵队第十五旅第一政委：on Togliatti' s leadership ( 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领导地位 ) ， 133

Gaykis, Leon ( 列昂·盖基斯 ) ， 苏联代办，后来担任大使：ignored by Orlov ( 奥尔洛夫避而不谈盖基斯 ) ， 319 ; Vadalí on ( 维达利论盖基斯 ) ， 319 ; at politburo meeting on Caballero ouster ( 出席研究推翻卡瓦列罗的政治局会议 ) ， 361 ， 362 ; fears during commissariat crisis ( 总政治部危

机期间的担忧) , 374 ; and Prieto on PSOE—PCE fusion ( 与普列托谈论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 ) , 383 , 535 ; and alleged plot to assassinate Prieto ( 与所谓暗杀普列托的阴谋 ) , 549

Geddes, Sir Auckland ( 奥克兰·格迪斯爵士 ) , 英资力拓矿业公司董事长 : on workers imprison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 关于因政治原因坐牢的工人 ) , 7

Gelsa ( Aragon front ) ( 阿拉贡前线的赫尔萨 ) : desertions protest militarization ( 抗议军事化而前线 ) , 420

General Commissariat of War ( 国防部总政治部 ) : influence of Communists in ( 共产党在总政治部中的势力 ) , 274 , 371—372 ; Caballero orders curbs on ( 卡瓦列罗签署行政命令 , 限制其权力 ) , 373 ; Adelante on dangers of propaganda in ( 《前进报》论其宣传的危害性 ) , 374。另见 Political commissars

Generalitat ( Catalan parliament and executive council ) ( 由议会和行政会议组成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 ) : Esquerra ( ERC ) dominates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处于支配地位 ) , 388 ; Companys elected president of ( 孔帕尼斯当选自治政府主席 ) , 389 ; repression of CNT—FAI (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压制自治政府 ) , 389—390 ; power remaining to ( 自治政府保留的权力 ) , 394—395 ; agrees to join central war ministry ( 同意服从中央政府国防部的指挥 ) , 419。另见 Governments ( Catalan ) , composition of

GEPCI (加泰罗尼亚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创建的小型工商企业协会: organized by Communists (由共产党人组织成立), 84, 397; joins UGT (加入劳动者总工会), 397; resented by Esquerra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对其不满), 397

German—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deterioration in relations starting Jan.1933 (一九三三年一月德苏关系开始恶化), 88; signing of (签订), 655。另见Kandelaki, David

Germany (德国): western prediction of weakened Germany (西方国家预言德国将被严重削弱), 91, 93; appeasement of (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 92; British motives in signing naval pact with (英国与德国签订海军协定的目的), 95—96; reintroduces conscription (重新开始征兵), 96; reacts to Western European—Soviet alliance (对西欧与苏联结盟作出反应), 97; intervenes on the side of Spanish military (站在叛军一方干涉西班牙), 97—98, 第九章注释2; objectsives on aiding rebellion (援助叛军的目的), 98, 102—103; encourages Italy' s intervention (鼓励意大利进行干涉), 102—103; on Stalin' s goal of reaching a pact with (关于斯大林与德国签订一项条约的目标), 104—105; fires French fears of Soviet takeover (为法国对苏联介入的担忧火上浇油), 172

Ger·埃尔诺), 化名佩德罗, 共产国际代表: urges PSUC to seek British aid (催促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寻求英国援助), 180; suggests offer of Spanish Morocco and Canary Islands (建议转让西属摩洛哥和加那利群岛), 181; at politburo meeting on Caballero ouster (出席研究推翻卡瓦列罗的

政治局会议) , 361 , 362 ; as Comorera' s adviser and PSUC director ( 作为科莫雷拉的顾问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指挥者 ) , 400—401 ; monitors Antonov—Ovseenko ( 监视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 ) , 401 , 第三十九章注释33 ; on Negrín as Caballero successor ( 论内格林接替卡瓦列罗 ) , 476 ; advises Hungarian Communists after World War II ( 二战后为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出谋划策 ) , 551 ; on conspiracy against Prieto ( 关于针对普列托的阴谋 ) , 573

Gil, Lieutenant Colonel Rodrigo ( 罗德里戈·希尔中校 ) , 炮兵营营长 : distributes arms to Madrid workers ( 给马德里工人分发武器 ) , 39 ; replaced by Asensio ( 被阿森西奥取代 ) , 282

Gil Robles, JoséMaría ( 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 ) , 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领导人 : on necessity of social character for CEDA ( 论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必须扮演某种社会角色 ) , 4 ; Alcalá—Zamora' s distrust of ( 阿尔卡拉—萨莫拉不信任希尔·罗夫莱斯 ) , 8 ; joins Radical cabinet ( 加入激进党内阁 ) , 8 ; respect for democratic methods ( 尊重民主方式 ) , 8 , 第一章注释79 ; on “conquest of a new state” ( 论 “征服一个新的国家” ) , 8 ; Socialists' suspicion of ( 社会党人怀疑希尔·罗夫莱斯 ) , 8—9 ; on measures to be applied during elections ( 论大选期间应当采取的措施 ) , 11 ; on CEDA desertions to the right ( 论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转投右翼组织 ) , 16—17 , 第一章注释76 ; refuses to seize power with military help ( 拒绝依靠军队的帮助夺取政权 ) , 17—19 ; on inevitability of dictatorship ( 论独裁的不可避免 ) , 18 ; allegedly participates in military conspiracy ( 据说参与了军事叛乱的阴谋 ) , 18—19 ; political

eclipse of ( 在政坛失势 ) , 19 ; makes plans for a government of "national concentration" ( 打算组建一个 "民族团结" 政府 ) , 31 ; rejects CEDA participation in a Prieto government ( 拒绝让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参加一个普列托组阁的政府 ) , 31 ; on Aza ; and Calvo Sotelo ( 与卡尔沃·索特洛 ) , 37 ; disbelief in possibility of Communist uprising ( 不相信共产党暴动的可能性 ) , 99 ; on purchase of war material from Italy ( 论从意大利购买战争物资 ) , 101—102。另见CEDA

Gil Roldán, Angel G. ( 安赫尔·G.希尔·罗尔丹 ) , 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 in war ministry ( 在国防部任职 ) , 第二十八章注释30

Gilabert, Alejandro ( 亚历杭德罗·希拉韦特 ) ,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 , 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书记 : on FAI' s new "mass" organization ( 论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新型 "群众" 组织 ) , 485

Gilbert, Mattin ( 马丁·吉尔伯特 ) , 英国历史学家 : on Lothian' s pro—Nazi goal for Britain ( 论洛西恩为英国设想的亲纳粹目标 ) , 第八章注释16 ; on Hitler' s persuasion of British officials ( 论希特勒说服英国官员 ) , 174 ; on British treaty obligations to Poland ( 论英国对波兰的条约义务 ) , 658

Giménez Fernández, Manuel ( 曼努埃尔·希门尼斯·费尔南德斯 ) , 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自由派成员 : plans for government of "national concentration" ( 打算组建 "民族团结" 政府 ) , 31

Giner de los Rios, Bernardo ( 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 ) , 共和联盟领导人 , 通讯部长 : becomes 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s and merchant marina ( 20 July ) ( 七月二十日成为通讯和商业海运部长 ) 47 ; named Caballero communications minister ( 被任命为通讯部长 ) , 122 , 203 ; named Negrín public works minister ( 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的公共工程部长 ) , 483 ; allegedly intercepts UGT correspondence ( 据说截取寄往劳动者总工会的信件 ) , 560 ; named communica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minister , Negrín' s second government ( 被任命为第二届内格林政府的通讯和交通部长 ) , 585 ; named to cabinet of 17 Aug. ( 被任命为八月十七日内阁成员 ) , 618 ; asks Casado to accept transfer of power ( 请求卡萨多接受移交权力 ) , 729

Giral, Francisco ( 弗朗西斯科·希拉尔 ) , 何塞·希拉尔的儿子 : on Soviet support of Caballero ( 论苏联支持卡瓦列罗 ) , 第十一章注释26

Giral, José ( 何塞·希拉尔 ) , 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 总理 , 不管部长 : as premier , promises arms distribution ( 作为总理答应发放武器 ) , 46 ; commended by Aza ( 受到阿萨尼亚的称赞 ) , 47 ; sets up Popular Tribunals ( 设立人民法庭 ) , 50 ; as Aza' s minister , remains in Spain ( 留在西班牙的阿萨尼亚政府部长 ) , 52 ; powerlessness of government of ( 希拉尔政府有名无实 ) , 53 , 216 ; government of as seen by Western powers ( 希拉尔政府作为西方国家看得见的政府 ) , 115—116 ; Communists' support of government of ( 共产党人支持希拉尔政府 ) , 116—117 , 119—120 ; invites Popular Front to join ( 邀请人民阵线的其他党派加入政府 ) , 120 ; minister in Caballero government ( 在卡瓦列罗政府中担

任部长) , 122 , 203 ; and Communist views ( 与共产党人的观点 ) , 126 , 160 ; approves gold export decrees ( 批准出口黄金的秘密法令 ) , 第十四章注释14 ; and French promise of aid ( 与法国答应提供援助 ) , 176 ; reorganizes Civil Guard ( 重新组建国民卫队 ) , 216 ; plans to take over collectivized industries ( 打算接管集体化的工业企业 ) , 222—223 ; fails to enforce draft ( 没有强制征兵 ) , 250 ; supports Aza ; and Miaja' s refusal of war minister post ( 与米亚哈拒绝担任国防部长 ) , 292 ; tells Aza<sup>464</sup> ; on Negrín as premier ( 关于内格林任总理 ) , 474 ; is named Negrín minister ( 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的部长 ) , 483 , 488 , 585 , 619 ; unaware of Communist control of Foreign Press Bureau ( 不知道共产党控制了对外新闻司 ) , 501 ; names de la Mora chief of Foreign Press Bureau ( 任命德拉·莫拉为对外新闻司司长 ) , 539—540 ; member Higher War Council ( 战时高级委员会成员 ) , 542 ; supports negotiated settlement ( 赞成通过谈判结束内战 ) , 577 , 627 ; on anti—Communist feeling in Madrid ( 论马德里的反共气氛 ) , 629 , 687 ; remains in France ( 留在法国 ) , 685

Goddard, Colonel R.V. ( R.V.戈达德上校 ) , 英国空军军官 : allegedly receives offer of Spanish locations from Prieto ( 据说收到普列托提出的转让西班牙战略要地的建议 ) , 545

Goded, Genaral Manuel ( 曼努埃尔·戈代德将军 ) , 叛军将领 : transferred to the Balearic Islands ( 被调到巴利阿里群岛 ) , 12 , 35 ; one of four active service generals to join uprising ( 参加叛乱的四位现役将军之一 ) , 48 ; surrenders ( 投降 ) , 386—387 , 第三十八章注释6



Goering, Hermann ( 赫尔曼·戈林 ) , 希特勒的空军头子 : on German aid to military rebellion ( 论德国对军事叛乱的援助 ) , 97—98

Goicoechea, Antonio ( 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 ) , 君主主义的西班牙复兴运动领导人 : plans coup d' état ( 1934 ) ( 一九三四年打算发动军事政变 ) , 11 ; takes draft of "Rome agreement" to Madrid ( 把 "罗马协议" 的草稿带回马德里 ) , 11 ; speaks at Calvo Sotelo' s funeral ( 在卡尔沃·索特洛的葬礼上讲话 ) , 38 ; purchases war material in Italy ( 在意大利购买战争物资 ) , 101—102

Goldman, Emma ( 埃玛·戈德曼 ) , 美国无政府主义者 : criticizes CNT entry into government ( 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提出批评 ) , 第十九章注释35 ; on repression of Anarchists ( 论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 ) , 第四十八章注释5 ; on state of Spanish Anarchism ( 论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状况 ) , 625

Golferich, Dr. Bellido ( 贝利多·戈尔费里奇博士 ) , 生理学家 , 内格林的朋友 : appointed head of general commissariat of religion ( 被任命为高级宗教委员会负责人 ) , 644

Gómez, Colonel Juan B. ( 胡安·B. 戈麦斯上校 ) , 墨西哥共产党员军官 : commands Anarchist unit in Regular Army ( 指挥正规军中的无政府主义者部队 ) , 342 ; commits murder ( 进行谋杀 ) , 第四十八章注释25

Gómez, Mariano ( 马里亚诺·戈麦斯 ) , 马德里人民法庭的主审法官 : on commutation of Salazar Alonso' s death sentence ( 论减免萨拉萨尔·阿隆索的死刑 ) , 50 ; on Negrín' s demand for POUM death penalty ( 关于内格林

要求判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死刑) , 518—519

Gómez, Sócrates (苏格拉底·戈麦斯) , 何塞·戈麦斯·奥索里奥的儿子, 社会党左派: protests Communist coup in JSU (抗议共产党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搞政变) , 136 ; named president "Commission of Young Socialists" (担任“青年社会党人委员会”主席) , 632

Gómez, Trifón (特里丰·戈麦斯) , 温和派社会党人, 军需部门负责人: on government collapse (论政府瘫痪) , 691 ; and proposed transfer of power to Casado (与建议向卡萨多移交权力) , 729

Gómez Casas, Juan (胡安·戈麦斯·卡萨斯) , 全国劳工联合会历史学家: on collectives in New Castile (关于新卡斯蒂利亚地区的集体农庄) , 241 ; on Anarchists' capitulation of government (论无政府主义者向政府屈服) , 624 , 625—626

Gómez Sáez, Paulino (保利诺·戈麦斯·赛斯) , 社会党温和派人士, 内格林政府的内政部长: orders press control during POUM trials (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期间下令实行新闻管制) , 518 ; named to Negrín governments (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成员) , 585 , 618 ; influences on (受到的影响) , 606—607 , 608 ; asks Casado to accept transfer of power (请求卡萨多接受移交权力) , 729

González, Valentín (巴伦廷·冈萨雷斯) , 绰号“农夫” , 共产党民兵指挥官: on Togliatti (论陶里亚蒂) , 第十二章注释59 , 134 ; on belief in solidarity with Kremlin (论相信与克里姆林宫的团结) , 188 , 479—480 ;

Gorkin writes articles and books of ( “农夫” 的文章和书是戈尔金代写的 ) , 第十七章注释48 ; brutality of ( “农夫” 的暴行 ) , 第十七章注释48 ; Prieto hostile towards ( 普列托对其怀有敌意 ) , 545 ; and PCE ties to Anarchists ( 和西班牙共产党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关系 ) , 553 ; on Communist plans to discredit Prieto ( 论共产党人打算使普列托名誉扫地 ) , 572—573 ; on anti—Communist feeling during second Negrín government ( 论第二届内格林政府时期的反共气氛 ) , 632—633

González Inestal, Miguel ( 米格尔·冈萨雷斯·伊内斯塔 ) ,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全国委员会委员 , 历史学家 : on Anarchist fears of militarization ( 论无政府主义者对军事化的担忧 ) , 329—330

González Marín, Manuel ( 曼努埃尔·冈萨雷斯·马林 ) , 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 : named transport delegate , Madrid Delegate Defense Council ( 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运输代表 ) , 296 ; fails to promote POUM in Madrid junta ( 没有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说话 ) , 298 ; clashes with Cazorla ( Apr.1937 ) ( 一九三七年四月与卡索拉发生冲突 ) , 299 ; with CNT Regional Committee of Defense (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防务委员会 ) , 705 ; named finance and economy minister ( 被任命为卡萨多委员会的财政和经济部长 ) , 726

González Pe·冈萨雷斯·培尼亚 ) , 社会党主席 , 普列托的支持者 : leads miners ( 矿工领袖 ) , 25 ; courted by Communists ( 共产党人向其示好 ) , 384 ; Prieto' s influence on ( 普列托对他的影响力 ) , 470 ; alleges Negrín asks death penalty for POUM leaders ( 据说内格林要求他判处马克思主义统

—工人党领导人死刑) , 519 ; elected national UGT president ( 被选为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 , 558 , 567 ; supports Negrín' s dismissal of Prieto ( 支持内格林将普列托撤职 ) , 581 ; named minister Negrín governments ( 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的部长 ) , 585—586 , 618 ; on Spaniards' return to Spain ( 论回国的西班牙人 ) , 692

González Quintana, Antonio ( 安东尼奥·冈萨雷斯·金塔纳 ) , 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工作人员 : on Caballero memoirs ( 关于卡瓦列罗的回忆录 ) , 第四十五章注释19

Gonzalo, Colonel Luis ( 路易斯·贡萨洛上校 ) , 佛朗哥的代表 : meets with Casado' s representatives ( 与卡萨多的代表谈判 ) , 740—741

Gordón Ordás, Félix ( 费利克斯·戈东·奥尔达斯 ) , 共和联盟领导人 : needs cash for authorized arms purchases ( 受托购买武器需要现金支付 ) , 145—146

Gorev, Vladimir ( 弗拉基米尔·戈列夫 ) , 苏联大使馆武官 : arrives in Spain as adviser ( 作为军事顾问来到西班牙 ) , 277 ; association with Rojo ( 与罗霍合作 ) , 300 ; allegedly removed Kléber ( 据说建议调走克莱贝尔 ) , 304 ; and defense of Madrid ( 与马德里保卫战 ) , 306 ; Fischer , Vidali , Ehrenburg , and Rojo on ( 费希尔、维达利、爱伦堡和罗霍论戈列夫 ) , 306 ; ignored by Koltzov ( 科利佐夫不提戈列夫 ) , 306 , 第三十一章注释4 ; not Ian K. Berzin ( 与扬·K. 别尔津不是同一个人 ) , 307 ; soviet officers assisting ( 苏联军官协助戈列夫 ) , 307 ; perishes in Stalin purge ( 被斯大林清洗 ) , 308 , 310 , 311 ; Orlov on ( 奥尔洛夫论戈列夫 ) , 311 ; Caballero

objects to his accompanying Uribe in north ( 卡瓦列罗反对委派乌里韦与戈列夫一同前往北部前线 ) , 375

Gorkin ( 戈尔金 ) , 苏联红军工程师 : Regler describes farewell party of ( 雷格勒对其欢送会的描述 ) , 313

Gorkin, Julián ( Julián Gómez ) ( 胡利安·戈尔金 , 即胡利安·戈麦斯 )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成员 , 《战斗报》负责人 : author of El Campesino' s writings ( “ 农夫 ” 文章著作的作者 ) , 第十七章注释48 ; on Spain as testing ground for Soviets ( 论西班牙作为苏联的试验场 ) , 314 ; on Togliatti' s altering dates of presence in Spain ( 论捉摸不定的陶里亚蒂出现在西班牙的日期 ) , 364—365 ; PSUC attacks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攻击戈尔金 ) , 409 ; on POUM in May events ( 论五月事变中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 433—434 ; on Lérida siege ( 关于包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莱里达地方总部 ) , 452 ; on Stalin' s repression of POUM ( 论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镇压 ) , 503—504 ; on Nin' s execution ( 关于处决安德烈斯·宁 ) , 506 ; on PCE' s efforts to influence POUM trial ( 论西班牙共产党企图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审判 ) , 517 ; on Negrín' s demand for POUM death penalty ( 关于内格林要求判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死刑 ) , 518—519 ; receives prison sentence ( 被判刑 ) , 520

Gott, Richard ( 理查德·戈特 ) , 英国作家和历史学家 : on British treaty obligations to Poland ( 论英国对波兰的条约义务 ) , 658

Governments ( Catalan ) , composition of (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组成 ) : Sept.1936 ( 一九三六年九月 ) , 402—403 ; Dec.1936 (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 ,

412 ; interim cabinet ( 3 Apr.1937 ) ( 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的临时内阁 ) , 421—422 ; Apr.1937 ( 一九三七年四月 ) , 423—424 ; four—m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 May 1937 ) ( 一九三七年五月的四人临时政府 ) 451 ; June 1937 ( 一九三七年六月 ) , 495

Government ( central ) , composition of ( 中央政府的组成 ) : Giral cabinet ( 20 July 1936 ) (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的希拉尔内阁 ) , 46—47 ; Caballero cabinet ( 4 Sept.1936 ) ( 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的卡瓦列罗内阁 ) , 122 ; Caballero adds CNT ministers ( 3 Nov.1936 ) (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增加了全国劳工联合会部长的卡瓦列罗内阁 ) , 203 ; Negrín cabinet ( 17 May 1937 ) (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的内格林内阁 ) , 483 ; second Negrín government ( 5 Apr.1938 ) ( 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的第二届内格林政府 ) , 585 ; Negrín cabinet ( 17 Aug.1938 ) (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七日的内格林内阁 ) , 618—619

GPU (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 ) 。见NKVD

Gracia, Anastasio de ( 安纳斯塔西奥·德·格拉西亚 ) , 社会党温和派人士 , 普列托的支持者 , 劳工部长 : named minister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 被任命为工商部长 ) , 122 ; named Caballero labor minister ( 被任命为卡瓦列罗政府的劳工部长 ) , 203 ; courted by Communists ( 共产党人向其示好 ) , 384 ; announces resignation of Socialiat ministers ( 宣布社会党温和派政府部长辞职 ) , 470 ; opposes Socialist—Communist merger ( 反对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 ) , 537

Grandos, Mariano ( 马里亚诺·格兰多斯 ) , 内格林的最高法院成员 : creates

Tribunales de Guardia ( 设立特别安保法庭 ) , 514

Granollers ( 格拉诺列尔斯 ) : brickmaking industries centralized in ( 制砖业被集中起来 ) , 59

Graus ( 格劳斯村 ) : Anarchist—run economic system in ( 无政府主义者在格劳斯村实行的经济制度 ) , 69—70

Great Britain ( 英国 ) : on threat of war with Germany ( 关于与德国打仗的威胁 ) , 91 ; USSR hopes to conclude alliance with ( 苏联希望与英国结盟 ) , 95 ; supports German rearmament and conscription ( 1935 ) ( 一九三五年支持德国重整军备和征兵 ) , 95 ; fears Bolshevization ( 担心布尔什维化 ) , 107 , 171 , 176 ; Communists campaign for Popular Front in ( 共产党人在英国为人民阵线宣传造势 ) , 110 ; noninterventionism of ( 英国的不干涉主义 ) , 110 , 172—173 , 187 , 483 , 575 , 650—661 ; refuses to support French action against Germany ( 拒不支持法国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 ) , 第十六章注释21 ; against Franco—Soviet pact ( 反对法苏条约 ) , 177 , 180 ; “excludes” some state documents ( “隐匿” 某些政府文件 ) , 第十七章注释33和注释36 ; hopes to profit from German—Soviet struggle ( 希望从德国与苏联的争斗中获益 ) , 187 ; recognizes Franco ( 承认佛朗哥政权 ) , 698 , 700 , 720。另见Chamberlain, Arthur Neville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 ( 苏联大百科全书 ) : second edition deletes reference to Koltzov ( 第二版删去科利佐夫的条目 ) , 308 ; on date of Berzin' s death ( 关于别尔津死亡的日期 ) , 310

Grey, C.G. ( C.G.格雷 ) , 《飞机》杂志编辑 : pro—german leanings of ( 亲德倾向 ) , 92

Griffiths, Richard ( 理查德·格里菲思 ) , 历史学家 : on pro—german declarations of C.G.Grey ( 论C.G.格雷的亲德言论 ) , 92

Grigorovich, General ( 格里戈罗维奇将军 ) 。见Shtern, Gregoriy M.

Grinko, G.F. ( Г.Ф.格林科 ) ,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 : signs receipt for Cartagena Shipment ( 签收卡塔赫纳运到莫斯科的黄金 ) , 147 ; executed ( 15 Mar.1938 ) (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被处决 ) , 153

Grishin, General ( 格里申将军 ) 。见Berzin, General Ian K.

Guarner, Colonel Vicente ( 比森特·瓜内尔上校 )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 巴塞罗那警察局局长 : describes revolutionary excitement ( 描述革命者的兴高采烈 ) , 387 ; on maintaining Catalan government ( 论维持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 ) , 390

Guérin, Daniel ( 达尼埃尔·介朗 ) , 革命社会党国际协调局代表团的法国成员 : on workers' self—management ( 论工人的自我管理 ) , 225 ; visits Spain in defense of POUM ( 为保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访问西班牙 ) , 505

Guitián, Manuel ( 曼努埃尔·吉蒂安 ) , 宪兵情报局特工 : visits Casado ( 会见卡萨多 ) , 707—708

Gurri ( 古里 ) , 裁剪同业协会会长 : antilabor tendencies of ( 敌视工人的倾向 ) , 84



Gúzman, Eduardo de ( 爱德华多·德·古斯曼 ) ,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记者 :  
describes International Brigade march on Madrid ( 描述国际纵队开进马  
德里的场面 ) , 287—288 ; on Edgar André Battalion ( 论埃德加·安德烈营 ) ,  
288 ; on Commune de Paris Battalion ( 论巴黎公社营 ) , 288

Hager, Kurt ( 库尔特·哈格尔 ) , 化名费利克斯·阿尔文 , 德国共产党人 , 马德里广  
播电台负责人 : 296

Halifax, Lord ( 哈利法克斯勋爵 ) , 英国外交大臣 : writes preface to  
pamphlet by Lord Lloyd ( 为劳埃德勋爵的小册子作序 ) , 94 ; warns Germany  
of dangers of European war ( 就欧洲爆发战争的危险警告德国 ) , 171 ; pro—  
German stance ( 亲德姿态 ) , 174 , 第十六章注释32 , 651—654 , 657 ; in  
Chamberlain' s "Inner Cabinet" ( 张伯伦的 "内阁决策委员会" 成员 ) , 187

Hankey, Sir Maurice ( 莫里斯·汉基爵士 ) , 英国官员 : on shift toward ties  
with Germany and Italy ( 论改变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 ) , 175

Harvey, Oliver ( 奥利弗·哈维 ) , 艾登和哈利法克斯的秘书 : on  
Conservatives' fear of Communist takeover ( 论保守党人对共产党人统治世  
界的担忧 ) , 173 ; and British pressure on French not to aid  
Czechoslovakia and Barcelona ( 与英国向法国施加压力逼迫其不要援助捷克斯  
洛伐克和巴塞罗那 ) , 第十六章注释61 ; on Negrín' s peace offer to  
Franco ( 关于内格林向佛朗哥提出的和平建议 ) , 697—698

Hassell, Ulrich von ( 乌尔里希·冯·哈塞尔 ) , 德国驻罗马大使 : on Italian  
and German interests in Spain ( 论意大利和德国在西班牙的利益 ) , 102—103

Hemingway, Ernest ( 欧内斯特·海明威 ) , 美国记者和小说家 : Mamsurov and ( 马姆苏罗夫与海明威 ) , 313 , 第三十一章注释60 ; Regler and ( 雷格勒与海明威 ) , 314 ; as correspondent and novelist ( 作为记者和小说家 ) , 第三十一章注释64

Henderson, Sir Neville ( 内维尔·亨德森爵士 ) , 英国驻德国大使 : Halifax urges to inform Germany of war danger ( 哈利法克斯要求他就战争的危险警告德国 ) , 171 ; and appeasement policy ( 与绥靖政策 ) , 652—654

Henry, Jules ( 朱尔·亨利 ) , 法国驻西班牙大使 : and Negrín' s peace proposals ( 与内格林的和平建议 ) , 697

Heraldo de Aragón ( 《阿拉贡信使报》 ) , 民族主义报纸 : 123

Hernández, Jesús (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 ) ,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 教育和艺术部长 , 战后被开除出党 : accuses CLUEA of plundering peasants ( 指责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掠夺农民 ) , 第七章注释26 ; declares support of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 宣称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 112 ; on pressure on Communists to join Caballero government ( 关于为使共产党人加入卡瓦列罗政府而对其施加的压力 ) , 121 ; named minister of education and fine arts ( 被任命为教育和艺术部长 ) , 122 ; on Communists' use of internal Socialist dissension ( 论共产党人利用社会党的内部纠纷 ) , 129—130 ; Rosal on ( 罗萨尔论埃尔南德斯 ) , 第十二章注释23 ; on Communists' use of Negrín ( 论共产党人利用内格林 ) , 142 ; says Soviets behind Spanish Morocco offer ( 声称苏联支持关于西属摩洛哥的建议 ) , 181 ; on "denationalization" of Spanish Communists ( 论西班牙共产党人

的“非西班牙化” ) , 187 ; urges establishment of Popular Army ( 敦促建立人民军 ) , 272—273 ; on Communist activity in military units ( 论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活动 ) , 275—276 ; on Miaja' s links with Communists ( 论米亚哈与共产党人的关系 ) , 294 ; on Kulik ( 论库利克 ) , 316 ; and Caballero ouster ( 与推翻卡瓦列罗 ) , 361—366 , 465 ; erroneously describes Orlov ( 对奥尔洛夫描述错误 ) , 363 ; on Togliatti' s presence in Spain ( 关于陶里亚蒂出现在西班牙的时间 ) , 364 ; on own bad faith ( 365—366 ) , 论自己的表里不一 ; demands resignation of Martínez Cabrera ( 要求马丁内斯·卡夫雷拉辞职 ) , 366 ; designated for military missions ( 被委派执行军事任务 ) , 375 ; represents government in Madrid ( 担任政府在马德里的代表 ) , 375 ; on Barcelona rising as excuse for cabinet crisis ( 论巴塞罗那暴动成为制造内阁危机的借口 ) , 465 ; favors Extremadura offensive ( 支持发动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 ) , 468 ; tells Negrín of Communist goals ( 告诉内格林共产党的目标 ) , 477—478 ; on Prieto as proposed defense minister ( 论普列托作为国防部长候选人 ) , 478 ; is named Negrín education and health minister ( 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的教育和卫生部长 ) , 483 ; on Nin' s disappearance ( 关于宁的失踪 ) , 506 , 509—510 ; on POUM trial ( 论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 520 ; and Prieto ( 与普列托 ) , 535 , 572 , 575 , 581 ; protests Antón' s demotion ( 反对将安东降职 ) , 542 ; alleges Orlov plot ( 声称奥尔洛夫阴谋暗杀普列托 ) , 549 ; on secret of Communist strength ( 论共产党强大的秘密 ) , 550—551 , 552 ; conflicting allegiances of ( 相互矛盾的忠诚 ) , 574 ; opposes withdrawal of Communist ministers ( 反对撤出政府中的共产党人部长 ) , 582 ; withdrawal from government ( 退出政府 ) , 582 ; named chief

political commissar central—southern region ( 被任命为中南部地区集团军第一政委 ) , 586 , 686 ; on PCE influence in military ( 论西班牙共产党在军事上的影响力 ) , 594 ; on Orlov' s control of SIM ( 论奥尔洛夫对军事调查局的控制 ) , 600 ; on government collapse ( 论政府瘫痪 ) , 691 ; on Negrín' s acting for PCE ( 论内格林作为西班牙共产党的代理人 ) , 722—723 ; meets with Togliatti and La Pasionaria ( 与陶里亚蒂和热情之花谈话 ) , 723—725 ; and Manuïlski on Togliatti' s role ( 与马努伊尔斯基对陶里亚蒂作用的评论 ) , 730

Hernández Sarabia, General Juan ( 胡安·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将军 ) , 共和派将领 , 国防部长 : replaces Castellóas Giral minister of war ( 接替加斯特略担任希拉尔政府的国防部长 ) , 47 ; supports Azaon UGT as war bureau ( 关于劳动者总工会成为国防部的情报部门 ) , 259 ;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 , 688

Hernández Zancajo, Carlos ( 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 ) , 社会党左派领导人 , 卡瓦列罗的支持者 : designated to go to Barcelona ( 被派往巴塞罗那 ) , 436

Hernando Solana, Manuel ( 曼努埃尔·埃尔南多·索拉纳 ) , 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法官 : allegedly suggests prosecuting those pressuring judiciary ( 据说建议起诉那些向法官施加压力的人 ) , 519

Herrera, Pedro ( 佩德罗·埃雷拉 ) , 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 : Catalan health and public assistance councillor (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卫生与公共救助专员 ) , 412 ; at libertarian plenum ( Oct.1938 ) ( 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的

自由主义运动大会上) , 625 ; defends Anarchist precepts ( 为无政府主义的信条辩护 ) , 626

Herrick, William ( 威廉·赫里克 ) , 美国作家 , 国际纵队第十五旅成员 : on Communists in Spain ( 论共产党人在西班牙 ) , 289

Hidalgo de Cisneros, Ignacio ( 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 ) , 共产党员 , 空军司令 : attempts to warn of uprising ( 试图提醒总理和总统军事叛乱迫在眉睫 ) , 第三章注释2 ; on Miaja' s refusal to arm UGT ( 论米亚哈拒绝向劳动者总工会提供武器 ) , 39 ; confirms late arrival of Soviet aid ( 证实苏联的援助姗姗来迟 ) , 107 ; on Aza' s fear of capture by fascists ( 论阿萨尼亚担心被法西斯军队俘虏 ) , 164 ; on Miaja' s party membership ( 关于米亚哈的共产党员身份 ) , 294 ; and Smushkevich ( 与斯穆什克维奇 ) , 307 ; on Soviet advisers ( 论苏联顾问 ) , 315 ; on Prieto' s relations with Soviets ( 论普列托与苏联人的关系 ) , 383 ; on relations between Prieto and Caballero ( 论普列托和卡瓦列罗之间的关系 ) , 383 ; commands aviation in Barcelona ( 指挥巴塞罗那的空军 ) , 438 ; joins Communists ( 加入共产党 ) , 536 ; on Rojo' s clash with Prieto ( 论罗霍与普列托的冲突 ) , 545 ; on Prieto' s pessimism ( 论普列托的悲观主义 ) , 573 ; requests military aid in Moscow ( 去莫斯科要求军事援助 ) , 672—675 ; alleges arrival of Soviet war material ( 声称苏联战争物资运到 ) , 674 ; against further resistance ( 反对继续进行抵抗 ) , 686 ; on Spaniards' return from France ( 论从法国返回的西班牙人 ) , 689 ; on Casado' s negotiations with Franco ( 关于卡萨多与佛朗哥的谈判 ) , 709—710 ; asks Casado to accept transfer of power ( 请求卡萨多接受移交权

力) , 729 ; on Communists' departure from Spain ( 关于共产党人离开西班牙的情况 ) , 735—736

Higher War Council ( 战时高级委员会 ) : establishment of ( 设立 ) , 324 ; dissension within ( 委员会内部意见分歧 ) , 324—325 ; and replacement of Martínez Cabrera ( 与撤换马丁内斯·卡夫雷拉 ) , 366 ; designates Communist ministers for military missions ( 委派共产党人政府部长执行军事任务 ) , 375 ; composition of after Caballero ( 卡瓦列罗下台后的人员组成 ) , 542

Hilger, Gustav ( 古斯塔夫·希尔格 ) , 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 : on Stalin' s plan to stay aloof from Western conflict ( 论斯大林打算对西方的冲突袖手旁观 ) , 169

Hitler, Adolf ( 阿道夫·希特勒 ) : rise to power worsens German—Soviet relations ( 希特勒上台使德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 ) , 88 ; aid to Spain ( 援助西班牙 ) , 97—98 , 101 , 103 ; Stalin' s desire to forge pact with ( 斯大林希望与希特勒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 , 105—107 , 654—656 ; Krivitsky on ( 克里维茨基论希特勒 ) , 106—107 ; as self—named crusader against communism ( 自命反共十字军 ) , 173 ; goals in Spain ( 在西班牙的目标 ) , 571—572 ; occupies Austria ( 占领奥地利 ) , 572 ; and Halifax on appeasement ( 哈利法克斯对绥靖主义的论述与希特勒 ) , 651—654 ; disregards Wilson' s proposals ( 对威尔逊的建议置之不理 ) , 660

Hitler—Stalin pact ( 希特勒—斯大林条约 ) 。见 German—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

Hoare, Sir Samuel (Viscount Templewood) (塞繆尔·霍尔爵士, 坦普尔伍德子爵), 鲍德温和张伯伦政府的核心成员: on British fear of Russia (论英国对苏联的担忧), 92, 175; on lost opportunity to stop Hitler (论失去遏制希特勒的机会), 第十六章注释21; in Chamberlain's "Inner Cabinet" (张伯伦的“内阁决策委员会”成员), 187, 652; and Negrín in England (与在英国的内格林), 590; and appeasement policy (与绥靖政策), 652

Hospitalet (near Barcelona) (巴塞罗那附近的奥斯皮塔莱特): as Anarchist stronghold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堡垒), 395

Hossbach,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 希特勒的上校副官: records Hitler's plans for war in Spain (记录希特勒在西班牙的战争计划), 104

Huesca (韦斯卡): Gregorio de Benito leads rising in (格雷戈里奥·德·贝尼托在韦斯卡指挥叛乱), 43

La Humanitat (《人道报》),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喉舌: 391, 410, 426

Hungary (匈牙利): postwar Communist tactics used in (二战后共产党在匈牙利采用的策略), 551

Iakushin, M. (M. 亚库申), 苏联军官: 312

Ibárruri, Dolores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 别名“热情之花”,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on destruction of Republican state apparatus (论共和国的国家机器遭到破坏), 48; defines events as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 将社会变革解释成为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 87 ; on goals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 ( 1933 ) ( 一九三三年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 ) , 88 ; speeches written by Togliatti ( 陶里亚蒂为其写演讲稿 ) , 133 ; weakness before comintern advisers ( 不如共产国际顾问之处 ) , 134 ; on Togliatti ( 论陶里亚蒂 ) , 第十二章注释68 ; ignores Kléber in memoirs ( 在回忆录中不提克莱贝尔 ) , 305 ; and Caballero ouster ( 与推翻卡瓦列罗 ) , 361—362 ; defends political commissars ( 为政治委员辩护 ) , 373 ; on halt of Anarchist march on Barcelona ( 关于阻止无政府主义民兵向巴塞罗那进军 ) , 452 ; on Communist proselytizing ( 论共产党鼓动人们改变政治信仰 ) , 541 ; on Prieto and political commissars ( 论普列托与政治委员 ) , 541—542 , 545 ; invites links with CNT ( 要求与全国劳工联合会联系 ) , 553 ; praises government handling of Caballero ( 称赞政府控制卡瓦列罗的做法 ) , 563 ; and Prieto' s ouster ( 与罢免普列托 ) , 576 ; on Communist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 ( 论共产党人参加政府 ) , 586 ; on PCE' s role in averting crisis ( Aug.1938 ) ( 论西班牙共产党在避免一九三八年八月的政府危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 , 616 ; on dissension on the left ( 论左派阵营的分歧 ) , 630 ; on outcome of European war ( 论欧洲战争的后果 ) , 648—649 ; on PCE plans for postwar era ( 论西班牙共产党战后的打算 ) , 672 ; on Negrín ( 论内格林 ) , 677 , 716—718 , 720 , 733 ; in south—central zone ( 在中南部地区 ) , 687 ; on PCE' s departure for El Palmar ( 论西班牙共产党撤往埃尔帕尔马 ) , 695 ; meets with Togliatti and Hernández ( 和陶里亚蒂一起与埃尔南德斯谈话 ) , 723—725 ; leaves Spain ( 离开西班牙 ) , 732 , 733



Ideas (《思想报》), 无政府主义报纸: 523

Iglesias, Ignacio (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 on Maurín's importance (论毛林的重要性), 405—406; on PCE's role in Nin's death (论西班牙共产党在杀害宁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507—508; on alleged arrival of Soviet war material (论据称运到西班牙的苏联战争物资), 674

Ignotus, Paul (伊尼奥塔斯·保罗), 匈牙利自由主义作家: on Communist "salami tactics" (论共产党的“萨拉米香肠战术”), 551

I·伊尼戈), 无政府主义青年联盟成员, 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战争工业代表: 296

Inskip, Sir Thomas (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 张伯伦的国防协调大臣: says only Russia would benefit from war (认为只有苏联将从战争中获益), 170

Institute of Agrarian Reform (土地改革协会): deprived of funds by center—right coalition (中—右联合政府使其失去了资金支持), 3; "legalizes" land seizures (使没收土地“合法化”), 6, 55, 62; claims aid provided to collective farms (宣称向集体农庄提供帮助), 242; Cardona Rosell on (卡多纳·罗塞利论土地改革协会), 242

International Brigades (国际纵队): led by Emolio Kléber (由埃米利奥·克莱贝尔指挥), 106; first activities of (最初的行动), 108; organized by Fifth Regiment officers (由第五团的军官组织), 270; and Madrid defense (与马德里保卫战), 283, 288; removal of Kléber (Jan.1937) (一九三七年一月将克莱贝尔调走), 304; Spanish Communists and (西班牙共

产党人与国际纵队) , 第三十章注释128 ; as model of efficiency ( 战斗力的榜样 ) , 316 , 第三十一章注释76 , 328 ; CNT' s resentment of ( 全国劳工联合会  
对国际纵队不满 ) , 第三十二章注释27 ; during Aragon offensive ( 阿拉贡攻势  
期间的国际纵队 ) , 570—571。另见Eleventh International Brigade ;  
Twelfth International Brigade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Unity ( 革命社会党国际  
协调局 ) : campaigns for open POUM trial ( 开展要求自由公开审判马克思主义  
统一工人党的运动 ) , 516—517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 《国际新闻通讯》 ) , 共产国际刊物 :  
89 , 270 , 294 , 445 , 507 , 559 , 634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 s Association ( 国际工人协会 ) 。见AIT

IR ( Izquierda Republicana , 左翼共和派 ) : led by Aza' s new  
government ( 抵制卡瓦列罗组织新政府 ) , 473 ; does not back Irujo and  
Aiguadé ( 不支持伊鲁霍和艾瓜德 ) , 616 ; animosity toward Negrín and  
PCE ( 敌视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 ) , 629。另见Giral, José ; Liberal  
Republicans

“Irma” ( “伊尔玛” ) ,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 : spreads stories of  
POUM espionage ( 散布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 ) , 500 , 第四  
十八章注释16

Iron Column ( 钢铁纵队 ) : guard duty decided in ( 决定由谁执行警卫任  
务 ) , 262 ; uniquely CNT—FAI ( 清一色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

义者联盟成员) , 331—332 ; adherence to Anarchist goals ( 坚持无政府主义的宗旨 ) , 333 ; recruitment of convicts ( 招收囚犯 ) , 333 ; boycotted by Valencia CNT ( 遭到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委员会的抵制 ) , 334 ; censures CNT government ministers ( 谴责出任政府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 , 334 ; terrorism and confiscations by ( 恐怖主义行动和没收财物 ) , 334 ; restrained by government authority ( 受到政府当局的遏制 ) , 335 , 337—338 ; difficulties faced by ( 面临的困难 ) , 336—337 , 338 ; against militarization ( 反对军事化 ) , 339—341 ; absorption into Regular Army ( 改编成为正规军 ) , 341—342

Irujo, Andrés María de ( 安德烈·马利亚·德·伊鲁霍 ) , 笔名A.利萨拉,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的兄弟和私人秘书 : on Manuel de Irujo' s resignation ( 关于曼努埃尔·德·伊鲁霍的辞职 ) , 514 ; on Negrín' s promise of free religious beliefs ( 关于内格林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证 ) , 642—643

Irujo, Manuel de (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 ) , 巴斯克民族独立党领导人, 不管部长, 内格林政府的司法部长 : named minister ( 被任命为内阁部长 ) , 123 , 203 , 483 ; and POUM ( 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 504 , 505 , 513 ; angered at Nin' s disappearance ( 对宁的失踪表示愤慨 ) , 510 ; Morón on ( 莫隆论伊鲁霍 ) , 510 ; opposes Tribunales Especiales de Guardia ( 反对设立特别安保法庭 ) , 514 ; resigns from government ( 从政府辞职从政府辞职 ) , 514 , 615 ; remains in Negrín' s government ( 留在内格林政府中 ) , 第四十八章注释94 , 585 ; supports negotiated settlement ( 赞成谈判结束内战 ) , 577 ; confirms SIM' s crimes ( 证实军事调查局的罪行 ) , 605 ; and Negrín' s promise of free religious beliefs ( 与内格林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证 ) , 642

Irving, David (戴维·欧文), 英国历史学家: on disappearance of Hitler—Chamberlain messages (论希特勒与张伯伦之间所通秘电的消失), 185; on destruction of British documents on Nuremberg (论纽伦堡审判销毁英国文件), 第十七章注释36

Isgleas,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伊斯格莱亚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 Catalan councilor of defense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防务专员), 412; defended by Tarradellas (塔拉德利亚斯为其辩护), 415; threatens to resign over popular army (因人民军问题威胁要辞职), 419; named vice—president of Committee for the Popular Army (被指定为支持人民军委员会副主席), 419; compelled to institute conscription (被迫征兵), 419, 421

Italy (意大利): Mussolini' s meeting with monarchists (墨索里尼与西班牙君主主义者会谈), 11, 101; refuses military aid to Bolín (拒绝博林提出的军事援助要求), 101; sends aid to Nationalists in early Aug. 1936 (一九三六年八月初向民族主义军队提供援助), 101; on motives in Spain of (关于意大利干涉西班牙的动机), 102—103; seeks to split Spain from France and England (试图离间西班牙与英法两国的关心), 102—103; and occupation of Austria and Czechoslovakia (与德国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102—103, 572; Hitler' s influence on (希特勒对意大利的影响), 103; intervention statistics (关于干涉的统计数字), 第十七章注释2; approached by Spanish government (西班牙政府与意大利接触), 第十七

## 章注释23

Izquierda Comunista ( 共产党左派 ) : precursor of POUM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前身 ) , 405

Izquierda Republicana ( 左翼共和派 ) 。见IR ; Liberal Republicans

Izvestiia ( 苏联《消息报》 ) : 89 , 308 , 414

Jackson, Gabriel ( 加布里埃尔·杰克逊 ) , 美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 : analysis of social revolution ( 对社会革命的分析 ) , 54 ; Chomsky on ( 乔姆斯基论杰克逊 ) , 第六章注释81

Jaén ( Andalusia ) ( 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哈恩省 ) : collectivized agriculture in ( 哈恩省的集体化农业 ) , 63 ; restoration of Socialist power in ( 社会党在哈恩省恢复活力 ) , 632

JARE ( Junta de Auxilio a los Republicanos EspañaPrieto distributes valuables in Mexico by means of ( 普列托通过该委员会控制运往墨西哥的黄金财宝 ) , 第十三章注释23

Jativa, Alfonso ( 阿方索·哈蒂瓦 ) , 社会党人 : Negrín appoints to undersecretaryship of the navy ( 内格林任命其为负责海军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 ) , 592

Jauregui, Julio ( 胡里奥·豪雷吉 ) , 温和的巴斯克民族独立党人 : backs Negrín on religion ( 支持内格林的宗教措施 ) , 644

JCI ( Juventud Comunista Ibérica ) ( 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 ) : POUM youth organization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青年组织 ) , 第四十八章注释84 ;  
officially dissolved ( 被正式取缔 ) , 520

Jebb, Gladwyn ( 格拉德温·杰布 ) , 亚历山大·卡多根的秘书 : drafts policy summary on noninterventionism ( 起草不干涉政策的总结报告 ) , 650

Jellinek, Frank ( 弗兰克·杰利内克 ) , 英国历史学家 , 《曼彻斯特卫报》记者 :  
claims Trotskyists in Friends of Durruti ( 声称杜鲁蒂之友会里有托洛茨基分子 ) , 420 ; writes for News of Spain ( 为《西班牙新闻》撰稿 ) ,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Jiménez, Enrique ( 恩里克·希门尼斯 ) , 共和联盟成员 : named finance councillor , Madrid Defense Council ( 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财政委员 ) , 295 ; named evacuation delegate , Madrid Delegate Defense Council ( 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疏散代表 ) , 296

Jiménez, Javier ( 哈维尔·希门尼斯 ) , 马德里特警部队成员 : on Nin' s disappearance ( 论宁的失踪 ) , 508

Jiménez de Asúa, Luis ( 路易斯·希门尼斯·德·阿苏亚 ) , 社会党温和派议员 : attempted assassination of ( 长枪党企图暗杀希门尼斯·德·阿苏亚 ) , 9

Johnson, Reverend Hewlett ( 休利特·约翰逊主教大人 ) , 英国主教 : asserts that no churches were damaged ( 断言没有教堂遭到破坏 ) , 51

Johnston, Verle ( 弗尔·约翰斯顿 ) , 研究国际纵队的美国历史学家 : on

Spanish resentment of Kléber (论西班牙人对克莱贝尔不满) , 304

Jones, Thomas (托马斯·琼斯) , 斯坦利·鲍德温的顾问 : on need for Anglo—German friendship (论英德友好的必要性) , 174—175

Jouhaux, Léon (莱昂·儒奥) , 法国工会领导人 : arbitrates internal UGT conflict (仲裁劳动者总工会的内部争议) , 567

Journalists (新闻记者) : distortions disseminated by (歪曲性报道) , 54

JSU (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 共产党的青年组织 : as auxiliary to Communist party (作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 125—126 , 134—135 ; Caballero' s loss of control of (卡瓦列罗对其失去控制) , 130 , 478—479 ; merger of Union of Young Communists and Socialist Youth Federation (由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与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合并而成) , 130—131 ; Conference of Valencia (1937) (一九三七年的巴伦西亚代表大会) , 135—136 ; fears hostility of Western powers (担心引起西方国家的敌意) , 230 ; involvement in military units (渗透到军队中) , 276 ; Carrillo calls for union with Libertarian Youth (卡里略呼吁联合自由主义青年运动) , 323—324 ; growing discord within (内部斗争愈演愈烈) , 630—631。另见Federación de 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

Juliá, Santos (桑托斯·胡利亚) , 西班牙历史学家 : on Prieto' s error in elevating Aza见JARE

Junta de Defensa de Madrid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 。见Defense Council of

## Madrid

Junta de Defensa Nacional ( 国防委员会 ) , 叛军的组织 : names Franco head of state and generalissimo ( 任命佛朗哥为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总司令 ) , 第一章注释44 ; attempts to obstruct gold sales ( 竭力阻挠出售黄金储备 ) , 146

Junta de Mandos ( 指挥委员会 ) : Díaz Tintero member of ( 委员会成员迪亚斯·滕德罗 ) , 544 ; makes officer recommendations to defense minister ( 向国防部长推荐军官 ) , 544 ; controlled by Rojo ( 由罗霍控制 ) , 544

Junta de Seguridad ( 治安委员会 ) , 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成立的治安组织 : power of ( 委员会的权力 ) , 403 ; Comerera and PSUC demand suppression of ( 科莫雷拉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要求撤销治安委员会 ) , 411 , 416

Jurado, Lieutenant Colonel Enrique ( 恩里克·胡拉多中校 ) , 共和派军官 : designated to command at Estremadura ( 计划指挥埃斯特雷马杜拉行动 ) , 467 ;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 , 688

Jurados Mixtos ( 混合陪审团 ) 。见Labor Courts

Just, Julio ( 胡利奥·胡斯特 ) , 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 公共工程部长 : named Caballero minister ( 被任命为卡瓦列罗政府的部长 ) , 123 , 203 ; member of Higher War Council ( 战时高级委员会成员 ) , 324 ; represents government in Madrid ( 担任政府在马德里的代表 ) , 375



Justice , revolutionary ( 革命司法 ) : destruction of judicial records ( 销毁司法档案 ) , 第四章注释41

Justicia Social ( 《社会正义》 ) , 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机关报 : 398

Juventud Comunista Ibérica ( 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 ) 。 见JCI

Juventud Libre ( 《自由青年报》 ) , 自由主义青年运动的喉舌 : 233 , 496 ,

Juventud Obrera ( formerly Juventud Comunista ) ( 《工人青年报》 , 前《共产主义青年报》 )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青年组织的喉舌 : 513

Juventudes de Acción Popular ( JAP ) ( 青年人民行动 ) : presses Gil Robles for violent action ( 逼迫希尔·罗夫莱斯采取暴力行动 ) , 16—17

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 (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 。 见JSU

Kamenev, Lev B. ( 列夫·Б·加米涅夫 ) , 布尔什维克 : POUM protests execution of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抗议处决加米涅夫 ) , 408

Kandelaki, David ( 达维德·坎杰拉基 ) , 斯大林的贸易代表 : and Hitler negotiations ( 和与希特勒的谈判 ) , 106—107 , 第九章注释50和注释53 , 654 , 655

Katz, Otto ( 奥托·卡茨 ) , 捷克共产党员 , 化名安德烈·西蒙 : appointed by Vayo to Paris propaganda post ( 被德尔巴约任命为巴黎宣传机构负责人 ) , 139

Khrushchev, Nikita ( 尼基塔·赫鲁晓夫 ) ,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 :

speaks ( Feb.1956 ) on purge of Soviet officers who served in Spain ( 一九五六年二月发表讲话谈到对在西班牙作战的苏联军官的清洗 ) , 308

Kléber, Emilio ( 埃米利奥·克莱贝尔 ) , 苏联军官 , 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指挥官 :

Krivitsky on ( 克里维茨基论克莱贝尔 ) , 106 , 303—304 ; marches on Madrid ( 8 Nov.1936 ) (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开进马德里 ) , 287—288 ; Hugh Thomas on ( 休·托马斯论克莱贝尔 ) , 288 ; Colodny on ( 科洛德尼论克莱贝尔 ) , 289 ; biography of ( 生平简历 ) , 302 ; Vidali , Regler , Zugazagoitia , Renn , and Matthews on ( 维达利、雷格勒、苏加萨戈伊蒂亚、雷恩和马修斯论克莱贝尔 ) , 303 , 304 ; Miaja and Caballero jealous of ( 米亚哈和卡瓦列罗妒忌克莱贝尔 ) , 304 ; removed from Madrid ( Jan.1937 ) ( 一九三七年一月被调离马德里 ) , 304 ; Fischer on his relations with Marty ( 费希尔论他与马蒂的关系 ) , 304 ; Rojo initiates offensive against ( 罗霍对克莱贝尔发起攻击 ) , 304—305 ; later obscurity and death ( 后来的湮没无闻和死亡 ) , 305 ; and Gustavo Durán ( 与古斯塔沃·杜兰 ) , 547

Kloosterman, Jaap ( 雅普·克洛斯特曼 ) , 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工作人员 : on "secret" AIT congress ( Dec.1937 ) ( 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秘密" 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 ) , 499

Koestler, Arthur ( 阿瑟·科斯特勒 ) , 作家和哲学家 : on Cimintern' s banishing of revolutionary slogans ( 论共产国际清理革命的标语口号 ) , 96 ; on Koltsov ( 论科利佐夫 ) , 119 ; assistant to Otto Katz in Paris ( 在巴黎担任奥托·卡茨的助手 ) , 139

Kolev (科列夫), 苏联军官, 部队指挥官: perishes in Stalin purge (被斯大林清洗), 312

Koltsov, Mikhail (米哈伊尔·科利佐夫), 苏联记者, 斯大林的代理人: on number of enterprises taken over by workers (关于工人接管的企业数量), 54; Koestler on (科斯特勒论科利佐夫), 119; quotes Caballero on Giral government (引述卡瓦列罗对希拉尔政府的评论), 119; on Prieto's view of Giral and Caballero (关于普列托对希拉尔和卡瓦列罗的看法), 119—120; discusses militarization with Caballero (与卡瓦列罗讨论军事化), 252—254; influence on Madrid war commissariat (在马德里对总政治部的影响), 278—279; describes Madrid ministries after government departure (描述内阁撤离后的政府各部), 282—283; on Fifth Regiment in Madrid defense (论马德里保卫战中的第五团), 286; on Miaja and Rojo in battle for Madrid (论马德里保卫战中的米亚哈和罗霍), 290; on Rojo (论罗霍), 290—291, 300, 301; Vayo on (德尔巴约论科利佐夫), 291; writings ignore Gorev (日记中不提戈列夫), 306, 第三十一章注释4; omitted from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 (被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删去), 308; imprisonment and death (Apr.1942) (被监禁并于一九四二年四月死亡), 308—309; and Stalin (与斯大林), 第三十一章注释31; Cockburn on (科伯恩论科利佐夫), 309; and Soviet engineer Gorkin's "farewell" (与苏联工程师戈尔金的“欢送会”), 313; criticizes Caballero's habits (论卡瓦列罗的习惯), 345—346; explains Nin's disappearance (解释宁的失踪), 507

Kolya (科利亚)。见Kuznetsov, Nicolai G.

Kordt, Theodor (特奥多尔·科尔特), 德国代办: and German—British cooperation (德—英合作与科尔特), 170, 654;

Kravchenkov (克拉夫琴科夫), 化名安东尼奥·平托斯上尉, 苏联军官: Líster on (利斯特论克拉夫琴科夫), 307

Kremlin (克里姆林宫)。见USSR

Krestinski, N.N. (H.H.克列斯京斯基),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signs receipt for Cartagena shipment (签收卡特赫纳运到莫斯科的黄金), 147; executed (15 Mar.1938)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被处决), 153

Krivitsky, Walter (瓦尔特·克里维茨基), 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 on Stalin' s masking of Soviet military aid (论斯大林掩饰苏联的军事援助), 104—105; denounced as imposter by Communists (被共产党人指控为江湖骗子), 105; posts held by (担任过的职务), 第九章注释44; reveals presence in Spain of Berzin, Orlov, and Stashevsky (揭露别尔津、奥尔洛夫和斯塔舍夫斯基在西班牙的活动), 106; reveals true name of Kléber (揭露克莱贝尔的真实姓名), 106, 303; on Stalin' s attempts to negotiate with Hitler (关于斯大林企图与希特勒谈判), 106—107, 655—656; on Negrín and Stashevsky (论内格林与斯塔舍夫斯基), 142; on Stashevsky' s role in gold shipment (论斯塔舍夫斯基在运送黄金问题上所起的作用), 143; on arrival of gold shipment in Moscow (关于黄金运到莫斯科的情况), 151; on NKVD in Spain (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在西班牙), 219—220, 221; on Kléber (论克莱贝尔), 303—304; on Berzin' s disappearance (论别尔津的消失), 310—311; on NKVD (论内务人民委员

部) , 310—311 ; on purge of Stashevsky ( 论斯塔舍夫斯基被清洗 ) , 310—311 ; on Yezhov , Orlov , and Sloutski ( 论叶若夫、奥尔洛夫和斯卢茨基 ) , 310—311 ; on Soviet role in choosing Negrín ( 论苏联在选择内格林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 , 476—477

Krivoshein, Colonel S. ( C.克里沃舍因上校 ) , 化名梅莱 , 苏联坦克旅指挥官 : 312 ; and secret gold transfer ( 与秘密转移黄金 ) , 150

Ksanti ( 克桑季 ) 。见Mamsurov Judji—Umar

Kühlenthal, General ( 屈伦塔尔将军 ) , 德国驻巴黎大使馆武官 : predicts Soviet intervention ( 预言苏联的介入 ) , 172

Kulik, General G. ( Г.库利克将军 ) , 化名库珀尔 , 苏联军官 , 波萨斯的顾问 : as Gorev' s superior ( 作为戈列夫的上司 ) , 307 ; survives until 1950 ( 直到一九五〇年还活着 ) , 312 , 第三十一章注释51 ; adviser to Pozas ( 担任波萨斯的顾问 ) , 316—317 ; Hernández and Casado on ( 埃尔南德斯和卡斯特罗论库利克 ) , 316—317 ; holds meeting on Estremadura ( 召开关于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的会议 ) , 468

Kuper ( Kupper ) , General ( 库珀尔将军 ) 。见Kulik, General G.

Kuznetsov, Nicolai G. ( 尼古拉·Г.库兹涅佐夫 ) , 苏联军官 , 海军武官 : testifies that naval escort accompanied gold shipment ( 证明西班牙舰队为运送黄金护航 ) , 156 ; on fate of Gorev ( 论戈列夫的命运 ) , 312

La Pasionaria ( 热情之花 ) 。见Ibárruri, Dolores

Labonne, Eilrick ( 埃尔里克·拉博纳 ) , 法国驻西班牙大使 : on France' s willingness to serve as mediator ( 关于法国愿意充当调停人 ) , 576—577

Labor courts ( 劳动法庭 ) : awards injurious to woekers ( 裁决不利于工人 ) , 3 ; established by Caballero as labor minister ( 由劳工部长卡瓦列罗设立 ) , 198

Labor disturbances ( 工人骚乱 ) : preceding Civil War ( 内战前的工人骚乱 ) , 3 ; in urban centers ( 城市中心的工人骚乱 ) , 7

Lacouture, Jean ( 让·拉库蒂尔 ) , 历史学家 : on French bourgeois noninterventionism ( 论法国资产阶级的不干涉主义 ) , 176

Laín, José ( 何塞·莱恩 ) ,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 , 亲共分子 : named director of school of commissars ( 被任命为政治委员培训学校负责人 ) , 275

Lamas Arroyo, Angel ( 安赫尔·拉马斯·阿罗约 ) , 比森特·罗霍的同僚 , 后来成为民族主义者 : on Soviet advisers in military ( 论军队中的苏联顾问 ) , 278

Lamonedá, Ramón ( 拉蒙·拉莫内达 ) , 社会党书记 : on Socialist—Communist fusion ( 论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 ) , 382 , 536—537 ; political allegiances of ( 其政治效忠对象 ) , 第三十七章注释5 ; represents PSOE on national committee ( 代表社会党参加全国协调委员会 ) , 385 , 537 ; announces resignation of Socialist ministers ( 宣布社会党温和派政府部长辞职 ) , 470 ; Prieto' s influence on ( 普列托的影响 ) , 470 ; opposes Caballero' s ministry plans ( 反对卡瓦列罗的组阁计划 ) , 473 ;

background of ( 个人背景 ) , 第五十一章注释6 ; praises government handling of Caballero ( 称赞政府控制卡瓦列罗的做法 ) , 563 ; refusal to attend party meetings ( 拒绝参加与共产党的协调会议 ) , 630 ; tries to regain control of Socialist youth ( 试图重新控制社会主义青年运动 ) , 632

Langdon—Davies, John ( 约翰·兰登—戴维斯 ) , 伦敦《新闻记事报》记者 : alleges putsch by POUM ( 声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发动暴动 ) , 445

Lara, Antonio ( 安东尼奥·拉腊 ) , 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成员 : Claridad' s distrust of ( 《光明报》不信任拉腊 ) , 45

Largo Caballero, Francisco (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 ) , 社会党左派领导人 , 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书记 , 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 : on Gil Robles' s opposition to parliamentary means ( 论希尔·罗夫莱斯反对议会手段 ) , 9 ; on goal of Marxist socialism ( 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 ) , 22—23 ; biography of ( 生平简历 ) , 23 ; Socialists turn to ( 社会党人转向卡瓦列罗 ) , 23—25 ; sources of power of ( 力量的来源 ) , 24—25 ; Madariaga on effects of his policies ( 马达里亚加论其政策的影响 ) , 25 ; and Prieto ( 与普列托 ) , 25 , 27—28 , 120 ; and Communists ( 与共产党人 ) , 25—27 , 120—121 , 129—130 , 139 , 160—162 , 275 , 316 , 318—319 , 320 , 350—352 , 356 , 358—361 , 366—367 , 369 , 382 ; ousted from Socialist executive ( 被逐出社会党执委会 ) , 27 , 470 ; defended by Santos Juliá ( 桑托斯·胡利亚为其辩护 ) , 29 ; does not mention Araquistáin' s plot ( 没有注意阿拉基斯塔因的政治阴谋 ) , 30 ; demands arming of workers ( 要求给工人发放武器 ) , 40 ; Communists' suspicion of ( 共产党人

对卡瓦列罗的怀疑) , 114—115 , 280 , 295 , 345—346 ; tempers  
revolutionary drive ( 缓和革命的热情 ) , 115—116 ; views on Giral  
government ( 对希拉尔政府的看法 ) , 119 ; thwarted by Soviets in attempt  
to set up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受到苏联阻  
挠 ) , 119 ; Koltzov on ( 科利佐夫论卡瓦列罗 ) , 121 ; tries to expel  
Giral ( 试图将希拉尔赶出政府 ) , 121 ; as viewed by working class ,  
Republicans , and Stalin ( 工人阶级、共和派和斯大林对卡瓦列罗的看法 ) , 第  
十一章注释26 ; enthusiastically received by public ( 受到公众的热烈欢  
迎 ) , 122 ; hopes to name Araquistáin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 希望  
任命阿拉基斯塔因为外交部长 ) , 122—123 ; and loss of authority over  
JSU ( 对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失去权威 ) , 131—132 ; and relation to  
Comintern ( 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 , 131 ; praised by Carrillo ( 受到卡里略赞  
扬 ) , 135 ; appoints Vayo to war commissariat ( 指派德尔巴约负责国防部总  
政治部 ) , 138 ; on Vayo' s service to Communists ( 关于德尔巴约为共产党  
效力 ) , 138 ; initiates gold shipment ( 开始实施运送黄金计划 ) , 143 ,  
145 , 第十四章注释3和注释14 , 157 ; fears French blockage of gold  
use ( 担心法国禁止使用黄金储备 ) , 146 ; informed of planned FAI gold  
seizure ( 得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准备夺取黄金储备 ) , 150 ;  
corresponds with Stalin on Republic ( 与斯大林通信谈共和国 ) , 166 ;  
knew of Spanish Morocco offer ( 知道关于西属摩洛哥的建议 ) , 182 ;  
unlikelihood of Anarchists' joining with ( 无政府主义者不大可能加入卡  
瓦列罗政府 ) , 195 ; serves on Primo de Rivera' s Council ( 在普里莫·德·  
里维拉的国务委员会任职 ) , 196 , 197 ; relation with CNT (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  
的关系 ) , 196 , 197—200 , 201—204 , 320—321 , 330 , 331 , 473 ; sets up



labor—management laws (提出劳资法案) , 197—198 ; insists on legal government of Republic (强调共和国政府的合法地位) , 202 ; transfers government to Valensia (把政府转移到巴伦西亚) , 204 , 205—206 ; dissolves own UGT committees (解散自己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占支配地位的革命委员会) , 214 ; sets up National Republican Guard and Assault Guard (建立共和国国家卫队及重建突击卫队) , 216 ; controls workers' militia (控制工人民兵) , 218 ; vetos Peiró' s collectivization plan (制止佩罗的集体化计划) , 227 ; on popular militia (论民兵武装) , 250—251 ; and militarization (与军事化) , 252—254 , 272—273 ; on political commissars (关于政治委员) , 277 ; and Soviet military advisers (与苏联军事顾问) , 277—278 , 315—317 ; and Asensio (与阿森西奥) , 280 , 281—282 , 348 , 349 , 355—356 ; dismisses , then reinstates , Casado as operations chief (解除卡萨多国防部军事行动负责人的职务 , 然后又将其复职) , 282 ; replaces Estrada by Martínez Cabrera (用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取代埃斯特拉达) , 282 ; forbids announcement of government' s departure (不许宣布政府撤离) , 282—283 ; approves sealed orders to Pozas and Miaja (批准给波萨斯和米亚哈的密封命令) , 284 ; believes Madrid lost (相信马德里将失守) , 284 ; relation with Miaja (与米亚哈的关系) , 285 , 289 , 291 , 294 , 296 , 315 ; recasts Madrid Defense Council to enhance authority (改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以加强政府的权力) , 295 ; urged by Diéguez to remove "suspect elements" from military (迭格斯敦促卡瓦列罗清除军队中的“可疑分子” ) , 299 ; dissolves Defense Council (Apr.1937) (一九三七年四月解散保卫马德里委员会) , 299—300 , 第三十章注释98 ; jealous of Kléber (妒忌克莱贝尔) , 304—305 ;

Rosenberg puts pressure on ( 罗森堡对卡瓦列罗施加压力 ) , 318—319 ; member of Higher War Council ( 战时高级委员会成员 ) , 324 ; names García Oliver head of officers' school ( 任命加西亚·奥利韦为军官培训学校负责人 ) , 328 ; withholds pay from militiamen ( 停发民兵的薪饷 ) , 335 ; declares Iron Column subordinate to war ministry ( 宣布钢铁纵队隶属于国防部 ) , 337 ; Cerdán on ( 科登论卡瓦列罗 ) , 345—346 ; defends nonenforcement of draft ( 为不强制征兵辩解 ) , 346—347 ; ejects Rosenberg from his office ( 将罗森堡赶出他的办公室 ) , 348—349 ; Rosal on ( 罗萨尔论卡瓦列罗 ) , 349 ; on pressure by Codovila ( 关于柯多维拉施加的压力 ) , 352 ; Communists begin campaign against ( 共产党人开始诋毁卡瓦列罗 ) , 352 , 354 ; lacks trustworthy associates ( 没有可以信赖的助手 ) , 353 ; appoints Socialist military inspectors ( 任命社会党人为军队的监察人员 ) , 357 ; Nosotros campaigns against ( 《我们》抨击卡瓦列罗 ) , 357—358 ; receives Communist petition on military ( 收到共产党人关于军事问题的请愿书 ) , 360 ; Communists attempt to undermine by wooing Baráibar ( 共产党人试图拉拢巴赖瓦尔挖卡瓦列罗的墙脚 ) , 368—370 ; on Vayo' s Communist appointments ( 论德尔巴约任用共产党人 ) , 371 ; retains Vayo after Aza—UGT recommendation for officer training ( 要求军官受训须经全国劳工联合会或劳动者总工会推荐 ) , 375 ; objects to Communist ministers' military assignments ( 反对委派共产党人政府部长执行军事任务 ) , 375 ; Prieto hopes to oust ( 普列托希望推翻卡瓦列罗 ) , 383—384 ; reacts to news PSUC formation ( 听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立的消息后的反应 ) , 第三十九章注释13 ; withholds arms from Anarchist units ( 不给无政府主义民兵部队发放武器 ) , 第四十一章注释44 ; Aza449 , 450 ;

on Díaz' s call to repress trotskyists ( 论迪亚斯要求镇压托洛茨基分子 ) , 463 ; Azaprieto denies role in ouster of ( 普列托否认在推翻卡瓦列罗的过程中起了作用 ) , 465—466 ; Uribe on Prieto and ( 乌里韦论普列托与卡瓦列罗 ) , 466 ; submits resignation ( 递交辞呈 ) , 466 , 469 ; and Spanish Morocco plans ( 与在西属摩洛哥煽动一场反佛朗哥将军叛乱的计划 ) , 第四十四章注释25 ; and Estremadura operation ( 与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 ) , 466—467 ; ignores Communists in new government ( 组建新政府时无视共产党人 ) , 469 , 472—473 ; refuses to give up any authority ( 拒绝交出任何权力 ) , 471—472 ; on authenticity of memoirs ( 关于卡瓦列罗回忆录的真实性 ) , 第四十五章注释19 ; final defeat of ( 最终失败 ) , 478—479 , 483 ; on damage done by POUM repression ( 论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共和国事业造成的损害 ) , 506 ; returns to power in UGT ( 在劳动者总工会重掌权力 ) , 554 ; Communists plan to dislodge from UGT ( 共产党人打算把卡瓦列罗赶出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 ) , 555 , 556—558 ; on Communists presence at anniversary meeting ( 论共产党人出席纪念会议 ) , 555 ; protests postponement of Cortes opening ( 反对推迟议会会期 ) , 559 ; refuses to recognize new UGT executive ( 拒绝承认新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 ) , 559 , 567 ; removed from parliamentary posts ( 被免除了议会职务 ) , 560 ; attends meetings of Agrupación Socialista Madrile—Communists ( 论非共产党人在战地医院受到的恶劣对待 ) , 595 ; later activity of ( 后来的活动 ) , 627—629 ; and last Cortes meeting ( 与最后一次议会会议 ) , 677 ; Mije denounces ( 米赫谴责卡瓦列罗 ) , 680—681 ; departure for France ( 逃往法国 ) , 第六十二章注释63 ; relations with after Franco victory ( 佛朗哥获胜后与左派的关系 ) , 692。另见Adelante ; Socialist

party ; Socialists ( left ) ; Socialists ( moderate ) ; UGT

Largo Calvo, Francisco (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尔沃 ) , 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儿子 : urged by Llopis not to publish memoirs ( 略皮斯劝其不要发表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回忆录 ) , 第四十五章注释19

Larraz ( Larras ) , José ( 何塞·拉腊斯 ) , 天主教出版社社长 : on proposal to include CEDA in a Prieto government ( 关于组成一个包括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在内的普列托政府的建议 ) , 31

Laval, Pierre ( 皮埃尔·赖伐尔 ) ,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的法国总理 : Fabry on his opposition to military agreement in Franco—Soviet pact ( 法布里透露其反对在法苏条约的基础上与苏联签订军事协定 ) , 第八章注释9

Law of Leases ( 土地租赁法 ) : 14

Law of Political Responsibilities ( 政治责任法 ) : issued by Franco ( 佛朗哥颁布 ) , 690—691 , 738—739 ; demand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 要求无条件投降 ) , 708

Le Grix, Fran ( 勒格里 ) , 法国保王党人 , 《周刊》编辑 : hopes for German—Soviet conflict ( 希望德国与苏联发生冲突 ) , 90—91

League of Nation ( 国际联盟 ) : Russia joins ( 苏联加入国际联盟 ) , 89 ; Churchill' s hope that League agreements could contain Germany ( 丘吉尔希望国际联盟区域协定能包括德国 ) , 93—94 ; Stalin plans to bring Italo—German intervention before ( 斯大林打算把德意两国干涉西班牙的问

题提交国际联盟审议) , 168

Lécera ( 莱塞拉村 ) : difficulty of collectivizing ( 集体化遇到的困难 ) , 74

Left Republicans ( 左翼共和派 ) 。见IR

Léger, Alexis Saint—Léger ( 亚历克西·圣—莱热·莱热 ) , 法国外交部官员 : and British arguments for nonintervention ( 与英国坚持不干涉政策 ) , 176

Lenin, V.I. ( В.И.列宁 ) : inspired Madrid Socialist organization ( 激励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 ) , 24 ; justifies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 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 ) , 77—78 ; advises gaining any mass ally ( 建议无论如何争取得到大量盟友 ) , 84 ; seeks transitional forms to revolution ( 寻找向革命过渡的形式 ) , 96 ; quoted by Claridad on government army ( 《光明报》引用其关于政府武装的论述 ) , 251

León, María Teresa ( 玛丽娅·特蕾莎·莱昂 ) , 共产党诗人拉斐尔·阿尔维蒂的妻子 : and Miaja ( 与米亚哈 ) , 294

Lérida ( Catalonia ) ( 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莱里达省 ) : troops besiege POUM—CNT locals ( 部队已经包围了莱里达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地方总部 ) , 452

Lerroux, Alejandro ( 亚历杭德罗·勒鲁 ) , 加泰罗尼亚激进党领导人 : cabinet formed in Oct.1934 ( 一九三四年十月组阁 ) , 8 ; and CEDA ( 与西班牙争取自

治权利联盟) , 8 ; Unión Republicana splits from ( 共和联盟从勒鲁的激进党中分裂出来 ) , 22

Leval, Gaston ( 加斯东·勒瓦尔 ) , 法国无政府主义作家 : on free union ceremonies in Magdalena de Pulpis ( 关于马格达莱娜 - 德普尔皮斯村的自由结合仪式 ) , 69 ; on instances of land trade for small owners ( 关于为小地主调换土地的实例 ) , 75—76 ; on policy of silencing libertarian communism ( 论避免谈论自由共产主义的政策 ) , 第十九章注释38 ; on need for discipline in militia ( 论民兵武装需要纪律 ) , 263

Levine, Isaac Don ( 艾萨克·唐·莱文 ) , 克里维茨基的出版代理人 : on Krivitsky' s alleged posts ( 关于所说克里维茨基担任过的职务 ) , 第九章注释44

Ley de Ordenación Bancaria ( 银行法 ) : junta charges violations of ( 国防委员会指控共和派政府出售黄金储备违反银行法 ) , 146

El Liberal ( 《自由报》 ) ,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拥有的在毕尔巴鄂出版的报纸 : 27

Liberal Republicans ( 自由共和派 ) : refusal to defend middle classes ( 拒绝保护中产阶级 ) , 84—85 ; effort to form left coalition ( 努力缔造左派联盟 ) , 95 ; relative passivity during war ( 内战期间相对消极 ) , 126。另见IR ; UR

La Libertad ( 《自由报》 ) , 左翼共和派的报纸 : 5 , 6

Libertarian communism (自由共产主义运动) : supported by Anarchosyndicalist peasant unions (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雇农工会的支持) , 65 ; on establishment of (关于建立自由共产主义) , 65—66 , 193—195 ; Uribe on Anarchist control of Valencia villages (乌里韦论无政府主义者对巴伦西亚农村的控制) , 86 ; Lorenzo on impossibility of libertarian revolution (洛伦索论自由主义革命之不可能) , 128。另见 Anarchists ; CNT ; FAI

Libertarian movement (自由主义运动)。见Anarchists ; CNT ; FAI ; FIJL ; Libertarian communism

Libertarian Youth (自由主义青年运动)。见FIJL

Liddell Hart, Basil Henry (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 , 英国陆军部顾问, 历史学家 : on allowing Germany' s eastern expansion (论允许德国向东方扩张) , 179 ; British—French hopes (英法两国的希望) , 660—661

Linea de Fuego (《火线》) , 钢铁纵队的喉舌 : 334 , 335

Líster, Enrique (恩里克·利斯特) , 共产党民兵指挥官, 第五团团团长, 后晋升为上校 : on number of regular officers in Popular Army (关于人民军中的正规军军官数量) , 47 ; on Togliatti (论陶里亚蒂) , 133 ; implicated in peasant assassinations (参与杀害农民) , 241 ; dissolves Defense Council of Aragon (解散保卫阿拉贡委员会) , 243—244 , 525—526 ; on Fifth Regiment (论第五团) , 267 , 269 , 270 ; commands Regular Army' s First Brigade (指挥正规军第一旅) , 273 ; on Communist manipulation of

Miaja (论共产党利用米亚哈) , 293 ; ignores Kléber in memoirs (在回忆录中不提克莱贝尔) , 305 ; on Pavlov (论帕夫洛夫) , 307 ; advised by Meretskoy (梅列茨科夫担任其顾问) , 313 ; Duque on (杜克论利斯特) , 526 ; Almodón (阿尔穆迪论利斯特) , 526 ; reproached by Prieto (受到普列托的训斥) , 526—527 ; on Prieto (论普列托) , 527 ; on Mantecón (论曼特孔) , 529 ; suggests execution of Aragon council members (建议处决阿拉贡地方委员会成员) , 529 ; Prieto hostile toward (普列托对其怀有敌意) , 545 ; commands Eastern unit (指挥东部的部队) , 595 ; on government abuses in Catalonia (论政府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滥用职权) , 611—612 ; on those who did not return from France (论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的那些人) , 689—690 ; on Negrín' s move to Elda (论内格林转移到埃尔达) , 694—695 ; promoted to colonel by Negrín (被内格林晋升为上校) , 714 ; on proof that war was lost (关于内战已经失败的迹象) , 722 ; on defeatism of politburo (论共产党政治局的失败主义倾向) , 730 ; on how Togliatti profited from Casado rising (论陶里亚蒂如何从卡萨多的叛乱中获益) , 733

Litvinov, Maxim (马克西姆·李维诺夫) ,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 Lothian' s views on (洛西恩对李维诺夫的看法) , 第八章注释16 ; warns Davies of German domination (警告戴维斯德国可能控制欧洲) , 180 ; allegedly persuades Vayo to offer Spanish Morocco (据说敦促德尔巴约提出关于西属摩洛哥的建议) , 181

Livinski, G.K. (Г.К.利文斯基) , 苏联飞行员 : carries out attack on the Deutschland (轰炸“德意志”号袖珍战列舰) , 574—575



Lizarra, A. (A.利萨拉)。见Irujo, Andrés María de

Lizarza Iribarren, Antonio de (安东尼奥·德·利萨尔萨·伊里瓦伦), 卡洛斯派君主主义者民兵司令: on effect of Italy' s 1934 agreement with monarchists (论一九三四年意大利与西班牙君主主义者签订的协议的作用), 101

Llanos, Virgilio (比尔希略·利亚诺斯), 波萨斯的第一政委: 490

Llarch, Joan (胡安·利亚尔奇): 加泰罗尼亚作家: Vi' s claims (比尼亚斯告诫他不要相信克里维茨基的说法), 105; on alleged Soviet offer to Negrín (关于所谓苏联给内格林的建议), 671—672

Llopis, Rodolfo (鲁道夫·略皮斯): 社会党左派, 卡瓦列罗政府的副总理: reports disloyalty of Communists (描述共产党人的出尔反尔), 351; supports Caballero (支持卡瓦列罗), 353; urges Caballero' s son not to publish memoirs (劝说卡瓦列罗之子不要发表其父的回忆录), 第四十五章注释19; with Caballero when stopped at gunpoint (与卡瓦列罗一起被突击卫队士兵的枪口阻止), 562

Lloyd, Lord (George Ambrose) ([乔治·安布罗斯·]劳埃德勋爵), 英国保守党贵族, 外交官: on Hitler as representative of common European interests (论希特勒作为欧洲共同利益的代表), 94—95, 173—174

Lloyd George, David (戴维·劳合·乔治), 英国前首相: sees Germany as bulwark against Communism (将德国视为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 91

Lluhi y Vallescá, Juan (胡安·留伊—巴列斯卡):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

人：becomes minister of labor, health, and supplies (20 July) (七月二十日成为劳工、卫生和物资部长), 47

Locarno Powers (洛迦诺公约缔约国) : propose meeting to negotiate new western pact (建议开会谈判协商新的西方国家条约), 89

Lois, Manuel (曼努埃尔·洛伊斯), 劳动者总工会领导人, 亲共的社会党左派: member of Consejo General de Electricidad (电力委员会成员), 223

Londonderry, Marquess of (伦敦德里侯爵), 英国空军大臣: on importance of Anglo—German understanding (论英德谅解的重要性), 92—93

Longo, Luigi (路易吉·隆哥), 化名加略, 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 on arrival of first members of International Drigade (关于第一批国际纵队成员的到达), 108

López, Bernabé (贝尔纳韦·洛佩斯),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 role in Casado coup (在卡萨多政变中的作用), 727

López, Juan (胡安·洛佩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 卡瓦列罗政府的商业部长: named Caballero minister of commerce (被任命为卡瓦列罗政府的商业部长), 203, 209; refused passage through Tarancón (民兵不许其通过塔兰孔), 206; on why CNT entered government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的原因), 210; on CNT compromises with Communists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共产党人的让步), 231; against national army (反对国家军队), 322; protests POUM repression (对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提出抗议), 502

López, Tundidor ( 顿迪多尔·洛佩斯 ) , 社会党左派 : protests Communist coup in JSU ( 抗议共产党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搞政变 ) , 136

López Fernández, Captain Antonio ( 安东尼奥·洛佩斯·费尔南德斯上尉 ) , 米亚哈将军的副官 : on Miaja' s opposition to arms distribution ( 论米亚哈反对发放武器 ) , 第三章注释33 ; on composition of Madrid general staff ( 论马德里参谋部的组成 ) , 289—290

Lórenzo, César M. ( 塞萨尔·M·洛伦索 ) , 自由主义历史学家 , 奥拉蒂奥·M·普列托之子 : on Anarchists' contradictory principles ( 论无政府主义者自相矛盾的原则 ) , 第六章注释77 ; on illiteracy as factor in all parties ( 论各党派成员的教育缺失状况 ) , 127 ; on virtual impossibility of libertarian revolution ( 论自由主义革命没有现实可能性 ) , 128 ; on history of FAI ( 关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历史 ) , 191—192 ; on Caballero' s rejection of CNT plan ( 论卡瓦列罗拒绝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方案 ) , 200 ; on entry of CNT into government (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 ) , 201 , 207 , 210—211 ; on CNT power in Catalonia ( 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加泰罗尼亚的势力 ) , 401 ; on violence in Castile ( 论共产党人在卡斯蒂利亚地区的暴行 ) , 第五十章注释4 ; on Regional Defense Council of Aragon ( 论保卫阿拉贡地方委员会 ) , 524—525 ; on CNT' s desire to collaborate with Negrín (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希望与内格林合作 ) , 528

Lothian, Lord ( 洛西恩勋爵 ) , 英国保守党领导人 : wishes to turn Germany eastward ( 希望把德国的目标转向东方 ) , 91 ; becomes propagandist of unserstanding with Hirler ( 变成与希特勒达成谅解的鼓吹者 ) , 174

Louzon, Robert ( 罗贝尔·卢宗 ) , 法国的革命工团主义者 : on signs of bourgeois takeover in Catalonia ( 论资产阶级控制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迹象 ) , 496—497

Luca de Tena, Marqués Juan Ignacio ( 胡安·伊格纳西奥·卢卡·德·特纳侯爵 ) , 君主主义报纸《阿贝赛报》的出版商 : Gil Robles on his call for insurrection ( 希尔·罗夫莱斯论其鼓吹暴动的行为 ) , 17 ; charters plane for Franco' s flight to Spanish Morocco ( 包租把佛朗哥送往西属摩洛哥的飞机 ) , 43

Lufthansa ( 汉莎航空公司 ) , 德国国家航空公司 : aids Spanish military rebellion ( 援助西班牙军事叛乱 ) , 98

Luftwaffe ( 纳粹德国空军 ) : Goering' s claim that he "tested" his pilots during aid to Spain ( 戈林声称他在援助西班牙期间 "训练了" 他的飞行员 ) , 97—98

Luna, Antonio de ( 安东尼奥·德·卢纳 ) , 大学教授 , 宪兵情报局特工 : negotiates with Casado ( 与卡萨多谈判 ) , 706

Luz y Fuerza ( 《照明与电力》 ) ,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行业刊物 : 395

Lyova ( 廖瓦 ) 。见Orlov, Alexander

McGovern, John ( 约翰·麦戈文 ) , 英国独立工党下院议员 : visits Spain in defense of POUM ( 为保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访问西班牙 ) , 505—506

Madariage, Salvador de ( 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 ) , 温和共和派人士 , 历史学

家 : on labor courts ( 1933—1935 ) ( 论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间的劳动法庭 ) , 3 ; on Institute of Agrarian Reform ( 论土地改革协会 ) , 3 ; on benefits to church from center—right victory ( 论教会因中—右势力获得一九三三年大选胜利而获益 ) , 14 ; on effects of internal dissension within the Socialist party ( 论社会党内部分歧的影响 ) , 25 ; on regular officers' siding with the government ( 论站在政府一边的正规军军官 ) , 48 ; on murder of judge by convicted criminal ( 论法官被其判决的罪犯杀害 ) , 50—51 ; flees Spain ( 逃离西班牙 ) , 第四章注释58 , P164 ; on Communist influence on Pablo de Azcárate ( 论共产党对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的影响 ) , 142 ; on Azcárate defection to communism ( 论阿斯卡拉特堕落成为共产主义走狗的背叛 ) , 162 ; on Negrín' s ignorance of Communist motives ( 论内格林不知道共产党人的目的 ) , 477

Madrid ( 马德里 ) : collapse of military revolt in ( 马德里的军事叛乱失败 ) , 47 ; revolutionary justice in ( 马德里的革命法庭 ) , 50 ; small businesses collectivized in ( 小型工商业被集体化 ) , 57 ; cabinetmakers' trade centralized in ( 木制家具业被集中起来 ) , 59 ; disorganization of CNT rule in (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控制被瓦解 ) , 127—128 ; many left Socialists embrace Communist party ( 许多社会党左派人士投靠共产党 ) , 130 ; official surrender of ( 正式投降 ) , 742

Maella ( 马埃利亚村 ) : abolition of money in ( 废止货币 ) , 72

Magdalena de Pulpis ( 马格达莱娜 - 德普尔皮斯村 ) : on puritanical nature of libertarian communism in ( 自由共产主义的清教徒生活状态 ) , 69

Maisky, Ivan (伊万·迈斯基), 苏联驻英国大使: on Churchill's criticism of supporters of western security (关于丘吉尔对西方安全维护者的批评), 94; on Britain's motives for concluding naval pact with Germany (论英国与德国签订海军协定的目的), 95—96; affirms thousands of union and state confiscations (证实工会和政府为数以万计的企业巧取豪夺), 第十章注释7; on Soviet hopes for Franco's defeat (关于苏联希望佛朗哥失败), 168; on Negrín's cooperation with Communists (论内格林与共产党人合作), 483; on British—French noninterventionism (论英法两国的不干涉政策), 575; and Negrín during World War II (二战期间与内格林), 590—591

Malaga (马拉加): beginning of uprising in (叛军起事), 42; collapse of military revolt in (军事叛乱失败), 47; loss of (Feb.1937) (一九三七年二月失守), 298, 343—344

Malatesta, Errico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 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 on importance of free evolution of society (论社会自由发展的重要性), 77; on power in all government (论各种政府的权力), 193—194

Malefakis, Edward E. (爱德华·E·马莱法基斯), 美国历史学家: on social tension in 1936 (论一九三六年紧张的社会形势), 6—7; on the divided peasantry (论分裂的农民阶层), 10; on indifference of liberal Republicans to land reform (论自由共和派对土地改革漠不关心), 23; on amount of land seized in collectivization (关于集体化运动中没收土地的数量), 62; on Nationalist dismantling of Popular Front

settlements ( 论民族主义当局拆除人民阵线执政期间建立的移民定居点 ) , 第六章注释2

Malinó ( 马利诺 ) 。见Malinovsky, Rodion

Malinovsky, Rodion ( 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 ) , 化名马利诺上校 , 苏联军官 : on Miaja ( 论米亚哈 ) , 294 ; survives purges ( 免遭清洗 ) , 313 ; becomes Soviet defense minister ( 成为苏联国防部长 ) , 313 ; aide to Kulik ( 担任库利克的副官 ) , 317 ; on Pozas' s habits ( 论波萨斯的习惯 ) , 317

Mamsurov Judji—Umar ( 马姆苏罗夫·尤季—乌马尔 ) , 化名克桑季·哈伊 , 苏联游击战专家 : survives purges ( 免遭清洗 ) , 313 ; and Hemingway ( 与海明威 ) , 313 , 第三十一章注释60 ; and Durruti ( 与杜鲁蒂 ) , 第三十一章注释61

Mantecón, JoséIgnacio ( 何塞·伊格纳西奥·曼特孔 ) , 亲共左翼共和派人士 : appointed governor general of Aragon ( 被任命为阿拉贡地区首席行政长官 ) , 244 , 529 ; orders arrests and breakup of collective farms ( 下令解散集体农庄并逮捕其成员 ) , 244 , 529 ; Duque on ( 杜克论曼特孔 ) , 529

Manuel, Frank E. ( 弗兰克·E·曼努埃尔 ) , 美国历史学家 : on press censorship prior to Civil War ( 论内战前的新闻审查 ) , 10

Manuilsky, Dmitri ( 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 ) , 共产国际领导人 : says Revolution depends on success of Caballero' s policies ( 声称革命取决于卡瓦列罗政策的成功 ) , 27 ; praises Negrín ( 赞扬内格林 ) , 590 ; on Togliatti' s role in Casado coup ( 论陶里亚蒂对卡萨多政变的影响 ) , 730

MAOC (Milicias Antifascistas Obreras y Campesinas) (反法西斯工农民兵) : established by Communists before war (内战前由共产党建立) , 266—267 ; source of Fifth Regiment (第五团的基石) , 266—267

Mara·马拉尼翁) , 医生兼随笔作家 : (逃离西班牙) , 第四章注释58 , 64

Marichal, Juan (胡安·马里查尔) , 教授, 历史学家, 阿萨尼亚文集的编辑者 : on left Socialists' plan to frustrate Aza' s ignorance of army conspiracy (论阿萨尼亚对军队谋反全然不知) , 34 ; on Negrín (论内格林) , 142 , 476 ,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 587 ; on AzaMaroto Column (马罗托纵队) , 无政府主义民兵部队 : authorized as uniquely CNT brigade (获准组成特殊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旅) , 331

MartíFeced, Carlos (卡洛斯·马蒂·费塞德)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自治政府内务专员 : named councillor 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成员) , 451 ; disollves patrullas de control (解散治安巡逻队) , 492 ; loses authority under central government (在中央政府接管社会治安后失去权力) , 492

Martín, Antonio (安东尼奥·马丁) , 普奇塞达的无政府主义委员会主席 : killing of (遇害) , 426—427

Martín Blázquez, José (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 , 国防部官员 : on militia shortcomings (论民兵的缺点) , 258 ; on Rojo (论罗霍) , 301 ; on García Oliver as administrator (论作为管理者的加西亚·奥利韦尔) , 329 ; on Communists' creation of mixed bridades (论共产党人创建混成旅) , 330 ;



on withholding pay from militia (论停发民兵的薪饷) , 335 , 338 ; on Caballero' s dismissal of Communists in war ministry (论卡瓦列罗将国防部的共产党人解职) , 356

Martín i Ramos, Josep Lluís (何塞·路易斯·马丁—拉莫斯)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历史学家 : neglects Comorera' s opposition to PSUC (没有提到科莫雷拉反对成立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 398

Martín Nájera, Aurelio (奥雷略·马丁·纳赫拉) , 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工作人员 : on Caballero memoirs (关于卡瓦列罗的回忆录) , 第四十五章注释19

Martínez, Félix (费利克斯·马丁内斯) , 无政府主义者 , 杜鲁蒂之友会干事 : 420—421 , 第四十一章注释49

Martínez, Jesús A. (赫苏斯·A.马丁内斯) , 历史学家 : ignores Miaja' s Communist ties (无视米亚哈与共产党的关系) , 296—297

Martínez, JoséGregori (何塞·格雷戈里·马丁内斯) ,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总书记 : refuses JSU committee seat (拒绝接受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的职务) , 136 , 631

Martínez Amutio, Justo (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 , 社会党人 , 阿尔瓦塞特省省长 , 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书记 : on Stefanov (论斯特凡诺夫) , 第十二章注释57 ; on Togliatti (论陶里亚蒂) , 134 ; on Fischer as Soviet agent (论费希尔是苏联的代理人) , 第十三章注释46 ; describes Negrín (描述内格林) , 149 , 588—589 ; on detention of bank officials (关于苏联扣押西班牙银行职员) , 第十四章注释56 ; on credits secured by Negrín (论内格

林担保的贷款) , 154 ; on Communist pressure ( 关于共产党人施加的压力 ) , 219 ; on Vidali and Codovila ( 论维达利和柯多维拉 ) , 267 ; on Vidali' s exploitation of Madrid populace ( 论维达利利用马德里民众 ) , 267 ; confirms Togliatti' s presence in Spain ( 证实陶里亚蒂在西班牙 ) , 364 ; on Caballero memoirs ( 关于卡瓦列罗的回忆录 ) , 第四十五章注释19 ; on Negrín' s Communist appointments to police administration ( 论内格林将共产党人安排在警察部门 ) , 486—487 ; approves resolutions against Communists ( 批准反对共产党人的决议 ) , 560 ; on removal of Valencia Socialist federation committee ( 关于取缔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 ) , 561

Martínez Bande, Colonel José ( 何塞·马丁内斯·班德上校 ) , 亲民族主义历史学家 : on halting of Estremadura offensive ( 论没有实施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 ) , 468 ; on Casado' s negotiations with SIPM ( 关于卡萨多与宪兵情报局的谈判 ) , 706 , 707—708

Martínez Barrio, Diego ( 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 ) , 共和联盟领导人 , 总理 : desire to avoid revolution ( 希望避免革命 ) , 22 ; and Aza ( 与阿萨尼亚 ) , 38—39 , 449—450 , 469 ; on workers' assumption of police functions ( 论工人接管警察的职能 ) , 39 ; and Miaja ( 与米亚哈 ) , 39 , 291—292 ; withholds arms from workers ( 拒绝向工人发放武器 ) , 39—40 , 45 ; attempt to hold back military leaders ( 试图劝说军队领导人克制 ) , 40 ; forms moderate government ( 组成温和派政府 ) , 41 , 43 , 44 ; cabinet rejected by both right and left ( 内阁受到左右两派的抵制 ) , 44 ; Anarchosyndicalists' views on (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马丁内斯·巴里奥的看

法) , 45 ; decision to resign ( 决定辞职 ) , 45 ; dissolution of newly formed cabinet ( 刚组成的马丁内斯·巴里奥内阁解散 ) , 45 ; heads commission to organize volunteer army ( 领导组建志愿军的委员会 ) , 252 ; intervenes in release of asensio ( 为释放阿森西奥进行干预 ) , 359 ; at final Cortes meeting ( 在最后一次议会会议上 ) , 678 , 679 ; delays assuming presidency ( 推迟继任总统职务 ) , 700—701。另见UR

Martínez Cabrera, General Toribio ( 托里维奥·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 ) , 共和派将军 , 总参谋长 : on Soviet advisers and Republican army ( 论苏联军事顾问与共和派军队 ) , 278 ; replaces Estrada as general staff chief ( 接替埃斯特拉达担任总参谋长 ) , 282 ; in Valencia ( 逃往巴伦西亚 ) , 289 ; advised by meretakov ( 梅列茨科夫任其顾问 ) , 313 ; authorizes CNT Maroto Brigade ( 批准全国劳工联合会组建马罗托旅 ) , 331 ; replaces Estrada ( 接替埃斯特拉达 ) , 366 ; resignation demanded ( 被要求辞职 ) , 366 ; and Estremadura plans ( 与埃斯特雷马杜拉进攻计划 ) , 466

Martínez Cartón, Pedro ( 佩德罗·马丁内斯·卡顿 ) ,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 on Miaja ( 论米亚哈 ) , 292 ; in south—central zone ( 在中南部地区 ) , 687

Martínez de Aragón, José ( 何塞·马丁内斯·德·阿拉贡 ) , 亲共社会党人军官 : Enrique2 Castro ( 恩里克·卡斯特罗论马丁内斯·德·阿拉贡 ) , 73

Martínez de Campos, General Carlos ( 卡洛斯·马丁内斯·德·坎波斯将军 ) , 佛朗哥的参谋长 : on Mola' s posting to Pamplona ( 论把莫拉派到潘普洛纳 ) ,

第一章注释51

Marty, André ( 安德烈·马蒂 ) , 法国共产党员 , 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 : on struggle between fascism and democracy ( 论法西斯主义与民主的斗争 ) , 111—112 ; lauds Communist influence on Socialist leaders ( 称赞共产党对社会党领导人的影响 ) , 115 ; hostile to Kléber ( 敌视克莱贝尔 ) , 304 ; Regler on executions codered by ( 雷格勒论马蒂下达的处决令 ) , 314 ; and Hemingway ( 与海明威 ) , 第三十一章注释64 ; at politburo meeting on Caballero ouster ( 出席研究推翻卡瓦列罗的政治局会议 ) , 361 ; clashes with Díaz and Hernández ( 与迪亚斯和埃尔南德斯发生争执 ) , 362 ; and terror in International Brigades ( 与国际纵队中的恐怖行动 ) , 571

Marx, Karl ( 卡尔·马克思 ) : dialogue with Bakunin ( 与巴枯宁论战 ) , 193

Más, Valerio ( 巴莱里奥·马斯 ) , 全国劳工联合会巴塞罗那地方委员会书记 : named councillor in Catal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临时政府成员 ) , 451 ; on reasons for CNT withdrawal from Companys' s cabinet (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退出孔帕尼斯内阁的原因 ) , 495

Mas de las Masas ( 马斯—德拉斯马萨斯 ) , 集体化乡镇 : on freedom of movement in ( 外出自由 ) , 71

Mascarell, Manuel ( 曼努埃尔·马斯卡雷尔 ) , 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 : on danger of anarchist rigidity ( 论无政府主义者墨守成规的危害 ) , 208

Masons ( 共济会会员 ) 。见Freemasons

Masquelet, General Carlos ( 卡洛斯·马斯克莱特将军 ) , 阿萨尼亚政府的国防部长 : on officers' obedience to the legal government ( 论军官服从合法

政府的命令) , 13

Matallana, General Manuel (曼努埃尔·马塔利亚纳将军) , 中南部地区集团军司令 : at Los Llanos meeting (出席洛斯利亚诺斯会议) , 699 ; conspires to overthrow Negrín (密谋推翻内格林) , 699—700 ; meets with Casado (会见卡萨多) , 703 ; appointed chief central general staff (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 713—714

Mateu, Julio (胡里奥·马特乌) ,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 on Communists' efforts to aid small landowners (论共产党努力帮助小地主) , 85 ; on Communist sympathies in rural Valencia (论共产党在巴伦西亚农村得到广泛支持) , 86—87

Matthews, Herbert L. (赫伯特·L.马修斯) , 《纽约时报》记者 : makes light of July 1936 revolutionary changes (对一九三六年七月发生的革命性变化轻描淡写) , 54 ; as Negrín apologist (作为内格林的辩护士) , 141 , 第十三章注释35 , 586—587 ; on melting of coins by Soviets (关于西班牙金币被苏联人熔化) , 151 ; on Bollothen' s views on NKVD power (论博洛滕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的政治影响的看法) , 220—221 ; ignores accounts of Soviet influence in army (避而不谈苏联在军队中的影响) , 278—279 ; on Miaja (论米亚哈) , 294 ; on Kléber (论克莱贝尔) , 303 ; reports POUM trial (报道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审判) ,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 writes for News of Spain (为《西班牙新闻》写文章) ,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 on Negrín' s hope for war in Europe (关于内格林寄希望于欧洲战争) , 649

Maulnier, Thierry (蒂埃里·莫尼耶) , 法国右派 : fears a weak Germany (担

心出现一个虚弱的德国，93；openly expresses fears of Russia（公开表示对苏联的担忧），172

Maura, Antonio（1853—1925）（安东尼奥·毛拉），保守政府首相：307

Maura, Miguel（米格尔·毛拉），温和的保守共和派领导人：tries to place Prieto in premiership（试图使普列托出任总理），28—29；plans a government of “national concentration”（打算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政府），31；calls for a multiparty Republican dictatorship（要求组成一个多党派联合的共和国独裁政府），32；on failures of the Popular Front（论人民阵线的失败），32—33；as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forms Assault Guard corps（担任内政部长时创建突击卫队），42；on Aza’s fear of physical harm（论阿萨尼亚担心受到人身伤害），164—165

Maurín, Joaquín（华金·毛林），工农集团领导人：on weakness of Aza’s government（论阿萨尼亚政府的弱点），第三章注释2；co—founder of POUM（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共同创始人），405—406；arrest and imprisonment of（被捕与坐牢），405—406；Esenwein on（埃森魏因论毛林），405—406；Iglesias on（伊格莱西亚斯论毛林），405—406；Alba on（阿尔瓦论毛林），406；attacked by Trotsky（受到托洛茨基的攻击），406

Maximov, General（马克西莫夫将军）：第三十一章注释62

Maximovich（马克西莫维奇）。见Maximov, General

Maxton, James（詹姆斯·马克斯顿），英国下院议员，独立工党主席：visits

Spain in defense of POUM ( 为保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访问西班牙 ) , 505

May Events ( 五月事变 ) : 429—461 ; estimate of casualties ( 估计的伤亡人数 ) , 第四十三章注释64

Mazaleón ( 马萨莱昂村 ) : on disappearance of religion in ( 宗教活动不复存在 ) , 73

Medina ( 梅迪纳 ) 。见Codovila, Vittorio

Medlicott, W.N. ( W.N.梅德利科特 ) , 美国历史学家 : on Chamberlain' s strengths ( 论张伯伦的能力 ) , 186 ; on British appeasement policy ( 论英国的绥靖政策 ) , 653 ; and Wilson' s secret proposals ( 与威尔逊的秘密建议 ) , 658

Melchor, Federico ( 费德里科·梅尔乔 ) ,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 , 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世界报》的新任负责人 : against socialization of industries ( 反对对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 , 228—229 ; on protection of foreign capital ( 论保护外国资本 ) , 230 ; Carrillo appoints to Madrid security ( 卡里略将其安排在马德里的治安部门 ) , 299 ; is named negrín director general of propaganda ( 被任命为内格林的宣传总监 ) , 488

Melé ( 梅莱 ) 。见Krivoshein, Colonel S.

Melilla ( Spanish Morocco ) ( 西属摩洛哥的梅利利亚 ) : site of military rebellion ( 军事叛乱爆发地 ) , 38 ; arrival of Italian planes near ( 意大利飞机到达梅利利亚附近的机场 ) , 102

Membrilla ( 门布里利亚村 ) : Anarchist—run economic system in ( 无政府主义者在门布里利亚村实行的经济制度 ) , 70

Mena ( 梅纳 ) ,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的警卫班长 : on alleged plot to assassinate Prieto ( 关于所谓暗杀普列托的阴谋 ) , 549

Mena, Marciano ( 马西亚诺·梅纳 ) , 第二十九师政治委员 : executed during POUM repression ( 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期间被枪毙 ) , 502

Méndez, Dr. Rafael ( 拉斐尔·门德斯博士 ) , 内格林的亲信, 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 内政部副部长 : and Garcés Arroyo ( 与加尔塞斯·阿罗约 ) , 602 ; influences gómez sáez ( 影响戈麦斯·赛斯 ) , 606—607 ; on Negrín' s Communist alliance ( 论内格林与共产党的同盟关系 ) , 609—610 ; and Negrín' s alleged promise to outlaw PCE ( 与所谓内格林取缔西班牙共产党的承诺 ) , 672

Méndez Aspe, Francisco ( 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 ) , 左翼共和派人士, 内格林的财政部长 : and gold shipment to Mexico ( 与运往墨西哥的黄金财宝 ) , 第十三章注释23 ; flees scene of gold transfer ( 逃离装运黄金的现场 ) , 150 ; named to Negrín governments ( 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成员 ) , 585 , 618 ; leaves france for england ( 25 June 1940 ) (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离开法国去英国 ) , 590 ; remains in france ( 留在法国 ) , 685

Mendiola, Lieutenant Colonel Leocadio ( 莱奥卡多·门迪奥拉中校 ) , named military commander of Murcia ( 被任命为穆尔西亚驻军司令 ) , 715 ; Togliatti on ( 陶里亚蒂论门迪奥拉 ) , 718



Menéndez, Alvaro (阿尔瓦罗·梅嫩德斯), 共产党员: on Vidali in defense of Madrid (论马德里保卫战中的维达利), 287

Menéndez, Leopoldo (莱奥波尔多·梅嫩德斯), 中路军莱万特方面军司令: 714; at Los Llanos meeting (出席洛斯利亚诺斯会议), 699; conspires to overthrow Negrín (密谋推翻内格林), 699, 703

Menéndez de Beltrán, Leonor (莱昂诺尔·梅嫩德斯·德·贝尔特兰), 卡瓦列罗的同事: on Caballero memoir (关于卡瓦列罗的回忆录), 第四十五章注释19

Mera, Cipriano (西普里亚诺·梅拉), 中部前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无政府主义民兵部队指挥官: objects to government departure from Madrid (抗议政府逃离马德里), 207; on new belief in militarization (论对军事化的新看法), 326—328; and Communist ties to Anarchists (与西班牙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关系), 553; commands Fourth Army Corps (指挥第四军), 702; and Casado (与卡萨多), 703—704, 727; Romero on (罗梅罗论梅拉), 704; meets with Negrín (会见内格林), 704—705; makes radio broadcast after coup (政变后发表广播讲话), 727—728

Meretskov, K.A. (K.A.梅列茨科夫), 苏联军官, 马丁内斯·卡夫雷拉的顾问: on Soviet adviser and Republican army (论苏联军事顾问与共和国军队), 278; survives purges (免遭清洗), 313; becomes Red Army chief of staff (成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长), 313; adviser to Líster, Martínez Cabrera, Miaja (担任利斯特、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和米亚哈的顾问), 313; and Martínez Cabrera's organization of Maroto Brigade (马丁内斯·卡夫雷拉批准组建马罗托旅与梅列茨科夫), 331; on Caballero's lifestyle (论卡瓦

列罗的生活方式) , 345—346

Miaja, General José (何塞·米亚哈将军), 共和派军官, 马德里军区司令: joins Martínez Barrio' s government (加入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 39; opposed to arms distribution (反对发放武器), 第三章注释33; on late arrival of Soviet aid (关于苏联援助迟迟不到), 107; role in Madrid Defense Council (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中的角色), 284—285, 286, 290, 295, 315; Koltzon on (科利佐夫论米亚哈), 290; early member of right—wing UME (前右翼西班牙军人联盟成员), 291—292; refuses Giral war minister post (拒绝担任希拉尔政府的国防部长), 292; intoxicated with popularity (陶醉于巨大的声望), 292—293; breaks with Communists (与共产党人决裂), 293; Líster, Cerdón, Asensio, Ehrenburg, Malinovsky, Matthews, Fischer, Vidarte, Hidalgo de Cisneros, Rojo, Hugh Slater, and Hernández on (利斯特、科登、阿森西奥、爱伦堡、马利诺夫斯基、马修斯、费希尔、比达特、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罗霍、休·斯莱特和埃尔南德斯论米亚哈), 293—294; Castro on Miaja and M.T.León (卡斯特罗论米亚哈与玛丽娅·特蕾莎·莱昂), 294; Caballero on (卡瓦列罗论米亚哈), 294, 296; joins with Communists (加入共产党), 294, 316; Aza' s orders to dissolve junta (接到卡瓦列罗解散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命令), 第三十章注释98; jealous of Kléber (妒忌克莱贝尔), 304—305; advised by Meretskov (梅列茨科夫任其顾问), 313; backs Rojo' s refusal to be staff chief (支持罗霍拒绝担任总参谋长), 366; delays Extremadura offensive (拖延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 467; skepticism of (米亚哈的怀疑态度), 685—686; at Los Llanos meeting (出席洛斯利亚诺斯会议), 699; supports continued

resistance (支持继续进行抵抗) , 699 ; conspires to overthrow Negrín (密谋推翻内格林) , 699—700 , 703 ; named inspector general of armed services (被任命为三军监察长) , 713 ; named president , Casado junta (被任命为卡萨多委员会主席) , 726

Micaud, Charles A. (夏尔·A.米科) , 历史学家 : on French right' s refusal of Franco—Soviet Pact (论法国右派拒绝接受法苏条约) , 第八章注释14

Middle classes (中产阶级) 。见Small bourgeoisie

Middlemas, Keith (基思·米德尔马斯) , 英国历史学家 : on Britain' s responsibility to France (论英国对法国的责任) , 177—178 ; on Chamberlain and ideological conflict (论张伯伦与意识形态冲突) , 185—186 , 第十七章注释43 ; on Henderson and Chamberlain (论亨德森与张伯伦) , 653

Mije, Antonio (安东尼奥·米赫) , 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 on Communist defense of democratic Republic (论共产党主张保卫民主共和) , 115 , 229 国 ; on political commissars (论政治委员) , 275 ; holds subcommissariat in war ministry (负责国防部总政治部的分支部门) , 275 , 371 ; denounces Miaja after war (战后谴责米亚) , 293 哈 ; named war councillor , Madrid Defense Council (被任命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作战委员) , 295 ; at politburo meeting on Caballero ouster (出席研究推翻卡瓦列罗的政治局会议) , 362 ; issues denunciatory manifesto (发表谴责宣言) , 680—681 ;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

Milicia Popular (《人民战士报》), 共产党民兵第五团的喉舌: 140, 283—283

Milicias Antifascistas Obreras y Campesinal (反法西斯工农民兵)。见 MAOC

Militarization (军事化)。见CNT

Militarization,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军事化): of war industries, ports, and courts of law (对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战争工业、港口和法院实行军事化), 615, 637.另见CNT; Draft; Militia; PSUC

Military Directory (Primo de Rivera's dictatorship) (军事委员会, 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独裁政府): Caballero's service to (卡瓦列罗任职于其国务委员会), 196; relations with UGT (与劳动者总工会的关系), 196—197

Military revolt (军事叛乱): breaks out in Spanish Morocco (17 July 1936)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在西属摩洛哥爆发), 10, 38; failure precipitates revolution (叛乱失败促成革命), 21; explains excesses of Republican crimes (解释了共和派过激的犯罪行为为什么发生), 53; destroys standing army (毁掉正规军), 249

Militia (民兵武装): replaces Assault Guard (取代突击卫队), 48, 216; controls borders (控制边境), 49; formed by proletarian parties and labor unions (由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会组建), 250; defects of (缺陷), 254

—259 , 261—265 ; CNT militia ( 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民兵武装 ) , 261—263 ; Madrid Defense Committee militia regulations (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关于民兵的规章制度 ) , 264 ; CNT and defects of ( 全国劳工联合会与民兵武装的缺陷 ) , 325—326 ; new units remain under union control ( 新改编的部队仍由工会所控制 ) , 425

Minifie, James ( 詹姆斯·米尼菲 ) , 记者 : on Anarchists' fear of carabineros ( 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对边防警察部队的担忧 ) , 217

Minor, Robert ( 罗伯特·迈纳 ) , 《工人日报》记者 : describes uprising led by Nin and Gorkin ( 把五月事变中的战斗描述成由宁和戈尔金领导的法西斯暴动 ) , 445

Miravittles, Jaime ( 海梅·米拉维特列斯 )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 on union control of Catalanian plants ( 论工会控制加泰罗尼亚的工厂 ) , 388 ; on Orlov and Nin ( 论奥尔洛夫与安德烈斯·宁 ) , 509 , 第四十八章注释58

Miret, José ( 何塞·米雷特 )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 ,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物资供应专员 : 424

Mirova ( 米罗娃 ) , 塔斯社驻巴伦西亚代表 : interference in Spain ( 干涉西班牙事务 ) , 278 ; perishes in Stalin purge ( 被斯大林清洗 ) , 308

Modesto, Juan ( 胡安·莫德斯托 ) , 反法西斯工农民兵全国领导人 , 共产党民兵指挥官 : on late arrival of Soviet aid ( 关于苏联援助迟迟不到 ) , 107 ; on MAOC' s mission ( 论反法西斯工农民兵的任务 ) , 266 ; Prieto hostile toward ( 普列托对其怀有敌意 ) , 545 ; on commanders' return from

France (论军队指挥官从法国归来) , 688 ; promoted to general by Negrín (被内格林晋升为将军) , 714

Moix, José (何塞·莫伊克斯)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 内格林政府的加泰罗尼亚成员 : replaces Aiguadéin Negrín government (接替艾瓜德加入内格林政府) , 616 , 618

Mola, General Emilio (埃米利奥·莫拉将军) , 民族主义将领 : posted to Pamplona ( Navarre ) (被派到纳瓦拉省的潘普洛纳) , 12 ; directs insurrection (指挥策划暴动) , 12 , 第一章注释51 ; declares government unlawful (宣布政府非法) , 18 ; not transferred by Aza ; on reasons for delay of military rising (论推迟军事叛乱的原因) , 36 ; refuses Martínez Barrio' s offer of war ministry (拒绝马丁内斯·巴里奥提供的国防部长职位) , 40

Molina, Juan Manuel (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 , 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防务副专员 : defended by Tarradellas (塔拉德利亚斯为其辩护) , 415 ; tries stop CNT march on Barcelona (竭力阻止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民兵向巴塞罗那进军) , 452 , 527 ; halts CNT attack on Communists in Aragon (制止阿拉贡地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攻击共产党人) , 527—528 ; explains possible CNT attack to Negrín (向内格林说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民兵可能发动进攻) , 527—528

Molina Conejero, Manuel (曼努埃尔·莫利纳·科内赫罗) , 巴伦西亚省省长 : removes Valencia Socialist federation committee (取缔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 , 561

Molotov, Vyacheslav (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 ) 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主席 :  
claims German attempts to deal with USSR ( 抱怨德国打算对付苏联 ) ,  
89 ; rebuffed by Hitler after proposed negotiations ( 提出谈判的建议后  
遭到希特勒拒绝 ) , 106 ; signs Soviet letter to Caballero ( 在苏联写给卡  
瓦列罗的信上署名 ) , 165 , 315 ; Cisneros requests aid of ( 西斯内罗斯请求  
莫洛托夫提供援助 ) , 673—674

Monarchy ( 君主制 ) : fall of ( Apr.1931 ) ( 一九三一年四月被推翻 ) , 3

Montagu, Ivor ( 艾弗·蒙塔古 ) , 英国共产党员 : and Negrín' s Thirteen—  
Point program ( 与内格林的十三点方案 ) , 645—646

Montiel, Francisco ( 弗朗西斯科·蒙铁尔 ) , 社会党议员 : joins  
Communists ( 加入共产党 ) , 130 ; Llopis on Communists and ( 略皮斯论共产  
党人与蒙铁尔 ) , 351

Montseny, Federica ( 费德丽卡·蒙特塞尼 ) ,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  
主义者联盟领导人 , 卫生和公共救济部长 : says military revolt hastened  
revolution ( 认为军事叛乱加速了革命的爆发 ) , 21 ; on Revolution' s  
destructive power ( 论革命的破坏性力量 ) , 52 ; on patrullas de  
control ( 论治安巡逻队 ) , 第六章注释73 ; on M.Nelken ( 论玛加丽塔·内尔  
肯 ) , 第十二章注释29 ; on character of CNT (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特点 ) ,  
192 ; named minister in Caballero government ( 被任命为卡瓦列罗政府的部  
长 ) , 203—204 , 208—209 ; on why CNT entered government ( 论全国劳工联  
合会加入政府的原因 ) , 209—210 ; on government' s attempt to disband  
committees ( 论政府试图解散革命委员会 ) , 213 ; on Soviet advice to CNT

—FAI (关于苏联给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建议), 230—231; on CNT antimilitarization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反对军事化), 326; supports Asensio' s ouster (支持罢免阿森西奥), 355; on Republicans' adaptation to Revolution (论共和派适应革命), 391; on why Anarchists joined Generalitat (论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原因), 402; opposes takeover of Catalanian public order (反对中央政府接管加泰罗尼亚的社会治安), 439; on Berneri assassination (论暗杀贝尔内里事件),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fears provocation of Anarchists (担心激怒无政府主义者), 457; plans truce and peace demonstration (计划举行停战与和平示威), 459—460; represents CNT in meetings with UGT (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会谈), 568; on CNT support of Negrín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支持内格林), 626

Monzón, Jesús (赫苏斯·蒙松), 共产党议员: flees Spain (逃离西班牙), 733

Mora, Constanca de la (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 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妻子, 安东尼奥·毛拉的外孙女, 对外新闻司的共产党员新闻检查官: 307; Vayo appoints to foreign press bureau (德尔巴约安排其担任对外新闻司司长), 第十三章注释11, 501, 539; on Aza' s concerns about safety (论阿萨尼亚对安全的担忧), 438; on Bergamín' s cultural activities in Mexico (论贝尔加明在墨西哥的文化活动), 518; asks Eleanor Roosevelt for aid to exiles (请求埃莉诺·罗斯福帮助西班牙流亡者), 第四十九章注释18; clashes with Prieto (与普列托发生冲突), 539—540; censors reference to "popular revolution" (删去电讯中提到“人民革命”的内容), 556



Morayta Nu·莫赖塔·努涅斯) , 共产党人 , 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 : on peasants' land appropriation ( 论农民将土地据为己有 ) , 55 ; on rural land confiscations ( 论农村的没收土地 ) , 237

Moreno ( 莫雷诺 ) 。 见Stefanov, Boris

Moreno Gómez, Francisco ( 弗朗西斯科·莫雷诺·戈麦斯 ) , 历史学家 : on Miaja' s failure to capture Cordova ( 论米亚哈没有夺取科尔多瓦 ) , 292

Moriones, Colonel Domingo ( 多明戈·莫里奥内斯上校 ) : at Los Llanos meeting ( 出席洛斯利亚诺斯会议 ) , 699 ; named commander Army of Andalusia ( 被任命为安达卢西亚方面军司令 ) , 714

Morón, Gabriel ( 加夫列尔·莫隆 ) , 社会党温和派人士 , 安全总局局长 : on weakness of Socialist movement ( 论社会主义运动的衰落 ) , 129 ; on Prieto' s role in Caballero ouster ( 论普列托在推翻卡瓦列罗的计划中扮演的角色 ) , 466 ; sent away by Ortega during POUM seizure ( 占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部行动时被奥尔特加支走 ) , 500 ; replaces Ortega ( 取代奥尔特加 ) , 511 ; denounces Prieto for not resisting Communists ( 谴责普列托不抵制共产党人 ) , 511 ; attempts to reorganize police corps ( 试图整顿警察部队 ) , 512 , 513 ; on SIM ties to Communists ( 论军事调查局与共产党人的关系 ) , 549 , 601 ; on Casado ( 论卡萨多 ) , 703

Morrow, Felix ( 费利克斯·莫罗 ) , 美国的托洛茨基分子 : criticizes CNT and POUM leadership ( 批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 ) , 442 —443 ; countered by "Senex" ( 遭到 "老者" 反驳 ) , 443—444 ; on CNT

denunciation of Friends Durruti (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谴责杜鲁蒂之友会 ) , 455

Moscardó, Colonel José ( 何塞·莫斯卡多上校 ) , 民族主义军官 : Rojo presents with surrender terms at Alcázar ( 罗霍向其守卫的托莱多城堡提出投降的条件 ) , 300

Moulin ( 莫林 ) 。见Freuns, Hans

Mowat, Charles L. ( 查尔斯·L.莫厄特 ) , 英国历史学家 : on British colonial neutrality ( 论英国殖民地保持中立 ) , 661

Mozos de Escuadra ( 青年卫队 ) ,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警卫部队 : and defeat of military insurrection ( 与挫败军事叛乱 ) , 389 ; alleged role in assassination of Berneri and Barbieri ( 被指控参与暗杀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 ) ,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Muedra, Colonel Félix ( 费利克斯·穆埃德拉上校 ) , 中路军军官 : suspected of spying ( 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 , 714

Muenzenberg, Willi ( 维利·明岑贝格 ) , 共产国际宣传人员 : controls Agencia Española Obrera ( 《工人世界报》 ) , 共产党的喉舌 : 83 , 111 , 112 , 161 , 212 , 215 , 232 , 236 , 251—252 , 266 , 283 , 295 , 299 , 355 , 366 , 367 , 381—382 , 501 , 540 , 554 , 640 , 702 , 736

Muniesa ( 穆涅萨村 ) : currency system in ( 穆涅萨村的流通方式 ) , 72

Munis ( 穆尼斯 ) 。见Fernández Grandizo, Manuel

Mu·穆尼奥斯·格兰德斯中校) : Galarza names chief of Assault Guard ( 加拉尔萨任命其为突击卫队负责人 ) , 42 ; continued contact with Assault Guard members ( 与突击卫队的许多军官保持着联系 ) , 43

Mu·穆尼奥斯·洛佩斯) , 军事调查局官员 : on Garcés Arroyo' s allegiance ( 论加尔塞斯·阿罗约的效忠对象 ) , 602 ; on Rafael Méndez ( 论拉斐尔·门德斯 ) , 610

Mu·穆尼奥斯·桑切斯) , 社会党左派 , 卡瓦列罗的支持者 : chosen to go to Barcelona ( 被选派去巴塞罗那 ) , 436

Mussolini, Benito ( 贝尼托·墨索里尼 ) 。见Italy

Nador ( 纳祖尔 ) , 西属摩洛哥机场所在地 : arrival of 24 Italian planes by 2 Aug. ( 八月二日意大利飞机抵达纳祖尔 ) , 102

Namier, Sir Lewis ( 刘易斯·内米尔爵士 ) , 英国历史学家 : on secret British—German negotiations ( 论英国与德国的秘密谈判 ) , 658

Naroday Bank ( 人民银行 ) , 伦敦的莫斯科银行 : and secret foreign exchange transactions ( 与秘密外汇交易 ) , 147

The Nation ( 《民族》 ) , 纽约的刊物 : Vayo works for ( 德尔巴约为其工作 ) , 138

National Committee of Road Transport ( 道路运输全国委员会 ) : dominated by CNT and UGT ( 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控制 ) , 259

National Council of Defense ( 国防委员会 ) : Miaja' s participation in ( 米亚哈加入国防委员会 ) , 293

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nd Workers ( in UGT ) ( 劳动者总工会所属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 ) 。见FNTT

National Front ( Bloque Nacional ) ( 民族阵线 ) : led by Calvo Sotelo ( 由卡尔沃·索特洛领导 ) , 16

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 全国联络委员会 ) : on Socialist—Communist fusion ( 关于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 ) , 537

National Republican Guard ( 共和国国家卫队 ) : Civil Guard reorganized as ( 国民卫队重组成为共和国国家卫队 ) , 48 , 216 ; attempts to disarm Abarchists ( 试图解除无政府主义者的武装 ) , 428

Nationalist repression ( 民族主义者控制区的镇压活动 ) : casualty statistics ( 杀害人数统计 ) , 第四章注释68

Navarro Márques, Ernesto ( 埃内斯托·纳瓦罗·马克斯 ) , 科登的战术秘书 : 714

Navy ( 海军 ) : murder of officers , ascendance of sailors' committees ( 水兵委员会决定是否杀害军官 ) , 49 ; ineffectuality during Civil War ( 内战期间战斗力低下 ) , 第四章注释31 ; Negrín tolerates Socialists in ( 内格林容忍社会党人占据海军的关键职位 ) , 593

Nazi regime ( 纳粹政权 ) 。见Germany ; Hitler, Adolf

Negrín, Juan (胡安·内格林), 社会党温和派人士, 财政部长, 总理, 国防部长: on weakness of post-rising government (论叛乱后政府的虚弱), 49; Krivitsky on (克里维茨基论内格林), 105—106, 476—477; initially opposes Caballero government (最初反对卡瓦列罗组阁), 121; Soviet support of his premiership (苏联支持其出任总理), 第十一章注释26; named finance minister (被任命为财政部长), 122, 203; importance of Communist influence on (共产党对其影响的重要性), 138, 139—140, 609, 713; biography (生平简历), 139; suspension from Madrid Socialist party (被社会党的马德里地方组织停职), 140; and Stashevsky (与斯塔舍夫斯基), 142—143, 476; role in golds affair (在把黄金运往苏联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 143, 145, 146, 148, 151—152, 153; overthrown by left-wing coalition (Mar.1939) (一九三九年三月被左翼各派联合推翻), 162, 483; on Soviet promise of Franco—British intervention (论苏联指望英法干涉), 184; reorganizes carabineros (重建边防警察部队), 217; plans to gain control factories (打算取得工厂的控制权), 224, 227; appoints Garcés Arroyo to head SIM (Apr.1938) (一九三八年四月任命加尔塞斯·阿罗约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 301; Togliatti offers as Caballero successor (陶里亚蒂提出让内格林成为卡瓦列罗的继任者), 363; and carabineros (与边防警察部队), 427, 460, 491, 493; announces resignation of Socialist ministers (宣布社会党温和派政府部长辞职), 470; named premier by AzaNews of Spain (被《西班牙新闻》突出报道),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Hernández explains Communist goals to (埃尔南德斯向其说明共产党的目标), 477—478; urges Vidarte to accept undersecretaryship of the interior (劝说比达特接受内政部副部长的职

务) , 486—487 ; at odds with CNT (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势不两立 ) , 491 ; and Nin affair ( 与宁事件 ) , 509—511 , 513—514 ; orders creation of Tribunales Especiales de Guardia ( 下令设立特别安保法庭 ) , 514 ; visit to Roosevelt White House ( 到罗斯福的白宫做客 ) , 第四十九章注释18 ; allegedly asks death penalty for POUM members ( 据说要求判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死刑 ) , 518—519 ; dissolves Aragon Defense Council ( 解散保卫阿拉贡委员会 ) , 525 ; hears of possible CNT attack on Communists ( 得知全国劳工联合会可能攻击共产党人 ) , 528 ; explains postponement of cortes opening ( 解释推迟议会会期的原因 ) , 558 ; on Caballero' s loss of public support ( 论卡瓦列罗失去公众的支持 ) , 562 ; against mediation ( 反对调停 ) , 576—577 ; dismisses Prieto as defense minister ( 解除普列托的国防部长职务 ) , 581 ; forms new government ( 5 Apr.1938 ) ( 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组成新政府 ) , 585 ; assumes defense ministry and premiership ( 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 , 585 ; tries to retain Prieto ( 试图挽留普列托 ) , 586 ; views on his political allegiance ( 对其在政治上效忠共产党的看法 ) , 586—587 ; criticized by Togliatti ( 受到陶里亚蒂的批评 ) , 589—590 ; reasons for collaborating with Moscow ( 与苏联合作的理由 ) , 591—592 ; makes false concessions to Socialists ( 对社会党人作出虚假的让步 ) , 596—597 ; silences El Socialista ( 《社会主义者》 ) , 608 ; against regionalist tendencies ( 反对地方主义倾向 ) , 613—614 ; forms new cabinet ( 17 Aug. ) ( 八月十七日组成新内阁 ) , 616 , 618—619 ; parties' animosity toward ( 各党派敌视内格林 ) , 629 ; and Thirteen—Point program ( 与十三点方案 ) , 642—646 ; hopes for war in Europe ( 寄希望于欧洲战争 ) , 649 ; ouster of ( Mar.1939 ) ( 一九三九年三月

被赶下台) , 654 ; on Communist predominance in army ( 关于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 ) , 665—666 ; on “what might have happened” ( 关于 “可能发生的情况” ) , 666—667 ; on withdrawal of foreign volunteers ( 论撤出外国志愿人员 ) , 第六十二章注释23 ; requests Stalin’ s aid ( 要求斯大林提供援助 ) , 669—671 ; dislikes multiparty system ( 不喜欢多党制 ) , 671 ; allegedly promises to outlaw PCE ( 据说答应取缔西班牙共产党 ) , 671—672 ; Togliatti makes scapegoat of ( 陶里亚蒂将其当做替罪羊 ) , 675—677 ; speaks at last Cortes meeting ( 在最后一次议会会议上讲话 ) , 678—679 ; flight of ( 逃走 ) , 681 , 731 , 734 ; return to Alicante ( 返回阿利坎特 ) , 685 , 687 ; tries to persuade Aza694 , 720 ; makes peace proposals ( 提出和平建议 ) , 697 ; delays ending war ( 迟迟不停战 ) , 698—700 , 716—718 ; relation with Casado ( 与卡萨多的关系 ) , 700 , 710 , 711—712 , 728—729 ; meets with Cipriano Mera ( 会见西普里亚诺·梅拉 ) , 704—705 ; convinced that war is lost ( 相信战争失败了 ) , 723

Negrín, Rómulo ( 罗慕洛·内格林 ) , 胡安·内格林的儿子 : submits documents to Franco ( Dec.1956 ) (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向佛朗哥移交其父的文件 ) , 148

Nelken, Margarita ( 玛加丽塔·内尔肯 ) , 社会党左派议员 : confirms that workers were armed by Rodrigo Gil ( 证实罗德里戈·希尔向工人发放武器 ) , 39 ; joins Communists ( 加入共产党 ) , 130 , 第十二章注释29 ; Llopis on Communists and ( 略皮斯论共产党人与内尔肯 ) , 351 ; on Díaz Tintero’ s usefulness to Communist ( 论迪亚斯·滕德罗对共产党人的用处 ) , 356—357

Nenni, Pietro ( 彼得罗·南尼 ) , 意大利共产党员 , 国际纵队政委 : on

Prieto' s power ( 论普列托的能力 ) , 120 ; on Prieto and PSOE—PCE fusion ( 关于普列托与社会党—共产党合并 ) , 383 , 第三十七章注释13 , 535

Neurath ( 诺伊拉特 ) , 德国外交部长 : on Hitler' s refusal to negotiate with Russia ( 关于希特勒拒绝与苏联谈判 ) , 106

New York Times ( 《纽约时报》 ) 。见Matthews, Herbert L.

Newman, Simon ( 西蒙·纽曼 ) , 英国历史学家 : and Wilson' s secret proposals ( 与威尔逊的秘密建议 ) , 658 ; “neo—revisionism” of ( 纽曼对绥靖政策的“新修正主义”阐述 ) , 第六十一章注释58

The News of Spain ( 《西班牙新闻》 ) , 在纽约出版的小报 , 索思沃思主编 :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 645

Newspapers and print shops ( 报纸和印刷厂 ) : union control of ( 工会控制报纸和印刷厂 ) , 第四章注释88

Nicolaevsky, Boris ( 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 ) , 苏联事务专家 : on Krivitsky ( 论克里维茨基 ) , 105 , 第九章注释44

Nicolson, Sir Harold ( 哈罗德·尼科尔森爵士 ) , 英国工党下院议员 , 作家 : on British sacrifice of eastern nations ( 论英国牺牲东方国家 ) , 第八章注释29 ; fears Soviet takeover ( 担心苏联控制世界 ) , 172—173

Nieto, Luis ( 路易斯·涅托 ) , 劳动者总工会成员 ( 共产党员 ) , 保卫马德里代表委员会军需代表 : 296



Nikolsky (尼科利斯基)。见Orlov, Alexander

Nin, Andrés (安德烈斯·宁), 共产党员左派领导人,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司法专员: named Catalan justice councillor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司法专员), 403; former disciple of Trotsky (曾为托洛茨基的信徒), 405, 406—407; on POUM (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405; takes over POUM (接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405—406; explains POUS entrance into UGT (解释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加入劳动者总工会的原因), 407; PSUC excludes from Generalitat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将宁逐出自治政府), 410—411; accuses PSUC of destorying revolution (指责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破坏革命), 416; supports CNT on militia (在民兵问题上支持全国劳工联合会), 422; in News of Spain (在《西班牙新闻》的报道中),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arrest and disappearance of (被捕与失踪), 503, 506—512; resistance halts NKVD plans (宁的反抗打乱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计划), 520。另见POUM

NKVD (also GPU, OGPU)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或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Nicolaevsky on Krivitsky in (尼古拉耶夫斯基论克里维茨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 105; its power in Spain (在西班牙的势力), 219—221, 第二十一章注释49; history of (历史), 第二十一章注释36; and POUM (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298, 500—501, 508; Fiscer on its role in Stalin's purges (费希尔论其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所起的作用), 308; allegedly criticized by Berzin and Stashevsky (据说受到别尔津和斯塔舍夫斯基的批评), 319; Zugazagoitia on its influence in Negrín government (苏加萨戈伊蒂亚论其在内格林政府中的势力), 486; authors "Max

Rieger' s" book ( 炮制 “马克斯·里格尔” 的书 ) , 517—518 ; fails to extract confession from Nin ( 没能取得宁的供词 ) , 529

No Importa ( 《无所谓》 ) , 长枪党的地下报纸 : 17—18

La Noche ( 《晚报》 ) , 巴塞罗那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报纸 : 420

Noja Ruiz, Higinio ( 伊希尼奥·诺哈·鲁伊斯 ) , 著名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员 : on involuntary collectivization ( 论强加于人的集体化 ) , 76

Nollau, Günther ( 京特·诺劳 ) , 历史学家 : on Togliatti ( 论陶里亚蒂 ) , 365

Non—Intervention Agreement ( 不干涉公约 ) : proposed by France and signed by USSR ( Aug.1936 ) ( 一九三六年八月由法国提出 , 苏联随后签署 ) , 99 ; Stalin start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pite of ( 斯大林不顾不干涉公约开始进行军事干涉 ) , 100—101

El Norte de Castilla ( 《卡斯蒂利亚北方报》 ) , 巴利亚多利德的报纸 : 42

Nosotros ( 《我们》 ) , 巴伦西亚的无政府主义报纸 : 322 , 332 , 第三十二章注释 50 , 337—338 , 339—341 , 357—359

Las Noticias ( 《消息报》 )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的喉舌 : 501 ; Caballero loses control of ( 卡瓦列罗对其失去控制 ) , 561

Novak, A. ( A. 诺瓦克 ) , 苏联军官 : 312

Nu·努涅斯·德·普拉多将军 ) , 民航总署署长 : 39

Nu·努涅斯·马萨 ) , 民航总署技术干事 , 共产党员 : Miaja refuses for arms ( 米亚哈拒绝其向工人提供武器的要求 ) , 39 ; Negrín appoints to undersecretaryship ( 内格林任命其为国防部副部长 ) , 592—593 , 597 ; against further resistance ( 反对继续进行抵抗 ) , 686

Nu·努涅斯·莫尔加达 ) , 智利驻马德里大使 : on Spanish refugees in Madrid embassies ( 关于马德里外国使馆里的西班牙避难者 ) , 52

Nu·努尼奥 ) , 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战争工业委员 : 295

Nuremberg trials ( 纽伦堡审判 ) : Goering describes German aid to military rebellion ( 戈林供述德国对叛军的援助 ) , 97—98 ; Britain attempts to prevent ( 英国试图阻止纽伦堡审判 ) , 第十七章注释36 ; destruction of documents relevant to ( 销毁有关的文件 ) , 第十七章注释36

Oak, Liston ( 利斯顿·奥克 ) : on censorship of economic reports ( 论对经济报道的审查 ) , 139

El Obrero de la Tierra ( 《农业工人报》 ) , 社会党左派 ( 劳动者总工会 ) 的报纸 : 5—6

Observer ( 《观察家报》 ) : 175 , 第十六章注释52 , 177 , 第十六章注释53

Oca·奥卡尼亚 ) , 无政府主义者 : reacts to order silencing libertarian communism ( 对不许谈论自由共产主义运动的指示的反应 ) , 第十九章注释38

October 1934 uprising ( 一九三四年的十月暴动 ) : 24 , 第二章注释15

Octubre, segunda etapa ( 《十月, 第二阶段》 ), 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秘密散发的小册子 : 24

Oehler, Hugo ( 雨果·奥勒 ), 美国托洛茨基分子 : on POUM and Friends Durruti ( 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杜鲁蒂之友会 ), 442

Ogilvie—Forbes, Sir G. ( G.奥格尔维—福布斯爵士 ), 英国驻柏林代办 : on German attack on West ( 关于德国进攻西方 ), 657

OGPU (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见NKVD

Olaso, Joaquín ( 华金·奥拉索 ), 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人 : conducts PSUC surveillance ( 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内部进行监视 ), 399—400

Olmedo Delgado, Antonio ( 安东尼奥·奥尔梅多·德尔加多 ), 凯波·德·利亚诺的支持者 : 41

Oma·奥马尼亚·迪亚斯 ) : appointed Valencia general commissar ( 被任命为巴伦西亚警察总署署长 ), 219

Orgaz, General Luis ( 路易斯·奥尔加斯将军 ), 右翼军官 : deprived of command and imprisoned ( 被剥夺了指挥权并被监禁 ) 13

Orlov, Alexander (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特工负责人 : Ktivitsky on ( 克里维茨基论奥尔洛夫 ), 106, 310 ; on Soviets' desire to prolong Spanish war ( 论苏联希望拖延西班牙内战 ), 109 ; biography of ( 生平简历 ), 第十三章注释55 ; claims Negrín initiated gold shipment to Russia ( 声称内格林提出把西班牙的黄金运往苏联 ), 143 ;

receives Stalin telegram on gold shipment (收到斯大林关于运送黄金的电报) , 147 ; on Negrín' s na' s early ignorance of gold shipment (证实普列托最初对运送黄金的计划并不知情) , 155 ; receives Order of Lenin (获得列宁勋章) , 158 ; party and code names of (党内的化名和代号) , 219—220 ; sets up Spanish NKVD (在西班牙建立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组织) , 219—221 ; on liquidation of Gorev , Berzin , and others (论斯大林杀掉戈列夫、别尔津以及另外一些人) , 312 , 319 ; and Rosenberg (与罗森堡) , 319 ; allegedly at politburo meeting on Caballero ouster (据说出席了研究推翻卡瓦列罗的政治局会议) , 361—363 ; Bertram Wolfe on (伯特伦·沃尔夫论奥尔洛夫) , 363 ; erroneously described by Hernández (埃尔南德斯误认奥尔洛夫) , 363—364 ; Poretsky claims presence of two Alexander Orlovs (波列茨基声称有两个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 第三十五章注释49 ; and seizure of POUM headquarters (与占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部的行动) , 500 ; and Nin' s execution (与处决宁) , 506—507 , 508—509 , 510 ; Zugazagoitia fears to expose (苏加萨戈伊蒂亚担心奥尔洛夫暴露出来) , 511 ; relation with Prieto (与普列托的关系) , 546—548 , 549 ; controls SIM' s operations (指挥军事调查局的行动) , 600 ; defection of (叛逃) , 605 ; on Soviet "misinformation" (论苏联"传递错误信息") , 655。另见 NKVD

Ortega, Lieutenant Colonel Antonio (安东尼奥·奥尔特加中校) , 共产党员, 安全总局局长: Communists arrange appointment of (共产党人安排奥尔特加的任命) , 486 ; replaces W.Carrillo as director general of security (取代文塞斯劳·卡里略担任安全总局局长) , 486 ; orders seizure of

POUM headquarters ( 下令占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部 ) , 500 , 508 ;  
withholds knowledge of coup from Zugazagoitia ( 对苏加萨戈伊蒂亚隐瞒采取  
突击行动的消息 ) , 500 ; defended by PCE after Nin' s  
disappearance ( 宁失踪后西班牙共产党为奥尔特加辩护 ) , 510 ; removed from  
post ( 被撤职 ) , 511 , 513 ; commander Third Army Corps ( 任第三军军长 ) ,  
702 ; fate of ( 死亡 ) , 737

Ortega, Major Leopoldo ( 莱奥波尔多·奥尔特加少校 ) , 共和派参谋人员 :  
meets with Franco' s representative ( 与佛朗哥的代表会谈 ) , 740—742

Ortega y Gasset, José ( 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 ) , 哲学家 : flight from  
Spain ( 逃离西班牙 ) , 第四章注释58 , 164

Orwell, George ( 乔治·奥威尔 ) , 英国作家 : on withholding of arms from  
Anarchist units ( 论不给无政府主义民兵部队武器 ) , 第四十一章注释44 ; on  
rivalry and hatred in Barcelona ( 论巴塞罗那的对立和敌意 ) , 427 ; on  
building of barricades ( 论构筑街垒 ) , 432 ; on battle in  
Barcelona ( 论巴塞罗那的战斗 ) , 434—435 ; foresees POUM used as  
scapegoat ( 预感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将被当做替罪羊 ) , 455 ; on POUM  
arrests and repression ( 论逮捕和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 503

Ossorio y Gallardo, Angel ( 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 ) , 共和派法官 :  
speaks with Azaadvises middle classes to align with proletariat ( 建  
议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 ) , 81 ; on demoralization of Aza' s  
relations with Anarchists ( 关于孔帕尼斯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 ) , 389 ,  
393 ; on Companys' s humanitarian activities ( 论孔帕尼斯的人道主义行

为) , 391

OVRA ( 监控镇压反法西斯分子机构 ) , 墨索里尼的秘密警察 : and murders of Berneri and Barbieri ( 与谋杀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 ) ,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Pablo, General ( 巴勃罗将军 ) 。见Pavlov, General D.G.

Pabón, Benito ( 贝尼托·帕冯 ) , 工联党领导人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律师 : forced to flee abroad fro planning to defend POUM ( 因打算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辩护而被迫逃往国外 ) , 505 , 516 ; career of ( 简历 ) , 第四十八章注释41 ; persuades CNT to back Aragon Defense Council ( 说服全国劳工联合会支持保卫阿拉贡委员会 ) , 524—525

Padelford, Norman J. ( 诺曼·J.帕德尔福德 ) , 历史学家 : on Spanish refugees in Madrid embassies ( 关于马德里外国使馆里的西班牙避难者 ) , 52

Palacio, Solano ( 索拉诺·帕拉西奥 ) , 无政府主义者 : on militia' s relations with officers ( 论民兵与军官的关系 ) , 329

Palacio Atard, Vicente ( 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 ) , 右翼历史学家 : on Aza' s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 论阿萨尼亚政府与军队 ) , 13 , 34 ; on active brigadier generals who rebelled ( 关于反叛的现役准将 ) , 48

Palacios, Julio ( 胡里奥·帕拉西奥斯 ) , 马德里大学教授 , 宪兵情报局特工 : on SIPM negotiations with Casado ( 关于宪兵情报局与卡萨多的谈判 ) , 706

Papen, Franz von ( 弗朗茨·冯·巴本 ) , 德国驻奥地利大使 : on France' s assurances to Hitler ( 关于法国对希特勒的保证 ) , 652

Partido Autonomista ( 自治党成员 ) : small proprietors join Communist Peasant Federation ( 加入共产党成立的农民联合会的小地主 ) , 86

Partido Comunista Espa<sup>ña</sup>见PCE

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见  
POUM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sup>ña</sup>见PSOE

Partit CatalàProletaria ( 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党 ) : as source of  
PSUC ( 作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发起者 ) , 397

Partit Comunista de Catalunya ( 加泰罗尼亚共产党 ) : as source of  
PSUC ( 作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发起者 ) , 397

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 。见  
PSUC

Pascua, Marcelino ( 马塞利诺·帕斯库亚 ) , 社会党议员 , 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 :  
delivers letters asking Soviet approval of gold shipment ( 递交请求苏联同意把西班牙黄金运往苏联的信件 ) , 143 ; on secrecy of foreign  
exchange transactions ( 论秘密进行的外汇交易 ) , 147 ; signs receipt for  
Cartagena shipment ( 在卡塔赫纳运到莫斯科的黄金收据上签名 ) , 147 ;  
Amutio on ( 阿穆蒂奥论帕斯库亚 ) , 第十四章注释56 ; requests Soviet  
credits ( 要求苏联提供贷款 ) , 153—154 , 673 , 675 ; unaware of Gaykis' s  
or Stashevsky' s fate ( 不知道盖基斯或斯塔舍夫斯基的下落 ) , 319 ; brings



Stalin' s request for Socialist—Communist fusion ( 带来斯大林请求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的信息 ) , 352

Pasionaria ( La Pasionria ) ( 热情之花 ) 。见Ibárruri, Dolores

Pastor Petit, D. ( D.帕斯托尔·佩蒂特 ) , 加泰罗尼亚历史学家 : on Garcés Arroyo and SIM ( 论加尔塞斯·阿罗约与军事调查局 ) , 602 , 603—604

Patrols ( 巡逻队 ) : Montseny on revolutionary police squads ( 蒙特塞尼论革命治安小分队 ) , 第六章注释73 ; dissolved under PSUC pressure ( 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压力下被解散 ) , 492 , 493 ; offer services to Torres Iglesias ( 愿意为托雷斯·伊格莱西亚斯效力 ) , 493

Patrullas de Control ( 治安巡逻队 ) 。见Patrols

Pavlov, General D.G. ( Д.Г.帕夫洛夫将军 ) , 化名巴勃罗将军 , 苏联军官 , 坦克部队指挥官 : and Gorev ( 与戈列夫 ) , 307 ; Líster on ( 利斯特论帕夫洛夫 ) , 307 ; perishes in Stalin purge ( 1941 ) ( 一九四一年被斯大林清洗 ) , 308 , 312

Payne, Stanley G. ( 斯坦利·G.佩恩 ) , 美国历史学家 : on posts held by pro—Republican generals ( 关于亲共和派将军占据的职位 ) , 13 ; on Aza' s reluctance to use security forces ( 不愿动用治安部队 ) , 15—16 ; on left—wing Socialists' views on Communists ( 论社会党左派对共产党人的看法 ) , 26 ; on Aza' s treatment of military intrigue ( 论阿萨尼亚对待军方阴谋的做法 ) , 35 ; on formation of Assault Guard ( 论突击卫队的建立 ) , 42 ; on promise made to Franco of command of Morocco forces ( 论

军方答应把西属摩洛哥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佛朗哥) , 43 ; on coalition government ( 论联合政府 ) 123 ; questions Orlov ( 向奥尔洛夫提问 ) , 220 , 509 , 546—547 ; on Díaz Tintero ( 论迪亚斯·滕德罗 ) , 357

PCE ( Partido Comunista Espa' s financial base ( 攻击教会的经济基础 ) , 第一章注释63 ; and plans for Socialist—Communist fusion ( 与社会党—共产党合并的打算 ) , 25—26 , 350 , 381 , 384—385 , 536—537 , 643—644 ; attempts to strengthen Popular Front ( 努力巩固人民阵线 ) , 26 , 110 , 314—315 ; Caballero' s value to ( 卡瓦列罗对共产党的利用价值 ) , 26—27 ; demands removal of reactionary army officers ( 要求清除反动军官 ) , 35 ; organizes own militia ( 组织自己的民兵武装 ) , 38—40 ; on "surrender of the Republic" ( 论 "共和派缴械投降" ) , 44 ; former Republicans find support in ( 前共和派人士在共产党里找到避难所 ) , 83 ; ascendance and role of ( 支配地位和影响力 ) , 83 , 124—125 ; defends small property owners ( 保护小业主和小地主 ) , 84—86 , 228 , 238 ; controls agriculture ministry ( 控制农业部门 ) , 86 ; defines events as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 将发生的事情解释成为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 87 , 115 , 640—641 ; revolutionary measures in electoral program ( Oct.1933 ) ( 一九三三年十月竞选纲领中的革命措施 ) , 第八章注释1 , 100 ; newly moderate goals ( July 1936 ) ( 一九三六年七月提出的温和的新目标 ) , 88 , 96 , 100 ; military rebels claim PCE plot to set up Soviet regime ( 军事叛乱者声称西班牙共产党密谋建立苏维埃政权 ) , 99 ; and Madrid construction strike ( 与马德里建筑工人的罢工 ) , 100 ; denounces Ktivitsky as imposter ( 把克里维茨基斥为江湖骗子 ) , 105 ; and

International Brigades (与国际纵队) , 108 , 第三十章注释128 ; and French Communist aims (与法国共产党的目标) , 112 ; on struggle as people' s defensive war (把斗争称为人民保卫战) , 113 ; and control of Spanish left (与控制西班牙左派阵营) , 114—115 , 187 , 479 ; mediates takeover by Caballero (促成卡瓦列罗接管政府) , 120—121 ; first refuses to enter Popular Front government (最初拒绝加入人民阵线政府) , 121 , 123 ; approves Caballero unity with Basque Nationalists (盛赞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加入卡瓦列罗政府) , 123 ; as viewed by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对共产党的看法) , 125—126 ; takes over Madrid control from CNT (取代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马德里) , 128 ; attempts to win over Britain and France (努力争取获得英法两国的支持) , 191 ; welcomes CNT into government (欢迎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 , 212—213 ; on dangers inherent in workers' committees (论工人委员会固有的危害) , 215 ; pressures on civil governors (向各省的地方长官施加压力) , 219 ; arranges n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es (打算工业国有化) , 223 ; allegedly initiates land confiscations (声称认可没收的土地) , 237 ; asks for voluntary collectivization (要求自愿实行集体化) , 238 ; mobilizes agricultural laborers (鼓动农业工人) , 241 ; supports collectives outside Aragon (在阿拉贡以外的地区支持集体农庄) , 244—245 ; military policy of (军事政策) , 251 , 266 , 269—270 , 272—274 , 275 , 281 , 283—284 , 286 , 296—299 , 第三十二章注释16 , 345 , 347—348 , 360 , 370—371 , 373—374 , 375 , 467 , 488 ; clashes with Caballero (与卡瓦列罗产生矛盾) , 280 , 316 , 318—319 , 320 , 361 ; demands Asensio' s ouster from central front (要求解除阿森西奥的中部前线指挥权) , 281 ,

348 ; asks removal of Casado as operations chief ( 要求解除卡萨多国防部军事行动负责人的职务 ) , 282 ; and government' s departure ( 政府撤离与共产党 ) , 283 ; Llopis on disloyalty of ( 略皮斯论共产党的出尔反尔 ) , 351 ; campaigns against Caballero ( 诋毁卡瓦列罗 ) , 352—353 , 357 , 361—363 , 365—367 , 464 , 470 ; Baráibar on ( 巴赖瓦尔论共产党 ) , 368—370 ; and Prieto ( 与普列托 ) , 381 , 483 ; influence in Catalonia ( 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共产党势力 ) , 397—398 , 400 ; and POUM ( 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 405 , 408—409 , 445 , 462 , 465 , 501 , 504 , 517—518 , 521 ; urges Caballero to act in Barcelona ( 逼迫卡瓦列罗对巴塞罗那采取行动 ) , 436 ; and murders of Berneri and Barbieri ( 与暗杀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 ) ,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 ignored by Caballero in cabinet plans ( 卡瓦列罗的组阁计划不考虑西班牙共产党 ) , 472—473 ; tightens control under Negrín ( 在内格林之下加强控制 ) , 483—484 , 486 ; asks for Ortega' s appointment as security director ( 要求任命奥尔特加为安全总局局长 ) , 486 ; regains control of political commissars ( 夺回政治委员的控制权 ) , 487 ; on Nin' s disappearance ( 关于宁的失踪的说法 ) , 507 , 508 ; helps author "Max Rieger' s" book ( 协助炮制 "马克斯·里格尔" 的书 ) , 518 ; restores some collectives ( 恢复了一些集体农庄 ) , 530 , 535 ; Prieto clashes with ( 普列托与共产党产生矛盾 ) , 535 , 539—540 , 541 , 542—544 , 547—549 ; pursues proselytizing activities ( 继续进行劝人改变政治信仰的活动 ) , 540—542 ; relations with Negrín ( 与内格林的关系 ) , 546 ; influence in SIM ( 在军事调查局中的势力 ) , 546—547 , 549 , 604 ; initiates rapprochement with CNT ( 开始与全国劳工联合会恢复关系 ) , 550 , 552 ; relations with Republicans ( 与共和派的关系 ) , 551—552 ;

plans to dislodge Caballero from UGT ( 打算把卡瓦列罗赶出劳动者总工会 ) , 555 , 556—558 ; on “popular revolution” ( 论 “人民革命” ) , 556 ; takes control of national UGT executive ( 夺取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委员会执委会的控制权 ) , 558 ; demonstrates for continued resistance ( 为继续抵抗的示威游行 ) , 577—578 ; withdraws one of two ministers from government ( 从政府中撤出两名部长中的一名 ) , 582 ; predominance in army , second Negrín government ( 第二届内格林政府时期在军队中的优势 ) , 593—596 ; fears carabineros ( 担心边防警察部队 ) , 610 ; other parties' animosity toward ( 其他党派敌视共产党 ) , 629 , 691 ; growth of coercive policies at the front ( 在前线的强制政策愈演愈烈 ) , 633 ; and Negrín' s Thirteen—Point program ( 与内格林的十三点方案 ) , 646 ; doubts that Britain and France will intervene ( 怀疑英法两国将进行干涉 ) , 651 ; on fall of Catalonia ( 论加泰罗尼亚失陷 ) , 667 ; influence wanes ( 影响力衰退 ) , 687 ; conference in Madrid ( 在马德里开会 ) , 693 ; moves to El Palmar ( 转移到埃尔帕尔马 ) , 720 ; postwar claims of ( 战后的说法 ) , 720—721 ; members prepare flight abroad ( 准备逃往国外的党员 ) , 731—732 ; in Madrid , battles with Casado junta ( 在马德里与卡萨多委员会的部队作战 ) , 736。另见Comintern ; Díaz, José ; PSUC ; USSR

Pearson, Major H.M. ( H.M.皮尔逊少校 ) , 英国空军军官 : allegedly receives offer of Spanish locations from Prieto ( 据说收到普列托提出的转让西班牙战略要地的建议 ) , 545—546

Peasant Federation ( 农民联合会 ) : success of in Valencia ( 在巴伦西亚取得的成功 ) , 86 ; inhibits collectivization ( 阻挠集体化 ) , 86 ;

established by Communists (由共产党人建立) , 86 , 238 ; Valencia Socialists expel members of (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开除农民联合会会员) , 560

Peasants' Federation , CNT ( Castile ) ( 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协会 ) : on dangers of wholesale collectivization ( 论大规模推行集体化的危害 ) , 74 ; battles with Communists ( 与共产党人作斗争 ) , 241

Pedrero, Angel ( 安赫尔·佩德雷罗 ) , 社会党人 , 军事调查局中部地区负责人 : supports Casado' s coup ( Mar.1939 ) ( 一九三九年三月支持卡萨多政变 ) , 603

Pedro ( 佩德罗 ) 。见GerPeirats, José ( 何塞·佩拉特斯 ) , 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 : on collectivists as the "last romantics" ( 论作为 "最后的幻想家" 的集体主义者 ) , 第六章注释17 ; on Juan Peiró ( 论胡安·佩罗 ) , 第六章注释70 ; on FAI and CNT ( 论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与全国劳工联合会 ) , 192 ; on CNT collectivization program (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集体化计划 ) , 227 , 530—531 ; on beginning of May events ( 论五月事变的起因 ) , 431 ; on CNT hostility toward Friends Durruti ( 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对杜鲁蒂之友会的敌意 ) , 第四十三章注释44 ; on possibility of negotiated settlement ( 论谈判结束内战的可能性 ) , 579—580 ; on Communist advantage in officers' school tests ( 论共产党人在军官培训学校考试中的有利条件 ) , 594 ; on SIM ( 论军事调查局 ) , 600—601 , 603 ; on weakening of Spain ( 论西班牙的逐渐虚弱 ) , 627 ; on dissolution of Foreign utilities collective ( 论解除对外国公用事业企业的集体化 ) , 635

Peiró, Juan (胡安·佩罗), 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 工业部长: on dangers of coercing peasantry (论强迫农民的危险), 76; named Caballero minister (被任命为卡瓦列罗政府的部长), 203, 209; refused passage through Tarancón (民兵不许其通过塔兰孔), 206; on "war before Revolution" (论"先打仗后革命"), 213—214; on problems created by workers' committees (论工人委员会造成的问题), 215; proposes government economic intervention (建议政府经济干预), 227; on CNT ministers' lack of war powers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内阁部长没有指挥战争的权力), 324; on Communist press' s maligning of POUM (论共产党的报纸诽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518; fate of (命运), 678

Penchienati, Carlo (卡洛·彭基耶纳蒂), 国际纵队加里波第旅旅长: on International Brigades (关于国际纵队), 108, 571

El Pensamiento Navarro (《纳瓦拉思想报》), 潘普洛纳的报纸: 40, 429

People' s Commissaria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CIA)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 resident of accompanies Kandelaki to negotiate with Hitler (其柏林常驻代表与坎杰拉基一起准备与希特勒谈判), 107。另见NKVD

Pérez, Antonio (安东尼奥·佩雷斯), 劳动者总工会领导人: named labor minister, Casado junta (被任命为卡萨多委员会的劳工部长), 726

Pérez, Emilio (埃米利奥·佩雷斯), 共产党人, 莱万特方面军政治军事委员会负责人: on Negrín and carabineros (论内格林与边防警察部队), 610

Pérez, Leoncio (莱昂西奥·佩雷斯), 社会党左派: protests Communist coup

in JSU ( 抗议共产党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搞政变 ) , 136

Pérez—Baró, Albert ( 阿尔韦特·佩雷斯—巴罗 ) , 前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方组织成员 : on independence of small bourgeoisie ( 论小资产阶级的独立性 ) , 59 ; biography of ( 生平简历 ) , 第五章注释38 ; on collectivized industries ( 论工业集体化 ) , 223—224 ; on Esquerra resentment of GEPCI ( 论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对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的不满 ) , 397

Pérez de Ayala, Ramón ( 拉蒙·佩雷斯·德·阿亚拉 ) , 作家兼评论家 : flight from Spain ( 逃离西班牙 ) , 第四章注释58 , P164

Pérez Salas, Colonel Jesús ( 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 ) , 共和派军官 : on regular officers in Popular Army ( 关于人民军中的正规军军官 ) , 47 ; on problems in combining military units ( 论军队联合作战的问题 ) , 255—256 ; on Communist domination in military ( 论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 ) , 276 , 593—594 , 633 , 665 , 668 ; on Miaja' s and Rojo' s adherence to UME ( 关于米亚哈和罗霍加入西班牙军人联盟 ) , 291 ; on Communists' skillfulness ( 论共产党人的手腕 ) , 317 ; replaces Díaz Tintero ( 接替迪亚斯·滕德罗 ) , 544 ; on Rojo ( 论罗霍 ) , 544 ; on Díaz Tintero ( 论迪亚斯·滕德罗 ) , 544 ; on Zugazagoitia' s "empty" appointment ( 论苏加萨戈伊蒂亚 "徒有虚名" 的职位 ) , 598—599 ; on Republican fear of Communist coup ( 论共和派担心共产党发动政变 ) , 600 ; on SIM ( 论军事调查局 ) , 603

Pérez Trevi·佩雷斯·特雷维尼奥将军 ) , 墨西哥大使 : on refugees housed in Mexican embassy ( 关于躲进墨西哥大使馆避难的人 ) , 52



Pesta·佩斯塔尼亚) : holds subcommissariat in war ministry ( 主管国防部总政治部的分支部门 ) , 第二十八章注释30 ; replaced by García Maroto ( 被加西亚·马罗托取代 ) , 275 ; leader of Syndicalist party ( 工联党领导人 ) , 第五十章注释12。另见Syndicalist party

Petrovich ( 彼得罗维奇 ) 。见Meretskov, K.A.

Pettifer, James ( 詹姆斯·佩蒂弗 ) 。见Cockburn, Claud

Phipps, Sir Eric ( 埃里克·菲普斯爵士 ) , 英国驻巴黎大使 : and Lord Halifax ( 与哈利法克斯勋爵 ) , 657

Pi Sunyer, Carlos ( 卡洛斯·皮·苏涅尔 )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 , 巴塞罗那市长 , 自治政府文化专员 : on Aza' s objection to CNT ministers ( 关于阿萨尼亚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担任政府部长 ) , 205 ; on Anarchists' confiscation of weapons ( 论无政府主义者夺取武器 ) , 387—388 ; named councillor of culture ( June 1937 ) ( 一九三七年六月被任命为自治政府文化专员 ) , 495 ; on opposition to negotiated settlement ( 论反对谈判结束内战 ) , 577 ; on power of SIM ( 论军事调查局的权力 ) , 605—606 ; on relations between Generalitat and central government ( 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 , 614—615 ; on Negrín' s anti—Catalan policy ( 论内格林敌视加泰罗尼亚的政策 ) , 667

Pintos ( 平托斯 ) 。见Kravchenkov

Pi·皮纽埃拉 ) , 社会党人 , 马德里前线督察委员 : replaces Francisco Antón ( 取代弗朗西斯科·安东 ) , 542

Pitcairn, Frank ( 弗兰克·皮特凯恩 )。见Cockburn, Claud

Pivert, Marceau ( 马索·皮韦尔 ) , 革命社会党国际协调局代表团的法国成员 :  
visits Spain in defense of POUM ( 为保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访问西班牙 ) , 505

Planelles, Dr. Juan ( 胡安·普拉内列斯医生 ) , 共产党员 , 内格林的军队医疗部  
门长官 : administers field hospitals ( 管理战地医院 ) , 595

Poland ( 波兰 ) : British treaty obligations to ( 英国对波兰的条约义  
务 ) , 658—660

Police ( 警察 )。见Assault Guard ; Carabineros ; Carrillo, Wenceslao ;  
Civil Guard ; Cuevas de la PePolítica ( 《政治报》 )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  
派在马德里的喉舌 : 126 , 216 , 355 , 358 , 627

Political commissars ( 政治委员 ) : Rovira on ( 罗维拉论政治委员 ) , 274 ;  
Vidali on ( 维达利论政治委员 ) , 274 ; role of ( 政治委员的作用 ) , 274—  
277 , 373—375 ; Mije on ( 米赫论政治委员 ) , 275 ; Prieto campaigns  
against ( 普列托针对政治委员采取行动 ) , 541—544。另见Alvarez del Vayo,  
Julio ; General Commissariat of War

Pollitt, Harry ( 哈里·波利特 ) , 英国共产党书记 : supports bourgeois  
economy ( 支持资产阶级经济 ) , 112

Ponamariova, L.V. ( Л.В.波纳马廖娃 ) , 苏联历史学家 : on PSUC ( 关于加泰罗  
尼亚统一社会党 ) , 397 , 399

Popular Army (人民军) : disagreement about number of regular army officers (关于人民军中正规军军官人数的说法不一) , 47 ; Fifth Regiment source of (以第五团为基础) , 270 ; created under Caballero (卡瓦列罗执政期间创建) , 273 ; and mixed brigades (与混成旅) , 第二十八章注释9。另见Army ; CNT ; Draft ; General Commissariat of War ; Iron Column ; Militarization , Catalonia ; Militia ; PCE ; Political commissars ; PSUC

Popular Front (人民阵线) : victory and subsequent crisis in (Feb.1936) (一九三六年二月大选获胜及随后出现的危机) , 3 , 4 , 6 , 9 ; on peasant' s disillusionment with (论农民对人民阵线大失所望) , 5 ; reinstates workmen discharged on political grounds (恢复因政治原因被解雇的工人的工作) , 7 ; Aza' s resignation (焦躁情绪导致波特拉辞职) , 12 ; wins seats in Cortes (在议会赢得的席位) , 第一章注释57 ; promises to abrogate center—right' s measures on land return (承诺废除中—右政府向卷入一九三二年八月圣胡尔霍叛乱的地主退还地产的法律) , 14 ; promises restoration of labor legislation (承诺恢复劳动立法) , 14 ; and charges that it created fascism (与人民阵线本身造成法西斯主义威胁的指责) , 19—20 ; delays Agrarian Reform Law (拖延土地改革法的实施) , 23 , 第二章注释12 ; Caballero decries weakness of (卡瓦列罗希望削弱人民阵线) , 24 ; Communists attempt to strengthen (共产党人努力巩固人民阵线) , 26 ; Maura describes failures of (毛拉论述人民阵线的不足之处) , 32—33 ; committees formed to supervise ministers (组成监督政府部长的人民阵线委员会) , 46 ; Comintern adopts as policy (1935) (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采取人民阵线的政策) , 88 , 95 , 97 ; Aza' s fear of (阿萨尼亚对人民阵线的恐

惧) , 99 ; Comintern' s desire not to weaken French Popular Front ( 共产国际不希望法国人民阵线被削弱 ) , 110 ; invited by Giral to join government ( 希拉尔邀请人民阵线各党派加入政府 ) , 120 ; CNT—FAI votes for (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为人民阵线投票 ) , 195 ; exercises state capitalism under Giral ( 在希拉尔执政期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 , 223 ; Communists' intentions for ( 共产党采取人民阵线政策的目 的 ) , 271 ; criticized by POUM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批评人民阵线 ) , 405 ;

Popular Tribunal ( 人民法庭 ) : set up by Giral against revolutionary terror ( 希拉尔政府针对革命恐怖而设立 ) , 50

Poretsky, Elizabeth ( 伊丽莎白·波列茨基 ) , 伊格纳斯·赖斯的妻子 : and Krivitsky ( 与克里维茨基 ) , 106 , 第九章注释43 ; claims presence of two Alexander Orlovs ( 声称有两个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 , 第三十五章注释49

Portela Valladares, Manuel ( 曼努埃尔·波特拉·巴利亚达雷斯 ) , 临时政府总 理 , 中间派领导人 : proposed by Franco martial law during elections ( 大选期间佛朗哥建议其宣布戒严令 ) , 11—12 ; resignation of ( 辞职 ) , 12 , 第一章注释49

ports and frontiers ( 港口和边境 ) : controlled by workmen' s committees ( 被工人委员会控制 ) , 48—49 ; customs procedure controlled by militia ( 海关手续被民兵控制 ) , 49

Pou, Joaquín ( 华金·波乌 ) ,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领导人 : named to

provisional government ( 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成员 ) , 451

POUM ( 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 )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 Gorkin' s role in ( 戈尔金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的角色 ) , 第十七章注释48 ; on immobilization ( 论现金不流通 ) , 226 ; excluded from Madrid Junta ( 被排除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之外 ) , 298 ; newspaper and radio station seized ( 报纸和广播电台被没收 ) , 298 ; targeted for liquidation by NKVD (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消灭的对象 ) , 298 ; creation of ( 成立 ) , 405 ; relation with Trotsky and Trotskyism ( 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关系 ) , 405—406 , 第四十章注释3和注释12 ; Bertram Wolfe on ( 伯特伦·沃尔夫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 406—407 ; enters Generalitat ( 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 ) , 407 , 第四十章注释15 ; members expelled by UGT ( 劳动者总工会解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所担任的重要职务 ) , 408 ; criticizes USSR ( 批评苏联 ) , 408 ; protests execution of Zinoviev and Kamenev ( 抗议处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 , 408 ; against view of "democratic Republic" ( 反对 "民主共和国" 的观点 ) , 409 ; PSUC proposes its exclusion from Generalitat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建议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赶出自治政府 ) , 410 ; and CNT security forces (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治安力量 ) , 411 , 414 , 417—418 , 424 ; on abuses by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 论革命委员会的腐败行为 ) , 416 ; rejects UGT' s proposal of single security corps ( 拒绝劳动者总工会统一治安部队的建议 ) , 417 ; demands army drawn from militia ( 要求军队从民兵中产生 ) , 419 ; on danger of retaliation against Anarchists ( 论报复无政府主义者的危险 ) , 426 ; on Anarchists' occupation of streets ( 论无政府主

义者占领街头) , 427—428 ; and May events ( 与五月事变 ) , 430 , 434—435 ; distance from Friends of Durruti ( 与杜鲁蒂之友会保持距离 ) , 442 , 455 ; on workers' power ( 论工人政权 ) , 442 ; accused by Communists of inspiring putsch ( 共产党人指责其煽动暴乱 ) , 445 ; urges workers to return to work ( 敦促工人恢复工作 ) , 456 ; Communists plan and execute dissolution of ( 共产党人计划并且开始消灭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 462 , 465 , 513 , 520 ; Caballero refuses to dissolve ( 卡瓦列罗拒不取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 465 ; Barcelona rising as excuse for cabinet crisis ( 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巴塞罗那叛乱为借口制造政府危机 ) , 465 ; repression of ( 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 502 , 第四十八章注释20和注释84 , 516—518 , 519—521 , 第四十九章注释37 ; Soria on ( 索里亚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 507 ; Ravines on ( 拉维内斯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 538。另见Andrade, Juan ; Gorkin, Julián ; Maurín, Joaquín ; Nin, Andrés

Pozas, General Sebastián ( 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 ) , 共和派将军 , 后来成为共产党员 : Franco urges Portela to influence ( 佛朗哥敦促波特拉命令波萨斯 ) , 12 ; becomes Giral interior minister ( 20 July ) ( 七月二十日成为希拉尔政府的内政部长 ) , 46 ; on late arrival of Soviet aid ( 关于苏联援助迟迟不到 ) , 107 ; replaces Asensio in central front command ( 接替阿森西奥指挥中部前线 ) , 282 ; receives orders from Asensio on establishing new headquarters ( 接到阿森西奥建立新的指挥部的命令 ) , 284 ; on Miaja' s reaction to order to defend Madrid ( 论米亚哈对保卫马德里的命令的反应 ) , 285 ; and General Kulik ( 与库利克将军 ) , 316—

317 ; activities of ( 波萨斯的活动 ) , 317 ; joins with Communists ( 加入共产党 ) , 317 , 490 ; named military commander of Catalonia (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地区军事指挥官 ) , 450 , 452 ;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 , 688

Prados, Pedro ( 佩德罗·普拉多斯 ) , 共产党员 : Negrín appoints as navy chief of staff ( 普列托任命其为海军参谋长 ) , 592

Prats, José ( 何塞·普拉特斯 ) , 内格林的助手 : at 1985 colloquium on Negrí ( 出席一九八五年举行的内格林学术讨论会 ) ,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Pravda ( 苏联《真理报》 ) : 126 , 154 , 308 , 309 , 414 , 429 , 435 , 445 , 675

Pretel, Felipe ( 费利佩·普雷特尔 ) , 劳动者总工会司库 , 曾经支持卡瓦列罗 : joins with Communists ( 加入共产党 ) , 130 , 275 , 555 ; made secretary general , commissariat of war ( 被任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秘书长 ) , 275 ; brings war commissariat under Communist control ( 将总政治部置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 , 371 ; elected treasurer national UGT executive ( 当选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司库 ) , 558

Prieto, Horatio M. ( 奥拉蒂奥·M. 普列托 ) , 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 : on CNT entry into government (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 ) , 200 , 202 , 210—211 ; assails defense council plan ( 抨击成立国防委员会的方案 ) , 201—202 ; defends CNT national committee' s departure ( 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逃离马德里辩解 ) , 207 ; resigns as CNT secretary ( 辞去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职务 ) , 207 ; selects and advises new CNT

ministers ( 选择提名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新任政府部长 ) , 209 ; persuades CNT to back Aragon Defense Council ( 促请全国劳工联合会支持保卫阿拉贡委员会 ) , 524—525 ; represents CNT in meetings with UGT ( 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会谈 ) , 568—569 ; on possibility of negotiated settlement ( 论通过谈判结束内战的可能性 ) , 580 ; on death of apoliticismo ( 论不问政治倾向的寿终正寝 ) , 624 , 625 ; at libertarian plenum ( Oct.1938 ) ( 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的自由主义运动大会上 ) , 625 ; and CNT reaction to Thirteen—Points (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十三点方案的反应 ) , 647—648

Prieto, Indalecio (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 ) , 共和派中间派领导人 , 海军和空军部长 , 国防部长 : pursues policy of restraint ( 奉行克制政策 ) , 22 , 27—28 ; and Caballero ( 与卡瓦列罗 ) , 25 , 120 , 205—206 , 283 , 320 , 372 , 465—466 , 第四十五章注释19 ; and violence of Socialist infighting ( 与社会党激烈的内部斗争 ) , 25 ; sources of power ( 力量的来源 ) , 25 , 31 ; biography of ( 生平简历 ) , 27 ; role in Aza' s installation and Caballero' s ouster from Socialist executive ( 在把阿萨尼亚推上总统职位和把卡瓦列罗赶出社会党执委会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 , 27 , 470 ; hostile toward Communist influence ( 反对共产主义 ) , 27—28 ; refuses premiership ( 拒绝出任总理 ) , 29 ; on Aza' s government ( 论阿萨尼亚的政府 ) , 34 ; warns against Casares' s illusion of control ( 针对卡萨雷斯局势在掌控中的错觉发出警告 ) , 第三章注释2 ; warns of left' s violent reaction to military conspiracy ( 警告说左派将对军事谋反做出激烈的反应 ) , 37 ; at meeting where Caballero demands arms ( 出席卡瓦列罗要求发



放武器的会议) , 40 ; and Martínez Barrio ( 与马丁内斯·巴里奥 ) , 41 , 45 ; on terror inherent in Popular Tribunals ( 论革命法庭的恐怖行为 ) , 50 ; reverses vote on Salazar Alonso' s death penalty ( 对萨拉萨尔·阿隆索的死刑判决改变意见 ) , 50 ; Araquistáin on proposed Prieto government ( 阿拉基斯塔因论组成一个普列托政府的建议 ) , 117 ; scorns weakness of Giral government ( 嘲笑希拉尔政府的无能 ) , 119—120 ; nenni on ( 南尼论普列托 ) , 120 ; on pro—Soviet left Republicans ( 论左翼共和派的亲苏倾向 ) , 126 ; on fate of confiscated valuables ( 关于没收的金银财宝的下落 ) , 第十三章注释23 ; takes over gold shipment to Mexico ( 控制运到墨西哥的黄金财宝 ) , 第十三章注释23 ; alleges embezzlement of Spanish funds ( 断言西班牙资金被挪用 ) , 155 ; alleges purchase of ships by France—Navigation ( 断言法国航海公司用西班牙资金购买船只 ) , 155 ; claims ignorance of plan to ship gold ( 声称不知道运送黄金的计划 ) , 155 ; alleges no official approval of gold shipment ( 断言运送黄金没有经过正式批准 ) , 155—156 ; denies providing naval escort ( 否认提供海军护航 ) , 156 ; on Soviet direction of Air Force ( 关于空军受苏联人指挥 ) , 159 ; convinces Aza ; claims ignorance of Spanish Morocco offer ( 声称没有人提过关于西属摩洛哥的建议 ) , 182 ; as navy and air minister in Caballero' s government ( 在卡瓦列罗政府中担任海军和空军部长 ) , 203 ; orders dissolution of Defense Council of Aragon ( 下令解散保卫阿拉贡委员会 ) , 243—244 , 525 ; alleges Communist assassinations at front ( 指控共产党在前线搞暗杀 ) , 276 ; believes Madrid lost ( 相信守不住马德里 ) , 284 ; names Hidalgo de Cisneros air force chief ( 任命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为空军司令 ) , 307 ; member of Higher War Council ( 战时高

级委员会成员) , 324 , 542 ; and Communists ( 与共产党人 ) , 382 , 383—384 , 465—466 , 470 , 474—475 , 488 ; and Rosenberg ( 与罗森堡 ) , 382 ; and Smushkevich ( 与斯穆什克维奇 ) , 382—383 ; Hidalgo de Cisneros on ( 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论普列托 ) , 383 ; on PSOE—PCE fusion ( 关于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 ) , 383 , 第三十七章注释13 ; hopes for Anglo—French aid ( 寄希望于英法两国的援助 ) , 384 ; and takeover of Catalan public order ( 与接管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治安 ) , 436 , 448—449 ; sends air force , destroyers , and marines to Barcelona ( 派空军、驱逐舰和海军去巴塞罗那 ) , 437—438 , 453 ; Uribe on his role in Caballero ouster ( 乌里韦论他在推翻卡瓦列罗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 , 466 ; influence on Socialists' resignations ( 对社会党人政府部长辞职所起的作用 ) , 470 ; named Negrín defense minister ( 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的国防部长 ) , 471—472 , 474 ; and Negrín ( 与内格林 ) , 474—475 ; Hernández on ( 埃尔南德斯论普列托 ) , 478 ; against military predominance of PCE ( 反对共产党控制军队 ) , 483 , 487 ; ousted from government ( Apr.1938 ) ( 一九三八年四月被赶出政府 ) , 483 ; urges cabinet post for Zugazagoitia ( 强烈要求让苏加萨戈伊蒂亚担任内阁部长 ) , 486 ; and reappointment of officials dismissed by Caballero ( 被卡瓦列罗解雇的官员的重新任命 ) , 488 ; reorganizes militia ( 改编民兵武装 ) , 488 ; Togliatti on ( 陶里亚蒂论普列托 ) , 488 ; appoints Cerdán Eastern Army chief ( 任命科登为东路军参谋长 ) , 490 ; says Republic pays for Soviet aid ( 声称共和国为苏联援助付出代价 ) , 505 ; protests Ortega and threatens to resign ( 反对奥尔特加并以辞职相威胁 ) , 510 ; denounced by Morón ( 遭到莫隆的谴责 ) , 511 ; claims coverup of Nin investigation ( 声称有人阻止对宁的失踪进行调查 ) , 511 ;

reproaches Lister for violence ( 因其暴行训斥利斯特 ) , 527 ; Lister on ( 利斯特论普列托 ) , 527 ; friction with PCE ( 与共产党发生摩擦 ) , 535 , 539—540 , 541 ; refuses Socialist—Communist party fusion ( 不同意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 ) , 535—536 ; La Pasionaria on ( 热情之花论普列托 ) , 541 , 545 ; and role of political commissars ( 与政治委员的作用 ) , 541—542 ; ousts Communist officials ( 罢免共产党人军官 ) , 542 , 544 ; Fernández Bola' loyalty to ( 费尔南德斯·博拉尼奥斯忠于普列托 ) , 544 ; clashes with Díaz Tintero and Rojo ( 与迪亚斯·滕德罗和罗霍产生矛盾 ) , 544—545 ; allegedly offers Spanish locations to Britain ( 据说愿意把西班牙的战略要地转让给英国 ) , 545 ; creates SIM ( 成立军事调查局 ) , 546—547 ; appoints Durán to SIM ( 任命杜兰为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地区负责人 ) , 547 ; breaks with Orlov ( 与奥尔洛夫断绝关系 ) , 548 ; alleged Orlov plot to assassinate ( 据说奥尔洛夫阴谋暗杀普列托 ) , 549 ; Communist campaign against ( 共产党人为使普列托名誉扫地采取行动 ) , 572—573 , 576 , 581 ; pessimism of ( 普列托的悲观主义 ) , 573—574 ; proposes bombing German fleet ( 建议轰炸德国舰队 ) , 574 , 575 ; tries to limit Communists in military ( 试图限制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势力 ) , 575 ; favors negotiated settlement ( 赞成通过谈判结束内战 ) , 576 , 627 ; replaced as defense minister ( 作为国防部长被撤换 ) , 581 ; refuses to rejoin Negrín' s government ( 拒绝继续留在内格林政府中 ) , 586 ; lists PCE members appointed by Negrín ( 列举内格林任用的共产党员 ) , 598 ; and Orlov' s organization of SIM ( 奥尔洛夫组建军事调查局与普列托 ) , 601 ; on army messages supporting Negrín ( 论军队支持内格林的电报 ) , 618

Primo de Rivera, JoséAntonio (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 长枪党领导人: on rural conditions (论农村的状况), 3—4; Falange' s assassination attempt on Jiménez de Asua (长枪党企图行刺希门尼斯·德·阿苏亚), 9

Primo de Rivera, General Miguel (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 Caballero a labor delegate under (卡瓦列罗是其国务委员会中的一名工人代表), 23; and Calvo Sotelo (与卡尔沃·索特洛), 37; FAI created to counter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为反对其军事独裁而成立), 191; Caballero and Council of State of (卡瓦列罗与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国务委员会), 197

Prisons (监狱): invasion and liberation of prisoners (闯入监狱释放囚犯), 50。另见Terror, revolutionary

Prokofiev, Major General G. (Г.普罗科菲耶夫少将), 苏联空军顾问: on Smushkevich (论斯穆什克维奇), 308; becomes general officer in Soviet Union (成为苏联将军), 313; on attack on the Deutschland (关于轰炸“德意志”号袖珍战列舰), 574

Property (财产): seizure of landed properties by workers (地产被工人没收), 54; confiscation of utilities, plants, hotels, and dwellings (没收公用事业、工厂、旅馆和住宅), 55; CNT' s intent to suppress all forms of small property (全国劳工联合会打算禁止任何形式的小型资产私有), 59

PSOE (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 ( 社会党的青年运动对社会党不满 ) , 24 ; early hostility to Communist influence ( 早就对共产党的影响不满 ) , 27 , 381 ; merges with Communist party to create PSUC ( 与共产党联合创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 , 130 ; opposes CNT plan for union management ( 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由工会管理企业的计划 ) , 225 ; explains removal of Valencia Socialist committee ( 解释取缔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的理由 ) , 561 ; corresponds with Agrupación Socialista Madrileña另见Largo Caballero, Francisco ; Prieto, Indalecio

PSUC ( 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 )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 : takes up middle—class cause ( 维护中产阶级的利益 ) , 83 , 396—397 , 415—416 ; claims there is no social revolution ( 声称没有爆发社会革命 ) , 112 ; created through merger of PSOE and Communists ( 由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共产党联合创建 ) , 130 , 397 ; under Communist control ( 由共产党控制 ) , 396 , 399—401 , 404 ; joins with ERC against FAI ( 与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一起反对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 ) , 401 , 403 ; clashes with both POUM and Trotskyists ( 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托洛茨基分子发生冲突 ) , 409 ; excludes POUM from cabinet ( 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赶出内阁 ) , 410—411 ; nominally agrees to withdraw from cabinet ( 同意名义上退出内阁 ) , 412 ; as threat to CNT ( 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形成威胁 ) , 414 ; attacks Tarradellas for defending Anarchists ( 因其为无政府主义者辩护而攻击塔拉德利亚斯 ) , 416 ; presses for single police power ( 强烈要求统一治安力量 ) , 417 , 422 ; urges establishment of Regular Army ( 敦促建立正规军 ) , 418—419 ; organizes demonstration for

Cortada' s funeral ( 组织示威活动为科尔塔达举行葬礼 ) , 426 ; and assassination of Berneri and Barbieri ( 与暗杀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 ) ,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 demands unity with Generalitat ( 要求团结在自治政府周围 ) , 455 ; supported by Negrín government ( 得到内格林政府的支持 ) , 490 ; presses for municipalization of utilities ( 强烈要求把公用事业交给市政委员会 ) , 492 ; Cruells on ( 克鲁埃利斯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 , 496 ; denounces POUM as spies ( 指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间谍组织 ) , 501。另见Comirera, Juan

Ptukhin, E.S. ( E.C.普图欣 ) , 斯穆什克维奇的继任者 : perishes in Stalin purge ( 1941 ) ( 一九四一年被斯大林清洗 ) , 308 , 312

Public utilities ( 公用事业 ) : union control of ( 工会控制公用事业 ) , 第四章注释88

Puche, José ( 何塞·普切 ) , 内格林的朋友 : and gold shipment to Mexico ( 与运往墨西哥的黄金财宝 ) , 第十三章注释23

Puente, Enrique ( 恩里克·普恩特 ) , 内格林的助手 : and gold shipment to Mexico ( 与运往墨西哥的黄金财宝 ) , 第十三章注释23 ; charged with shipment of Vita treasure ( 负责用“比塔”号游艇运送黄金财宝 ) , 218 ; occupies Correspondencia de Valencia offices ( 占领《巴伦西亚通讯》办公室 ) , 562

Puente, Isaac ( 伊萨克·普恩特 ) , 著名无政府主义者 : on libertarian communism ( 论自由共产主义 ) , 65 ; on government as enemy ( 论政府为

敌) , 194 ; hopes for CNT uprisings ( 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起义持乐观态度 ) , 198

Puritanism ( 清教主义 ) : its role in libertarian communism ( 在自由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 ) , 68—69

Queipo de Llano, General Gonzalo ( 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将军 ) , 叛军将领 : distrusted for connection with Alcalá—Zamora ( 因为与阿尔卡拉—萨莫拉的关系而得不到谋反者的信任 ) , 41 ; leads Seville coup ( 指挥塞维利亚的叛乱 ) , 41—42 ; resorts to extreme measures to keep order ( 采取极端措施维持秩序 ) , 42 ; one of four active service generals to join uprising ( 参加叛乱的四位现役将军之一 ) , 47—48 ; target of planned Estremadura offensive ( 计划中的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的攻击目标 ) , 467

Quemades, Salvador ( 萨尔瓦多·克马德斯 ) , 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 on government' s yielding to people' s organization ( 论政府对群众组织的让步 ) , 46 ; on invisibility of Republican parties ( 论共和派政党的无声无息 ) , 82

Rabassaires ( 农夫 ) 。见 Uni6de Rabassaires

Radical party ( 激进党 ) : in power after victory of center—right ( Nov.1933 ) (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右党派大选获胜后执政 ) , 8 ; led by Lerroux ( 勒鲁领导 ) , 22

Radio Madrid ( 马德里广播电台 ) : controlled by Communists ( 被共产党人控制 ) , 296 ; directed by Kurt Hager ( 由库尔特·哈格尔负责 ) , 296

Railroads ( 铁路 ) : union control of ( 工会控制铁路 ) , 第四章注释88

Rákosi, Mátyás ( 拉科西·马蒂亚斯 ) , 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 : advised by Ern-  
埃爾諾的建议 ) , 551

Rama, Carlos ( 卡洛斯·拉马 ) , 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 on Berneri  
assassination theory ( 关于暗杀贝尔内里的阴谋 ) ,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Ramírez de Togados, Vicente ( 比森特·拉米雷斯·德·托戈雷斯 ) , 卡塔赫纳舰队  
司令 : denies that warships escorted gold shipment ( 否认西班牙军舰为运  
送黄金护航 ) , 156

Ramos Oliveira, Antonio ( 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 ) , 社会党人历史学家 :  
on control by people' s committees ( 论人民委员会掌握权力 ) , 49—50 ;  
on reasons for middle class adherence to Communist party ( 论中产阶级  
追随共产党的原因 ) , 124—125 , 316

Ramos y Ramos, Enrique ( 恩里克·拉莫斯—拉莫斯 ) , 左翼共和派人士 :  
becomes finance minister ( 20 July ) ( 七月二十日成为财政部长 ) , 47

Ravines, Eudocio ( 欧多西奥·拉维内斯 ) , 秘鲁共产党人 , 《红色阵线报》编  
辑 : on power of Codovila and Stefanov ( 论柯多维拉和斯特凡诺夫的权  
力 ) , 133 ; Stefanov tells of usefulness of PSOE leaders ( 斯特凡诺夫  
告诉他社会党领导人的利用价值 ) , 384 ; on growth of PCE ( 描述西班牙共产党的  
发展壮大 ) , 538—539

Real estate , urban ( 城市不动产 ) : union control of ( 工会控制城市不动



产) , 第四章注释88

Refugees in embassies and legations ( 外国使馆里的避难者 ) : Spanish refugees in Madrid embassies ( 马德里外国使馆里的西班牙避难者 ) , 52 ; Madrid mayor takes refuge in Mexican embassy ( 马德里市长躲进墨西哥大使馆 ) , 206

Regler, Gustav ( 古斯塔夫·雷格勒 ) , 德国共产党人 , 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 : on Miaja' s glorification ( 论对米亚哈的吹捧 ) , 292 ; on Kléber ( 论克莱贝尔 ) , 303 ; on Soviet engineer Gorkin' s farewell party ( 描述苏联工程师戈尔金的欢送会 ) , 313—314 ; on meeting with Koltzov ( 关于与科利佐夫交谈 ) , 313—314 ; and Hemingway ( 与海明威 ) , 314 ; writes for News of Spain ( 为《西班牙新闻》写文章 ) ,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 on terror in Intertional Brigades ( 论国际纵队中的恐怖行动 ) , 571

Regulares ( 摩洛哥军团 ) , 西班牙军队中的摩尔人部队 : and MuGrandes ( 与穆尼奥斯·格兰德斯 ) , 42 ; German assistance in transport of ( 德国帮助运送摩洛哥军团 ) , 97

Reiss, Ignace ( 伊格纳斯·赖斯 ) ,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 , 伊丽莎白·波列茨基的丈夫 : assassinated in 1937 ( 一九三七年被暗杀 ) , 第九章注释43 ; ties with Krivitaky ( 与克里维茨基的关系 ) , 106

Religion ( 宗教 ) 。见Church

Renn, Ludwig ( 路德维希·雷恩 ) , 德国共产党作家 , 国际纵队台尔曼营营长 : on Kléber ( 论克莱贝尔 ) , 303

Renovación Espa ( 西班牙复兴运动 ) , 拥护阿方索的君主主义派别 : plans coup d' état ( 1934 ) ( 一九三四年策划军事政变 ) , 11 ; meets with Mussolini ( 与墨索里尼会谈 ) , 11 ; anticipates reaction to continued revolutionary violence ( 预感革命将会继续走暴力路线 ) , 11 ; under Calvo Sotelo , criticizes Aza' s policies ( 在卡尔沃·索特洛的带领下抨击阿萨尼亚的政策 ) , 16 ; political differences with Carlists delay military rising ( 与卡洛斯派君主主义者的政治分歧干扰军事叛乱 ) , 36

Republic ( 共和国 ) : proclamation of ( Apr.1931 ) ( 一九三一年四月宣告成立 ) , 3 ; actually "ends" in July 1936 ( 实际 "灭亡" 于一九三六年七月 ) , 78

Republican Left party ( Izquierda Republicana ) ( 左翼共和派 ) 。见 IR ; Liberal Republicans

Republican Union party ( 共和联盟 ) 。见 UR

Requetés ( 志愿军 ) , 卡洛斯派君主主义者的民兵武装 : 12 ; in streets of Pamplona ( 在潘普洛纳街头 ) , 40。另见 Carlists

La Revista Blanca ( 《白色评论》 ) , 无政府主义刊物 : 69 , 261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 革命委员会 ) : take over func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 接管地方政府的职能 ) , 49 ; control Tarragona ( 控制塔拉戈纳 ) , 49 ; power fragmented across ( 权力被分解为碎片散落到革命委员会手中 ) , 53 ; government decrees dissolution of ( 政府颁布法令解散革命委员会 ) , 214—215 ; declared illegal by Catalan government ( 被加泰罗尼亚

自治政府宣布为非法) , 493—494。另见CNT ; PCE ; POUM ; PSUC ; Social revolution

Revolutionary turmoil ( 革命造成的动乱 ) : Montseny on ( 蒙特塞尼论革命造成的动乱 ) , 52 ; Republic serves to cover ( 共和国竭力掩饰革命造成的动乱 ) , 166。另见Strikes

Reyes, Alfonso ( 阿方索·雷耶斯 )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人 , 空军军官 : halts Anarchists' march on Barcelona ( 阻止无政府主义民兵向巴塞罗那进军 ) , 452

Reynaud, Paul ( 保罗·雷诺 ) , 法国司法部长 : warns Welcbeck of dangers of war ( 就战争的危险警告韦尔切克 ) , 171

Ribbentrop, Joachim von (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 , 德国外交部长 : works to create Anglo—German ties ( 努力营造英德两国的友好关系 ) , 173 ; on British appeasement policy ( 论英国的绥靖政策 ) , 653 ; on Stalin' s negotiations with Germany ( 关于斯大林与德国的谈判 ) , 654 , 655

Rico, Pedro ( 佩德罗·里科 ) , 马德里市长 : takes refuge in Mexican embassy ( 躲进墨西哥大使馆 ) , 206 ; departs Madrid in secret ( 偷偷逃离马德里 ) , 206

“Rieger, Max” ( “马克斯·里格尔” ) , 《西班牙的间谍活动》一书的神秘作者 : Bergamín writes preface for ( 贝尔加明为其作序 ) ,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 517 ; writings influence POUM trial ( 著作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审判 ) , 517—518

Riegos y Fuerzas del Ebro (埃布罗河灌溉与电力公司), 巴塞罗那牵引、照明及电力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controlled by joint CNT—UGT committee (被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一个联合委员会控制), 55

Río, José del (何塞·德尔·里奥), 共和派领导人: confers with CNT Defense Committee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防务委员会交换意见), 706; named education and health minister, Casado junta (被任命为卡萨多委员会的教育和卫生部长), 726

Rio Tinto Company (力拓公司): Sir Auckland Geddes, chairman, on workers imprison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董事长奥克兰·格迪斯爵士论因政治原因坐牢的工人), 7

Rivas—Cherif, Cipriano (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弗), 阿萨尼亚的姻兄弟: on Aza' s courage (关于阿萨尼亚的勇敢), 165; on attempts to prevent Aza' s resignation (关于劝阻阿萨尼亚辞职的努力), 165; on Vayo' s view of war in Europe (关于德尔巴约对欧洲战争的看法), 649

Robinson, Richard (理查德·鲁宾逊), 英国历史学家: on Socialists' opposition to CEDA (论社会党人反对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 8—9; on Aza' s confiscation of private schools (论阿萨尼亚将私立学校收归国有), 14; on right' s theory of planned economic collapse (论右派对左派打算造成经济崩溃的推测), 16; on left Republicans' fear of workers (论左翼共和派担心工人造成社会动乱), 35; on Franco' s respect for legality (论佛朗哥重视合法性), 35

Robles, José ( 何塞·罗夫莱斯 ) : Dos Passos searches for ( 多斯·帕索斯寻找何塞·罗夫莱斯 ) , 318

Roces, Wenceslao ( 文塞斯劳·罗塞斯 ) , 共产党员 , 教育部副部长 : allegedly prepares false evidence for POUM trial ( 据说他为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准备了伪造的证据 ) , 520

Rock, William R. ( 威廉·R.罗克 ) , 美国历史学家 : on Chamberlain ( 论张伯伦 ) , 第十七章注释42

Rocker, Rudolph ( 鲁道夫·罗克 ) , 德国无政府主义者 : on Soviet threats regarding POUM ouster ( 关于苏联为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赶出政府进行的威胁 ) , 411

Rodimtsev, A. ( A.罗季姆采夫 ) , 苏联军官 : survives purges ( 免遭清洗 ) , 313

Rodríguez, Benigno ( 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 ) , 内格林的政治秘书 , 共产党员 : Semprún on ( 森普鲁伦论罗德里格斯 ) , 140 ; influence on Negrín ( 对内格林的影响 ) , 140 , 588 ; drafts Negrín' s last political speech ( 起草内格林的最后一篇政治演说 ) , 140 ; and gold shipment to Mexico ( 与运往墨西哥的黄金财宝 ) , 第十三章注释23 ; leaves France for England ( 25 June 1940 ) (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离开法国去英国 ) , 590 ; leaves Madrid with Negrín ( 与内格林一起离开马德里 ) , 694 , 717 ; prepares to leave Spain ( 准备离开西班牙 ) , 732

Rodríguez, Enrique ( 恩里克·罗德里格斯 )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马德里地区

领导人：and POUM exclusion from Madrid junta (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排除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之外)，298

Rodríguez, Melchor (梅尔乔·罗德里格斯)：director of prisons (Dec.1936)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任监狱总监)，第四章注释68；saves lives during atrocities (最残忍的暴行发生时拯救生命)，第四章注释68

Rodríguez Cuesta, Luis (路易斯·罗德里格斯·奎斯塔)，卡里略的助手：appointed to Madrid security (被安排在马德里的治安部门)，299

Rodríguez Doreste, Juan (胡安·罗德里格斯·多雷斯特)，内格林的助手：at 1985 colloquium on Negrín (出席一九八五年举行的内格林学术讨论会)，第四十五章注释13

Rodríguez Revilla, Vincente (文森特·罗德里格斯·雷维利亚)，社会党人律师：defends POUM in trials (在审判中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辩护)，517

Rodríguez Salas, Eusebio (欧塞比奥·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加泰罗尼亚地区警察署长：Aiguadé appoints as police commissioner (被艾瓜德任命为警察署长)，417；lambasted by Anarchists (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严厉指责)，417；attempt on life of (有人企图暗杀罗德里格斯·萨拉斯)，425；on Cortada's murder (论科尔塔达被暗杀)，426；raids telefónica (袭击电话局)，430—431；dismissed by Galarza (被加拉尔萨撤职)，458

Rodríguez Vega, José (何塞·罗德里格斯·维加)，曾经追随卡瓦列罗，后来支持共产党：political allegiance of (其政治效忠对象)，555，第五十三章注释

20 ; elected secretary general UGT national executive ( 当选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总书记 ) , 558 ; role in reconciliation with CNT ( 在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解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 , 568

Roig, Eleuterio ( 埃莱乌特里奥·罗伊格 ) , 杜鲁蒂之友会成员 : 第四十一章注释 49

Rojo, Major Vicente ( 比森特·罗霍少校 , 后来晋升为中校和将军 ) , 总参谋长 : on arrival of Soviet military advisers ( 关于苏联军事顾问的到来 ) , 108 ; on carabineros' unpopularity ( 论边防警察部队的不得人心 ) , 218 ; denies Soviet interference in military ( 否认苏联顾问干预军事行动 ) , 278 ; on links between Spanish officers and Soviet advisers ( 论西班牙军官与苏联军事顾问的关系 ) , 278 ; on misdirection of orders to Pozas and Miaja ( 论给波萨斯和米亚哈的命令的错误 ) , 284 ; on weakness of loyalist front ( 论共和派防线的虚弱 ) , 285 ; Caballero appoints as Miaja' s chief of staff ( 卡瓦列罗任命其为米亚哈的参谋长 ) , 289 ; forms Madrid general staff ( 组成马德里总参谋部 ) , 289—290 ; Koltzov on ( 科利佐夫论罗霍 ) , 290 , 300 , 301 ; member of UME ( 西班牙军人联盟成员 ) , 291 ; reasons for joining loyalists ( 效忠共和国政府的原因 ) , 291 ; on Miaja ( 论米亚哈 ) , 294 ; on composition of Defense Council ( 论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组成 ) , 295 ; presents terms of surrender at Alcázar ( 向托莱多城堡提出投降的条件 ) , 300 , 第三十章注释103 ; allegiance to Communists ( 效忠于共产党人 ) , 300—302 ; biography ( 生平简历 ) , 300—302 ; Martín Blázquez on ( 马丁·布拉斯克斯论罗霍 ) , 301 ; Castro on religious beliefs of ( 卡斯特罗论罗霍的宗教信仰 ) , 302 ; Suero Roca

on ( 苏埃罗·罗卡论罗霍 ) , 302 ; initiates offensive against Kléber ( 发起对克莱贝尔的攻击 ) , 304 ; on Gorev' s role in Madrid ( 论戈列夫在马德里保卫战中的作用 ) , 306 ; on Mera' s request for military rank ( 论梅拉要求授予军衔 ) , 326—327 ; intervenes in release of Asensio ( 为释放阿森西奥进行干预 ) , 359 ; named central general staff chief ( May 1937 ) ( 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 , 第三十五章注释70 , 487 ; featured in News of Spain ( 被《西班牙新闻》突出报道 ) ,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 and Francisco Antón ( 与弗朗西斯科·安东 ) , 543 ; controls Junta de Mandos ( 控制指挥委员会 ) , 544 ; Pérez Salas on ( 佩雷斯·萨拉斯论罗霍 ) , 544 ; clashes with Prieto ( 与普列托发生冲突 ) , 545 ; on fall of Barcelona ( 论巴塞罗那的陷落 ) , 667 ; loss of confidence of ( 失去信心 ) , 679—680 ; flight of ( 逃走 ) , 681 ; does not return from France ( 没有从法国返回西班牙 ) , 688—689 ; on alleged liquidation of war materiel ( 论所谓清理战争物资 ) , 689

Rome agreement ( 1934 ) ( 一九三四年的罗马协议 ) : fulfilled during minarchists' negotiation for arms with Italy ( July 1936 ) ( 一九三六年七月君主主义者与意大利进行购买武器谈判时落实 ) , 101—102

Romerales, General Manuel ( 曼努埃尔·罗梅拉莱斯将军 ) , 共和派将领 : ousted by military rebellion ( 17 July ) ( 七月十七日被军事叛乱推翻 ) , 38

Romero, Luis ( 路易斯·罗梅罗 ) , 西班牙作家 : on Negrín' s delay in ending war ( 论内格林迟迟不愿结束内战 ) , on Casado and libertarians ( 论



卡萨多与自由主义运动) , 698 ; 703—704 ; on Cipriano Mera ( 论西普里亚诺·梅拉 ) , 704 ; on Communists' fear to leave ( 论共产党人害怕留下 ) , 715

Rosal, Amaro del ( 阿马罗·德尔·罗萨尔 ) , 社会党左派 , 后来转投共产党 : on Jesús Hernández ( 论赫苏斯·埃尔南德斯 ) , 第十二章注释23 ; joins Communists ( 加入共产党 ) , 130 ; on ties between Caballero and Communists ( 论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的联系 ) , 131 ; on JARE administration ( 论墨西哥援助西班牙共和派委员会的管理 ) , 第十三章注释23 ; on Stalin' s refusal to give receipt for gold ( 论斯大林拒绝出具黄金收据 ) , 147 ; lauds Stalin' s letter to Caballero ( Dec.1936 ) ( 赞颂斯大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给卡瓦列罗的信 ) , 166 ; control UGT bank employees' union ( 控制劳动者总工会银行雇员工会 ) , 226 ; on Caballero and Rosenberg ( 论卡瓦列罗与罗森堡 ) , 349 ; on campaign against Asensio ( 论反阿森西奥的活动 ) , 349 ; switches Claridad to Communist party ( 把《光明报》变成共产党的喉舌 ) , 第四十五章注释18 ; role in UGT executive ( 在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中的角色 ) , 555 , 558 , 567 ; on PCE pressure on UGT ( 论西班牙共产党对劳动者总工会施加的压力 ) , 557 ; later role of ( 后来的作用 ) , 第五十三章注释9 ; appointed to negotiate with CNT ( 受委派与全国劳工联合会谈判 ) , 567

Rosal Column ( 罗萨尔纵队 ) , 由获释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犯人组成的民兵部队 : halts government' s passage through Tarancón ( 不许政府部长通过塔兰孔 ) , 206—207

Rosenberg, Marcel ( 马塞尔·罗森堡 ) , 苏联大使 : receives Caballero—

Negrín letters requesting approval of gold shipment (收到卡瓦列罗和内格林要求同意把黄金运往莫斯科的信件) , 143 ; allegedly persuades Vayo to offer Spanish Morocco (据说曾敦促德尔巴约用西属摩洛哥做交易) , 181 ; arranges arrival of Soviet advisers (安排苏联顾问来西班牙) , 277 , 315 ; and exclusion of POUM from Madrid junta (与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排除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之外有牵连) , 298 ; Ganga on (甘加论罗森堡) , 319 ; ignored by Orlov (奥尔洛夫避而不谈罗森堡) , 319 ; puts pressure on Caballero (向卡瓦列罗施加压力) , 319 , 320 ; demands Asensio' s dismissal (要求罢免阿森西奥) , 348 ; ejected from Caballero' s office (被赶出卡瓦列罗的办公室) , 348—349 ; Rosal on (罗萨尔论罗森堡) , 349 ; Prieto' s friendliness toward (普列托对其态度友好) , 382

Rosselli, Carlo and Nello (卡洛和内洛·罗塞利兄弟) , 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 : assassination of compared with that of Berneri (把暗杀他们与暗杀贝尔内里作比较) ,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Rothermere, Viscount (罗瑟米尔子爵) , 英国报业巨头 : proposes a Franco—British alliance to divert Germany eastward (建议英法结盟把德国的领土野心转向东方) , 91 ; asks Ward Price for anti—Bolshevist articles (要求沃德·普赖斯多写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章) , 91

Rouret, Martí (马蒂·罗雷特) ,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警察署长 : and government security forces (与政府的治安力量) , 403 ; replaced by Rodríguez salas (被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取代) , 417

Rous, Jean (让·鲁斯) 。见Roux, Jean

Roux, Jean (让·鲁), 托洛茨基在西班牙的代表: on dissolution of Central Antifascist Militia Committee (论解散反法西斯民兵中心委员会), 407

Rovira, Lieutenant Colonel Esteban (埃斯特万·罗维拉中校), 第四十二旅旅长: on first political commissars (论第一批政治委员), 274

Rovira, José (何塞·罗维拉),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政治书记, 阿拉贡师师长: negotiates compromise in Lérida (在莱里达谈判达成妥协方案), 452; role as reported by News of Spain (在《西班牙新闻》报道中的角色),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arrested by Communists (被共产党人逮捕), 500, 第四十八章注释11

Rowse, A.L. (A.L.罗斯), 英国历史学家: on Lothian as Hitler propagandist (论洛西恩成为希特勒的宣传员), 174; on Chamberlain (论张伯伦), 186

Rubiera, Carlos (卡洛斯·鲁维埃拉), 社会党左派, 代表马德里的议会议员: on Communist soldiers' privileges (论共产党士兵的特权), 369; supports social revolution (支持社会革命), 556; on poor hospital treatment of non-Communists (论非共产党人在战地医院受到的恶劣对待), 595

Rubio, Javier (哈维尔·鲁维奥), 历史学家: on numbers of Spanish refugees in embassies (关于外国使馆里西班牙避难者的人数), 52

Ruediger, Helmut (赫尔穆特·吕迪格), 国际工人协会的德国籍代表: on power inherent in CNT plan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方案固有的权力特征), 201; on CNT army units (May 1937) (一九三七年五月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军队),

330 ; supports Caballero against Communists ( 支持卡瓦列罗反对共产党人 ) , 359 ; on CNT' s use of power (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对权力的使用 ) , 392—393 , 440 ; ceiticizes Friends of Durruti ( 批评杜鲁蒂之友会 ) , 第四十三章注释44

Ruiz, Pablo ( 巴勃罗·鲁伊斯 ) , 杜鲁蒂之友会发言人 : on goals of Friends of Durruti ( 论杜鲁蒂之友会的目标 ) , 第四十一章注释49

Ruiz Funes, Mariano ( 马里亚诺·鲁伊斯·富内斯 ) , 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 becomes agriculture minister ( 20July ) ( 七月二十日成为农业部长 ) , 47 ; flight from Spain ( 逃离西班牙 ) , 第四章注释58 ; named minister of justice ( 被任命为司法部长 ) , 122

Ruiz Ponsetti, Estanislao ( 埃斯塔尼斯劳·鲁伊斯·庞塞蒂 )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和经济部门负责人 : and n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es ( 与工业企业的国有化 ) , 636

Ruta ( 《道路》 ) , 伊比利亚自由主义青年联盟的喉舌 : 425

Rychagov ( 雷恰戈夫 ) , 苏联军官 : Yakovlev on liquidation of ( 雅科夫列夫论雷恰戈夫遇害 ) , 312

Sabio, Fernando ( 费尔南多·萨维奥 ) , 职业军官 , 社会党人 : Enrique Castro on ( 恩里克·卡斯特罗论萨维奥 ) , 273

Sainz Rodríguez ( 赛恩斯·罗德里格斯 ) , 君主主义者 : negotiates purchase of Italian war material ( 商谈购买意大利的战争物资 ) , 101

Salas Larrazábal, Ramón (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 右翼军官和历史学家 : on estimated number of deaths during war (关于内战期间的估计死亡人数), 第四章注释68 ; on Fifth Regiment statistics (与第五团有关的统计数字), 269 ; on mixed brigades (论混成旅), 第二十八章注释9 ; on officers' respect for Rojo (论军官尊重罗霍), 290 ; on Extremadura plans (论埃斯特雷马杜拉计划), 467 ; on Casado coup (论卡萨多的政变), 702, 713

Salazar, Lieutenant Colonel (萨拉萨尔中校) : and CNT Maroto Brigade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马罗托旅), 331

Salazar, Victor (维克托·萨拉萨尔), 普列托派社会党人 : replaced as head of carabineros (作为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被撤换), 609

Salazar Alonso, Rafael (拉斐尔·萨拉萨尔·阿隆索), 激进党政府部长 : sentenced to death by Popular Tribunal (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 50

Salgado, Manuel (曼努埃尔·萨尔加多), 全国劳工联合会军事领导人 : protests imposition of commanders (反对强行任命指挥官), 331 ; with CNT Regional Committee of Defense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防务委员会), 705

San Andrés, Miguel (米格尔·圣安德烈斯), 左翼共和派议员 : defends middle classes (保护中产阶级), 84—85 ; named justice and propaganda minister, Casado junta (被任命为卡萨多委员会的司法和宣传部长), 726 ; broadcasts junta manifesto (在广播上发表卡萨多委员会宣言), 727

San Miguel de los Reyes penitentiary ( 圣米格尔·德洛斯雷耶斯监狱 ) :  
supplies men to Iron Column ( 为钢铁纵队提供兵员 ) , 333 , 339

Sa·萨尼亚 ) , 西班牙历史学家 : interviews Garcés Arroyo ( 采访加尔塞斯·阿罗约 ) , 301 ; and Garcés Arroyo ( 与加尔塞斯·阿罗约 ) , 301 , 602

Sánchez—Albornoz, Claudio ( 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 ) , 历史学家 , 共和国流亡时期的总统 : on Aza' s powerlessness ( 论阿萨尼亚的无能为力 ) ,  
15 , 163 , 165 ; flight from Spain ( 逃离西班牙 ) , 第四章注释58

Sánchez Arcas, Manuel ( 曼努埃尔·桑切斯·阿尔卡斯 ) , 内格林政府主管宣传的外交部副部长 : influence on Negrín ( 对内格林的影响 ) , 140 , 588 ;  
appointed by Vayo ( 被德尔巴约任命为外交部主管宣传的副部长 ) , 586 ;  
leaves Madrid with Negrín ( 与内格林一起离开马德里 ) , 694 , 717 ; bids  
farewell to Communist leaders ( 向共产党领导人告别 ) , 731

Sánchez Requena, J. ( J. 桑切斯·雷克纳 ) , 工联党人 : named secretary ,  
Casado junta ( 被任命为卡萨多委员会秘书 ) , 726

Sánchez Román, Felipe ( 费利佩·桑切斯·罗曼 ) , 保守的民族共和党领导人 :  
member of Martínez Barrio' s government ( 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成员 ) ,  
39 , 41 ; agrees on withholding arms from workers ( 赞成不向工人发放武器 ) , 40 ; on Martínez Barrio' s offers to Mola ( 关于马丁内斯·巴里奥愿意  
向莫拉提供其想要的职位和条件 ) , 40 ; Claridad views as  
reactionary ( 《光明报》认为桑切斯·罗曼最保守 ) , 45

Sánchez Vázquez, Adolfo ( 阿道弗·桑切斯·巴斯克斯 ) , 西班牙共产党作家 : on

Togliatti ( 论陶里亚蒂 ) , 364

Sanjurjo, General José ( 何塞·圣胡尔霍将军 ) , 君主主义者军官 : leads abortive revolt against Republic ( 1932 ) ( 一九三二年领导反共和国的未遂叛乱 ) , 10—11 ; death in plane crash ( 死于飞机坠毁 ) , 第一章注释44 , 101 ; government promises to return land of owners participating in Sanjurjo' s revolt ( 政府承诺向参加圣胡尔霍叛乱的地主退还土地 ) , 14 ; signs authorization for Bolín to seek aid abroad ( 签署委派博林寻求外国援助的授权文件 ) , 101

Sanz, Ricardo ( 里卡多·桑斯 ) , 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武装领导人 , 杜鲁蒂纵队指挥官 : on self—discipline of CNT militia (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的自我约束 ) , 264 ; uses professional military advice ( 采用职业军人的建议 ) , 325 ; on withholding of arms from anarchist units ( 论不给无政府主义民兵部队发放武器 ) , 第四十一章注释44 ; on workers' demoralization ( 论工人的士气低落 ) , 499 ; claims Aragon Defense Council dissolved by force ( 声称保卫阿拉贡委员会被强行解散 ) , 526 ; on Mantecón' s destruction of collectives ( 论曼特孔破坏集体农庄 ) , 529

Saragossa ( 萨拉戈萨 ) : arrests and martial law during uprising ( 叛乱时抓人并且宣布军事管制 ) , 43

Savich, Ovadii ( 奥瓦季·萨维奇 ) , 塔斯社驻西班牙代表 : on Alvarez del Vayo ( 论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 ) , 139

Sayagües, Prudencio ( 普鲁登西奥·萨亚圭斯 ) , 共和派人士 : briefly heads

SIM ( 短期领导军事调查局 ) , 601

Sbert, Antonio María ( 安东尼奥·马利亚·斯韦尔特 )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 Catalan councillor of culture (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文化专员 ) , 412 ; named councillor of the interior ( June 1937 ) ( 一九三七年六月被任命为自治政府内务专员 ) , 495

Schacht ( 沙赫特 ) , 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 : and Neurath' s dispatch on German—Soviet negotiations ( 与诺伊拉特就德苏谈判写给他的私人信件 ) , 106

Schapiro, Alexander ( 亚历山大·夏皮罗 ) , 出生于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 : condemns CNT entry into government ( 谴责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 ) , 第十九章注释35 ; Vázquez counters criticism of ( 巴斯克斯反驳夏皮罗的指责 ) , 499

Schapiro, Leonard ( 伦纳德·夏皮罗 ) , 欧洲的苏联问题学者 : confirms Hitler—Stalin negotiations ( 证实希特勒—斯大林谈判 ) , 106

Schlager, Felix ( 费利克斯·施莱尔 ) , 挪威临时代办 : on numbers of refugees housed in Norwegian embassy ( 关于躲进挪威公使馆避难的人数 ) , 52

Schwed ( 什维德 ) 。见 Orlov, Alexander

Schweppenburg, General Baron Geyr von ( 盖尔·冯·施韦彭布尔格将军男爵 ) , 前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武官 : on need to avoid Anglo—German war ( 论必



须避免英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 , 91—92 , 171 ; on West' s lost opportunity to stop Hitler ( 论西方列强坐失遏制希特勒的良机 ) , 第十六章注释21

Scrutator ( 斯克鲁泰特 ) 。见Sidebotham, Herbert

Secret police ( 秘密警察 ) : dissolution of ( 解体 ) , 第四章注释18 , 216 ; reorganized under Galarza ( 在加拉尔萨的领导下重建 ) , 219

Secretariado de Defensa ( 防务秘书处 ) , 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的机构 : holds power in Catalonia ( 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掌握权力 ) , 403 ; Comorera demands suppression of ( 科莫雷拉要求撤销防务秘书处 ) , 411

Sedwick, Frank ( 弗兰克·塞德威克 ) , 历史学家 : on Communist influence on Negrín ( 论共产党对内格林的影响 ) , 141 ; on disintegration of Aza' s presidency ( 论阿萨尼亚总统职位的没落 ) , 164 , 165

Seidman, Michael ( 迈克尔·塞德曼 ) , 历史学家 : on worker sabotage of factory improvements ( 论工人在工厂改善工程中的破坏行为 ) , 223

Semprún, Jorge ( 豪尔赫·森普鲁伦 ) , 作家 : on Benigno Rodríguez ( 论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 ) , 140

Sender, Ramón ( 拉蒙·森德尔 ) , 作家 : on Bowers' s ignorance of Soviet influence ( 论鲍尔斯对苏联影响的无知 ) , 141

"Senex" ( "老者" ) , 无政府主义作家 : counters Morrow' s criticism of CNT leadership ( 反驳莫罗对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指责 ) , 443—444

Serra Pàmies, Miguel (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 on Companys' s threats to Anarchists (关于孔帕尼斯向无政府主义者发出的威胁), 394; on composition of PSUC (关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构成), 397; on FAI' s reaction to PSUC in Catalan government (关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反应), 401; on Antonov—Ovseenko and POUM (论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411; on Comorera' s actions in May events (关于科莫雷拉在五月事变中的活动), 448; on Sesé' s assassination (关于暗杀塞赛), 第四十三章注释29; on Caballero succession (关于内格林接替卡瓦列罗), 476; named supplies councillor (June 1937) (一九三七年六月被任命为自治政府物资供应专员), 495; on Negrín and carabineros (论内格林与边防警察部队), 610

Serrano Poncela, Segundo (塞贡多·塞拉诺·庞塞拉),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 Carrillo appoints to Madrid security (卡里略将其安排在马德里的治安部门), 299

Serveis Electrics Unificats de Catalunya (加泰罗尼亚电力联合会), 外国水电公司联合体: denationalization of (恢复私营), 635

Servicio de Información Militar (军事调查局)。见SIM

Servicio de Información y Policía Militar (宪兵情报局)。见SIPM

Sesé, Antonio (安东尼奥·塞赛), 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书记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 on workers' ownership of property (论工人有

了财产) , 54 ; named councillor i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 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成员 ) , 451 ; killing of ( 被杀 ) , 453 , 第四十三章注释29

Seville ( 塞维利亚 ) : insurgent army captures garrison of ( 叛军占领塞维利亚兵营 ) , 41—42

Shkarenkov, L.K. ( Л.К.什卡伦科夫 ) , 苏联作家 : on Russian emigré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 ( 论国际纵队中的俄国流亡者 ) , 108

Shtern ( Stern ) , Gregoriy M. ( 格列戈里·M.施特恩或斯特恩 ) , 化名格里戈罗维奇将军 , 一九三七年五月起担任苏联首席军事顾问 : not Emilio Kléber ( 不是埃米利奥·克莱贝尔 ) , 303 ; perishes in Stalin purge ( 1941 ) ( 一九四一年被斯大林清洗 ) , 308 , 312

Shumilov, Brigadier Mikhkhail Stepanofich ( 米哈伊尔·斯捷潘诺菲奇·舒米洛夫准将 ) , 化名希洛夫 , 苏联军官 : and Negrín' s departure ( 与内格林的逃离 ) , 735

Sidebotham, Herbert ( 赫伯特·赛德博特姆 ) , 笔名斯克鲁泰特 , 《观察家报》的外交事务记者 : 第十六章注释52

Silva, José ( 何塞·席尔瓦 ) , 共产党员 , 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 : restores some Aragon collectives ( 恢复阿拉贡地区的一些集体农庄 ) , 244 ; on violence associated with collectives ( 论与集体农庄有关的暴力行为 ) , 529—530 ; on restoring peasants' incentive ( 论重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 , 530—531

SIM (Servicio de Investigación Militar) (军事调查局) : Negrín appoints Garcés Arroyo to head (内格林委派加尔塞斯·阿罗约负责军事调查局) , 218 , 301 ; Prieto tries to prevent Communist takeover of (普列托竭力防止共产党人掌握军事调查局) , 546—547 ; Morón on its Communist ties (莫隆论军事调查局与共产党人的关系) , 549 ; operations of (军事调查局的活动) , 600—606。另见Prieto, Indalecio

Simon, Sir John (约翰·西蒙爵士) , 英国外交大臣 : supports Germany' s claim to armament equality (支持德国提出的军备权利平等的要求) , 95 ; quotes Hitler on dangers of Communism (引述希特勒谈共产主义的危险的言论) , 174 ; in Chamberlain' s "Inner Cabinet" (张伯伦的“内阁决策委员会”成员) , 187 , 651

SIPM (Servicio de Información y Policía Militar , 宪兵情报局) , 民族主义者的情报机构 : P706—709 , 卡萨多与宪兵情报局谈判

Simone, André (安德烈·西蒙) 。见Katz, Otto

SIPM (Servicio de Información y Policía Militar) (宪兵情报局) , 民族主义者的情报机构 : Casado negotiates with (卡萨多与其谈判) , 706—709

Sitges (锡切斯) : shoemaking industry centralized in (制鞋业被集中起来) , 59

Skidelsky, Robert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 英国历史学家 : and Wilson' s secret proposals (与威尔逊的秘密建议) , 658 ; "neorevisionism" of (斯基德尔斯基对绥靖政策的“新修正主义阐述” ) , 第六十一章注释58 ; on

impossibility of appeasement policy (论绥靖政策的不可能性) , 662

Slater, Hugh (休·斯莱特) : on Miaja' s Communist ties (论米亚哈与共产党的关系) , 294

Sloutski, Abram (阿布拉姆·斯卢茨基) , 苏联秘密警察 : on establishment of NKED in Spain (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立足) , 219—220 ;

Krivitsky on (克里维茨基论斯卢茨基) , 310—311

Small bourgeoisie (小资产阶级) : adjustment to radical regime (彻底调整适应新的社会制度) , 81—82 ; its pessimism and adoption of working—class appearance (悲观主义和采用工人阶级的衣着打扮) , 81—82 ;

adherence to Communist party (依附共产党) , 83—87 , 126 ;

dissatisfaction of in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地区小资产阶级的不满) ,

395 ; adherence to Catalan PSUC (依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 415 ;

reasons for fate of (造成其命运的原因) , 627。另见ERC ; IR ; PCE ; PSUC ;

Small farmers

Small farmers (小地主)。见CNT ; Collectivization , rural ; 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nd Workers ; PCE ; Peasant Federation

Smushkevich, Yakov (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 , 化名道格拉斯将军 , 苏联空军指挥官 , 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顾问 : directed Spanish Air Force (指挥西班牙空军) , 159 ; and Gorev (与戈列夫) , 307 ; Prokofiev on (普罗科菲耶夫

论斯穆什克维奇) , 308 ; perishes in Stalin purge (1941) (一九四一年被斯大林清洗) , 308 , 312 ; Prieto' s Friendliness toward (普列托对其态度

友好) , 382—383 ; orders too few planes for Estremadura ( 为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派出的飞机太少 ) , 468

Social revolution ( 社会革命 ) 。见CNT ; Collectivization , rural ; Collectivization , urban ; FAI ; JAU ; PCE ; PSUC ;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Socialist party ( 社会党 ) : irreconcilable divisions within ( 内部已经无法弥合的裂痕 ) , 25 ; organizes own militia ( 组织自己的民兵武装 ) , 38—40 ; supports but does not join Martínez Barrio' s government ( 支持但不加入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 ) , 41 ; strength undermined by defections to Communist party ( 因成员转投共产党而被严重削弱 ) , 129。另见 Socialists ( left ) ; Socialists ( moderate )

Socialist Youth Federation ( 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 ) 。见JSU

El Socialista ( 《社会主义者》 ) , 社会党执委会的报纸 : 13—14 , 25 , 41 , 129 , 160 , 197 , 291 , 384 , 536 , 540 , 560 , 608—609

Socialists ( left ) ( 社会党左派 ) : opposition to CEDA and to Gil Robles ( 反对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和希尔·罗夫莱斯 ) , 8—9 ; city councils in the hands of ( 控制市政当局 ) , 12 ; Payne on their plan to fuse with Communists ( 佩恩论其与共产党合并的打算 ) , 26 ; plot to weaken Aza' s presidency ( 密谋削弱阿萨尼亚的总统权力 ) , 29—30 ; labor unions control local governing committees ( 社会党工会控制地方管理机构 ) , 49 ; former Republican parties search for support against ( 前共和派为反对

社会党左派寻求帮助) , 82—83 ; Communists' desire to overpower ( 共产党人希望遏制社会党左派 ) , 114 ; alleged proposal to establish Socialist republic ( 据说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 ) , 114—115 ; invited by Giral to join government ( 希拉尔邀请社会党左派加入政府 ) , 120 ; clash with center Socialists ( 与社会党中间派势不两立 ) , 129 ; against government volunteer army ( 反对政府组建志愿军 ) , 252 ; support Caballero' s curbs on war commissariat ( 支持卡瓦列罗约束总政治部 ) , 375 ; animosity toward Negrín and PCE ( 敌视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 ) , 629 ; return to power in Jaén ( 在哈恩省恢复活力 ) , 632。另见Largo Caballero, Francisco ; PCE ; Socialiat party ; Socialiats ( moderate )

Socialiats ( moderate ) ( 社会党温和派 ) : clash with left Socialists ( 与社会党左派势不两立 ) , 129 ; propose coordination of Communist and Socialist ( 建议共产党与社会党协调行动 ) , 382 ; fears of unification with PCE ( 对与共产党合并有顾虑 ) , 385 , 536 ; join with PCE to oust Caballero ( 与共产党联手推翻卡瓦列罗 ) , 464 , 470 ; resign to force Caballero' s hand ( 辞职迫使卡瓦列罗行动 ) , 470—471 ; demand defense ministry for Prieto ( 要求让普列托任国防部长 ) , 471—472 ; animosity toward Negrín and PCE ( 敌视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 ) , 629。另见Lamonedá, Ramón ; Largo Caballero, Francisco ; PCE ; Prieto, Indalecio ; Socialiat party ; Socialiats ( left )

Socialization ( 社会主义化 )。见Collectivization , rural ;

Collectivization , urban

El Sol (《太阳报》), 温和共和派的报纸: 4—5, 7, 15, 32, 199

Solano, Wilebaldo (维莱瓦尔多·索拉诺),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青年组织总书记: on clandestine activities of POUM (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地下活动), 第四十八章注释84; on Nin's resistance under torture (论宁在严刑下的反抗), 520

Soley Conde, Major Julián (胡利安·索莱·孔德少校), 内格林的副官: leaves Madrid with Negrín (与内格林一起离开马德里), 694, 717

Solidaridad Obrera (《工人团结报》), 巴塞罗那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喉舌: 45, 51, 58, 60—61, 76, 82, 84, 140, 208, 262—263, 323, 389, 395, 411—413, 415, 417—418, 422, 424—425, 428, 447, 460, 492, 499, 553, 586, 624, 636, 637—638; Toryho dismissed from (解除托里奥报纸负责人的职务), 623

Somoza Silva, Lázaro (拉萨罗·索莫查·席尔瓦), 何塞·米亚哈将军的传记作者: claims that Miaja distributed arms (声称米亚哈下令给工人发放武器), 39

Soria, Georges (乔治·索里亚), 法国共产党《人道报》记者: alleges POUM controlled by Franco (声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受弗朗哥控制), 445; Bolloten on his views on POUM (博洛滕论其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看法), 第四十二章注释106; on Nin's disappearance (论宁的失踪), 507

Sorrenti, Enea (埃内亚·索尔门蒂)。见Vidali, Vittorio

Souchy, Agustín (阿古斯丁·索奇), 德国无政府主义者: on collectives in



Albalate de Cinca , Calaceite , Calanda , Muniera , and Mazaleón ( 论辛卡河畔的阿尔瓦拉特、卡拉塞特、卡兰达、穆涅萨和马萨莱昂等村子的集体农庄 ) , 70—73 ; on pressure to collectivize ( 论集体化承受的压力 ) , 75 ; on appeals for cease—fire in Barcelona ( 论在巴塞罗那停火的呼吁 ) , 439 , 454 ; on Sesé' s assassination ( 论塞赛被暗杀 ) , 453 ; on assassination of Berneri and Barbieri ( 论暗杀贝尔内里和巴尔别里 ) , 第四十三章注释32

Southworth, Herbert R. ( 赫伯特·R.索思沃思 ) , 美国历史学家 : exposes as forgeries papers on Communist plot in Spain ( 揭露关于共产党在西班牙密谋的文件是伪造的 ) , 99 ; claims that Communists did not conceal revolution ( 声称共产党人没有掩盖革命 ) , 第十章注释14 ; asks why Bollothen concealed Faupel' s memo ( 质问博洛滕为什么避而不谈福佩尔的备忘录 ) , 446 ; later appearances of ( 后来的表现 ) ,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 as Negrín supporter ( 作为内格林的支持者 ) ,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 第六十章注释17 ; on use of El Campesino' s book ( 论引用 “ 农夫 ” 的书 ) , 632—633

Sovetskaia Bukovina ( 《布科维纳苏维埃报》 ) : reveals real name of Emilio Kléber ( 透露克莱贝尔的真实姓名 ) , 302

Soviet civilians and NKVD operatives in Spain ( 在西班牙的苏联文职人员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 ) 。见 Belayev ; Ehrenburg, Ilya ; Gaykis, Leon ; Koltsov, Mikhail ; Mirova ; Orlov, Alexander ; Rosenberg, Marcel

Soviet—German Non—Aggression Pact (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 。见 German—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

Soviet officers in Spain ( 在西班牙的苏联军官 ) : 307 , 314—315 ;  
independent of war ministries ( 独立于国防部 ) , 315。另见Batov, P. ;  
Berzin, General Ian K. ; Eremenko, I. ; Gorev, Vladimir ; Gorkin ;  
Iakushin, M. ; Kléber, Emilio ; Kolev ; Kravchenkov ; Krivoshein,  
Colonel S. ; Kulik, General G. ; Kuznetsov, Nicolai G. ; Malinovsky,  
Rodion ; Mamsurov Judji—Umar ; Meretskov, K.A. ; Novak, A. ; Pavlov,  
General D.G. ; Prokofiev, Major General G. ; Ptukhin, E.S. ;  
Rodimtsev, A. ; Shtern, Gregoriy M. ; Smushkevich, Yakov ; Valua ;  
Voronov, N.

Soviet Union ( 苏联 )。见Comintern ; Soviet officers in Spain ; Stalin,  
Joseph ; USSR

Spanish Morocco ( 西属摩洛哥 ) : insurgent army seizes ( 叛军占领西属摩洛哥 ) , 41 ; Franco assumes command of Moroccan forces ( 佛朗哥取得摩洛哥军队的指挥权 ) , 43 ; nearly all officers side with revolt ( 西属摩洛哥的几乎所有军官都支持叛乱 ) , 47 ; Germany' s help in troop transport from ( 德国帮助把西属摩洛哥的军队运到内地 ) , 97—98 ; Mussolini sends first planes to ( 墨索里尼把第一批飞机派到西属摩洛哥 ) , 101—102 ; offered by Vayo to France and Britain ( 德尔巴约提出愿意把西属摩洛哥转让给法国和英国 ) , 181 ; plan to foment rebellion in ( 打算在西属摩洛哥煽动叛乱 ) , 466

Spanish Revolution ( 《西班牙革命》 )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英语新闻快报 : 442

Spartacus (《斯巴达克斯》), 阿利坎特的社会党左派刊物: 518

Stalin, 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and program of Madrid Socialists (与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的纲领), 24, 234; fears Germany's revived strength (担心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军事力量), 88—89; negotiates with Hitler (与希特勒谈判), 89, 106—107, 654—656; Gil Robles on his rapprochement with England and France (希尔·罗夫莱斯论其与英法两国建立友好关系), 99; Communists' disappointed at his Spanish policy (共产党人对其西班牙政策感到失望), 104; begins military intervention (开始进行军事干涉), 104, 107—109; Krivitsky on his seeking support of Foreign Communists (克里维茨基论其寻求外国共产党的支持), 104—105; prefers prolongation of Spanish conflict (希望把西班牙内战拖延下去), 109; contacts Orlov on secret gold shipment (就秘密运送黄金与奥尔洛夫联系), 147; grants credit to Negrín (批准向内格林贷款), 153—154; delights in holding gold (因占有黄金而心情愉快), 158; letter to Caballero on defense of Republic (给卡瓦列罗写信论保卫共和国), 165—166, 234, 315; profits by backing Spanish government (通过支持西班牙政府得到好处), 168—169; and Koltzov (与科利佐夫), 第三十一章注释31; motives in repressing POUM (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目的), 503; withdraws from Spain (撤出西班牙), 669。另见Comintern; Soviet civilians and NKVD operatives in Spain; Soviet officers in Spain; USSR

Stanley, Oliver (奥利弗·斯坦利), 英国保守党政府官员: expresses fear of communism (表达对共产主义的担忧), 173

Starik (斯塔里克)。见Berzin, General Ian K.

Stashevsky, Arthur (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 斯大林的贸易特使: Negrín's ties to (与内格林的关系), 105—106, 142—143, 476; Krivitsky reveals presence in Spain of (克里维茨基揭露其在西班牙的活动), 106; allegedly assigned by Stalin to manipulate loyalist Spain (据说斯大林派他来控制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 142; and gold shipment (与运送黄金), 143; disappearance of (销声匿迹), 153, 310—311; allegedly criticizes NKVD (据说批评过内务人民委员部), 319; ignored by Orlov (奥尔洛夫避而不谈斯塔舍夫斯基), 319

Stefanov, Boris (鲍里斯·斯特凡诺夫), 化名莫雷诺, 保加利亚共产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 on communist entry into Caballero government (论共产党加入卡瓦列罗政府), 121—122; Ravines on (拉维内斯论斯特凡诺夫), 133; MartínezAmutio on (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论斯特凡诺夫), 第十二章注释57; on Soviet hope of involving Western democracies (论苏联希望西方民主国家卷入西班牙内战), 184; at politburo meeting on Caballero ouster (出席研究推翻卡瓦列罗的政治局会议), 361, 362; on usefulness of PSOE leaders (论社会党领导人的利用价值), 384; on conspiracy against Prieto (关于针对普列托的阴谋), 573; arrives in south—central zone (到达中南部地区), 687; on left's hostility to PCE (论左派敌视西班牙共产党), 692—693; on PCE party conference in Madrid (论西班牙共产党的马德里会议), 693—694; on government at Elda (论政府在埃尔达), 696; on communist leaders' dependence on Negrín (论共产党领导人对内格林的依赖), 720; flees Spain (逃离西班牙), 733

Stern, Manfred Zalmanovich (曼弗雷德·扎尔曼诺维奇·斯特恩)。见 Kléber, Emilio

Stevenson, Ralph (拉尔夫·史蒂文森), 英国代办: and Negrín's peace proposal (与内格林的和平建议), 697

Stores, Hotels, and restaurants (商店、旅馆和餐馆), union control of (工会控制商店、旅馆和餐馆), 第四章注释88

Strang, William (威廉·斯特朗), 英国政府中心部门负责人: supports Chamberlain (支持张伯伦), 650; on possibility of German attack on West (论德国进攻西方的可能性), 657—658

Straperlo (斯特拉佩洛), 非法交易: 538, 第五十一章注释12

Strikes (罢工): in urban centers preceding Civil War (内战之前在城市中心举行的罢工), 7; of Madrid construction workers (马德里建筑工人的罢工), 7, 100

Strong, Anna Louisa (安娜·路易莎·斯特朗), 共产党作家: interviews Vidali (采访维达利), 267

Suárez de Tangil, Fernando (Count of Vallellanos) (费尔南多·苏亚雷斯·德·坦希尔, 巴列利亚诺斯伯爵), 君主主义者: on impact of Calvo Sotelo's assassination (论杀害卡尔沃·索特洛的影响), 37—38

Suero Roca, M. Teresa (M. 特蕾莎·苏埃罗·罗卡), 历史学家: on Rojo's political allegiances (论罗霍的政治效忠对象), 302; on Díaz

Tendero ( 论迪亚斯·滕德罗 ) , 357

The Sunday Times ( London ) ( 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 ) : 177 , 第十六章注释  
52

Syndicalist party ( 工联党 ) : 第五十章注释12

Tagüe·塔圭尼亚) , 共产党民兵指挥官 : Prieto hostile toward ( 普列托对其怀  
有敌意 ) , 545 ; commands an Eastern unit ( 指挥东部前线的一支部队 ) ,  
595 ; and plan to defend Barcelona ( 与保卫巴塞罗那的计划 ) , 669 ; on  
Spanish Communists who did not return to Spain ( 论没有返回西班牙的共  
产党人 ) , 689 ; on danger of remaining in Madrid ( 论留在马德里的危  
险 ) , 694 ; on support for Casado ( 论人们对卡萨多的支持 ) , 703 , 710 ; on  
PCE inaction during coup ( 论西班牙共产党在政变期间的无所作为 ) , 720

Taittinger, Pierre ( 皮埃尔·泰坦热 ) , 法国右派众议员 : advises that  
Franco—Soviet alliance would lead to war with Germany ( 认为法苏结盟  
将导致与德国的战争 ) , 90

Tarradellas, José ( 何塞·塔拉德利亚斯 )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 加泰  
罗尼亚自治政府首席专员兼财政专员 : attempts to control collectives ( 试  
图控制集体化企业 ) , 224 ; decrees measures to remedy currency  
shortage ( 颁布法令改善流通不足的状况 ) , 226 ; appointed to Militia  
Committee by Companys ( 被孔帕尼斯派到民兵委员会 ) , 394 ; forms new  
administration ( 组成新政府 ) , 402 ; defends Catalan autonomy ( 保护加泰  
罗尼亚的自治权 ) , 403—404 ; announces cabinet crisis ( 宣布内阁处于危机

状态) , 410 ; defends CNT ( 保护全国劳工联合会 ) , 415 ; clashes with Aiguadé ( 与艾瓜德意见分歧 ) , 415—416 ; on central police authority in Catalonia ( 论中央政府在加泰罗尼亚的治安权 ) , 418 , 611 ; during crisis , named councilor of education ( 政府危机期间兼任教育专员 ) , 421 ; Companys impatient with ( 孔帕尼斯不再支持塔拉德利亚斯 ) , 422 ; on danger of telefónica raid ( 论袭击电话局的危险 ) , 431 ; visits AzaTasis i Marca, Rafael ( 拉斐尔·塔西斯—马卡 ) , 加泰罗尼亚监狱总长 : on committees' control of Catalan provinces ( 论委员会控制加泰罗尼亚各省 ) , 49

Tass news agency ( 塔斯社 ) : 308

Taylor, A.J.P. ( A.J.P.泰勒 ) , 英国历史学家 : on disappearance of British state papers ( 论英国政府文件的消失 ) , 185 ; on selection of documents used at Nuremberg ( 论纽伦堡审判所用文件的选择 ) , 第十七章注释36 ; on British assurances to Hitler ( 论英国对希特勒的保证 ) , 651—652 ; on Wilson' s secret proposals ( 论威尔逊的秘密建议 ) , 658 , 659—660

Témime, Emile ( 埃米尔·特米姆 ) , 法国历史学家 : on revolutionary faith of Madrid defenders ( 论马德里保卫战参加者的革命信念 ) , 284

Terror , revolutionary ( 革命恐怖活动 ) : workers assume police functions ( 工人行使警察的职能 ) , 39 ; Popular Tribunal set up to counteract ( 为抵消革命恐怖活动的危害设立人民法庭 ) , 50 ; Araquistáin on ( 阿拉基斯塔因论革命恐怖活动 ) , 52 ; casualty statistics ( 革命恐怖活动

所造成的伤亡人数统计) , 第四章注释68 ; Giral government faces ( 希拉尔政府面对革命恐怖活动 ) , 216 ; by Communists against Catalan CNT ( 共产党人用革命恐怖活动对付全国劳工联合会 ) , 498—499

Teruel ( 特鲁埃尔 ) : captured , then evacuated , by Republicans ( 共和派占领特鲁埃尔 , 后被迫撤出 ) , 570 ; and discrediting of Prieto by Communists ( 特鲁埃尔与共产党人使普列托名誉扫地的阴谋 ) , 572—573

Thalmann, Paul ( 保罗·塔尔曼 ) , 瑞士托洛茨基分子 : on Jaime Balius ( 论海梅·巴柳斯 ) , 第四十一章注释49 ; on weak ties between POUM and Trotskyist ( 论杜鲁蒂之友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脆弱关系 ) , 442

Theaters ( 剧院 ) : union control of ( 工会控制剧院 ) , 第四章注释88

Thirteen—Point program ( 十三点方案 ) : issued by Negrín government ( 内格林政府发表十三点方案 ) , 642—643

Thomas, Hugh ( 休·托马斯 ) , 英国历史学家 : Chomsky on his disregard of Popular revolution ( 乔姆斯基论托马斯不提人民革命 ) , 第六章注释81 ; suspects Krivitsky ( 怀疑克里维茨基 ) , 105 ; on Negrín ( 关于内格林 ) , 141—142 , 217 ; describes International Brigade march on Madrid ( 描述国际纵队进军马德里 ) , 288 ; on Commune de Paris Battalion ( 关于国际纵队巴黎公社营 ) , 288 ; on Edgar André Battalion ( 关于国际纵队埃德加·安德烈营 ) , 288 ; on possibility of Anglo—French aid ( 论英法援助的可能性 ) , 721



Tierra y Libertad (《土地与自由》),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喉舌: 63, 72—73, 193, 194—195, 419, 423, 425, 494, 495—496, 635—636, 637

The Times (London) (伦敦《泰晤士报》): 第十六章注释51

Togliatti, Palmiro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化名埃尔科莱·埃尔科利、阿尔弗雷多,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 共产国际代表: succeeded by Luigi

Lango (Gallo) (作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被在西班牙化名加略的路易吉·隆哥接替), 108; active in Spanish Communist party (在西班牙共产党内的作用), 133; El Campesino on ( “农夫” 论陶里亚蒂), 第十二章注释59, 134; Orlov on (奥尔洛夫论陶里亚蒂), 133; La Pasionaria on (热情之花论陶里亚蒂), 第十二章注释68; relation with Negrín (与内格林的关系), 140, 363; supports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29, 488; proposes Caballero ouster at politburo meeting (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推翻卡瓦列罗), 361—363; controversy on his presence in Spain (出现在西班牙的时间引起争论), 364—365; on Prieto' s role in Caballero ouster (论普列托在推翻卡瓦列罗的计划中扮演的角色), 466; rebukes Hernández for favoring Estremadura offensive (因其支持发动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而训斥埃尔南德斯), 468; on choice of prieto as defense minister (论选择普列托担任国防部长), 478; on Communists' satisfaction with Negrín government (论共产党人对内格林政府感到满意), 488; and Nin' s death (与宁的死亡), 510; on PUUM trials (论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518, 521; on PCE' s drive for predominance (论西班牙共产党谋求支配地位), 540, 640;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 陶里亚蒂的政治哲学 ) , 第五十一章注释22 ; and Vayo ( 与德尔巴约 ) , 第五十一章注释42 ; on PCE rapprochement with CNT ( 论西班牙共产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建立友好关系 ) , 552—553 , 567—568 , 578 ; criticizes Codovila ( 指责柯多维拉 ) , 553 ; on CNT—UGT alliance (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的盟约 ) , 554 ; role in takeover of Correspondencia de Valencia ( 在接管《巴伦西亚通讯》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 , 561—562 ; on Communist demonstration for resistance ( 论共产党为继续抵抗举行的示威活动 ) , 578 ; on Negrín ( 论内格林 ) , 581—582 , 588—589 , 629 , 671 , 675—677 , 712 , 717—718 , 732—733 ; on Freemasons ( 论共济会会员 ) , 608 ; on rival leaderships in JSU ( 关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中出现对立的领导班子 ) , 631 ; on Rojo' s defeatism ( 论罗霍的失败主义情绪 ) , 680 ; on loss of war ( 论内战失败 ) , 686 ; arrives in south—central zone ( 到达中南部地区 ) , 687 ; criticizes Communist conference in Madrid ( 批评共产党的马德里会议 ) , 693—694 ; departs for El palmar ( 离开马德里去埃尔帕尔马 ) , 695 ; on PCE' s attempt to prevent coup ( 论西班牙共产党试图防止政变 ) , 717—719 ; meets with Hernández and La pasionaria ( 和热情之花一起与埃尔南德斯谈话 ) , 723—725 ; instructs Communists to leave Spain ( 指示共产党人离开西班牙 ) , 725 ; during last politburo meeting ( 在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 ) , 735 ; on struggle with Casado junta ( 论与卡萨多委员会作斗争 ) , 736—737

Toller, Ernst ( 恩斯特·托勒 ) , 激进的德国剧作家和诗人 : and Negrín' s Thirteen—Point program ( 与内格林的十三点方案 ) , 645

Tomás, Belarmino ( 贝拉米诺·托马斯 ) , 矿工领袖 ,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支持

者：25

Tomás, Pascual ( 帕斯库亚尔·托马斯 ) , 卡瓦列罗的支持者 , 劳动者总工会副书记 : accompanies Caballero to meetings of Madrid Socialists ( 陪同卡瓦列罗参加社会党马德里地方组织的会议 ) , 560 ; with Caballero when stopped at gunpoint ( 与卡瓦列罗一起被突击卫队士兵的枪口阻止 ) , 562

Tomás y Piera, José ( 何塞·托马斯—彼埃拉 ) , 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 named minister of labor and health ( 被任命为劳工和卫生部长 ) , 122

Toral, Hilamón ( 伊拉蒙·托拉尔 ) , 后备部队的共产党人指挥官 : 719

Torrente ( 托伦特 ) : candy industry centralized in ( 糖果业被集中起来 ) , 58—59

Torres, Henri ( 亨利·托雷斯 ) , 法国出庭律师 : prohibited from defending POUM ( 不许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辩护 ) , 517

Torres Iglesias, Lieutenant Colonel Emilio ( 埃米利奥·托雷斯·伊格莱西亚斯中校 ) ,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同情者 , 巴塞罗那警察部队指挥官 : appointed police chief of Barcelona ( 被任命为巴塞罗那警察部队指挥官 ) , 459—460 , 第四十三章注释57 ; replaced by Burillo ( 被布里略取代 ) , 490 ; patrols offer services to ( 巡逻队表示愿意为托雷斯效力 ) , 493

Torrijos, Fernando ( 费尔南多·托里霍斯 ) , 共产党员 : named to police administration ( 被安排在警察管理部门任职 ) , 219

Toryho, Jacinto (哈辛托·托里奥),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主管宣传的书记, 《工人团结报》负责人: on Benigno as Negrín adviser (论作为内格林顾问的贝尼尼奥·罗德里格斯), 140; orders silence on libertarian communism (指示不许谈论自由共产主义), 第十九章注释38; calls for peace (呼吁和平), 455—456; on Negrín's demand for POUM death penalty (关于内格林要求判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死刑), 519; dismissed from Solidaridad Obrera (被解除《工人团结报》负责人的职务), 623

Toynbee, Arnold J. (阿诺德·J.汤因比), 英国历史学家: on Russia's plan to stay aloof from Western Powers conflict (论苏联打算对西方列强的冲突袖手旁观), 169; reasons for desired Anglo—German rapprochement (英德希望友好的原因), 178—179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运输业): union control of (工会控制运输业), 第四章注释88

Treball (《劳动报》),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喉舌: 84—85, 396, 400, 409, 426

Tribunales Especiales de Guardia (特别安保法庭): created by decree to repress treason (Dec.1937)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镇压叛国罪的法令设立), 514

Tribunals, revolutionary (革命法庭): replace law courts (取代法院), 50; replaced by legalized courts (被形式合法的法庭所取代), 219

Tribunals of Espionage and High Treason ( 间谍和叛国罪法庭 ) : created by decree of 23 June 1937 ( 由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颁布的法令设立 ) , 504

Trotsky, Leon ( 列昂·托洛茨基 ) : Nin and Andrade seek asylum for ( 宁和安德拉德为其谋求政治避难权 ) , 405 , 第四十章注释3 ; differences with POUM ( 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意见分歧 ) , 406 ; attacks Maurín ( 攻击毛林 ) , 406 ; on possibility of proletariat control in Catalonia ( 论无产阶级控制加泰罗尼亚的可能性 ) , 444。另见Bolshevik Leninists ; Friends of Durruti ; POUM ; Trotskyists

Trotskyists ( 托洛茨基分子 ) : POUM expels (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开除托洛茨基分子 ) , 406 , 第四十章注释12 ; denounce POUM for entering Generalitat ( 谴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 ) , 407 ; critical of USSR ( 批评苏联 ) , 408 ; difine May events ( 认为五月事变的性质 ) , 429。另见Bolshevik Leninists ; Friends of Durruti ; POUM ; Trotsky, Leon

Tu ( 曼努埃尔·图尼翁·德拉拉 ) , 亲共历史学家 : on Bolloten' s views ( 论博洛滕的观点 ) , 297 ; at 1985 colloquium on Negrín ( 出席一九八五年举行的内格林学术讨论会 ) ,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Tusell, Javier ( 哈维尔·图塞尔 ) , 历史学家 : at 1985 colloquium on Negrín ( 出席一九八五年举行的内格林学术讨论会 ) , 第四十五章注释13

Twelfth International Brigade ( 国际纵队第十二旅 ) : statistics on ( 人

数) , 288。另见International Brigades

UGT ( 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 ( 劳动者总工会 ) : and Madrid construction workers' strike ( 与马德里建筑工人的罢工 ) , 7—8 ; led by Largo Caballero ( 由拉尔戈·卡瓦列罗领导 ) , 22 , 25 , 196 ; relation with Anarchosyndicalists ( 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关系 ) , 23 , 197—199 , 225—226 ; opposes Prieto premiership ( 反对普列托担任总理 ) , 29 ; economy taken over by ( 控制经济 ) , 54 ; unions expropriate small businesses ( 工会没收小业主的财产 ) , 57 ; and collectivization ( 与集体化运动 ) , 58 , 63 , 64 , 243 ; fears rise of small landowning peasant ( 担心拥有小片土地的农民的力量壮大 ) , 64 ; minimally influenced by Spanish Communist party ( 受西班牙共产党的影响较小 ) , 126 ; and PSUC ( 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 , 130 , 422 ; activities during Primo de Rivera' s dictatorship ( 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统治时期的活动 ) , 196—197 ; power held under 1931 Republic ( 一九三一年共和国初期拥有的权力 ) , 198 ; serves as Madrid war bureau ( 作为国防部的情报部门 ) , 259 ; holds pro—Caballero demonstration after fall of Malaga ( 马拉加失陷后举行支持卡瓦列罗的示威游行 ) , 360 ; merges with FOUS ( 与统一工会工人联合会合并 ) , 407—408 ; size of Catalan Federation ( 其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的规模 ) , 第四十章注释21 ; expels POUM members ( 开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 ) , 408 ; proposes single security corps ( 建议统一治安部队 ) , 417 ; with CNT , controls telefónica (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共同管理电话局 ) , 430 ; demands premiership and war ministry for Caballero ( 要求由卡瓦列罗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 , 472 ; Caballero loses control of ( 卡瓦列罗失去对劳

动者总工会的控制) , 479 ; signs alliance with CNT (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签订盟约 ) , 554 , 568—569 ; elects new national executive ( 选出新的全国委员会执委会 ) , 558。另见Largo Caballero, Francisco ; PSUC

UME ( Unión Militar España's government ( 阿萨尼亚政府应当将西班牙军人联盟的年轻军官调换岗位 ) , 35 ; Miaja and Rojo members of ( 米亚哈和罗霍是其成员 ) , 291

UMRA ( Unión Militar Republicana Antifascista ) ( 共和国军人反法西斯联盟 ) : Díaz Tintero and ( 迪亚斯·滕德罗与共和国军人反法西斯联盟 ) , 274 ; said to be outgrowth of Communist Unión Militar Antifascista ( 据说是共产党建立的反法西斯军人联盟的发展壮大 ) , 274

Ungría, Major Domingo ( 多明戈·温格里亚少校 ) , 共产党员 : guards Negrín's stronghold in Elda ( 负责警卫内格林在埃尔达的指挥部 ) , 694 , 734—735

Ungría, Colonel José ( 何塞·温格里亚上校 ) , 民族主义军官 : operates SIPM ( 指挥宪兵情报局 ) , 738 ; meets with Casado's representatives ( 与卡萨多的代表会谈 ) , 740—741

Unified Socialist Youth (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 。见JSU , Federación de 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

Unióde Menestrals ( 加泰罗尼亚手工业者联合会 ) : created by Esquerra ( 由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创建 ) , 397

Unió de Rabassaires ( Catalonia ) (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 ) : composed of small farmers coerced into collectivizing ( 由被迫加入集体农庄的小地主和佃农组成 ) , 76 ; dissatisfaction of ( 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的不满 ) , 395 ; links with PSUC ( 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关系 ) , 397 , 399 , 416

Unió Socialista de Catalunya ( 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联盟 ) : as source of PSUC ( 作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发起者 ) , 397

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 劳动者总工会 ) 。见UGT

Unión Militar Antifascista ( 反法西斯军人联盟 ) : relation to UMRA ( 与共和国军人反法西斯联盟的关系 ) , 274

Unión Militar Española 见UME

Unión Militar Republicana Antifascista ( 共和国军人反法西斯联盟 ) 。见UMRA

Union of Young Communists (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 。见JSU

Unión Republicana ( 共和联盟 ) 。见UR

United Socialist Party of Catalonia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 。见PSUC

Unser Wort ( 《我们的话》 ) , 德语托派报纸 : 406

UR ( Unión Republicana ) ( 共和联盟 ) , 人民阵线中的温和派 : and Martínez Barrio ( 与马丁内斯·巴里奥 ) , 22 , 38 ; no longer supports middle classes ( 不再支持中产阶级 ) , 82 ; does not back Irujo and Aiguadé ( 不



支持伊鲁霍和艾瓜德) , 616.另见Martínez Barrio, Diego ; Liberal  
Republicans

Urales, Federico ( 费德里科·乌拉莱斯 ) , 无政府主义者 , 费德丽卡·蒙特塞尼的  
父亲 : on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 论无产阶级专政 ) , 392

Uribarry, Lieutenant Colonel Manuel ( 曼努埃尔·乌里瓦里中校 ) , 社会党  
人 : flight of ( 逃跑 ) , 601 ; briefly heads SIM ( 短期领导军事调查局 ) ,  
601—602

Uribe, Vicente ( 比森特·乌里韦 ) ,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 代表共产党  
担任农业部长 : appeals to antifascism of small farmers ( 向反法西斯的小  
地主发出呼吁 ) , 85 ; on policy of violence against peasants ( 论侵犯农  
民的政策 ) , 85—86 ; on Communist support of Giral government ( 论共产  
党支持希拉尔政府 ) , 117 ; and Caballero ( 与卡瓦列罗 ) , 121 , 362 , 367 ;  
named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 被任命为农业部长 ) , 122 ; legalizes  
farm confiscations ( 使没收耕地合法化 ) , 236 ; issues decree allowing  
land restitution ( 颁布法令允许归还土地 ) , 242 , 522 ; grants no  
permanent legality to collectives ( 不给集体农庄永久性的合法地位 ) ,  
243 , 524 ; urges establishment of Popular Army ( 敦促建立人民军 ) , 272  
—273 ; member of Higher War Council ( 战时高级委员会成员 ) , 324 , 542 ;  
demands resignation of Martínez Cabrera ( 要求马丁内斯·卡夫雷拉辞职 ) ,  
366 ; war council designates for military missions ( 战时高级委员会委  
派其执行军事任务 ) , 375 ; on Communist influence in Catalonia ( 论共产  
党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影响 ) , 398 ; demands changes in Caballero' s

policies ( 要求改变卡瓦列罗的政策 ) , 465 ; on Prieto ( 论普列托 ) , 466 , 471—472 ; named to Negrín' s governments ( 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的部长 ) , 483 , 585 , 618 ; attempts to influence Prieto ( 试图影响普列托 ) , 535 ; protests Antón' s demotion ( 反对把安东降职 ) , 542 ; on Negrín ( 论内格林 ) , 671 , 695 , 732 ; directed to request Soviet aid ( 奉命请求苏联援助 ) , 675 ; on government at Elda ( 论政府在埃尔达 ) , 696

Uribe, JoséAntonio ( 何塞·安东尼奥·乌里韦 ) , 巴伦西亚的共产党议员 : prepares to leave Spain ( 准备离开西班牙 ) , 731—732

USSR ( 苏联 ) : joins League of Nations ( Sept.1934 ) ( 一九三四年九月加入国际联盟 ) , 89 ; signs Franco—Soviet Pact ( 签订法苏条约 ) , 89 ; appeasement of Germany caused by fear of ( 对苏联的担忧造成对德国的姑息 ) , 90—93 ; adopts Popular Front line ( 采取人民阵线路线 ) , 95 , 99 ; and Anglo—German Naval Pact ( 与英德海军协定 ) , 95—96 ; adheres to international Non—Intervention Agreement ( Aug.1936 ) ( 一九三六年八月加入国际不干涉公约 ) , 99 ; advocates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League of Nations ( 拥护集体安全和国际联盟 ) , 107 ; publishes statistics on military aid to Spain ( 公布军事援助西班牙的统计数字 ) , 107—108 ; runs risk in supplying aid to Spain ( 冒险向西班牙提供援助 ) , 108—109 ; attempts to provoke French and British intervention ( 试图引诱英法两国进行干涉 ) , 110 , 180 , 184 ; and Caballero ( 与卡瓦列罗 ) , 第十一章注释 26 , 122—123 ; claims debt owed by Spain ( 1957 ) ( 声称西班牙欠其债务 ) , 154 ; advisers in Spain ( 在西班牙的苏联顾问 ) , 159—160 , 277—278 ; fears both Anglo—German and Franco—German ties ( 对英法两国与

德国的关系感到担忧) , 180 ; purpose in Spain ( 在西班牙的意图 ) , 234—235 ; representatives try to win over Baráibar ( 在西班牙的代理人试图争取巴赖瓦尔 ) , 368 , 370 ; criticized by Trotskyists and POUM ( 遭到托洛茨基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批评 ) , 408 ; Negrín government defends ( 内格林政府为苏联辩护 ) , 511—512 ; Frente Rojo defends ( 《红色阵线报》为苏联辩护 ) , 512 ; refuses to declare war on Germany ( 拒绝向德国宣战 ) , 574。另见 Comintern ; Soviet civilians and NKVD operatives in Spain ; Soviet officers in Spain ; Stalin, Joseph

Vaillant—Couturier, Paul ( 保罗·瓦扬—库蒂里耶 ) ,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 : believes that bourgeoisie will not adhere to Franco—Soviet Pact ( 不相信资产阶级将会遵行法苏条约 ) , 90

Val, Eduardo ( 爱德华多·巴尔 ) , 全国劳工联合会军事领导人 : opposed to imposition of commanders ( 反对强行任命部队指挥官 ) , 331 ; with CNT Regional Committee of Defense (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防务委员会 ) , 705 ; named communications and public works minister , Casado junta ( 被任命为卡萨多委员会的通讯和公共工程部长 ) , 726

Valderrobres ( Teruel ) ( 特鲁埃尔省的巴尔德罗夫雷斯地区 ) : opposition to collectivization in ( 有人反对集体化 ) , 71

Valdés, Miguel ( 米格尔·巴尔德斯 ) ,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 : on composition of PSUC ( 关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构成 ) , 397 ; named Catalan labor and public works councillor ( 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劳工与公共工程专员 ) , 403 , 412 ; urges crushing “Trotskyists” ( 强烈要

求镇压“托洛茨基分子” ) , 455 ; and replacement of Aiguadé and Irujo ( 与接替艾瓜德和伊鲁霍 ) , 615—616

Valladolid ( 巴利亚多利德 ) : beginning of uprising ( 叛军起事 ) , 42

Vallellanos, Count of ( 巴列利亚诺斯伯爵 ) 。见Suárez de Tangil, Fernando

Valua ( 瓦卢亚 ) , 苏联军官, 部队指挥官 : perishes in Stalin purge ( 被斯大林清洗 ) , 312

La Vanguardia ( 《先驱报》 ) , 内格林的喉舌 : 581 , 608—609 , 643 , 644

Vanni, Ettore ( 埃托雷·万尼 ) , 前意大利共产党员, 巴伦西亚《真理报》负责人 : on strength of Communist discipline ( 论共产党的纪律的作用 ) , 126 ; on Belayev and POUM trial ( 论别拉耶夫与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 , 第四十八章注释19 ; on final resistance ( 论最后的抵抗 ) , 687 ; on PCE' s reaction to Casado coup ( 论西班牙共产党对卡萨多政变的反应 ) , 720

Vansittart, Sir Robert ( 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 ) , 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 : supports defensive alliance between Britain , France and the USSR ( 支持英国、法国与苏联建立防御同盟 ) , 94 ; on immorality of allowing German expansion ( 论允许德国扩张的不道德 ) , 94 ; Nicolson on ( 尼科尔森论范西塔特 ) , 第八章注释29 ; removed from post by Chamberlain ( 被张伯伦撤职 ) , 94 , 652

Varela, General José Enrique (何塞·恩里克·巴雷拉将军), 右翼军官:  
deprived of command and imprisoned (被剥夺了指挥权并被监禁), 13;  
confronts Madrid militia and International Brigades (面对马德里民兵  
和国际纵队的抵抗), 288

Vaupshasov, Colonel Stanislav A. (斯坦尼斯拉夫·A.沃普沙索夫上校), 苏  
联顾问: on Negrín in Elda (论在埃尔达的内格林), 694; on Negrín's  
flight (论内格林逃走), 735

Vázquez, Mariano R. (马里亚诺·R.巴斯克斯), 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  
记: succeeds Horacio Prieto (接替奥拉蒂奥·普列托), 207; accuses  
Communists of inciting farm laborers (指责共产党煽动农业工人), 241;  
on transformation of CNT columns into brigades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民  
兵纵队改编成旅), 332; present at CNT confrontation with Companys (参  
加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孔帕尼斯的会见), 390; Casanovas asks his approval  
of new Catalan government (卡萨诺瓦斯请求其认可加泰罗尼亚新政府),  
401; designated to go to Barcelona (被派往巴塞罗那), 436; and May  
events (与五月事变), 439, 451—452, 457—459; on CNT refusal to  
collaborate with Negrín government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拒绝与内格林政府合  
作), 484; on health of CNT (Dec.1937)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论全国劳工联  
合会的健康发展), 499; protests repression of minority parties (抗议  
镇压少数派政党), 504; present at Molina's visit Negrín (莫利纳拜访内  
格林时在场), 528; on policy of conciliation (论和解政策), 567—568;  
represents CNT in meeting with UGT (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会  
谈), 568; backs demonstration for continued resistance (支持为继续

抵抗举行的示威游行) , 577 , 580 ; equivocal position of ( 暧昧的立场 ) , 580 ; at libertarian plenum ( Oct.1938 ) ( 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的自由主义运动大会上 ) , 625—626 ; on Anarchists' mistakes ( 论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 ) , 625—626 ; and CNT reaction to Thirteen Points ( 与全国劳工联合会 对十三点方案的反应 ) , 647—648

Vega, Lieutenant Colonel Etelvino ( 埃特尔维诺·维加中校 ) , 共产党人军官 : commands Eastern unit ( 指挥东部前线的部队 ) , 595 ; named head military command of Alicante ( 被任命为阿利坎特驻军的指挥官 ) , 715

Veláiev ( 维拉耶夫 ) 。见Belayev

Velao, Antonio ( 安东尼奥·贝劳 ) , 左翼共和派领导人 : named public works minister ( 20July 1936 ) (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被任命为公共工程部长 ) , 47 ; named Negrín minister ( 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的部长 ) , 585 , 618

Verdad ( 《真理报》 ) , 巴伦西亚的共产党报纸 : 126

Versailles Treaty ( 凡尔赛和约 ) : Germany violates by reintroducing conscription ( 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重新开始征兵 ) , 96

Viana, Marqués de ( 比亚纳侯爵 ) , 前国王阿方索的侍从武官 : with Bolín , requests Italian military aid ( 与博林一起请求意大利提供军事援助 ) , 101

Vich ( 比克 ) : tanning trade centralized in ( 制革业被集中起来 ) , 59

Vidali, Vittorio ( 维托里奥·维达利 ) , 化名卡洛斯·孔特雷拉斯、 “指挥官卡洛斯” 和埃内亚·索尔门蒂 , 意大利共产党人 , 第五团政委 ,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

工 : authority over Communist refugees in Mexico (对墨西哥的共产党流亡者的影响) , 第十三章注释23 ; on shipment of Vita treasure (关于“比塔”号游艇运送黄金财宝事件) , 218 ; Herbert Matthews on (赫伯特·马修斯论维达利) , 221 ; later activities of (后来的活动) , 第二十七章注释9 ; and organization of Fifth Regiment (与组织第五团) , 267—268 ; interviewed by Anna Louisa Strong (接受安娜·路易莎·斯特朗的采访) , 267—268 ; on Communists' control of Regular Army (论共产党人对正规军的控制) , 273 ; on political commissars (论政治委员) , 274 ; and Madrid defense (与马德里保卫战) , 284 , 287 ; on Rojo' s ambiguous political allegiance (论罗霍含混不清的政治效忠对象) , 300—301 ; on Kléber (论克莱贝尔) , 303—304 ; on Gaykis' s fate (关于盖基斯的下落) , 319 ; and death of Nin (与宁之死) , 506 , 510 ; on Antón' s demotion (论安东被降职) , 542 ; ousted by Prieto (被普列托撤职) , 544

Vidarte, Juan—Simeón (胡安—西梅翁·比达特) , 社会党温和派人士, 内政部副部长 : alleges that Companys threatened gold seizure (声称孔帕尼斯曾警告过黄金有被夺走的危险) , 150 ; on Miaja' s Communist ties (论米亚哈与共产党的关系) , 294 ; on importance of halting Extremadura plans (论阻止实施埃斯特雷马杜拉计划的重要性) , 470 ; assumes undersecretaryship of the interior (担任内政部副部长) , 486—487 ; on Caballero' s hostility toward Vayo (论卡瓦列罗对德尔巴约的敌意) , 487 ; on Nin' s disappearance (论宁的失踪) , 508 ; on understanding between Negrín and Communists (论内格林与共产党人之间的默契) , 509 , 578—579 ; on Morón' s accusations (论莫隆的指责) , 511 ; on Prieto and Socialist—Communist

fusion (关于普列托与社会党—共产党合并) , 535—536 ; on Communist influence on UGT (论共产党对劳动者总工会的影响) , 558 ; on proposed jailing of Caballero (关于打算监禁卡瓦列罗) , 563 ; and Aza (与阿萨尼亚对世界大战的看法) , 656

Vidiella, Rafael (拉斐尔·比迭利亚) , 西班牙社会党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领导人,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司法专员 : and creation of PSUC (与创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 130 , 613 ; opposes Communist influence in PSUC (反对共产党控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 398 ; joins Communist central committee (进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 400 ; expelled from Militia Committee on entering Catalan government (因加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被民兵委员会开除) , 401 ; councillor of justice (担任自治政府司法专员) , 412 ; councillor of labor and public works (担任自治政府劳工与公共工程专员) , 424 ; named labor councillor (June 1937) (一九三七年六月被任命为自治政府劳工专员) , 495 ; and replacement of Aiguadé and Irujo (与接替艾瓜德和伊鲁霍) , 615—616

Vielayev (维耶拉耶夫) 。见Belayev

Vigilance Militia (治安民兵) : organized under Caballero government (由卡瓦列罗政府组织而成) , 218

Villalba, Colonel José (何塞·比利亚尔瓦上校) , 马拉加防区指挥官 : and loss at Malaga (与马拉加失守) , 343—345 ; refuses to join military insurrection (拒绝参与军事叛乱) , 第三十四章注释6



Villar, Manuel (曼努埃尔·比利亚尔), 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 《社会熔炉报》  
负责人: on CNT entry into government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  
210; on dangers of CNT antimilitarization (论全国劳工联合会反对军事化  
的危害), 324

Vi·比尼亚斯), 西班牙外交部官员, 历史学家: on aid sent by Hitler in  
July 1936 (论一九三六年七月希特勒提供的援助), 98; suspects  
Krivitsky' s claims (怀疑克里维茨基的说法), 105—106; doubts  
importance of Stashevsky' s role (怀疑斯塔舍夫斯基的重要作用), 143;  
on why gold shipped to Cartagena (论把黄金运到卡塔赫纳的原因) 145; on  
circumvention of Ley de Ordenación Bancaria (论规避银行法), 146; on  
absence of documentation on foreign exchange (论与外汇有关的资料的缺  
失), 147, 153; on Soviet bid to purchase Spanish ships (关于苏联希望  
购买西班牙商船), 第十四章注释29; on Negrín' s approval of gold  
sales (关于内格林同意出售黄金), 152; on Spanish bank  
officials' detention in Moscow (关于西班牙银行职员被滞留在莫斯科), 第  
十四章注释53; on Negrín' s attempts to get Soviet credits (论内格林试  
图得到苏联贷款), 153—154; on Caballero memoirs (论卡瓦列罗的回忆  
录), 第四十五章注释19; on political damage done by revolution (论革  
命造成的政治损失), 638; on alleged arrival of Soviet war  
material (论所谓苏联的战争物资运到了), 674

Vizcaya (比斯开省): no revolutionary economic changes in (经济结构没  
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第四章注释76

Volter (博尔特)。见Voronov, N.

Volunteer army (志愿军) : Giral plans for (希拉尔政府计划建立志愿军) , 250 ; attempts to assuage reaction of UGT to (努力缓和劳动者总工会对建立志愿军的反应) , 252

The Volunteer for Liberty (《自由志愿军》) , 国际纵队的英文刊物 : 645 , 651

Voronov, N. (H.沃罗诺夫) , 化名博尔特, 苏联军官 : on Soviet advice to Republican chief of staff (关于苏联人给共和国总参谋长的建议) , 278 ; and Gorev (与戈列夫) , 307 ; survives purges (免遭清洗) , 312

Voros, Sandor (桑多尔·沃罗斯) , 国际纵队第十五美洲旅政委 : on motives for fighting (论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动机) , 289 ; on terror in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 (论国际纵队中的恐怖行动) , 570—571

Voroshilov, Kliment Y. (克利门特·E.伏罗希洛夫) ,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 signs Stalin letter to Caballero (在斯大林写给卡瓦列罗的信上署名) , 165 , 315 ; Krivitsky on (克里维茨基谈到伏罗希洛夫) , 310 ; Cisneros requests aid of (西斯内罗斯请求伏罗希洛夫帮助) , 673

Ward Price, George (乔治·沃德·普赖斯) , 《每日邮报》记者 : Rothermere requests more anti—Bolshevist articles (罗瑟米尔要求其多写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章) , 91

Weinberg, Gerhard L. (格哈德·L.魏因贝格) , 历史学家 : on Germany' s

plan to prolong war in Spain (论德国打算拖延西班牙内战) , 104

Weizs·冯·魏茨泽克) , 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 : and von Papen on France (冯·巴本论法国与魏茨泽克) , 652 ; and German—Soviet pact (与德苏条约) , 655

Welczek (Welczech) , Count Johannes von (约翰内斯·冯·韦尔切克伯爵) , 德国驻巴黎大使 : on possibility of Franco—German treaty displacing Franco—Soviet treaty (论法德条约取代法苏条约的可能性) , 第八章注释11 ; French foreign minister urges peace to (法国外长极力向其主张和平) , 171 ; and Daladier on noninterventionism (达拉第论不干涉主义与韦尔切克) , 650

Welles, Sumner (萨姆纳·韦尔斯) , 美国副国务卿 : on belief that West would benefit from German—Soviet war (论西方国家相信德国与苏联之间的战争有利于它们) , 91

Wheeler—Bennet, Sir John W. (约翰·W.惠勒—贝内特爵士) , 历史学家 : on chasm between USSR and rest of world (论苏联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鸿沟) , 169 ; on Conservative conviction that Russia planned takeover (论保守派人士确信苏联打算控制世界) , 172 ; on German's possible eastward expansion (论德国可能向东方扩张) , 179

Wigram, Lord (威格拉姆勋爵) , 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私人秘书 : 94

Willson, Sir Horace (霍勒斯·威尔逊爵士) , 张伯伦的主要合作者和首席顾问 : on hope of Anglo—German understanding (希望英德两国达成谅解) , 169—170 ; portrait of (对威尔逊的描述) , 第十五章注释6 ; and Chamberlain's

appeasement policy ( 与张伯伦的绥靖政策 ) , 652 , 654 ; and secret proposals to Germany ( 与向德国提出的秘密建议 ) , 658—659

Wohlthat, Helmut ( 赫尔穆特·沃尔塔特 ) , 戈林派往伦敦的使者 : and proposals made by Wilson ( 与威尔逊提出的建议 ) , 658—659

Wolfe, Bertram D. ( 伯特伦·D·沃尔夫 ) , 美国共产党 ( 反对派 ) 领导人 , 苏联问题专家 : on Lenin' s definition of dictatorship ( 论列宁对专政的定义 ) , 77—78 ; on Orlov ( 论奥尔洛夫 ) , 363 ; on POUM' s allegiance ( 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政治态度 ) , 406—407 ; asks Orlov about Nin' s disappearance ( 向奥尔洛夫提出宁失踪的问题 ) , 508

Wolfe, Ella ( 埃拉·沃尔夫 ) : informed of possible "suicide" of Krivitaky ( 得知克里维茨基可能 "自杀" ) , 第九章注释43

Woodcock, George ( 乔治·伍德科克 ) , 历史学家 : on unique nature of the collectivist movement ( 论集体化运动的独特性 ) , 78

Workers' Age ( 《工人时代》 ) , 美国共产党 ( 反对派 ) 的喉舌 : 505 , 516 , 521

Workmen' s committees ( 工人委员会 ) : take control of ports and frontiers ( 港口和边境 ) , 48—49

World News and Views ( 《世界新闻与观察》 ) , 共产国际的报纸 : successor to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 替代《国际新闻通讯》的报纸 ) , 668

Wrench, John Evelyn ( 约翰·伊夫林·伦奇 ) , 杰弗里·道森的传记作者 : on Nazi

Germany as defense against communism (论作为反共屏障的纳粹德国) , 173

Yagüe, Pablo (巴勃罗·亚格) , 劳动者总工会成员, 共产党员,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军需委员, 295

Yakovlev, Alexander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 飞机设计师: on purge of Smushkevich and Rychagov (论斯穆什克维奇和雷恰戈夫被清洗) , 312

Yezhov (叶若夫) ,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 Krivitaky on (克里维茨基论叶若夫) , 310—311; Orlov on (奥尔洛夫论叶若夫) , 312

Zabalza, Ricardo (里卡多·萨瓦尔萨) : 社会党左派的(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书记: on voluntary farm collectivization (论自愿实行的农业集体化) , 64; on rural land confiscations (论农村的没收土地) , 236—237, 239—240; on destruction of collectives (论破坏集体农庄) , 522

Zetland, Lord (泽特兰勋爵) , 英国印度事务大臣: on fear of Bolshevization of Europe (论对欧洲布尔什维化的担忧) , 170—171

Zinoviev, Grigorii E. (格里戈里·E.季诺维也夫) , 布尔什维克: POUM protests execution of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抗议处决季诺维也夫) , 408

Zubiaurren, Antonio (安东尼奥·苏维奥伦) ,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西班牙特工: and alleged plot to assassinate Prieto (与所谓暗杀普列托的阴谋) , 549

Zugazagoitia, Julián (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 , 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并且主管《社会主义者》: on Casares and Azaon distrust of Casares (论人们不

相信卡萨雷斯) , 32 ; on Aza' s ignorance of army' s plans ( 论阿萨尼亚不知道军队的叛乱计划 ) , 34 ; on Calvo Sotelo' s assassination ( 论卡尔沃·索特洛被害 ) , 37 ; on invitation to join Martínez Barrio' s government ( 论马丁内斯·巴里奥发出的加入其政府的邀请 ) , 41 ; on adversaries of the Republic in the Assault Guard ( 论突击卫队中共和国的敌人 ) , 42—43 ; on collapse of Republican state ( 论共和国政权的崩溃 ) , 48 ; on control of officers by sailors' committees ( 论海军军官被水兵委员会处置 ) , 49 ; on public enthusiasm greeting Caballero government ( 论卡瓦列罗政府受到公众的热情欢迎 ) , 122 ; on belief that Madrid could not be defended ( 论没有人相信能够守住马德里 ) , 284 ; on Miaja ( 论米亚哈 ) , 285 , 292—293 ; on Kléber ( 论克莱贝尔 ) , 303 ; on Prieto ( 论普列托 ) , 454 , 465 ; on arrival of assault guards in Barcelona ( 论突击卫队到达巴塞罗那 ) , 第四十三章注释62 ; named Negrín interior minister ( 被任命为内格林政府的内政部长 ) , 483 , 486—487 ; on Ortega' s political allegiance ( 论奥尔特加的政治效忠对象 ) , 486 ; on NKVD influence in Negrín government ( 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内格林政府的影响 ) , 487 ; on Negrín' s aim to dismantle CNT export groups ( 论内格林解散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出口组织的目的 ) , 491 ; does not know of seizure of POUM headquarters ( 不知道占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部的行动 ) , 500 , 509—510 ; and investigation of Nin' s disappearance ( 与对宁的失踪的调查 ) , 508 , 510 ; threatens to resign ( 以辞职相威胁 ) , 510 ; reacts to Morón' s accusations ( 对莫隆的指控的反应 ) , 511 ; fears antagonizing Soviets ( 担心招致苏联人不满 ) , 511 ; on Aragon Defense Council ( 论保卫阿拉贡委员会 ) , 525 ; approves removal of Valencia

Socialist federation committee ( 同意取缔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 ) , 561 ; on proposed jailing of Caballero ( 关于打算监禁卡瓦列罗 ) , 563 ; on Republican loss in Aragon ( 论共和派在阿拉贡地区的失败 ) , 570 ; on Negrín ( 论内格林 ) , 588 , 629 , 643 ; on Cerdán ( 论科登 ) , 593 ; Negrín appoints as "secretary general of national defense" ( 内格林任命其为 "国防部秘书长" ) , 593 , 597—599 ; fate of ( 被处决的命运 ) , 678 ; on stupidity of resistance ( 论抵抗政策的愚蠢 ) , 691

Zunzunegui ( 顺苏内吉 ) , 君主主义者 : negotiates purchase of Italian war material ( 商谈购买意大利的战争物资 ) , 101

## 参考资料

### 一、书籍、信函、文件、访谈和小册子

为准备撰写本书查阅了数千本书籍和小册子，但是，考虑到因篇幅所限不允许列出一个完整的参考书目，因此，这里只列出了本书正文或注释所引述的那些资料来源，同时列出了在本书作者看来可能有助于其他人的研究课题的那些资料来源。除非在正文或注释中予以引述，内战爆发之前出版的书籍和小册子以及大量仅与民族主义西班牙、军事行动和战后时期有关的书籍和小册子不包括在内。只有在本书作者看来进行了有意义的修订、增补或者删节的情况下，才将同一书籍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版本（无论是以一种还是两种语言出版）列出。下面列出的所有参考资料均可以在本书开头提到的某个或多个图书馆和公共机构里找到。标有星号的参考资料只能在胡佛研究所的档案（博洛滕资料集）里找到。

Abad de Santillán, Diego. *After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 Greenberg ,

1937.

——.Alfonso XIII, la II república, Francisco Franco.Gijón : Júcar , 1979.

——.El anarquismo y la revolución en España: Escritos 1930-1938.Madrid : Ayuso , 1976.

——.Los anarquistas y la reacción contemporánea.Mexico City : Ediciones del Grupo Cultural Ricardo Flores Magon , 1925.

——.La bancarrota del sistema económico y político del capitalismo.Buenos Aires : Nerivo , 1932.

——.Contribución a la historia del movimiento obrero español.Puebla , Mexico : Cajica , 1965.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Estrategia y táctica.Puebla , Mexico : Cajica , 1971.

——.Memorias,1897-1936.Barcelona : Planeta , 1977.

——.El organismo económico de la revolución:Cómo vivimos y cómo podríamos vivir en España.Barcelona : Tierra y Libertad , 1938.

——.Por quéperdimos la guerra.Buenos Aires : Imán , 1940.

——.La revolución y la guerra en España.Mexico City : El Libro ,



1938.

Abella, Rafael. Julio 1936 : Dos Españas frente a frente. Barcelona : Plaza y Janés , 1981.

— , La vida cotidiana durante la guerra civil: La España republicana. Barcelona : Planeta , 1976.

Abendroth, Hans-Henning. Hitler in der spanischen Arena. Paderborn : Schöningh , 1973.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with the Spanish Republic, 1936-1939. Moscow : Progress , 1974.

Acedo Colunga, General Felipe. José Calvo Sotelo. Barcelona : AHR , 1957.

Acier, Marcel , ed. From Spanish Trenches. New York : Modern age Books , 1937.

Acords del ple extraordinari del comitè nacional de la unió General de treballadors. Valencia : UGT , 1937.

Acords de III congrés de la unió general de treballadors a Catalunya 13-18 de novembre de 1937. Introducció per Rafael Vidiella. Pròleg per Miguel Ferrer. Barcelona : UGT , 1937.

Actas de las sesiones de la junta de defensa de Madrid. (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 Salamanca ;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 Servicio Histórico Militar , Madrid ) .

Agencia Febus. Typewritten copies of dispatches received by the Febus newsagency in Madrid during the first few days of the Civil War. Hoover Institution , Bolloten Collection.

Agrarian Reform in Spain. London : United Editorial , 1937.

La agresión italiana: Documentos ocupados a las unidades italianas en la acción de Guadalajara. Valencia : Ministerio de Estado , 1937.

Aguado, Emiliano. Don Manuel Azaña Díaz. Barcelona : Nauta , 1972.

———. Manuel Azaña. Madrid : Epsa , 1978.

Aguilar Olivencia, Mariano. El ejército español durante la segunda república. Madrid : Econorte , 1986.

Aguirre y Lecube, JoséAntonio de. De Guernica a NuevaYork pasando por Berlin. Buenos Aires : Vasca Ekin , 1943.

———. Freedom Was Flesh and Blood. London : Gollancz , 1945.

\*———. Report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y JoséAntonio de Aguirre , premier of the autonomous Basque government. A photocopy of the first ninety-five Pages of this report loaned to Burnett Bolloten by Manuel de Irujo is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Veinte años de gestión del gobierno vasco,1936-1956.Durango ( Vizcaya ) : Zugaza , 1978.

\*Aiguadé, Jaime Antón. "Actuació del Govern de la Generalitat i del seu President Lluís Companys Durant les Jornades de Maig De 1937." Copy of original document loaned to Burnett Bolloten by Jordi Arquer.

Aiguader, Jaime.Cataluña y la revolución.Madrid : Zevs , 1932.

Aims of the Spanish Republic.London : United Editorial , 1938.

Akademiia Nauk SSSR.Institut istorri.Ispanskiinarod protiv fashizma,1936-1939 gg: Sbornik statei.Moscow : Academiaia Nauk SSSR , 1963.

Aláiz, Felipe.Indalecio Prieto:Padrino de Negrín y campeón anticomunista.Toulouse : "Páginas Libres , " n.d.

Alba, Luz de.19 de julio.Montevideo : Esfuerzo , 1937.

Alba, Víctor.Catalonia:A Profile.London : Hurst , 1975.

——.Cataluña de tamaño natural.Barcelona : Planeta , 1975.

——.Dos revolucionarios:Joaquín Maurín,Andreu Nin.Madrid : Seminarios y Ediciones , 1975.

——.El frente popular.Barcelona : Planeta , 1976.

——.Historie de POUM.Paris : Champ Libre , 1975.

——.Historia de la segunda república española.Mexico City : Libro Mex , 1960.

——.Historia general del campesinado.Barcelona : Plaza y Janés , 1973.

——.Insomnie Espagnole.Paris : Franc-Tireur , 1946.

——.El marxismo en España,1919-1939 : Historia del BOC y POUM.Vols.I, II.Mexico City : Costa-Amic , 1973.

——.El partido comunista en España.Barcelona : Planeta , 1979.

——.Sentencia dída contra el POUM, 1938.Mexico City : Costa-Amic , 1974.

——.ed ,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en la práctica: Documentos del POUM.Madrid : Júcar , 1977.

Alba, Víctor and Schwartz, Stephen.Spanish Marxism vs.Soviet Communism.New Brunswick , N.J. : Transaction Books , 1988

Albert Despujol, Carlos de.La gran tragedia de España, 1931-1939.Madrid : Sánchez de Ocaña , 1940.

Albin, Felix[Kurt Hager].The Socialist Unity Party of Germany.Introduction by Konni Zilliacus.London : New Germany

Publications , 1946.

Alcade, Carmen. La mujer en la guerra civil. Madrid : Cambio 16 , 1976.

Alcalá-Zamora, Niceto. Discursos. Madrid : Tecnos , 1979.

——. Memorias. Barcelona : Planeta , 1977.

——. Pensamientos y reflexiones. Maxico City : Porrúa , 1950.

Alcofar Nassaes, José Luis. Los asesores soviéticos en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Madrid : Dopesa , 1971.

\*Alcon, Marcos.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Aldana, B. F. Como fué la guerra en Aragón. Barcelona : Ediciones "Como Fué , " 1937.

Alexander, Bill. British Volunteers For Liberty: Spain, 1936-1939. London : Lawrence and Wishart , 1982.

Algarra Rafegas, Comandant Antonio. El asedio de Huesca. Saragossa : El Noticiero , 1941.

Alianza CNT-UGT. Barcelona : Tierra y Libertad , 1938.

Allen, David Edward, Jr.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Dissertation , Stanford University , 1952.

Almendros, Joaquín. Situaciones españolas, 1936-1939 : El PSUC en la

guerra civil.Barcelona : Dopesa , 1976.

\*Almudí, Manuel.Interview ,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Alonso, Bruno.La flota republicana y la guerra civil de España.Mexico City : Imprenta Grafos , 1944.

Alonso, Pedro Luis.La Batalla de Teruel.Barcelona : Bruguera , 1975.

Alpert, Michael.El ejército republicano en la guerra civil.Barcelona : Ibérica , 1977.

——.La reforma militar de Azaña, 1931-1933.Madrid : Siglo XXI , 1982.

Alvarez, Basilio.España en el crisol.Buenos Aires : Colección Claridad , 1937.

Alvarez, Santiago.Castelao y nosotros los comunistas.Coruña : Ediciós do Castro , 1984.

\*——. "Informe Operaciones del 22 al 27 de Marzo de 1938 , " dated 4 April 1938.Type-written copy of original loaned to Burnett Bolloten by Carlos Contreras.

——.El partido comunista y el campo.Madrid : Torre , 1977.

——.El pueblo de Galicia contra el fascismo.Valenci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7.

Alvarez, Segis. La juventud y los campesinos: Conferencia nacional de juventudes, enero de 1937. Valencia : JSU de España , 1937.

———. Nuestra organización y nuestros cuadros. Valencia : JSU de España , 1937.

Alvarez del Vayo, Julio. Deux discours prononcés à la 101me session de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 Paris : Services d' Information du Rassemblement Universel pour la Paix , 1938.

———. L' Espagne accuse. Paris : Comité Franco-Espagnol , 1936.

———. Freedom' s Battle. New York : Knopf , 1940.

———. Give Me Combat. Boston : Little , Brown , 1973.

———. The Last Optimist. New York : Viking Press , 1950.

———. Speech at the Council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May, 1938. London :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 , 1938.

Ametlla, Claudi. Catalunya: Paradís perdut. Barcelona : Selecta , 1984.

\* "Los Amigos de Durruti." File containing three letters to Burnett Bolloten from Jaime Balius , vice-secretary of the Friends of Durruti , and a photostatic copy of typewritten data compiled by Jordi Arquer. See also Balius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and Hacia una nueva revolución.

Among Friends. New York : Friends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 1938.

Amsden, Jon. Convenios colectivos y lucha de clases en España. Paris : Ruedo Ibérico , 1974.

\*———. "Krivitsky." Manuscript.

Anarcosindicalismo: Antecedentes, Declaración de principios. Finalidades y tácticas. Toulouse : Espoir , 1947.

Los anarquistas y la autogestión. Barcelona : Anagrama , 1977.

Anasagosti, Iñaki , and San Sebastián, Koldo. Los años oscuros: El gobierno vasco—el exilio, 1937-1941. San Sebastián : Txertoa , 1985.

Andrade, Juan. Algunas "notas políticas"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1936-1937. Paris : La Batalla , 1969.

———. Apuntes para la historia del PCE. Barcelona : Fontamara , 1979.

———. "Conferencia leída el 10 Enero de 1970 , en el Centro de Estudios sobre el Movimiento Obrero Español , de Paris." Copy in Hoover Institution , Bolloten Collection.

———. Notas sobre la guerra civil: Actuación del POUM. Madrid : Libertarias , 1986.

———.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día a día. Barcelona : Nueva Era , 1979.



Andrés-Gallego, José. El socialismo durante la dictadura: 1923-1930. Madrid : Tebas , 1977.

Un año de las brigades internacionales. Madrid : Ediciones del Comisariado de las Brigadas Internacionales , [1937?].

Ansaldo, Juan Antonio. ¿Para qué...? De Alfonso XIII a Juan III. Buenos Aires : Vasca Ekin , 1951.

Ansó, Mariano. Yo fui ministro de Negrín. Barcelona : Planeta , 1976.

Antón, Francisco. Madrid: Orgullo de la España antifascista. Barcelon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7.

Araceli, Gabriel. Valencia 1936. Saragossa : El Noticiero , 1939.

Araquistáin, Luis. See also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 Papeles de Don Luís Araquistáin.

———. El comunismo y la guerra de España. Carmaux ( Tarn ) : 1939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Marxismo y socialismo en España. Ediciones de la Secretaría de Propaganda del P.S.O.E. en Francia , n.d.

———. Mis tratos con los comunistas. Barcelona : Fontamara , 1979.

———. "Negrín." Unpublished article. Araquistáin Papers.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 Sobre la guerra civil y en la emigración: Edición y estudio preliminar de Javier Tusell. Madrid : Espasa-Calpe , 1983.

——. "La Verdad sobre el Comunismo en España: Carta Abierta a Norman Thomas." Barcelona , 1 Jan.1939.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 Madrid. Araquistáin Papers , Leg.58/v7b. Photocopy in Hoover Institution , Bolloten Collection.

——. La verdad sobre la intervención y la no-intervención en España. Madrid : n.p. , 1938.

Les archives secretes de la Wilhelmstrasse: De Neurath a Ribbentrop. Septembre 1937-Septembre 1938. Paris : Plon , 1950.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Papeles de Don Luís Araquistáin Quevado. Organiz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Mería Teresa de la Peña Marazuela. Prólogo de Javier Tusell. Madrid :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 1938. Photocopies of several hundred of these documents are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 Bolloten Collection.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 Salamanca. Sección Guerra Civil.

Ardiaca, Pere. Intervenció de Pere Ardiaca del c.c. en la primera conferència nacional del 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 ( I.C. ) . Barcelona : Edicions del Secretariat d' Agitació

Propaganda del PSUC , n.d.

Arenillas, José. Euzkadi, la cuestión nacional y la revolución socialista. Paris : La Batalla , 1969.

Arenillas de Claves, Ignacio. El proceso de Besteiro. Madrid : Revista de Occidente , 1976.

Arias Velasco, José. La hacienda de la Generalidad, 1931-1938. Barcelona : Ariel , 1977.

L' armée de la république espagnole qui défend la démocratie et la paix. Paris : [1937?].

Armero, José-Mario. España fue noticias: Corresponsales extranjeros en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Madrid : Sedmay , 1976.

Armiñan, Luis de. Bajo el cielo de Levante. Madrid : Ediciones Españolas , 1939.

———. Por los caminos de guerra: De Navalcarnero a Gijón. Madrid : Ediciones Españolas , 1939.

Arnau, Roger. Marxisme català i question nacional catalana, 1930-1936. Vol. II. Paris : Edicions Catalanes , 1974.

Aron, Raymond. Entre Deux Guerres. Vol. III. New York : Brentano , 1946.

Aróstegui Sánchez, Julio , and Martínez, Jesús A. La junta de defensa

de Madrid. Madrid : Comunidad de Madrid , 1984.

\*Arquer, Jordi. Letter to Bolloten on his meeting in 1950 with Manuel Hernando Solana (magistrate on the Tribunal of Espionage and High Treason during trial of the POUM Leaders) .

\*——. Miscellaneous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Verbatim account of public prosecutor' s cross-examination of Arquer during the POUM trial in October 1938.

Arques, Enrique. 17 de julio: La epopeya de Africa. Madrid : Reus , 1948.

Arrabal, Juan. José María Gil Robles. Avila : Senén Martín Díaz , 1935.

Arrarás, Joaquín. Historia de la segunda república española. Vols. I , II , III , IV. Madrid : Editora Nacional , 1964 and 1968.

——. Memorias íntimas de Azaña. Madrid : Ediciones Españolas , 1939.

——. El sitio del Alcázar de Toledo. Saragossa : Heraldo de Aragón , 1937.

——, ed. Historia de la cruzada española. 12 vols , Madrid : Ediciones Españolas , 1940.

Arrigoni, Enrico [Carl Brand , pseud.]. Freedom: My Dream. Sun City : Western World Press , 1985.

Arsenio de Izaga, G. Los presos de Madrid. Madrid : Martosa , 1940.

Artal, Francesc , et al. El pensament economic català Durant la republica i la guerra, 1931-1939. Barcelona : Ediciones 62 , 1976.

Artola, Miguel. Partidos y programas políticos, 1808-1936. Vol. I : Los Partidos políticos. Vol. II : Manifiestos y programas políticos. Madrid : Aguilar , 1974 , 1975.

Asedio de Huesca. Huesca : Ayuntamiento de Huesca , [1938?].

\* Asensio, General José.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El General Asensio: Su lealtad a la república. Barcelona : Artes Gráficas CNT , 1938.

L' assassinat de Andrés Nin. Paris : Spartacus , 1939.

Assassination of Catholic Priests in the Diocese of Barcelona, Spain, under the So-called Spanish Republic, Now the Spanish Republic in Exile. Washington , DC : Spanish Embassy , [1946?].

Atholl, Katherine, Duchess of. My Impressions of Spain. Essex : Lucas , 1937.

———. Report of Our Visit to Spain. London : Caledonian Press , [1937?].

———. Searchlight on Spain. Harmondsworth , England : Penguin , 1938.

Aub, Max.Últimos cuento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Caracas : Arte , 1969.

Aunós Pérez, Eduardo.Calvo Sotelo: Le drame de l' Espagne contemporaine.Paris : Éditions de France , 1943.

Autour du procès du POUM.Paris : Independent News , 1938.

Avilés, Gabriel.Tribunales rojos:Vistos por un abogado defensor.Barcelona : Destino , 1939.

Avilés Farré, Juan.La izquierda burguesa en la II República.Madrid : Espasa-Calpe , 1985.

Ayala, JoséAntonio.Murcia en la II república.Murcia : Comunidad Autónoma de Murcia , 1984.

Azaña, Manuel.Los española en guerra.Barcelona : Grijalbo , 1977.

——.Madrid.London : Friends of Spain , 1937.

——.Obras completas.Edited by Juan Marichal.Vols.III , IV.Mexico City : Oasis , 1967 , 1968.

——.Una política, 1932-1933.Madrid : Espasa Caple , 1932.

——.Speech by His Excellency the President of the Spanish Republic, January 21 , 1937.London : Spanish Embassy , 1937.

——.La velada en Benicarló.Buenos Aires : Losada , 1939.

——.A Year of War in Spain.London : Friands of Spain , 1937.

Azaña-Prieto tapes.Teletyped messages exchanged between Prieto and Azaña during the May events in Barcelona , 3-7 May 1937.Servico Histórico , Madrid.A microfilm copy is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Azaretto, Manuel.Las pendientes resbaladizas: Los anarquistas en España.Preface by JoséA.Barrionuevo.Montevideo : Germinal , 1939.

Azcárate, Pablo de.Mi embajada en Londres durant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Barcelona : Ariel , 1976.

Aznar, Manuel.Historia militar de la guerra de España.Madrid : Idea , 1940.

Bahamonde y Sánchez de Castro, Antonio.Un año con Queipo de Llano.Maxico City : Nuestro Tiempo , 1938.

——.Memoirs of a Spanish Nationalist.London : United Editorial , 1939.

Bajatierra, Maura.Crónicas de la Guerra.Valencia : Subsecretaria de Propaganda , 1937.

Bajo la bandera de la España republicana.Moscow : Progreso , 1967.

Baker, Carlos.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New York : Scribner' s

Sons , 1969.

Bakunin, M.A. Bog i gosudarstvo. New York : Union of Russian Workers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 1918.

——. Gosudarstvennost i anarkhiia. Petersburg-Moscow : Gosudarstvennoe Izdanie , 1922.

Balbontín, JoséAntonio. La España de mi experiencia. Mexico City : Colección Aquelarre , 1952.

Balcells, Albert. Cataluña xontemporánea II, 1900-1936. Madrid : Siglo XXI , 1974.

——. Crisis económica y agitación social en Cataluña, 1930-1936. Barcelona : Ariel , 1971.

——. Marxismo y catalanismo, 1930-1936. Barcelona : Anagrama , 1977.

——. El problema agrario en Cataluña: La cuestión Rabassaire, 1890-1936. Madrid : 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 1980.

\* Balias, Jaime.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Towards a Fresh Revolution ( translation of Hacia una nueva revolución ) . The Friends of Durruti Group. Orkney : Cienfuegos Press , 1978.

Baráibar, Carlos de. Las falsas "posiciones socialistas" de



Indalecio Prieto. Madrid : Yunque , 1935.

——. La guerra de España en el plano internacional. Barcelona :  
Tierra y Libertad , 1938.

La Barbarie Roja. Valladolid : Santarén , 1938.

Barça, J.O. La obra financiera de la generalidad durante los seis  
primeros meses de la revolución. Paris : Association Hispanophile de  
France , 1937.

Barcellona, Antonio María de. Martiri della rivoluzione del 1936  
nella Catalogna. Milan-Rome : Società Editrice Internazionale , 1937.

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Limited. Statements  
issued on 3 September and 16 November. Public Library of Toronto.

Bardoux, Jacques. Chaos in Spain. London :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 1937.

——. Stalin contre l' Europe. Paris : Flammarion , 1937.

\*Barea, Arturo.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The Forging of a Rebel. New York : Reynal Hitchcock , 1946.

\*Barea, Ilsa.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Barrio, José del. Intervención en la primera conferencia nacional

del Partido Socialista Unificado de Cataluña ( I.C. ) celebrada durante los días 24 a 26 de Julio De 1937.Barcelona : Agitación y Propaganda del PSU , 1937.

——.3er congrés de la UGT a Catalunya.Informe de Josep del Barrio.Barcelona : UGT , 1937.

Barron, John.KGB.New York : Dutton , 1974.

Bateman, Don.Joaquín Maurín, 1893-1973.Leeds , England : I.L.P.Square One Publications , 1974.

\*Bates, Ralph.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En la España leal ha nacido un ejército.Moxico : [1937?].

Batov, Pavel I.V pokhodakh i boiakh.Moscow : Voennoe Izdatel' stvo , 1966.

Battaglione Garibaldi.Paris : Edizioni di Cultura Sociale , 1937.

Bauer, Eddy.Impressions et expériences de la Guerra d' Espagne.Lausanne : Imprimeries Reunies , 1938.

Bayerlein, Bernard.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Spaniens als Sektion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vor de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1931-1936." Dissertation.Bochum : Ruhr-Universität , 1978.

Bayo, Capitán Alberto. Mi desembarco en Mallorca. Guadalajara , Mexico : Imprenta Gráfica , 1944.

Bécarud, Jean. La segunda república española. Madrid : Taurus , 1967.

Bécarud, Jean , and Lapouge, Gilles. Anarchistes de' Espagne. Paris : Balland , 1970.

Bécarud, Jean , and López Campillo, E. Los intelectuales españoles durante la II República. Madrid : Siglo XXI , 1978.

Bédarida, François. La stratégie secrète de la drôle de guerre. Paris :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et Editions du CNRS , 1979.

Bedford Jones, Nancy. Students under Arms. New York : North American Committee to Aid Spanish Democracy , 1938.

Bejarano, Benigno. See Lazarillo Tormes.

Belausteguigoitia, Ramón de. Euzkadi en llamas. Mexico City : Botas , 1938.

Belforte, General Francesco. La guerra civile in Spagna. Vol. I : La disintegrazione dello stato. Vol. II : Gli interventi stranieri nella Spagna rossa. Vol. III : La campagna dei volontari italiani. Vol. IV : La campagna dei volontari italiani e la vittoria di Franco. Milan : Istituto per gli studi di política internazionale , 1938 , 1939.

Beliaev, N. , comp.Mikhail Koltsov: Kakim on byl:  
vospominaniia.Moscow : Sovetskii Pisatel' , 1965.

Bellmunt, Domènec de.Lluis Companys.Toulouse : Foc Nou , 1945.

Beloff, Max.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1929-1941.2  
vols.London-New York-Toronto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47.

Ben-Ami, Shlomó.La revolución desde arriba: España, 1936-  
1979.Barcelona : Ríopiedras , 1980.

Benavides, Manuel D.La escuadra la mandan los cabos.Mexico City :  
n.p. , 1944.

——.Guerra y revolución en Cataluña.Mexico City : Tenochtitlan ,  
1946.

——.Luz sobre España.Mexico City : Tenochtitlan , 1944.

Bennett, Milly.Archives.Hoover Institution.

Berdión, Auxilio.Madrid en tinieblas: Siluetas de la  
revolución.Madrid-Valencia : Salmantina , 1937.

Berenguer, Dámaso.De la dictadura a la república.Madrid : Plus-  
ultra , 1946.

Bergamín, José.Marañón' s Betrayal.n.p. , [193-?].

Berlin 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Der Freiheitskampf der spanischen Volkes und die internationale Solidarität. Berlin : Dietz , 1956.

Bernanos, Georges. Les grandes cimitières sous la lune. Paris : Plon , 1938.

Bernard, Ino. Mola, mártir de España. Granada : Prieto , 1938.

Bernecker, Walther L. Anarchismus und Bürgerkrieg. Hamburg : Hoffmann and Campe , 1978.

———. Kollektivismus und Freiheit. Munich : Deutscher Taschenbuch , 1980.

———. Die soziale Revolution o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 Munich : Ernst Vögel , 1977.

Bernecker, Walther L. , and Hallerbach, Jörg. Anarchismus als Alternative? Berlin : Kramer , 1986.

Bernerri, Camillo. Entre la revolución y las trincheras ( 1936-1937, Barcelona ) , No.21. France : Tierra y Libertad , 1946.

———. Guerra de clases en España, 1936-1937. Barcelona : Tusquets , 1977.

———. Mussolini a la conquista de las Baleares. Buenos Aires :

Servicio de Propaganda de España , 1938.

——.Pietrogrado, 1917/Barcellona, 1937.Milan : Sugar , 1964.

Berryer.Revolutionart Justice in Spain.London :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 [1937?].

Bertrán Güell, Felipe.Caudillo, profetas y soldados.Madrid-Barcelona : Editorial Juventud , 1939.

——.Preparación y desarrollo del alzamiento nacional.Valladolid : Santarén , 1938.

Bertrán y Musitu, José.Experiencias de los servicios de información del nordeste de España ( SIFNE ) durante la guerra.Madrid : Espasa-Calpe , 1940.

Bessie, Alvah.Men in Battle.New York : Scribner' s Sons , 1939.

——.Spain Again.San Francisco : Chandler and Sharp , 1975.

—— , ed.The Heart of Spain.New York : Veterans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 1952.

Bessie, Alvah , and Prago,Albert , eds.Our Fight: Writings by Veterans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Spain, 1936-1939.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Press , 1987.

Besteiro, Julián.Marxismo y antimarxismo.Mexico City : Pablo

Iglesias , 1966.

Bethune, Norman.El crimen del camino Malaga-Almeria.Valencia :  
Iberia , 1937.

Beumelburg, Werner.Kampf um Spanien: Die Geschichte de Legion  
Condor.Oldenburg-Berlin : Gerhard Stalling , 1939.

Bezucha, Robert J. , ed.Modern European Social History.Boston :  
Heath , 1972.

Bialer, Seweryn , ed.Stalin and His Generals: Soviet Military  
Memoirs of World War II.New York : Pegasus , 1969.

Bibliothèques du front et de l' arrière en Espagne  
républicaine.Barcelona : Editions Espagnoles , 1938.

Bilainkin, George.Ivan Mikhailovitch Maisky: Ten Years  
Ambassador.London : Allen and Unwin , 1944.

"Bilan" : Textos aobr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1936-  
1938.Barcelona : Etcétera , 1978.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rxism.See Gorman, Robert A.

Birkenhead, Earl of.Halifax:The Life of Lord Halifax.Boston :  
Houghton Mifflin , 1966.

Bizcarrondo, Marta.Araquistáin y la crisis socialista en la II

república, Leviatán, 1934-1936. Madrid : Siglo XXI , 1975

———. Octubre del 34: Reflexiones sobre una revolución. Madrid : Ayuso , 1977.

Blackstock, Paul W. The Secret Road to World War II: Soviet Versus Western Intelligence, 1921-1939. Chicago : Quadrangle Books , 1969.

Blackwell, Russell [Rosalio Negrete , pseud.]. Correspondence with Hugo Oehler , 1936-1937. Brandeis University , Hugo Oehler Papers

\*Bland, Roger.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Blanshard, Paul. Freedom and Catholic Power in Spain and Portugal. Boston : Beacon Press , 1962.

Bley, Wulf. Das Buch der Spanienflieger. Leipzig : Hase and Koehler , 1939.

Blinkorn, Martin. Carlism and Crisis in Spain, 1931-1939.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5.

———, ed. Spain in Conflict, 1931-1939 : Democrac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 Sage , 1986.

Bloch, Jean Richard. Espagne, Espagne! Paris : Editions Sociales Internationales , 1936.

———. España en Armas. Mexico City : Pax , 1937.



The Blodgett Collection of Spanish Civil War Pamphlet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1980. This booklet contains a listing of several hundred pamphlets. The microfiche of the entire collection is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Blythe, Henry. Spain over Britain. London : Routledge, 1937.

Bocca, Giorgio. Palmiro Togliatti. Rome : Laterza, 1977.

Bochet, Pierre. Les volontaires du peuple. Perigueux : Soleil Levant, 1947.

Bohlen, Charles. Witness to History, 1929-1969. New York : Norton, 1973.

Bolín, Luis. España: Los años vitales. Madrid : Espasa Calpe, 1967.

———. Spain: The Vital Years. London : Cassell, 1967.

\*Bolívar, Candido.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Bollati, Ambrogio, and Bono, Giulio del. La guerra di Spagna. Torino : Giulio Einaudi, 1967.

\*Bolloten, Burnett. Clippings from over 500 different newspapers, periodicals, and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arranged chronologically in 1986 large envelopes and 10 bound volumes covering each day of the Civil War. Additional envelopes contain clippings covering the

first years of the postwar period.

\*——. "Dispatch from Valencia to the London Bureau of the United Press , 31 December 1936."

\*——. "Dispatch from Valencia to the United Press.Excerpts from Largo Caballero' s unpublished statement to British Members of Parliament on 4 December 1936."

\*——. "Dispatch from Valencia to the United Press , 18 June 1937."

——. "Dispatch from Valencia to the United Press , 7 July 1937."

——.The Grand Camouflage: The Spanish Civil War and Revolution, 1936-1939.New York : Praeger , 1961 , 1968.Introduction to the second printing by H.R.Trevor-Roper.

——.El gran engaño.Barcelona : Caralt , 1961 , 1967 , 1975 , 1984.

\*——.Interviews: Shorthand notes taken during Burnett Bolloten' s interviews with some of the leading Civil War participants.Some transcripts are available.

\*——.Microfilm collection of newspaper , Periodicals ,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 books , pamphlets , and documents comprising 7250 items.

\*——.Miscellaneous Documents.Vols.I , II , III , IV.These consist of

typewritten copies of directives and reports by political commissars and military leaders , manifestos and articles , as well as original passes by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s. The original directives and reports were loaned to Burnett Bolloten by Vittorio Vidali ( Carlos Contreras ) .

——.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Sus orígenes, la izquierda y la lucha por el poder durante la guerra civil. Foreword by Gabriel Jackson. Barcelona : Grijalbo , 1980.

——. The Spanish Revolution: The Left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during the Civil War. Foreword by Raymond Carr. Chapel Hill :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1979.

Bol' shaia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 Moscow : [1st ed. 1926-1947 ; 2d ed. 1950-1960 ; 3d ed. 1970-].

Bombardments et agressions en Espagne: Juillet 1936-juillet 1938. Paris : Comité Mondial contre la Guerre et le Fascisme , 1938.

Bombs over Barcelona. New York : North American Committee to Aid Spanish Democracy , 1938.

Bonamusa, Francesc. Andreu Nin y el movimiento comunista en España, 1930-1937. Barcelona : Anagrama , 1977.

——. El bloc obrer i camperol, 1930-1932. Barcelona : Curial , 1974.

Bonastre. Características fundamentales del ejército popular. Barcelona : Publicacions Antifeixistes de Catalunya , 1938.

Bonnet, Georges. Défense de la paix: De Washington au Quai d' Orsay. Genève : Bourquin , 1946.

———. Défense de la paix: Fin d' une Europe. Genève : Bourquin , 1948.

Bookchin, Murray. The Spanish Anarchists: The Heroic Years, 1868-1936. New York : Free Life Editors , 1977.

Borkenau, Franz. The Spanish Cockpit. London : Faber and Faber , 1937.

Borrás, José. Políticas de los exilados españoles, 1944-1950. Paris : Ruedo Iberico , 1976.

Borrás, T. Checas de Madrid. Madrid : Escelicer , 1940.

Borrás Cascarosa, José. Aragón en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Barcelona : Viguera , 1983.

Borrás Llop, JoséMaría. Francia ant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Burguesía, interés nacional e interés de clase. Madrid :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ológicas , 1981.

Bortsy Latvii v Ispanii, 1936-1939 : Vospominaniia I dokumenty. Riga : Institutu Istori Partii pri Tsk KP Latvii. Filial Institua Marksizma-Leninizma pri Tsk. KPSS. , 1970.

Bosch Gimpera, Pere. *Memòries*. Barcelona : Edicions 62 , 1980.

Bosch Sánchez, Aurora. *Ugetistas y libertarios: Guerra civil y revolución en el país valenciano, 1936-1939*. Valencia : Soler , 1983.

*A Boss for Spain*. Madrid : SIE , 1964.

Botin, Mikhail. *Za svobodu Ispanii*. Moscow : Sovetskaia Rossiia , 1986.

Bougöuin, E. , and Lenoir, P. *La finance internationale et la guerre d' Espagne*. Paris : Centre d' études de Paix et Démocratie , 1938.

Bouthelier, Antonio , and López Mora, José. *Ocho días: La revueltacomunista, Madrid, 5-13 marzo 1939*. Madrid : Editora Nacional , 1940.

Bowers, Claude. *My Mission to Spain*. New York : Simon and Schuster , 1954.

Boyle, Andrew. *Montagu Norman*. London : Cassell , 1967.

Brademas, John. *Anarcosindicalismo y revolución en España, 1930-1937*. Barcelona : Ariel , 1974.

Brandt, Willy. *Berichtüber Krieg und Revolution in Spanien*. n.p. :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 Partei Deutschlands , 1937.

———. *Ein Jahr Krieg und Revolution in Soanien*. Referat des Gen.Brandt auf der Sitzung der erweiterten Partei-Leitung der SAP ,

Anfang Juli , 1937. Paris :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 1937.

Brasa, Juan. España y la Legion. Valladolid : Santarén , 1938.

Brasillach, Robert. Histoire de la Guerre d' Espagne. Paris : Plon , 1939.

——. Le Siége de l' Alcazar. Plon : Bourquin , 1939.

Braubach, Max. Hitlers Weg zur Verständigung mit Russland im Jahre 1939. Bonn : Hanstein , 1960.

Bravo Martínez, Francisco. Historia de la Falange Española de las JONS. Madrid : Editora Nacional , 1940.

Bravo Morata, Federic. Historia de la república. Vol. II : 1934-1939. Madrid : Daimon , 1977.

——. Historia de Madrid. Vol. III , Madrid : Fenicia , 1968

——. La reforma agrarian de la república. Madrid : Fenicia , 1978.

——. La república y el ejército. Madrid : Fenicia , 1978.

Brea, Juan , and Low Mary. Red Spanish Notebook. London : Martin Secker , 1937.

Brenan, Gerald. The Face of Spain. New York : Pellegrini and Cudahy ,

1951.

——.Memoria personal, 1920-1975.Madrid : Alianza , 1979.

——.Personal Record,1920-1972.New York : Knopf , 1975.

——.The Spanish Labyrinth.Lond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43.

Brenner, Anita.Class War in Spain: An Exposure of Fascism,  
Stalinism, etc.Sydney : Socialist Labour Party of Australia , 1937.

Brereton, Geoffrey.Inside Spain.London : London Quality Press , 1938.

Brezhnev, Leonis I.Following Lenin' s Course: Speeches and  
Articles.Moscow : Progress , 1972.

Bricall, Josep M.Política económica de la Generalitat, 1936-  
1939.Barcelona : Edicions 62 , 1970.

La brigade del amanecer.Valladolid : Santarén , n.d.

Brigada Internacional ist under Ehrenname: Erlebnisse ehemaliger  
deutscher Spanienkämpfer.2 vols.East Berlin : Militär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 1986.

Briones, Mariano.La juventud anarquista: Factor determinante de la  
guerra y de la revolución.Barcelona : Agrupaciän Anarquista "Los de  
Ayer y los de Hoy , " 1937.

Brissaud, André.Canaris.Paris : Tallandier , 1971.

——.Canaris: The Biography of Admiral Canaris, Chief of German Military Intelligence.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Ian Colvin.New York : Grosset and Dunlop , 1973.

British Medical Aid in Spain.London : News Chronicle , n.d.

Brockway, Fenner.Truth about Barcelona.London :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 1937.

——.Workers' Front.London : Secker and Warburg , 1938.

Brome, Vincent.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London : Heinemann , 1965.

Brook-Shepherd, Gordon.Anschluss:The Rape of Austria.London : Macmillan , 1963.

——.The Storm Petrels:The Flight of the First Soviet Defectors.New York :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1978.

Broué, Pierre.See also Trotsky ,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Broué, Pierre ; Fraser, R. ; and Vilar, P.Metodología histórica de la guerra y revolución españolas.Barcelona : Fontamara , 1980.

Broué, Pierre , and Témime, Emile.La révolution et la guerre



d' Espagne.Paris : Les Editions de Minuit , 1961.

Browder, Earl.Lenin and Spain.New York : Worker Library , 1937.

——.Next Steps to Win the War in Spain.New York : Worker Library , 1938.

——.Win the War in Spain! New York : Worker Library , 1937.

Buckley, Henry.Life and Death of the Spanish Republic.London : Hamish Hamilton , 1940.

Buckley, William F. , Jr. , and Bozell,L.Brent.McCarthy and His Enemies: The Record and Its Meaning.Chicago : Regnery , 1954.

Buenacasa, Manuel.El movimiento obrero español, 1886-1926.Madrid : Júcar , 1977.

——.Por la unidad CNT-UGT: Perspectivas del movimiento obrero español.Mexico City : Salvador Segui , 1964.

Bueso, Adolfo.Cómo fundamos la CNT.Barcelona : Avance , 1976.

——.Recuerdos de un cenetista.Vol.II.Barcelona : Ariel , 1978.

Bullejos, José.La comintern en España: Recuerdos de mi vida.Mexico , D.F. : Impresiones Modernas , 1972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España en la segunda república.Mexico City : Impresiones Modernas , 1967.

——.Europa entre dos guerras, 1918-1938.Mexico City : Castilla , 1945.

Bullock, Alan.Hitler:A Study in Tyranny.New York : Harper and Row , 1964.

Burgo, Jaime del.Conspiración y guerra civil.Madrid : Alfaguara , 1970.

Burns, Emilio.La conspiración nazi en España.Mexico City : Editorial Revolucionaria , 1938.

——.Spain.London :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 1936.

Butler, James Ramsay Montagu.Lord Lothian ( Philip Kerr ) , 1882-1940.London : Macmillan , 1960.

Les buts militaires de l' Allemagne et de l' Italie dans la guerre d' Espagne.Paris : ComitéMondial contre la Guerre et le Fascisme , 1938.

Caballéy Clos, Tomás.Barcelona Roja.Barcelona : Librería Argentina , 1939.

Cabanellas, Guillermo.Cuatro generales: Preludio a la guerra

civil.Barcelona : Planeta , 1977.

——.La guerra civil y la victoria.Madrid : Tebas , 1978.

——.La guerra de los mil días: Nacimiento, vida y muerte de la II república española.Vols.I , II.Barcelona , Buenos Aires , Mexico City : Grijalbo , 1973.

Cabezas, Juan Antonio.Asturias: Catorce meses de guerra civil.Madrid : Toro , 1975.

Cabo Giorla, Luis.Primer conferencia nacional del P.S.U.C.Barcelona : Ediciones del Departamento de Agitación y Propaganda del PSUC , 1937.

Cadden, J.Spain 1936.New York : International Youth Commission , 1936.

Cadogan, Sir Alexander.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1938-1945.Edited by David Dilks.London : Cassell , 1971.

Camba, Francisco.Madridgrado.Documental film , 2d ed.Madrid : Ediciones Espanoles , 1940.

Camillo Atrayente.Barcelona : Tierra y Libertad , 1937.

Caminal, Miquel.Joan Comorera.Vol.I : Catalanisme i socialisme, 1913-1936.Vol.II : Guerra i revolució, 1936-1939.Barcelona :

Empúries , 1984.

Camino, Jaime.Intimas conversaciones con la Pasionaria.Barcelona :  
Dopesa , 1977.

El camino de la victoria.Valencia : Gráficas Genovés , [1936?].

Campbell, J.R.Soviet Policy and Its Critics.London : Gollancz , 1939.

——.Spain' s "Left" Critics.London :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 1937.

Campbell Doherty, Julian.Das Ende des Appeasement.Berlin : Hess ,  
1973.

El Campesino[Valentín González] .Comunista en España y  
antistalinista en la U.R.S.S.Mexico City : Guaranía , 1952.

——.La vie et mort en U.R.S.S., 1939-1949.Paris : Plon , 1950.

——.Yo escogíla esclavitud.Barcelona : Plaza y Janés , 1977.

Campoamor, Clara.La révolution espagnole vue par une  
républicaine.Paris : Plon , 1937.

\*Campos, Severina.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Cánovas Cervantes, S.Apuntes históricos de "Solidaridad  
Obrera" .Barcelona : Ediciones C.R.T. , n.d.

——.De Franco a Negrín pasando por el partido comunista: Historia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Toulouse : Páginas Libres , n.d.

——.Durruti y Ascaso: La CNT y la revolución de julio.Toulouse : Páginas Libres , n.d.

Cantalupo, Roberto.Fu la Spagna.Ambasciata presso Franco.Febbraio-Aprile 1937.Milan : Arnoldo Mondadori , 1948.

Cantarero del Castillo, Manuel.Tragedia del socialismo español.Barcelona : Dopesa , 197.

Capo, JoséMaría.España desnuda.Havana : Publicaciones España , 1938.

Carabantes, Andrés , and Cimorra,Eusebio.Un mito llamado Pasionaria.Barcelona : Planeta , 1982.

Carabias, Josefina.Azaña: Los que le llamábamos Don Manuel.Esplugues de Llobregat : Plaza y Janés , 1980.

\*Carbajal, Captain Aniceto.Interview ,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Cardona, Gabriel.El poder military en la España contemporánea hasta la guerra civil.Madrid : Siglo XXI , 1983.

Cardona Rosell, Mariano.Aspectos económicos de nuestra revolución.Barcelona : CNT-FAI , 1937.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Carney, William P.No Democratic Government in Spain.New York :  
America Press , 1937.

Carr, Edward Hallett.The Comintern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London : Macmillan , 1984.

——.The Foreign Policy of Britain,1818-1939.London : Longmans ,  
Green , 1939.

——.German-Soviet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1919-  
1939.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Press , 1951.

Carr, Raymond.Modern Spain: 1875-1980.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0.

——.Spain, 1808-1939.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66.

——.The Spanish Civil War: A History in Pictures.New York :  
Norton , 1986.

——.The Spanish Tragedy: The Civil War in Perspective.London :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1977.

—— , ed.Estudios sobre la república y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Barcelona : Ariel , 1973.

—— , ed.The Republic and the Civil War in Spain.London :

Macmillan , 1971.

Carrascal, Geminiano.Asturias: 18 julio 1936-21 octubre 1937.Valladolid : Casa Martín , 1938.

Carrasco, C.Como se destrozan los tanques enemigos.Valencia : J.S.U. , 1937.

Carrasquer, Félix.Las colectividades de Aragón: Un vivir autogestionado, promesa de futuro.Barcelona : Laia , 1986.

Carrero Blanco, Luis.España y el mar: El mar en la guerra y en la paz hasta la II guerra mundial.Madrid : Instituto de Estudios Políticos , 1962.

Carrillo, Santiago.Demain l' Espagne: Entretiens avec Régis Debray et Max Gallo.Paris : Editions du Seuil , 1974.

——.En marcha hacia la victoria.Valenci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7.

——.La juventud, factor de la victoria.Valenci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7.

——.Somos la organización de la juventud.Madrid : n.p. , n.d.

\*Carrillo, Wenceslao.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El último episodio d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Toulouse : La

Secretaría de Publicaciones de la J.S.E.en Francia , 1945.

Carrión, Pascual.Los latifundios en España.Madrid : Gráficas Reunidas , 1932.

——.La reforma agraria de la segunda república y la situación actual de la agricultura.Barcelona : Atiel , 1973.

Casado, Colonel Segismundo.Así cayó Madrid.Madrid : Gardiana , 1968.

——.The Last Days of Madrid.London : Peter Davies , 1939.

Casanova, M.L' Espagne livrée.Paris : Ligue Comuniste , 1971.

——.La guerra de España: El frente popular abrió las puertas a Franco.Barcelona : Fontamara , 1978.

Casanova Ruiz, Julián.Anarquismo y revolución en la sociedad rural aragonesa, 1936-1938.Madrid : Siglo XXI , 1985.

——.Caspe, 1936-1938.Zaragoza : Grupo Cultural Caspolino , 1984.

Casnovas, Joan.Une pensée et une attitude: Discours, notes et déclarations, 1936-1939.Paris : Grifé , [1939].

Casares, Francisco.Azaña y ellos.Granada : Prieto , 1938.

Castelao, Alfonso R.Galicia mártir.Valencia : Ministerio de Propaganda , 1937.



Castells, Andreu.Las brigadas internacionale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Barcelona : Ariel , 1974.

Casterás Archidona, Ramón.Las 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 de Cataluña: Ante la guerra y la revolución, 1936-1939.Barcelona : Hogar , 1982.

Castilla, Floreal.El anarquismo ibérico: La FAI y la CNT.Supplement to Espoir , #780.Toulouse : n.d.

Castrillo Santos, Juan.Revolución en España.Buenos Aires : Librería la Facultad , 1938.

Castro, Fidel.Revolutionary Struggle, 1947-1958.Selected Works , Vol.I.Cambridge , Mass. : MIT Press , 1972.

Castro Albarrán, A.de.El derecho al alzamiento.Salamanca : Henricus , 1940.

——.La gran víctima:La iglesia española martir de la revolución roja.Salamanca : Henricus , 1940.

Castro Delgado, Enrique.Balance y perspectives de nuestra guerra.Barcelon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Comisión Nacional de Agit-Prop , 1937.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Hombres made in Moscú.Mexico City : Publications Mañana , 1960.

——.J' ai perdu la foiàMoscou.Paris : Gallimard , 1950.

Castro Marcos, Miguel de.El ministerio de instrucción pública bajo la dominación roja.Madrid : Enrique Prieto , 1939.

Castrovido, Roberto.Las dos républicas:El 11 de febrero y el 14 de abril.Barcelona : Ediciones españolas , [1938?].

Catalla, Bernard , ed.Problèmes de la construction et du logement dans la revolution espagnole, 1936-1939: Barcelona, Aragón.Toulouse : n.p. , 1976.

A Catholic Looks at Spain.London : Labour Publications Department , 1937.

Catholica and the Civil War in Spain: A Collection of Statements by World-famous Catholic Leaders on the Events in Spain.New York : Workers Library , 1936.

Catholics Reply to Open Letter of 150 Protestant Signatories on Spain.New York : America Press , [1937?].

Cattell, David T.Communism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Berkel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55.

——.Soviet Diplomacy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Berkel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57.

Caudet, F.História política de Catalunya.Barcelona : Producciones Editoriales , 1978.

Causa general:La dominación roja en España.Madrid : Dirección General de Información , 1961.

Caute, David.The Fellow Travellers.New York : Macmillan , 1973.

Cave Brown, Anthony C. , and MacDonald, Charles B.On a Field of Re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oming if World War II.New York : Putnam , 1981.

Cavero y Cavero, Francisco.Con la segunda bandera en el frente de Aragón.Zaragoza : Heraldo de Aragón , 1938.

Cayette, André.Sauvons la France en Espagne.Paris : Baudinière , 1937.

Cerezo Martínez, Ricardo.Armada española, siglo XX.4 vols.Madrid : Poniente , 1983.

Cervera Pery, José.Alzamiento y revolución en la marina.Madrid : San Martín , 1978.

Cervera Valderrama, Almirante Juan.Memorias de guerra.Madrid : Editora Nacional , 1968.

Ceyrat, Maurice. La trahison permanente. Parti communist et politique russe. Paris : Spartacus , 1948.

Chacón, R.L. Por qué hice las chekas de Barcelona: Laúrencic ante el consejo de guerra. Barcelona : Solidaridad Nacional , 1939.

Chalmers Mitchell, Sir Peter. My House in Malaga. London : Feber , 1938.

Chamberlain, Neville. The Struggle for Peace. London : Hutchinson , 1939.

Chambers, Whittaker. Witness. New York : Random House , 1952.

Chaminade, Marcel. Feux Croisés sur l' Espagne. Paris : Denoël , 1939.

Chapaprieta Torregrosa, Joaquín. La paz fue possible: Memorias de un político. Barcelona : Ariel , 1972.

Charlton, L.E.O. , Air Commodore. The Military Situation in Spain. London : United Editorial , 1938.

Checa, Pedro. A un gran partido, una gran organización. Valencis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Comisión Nacional de Agit-Prop , 1937.

\*——. Interview ,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Qué es y cómo funciona el partido comunista. Valenci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n.d.

——.Tareas de organización y trabajo práctico del Partido.Madrid-Barcelon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8.

Chiapuso, Manuel.Los anarquistas y la guerra en Euzkadi: La comuna de San Sebastián.San Sebastián : Txertoa , 1977.

——.El gobierno vasco y los anarquistas: Bilbao en guerra.San Sebastián : Txertoa , 1978.

Chipont Martínez, Emilio.Alicante: 1936-1939.Madrid : Editora Nacional , 1974.

Chomsky, Noam.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New York : RandomHouse ( Vintage Books ) , 1969.

Churchill, Winston S.See also James, Robert Rhodes.

——.Arms and the Covenant.London : George G.Harrap and Co. , 1938.

——.The Gathering Storm.Boston : Houghton Mifflin , 1948.

Ciano, Count Galeazzo.Les archives secrètes du Comte Ciano, 1936-1942.Paris : Plon , 1949.

——.The Ciano Diaries, 1936-1943.Edited by Hugh Gibson.Garden City : Doublyday , 1946.

Cien años por el socialismo: Historia del PSOE, 1879-1979.Madrid : Pablo Iglesias , 1979.

Cierva y de las Hoces, Ricardo de la. Cien libros básicos sobre la guerra de España. Madrid : Publicaciones Española , 1966.

———. Los documentos de la primavera trágica: Análisis documental de los antecedentes inmediatos del 18 de julio de 1936. Madrid : Ministerio de Información y Turismo , 1967.

———. Historia básica de la España actual, 1800-1971. Barcelona : Planeta , 1974.

———. Historia d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Madrid : San Martín , 1969.

———. Historia del socialismo en España, 1879-1983. Barcelona : Planeta , 1983.

———. Historia ilustrada d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2 vols. Barcelona : Danae , 1971.

———. La historia perdida del socialismo español. Madrid : Editora Nacional , 1972.

———. Leyenda y tragedia de las brigades internacionales. Madrid : Prensa Española , 1973.

Cirre Jiménez, José. De espejo a Madrid con las tropas del General Miaja. Granada : Prieto , 1938.

———. Memorias de un combatiente de la brigade

internacional.Granada : Prieto , 1938.

Civera, Marín.El sindicalismo y la economía actual.Valencia :  
Partido Sindicalista , 1937.

Claudín, Fernando.La crisis del movimiento comunista.Vol.I : De la  
komintern al kominform.Paris : Ruedo Ibérico , 1970.

——.Santiago Carrillo: Crónica de un secretario  
general.Barcelona : Planeta , 1983.

Clavego, Pablo.Algunas normas para el trabajo de los comisarios  
políticos.Madrid : Europa América , [1937?]

El clero y los católicos vasco-separatistas y el movimiento  
nacional.Madrid : Centro de Información Católica Internacional ,  
1940.

Cleugh, James.Spanish Fury.London : Harper , 1962.

Climent, Luís.Rojos en Tarragona y su provincia.Tarragona : Torres y  
Virgili , 1942.

Coates, W.P. , and Coates, Z.K.A History of Anglo-Soviet  
Relations.London : Lawrence and Wishart , 1945.

——.World Affairs and the USSR.London : Lawrence and Wishart , 1939.

Cockburn, Claud.See also Pettifer, James , and Pitcairn,

Frank[pseud.].

——.Cockburn in Spain:Despatches from the Spanish Civil War.Edited by James Pettifer.London : Lawrence and Wishart , 1986.

——.Crossing the Line.London : Macgibbon and Kee , 1958.

——.A Discord of Trumpets.New York : Simon and Schuster , 1956.

Cockburn, Patricia.The Years of the Week.London : Macdonald , 1968.

Las colectividades campesinas, 1936-1939.Barcelona : Tusquets , 1977.

Coll, Josep and Pané, Josep.Josep Rovira:Una vida al servei de Catalunya del socialisme.Barcelona : Ariel , 1978.

Collectivisations: L' oeuvre constructive de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 1936-1939.Recueil de documents.Preface by A.Souchy.Toulouse : CNT , 1965.

Colodny, Robert Garland.Spain:The Glory and the Tragedy.New York : Humanities Press , 1970.

——.The Struggle for Madrid: The Central Epic of the Spanish Conflict, 1936-1937.New York : Paine-Whitman , 1958.

Colomer, Victor.Informe presentat a la primera conferencia nacional del 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do de Catalunya I.C.Barcelona : Secretariat d' Agitacio i Propaganda del P.S.U.C. , 1937.



Colton, Joel. Léon Blum. Humanist in Politics. New York : Knopf , 1966.

Colvin, Ian. The Chamberlain Cabinet. London : Gollancz , 1971.

———. None So Blind. New York : Harcourt , Brace and World , 1965.

———. Vansittart in Office: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I. London : Gollancz , 1965.

Comín Colomer, Eduardo. El comisariado político en la guerra Española. Madrid : San Martín , 1973.

———. El comunismo en España, 1919-1936. Madrid : Publicaciones Españolas , 1959.

———. Historia del anarquismo español. Vols. I , II. Barcelona : AHR , 1956.

———. Historia de la primera república. Barcelona : AHR , 1956.

———. Historia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Vol. I , II , III. Madrid : Editora Nacional , 1965.

———. Historia secreta de la segunda república. Barcelona : AHR , 1959.

———. Luchas internas en la zona roja. Madrid : Publicaciones Españolas , 1959.

———. El 5º Regimiento de Milicias Populares. Madrid : San Martín , 1973.

——.La república en el exilio.Barcelona : AHR , 1957.

“ComitéRegional de Aragón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Acta de la Reunión Celebrada el día 12 de Septiembre de 1937.”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 Salamanca , Leg.616/816-21

Communist International.Unity for Spain: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Labor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June-July, 1937.New York : Workers Librart , 1937.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XIII Plenum IKKI.Stenograficheski Otchet.Moscow :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 1934.

¿Cómo fortalecer nuestra democracia?.Madrid-Barcelon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8.

Cómo piensa el partido sindicalista en este momento histórico de la vida española.Valencia : Cultura Popular , 1937.

Comorera, Juan.Cataluña en pie de guerra: Discurso pronunciado en el pleno ampliado del C.C.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Valenci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7.

——.Informe presentado a la primera conferencia nacional del partido socialista unificado de Cataluña I.C.por su secretario general.Barcelona : Agitación y Propaganda del P.S.U.C. , 1937.

Companys, Luis. Discurso pronunciado el día 27 de diciembre de 1936. Barcelona : 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 , 1936.

———. "Notes and Documents on the Fighting in Barcelona, 3-7 May 1937." Carbon copy of original material given to the author by Ricardo del Rió , director of the Febus news agency , who received it from Francisco Aguirre , a friend of Companys.

Los comunistas y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Palmiro Togliatti, José Díaz, Santiago Carrillo. Barcelona : Bruguera , 1979.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Acuerdos del pleno económico nacional ampliado. Barcelona : Artes Gráficas CNT , 1938

———. "Atropellos Contra Nuestra Organizació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 CNT-FAI Archives. Paquete 44 B/5 , Caja 318. Photocopies in Hoover Institution , Bolloten Collection.

———. Comarcal de Utrillas ( Teruel ) : En luchas por la libertad, contra el fascismo, 1936-1939. Toulouse : Cultura y Acción , 1971.

———. Comarcal de Valderrobres ( Teruel ) : Sus luchas sociales y revolucionarias. Toulouse : Cultura y Acción , 1971.

———. Confederación Regional de Aragón , Rioja y Navarra ( CNT ) . Comarcal de Valderrobres ( Teruel ) . Toulouse : Cultura y Acción , [1971?].

——.El congreso confederal de Zaragoza, 1936.Madrid : Zero , 1978.

——.Congreso de constitución de la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 CNT ) .Prólogo de JoséPeirats.Barcelona : Anagrama , 1976.

\*——.Memoria del congreso extraordinario celebrado en Madrid los días 11 al 16 de junio de 1931.Barcelona : Cosmos ,  
[1976?].Photographic reproduction.

——. "Pleno Nacional de Regionales , 15 Octubre 1938."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 CNT-FAI Archives.Paquete 54 , C.Photocopy in Hoover Institution , Bolloten Collection.

——.Realizaciones revolucionarias y estructuras colectivistas de la comarcal de Monzón ( Huesca ) .Monzón : CNT , Cultura y Acción , 1977.

CNT-FAI Archives.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 Amsterdam.

Confederación Regional del Trabajo de Cataluña.Memoria del congreso extraordinario de la confederación regional del trabajo de Cataluña celebrado en Barcelona los días 25 de febrero al 3 de marzo de 1937.Barcelona : CNT , 1937.

——.Memorias de la conferencia regional extraordinaria celebrada

los días 25, 26 y 27 de enero 1936. Barcelona : Confederación Regional del Trabajo de Cataluña , 1936.

\*Confederación Regional del Trabajo de Levante. Actas del congreso regional de sindicatos de Levante celebrado en Alicante, en el Teatro Verano, los días 15 , 16 , 17 , 18 y 19 de julio de 1937. Valencia : CNT , 1937.

Conforti, Olao. Guadalajara: La prima sconfitta del fascismo. Milano : Mursia , 1967.

\*Congress of the Valencia CNT , November 1936. Bound collection of clippings from Fragua Social , organ of the CNT , Valencia.

Conquest, Robert. The Great Terror. New York : Macmillan , 1969.

Contemporary Authors. Detroit : Gale Research , 1980.

Contes de guerra i revolució, 1936-1939. Vols. I , II. Barcelona : Laia , 1982.

Le contrat de travail dans la république espagnole. Madrid : Ministère du Travail et de Prévoyance , Gráficas Reunidas , 1937.

Contreras, Carlos J. See also Vidali, Vittorio.

———. Nuestro gran ejército popular. Barcelon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Comisión Nacional de Agit-Prop , 1937.

——.La quinta columna.Valenci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7.

Contreras, Juan de.La iniciación en Segovia del movimiento nacional.Segovia : El Adelantado , 1938.

Contreras, Manuel.El PSOE en la II república: Organización e ideología.Madrid :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ológicas , 1981.

Controversy on Spain.London : United Editorial , 1937.

Conze, Edward.Spain Today.London : Martin Secker and Warburg , 1936.

Cooper, Duff ( Viscount Norwich ) .Old Men Forget: The Autobiography of Duff Cooper.London : Rupert Hart-Davis , 1953.

Las cooperatives agrícolas.Barcelon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7?].

Córdoba, Juan de.Estampas y reportajes de retaguardia.Sevilla : Ediciones Españolas , 1939.

Córdoba, Ayuntamiento.Seis estudios sobre el proletariado andaluz, 1868-1939.Córdoba : Delegación de Cultura , 1984.

Cordón, Antonio.Trayectoria.Paris : Ebro , 1971.

Cordonié, Rafael.Madrid bajo el Marxismo.Madrid : Victoriano Suárez , 1939.

Cordova Iturburu, Cayetano. España bajo el comando del pueblo. Buenos Aires : Acento , 1938.

Cortada, James W. , ed. Th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Westport : Greenwood Press , 1982.

———. Spain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Essays on Spanish Diplomacy, 1898-1978. Westport , conn. : Greenwood , 1980.

Corthis, André. L' Espagne de la victoire. Paris : Fayard , 1941.

Cossio, Francisco de. Guerra de Salvación. Valladolid : Santarén , 1937.

Cot, Pierre. Triumph of Treason. New York : Ziff-Davis , 1944.

Coulondre, Robert : De Staline à Hitler: Souvenirs de deux ambassades , 1936-1938. Paris : Hachett , 1950.

Coverdale, John F. Italian Intervention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75.

Cox, Geoffrey. Defence of Madrid. London : Gollancz , 1937.

Craig, Gordon A. Germany, 1866-1945.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0.

Craig, Gordon A. , and Gilbert, Felix , eds. The Diplomats, 1919-1939. Vol. II : The Thirties. New York : Atheneum , 1977.

Cremscoli, Franco. *Inferno a Barcellona*. Milan : Mondadori , 1939.

Crossman, Richard , ed. *The God That Failed*. New York : Bantam Books , 1959.

Crowley, Edward L. , ed. *The Soviet Diplomatic Corps, 1917-1967*. Metuchen , N.J. : Scarecrow Press , 1970.

Crozier, Brian. *Franco*. Boston : Brown , 1967.

Cruells, Manuel. *L' expedició a Mallorca*. Barcelona : Juventud , 1972

———. *Mayo sangriento*: Barcelona, 1937. Barcelona : Editorial Juventud , 1970.

———. *El separatisme català durant la guerra civil*. Barcelona : Dopesa , 1975.

———. *La societat catalana Durant la guerra civil*. Barcelona : Edhasa , 1978.

*Cuadernos bibliográfico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 1936-1939*. Series 1 , 2 , and 3. Madrid : Universidad de Madrid , 1966 , 1967.

Cuadrado, Alonso Arturo. *18 julio: Diez meses de Madrid rojo*. Melilla : Artes Gráficas , 1938.

Cuadrat, Xavier. *Socialismo y anarquismo en Cataluña, 1899-1911: Los orígenes de la CNT*. Madrid : Revista de Trabajo , 1976.



Cucó, Alfons. *Republicans i camperols revoltats*. València : Eliseu Climent , 1975.

———. *El valencianismo político, 1874-1939*. Barcelona : Ariel , 1977.

CucóGiner, María Josepa , et al. *La qüestióagrària al país Valencià*. Barcelona : Aedos , 1978.

Cucurull, Félix. *Panoràmica del nacionalisme català*. 6 Vols. Paris : Edicions Catalanes , 1975.

Cuevas de la Peña, Colonel Eduardo. *Recuerdo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 Montauban : Forestié , 1940.

Culla i Clarà, Joan B. *El catalanisme d' Esquerra, 1928-1936*. Barcelona : Curial , 1977.

Cunningham, Valentine. *Spanish Front: Wriers on the Civil War*.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6.

Cusick ( Orr ) , Lois. "The Anarchist Millennium: Memorie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6-1937." Typescript. Hoover Institution.

Dahms, H.Günther. *Der spanische Bürgerkrieg, 1936-1939*. Tubingen : Rainer Wunderlich , 1962.

Dallet, J.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Volunteer to His Wife*. New York : Workers Library , 1938.

Dallin, David J. Russia and Postwar Europe.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43.

———. Soviet Espionage.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55.

———. Soviet Russia' s Foreign Policy, 1939-1942.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55.

Dalton, Hugh. The Fateful Years: Memoirs, 1931-1945. London : Frederick Muller , 1957.

d' Arcangues, Pierre. Le Destin de l' Espagne. Paris : Denoël , 1938.

Dashar, M. [Helmut Ruediger].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Spain. New York : Libertarian Publishing Society , n.d.

Datos complementari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Guerra de liberación, 1936-1939. Madrid : 1945.

Dautun, Yves. Valence sous la Botte Rouge. Paris : Baudinière , 1937.

Davies, Joseph E. Mission to Moscow. New York : Simon and Schuster , 1941.

Deacon, Richard.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Secret Service. New York : Taplinger , 1972.

De Companys a Indalecio Prieto: Documentación sobre las industrias de guerra en Cataluña. Buenos Aires : Servicio de Propaganda España ,

1939.

Decret de collectivitzacions.Barcelona : Condellería d' Economia , 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 1936.

Decret sobre la collectivització i control de la indústria i el comerç a Catalunya.Barcelona : Condellería d' Economia , Catalunya , Industries Grafiques Seix i Barral Germans , 1936.

Degras, Jane.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Vol.III : 1933-1941.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53.

De julio a julio: Un año de lucha.Barcelona : Tierra y Libertad , 1937.

Delaprée, Louis.Le martyre de Madrid, Témoignages inédits.Madrid , 1937.

——.Mort en Espagne.Paris : Tisné , 1937.

Delicado, Manuel.Comóse luchó en Sevilla.Barcelon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7.

Dellacasa, Gianfranco.Revolución y frente popular en España, 1936-1939.Madrid : Zero , 1977.

Delperrie de Bayac, Jacques.Les brigades internationales.Paris : Fayard , 1968.

\*Deltell, Louis.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Denkschrift über die Einmischung des Bolchewismus und der Demokratien in Spanien. Berlin-Leipzig : Nibelungen , 1939.

Deportista, Juan. Los Rojos. Valladolid : Santarén , 1938.

Deriabin, Peter. Watchdogs of Terror. New Rochelle , R.Y. : Arlington House , 1972.

Detwiler, Donald S. Hitler, Franco und Gibraltar. Wiesbaden : Franz Stiner , 1962.

Deutsche kämpfen in Spanien. Darmstadt : Winklers , 1939.

Deutscher, Isaac. The Prophet Outcast: Trotsky, 1929-1940. New York : Random House , 1965.

———.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49.

Deutschland und der spanische Bürgerkrieg, 1936-1939.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1918-1945. Series D., 1937-1945. Vol. III. Baden-Baden : Imprimerie Nationale , 1951.

Dewar, Hugo. Assassins at Large. London : Wingate , 1951.

Dez anos de política externa, 1936-1947: A nação portuguesa e 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Vols. I , II , III. Lisbon : Ministérios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 1962.

Díaz, Carlos. Besteiro: El socialismo en libertad. Prologue by Enrique Tierno Galván. Madrid : Silos , 1976.

Díaz, José. Tres años de lucha. Paris : Globe , 1969.

Díaz de Entresotos, Baldomero. Seis meses de anarquía en Extremadura. Caceres : Editorial Extremadura , 1937.

Díaz del Moral, Juan. Historia de las agitaciones campesinas andaluzas. Madrid : Alianza , 1967.

Díaz del Moral, Juan , and Ortege y Gasset, José. La reforma agrarian y el estatuto catalán. Madrid : Revista de Occidente , 1932.

Díaz de Villegas, General José. Guerra de liberación, 1936-1939. Barcelona : Editorial AHR , 1958.

———.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 Madrid : Europa , 1963.

Díaz Doin, Guillermo. Como llegó Falange al poder. Buenos Aires : Aniceto López , 1940.

———. El pensamiento político de Azaña. Buenos Aires : PHAC , 1943.

———. 236 biografías sintéticas políticas y militares. Buenos Aires : Editorial Mundo Atlántico , 1943.

Díaz-Plaja, Fernando. La historia de España en sus documentos: El siglo XX. Dictadura... república, 1923-1936. Madrid: Instituto de Estudios Políticos, 1964.

———. La historia de España en sus documentos: El siglo XX. La guerra, 1936-1939. Madrid: Faro, 1963.

Dictamen de la comisión sobre ilegitimidad de poderes actuantes en 18 de julio de 1936. Madrid: Editora Nacional, 1939.

19 julio de 1936. FAI-CNT. Barcelona: Oficinas de Propaganda CNT-FAI, [1937?].

Diego, Capitán de. Belchite. Barcelona: Editora Nacional, 1939.

Diego Sevilla, Andrés. Historia política de la zona roja. Madrid: Rialp, 1963.

Diez, Genadius. Spain's Struggle against Anarchism and Communism.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36?].

Diéz de los Ríos San Juan, María Terasa. Documentación sobre la guerra civil en Alicante. Alicante: Instituto Juan Gil-Albert, 1984.

Diggins, John P. Up from Communis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5.

Dimitrov, Georgi. Against Fascism and War: Report before the Seven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delivered on August

2, 1935.Sofia : Sofia Press , 1975.

——.Las lecciones de Almería.Barcelona : Europa-America , 1937.

——.Spain and People' s Front.New York : Workers Library , 1937.

——.Spain' s Year of War.New York : Workers Library , 1937.

——.Two Years of Heroic Struggle of the Spanish People.New York : Workers Library , 1938.

——.The United Front: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and War.New York :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938.

Dingle, Reginald J.Russia' s Work in Spain.London : Spanish Press Services , 1939.

——.Second Thoughts on "Democracy" in Spain.London : Spanish Press Services , 1937.

Dirksen, Herbert von.Moscow, Tokyo, London: Twenty Years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London : Hutchinson , 1951. ( See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Ev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

Documentos.Lo que han visto en Madrid los parlamentarios ingleses.Valencia : Ministerio del Estado , [1937?].

Documentos politicos para la historia de la república española.Vol.I.Mexico City : Colección Málaga , 1945.

Documentos secretos del ministerio de asuntos exteriores de Alemania sobr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Gijón : Júcar , 1978.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Ev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I : November 1937-1938. Vol. II : Dirksen Papers , 1938-1939. Moscow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USSR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 1948.

Documents: De la proclamació de la república al front popular. Barcelona : Disseny , 1977.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1932-1939. See France ,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Document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The Formative Years, 1930-1940. New York : Pathfinder Press , 1973.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See Great Britain , Foreign Office.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Se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 and Great Britain , Foreign Office.

Dodd, William E. Ambassador Dodd' s Diary, 1933-1938. New York : Harcourt Brace , 1941.

Dolgoff, Sam. La anarquía según Bakunin. Barcelona : Tusquets , 1977.



———, ed.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New York : Free Life Editions , 1974.

Domènec de Bellmunt. *Lluís Companys*. Toulouse : Foc Nou , 1945.

Domingo, Marcelino. *España ante el mundo*. Mexico City : Mexico Nuevo , 1937.

Domínguez, Edmundo. *Los vencedores de Negrín*. Mexico City : Nuestro Pueblo , 1940.

Dommanget, Maurice. *Histoire du premier mai*. Paris : Tête de feuilles , 1972.

Donaldson, Frances. *Edward VIII*. Philadelphia : Lippincott , 1975.

Dos Passos, John. *The Theme Is Freedom*. New York : Dodd , Mead , 1956.

Douglas, Roy. *In the Year of Munich*. London : Macmillan , 1977.

Drachkovitch, Milorad M. See Also Lazitch, Branko.

———, ed. *Fifty Years of Communism in Russia*. Hoover Institution Publications. University Park :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1967.

*Le drame du pays basque*. Paris : SGIE , 1937.

Dreifort, John E. *Yvon Delbos at the Quai d' Orsay: French*

ForeignPolicy during the Popular Front, 1936-1938. Wichita :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 1973.

Duff, Charles. A Key to Victory: Spain. London : Gollancz , 1940.

Dulles, John W.F. Brazilian Communism, 1935-1945. Austin :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1983.

Dupré, Henri. La "Légion Tricolore" en Espagne, 1936-1939. Paris :  
Ligue Française ( Mouvement social européen ) , 1942.

Duque, José. "Informe de José Duque, Secretario General de la  
Comisión Agraria al Comité Central del P.C. 17-VIII-37."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 Salamanca , Leg. 616/816-6.

\*———. "La situación de Aragón al comienzo de la  
guerr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given to Burnett Bolloten by José  
Duque.

Durán, Gustavo. Una enseñanza de la guerra española. Madrid : Júcar ,  
1980.

Duval, Général. Les espagnols et la guerre d' Espagne. Paris : Plon ,  
1939.

———. Les leçons de la guerre d' Espagne. Paris : Plon , 1938.

Dzelepy, E.N. The Spanish Plot. London : King , 1937.

East European Fund. Program on the USSR. Soviet Shipping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1954. Mimeographed Series of the East European Fund, No. 59.

Eby, Cecil. Between the Bullet and the Lie: American Volunteer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1969.

———. The Siege of the Alcáz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5.

Echeandia, José. La persecución roja en el país vasco. Barcelona: Fidel Rodríguez, 1940.

Echverría, Federico de. Spain in Flames. London: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1936?].

Echverría, Tomás. Cómo se prepare el alzamiento: El General Mola y los carlistas. Madrid: Gráf. Letra, 1985.

Lesécrivains et la guerre d' Espagne. Paris: Pantheon, 1973.

Eden, Anthony (Lord Avon). Facing the Dictators. London: Cassell, 1962.

———. The Reckon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Edwards, Jill.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Macmillan, 1979.

L' Effort cultural du peuple espagnol en armes. Paris: Ministère de

l' Instruction Publique de la République Espagnole , 1937.

Egorov, P.Ia.Marshal Meretskov.Moscow : Voennoe Izd , 1974.

Eguía Ruiz, Constancio.Los causantes de la tragedia hispana.Buenos Aires : Difusión , 1938.

Ehrenburg, Ilya.Corresponsal en España.Buenos Aires : Tiempo Contemporáneo , 1968.

——.España república de trabajadores.Madrid : Júcar , 1976.

——.Estampas de España.Buenos Aires : Problemas de España , 1938.

——.Eve of War, 1933-1941.London : Macgibbon , 1963.

——.No Pasarán.London : Malik-Verlag , 1937.

Un ejército popular y democrático al servicio del pueblo.Barcelona : Ministerio de Defensa Nacional , [1938?].

Elstob, Peter.Spanish Prisoner.London : Macmillan , 1939.

Elwyn Jones, F.The Battle for Peace.London : Gollancz , 1938.

Emiliani, Angelo.La aviación legionaria: España, 1936-1939.Madrid : San Martín , 1974.

Encinas, Joaquín de.La tradición española y la revolución.Madrid : Rialp , 1958.

Enríquez de Salamanca, Jesús. La vida en el Alcázar de Toledo. Valladolid : Santarén , 1937.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El corto verano de la anarquía: Vida y muerte de Durruti. Barcelona : Grijalbo , 1977.

Un episode de la lutte fratricide. Paris : Archives Espagnoles , 1938.

Epistolario, Prieto y Negrín. Paris : Imprimerie Nouvelle , 1939.

Epopée d' Espagne: Brigades internationales, 1936-1939. Paris : L' Amicale des Anciens Volontaires français en Espagne Républicaine : Paris , 1957.

La epopeya de Africa 17 de julio. Ceuta-Tetuán : Imprenta Africa , 1938.

Erickson, John. The Soviet High Command: A military-Political History, 1918-1941. New York : St. Martin' s , 1962.

Escofet, Federico. Al servei de Catalunya i de la república: La victòria, 19 de juliol 1936. Paris : Edicions Catalanes , 1973.

———. De una derrota a una Victoria: 6 de octubre de 1934-19 de Julio de 1936. Barcelona : Argos Vergara , 1984.

\*Escribano, Antonio.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Esenwein, George. "Anarchist Ideology and the Working-Class

Movement in Spain (1889-1900)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Ideas of Ricardo Mella." Dissertation , University of London , 1987. ( Copy in Hoover Institution. )

España, Daniel.Carceles Rojos.Madrid : Victoriano Suárez , 1939.

España, su lucha y sus ideales: Documentos de Ossorio y Gallardo, Federica Montseny, Juan P.Fábrega, F.MartíIbañez, García Oliver, H.Noja Ruiz.Buenos Aires : Acento , 1937.

Esperabéde Arteaga, Enrique.La guerra de reconquista española y el criminal comunismo.Madrid : San Martín , 1940.

Espin, Eduardo.Azaña en el poder: El partido de Acción Republicana.Madrid :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ológicas , 1980.

Espinar, Jaime.Noviembre de Madrid.Barcelona : UnióGráfico , 1938.

Espinosa y del Rió, JoséMaría.La Agonía de la dictadura rojo-separatists en Vizcaya.San Sebastián : Editorial Española , 1938.

"Es spricht der Führer." 7 exemplarische Hitler-Reden.Gütersloh : Sigbert Mohn , 1966.

Estado Mayor Central del Ejército.Historia de la guerra de liberación, 1936-1939.Vol.I.Madrid : Servicio Histórico Militar , 1945.

Estampas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19 de Julio de 1936. Barcelona : Oficinas de Propaganda CNT-FAI , [1936?].

L' Estatut de Catalunya. Text oficial comentat , amb referències legals i notes de la discussió parlamentària. Per C. Massó i Escofet i R. Gay de Montellà. Barcelona : Llibreria Bosch , 1933.

Estatutos de la federación nacional de campesinos. Valencia : n.p. , 1937.

Esteban-Infantes, General Emilio. General Sanjurjo. Barcelona : AHR , 1957.

Estornés Lasa, José. Un gudari en los frentes de Euzkadi, Asturias y Calaluña. San Sebastián : Auñamendi , 1979.

Estruch, Joan. Historia del PCE, 1920-1939. Vol. I. Barcelona : Iniciativas , 1978.

Etchebéhère, Mika. Ma guerre d' Espagne à moi : Une femme à la tête d' une colonne de combat. Paris : Denoël , 1976.

Eudin, Xenia J. , and Slusser, Robert M.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28-1934: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Vol. II. University Park :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1967.

Les événements survenus en France de 1933 à 1945: Temoignages et documents recueillis par la Commission d' enquête

parlementaire.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n.d.

Evidence of Recent Breaches by Germany and Italy of the Non-Intervention Agreement.London : King , 1937.

El exilio español en Mexico, 1939-1982.Mexico City :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 1982.

Exposición del plan secreto para establecer un "Soviet" en España.Bilbao : Editora Nacional , 1939.

Exposure of the Secret Plan to Establish a Soviet in Spain.London : Friends of National Spain , n.d.

Fabbri, Luis.¿Quéés la anarquía? Toulouse : Tiempos Nuevos , n.d.

——.Vida y pensamiento de Malatesta.Bacelona : Tierra y Libertad , 1938.

Fàbregas, Joan P.Los factores económicos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Barcelona : Oficinas de Propaganda CNT-FAI , 1937.

——.Els factors económica de la revolució.Barcelona : Bosch , 1937.

——.Les finances de la revolució.Barcelona : Bosch , 1937.

——.Vuitanta dies al govern de la Generalitat.Barcelona : Bosch , 1937.



Fagen, Patricia W. Exiles and Citizens: Spanish Republicans in Mexico. Austin: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3.

Falcón, César. Madrid. Madrid: Nuestro Pueblo, 1938.

Falsifiers of History.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48.

Febrés, Xavier. Frederic Escofet: L'últim exiliat. Barcelona: Pòrtic, 1979.

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Informe, Comité Peninsular de la FAI, Sept. 1938."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CNT-FAI Archives, Paquete 92, Caja 305, B, pp. 7-8.

———. Memoria del peninsular de regionales celebrado en Valencia los días 4, 5, 6 y 7 de Julio, 1937. Valencia: FAI, 1937.

———. Memoria del pleno regional de grupos anarquistas de Levante celebrado en Alicante, durante los días 11, 12, 13, 14 y 15 del mes de abril de 1937. Valencia: Nosotros, 1937.

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Trabajadores de la Enseñanza. Les professionnels de l'enseignement luttent pour la libération du peuple espagnol. [Paris?]: FETE, [1937?].

Federación Regional de Grupos Anarquistas de Cataluña. Actas del

pleno regional de grupos celebrado los días 1 , 2 y 3 del mes de Julio de 1937.Barcelons : 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 1937.

Feiling, Keith.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London : Macmillan , 1946.

Felipe, Leon.Poesía Revolucionaria.Barcelona : CNT-FAI , 1937.

Fernández, Carlos.Paracuellos del Jarama:¿Carrillo culpable? Barcelona : Vergara , 1983.

Fernández Almagro, Melchor.Catalanismo y república española.Madrid : Espasacalpe , 1932.

——.Historia de la república española, 1931-1936.Madrid : Editorial Biblioteca Nueva , 1940.

Fernández Arias, Adelardo.La agonía de Madrid.Zaragoza : Librería General , 1938.

——.Gil Robles.¡La esperanza de España!.Madrid : Comentarios del Momento , 1936.

——.Madrid bajo el terror.Zaragoza : Librería General , 1937.

\*Fernández Ballesteros, Alberto.Reports to the General Commissariat of War , dated 18 Feb.and 12 Mar.1937.Typewritten copies of original documents loaned to Burnett Bolloten by Gabriel

García Maroto , subcommissar general of propaganda.

Fernández de Castro y Pedrera, Rafael.Hacia las rutas de una nueva España.Melilla : Artes Gráficas Postal Exprés , 1940.

——.Vidas de soldados ilustres de la nueva España: Franco, Mola, Varela.Melilla : Artes Gráficas Postal Exprés , 1937.

Fernández García, Eusebio.Marxismo y positivismo en el socialismo español.Madrid : Centro de Estudios Constitucionales , 1981.

Fernández Grandizo, Manuel.See Munis G.

Fernández Santander, Carlos.El alzamiento de 1936 en Galicia.Coruña : Castro , 1983.

Fernsworth, Lawrence A.Back of the Spanish Rebellion.Washington , D.C. , [1936?].

——.Spain' s Struggle for Freedom.Boston : Beacon Press , 1957.

Ferrándiz Alborz, F.La bestia contra España.Montevideo : n.p. , 1951.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Paris : Federación Nacional de Juventudes Socialistas de España en exilio , 1949.

Ferrara, Marcella and Ferrara, Maurizio.Conversando con

Togliatti. Rome : Edizioni de Coltúra Sociale , 1954.

Ferrer, Rai ( Raimundo ) .Durruti, 1896-1936.Barcelona : Planeta , 1985.

Figuro, Javier.Memoria de una locura: Crónica testimonial de una gran tragedia española.Barcelona : Planeta , 1986.

Finalidad de la CNT.El comunismo libertario.Barcelona : Tierra y Libertad , 1936.

La finance internationale et la guerre d' Espagne.Paris : Centre d' Etudes de Paix et Democratie , 1938.

Financ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Spanish Government and Great Britain.London : Friends of Spain , 1937.

Fischer, Louis.Men and Politics.London : Cape , 1941.Some material omitted from U.S.edition

——.Men and Politics.New York : Duell , Sloan and Pierce , 1941.

——.Russia' s Road from Peace to War: Soviet Foreign Relations, 1917-1941.New York : Harper , 1969.

——.The War in Spain.New York : The Nation , 1937.

——.Why Spain Fights On.London :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 , 1938.

Fischer, Markoosha. My Lives in Russia. New York : Harper And Bros. , 1944.

Fontana, JoséMaría. Los catalanes en la guerra de España. Madrid : Samarán , 1951.

Fonteriz, Luis de. Red Terror in Madrid. London : Longmans , Green , 1937.

Foreign Journalists under Franco' s Terror. London : United Editorial , [1937?].

Foxá, Agustín de. Madrid de corte a cheka. San Sebastián :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 1938.

Franc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1932-1939. 2e Série ( 1936-1939 ) .Tomes VIII and IX. Paris : Imprimerie nationale , 1973.

———. The French Yellow Book, 1938-1939. London : Hutchinson , 1940.

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 1869-1946. Toulouse : Ediciones El Socialista , 1947.

Franco Bahamonde, Francisco. Palabras del Caudillo. Madrid : Editora Nacional , 1943.

Franco in Barcelona. London : United Editorial , 1939.

Frank, Willard C. , Jr. "Sea Power, Politics, and the Onset of the Spanish War, 1936." Dissertation ,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 1969.

Fraser, Hamish.De las brigades internacionales a los sindicatos católicos.Madrid : Editora Nacional , 1957.

Fraser, Ronald.Blood of Spain.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 1979.

Freemasons and Spain.New York : North American Committee to Aid Spanish Democracy , [1937?].

Der Freiheitskampf des spanischen Volkes und die internationale Solidarität.Berlin : Dietz , 1956.

Friends of Democracy and Independence in Spain.Italians in Spain.London : Friends of Democracy and Independence in Spain , 1937.

Friends of Spanish Democracy.Spain.New York : American Spanish News Service , 1936.

Frutos, Víctor de.Los que NO perdieron la guerra.Buenos Aires : Oberon , 1967.

Fuchser, Larry William.Neville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New York : Norton , 1982.

Fuentes Mares, José.Historia de un conflicto: El tesoro del "Vita" .Madrid : CVS , 1975.

Führung, Hellmut H. Wir funken für Franco. Gütersloh : Bertelsmann , 1939.

Fuller, J.F.C. The Conquest of Red Spain. London :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 1937.

Fundación Pablo Iglesias. Catálogo de publicaciones periódicas, 1984. Madrid : Editorial Pablo Iglesias , 1984.

Fusi Aizpurua, Juan Pablo. El problema vasco en la II república. Madrid : Turner , 1979.

Fyrth, Jim. The Signal Was Spain: The Spain Aid Movement in Britain, 1936-1939. London : Lawrence and Wishart , 1986.

Gabriel, José. La vida y la muerte en Aragón. Buenos Aires : Imán , 1938.

Galán, José María. Cuestiones varias del Carrillismo. Madrid : Futuro , 1976.

Galassi, Jonathan , ed. Understand the Weapon, Understand the Wound: Selected Writings of John Cornford. Manchester , England : Carcanet New Press , 1976.

\* Galíndez, Jesús de.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Los vascos en el Madrid sitiado. Buenos Aires : Vasca Ekin ,

1945.

Galíndo Herrero, Santiago. Los partido monárquicos bajo la segunda república. Madrid : Rialp , 1956.

Gallego, Ignacio. El problema campesino en Andalucía. Valencia : JSU , 1937.

Gamelin, Général Maurice Gustave. Servir. 3 vols. Paris : Plon , 1946-1947.

Gamir Ulibarri, General Manuel. La pérdida de Barcelona. Paris : Imprimerie Moderne , 1939.

Gannes, Harry. How the Soviet Union Helps Spain. New York : Workers Library , 1936.

——. Soviets in Spain. New York : Workers Library , 1935.

Gannes, Harry , and Reppard, T. Spain in Revolt. London : Gollancz , 1936.

Gannon, Franklin Reid. The British Press and Germany, 1936-1939. Oxford : Clarendon , 1971.

Gantenbein, James W. Documentary Background of World War II, 1931-1941. New York : Farrar , Straus , 1975.

Garcerán, Rafael. Falange desde febrero de 1936 al gobierno



nacional.n.p. : Secretaría General de la F.E. , 1938.

Garcés Arroyo, Santiago. Photocopies of letters to D. Pastor Petit.

García, Angel. La iglesia española y el 18 de julio. Barcelona : Acervo , 1977.

García, Félix. Colectivizaciones campesinas y obreras en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Madrid : Zero , 1977.

García, Regina. Yo he sido marxista: El cómo y el porqué de una conversión. 2d. ed. Madrid : Editora Nacional , 1952.

García, Víctor. El pensamiento anarquista. Toulouse : CENIT , 1963.

García de Bartolomé, Santiago , and Rull, Alberto. Republicanos: 50 años después. Caracas : Ateneo de Caracas , 1986.

García Durán, J. Fuentes d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y bibliografía. Barcelona : Crítica , 1985.

García Escudero, José María. Historia política de las dos Españas. Vols. I , II , III , IV. Madrid : Nacional , 1976.

García Lacalle. Mitos y verdades: La aviación de caza en la guerra española. Mexico City : Oasis , 1973.

\* García Maroto, Gabriel. Interview ,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Un jefe eiército popular: Teniente Coronel Joaquín Pérez Salas.Pozoblanco : Colectiva Linares , 1937.

García Mercadal, J.Aire, tierra y mar.Vols.I , II.Zaragoza : Colección Hispanis , 1938 , 1939.

García Morato, Joaquín.Guerra en el aire.Madrid : Editora Nacional , 1940.

García-Nieto, María Carmen , and Donezar, Javier M.La guerra de España, 1936-1939.Madrid : Guadiana de Publicaciones , 1975.

——.La segunda república: Política burguesa y movimiento obrero, 1931-1936.Madrid : Guadiana de Publicaciones , 1974.

García Oliver, Juan.El eco de los pasos.Paris : Ruedo Ibérico , 1978.

——.El fascismo internacional y la guerra antifascista española.Barcelona : CNT-FAI , 1937.

García Pradas, José.Antifascismo proletario.Madrid : Frente Libertario , n.d.

——.Como terminóla guerra de España.Buenos Aires : Inmán , 1940.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Origen, esencia y fin de la sociedad de clases.Rennes : Libertad , 1948.

——.Rusia y España.Paris : Tierra y Libertad , 1948.

——.¡Teníamos que Perder! Madrid : Toro , 1974.

——.La traición de Stalin.New York : Cultura Proletaria , 1939.

——.Tres epístolas a Horacio.Algiers : Ediciones Libertarias Africa del Norte , 1946.

García Sánchez, Antonio.La segunda república en Málaga: La cuestión religiosa, 1931-1933.Córdoba : Ayuntamiento de Córdoba , 1984.

\* García Val, Alejandro.Interview ,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García-Valiño y Marcen, Lieutenant General.Guerra de liberación española.Madrid : Bosca , 1949.

García Venero, Maximiano.El General Fanjul: Madrid en el alzamiento nacional.Madrid : Ediciones Cid , 1967.

——.Historia de las internacionales en España.Vol.II : 1914-1946 ; Vol.III : 1936-1939.Madrid : Ediciones del Movimiento , 1957.

——.Historia del nacionalismo catalán.Vol.I , II.Madrid : Editora Nacional , 1967.

——.Historia del nacionalismo vasco.Madrid : Editora Nacional , 1969.

——.Madrid: Julio 1936.Madrid : Tebas , 1973.

Garibaldini in Ispagna.Madrid : n.p. , 1937.

Garrachón Cuesta, Antonio.De Africa a Cádiz y de Cádiz a la España Imperial.Cádiz : Establecimientos Cerón , 1938.

Garratt, G.T.Gibraltar and the Mediterranean.London : Cape , 1939.

——.Mussolini' s Roman Empire.Harmondsworth , England : Penguin , 1938.

Garrido González, Luis.Colectividades agrarias en Andalucía Jaén, 1931-1939.Madrid : Siglo XXI , 1979.

Garriga, Ramón.El general Juan Yagüe: Figura clave para conocer nuestra historia.Barcelona : Planeta , 1985.

——.La Legión Condor.Madrid : Toro , 1975.

Garsia, Khose.Ispaniia narodnogo fronta.Moscow : Akademiia Naul SSSR , 1957.

Gates, John.The Story of an American Communist.New York : Thomas Nelson , 1958.

\*——.Twelve-page inpublished commentary on Verle B.Johnston' s manuscript ,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 1936-1939."

Gaule, Jacques de. La batalla del Ebro. Madrid : Círculo de Amigos de la Historia , 1973.

———. La batalla de Madrid, 1936-1937. Vols. I , II. Madrid : Círculo de Amigos de la Historia , 1972.

———. El frente de Aragón. Madrid : Círculo de Amigos de la Historia , 1973.

———. Hacia el final. Madrid : Círculo de Amigos de la Historia , 1973.

———. La política española y la guerra civil. Vols. I , II. Madrid : Círculo de Amigos de la Historia , 1973 , 1974.

Geiser, Carl. Prisoners of the Good Fight: Americans against Franco and Fascism.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New York : Veterans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 1986.

Gellhorn, Martha. The Face of War. London : Hart-Davis , 1959.

Gemelli, Augustín Fr. España e Italia en la defensa de la civilización cristiana contra el bolshevismo. Avila : Imprenta Católica , 1938.

Generalidad de Cataluña. Actas de Reuniones del Consejo de la Generalidad, 3 Nov.-23 Dec. 1936. Servicio Histórico Militar. Archivo de la Guerra de Liberación. Sección II. Leg. 556 , Apartado II , Carpeta 3. Photocopies in Hoover Institution , Bolloten Collection.

Generalnyi Shtab RKKA.Upravlenie voiskami i rabota shtabov v ispanskoirespublikanskoi armii.Moscow : Gosudarstvennoe Voennoe Izdateistov Narkomata Oborony Soiuza SSR , 1939.

George, Margaret.The Warped Visi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33-1939.Pittsburgh :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1965.

Gerahty, Cecil.The Road to Madrid.London : Hutchinson , 1937.

Gerahty, Cecil , and Foss, William.The Spanish Arena.London : Gifford , 1938.

Gerassi, John.The Premature Antifascists: North American Volunteer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New York : Praeger , 1986.

Geraud, André ( Pertinax ) .The Gravediggers of France.Garden City : Doubleday Doran , 1944.

Gerhard i Hortet, Carles.Comissari de la Generalitat a Montserrat, 1936-1939.Montserrat : Abadia de Montserrat , 1982.

Germany.Auswaertiges Amt.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London : HMSO , 1951.

Germán Zubero, Luis.Aragón en la II República: Estructura económica y comportamiento político.Zaragoza : Institución Fernando el Católico , 1984.

Gibson, Ian. La noche en que mataron a Calvo Sotelo. Barcelona : Argos Vergara , 1982.

———. Paracuellos: Como fue. Barcelona : Vergara , 1983.

———. Queipo de Llano: Sevilla, verano de 1936. Barcelona : Grijalbo , 1986.

———. La represión nacionalista de Granada en 1936 y la muerte de Federico García Lorca. Paris : Ruedo Ibérico , 1971.

Gilabert, A.G. Durruti, un anarquista íntegro. Barcelona :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 n.d.

Gilbert, Martin.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ars. Bungay , England : Longmans , 1964.

———. The Roots of Appeasement. London :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1966.

———, ed. A Century of Conflict, 1850-1950: Essays for A.J.P. Taylor. London : Hamilton , 1966.

Gilbert, Martin , and Gott, Richard. The Appeasers. Boston : Houghton Mifflin , 1963.

Gillain, Nick. Le Mercenaire. Paris : Fayard , 1938.

Gil Robles, José María. Discursos Parlamentarios. Madrid : Taurus ,

1971.

——.No fué posible la paz.Barcelona : Ariel , 1968.

——.Spain in Chains.New York : America Press , 1937.

Gil Robles, JoséMaría , and Pérez-Serrano, Nicolás.Diccionario de terminus electorales y parliamentarios.Madrid : Taurus , 1977.

Giménez Arnau, J.A. , and Giménez Arnau, R.La guerra en el mar.Zaragoza : Heraldo de Aragón , 1938.

Giménez Caballero, Ernesto.Camisa azul y boina colorada.Madrid : Los Combatientes , 1939.

——.España y Franco.Cegama : Los Combatientes , 1938.

——.Genio de España.Barcelona : FE , 1939.

——.¡Hay Pirineos!.Barcelona : Editora Nacional , 1939.

——.Madrid Nuestro.Madrid : Educación Popular , 1944.

——.Manuel Azaña.Madrid : Turner , 1975.

——.Los secretos de la Falange.Barcelona : Yunque , 1939.

Giner,Vicente , ed.Historia de la segunda república, 1931-1939.Vols.I , II , III , IV , V.Madrid : Giner , 1985.



\* Giral, José.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Giral, o una historia de sangre. Spain: Ediciones Combate, n.d.

Girona. Ayuntamiento. La guerra civil a les comarques gironines, 1936-1939. Girona: Cercle d'Estudis Històrica i Socials de Girona, 1986.

Girona i Albuxec, Albert. Guerra i revolució al país Valencià. Valencia: Biblioteca d'Estudis i Investigacions, 1986.

Gisclon, Jean. La désillusion: Espagne 1936. Paris: France-Empire, 1986.

Gitlow, Benjamin. The Whole of Their Lives.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1948.

El gobierno del frente popular abre a los trabajadores las puertas de la cultura superior. Sabadell: Ministerio de Instrucción Pública, 1937.

Godden, G.M. Communism on Spain. New York: America Press, 1937.

———. Conflict in Spain<sup>6</sup>. London: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1937.

Godé, Antonio. Asedio de Huesca, 18 julio 1936, 25 marzo 1938. Huesca: Ayuntamiento, [1938?].

Goded, Manuel. Un "faccioso" cien por cien. Saragossa: Heraldo, 1939.

Goldman, Emma. *Nowhere at Home: Letters from Exile of Emma Goldman and Alexander Berkman*. Edited by Richard and Anna Drinnon. New York : Schocken Books , 1975.

———. *Red Emma Speaks: Se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Edited and compiled by Alix Kates Shulman. New York : Vintage Books , 1972.

———. *Vision on Fire: Emma Goldman o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Edited by David Porter , New Paltz , NY : Commonground Press , 1983.

Gollonet, Angel , and Morales, José. *Málaga: Sangre y fuego*. Granada : Imperio , 1937.

Gomáy Tamás, Isidro. *La España heroica*. Pamplona : Bescansa , 1937.

———. *Pastorale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 Madrid : Rialp , 1955.

Gómez, Sócrates. *Los jóvenes socialistas y la JSU*. Madrid : Rivadeneyra , n.d.

Gómez Acebo, Juan. *La vida en las cárceles de Euzkadi*. Zarauz : Icharopena , 1938.

Gómez Aparicio, Pedro. *A Bilbao!* Granada : Imperio , 1937.

Gómez Bajuelo, Gil. *Málaga bajo el dominio rojo*. Cadiz : Cerón , 1937.

Gómez Casas, Juan. *Los anarquistas en el gobierno*. Barcelona : Bruguera , 1977.

——.Historia de la FAI.Madrid : Zero , 1977.

——.Historia del anarcosindicalismo español.Madrid : ZYX , 1969.

Gómez Málaga, Juan.Estampas trágicas de Madrid.Avila : Senén  
Martín , n.d.

Gómez Oliveros, Major Benito , in collaboration with Lieutenant  
General JoséMoscardó.General Moscardó: Sin novedad en el  
Alcázar.Barcelona : AHR , 1956.

Gómez Ortiz, Juan María.Los gobiernos republicanos:España, 1936-  
1939.Barcelona : Bruguera , 1977.

González, Ceferino.La rebellion militaire en Espagne et  
l' incompréhension des démocraties européennes devant un aussi  
grave problème.Bruxelles : Imp.Coop.Lucifer , [1936?].

González, Valentín.See El Campesino.

González Casanova, JoséAntonio.Federalismo y autonomía: Cataluña y  
el estado español, 1868-1938.Barcelona : Grijalbo , 1979.

González Echegaray, R.La marina mercante y el tráfico maritime en  
la guerra civil.Madrid : San Martín , 1977.

González Gómez, Joaquín.Publicaciones periódicas de la guerra  
civil, 1936-1939, en la zona republicana, existents en la

Hemeroteca Nacional.Madrid : Hemeroteca Nacional , 1986.

González Inestal, Miguel.Cipriano Mera,revolucionario.Havana :  
Atalaya , 1943.

\*González Quintana, Antonio.Report to Burnett Bolloten on Largo  
Caballero' s Mis Recuerdos and "Notas Históricas sobre la guerra  
cicil." File includes Bolloten' s correspondence with Aurelio  
Martín , Justo Martínez Amutio , Leonor Menéndez de Beltrán , and Angel  
Viñas regarding these two works.

Gorkin, Julián[Julián Gómez].El asesinato de Trotsky.Barcelona :  
Aymá , 1971.

——.L' assassinat de Trotsky.Paris : Julliard , 1970.

——.Caníbales políticos.Mexico City : Quetzal , 1941.

——.Les communistes contre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Paris : Belfond ,  
1970.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Two files.

——.España: Primer ensayo de democracia popular.Buenos Aires :  
Libertad de la Cultura , 1970.

——.El proceso de Moscúen Barcelona.Barcelona : Aymá , 1974.

——.El revolucionario profesional.Barcelond : Aymá , 1975.

———. "We Conquer or Die" : Two Speeches Which Sir John Simon Tried to Stop. London :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 [1936?].

Gorman, Robert A. ,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rxism. Westport : Greenwood Press , 1986.

Gorozhankina, N. Rabochii klass Ispanii v gody revolutsii. Moscow : Gos. Sotsial' no- Ekonomicheskoe Izdat , 1936.

Gracia, Padre Vicente, S.J. Aragón, baluarte de España. Saragossa : El Noticiero , 1938.

Graham, Helen , and Preston, Paul , eds. The Popular Front in Europe. Houndmills , Basingstoke : Macmillan , 1987.

Grandi, Blasco. Togliatti y los suyos en España. Madrid : Publicaciones Españolas , 1954.

Granja Sainz, José Luis de la. Nacionalismo y II república en el país vasco. Madrid : Siglo Veintiuno , 1986.

Grant, Ted. 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1-1937. London : Militant , 1977.

Great British , Cabinet Office. Minutes, 1916-1939. Cab. 23. Microfilm n.s. 173. Green Library , Stanford University.

———. Foreign Office.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cond Series XVII , XVIII , XIX. Third Series I , II , III ,

VI.London : HMSO , 1946 ( Third Series ) , 1979 , 1980 , 1982 ( Second Series ) .

——.Foreign Office.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Vol.I.London : HMSO , 1949.

——.Parliament.House of Commons.Report on the Visit by an All Party Group of Members of Parliament to Spain.London : Press Dept.of the Spanish Embassy , [1937?].

Greaves, H.R.G.The Truth about Spain.London : Gollancz , 1938.

Greenwall, Harry J.Mediterranean Crisis.London : Nicholson and Watson , 1939.

Gregory, Walter.The Shallow Grave: A Memoir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London : Gollancz , 1986.

Griffiths, Richard.Fellow Travellers of the Right: British Enthusiasts for NaziGermany, 1933-1939.London : Constable , 1980.

Grimau, Carmen.El cartel republicano en la guerra civil.Madrid : Cátedra , 1979.

Grisoni, Dominique , and Hertzog, Gilles.Les brigades de la mer.Paris : Grasset , 1979.

Gromyko, A.A. , et al.Soviet Peace Efforts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II. Moscow : Progress , 1973.

Gros, José. Abriendo Camino: Relatos de un guerrillero comunista español. Prólogo de Dolores Ibárruri. Paris : Globe , 1971.

Guadalajara. Madrid : Comisariado General de Guerra ( Inspección Centro ) Comisión de Propaganda , 1937.

Guardia Abella, Isidro. Conversaciones sobre el movimiento obrero: Entrevistas con militantes de la CNT. Madrid : La Piqueta , 1978.

Guarner, Vicente. L' aixecament military i la guerra civil a Catalunya, 1936-1939. Montserrat : Toro , 1975.

———. Las reformas militares de la república española. Mexico City : España Nueva , 1947.

Guérin, Daniel. L' anarchisme: De la doctrine à l' action. Paris : Gallimard , 1965.

———. Front populaire: Révolution manquée, Témoignage militant. Paris : Masoero , 1970.

———. Ni dieu ni maître: Anthologie historique de mouvement anarchiste. Paris : Delphes , [1967?].

Guerney, Jason. Crusade in Spain. London : Faber , 1974.

Guernica. London : Eyre and Spottiswoode , 1938.

La guerr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Historia de la guerra.Vol.III.Zaragoza : Universidad de Zaragoza , 1961.

Guerra y revolución en España, 1936-1939.Vols.I , II , III , IV.Moscow : Progreso , 1967 , 1966 , 1971 , 1977.

Guillén, Abraham.El error military de las "izquierdas" .Barcelona : Colectivo , 1980.

——.Historia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Buenos Aires : Coyoacan , 1961.

Guinea, JoséLuis.Los movimientos obreros y sindicales en España de 1833 a 1978.Madrid : Debate Libertario , 1978.

Guixé, Juan.Le vrai visage de la république espagnole.Paris : Cooperative Étoile , 1938.

Gustavo, Soledad.El sindicalismo y la anarquía: Política y sociología.Paris : Tierra y Libertad , 1945.

Gutiérrez Molina, JoséLuis.Colectividades libertarias en Castilla.Madrid : Debate Libertario , 1977.

Gutiérrez-Ravé, José.Las cortes errantes del frente popular.Madrid : Editora Nacional , 1953.

——.JoséGil Robles, caudillo frustrado.Madrid : Luyve , 1967.



Guttman, Allen. *The Wound in the Heart: America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 Free Press of Glencoe , 1962.

Guzmán, Eduardo de. *El año de la Victoria*. Madrid : Toro , 1974.

———. *Madrid, rojo y negro*. Barcelona : Tierra y Libertad , 1938.

———. *La muerte de la esperanza*. Madrid : Toro , 1973.

———. *Nosotros, los asesunos*. Madrid : Toro , 1976.

———. *La segunda república fue así*. Barcelona : Planeta , 1977.

Guzmán de Alfarache, J. *¡18 de julio! Historia del alzamiento glorioso de Sevilla*. Seville : F.E. , 1937.

Györkei, Jenő. *Legenda, valóság, tragédia: A nemzetközibrigádok történetéből*. Budapest : Zrinyi-Militärverlag , 1986.

*Hacia una nueva revolución*. Barcelona : Agrupación Amigos de Durruti , [1937]. See Balius, Jaime , *Towards a Fresh Revolution* ( translation of *Hacia una nueva revolución* ) , and "Los Amigos de Durruti."

*Hacia un mundo Nuevo: Teoría y práctica del anarcosindicalismo*. Valparaiso : Gutenberg , 1938.

Hager, Kurt. See Albin, Felix.

Haldane, Charlotte. *The Truth Will out*. London : Right Book Club , 1949.

Halifax, Lord. *Fullness of Days*. New York : Dodd , Mead , 1957.

Hamilton, Ian. *Koestker: A Biography*. London : Secker and Warburg , 1982.

Hammond, Thomas T. , ed. *The Anatomy of Communist Takeovers*.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71.

Hanighen, Frank , ed. *Nothing But Danger: Thrilling Adventures of Ten Newspaper Correspondent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 McBride , 1939.

Hargrave, John. *Montagu Norman*. New York : Greystone , 1942.

Harvey, John , ed. *The Diplomatic Diaries of Oliver Harvey, 1937-1940*. New York : St. Martin' s , 1971.

Hayes, Paul. *The Twentieth Century, 1880-1939: Moder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 St. Martin' s , 1978.

Heine, Hartmut. *La oposición política al franquismo de 1939 a 1952*. Barcelona : Grijalbo , 1983.

Held, Walter. *Die spanische Revolution*. Paris : Jean Mekhler , [1938?].

Hellman, Lillian. *Three*. Boston : Little , Brown , 1979.

———.An Unfinished Woman: A Memoir.Boston : Little , Brown , 1969.

Hemingway, Ernest.By-Line: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Articles and Dispatches of Four Decades.New York : Scribner' s Sons , 1967.

———.The Fifth Columa and Four Stories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New York : Scribner' s Sons , 1969.

Henderson, Sir Nevile.Failure of a Mission.London : Hodder and Stoughton , 1940.

Henríquez Caubín, Julián.La Batalla del Ebro.Mexico City : Unda y García , 1944.

Hericourt, Pierre.Arms for Red Apain.London :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 [1937?].

———.Pourquoi Franco a vaincu.Paris : Baudinière , 1939.

———.Pourquoi Franco vaincra.Paris : Baudinière , 1936.

Hermet, Guy.Los comunistas en España.Paris : Ruedo Ibérico , 1972.

Hernández, Jesús.A los intelectuales de España.Valenci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Comisión Nacional de Agit-Prop , 1937.

———.¡Atrás los invasores! Barcelon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8.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En el país de la gran mentira.Madrid : Toro , 1974.

——.Negro y rojo: Los anarquistas en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Mexico City : La España Contemporánea , 1946.

——.El orgullo de sentirnos españoles.Barcelona : S.G.de Publicaciones , [1938?].

——.El partido comunista antes, durante y después de la crisis del gobierno Largo Caballero.Valenci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7.

——.Todo dentro del frente popular.[Valenci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Comisión Nacional de Agit-Prop , 1937.

——.Yo fui un ministro de Stalin.Mexico City : Editorial America , 1953.

Hernández García, Antonio.La represión en La Rioja durante la guerra civil.Vols.I , II , III.Logroño : Calahorra , 1984.

Hernández Zancajo, Carlos.Tercera etapa de octubre.Valencia : Meabe , 1937.

Herrick, William.Hermanos! Sag Harbor , N.Y. : Second Chance Press , 1969.

———. "A Memoir." Paperdelivered at Siena College , 12 June 1938.

Herring, Hubert Clinton. Spain, Battleground of Democracy. New York : Pilgrim Press , 1937.

Heusser, Hans. Der Kampf um Madrid. Berne : Francke , [1937?].

\*Hidalgo de Cisneros, Ignacio. Interview ,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Memorias 2: La república y la guerra de España. Paris : Librarie du Globe , 1964.

———. Virage sur l' aile: Souvenirs. Paris : Français Reunis , 1965.

Hidalgo Salazar, H. La ayuda alemana a España, 1936-1939: Legion Condor. Madrid : San Martín , 1975.

Higuera y Velázquez, Alfonso G. de la. Historia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Madrid : Cervantes , 1940.

Hilger, Gustav , and Mayer, Alfred G. The Incompatible Allies. New York : Macmillan , 1953.

Hills, George. Franco: The Man and His Nation. New York : Macmillan , 1967.

———. Monarquía, república y Franquismo. 1868-1974. Madrid : San Martín , 1969.

Hinkel, John Vincent. The Communistic Network. New York : America Press , 1939.

Hiriartia, J.de. El caso de los católicos vascos. Buenos Aires : Egi-Alde , 1939.

Hispanicus[pseudo.]. Badjoz. London : Friends of Spain , 1937.

——. Foreign Intervention in Spain. London : United Editorial , 1938.

Historia de la revolución nacional española. 2 vols. Paris : Sociedad Internacional de Ediciones y de Publicidad , 1940.

Historia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Paris : Ediciones Sociales , 1960.

Hitler, Adolf. "Es spricht der Führer" : 7 exemplarische Hitler Reden. Gütersloh : Sigbert Mohn , 1966.

Hoare, Sir Samuel ( Viscount Templewood ) . Nine Troubled Years. London : Collins , 1954.

Hoffman, Heinz. Mannheim. Madrid. Moskau. Berlin ( VEB ) : Militär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 1981.

Hoggan, David L. Der erzwungene Krieg. Tübingen : Deutsche Hochschullehrer-Zeitung , 1961.

Homenaje a André Marty. Madrid : Comisariado de las Brigadas

Internacionales , [1937?].

Homenaje del comité peninsular de la FAI a Buenaventura Durruti, 1896-1936. En el Segundo aniversario de su muerte. Barcelona : n.p. , 1938.

Hore, Charlie. Spain, 1936: Popular Front or Workers' Power? London : Bookmarks , 1986.

Hoskins, Katherine Bail. Today the Struggle: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during the Spanish Civil War. Austin and London :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1969.

How Mussolini Provoked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 United Editorial , [1938?].

How the German Fleet Shelled Almeria. London : Union of Democratic Control , [1937?].

Hoyos, Max. Pedros y Poblos: Fliegen, Leben, Kämpfen in Spanien. Munich : Druckmann , 1940.

\*Hudson, Irene. Interview ,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I Accuse France. London : Spanish Press Services , [1937?].

Ibárruri, Dolores [La Pasionaria]. Ejército popular unido, ejército de la victoria. Madrid- Barcelon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8.

——.En la lucha: Palabras y hechos, 1936-1939.Moscow : Progreso , 1968.

——.Es hora ya de crear el gran partidoúnico del proletariado.Madrid : Stajanov , 1937.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Spain, for Liberty, for the Republic, Union of All Spaniards.Complete text of the Report to the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Spain , Madrid , May 23 , 1938.Madrid : Communist Party of Spain , 1938.

——.Mémoires de La Pasionaria.Paris : Julliard , 1964.

——.Memorias de Pasionaria, 1939-1977.Barcelona : Planeta , 1984.

——.No hay mas posibilidad de gobernar que a través del frente popular.Barcelon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8.

——.Un pleno histórico.Valenci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Comisión Nacional de Agit-Prop , 1937.

——.Speeches and Atticles, 1936-1938.London : Lawrence and Wishart , 1938.

——.They Shall Not Pass: The Autobiography of La Pasionaria.New York :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966.



——.El único camino.Paris : Editions Sociales , 1962.

——.Unión de todos los españoles:Por la independencia de España.Por la libertad.Por la república.Madrid-Barcelon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8.

Ibarzabal, Eugenio.50 Años de nacionalismo vasco, 1928-1978.Bilbao : Ediciones Vascas , 1978.

\*Iglesias, Captain Ramón.Interview ,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Iglesias, Ignacio.See also Suárez, Andrés.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La fase final de la guerra civil.Barcelona : Planeta , 1977.

——.León Trotsky y España, 1930-1939.Madrid : Júcar , 1977.

——.Trotsky y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Madrid : Zero , 1976.

Iglesia y estado durante la segunda república española, 1931-1939.Barcelona : Monestir de Montserrat , 1977.

Informe sobre la guerra civil en el país vasco.Buenos Aires : Amorrortu , 1938.

Informe sobre la situación de las provincias vascongadas bajo el

dominio rojo-separatista.Valladolid :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  
1938.

Inglés, Martín.Bajo las garras del SIM.Barcelona : Librería  
Religiosa , 1940.

Iniesta, Juan de.Escuchad, campesino.Madrid : Comisión de Propaganda  
del ComitéRegional del Centro , 1937.

In Spai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London :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 1938.

Intellectuals and the Spanish Military Rebellion.London : Spanish  
Embassy , 1936.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Coordination and Information to Aid  
Republican Spain.Franco ami de la France? Paris :  
ComitéInternational de Coordination et d' information pour  
l' aideàl' Espagne républicaine , 1938.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The Trial of German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Parts IX and X.London : HMSO , 1947.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Memoria, 1936-  
1940.Madrid , 1941.

Iribarren, JoséMaría.Con el General Mola: Escenas y aspectos

inéditos de la guerra civil.Saragossa : Librería General , 1937.

——.Mola.Saragossa : Heraldo de Aragón , 1938

Iribarren, Manuel.Una perspectiva histórica de la guerra en España, 1936-1939.Madrid : García Enciso , 1941.

\*Irujo, Andrés María de.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Irujo, Manuel de. "Datos Remitidos por el Señor Manuel de Irujo,Ministro Vasco en el Gobierno de la República Española." Memorandum sent by Manuel de Irujo to the Basque Government-in-Exile.Hoover Institution , Bolloten Collection.

\*——. "La guerra civil en Euzkadi antes del estatuto." Microfilm copy of this unpublished work loaned to Burnett Bolloten by Manuel de Irujo.

——.Un vasco en el ministerio de justicia.Vols.I , II.Buenos Aires : Vasca Ekin , 1976 , 1978.

Irving, David.Hitler' s War.New York : Viking Press , 1977.

——.The War Path: Hitler' s Germany, 1933-1939.London : Joseph , 1978.

—— , ed.Breach of Security.London : Kimber , 1968.

Istoriia vtoroi mirovoi voiny, 1939-1945.Moscow : Voennoe

Izdatel' stvo , 1973-1982 , Vol.II ( 1974 ) : "Nakanune voiny."

The Italian Air Force in Spain.London : United Editorial , n.d.

Italians in Spain.London : Friends of Democracy and Independence in Spain , [1937].

Iturralde, Juan de[Pradre Juan Usabiaga].El catolicismo y la cruzada de Franco.Vienn , France : Egi-Indarra , 1960.

Izaga, G.Arsenio de.Los Presos de Madrid.Madrid : Martosa , 1940.

Jackson, Gabriel.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 1974.

——.Entre la reforma y la revolución, 1931-1939.Barcelona : Grijalbo , 1980.

——.The Spanish Republic and the Civil War, 1931-1939.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65.

—— , ed.The Spanish Civil War.Chicago : Quadrangle Books , 1972.

Jackson, Gabriel , and Centelles, Augustí.Catalunya republicana i revolucionaria, 1931-1939.Barcelona : Grijalbo , 1982.

Jalón, Cesar.El cautiverio vasco.Madrid : Ediciones Españolas , 1939.

James, Robert Rhodes , ed.Winston S.Churchill: His Complete

Speeches, 1897-1963.Vol.VI.New York : Chelsea House , 1974.

Jean, André.Transformation Economique en Catalogne.Barcelona : 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 [1936?].

Jellinek, Frank.The Civil War in Spain.London : Gollancz , 1938.

\*Jiménez, Miguel.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Jiménez Campo, Javier.El fascismo en la crisis de la II república española.Madrid : Artifrafia , 1979.

Jiménez de Aberasturi, Luis María , and Jiménez de Aberasturi, Juan Carlos.La guerra enEuskadi.Esplugas de Llobregat : Plaza y Janés , 1978.

Jiménez de Asúa, Luis.La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de la democracia española.Santiago de Chile : Ediciones Ercilla , 1942.

Joaniquet, Aurelio.Calvo Sotelo.Santander : Espasa-Calpe , 1939.

\*Johnston, Verle B.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Xerox copy of original manuscript published by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in conjunction with th Hoover Institution under the title of Legions of Babel.The manuscript contains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amplifying and qualifying material , which was eliminated from the published version.

———.Legions of Babel: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Hoover Institution Publications.University Park :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1967.

Johnstone, Nancy.Hotel in Spain.London : Faber , 1937.

Joint Letter of the Spanish Bishops to the Bishops of the Whole World Concerning the War in Spain.London : Catholic Truth Society , 1937.

Joint Letter of the Spanish Bishops to the Bishops of the Whole Worlda: The War in Spain.New York : America Press , 1937.

Joll, James.The Anarchists.London : Eyre and Spottiswoode , 1964.

Jones, Thomas.A Diary with Letters.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54.

Jong, Alberti de.See Schapiro, Alexander.

Jordan, Philip.There Is No Return.London : Cresset Press , 1938.

Joseph, Don.Shop Talk on Spain.New York : North American Committee to Aid Spanish Democracy , [1937?].

Jouve, Marguerite.Vu en Espagne.Paris : Flammarion , 1937.

Juliá, Santos.La izquierda del PSOE, 1935-1936.Madrid : Siglo XXI , 1977.

——.Orígenes del frente popular en España, 1934-1936.Madrid : Siglo XXI , 1979.

—— , ed.El socialismo en España: Desde la fundación del PSOE hasta 1975.Madrid : Pablo Iglesias , 1986.

Junco, Alfonso.Mexico y los refugiados.Mexico City : Jus , 1959.

Juventus comunista ibérica.A los ocho meses de guerra civil.Barcelona : n.p. , 1937.

Kaminski, H.E.Ceux de Barcelone.Paris : Denoël , 1937.

"Kandelaki Mission." Auswärtiges Amt.Film Serial 1907 H/429294-324.Washington , D.C. : National Archives.

Kantorowicz, Alfred.Spanisches Kriegstagebuch.Hamburg : Konkret-Literatur-Verlag , 1979.

Kaplan, Temma.The Anarchists of Andalusia.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77.

——.Orígenes socials del anarquismo en Andalucía.Barcelona : Grijalbo , 1977.

Karaganda: La tragedia del antifascismo español.Toulouse : MLE-CNT , 1948.

Keding, Karl.Feldgeistlicher bei Legion Conder.Berlin : Ostwerk ,

[1938?].

Kemp, Peter. Mine Were of Trouble. London : Cassell , 1957.

Kennan, George F. Russia and the West under Lenin and Stalin. Boston : Little , Brown , 1960.

Kerillis, Henri de. Français! Voici la guerre! Paris : Bernard Grasset , 1936.

Khrushchev, Nikita. Speech at a Session of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on 25 February 1956. Washington , D.C.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 1956.

Kirkpatrick, Ivone. Mussolini: A Study in Power. New York : Hawthorn Books , 1964.

Kirkpatrick, Jeane J. , ed. The Strategy of Deception: A Study in World-Wide Communist Tactics. New York : Farrar , Straus , 1963.

Klotz, Helmut. Les leçons militaires de la guerre civile en Espagne. Paris : Edité par l' Auteur , 1937.

Knickerbocker, H.R. The Siege of Alcazar. Philadelphia : McKay , 1936.

Knightly, Philip. The First Casualty. New York :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1975.

Knoblauch, H. Edward. Correspondent in Spain. New York : Sheed and



Ward , 1937.

Koblyakov, I.K.USSR for Peace against Aggression, 1933-1941.Moscow : Progress , 1976.

Koestler, Arthur.L' Espagne ensanglantée.Paris : Carrefour , 1937.

——.The Invisible Writing.London : Collins with Hamish Hamilton , 1954.

——.The Spanish Testament.London : Gollancz , 1937.

Köhler, Klaus.Kriegsfreiwilliger 1937.Leipzig : Henig , 1939.

Koltzov, Mijail [Mikhail] E.Diario de la guerra de España.Paris : Ruedo Ibérico , 1963.

——.Izbrannye proizvedeniia.Vol.III.Moscow :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Khudozhestvnoi Literatury , 1957.

Kommunisticheskii internatsional:Kratkii istoricheskii ocherk ( Outlin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 .Moscow : Politzat Literatura , 1969.

Krehm, Willian.Spain.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Toronto : League for a 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 , [1937?].

Kristanov, Tsvetan.Za svobodu Ispanii: Memuary bolgarskogo kommunista.Moscow : Progress , 1969.

Krivitsky, Walter G. In Stalin' s Secret Service. New York : Harper , 1939.

Kropp, Major A. So kämpfen deutsche Soldaten. Berlin : Wilhelm Limpert , 1939.

Kurzman, Dan. Miracle of November. New York : Putnam' s Sons , 1980.

Kuznetsov, Nikolai G. Na dalekom meridiane. Moscow : Nauka , 1966.

Lacalle, Andrés García. Mitos y verdades: La aviación de caza en la guerra española. Mexico City : Oasis , 1973.

Lacouture, Jean. Léon Blum. Translated by George Holoch. New York : Holmes and Meier , 1982.

Lacruz, Francisco. El alzamiento, la revolución y el terror en Barcelona. Barcelona : Librería Arysel , 1943.

Lain, José. Por un ejército regular disciplinado y fuerte: Conferencia nacional de juventudes, enero 1937. Valencia : JSU , 1937.

Lamas Arroyo, Angel. Unos...y...otros.... Barcelona : Luis de Caralt , 1972.

Lambda[pseud.]. The Truth about the Barcelona Events. New York : Independent Communist League of New York , 1937.

Lamo de Espinosa, E. Filosofía y política en Julián Besteiro. Madrid :

Edicusa , 1973.

Lamonedá, Ramón.El camino de la unidad.Madrid : n.p. , 1937.

\*——.Letter ( carbon copy ) sent in August 1939 to a member of the party , Paris , 1939.

——.El partido socialista en la república española.Mexico City : El Socialista , 1942.

Lamour, Philippe.Sauvons la France en Espagne.Paris : Baudinière , 1937.

\*Landau,Katia.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Le stalinisme en Espagne.Paris : Spartacus , 1938.

Landis, Arthur H.Spain: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New York :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972.

The Land of Socialism Today and Tomorrow: Reports and Speeches at the Eighteen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 Bolshevik ) , March 10-21, 1939.Moscow :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 1939.

Langdon-Davies, John.Behind the Spanish Barricades.New York : Robert M.McBride , 1937.

——.The Case for the Government.New York : American Friends of

Spanish Democracy , 1939.

——.Gatherings from Catalonia.London : Cassell , 1953.

——.The Spanish Church and Politics.New York : American Friends of Spanish Democracy , 1938.

Langhorne, Richard , ed.Diplomacy and Intelligen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Combridge :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5.

Lapeyre, Aristide.Le problème espagnol.Paris : Edition "Ce qu' il faut dire" , 1946.

Lapeyre, Paul.Lueurs sur l' Espagne: Revolution et contre-revolution en Espagne republicaine.Nimes : La Laborieuse , 1938.

——.Révolution et contre-révolution en Espagne.Paris : Spartacus , 1938.

Largo Caballero, Francisco.Discurso pronunciado en Valencia el día 1 de febrero de 1937.Valencia : Comisarido General de Guerra , 1937.

——.Discursos a los trabajadores.Madrid : Gráfica Socialista , 1934.

——.Escritos de la república: Edición, estudio preliminar y notas de Santos Juliá.Madrid : Pablo Iglesias , 1985.

——.Largo Caballero denuncia.Buenos Aires : Servicio de Paopaganda España , 1937.

——. Letter to Diego Martínez Barrio , 26 Oct. 1937.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 CNT-FAI Archives , Paquete 005 , Caja 305 , Dossier 66.

——. Mis recuerdos: Cartas a un amigo. Mexico City : Alianza , 1954. For information on these memoirs , see Chapter 45 , n.19.

——. "Notas Históricas sobre la Guerra de España." Manuscript. Fundación Pablo Iglesias , Madrid. For information on this manuscript , see Chapter 45 , n.19.

——. Presente y futuro de la 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de España. Madrid : J. Morata Pedreño , [1925?].

——. ¿Qué se puede hacer? Paris : n.p. , 1940.

——. La UGT y la guerra. Valencia : Meabe , 1937.

Lario Sánchez, Juan. Habla un aviador de la república. Madrid : Toro , 1973.

Larios, José , Capitán de Aviación. Combate sobre España: Memorias de un piloto de caza, 1936-1939. Madrid : Aldus , 1966.

Larrañaga, Jesús. ¡Por la libertad de Euzkadi, dentro de las libertades de España! Barcelon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7.

Last, Jef. The Spanish Tragedy. London : Routledge , 1939.

Lazareff, Pierre. Deadline. New York : Random House , 1942.

Lazarillo de Tormes [Benigno Bejarano]. España, cuña de la libertad. Valencia : "Ebro" , [1937?].

———. España, tumba del fascismo. Valencia : Ediciones del Comité Nacional de la CNT , Sección Propaganda y Prensa , [1938?].

\*———. "Les morts ne vous pardonnent pas." Photocopies of some of the pages of this unpublished work loaned to Burnett Boloten by José Peirats are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Lazitch, Branko. Los partidos comunistas de Europa, 1919-1955. Madrid : Instituto de Estudio Políticos , 1961.

Lazitch, Branko , and Drachkovitch, Milorad M.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Comintern. Stanford : Hoover Institution , 1973.

League of American Writers , ed. Writers Take Sides. New York : League of American Writers , 1938.

Lefranc, Georges. Histoire du front populaire.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1972.

The Legacy of Alexander Orlov. See U.S. Congress.

Lehning, Arthur. Michel Bakounine et les Autres. Paris : Union Générale d' Editions , 1976.

Lenoir, P. La finance internationale et la guerre d' Espagne. Paris : Paix et Democratie , 1938.

Lent, Alfred. Wir kämpften für Spanien. Berlin : Gerhard Stalling , 1939.

Lera, Angel María de. Angel Pestaña. Barcelona : Argos , 1978.

Lerroux, Alejandro. Mis memorias. Madrid : Afrodisio Aguado , 1963.

———. La pequeña historia. Madrid : Afrodisio Aguado , [1963?].

Lerroux, Alejandro ; Marañón, Gregorio ; Unamuno, Miguel de ; Baroja y Nessi, Pio. Spanish Liberals Speak on 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Spai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the Spanish Relief Committee. San Francisco : Spanish Relief Committee , 1937.

Lettre collective des évêques espagnols à ceux du monde entier à propos de la guerre en Espagne. Paris : n.p. , 1937.

Leval, Gaston [Pierre Piller]. L' anarchisme et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 Turin : Einaudi , 1971.

———.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Bernon Richards. London : Freedom Press , 1975.

———. Le communisme. Paris : Les Editions du Libertaire , n.d.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Espagne libertaire, 1936-1939: L' oeuvre constructive de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Meuse : Editions du Cercle , 1971.

——.L' indispensable révolution.Paris : Editions du Libertaire , 1948.

——.Marxisme et anarchisme.Turin : Einaudi , 1971.

——.NéFranco néStalin: Le collettivitàanarchische spagnole nella lotta contro Franco e la reazione staliniana.Milan : Istituto Editoriale Italiano , 1952.

——.Nuestro programa de reconstrucción.Barcelona : Oficinas de Propaganda , CNT-FAI , [1937?].

——.Pour une renaissance du mouvement libertaire.Turin : Einaudi , 1971.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Spain.London : Spain and the World , 1938.

Leviatán: Antología.Selección y prólogo de Paul Preston.Madrid : Turner , 1976.

Levine, Isaac Don.Eyewitness to History.New York : Hawthorn Books , 1973.

——.The Mind of an Assassin.New York : Straus and Cudahy , 1959.



Lévy, Louis. Vérités sur la France. Harmondsworth, England : Editions Pingouin, 1941.

\*Liarte, Ramón.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Entre la revolución y la guerra. Barcelona : Picazo, 1986.

Liddell Hart, Basil Henry. Europe in Arms. New York : Random House, 1937.

———. The Memoirs of Captain Liddell Hart. Vols. I, II. London : Cassell, 1965, 1967.

Liébana, José Manuel, and Orizana, G. El movimiento nacional. Valladolid : Vicente, [1937].

Linz, Juan. The Party System of Spai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 Free Press, 1967.

Líster, Enrique. Así destruyó Carrillo el PCE. Barcelona : Planeta, 1983.

———. ¡Basta! n.p. [1971?].

———. Memorias de un luchador. Vol. I : Los primeros combates. Madrid : Toro, 1977.

———. Nuestra guerra: Aportaciones para una historia de la guerra nacional revolucionaria del pueblo español, 1936-1939. Paris : Librarie du Globe, 1966.

List of Ships Interfered with, Attacked or Sunk during the War in Spain, July 1936-June 1938.London : Press Dept.of the Spanish Embassy , [1938?].

Litvinov, Maxim.Against Aggression.London : Lawrence and Wishart , 1939.

Le livre blanc de l' intervention italienne en Espagne.Paris : ComitéFranco-Espagnol , 1937.

Lizarra, A.de[Andrés María de Irujo].Los vascos y la república española.Buenos Aires : Vasca Ekin , 1944.This book is based on the memoirs of Manuel de Irujo. ( Andrés María was Manuel' s brother and private secretary during the Civil War )

Lizarza Iribarren, Antonio de.Memorias de la conspiración,1931-1936.Pamplona : Gómez , 1969.

Lizon Gadea, Adolfo.Brigadas internacionales en España.Madrid : Editora Nacional , 1940.

Lladó i Figueres, J.El 19 de Julio a Barcelona.Barcelona : Biblioteca política de Catalunya , 1938.

Llarch, Joan.La Batalla del Ebro.Barcelona : Aura , 1972.

——.Cipriano Mera: Un anarquista en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Barcelona : Producciones Editoriales , 1977.

——.Los días rojinegros.Barcelona : Ediciones 29 , 1977.

——.Morir en Madrid.Barcelona : Producciones Editoriales , 1978.

——.Le muerte de Durruti.Barcelona : Plaza y Janés , 1976.

——.Negrín:¡Resistir es vencer! Barcelona : Pleneta , 1985.

——.La trágica mort de Companys.Barcelona : Bruguera , 1979.

Llaugé, Félix.El terror staliniano en la España republicana.Barcelona : Aura , 1974.

Llorens, Carlos.La guerra en Valencia y en el frente de Teruel.Santander : Fernando Torres , 1978.

Llorens, Josep María.La iglesia contra la república española.Vieux , France : Galerie d' Art du Domaine de l' Espaliou , 1968.

Llovera, Fernando.La columna Uribarry.Valencia : Turia , [1937?].

Lloyd, Lord[George Ambrose].The British Case.London : Eyre and Spottiswoode , 1939.

Lloyd George, David.Spain and Britain.New York : American Friends of Spanish Democracy , 1937.

LluhíVallescà, Joan.Lluis Companys Jover,President de la

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Mexico City : Imprenta Grafos , 1944.

Loewenstein, Prince Hubertus Friedrich of. A Catholic in Republican Spain. London : Gollancz , 1937.

Lojendio, Ignacio María de. El derecho de revolucion. Madrid : Revista de Derecho Privado , 1941.

Lojendio, Luis María de. Operaciones militare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 Barcelona : Montaner y Simón , 1940.

London, Arthur G. L'aveu. Paris : Gallimard , 1968.

———. Espagne. Paris : Français Réunis , 1966.

Londonderry, K.G. , Marquess of. Ourselves and Germany. London : Hale , 1938.

———. Wings of Destiny. London : Macmillan , 1943.

Longo, Luigi ( Gallo ) . Un anno di guerra in Spagna. Paris : Coltúra Sociale , 1938.

———. Las brigadas internacionales en España. Mexico City : Ediciones Era , 1966.

López, Juan. Concepto del federalismo en la guerra y en la revolución. [Barcelona?] : Oficinas de Propaganda CNT-FAI , n.d.

——.Una mission sin importancia:Memorias de un sindicalista.Madrid : Editora Nacional , 1972.

López de Medrano, Luís.986 días en el infierno.Madrid : Asilo de Huérfanos del Sagrado Corazón de Jesús , 1939.

López Fernández, Captain Antonio.Defensa de Madrid.Mexico City : A.P.Márques , 1945.

López-Muñiz, Lieutenant Colonel de E.M.La batalla de Madrid.Madrid : Gloria , 1943.

López Sevilla, Enrique.El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en las cortes constituyentes de la segunda república.Mexico City : Pablo Iglesias , 1969.

Lo que han hecho en Galicia.Paris : Editorial España , 1938.

Lórenzo, César M.Les anarchistes espagnols et le pouvoir, 1868-1969.Paris : Du Seuil , 1969 ; The author is the son of Horatio M.Prieto , onetime national secretary of the CNT.

Louzon, R.La contrarrevolución en España.Buenos Aires : Imán , 1938.

Loveday, Arthur.British Trade Interests and the Spanish War.London : Spanish Press Services , [1937?].

——.World War in Spain.London : Murray , 1939.

Lunn, Arnold. Spain and the Christian Front: Ubi Crux Ibi Patria. New York : Paulist Press , [1937?].

———. Spain: The Unpopular Front. London : Catholic Truth Society , 1937.

———. Spanish Rehearsal. London : Hutchinson , 1937.

Macarro Vera, JoséManuel. La utopia revolucionaris: Sevilla en la Segunda República. Sevilla : Monte de Piedad , 1985.

MaCabe, Joseph. The Causes of the Civil War in Spain. Kansas : Haldeman-Julius , 1937.

———. The Papacy in Politica Today. London : Watts , 1937.

MacDonald, C.A.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Appeasement, 1936-1939. London : Macmillan , 1981.

Macdonald, Nancy. Homage to the Spanish Exiles. New York : Insight Books , 1987.

MacDougall, Ian , ed. Voices from the Spanish Civil War: 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Scottish Volunteers in Republican Spain, 1936-1939. Edinburgh : Polygon , 1986.

McGovern, John , M.P. Terror in Spain. London :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 1937.

——.Why Bishops Back Franco: Report of Visit of Investigation to Spain.London :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 [1936?].

McGraw-Hill Encyclopedia of Russia and Soviet Union.New York : McGraw-Hill , [1961].

McLachlan, Donald.In the Chair: Barrington-Ward of the Times, 1927-1948.London :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1971.

Macleod, Iain.Neville Chamberlain.London : Muller , 1961.

Macmillan, Harold.Winds of Change, 1914-1939.New York : Harper and Row , 1966.

McMillan, Wayne.This Is Our Concern.New York : Social Workers Committee to Aid Spanish Democracy , 1937.

McNair, John.Spanish Diary.Manchester : Greater Manchester ILP Branch , [1937?].

McNeill-Moss, Geoffrey.The Epic of the Alcázar.London : Rich and Cowan , 1937.

——.The Legend of Badajoz.London :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 1937.

Madariage, Salvador de.España.Buenos Aires : Editorial Sudamericana , 1942.

——.Españoles de mi tiempo.Barcelona : Planeta , 1974.

——.Memorias, 1921-1936.Madrid : Espasa-Calpe , 1974.

——.Spain: A Modern History.New York : Praeger , 1960.Second Printing.

Madrid Santos, Francisco.Camillo Berneri, un anarchico italiano, 1897-1937: Rivoluzione e controrivoluzione in Europa, 1917-1937.Pistoria : Archivo Famiglia Berneri , 1985.

Madrid: The "Military" Atrocities of the Rebels.London : Labour Party of Great Britain , 1937.

Maeztu, Ramiro de.En vísperas de la tragedia.Preface by JoséM.de Areilza.Madrid : Cultura Española , 1941.

Maidanik, K.L.Ispanskii proletariat v natsionalno-revoliutsionnoi voine, 1936-1937.Moscow : Akademiia Nauk , 1960.

Maisky, Ivan M.Ispanskie Tetradi.Moscow : Voennoe izdatel' stvo , 1962.

——.Iz istorii osvoboditeloni borby ispanskogo naroda.Moscow : Akademiia Nauk SSSR , 1974.

——.Memoirs of a Soviet Ambassador: The War, 1939-1943.London : Hutchinson , 1967.



——.Spanish Notebooks.London : Hutchinson , 1966.

——.Who Helped Hitler? London : Hutchinson , 1964.

Maitland, Frank.Searchlight on the Duchess of Atholl.Edinburgh :  
[1937?].

Maíz, B.Félix.Mola, aquel hombre: Diario de la conspiración,  
1936.Barcelona : Planeta , 1976.

Majuelo Gil, Emilio.La II república en Navarra: Conflictividad  
agrarian en la Ribera Tudelana, 1931-1933.Pamplona : Zarama , 1986.

Malaga Documents.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 History , CNT-FAI  
Archives.Paquete 63.D.Documentación General.I.Asuntos  
Especiales.Photocopies in Hoover Institution , Bolloten Collection.

Malefakis, Edward E.Agrarian Reform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Spain: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70.

Mallorca en guerra contra el marxismo.Palma de Mollorca : Sabater  
Mut , 1936.

Malraux, André.The Fascist Threat to Culture.Speech delivered  
March 8 , 1937 , Harvard University , Cambridge.

Maluquer i Wahal, Joan J.L' aviacióde Catalunya els primers mesos

de la guerra civil.Barcelona : Portic , 1978.

Manent i Segimon, Albert , and Raventós i Giralt, Josep.L' Església clandestina a Catalunya durant la guerra civil, 1936-1939.Montserrat : Abadia de Montserrat , 1984.

Manifesto of Catalan Intellectuals.Barcelona , 1936.

Manobens, E.Crónicas de la guerra.Valencia : Subsecretaria de Propaganda , 1937.

\*Mansó, Juan José.Interview ,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Manuel, Frank E.The Politics of Modern Spain.New York : McGraw-Hill , 1938.

Manzanares, Alejandro.Alzamiento nacional de España.Logroño : Imprenta Moderna , 1937.

Marañón, Gregorio.Liberalismo y comunismo.Burnos Aires : OPYPRE , 1938.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n.p. , 1938.

——.Surveying the Spanish War: Liberalism and Communism.New York , [1937?].

Marichal, Juan.See Azaña, Manuel.

——.La vocación de Manuel Azaña.Madrid : Cuadernos para el Diálogo , 1971.

Marinello, Juan.Cultura en la España Republicana.New York : Spanish Information Bureau , 1937.

——.Dos discursos al servicio de la causa popular.Paris , 1937.

——.Hombres de la España leal.Havana , Facetas , 1938.

Mario de Coca, Gabriel.Anti-Caballero: Crítica marxista de la bolchevización del partido socialista, 1930-1936.Madrid : Engels , 1936.

Maritain, Jacques.Los rebeldes españoles no hacen una "guerra santa." Madrid , 1937.

Márquez Tornero, A.C.Testimonio de me tiempo: Memorias de un español republicano.Madrid : Orígenes , 1979.

Marrast, Robert.El teatre Durant la guerra civil espanyola.Barcelona : Edicions 62 , 1978.

Marti-Ibañez, Félix.Grandezas y miserias de la revolución social española.Barcelona , [1937?].

Martin, Enrique.Recuerdos de un militante de la CNT.Barcelona : Picazo , 1979.

Martín, J. La transformation politique et sociale de la Catalogne  
Durant la revolution: 19 juillet-31 décembre, 1936. Barcelona :  
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 1938.

\*Martín Blázquez, José.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I Helped to Build an Army. London : Secker and Warburg , 1939.

Martín i Ramos, Josep Lluís. Els orígens del 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 1930-1935. Barcelona : Curial , 1977.

Martín Retortillo, Cirilo. Huesca vencedora. Huesca : Campo , 1938.

Martínez Abad, Julio. ¡17 de julio! La guarnición de Melilla inicia  
la salvación de España. Melilla : Artes Gráficas Postal Exprés , 1937.

Martínez Alier, Juan. La estabilidad del latifundismo. Paris : Ruedo  
Ibérico , 1968.

Martínez Amutio, Justo. Chantaje a un pueblo. Madrid : Toro , 1974.

\*———.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Martínez Bande, Colonel José Manuel. Los asedios. Madrid : San Martín ,  
1983.

———. La batalla del Ebro. Madrid : San Martín , 1978.

———. La batalla de Teruel. Madrid : Servicio Histórico Militar , 1974.

- .La campaña de Andalucía.Madrid : Servicio Histórico Militar , 1969.
- .La campaña de Cataluña.Madrid : San Martín , 1979.
- .Los cienúltimos días de la república.Barcelona : Caralt , 1973.
- .El final de la guerra civil.Madrid : San Martín , 1985.
- .El final del frente norte.Madrid : San Martín , 1972.
- .La gran ofensiva sobre Zaragoza.Madrid : San Martín , 1973.
- .La guerra en el norte.Madrid : Servicio Histórico Militar , 1969.
- .La intervención comunista en la guerra de España, 1936-1939.Madrid : Servicio Informativo Español , 1965.
- .La invasión de Aragón y el desembarco en Mallorca.Madrid : Servicio Histórico Militar , 1970.
- .La marcha sobre Madrid.Madrid : Servicio Histórico Militar , 1968 , rev.ed.1982.
- .La ofensiva sobre Segovia y la batalla de Brunete.Madrid : San Martín , 1972.
- .La ofensiva sobre Valencia.Madrid : San Martín , 1977.

——.Vizcaya.Madrid : San Martín , 1971.

Martínez Barrio, Diego.Memorias.Barcelona : Planeta , 1983.

——.Orígenes del frente popular español.Buenos Aires : PHAC , 1943.

——.Páginas para la historia del frente popular.Madrid-Valencia : Ediciones Españolas , 1937.

\*Martínez Cartón, Pedro.Interview ,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Martínez Dasi, Salvador.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Martínez de Campos, Carlos.Ayer, 1931-1953.Madrid : Instituto de Estudios Políticos , 1970.

Martínez Leal, Comandante.El asedio del Alcázar del Toledo.Toledo : Editorial Católica Toledana , 1937.

Martínez Lorenzo, César.See Lorenzo, César M.

Martínez Prieto, Horacio.See Prieto, Horacio M.

Marty, André.Douze mois sublimes.Paris : ComitéPopulaire de Propaganda , n.d.

——.En Espagne...oùse joue le destin l' Europe.Paris : Bureau d' Editions , 1937.

——.L' Espagne, bastion avancéde la libertéet de la paix: Discours

au Comité Central du PCF, 19 octobre, 1937. Paris : La Brochure Populaire , 1937.

———. Heroic Spain. New York : Workers Library , 1937.

\*Más, Valerio.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Massó i Escofet, C. , and Gay de Montellá, R. L' estatut de Catalunya. Barcelona : Bosch , 1933.

Massot i Muntaner, Josep. La guerra civil a Montserrat. Montserrat : Abadia de Montserrat , 1984.

Mastny, Vojtech. Russia' s Road to the Cold War.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79.

Mateu, Julio. La obra de la federación campesina. Barcelon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7.

Matthews, Herbert L. The Education of a Correspondent. New York : Harcourt , Brace , 1946.

———. Half of Spain Died: A Reappraisal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 Scribner' s Sons , 1973.

———. Return to Cuba. Special issue of Hispanic American Report. Stanford : Institute of Hispanic American and Luzo-Brazilian Studies , 1964.

———.Two Wars and More to Come.New York : Carrick and Evans , 1938.

———.The Yoke and the Arrows.New York : Braziller , 1961.

Mattioli, Guido.L' aviazione legionaria in Spagna.Rome :  
L' Aviazione , 1938.

Maura, Miguel.Asi cayó Alfonso XIII.Mexico City : Mañez , 1962.

Maurice, Jacques.La reforma agraria en España en el siglo XX, 1900-  
1936ñ.Madrid : Siglo XXI , 1975.

Maurín, Jeanne.Cómo se salvo Joaquín Maurín: Recuerdos y  
testimonios.Madrid : Júcar , 1980.

Maurín, Joaquín.En las prisiones de Franco.Mexico City : Costa-Amie ,  
1974.

———.Joaquín Maurín Archives.Hoover Institution.

———.Revolución y contrarrevolución en España.Paris : Ruedo  
Ibérico , 1966.

———.Révolution et contre-révolution en Espagne.Paris : Rieder ,  
1937.

Meaker, Gerald H.The Revolutionart Left in Spain, 1914-  
1923.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4.



Medical Aid for Spain.London : Spanish Medical Aid Committee , 1937.

Medlicott, William N.Britain and Germany: The Search for Agreement,1930-1937.London : Athlone , 1969.

——.Brit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Versailles, 1919-1963.London : Methuen , 1968.

Medrano, Trifón.Hombres nuevos y nuevos cuadros.Valencia : JSU , 1937.

Melchor, Federico.Organicemos la producción.Valencia : JSU de España , 1937.

Meliani, Giovanni.Barcelona sotto l' incubo del terrore rosso.Milano : Buone Letture , 1938.

Meltzer, Albert , ed.A New World in Our Hearts.Orkney : Cienfuegos Press , 1978.

Méndez Luengo, E.Tempestad al amanecer: La epopeya de Madrid.Madrid : Toro , 1977.

\*Menéndez, Alvaro.Interview ,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Menéndez Beltrán, Leonor.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Mera, Cipriano.Guerra, exilio y cárcel de un anarcosindicalista.Paris : Ruedo Ibérico , 1976.

Mercier Vega, Luis. Anarquismo, ayer y hoy. Caracas : Monte Avila , 1970.

Meretskov, Kirill A. Na sluzhbe narodu: Stranitsy vospominaniia. Moscow : Politizdat , 1968.

Merin, Peter. Spain between Death and Birth. New York : Dodge , 1938.

Merkes, Manfred. Die deutsche Politik gegenüber de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 1936-1939. Bonn : Röhrschied , 1961.

Merriman, Marion , and Lerude, Warren. American Commander in Spain: Robert Hale Merriman and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Reno :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1986.

Merry Del Val, Alfonso , The Marquis. The Conflict in Spain. London : Catholic Truth Society , 1937.

———. Spain Is Fighting For Civilization. New York , [1936?].

———. Spanish Basques and Separatism. London :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 1939.

Meshcheriakov, Marklin T. Ispanskaya respublika i komintern: Natsional' no-revoliutsionnaia voina ispanskogo naroda i politika kommunisticheskogo internatsionala, 1936-1939 gg. Moscow : Mysl , 1981.

Miaja, General

José. Correspondence/documents. "Spain. Ejército. Estado Mayor, 1936-1939."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Micaud, Charles A. The French Right and Nazi Germany, 1933-1939. 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43.

Middlemas, Keith. Diplomacy of Illusion. London : Weidenfeld Nicolson, 1972.

Mieli, Renato. Togliatti, 1937. Milan : Rizzoli, 1964.

Mije, Antonio. El papel de los sindicatos en los momentos actuales. Madrid-Valenci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 Por una potente industria de guerra. Barcelon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Mikusch, Dagobert von. Franco befreit Spanien. Leipzig : P. List, 1937.

Milicia Popular: Diario del 5º regimiento de milicias populares. Preface by Vittorio Vidali. Milan : La Pietra, 1973.

Miller, John, ed. Voices against Tyranny. New York : Scribner's Sons, 1986.

\*Milton, Harry. Copies of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Léon Trotsky and

George Kopp.

Minelli, Pablo M. El pueblo español en armas. Madrid-Valencia : Edicions Espanòles , 1937.

Mintz, Frank. L' autogestion dans l' Espagne révolutionnaire. Paris : Bélibaste , 1970.

Mintz, Frank , and Peciña, Miguel. Los amigos de Durruti, los trotsquistas y los sucesos de mayo. Madrid : Campo Abierto , 1978.

Mintz, Jerome R. The Anarchists of Casas Viejas.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2.

Miralles Bravo, Rafael. Españoles en Rusia. Madrid : Publicaciones Espanòles , 1947.

———. ¿Hacia dónde va Rusia? Mexico City : Miralles , 1946.

———. Memorias de un comandante rojo. Madrid : San Martín , 1975.

Miravittles, Jaime. El que jo he vist a Madrid: Conferencia donada pel comisari de propaganda. Barcelona : Forja , 1938.

———. Episodis de la guerra civil espanyola. Barcelona : Pòrtic , 1972.

Mitchell, Mairin. Storm over Spain. London : Secker and Warburg , 1937.

Moch, Jules. Rencontres avec... Léon Blum. Paris : Plon , 1970.

Modesto, Juan. Soy del quinto regimiento. Presentación de Santiago Carrillo. Barcelona : Laia , 1978.

Mohr, E. Wir im fernen Vaterland geboren... Die Centuria Thälmann. Paris : Prométhée , 1938.

Molas, Isudre. El sistema de partidos políticos en Cataluña, 1931-1936. Barcelona : Península , 1974.

Mola Vidal, Emilio. Obras completas. Valladolid : Santarén , 1940.

———. El pasado, Azaña y el porvenir: Las tragedias de nuestras instituciones militares. Madrid : Bergua , 1934.

\*Molins I Fàbrega, Narcís. "Les Jornadas de Maig de Barcelona." Typewritten Notes , Hoover Institution , Bolloten Collection.

Molodoi Leningrad. Leningrad : Molodaia Gvardiia , 1957.

Mommsen, Wolfgang J. , and Kettenacker, Lothar , eds. The Fascist Challenge and the Policy of Appeasement. London : Allen and Unwin , 1983.

Monjo, Anna , and Vega, Carme. Els treballadors i la guerra civil: Històris d' une indústria catalana col·lectivizada. Barcelona : Empúries , 1986.

Monreal, Antoni.El pensamiento político de Joaquín

Maurín.Barcelona : Edicions 62 , 1984.

Montaldo, Jean.Les finances du PCF.Paris : Albin Michel , 1977.

——.Les secrets de la banque soviétique en France.Paris : Albin Michel , 1979.

Montero, Antonio.Historia de la persecución religiosa en España, 1936-1939.Madrid : 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 , 1961.

Montero, José.La CEDA.Vols.I , II.Madrid : Revista del Trabajo , 1977.

——.El drama de la verdad en Manuel Azaña.Sevilla : Universidad de Sevilla , [1979?].

Montiel, Francisco Félix.Por qué he ingresado en el partido comunista.Barcelon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Comisión Nacional de Agit-Prop , 1937.

Montseny, Federica.La commune de Paris y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Conferencia pronunciada en el Cine Coliseum de Valencia el día 14 de marzo de 1937.Barcelona : Oficina de Información , Propaganda y Prensa del Comité Nacional CNT-FAI , 1937.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María Silva: La libertaria.Toulouse : Universo , 1951.

———.Seis años de mi vida, 1939-1945.Barcelona : Galba , 1978.

Mora, Constanca de la.In Place of Splendor.New York : Harcourt Brace , 1939.

Morán, Gregorio.Miseria y grandeza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9-1985.Barcelona : Planeta , 1986.

Moreno, Admiral Francisco.La guerra en el mar.Barcelona : AHR , 1959.

Moreno, Enrique.Catholicisme et Loyalisme.Paris : Archives Espagnoles , [1937?].

Moreno Dávila, Julio.Frente a Madrid.Granada : Librería Prieto , 1937.

Moreno Gómez, Francisco.La guerra civil en Córdoba, 1936-1939.Madrid : Alpuerto , 1985.

Morgan-Witts, Max.The Day Guernica Died.London : Hodder and Stoughton , 1975.

Morón, Gabriel.Política de ayer y política de mañana.Maxico City : Talleres Linotipográficos Numancia , 1942.

Morrow, Felix.The Civil War in Spain.New York : Pioneer Publishers , 1938.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Spain.New York : Pioneer

Publishers , 1938.

Moscardó, General José. Diario del Alcázar. Preface by Joaquín Arrarás. Madrid : Ibiza , 1943.

Mosley, Leonard. On Borrowed Time: How World War II Began. New York : Random House , 1969.

El movimiento libertario español: Pasado, presente y futuro. Paris : Ruedo Ibérico , 1974.

Movimiento libertario y política. Prologue by Carlos Díaz. Madrid : Ediciones Júcar , 1978.

Mowat, Charles Loch. Britain between the Wars, 1918-1940. Boston : Beacon , 1971.

———. Great Britain since 1914. Ithaca ,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71.

Müehlen, Patrik v. zur. Spanien war ihre Hoffnung: Die deutsche Linke i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 1936-1939. Bonn : Neue Gesellschaft , 1983.

Muniesa, Bernat. La burguesía catalana ante la II república española, 1931-1936. Vols. I , II. Barcelona : Anthropos , 1985 , 1986.

\*Munis, G. [Manuel Fernández Grandizo].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Jalones de derrota:Promesa de victoria.Mexico City : Lucha Obrera , 1948.

Muñoz, Máximo.Dos conductas: Indalecio Prieto y yo.Mexico City : n.p. , 1952.

Muñoz Arconada, Felipe.La juventud que defiende Madrid.Valencia : JSU , 1937.

Muñoz Díez, Manuel.Marianet.Mexico City : Ediciones CNT , 1960.

\*Muñoz Lopez, José.Interview ,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Muro Zegri, D.La Epopeya del Alcázar.Valladolid : Librería Santarén , 1937.

Namier, L.B.Diplomatic Prelude, 1938-1939.London : Macmillan , 1948.

——.Europe in Decay, 1936-1940.London : Macmillan , 1950.

Nash, Mary , ed. "Mujeres Libres" : España, 1936-1939.Barcelona : Tusquets , 1976.

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1941.See U.S.Department of State.

Negre, Juan.¿Quéés el colectivismo anarquista? Barcelona : Agrupación Anarquista , Los de Ayer y Los de Hoy , 1937.

Negrin, Juan. L' Adieu de Président Négrin aux Combattants Internationaux: Discours prononcé le 9 octobre, 1938. Paris : Delegation de Propagande , 1938.

——. Allocution prononcée le 24 décembre 1938. Paris : Les Archives Espagnoles , 1938.

——. Discours prononcé le 30 septembre, 1938. Paris : Le Comité Franco-Espagnol , 1938.

——. Un discurso. Mexico City : Unión Democrática Española , 1942.

——. Discurso pronunciado el día 26 de febrero de 1938. Barcelona : Ediciones Españolas , 1938.

——. Discurso pronunciado el 18 de junio de 1938. Barcelona : Ediciones Españolas , 1938.

——. L' Espagne en face de la situation internationale: Discours prononcé par S.E. le Dr. Juan Negrín à Barcelone, le 14 octobre 1938. Paris : Delegation de Propagande , 1938.

——. Three Speeches given at the League of Nations Assembly, September 1937. Paris : Cooperative Etoile , 1937.

Negrin, Juan , and Martínez Barrio, Diego. Documentos políticos para la historia de la república española. Mexico City : Colección Malaga , 1945.

\*Negrin, Juan , and Prieto, Indalecio. Carbon copies of letters exchanged between the two Socialiat Leaders in June 1939 , given to Burnett Bolloten by Benigno Rodríguez.

Negrin' s telegram to García Valdecasas , 22 Oct.1938.

Negrín y Prieto, culpables de alta traicion. Buenos Aires : Servicio de Propaganda España , 1939.

Negro Castro, Juan. Españoles en la URSS. Madrid : Gráficos Escelicer , 1959.

\*Nelken, Margarita. Interview ,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Nelson, Steve ; Barrett, James R. : and Ruck, Rob. Steve Nelson: American Radical. Pittsburgh :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1981.

Nenni, Pietro. España. Madrid : Plaza y Janés , 1977.

——. La guerre d' Espagne. Paris : Maspero , 1960.

986 jours de lutte: La guerre nationale et révolutionnaire du peuple espagnol. Paris : Editions Sociales , 1962.

Neville, Edgar. Frente de Madrid. Madrid : Espasa-Calpe , 1941.

Newman, Simon. March 1939: The British Guarantee to Poland. Oxford : Clarendon , 1976.

Nicholson, Helen ( Zglinitzki ) .Death in the Morning.London : Lovat Dickson , 1937.

Niclauss, Karlheinz.Die Sowjetunion und Hitlers Machtergreifung.Bonn : Ludwig Röhrscheid , 1966.

Nicolson, Harold.Diaries and Letters, 1930-1939.Vol.I.London : Collins , 1966.

——.King George the Fifth: His Life and Reign.London : Constable , 1952.

——.The War Years: 1939-1945.New York : Atheneum , 1967.

Nin, Andrés.Els moviments d' emancipaciónacional.Paris : Edicions Catalanes , 1970.

——.Las organizaciones obreras internacionales.Madrid : Torre , 1977.

——.Por la unificación marxista.Madrid : Castellote , 1978.

——.Los problemas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Preface and compilation by Juan Andrade.Paris : Ruedo Ibérico , 1971.

——.La revolución de octubre de 1934, la alianza obrera y el frente popular.Preface by Juan Andrade.Paris : La Batalla , 1970.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1930-1937.Barcelona : Fontamara , 1978.

Nino Nanetti. Paris : Coltura Sociale , 1937.

Noja Ruiz, Higinio. El arte en la revolución: conferencia pronunciada en el cine Coliseum de Barcelona, el día 21 de marzo de 1937. Barcelona : Oficinas de Propaganda CNT-FAI , [1937?].

Nollau, Günther.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and World Revolution. Foreword by Leonard Schapiro. New York : Praeger , 1961.

Norteamérica y la guerra de España. Valencia : Comisariado General de Guerra , 1937.

North, Joseph. Men in the Ranks. New York : Friends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 1939.

———. Why Spain Can Win. New York : Workers Library , 1939.

Nuestra lucha por la unidad. Valencia : J.S.U. , 1937.

Nuestra utopía: PSUC, cincuenta años de historia de Cataluña. Barcelona : Planeta , 1986.

Nuestra programa y el de la CNT. Valenci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Comisión Nacional de Agit-Prop , 1937.

Nunes, Leopoldo. La guerra en España. Granada : Prieto , 1938.

———. Madrid trágico. Cadiz : Cerón , 1938.

Nuñez Morgada, Aurelio. Los sucesos de España vistos por un diplomático. Buenos Aires : Rosso , 1941.

O' Duffy, Eoin. Crusade in Spain. London : Hale , 1938.

Oehler, Hugo. Barricades in Barcelona. New York : Demos Press , 1937.

O' Flanagan, Michael. American Catholics and the War in Spain. Verbatim speech given at Madison Square Garden. New York : n.p. , 1938.

\*Ogilvie-Forbes, Sir George.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Olaya, Francisco. La comedia de la no intervención en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Madrid : Toro , 1976.

Oliveira, Mauricio de. La tragedia española en el mar. Vol. I : Establecimientos Cerón. Vol. II : Las dos Españas en el mar. Vol. III : Marineros de España en guerra. Vol. IV : Aguas de España, zona de guerra. Cádiz : Cerón , 1938-1939.

Ollivier, Marcel. La Guépéou en Espagne. Paris : Librairie du Regionalisme , 1937.

———. Les journées sanglantes de Barcelone. Paris : Spartacus , [1937?].

Olmedo Delgado, Antonio , and Cuesta Monereo, Lieutenant General

José.General Queipo de Llano.Barcelona : AHR , 1958.

Oltra Picó, J.El POUM i la collectivització d' industries i comerços.Barcelona : Editorial Marxista , 1936.

——.Socialización de las fincas urbanas y municipalización de los servicios.Barcelona : Editorial Marxista , 1937.

Orlov, Alexander.See also U.S.Congress.The Legacy of Alexander Orlov.

——. "Answers to the Questionnaire of Professor Stanley G.Payne." 1 April 1968.A copy of this document given to Burnett Bolloten by Professor Payne is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Handbook of Intelligence and Guerrilla Warfare.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63.

——.The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 s Crimes.New York : Random House , 1953.

d' Ormesson, Wladimir.France.London : Longmans , Green , 1939.

Ornitz, Lou.Captured by Franco.New York : Friends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 1939.

Orr, Charles. "Some Facts on the Persecution of Foreign Revolutionaries in 'Republican' Spain." A copy of this typewritten

document by the editor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is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rr, Lois. See Cusick, Lois.

Ortiz de Villajos, C.G. De Sevilla a Madrid. Granada : Prieto , 1937.

Orwell, George. Homage to Catalonia. London : Secker and Warburg , 1938.

Ossorio y Gallardo, Angel. Discursos pronunciados los días 25 de agosto y 6 de septiembre de 1936 respectivamente. Madrid : Socorro Rojo Internacional , 1936.

———. Mis memorias. Buenos Aires : Losada , 1946.

———. The Religious Problem in Spain. Washington , D.C. : Bureau of Information , Spanish Embassy , 1937.

———. Spain' s Future. Speech made at the Maison de Chimie , Paris , Feb. 22 , 1937. n.p. , 1937.

———. Vida y sacrificio de Companys. Buenos Aires : Losada , 1943.

Outlin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Moscow : Progress , 1971.

Ovendale, Ritchie. Appeasement and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Cardiff :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 1975.



Oyarzun, Roman.Historia del Carlismo.Bilbao : Edicions FE , 1939.

Paassen, Pierre van.Days of our Years.New York : Hillman-Curl , 1939.

Pabón, Jesús.Los virajes hacia la guerra, 1934-1939.Madrid :  
Sucesores de Rivadeneyra , 1946.

Pacciardi, Randolfo.Il battaglione Garibaldi.Lugano : Nuove Edizioni  
di Capolago , 1938.

Padelford, Norman J.International Law and Diplomacy in the Spanish  
Civil Strife.New York : Macmillan , 1939.

Padilla Bolívar, Antonio.El movimiento anarquista  
español.Barcelona : Planeta , 1976.

Pagès, Pelai.Andreu Nin: Su evolución política, 1911-1937.Bilboa :  
Zero , 1975.

——.Historia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Barcelona : Hacer ,  
1978.

——.El movimiento trotskista en España, 1930-1935: La 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 y las disidencias comunistas durante la  
segunda república.Barcelona : Ediciones Península , 1977.

Palacín, Santiago.La revolución y el campo.Barcelona : Editorial  
Marxista , 1937.

Palacio, Léo.1936: La maldonne espagnole.Ou la guerre d' Espagne  
comme repetition générale du 2ème conflit mondial.Toulouse :  
Privat , 1986.

Palacio, Solano.La tragedia del norte.Barcelona : "Tierra y  
Libertad , " 1938.

Palacio Atard, Vicente.Cinco historias de la república y de la  
guerra.Madrid : Editora Nacional , 1973.

—— , ed.Cuadernos bibliográfico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 1936-  
1939: Memorias y reportajes de testigos.Madrid : Universidad de  
Madrid , 1970.

Palacio Atard, Vicente , et al.Aproximación histórica a la guerra  
española, 1936-1939.Madrid : Universidad de Madrid , 1970.

Palencia, Isabel de.I Must Have Liberty.New York : Longmans , Green ,  
1940.

Pàmies, Teresa.Una española llamada Dolores Ibárruri.Mexico City :  
Roca , 1975.

Panés, Antonio.Estampas de la revolución.Madrid : Goya , 1941.

Paniagua, Xavier.La sociedad libertaria:Agrarismo e  
industrialización en el anarquismo español, 1930-1939.Barcelona :  
Grijalbo , 1982.

Pankrashova, M. , and Sipols, V. Why War Was Not Prevented. Moscow :  
Novosti Press Agency , 1970.

Pantaloni-Ensegnat, Odette. Segunda república y guerra civil. Paris :  
Masson , 1970.

Para que el campesino tenga tierras, trabajo, libertad y  
bienestar. Barcelona : 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 [1937?].

Parker, A.A. The Catholic Church in Spain. London : Catholic Truth  
Society , 1938.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295 , Fifth Series. London : HMSO.

Parti Communiste. Congrès National , 9th , Arles , 1937. Le peuple de  
France aux côtes de l' Espagne républicaine: extraits des rapports  
et interventions. Discours de Camarade Delicado. Paris :  
Comité populaire de propagande , 1938.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Comité Central. Programa de acción común  
para la creación del partido unico del proletariado. n.p. , [1937?].

El partido comunista por la libertad y la independencia de España:  
Llamamientos y discursos. Valencia : Ediciones del P.C. de E. ,  
Comisión Nacional de Agitación y Propaganda , 1937.

El partido comunista y la unidad antifascista. Valencia : Sección de  
Prensa y Propaganda del Comité Peninsular de la FAI , 1937.

Pascual Cevallos, Fernando. Luchas agrarias en Sevilla durante la segunda república. Sevilla : Diputación Provincial de Sevilla , 1983.

La Pasionaria. See Ibárruti, Dolores.

Pastor Petit, D. La cinquena columna a Catalunya, 1936-1939. Barcelona : Galba , 1978.

———. Los dossiers secrets de la guerra civil. Barcelona : Argos , 1978.

Paul, Elliot.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Spanish Town. New York : Random House , 1937.

Paul Boncour, Joseph. Entre deux guerres: Sur les chemins de la défaite, 1935-1940. Vol. III. New York : Brentano' s , 1946.

Payne, Robert. The Civil War in Spain, 1936-1939. New York : Putnam , 1962.

———, ed. The Civil War in Spain, 1936-1939. London : Secker and Warburg , 1963.

Payne, Stanley G. Basque Nationalism. Reno :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1975.

———. Falange.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61.

———. The Franco Regime, 1936-1975. Madison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1987.

——.El nacionalismo vasco: De sus orígenes a la ETA.Barcelona :  
Dopesa , 1974.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in Modern Spain.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67.

——.La revolución y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Madrid : Júcar , 1976.

——.The Spanish Revolution.New York : Norton , 1970.

—— , ed.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wentieth-Century  
Spain.Introduction by Stanley G.Payne.New York : Franklin Watts ,  
1976.

Paz, Abel.Durruti en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Barcelona : Laia , 1986.

——.Durruti: Le peuple en armes.Paris : Tête de Feuilles , 1972.

Paz, Armando.Los servicios de espionaje en la guerra civil de  
España, 1936-1939.Madrid : San Martín , 1976.

PCE en sus documentos, 1920-1977.Madrid : Hoac , 1977.

\*Pearson, Captain H.M.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Peers, E.Allison.Catalonia Infelix.London : Methuen , 1937.

——.Spain, the Church and Orders.London : Eyre and Spottiswoode ,

1939.

——.The Spanish Tragedy.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37.

Peirats, José (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Intercontinental Secretariat of the CNT in Exile ) .Los anarquistas en la crisis política española.Buenos Aires : Alfa , 1964.

——.La CNT en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Vols.I , II , III.Toulouse : C.N.Y. , 1951 , 1952 , and 1953.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Examen crítico-constructivo del movimiento libertario español.Mexico City : Editores mexicanos unidos , 1967.

——.Figuras del movimiento libertario español.Barcelona : Picazo , 1978.

Peiró, Juan.Pensamiento de J.P.: Trayectoria de la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Ideas sobre sindicalismo y anarquismo; apuntes biográficos.Mexico City : CNT , 1959.

——.Perill a la reraguarda.Mataró : Libertat , [1937?].

——.Problemas del sindicalismo y del anarquismo.Toulouse : E.M.L.E. , 1945.

——.Problemas y cintarazos.Rennes : Imprimeries Réunies , 1946.

——. Trayectoria de la CNT: Sindicalismo y anarquismo. Madrid : Júcar , 1979.

Penchienati, Carlo. Brigate internazionali in Spagna: Delitti della "Ceka" comunista. Milan : Echi del Secolo , 1950.

\*Pérez, Emilio. Interview ,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Pérez, Manuel. Cuatro meses de barbarie: Mallorca bajo el terror fascista. Barcelona : Servicio de Información CNT-AIT , 1937.

Pérez-Baró, Albert. Autogestió obrera i altres temes. Barcelona : Pòrtic , 1974.

——. Treinta meses de colectivismo en Cataluña, 1936-1939. Barcelona : Ariel , 1974.

——. 30 mesos de col·lectivisme a Catalunya, 1936-1939. Barcelona : Ariel , 1970.

Pérez de la Dehesa, Rafael , ed. Joaquín Costa: Oligarquía y caciquismo. Colectivismo agrario y otros escritos. Madrid : Alianza , 1979.

Pérez de Olaguer, Antonio. El terror rojo en Andalucía. Burgos : Ediciones Antisectarias , 1938.

——. El terror rojo en Cataluña. Burgos : Ediciones Antisectarias ,

1937.

Pérez de Urbel, Justo. Los mártires de la iglesia. Barcelona : AHR , 1956.

Pérez Madrigal, Joaquín. Aquíes la emisora de la flota republicana. Avila : Sigirano Díaz , 1938.

——. Augurios, estallido y episodios de laguerra civil. Avila : Sigirano Díaz , 1938.

——. Disparos a cero. Madrid : Ediciones Españolas , 1939.

——. Tipos y sombras de la tragedia. Avila : Sigirano Díaz , 1937.

Pérez Ramírez, Antonio. La gesta heroica de España: El movimiento patriótico en Aragón. Zaragoza : Heraldo de Aragón , 1936.

\*Pérez Salas, Colonel Jesús.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Guerra en España , 1936-1939. Preface by Colonel Mariano Salafranca. Mexico City : Imprenta Grafos , 1947.

Pérez Serrano, Nicolás. La constitución española ( 9 dic.1931 ) : Antecedentes, entarios. Madrid : Editorial Revista de Derecho Privado , 1932.

Pérez Solís, Oscar. Sitio y defensa de Oviedo. Valladolid-Palencia : Afrodisio Aguado , 1938.



La persecution religieuse en Espagne. Paris : Plon , 1937.

Pertinax. See Geraud, André.

Pétrément, Simone. Simone Weil: A Life. New York : Pantheon , 1976.

Pettifer, James , ed. Cockburn in Spain: Despatches from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 Lawrence and Wishart , 1986.

Le peuple de France aux côtés de l' Espagne républicaine. Paris : Comité Populaire de Propagande , 1937.

Piera, Dolores. Informe presentado a la primera conferencia nacional del partido socialista unificado de cataluña ( IC ) . Barcelona : Agitación y Propaganda del PSUC , [1937?].

Pike, David Wingeate. Conjecture, Propaganda, and Deceit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Stanford :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1968.

———. La crise espagnole de 1936 vue par la presse française. Toulouse : Université de Toulouse , 1966.

———. Les Français et la guerre d' Espagne, 1936-1939.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1975.

———. Vae Victis! Los republicanos españoles refugiados en Francia, 1939-1944. Paris : Ruedo Ibérico , 1969.

Pino, Francisco. Asalto a la cárcel modelo. Madrid : Aguilar , 1939.

Pi Sunyer, Carlos. La república y la guerra: Memorias de un político catalán. Mexico City : Oasis , 1975.

Pitcairn, Frank [Claud Cockburn]. Reporter in Spain. London : Lawrence and Wishart , 1936.

Pius XI. Encyclical on Spain. New York : American Press , 1937.

———. The Spanish Terror. London : Catholic Truth Society , 1936.

Plá, José. Historia de la segunda república española (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 ) , Vols. I , II , III , IV. Barcelona : Destino , 1941.

Poblet, Josep M. Els darrers temps de la Generalitat i la república. Barcelona : Dopesa , 1978.

Pod znamenem ispanskoi respubliki, 1936-1939: Vospominaniia sovetskikh dobrovoltagev- uchastnikov. Moscow : Izdatel' stvo Nauka , 1965.

Política del frente popular en agricultura. Madrid-Valencia : Españolas , 1937.

La política financiera de la Generalidad durante la revolución y la guerra. Barcelona : 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 1936.

Pollitt, Harry. Aems for Spain. London :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 1936.

——.Pollitt Visits Spain: Harry Pollitt' s Story of His Visit to Spain in December, 1937.London : International Brigade Wounded and Dependents' Aid Fund , 1938.

——.Save Spain from Fascism.London , [1936?].

Ponamariova, L.V.La formación del 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Barcelona : Icaria , 1977.

Ponce, Anibal.Examen de la España actual.Montevideo : Ediciones "Mundo" , 1938.

Poncins, Léon de.Histoire secrete de la revolution espagnole.Paris : Beauchesne , 1938.

Ponomariov, B. , ed.Historia de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la URSS, 1917-1945.Moscow : Progreso , n.d.

Pons, Agustí.Converses amb Federica Montseny.Barcelona : Laia , 1977.

Pons Prades, Eduardo.Guerrillas españolas, 1936-1960.Barcelona : Planeta , 1977.

Pool, James , and Pool, Suzanne.Who Financed Hitler?.New York : Dial , 1978.

Porcel, Baltasar.Conversaciones con el honorable

Tarradellas.Barcelona : Plaza y Janés , 1977.

Poretzky, Elizabeth K.Our Own People.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69.

Por Euzkadi hacia la victoria.Madrid-Valencia : Ediciones Españolas , 1937.

Por la revolución agraria.Madrid : 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Trabajadores de la Tierra , UGT , 1937.

Portugal ante la guerra civil de España: Documentos y notas.Lisbon : SPN , n.d.

Portuondo, E.La segunda república: Reforma,fascismo y revolución.Madrid : Editorial Revolución , 1981.

Por una cooperative en cada pueblo: Dentro del instituto de reforma agraria.Valencia : 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 1937.

Por una justicia popular, humana y democrática.Barcelona : Ministerio de Justicia , [1937?].

Possoni, Stefan Thomas.A Century of Conflict: Communist Techniques of World Revolution.Chicago : Regnery , 1953.

\*Pou, Bernardo.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El POUM ante los problemas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Presentación

de Wilebaldo Solano. Paris : La Batalla , 1972.

POUM. Hasta vencer o morir. Paris : Comité de Ayuda del POUM , [1938?].

Pourquoi l' Italie fait la guerre à l' Espagne. Paris : Comité Franco-Espagnol , 1939.

Pous i Pagés, J. Al marge de la revoluciói de la guerra. Barcelona : Casa de Cultura , 1937.

Powell, T.G. Mexico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Albuquerque :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 1981.

\*Pozas, General Sebastián. Interview ,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Pozharskaia, Svetlana Petrovna. Sotsialisticheskaia rabochaia partiia Ispanii, 1931-1939. Moscow : Nauka , 1966.

Prader, Jean. Au secours de L' Espagne socialiste. Paris : Spartacus , 1936.

Prado Moura, Angel de. El movimiento obrero en Valladolid durante la II república, 1931-1936. Valladolid : Junta de Castilla y León , 1985.

Prats, Alardo. Vanguardia y retaguardia de Aragón. Buenos Aires : Perseo , 1938.

Pratt, Lawrence R. East of Malta, West of Suez: Britain' s

Mediterranean Crisis, 1936-1939.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5.

The Premature Anti-Fascists: North American Volunteer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 : Praeger , 1986.

Preston, Paul. The Coming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 Macmillan , 1978.

———. Las derechas españolas en el siglo XX: Autoritarismo, fascismo y golpismo. Madrid : Sistema , 1986.

———. La destrucción de la democracia en España. Madrid : Turner , 1978.

———.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London :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1986.

Prieto, Carlos. Spanish Front. London : Nelson , 1936.

Prieto, Horatio M. El anarquismo español en la lucha política. Paris : n.p. , 1946.

———. Marxismo y socialismo Libertario. Paris : Ediciones Madrid , 1947.

———. El movimiento libertario español y sus necesidades urgentes. Paris : Galería , n.d.

——.Posibilismo Libertario.Val-de-Marne , France : Gondoles , 1966.

Prieto, Indalecio.Cómo y por qué salí del ministerio de defensa nacional.Mexico City : Impresos y Papeles , 1940.Also French edition , Paris : Imprimerie Nouvelle , 1939.

——.Convulsiones de España.Vols.I , II , III.Mexico City : Oasis , 1967.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De mi vida.Vol.I.Mexico City : Ediciones El Sitio , 1965.

——.Dentro y fuera del gobierno: Discursos parlamentarios.Mexico City : Oasis , 1975.

——.Discursos fundamentales.Preface by Edward Malefakis.Madrid : Turner , 1975.

——.Inauguración del círculo "Pablo Iglesias" de México.Mexico City : n.p. , 1940.

——.Palabras al viento.Mexico City : Minerva , 1942.

——.Palabras de ayer y de hoy.Santiago : Ercilla , 1938.

——. "Reply to Jordi Arquer' s Questionnaire." Hoover Institution , Bolloten Collection.

Prieto, Tomás. Héroes y gestas de la cruzada: Datos para la historia. Madrid: Tormes, 1942.

Primo de Rivera, José Antonio. Discursos frente al parlamento. Barcelona: F.E., 1939.

Programa de acción común para la creación del partido único del proletariado. Valencia: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1937.

Programa de unidad de acción entre UGT-CNT. Barcelona: Españolas, 1938.

Prominent Personalities in the USSR.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68.

Propaganda y cultura en los frentes de guerra. Valencia: Ministerio de la Guerra, Comisariado General de Guerra, 1937.

Propagande culturelle. Valencia: 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1938.

"Proyecto que la Delegación Regional de Reforma Agraria Presenta para su Aprobación al Comité Regional del Frente Popular de Aragón."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Salamanca, Leg. 616/816-3

Prudhommeaux, A. and Prudhommeaux, D. Catalogne libertaire, 1936-1937: L'armement du peuple. Que sont la CNT et la FAI? Paris: Spartacus, 1946.



PSOE en sus documentos, 1879-1977. Madrid : Hoac , 1977.

El PSU davant la situació actual. Barcelona : Agitació i Propaganda PSU , 1938.

Puente, Isaac. El comunismo libertario: Apunte biográfico de Juan Ferrer. Epílogo de Federica Montseny. Toulouse : Espoir , n.d.

———. Finalidad de la CNT: El comunismo libertario. Barcelona : Tierra y Libertad , 1936.

———. Propaganda. Barcelona : Tierra y Libertad , 1938.

Puig, Jaime J. Historia de la Guardia Civil. Barcelona : Editorial Mitre , 1984.

Puig Mora, E. [El Ciudadano Desconocido]. La tragedia roja en Barcelona. Saragossa : Librería General , 1937.

Puzzo, Dante A. Spain and the Great Powers, 1936-1941.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62.

Queipo de Llano, Rosario. De la cheka de Atadell a la prisión de Alacuas. Valladolid : Santarén , 1939.

Quintanilla, Luis. Los rehenes del Alcázar de Toledo: Testimonios 2. Paris : Ruedo Ibérico , 1967.

Rabasseire, Henri [Henry M. Pachter]. Espagne: creuset

politique.Paris : Fustier , 1938.

Rama, Carlos M.La crisis española del siglo XX.Mexico City :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 1960.

———.Fascismo y anarquismo en la España contemporánea.Barcelona : Bruguera , 1979.

——— , ed.Camillo Berneri: Guerra de clase en España, 1936-1937.Barcelona : Tusquets , 1977.

Ramirez Jiménez, Manuel.Las reformas de la II república.Madrid : Júcar , 1977.

Ramón Alonso, José.Historia política del ejército español.Madrid : Editora Nacional , 1974.

Ramón Jiménez, Juan.Guerra en España.Barcelona : Seix Barral , 1985.

Ramos, Vicente.La guerra civil, 1936-1939, en la provincia de Alicante.Vols.I , II , III.Alicante : Biblioteca Alicantina , 1972-1974.

Ramos Olivreira, Antonio.The Drama of Spain from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Republic to the Civil War, 1931-1936.London : National Council of Labour , [1936?].

———.On the Eve of Civil War in Spain.London : Friends of Spain ,

1937.

——.Politics, Economics and Men of Modern Spain, 1808-1946.London : Gollancz , 1946.

Ranzato, Gabriel.Lucha de clases y lucha política en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Barcelona : Anagrama , 1979.

Ravines, Eudocio.La gran estafa.Mexico City : Libros y Revistas , 1952.

——.The Yenán Way ( translation of La gran estafa ) .New York : Scribner' s Sons , 1951.

Raymundo, Francisco J.de.Cómo se inicióel glorioso movimiento nacional en Valladolid y gesta heroica del Alto del León.Valladolid : Imprenta Católica , 1936.

Read, Jan.The Catalans.London : Faber , 1978.

Redondo, General Luis , and Zavala, Comandante Juan de.El Requeté: Tradición no muere.Barcelona : AHR , 1957.

La reforma agraria en España.Valencia : Instituto du Reforma Agraria , 1937.

La reforma agraria y los problemas del campo bajo la república española.Buenos Aires : Servicio Español de Información , Prensa

Hispánica , [1938?].

\*Regler, Gustav.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The Great Crusade. New York : Longmans , Green , 1940.

———. The Owl of Minerva: The Autobiography of Gustav Regler. London : Reput Hart-Davis , 1959.

Reid, John T. Modern Spain and Liberalism.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37.

Relief Organizations. Reports and appeals by various relief organizations. Bound volumn in Hoover Institution , Bolloten Collection.

Rello, Salvador. La aviación en la guerra de España. Madrid : San Martín , 1972.

\*Renn, Ludwig. Interview ,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Der spanische Krieg. Berlin : Aufbau , 1956.

Reparaz y Tresgallo de Souza, Captain Antonio. Desde el cuartelgeneral de Miaja al santuario de la Virgen de la Cabeza. Valladolid : Afrodисio Aguado , 1937.

Report of a Religious Delegation to Spain, April 1937. London : Gollancz , 1937.

Reppard, Theodore. The Spanish Revolt. London : Gollancz , 1936.

Requeña Gallego, Manuel. Los sucesos de Yeste. Albacete : Instituto de Estudios Albacetenses , 1983.

"Reunión de la Comisión Agraria del Partido Comunista Celebrada en Caspe el día 9 de Octubre de 1937."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 Salamanca , Leg.616/816-3.

La revolution espagnole, 1936-1939. Supplémentá "Etudes Marxistes" No.7-8. Paris : Etudes Marxistes , 1969.

Revolution und Gegenrevolution: Die Ereignisse des Mai 1937 in Katalonien. Barcelona : Asy , 1937.

Reynaud, Paul. La France a sauvé l' Europe. Vol.I. Paris : Flammarion , 1947.

Richards, Vernon.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6-1939. London : Freedom Press , 1953. Also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s published in 1972 and 1983.

Richardson, R.Dan. Comintern Army: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Lexington :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 1982.

Rieger, Max. Espionaje en España. Preface By José Bergamín. Barcelona : Ediciones "Unidad" , 1938.

Rienffer, Karl. *Comunistas españoles en América*. Madrid : Editora Nacional , 1953.

Rimblas, José. *España vence a la Internacional Comunista*. Barcelona : Sopena , 1939.

\*Río, Ricardo del , director of the Febus news agency. Information on various important events written by Del Río and shorthand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during conversation with him.

\*——. Unpublished report on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ituation in Catalonia during the last few months of the war.

Ríos, Fernando de los. *What Is Happening in Spain?* London : Spanish Embassy , 1937.

Ríos, Isabel. *Testimonio de la guerra civil*. Coryña : Castro , 1986.

Rio Tinto Company Limited: *Report of the Transactions at the Sixty-Third 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London : Río Tinto Company , 24 April 1936.

Risco, P. Alberto, S.J. *La epopeya del Alcázar de Toledo*. San Sebastian : Editorial Española , 1941.

Rivas, Fernando. *El frente popular*. Madrid : San Martín , 1976.

Rivas-Cherif, Cipriano. *Retrato de un desconocido: Vida de Manuel*

Azaña.Mexico City : Oasis , 1961.

Rivero Sanchez, Manuel.Odisea y gesta de Oviedo Las Palmas :  
Canaria , 1938.

Rivero Solozábal, Francisco.Asífué...Santander: Revolución, 18 julio  
1936-26 agosto 1937.Santander : Alonso , n.d.

Robertson, Esmonde M. , ed.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 : Macmillan , 1971.

Robinson, Richard A.H.The Origins of Franco' s Spain: The Right,  
the Republic and Revolution, 1931-1936.Newton Abbott : David and  
Charles , 1970.

Robrieux, Philippe.Histoire intérieure du parti communiste, 1920-  
1945.Paris : Fayard , 1980.

Rock, William R.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New York : Norton ,  
1977.

Rocker Collection.Photocopies of several hundred pages of document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Rudolph Rocker i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Hoover Institution.

Rocker, Rudolf.Anarcho-Syndicalism.London : Secker and Warburg ,  
1938.

———.Extranjeros en España.Buenos Aires : Imán , 1938.

———.The Tragedy of Spain.New York : Freie Arbiter Stimme , 1937.

\*Rodríguez, Benigno.Interview ,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Rodríguez de Cueto, José.Epopeya del santuario de Santa María de la Cabeza.San Sebastián : Editorial Española , 1939.

Rodríguez Salas, Eusebio.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 Dossier , CNT-FAI Archives.Paquete 005 , Caja 305.B.Informes.Dossier 90.Photocopies in Hoover Institution , Bolloten Collection.

Rodríguez Vega, José.3er congres de la UGT a Catalunya: Discurs de JoséRodríguez Vega, secretario general de la Unio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de España.Barcelona : UGT , 1937.

Rojas, Carlos.Azaña.Barcelona : Planeta , 1973.

———.Los dos presidentes: Azaña—Companys.Barcelona : Dirosa , 1977.

———.La guerra civil vista por los exiliados.Barcelona : Planeta , 1975.

———.La guerra en Catalunya.Barcelona : Plaza y Janés , 1979.

———.Por quéperdimos la guerra: Antología de testimonios de los vencidos en la contienda civil.Barcelona : Nauta , 1970.



Rojo, General Vicente. ¡Alerta los pueblos! Estudio político-militar del período final de la guerra española. Buenos Aires : López , 1939.

———. Así fué la defensa de Madrid. Mexico City : Era , 1967.

———. España heroica. Buenos Aires : Editorial Americalee , 1942.

Rolfe, Edwin. The Lincoln Battalion. New York : Random House , 1939.

Romano, Julio. Sanjurjo. Madrid : Imprenta de la Viuda de Juan Pueyo , 1940.

Romero, Colonel Luis. Impresiones de un military republicano. Barcelona : Oficinas de Propaganda CNT-FAI , 1937.

Romero, Luis. Cara y cruz de la república, 1931-1936. Barcelona : Planet , 1980.

———. Desastre en Cartagena ( marzo de 1939 ) . Barcelona : Ariel , 1971.

———. El final de la guerra. Barcelona : Ariel , 1976.

———. Por qué y cómo mataron a Calvo Sotelo. Barcelona : Planet , 1982.

———. Tres días de julio: 18 , 19 y 20 de 1936. Barcelona : Ariel , 1967.

Romero Solano, Luis. Víspera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 Mexico City : El Libro Perfecto , 1947.

Romilly, Esmond. Boadilla. London : Hamish Hamilton , 1937.

Ros, Félix.Preventotio D.Barcelona : Yunque , 1939.

Rosado, Antonio.Tierra y libertad: Memorias de un campesino anarcosindicalista andaluz.Barcelona : Grijalbo , 1979.

Rosal, Amaro del.Los congresos internacionales en el siglo XX.Barcelona : Grijalbo , 1975.

——.Historia de la UGT de España, 1901-1939.Vol.II.Barcelona : Grijalbo , 1977.

——.El oro del Banco de España y la historia del Vita.Barcelona : Grijalbo , 1977.

Rosselli,Carlo.Oggi in Spagna, domain in Italia.Paris : Edizioni di giustizia i libertà , 1938.

Das Rotbuchüber Spanien.Berlin-Leipzig : Nibelungen , 1937.

Rothstein, Andrew.The Munich Conspiracy.London : Lawrence and Wishart , 1958.

Roux, Georges.La guerre civile d' Espagne.Paris : Fayard , 1963.

Roviri i Virgili, A.Els darrers dies de la Catalunya republicana.Buenos Aires : Edicions de la Revista Cataluña , 1940.

Rowse, A.L.All Souls.London : Macmillan , 1961.

——.Appeasement.New York : Norton , 1961.

Rubashkin, A.Mikhail Koltsov.Leningrad : 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 1971.

Rubio, Javier.Asilos y canjes durant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Barcelona : Planeta , 1979.

——.La emigración de la guerra civil de 1936-1939.Vol.I , II , III.Madrid : San Martín , 1977.

——.La emigración española a Feancia.Barcelona : Ariel , 1974.

RubioCabeza, Manuel.Las voces de la república.Barcelona : Planeta , 1985.

Rubiói Tudurí, Mariano.La justicia en Cataluña: 19 de julio de 1936-19 defebrero de 1937.Paris : n.p. , 1937.

Ruediger, Helmut.See also Dashar, M.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Ensayo crítico sobr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Buenos Aires : Imán , 1940.

——.Informe para el congreso extraordinario de la AIT, el día 6 de diciembre de 1937.Paris , 1937.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 Labadie Collection. )

——.Report to the AIT dated 8 May 1937.A copy of this report is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 Bolloten Collection.

Ruiz Vilaplana, Antonio.Burgos Justice: A Year' s Experience of Nationalist Spain.New York : Knopf , 1938.

——.Doy fe Buenos Aires : Perseo , 1938.

Russkie sovetskii pisateli-prozaiki.Vol.I , II , III , IV.Leningrad : Publichnaia Biblioteka , 1959-1966.

Rust, William.Britons in Spain.London : Lawrence and Wishart , 1939.

——.Spain Fights for Victory.London :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 1938.

Sabater, Jordi.Anarquisme i catalanisme: La CNT i el fet nacional catalàDurant la guerra civil.Barcelona : Eds.62 , 1986.

Sabater, Miguel.Estampas del cautiverio rojo: Memorias de un preso del SIM.Barcelona : Librería Religiosa , 1942.

Saborit, Andrés.Asturias y sus hombres.Toulouse : Imprimerie Dulaurier , 1964.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Julián Besteiro: Figuras del socialismo español.Mexico City : Impresiones Modernas , 1961.

——.El pensamiento político de Julián Besteiro.Madrid : Seminarios y Ediciones , 1974.

Sáenz, Vicente.España en sus gloriosas jornadas de julio y agosto de 1936.San José , Costa Rica : La Tribuna , 1936.

——.España heroica.New York : Iberoamericana , 1938.

Sagardía, General.Del Alto Ebro a las Fuentes del Llobregat.Barcelona : Editora Nacional , 1940.

Saíz Valdivielso, Alfonso Carlos.Indalecio Prieto:Crónica de un corazón.Barcelona : Planeta , 1984.

Salas Larrazábal, Jesús.Intervención extranjera en la guerra de España.Madrid : Editora Nacional , 1974.

Salas Larrazábal, Ramón.Los datos exactos de la guerra civil.Madrid : Dracena , 1980.

——.Historia del ejército popular de la república.Vols.I , II , III , IV.Madrid : Editora Nacional , 1973.

——.Pérdidas de la guerra.Barcelona : Planeta , 1977.

Salas Larrazábal, Ramón , and Salas Larrazábal, Jesús María.Historia general de la guerra de España.Madrid : Rialp , 1986.

Salaün, Serge.La poesía de la guerra de España.Madrid : Castalia ,

19865.

Salazar, Ramón Hidalgo. La ayuda alemana a España, 1936-1939. Madrid : San Martín , 1975.

Sallés, Anna. Quan Catalunya rea d' Esquerra. Barcelona : Eds.62 , 1986.

Salter, Cedric. Try-Out in Spain. New York : Harper , 19439.

\*Saña, Heleno.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La Internacional Comunista, 1919-1945. Vols. I , II. Algorta ( Vizcaya ) : Zero , 1972.

Sanabria, Fernando. Madris bajo las hordas. Avila : SHADE , 1938.

Sánchez, JoséM. The Spanish Civil War as a Religious Tragedy. Notre Dame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1987.

Sánchez, Juan Lario. Habla un aviador de la república. Madrid : Toro , 1973.

Sánchez-Albornoz, Claudio. Anecdulario político. Barcelona : Planeta , 1976.

———. Mi testamento histórico-político. Barcelona : Planeta , 1975.

Sánchez del Arco, Manuel. El sur de España en la reconquistade

Madrid.Seville : Sevillana , 1937.

Sánchez Guerra, Rafael.Mes prisons: Mémoires d' un rouge.Paris :  
Vigneau , 1947.

\*Sánchez Román, Felipe.Interview ,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Sánchez y Rueda, Enrique.De Sigüenza a Madrid pasando por  
Guadalajara.Sigüenza : Sánchez y Rueda , 1939.

Sandoval, José , and Azcárate, Manuel.Spain, 1936-1939.London :  
Lawrence and Wishart , 1963.

Sans, Ricard M.Montserrat, 1936-1939 : Episodis viscuts.Montserrat :  
Abadia de Montserrat , 1984.

Sanz, Ricardo.Buenaventura Durruti.Toulouse : El Frente , 1945.

——.Los que fuimos a Madrid: Columna Durruti 26  
Division.Toulouse : Dulaurier , 1969.

——.El sindicalismo y la política:  
Los "solidarios" y "nosotros" .Toulouse : Dulaurier , 1966.

Sanz y Díaz, José.Por las rochas del Tajo.Valladolid : Santarén ,  
1938.

Sardá, Rafael.Las colectividades agrícolas.Barcelona : Editorial  
Marxista , 1937.

Sartin, Max. Berneri en Ispagna. Newark , N.J. : Adunata dei Refrattari , [1938?].

Savich, Ovadii. Dva goda v. Ispanii, 1937-1939. Moscow : Sovetskii Pisatel' , 1975.

Scanlon, Geraldine M. La polémica feminista en la España contemporánea, 1868-1974. Madrid : Siglo XXI , 1977.

Schspiros, Alexander , and Jong, Albert de. Waarom verloren wij de revolutie? Baarn : Archief , 1979.

Schspiros, Leonard B.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 Eyre and Spottiswoode , 1960.

Schempp, Otto. Das autoritäre Spanien. Leipzig : Goldmann , 1939.

Schlager, Felix. Diplomat im roten Madrid. Berlin : Herbig , 1938.

Schmid, Robert. Das rot-schwartz Spanien: zur rolle des Anarchismus i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 Aachen : Rader , 1986.

Schmigalle, Günther. André Malraux und der spanische Bürgerkrieg. Bonn : Bouvier , 1980.

Schneider, Luis Mario. I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escritores antifascistas ( 1937 ) . Vol. I : Inteligencia y guerra civil en España. Barcelona : Laia , 1978.



Schulz, Arno. Seekriegsrechtliche Fragen i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 Würzburg-Aumühle : Triltsch , 1939.

Schwartz, Fernando. La internacionalización de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Julio de 1936-marzo de 1937. Barcelona : Ariel , 1971.

\*Schwartzmann, Manuel. "L' Industrie de Guerre de la République Espagnol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given to Burnett Bolloten by Schwartzmann.

\*———. "La Naissance et l' Activité de la D.E.C.A. en Espagn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given to Burnett Bolloten by Schwartzmann , who worked under Soviet direction in the anti-aircraft defense and war industries in the Republican zone.

Schweppenburg, Geyr von , and Franz, Leo Dietrich. The Critical Years. London : Wingate , 1952.

Scope of Soviet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ee U.S. Congress.

Seco Serrano, Carlos. Historia de España: Gran historia general de los pueblos hispanos. Vol. VI. Barcelona : Instituto Gallach de Librería y Ediciones , 1962.

Sedwick, Frank. The Tragedy of Manuel Azaña and the Fate of the Spanish Republic. Columbus :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1963.

Segundo congreso del 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en el

exilio.Toulouse : PSOE , 1946.

\*Seidman, Michael. "Work and Revolution: Workers' Control in Barcelona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8."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emprún, Jorge.Autobiografía de Federico Sánchez.Barcelona : Planeta , 1977.

Semprún Gurrea, JoséMaría.A Catholic Looks at Spain.London : Labour Publications Dept. , 1937.

Semprún Maura, Carlos.Ni dios, ni amo, ni CNT.Barcelona : Tusquets , 1978.

——.Révolution et contre-révolution en Catalogne.Tours : Mame , 1974.

Sencourt, Robert.Spain' s Ordeal.London : Longmans , Green , 1940.

Sender, Ramón.Counter-Attack in Spain.Boston : Houghton Mifflin , 1937.

——.Crónica del pueblo en armas.Madrid-Valencia : Ediciones Españolas , 1936.

Serge, Victor.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67.

\*Serra Pàmies, Miguel. Interview,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Serrano, Seundino. La guerrilla antifranquista en León, 1936-1951. Valladolid: Junta de Castilla y León, 1986.

Serrano Poncela, Segundo. La conferencia nacional de juventudes. Valencia: JSU de España, 1937.

Serrano Súñer, Ramón. Entre Hendaya y Gibraltar: Frente a una leyenda. Madrid: Ediciones y Publicaciones Españolas, 1947.

Servicio Español de Información. Lo que los facciosos quieren que se olvide. Madrid: Servicio Español de Información, 1936.

Servicio Histórico Militar. See also Martínez Bande, Colonel José Manuel.

———. Archivo de la Guerra de Liberación. Documentación Roja. Madrid.

———. Partes oficiales de guerra, 1936-1939. Vol. I: El Ejército Nacional. Vol. II: El Ejército de la República. Madrid: San Martín, 1977.

Seton-Watson, R.W. Britain and the Dictators. New York: Macmillan, 1938.

Sevilla Andrés, Diego. Historia política de la zona roja. Madrid: Rialp, 1963.

Sharkey, Paul. The Friends of Durruti: A Chronology. Tokyo : Editorial Crisol , 1984.

Shirer, William 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 : Simon and Schuster , 1960.

Shkarenkov, L.K. Agoniia beloi emigratsii. Moscow : Mysel , 1981.

Shubert, Adrian. Hacia la revolución: Orígenes sociales del movimiento obrero en Asturias, 1860-1934. Barcelona : Grijalbo , 1984.

Shubert, Adrian , and Esenwein, George. The Spanish Civil War: War of Many Wars. London : Longmans , 1988.

Sieberer, A. Espagne contre Espagne. Geneva : Jeheber , 1937.

Siete de octubre: Una nueva era en el campo. Madrid : 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 1936.

Sigüenza en 1936 bajo el dominio rojo. Sigüenza : Sánchez y Rueda , 1937.

Silex, Karl. Der Marsch auf Madrid. Leipzig : Seemann , 1937.

Silva, José. La revolución popular en el campo. Valenci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7.

Simon, O.K. Hitler en Espagne. Paris : Denoël , 1938.

Simon, Sir John ( Lord Templewood ) .Retrospect.London : Hutchinson , 1952.

Siqueiros, David Alfaro.Me llamaban el coronelazo (memorias) .Mexico City : Biografías Gadesa , 1977.

Smith, Bradley F.The American Road to Nuremberg: The DocumentaryRecord, 1944-1945.Stanford : Hoover Press , 1982.

——.The Road to Nuremberg.New York : Basic Books , 1981.

Smith, Lois Elwyn.Mexico and the Spanish Republicans.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55.

Snellgrove, L.E.Franco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London : Longmans , Green , 1965.

Sobrequés i Callicó, Jaume , ed.Història de Catalunya.Vol.XII.Bilbao : Editotial La Gran Enciclopedia Vasca , 1982.

Sola, Victor María de , and Martel, Carlos.Estelas gloriosas de la Escuadra Azul.Cádiz : Ceron , 1937.

——.Proa a España.Cádiz : Ceron , 1937.

Solana, Fermín , ed.Historia parlamentaria del socialismo: Julián Besteiro.Vols.I , II.Madrid : Taurus , 1975.

\*Solano, Wilebaldo.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 "Notas sobre el POUM en la Revolución de 1937 : El Período de Clandestinidad." Copy of typescript.

———. The Spanish Revolution: The Life of Andrés Nin. London :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 [1972?].

Soldevila, Ferran , and Bosch Gimpera, Pere. Història de Catalunya. Mexico City : Col·lecció Catalònia , 1946.

Soléi Sabaté, Josep M. La represió franquista a Catalunya, 1938-1953. Barcelona : Edicions 62 , 1985.

Soler, Juan M. La guerra en el frente de Aragón. Barcelona : Mi Revista , 1937.

Solé-Tura, Jordi. Catalanismo y revolución burguesa. Madrid : Cuadernos para el Diálogo , 1974.

Sommerfield, John. Volunteer in Spain. New York : Knopf , 1937.

Somoza Silva, Lázaro. El General Miaja: Biografía de un héroe. Mexico City : Tyris , 1944.

Sonadellas, Concepción. Clase obrera y revolución social en España, 1936-1939. Madrid : Zero , 1977.

Soria, Georges. Guerra y revolución en España. Vols. I , II , III , IV ,

V.Barcelona : Grijalbo , 1978.

——.Trotskyism in the Service of Franco: A Documented of Treachery by the POUM in Spain.London : Lawrence and Wishart , 1938.

Souchère, Eléna de la.An Explanation of Spain.New York : Random House , 1964.

Souchy, Agustín.Anarcho-syndikalistenüber Bürgerkrieg und Revolution inSpanien.Darmstadt : März Verlag , 1969.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Entre los campesinos de Aragón.Barcelona : Tierra y Libertad , 1937.

\*——.Interview ,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Nachtüber Spanien: Bürgerkrieg und Revolution in Spanien.Darmstadt : Freie Gessellschaft , 1954.

——.El socialismo libertario.Havana : Editorial Estudios , 1950.

——.Los sucesos de Barcelona.Valencia : Ebro , 1937. ( Although this booklet does not bear Souchy' s Name , it is undoubtedly the original Spanish Text of The Tragic Week in May , whose title page does carry his name as author. )

——.The Tragic Week in May.Barcelona : Oficina de Información

Exterior de la CNT-FAI , 1937. ( See Los sucesos de Barcelona for original Spanish Text. )

——.La verdad sobre los sucesos en la retaguardia leal.Buenos Aires : F.A.C.A. , 1937.

Souchy, Agustín , and Folgare, Paul.Colectivizaciones: La obra constructiva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Barcelona : Fontamara , 1977.

Southworth, Herbert R.Antifalange.Paris : Ruedo Ibérico , 1967.

——.La destrucción de Guernica.Paris : Ruedo Ibérico , 1975.

——.El mito de la cruzada de Franco.Barcelona : Plaza y Janés , 1986.

——.El mito de la cruzada de Franco.Paris : Ruedo Ibérico , 1963.

——.Le mythe de la croisade de Franco.Paris : Ruedo Ibérico , 1964.Revised edition of Spanish text.

Sovetskaia voennaia entsiklopediia.Moscow : Voennoe Izdatel' stva , 1978.

Sovetskie pisатели.Vol.I.Moscow : Gos.Izd-vo Khudozh , Lit-ry , 1959.

The Soviet Diplomatic Corps, 1917-1967.Compiled by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USSR , Munich.Metuchen , N.J. : Scarecrow Press , 1970.



"Soviet newspapers." Translations by X.J.Eudin of articles in Pravda and Izvestiia (Hoover Institution, Bolloten Collection).

Los Soviets en España: La lucha por el poder, por la república obrera y campesina en España. Paris : Sudam , 1935.

Spain. Consejo nacional de educación premilitar física y cultural de la juventud. Consejo nacional de educación premilitar física y cultural de la juventud. Valencia : Alerta , 1937.

——. 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7 de octubre: Una nueva era en el campo. Madrid , 1936.

——. Ministerio fiscal. Tribunal Supremo. Causa general: La dominación roja en España. Madrid : Ministerio de Justicia , 1943.

\*——. Ministry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Documents on Battle for Teruel. Confidential reports on the progress of the republican offensive against Teruel , 31 December 1937-8 January 1938 , by defense minister Indalecio Prieto. These copies were given to Burnett Bolloten by Francisco Giner de los Ríos , son of the 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s.

Spain. London : International Brigade Wounded and Dependents' Aid Committee , 1938.

Spain against the Invaders. London : United Editorial , 1938.

Spain: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Priests, Freemasons and Liberals Shot by the Rebels. London : Spanish Embassy , 1937.

Spain defends Democracy. New York : 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 , 1936.

Spain emergency Committee Deputations. Deputation to the Prime Minister , 7 Jan. , 1939. Deputation to M. rAtlee , Mr. Alfred Barnes , Sir Archibald Sinclair , 24 Jan. , 1939. N.p. , n.d.

Spain: Internal and Foreign Affairs, 1930-1939: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Sixty-six microfilm reels. Frederick , Md. :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 1986.

Spain Organises for Victory. London :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 1937.

Spain' s Democracy Talks to America. New York : American League against War and Fascism , 1936.

Spain' s War of Independence. Washington , D.C. : Spanish Embassy , 1938.

Spain' s War of Independence: President Azaña, Premier Negrín, Defense Minister Prietp, Alvarez del Vayo, Martínez Barrio, and Portela Valladares Put the Case of the Spanish Republic before the World. Washington , D.C. : Spanish Embassy , 1937.

Spain: The Elections of February 16th, 1936. London : Press

Department of the Spanish Embassy , 1936.

Spain: What Next? London :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 1939.

"The Spanish Civil War." Six-part TV series , edited by Ronald Fraser , Hugh Thomas , and Javier Tusell.England : Granada Television.

Spanish Communists in the Kremlin and in the White House.n.p. , n.d.

Spanish Gold.London :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 1937.

Spanish Information Bureau , New York.American Democracy vs.the Spanish Hierarchy.New York : Spanish Information Bureau , 1937.

Spender, Stephen.The Thirties and After: Poetry, Politics, People, 1933-1975.New York : Random House , 1978.

Sperber, Murray A. , ed.And I Remember Spain.New York : Macmillan , 1974.

SSSR i fashistskaia agresiiia v Ispanii: Sbornik dokumentov.Moscow : Gosudarstvennoe Sotsial' no-Ekonomicheskoe Izdatelstvo , 1937.

Stache, Rud.Armeemit geheimen Auftrag.Bremen : Henry Burmester , n.d.

Stackelberg, Karl-George von.Legion Condor: Deutsche Freiwillige in Spanien.Berlin : Die Heimbücherei , 1939.

Stalin, Iosif. Sochineniia. Moscow : OGIZ , Gosdarstvennoe izdatel' stvo politichskoi literatury , 1946-1955. Vol. VII.

Stansky, Peter , and Abrahams, William. Journey to the Frontier: Two Roads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Boston : Little , Brown , 1966.

———. Orwell: The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 Knopf , 1980.

———. The Unknown Orwell. New York : Knopf , 1972.

Starobin, Joseph. The Life and Death of an American Hero: The Story of Dave Doran. New York : New Age , 1938.

Steer, G.L. The Tree of Gernika. London : Hodder and Stoughton , 1938.

Stefanov, Boris. "Las Causas de la Derrota de la República Española ( en ruso ) ." Madrid : Archivo Histórico del Comité Central del PCE , Carpeta 58 ( in Russian ) . A photocopy is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 Bolloten Collection.

Stimson, Henry L. , and Bundy, McGeorge.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 Harper and Btos. , 1948.

The Story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attalion. New York : Friends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attalion , 1937.

Stoye, Johannes. Spanien im Umbruch. Berlin : Teubner , 1938.

Straight, Michael. After Long Silence. London : Collins , 1983.

Strong, Anna Louise. Spain in Arms, 1937. New York : Henry Holt , 1937.

The Struggle in Spain. New York : Fortune , 1937.

Suárez, Andrés [Ignacio Iglesias]. El proceso contra el POUM. Paris : Ruedo Ibérico , 1974.

Los sucesos de Barcelona. Valencia : Ebro , 1937. This was without doubt written by Agustín Souchy and is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Tragic Week in May , which bears his name as author.

Los sucesos de anyo en Barcelona. New York : Federación Local de Grupos Libertarios , n.d.

Sueiro, Daniel. La flota es roja. Barcelona : Argos Vergara , 1983.

Suero Roca, M.teresa. Militares republicano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 Barcelona : Península , 1981.

Suero Sánchez, Luciano. Memorias de un campesino andaluz en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Madrid: Queimada , 1982.

Suñer, Enrique. Los intelectuales y la tragedia española. San Sebastian : Editorial Española , 1938.

Sutton, Antony C. Wall Street and the Rise of Hitler. Seal Beach , Calif. : ' 76 Press , 1976.

Symons, Julian. The Thirties: A Dream Revolved. London : Cresset ,

1960.

Tabouis, Geneviève. *Blackmail or War*. England : Penguin Books , 1938.

———. *Ils l' ont appelée Cassandre*. New York : Editions de la Maison Française , 1942.

Tagüeña Lacorte, Manuel. *Testimonio de dos guerras*. Maxico City : Oasis , 1974.

Talón, Vicente. *Arde Guernica*. Madrid : Toro , 1973.

Tamames, Ramón. *España, 1931-1975: Una antología histórica*. Barcelona : Planeta , 1980.

Tamames, Ramón , et al.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Una reflexión moral 50 años después*. Barcelona : Planeta , 1986.

\*Tarradellas, José.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Tarragona, Eduardo. *Las elecciones de 1936 en Cataluña*. Barcelona : Bruguera , 1977.

Tarrés i Claret, Pere. *Diari de guerra, 1938-1939*. Montserrat : Abadia , 1979.

Tasis i Marca, Rafael. *La revolución en los ayuntamientos*. Paris : Asociación Hispanophile de France , 1937.

Taylor, A.J.P. English History, 1914-1945.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65.

———.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 Hamilton , 1961.

Taylor, Foster Ja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 Bookman , 1956.

Tedeschi, Paolo. Guadalajara. Paris : Coltura Sociale , 1937.

Templewood, Viscount. See Hoare, Sir Samuel.

Tercer avance del informe official sobre los asesinatos, violaciones, incendios y demás depredaciones y violencias cometidas en algunos pueblos del centro y mediodía de España por las hordas marxistas al servicio del llamada gobierno de Madrid. Seville : Estado Español , 1936.

Tercer congreso de la UGT a Catalunya. Informe de Josep del Barrio. Barcelona : Ediciones UGT , 1937.

Téry, Simone. Front de la liberté. Paris : Editions Sociales Internationales , 1938.

Thalmann, Clara , and Thalmann, Paul. Revolution für die Freiheit. Hamburg : Verlag GMBH , 1976.

Thomas, Hugh. The Spain Civil War. London : Eyre and Spottiswoode ,

1961.

——.The Spain Civil War.Rev.ed.Harmondsworth , England : Penguin Books , 1965.

——.The Spain Civil War.Rev.ed.New York : Harper and Row , 1977.

Thompson, Dorothy.Let the Record Soak.Boston : Houghton Mifflin , 1939.

Thompson, Neville.The Anti-Appeasers:Conservative Opposition to Appeasement in the1930s.Oxford : Clarendon , 1971.

Thorning, Joseph F.Professor de los Ríos Refuses Himself.New York : Paulist Press , 1937.

Three Years of Struggle in Spain.London : Freedom Press , 1939.

Tijomírov, Mijaíl.El general Lukács: Novela.Moscow : Progreso , [1953?]

The Times.The History of the Times.London : Office of the Times , 1935-1952.

Timmermans, Rodolphe.Heroes of the Alcázar.London : Eyre and Spottiswoode , 1937.

Togliatti, Díaz, Carrillo: Los comunistas y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Barcelona : Bruguera , 1979.



- Togliatti, Palmiro. Escritos políticos. Prologue by Adolfo Sánchez Vázquez. Mexico City : Era , 1971.
- . Escritos sobre la guerra de España. Barcelona : Crijalbo , 1980.
- Tökés, Rudolf L. Béla Kun and the Hungarian Soviet Republic. Stanford : Hoover Institution by F.A. Praeger , 1967.
- Tomás, Pascual. Discurso en el "Gran Prince" de Barcelona, el día 17 de enero de 1937. Barcelona : Unio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 1937.
- Tommasini, Umberto. L' anarchico triestino. Milano : Antistato , 1984.
- Torre Enciso, C. , and Zegri, D. Muro. La marcha sobre Barcelona. Barcelona , Editora Nacional , 1939.
- Torres, Estanislau. La caiguda de Barcelona 1939. Barcelona : Galba , 1978.
- Torriente Brau, Pablo de la. Peleando con los milicianos. Mexico City : México Nuevo , 1938.
- Toryho, Jacinto. Del triunfo a la derrota. Barcelona : Argos Vergara , 1978.
- . La independencia de España. Barcelona : Tierra y Libertad , 1938.
- . No eramos tan malos. Madrid : Toro , 1975.

——.La traición del Señor Azaña.New York : Federación Libertaria , 1939.

Tosstorff, Reiner. "Die POUM während des Spanischen Bürgerkriegs, 1936-1939." Inauguraldissertastion. ( To be published in West Germany. ) A Copy of the dissertation is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 Bolloten Collection.

Toynbee, Arnold J.The International Repercussions of the War in Spain, 1936-1937.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38.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6.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Toynbee, Philip.Friends Apart: A Memoir of Esmond Romolly and Jasper Ridley in the Thirties.London : Macgibbon and Kee , 1954.

—— , ed.The Distant Drum.London : Sidgkson , 1976.

Trade Union and Labour Party Members' Delegation to Spain.Spain 1938: Report.London : International Brigade Wounded and Dependents' Aid Committee , 1938.

Traina, Richard P.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68.

Trautloft, Hannes.Als Jagdflieger in Spanien.Berlin : Nauch , n.d.

Trotsky, Leon. The Case of Leon Trotsky. New York : Harper and Brothers , 1937.

———. Escritos sobre España. Paris : Ruedo Ibérico , 1971.

———. Leçon d' Espagne. Paris : Pionniers , 1946.

———.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 1930-1940. Textes recueillis et présentés par Pierre Broué. Paris : Minuit , 1975.

———. 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1-1939. New York : Pathfinder , 1973.

Truth about Spain. London : Gollancz , 1938.

Tschapaiew: Das Bataikkon der 21 Nationen. Madrid : Torrent , 1938.

Tuñón de Lara, Manuel. La España del siglo XX, 1914-1939. Paris : Librería Española, 1973.

———. Historia de España. Vol. IX : La crisis del estado:

Dictadura, república, guerra, 1923-1939. Vol. XII : Textos y documentos de historia moderna y contemporánea ( siglos XVIII-XX ) . Barcelona : Editorial Labor , 1981.

———. El movimiento obrero en la historia de España. Madrid : Taurus , 1972.

———. La II República. Vols. I , II. Madrid : Siglo Veintiuno , 1976.

——, ed. La crisis del estado española, 1898-1936. Madrid : Edicusa , 1978.

——, ed. 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50 años después. Barcelona : Editorial Labor , 1985.

Tusell Gómez, Javier. Las elecciones del frente popular en España. Vols. I , II. Madrid : Edicusa , 1974.

——. Hijos de la sangre. Madrid : Espasa-Calpe , 1986.

——. Oligarquía y caciquismo en Andalucía, 1890-1923. Barcelona : Planeta , 1976.

——, ed. See also Araquistáin, Luis. Sobre la guerra y en la emigración.

Tusell Gómez, Javier , et al. Política y sociedad en la España del siglo XX. Madrid : Akal , 1978.

\*Ubach, Felipe. Interview ,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Udina, Ernest. Josep Tarradellas: L' aventura d' una fidelitat. Barcelona : Edicions 62 , 1978.

UGT: Ple extraordinary del comiténacional, 27-30 octubre 1937, Valencia. Barcelona : UGT , 1937.

Uhse, Bodo. Die erste Schlacht. Strasbourg : Prométhée , 1938.

Uj Magyar Lexikon. Budapest : Akademiai Kiado [1959-1962] , Vol.III.

Ulam, Adam B.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1973. New York : Praeger , 1974.

Ulmann, André. Les darreres hores de la república espanyola. Montpellier : Agit-Pro PSU , [1939?].

La Unió general de treballadors i la municipalització de serveis. Barcelona : UGT , 1937.

\* "Unpublished Article by a Regular Army Corporal." Photostatic copy of original document loaned to Burnett Bolloten by Jordi Arquer.

Urales, Federico. La anarquía al alcance de todos. Barcelona : Revista Blanca , 1932.

Urban, Joan Barth. Moscow and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From Togliatti to Berlinguer.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7.

Uribarri, Manuel. El SIM de la República. Havana , n.p. , 1943.

Uribarry Barutell, Manuel. Sin contestar. Valencia : Ruig , 1937.

Uribe, Vicente. Los campesinos y la república. Valenci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8.

———. "Memorias" ( typescript ) . Madrid : Archivo Histórico del

Comité Central de PCE , Carpeta 60. Photocopy in Hoover Institution ,  
Bolloben Collection.

——. Nuestra labor en el campo. Barcelon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7.

——. Nuestros hermanos los campesinos. Valenci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7.

——. La política agraria del partido comunista. Valenci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7.

——. El problema de las nacionalidades en España a la luz de la  
guerra popular por la independencia de la república  
española. n.p. : Ediciones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n.d.

Urra, Juan. En las trincheras del frente de Madrid. Madrid : Fermin  
Uriarte , 1966.

\*Usabiaga l' Abbé, Jean.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ben.

U.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83d Cong. , 1st sess. , 1953.

——. The Legacy of Alexander Orlov. Prepared by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93d  
Cong. , 1st sess. , 1973. Washington , D.C. :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1973.

——.Scope of Soviet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85th Cong. , 1st sess. , 1957 , 14 and 15 February 1957.Part 51.Washington , D.C. :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1957.

U.S.Department of State.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 1918-1945.Series C , Vols.IV , V , VI , and Series D , Vols.I , II , III , IV , V , VI.Washington , D.C. :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1949-198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 1936 and 1937.Vols.I , II.Washington , D.C. :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1954.

——.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1941: 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Edited by Ramond James Sontag and James Stuart Biddie.Washington , D.C. :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1948.

——.[Spain:]Internal and Foreign Affairs, 1930-1939: 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Sixty-six microfilm reels.Md. :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 1986.

U.S.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Subversive Activities Control Board.Docket No.108-153.Herbert Brownell, Jr. ,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 Oetitioner v.Veterand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 Respondent.Washington , D.C. : Subversive Activities Control Board , 1955.

Valdés, Miguel.Informe presentado en la primera conferencia nacional del partido socialista unificado de cataluña, ( I.C. ) por el secretario de organizacion del c.c.Barcelona : Agitación y Propaganda del PSUC , 1937.

Valdesoto, Fernando de.Francisco Franco.Madrid : Afrodisio Aguado , 1943.

Valera, Fernando.La república es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Discurso pronunciado a millares de ciudadanos el 11 de 1937 desde el local social de U.R., Valencia.Valencia , [1937?].

Válgoma, Carlos de.Mola: La vocación de servicio.Madrid : Pace , n.d.

Vallescà, Lluhí.Lluis Companys Jover.Mexico City , Grafos , 1944.

Van Alstyne, R.W.American Diplomacy in Action.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44.

Vanni, Ettore.Yo, comunista en Rusia.Barcelona : Destino , 1950.

Vansittart, Lord.The Mist Procession.London : Hutchinson , 1958.

Varela Rendueles, José.Rebelión en Sevilla: Memorias de su



gobernador rebelde, 1936-1939. Sevilla : Ayuntamiento , 1982.

Varga, Evgenii S. Ispaniia v revoliutsii. Moscow : Gos.Sots.-  
Ekon.Izd-vo , 1936.

Vaupshasov, Stanislav A. Na trevozhnykh perekrestkakh: Zapiski  
chekista. Moscow : Politizdat , 1971.

Vázquez, Mathilde , and Valero, Javier. La guerra civil en  
Madrid. Madrid : Giner , 1978.

Ventín Pereira, José Augusto. La guerra de la radio, 1936-  
1939. Barcelona : Mitre , 1986.

\*Verbatim report of a meeting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on  
the Aragón front in September 1936 given to Burnett Bolloten by  
Colonel José Villalba.

Vereeken, Georges. The GPU in the Trotskyist Movement. New York : New  
Park Publications , 1976.

La victoria exige el partido único del proletariado. Valencia :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 1937.

Vidal, Miguel. "El Campo Español." Decrees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Comments. Unpublished typescript given to Burnett  
Bolloten by the author , who was an official in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during the Civil War.

Vidali, Vittorio. See also Contreras, Carlos J.

———. *La caduta della repubblica*. Milan : Vangelista , 1979.

———. *Diary of the Twentie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Westport : Lawrence Hill , 1984.

\*———. *Interview , and conversations , notes taken by Burnett Bolloten*.

———. *El quinto regimiento*. Mexico City : Grijalbo , 1977.

———. *Spagna lunga battaglia*. Milan : Vangelista , 1975.

Vidarte, Juan-Simeón. *El bienio negro y la insurrección de Asturias*. Barcelona : Grijalbo , 1978.

———. *Todos fuimos culpables*. Mexico City :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 1973.

Viereck, Peter. *Shame and Glory of the Intellectuals*. Boston : Beacon Press , 1953.

Vignaux, Paul. *Manuel de Irujo: Ministre de la république dans la guerre d' Espagne, 1936-1939*. Paris : Beauchesne , 1986.

Vigón, Genaral Jorge. *General Mola: El conspirador*. Barcelona : AHR , 1957.

——.Milicia y política.Madrid : Instituto de Estudios Políticos , 1957.

Vilanova, Antonio.La defensa del Alcázar de Toledo.Mexico City : Mexicanos Unidos , 1963.

Vilar, Pierre.L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Barcelona : Crítica , 1986.

——.Historia de España.Barcelona : Grijalbo , 1979.

\*Villaiba, Colonel José.Report on the fall of Malaga to the Higher War Council, dated 1937.Typewritten copy of original document loaned to Burnett Bolloten by Colonel Villalba.

Villanueva, Francisco.Azaña, el gobierno.Mexico City : Moderna , 1941.

Villar, Manuel.España en la ruta de la libertad.Buenos Aires : Reconstruir , 1962.

Villarroya i Font, Joan.Els bombardeigs de Barcelona durant la guerra civil, 1936-1939.Montserrat : Abadia de Montserrat , 1981.

Viñas, Angel.La Alemania nazi y el 18 de julio.Madrid : Alianza , 1977.

\*——.Correspondence with Burnett Bolloten.

——.Guerra, Dinero, Dictadura.Barcelona : Grijalbo , 1984.

——.El oro de Moscú.Barcelona : Grijalbo , 1979.

——.El oro español en la guerra civil.Madrid : Instituto de Estudios Fiscales , Ministerio de Hacienda , 1976.

Viñas, Ricard.La formación de las 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 1934-1936.Madrid : Siglo XXI , 1978.

Vita, A.de.Battaglione Garibaldi, ottobre 1936-aprile 1937.Paris : Coltura Sociale , 1937.

Vmeste s patriotamiispanii.Kiev : Politicheskaia , 1976.

The Voice of the Church in Spain.London : Burns Oates and Washbourne , 1937.

Volta, Sandro.Spagna a ferro e fuoco.Florence : Vallecchi , 1937.

Volunteer for Liberty.Edited by Ralph Bates , Edwin Rolfe , and John Tisa.New York : Veterans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 1949.Organ of the English-speaking battal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Brigades.Reproduction of complete collection from 24 May 1937 through 7 November 1938.

Vorobev, Evgenii.Ia ne boius' ne byt' : Dokumental' naia povest' o geroe Sovetskogo Soiuza Pole Armane.Moscow : Politicheskaia Literature , 1982.

Voros, Sandor. American Commissar. Philadelphia : Chilton , 1961.

Watson, Keith Scott. Single in Spain. London : Barker , 1937.

Weinberg, Gerhard L.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 s Germany: Diplomatic Revolution in Europe, 1933-1936.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 s Germany, 1937-1939.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0.

———. Germany and Soviet Union. Leiden : Brill , 1954.

Weintraub, Stanley. The Last Great Cause: The Intellectuals and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 Weybright and Talley , 1968.

Weizsäcker, Ernst von. Memoirs of Ernst von Weizsäcker. Chicago : Regnery , 1951.

Welles, Sumner. The Time for Decision. New York : Harper , 1944.

Wendt, Bernd Jürgen. Economic Appeasement: Handel und Finanz in der britischen Deutschland-Politik, 1933-1939. Düsseldorf : Bertelsmann Universität Verlag , 1971.

Werth, Alexander. Which Way France? New York : Harper , 1937.

We Saw in Spain. London : Labour Party , 1937.

Wheeler-Bennet, John W. Munich: Prologue to Tragedy. New York : Duell , Sloan and Pearce , 1948.

Who' s Who in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New York and Munich : Saur , 1978.

Who Was Who in the USSR. Metuchen , N.J. : Scarecrow Press , 1972.

Who Was Who, 1961-1970. New York : St. Martin' s , 1972.

Wintringham, Tom. English Captain. London : Faber and Faber , 1939.

Wojna narodoworewolucyjna Hiszpanii. Warsaw : Wydawnictwo ministerstwa brony Narodowej , [1979].

Wolfe, Bertram D. Civil War in Spain. New York : Workers' Age , 1937.

———. Khrushchev and Stalin' s Ghost. New York : Praeger , 1957.

Wolfers, A. Britain and France between Two Wars. New York : Harcourt Brace , 1940.

Wood, Neal. Communism and British Intellectuals.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59.

Woodcock, George. Anarchism: A History of Libertarian Ideas and Movements. Cleveland :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 1962.

Wrench, John Evelyn. Geoffrey Dawson and Our Times. Foreward by The

Rt.Hon.Earl of Halifax.London : Hutchinson , 1955.

Wyden, Peter.The Passionate War.New York : Simon and Schuster , 19483.

Yagüe, María Eugenia.Santiago Carrillo, perfil humano y político.Madrid : Combio 16 , 1977.

Yakovlev, Alexander.The Aim of a Lifetime.Moscow : Progress , 1972.

Young, G.M.Syanley Baldwin.London : Rupert Hart-Davis , 1952.

Ypsilon [Julian Gumperz and Robert Rindl].Pattern for World Revolution.Chicago-New York : Ziff Davis , 1947.

Zaculúa, Juan Antonio.La resistencia socialista en Asturias, 1937.Madrid : Fundación Pablo Iglesias , 1986.

Zahn, Michael. "Der spanische Anarchosyndikalismus." Dissertation.Self published , 1979.Copy at Stanford University.

Zamacois, Eduardo.El asedio de Madrid.Havana : Aurora , 1939.

——.Crónicas de la guerra.Valencia : Subsecretaria de Propaganda , 1937.

Zambrano, María.Los intelectuales en el drama de España.Santiago : Panorama , 1937.

Zaragoza, Cristóbal. Ejército popular y militares de la república, 1936-1939. Prólogo de Ramón Garriga. Barcelona : Planeta , 1983.

Zilliacus, Konni ( "Vigilantes" ). Between Two Wars. Harmondsworth , England : Penguin , 1939.

——. Why We Are Losing the Peace. London : Gollancz , 1939.

Zilmanovich, Dmitrii Iakovlevich. Na Orbite bolshoi zhizni: Dokumentalno-memuarnoe povestvovanie o dvazhdy geroe Sovetskogo Soiuza Ia. V. Smushkeviche. Vilnius : Mintis , 1971.

Zugazagoitia, Julián. Historia de la guerra en España. Buenos Aires : La Vanguardia , 1940.

## 二、报纸和期刊

这里列出的只是本书正文或注释中所涉及的那些报纸和期刊。本书引述的资料可以在收藏于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博洛滕西班牙内战资料集中找到，包括装订成册的报纸、剪报、打印件副本、影印件和缩微胶片。请在“博洛滕”项下查阅（剪报和缩微胶片）。

ABC , Madrid.

ABC , Seville.

Acción Libertaria: Boletín Informativo sobre España , Buenos Aires.

Acción Socialista , Paris.



Acracia , Lérída.

L' Action Française , Paris.

Adelante , Alicante.

Adelante , Marseilles.

Adelante , Mexico City.

Adelante , Valencia.

El Adelanto , Salamanca.

L' Adunata dei Refrattari , New York.

Ahora , Madrid.

A.I.T. Servicio de Prensa , Stockholm.

The Alarm , San Francisco.

El Amigo del Pueblo , Barcelona.

Anarchist Review , Orkney.

Anarquía , Barcelona.

Antioch Review , Yellow Springs , Ohio.

Atlantic Monthly , Boston.

Avant , Barcelona.

La Batalla , Barcelona.

La Batalla , Paris.

BEIPI , Paris.

Boletín de Información ( CNT National Committee ) , Valencia.

Boletín de Información, CNT-FAI , Barcelona.

Boletín de Información y Orientación Orgánica del Comité Peninsular de la 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 , Barcelona.

Boletín de Orientación Bibliográfica , Madrid.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 Burgos.

Butlletí del Partit Socialista Català , Mexico City.

Butlletí Oficial de la 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 Barcelona.

Cahiers de l' Humanisme Libertaire , Paris.

Cahiers de l' I.S.E.A. , La Rochelle.

Cahiers Leon Trotsky , Paris.

Cambio 16 , Madrid.

Canadian Forum , Toronto ( Public Library of Toronto ) .

Canarias , Las Palmas.

Candide , Paris.

Carta Del Este , Madrid.

Castilla Libre , Madrid.

Catalunya , Barcelona.

Cenit , Toulouse.

Ce Soir , Paris.

Claridad , Madrid.

CNT , Madrid.

CNT , Paris.

CNT , Toulouse.

CNT-FAI-AIT Informationsdienst , Barcelona.

Colectivismo , Valencia.

Combat , Paris.

El Combatiente Rojo , Madrid.

Le Combat Syndicaliste , Paris.

Commonweal , New York.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 London.

El Comunista , Madrid.

Congreso de los Diputados. Diputación Permanente , Valencia ,  
Barcelona , Paris.

La Continental Obrera , Santiago , Chile.

Correo de Asturias , Buenos Aires.

La Correspondance Internationale , Paris.

La Correspondencia de Valencia , Valencia.

La Correspondencia Internacional , Paris.

Cuadernos para el Diálogo , Madrid.

Cuadernos Socialistas , Toulouse.

Cultura Proletaria , New York.

Cultura y Acción , Alcañiz.

Daily Express , London.

Daily Herald , London.

Daily Mail , London.

The Daily Telegraph , London.

Daily Worker , London.

Daily Worker , New York.

El Debate , Madrid.

Democracia , Madrid.

La Dépêche , Toulouse.

El Día Gráfico , Barcelona.

Dialéctica , Havana.

Diari de Barcelona , Barcelona.

Diario de Burgos , Burgos.

Diario de las Sesiones de Cortes , Madrid.

Diario de las Sesiones de la Diputación Permanente de las Cortes ,  
Madrid , Valencia , Barcelona , Paris.

Diario Oficial de la Generalitat de Catalunya , Barcelona.

Diario Oficial del Ministerio de Defensa Nacional , Valencia ( later  
Barcelona ) .

Diario Oficial del Ministerio de la Guerra , Madrid ( later  
Valencia ) .

Documentos Históricos de España , Buenos Aires.

Economies et Sociétés , Paris.

Encounter , London.

Enllà , Mexico City.

Ercilla , Santiago , Chile.

L' Ere Nouvelle , Paris.

Esfuerzo , Barcelona.

Espagne Antifasciste , Paris.

Espagne Nouvelle , Montpellier.

España Libre , New York.

España Libre , Paris.

España Libre , Toulouse.

España Nueva , Mexico City.

España Popular , Mexico City.

España Republicana , Buenos Aires.

Espoir , Toulouse.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 London.

Fight , London.

Foreign Affairs , New York.

Le Forze Armate , Rome.

IV International , Mexico City.

Fragua Social , Valencia.

Frente Libertario , Madrid.

Frente Rojo , Valencia.[Published in Barcelona in November 1937 , and in Figueras and Port Bou in February 1939.]

Frente y Retaguardia.[Place of publication not indicated.]

Full Català , Mexico City.

Gaceta de la República , Valencia , Barcelona.

Gaceta de Madrid , Madrid.

Il Grido del Popolo , Paris.

Guerra di Classe , Barcelona.

Guión , Madrid.

Hansard , London.

Heraldo de Aragón , Saragossa.

Hispanic American Report , STanford.

The Historian , London.

Historia 16 , Madrid.

Historia y Vida , Barcelona.

Hoja Oficial de Lunes , Barcelona.

Hoy , Mexico City.

La Humanitat , Barcelona.

L' Humanité , Paris.

Ideal , Granada.

Ideas , Hospitalet.

Independent News , Paris.



Indice , Madrid.

Informaciones , Madrid.

Información Española , Madrid.

Information Bulletin ( International Bureau for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 , New York.

Inquiétudes , Bordeaux.

Internacional , Paris.

Internac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 Yale.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L' Intransigeant , Paris.

Izvestiia , Moscow.

Le Jour , Paris.

Journal des Débats , Pari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 Lond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 London.

Justicia Social , Barcelona.

Juventud de España , Mexico City.

Juventud Libre , Madrid.

Komsomolskaya Pravda , Moscow.

The Labour Monthly , London.

Left News , London.

Left Review , London.

La Libertad , Madrid.

Le Liberaire , Paris.

Life , Chicago.

Linea de Fuego , Pueblo de Valverde.

Listener , London.

Llibertat , Mataró.

Lluita , Paris.

La Lutte Ouvrière , Paris.

Luz y Fuerza , Barcelona.

Man! , Los Angeles.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 Manchester.

Mar y Tierra , Altea.

El Mercantil Valenciano , Valencia.

Milicia Popular , Madrid.

Modern Monthly , New York.

Mujeres Libres , Barcelona.

Mundo , Mexico City.

Mundo Obrero , Madrid.

Mundo Obrero , Paris.

Nada Cuadernos Internacionales , Barcelona.

The Nation , New York.

The National Review , Lond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 New York.

The New Leader , London.

New Masses , New York.

New Militant , New York.

The New Republic , New York.

The News Chronicle , London.

The News of Spain , New York.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 London.

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 New York.

The New York Post , New York.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New York.

The New York Times , New York.

La Noche , Barcelona.

El Norte de Castilla , Valladolid.

Nosotros , Valencia.

Las Noticias , Barcelona.

El Noticiero , Saragossa.

El Noticiero Universal , Barcelona.

La Nouvelle Espagne Antifasciste , Paris.

Novyi Mir , Moscow.

Nuestra Bandera , Barcelona.

Nuestra Bandera , Paris.

Nuestra España , Havana.

El Obrero de la Tierra , Madrid.

The Observer , London.

Orientaciones Nuevas , Granollers.

Orto , Barcelona.

L' Osservatore Romano , Vatican City.

El País , Madrid.

Pasaremos , Madrid.

El Pensamiento Navarro , Pamplona.

El Poble Català , Mexico City.

Política , Madrid.

Il Pòpolo d' Italia , Rome.

Pravda , Moscow.

La Publicitat , Barcelona.

Pueblo , Madrid.

El Pueblo , Valencia.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 Paris.

Radio Liberty Research , Munich , New York.

Reader' s Digest , Pleasantville.

Recerques , Esplugues de Llobregat.

Reconstruir , Buenos Aires.

Regeneración , Mexico City.

La République , Paris.

Le Reveil , Geneva.

The Review , Brussels.

The Review of Politics , Notre Dame , Indiana.

La Revista Blanca , Barcelona.

Revista del Occidente , Madrid.

Revista Histórica y Vida , Madrid.

La Révolution Proletarienne , Paris.

Il Risveglio Anarchico , Geneva.

Rumbos Nuevos , Havana.

Ruta , Barcelona.

Saturday Evening Post , Philadelphia.

Saturday Review , New York.

Screen , London.

Service d' Information et de Presse por la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 Paris.

Slavic Review , Washington , D.C.

El Socialista , Algiers.

El Socialista , Madrid.

El Socialista , Paris.

El Socialista Español , Paris.

Socialist Appeal , New York.

Socialist Review , New York.

El Sol , Madrid.

Solidaridad Obrera , Barcelona.

Solidaridad Obrera , Mexico City.

Solidaridad Obrera , Paris.

Sotsialisticheskii Vestnik , Berlin , Paris , New York.

Soviet News , London.

Die Soziale Revolution , Barcelona.

Spain , London.

Spain and the World , London.

Spanish Labor Bulletin , Chicago.

Spanish Revolution , Barcelona.

Spanish Revolution , New York.

Spartacus , Alicante.

The Sunday Times , London.

Survey , London.

Le Temps , Paris.

Tiempo , Mexico City.



Tiempo de Historia , Madrid.

Tiempos Nuevos , Barcelona.

Tierra y Libertad , Barcelona.

Tierra y Libertad , Mexico City.

The Times , London.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 London.

Timón , Barcelona.

Timón , Buenos Aires.

Treball , Barcelona.

Tribuna , Mexico City.

Triunfo , Madrid.

Ultima Hora , Barcelona.

UmanitàNova , Rome.

Umbral , Barcelona.

Unión , Seville.

El Universal , Mexico City.

Universal Gráfico , Mexico City.

Universo , Toulouse.

Unser Wort , Brussels.

Vanguard , New York.

La Vanguardia , Barcelona.

Vanguardia , Mexico City.

Verdad , Valencia.

La Veu de Catalunya , Barcelona.

Vía Libre , New York.

Voelkischer Beobachter , Berlin.

Voenna-Istoricheski Zhurnal , Moscow.

The Volunteer for Liberty , Madrid , Barcelona.

La Voz Lenista , Madrid , Barcelona.

La Voz Valenciana , Valencia.

Vu , Paris.

Washington Post , Washington D.C.

Die Wehrmacht , Berlin.

Workers' Age , New York.

World Affairs Report , Stanford.

Ya , Madrid.